

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研究動機

冷戰結束後，中國崛起是否會使其戰略目標朝向在亞太(Asia-Pacific)地區朝向海洋發展，甚至追求將東亞納入其勢力範圍，進而導致與美國或其他周邊國家發生嚴重衝突，危及亞太安全，還是中國會持續融入當前的國際社會，甚至確實會走上胡錦濤政權提出的「和諧世界」路線，一直是國際關係學界關切的主要議題之一。

此一議題不僅涉及中國的戰略目標與意圖，亦與中國的戰略文化(Strategic Culture)有密切的關係，並帶有明顯的地緣政治性質。中國在古代乃是一個純粹的大陸帝國，但其地理位置適合同時向海洋與歐亞大陸發展，¹目前亦大力朝向海洋發展，中國軍事力量現代化與 2009 年以來對領土糾紛日趨強硬的態度加深了鄰國對中國戰略意圖的疑慮，當俄羅斯不復為中國最大的安全威脅，而中國卻因成為能源淨進口國，面臨必須確保其主要能源運輸通道—由印度洋經南海至中國的海上交通線安全(Sea Lanes of Communication, SLOCs)的新安全議題後，中國是否會為了保衛海上交通線與在東海和南海的主權而挑戰美國在亞太的海上優勢與地位，不僅為有關國家所關注，也是中國內部對未來發展方向的辯論焦點。²換言之，中國的「地緣戰略」(Geostrategy)已是目前重要的安全與戰略議題。而中國的戰略文化類型究竟為何，是否會引導中國崛起朝向穩定國際秩序的方向，不至於引發與美國的嚴重衝突，也成為國際關係學界日漸關注的焦點。但這些議題在目前的研究中，卻存在下列三方面的明顯不足：

一、地緣政治學、海軍戰略理論與國際關係理論的整合，及在中國研究中的運用

地理對國際關係的影響屬於地緣政治學(Geopolitics)的研究領域，而地緣戰略則為冷戰後期新興的新古典地緣政治學(Neoclassical Geopolitics)的主要研究議題。³在 20 世紀初曾盛極一時的地緣政治學因德國地緣政治學派(Geopolitik)的理

¹ Alfred T. Mahan, *The Problem of Asia: Its Effect up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Brunswick, NJ.(U.S.A.) and London(U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3), p. 98 and p. 106.

² 例如：葉自成、慕新海，「對中國海權發展戰略的幾點思考」，*國際政治研究*(北京)，2005 年第 3 期，2005 年 8 月，頁 5-17；倪樂雄，「從陸權到海權的歷史必然—兼與葉自成教授商榷」，*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市)，2007 年第 11 期，2007 年 11 月，頁 22-32；李義虎，*地緣政治學：二分論及其超越—兼論地緣整合中的中國選擇*(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年)；劉中民、王曉娟，「澄清中國海權發展戰略的三大思想分歧」，*學習月刊*(湖北省武漢市)，2005 年第 9 期，2005 年 9 月，頁 32-33、50。

³ V. D. Mamadouh, "Geopolitics in the nineties: one flag, many meanings," *GeoJournal*, Vol. 46, No. 4(December 1998), p. 238.

論被認為是納粹德國(Nazi Germany)的擴張行動依據，⁴並被冠以「地理決定論」(geographical determinism)的悲觀色彩，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遭到排斥。⁵然而，國家對外的政治行為始終受到經濟與地理兩大因素的推動，⁶國際衝突最常見的原因不外是為了領土、天然資源、貿易路線、能源、戰略要地等「地理目標」的控制權，⁷消極的目的在使潛在競爭對手無法增加國力，或對自己的安全構成更大的威脅，積極的目的則藉由控制這些地理目標，使本國獲得較潛在競爭對手更為有利的發展條件與安全環境。國家對本身與潛在競爭對手任何在地理目標控制上的變化，總是相當敏感。地理遂被視為「戰略之母」，⁸藉由限制國家與潛在威脅的地理環境與相對位置，影響各國的發展方向，對戰略、作戰與戰術目標的設定與工具選擇。

因此冷戰以來的國際政治與強權的大戰略(Grand Strategy)仍然充滿濃厚的地緣政治色彩，例如美國的圍堵政策(Containment)雖然延續了不允許任何單一強國控制歐亞大陸資源的傳統，⁹但從中可發現英國地緣政治學者麥金德(Halford Mackinder)的「心臟地帶理論」(Heartland Theory)與美國地緣政治學者史派克曼(Nicholas J. Spykman)的「邊緣地帶理論」(Rim Land Theory)等古典地緣政治學(Classical Geopolitics)理論的明顯成分；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對全球地緣政治結構(Geopolitical Structure)與地緣政治衝突觀點明顯繼承了麥金德的心臟地帶理論；¹⁰季辛吉(Henry Kissinger)更直接表示他對國際權力均衡(political

⁴ 其原因在於德國地緣政治學派的創始人與領導人物豪斯霍夫(Karl Haushofer)與包括希特勒(Adolf Hitler)在內的諸多納粹黨(Nazi)領導人有相當深厚的交情，後者受其理論的影響而採取侵略性擴張政策，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不過戰後的研究發現，豪斯霍夫根本就反對希特勒的種族與擴張政策，對納粹的外交其實並沒有影響力。請參考鈕先鍾，*西方戰略思想史*(臺北：麥田出版社，1995年)，頁438-445。

⁵ 吳志中，「地緣政治理論與兩岸關係」，*國際關係學報*，第18期(2003年12月)，頁106；蔣君章，*政治地理學原理*(臺北：中外出版社，1976年3月)，頁3；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5th ed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8; first edn published 1948), pp. 164-166.

⁶ Halford J. Mackinder, "The Physical Basis of Political Geography," *Scottish Geographical Magazine*, Vol. 6, Issue 2(February 1890), p. 84.

⁷ 約米尼(Antoine-Henri Jomini)於**戰爭藝術**(*The Art of War*)中利用歷史歸納法的途徑，列舉導致各類大小戰爭爆發的九種原因，其中廣義來說與地理相關的就有六種，包括收回或保護某種權利、保護和維持包括經濟在內的國家的最大利益、援助其存亡和本國的安全或均勢局面的維持具有必要關係的鄰國、用奪取土地的方式增加國家的勢力和權力、保衛國家的獨立不受威脅，以及滿足征服欲。另外，現實主義學者范艾弗拉(Stephen Van Evera)亦曾運用行為主義途徑針對國際戰爭的成因進行研究，他所列舉的戰爭發生原因也包括了與上述的各種地理因素相關的原因，即所謂的資源累積(cumulative resources)因素，此外他也引用攻守理論(Offense-Defense Theory)的主張，指出地理因素是影響國家攻勢或守勢偏好的重要影響因素。請參考Antonie Henri Jomini 著，鈕先鍾譯，**戰爭藝術**(臺北：麥田出版社，1996年)，頁23-24；Stephen Van Evera, *Causes of War: Power and the Roots of Conflict*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chapter 5 and p. 163。

⁸ Geoffrey Sloan and Colin S. Gray, "Why Geopolitics?" in Colin S. Gray and Geoffrey Sloan eds., *Geopolitics, Geography and Strategy* (London and Portland, Oregon: FRANK CASS Publishers, 1999), p. 3.

⁹ Stephen M. Walt, "The Case for Finite Containment: Analyzing U.S. Grand Strateg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 14, No. 1(Summer 1989), p. 9.

¹⁰ Gerry Kearns, *Geopolitics and Empire: The Legacy of Halford Mackind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2009), pp. 225-229.

equilibrium)的看法常受到地緣政治的影響；¹¹冷戰結束後，老布希(George H. W. Bush)政府仍然繼承冷戰的地緣政治原則，只是稍加修改為不允許在東亞與前蘇聯境內出現能重新掌握整個區域資源以建立威脅美國全球利益的強國，¹²並先後為柯林頓(Bill Clinton)、小布希(George W. Bush)等四任美國政府繼承。¹³

職是之故，原先忽視地理影響力的國際關係理論自 1980 年代起又開始逐漸恢復對地理的重視，例如沃爾特(Stephen M. Walt)的「威脅平衡論」(Balance of Threat Theory)、「攻守理論」(Offense-Defense Theory)。前者強調鄰近程度(proximity)對國家是否組成聯盟對抗潛在威脅有重要影響；¹⁴後者則認為地理對於戰爭行為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因此地理與科技會影響國家對採取攻勢與守勢的考量，當整體條件利於防禦時，戰爭便不容易發生，能夠降低國際無政府狀態中的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¹⁵此一趨勢由於冷戰結束後出現沒有相對應平衡聯盟的單極結構，導致權力平衡理論(Balance of Power Theory)備受質疑，而更加明顯。現實主義典範(paradigm)為了搶救作為理論核心的權力平衡概念，¹⁶紛紛加入了許多地理或地緣政治變數，以解釋為何國際體系沒有出現平衡美國單極的聯盟，使單極結構得以持續下去的中型理論，包括米爾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的攻勢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以及李維(Jack S. Levy)與湯普遜(William R. Thompson)的海陸霸權平衡差異，二者皆認為海洋或「巨大水體」(large bodies of water)能有效阻止國家向外投射權力，¹⁷因此國際結構不會形成對抗海洋霸權或者與其他強國之間隔著巨大水體的區域霸權，是國際權力分配之外能有效維持權力平衡的重要變數。¹⁸

然而現實主義典範對地緣政治的引用並不全面，也很少將這些修正理論運用於研究中國崛起，只有米爾斯海默與守勢現實主義(Defensive Realism)學者陸伯彬(Robert S. Ross)的研究較有系統，但二者的研究主要是基於攻勢與守勢現實主義邏輯，對於權力與地理兩個變數之間的相互關係缺乏妥善的處理，使其研究結果既非呈現出中國地緣戰略的真貌，且地緣政治分析充滿明顯的矛盾。米爾斯海默將地理視為國際權力結構的輔助因素之外，輔助解釋國家行為的中介變數，

¹¹ Henry Kissinger, *The White House Years* (Boston: Little Brown, 1979), p. 914.

¹² Simon Dalby, *Geopolitics, Grand Strategy and the Bush Doctrine* (Singapore: Institute of Defence and Strategic Studies, October 2005), pp. 12-13.

¹³ Department of Defense,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United States Security Strategy for the East-Asia-Pacific Region* (Washington D.C.: Pentagon, February 1995), p. 5 and p. 7; F. William Engdahl, "Russia, Europe and USA: Fundamental Geopolitics," *Global Research*, September 4, 2008, <http://www.globalresearch.ca/index.php?context=va&aid=10062>.

¹⁴ Stephen M. Walt, "Alliance Formation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9, No. 4 (Spring 1985), pp. 9-12.

¹⁵ Robert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 30, No. 2 (January 1978), pp. 167-214; Stephen Van Evera, "Offense, Defense, and the Causes of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2, No. 4(Spring 1999), p. 19.

¹⁶ 鄭端耀，「搶救權力平衡理論」，發表於國際關係理論學術研討會(台北：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與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會主辦，2010年5月21-22日)，頁9。

¹⁷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2001), p. 86 and pp. 271-272.

¹⁸ Jack S. Levy and William R. Thompson, "Balancing on Land and at Sea: Do States Ally against Leading Global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5, No.1(Summer 2010), pp. 7-43.

其攻勢現實主義邏輯認為國家戰略的目的在追求權力最大化，最後必然引起大國之間戰爭的悲觀態度，故中國崛起很可能引發美中之間的戰爭，¹⁹但其理論中的地理變數卻主張巨大水體能阻礙國家對外投射武力，維持國家之間權力平衡的作用要比共同邊界來得有效，而中美之間隔著太平洋，要如何解釋中國會因此與美國發生衝突？²⁰陸伯彬將地理提升至與國際權力結構一樣的獨立變數地位，²¹認為地理對於陸權向海洋與海權向陸地實施戰略擴張的阻礙，將使美國與中國各自安於其在東亞的戰略地位與利益，區域秩序因而得以在中國崛起的過程中保持穩定。²²然而，假使海陸性質對強權擴張與衝突模式具有絕對的主導功能，要如何解釋過去三個世紀以來，陸權在歐亞大陸的戰略擴張與其海洋戰略發展每每引起海權的干預並導致戰爭？假使中國無法順利向海洋發展並威脅美國，而兩極結構又是最穩定的結構形式，陸伯彬又何必在 2009 年改變看法，擔憂中國的海軍發展並建議美國加強在亞太的軍事部署？²³此外，米爾斯海默與陸伯彬兩人的研究，都沒有從海軍戰略與海洋戰略的角度分析中國的戰略與目的是否真的希望成為與英國、美國一樣的海權，或希望成為什麼樣的海洋國家，而這卻是對中國地緣戰略研究的重點。

國際關係理論之外的戰略研究對中國地緣戰略的研究比較集中於中國的軍事戰略，特別是在軍種戰略(例如海軍)層面與作戰層面，雖然這使他們改善了國際關係學者的研究缺陷，但也造成了其他問題。首先，戰略研究者如荷姆斯(James Holmes)與吉原俊井(Toshi Yoshihara)，使用馬漢的海軍地緣戰略研究途徑對中國海洋與海軍戰略發展進行分析，²⁴但中國海洋與海軍戰略發展是否確實如他們所想像的，受到馬漢的極大影響？從柯爾(Bernard D. Cole)與王俊評的研究來看，²⁵中國海軍戰略的發展受到蘇聯的影響更大，與馬漢並沒有太多關連。其次，這些戰略研究並未真正深入分析中國的地緣戰略，正如本章第三節將指出的，海洋與海軍戰略的層次低於地緣戰略，僅研究中國的海洋與海軍戰略並無法窺知其地緣

¹⁹ Zbigniew Brzezinski and John J. Mearsheimer, "Clash of the Titans," *Foreign Policy*, No. 146(Jan/Feb 2005), pp. 47-48, p. 49, and p. 50; John J. Mearsheimer, "The Rise of China Will Not Be Peaceful at All," *The Australian*, November 18, 2005, <http://mearsheimer.uchicago.edu/pdfs/P0014.pdf>.

²⁰ 關於米爾斯海默在這個邏輯上的矛盾，可參考 Christopher Layne, "The 'Poster Child for offensive realism': America as a global hegemon," *Security Studies*, Vol. 12, No. 2(Winter 2002/3), pp. 126-127.

²¹ Robert S. Ross, "The Geography of Peace: East Asi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2(Spring 1999), p. 82.

²² *Ibid.*, pp. 81-118.

²³ Robert S. Ross, "China's Naval Nationalism: Sources, Prospects, and the U.S. Respons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4, No. 2(Fall 2009), pp. 46-81.

²⁴ James R. Holmes and Toshi Yoshihara, *Chinese Naval Strategy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Turn to Mahan* (London: Routledge, 2008); James R. Holmes and Toshi Yoshihara, "China's Naval Ambitions in the Indian Ocean," *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31, No. 3, June 2008, pp. 367-394; James R. Holmes and Toshi Yoshihara, "Historic Rhymes: The German Precedent for Chinese Sea Power," *Orbis*, Vol. 54, No. 1(Winter 2010), pp. 14-34; Thomas M. Kane, *Chinese Grand Strategy and Maritime Power* (London • Portland, OR.: FRANK CASS PUBLISHERS, 2002).

²⁵ Bernard D. Cole, "China's Maritime Strategy," in Susan M. Puska eds.,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fter Next* (Carlisle, Pennsylvania: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U.S. Army War College, 2000), p. 319; 王俊評,「制海權與中國海軍戰略」,《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11 卷第 1 期(2010 年 1 月),頁 131-178。

戰略的全貌。最後，這方面的研究並沒有與國際關係理論相結合，亦未根據更深入的海軍戰略理論，使其在安全研究方面的理論化仍相當不足。

二、對中國戰略文化的研究不足

就中國這樣一個擁有悠久歷史的大國而言，歷史遺產對於其當代戰略行為必然有深刻的影響。如同王賡武(Wang Gungwu)所言，雖然歷史不會直線性地發展與重演，但像中國這樣擁有悠久歷史的國家，根基深厚的古代遺產必然會以許多不同方式重現，當代中國自 1949 年以來至少就重現了秦漢的崛起、隋唐的復興與對外開放的世界性格，以及像明清時代那樣利用主權邊界觀念區隔自我與外國的種族觀念與國家建構。²⁶雖然 1990 年代中期以後國際關係學界對中國戰略文化的研究，已經發展到認為中國同時存在以儒家為代表的柔性戰略文化，以及與西方國家毫無二致，具有強調「備戰」(parabellum)邏輯的強現實政治戰略文化，²⁷但專門從中國歷史切入，全面分析中國戰略文化的國際關係研究仍不多見，大多數研究係從儒家思想切入，歷史分析途徑僅集中探討明清以後的中國歷史，對於宋元之前的發展甚少著墨或僅作簡要的分析，²⁸尤其是根據中國古代經典、官方文獻與史書記載的戰略研究，更遑論結合地緣政治分析對中國戰略文化的研究。²⁹這使得國際關係學者很難瞭解中國戰略文化的全貌，無從得知其歷史遺產對其當代戰略行為可能發生何種影響。

西方國際關係學界幾乎不存在這些研究的一個重要原因，可能在於語言與中文古典文獻運用上的劣勢，但即使具有語言優勢、能夠從中文古籍中對此進行研究的華人學者也少有此種研究，少數進行與中國古代歷史和當代國際關係理論相結合的學者如王元綱，其研究也仍與其他西方學者一樣停留在宋朝，未進一步作更全面的分析。而許田波(Victoria Tin-Bor Hui)雖然以春秋戰國時代的華夏國際體系為主要的研究對象並結合了權力平衡理論，但其研究卻沒有觸及中國的戰略文化。至於中國出身的學者，雖然不受語言與古典文獻運用的限制，但他們經常受到中國內部政治環境與政策目的的影響，無法真正客觀、深入研究中國戰略文化的發展，例如為了證明中國的戰略文化本質是「愛好和平」，而且有助於中國的

²⁶ Wang Gungwu, "The Cultural Impactions of the Rise of China on the Region," in Kokubun Ryosei and Wang Jisi eds., *The Rise of China and a Changing East Asian Order* (Tokyo: Jap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 2004), p. 83 and p. 86.

²⁷ 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Andrew Scobell, *China's Use of Military Force: Beyond the Great Wall and the Long March* (Cambridge, UK.;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9-25.

²⁸ 例如 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Andrew Nathan and Robert S. Ross, *The Great Wall and the Empty Fortress: 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1998), chapter 2; David C. Kang, *East Asia Before the West: Five Centuries of Trade and Tribu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²⁹ 西方國際關係學界在這方面目前比較完整的研究，目前仍只有 Michael D. Swaine and Ashley J. Tellis, *Interpreting China's Grand Strateg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Santa Monica, California: Rand, 2000), chapter 3; Ross Terrill, *The New Chinese Empire and What It Mea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3), chapter 2 and chapter 3.

「和平發展」與促進「和諧世界」的建構，中國學者們試圖將儒家政治文化與戰略文化相結合，這種現象尤以出身軍方的學者為明顯。³⁰但正如本章將在第四節的研究方法中所指出，戰略文化不是政治文化在國家戰略行為上的單純轉化，而是國家長期以來應對外來威脅的經驗與行為模式。從中國學者—特別是國際關係學者—對戰略文化的研究可發現，他們並非不理解這一點，³¹但仍無法完全跳脫出既有的研究限制，而且也與西方學者一樣，未從中國歷史切入，同時進行橫向與縱向的深入分析。

三、未針對「和諧世界」與國際安全進行理論化的分析

根據胡錦濤在 2005 年 9 月 15 日的聯合國大會演說，和諧世界的概念大致上包括四點主要意見，每項主要意見之下又再衍生出其他補充：

「第一，堅持多邊主義，實現共同安全。…各國應該…摒棄冷戰思維，樹立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的新安全觀，建立公平、有效的集體安全機制，共同防止衝突和戰爭，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聯合國作為集體安全機制的核心…憲章確定的宗旨和原則…已經成為公認的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必須得到切實遵循。安理會…維護世界和平的權威必須得到切實維護。…鼓勵和支持以和平方式，通過協商、談判解決國際爭端和衝突，

第二，堅持互利合作，實現共同繁榮。…積極推動建立健全開放、公平、非歧視的多邊貿易體制，進一步完善國際金融體制…加強全球能源對話和合作，共同維護能源安全和能源市場穩定…積極促進和保障人權…發達國家應該為實現全球普遍、協調、均衡發展承擔更多責任…發展中國家要…廣泛開展南南合作…。

第三，堅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諧世界。…歷史文化、社會制度和發展模式的差異不應成為各國交流的障礙，更不應成為相互對抗的理由。…尊重各國自主選擇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的權利…推動各國根據本國國情實現振興和發展…加強不同文明的對話和交流…努力消除相互的疑慮和隔閡…以平等開放的精神…促進國際關係民主化，協力建構各種文明兼容並蓄的和諧世界。

第四，堅持積極穩妥方針，推進聯合國改革。…要通過改革安理會，優先增加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非洲國家的代表性…讓更多國家特別是中小國家有更多機

³⁰ 例如宮玉振，**中國戰略文化解析**（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2 年），頁 71-144；李際均，**軍事戰略思維**（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增訂版，1998 年），頁 237-241；江西元，「試析和和諧世界與中國戰略文化重塑」，**教學與研究**（北京），第 2 期（2009 年），頁 59-66；門洪華，「中國戰略文化的重構：一項研究議程」，**教學與研究**（北京），第 1 期（2006 年），頁 59-60；杜永吉，「論中國戰略文化的近代流變」，**軍事歷史研究**（上海），第 3 期（2005 年），頁 143-143；李曉燕，「中國明代戰略文化與儒家文化一致性的研究—與江憶恩商榷」，**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第 10 期（2008 年），頁 66-76。其中，宮玉振、杜永吉與李際均都是軍方出身的學者，故其研究的內容比起門洪華、李曉燕等非軍方背景的一般國際關係學者更強調儒家思想與中國戰略文化的結合，以及中國戰略文化的「和平性」。

³¹ 秦亞青，「國家身份、戰略文化和安全利益——關於中國與國際社會關係的三個假設」，**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第 1 期（2003 年），頁 10-15、77；李少軍主編，**國際戰略報告：理論體系、現實挑戰與中國的選擇**（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第一版，2005 年），第十章；李曉燕，「文化、戰略文化、國家行為」，**外交評論**（北京），第 4 期（2009 年），頁 83-93。

會參與安理會決策。改革涉及各國利益，應該充分協商，在達成廣泛共事的基礎上做出決定」³²

上述的四點演講意見，在胡錦濤於 2006 年 8 月 23 日的中共中央外事會議上的講話，以及 2007 年 10 月中共十七大上的工作報告中，進一步濃縮為下列的概念：

中共中央外事會議的講話：「致力于同各國相互尊重、擴大共識、和諧相處，尊重各國人民自主選擇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的權利，堅持各國平等參與國際事務，促進國際關係民主化；致力于同各國深化合作、共同發展、互利共贏，推動共享經濟全球化和科技進步的成果，促進世界普遍繁榮；致力于促進不同文明加強交流、增進了解、相互促進，倡導世界多樣性，推動人類文明發展進步；致力于同各國加深互信、加強對話、增強合作，共同應對人類面臨的各種全球性問題，促進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維護世界和地區安全穩定。」³³

中共十七大工作報告：「遵循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恪守國際法和公認的國際關係準則，在國際關係中弘揚民主、和睦、協作、共贏精神。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協商，共同推進國際關係民主化；經濟上相互合作、優勢互補，共同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均衡、普惠、共贏方向發展；文化上相互借鑒、求同存異，尊重世界多樣性，共同促進人類文明繁榮進步；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強合作，堅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戰爭手段解決國際爭端，共同維護世界和平穩定；環保上相互幫助、協力推進，共同呵護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球家園。」³⁴

目前，國際關係理論三大典範(paradigm)雖然各自依照本身的理論邏輯，發展對中國崛起與國際安全的研究，但胡錦濤政權所提出的「和平發展/崛起」與「和諧世界」概念，似乎難以在當代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中找到類似的對應概念，使得雖然胡錦濤在 2005 年 9 月就提出「和諧世界」的概念，但西方國際關係學界迄今仍未對此進行理論性的研究。然而，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確實也有包含權力平衡，但同樣強調多邊國際合作與國際建制(international regime)重要性，又與「和諧世界」概念類似的體系穩定概念，此即久已被國際關係學界忽略的「均衡」(equilibrium)概念。均衡是國際關係理論與地緣政治學中經常出現但缺乏明確定義的概念，³⁵如第三章將進行的分析所指出的，均衡在國際關係理論中比較一致的概念指的是藉由多邊國際合作與國際建制來維持的長期體系穩定狀態，而非現實主義典範中指涉的國際權力平均分配的理想化均衡概念，前者並不一定涉及國際權力的分配，但一個有助於穩定的權力平衡是達成均衡的主要工具之一，其他

³² 「胡錦濤在聯合國成立 60 週年首腦會議上的講話(全文)」，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05 年 9 月 16 日，<http://www.fmprc.gov.cn/chn/pds/ziliao/zyjh/t212365.htm>。

³³ 姜華宣張蔚萍、尚珺主編，**中國共產黨重要會議紀事(1921-2011)**(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 年)，頁 1220。

³⁴ 胡錦濤，「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奪取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鬥」，中共中央文獻室編，**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 年)，頁 36。

³⁵ James E. Dougherty and Robert L. Pfaltzgraff, Jr. eds., *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omprehensive Survey* (New York: Longman, 2001), p. 115.

工具尚包括各種地緣政治利益的妥協與各國均能接受的安排之達成與共同維護體系穩定的多邊國際建制之設立與運作。假使國家的戰略目標真正在追求建立此一長期穩定的均衡，必然會試圖與他國達成各種戰略上的妥協與長期合作關係，甚至建立能讓各主要國家皆在其中一起合作維持體系穩定的國際建制。

事實上，從現實主義典範為了維護權力平衡理論而引入地理變數，以及其他試圖解釋權力平衡仍然有效的現實主義中型理論，如新古典現實主義(Neoclassical Realism)學者施維勒(Randall L. Schweller)主張國內因素造成國家不願意追求權力平衡而形成體系中的制衡不足(underbalancing)或不制衡(nonbalancing)等現象，或如部分英國學派(English School)學者與霸權穩定論(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所主張的，是藉由國際制度、國際規範運作、霸權提供國際體系穩定必要的公共財、體系中滿足現狀與不滿足現狀成員之間的互動等可知，³⁶權力平衡理論多元化提出權力之外多重變數的真正意義在於，有利於本身的體系秩序的長期「穩定」才是國家真正追求的目標，國際權力分配是否平衡只是此一邏輯下的附帶考量。但可能因為均衡的概念較為抽象與複雜，使得國際關係學界長期以來忽略對此一概念的整理與發展，致使其未被運用來檢視中國在胡錦濤政權下提出的「和平發展/崛起」、「和諧世界」等概念。

正是因為目前的國際關係與戰略研究學界，對於中國崛起的地緣政治、地緣戰略、戰略文化，以及最終戰略目標和亞太安全之間的關係，存在上述的理論研究不足與缺陷，使得迄今對中國地緣戰略的認識仍然相當不完整與片面，至於其對亞太區域安全的影響則更有待進一步的研究。本論文的主要目的即在試圖結合地緣政治學、戰略文化研究、海軍戰略研究、權力平衡理論等多重理論與研究途徑，分析中國地緣戰略的本質、方向、重心、目的，檢驗其戰略企圖是否為重建以其為核心的東亞區域國際體系，並因此與周邊國家乃至美國發生衝突，使得亞太地緣政治次體系朝美中對峙的局勢發展，或者中國確實願意奉行「和平發展/崛起」的路線，與其他亞太國家一起合作維持亞太的長期穩定，真正建構能達成亞太地區均衡的「和諧世界」。

第二節、研究目的與假設

本論文的問題意識在於，中國是否將與其古代帝國一樣，在力量強大時追求以武力或其他強制手段達成戰略目標，並試圖建立以其為核心的東亞勢力範圍與國際秩序，結果導致升高與周邊國家甚至美國在內的其他亞太強國的緊張關係與衝突發生機率，與其所宣稱的「和平發展/崛起」、「和諧世界」不符。

本論文認為若中國果真奉行「和平發展/崛起」的對外政策路線，並追求「和諧世界」作為最終戰略目標，其地緣戰略應該會表現出盡力以與體系中各大國進

³⁶ Daniel H. Nexon,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the Balance," *World Politics*, Vol. 61, No. 2(April 2009), pp. 338-340.

行多邊談判、對話乃至合作的方式，尋求解決中國與周邊國家乃至主要強國的地緣政治爭端，以達成作為均衡基礎的多邊安排，並與其他主要國家一起在既有或新創的國際建制中合力維持亞太地緣政治體系的均衡。反之，如果中國仍採取重建以其為核心的東亞區域國際體系的戰略目標，其地緣戰略將表現出與以往歷史上其他強國崛起後，追求控制戰略交通線與要地，以及建立受其支配的東亞地緣戰略領域的傳統地緣戰略形式，任何現階段的對話、倡議，與雙邊、多邊建制的參與，都只是本國利益極大化的安全計算戰略思維，甚至是「購買時間」(Buying Time)邏輯的展現，不是真正欲追求體系的均衡，「和諧世界」、「和平發展/崛起」只是完全的政治宣傳口號。

為了證明上述的問題意識與研究假設，本論文將運用新古典地緣政治學中結合地緣政治分析與權力結構理論的地緣政治結構模型，綜合對中國戰略菁英(strategic elite)的地緣政治密碼(Geopolitical Code)與戰略文化研究，從對中國古代地緣戰略遺產開始切入進行分析，並結合海軍戰略研究途徑，試圖以多重理論與研究途徑，擬透過對以下問題的回答來研究中國的地緣戰略本質、方向及其對亞太地緣政治均衡的影響，並檢驗上述的問題意識與研究假設：

1. 中國本身的地理環境與當前全球和亞太地緣政治結構對中國地緣戰略的影響為何？
2. 中國的戰略文化是否具有江憶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所謂偏好使用武力使用的「備戰」(parabellum)本質與「強現實政治」(hard *realpolitik*)特徵，導致中國的地緣戰略越來越具有侵略性，從而容易引發衝突？
3. 中國的戰略菁英如何解構中國的地緣政治密碼？
4. 當代中國的戰略文化與地緣政治密碼，是否與古代的地緣戰略遺產有密切的傳承關係，並影響目前的中國地緣戰略目標之制訂與手段之運用？
5. 中國的海洋戰略與海軍戰略是否即為其地緣戰略主軸，抑或只是將海洋視為國防最前線，是政治性、軍事性與領土性大過經濟性與社會性的發展？
6. 亞太地緣政治次體系是否存在均衡？
7. 中國的地緣戰略操作是否為追求在亞太地區達成地緣政治妥協與合作，以達成均衡，或因為追求控制戰略要地、領土完整、建立戰略緩衝區與劃分勢力範圍等意圖，而嚴重威脅其他國家的地緣政治利益，從而影響亞太地緣政治次體系的均衡？

第三節、名詞定義與解釋

由於季辛吉重新引入地緣政治學於政策分析與學術研究時，是把它當作「權力政治」(Politics Power)的同義詞而非援引其原意，或當時其他地緣政治學者所提出的新概念，加上大多數地緣政治學者為地理學者而非國際關係學者，因此國

際關係學界迄今仍對其感到相當模糊，許多學者接受季辛吉的觀點，認為地緣政治就是權力政治；³⁷還有某些著作將「地緣政治」等同於海權論、陸權論之類的「地緣戰略」或「軍略地理」，認為這是兩個概念相當，可以交互運用的詞彙。³⁸此外，由於英文常以Geopolitics作為所有地緣政治研究概念的總稱，連帶使得中文在翻譯上出現困難：或將Geopolitics譯為地緣政治，或譯為地緣政治學，即使是地緣政治研究的專門著作也未必能整理出這兩個名詞的異同，甚至還常與另一門常見的地理學研究—政治地理學(Political Geography)發生混淆。因此，本論文認為在進行任何更進一步的討論之前，必須先釐清基本的地緣政治學與地緣戰略概念。此外也必須先將釐清「地緣戰略」的定義，理解其在國家的戰略規劃中的層級，與所指導的領域究竟為何。

一、 Geopolitics、地緣政治與地緣政治學

英文的Geopolitics原為德文Geopolitik的英譯。今日西方學者對Geopolitics的定義儘管龐雜，但已經跳脫兩者原先的關係：帕克(Geoffrey Parker)認為Geopolitics是「從空間或地理的視角研究國際關係」；³⁹艾格紐(John Agnew)主張Geopolitics是「對影響世界政治發展的地理條件、設定與理解的檢驗」；⁴⁰科恩(Saul B. Cohen)則將Geopolitics定義為「對地理環境與地理觀點和政治活動過程之間互動關係的研究」；⁴¹批判性地緣政治學(Critical Geopolitics)學者鄂圖泰爾(Gearóid Ó Tuathail)與達爾比(Simon Dalby)則認為Geopolitics是「地理與政治結合的產物...與進行中的權力和政治經濟再生產有關...沒有一種單一或包含所有面向的意義或認同...其論述—文化上與政治上變動的描述方式—表現與描繪出地理和國際政治的關係」；⁴²歐蘇利文(Patrick O'Sullivan)運用Geopolitics來表示國際關係中距離與位置的重要性，認為Geopolitics就是「運用良好的地理概念來理解或治理人類群體之間的關係」。⁴³戰略學者格雷(Colin S. Gray)主張Geopolitics有兩種概

³⁷ 例如，連恩(Christopher Layne)在整理冷戰後五本研究美國霸權地位的代表性鉅著時，其文章中大量出現 geopolitical 一詞，但是從未見到連恩對這個詞彙所下的定義，他對這個詞彙的概念明顯就是權力政治。而從他的整理中也可以發現，美國學術界、政界與媒體界對於 Geopolitics 的運用已經到了相當氾濫的程度，而且雖然那麼多人使用這個詞彙，但究竟有多少人真正瞭解其意義，是相當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情。Christopher Layne, "The Waning of U.S. Hegemony—Myth or Real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4, No. 1(Summer 2009), pp. 147-172.

³⁸ 例如，汪大鑄先生所著之**軍略地理**一書，在書名內頁特別加註「又名地緣政治學」。另外，張其昀先生所著之**地略學**一書，亦有相同之觀念。而即使到今日，國內許多著作還是認為地緣政治就是地緣戰略，例如中華歐亞基金會在 2006 年出版的**地緣政治與中共外交戰略**一書，雖然書名冠有「地緣政治」，參與撰稿的學者皆為國內相關研究領域的翹楚，但是完全沒有對該書重要的研究變數：地緣政治，下嚴格的學術定義，全書中地緣政治與地緣戰略交互運用，顯然是混淆了兩者的概念。中華歐亞基金會編著，**地緣政治與中共外交戰略**(台北：大屯出版社，2006 年)。

³⁹ Geoffrey Parker, *Geopolitic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London: Printer, 1998), p. 5.

⁴⁰ John Agnew, *Geopolitics: Re-Visioning World Politic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p. 2.

⁴¹ Saul B. Cohen, *Geopolitics: The Ge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9), p. 12.

⁴² Gearóid Ó Tuathail, Simon Dalby, and Paul Routledge, *The Geopolitics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1998), pp. 2-3.

⁴³ Patrick O'Sullivan, *Geopolitic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6), p. 5.

念，一是「國際權力政治與地理條件之間的相互關係」，⁴⁴二是「空間關係與歷史因果的理論，由此演繹出當代與未來的政治和多種地理概念之間的關係，並提供建議...Geopolitics使用複雜的理論化能力結合歷史知識，結果形成一種有力的分析框架」。⁴⁵格利吉爾(Jakub J. Grygiel)則認為Geopolitics指的是人類在地理中的活動，「資源與交通線(lines of communication)的地理分佈，其位置的價值是由其戰略重要性而定。地緣政治局勢是科技與地理互動的結果，這些結果改變了位置的經濟、政治、戰略重要性...因此地緣政治不是固定不變，而是描述經濟與資源路線的地理分佈的變數」。⁴⁶

顯然當代西方學者並不認為Geopolitics可與Geopolitik並用，目前在提及德國地緣政治學派時也大多直接使用Geopolitik，格雷早在1977年便主張兩者應有所區別—Geopolitics是「含有政策科學(policy science)意義的研究...只研究政策問題的結構，而並不提倡某種特殊的政策行動」。⁴⁷而將Geopolitics視為與軍事戰略與國家安全計畫作為有絕對密切關係，也完全不符合Geopolitics今日在西方學術界蓬勃的發展情況，艾格紐便指出，Geopolitics在近年來被大量運用於分析邊界爭議、全球金融結構與選舉結果等新興安全與地方政治研究領域，⁴⁸而這些領域有許多與軍事戰略或國家安全計畫作為毫無關係，更不用說目前地緣政治學理論主流的批判性地緣政治學很少討論地理與軍事戰略之間的關係。大多數當代西方學者對Geopolitics的概念集中於兩個層面：一種以地理資料為分析基礎的國際關係研究框架，此時其概念為一種國際關係研究方法；亦可用來從地理角度客觀地描述國際政治關係，此時其概念就不是理論或研究方法。換言之，Geopolitics在英文中如今是一個至少具有兩種概念的複合學術詞彙。

中文要如何翻譯才能同時代表Geopolitics的學術性與描述性概念？已故我國地緣政治學者沈默先生的**地緣政治**一書是少有的地緣政治學研究專著，也是罕見的提出類似上述西方地緣政治學概念的著作。⁴⁹但沈默先生明顯是以「地緣政治」一詞來含蓋Geopolitics的兩種意義，如此甚易產生困惑，因為即使在英文學界，也開始有學者主張以Geopolitical Reality與Geopolitical Thought來分別代表Geopolitics的兩種概念。⁵⁰對此，中國地緣政治學者陸俊元提出另一種觀點，認為當文意指的是Geopolitics作為理論與分析國際議題的研究方法，可稱為「地緣政治學」；若指的是Geopolitics作為描述以地理為基礎的特定政治關係，此時它

⁴⁴ Colin S. Gray, *The Geopolitics of Super Power* (Lexington, Kentucky: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88), p. 43.

⁴⁵ Sloan and Gray, "Why Geopolitics?" *op. cit.*, pp. 1-2.

⁴⁶ Jakub J. Grygiel, *Great Powers and Geographical Change* (Baltimore, Maryland: The John Hopkins Press, 2006), p. 22.

⁴⁷ Colin S. Gray, *The Geopolitics of the Nuclear Era* (New York: Crane, Russak & Company, Inc., 1977), p. 19.

⁴⁸ Agnew, *Geopolitics: Re-Visioning World Politics*, p. 2.

⁴⁹ 「地緣政治的廣義定義...也是為一般人所公認的定義...是研究地理與地理條件對國家外交政策、國際政治及戰爭之影響的科學。總而言之，地緣政治是國際關係之地理上的解釋」。見沈默，**地緣政治**(台北：中央圖書供應社，民國56年)，頁5。

⁵⁰ Geoffrey Parker, *Western Geo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Sydney: Croom Helm Ltd, 1985), pp. 2-3. 不過這種作法畢竟還是少數，多數人仍使用 Geopolitics。

就成為對一種複雜現象的理解與詮釋而不是理論或研究方法，可稱此為「狹義地緣政治」，並表示當中文使用「地緣政治」時，若無特別說明則即指狹義地緣政治。⁵¹換句話說，Geopolitics的兩種主要學術概念在翻譯成中文時必須在文字上有所改變以為區隔。陸氏的區分就學術研究而言相當便利，因此本論文參照陸俊元的劃分與使用模式，對於Geopolitics的理論層面，以「地緣政治學」表示，對於Geopolitics的政治關係層面，則以「地緣政治」表示。

二、地緣政治學與政治地理學

地緣政治學雖研究地理與政治現象之間的關連，但卻非常容易與另一門非常類似的地理學研究—政治地理學產生混淆，儘管二者的學科性質、研究方法與研究目的均大為不同。西方地緣政治學界迄今沒有對二者提出嚴格的區別，經常把二者混為一談，⁵²或認為地緣政治學即為政治地理學的分支。即使認為有所區別的學者，也只認為地緣政治學是在政治地理學下衍生出來的學問，與政治地理學一樣專注於研究國家作為地理實體的性質，不過地緣政治學同時具有政治學與地理學的屬性，二者的差異是基於研究者對於兩種學問研究目的的不同認知。⁵³

地緣政治學最初為政治地理學的分支，後者的近代學術始祖為日耳曼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而前者的近代學術始祖之一，德國人文地理學(Anthropo-geographical school)學者拉澤爾(Friderich Ratzel)是康德在人文地理學方面的再傳弟子，至於地緣政治學的學科創始人瑞典學者克哲倫(Rudolf Kjellén)，則是拉澤爾的學生。⁵⁴已故我國政治地理學者蔣君章，對這兩門學術理論曾提出自己的區分觀點，認為「地緣政治學的內政與外交，都以利害為出發點，雖然所根據的資料是客觀的，但其政策的確定完全是利害的，而且是富有時間性的」，⁵⁵而政治地理學的定義則是「研究地理環境對人類政治生活的影響」。⁵⁶沈默則認為「政治地理是地緣政治的基礎，地緣政治是政治地理的運用。政治地理是從空間的立場來看國家，地緣政治是從國家的立場來看空間。政治地理是專從客觀分析的觀點來研究一個國家地理環境的狀況，它是靜態描述。地緣政治專從地理環境的觀點研究一個國家對外政策的需要，是動態的探討」。⁵⁷如此而言，似乎二者的主要差別在於研究時態與研究目的是。蔣君章與沈默的觀點，與後來中國地緣政治學者陸俊元的觀點，有若干符合之處。陸氏針對二者在研究目的、方法與領域等的不同，提出六項二者的主要區別，茲摘錄如下：⁵⁸

⁵¹ 陸俊元，*地緣政治的本質與規律*(北京：時事出版社，2005年)，頁70-71。

⁵² 蔣君章，*政治地理學原理*，前引書，頁5-9。

⁵³ Parker, *Geopolitic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pp. 7-8; Geoffrey Parker, *Western Geo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Sydney: Croom Helm Ltd, 1985), pp. 1-2.

⁵⁴ 地緣政治學的理論基本上以四位學者的著作為起點，除了拉澤爾與克哲倫之外，另外兩人是麥金德與馬漢(Alfred T. Mahan)。Kearns, *Geopolitics and Empires: The Legacy of Halford Mackinder*, *op. cit.*, pp. 3-5.

⁵⁵ 蔣君章，*政治地理學原理*，前引書，頁12。

⁵⁶ 同上註，頁16。

⁵⁷ 沈默，*地緣政治學*，前引書，頁9-10。

⁵⁸ 陸俊元，*地緣政治的本質與規律*，前引書，頁99-102。

1. 研究方法的單一性與綜合性－政治地理學是對政治現象的地理研究，其研究方法是純地理學的。地緣政治學則以地理為視角，藉助地理學研究方法做政治研究，除了地理學的研究方法，地緣政治學還結合了政治學、歷史學等其他社會科學研究方法。
2. 研究重心不一致－政治地理學的研究重心在政治的地理區域，必須將完整的政治地理系統劃分成不同的政治區域，分析區域的性質、差異與關係。地緣政治學雖然也對地理環境進行區域劃分，其重心則在區域內行為體之間的相互作用關係而非區域本身。
3. 政治著眼點不一－政治地理學將政治視為既成事實，對政治的內部結構與運作方式並不關心。地緣政治學則較為關注政治系統內部的動力、結構、運作方式等。
4. 政治時態差異－政治地理學關注的是靜態的政治，認為政治是一個結果與既存現象。地緣政治學則關注動態的政治，研究造成政治結果的地理原因，影響政治運行軌跡和規律的地理因素，並關注政治的趨勢和方向，以及未來的可能。
5. 研究立足點不同－政治地理學立足於地理層面。地緣政治學為求解決政治問題，立足於社會關係層面。
6. 觀察方向與流程相逆－政治地理學的觀察方向是：地理－政治－地理，地緣政治學則是政治－地理－政治。

從以上六點可知，時態確實是地緣政治學與政治地理學最明顯的差異，但是在其他方面則未必如此，例如陸氏認為政治地理學不注重政治系統的內部結構與運作方式，但蔣君章先生則認為這是政治地理學必須研究的方向。雖有以上的差異，不過簡單來說，政治地理學屬於靜態的地理學研究，地緣政治學則屬於動態的政治學研究，⁵⁹此種區別應可視為二者的主要差異。

三、 地緣戰略

乍看之下，地緣戰略似乎是強調地理重要性的一種戰略，但這一說法太過模糊，因為地理本來就是「戰略之母」，如此解釋完全無法體現地緣戰略的真正意義。此外，戰略的概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有很大的差異，從傳統上只關注於運用軍事力量於戰爭中取勝的純軍事層面，擴大為運用國家的各種總體力量，以並能夠在國際鬥爭中達成政策目標的廣泛層面，也就是由純粹的軍事戰略擴展為「大戰略」。⁶⁰因此究竟地緣戰略是強調地理對純粹軍事戰略的重要性，還是強調對更廣泛的戰略運用中的重要性？同時，地緣戰略也與地緣政治一樣，是否其中的「地理」概念也限於自然地理，或包含人文地理的概念？這些問題與概念

⁵⁹ 帕克雖然沒有詳細提出地緣政治學與政治地理學的區別，但他也認為地緣政治學就是「從空間或地理中心的觀點對國際現象(international scene)進行研究」，Parker, *Western Geo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op. cit., p. 2.

⁶⁰ 鈕先鍾，*大戰略漫談*(台北：華欣文化事業中心，民國 66 年)，頁 5-6。

上的模糊，都需要進一步的清晰界定，才有助於本論文研究議題的完整探討。

(一)、定義

中文的地緣戰略係由英文的Geostrategy翻譯而來，後者亦與Geopolitik密切相關。豪斯霍夫等人曾提倡「國防地緣政治學」(Wehrgeopolitik)的概念，主張從軍事觀點精密分析各國的防禦結構、軍事力量、人口問題與邊界形勢等。⁶¹由此看來，Wehrgeopolitik實為一種戰略分析方法，專注於從地理的角度分析戰略，並提出政策建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在翻譯上有將Wehrgeopolitik直譯為Defense-geopolitics或改譯為War-geopolitics，學者舒曼(Frederick L. Schuman)則譯為—Geo-strategy，但是在當時並沒有詳細地分別其概念與Geopolitics的差別，⁶²即使在戰後初期，美國學者克雷西(George B. Cressey)將Geo-strategy 變為Geostrategy時也只是以此表達戰略的政策意涵以及地緣政治學的動態概念，以與靜態的政治地理分析做區隔，⁶³但他並未提出嚴密的定義，只提出Geostrategy的研究範圍：(國家的)大小、形狀、外界進入的容易度(accessibility)、位置、邊界、與海洋的關係、地形、天然資源、氣候與人口等十項地緣因素之間的互動關係。⁶⁴顯然克雷西認為Geostrategy與Geopolitics是兩個同義詞，只是前者比後者更具有政策性質。在此時，Geostrategy本身的概念以及與Geopolitics的區別都仍相當模糊，而且明顯限於軍事戰略領域。

另一方面，地緣戰略、「戰略地理」(Strategic Geography)、地緣政治又是三個容易相互混淆的概念，例如琳姆(Robyn Lim)認為戰略地理是「國際體系中的權力與地理環境之間的關係」，⁶⁵但根據上文的名詞解釋，這顯然應該是地緣政治的概念。坎普與(Geoffrey Kemp)哈卡威(Robert E. Harkavy)對戰略地理的定義不僅不同，也展現出與地緣政治明確的差異：戰略地理是對國家的安全與經濟繁榮有影響—無論正面或負面—的空間區域(陸地、水域、天空與外太空)的控制或介入，它包含地理的每個層面：自然地理與人文地理。⁶⁶不過雖然坎普與哈卡威的定義釐清戰略地理與地緣政治之關係，卻使它與地緣戰略發生嚴重的混淆。

地緣戰略的概念直到地緣政治學的復興以及大戰略的概念逐漸被戰略學界接受後才逐漸清晰。中國軍事學者程廣中將其定義為「利用地緣關係及其作用法則牟取和維護國家利益的方略」，⁶⁷雖然指出地緣戰略的目的為替國家利益服務，但這個定義仍太過簡單與模糊，因為這涉及到「戰略」的概念，以及地緣戰略的主要手段為何等問題。如上所述，「戰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其概念

⁶¹ Andrew Gyorgy, "The Geopolitics of War: Total War and Geostrategy,"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5, No. 4(November 1943), pp. 347-349.

⁶² *Ibid.*, p. 347 at reference 2; Frederick L. Schuman, "Let Us Learn Our Geopolitics," *Current History*, Vol. 2, No. 9(May 1942), pp. 161-165.

⁶³ George B. Cressey, *The Basis of Soviet Strength* (London: George G. Harrap & Company Ltd., 1946), p. 237.

⁶⁴ *Ibid.*, pp. 237-238.

⁶⁵ Robyn Lim, *The Geopolitics of East Asia: The Search for Equilibriu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 3.

⁶⁶ Geoffrey Kemp and Robert E. Harkavy, *Strategic Geography and the Changing Middle East*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97), p. 8.

⁶⁷ 程廣中，*地緣戰略論*(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16。

已經逐漸從運用軍事手段在戰爭中取勝，或達成政策目標的傳統概念，轉為運用國家的各種力量來達成政策目標的現代概念，但是「戰略」一詞本身仍與戰爭或軍事鬥爭等現象緊密相連，而具有鮮明的軍事意義，特別是在中國，「戰略」有時就是「軍事戰略」的同義詞。⁶⁸因此程廣中的定義無法被採用，必須做更進一步的檢驗與歸納。

布里辛斯基認為「地緣政治的考量反映出決定國家或區域局勢的地理與政治因素的結合；戰略考量則反映出運用具有整體性或計畫性措施以達成國家中心目標或具有軍事重要性的必要目標；至於地緣戰略則是戰略性與地緣政治性考量的結合」，⁶⁹這個定義顯示地緣戰略同時具有軍事性與政治性手段，而且與地緣政治是不同的概念，類似的概念可發現於中國學者蒲寧的定義：「地緣戰略...不是一種理論，而表現為一種戰略管理或戰略規劃...必須以一定的地緣政治理論為指導」。⁷⁰格利吉爾則將地緣戰略定義為：「國家藉由投射軍力與確定外交活動的方向來集中其努力。其先決條件是國家具有有限的資源，以致於無法執行一種全方位(*tous azimuths*)外交，必須集中政治與軍事力量在世界的某個區位」，⁷¹表現出地緣戰略有明顯的戰略方向與地理重心。羅傑斯(James Rogers)與西蒙(Luis Simón)則將地緣戰略的運作表達的更為清楚：「關於在地球表面某個特定關鍵區域運用權力，與在國際體系中精心創造政治存在。其目標是強化某個國家的安全與繁榮、使國際體系變得更繁榮、是關於塑造而非被塑造。地緣戰略強調控制某些貿易通道、戰略要道(Strategic Bottleneck)、河流、島嶼與海洋的通道，因此需要龐大的軍事存在，以及一個可靠的聯盟體系，對象可能是擁有共同目標的其他強國或位在特定國家視為極重要地區的關鍵國家(*lynchpin states*)」。⁷²

從以上的整理可發現，地緣戰略具有以下特徵：是一種戰略形式而非學術理論、指導國家將其有限的資源與力量集中於某個對其生存、安全與發展具有特別重要的地區、利用對地緣政治關係的靈活運用來達成政策目標、強調對重要戰略要地與交通線的控制、手段包括軍事性與政治性。反過來說，坎普與哈卡威明確表示，戰略地理則注重於地理對大戰略的戰術而非戰略層面，⁷³這是戰略地理與地緣戰略最主要的差異。本論文對地緣戰略的定義如下：**地緣戰略是國家為了達到國家安全與促進發展的戰略目標而制訂的戰略形式，藉由運用政治與軍事力量控制戰略交通線與要地為主要戰略實行手段，而國家的地緣政治特徵與所處的地緣政治環境決定國家應該將有限的資源與主要力量集中於何處，以及應使用何種軍事力量作為主要的控制力量。**地緣政治學則是地緣戰略重要的戰略分析工

⁶⁸ 馬保安，「戰略的含義、特點和分類」，王文榮主編，*戰略學*(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 1999 年)，頁 18-22。

⁶⁹ Zbigniew Brzezinski, *Game Plan: A Geostrategic Framework for the Conduct of the U.S.–Soviet Contest* (Boston: The Atlantic Monthly Press, 1986), p. xiv.

⁷⁰ 蒲寧，*地緣戰略與中國安全環境的塑造*(北京：時事出版社 2009 年)，頁 6-7。

⁷¹ Grygiel, *Great Powers and Geographical Change, op. cit.*, pp. 21-22.

⁷² James Rogers and Luis Simón, "Think Again: European Geostrategy," *European Geostrategy, Ideas on Europe*, March 14, 2010, <http://europeangeostrategy.ideason europe.eu/2010/03/14/think-again-european-geostrategy/>.

⁷³ Kemp and Harkavy, *Strategic Geography and the Changing Middle East, op. cit.*, p. 8.

具，提供地緣戰略設定戰略方向與目標的重要理論憑藉，一如格雷所指出的，地緣政治學只進行分析而不提出政策建議，後者是地緣戰略的主要任務。因此地緣戰略中的「地理」概念也與地緣政治學一樣包含人文地理的概念，不能僅從自然地理的角度分析地緣戰略，否則很容易誤判一個國家的地緣戰略發展方向。

(二)、層級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除了蘇聯之外，一般對戰略層級的劃分中，最高層次為大戰略(英國)、總體戰略(法國)或國家戰略(美國、中國、日本)，並指揮較低層次的軍事、外交、經濟等分項戰略。⁷⁴然而，地緣戰略雖然是戰略研究的一項領域，但由於它不屬於上述任何一項戰略分層，故迄今在所有國家的戰略結構或分層中，皆沒有取得任何正式的位置。可是根據上述的定義，地緣戰略的目的地是指導國家力量投射於有助於國家繁榮與安全地區的控制，這使其性質與大戰略極為接近，後者的定義一般來說係為「在平時和戰時，發展和使用國家資源(包括政治、經濟、心理、軍事四種權力)以求確實達到國家目標的藝術和科學」，⁷⁵且其規劃無平時與戰時之分，平時注重將國家的潛力發展為權力工具，戰時則以戰爭指導贏得戰爭，而由於戰爭頻率的降低與戰爭性質的改變，大戰略在平時的发展更重於戰爭指導，非軍事面更重於軍事面。⁷⁶上述的特性使得大戰略的主要任務在決定國家的中長程發展目標，以及國家主要採取何種對外戰略形式，例如攻勢或防禦、擴張以獲取權力或守成以維持或發展本國的財富、積極應對威脅或以消極安撫或採取嚇阻等概要類型。⁷⁷因此，地緣戰略在戰略分層中，其層級應低於大戰略，承接後者的發展目標與形式，決定國家應朝哪一種地緣政治方向發展才能最迅速與最可能達到大戰略目標，並以此指導國家的政治、軍事、經濟等次級戰略力量應集中於哪一個區域或地理方向，特別是對軍事戰略的指導，因為這是最直接與強度最高的控制手段，且仍然對國家安全有很高的重要性，若地緣戰略對軍事戰略的指導方向錯誤，還是可能導致國家在武裝衝突中蒙受嚴重的損失或失敗，甚至危及國家生存。

最後，根據以上兩小節對地緣戰略的定義，以及在戰略層級中的地位整理，顯示吾人不可將所有涉及空間概念的戰略術語皆歸入地緣戰略的範疇，這些術語經常只是一種作戰性的政策指導，甚至只是一種缺乏實際且長久的戰略行動支撐的戰略思想，不是真正的地緣戰略。例如所謂的「遠交近攻」、「合縱」、「連橫」等中國先秦時期的「地緣戰略」，⁷⁸雖然涉及空間的概念，但不可將其視為地緣戰略，因為這些術語根本沒有指明哪個國家基於其本身的地緣政治特性，應將其有限的資源與力量集中於何處，更沒有指出應使用何種軍事力量作為主要控制力

⁷⁴ 彭光謙、姚有志主編，**戰略學**(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 2001 年)，頁 22-27。

⁷⁵ 鈕先鍾，**大戰略漫談**，前引書，頁 9。

⁷⁶ 整理自同上註，頁 9-11。

⁷⁷ 以上的大戰略類型係整理自 Edward Luttwak, *Strategy: The Logic of War and Peace*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182 and p. 192; Charles A. Kupchan, *The Vulnerability of Empir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67-68;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op. cit.*, pp. 112-113.

⁷⁸ 葉自成，**地緣政治與中國外交**(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 年)，頁 181-187。

量。這些術語實際上僅止於一般性的戰略指導原則，而且只是外交政策上的實務指導，其位階類似於所謂的「外線作戰」、「內線作戰」在軍事戰略中的地位，只是一種可依形勢變換的**作戰指導原則**而非真正的戰略形式。同樣的，毛澤東的「中間地帶」、「一條線」、「一大片」、「三個世界」等外交政策，也只是一種作戰層面的戰略指導方針和外交政策指導，因其皆缺乏地緣戰略應有的國家政治、經濟、武力資源在特定地理方向的整體投入，故雖然涉及空間的概念，但最多只能算是一種「戰略思想」而非真正的「地緣戰略」。

第四節、研究方法與變數設定

傳統上，地緣戰略研究方法包括對國家本身地理環境的靜態政治地理學分析，動態的國際戰略形勢分析，以及歷史分析等三種研究途徑。但隨著學科的發展，地緣戰略研究者承認其他非地緣政治因素如意識型態、利益團體，甚至決策者個人一時的興致，都可能左右一個國家的地緣戰略的形式與內涵。⁷⁹ 另外本論文也屬於戰略研究與中國戰略研究，戰略研究邁入大戰略領域後亦開始要求研究方法與途徑的多樣化，以擺脫傳統軍事戰略研究的侷限性。薄富爾(André Beaufre)曾指出，戰略不是單純固定的教條，而是一種思想方法，目的是整理事件，將它們按照優先次序加以排列，然後再選擇最有效的行動路線。⁸⁰ 戰略的思想方法是戰略決策者制訂戰略時的思考模式，而有五大因素影響決策者的思想，使不同的決策者排列出不同的優先次序選擇：時代、地理、社會、文化與技術。⁸¹ 沈大偉(David Shambaugh)則指出對中國的戰略研究必須包含廣泛的研究途徑，包括中國的社會與政治文化、軍事與戰略傳統、當代國際軍事準則與戰爭本質，以及中國所面對的戰略環境等，⁸² 以避免過度陷於軍事層面的思考而無法有全面性瞭解。因此地緣戰略研究開始要求研究方法的多樣性，以求更精確地描繪出研究對象國的地緣戰略真貌。

因此本論文採用多種研究方法對中國地緣戰略進行全面性剖析，以適應冷戰後與 21 世紀國際關係的新發展，更增加其理論可信度，並擺脫地緣政治學的「決定論」(determinism)刻板印象。⁸³ 首先，對國家長期戰略行為影響最大的還是物質層面的國際體系結構，⁸⁴ 即使是非物質層面因素的戰略文化，其基礎也是國際結構與國內地理環境等物質因素。⁸⁵ 為了能妥善處理權力與地理的關係以有效提

⁷⁹ Grygiel, *Great Powers and Geographical Change*, op. cit., p. 22.

⁸⁰ 鈕先鍾譯，André Beaufre 著，**戰略緒論**(台北：麥田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6 年)，頁 16。

⁸¹ 鈕先鍾，**現代戰略思潮**(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再版，民國 78 年)，頁 15-26。

⁸² David Shambaugh,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at 50: Reform at Last,"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59 (September 1999), p. 661.

⁸³ C. Dale Walton, *Geopolitics and the Great Power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Multipolarity and the revolution in strategic perspectiv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p. 21-24.

⁸⁴ Colin Dueck, *Reluctant Crusaders: Power, Culture, and Change in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34; 宮玉振，**中國戰略文化解析**，前引書，頁 23。

⁸⁵ Oliver M. Lee, "The Geopolitics of American Strategic Culture,"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 27, No.

高理論解釋力，本論文運用專注於戰略分析的新古典地緣政治學地緣政治結構理論為主要研究方法，以分析冷戰後國際戰略環境對中國地緣戰略的影響。其次，本論文將使用戰略研究中日益受到重視的戰略文化研究途徑來分析當代中國戰略文化的特徵，試圖理解戰略思想中的文化背景對於中國戰略菁英在制訂地緣戰略時的影響，以及中國地緣戰略對武力使用的偏好。而由於戰略文化相當程度受到國家整體地緣政治環境的影響，為了更有效分析中國戰略文化對地緣戰略的影響，本論文將運用批判性地緣政治學來連結中國戰略菁英對中國戰略文化的繼承與對中國國際地位與戰略環境的想像，透過對中國戰略決策菁英的地緣政治密碼分析，來瞭解中國地緣戰略的發展方向，並結合戰略文化途徑以分析中國地緣戰略的手段偏好。最後，為了進一步瞭解中國地緣戰略對亞太地緣政治均衡的影響，本論文將使用海軍戰略途徑來檢驗中國的海洋與海軍戰略的發展以及與地緣戰略之間的關係，以確認中國的地緣戰略重心是否確實位於海洋，和中國的海上發展與亞太地緣政治均衡之間的關係。

一、新古典地緣政治學：以結構概念研究地緣戰略

自馬漢與麥金德以來，地緣政治學就以國際地緣政治形勢為初步的地緣政治結構並作為理論自變數。然而正如麥金德曾指出的，每個時代的地緣政治結構與地緣政治意識都不同，⁸⁶適用於某一時代的理論不見得能運用於其他時代。故吾人不能以古典地緣政治學理論解釋當代地緣政治結構並分析國家的地緣戰略，本論文所採用的首要研究方法是新古典地緣政治學，此一地緣政治學理論不僅包含了冷戰中期以來的新國際關係理論概念，而且對於地緣政治結構的概念亦有相當程度的發展，更重要的是此一理論的出現完全是為了研究地緣戰略。

新古典地緣政治學一如現實主義典範中的新古典現實主義，並不是由特定學者創立的學派，也沒有統一的理論概念，最初是 1970 年代後期廣泛出現於美國、德國、法國，以及蘇聯/俄羅斯/獨立國家國協(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CIS)的古典地緣政治學復興現象，延續了麥金德的心臟地帶地緣戰略觀點，有新意地將之重新運用於社會、經濟、政治與文化因素都已改變的當代國際社會，⁸⁷被某些地緣政治學者依照其與古典地緣政治學、批判性地緣政治學均有所差異的研究方法、宗旨與觀點，將之分門別類而成。⁸⁸歐陸新古典地緣政治學特別是法國學派比較屬於軍事與地理環境思維，相較之下英美學派則比較屬於國際關係的

3(May/June 2008), pp. 268-272; 楊仕樂，「中國獨特的戰略文化？尋找理念的物質基礎」，*東亞研究*，第 37 卷第 1 期（2006 年 1 月），頁 198-230。

⁸⁶ Halford J. Mackinder, *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Defense Classic Edition, 1996), p. 21.

⁸⁷ Nick Megoran, "Guest Editorial: Neoclassical Geopolitics," *Political Geography*, Vol. 29, No. 4(May 2010), p. 187.

⁸⁸ Mamadouh, "Geopolitics in the nineties," *op. cit.*, pp. 238-239; Mark Bassin, "The Two Faces of Contemporary Geopolitics," in "Is There a Politics to Geopolitics?"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Vol. 28, No. 5(October 2004), pp. 620-626; Megoran, "Neoclassical Geopolitics," *op. cit.*, pp. 187-189; Geoffrey Parker, *Geopolitic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London and Washington: Pinter, 1998), p. 1 and p. 5.

政治思考角度，⁸⁹也因此顯得較為龐雜，既有繼承麥金德與史派克曼地緣政治觀點的布里辛斯基的歐亞大陸中心地緣政治結構理論，也有強調區域經濟整合對國家戰略重要性的「地緣經濟學」(Geoeconomics)，甚至將麥金德的研究觀點應用於太空戰略的「太空政治學」(Astropolitik)⁹⁰等。

(一)、與古典地緣政治學的差異

兩者差異最主要在於研究目的與地緣政治意識。首先，古典地緣政治學對結構和單元性質的認知與目前的新古典地緣政治學有相當大的差異，前者視結構與組成結構的單元為會不斷擴張與成長的「有機體」(organism)，後者雖然繼承麥金德—豪斯霍夫—史派克曼一系地緣政治與戰略觀念，⁹¹則視單元為有固定邊界的政治實體，⁹²因此前者對全球地緣政治結構中各單元的戰略重要性並不以國家或具有明顯政治邊界的地理區域為主，而是以「心臟地帶」、「邊緣地帶」、海洋等作為重心，因為國家與結構均為有機體，可無限制擴張其範圍至無法再擴張為止，故邊界的重要性並不高，因為可能短時間之後即因某一國家的擴張而再度發生改變。其次，古典地緣政治學萌芽於 19 世紀後半，在當時國家雖有邊界，但常因相互併吞而變動，因此古典地緣政治學才視國家為可無限制擴張的有機體，每個國家的戰略目標即為爭奪世界霸權；反之，新古典地緣政治學是在一個各國政治邊界已經明顯固定不動的時代，帝國主義式的領土擴張不再被容許，而對經濟發展的要求也逐漸與對領土安全的要求居於同等重要的地位，單元的增加更使新古典地緣政治學認為地緣戰略的目的在於國家安全的獲得與發展，世界霸權不再是地緣戰略的主要目的。

新古典地緣政治學的主要分析手段為政治地圖，其方法則包含於對其特性的考證之中，借此理解其所揭示的現象和滋生其形態的過程。世界政治舞台的各組成部分被視為空間客體，其相互作用構成空間現象。研究目的在於解釋這些空間客體作為整體組成部分的行為及相互作用，其所要達到的根本目標在於了解整體地緣政治空間和任何既定時間裡在其中發揮作用的過程。這一過程必須構成整體，因為若要試圖考察和解釋地理空間特殊客體的行為特徵，就有必要考慮這些客體功能的眾多差異點，⁹³對整體的分析與確立所有行為特徵，就是其研究內涵，顯現其最終研究目的—對總體之上謂之「秩序」所賦予的不斷重複的行為模

⁸⁹ 吳志中，「地緣政治理論與兩岸關係」，前引文，頁 124。

⁹⁰ 太空政治學是美國學者多爾曼(Everett Dolman)在 1990 年代末期新發展的地緣政治學理論，認為太空是人類科技未來發展與適用的新領域，任何國家只要能先掌握對太空的控制權，將可在其上部署有利於軍事與民生用途的科技系統，除了能使本國的科技發展領先他國之外，還可比他國擁有更大的戰略優勢，因為從太空將可毫無困難地監視、攻擊與反制敵人的一切防衛措施。多爾曼甚至將麥金德著名的三階段控制論改為「控制地球低軌道者控制近地太空，控制近地太空者主宰地球，主宰地球者決定人類的命運」(Who controls low-Earth orbit controls near-Earth space. Who controls near-Earth space dominates Terra; Who dominates Terra determines the destiny of mankind.)。Everett Dolman, *Astropolitik: Classical Geopolitics in Space Age* (London: Frank Cass, 2002), p. 8。

⁹¹ Mamadouh, "Geopolitics in the nineties," *op. cit.*, p. 239; Megoran, "Neoclassical Geopolitics," *op. cit.*, p. 188.

⁹² Mamadouh, "Geopolitics in the nineties," *op. cit.*, p. 238.

⁹³ Parker, *Geopolitic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p. cit.*, pp. 5-6.

式的探究。⁹⁴而由於受到 19 世紀末以來科技發展帶動人類活動範圍擴大，導致原先各自發展、沒有太多聯繫的各個古代地緣政治區域逐漸在政治、經濟兩大層面融為一體，「整體」的範圍遂擴大為全球。

新古典地緣政治學認為自然地理本身並無結構的意義，政治地理才顯現出不同於自然地理的連續性特徵，從而使地緣政治分析具備結構的概念，傳統地理學的各種要素都是組成結構的一部分。對新古典地緣政治學而言，組成整體最基本的客體單元是民族國家，而整體則是全球地緣政治環境。因此新古典地緣政治學一樣是國家中心主義，對國家戰略行為的分析與結構現實主義一樣具有結構性與層次性，客體單元的行為既受整體地緣政治結構的支配，同時也影響整體的組成形式。而儘管沒有明言，但新古典地緣政治學同樣認為總體是無政府狀態(anarchy)，地緣政治體系是國家經由各方面的互動所形成的一組以空間為主要特性的政治群體，地緣政治結構則是體系中的整體地理環境，與單元的自然和人文地理所形成的空間結構，會隨著體系中的主要國家對空間的控制能力與範圍，發展出不同的形式，陸俊元因此將地緣政治結構定義為「在特定的歷史時段內，以政治行為體為單元(國家或國家集團)的地緣政治力量中心，通過地理空間進行的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相對穩定的空間結構」。⁹⁵

由於每個單元的組成形式與特徵都不同，因此對於衝突的解決方式亦不同。地緣政治結構理論所假設的標準地緣政治程序(Normative Geopolitical Process)是結構中強調權力政治效用的大國，為了達成霸權的最後目標，傾向擴張並以強制方式解決衝突；而較小型國家或海島國家對大陸強權的標準程序的反抗稱為替代地緣政治程序(Alternative Geopolitical Process)，由於國力較微弱，其對衝突的解決方式傾向於雙邊以上的合作，帕克表示兩種程序是可以同時發生的，而且大國甚至會假借替代程序的名義來達成其目標，不過一般說來，標準程序是歷史上常見的現象，替代程序只有在大國的力量衰退的時候才較能獲得成果。⁹⁶

(二)、以能力為劃分邏輯

新古典地緣政治學重視國家的軟權力(Soft Power)與國家本身的面積、區位、資源等要素賦予它發揮地緣政治作用和效應的「地理力」，這兩者與國家的硬權力綜合而為「地緣政治作用力」。⁹⁷但由於以地緣戰略為主要研究目標，故與新古典現實主義(Neoclassical Realism)一樣並不認為權力的增加等同於國家能力的增加，中間還必須經由政府的承接與轉換。⁹⁸

本論文的地緣政治結構劃分邏輯強調以國家對交通線的控制能力作為劃分國家等級的依據，這可分為兩個組成，第一是各種權力要素必須轉換為能夠增強國家運用於對交通線控制的工具，控制的目的是確保敵人不能使用與本身能順暢

⁹⁴ *Ibid.*, pp. 6-7.

⁹⁵ 陸俊元，**地緣政治的本質與規律**，前引書，頁 247。

⁹⁶ Parker, *Geopolitic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p. cit., p. 161, 166.

⁹⁷ 陸俊元，**地緣政治的本質與規律**，前引書，頁 249。

⁹⁸ 鄭端耀，「國際關係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問題與研究**，第 44 卷第 1 期(2005 年 1、2 月)，頁 125-126、127-128。

使用，因此除了擊敗敵人的主力之外，還必須長期與持續對戰略要地甚至整條交通線實施警戒任務以防敵人的反擊；擊敗敵人使其無法使用交通線，但自己也無法順利使用交通線並非控制，只是「拒止」(Denial)。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建立配備能夠實施交通線控制作戰武器的軍隊而非僅計算軍隊的人數與裝備數量多寡來決定國家的力量大小。第二則是政府實現戰略目標的決心與意志，這一點在戰略研究中或許比前者更為重要，能力除了以各種有形權力要素為基礎之外，更重要的是必須搭配政府的意志與決心，才能展現在戰略的執行上，尤其是像交通線控制這樣難已達成的戰略目標，如果沒有堅強的意志與決心根本無法達成，也因此只有同時具備強大的能力與堅強戰略意志與實行決心的國家，才能在地緣政治結構中成為真正的超強。

儘管對「極」的權力基礎要求較結構現實主義複雜與嚴格降低了新古典地緣政治學結構理論的「簡約性」(parsimony)，但符合莫頓卡普蘭(Morton A. Kaplan)認為體系理論的變數之間必須有相關性的主張，⁹⁹並能有效提高理論的解釋力，因為所有的變數都與地理相關。反之，結構現實主義一開始為了實現簡約性，犧牲了難以量化的能力而代之以容易量化的權力，但對結構的劃分卻又不經由嚴格的權力計算反而訴諸常識，¹⁰⁰結果使得其對「極」的標準前後矛盾：18世紀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世界體系為多極結構，儘管英國與美國和德國、義大利、法國、蘇聯、日本之間在領土、人口、軍力與財富等權力要素的對比上有極大的落差，而且在19世紀前其時也僅限於歐洲為多極結構；對這些落差的容許到了冷戰時期消失，體系被公認為兩極結構，儘管蘇聯的經濟力量在1970年代後即不如英、法、西德與日本，而英、法、中三國也都擁有不可忽略的核武庫，中國更維持著世界上人數最龐大的陸軍；¹⁰¹而到了冷戰之後，許多現實主義學者認為國際體系為單極，米爾斯海默卻認為體系不是單極，因為中國與俄羅斯還是保有核武，足以挫敗美國建立單極體系的努力。¹⁰²

此種因為缺乏嚴格劃分邏輯而導致的分歧又因為加入地理變數作為中介變數而更加混亂。首先是結構現實主義經常以某種「常識」中的區域概念作為區域研究的劃分基礎，而不是提出嚴格的區域劃分概念，便使得結構現實主義在安全研究上經常出現相當大的混亂，例如陸柏彬使用「東亞」，而米爾斯海默對相同區域則使用「東北亞」，但兩人都沒有詳細說明他們對區域的概念以及為何要採用這種分類，結果使得兩人對區域的權力結構有完全不同的主張：米爾斯海默認為東北亞是平衡的多極，陸柏彬卻認為是穩定的兩極。¹⁰³更有甚者，米爾斯海默

⁹⁹ Morton A. Kaplan, *System and Proces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1957), p. 3.

¹⁰⁰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Inc., 1979), p. 131.

¹⁰¹ 楊仕樂，「跳脫國際政治的攻勢及守勢現實主義：體系穩定的互動與結構解釋之嘗試」，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博士論文(2007年)，頁23-24；Barry Buzan and Ole Wæver, *Regions and Powers: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33-34; R. Harrison Wagner, "What was Bipolar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7, No.1 (Winter 1993), pp. 77-106.

¹⁰²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op. cit.*, p. 381.

¹⁰³ *Ibid.*, p. 381; Ross, "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 *op. cit.*, p. 83.

指出東北亞的區域體系結構是多極，英國與法國是主要的角色但其身份卻是「來自遙遠大陸的擅自入侵者」，¹⁰⁴如此簡直使人無法弄清究竟東北亞的區域安全體系的內涵是什麼意義。而且假使米爾斯海默承認英國在東北亞權力平衡中的角色，則他應該把討論的範圍擴充到包含東南亞在內的「東亞」，因為英國在東亞是以其東南亞殖民地作為力量的基礎。但最嚴重的則是米爾斯海默的推卸責任假設在地理方面的誤差與事實出現巨大的差異而降低了解釋力，甚至擴大「理論缺口」：難以解釋日本向亞洲大陸的侵略，以及冷戰後俄羅斯與中國關係的改善和上海合作組織的出現。¹⁰⁵

二、批判性地緣政治學：對中國戰略菁英地緣政治密碼的解構

批判性地緣政治學(Critical Geopolitics)主要的研究對象並非國際地緣政治環境與國家本身的地緣政治條件等物質條件對國家行為的影響。戰略是由人所制訂，極可能出現與結構理論預測不符的情況，這在現實主義、古典與新古典地緣政治學中均不乏例證。發生這種研究誤差最主要的原因在於新古典地緣政治學主要的關切重點仍在地緣政治體系中的物質因素對國家戰略行為的影響。然而，無論是體系的結構形式、交通線與戰略資源和能源的分佈區、各國的絕對與相對地理位置等體系的物質基礎，終究是一種客觀的物質存在，而國家的戰略行為卻是一種帶有主觀的人為意識型態，戰略不只反應出國家利益的所在，還反應出制訂戰略的國家戰略菁英以何種意識型態來看待所處的物質世界，並運用物質與非物質的手段來達到國家戰略目的。

自古典地緣政治學以來的所有的與戰略研究相關的地緣政治理論之所以難以成為客觀的學術理論，主要原因即在於作為戰略建議的地緣政治理論本身即反應出研究者對世界客觀物質現象的主觀意識型態分析。而比較可惜的是，大多數新古典地緣政治學研究都忽略了人的地緣政治與戰略思想對國家戰略行為的影響，分析層次卻只有全球、區域與國家等地緣政治單元的物質屬性，且與大多數現實主義學者一樣，視國家戰略的制訂過程為「黑盒子」(black box)。¹⁰⁶但是人在戰略形成的過程中至為重要，戰略研究非常重視對「戰略思想」的研究，因為人的思想確實能影響一個國家甚至好幾個世代、不同國家的戰略本質與政策制訂，約米尼、克勞塞維茨、馬漢等人都是著名的例證。在中國歷史上，某一朝代初期皇帝對後世子孫的訓誡，經常也是皇帝本人戰略思想的延續，並影響後代皇帝的戰略方向。而在地緣政治學發展史上，最有名的例子就是肯楠(George Kennan)的地緣戰略思想與美國圍堵政策之間的關係。

批判性地緣政治學的研究目的強調還原地緣政治學的本質，在不推翻既有地緣政治學傳統的情況下，重新檢視地緣政治學傳統。儘管對政策實務面影響力較低，批判性地緣政治學卻因此對「人」的思想與國家地緣戰略的關連性有較多分

¹⁰⁴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op. cit.*, pp. 271-272.

¹⁰⁵ 張登及，「理論改良還是缺口？—新現實主義與冷戰後中美地緣競爭的分析」，*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2009年第3期，頁11-17。

¹⁰⁶ Mamadouh, "Geopolitics in the nineties," *op. cit.*, p. 238.

析，為了重新檢視地緣政治的傳統，解構與重新解釋地緣戰略思想的真實意義，大量探討地緣政治學者與政治實務者的構想與戰略思想提出的背景與制度狀況。¹⁰⁷在批判性地緣政治學的眾多研究途徑中，本論文主要採用其對地緣政治密碼的研究。地緣政治密碼是一組政府對其他國家所做的政治的與地理的戰略假設，¹⁰⁸為國家定義出利益，指出國家威脅的本質與所在，決策者據此制訂外交政策，¹⁰⁹其操作層次包含周邊(local)、區域與全球等三層次—周邊層次是各國都有的密碼；區域層次則是力量能超越周邊、投射至區域中的國家的操作密碼；全球層次雖然一般說來是有能力將權力投射至全球大部分地區的強國才擁有的，但某些自詡為世界重要國家的區域大國如印度與中國，雖然並未擁有全球投射的物質能力，卻還是會發展出全球層級地緣政治密碼。¹¹⁰很顯然地，地緣政治密碼不僅每個國家各不相同，即使同一個國家也會因為決策者的更替而導致出現不同地緣政治密碼，或同一組地緣戰略密碼在操作層級上的變化。

吉爾平(Robert Gilpin)曾指出，若國家的成長與擴張和國內決策圈(powerful groups)的利益直接相關，那麼國家便存在擴張與改變體系的強烈動機，反之則否。¹¹¹此種分析雖然屬於國內政治層面，但對於地緣政治密碼的研究亦可反映出國家決策圈的利益方向。由於地緣政治密碼是國家對其他地區的戰略重要性與潛在威脅評估，不僅反映出國家中心主義，同時也是該國戰略菁英對世界秩序的觀點，¹¹²反映出國家決策與戰略菁英對本國整體國力與戰略環境的認知，使吾人能理解某一國家的戰略菁英對國家所處的時代的整體世界秩序觀點，以及這種觀點如何影響其發展與運用主要以物質能力為基礎的各種戰略，來達到符合其世界秩序觀的整體國家戰略目標與短、中、長程國家利益。換句話說，地緣政治密碼的概念與社會建構主義(Social Constructivism)的身份認同概念一樣，先藉由界定本身與結構中他者的身份建構，再由此定義出國家的利益所在，以制訂符合利益的政策與對它國的政策做出各種回應。適當解讀中國決策與戰略菁英對中國地緣政治密碼的解構，便可瞭解中國戰略菁英對整體世界地緣政治秩序的觀點，以及對中國在世界地緣政治體系中的定位與角色的認知，如此便可清楚中國戰略菁英在制訂中國地緣戰略時的層級設定，以及每個層級的主要方向與目標，和其地緣戰略對亞太地緣政治均衡的潛在影響。

本論文對「戰略菁英」的界定範圍，指的是一個國家內戰略研究社群研究人員，既包括文人戰略研究者與軍方學者，也包括決策圈的國家領導人與部會首長等決策官員與領導階層，是一種統稱。對國家地緣政治密碼的研究應以決策者的

¹⁰⁷ 莫大華，「批判性地緣政治戰略之研究」，*問題與研究*，第 47 卷，第 2 期(2008 年 6 月)，頁 61-62。

¹⁰⁸ Peter J. Taylor, *Political Geography: World-economy, nation-state and locality* (Essex, England: Longman, Third Edition, 1993), p. 64 and p. 91.

¹⁰⁹ John O'Loughlin eds., *Dictionary of Geopolitics*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94), pp. 89-90.

¹¹⁰ Taylor, *Political Geography: World-economy, nation-state and locality*, op. cit., pp. 100-102.

¹¹¹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97.

¹¹² Taylor, *Political Geography: World-economy, nation-state and locality*, op. cit., p. 91.

地緣政治密碼為主，因為這才是影響戰略決策的主要變數，但如下文在研究限制處所指出的，決策者的密碼雖然可透過參考重要的官方文獻—在古代是正史的記載，在當代則可以「白皮書」、「官方會議記錄」、「聲明」等取代—來判斷，但這些文獻有時並不足以透露全部的決策地緣政治密碼，尤以涉及敏感或機密戰略議題的文獻為甚，越敏感或越機密，越難全盤理解官方的真實態度與意圖，所公佈的正式文獻也越少。此時，只能藉由與此議題的決策相關，或曾進行深入研究的學者、退休官員的研究、政策建議或回憶錄，或一般學界的主流意見，來代替正式官方文獻，提供另一種理解官方地緣政治密碼的管道。但這些管道究非正式的官方文獻透露出來的訊息，故在判讀時必須盡量謹慎，尤其是未經官方證實的一般主流意見更是如此，否則很容易出現誤判。

三、戰略研究

儘管新古典與批判性地緣政治學理論有助於吾人理解國際地緣政治結構對國家行為的影響，以及戰略菁英對世界地緣政治秩序的觀點如何影響其對本國地緣政治密碼的解構，但一來這些都是比較抽象的理解與想像，二來是地緣政治學對國家戰略行為的解釋層面著重於國家的戰略目的，很難解釋國家的戰略手段性質與偏好，但後者卻是影響整個地緣政治體系均衡的重要層面。串連起國家政策目標與手段運用的性質與偏好這兩者的橋樑就是國家在各個不同層級的戰略，特別是大戰略以及地緣戰略。傳統上，戰略研究的目的主要在瞭解國家如何使用武力工具達成戰略目標，以及武力使用與政治目的之間的關係。地緣戰略既強調使用武力與政治力量控制重要交通線，顯然必須使用戰略研究方法。但戰略研究區分成許多次級研究領域，彼此關注的研究重點不盡相同，¹¹³本論文主要使用戰略研究中的戰略文化研究與傳統的軍事戰略研究，以釐清中國地緣戰略對於武力使用的偏好，和是否足以達成中國的戰略目標。

地緣政治學與戰略文化之間的關係發生得很早，由於各種地理環境的變化相對於權力的變化而言顯得相當緩慢，而且國家無法獨力改變地理環境，地理環境的不可選擇性使國家在應付外來威脅時具有長期且規律的思考方式與戰略選擇，使其成為戰略文化的重要形成機制之一。麥金德對德國地緣戰略行為的分析除了最著名的心臟地帶理論對國家戰略行為的影響之外，還包含對德國戰略文化的分析，以及近代德國人對國際經濟秩序和德國經濟制度運用於國家戰略發展的分析。¹¹⁴但麥金德對戰略文化的重視被後來的研究者忽略，絕大多數新古典地緣

¹¹³ 關於戰略研究的次級研究領域與研究方向的簡要說明，可參考陳偉華，「戰略研究的批判與反思：典範的困境」，*東吳政治學報*，第24卷第4期(2009年12月)，頁7-21。

¹¹⁴ 麥金德在*民主理想與現實*(*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一書中有最明顯的此三層次分析，除了地緣政治分析之外，麥金德另外也以經濟方面的理由闡述了心臟地帶的重要性，以及借用會計學「永續發展」(*Going Concern*)概念來描述不同的經濟制度對各國戰略發展與戰略選擇的影響。麥金德在分析德國控制心臟地帶後的可能戰略行為時，非常注重對德國戰略文化的研究，儘管他並沒有「戰略文化」的概念，而且只是粗淺地分析德意志民族的歷史與行動哲學對德國地緣戰略手段運用的影響。請參考 Mackinder, *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op. cit.*, pp. 14-15, p. 17, pp. 92-99, pp. 12-113, and p. 125.

政治學理論只繼承麥金德關於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分析的研究方法，幾乎沒有新古典地緣政治學理論繼承麥金德研究方法中的戰略文化分析，但戰略文化對國家大戰略行為的影響如今已被學界所承認，因此研究中國地緣戰略不能忽視中國戰略文化對其地緣戰略的影響。

此外，地緣戰略強調政治與軍事力量對重要地理目標的控制，因此研究中國的軍事力量是否能達成中國地緣戰略中的政治目標，是一個重要的研究目的，況且目前國際社會對中國崛起最關切的主要議題之一是中國是否轉而會發展強大的遠洋海軍，試圖以海軍作為獲取東亞地區霸權的主要工具，甚至挑戰美國的全球海軍優勢地位，因此有必要研究中國的海軍戰略是否能夠達到其控制亞太重要交通線的戰略目標，並因此與周邊國家甚至美國發生嚴重的衝突。

(一)、戰略文化研究

誠如新古典現實主義所指出的，權力等結構變數對國家戰略行為的影響是間接的，體系的外在壓力必須透過作為中介變數的國內政治決策程序承接，才能反應在戰略上。¹¹⁵儘管現實主義典範不承認戰略文化的價值，但戰略文化與國際體系理論確實有相當寬闊的理論互補空間，只要有適當的連結，可互相增強彼此對國家戰略行為的解釋力。¹¹⁶

戰略文化與地緣政治密碼一起扮演中介變數的角色，影響決策者制訂出不同的戰略。¹¹⁷人的思想必然受到其成長環境、社會文化背景和國家抵抗外敵經驗的影響，戰略規劃反應出制訂者對這些非物質變數的內化程度，加上對國家所處的戰略環境的認知，不同的認知產生不同的戰略思想。戰略文化即欲探討非物質的理念與文化變數對國家大戰略行為影響的強弱，俾能對國家的戰略行為有更好的解釋，根據布斯(Ken Booth)的解釋，戰略文化對國家大戰略行為共有六種主要且重疊的解釋力：1. 可以排除因種族中心主義(enthinocentrism)作祟而產生的戰略互動誤解；2. 是戰爭中知己知彼的基礎；3. 可使研究者注意到歷史研究對瞭解他者的動機、自我想像(self-image)與行為模式的重要性；4. 戰略文化有助於打破國內政治分析與國際關係研究之間的障礙，提醒研究者決策結構、軍事努力與政策制訂過程都是在特定的政治文化中運作；5. 有助於解釋受到不同社會與文化影響的分析者對於他國「非理性」行為的原因，提供了溝通的功能；6. 文化變數的理解對威脅的正確認知與評估非常關鍵，它可協助理解對手在重大與輕微議題上的思考模式與行為上的差異。¹¹⁸

戰略文化研究能有如此廣泛且多樣的功能係因其根源包括國家的地理與資

¹¹⁵ Gideon Rose,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Vol. 50, No. 1(October 1998), p. 146.

¹¹⁶ John Glenn, Darryl Howlett, and Stuart Poore eds., *Neorealism versus Strategic Culture* (Burlington: Ashgate Press, 2004), pp. 11-12.

¹¹⁷ 戰略文化研究始祖史奈德將戰略文化視為獨立變數，本論文將戰略文化視為干擾變數除了作者本人對戰略文化的概念以及研究方法運用上的緣故使然，但亦有其他學者持相同見解，可參考徐子軒，「軍事擴散理論的新思維：複合邏輯下的安全備戰模型」，*問題與研究*，第 50 卷第 1 期(2011 年 3 月)，頁 149-153。

¹¹⁸ Ken Booth, "The Concept of Strategic Culture Affirmed," in Carl G. Jacobsen eds., *Strategic Power: USA/USSR* (London: Macmillan, 1990), pp. 125-126.

源、歷史與經驗、政治結構與防衛組織等，¹¹⁹故影響的層面為大戰略層面，¹²⁰畢竟國家達成對外政策目標並不是只有運用軍事手段達成，戰略文化所欲解釋者只是國家對使用武力的偏好，¹²¹而非軍事戰略的類型與攻守態勢。文化雖然是一種理念性的變數，但若忽視構成文化的社會內部與外部物質基礎，只強調文化的理念面，很容易淪為「戰略思想研究」而非真正的「戰略文化研究」，正如布魯克 (Timothy Brook) 所言：「文化乃是人們做了什麼，而非人們認為他們應該怎麼做」 (Culture is what people do, not what they think they should do)。¹²²故戰略文化研究應著重分析國家在歷史上的大戰略行為，而非僅針對思想性的著作進行探討，如江憶恩大量採用的**武經七書**這類的傳統典籍。歷史乃是國家過去行為的反應，必須對歷史有詳細的認識才能對國家的戰略文化進行深入的分析，否則將淪為戰略思想研究而非真正的戰略文化研究。傳統典籍雖然可能是行動時的指引，但卻是原則性遠高於指導性，與大戰略行為之間未必具有明顯的關連，難以解釋為何出現某種大戰略行為的真正原因。

本論文為求進一步探究中國戰略文化的真實面貌，很重要的一項任務是對中國自先秦時代以來的歷史經驗作盡可能完整的詮釋。雖然在進行這項工作時，必須對中國古典文獻進行大量分析，但本論文分析的對象並非**武經七書**或**四書、五經**之類的傳統思想典籍，而是重要的歷史紀錄，包括官修正史、可信的私家歷史紀錄，以及官方文獻等能提供對大戰略行為的背景、決策原因提供重要解釋力的歷史文獻。基於如上的研究方式與觀察時間維度，本論文的戰略文化研究屬於所謂的「第一代」戰略文化研究，¹²³並利用柏杜 (Peter C. Perdue) 所謂的「實踐邏輯」 (logic of practice)，¹²⁴強調對國家大戰略行為的研究而非僅針對戰略思想家著述的研究。本論文所根據的戰略文化定義是第一代戰略文化研究者中最廣為接受的布斯的定義：「國家用來適應環境，與解決威脅、使用武力等相關的傳統、價值觀、態度、行為模式、習慣、象徵、成就與特別的方法」。¹²⁵在這樣的定義中，一個國家的戰略文化絕不具有單一性，而是隨著決策與戰略菁英的社會文化背景、服務於何種國家組織、對國家歷史與戰略環境的認知、對國家整體文化的內化程度等的差異，形成數種不同的戰略次文化，真正在決策過程中對戰略的本質、類型、偏好手段等發揮影響者，乃是不同的戰略次文化而非概括性的國家社

¹¹⁹ Alan Macmillan and Ken Booth, "Appendix: Strategic Culture— Framework for Analysis," in Ken Booth and Russell Trood ed., *Strategic Culture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99), pp. 365-366.

¹²⁰ 趙景芳，「戰略文化的再思考」，**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2008年第1期(2008年)，頁16。

¹²¹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op. cit.*, p. 36.

¹²² Timothy Brook, *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 Commerce and Culture in Ming China*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California Press, 1998), p. 124

¹²³ 見楊仕樂對當前戰略文化研究在本質、時間維度與觀察標的的分類。楊仕樂，「物質基礎、理念慣性：中國『王道』戰略文化的實證檢驗 1838-1842」，**中國大陸研究**，第54卷第4期(2011年12月)，頁9。

¹²⁴ Peter C. Perdue, "Coercion and Commerce in Two Chinese Frontiers," in Nicola Di Cosmo eds., *Military Culture in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317.

¹²⁵ Ken Booth, "The Concept of Strategic Culture Affirmed," in Carl G. Jacobsen eds., *Strategic Power: USA/USSR*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90), p. 121.

會文化或政治文化。

本論文的戰略文化研究途徑與江憶恩的研究最大的差異，便是將戰略文化研究與地緣政治學結合。蓋類似戰略文化與地緣政治密碼這類偏向理念性的非物質變數皆不能脫離支撐其發展的社會下層物質基礎，因此戰略文化不可能偏離國際與社會兩種物質環境所加諸的限制，否則將會使國家受害，¹²⁶何況人在制訂戰略時也不可能不考慮國際環境與本身的國力等物質因素。因此國家的政治行為是其歷史經驗的反映，而歷史經驗有相當程度是國家地理條件的產物，¹²⁷故地理是戰略文化的塑造根源之一。但無人應該如何區分戰略文化與地緣政治密碼兩個理念性變數對戰略的不同影響？舉例來說，阿德曼(Jonathan R. Adelman)和石之瑜認為中國古代的用兵目的在於在維護朝貢體系存續與天朝形象等象徵主義(symbolism)的目的而非現實主義考量，因此有獨特的戰爭方式。¹²⁸在這樣的敘述中，維護朝貢體系與天朝形象等戰爭目的是決策菁英對中國古代地緣政治密碼的解構，而獨特的戰爭方式才是戰略文化的影響，是根據國家本身與主要競爭對手的地理環境、結構的形式、國家本身與結構的地緣政治特徵和模式，為了達成地緣政治密碼設定的戰略目標，長久下來累形成的大戰略行為模式。戰略文化與地緣政治密碼兩者皆與作為下層物質基礎存在的地緣政治結構與國家能力密切相關，無法脫離這些物質基礎的制約。因此本論文在結構理論之外合併使用戰略文化途徑與地緣政治密碼，希望能開發過去並未為人所注意的研究層面，以期使本論文能更有精確地瞭解中國決策菁英如何設定戰略目標，並分析地緣政治結構如何塑造中國歷史上的戰略文化，而中國被納入全球地緣政治結構後，其決策菁英如何改變理念性的戰略遺產，將其反應至當代中國的地緣戰略。而這樣的研究方法雖然提及地緣政治「結構」此種物質概念，卻不是引用結構現實主義的結構概念並為了擴大結構現實主義的解釋能力，因此本論文的第一代戰略文化研究雖以物質基礎進行詮釋，卻與結構現實主義沒有很高的相容性，¹²⁹蓋地緣政治密碼並不一定符合結構現實主義的邏輯。

值得注意的是，針對戰略文化和國家行為之間的分析應著重於大戰略層級，包括江憶恩在內的許多戰略文化研究者分析的其實只是軍事戰略行為而不是大戰略行為，¹³⁰戰略文化對大戰略和軍事戰略行為必須有所分別，¹³¹然而大多數學者的研究都偏向軍事戰略行為，儘管研究結果或許與事實相去不遠，但卻失去戰

¹²⁶ Alexander E.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12-113.

¹²⁷ Gray, *The Geopolitics of Super Power*, op. cit., p. 43.

¹²⁸ Jonathan R. Adelman & Chih-yu Shih, *Symbolic War: The Chinese Use of Force, 1840-1980*(Taipei: Institu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1993), pp. 27-30.

¹²⁹ 關於戰略文化研究與結構現實主義的相容性分析，見黃恩浩，「爭論中的國際關係『戰略文化』研究：回顧與展望」，發表於 2011 年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會第四屆學術研討會(台北：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會、淡江大學國際研究學院主辦，2011 年 6 月 9 日)，頁 11-17；John Glenn, "Realism versus Strategic Culture: Competition and Collabor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1, No. 3(September 2009), pp. 523-551.

¹³⁰ Oliver M. Lee, "The Geopolitics of American Strategic Culture," op. cit., p. 273.

¹³¹ 趙景芳，「戰略文化的再思考」，前引文，頁 16-17。

略文化研究的真意，因為軍事戰略為了求勝，戰爭中的許多行為必然帶有明顯甚至比政治人物更強調現實政治色彩，與國家的主流戰略文化可能大相逕庭。因此本論文的戰略文化研究分析集中於對中國的大戰略行為，戰爭方式、個別戰役乃至軍隊的組織文化，皆非本論文戰略文化途徑的運用範圍。

(二)、海軍戰略研究

比起戰略文化，海軍戰略研究是戰略研究中更傳統，也更接近純粹軍事研究與軍種戰略的研究範疇，但本論文認為採用海軍戰略實甚為必要，首要原因在於目前學術界對中國崛起及亞太區域安全的一個關注焦點在於中國轉向海洋發展之後的戰略目標與其海軍戰略意圖和能力，因此為了分析中國海軍戰略是否能達到其地緣戰略目標，本論文運用海軍戰略研究途徑對中國海軍戰略進行分析。

首先從海軍戰略的「制海權」(command of the sea)角度切入分析中國海權發展的本質與其方向。第二個原因則在於海軍戰略經常與「海權」有密切關係，海軍為海權的重要組成支柱，因此海軍戰略研究與地緣戰略研究密不可分，比起其他陸軍、空軍與太空軍事戰略研究，更切合本論文的研究題旨。因此本論文從制海權角度切入後，將綜合馬漢與柯白(Sir Julian Corbett)兩大海軍戰略學者對於海權、制海權與海洋戰略的理論分析，¹³²目的是輔助其他研究途徑判別中國的地緣戰略方向與本質，判斷中國未來發展方向究竟是位於歐亞大陸，還是確實朝海洋發展，或者還有「海陸並重」的第三條路線，並驗證本文對中國海軍戰略發展的假設：中國海軍戰略的目標是輔助中國成為東亞霸權的主要工具，是政治性的手段而非中國真正以海洋為主要戰略發展方向，與歷史上的其他大陸強國如德國、前蘇聯的海軍戰略發展並無二致。

此外，本途徑還將用以解釋美國為何始終對中國懷有戒心並維持東亞駐軍，以及強化與日本、澳洲、印度等主要亞太國家進行安保合作的原因—持續在東亞掌握制海權。國際關係研究中除了攻守理論(Offense-Defense Theory)外，非常少見與軍事戰略的綜合研究，但國際政治史實為一部戰爭史，軍事戰略對國家行為即使在今日也有很大的影響。由於海權自 18 世紀以來可謂是影響國際關係發展的主要變數，¹³³其性質與陸權或一般熟悉的陸上戰略不同，對海上交通線的控制方法亦不如陸上交通線。德國、蘇聯皆曾致力於海軍戰略與海權發展，但其結果卻為國家與海軍的戰略破產，顯示這個次領域有其獨特的學術價值，在中國大力發展海權的現在實不可忽視。

四、方法論

(一)、文獻分析法(Document Analysis)

¹³² 比起馬漢對地緣政治學的貢獻，柯白更專注於海軍戰略的研究，因此其影響力很少出現在地緣政治學之上。然而柯白對海軍戰略研究的貢獻並不亞於馬漢，且某些方面更勝馬漢一籌，其研究已部分超出純粹海軍戰略的領域，而進入大戰略與「海洋戰略」(Maritime Strategy)的領域，因此本論文決定採用柯白的理論分析作為輔助之用。關於柯白的著作，主要可參考 Julian Corbett, *Some Principles of Maritime Strategy* (Annapolis, Marylan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88).

¹³³ Jon Sumida, "Alfred Thayer Mahan, Geopolitician," *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22, Issue 2 & 3 (1999), p. 43.

本論文的研究方法既有新古典地緣政治學關於地緣政治結構的分析，也包含了部分批判性地緣政治學的研究方法。就前者而言，對全球地緣政治環境的政治地理學分析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大量仰賴對相關地區各種地圖的研究、政府在政治、經濟、貿易、軍事、社會方面的統計資訊，和對國家與地區的歷史與文化研究，以使具有類似文化與歷史牽連的國家被歸屬於同一政治地理區。至於批判性地緣政治學的地緣政治密碼研究與戰略文化研究同樣重視對國家相關戰略文獻與官方文件的大量閱讀，以判別其戰略菁英對密碼的認知與戰略文化的內化程度，也是判斷一個國家戰略部署與方向的重要手段。而歷史研究更是戰略與戰略文化研究不可或缺的研究方法。因此本論文主要將採用文獻分析法與歷史研究法等兩種研究方法，在運用上以文獻分析法為主，歷史研究法則主要用於本論文關於戰略文化的討論，以及中國歷史的回顧。

故本論文所使用的第一個主要方法論工具是文獻分析法。此法有系統地針對相關的各種文獻，包括官方檔案、書籍、期刊文章、報導、智庫分析報告等，詳細地閱讀，並以客觀的態度詮釋、分析文獻所欲表達的意涵。本論文運用此法有兩個目的，首先在於詳細閱讀各種重要的地緣政治學體系結構理論之後，從中找出適合的分析架構，而非毫無目的地套用任何一種地緣政治學理論，畢竟每一個社會科學理論都不是完美的，都各有其缺陷，如何對每個理論截長補短，建構出最適合本論文的分析理論，是文獻分析法的第一個目標。

其次，由於本論文的研究主題在於中國的地緣戰略及其對亞太地緣政治均衡之影響，故也必須針對與中國大戰略與地緣戰略相關的各種著作與研究、政府文獻、官方公佈資料與相關重要報導，由於中國尚不是容忍言論多元與自由化的民主政體，故本文將特別對具權威性與代表性的官方與半官方學術刊物與報導，進行大量的閱讀與分析，如此才能釐清在辯論中的中國地緣戰略中，何者較具主流地位與影響力，而何者在未來可能是中國地緣戰略的主要方向。此外，中國的周邊國家或重要的戰略對手特別是美國、日本、印度，其學術界的相關亞太戰略研究，與政府文獻、媒體報導等也是本論文的研究分析對象，因為這些國家是直接與中國地緣戰略發生互動並影響亞太權力政治的主要行為者，必須對其透露出來的訊息深入分析，才能對本論文的研究假設進行實證檢驗。

(二)、歷史研究法(Historical Analysis)

本論文所採用的第二個研究法為歷史研究法。歷史研究法由來已久，顧名思義，其方法為針對少數的個案，分析過去一段時間內所發生的一連串事情的過程，並作有系統地探討以瞭解事件的來龍去脈、彼此之間的關連性與因果關係，最後得出對所分析的個案對象的意義。此法分析的個案對象可以是國家、文化、民族等。歷史研究法非常重視事情發生的先後時序，這種態度不僅見於純粹的歷史研究中，對國際關係的研究亦越來越重要，尤其是較側重於政策分析的研究，因為政策分析所涉及的對象與可能發生影響的變數非常繁多，而此法可以藉由強調所分析的個案的歷史背景、重要歷史事件發生的時機以及事件發生的持續時間，排除其他與分析不相關的龐雜變數，從而簡化了分析的複雜度。對本論文而

言，特別重要的是瞭解中國歷史與地理環境的連動性，中國歷代所面臨的不同地緣政治結構，對形塑其地緣戰略所構成的影響何在。後者對於認識中國戰略文化對中國對外政策與地緣政治態度具有極重要的影響，必須有正確的理解才能進一步分析中國目前的崛起本質，以及其崛起是否是獨特的，還是與歷史上其他崛起的國家一樣，很容易對周邊國家甚至範圍更廣大的整個體系內部主要國家，構成嚴重的安全威脅。

(三)、個案研究法(Case Stud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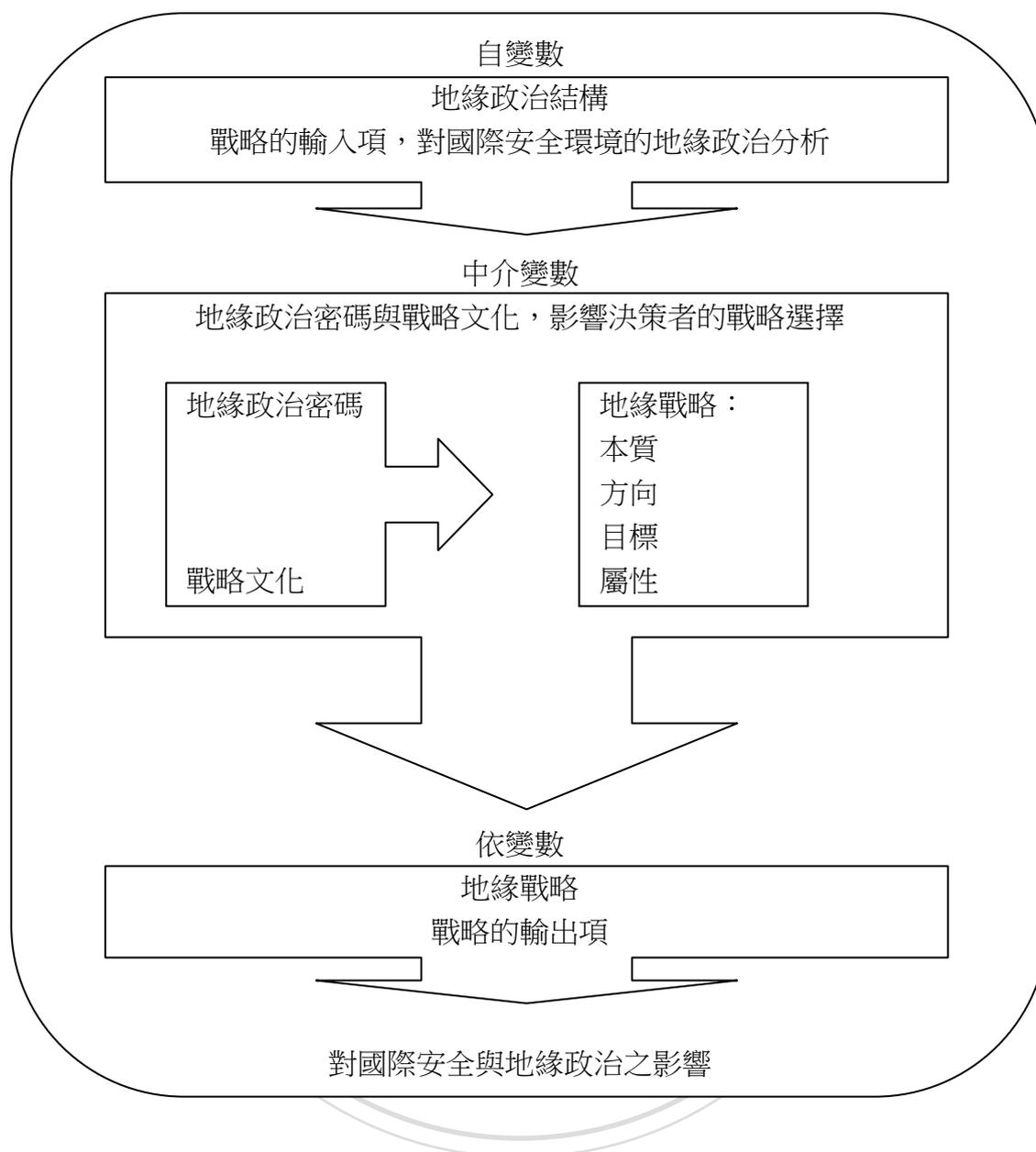
個案研究法亦為重要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之一，其方法在於利用對研究個案的分析，來達成檢驗理論，或創造理論，或辨識前提(antecedent condition)，或檢驗前提的重要性，或解釋個案的內在重要性。¹³⁴個案研究法有助於檢驗本論文關於利用地緣政治結構理論分析中國古代大戰略與戰略文化類型的研究目標，從對春秋戰國時代以來，包括秦漢時期、南北朝、唐代、宋代、明朝與清朝等中國歷代王朝應對外來威脅的模式，以及中國歷代戰略菁英對中國地緣政治密碼的解構，有助於瞭解經過兩千年的發展，中國的戰略文化類型與對大戰略的偏好類型，以及這些類型和偏好是否也為今日的中國戰略菁英所繼承。

五、變數設定

在地緣戰略的產出過程中，地緣戰略作為國家的政策產出，屬於依變數(Dependent Variable)，而地緣政治結構則作為戰略制訂背景的物质基礎，是對整體國際安全環境的地緣政治分析，為戰略制訂過程中的自變數(Independent Variable)。不過雖然地緣政治結構的變化必然引發地緣戰略的調整，會產生什麼樣的調整卻必須依靠國內政治決策作為中介變數(Intervening Variable)來承接結構所施加的外部壓力並做出決策。地緣政治密碼與戰略文化就是此一過程中的中介變數，前者替決策者指出國家追求的各層級戰略目標、威脅國家安全的主要來源、國家利益所在，並依此判斷結構中其他政治地理區域、國家，或特定戰略地區對本國的戰略價值，從而影響地緣戰略的方向；後者則影響地緣戰略依賴哪一種主要手段達成戰略目標(圖 1.2)，與地緣政治密碼一起影響決策者的戰略選擇，並決定戰略的地緣政治屬性(大陸或海洋)。

¹³⁴ Stephen Van Evera, *Guide to Methods for Students of Political Science*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55.

圖 1.1 地緣戰略制訂過程與對國際安全影響的各種研究變數設定



第五節、研究限制

本論文的研究限制主要有兩種，分別是研究文獻類型與研究範圍。

一、研究文獻類型的限制

無論是戰略研究或地緣政治密碼分析，最重要的研究資料之一是重要政軍領導人的戰略思想以及相關決定政策與戰略方向的文獻，以及高層領導人對戰略決策的過程。這三種文獻中，戰略決策過程無論在哪一個國家都是最難以取得的文獻，政策與戰略方向文獻其次，戰略思想又其次。但就中國的戰略研究而言，即

使是戰略思想與決定政策與戰略方向的文獻都相當難以取得，屬於高度機密，少有公開文獻可供參考。因此雖然馬漢與麥金德非常重視政治制度與社會組織的分析，以作為政府對國力的組織與運用方向的研究基礎，¹³⁵但由於此涉及戰略決策過程，而中國在這方面的透明度遠低於西方國家，故本論文卻不得不割捨這個重要的研究方向，仍將國家戰略決策過程視為「黑盒子」。

另外，如同本論文將在第五章指出，毛澤東、鄧小平兩位領導人提出的長期指導性戰略路線並不一致，遑論冷戰結束後迄今不過二十年，中國就已經出現江澤民政權在 1990 年代後期提出的「新安全觀」與「多極化」，以及胡錦濤政權在 200 年以後提出的「和平發展/崛起」、「和諧世界」等兩種不一致的長期指導性戰略路線，原來的「江澤民路線」在胡錦濤上台後即逐漸退去主流地位。這種現象並不奇特，每個不同的領導人與政府都有各自的地緣政治密碼，國家原本就會因為政權的更替而因此在戰略路線上出現修正，甚至更大規模的改變，未來胡錦濤下台之後，新一代領導人可能也會提出新的取代性戰略思想。但毛、鄧兩人路線的差異與江、胡兩個政權的路線差異，最大的根本不同點在於自毛澤東死後，中國領導人**本身**的政治權威就不斷下降，到了鄧小平之後幾乎沒有中國政治領導人能單獨提出具代表性與長期指導性的戰略思想。

因此就目前的情況來說，中國領導人**本身**的戰略思想幾乎已經不像毛澤東時代那樣具有絕對的參考價值。此種情況在軍人中更為明顯，只有劉華清的回憶錄較具參考價值，能就本論文對中國海洋與海軍戰略的發展假設提供一定程度的檢驗工具，但劉氏對中國海軍戰略的影響力仍顯然不能與馬漢、德意志帝國海軍(Kaiserliche Marine)的鐵必制(Alfred von Tirpitz)，以及前蘇聯海軍元帥高西科夫(Sergey Gorshkov)元帥等人相較。不過由於中共採取「民主集中制」的決策體制，而這套決策體制強調決策路線做成後，除非在下次討論期間予以更改，否則不可違反已做出的決策。¹³⁶這使得雖然鄧小平之後的領導人已不具備定於一尊的政治權威，但每位領導人執政期間提出的政策路線仍是最明顯的地緣政治密碼與戰略走向。故本論文捨棄對鄧小平以後的中國政軍領導人**本身**的戰略思想分析，所謂的領導人**文選**，不再是分析冷戰後中國地緣政治密碼的最權威文獻，這種文獻只適用於毛澤東與鄧小平兩個時期，在這兩個時代之後，本論文對於檢驗本論文觀點的中國地緣政治密碼的研究的權威文獻證據，只以中國官方公佈的政策白皮書、政府工作報告等指導性文件為主，特別是在體系與區域等越高層次的密碼。領導人的聲明與演講雖然仍具有非常高的證據效力，但因其不具備像毛澤東、鄧小平那樣的最高指導性，故本論文將這類文獻作為較次要的檢驗證據，且主要用於檢驗較低層次密碼或戰略操作的文獻證據。

二、研究理論範圍的限制

¹³⁵ 沈默，**地緣政治**，前引書，頁 75-78。

¹³⁶ 本章對民主集中制的理解，係參考許耀桐，「民主集中制的“集中”之解」，**學習與實踐**(湖北)，第 7 期(2011 年)，頁 25-27。

第二個研究限制是不討論批判性地緣政治學中的世界體系(World System)理論，以及與世界體系密切相關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現象，二者都強調經濟全球化之後，傳統地緣政治與戰略思考對國家安全重要性的降低，前者的研究重心在於資本主義(Capitalism)擴張所形成的核心(Centre)－半邊陲(Semi-Periphery)－邊陲(Periphery)等三級世界經濟互賴體系對國家地緣政治與戰略行為的影響，後者則認為在一個疆界逐漸消失，而各種地理障礙對人類活動的障礙逐漸降低之際，地理對國家行為與文化發展的影響力是否仍維持過往的程度，還是已經降低到使地緣政治學不再具有存在價值的程度，值得懷疑。¹³⁷本論文承認冷戰後的世界經濟確實逐漸走向全球化與資本主義化，同時也的確顯現出明顯的三級互賴特徵，而且中國逐漸融入此一體系的運作，後者亦改變了中國某些地緣政治行為，使其比毛澤東時代更願意融入國際社會。但本論文不從全球化與世界體系理論切入探討當代中國地緣戰略的原因有三：

第一，全球化與世界體系理論最大的缺陷在於太過強調經濟對國家行為的影響，儘管經濟的確是國家外在行為的最大誘因之一，但國家一如個人，不是完全的「經濟產物」，還必須考慮到其他非經濟因素如文化等對國家戰略行為的影響力。此外，即使是世界體系也無法否認交通線控制與其他新古典地緣政治學重視的地理目標對世界經濟結構的重要性，各種經濟活動的基礎是實體貨物的交易，而沒有交通線就不可能產生交易，更無從形成世界體系，而沒有對貿易交通線的控制就不可能形成經濟霸權，主導世界體系的秩序。國家還是非常關注許多經濟之外的傳統安全威脅，融入世界體系與國際社會，並沒有使中國完全擺脫傳統的戰略思考，且東南亞國家也反而擔心中國在徹底轉變成為核心國家之後，會將東南亞地區作為勢力範圍中的邊陲地區，在東亞再現中國古代的「朝貢體系」(Tribute System)。

第二，認為全球化使得地緣政治學的重要性已經瀕於消失的說法言過其實，科技發展與不斷增加的國際交流都無法擺脫地理與空間的影響，武器本身的目的是為了控制空間，而且只能在空間裡操作，凡牽涉到國家與空間概念者就脫離不了地緣政治學的研究範疇。只要國家不是以進行滅絕全部人類文明的戰爭為最後目的，地緣政治密切對國際合縱連橫就仍有其重要性。至於全球化對地緣政治學的影響，只要指出在全球化如此被廣泛談論的時代，貨物的運輸還是必須仰賴傳統的海陸交通線，而且國際經濟很難禁得起重要的國際交通線受到海盜或自然災害的侵襲與阻斷運輸；重要天然資源與能源的減產或減少輸出，立刻使全球經濟與國際經貿往來受到嚴重的干擾。更重要的是，無論再怎麼強調非國家行為者於當今國際社會中的活躍情況對國際關係的影響，非國家行為者在許多傳統與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功用仍無法與國家相比，特別是在與地緣政治相關且攸關國際民生的安全議題上，聯合國對索馬利亞海盜的聯合打擊行動與東南亞國家在麻六甲海峽(Strait of Malacca)的反海盜行動就是最好的例子。

此外，各國對於本國的戰略資源仍然非常保護，對於他國產的戰略資源不僅

¹³⁷ Ó Tuathail, Dalby, and Routledge, *The Geopolitics Reader*, op. cit., p. 2.

想盡辦法獲取，也不願競爭對手國能順利取得，更有甚者，依賴本身的大量戰略資源與能源蘊藏操縱國際關係，以此制裁、要脅競爭對手國，¹³⁸或者利用「新重商主義」(Neomercantilism)從眾多對本國戰略物資需求孔急的國家中謀利，¹³⁹提高本國的國際地位或使國際關係朝有利本國的方向發展，毫無依據市場機制與自由貿易精神協調各國取得戰略性資源的方式，而這些機制與自由貿易精神卻是當代經濟全球化的基礎，顯示在攸關國家安全的戰略資源獲取方面，仍是地緣政治壓倒全球化。最後，理論上而言國家願意參加全球化進程是因為透過全球化，能夠獲得大於相對安全利益的絕對經濟利益，然而一旦出現大型全球經濟危機，使經濟絕對利益無法超越相對安全利益，或因此改變了國家對於權力分配的認知，則全球化對國家的政策影響力就很有可能倒退，而地緣政治再度成為影響國家政策的重要考量，¹⁴⁰部分學者便認為中國在 2010 年一連串的強硬外交態度，即是 2008-2009 年全球金融危機，導致中國認為本身制度優於西方，而且國力也足以挺過這種大型經濟衰退的認知反應。¹⁴¹

第三，從學術上而言，全球化的概念仍甚模糊，很難令人清楚究竟什麼是真正的「全球化」，¹⁴²是否需要各國在文化、政治等方面均達成與經濟同樣密切的整合程度才算是全球化，抑或只要全球經濟整合達到一定程度即可算是全球化？而就中國對全球化的態度而言，中國是經濟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¹⁴³但中國

¹³⁸ 例如，中國是全球稀有金屬土壤(簡稱「稀土」)這種重要戰略物資產量最高的國家，其內部長期以來就對於美國和日本大量從其國內進口稀土而感到憂心，至少在 2010 年 9 月，中日雙方因為日本逮捕在釣魚台海域衝撞日本海上保安廳船隻的中國漁船及人員，並將船長交付其國內司法程序而引起的嚴重外交危機中，一度曾傳出中國欲利用對日本的稀土禁運來要脅日本讓步，而日本則欲改從蒙古進口稀土以免遭中國箝制與報復，儘管最後中國官方否認這種報導的真實性，但此種可能已引起有關國家的憂慮。Keith Bradsher and Hiroko Tabuchi, "China is Said to Halt Trade in Rare-Earth Minerals With Japan,"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4, 2010, <http://www.nytimes.com/2010/09/25/business/global/25minerals.html?ref=asia>;「日本尋求開發蒙古稀土免受中國禁運威脅」，**BBC 中文網**，2010 年 9 月 25 日，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business/2010/09/100925_japan_mongolia_rare_earth.shtml;「中國禁止向日本出口稀土？商務部否認」，**中國評論新聞網**，2010 年 9 月 23 日，<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14/5/4/5/101454539.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1454539&mdate=0923160407>;「中國打稀土牌 西方怕到」，**中央通訊社**，2010 年 9 月 27 日，<http://www.cna.com.tw/ShowNews/Detail.aspx?pNewsID=201009270287&pType0=aCN&pTypeSel=0>。

¹³⁹ 這方面最為明顯的就是俄羅斯利用出口石油和天然氣至歐盟、中國、日本等有大量需求但與俄國或彼此之間存在不少戰略競爭的國家和地區，設法從中提高俄羅斯原本的銷售利益或以此作為要脅對方切勿採取俄羅斯厭惡的政策。Charles E. Ziegler, "Neomercantilism and Energy Interdependence: Russian Strategies in East Asia," *Asian Security*, Vol. 6, No. 1(January 2010), pp. 74-93.

¹⁴⁰ Brian W. Blouet, *Geopolitics and Globaliz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Reaktion Books, 2001), p. 176.

¹⁴¹ See for example, David Shambaugh, "The year China showed its claw," *Financial Times*, February 16, 2010, <http://www.ft.com/intl/cms/s/0/7503a600-1b30-11df-953f-00144feab49a.html#axzz1xN4f6SPI>.

¹⁴² 對全球化觀念的批評與建構，本論文主要參考 Robert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Jr., "Introduction," in Joseph Nye and John D. Donahue eds., *Governance in a Globalizing World* (Cambridge, Mass.: Visions of Governance for the 21st Centur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0), pp. 2-12.

¹⁴³ Samuel S. Kim, "Chinese Foreign Policy Faces Globalization Challenges," in Alastair Ian Johnston

卻始終抗拒政治與文化的全球化，而且中國學術界在爭論全球化的概念時，部分學者常將全球化等同於「美國化」或「西方化」；¹⁴⁴還有部分中國學者並不認為全球化必然使國際社會走向社會建構主義學者溫特(Alexander Wendt)所謂的「康德無政府文化」(Kantian Culture)，因此認為中國仍必須做好國際社會仍在洛克無政府文化(Lockean Culture)，甚至可能倒退回霍布斯無政府文化(Hobbesian Culture)的準備。¹⁴⁵顯然多數中國學者仍認為國際政治運作還是受到現實主義邏輯支配。即使中國的安全戰略有朝向「安全全球化」發展的跡象，¹⁴⁶但中國對此仍相當遲疑，¹⁴⁷並沒有全面將全球化的各個層面與國家戰略規劃結合，最關切的國家安全方向仍是其周邊國際環境的安全與穩定對中國利益的影響，2010年3月在黃海發生北韓涉嫌擊沈南韓海軍天安艦事件以來，美、中、日、兩韓五邊關係的緊張發展，以及2010年7月美中兩國高層為了南海爭端的外交交鋒，即可證明這一點。因此從地緣政治學切入分析中國發展的戰略方向，仍具有相當程度的準確性與意義。

第六節、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

本論文的研究架構首先利用地緣政治結構理論對中國地理環境進行靜態的政治地理學分析，以及目前中國經濟發展必須的各種戰略資源與能源分佈，和從中國與亞太地區獲得這些資源與能源所需的交通線分佈狀況。在靜態的政治地理學分析之後，則以動態的地緣政治學分析冷戰結束迄今地緣政治結構的地緣戰略意義，以及中國在結構中的地位，和結構將對中國的地緣戰略可能產生何種影響。本論文在這個部分首先將分析中國的經濟和戰略重心變化，其次則分析中國周邊的海洋地區與歐亞大陸等陸地地區對中國經濟與戰略發展的重要性。

其次，本論文將回顧中國古代從先秦至清朝遺留給當代中國的地緣戰略遺產，進一步探討古代遺產與當代中國地緣政治密碼與戰略文化之間的傳承關係，並分析這些地緣政治結構、地緣政治密碼與戰略文化對當代中國地緣戰略的影響，包括當代中國戰略行為中的武力使用偏好，檢驗傳統戰略文化遺產的影響，同時分析中國地緣戰略中的使用武力偏好。在解碼之餘，本論文將特別對中國海軍戰略本質與意圖進行分析，藉以檢驗中國的地緣戰略方向究竟是真的朝海洋國家發展，或只是以海軍戰略為主要發展方向的陸權式發展，還是中國地緣戰略確

and Robert S. Ross ed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284-288.

¹⁴⁴ 關於中國學術界在冷戰後對全球化概念的爭辯，較完整扼要的整理，可參考徐斯儉，「全球化：中國大陸學者的觀點」，*中國大陸研究*，第43卷，第4期(民國89年4月)，頁1-26；俞可平編，*中國學者論全球化與自主*(重慶市：重慶出版社，2008年)。

¹⁴⁵ Ni Lexiong, "Sea Power and China's Development," *Liberation Daily*, 17 April 2005, 4,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Website, 5, http://www.uscc.gov/researchpapers/translated_articles/2005/05_07_18_Sea_Power_and_Chinas_Development.pdf4.

¹⁴⁶ Kim, "Chinese Foreign Policy Faces Globalization Challenges," *op. cit.*, pp. 288-298.

¹⁴⁷ David Shambaugh, "Beijing: A Global Leader With 'China First' Policy," *YaleGlobal Online Magazine*, June 29, 2010, <http://yaleglobal.yale.edu/content/beijing-global-leader-china-first-policy>.

實能夠「陸海並重」。

在分析中國的地緣政治密碼與地緣戰略方向和海軍戰略本質與意圖後，本論文欲探討中國地緣戰略對亞太地緣政治均衡之影響，以驗證本論文的研究假設和對中國地緣戰略的分析，並作為對中國地緣戰略進行分析之後的研究回饋。

緒論之後的章節安排如下：

第二章為文獻回顧，首先將回顧採用歷史與地緣政治分析的西方研究中對中國崛起的悲觀觀點，以瞭解其主張、貢獻與缺陷，第二節與第三節則分別回顧採取類似途徑，但分別為樂觀與折衷的觀點，至於第四節則是針對中國學者本身的研究。本論文逐步回顧中外學者對中國崛起的歷史、戰略文化、地緣政治分、地緣戰略與海軍戰略的研究，目的是從中了解現存對中國地緣戰略研究的貢獻與不足之處，期能使本論文在擷取既有的貢獻之後，能進一步針對不足之處提出新的研究貢獻。關於中國的地緣戰略與海軍戰略部分，由於西方學者對中國的地緣戰略甚少研究，因此將以中國地緣政治學者如葉自成、張文木、鞠海龍、徐起、王生榮等人的著作為主，瞭解當代中國學者對中國的地緣政治環境與本身的地緣政治潛力的看法，以及其提出的中國地緣戰略方向；在西方學者的部分則以荷姆斯與吉原俊井等人關於中國海洋戰略及海軍戰略擴張意圖的研究。

本論文於第三章發展對於中國地緣戰略分析所需的地緣政治結構模型，以及結構和體系均衡的關係。首先在第一節將回顧地緣政治學者曾經對地緣政治結構提出什麼樣的概念與模型建構，並從中選擇以科恩的地緣政治模型為基礎，搭配格利吉爾的交通線控制為國家層級劃分依據的邏輯的地緣政治結構模型建構，發展本論文所採用的地緣政治模型。因此在第二節，本論文將以國家對國際戰略交通線的控制能力作為結構劃分的自變數，劃分結構中的超強、強權、區域大國等三種大國等級，主張唯有能控制戰略交通線的超強才是地緣政治結構中的「極」，因為全球性交通線的存在才使全球體系得以出現與維繫，國家權力的具體化表現是對自然與政治地理環境之控制，而控制能力不僅包括政治、經濟、軍事等三種傳統權力，在 21 世紀的全球體系中還包括國際規範，只要有助於國家影響他國的行為以利於本國控制交通線，都屬於廣義的控制能力。此外，本章亦將闡述何謂「地緣政治均衡」的概念，並分析地緣政治結構與地緣政治均衡之間的關係，在這個部分的研究步驟將以純物質的結構如何影響均衡的發展，包括結構形式、結構內的海陸分佈與國家間的相對位置與距離、有無共同邊界等結構與單元層級物質變數的影響力，最後則以分析戰略文化與地緣政治密碼等干擾變數如何影響國家的地緣戰略，以彌補純物質變數對國家戰略行為與體系均衡的解釋力不足問題，完整討論地緣政治結構與均衡之間的關係。最後，本章亦將探討地緣政治變數與戰略文化形成、變遷之間的關連，以為本論文在第四章、第五章分析中國古代地緣戰略遺產，以及古代遺產與當代繼承之間的關連性。

第四章開始進入對中國地緣戰略的分析。本章係對中國自西周起至冷戰為只

的地緣戰略遺產分析，在這兩部分都各包括對作為干擾變數的戰略文化與地緣政治密碼分析，以及結構的地緣政治模式與特徵、中國本身的地緣政治模式與特徵對中國地緣戰略的影響。重點在整理出中國古代戰略遺產與中國被融入全球地緣政治結構與西發利亞體系等近現代結構變化下的變遷等兩種截然不同的戰略經驗，對當代中國當代地緣戰略可能遺留下何種影響。最主要是指出古代中國所留下的，具備強現實政治本質，重視武力效用但同時運用間接戰略，並因地緣政治結構而導致防禦性重於攻勢性的「內政導向」戰略文化。

第五章是對當代中國地緣戰略的研究，不過本章著重於對當代中國地緣政治密碼的解構，以及當代、古代戰略文化之間的對照分析。本章首先對當代亞太地緣政治結構進行分析，提出「單極加四強」的全球地緣政治結構與「單極加三強」的亞太地緣政治結構，建立接下來對當代中國地緣政治密碼解構的地緣政治物質基礎。第二部分則藉助對中國官方文獻、領導人談話與學者研究等文獻的分析，解構當代中國戰略菁英的地緣政治密碼，以協助釐清其地緣戰略方向。第三部分則是對當代中國戰略文化的分析，對照第四章的戰略遺產，指出當代中國的戰略文化實繼承了古代的「內政導向」戰略文化。

第六章則是對當代中國的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的分析。本章共分為四節，第一節首先綜合 19 世紀中期以後至冷戰為止的大陸國家的地緣戰略發展，歸納出一種「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的戰略形式。第二節與第三節則先後分析中國的地緣戰略特徵、形式、重心與操作，指出當代中國的地緣戰略相同接近以往的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都是深受大陸觀念影響的地緣戰略形式，將陸戰思維應用至戰略環境完全不同的海洋之中，本質上仍是大陸性而非海洋性，目的也不是取代既有的海權，而是利用強大的海軍來防止海權對其在大陸上行動的干預。目前中國海軍戰略的海上陣地戰即是繼承以往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的呈現，而海洋領土化則是其不同於以往大陸國家的新發展。其最終目的在於掌握周邊三個海域的制海權，並在西太平洋實施海上拒止(Sea Denial)來阻止美國干擾其在亞太地區的行動自由，此種「積極防禦戰略」無法使中國發展成為真正的海權或擁有類似美軍的全球作戰能力。雖然中國採取此種攻勢防禦，但其海軍的有限能力使其根本不可能有效分兵前往印度洋，因此中國地緣戰略仍須仰賴傳統的大陸途徑，以在中亞與中南半島的陸上發展為基礎，來強化中國對亞太海上交通線的控制與彌補海上發展的不足，降低對無法順利控制的海上交通線之依賴。不過由於地緣政治重心轉移的緣故，中國地緣戰略的陸地途徑在中南半島與印度洋地區會採取較主動與攻勢性的態勢，而在歐亞大陸方面則採取較被動與守勢的態勢。至於第四節則為本章的小結。

第七章則承接第六章的分析結果，進一步分析中國的地緣戰略對亞太地緣政治均衡的影響。首先在第一節指出目前的亞太地緣政治次體系不存在均衡，而儘管中國的海洋地緣戰略目標相當有限，但美國亦不能容忍，因為這嚴重威脅到其對全球海上戰略交通線的地緣政治地位基礎。不過雖然中國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對次體系中的主要國家與周邊國家都是威脅，卻因為中國尚不具備類似蘇聯那樣

真正強大的能力，又已經相當融入目前全球經濟體系的運作之中，使得各國為了利益與安全，而互相進行離岸平衡與扈從的操作，雖然不致觸怒中國引發真正的緊張關係，卻也使得中國根本沒有受到真正的平衡而能繼續其獨斷行為，導致一種政治與安全關係緊張，但經濟、社會與文化交往熱絡的「冷和平」(cold peace) 狀態。

第八章為本論文的結論，總結第三章至第七章的研究，並對本論文的問題意識與研究假設進行完整驗證。本章共分為三節，第一節將提出本論文的研究發現，其中主要集中於中國地緣戰略行為的本質，以及當前亞太地緣政治結構對中國戰略擴張的限制效應。第二節則是對本論文問題意識與研究假設的驗證，證明本論文的問題意識與研究假設的正確性。最後，本章在第三節檢討本論文的研究不足之處，並提出未來可能的繼續發展方向。



第二章、文獻回顧

在本章的文獻回顧中，由於研究中國崛起對亞太安全的影響的著作自 1990 年代以來早已汗牛充棟，為了節省篇幅以及切合本論文的研究主旨：對中國崛起的歷史與地緣政治分析，以及本論文著重的戰略文化研究，本章將只挑選出少數符合本論文題旨與上述分析重點的研究進行回顧。本章在架構上分為四節，第一節首先針對對中國崛起較為樂觀的觀點進行分析，第二節則回顧較為悲觀的觀點。而第三節則針對中國學者本身的相關研究。最後在第四節的小結則指出這些研究在歷史與地緣政治分析上的不足，無法真正提供完整的歷史與地緣政治分析，並建立古代遺產與當代傳承的關係，為本論文自第三章起的地緣政治模型建構、第四章的中國古代地緣戰略遺產分析、第五章的古代與現代連結，以及第六章分析中國地緣戰略對當代亞太地緣政治均衡的影響鋪路。

第一節、對中國崛起與國際安全互動抱持悲觀態度的 觀點

對中國崛起秉持較悲觀態度的學者相當多見，其中以歷史、地緣政治分析與戰略文化研究為主要內容的研究，則主要以阿查亞(Amitav Acharya)、米爾斯海默與王元綱、荷姆斯與吉原俊井等人為代表。這部分學者雖然研究途徑不同，但皆強調中國崛起對美國乃至亞太與國際體系秩序都構成嚴重的潛在威脅。

一、阿查亞

阿查亞並非專門從歷史、戰略文化與地緣政治途徑研究中國崛起的學者。本章對其悲觀觀點的回顧集中於他反駁本章將於第二節將提到的，康燦雄的朝貢體系與階級化秩序對穩定亞洲國際秩序的兩種樂觀觀點：亞洲國家沒有對中國實施權力平衡，以及中國在過去的朝貢體系主要利用非暴力手段解決國際爭端。

¹他指出亞洲國家並非沒有針對中國實施權力平衡的動作，至少印度就有，而其他與中國有領土爭端的亞洲國家大幅提昇海空軍戰力的行為也是屬於平衡中國的一種作為，更不用說美國強化其亞洲同盟體系的行動。許多亞洲國家與中國發展良好的經貿關係，是基於理性考量下的行動而非真正的扈從，否則他們應該連帶在政治上也更向中國靠攏，沒有出現這種現象就表示中國的鄰國對其崛起的態度是擔心多過歡迎。阿查亞進一步表示，中國周邊鄰國與中國的交往，實際上也可視為一種帶有「軟平衡」目的的作為。

¹ Amitav Acharya, "Will Asia's Past Be Its Futur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8, No. 3(Winter 2003/04), pp. 149-164.

此外，阿查亞也嚴厲批判康燦雄的朝貢體系研究基本上忽略中國歷代的對外用兵記錄，即使是在康燦雄研究主軸的明朝也曾對越南擺出侵略政策，鄭和下西洋也曾經干預蘇門達臘與錫蘭的內政，阿查亞引用王賡武的觀點，指出中國的世界秩序其實是在以權力和安全為主要關切的「實用現實政治」(pragmatic realpolitik)基礎上運作，武力則是主要的工具。在這種情況下，亞洲國家根本沒有接受康燦雄所為的階級化國際秩序的跡象，甚至害怕這種秩序形式，因為這代表一種上下從屬關係，可是中國周邊鄰國與中國一樣已經接受西發利亞體系的主權觀念、平等外交關係與規範，難以接受這種具備上下關係的國際秩序。體系的結構若權力不對稱，必須要設法加以管理才能為持穩定，不可能僅依賴中國的「善意」。阿查亞進一步表示，階級化體系的秩序很難維護，必須依賴積極的管理才能長期為持穩定，而從現實主義的觀點來說，管理就是以美國為首的權力平衡，自由主義與建構主義則會尋求互賴、規範與制度。

阿查亞對康燦雄的批評雖然尖銳，不過他主要從國際關係理論的角度，以及方法論上對康燦雄的研究進行批判，認為康燦雄先假定中國以往建構的階級化國際秩序是良善的，然後再找尋文化證據來支持的研究方法並非解決由這個角度分析中國崛起的答案。他自己認為如果要站在「獨特的亞洲經驗」的立場挑戰既有的國際關係理論假設，就不應該以亞洲經驗套用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方法，而應利用「地區知識」(local knowledge)來發展一般性的理論，如同英國學派與哥本哈根學派(Copenhagen School)所做的那樣，而且需要跳脫以亞洲強國本身為中心的觀點。²此種觀點是正確的。不過，由於阿查亞並非詳細掌握中國歷史與古代東亞國際體系的專家，雖然他的觀點大致上沒有錯誤，但是否中國古代歷史經驗與戰略文化對於當代亞太國際秩序的影響不如他所想像中大，則需要他所謂的進一步驗證，尤其是他認為當前中國戰略菁英並沒有恢復以往以中國為主導的東亞國際體系的企圖。

二、海軍戰略的角度：荷姆斯與吉原俊井

大多數西方學者對中國地緣戰略的研究比較集中在軍事戰略層面，亦即中國海軍戰略與中國地緣戰略之關連。其中，荷姆斯與吉原俊井是在這方面研究最多的學者。兩人的研究假設都是認為中國已經確實轉朝海洋發展，特別是由於能源安全的緣故，所以主要朝南海與印度洋發展，³問題只是在中國會在這些地區發展出甚麼樣的海軍戰略，與建造出何種艦隊來達成戰略目標。在 **21 世紀的中國海軍戰略**(*Chinese Naval Strategy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Turn to Mahan*)中，兩人認為雖然目前北京將未來十年的海洋戰略態勢定為已積極防禦為主，但這種戰略防禦概念其本質與馬漢思想並不一致，因此假使中國內部的馬漢擁護者在戰略辯論上獲勝，將會尋求重新解釋與修正積極防禦。⁴因此兩人運用馬漢的海權與海軍

² *Ibid.*, pp. 161-163.

³ James R. Holmes and Toshi Yoshihara, "China's Naval Ambitions in the Indian Ocean," *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31, No. 3(June 2008), pp. 367-394.

⁴ James R. Holmes and Toshi Yoshihara, *Chinese Naval Strategy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Turn to*

戰略理論分析中國海軍戰略與海洋戰略，及其對亞太海洋穩定的影響。但兩人並不完全以馬漢的理論來驗證中國海軍與海洋戰略，而是認為中國將以本國的特色來重新詮釋馬漢理論對中國海軍戰略與海洋戰略的發展與目標。其中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這本書以及兩人後續的其他研究中，都不斷強調中國意欲在南海地區獲致制海權，以及阻止美軍進入第一島鏈內海域的戰略嚇阻意圖，以及中國海軍戰略對美國和亞太海上安全的威脅遠大於過去德國對英國的威脅，和臺灣對於中國達成獲致第一島鏈內制海權戰略目標的重要性。⁵不過兩人最大的缺陷在於很少提供確切的證據連結馬漢式海軍戰略思想與發展和中國現行海軍戰略、地緣戰略甚至大戰略之間明確且必然的關連性。

三、米爾斯海默與王元綱

攻勢現實主義理論提出者米爾斯海默並非真正的中國研究學者，其對中國崛起的觀點乃是基於其攻勢現實主義邏輯，他認為中國經濟的持續快速成長將使其成為東北亞未來最有可能追求區域霸權的國家，而其經濟力量與人口將使中國進一步發展出其他周邊國家合起來也無法平衡的整體國力，導致東北亞的區域權力結構趨向不平衡的多極，迫使美國必須留在東北亞維持權力平衡。⁶但米爾斯海默雖然是現實主義典範中相當注重地緣政治分析的學者，其地緣政治分析邏輯缺陷已在研究動機中說明，無法充分運用在東北亞過去的歷史發展中，而他在當代東北亞的分析中也沒有在對東北亞的分析中充分運用這一途徑，因此問題依然存在：假使日本作為一個島國，無法成功向亞洲大陸擴張勢力，那尋求成為區域霸權的中國又如何跨越海洋取得整個東北亞的霸權地位，並威脅美國。

米爾斯海默不是重視歷史研究的學者，王元綱師承米爾斯海默的攻勢現實主義理論，他的研究是運用米爾斯海默的攻勢現實主義邏輯來比較結構現實主義或文化更能解釋中國的戰略行為。⁷在他對中國宋、明兩代的研究中，王元綱大量運用對中國古典文獻、政府文獻的分析來判斷支撐這兩個帝國對外行動的根源是文化或現實主義考量。此種研究方法相當接近第一代戰略文化研究，但王元綱本人卻不認為他自己屬於戰略文化研究。他在進行大量分析之後認為，結構現實主義較文化更能解釋中國的大戰略行為，結構不僅是中國現實政治的主要來源，中國的對外行動並不依照儒家思想，儒家思想也沒有降低中國的武力使用，或促成中國發展出反戰文化，反而進一步加強結構現實主義的解釋力，特別是儒家思想

Maha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 6.

⁵ *Ibid.*, 87-94; James Holmes and Toshi Yoshihara, "History Rhymes: The German Precedent for Chinese Sea Power," *Orbis*, Vol. 54, No.1 (Winter 2010), pp. 14-34; James Holmes and Toshi Yoshihara, "China Aims for Deterrence at Sea," *The Providence Journal*, October 1, 2009, http://www.projo.com/opinion/contributors/content/CT_holmes1_10-01-09_A2FSAUI_v8.3f8ca36.htm

⁶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2001), pp. 396-400.

⁷ Yuan-kang Wang, *Harmony and War: Confucian Culture and Chinese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3.

要求中國領導人在國力衰弱時不應尋求對外發展這一點。⁸

王元綱的研究確實補充了米爾斯海默的攻勢現實主義在分析中國戰略行為的不足之處，其研究已經很偏向第一代戰略文化研究，但他自己不這樣認為。然而王元綱的分析雖然精闢，而且其個案選擇有一套嚴謹邏輯：主張選擇宋朝與明朝是因為這兩個朝代不僅較以往的朝代更深刻與全面地受儒家文化的影響與支配，而且不選擇元、清兩個「征服王朝」的原因在於這兩個朝代都帶進來非儒家文化的遺產，會影響分析上的真確性。⁹然而，王賡武與黃仁宇均指出，中國漫長歷史中的每個大帝國都具有不同的政治與文化性格，至少就可分成秦漢的擴張崛起型、隋唐的世界開放型，以及明清的內斂型等三種不同形式。¹⁰處於不同階段的帝國，基於其內部的政治、經濟制度與文化等「地緣政治模式」之影響，對於對外關係會形成不同觀點的「地緣政治密碼」，影響帝國的對外關係。此外，文化與歷史的發展有其連續性，明朝既然是繼承元朝之後的帝國，儘管元朝統治中國時間較短，但也留下不少遺產並為明朝所繼承，黃仁宇便曾指出，元朝遺留給明朝的重要遺產之一，便是強調農業優先與紊亂的財政體系，為中國古代帝國的性格由隋、唐、宋的開放性，轉向明、清的內斂性格預先做了準備，使得往後明朝能很容易做出戰略轉向。¹¹更不用說朱元璋建立明朝後，他雖然對其他東亞體系中的行為者強調自己繼承秦漢至北宋的中原王朝正統，卻對草原地區的蒙古游牧行為者強調自己繼承成吉思汗以來的元朝正統，¹²以取得這些行為者的承認與幫助他消滅退回蒙古的北元，這種行為是過去中原地區帝國不可能會發生的情況。但王元綱的研究顯然忽略了此種文化傳承上的細微差異，以及黃仁宇所指出的，中國在地緣政治模式上的變遷對宋、明兩種「性格」完全不同的朝代的戰略行為的影響。¹³

其次，王元綱雖然師承米爾斯海默，他卻甚少運用米爾斯海默的攻勢現實主義結構邏輯與地緣政治分析途徑來研究結構與地緣政治對宋、明兩個帝國的戰略行動，但這兩個帝國所處的結構與地緣政治條件確有極大的差異：宋朝始終先後面對遼、金等其他超強，以及西夏這一強國的威脅，並致力於收回被這些強國控制的「原」中國領土；反之，明朝除了在立國之初面對北元，以及 15 世紀初、16 世紀初等兩個短暫期間曾面對一統的蒙古汗國之外，並沒有其他真正的超強競爭對手，更沒有需要明朝竭力收回的領土，明朝甚至能建立為人熟知的朝貢體系，而兩宋則沒有這種成就。但很可惜的是，吾人在王元綱的書中較少看到他如何就此種基本結構與地緣政治條件的影響進行分析。更有甚者，王元綱將北宋在

⁸ *Ibid.*, pp. 181-188.

⁹ *Ibid.*, p. 7.

¹⁰ Wang Gungwu, "The Cultural Impactions of the Rise of China on the Region," in Kokubun Ryosei and Wang Jisi eds., *The Rise of China and a Changing East Asian Order* (Tokyo: Jap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 2004), pp. 78-82; 黃仁宇, *中國大歷史* (臺北: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1993 年)。

¹¹ 同上註, 頁 204、214。

¹² 趙現海, 「洪武初年明、北元、高麗的地緣政治格局」, *古代文明* (吉林), 第 4 卷第 1 期 (2010 年 1 月), 頁 91-92。

¹³ 關於黃仁宇對宋、明兩帝國的不同性格描述, 見黃仁宇, *中國大歷史*, 前引書, 頁 152-154、214-215。

神宗執政期間的王安石變法，視為北宋欲利用內平衡來應付西夏壓力的手段，視為權力平衡運作的一環。¹⁴然而假使吾人接受權力平衡的目的是要維持體系之穩定，便不可能接受王元綱的這種推論，蓋北宋既對西夏保有戰略上的優勢，歷來均能擊敗西夏的進攻且給予西夏龐大的歲幣，則北宋想要「平衡」西夏，在邏輯上實說不通，況且北宋變法真正的目的乃是消滅西夏與制服遼朝，尋求對體系現狀的劇烈改變，更不符合權力平衡理論的基本論點。

此外，王元綱也很少討論與其結構現實主義邏輯有明顯衝突的反例，例如北宋與遼的澶淵之盟，北宋與遼分別在這個條約之後維持長達一個世紀的雙邊和平關係，並沒有緊張的權力平衡關係出現，北宋也放棄進一步成為東亞霸權的意圖，甚至王元綱自己也注意到北宋與西夏沒有聯合起來平衡遼，因為北宋認為西夏的獨立是對其威望的重大傷害。這些現象都與米爾斯海默最初的攻勢現實主義邏輯有衝突之處，王元綱自己也難以解釋為何明朝除了征服安南與鄭和下西洋之外，沒有更進一步的霸權作為，特別是針對北方的蒙古部落。但是假使吾人運用地緣政治密碼分析途徑，即可很明顯的發現，北宋、明等帝國在結構沒有重大變化的情況下卻改變戰略行動的原因，即使不是儒家文化的影響，也是地緣政治密碼改變的緣故，而地緣政治密碼雖然與國際權力結構相關，但更重要的是與分析單元的地緣政治結構有密切的關連性。可是王元綱的研究卻很明顯地忽略了地緣政治變數—無論是物質的結構還是非物質的密碼—對中國古代與當代戰略行為的影響。

也是因為缺乏地緣政治分析，雖然王元綱正確指出當代中國「和平發展」的戰略邏輯是經濟發展優先、軍事現代化與外交攻勢，¹⁵但吾人卻很難從其分析中瞭解當代中國的戰略發展方向與重心究竟在何處，會與美國、其他亞太重要國家在什麼樣的情況下爆發嚴重的衝突，或能使亞太權力平衡朝向何種方向發展，這是王元綱的研究美中不足之處。

第二節、對中國崛起與國際安全互動抱持樂觀態度的 觀點

國際關係學界對中國崛起和亞太區域安全秉持樂觀態度的學者並不在少數，但只有少部分學者曾利用歷史途徑或地緣政治途徑，或結合二者的分析進行研究。這些學者包括陸柏彬與黎安友(Andrew Nathan)、布里辛斯基、金竣遠(Avery Goldstein)、沈大偉、江憶恩，以及新生代的康燦雄(David C. Kang)。

一、陸柏彬與黎安友：長城與空城計的遺產

陸柏彬與黎安友所合著的長城與空城計：中國追尋安全的戰略(*The Great*

¹⁴ Wang, *Harmony and War: Confucian Culture and Chinese Politics*, op. cit., pp. 66-68.

¹⁵ *Ibid.*, pp. 196-208.

Wall and the Empty Fortress: 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一書，是西方國際關係學界在 1990 年代後期少見的綜合戰略文化歷史學派與地緣政治因素，對中國古代與當代戰略文化對中國大戰略影響的分析。陸柏彬與黎安友注意到中國古代地緣政治環境與歷史遺留給當代中國的兩項戰略文化遺產：同時象徵力量與弱勢和防衛戰略的長城，與象徵實力和軟弱的空城計，前者使中國不斷存有利用各種手段防衛本土的戰略思想，在中共建政後主要以意識型態與準備依靠龐大部隊數目與縱深防衛來嚇阻敵人進犯的解放軍，後者則使中國戰略菁英始終存有使用謀略應對強大外敵的思想，主要運作方式是充分發揮自己的實力與運用對方的弱點。第三個中國歷史與文化所遺留給當代中國的遺產，則是古代「中央王國」(Middle Kingdom)依靠強大的實力與文化優越感於東亞所建立的朝貢制度，這使中國的戰略菁英一直持有很強烈的中國中心主義，與外國的交往不是首先著眼於合作，而是如何以友誼和各種方法使對方接受中國的準則。¹⁶

一如本論文將在第四章所分析的，陸、黎二人受羅沙比(Morris Rossabi)之影響，正確地認識到所謂的「朝貢體系」(Tribute System)只是中國古代對外關係的形式之一而已，中國也可以抱持實用主義與平等外交。同時如本論文將在第四章與第五章所分析的，中國戰略菁英在帝國時代就很強調其屬於其「華夏」想像範圍內的統一，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則轉變為強調在國際法上屬於「中國」的領土之統一。而中國在近代與當代遭逢外國侵略、欺凌的「羞辱」歷史記憶所產生的強烈的民族主義，更是當代中國戰略菁英世界觀的一項特徵。¹⁷而在藉由歷史分析、地緣政治分析，以及對中國內部政治與環境的研究之後，二人承認中國不是一個對現狀滿意的國家，但是中國的力量仍然不足以使其推翻現狀，故中國必須努力維持與周遭國家的合作，因此中國的崛起不是對國際安全的真正威脅，因為中國無法再回到過去帝國時代的孤立狀態，西方國家若要維持安全，就必須努力讓中國更融入於全球秩序中。對亞太安全真正的威脅不在於中國的絕對能力，而在於其相對力量以及大國之間的利益安排情況，一旦既有強國—美、日、俄、中—之間無法形成緊密的合作，亞太安全就會相當脆弱，而且時時受到武裝衝突的威脅。¹⁸

然而，陸柏彬與黎安友只是簡單地分析中國古代戰略環境遺留給當代中國的戰略遺產，但是他們並沒有詳細地檢視中國歷代在不同的戰略環境下所形成的戰略遺產是否都一脈相承地傳給當代中國，而是明顯地只集中在明朝之後的戰略遺產(書中強調的三國演義也是明朝中葉以後的著名小說)，這使他們的研究出現了戰略文化傳承上的問題，是否明朝之前的戰略文化對當代中國戰略行為的影響力較低？兩人的觀點似乎是如此，因為他們認為孫子兵法關於對外事務用兵效用的主張、長城與空城計都只在農業社會中才有其意義，¹⁹然而張鐵軍(Tiejun Zhan)

¹⁶ Andrew Nathan and Robert S. Ross, *The Great Wall and the Empty Fortress: 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1998), pp. 21-26.

¹⁷ *Ibid.*, pp. 21-34.

¹⁸ *Ibid.*, pp. 230-231, 236-237.

¹⁹ *Ibid.*, p. 26.

卻指出，春秋戰國時代的國家行為對於目前已經不是世界中心的中國而言更具有戰略上的啟示。²⁰而且儘管中國領導人的許多思想，可能根源於三國演義，而中國的許多戰略行為，或許也與長城、空城計的思維有密切相關，但陸柏彬與黎安友卻沒有在這一點提出令人信服的證據，亦即利用批判性地緣政治學的文獻回顧研究方法來檢視中國從毛澤東以來，領導人的思維是否確實與三國演義和長城戰略觀有直接的關連性。

另外，儘管這本書所做的分析屬於明顯的第一代戰略文化研究，但陸柏彬與黎安友卻不這樣認為，而且他們混淆了一般的社會文化與戰略文化之間的關係，使其做出文化不能解釋戰略上的偏愛，中國是否使用暴力與美國一樣，是依照機會與需要。²¹而由於兩人缺乏地緣政治研究之背景，雖然對中國戰略菁英思想的研究已經接近地緣政治密碼分析，但終究沒有觸及其核心，使其分析顯得相當雜亂，無法有效幫助解釋中國戰略菁英如何在其世界觀、地緣政治密碼與戰略文化的影響下，根據地緣政治環境來制訂戰略。也正是由於缺乏此種途徑，以及兩人實際上缺乏對中國歷史的深入研究，使其雖然指出朝貢體系只是中國古代對外關係的形式之一，中國也存在實用主義與平等外交的遺產，卻無法解釋「為何」會出現這種遺產以及在何種情況之下，這些遺產會影響中國的對外關係。

二、布里辛斯基：傳統歐洲中心地緣政治觀點的樂觀態度

布里辛斯基在「大棋盤」(The Grand Chessboard)一書中所運用的是很典型的新古典地緣政治學去分析國際安全問題，他幾乎沒有運用歷史研究或戰略文化途徑來分析中國崛起帶來的安全問題。布里辛斯基作為一個匈牙利裔的學者與政治人物，以及自冷戰以來對蘇聯的深入研究，如同第三章將提到的，布里辛斯基完全繼承了麥金德的心臟地帶觀點，因此他的地緣戰略研究主要重心在歐亞大陸而非亞太，主要目標是俄羅斯與歐盟而非中國、日本，使其對中國的態度相對於俄羅斯友善許多。

布里辛斯基認為俄羅斯在冷戰後即使不再完全佔有心臟地帶，但仍是美國最主要的潛在威脅，因為俄羅斯雖然比以前衰弱，但周邊的新獨立國家更弱小，而且俄羅斯還有重新整合前蘇聯領土與東歐衛星國家的地緣政治雄心。美國當務之急的地緣戰略是必須防止歐亞大陸出現一個單一國家或若干國家的組合，能有實力把美國趕出歐亞大陸，²²在他看來，俄羅斯是最有實力也最有決心達到這個目標的國家。因此美國必須一方面與德、法兩國的密切合作，將歐盟當作美國在歐亞大陸的「民主橋頭堡」；另一方面，與中國維持友好關係，防止中俄兩國再度結成冷戰初期的中蘇同盟關係，形成對歐亞大陸的宰制聯盟。具體來說，美國必須與中國和歐洲維持廣泛的戰略關係，迫使俄羅斯因為面臨龐大的地緣政治壓力

²⁰ Tiejun Zhan, "Chinese Strategic Culture: Traditional and Present Features,"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 21, No. 2(Apr-Jun 2002), pp. 80-81.

²¹ Nathan and Ross, *The Great Wall and the Empty Fortress: 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 *op. cit.*, p. 21.

²² *Ibid.*, p. 198.

而不得不放棄恢復前蘇聯聲威的帝國式野心，轉而參與歐洲整合並接受美國與歐洲的民主價值觀。因此美國要支持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簡稱北約，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的東擴與歐洲整合，也必須讓本來就與美國是天然盟友的中國更進一步融入世界體系，因為中國的區域力量對於穩定歐亞局勢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戰略資產，與歐洲不分軒輊。²³

布里辛斯基認為美國必須接納中國強大之後主宰東亞的事實，讓中國將掌握中南半島與臺灣周邊區域，使其勢力範圍包括俄羅斯遠東地區、印尼、菲律賓與中亞地區。布里辛斯基認為假使中國真的朝向擁有這種勢力範圍的戰略目標發展，必然會引起與俄羅斯的嚴重對抗。²⁴不過布里辛斯基正是在對中國的結構地位中出現矛盾，他另外又認為美國不可以放任中國擴張在亞太海洋地區的勢力範圍，因為中國也有潛力取代俄羅斯成為美國的最大威脅，顯然他注意到中國位於邊緣帶的地緣戰略地位，以及一旦其取得世界大國地位之後對美國國際地位的危險性。因此他主張美國應該在東亞保有強大的軍事與政治存在，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以美日同盟為基礎的聯盟體系，他主張美國唯有利用美日同盟來節制中國崛起，維持東亞的「三極結構」—美國有全球實力、中國在區域稱雄、日本則扮演國際領袖—才能安心接納中國成為區域霸權的事實。²⁵

然而，他完全沒有提出如何使中國按照美國設定的地緣政治方向發展的政策作法，而且他根本忽視中國地緣政治重心已經從歐亞大陸轉移到亞太海洋地區。更重要的是，布里辛斯基似乎認為海洋與陸地可作為兩大海權與陸權國家勢力範圍的天然邊界，但對地緣政治學而言，海洋與陸地從來就不是有效的天然邊界，假使允許中國將中南半島納為勢力範圍，即便美國仍能維持與日本、南韓與澳洲的同盟體系，則美國如何能維持其在東南亞的既有影響力。

三、金峻遠：中國的「新俾斯麥式戰略」

金峻遠在《接受挑戰：中國大戰略與國際安全》(*Rising to Challenge: China's Grand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中試圖解釋當前中國大戰略的本質、目的、手段以及對國際安全的影響。雖然他在分析中國所面對的國際環境與安全困境，以及軍事現代化和戰略能力的成長對其大戰略的目標與戰略調整的影響時完全沒有提到地緣政治的影響，只有在分析中國與主要亞太強權的關係時夾雜了部分地緣政治分析，²⁶但他最重要的貢獻之一或許是提出了當代(2005年之前)的中國大戰略與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執政下的德意志第二帝國大戰略的有趣比較，認為二者的大戰略都是以追求穩定國際環境、避免列強對新誕生的德國構成嚴重威脅為目的，而且雖然中國的民族主義強烈，但並不熱中於急切恢復中國在古代帝國時期的光榮。²⁷

²³ *Ibid.*, p. 207.

²⁴ *Ibid.*, pp. 166-169, 187-188.

²⁵ *Ibid.*, pp. 183-185, 192-193.

²⁶ Avery Goldstein, *Rising to Challenge: China's Grand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chapter 7.

²⁷ *Ibid.*, pp. 204-212.

然而，金峻遠在做這種比較分析前卻很矛盾地指出，俾斯麥的戰略是一個獨特個案，他將當代中國的大戰略歸納為「新俾斯麥式」並非表示中國戰略菁英有計畫地模仿俾斯麥的戰略手段。²⁸如此一來產生了嚴肅的問題—如果中國戰略菁英不是有意要模仿俾斯麥的手段，或者願意追隨俾斯麥的作法，那麼吾人可否在戰略菁英制訂戰略時所考量的基本戰略假定可能極不相同的情況下，只因外表類似而將當代中國與俾斯麥執政時的德意志帝國的戰略歸納為同一類？這是金峻遠的「新俾斯麥式戰略」最大的問題所在。金峻遠自己也理解當代中國的大戰略並不全然如同俾斯麥時代的德國那樣，純粹為了追求體系與週邊環境的穩定而完全採行防禦型與安撫型大戰略，在這種情況下做此種歸納相當危險。

此外，如同本論文將在第六章做的進一步批判，中國的大戰略與地緣戰略受其地緣政治密碼與戰略文化之影響，包含明顯的攻勢大戰略手段。而俾斯麥之所以採取那樣的大戰略，同樣也是受到其普魯士戰略文化與地緣政治密碼的影響的緣故。兩者有極大的不同—普魯士需要一個穩定的國際環境來「消化」建立「德國」後的德意志內部問題，而且普魯士佔有法國領土，必須防止法國的復仇；反之，中國雖然需要時間來「消化」快速發展的問題，但是他沒有俾斯麥擁有的普魯士—德意志兩難困局，而且中國在領土爭端中並非如俾斯麥的德國那樣居於守勢地位，反而需要攻勢地位來達成其領土聲索。金峻遠過於簡化二者的比較，忽略了這兩者之間無論是所處的歷史背景、地緣政治結構、體系秩序原則、世界觀、在體系中的既有地位等，都存在巨大的差異，僅從表面的相似性進行分析，甚易產生研究誤差。當代中國這種強調融入與追求穩定國際環境的戰略，與其說是接近俾斯麥的戰略，實際上還比較接近金峻遠自己也曾經提到的，由史旺(Michael D. Swaine)與泰利斯(Ashley J. Tellis)提出的「計算戰略」(calculative strategy)或「安全計算戰略」(calculative security strategy)，是一種精密計算戰略行動所需付出的成本與能得到的收益之間損益的戰略。

四、沈大偉

沈大偉與陸柏彬同樣屬於著名的守勢現實主義學者，他對中國崛起也是抱持著較樂觀的態度，不過他甚少從歷史、戰略文化與地緣政治途徑進行分析，與本論文較接近的是他在 2005 年收錄於**權力轉移：中國與亞洲的新動力學**(*Power Shift: China and Asia's New Dynamics*)這本書中的文章—「重返中央王國？21 世紀初期的中國與亞洲」(Return to the Middle Kingdom? China and Asia in the Early Twenty-First Century)，但即使這篇文章的標題接近歷史研究途徑，沈大偉卻通篇沒有運用歷史研究，勉強可以說得上是使用地緣政治分析，其分析方法是將中國視為位於亞洲中央的國家，並研究中國崛起之後不斷增強與周邊國家包括東協、印度、俄羅斯、日本、美國在經濟、制度等層面的交往(engagement)。由於沈大偉在該文中舉出相當多中國與周邊國家、國際組織的深入互動與經濟發展關係，

²⁸ Avery Goldstein, "An Emerging China's Emerging Grand Strategy: A Neo-Bismarckian Turn?" in G. John Ikenberry and Michael Mastanduno,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Asia-Pacific*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63.

從而樂觀地認為中國崛起對國際秩序是相當正面的。²⁹

然而一向對中國崛起感到樂觀的沈大偉，其在上文的正面樂觀態度卻因為中國在 2009 年以後的強硬對外行為、增強內部管控與明顯放緩政治改革腳步的諸多行動而遭到嚴重困擾。他在 2010 年 2 月 16 日的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中的一篇短文—「中國張牙舞爪的一年」(*The year China showed its claws*)中，顯露了他與許多西方的樂觀派中國研究學者對這些行動的困惑。³⁰沈大偉雖然承認這種現象的原因之一可能如悲觀論者之前一再強調的，是中國作為一個崛起強國所自然表現出來的現象，但他顯然不太願意接受這種觀點，反而更傾向於這是源於中國接近權力交替—2012 年的十八大—的時間點之前的一種短暫現象。然而，假使沈大偉認為內政導向觀點是影響中國戰略行為轉變的主要因素，那麼他的研究應該更注重此種途徑的運用，一如本論文所運用的地緣政治密碼觀點。如果從這個途徑進行分析，則正如本論文即將在第五章指出的，許多西方學者都忽略了中國戰略菁英有非常強烈的超強自我身份認同，這是中國兩千年歷史流傳下來的重要遺產，而且中國最高層的體系層級地緣政治密碼目標也指向全球體系的多極化。即使在中國古代，這兩種遺產與密碼的影響和指導就使得中國即使面臨不利的國際環境，但也始終伺機改變國際環境，並追求建立其所屬意甚至支配的國際秩序。因此中國的強硬態度是「正常」現象，沈大偉等樂觀派學者的「困惑」則是因對中國戰略菁英的地緣政治密碼與繼承的古代遺產不瞭解所致。

五、江憶恩：從文化現實主義到維持現狀的強國

江憶恩是目前最負盛名的戰略文化研究學者與西方對中國的戰略文化研究權威。不過其觀點曾經歷過悲觀至樂觀的轉變。江憶恩最初在 1995 年出版的文化現實主義：中國歷史上的戰略文化與大戰略(*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一書中是採取比較悲觀的觀點，蓋其認為中國戰略文化是具有偏好使用武力的備戰性質與信任武力在國際事務中效用的強現實政治特徵。不過隨著中國在 1990 年代後半期開始擴大參與國際組織、推行多邊外交與信心建立措施，同時提出新安全觀等戰略思維後，江憶恩在 1999 年之後改變了他個看法，認為中國上述的行為使其越來越融入國際體系中，其崛起對國際體系不是一個真正的威脅。³¹江憶恩更在 2003 年的「中國是否為現狀國家？」(*Is China a Status Quo State?*)一文中，藉由定義何謂「修正主義國家」來解釋中國不是一個對現狀不滿、會尋求改變現狀的國家。³²

²⁹ David Shambaugh, "Return to the Middle Kingdom? China and Asia in the Early Twenty-First Century," in David Shambaugh eds., *Power Shift: China and Asia's New Dynamics*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pp. 23-47.

³⁰ David Shambaugh, "The year China showed its claws," *Financial Times*, February 16, 2010, <http://www.ft.com/intl/cms/s/0/7503a600-1b30-11df-953f-00144feab49a.html#axzz1xN4f6SPI>.

³¹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Paul Evans, "China's Engagement with Multilateral Security Institutions," 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 Ross eds., *En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 (London: Routledge, 1999), pp. 235-272.

³² Alastair Iain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Stat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4 (Spring 2003), pp. 5-56.

江憶恩提出對中國大戰略行為與類型的新分析方法，³³對戰略(文化)與國際關係研究無疑是相當大的貢獻，而他提出國家參與國際建制的比率來評估一個國家融入體系的程度，以及是否為一個修正主義國家，也是一項貢獻，畢竟國家參與的建制越多，與其他國家和體系整體的互動程度也就越高，越能透過建制來溝通意見與使用武力以外的方式解決國際爭端。不過江憶恩的研究也存在許多問題。首先，如果江憶恩的態度改變顯示他認為戰略文化是會改變的，那他應該對其戰略文化研究進行修正，因為他原本的戰略文化研究並沒有觸及戰略文化的形成與變遷這兩項議題。而正是因為他摒棄了較注重理念物質基礎的第一代戰略文化研究，故其戰略文化研究完全沒有提到地緣政治因素等理念的下層物質變數對中國戰略文化與大戰略的影響，這對想要解釋戰略文化會進行改變的研究來說是一個極其嚴重的致命傷。

其次，江憶恩沒有對中國戰略菁英的思想進行精密分析。這是一個相當不可思議的現象，因為江憶恩的戰略文化研究，有相當一部份是建立在戰略思想研究上。外在行為是內在思想的具體轉化，江憶恩如果真的認為中國戰略文化由帝國時代的備戰本質與強現實政治特徵，轉化為較柔性的戰略文化，那他應該具體提出當代中國戰略菁英在這方面的思想轉化。最後，如果中國戰略文化真的發生變化，那麼這一定會表現在中國戰略菁英的地緣政治密碼上，因為密碼與外交政策直接相關，可是江憶恩並沒有在這方面進行分析。而且極為矛盾的是，江憶恩在 1995 年的研究並不是真正針對明朝的大戰略，反而集中於明朝和北方異族進行戰爭時的作戰指導，這實際上只是軍事戰略文化而非真正的戰略文化。但江憶恩在 1999 年以後的研究就比較偏重中國整體的大戰略，儘管他還是偏重於中國與國際組織間的互動，這其實較屬於外交戰略的範圍而不是真正的大戰略。這就使其難以解釋何以中國加速與擴大融入國際體系，卻在 2008 年以後展現日益獨斷的對外行動。

六、康燦雄：東亞階級化國際秩序的恢復

康燦雄的研究著重於探討 14 世紀以來，中國在東亞建立的朝貢體系對東亞階級化國際秩序的穩定與維護作用，此外他也觸及當代中國戰略菁英的認同問題，以及主權問題在中國大戰略中的地位。總體來說，康燦雄對中國崛起抱持相當正面的態度，由於他比較強調理念與歷史研究，因此他在 2003 年批評部分西方學者認為中國崛起會導致亞洲經歷類似冷戰時的軍備競賽與權力政治的觀點太過「物質化」，而且亞洲國家也未如現實主義所主張的那樣，與美國一起實施權力平衡對抗崛起的中國，反而似乎走向扈從。³⁴他另外指出，中國雖然有強烈的民族主義，但這種民族主義並非固定不動並執著於消除中國的「百年恥辱」，文化大革命之後的中國與中國領導人更加強調維持與東亞鄰居的穩定關係，並進一步融入於西發利亞體系的規範之中，儘管他們最接受的規範是西發利亞體系中

³³ Goldstein, *Rising to Challenge, op. cit.*, p. 18.

³⁴ David C. Kang, "Getting Asia Wrong: The Need for New Analytical Framework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4(Spring 2003), p. 58.

的主權概念，但主權觀並未影響中國與東亞國家的關係，雖然中國戰略菁英的「大國心態」在冷戰後日益明顯，但他們中國傳統的天下觀被打破，也瞭解不可能重建朝貢體系，故重點在於「分享全球責任」與增加和西方的互動。³⁵換言之，中國強烈的民族主義不是對國際秩序的威脅。

在 2003 年的基礎上，康燦雄進一步發展對朝貢體系以及朝貢體系下的東亞國際秩序的研究，在 2010 年指出中國在明、清兩代的朝貢體系中，於東亞建立起一個以文化為核心的國際體系，這個體系是以中國為中心的單極體系，秩序則是階級化，中國以外的其他行為者包含受朝鮮、越南與日本等三個受中國儒家文化深刻影響的「中國化」(sinicized)國家，以及「中國化」並不深刻的游牧民族與其他中南半島國家，兩者對比之下，中國與「中國化」深刻的行為者之間由於具有共通的文化聯繫與密切的經濟往來，遂能維持長期且穩定的和平關係；反之，中國與游牧民族之間的關係則否。³⁶不過他對於目前的東亞，雖然中國逐漸崛起，但能否回到朝貢體系那樣穩定的階級化單極體系秩序還是持保留的態度，畢竟歷史不可能毫無保留地重演，因此他認為目前的中國雖然具有強大的經濟力量，但還需要很長一段時間來發展其文化與軟權力的領導力量，才能消弭其他東亞國家特別是日本的戒心，並成為主導區域乃至全球秩序的主要強國。³⁷

康燦雄是少數從文化與歷史觀點分析中國崛起與國際安全議題的西方國際關係學者，其觀點與分析也的確帶給吾人許多新的啟發，特別是文化對國際關係與國際秩序的影響。然而，康燦雄的歷史與文化研究有相當明顯的缺憾，首先是他只分析了明、清兩代的朝貢體系，但朝貢體系並非起於明朝，其起源可追溯至西周，並經歷漢、唐等帝國而有許多發展。雖然康燦雄指出他選擇這段期間的原因在於這是朝貢體系最成熟的階段，但吾人必須指出，當我們研究中國的「文化」、「認同」與「理念」對國際關係的影響時，很難如此分段研究並忽略先前的經驗累積，否則將出現失真的現象。如上文對阿查亞的回顧時所指出的，康燦雄基本上忽略了中國歷史上許多大規模對外用兵記錄，即使對於這些「中國化」的國家也不例外，而這當中很多肇因於地緣政治衝突以及中國欲強迫周邊國家接納缺乏平等外交關係的朝貢體系。顯然朝貢體系所建立起來的中國中心階級化國際體系秩序不是如他想像的這麼美好與穩定。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康燦雄沒有深入中文古典文獻分析支撐中國戰略菁英去建構與運作朝貢體系被後真正的基礎：世界觀、地緣政治密碼與戰略文化，³⁸而且又忽略了地緣政治分析途徑，才會使其研究出現過於誇大的分析，並飽受其他學者的批評。

此外，康燦雄認為東亞國家沒有對中國實施權力平衡，反而採取扈從，可是

³⁵ David C. Kang, *China Rising: Peace, Power, and Order in East As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81-83.

³⁶ David C. Kang, *East Asia Before the West: Five Centuries of Trade and Tribu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8-11.

³⁷ *Ibid.*, pp. 167-171.

³⁸ 事實上，康燦雄也沒有深入研究日本與越南的天下觀、地緣政治密碼與戰略文化，這對其研究來說是一個致命上，假使 A 國決定對 B 國採取某種長期政策行動，其間的決定因素不可能只是雙邊關係的考量，必然還包括 A 國與 B 國對遭遇其他 C、D、E 國的相對關係等全面戰略考量。

他卻沒有深入定義這些國家的扈從行為。事實上，如同本論文將在第三章以後引用施維勒的扈從觀點所繼續討論的，小國對大國扈從的目的可能是為了安全，也可能是為了從中一起獲得利益。在 2010 年之前，東亞的中小型國家或許願意扈從於中國以取得經貿上的利益，但在這之後可能反過來為了從中國身上取得他們與中國相衝突的政治、領土與安全利益，反而與扈從於美國。這個觀點是康燦雄沒有考慮到的，對其研究而言，殊為可惜。

第三節、折衷的觀點

折衷的觀點係指學者對中國崛起採取較為持平與謹慎的態度，既不認為是對國際體系嚴重的威脅，亦非表示贊同中國越來越融入國際體系將使體系越來越和平，而認為必須視個案的情況、時間點的不同與中國國內政治環境的變化等多重變數的影響而定。這方面的代表首推史旺與泰利斯，但陸柏彬也可算入，蓋其觀點雖然在 1999 年之前展現出相當樂觀的態度，在 2009 年以後卻因為中國大力朝向海上擴張而變得謹慎許多。

一、史旺與泰利斯：中國歷史、戰略文化與地緣政治環境的分析

史旺與泰利斯在*解釋中國的大戰略：過去、現在與未來(Interpreting China's Grand Strateg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一書中運用了與本論文極為類似的研究途徑：歷史與地緣政治分析，因此與本論文的相似性不低。

史旺與泰利斯正確地指出，由於北亞的牧地區缺乏如同南方與東方那樣明顯的大型天障礙物，隔絕中國的核心地區與來自游牧帝國的威脅，使中原帝國致力於對中國核心地區周邊的戰略邊緣區(Strategic Periphery)實施直接或象徵性的控制，以防來自北方的攻擊與保衛核心區與戰略邊緣區的貿易路線。然而，地理環境又限制了漢族農業文明的擴張，使得中國古代帝國的真正戰略重心實際上位於中國本土而非邊緣地區。³⁹

而結束對古代的分析之後，兩人在將古代遺產連結至當代時，指出傳統的中國戰略邊緣區形成許多強弱不一，但不受中國控制，甚至與中國之外的國家結盟的獨立國家，中國從 19 世紀末以來的衰退，使得雖然其民族主義仍希望控制這些戰略邊緣地區，但迫於實力的差距，中國逐漸形成一種混和強大國家對周邊戰略區域控制欲望，和弱國以領土防禦導向戰略與外交為主的「弱—強」國家安全戰略途徑(“weak-strong” state security strategy approach)，以及強調市場領導、外銷導向的經濟成長、與所有國家維持友好關係，克制使用武力但追求軍事現代化，和盡可能在國際上取得不對稱利得的「安全計算戰略」。⁴⁰另外，史旺與泰利斯對中國能力的估算，提出了中國將在 2015-2020 年間獲得足夠的能力來挑戰美國的區域與全球地位，並採取更獨斷的對外政策，在這段時間之前，中國會因

³⁹ Michael D. Swaine and Ashley J. Tellis, *Interpreting China's Grand Strateg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Santa Monica, California: Rand, 2000), pp. 22-33.

⁴⁰ *Ibid.*, pp. 78-79.

為缺乏足夠的能力而無法採取較強硬的態度並挑戰美國。⁴¹若按照本論文寫作時間的「後見之明」，兩人在這方面的估計可算是有相當的準確性。

安全計算戰略可謂是史旺與泰利斯經由對中國歷史的研究與地緣政治分析歸納出來的結果，同時與王元綱不同，兩人注意到中國菁英團體的不同態度，以及在內部政治鬥爭的結果對安全戰略的影響。⁴²此種研究不僅屬於地緣政治密碼途徑，也屬於戰略文化研究的範疇，蓋不同的菁英團體可能擁有不同的戰略次文化。史旺與泰利斯雖然沒有將這些研究冠上地緣政治密碼與戰略文化，但是兩人的研究已經很類似本論文運用的研究途徑。然而，史旺與泰利斯並沒有解釋如果中國古代戰略經驗對當代中國確實有其影響，那麼此種影響還會具體呈現在哪些方面。很重要的一個關鍵是，如果這種戰略乃是基於地緣政治結構的影響，那麼基於地緣政治結構的穩定性，中國在帝國時代較為衰弱或面臨強大威脅的時期，是否也會發展出這樣的戰略形式，並作為中國的戰略遺產。然而，史旺與泰利斯並的分析沒有觸及這個面向。此外，兩人也沒有詳細指出中國未來的發展方向將指向亞太的海洋地區，還是如古代一樣留在東亞大陸之上。這些都是兩人研究的不足之處，可留待為本論文進一步發展之處。

二、陸柏彬：由「和平地理」朝「海軍民族主義」轉變

陸柏彬稍後在 1999 年的文章中也展現了其在 1997 年的樂觀態度。由於陸柏彬的基本研究邏輯屬於守勢現實主義(Defensive Realism)，因此他對中國地緣戰略的研究重點在於中國地緣戰略是否會在亞太地區引發美中之間的武裝衝突。其研究方法因此也分為兩個方向：以守勢現實主義邏輯分析國際體系結構對中國地緣戰略發展的制約；以古典地緣政治學與海軍戰略理論，特別是馬漢的海權與海軍戰略理論，分析中國與東亞地理環境對中國地緣戰略發展方向的影響。陸柏彬很有技巧地同時運用這兩個途徑來研究當代中國的地緣戰略，然而他在這方面的主要著作：「和平的地理：21 世紀的東亞」(The Geography of Peace: East Asi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與「中國的海軍民族主義：根源、前景與美國的回應」(China's Naval Nationalism: Sources, Prospects, and the U.S. Response) 等兩篇文章卻相隔達十年以上，顯示陸柏彬的觀點在這十年中有不少修正。

在 1999 年的「和平的地理」一文中，陸柏彬認為美中在東亞除了朝鮮半島與臺灣海峽兩個地區之外，不會爆發以威脅彼此的安全甚至生存為主要目標的武裝衝突。從結構上來說，東亞基本上是以美國和中國為首的兩極體系，而依照新現實主義邏輯，兩極體系遠比多極體系穩定。⁴³此外，東亞的地理環境也進一步強化兩極體系，使其不易變為多極或單極體系。首先，無論同樣位於東亞的俄羅斯與日本過去如何強大，以及目前擁有多大的潛力與實力，在當今的東亞區域國際體系中受限於地理環境，只能扮演二等強權的角色而無法改變東亞的兩極結

⁴¹ *Ibid.*, p. 98.

⁴² *Ibid.*, pp. 79-95.

⁴³ Robert S. Ross, "The Geography of Peace: East Asi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4(Spring 1999), p. 99.

構：俄國的弱點在於一方面，遠東聯邦管區(Far Eastern Federal District)與歐洲部分隔著廣袤而蠻荒的西伯利亞，只依賴脆弱的鐵路與空中交通線維持聯繫，結果使俄國始終無法在東北亞維持足夠的人力、經濟與軍事力量，在冷戰後反而還必須擔憂中國的強勁經濟發展阻礙俄羅斯整合遠東與歐俄，二方面則是俄國的注意力與資源都投注在對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的整合以及防止美國在東歐的勢力擴張，根本沒有餘力注意東亞的局勢；而日本則受限於狹隘與靠近東亞大陸、易受空中攻擊毀滅的島國地形，而且它的經濟一方面依賴美國的進口市場，二方面也依賴從在美國保護下的海上交通線運送能源。⁴⁴

其次，陸柏彬認為中國是一個陸權大國的本質很難改變，因為兩千年來，中國歷史總是尋求在亞洲大陸而不是亞洲的海洋地區發展，中國最主要的利益是在歐亞大陸而不是海洋，這種態勢並沒有隨著中國在冷戰之後經濟日趨開放而有所改變，從地理上來說，同時與俄羅斯和中亞國家接壤的新疆是中國國防最脆弱的地方，中國仍然擔心俄羅斯重新發展為一個強大的國家，並控制中亞國家來威脅中國的領土完整，再加上中國擁有多達 14 個陸地鄰國，其中還包含像印度、越南、北韓這類區域強國，這會使得中國傾力維持陸地邊界現況，導致其無法向海洋地區全力發展。此外，亞太迥異於歐洲的海洋地理環境：島鏈阻隔了大陸地區與太平洋和印度洋的直接進出，不僅形成了大陸地區為中國勢力範圍、海洋地區為美國勢力範圍的天然形勢，而且亦使美國不必擔憂中國即便控制大陸地區，也會向德國與蘇聯控制歐洲之後發展成無可匹敵的強大海權，因為中國不可能希望獲得強於美國的海軍力量，即使中國能在 2025 年建造出一支強大的艦隊並帶給美軍在東亞海域更大的威脅，也不能說中國威脅到美國在東亞海域的支配地位，因為中國為了害怕其艦隊被毀滅，根本不敢率先攻擊美軍。換言之，中國的強大海軍將如同俄羅斯、德國、蘇聯在 19、20 世紀發展海軍之下的結果，只是一支沒有辦法用於爭奪制海權的「奢侈艦隊」(Luxury Fleet)。⁴⁵海水不僅阻止中國向海洋地區發展，也阻止美國向亞洲大陸擴張勢力，這會導致中國的激烈反抗，而美國並沒有在陸地上能壓倒中國的把握，因此東亞的美中兩極體系不容易變為單極單極，能夠保持長期的和平。⁴⁶

然而在 2009 年的「中國的海軍民族主義」中，陸柏彬注意到中國在胡錦濤上任之後許多大力發展遠洋海軍艦隊與反進入戰略(Anti-Access Strategy)的現象，以及中國國內瀰漫著發展強大海軍與海權的民族主義氣氛，他因此修正了

⁴⁴ *Ibid.*, pp. 86-92.

⁴⁵ 奢侈艦隊的概念是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在 1913 年評論德意志帝國的海軍擴張時首先提出，他認為強大的海軍艦隊對於英國這樣的海洋貿易國家來說是維持生存所需的必需品，但對於德意志帝國這樣一個即使被切斷海上貿易也不會因此而滅亡的國家來說則是奢侈品。而當德意志帝國海軍(Kaiserliche Marine)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因為對德國的戰是幾乎毫無幫助，最後甚至被迫整個艦隊自沈以免淪為戰勝國的戰利品後，赫維格與格雷將邱吉爾的概念擴張為德國、蘇聯等強大的陸權耗費鉅資建造出來，但卻對其達成國家戰略目標沒有什麼重要幫助的艦隊，都可稱為「奢侈艦隊」。請參考 Colin S. Gray, *The Geopolitics of Super Power* (Lexington, Kentucky: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88), p. 49; Holger H. Herwig, *Luxury Fleet: The Imperial German Navy* (Amherst, N.Y.: Humanity Books, 1987).

⁴⁶ Ross, "The Geography of Peace," *op. cit.*, pp. 96-111.

1999 年的樂觀態度，儘管他還是相信中國以航空母艦為核心的遠洋海軍建設與戰略發展仍然受所有陸權國家發展海權經驗中的限制，⁴⁷因而只對美國的海洋安全構成最小程度的威脅，還是可以藉由雙方的信心建立措施(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調整美軍的部署以及增加與盟國的合作來控制，並不需要美國改變其海軍戰略與增加支出，以類似雷根(Ronald Reagan)政府大肆擴張海軍應付蘇聯的方式應對中國的海軍民族主義，使美中的海軍競爭不致走向德國與日本的海軍擴張結果，而是走向類似 18 世紀中葉英法海軍短暫軍備競賽但仍維持高度政治與經濟合作的結果。⁴⁸但他也承認，儘管中國的遠洋海軍戰略與艦隊發展仍存在許多限制與障礙，特別是陸柏彬認為陸權國家發展遠洋海軍違背了他所說的「最理想海權戰略」(optimal maritime strategies) 他在此再度引用馬漢的理論分析歷史上法國、德意志帝國(*Deutsche Reich*)與蘇聯海軍戰略採用海上游擊戰(*guerre de course*)與反進入戰略的優劣得失⁴⁹但對美中關係的確是一大挑戰，這會使美國思考必須如何適當的回應，才不會演變成嚴重的軍備競賽與激化雙方的競爭，而無論如何，中國的遠洋海軍必然會使美國決策圈以更政治化的角度檢討其中國政策，⁵⁰對於美中關係的發展與亞太區域穩定顯然不是一件好事。

陸柏彬的研究有如此大的轉變實乃其只注意到古典地緣政治學的海陸兩極結構表面，卻沒有注意到地緣政治學從來都不認為地理本身即可決定國家的命運與戰略行為。因此中國的地緣戰略行為與方向不是專靠分析中國在歐亞大陸與海洋地區的利益即可判斷；陸柏彬在 1999 年也完全沒有預料到中國會開始增強對南海與印度洋地區的重視，反而在陸柏彬認為最需要注意的西北邊界與俄羅斯一起創立上海合作組織，這些事件的發展加上 2008 年的金融海嘯，使得陸柏彬在 1999 年的分析出現極大的誤差，然而中國從 1993 年起就是石油淨進口國，這必然會使其地緣戰略方向出現重要的改變，但陸柏彬卻反而認為中國在海洋地區沒有什麼明顯的重大利益。而 2009 年的文章則顯示，陸柏彬注意到對中國戰略菁英的思想分析，這是他先前幾乎沒有注意到的，顯示對於一個國家的戰略分析，光是從物質層面著手是不夠的，還必須研究戰略制訂者的思想，儘管對於中國戰略研究而言，這個層面還是相當困難，但至少可以更增加分析的完整性，這也是本論文認為結合批判性地緣政治學的地緣政治密碼分析與戰略文化研究的緣故，陸柏彬在 2009 年對中國海軍民族主義的分析，實際上就是一種地緣政治密碼的解構，而他自己也曾經在 1997 年出版過對中國傳統與當代戰略文化的歷史分析，但在 1999 年的文章中卻沒有更完善的利用，導致其分析在後來與事實的發展出現極大的誤差，必須做出重大的修正。

不過雖然陸柏彬在 2009 年的文章注意到中國海軍戰略的轉變，並將之與以往歐陸大國、日本帝國的海軍戰略做一比較，相當具有啟發性。但由於陸柏彬缺

⁴⁷ Robert S. Ross, "China's Naval Nationalism: Sources, Prospects, and the U.S. Respons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4, No. 2(Autumn 2009), p. 46.

⁴⁸ *Ibid.*, pp. 77-81.

⁴⁹ *Ibid.*, pp. 49-54.

⁵⁰ *Ibid.*, p. 46.

乏海軍戰略研究的理論基礎，使其文章的分析雖然有啟發性，卻缺乏系統性與正確性，蓋其只依據這些國家的海軍擴張便斷定它們都具有相同的「海軍民族主義」(naval nationalism)與所謂「次佳」(suboptimal)海上戰略，⁵¹而不是從海軍戰略理論的角度，特別是以海軍戰略理論的核心—制海權進行分析，更沒有詳細比較這些國家的地理環境、國內政治變數等地緣政治外部結構與內部地緣政治密碼進行分析，使其與 1999 年一樣同樣犯了只從外表便做歸納的毛病。更重要的是，假使只憑外表便可歸納，則陸柏彬在該文中又沒有將美國歸入這些新興海軍大國之列，也是其文章在這方面觀點的可議之處，畢竟美國在 19、20 世紀之交也曾與他所舉的俄羅斯、德意志帝國、日本帝國等新興海軍國家一樣建立龐大的海軍並朝海外發展，甚至可說比這些國家更為成功。

第四節 中國學者對中國崛起的歷史與地緣政治分析

雖然中國學者對中國崛起的分析不太可能出現類似上述西方學者的不同觀點，而且幾乎所有中國學者的地緣戰略分析都是朝向提出「政策建議」的方向，非「研究」現行中國地緣戰略本質與走向，或其目的與手段。此外，這些著作幾乎都無一例外地遵行中國政府的外交政策主軸—在 2001 年以前出版的著作中都可以明顯發現江澤民主張的新安全觀與多極化概念，但在胡錦濤取代江澤民之後，新安全觀與多極化的使用開始被和平崛起、和平發展與和諧世界所取代。由於本論文為中國研究的一種，故詳細瞭解中國戰略菁英的想法極為重要。本節的重點在於瞭解中國戰略菁英對中國地緣戰略的研究現況、成就與其缺憾。

一、對中國地緣戰略的一般性分析

一般中國學者對中國地緣戰略的分析，都是從中國本身的地緣政治特徵與對中國古代戰略的歷史分析進行，由王生榮主編的**金黃與蔚藍的支點：中國地緣戰略論**，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該書提出創建中國地緣戰略理論體系的構想，認為主要應以馬克思主義「人地關係論」為指導，⁵²因此全書的分析均從唯物主義觀點出發，即使是歷史分析也不是在戰略文化層面，而是特定時代中，各朝代的地緣戰略。並且為了從研究中國歷史中得到使冷戰後國際體系多極化的歷史經驗與政治需要，該書對中國古代的歷史分析特別重視多極化的春秋、戰國與三國等分裂時代，明顯忽略大一統的帝國時代以及同為大分裂時代，但實際上漢族政權受到相當壓迫與衰弱的南北朝和五代十國。

金黃與蔚藍的支點在分析當代中國的地緣政治地位與角色時具有相當明顯的層次性。其認為中國在全球層面是維護和平與發展的重要力量和大國，在歐亞大陸則是促進地區繁榮與穩定的主要國家，至於在周邊地區層面則是連結周邊的

⁵¹ *Ibid.*, pp. 50-52.

⁵² 王生榮主編，**金黃與蔚藍的支點：中國地緣戰略論**(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 23。

紐帶，⁵³因此中國的地緣戰略選擇也呼應此種分析而相當具有層次性，認為首先以環中國海為一體化的國家海洋戰略，其次則是堅持睦鄰友好為中心的周邊戰略，最後則是以維護世界和平與反對霸權主義的國際戰略。⁵⁴此種層次分析明顯是批判性地緣政治學的地緣政治密碼層次概念，不過遺憾的是，該書卻完全沒有提及這樣的概念，儘管地緣政治密碼的概念遠早於其出版時間(2001年)。沈偉烈與陸俊元共同主編的**中國國家安全地理**，其研究方法與途徑雖然屬於比較傳統的研究，比起**金黃與蔚藍的支點**更為注重中國歷代地緣戰略思想的研究，以及將中國本身的地理分析與中國國家安全的傳統與非傳統概念結合在一起。⁵⁵

丁力在**地緣大戰略：中國的地緣政治環境及其戰略選擇**一書中也和王生榮有同樣的問題，也是首先透過對地緣政治學理論的回顧，其次則分析中國古代的歷史與戰略現象，從中找出通則，繼之再分析當代中國本身的地理環境，最後以對中國周邊國家與地區，例如歐亞大陸、日本、東南亞、南亞等地區的地緣政治和大國權力平衡情況，及這些地區或國家與中國的關係作為結尾。

雖然丁力對中國古代歷史遺產的分析相當程度上跳脫了以往中國學者過份強調儒家思想支配性的特徵，很少見地較為客觀分析中國古代的政治與戰略現象，⁵⁶但他完全沒有歸納出這是否代表著一種戰略文化與戰略文化的傳承。此外，丁力並沒有真正分析當代中國的地緣戰略行為，儘管他自己也承認中國內部沒有官方的國家戰略或地緣戰略的資料，學界也很少發表有關大戰略的研究成果，但還是表示「中國正在『摸著石頭過河』。軍事問題或許有保密的必要，不能讓外人知道，尤其在實力和自信心不足的時候」，⁵⁷其書中比較多出現的是「中國應該」如何，而不是「中國現在的行為代表什麼樣的戰略意涵」。最後，丁力最大的問題在於並沒有以一個明顯的理論架構來分析國際地緣政治環境的結構與這個結構可能對中國地緣戰略發生什麼樣的影響，還是只以零散的區域分析方式來研究各地區對中國的戰略重要性。

二、海陸性質與中國地緣戰略

由於中國一方面身為世界上領土最大的國家之一，領土又深入中亞，故擁有悠久的陸權發展史，大部分的戰略文化與發展經驗都是從古代應付歐亞大陸游牧帝國而來，只有在1840年後才明顯地面臨由海上而來的嚴重威脅。另一方面，雖然中國瀕臨三個寬闊的太平洋緣海(marginal sea)，而且古代帝國很早就擴張到黃海、東海與南海的海岸線，但中國歷史卻明顯缺乏海權思想，以及海洋、海軍戰略，不像西班牙、俄羅斯、法國、義大利等國家，雖然身為陸權，歷史上卻也

⁵³ 同上註，頁284-286。

⁵⁴ 同上註，第20章。

⁵⁵ 沈偉烈、陸俊元主編，**中國國家安全地理**(北京：時事出版社，2001年)。

⁵⁶ 同上註，第三章。

⁵⁷ 丁力，**地緣大戰略：中國的地緣政治環境及其戰略選擇**(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頁35。

出現過不少重要的海洋戰略思想家。⁵⁸這使得當近代中國接觸到西方海權思想，瞭解到海權對濱海國家安全的重要性時，在地緣戰略選擇上就出現了強調海權重要性的主張，但由於中國本身的陸權屬性，同時還有堅持陸權發展的主張，以及兼採兩者主張的「海陸並重」主張。

(一)、海權論

在眾多主張海權為中國未來主要發展主要戰略選擇的主張中，馬漢經常是主要的思想基礎，但是也包含了中國在 1840 年之後飽經列強從海上侵略的歷史經驗，特別是中國好不容易建立起的北洋艦隊，雖然曾身為當時亞洲國家最強大的艦隊，卻在 1894 年被中國向來所輕視的日本徹底毀滅，而日本此後逐漸躍居世界強國之林，中國卻一蹶不振，甚至反過來遭到日本的長期侵略的歷史記憶。因此在中國的海權論主張中，發展強大海軍的優先性，始終居於其他海權組成要素之首，並且認為海軍的重要性與近代歷史上的大國崛起有絕對的關連，也是中國解決海洋領土問題以及統一臺灣不可或缺的工具。

鞠海龍的**中國海權戰略**與張世平的**中國海權**都表現出這樣的思想，因此他們都強調中國對海洋的控制能力。鞠氏的分析集中於海洋戰略的海事(maritime)與海軍戰略兩層面，他引用馬漢、高西科夫、印度戰略學者潘尼迦等人的海軍戰略思想與海權理論來分析中國從清朝中葉之後海權衰落的原因，認為是因為沒有對海軍戰略的性質有正確的認識，誤解了海軍的防禦戰略就等於本土防禦，實際上海軍的特性使其可以以攻勢戰略獲致制海權來達成防禦目的，因此國家必須擁有能控制對本國生存有密切關係的海域的能力，才能確保生存發展，⁵⁹強大的海軍艦隊與攻勢戰略則是實現控制的主要手段。對中國來說，具備此種戰略重要性的海域就是南海，因為南海的領土爭端、臺灣問題、美國重返東南亞、日本與印度的戰略合作，以及海上能源運輸問題等對中國來說具有龐大地緣政治壓力的戰略議題，其核心都在南海，他認為中國如果能透過非傳統安全機制(主要是經濟)來與南海周邊國家建立超越地緣政治的戰略合作，那麼中國就可以壓倒越南，逐漸獲得對南海的控制權，不但增強對臺灣問題的控制能力，對海權競爭對手日本的戰略威懾能力也相應增強，而以此為基礎，進一步啟動東北亞地區海權地緣戰略並通過解決臺灣問題後啟動遠洋安全戰略的時機也將成熟。⁶⁰而海軍軍人出身的張世平比鞠海龍的構想含有更強烈的攻勢戰略思想，**中國海權**不斷透過宣稱中國海疆遭受其他國家入侵的危機，以及海權對濱海國家發展的重要性，來強調中國必須擁有強大的海權，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中國必須建立起一支配備航艦戰鬥群的強大海軍，才能確實達到維護海洋主權和權益，並使海上武力的觸角達到國家利益拓展的所有範圍。⁶¹他甚至還主張中國人應當具有積極主動拓展生存空間

⁵⁸ Geoffrey Till, *Sea Power: A Guid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 48, Table3.1.

⁵⁹ 鞠海龍，**中國海權戰略**(北京：時事出版社，2010年)，頁 11-30。

⁶⁰ 同上註，頁 269-276。

⁶¹ 張世平，**中國海權**(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09年)，頁 268-301。

的觀念，利用海洋創造中國未來持續發展的生存空間。⁶²

張文木則比較從地緣政治角度分析海權對中國的急迫性。在**世界地緣政治中的中國國家安全利益分析**中，張氏正確地指出即使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國家經濟發展也脫離不了對天然資源與能源的利用與依賴等問題，這是政治及其戰略實施的過程而非簡單的經濟問題，⁶³而目前的全球地緣政治重心則集中在印度洋與阿富汗。中國對海洋運輸資源和能源的依賴既然日益加重，顯然就必須注重發展中國本身的制海權能力，否則海上貿易保護只是空話，而隨著中國日益融入全球化，中國國家利益所在即中國國家安全邊界所在，張氏更進一步指出在經濟史中，獲得了制海權也就相當程度獲得了歷史主動權，而統一台灣則是中國參予世界事務的第一張資格認證書。⁶⁴不過在強調制海權對中國重要性的同時，他也警告，制海權的發展程度必須與國家的力量成正比，過度發展只會傷害國家利益。⁶⁵在2010年出版的**論中國海權**第二版中，除了重複印度洋的地緣戰略重要性以及統一台灣對中國制海權發展的急迫性之外，比較特別的是張文木詳細分析了中國海權中的「海洋權力」(sea power)與「海洋權利」(sea right)兩個概念，⁶⁶認為前者在使用權力控制海洋，後者則是國家合法的海上利益，而中國海權的特徵就在於中國根本還沒有能力發展海洋權力，還處於為海洋權利奮鬥的階段，⁶⁷並主張中國的海權擴展不能超過保衛海洋權利的範圍，⁶⁸亦即認為中國的制海權不能也不會為中國的海洋權力服務。

徐起在「21世紀出海上地緣戰略與中國海軍的發展」一文中則針對當代中國周邊地緣政治局勢，對中國海軍戰略的發展進行比較政策性的分析。徐氏雖與張世平一樣為海軍軍官，其刊載在中國軍方權威性刊物**中國軍事科學**的這篇文章卻沒有像張氏的文章那樣充滿濃厚的攻勢海軍戰略主張。相反的，徐起比較冷靜地認為海軍在進行海上防衛時，雖然不能僅限於近海防禦，必須不斷走向藍水海軍，但他卻採取了與前蘇聯海軍極為類似的近海區域防禦戰略，而不是一般藍水海軍概念中的遠洋攻勢戰略，他不提倡張文木提出的「國家的利益到哪，安全邊界就到哪」的主張，認為近海區域防禦的戰略防禦範圍雖然應視國家利益的範圍而逐步擴大，而且在南海方面還應往南擴張到距大陸1600多海里，但整體而言並不應超越第一島鏈，不過長遠來說，從近海防禦擴大到遠海區域防禦是必要的，因為海上威脅的來源畢竟在於遠海。⁶⁹此外，徐起與鞠海龍一樣，並不認為中國海上地緣戰略對重要海洋的控制一定需要海軍的進駐，中國與中南半島國家

⁶² 同上註，頁165。

⁶³ 張文木，**世界地緣政治中的中國國家安全利益分析**(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71。

⁶⁴ 同上註，頁293-309。

⁶⁵ 同上註，頁265-269。

⁶⁶ 類似的分析還可參考劉新華，「試論中國發展海權的戰略」，**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上海市)，2001年第6期，頁68；宋增華，「海權的發展趨勢及中國海權發展戰略構想—兼論海上行政執法力量興起對中國海權發展的影響」，**中國軟科學**(北京市)，2009年第7期，頁188。

⁶⁷ 張文木，**論中國海權**(北京：海洋出版社，第二版，2010年)，頁2-7。

⁶⁸ 同上註，頁17。

⁶⁹ 徐起，「21世紀初海上地緣戰略與中國海軍的發展」，**中國軍事科學**(北京)，第17卷第4期，2004年8月，頁80。

的湄公河次區域合作，以及在緬甸、巴基斯坦等國興建深水港，甚至在中亞地區修建鐵路等作為，都可視為中國海上地緣戰略關係的新發展。⁷⁰

還有學者引入溫特提出的三種無政府狀態國際社會概念來為中國發展強大海權提供理論支撐，例如倪樂雄在「從陸權到海權的歷史必然—兼與葉自成教授商榷」一文中首先指出，從陸權走向海權是歷史的必然，海權對陸權擁有絕對的優勢，⁷¹因此中國走向海權是必然的結果。但是中國要發展出甚麼樣的海權，最終取決於對世界文明前景的判斷，假使國際社會走向康德永久和平，那麼中國海權就不需要依照馬漢理論發展，但假使國際社會的發展還遠不及康德文化，甚至霍布斯文化有捲土重來的可能，那麼中國海權的預設前提就必須是「世界前景不確定」，在「國際協作」和「單打獨鬥」間尋求平衡點，而且以此為未來很長一段時間裡的國防根本原則。⁷²高岩甚至認為，隨著中國越來越融入經濟全球化，未來中國必然也會如美國一樣，將全球海上航行自由視為自己的國家利益，並追求建立自己對全由海上通道的戰略性控制，但是在這個階段來臨之前，中國的主要階段性目標是維護周邊海域的主權，因此首先必須對抗美國的全球航行自由戰略目標，假使美國無視中國海軍的繼續成長，堅持在中國周邊海域維持其航行自由，未來必將引發美中之間的衝突，而唯一能夠避免這種情況發生的解決辦法，只有當中國海軍發展起能夠有效對抗美國海軍的海上力量後，中美兩國才有可能在全球海洋範圍內形成一種和平共處的關係。⁷³

最後一個中國海權論者們明顯的現象是其對於海權的概念都是關注於海權對國家的發展以及國家對海權的使用，幾乎沒有注意到在西方海權理論中，對海權發展真正重要的是社會力量的持續與深入參與，這包括馬漢所提到的人民海洋意識，以及由於社會經濟對海上貿易的依賴，才能支撐起對海洋資源的運用，以及海軍的發展，而後兩者則進一步保護與壯大國家的海上貿易，如此才使海權真正成為國家的力量。⁷⁴但在中國學者的研究中，人民的海洋意識與社會對海洋資源的利用以及海上貿易的依賴幾乎消失，而海洋資源的開發與運用則完全是「國家」的事務，⁷⁵只有少數學者注意到商業貿易與人民海權意識對中國海權發展的重要性，⁷⁶但很少為此提出專門的論述。

⁷⁰ 同上註，頁 79。

⁷¹ 倪樂雄，「從陸權到海權的歷史必然—兼與葉自成教授商榷」，*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市)，第 11 期(2007 年)，頁 22-27。

⁷² 同上註，頁 28-29。

⁷³ 高岩，「中美海軍戰略趨勢」，*廣角鏡*(香港)，第 457 期，2010 年 10 月，頁 28-32。

⁷⁴ 此種由資源、貿易、海軍所撐起的近代海權發展循環，可參考 Till, *Sea Power: A Guid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op. cit.*, pp. 33-37.

⁷⁵ 例如劉新華，「海權優先：當代中國的地緣戰略選擇」，*社會科學*(上海)，2008 年第 7 期，頁 58-61；修斌、姜秉國，「中國“和平發展”戰略視野下的海洋權益維護」，*中國海洋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山東省青島市)，2007 年第 1 期，頁 2-4；劉一建、呂賢臣，「試論海權的歷史發展規律」，*中國海洋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山東省青島市)，2007 年第 2 期，頁 2-3。張文木更認為，「在全球化世風日盛的今天，國家利益仍然是中國公民的最高利益」，見張文木，*世界地緣政治中的中國國家安全利益分析*，前引書，頁 337-340。此外，在前述的鞠海龍與張世平兩人的著作中也明顯可以發現這種主張。

⁷⁶ 倪樂雄，「從陸權到海權的歷史必然—兼與葉自成教授商榷」，前引文，頁 32。

(二)、陸海並重

儘管有上述鼓吹中國應優先發展海權的主張，但中國畢竟位於歐亞大陸，且擁有廣袤領土與眾多實力不可忽視的陸上鄰國，因此陸地仍是中國不可忽視的發展方向。這種地緣政治現實出現了認為中國既同時擁有廣大的大陸腹地與漫長的海岸線，應將其視為一個「海陸複合國家」，必須同時注重在海洋與陸地兩個戰略方向發展，但主要方向應集中於東南海洋方向的「陸海並重」主張，在本世紀已經逐漸成為中國戰略菁英偏好的主流地緣戰略選擇，⁷⁷例如邵永靈與時殷弘便認為，中國的強國之路在於「克服陸海複合國家的地緣政治弱點，依托穩定的大陸腹地，推行以改革開放為核心的海洋發展戰略」。⁷⁸鄭雪飛與邵、時二人一樣考察了 16 世紀以來西班牙、葡萄牙、荷蘭、英國、法國、德國、俄國、美國等大國崛起過程，認為海權因素對國家獲得和保持大國地位具有重要影響，但其本身並不具有決定國家興衰的魔力，不過陸海複合國家比起純粹的海洋或大陸國家，其發展戰略更必須做到陸、海平衡以及目標、手段的均衡，而且還須與本身在特定時期的海洋定位相符合，需要極高超的外交技巧和謀略來選定對國家有益的發展方向，否則非常容易受到地理上的雙重傷害。⁷⁹

而中國作為一個陸海複合國家，其情況與歷史上的大國相比又如何？李義虎在「從海陸二分到海陸統籌——對中國海陸關係的再審視」一文中指出，中國的地緣政治特性首先在於中國位於邊緣地帶，一方面靠近歐亞大陸心臟地帶，二方面又瀕臨廣大的海洋，既沒有心臟地帶國家如俄羅斯難以向海洋發展的地理劣勢，又比純粹的海島國家擁有從心臟地帶獲取資源的優勢。中國是少數能將連結歐亞大陸與太平洋的國家，不可以單純視為海權或陸權國家，中國可以用海權影響陸權，亦可用陸權制衡海權。然而這種優越條件的另一面，是中國的地理環境也使其擁有強大的海陸二分性格，使其在地緣政治發展上出現明顯的困境，發展陸權會引起俄羅斯與印度的不安全感，發展海權則又會挑起美國與日本的疑慮，這使得中國若無法處理好海陸關係，原本的地緣政治優勢將反過來成為不力的態勢。李義虎認為在這樣的環境下，中國的地緣戰略選擇必須認清強大的陸權是中國對國際事務發揮影響力的基礎，但陸權無法保證中國對沿海資源的開發、海上權益與海上交通線的保護，這必須依賴強大的海權，特別是海軍，中國必須對海軍與海權的關係有清楚的認識，因此中國海軍必須擁有遠海防衛的能力。他主張中國的地緣戰略發展不可過於偏重陸海的任一方，也不可搞平均主義，一般而言首先應保持強大的陸權，其次再發展強大的海權，但在歷史上一定時期，發展強大海權可放在更優先的地位。⁸⁰

⁷⁷ 葉自成，**陸權發展與大國興衰：地緣政治環境與中國和平發展的地緣戰略選擇**(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頁 111-112。

⁷⁸ 邵永靈、時殷弘，「近代歐洲陸海複合國家的命運與當代中國的選擇」，**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第 10 期(2000 年)，頁 47-52，文中所引的這段話出現於內容提要之中。

⁷⁹ 鄭雪飛，「近代大國崛起與海上安全環境辯證關係的歷史啟示」，**史學月刊**(河南)，2008 年第 12 期，頁 128-130。

⁸⁰ 李義虎，「從海陸二分到海陸統籌——對中國海陸關係的再審視」，**現代國際關係**(北京)，2007 年第 8 期，頁 1-7。

相對於李義虎沒有明白表示中國未來在陸海並重的情況下，究竟應以海權或陸權為優先，劉中民則對中國發展海權是否會導致與其他大國特別是美國之間的衝突進行研究。在「澄清中國海權發展戰略的三大思想分歧」中，劉氏指出中國的海權發展最大的動力來源是主權問題，其中最主要的是臺灣問題，這也是中國最有可能會引發與美國衝突的焦點；其次則是南海問題。而中國為了解決這兩大主權問題而發展一支強大的海軍，並不會與和平崛起的國策路線相悖，因為中國的目標是有限的，而且中國根本不可能為了發展海權而放棄其陸緣安全及其戰略安排而追求全球性海權，主觀上也不會以美國作為挑戰對象；再加上假使中國能夠擁有一支強的海軍作為後盾，增加對潛在衝突的威懾和抑制作用，而中國又辦事公道、人情入理、謹慎小心地處理與有關國家的海洋衝突，給世界一種友好和平的正面形象，那麼中國是完全有可能實現海陸並重的發展。⁸¹

然而，楊勇卻提出與劉中民的意見有很大差距的主張。在「發揮陸海兼備優勢是大型海陸複合國家的必然選擇」中，楊勇先提出海陸兼備是成就一個世界大國不可或缺的地緣政治基礎，然後表示建設藍色海軍是發揮海陸兼備地緣政治優勢的保障，在這裡他反對中國海軍以核子動力攻擊潛艦為主要兵力，認為中國只有建設以航空母艦為核心的強大藍水海軍，才能為建構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提供最為可靠的保障，中國必須有獨立的全球戰略，不能也不應該把他國的反應和意願做為制定中國外交戰略的重要依據。但在提出這種大膽主張之後，他卻又宣稱，中國建設海軍的目的不是要挑戰美國，因為中國海軍雖是藍色海軍，卻不是「深藍色」海軍，不能對美國的世界性利益構成威脅。反過來說，中國海軍的活動範圍僅限於西太平洋，在這個區域不是中國向美國發起挑戰，而是美國先前就進入中國的利益範圍，損害了中國的利益，因此中國無意與沒有實力挑戰美國，並不表示中國不捍衛自己的國際地位和放棄自身的國家利益。⁸²

樓耀亮的**地緣政治與中國國防戰略**是另一部研究地緣政治因素對中國國防戰略影響，並強調中國應走向陸海並重的著作。儘管樓耀亮的研究方法並無特殊之處，但從其著作中仍可見得解放軍軍方對於中國未來地緣戰略，特別是在軍事戰略方面的發展方向。樓氏的書先總結中國由古代到鄧小平時期的地緣政治與國防戰略思想，他認為當代中國最需要避免的就是在毛澤東後期、越戰結束之後，由於意識型態因素重於一切，結果導致中國四面受敵的戰略困境，同時必須擺脫中國數千年來不重視海洋與海權的地緣戰略思想，以免中國的海洋權益繼續受到侵蝕，以及不斷受到來自海洋的威脅。⁸³其次，他總結當代地緣政治結構，認為是「一超多強」，而在這樣的結構中，中國應以制衡美國獨霸體系的野心為主要戰略目標，⁸⁴至於具體戰略發展方向，首先應該傾力結好俄羅斯與中亞國

⁸¹ 劉中民、王曉娟，「澄清中國海權發展戰略的三大思想分歧」，**學習月刊**(湖北)，2005 年第 9 期，2005 年 9 月，頁 33、50。

⁸² 楊勇，「發揮陸海兼備優勢是大型海陸複合國家的必然選擇」，**黑龍江社會科學**(黑龍江)，總第 84 期(2004 年 6 月)，頁 26-29。

⁸³ 樓耀亮，**地緣政治與中國國防戰略**(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年)，頁 132-133。

⁸⁴ 同上註，頁 212、219。

家，利用上海合作組織使中國地緣政治的「北線」與「西北線」維持穩定，做為中國向東方與南方發展的後盾，而由於海洋對中國日趨重要，以及印度擁有稱霸南亞的野心，中國應在東北亞、東南亞與南亞地區擁有較積極的做為：除了統一臺灣與嚇阻日本之外，必須維持南海與東海的中國主權不可遭其他國家侵佔，亦不可使南海議題國際化以免中國難以完全實現對南海的主權聲索；此外還要在南亞積極支持巴基斯坦與印度的兩極權力平衡結構。⁸⁵而關於中國究竟應以海權或陸權為首要目標，樓耀亮認為中國既身為陸海兼備的大國，就應採海陸並重的地緣戰略，但這並非表示中國需要同時發展陸軍與海軍，而是應找出對實現地緣戰略具有真正重要性的軍種，既然必須在東北亞、東南亞與南亞有較積極的做為，就必須以海軍為重，但他也清楚地指出，地緣政治最明顯地特徵就是不斷變動的動態性，因此中國地緣戰略必須視時勢的變化，加以調整其建軍重點，同時必須著重西部開發，以深化中國的陸權戰略基礎。⁸⁶

(三)、陸權論

從以上的整理可以看出，無論是海權論或是海陸並重論，全都認為中國應該為了保衛主權、海洋權益、能源與資源安全、中國生存空間等要求而發展強大的海權，儘管他們的論點主認為中國的海權再怎麼強大，也只擁有有限的目標，不會因此與其他海權大國特別是美國發生衝突，但其實仍有明顯的邏輯矛盾，徐棄郁在「海權的誤區與反思」中就指出，大多數主張中國應發展強大海權的論點其實有四大明顯的謬誤：海權決定歷史，其功能是獨一無二的，現在仍是如此；全球化要求國家有更多的國際市場和資源，有了海權就可提供安全保證；大國必須奪取海權，否則其發展是沒有前途的；海上力量的發展可以分享霸權國的海權，這是與霸權國形成真正平等的「朋友關係」的基礎。徐棄郁指出，海權絕不僅是軍事問題，而是關乎國家安全發展的大戰略問題，只是實現大戰略的一種手段，是海權服務於戰略而不是戰略服務於海權，中國真正應該做的是把握時代的脈搏，將未來國際競爭的關鍵領域作為自己新的「增長點」，這才是決定後起大國發展前途的根本所在，是否追求海權同樣應是此而定，後起大國更不應該成為世界霸權國的主要挑戰者對海權的追求也要服從這一全局。⁸⁷

葉自成是主張中國應採取陸權發展最主要的代表。葉氏從 1997 年以來對中國地緣戰略的專門著作之豐富，旁人很難比得上。在 1998 年與王福春、唐士其、方向勤一起主編的**地緣政治與中國外交**中，葉氏就提出中國應發展有自己特色的地緣政治學體系的看法，並認為中國與西方在地緣政治思想中最大的不同，是後者強調鄰居可能成為敵人，而前者則強調與周邊國家的和平共處，產生於與周邊國家和平共處的基礎上，⁸⁸而且繼承毛澤東的把中國邊境分為西南、北部與和東部地概念，提出冷戰後以美國為中國地緣政治因素中最不穩定和最大不確定因素，並主張中國的地緣戰略作為應該是「安西、靠北、爭東南」—維持以南亞地

⁸⁵ 同上註，229-253。

⁸⁶ 同上註，頁 209-211、257-272。

⁸⁷ 徐棄郁，「海權的誤區與反思」，**戰略與管理**(北京市)，2003 年第 5 期，頁 15-23。

⁸⁸ 葉自成主編，**地緣政治與中國外交**(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 年)，頁 5-15。

緣政治區域為主的「西線」地緣的穩定，另外把以俄羅斯、中亞國家和蒙古為主的安定「北線」地緣作為值得倚靠的「後方」，來增加中國在以朝鮮半島、亞太島鏈地區與東南亞地緣政治區域的「東線」地緣利益鬥爭的力量。⁸⁹這些思想後來進一步呈現在 2007 年出版的**陸權發展與大國興衰：地緣政治環境與中國和平發展的地緣戰略選擇**之中，儘管葉自成在這本書中，並沒有特別重複 1998 年提出的「安西、靠北、爭東南」的地緣戰略主張。

總體來說，葉自成認為海權的重要性明顯被誇大了，人類不可能脫離陸地而發展，而絕大部分的居住地與生活區域、國家的領土與經濟發展空間，以及人類所必須的各種生活資源和財富累積，都存在於各大陸，海洋只在生態系統提供的服務方面遠超過大陸。⁹⁰中國不但是歐亞大陸的最大陸權國家之一，其歷史就是一部陸權發展史。他提出五點中國屬於陸權而非海權或海陸並重國家的基本地緣政治國情，⁹¹表示以中國基本的地緣政治環境，再加上世界的地緣政治中心與美國的全球戰略重心仍位於歐亞大陸，集中力量發展陸權才是中國和平發展的基本取向。中國不應分散力量追求強大的海權或「海陸並重」，海權雖然重要，但不可在中國地緣戰略選擇中居於主導地位，⁹²中國若以陸權做為繁榮與發展的基礎，一方面可以藉此在中亞突破中國大部分能源依賴海洋運輸的困境，二方面可以利用軟權力降低與周邊國家的領土衝突與海陸對峙，甚至反制美國的「軟冷戰」，並有利於中國對台灣的統一。⁹³

倪樂雄批評葉自成最大的問題在於誤解了海權、陸權等地緣政治學名詞的真正意義，⁹⁴不過本章則認為是葉自成對於中國與印度、歐盟、俄羅斯等歐亞大陸強國或超國家國際組織的合作有太過美好的想像，認為光靠經濟整合即可消除中國與這些國家或國際組織之間的地緣政治衝突。然而，假使中國與美國之間的地緣政治衝突難以消除，那麼中國與同樣身為陸權的俄羅斯、印度兩大中國鄰國之間的戰略矛盾可能更難以消除，特別是中印關係極端複雜，並非葉自成想像的可以靠經濟整合結束對立這麼簡單。而且葉自成所想像的海權發展方案，除了攻勢海軍艦隊之外，與其他海權論或海陸並重論者的主張其實並無太大的差別。葉自成在南海議題上更沒有真正提出如何以陸全解決南海問題的方法。

三、對於中國戰略文化的研究

目前的中國戰略文化研究在研究方法上與西方一樣表現出建構主義學派與歷史學派等兩大類別，建構主義戰略文化學者的研究大都從純粹理念因素切入，因此忽略地緣政治的重要性，例如秦亞青、李曉燕等人；歷史學派雖然進行了大量中國歷史研究，也承認物質因素特別是地理的影響力，但並未真正對地緣政治

⁸⁹ 同上註，頁 19-29。

⁹⁰ 葉自成，**陸權發展與大國興衰**，前引書，頁 48-50。

⁹¹ 同上註，頁 114-129。

⁹² 同上註，頁 264。

⁹³ 同上註，第七章。

⁹⁴ 倪樂雄，「從陸權到海權的歷史必然」，前引文，頁 29-30。

的影響做精密、客觀的分析，甚至僅注意到歷史與傳統的影響而忽略地理因素(例如張曙光(Shu Guang Zhang)收錄於布斯與楚德(Russell Trood)主編的**亞太地區戰略文化**(*Strategic Culture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書中的「中國：傳統與革命遺產」(China: Traditional and Revolutionary Heritage)一文)，因此仍存在許多質性研究缺陷。

(一)、宮玉振的歷史分析途徑

宮玉振在分析被中國學者戰略文化研究者一致接受的崇尚和平、排斥擴張與致力於國家統一等「非暴力」中國戰略文化本質與類型，以及針對中國與西方戰略文化進行比較研究時承認，有兩個主要物質因素造成中國與西方戰略文化發生差異的基本原因，首先是中國北方與希臘、羅馬文明興起的自然地理差異，中國的地理環境能夠建立經濟上自給自足的國家，不需要四處擴張、建立殖民地掠奪資源，而歐洲的地理環境則缺乏這種條件，因此西方傾向擴張，但中國卻很少有擴張紀錄，喜好擴張的帝王只是歷史上的少數；其次是政治結構，中國自秦漢以來都是統一的帝國政治結構，沒有經歷過真正的「永久分裂」，帝國視政權的穩定為最高優先，因此注重內部秩序的協調與整合的文化勝過對外擴張；反之，西方從羅馬帝國以來都是分裂的局面，雖有大一統思想，但從未有過「真正的統一」，國內問題在戰略優先性上居次，⁹⁵因此競爭與擴張就成為西方戰略文化最明顯的本質。

宮玉振的物質原因雖然看起來言之成理，但是他在進行中西比較時卻犯了許多邏輯與歷史觀念的錯誤，導致其對中西戰略文化的比較研究出現許多破綻。第一個破綻是對國家觀念的替換，宮玉振很明顯地將秦漢以來的中國視為一個「民族國家」(Nation-State)，但近代中國的「民族國家」概念是由西方所傳入，在此之前對於今日的中國領土概念是「天下」，古代「天下」中的「國家」，其概念與民族國家顯然大相逕庭，但宮玉振卻將「漢文化圈」的天下概念等同於今日的中國，忽略了其間性質的差異。退萬步言之，就算接受宮玉振的天下等同中國概念，但他對「西方」卻又立刻反其道而行，既然將古代中國視為民族國家對待，顯然對西方國家也應以民族國家做為比較單位，而非以「西方」這個文化概念做為比較單位，誠然今日的歐美國家誠然都屬於「西方」，但是美國與「歐洲」，甚至歐洲國家彼此之間的戰略文化差異相當深刻，但宮玉振卻將它們一視同仁，顯然是錯誤的作法。假使要這麼做，「西方」這個模糊文化概念的比較概念顯然應為「東方」，而「東方」卻不必然專指中國，可能還包含中亞、南亞、中東的許多非西方文明；即使吾人再退一步，限縮「東方」的概念為「東亞」或「漢文化圈」，則這個概念的範圍也還包括韓國、越南、日本等許多歷史悠久的古國，宮玉振實應先證明東亞漢文化圈中的其他國家與中國的戰略文化具有相當程度的一致性，但他卻沒有這麼做，顯然在邏輯和研究方法上犯了相當大的錯誤。

其次，宮玉振雖然提出了地理環境與政治結構的差異對中國與西方戰略文化的不同影響，但由於他在研究邏輯上的錯誤，他迴避了明顯的歷史觀念錯誤：他

⁹⁵ 宮玉振，**中國戰略文化解析** (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2年)，頁34-44。

認為西方戰略文化中的競爭與擴張特性起於希臘與羅馬為了尋求能提供更多資源而向本土之外的地區建立殖民地。然而，一方面希臘與羅馬時代的「國家」概念顯然也不是今日的民族國家，二方面希臘與羅馬文化只不過是西方文明的源頭，假使以相同的研究標準對應到中國歷史，則宮玉振的比較對象應為中國的夏、商、周三代以及春秋戰國時代的列國競爭，在這個時代，華夏國家的向外擴張與對周邊異民族的侵略歷史絕不亞於希臘與羅馬，否則何以秦漢時代能夠發展成面積廣達數百萬平方公里的大帝國，並奠定今日中國的基本疆域雛形？宮玉振更略而不提的是，秦、漢、唐等帝國的邊界都落在東亞農耕文化的最北界與最西界，在此之外是農業無法扎根的草原、沙漠與高原，即使在南方，也是座落於漢人能忍受的地區，無法忍受的雲貴高原與越南之外的中南半島才因此得以長期獨立於中國的直接政治控制之外。⁹⁶最後，宮玉振以克勞塞維茨的戰略思想做為西方戰略文化的縮影，⁹⁷更是明顯的「時代錯置」，克勞塞維茨所處的時代，其物質結構與中國完全不同，如何能以此證明中國戰略文化的非暴力性？⁹⁸況且在中國同樣處於多極時代的戰國時代，且為中國戰略文化研究相當注重的武經七書之一的吳子兵法和尉繚子，也流露出與宮玉振認為屬於克勞塞維茨思想核心的注重會戰與強調武力在國際關係中作用的戰略思想，⁹⁹就算是被當代中國戰略文化研究推崇為非暴力戰略文化表現之一的孫子兵法，其對於「慎戰」以及作戰中的攻勢偏好和數量優勢的等觀念與克勞塞維茨更是極為雷同。¹⁰⁰

(二)、張鐵軍的地緣政治分析途徑

張鐵軍在「中國戰略文化：傳統與當代特徵」(Chinese Strategic Culture: Traditional and Present Features)一文中對中國地緣政治環境與戰略文化之間的關係作了一些修正，從而避免了避免宮玉振的邏輯與研究方法錯誤。他並沒有將中國與西方戰略文化作比較，認為中國在東亞的地緣政治特徵是新疆、西藏、內外蒙古、朝鮮半島北部、中南半島北部與今日的中國東北等邊緣地區(periphery)圍繞著華夏文明的核心，使得中國古代的帝國為了防衛核心地帶，必須直接或間接控制這些邊緣區，而中國的地緣經濟特徵是核心地區兩千年來都足以自給自足，而且作為一個缺乏海洋利益的大陸國家，陸地交通線對中國的重要性遠超過海洋，這使得中國缺乏向海外發展的動機。¹⁰¹而由於指出基於防衛核心地帶的需要，中國古代帝國必須控制邊緣地區，因此他承認中國歷史上的擴張行動，但認

⁹⁶ 倪樂雄，**尋找敵人：戰爭文化與國際軍事問題透視**(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03年)，頁303-304；丁力，**地緣大戰略：中國的地緣政治環境及其戰略選擇**，前引書，頁222-229。

⁹⁷ 宮玉振，**中國戰略文化解析**，前引書，頁49。

⁹⁸ 關於中國與西方戰略文化比較的「時代錯置」，可參考楊仕樂，「中國獨特的戰略文化？尋找理念的物質基礎」，**東亞研究**，第37卷第1期(2006年1月)，頁210-218。

⁹⁹ **吳子兵法·圖國第一**主張「此五者，軍之練銳也。有此三千人，內出可以決圍，外人可以屠城矣」。**尉繚子·兵令下第二十四**更認為「臣聞古之善用兵者，能殺士卒之半，其次殺其十三，其下殺其十一。能殺其半者，威加海內；殺十三者，力加諸侯；殺十一者，令行士卒」。請參閱王陽明，**陽明先生手批武經七書**(台北：國防大學戰爭學院，翻印，三版，民國77年)，頁158、414。

¹⁰⁰ 鈕先鍾，**孫子三論**(台北：麥田出版社，二版，2007年)，頁220-221、222-224。

¹⁰¹ Tiejun Zhan, "Chinese Strategic Culture: Traditional and Present Features," *op. cit.*, pp. 74-75.

為中國傳統戰略文化在儒家的文化優越感與王道思想主導下，大多數的對外行動都不是侵略性的，偏好以武力之外的方式應對威脅，少數的例外是漢武帝的開疆拓土，其他時期的武力使用大多數是消極的防禦取向，或者尋求以「積極防禦」消滅來自邊緣地區的威脅，以重建中國在核心與邊緣地區的權威。¹⁰²

張鐵軍的分析比起宮玉振而言似乎更具客觀性，但在他為中國戰略文化的防禦性與非暴力性辯護時，他自己對中國古代帝國控制邊緣地區的行為已經洩漏了中國的戰略文化絕不是非擴張性的，否則就不需要為了防禦而控制如此龐大的周邊地區，而且張鐵軍無法解釋的是，這些邊緣地區環繞的中國「核心地區」面積不但與目前的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相當，而且遠超過張鐵軍主張的中國國家形成之前的春秋戰國時代各國的主要活動範圍－戰國七雄的領土向南並不超過今日湖南、江西、浙江等省的中部，雲貴地區也不屬於華夏文明範圍，向北也沒有達到河西走廊，更何況戰國七雄的領土遠超過春秋時代周朝各封國的領土，當然其活動範圍也遠超過西周王朝。因此僅就「中國本部」的領土而言，就是一部不斷擴張的歷史展現。

此外，張鐵軍表示作為一個大陸強權的帝國中國並不需要對其邊緣地帶以外的地區施加影響力或控制，因為在這些地區不存在能威脅中國的其他強權。¹⁰³從這個論述上亦可發現張鐵軍對中國戰略文化的研究完全忽略地緣政治結構的影響，因此也犯了時代錯置的毛病－在中國的帝國時代，並沒有所謂的「全球體系」，中國也直到 19 世紀中葉才被納入範圍擴張至全球的西發利亞體系中，在這之前，全球無論是現實主義概念下的國際體系或地緣政治學概念中的體系結構，都是散落於各大洲的區域型體系，體系之間互動困難，因此當然也很少存在區域體系中的霸權意欲對體系之外的地區施加政治控制以防另一個區域霸權來威脅自己的安全，而中國所處的東亞和印度所處的南亞尤其展現出地理上的封閉特徵，因此更難與外界產生交流。在這個情況下，帝國時代的中國本身就是體系中的秩序主導霸權，而且其對於在東亞地緣政治體系中建立自己的世界觀秩序的概念可能還強於今日的美國，後者並不以武力要求其他體系中的大國服從美國的世界觀與政治秩序，但帝國時代的中國所建立的「朝貢體系」與儒家的「華夷觀」卻導致中國經常以武力或其他強制手段要求周邊國家服從其本身的政治觀與理想中的國際秩序。張氏也沒有說明為什麼被視為中國非暴力戰略文化重要表現的「和親」，主要只有西漢、唐朝、清朝採用，其他帝國尤其是宋朝與明朝根本排斥這種手段的運用，他也沒有說明「和親」在西漢、唐、清三個帝國中的戰略意義是否完全相同，而這些戰略意義的差異則受到這三個帝國所處的明顯不同地緣政治結構與張鐵軍本人在文章中提到的，帝國內人文結構差異的影響，後者也屬於地緣政治學的重要研究組成，但他卻只簡單地表示中國核心地帶超過 90% 的居民都是漢人，表現出極大的民族同質性與文化一致性，¹⁰⁴完全忽略了唐、清兩代的中國的地緣政治環境演變。

¹⁰² *Ibid.*, pp. 75-79.

¹⁰³ *Ibid.*, p. 74.

¹⁰⁴ *Ibid.*, p. 75.

第五節、小結

從以上的文獻回顧可發現，目前僅對中國的戰略研究來說就相當缺乏足夠的歷史與地緣政治分析，使得研究者無法明確認知中國的戰略文化全貌，以及中國歷史經驗對當代中國戰略的影響之處。此一問題不僅出在研究者的議題選擇，也包含研究方法—除了極少數如江憶恩與王元綱之外，英文研究幾乎沒有大量運用中國古代典籍分析，自然無法對中國戰略文化、歷史經驗傳承等作有效且可信的分析。事實上，即使江憶恩的研究方法也有其問題：他不像王元綱那樣主要以中國古代政府文獻為分析目標來支撐戰略文化研究，而主要依靠對武經七書這種軍事典籍分析，但武經七書與其說是戰略文化的結晶，不如說是戰略「思想」的結晶，其是否能夠作為戰略文化的基礎還必須找到中國歷史上是否有運用武經七書作為戰爭指導的確實證據支持。

其次，就中國學者的地緣政治密碼與戰略文化研究而言，吾人可發現他們很難客觀研究中國歷史所傳達出來的戰略文化意涵。確實無論是哪一個地緣政治學理論，其本身不可能是客觀的，必然服務於某種意識型態，例如古典地緣政治學乃是服務於新帝國主義，世界體系理論與許多批判性地緣政治學的小型理論則服務於新馬克斯主義，新古典地緣政治學無庸置疑，也含有為冷戰後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持續保持其全球戰略優勢的內在思想存在。因此在以地緣政治學為主要分析理論的地緣戰略研究中，越能客觀地解釋歷史、戰略文化與解構地緣政治密碼，就越能真正理解歷史的影響，以及驗證地緣政治學理論的價值。但是在中國學者的研究中，吾人可發現其對歷史的解釋經常是非常不客觀的，甚至完全是為了中國政府的國家戰略目標而解釋其古代歷史，例如當胡錦濤執政後，從 2003 年起為了反駁中國崩潰論與中國威脅論而先後設定和平崛起與和平發展等兩個詞彙為主要的戰略目標後，¹⁰⁵這兩個本身就是極強烈政治目標而非學術命題的詞彙幾乎佔據了所有中國戰略研究著作的內容，對中國戰略文化的解釋幾乎都在強調歷史上中國的和平發展與注重統一，不喜擴張，以及儒家思想對這些「特質」的強大主導性，完全忽略了古代的封建戰略環境與當代的民族國家是完全不同的時代概念，也忽略了中國古代經常四處擴張的歷史，否則中國文化如何能覆蓋如此廣大的區域，更不願意提到中國只是在宋朝加強皇權與中央集權之後，之後的朝代才比較沒有分裂的情況出現，可見得中國歷史本來是一個區域性國際體系而不是一部國家或民族的歷史，至少在明朝之前可以這樣視之。

¹⁰⁵ 和平崛起是 2003 年 11 月所提出的，和平發展則是 2006 年 5 月所提出，不過中共官方為了顧忌中國威脅論，停止使用和平崛起一詞的時間相當早，最後一次公開始使用是胡錦濤在 2004 年 4 月 24 日參加第三屆博鰲亞洲論壇年會時發表的主旨演講。二者都是有中共「御用理論家」之稱的前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鄭必堅所提出的。另外，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虞云耀在 2004 年證實和平崛起是為了反駁中國威脅論與中國崩潰論，王緝思則公開表示過和平崛起的提出乃是政治命題而不是學術命題。請參考陳鐵源，「鄭必堅可能放棄“和平崛起”而改用“和平發展”」，天下博客，2006 年 05 月 14 日，<http://sais2005.bokee.com/5050610.html>。

吾人並不否認儒家文化對中國文化的影響，也不否認中國確實在某些階段具備強大的實力，但卻沒有發展成更強大與符合現代意義的帝國，但這並不表示儒家文化能直接轉換為中國戰略文化，也不代表中國就是一個完全愛好和平的國家，批判性地緣政治學對戰略研究的價值即在於此：每一個時代都有不同的時代精神與政治思想，不能以當代的時代精神與政治思想評論古代的政治現象，只有設身處地瞭解當時的時代背景與戰略環境，才能真正客觀地瞭解傳統戰略文化與戰略思想的真實意涵與價值。但中國學者們卻為了政治目的—和平崛起、和平發展、國家統一—的需要，不能客觀地面對歷史，更無法客觀地評論當代中國地緣戰略的本質、方向與潛在問題，只能從研究方法與歷史分析等層面大力批判西方學者們的研究，或許後者的研究基於社會文化背景、語言與資料等先天性問題，無法對中國歷史有真正完整的瞭解，但至少其研究態度是遠較客觀的。中國學者們反而無法提出更為客觀的研究，實為相當可惜之事。

最後，從對中國學者的文獻回顧中可發現，其對中國的地緣政治密碼解構明顯表現出他們認為中國不僅身為歐亞大陸重要陸權大國，同時也是重要的世界大國，而且具有悠久的文化歷史與地緣戰略地位，中國的戰略決策能對世界權力平衡發揮強大的影響力，因此他們渴望中國有朝一日能重拾體系內「極」的地位。這也表示當前與未來的中國地緣戰略必然與美國一樣包含周邊、區域與全球三個層次。然而他們同時也承認中國的國力尚不足以在全球層次擔負重要角色，主要的戰略目標仍在周邊與區域，特別是周邊。而中國學者的爭論也顯示出他們理解到必須發展海權才能使中國真正在周邊、區域與全球扮演重要的角色，但他們同時又害怕發展強大的海權會導致中國與美國發生衝突，進而步入歷史上其他陸權大國最後被海權國家擊敗的結果；也害怕中國會因為崛起而被周邊國家圍堵，使中國失去成為世界大國的機會。

因此，無論是在地緣政治結構或中國戰略文化與地緣戰略等學術議題上，迄今都沒有令人滿意的研究理論架構與歷史研究成果，能夠提供學術界對地緣政治和戰略文化，以及中國戰略菁英本身的思想如何影響中國地緣戰略的制訂，以及其發展本質與方向的研究與較為客觀的瞭解，因此較難以得知中國的地緣戰略究竟會對亞太的權力平衡與地緣政治均衡產生何種影響，但這卻是當前國際社會與國際關係學界亟欲瞭解的目標。本論文的主要目的即是盡量彌補這種研究方法與途徑上的缺憾，試圖藉由完整分析中國歷史上的戰略遺產，以及遺產與當代中國地緣戰略的傳承關係，來釐清目前中國的地緣戰略將對亞太地緣政治均衡發生何種影響。

第三章、地緣政治結構與地緣政治均衡

本章的目的在建構一個能夠改善上述缺陷，並運用於分析地緣戰略以及地緣戰略對地緣政治體系均衡影響的地緣政治結構模型。地緣政治學雖然也有結構與體系的概念，但長期以來並沒有發展出類似結構現實主義那樣的結構或體系理論，對於理論的發展而言是一個嚴重的缺憾。故本章在第一節將首先回顧地緣政治學中的結構與體系概念，並從中發展出以科恩的地緣政治結構為基礎、格利吉爾的交通線控制邏輯為國家層級劃分邏輯依據的地緣政治結構理論，作為本論文從地緣政治結構分析中國地緣戰略的理論模型。

接下來在第二節，本論文將進一步探討如何依照戰略交通線控制邏輯建立結構模型，並引入布贊與威佛(Ole Wæver)在「區域安全複合體理論」(Regional Security Complex Theory, RSCT)中的超強、強權、區域大國劃分層級，來劃分本論文地緣政治結構中的國家層級。第三節則分析地緣政治均衡(Geopolitical Equilibrium)的概念，釐清長期以來混淆的均衡概念同時並定義何謂地緣政治均衡，以及地緣政治結構如何影響地緣政治均衡的達成與顛覆，指出單憑物質結構分析國家行為與體系均衡的不足之處。第四節則分析地緣政治結構與地緣政治均衡的關係，析論地緣政治結構如何影響均衡的達成與不均衡的產生。在第五節則提出歷史上至冷戰為止的地緣政治均衡個案與實踐。而為了能結合地緣政治學與戰略文化兩途徑，本章亦將在第六節分析地緣政治結構如何對戰略文化發生影響。最後在第七節的小結總結本章的分析結果，為進入第四章的中國地緣戰略分析鋪路。

第一節、地緣政治結構理論與模型建構

從馬漢與麥金德的時代起，地緣政治學就有結構概念，表現為海權與陸權的競爭關係，同時相信結構本身有其運作規律，並能以各種結構因素來維持體系均衡。根據帕克的整理，地緣政治學的結構觀念可概分為單極、兩極與多極等三大類。

¹兩極概念主要屬於古典地緣政治學；多極概念雖然也發端於馬漢及麥金德的思想，但明顯屬於新古典地緣政治學；至於單極概念則主要屬於強調霸權週期循環的世界體系理論。然而隨著地緣政治學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被冷落，其結構理論的發展也隨之停頓，大多數的地緣政治結構研究框架，並非類似結構現實主義般簡明且嚴謹的結構理論，只是因應國際局勢的變化，並加入某些國際關係理

¹ Geoffrey Parker, *Geopolitic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London: Printer, 1998), p. 94.

論之後所呈現的結構概念而已。

一、古典地緣政治學：海陸兩極結構與地理力為主的均衡

自古典地緣政治學以來，最明顯與最為人熟知的地緣政治結構類型就是基於海洋與陸地兩種截然自然環境對人類發展所產生的截然不同影響而出現的海權與陸權的兩極對峙概念。海權與陸權的對峙很快地在 20 世紀初隨著俄國於日俄戰爭中戰敗而轉變為歐洲國家對抗亞洲「黃禍」的「東西對抗」概念，於是兩極結構遂同時包含了地理上的海陸對峙，以及歐洲人心理上的東西對抗，無論是在馬漢晚期或麥金德較早期的著作中都可見到這兩種因素，²不只是簡單的海權與陸權對抗而已，而美國與蘇聯在冷戰期間的敵對則同時加強了這兩種對抗概念，使得兩極對峙的概念在冷戰期間顯得最為明顯。但從第一章的均衡定義中吾人已知，古典地緣政治學並不認為對峙必然引發對抗，導致所有國家都捲入世界性大戰的悲慘命運，而是可藉由海陸相對分佈與陸地上的大型天然障礙，搭配其他方式來達成體系均衡。

海陸兩極對抗由於涉及最基本自然地理的現象，對華爾茨之後重新引入自然地理變數的結構現實主義學者有很深刻的影響，不過持兩極觀點的古典地緣政治學概念本身就與結構現實主義有類似之處，例如馬漢的地緣政治均衡機制主張近似於守勢現實主義(Defense Realism)，而史派克曼強調競爭雙方都必須具有同樣強大與侵略性的戰略意志和能力才能維持體系的均衡，則與攻勢現實主義極為類似。³不過最明顯受到古典地緣政治學海陸對峙影響的現實主義理論，應屬米爾斯海默的離岸平衡者(Off-Shore Balancer)邏輯——國家在國際體系中最重要權力要素為地面力量的大小，因此地面力量的均勢就可以大致決定國際體系的結構；但另一方面，巨大水體則能夠阻絕地面力量對另一岸地區的征服。⁴戰是之故，陸地上的共同邊界由於容易為陸軍跨越，因此陸地國家之間容易採取權力平衡行

² 馬漢地緣政思想中的東西對抗觀念展現於其較不為人所知，但具有相當戰略重要性的著作《亞洲問題及其對國際政治的影響》(*The Problem of Asia and Its Effect up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之中。馬漢不僅敘述了亞洲的戰略形勢與資源對海權與陸權全球權力平衡(主要英國與俄國在亞洲的競爭)的影響，而且顯示出條頓民族(Teutonic Nations)和斯拉夫民族(Slav)之間傳統的東西對立觀點，以及對亞洲國家尤其是中國在接受西方思想、組織和武裝之後，將成為對西方嚴重威脅的憂慮，Alfred T. Mahan, *The Problem of Asia: Its Effect up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Brunswick, NJ.(U.S.A.) and London(U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3), chapter 1-chapter 3, for the concern of the rise of China, see p. 98 and p. 106. 麥金德向來認為陸權對海權的威脅很早就展現在古代來自心臟地帶的游牧帝國對西方文明的威脅，在 18 世紀之後則由佔領心臟地帶的俄國繼承過去游牧帝國的角色，成為新的威脅，但最可怕的威脅則是日本的崛起與中國的衰弱，可能導致日本組織中國的人力並控制心臟地帶，成為對海權與西方文明最大的威脅，因為日本已是一個海權國家而且擁有中國的龐大資源，再加上中國的海岸線，使其擁有俄國完全無法比擬的海權發展優勢，請參考 Halford J. Mackinder,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23, No. 4(April 1904), pp. 421-437,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Japan's potential threat to British sea power, see p. 433 and p. 437; Halford J. Mackinder, *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Defense Classic Edition, 1996), chapter 3-chapter 7.

³ Parker, *Geopolitics*, op. cit., pp. 114-117.

⁴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2001), p. 83 and 87, pp. 114-119.

為；反過來說，與潛在競爭對手之間隔著海洋的強國則不必過於擔心入侵的問題，因此在面對外來威脅時傾向採取「推卸責任」(Buck-Passing)行為。這個邏輯的極致就是最穩定的國際體系為所有大國均為核武島國。⁵這種觀點無疑的存在許多與史實明顯不符的弱點，例如假使共同邊界確實促進均勢，中國與日本就不會由多極體系走向大一統；而假使水體的阻隔力量如此之強，日本如何會在20世紀於亞洲大陸數次發動大規模侵略，而英國又何必擔心大陸強權會對其發動跨海進攻而始終有所謂的「大陸承諾」(Continental Commitment)外交政策，並因此在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War of Spanish Succession, 1701-1714)、拿破崙戰爭與兩次世界大戰等大戰主動承擔對抗大陸強權的責任。

李維與湯普遜的「在陸上與海上的平衡：國家是否結盟對抗首要全球強權」(Balancing on Land and at Sea: Do States Ally against Leading Global Power?)是最新表現出海權與陸權兩極地緣政治結構對國家聯盟行為影響的結構現實主義研究。在這篇文章中，兩人對米爾斯海默的離岸平衡者觀念有進一步的發揮，並跳脫其他現實主義者對「單極」定義的爭論，認為國際關係學界在討論體系結構是否會影響其他國家形成對單極的「反霸權平衡」(counterhegemonic balancing)聯盟時，首先必需注意到單極究竟只存在於「區域大陸體系」(Regional Continental System)或屬於「全球海洋體系」(Global Maritime System)，⁶現實主義對權力平衡的探討歷史其時大都僅侷限於近代歐洲史或古代中國史，而這兩個個案其實都只是區域大陸體系，⁷當中的單極或霸權都是擁有眾多陸上鄰國的大陸國家，具有能輕易跨過邊界從鄰國奪取或毀滅鄰國的領土、資源與政治體制的強大陸軍；反之，海洋強國只擁有較小的陸軍，而且注重維持海上貿易的暢通與對經濟市場的掌握而不是奪取領土，因此較缺乏入侵的能力與意願，對其他國家的領土完整較不會構成威脅。⁸因此國家容易對陸權單極而非海權單極形成平衡聯盟。

李維與湯普遜雖然注意到權力平衡理論的缺陷而結合地緣政治與結構現實主義，並在文章中利用量化分析來驗證越強大的海權國家越不容易遭到平衡的理論假設，⁹然而其分析仍有幾個缺陷。首先是在國家分級上，葡萄牙與荷蘭和後來的英國與美國相比，其權力基礎與在體系中的地位相差甚遠，是否只因為擁有強大的海軍就能被視為世界強權？單以海軍力量的大小作為體系影響國家聯盟行為的主要變數顯然頗有疑問。其次，海權是否只專注於市場與貿易的控制而非奪取領土是另外一個值得探討的議題，畢竟即使除了美國之外的歐洲海權國家沒有積極在歐洲地區爭奪領土，但對於海外殖民地的競爭與控制卻從來沒有停止過，而為了殖民地競爭也曾形成不少對抗最強海權國家的聯盟。第三，李維與湯普遜的分析大部分還是著重於歐洲地區的分析，是否當時的歐洲國家即可分為區域大陸強權與全球海權國家？法國也擁有龐大的海軍與殖民地，全球殖民競爭對

⁵ *Ibid.*, p. 137.

⁶ Jack S. Levy and William R. Thompson, "Balancing on Land and at Sea: Do States Ally against Leading Global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5, No.1 (Summer 2010), p. 40.

⁷ *Ibid.*, pp. 13-15.

⁸ *Ibid.*, pp. 16-18.

⁹ *Ibid.*, pp. 19-36.

歐洲權力平衡其實也有很大的影響，但二人卻沒有分析全球體系對權力平衡的影響。最後則出在權力與能力的差別，是否海軍支出、戰艦型式與數目等權力評估要素可自動轉換為控制海上交通線與市場的能力，也是另一個值得探討的議題，畢竟擁有最多權力要素並不代表能完全將之轉換為能力，並透過戰略的對抗來獲得更高的國際地位，否則英國就無法取代荷蘭的海洋「霸權」地位。

二、新古典地緣政治學：以海陸分佈為基礎的多極結構

19 世紀末所形成的全球地緣政治結構與國際體系中，除了海權與陸權的兩種基本地緣政治形式外，由於文化和地理位置的差異，兩極不可能是唯一的結構形式，因為很難有國家能達到這樣的控制規模，而大多數的國家其利益都是集中在本國所處的地理區域中，因此比較常見的反而是多極結構。但是在古典地緣政治學中，多極的表現形式常為三極：馬漢認為兩大力量中心是條頓海權與斯拉夫陸權，而介於兩者之間的亞洲(主要是日本與中國)，只要經由適當地組織與管理，可以成為第三個平衡力量。¹⁰而麥金德在 1943 年拋棄了以往了心臟地帶是全球最重要戰略地區的理论主張(心臟地帶的概念從麥金德提出以來經歷了許多變遷，1943 年最後的範圍遠較 1904 年首度提出與 1919 年再度強調時都要小上很多，可參考圖 3.1)，在承認心臟地帶既有重要性的同時，認為以美國、英國、法國為首，佔據北大西洋「中間陸地海洋盆地」(basin of Midland Ocean)的海權國家，與佔據心臟地的蘇聯陸權，可以和季風亞洲(Monsoon Asia)的中國與印度以及澳洲等「內新月形地帶」(Inner or Marginal Crescent)一起保持權力平衡，共同防止軸心國的再度危害世界，¹¹顯然麥金德接受了史派克曼的意見，承認在全球地緣政治結構中，「邊緣地帶」(即麥金德以往所稱的環繞於心臟地帶周邊的內心月形地帶)是除了海權與陸權之外，對全球地緣政治均衡與國際權力平衡具備真正戰略重要性的地區。

¹⁰ Mahan, *The Problem of Asia: Its Effect up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p. cit., p. 109.

¹¹ Halford J. Mackinder, "The Round World and the Winning of the Peace," *Foreign Affairs*, Vol. 21, No. 4(July 1943), pp. 595-605.

圖 3.1 麥金德心臟地帶概念範圍的變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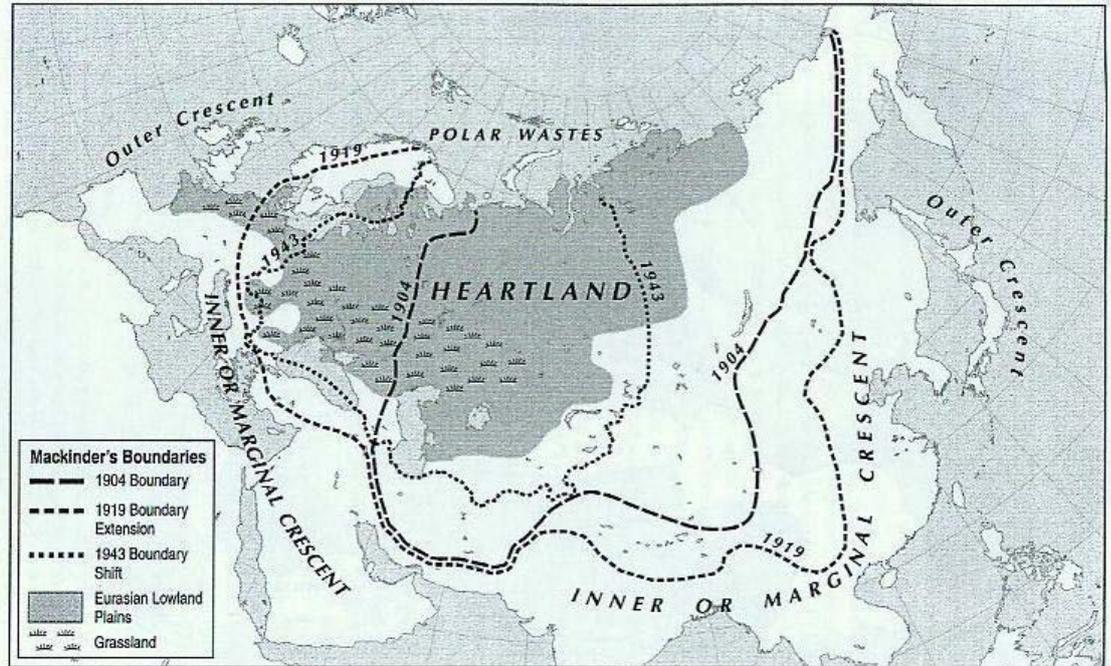


Figure 2.4. Changing Heartland Boundaries

資料來源：Cohen, *Geopolitics: The Ge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p. cit., p. 18

三極結構的概念發端後，在冷戰中期才因為受到區域主義(regionalism)的影響而有比較重要的發展，再加上冷戰的結束、歐盟的發展與中國崛起等國際重要局勢發展的加強，如今新古典地緣政治學的主要結構概念都是三極以上的多極結構。然而，無論是冷戰期間或冷戰後發展的多極結構概念，大多數還是可以看到麥金德在 1943 年文章的強烈影響。

(一)、大棋盤(Grand Chessboard)與第二世界(The Second World)

布里辛斯基的「大棋盤」概念主張歐亞大陸在冷戰後仍是全球權力平衡最重要的舞台，但出現五個具有能力及國家意志在其國境之外運用其實力或影響力，去改變現有地緣政治事務的主要「地緣戰略玩家」(Geostrategic Player)：俄羅斯、中國、法國、德國、印度，並用同樣的邏輯排除英國、日本、印尼作為地緣戰略玩家的地位，同時還設定烏克蘭、亞塞拜然、南韓、土耳其和伊朗等五個扮演地緣政治極重要的樞紐角色的「地緣政治樞紐國家」(Geopolitical Pivot)。¹²雖然布里辛斯基以能力和國家意志作為區分大國是否夠資格成為地緣戰略玩家的標

¹² Zbigniew Brzezinski, *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7), pp. 40-41.

準，但五個玩家無論是在領土、人口、軍力、經濟與國際政治影響力等的差距卻非常巨大。

布里辛斯基顯然只是與結構現實主義一樣，憑著一般的權力概念來決定其地緣政治結構或體系中的主要強國而不是提出一套嚴謹的劃分邏輯。這樣的結果便使其同樣落入混亂的劃分危機：歐盟雖然確實仍為美國在歐亞大陸的民主橋頭堡，但歐盟東擴之後的發展危機使德國與法國至少在 21 世紀初並沒有成為布里辛斯基內心希望的地緣政治玩家。而中國反而為了在亞太海洋地區的發展而在歐亞大陸保持低調的政治態勢，甚至與俄羅斯共組上海合作組織，反而在亞太海洋地區與美國有越來越多的衝突，使美國越來越重視原來根本不為布里辛斯基所設定為重要地緣政治對象的日本與澳洲。此種誤差，實為布里辛斯基與結構現實主義一樣只關注自然地理與軍事和經濟力量，沒有真正從地緣政治學研究國家戰略行為的結果。

另一個同樣受到麥金德影響的多極概念，是康納(Parag Khanna)對 21 世紀美國勢力衰退、歐亞大陸國家重新崛起與佔有世界領導權的三極結構。康納在**第二世界**(*The Second World: Empires and Influence in the New Global World Order*)一書中認為由於經濟全球化持續發展的緣故，21 世紀的國際社會將是由佔有西半球的美國與佔有歐亞大陸西部的歐盟，以及佔有東亞的中國等三個「極」所共同治理的三極體系，美國必須接納其不再是單極的事實，學會與其他強國共同治理國際社會。¹³在康納的三極結構中，麥金德的心臟地帶範圍更加縮小，只剩下包括阿富汗與巴基斯坦在內的中亞地區和中國的新疆與西藏兩個自治區，但康納並未否定心臟地帶的重要性，他還是承認心臟地帶由於位居歐亞大陸中部的的位置與豐富的天然資源，因此成為各主要強國確保能源安全的主要區域，特別是逐漸向亞洲伸展勢力的北約與中國領導下的上海合作組織之間的對峙。¹⁴康納的觀點圍繞著美國、歐盟與中國對他所謂「第二世界」國家的戰略競爭，第二世界國家遍佈東歐、高加索(Caucasus)、中東、東南亞與南美洲，它們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其所處的地理位置對三極的權力平衡具有相當的戰略重要性，或它們蘊藏對世界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豐富天然戰略資源與能源，因此這些國家的戰略決策(對三極的態度)能改變三極在全球的權力平衡。¹⁵

「第二世界」的美、中、歐三極概念似乎與美國戰略學者盧瓦克(Edward Luttwak)在 1990 年代初期提出的，大國會一改冷戰結束之前對地理環境的爭奪，改以爭奪與整合本國市場和北美、歐洲與東亞等三個對世界經濟發展最重要地區市場的「地緣經濟」(Geoeconomics)概念相符，¹⁶但事實上並非如此，康納甚至

¹³ Parag Khanna, *The Second World: Empires and Influence in the New Global Order*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8), pp. xv-xvi.

¹⁴ *Ibid.*, pp. 66-70.

¹⁵ *Ibid.*, p. xxii.

¹⁶ 盧瓦克的地緣經濟概念可參考 Edward N. Luttwak, "From geopolitics to geo-economics, Logic of conflict, grammar of commerce,"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20(Summer 1990), pp. 17-24, and Luttwak, *The Endangered American Dream: How to Stop the United States from Becoming a Third World Country and How to Win the Geo-Economic Struggle for Industrial Supremac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3)。相當可惜的是盧瓦克在提出地緣經濟概念之後並沒有接著發展，使得地緣經濟

完全沒有提及盧瓦克對地緣經濟概念的相關描述。「第二世界」比較屬於擴大化的邊緣地帶概念，但康納認為三個「極」對這些地區的爭奪已經不再是軍事與政治的直接控制，而是藉由政治制度與區域經濟整合來吸引這些國家成為其勢力範圍，因此維持三極權力平衡的真正要素是不斷深化的經濟全球化與互賴，儘管他也意識到光靠全球化不足以真正穩定體系，因為無論如何整合，體系中總是存在嚴重的不公正與政治階級秩序，形成衝突的根源。¹⁷康納特別重視中國崛起，認為中國不像歐盟那樣面臨許多整合問題，持續高速經濟成長使其成為「極」的前景比歐盟更光明，但他也意識到中國的崛起對美國和歐盟都是戰略威脅，因為中國在歐亞大陸的位置可以挑戰歐盟向心臟地帶伸展勢力，又可藉由強調外交協調與經濟整合的「中國門羅主義」(Chinese Monroe Doctrine)吸引東南亞國家進入其勢力範圍，從而阻止美國介入東亞區域整合，使美國失去對東亞邊緣地帶的影響力，進而達到其保護南海海上交通線的目的。¹⁸康納相當清楚中國崛起並不一定會導致其與俄羅斯之間的衝突，因為俄羅斯已經不是「極」，而中國和東亞國家非常關注海上交通線的安全，反而可能威脅美國在東亞的利益。

康納的觀點提醒吾人全球化的不可忽視之處，以及由於時代的改變，自麥金德以來的許多區域的戰略重要性與地緣政治概念顯然有變更的必要，否則難以精確討論當代真正的地緣政治地圖。然而康納太過重視經濟全球化對地緣政治的衝擊，而且他對「極」的勢力範圍分析和戰略行為不重視歷史與戰略文化對「極」的戰略行為的影響，結果使其預測與布里辛斯基同樣失真，特別是在東亞的部分，他過於相信中國的區域經濟整合以及協調外交對東南亞國家的影響力，認為南海是中國海洋「微笑外交」生效的最佳例證，顯示中國越來越瞭解如何在南海不依靠武力或強制手段而能達到其目標，¹⁹然而 2009 年以來中國在南海問題上的強硬作風不僅使康納認為與中國友好的馬來西亞與新加坡開始重新拉攏美國勢力，越南、新加坡、馬來西亞在 2009 年之後大肆購買武器的行為也與康納認為南海問題不會引起軍備競賽的主張大相逕庭，²⁰東協更在 2010 年同意美國加

沒有成為一個新的地緣政治學理論，仍舊停留在粗淺的概念範圍，瑪瑪多赫甚至認為地緣經濟學只是新古典地緣政治學的孿生姊妹而已，V. D. Mamadouh, "Geopolitics in the nineties: one flag, many meanings," *GeoJournal*, Vol. 46, No. 4(December 1998), p. 239。因此，一般在提到經濟學與地緣政治學的學科整合理論時也還是以世界體系理論為主。

¹⁷ Khanna, *The Second World: Empires and Influence in the New Global Order*, op. cit., pp. xxi-xxiii.

¹⁸ *Ibid.*, pp. 260-262.

¹⁹ *Ibid.*, p. 298.

²⁰ 例如越南在 2009 年 12 月與俄羅斯簽署購買協定，購入六艘基洛級(Kilo)潛艦與 12 架 Su-30MK2 長程戰鬥攻擊機，後者預定在 2011-2012 年間交付，其背後的考量顯然是為了應付中國在 2009 年以來展示的前進防禦能力和戰略，"Vietnam Buys Russian Kilo Class Subs, Su-30 Fighters, Nuke Plant," *Defense Industry Daily*, March 31, 2010, <http://www.defenseindustrydaily.com/Vietnam-Reportedly-Set-to-Buy-Russian-Kilo-Class-Subs-05396/>；此外，即使在康納著作出版前，東南亞主要國家的海空軍備擴張也早已不是新聞，其中主要是馬來西亞先後在 2003 年至 2004 年間，從俄羅斯購入 18 架 Su-30MKM 戰機，以及從法國購入兩艘天蠍級(Scorpène class)潛艦，可參考 Sam Bateman, "The Emergent Maritime Future of the Asia-Pacific Region," in Lawrence W. Prabhakar, Joshua H. Ho, and Sam Bateman eds., *The Evolving Maritime Balance of Power in the Asia-Pacific: Maritime Doctrines and Nuclear Weapons at Sea* (Singapore: Institute of Defence and Strategic Studies and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2006), pp.

入原先無法參與的東亞高峰會(East Asia Summit)，²¹有了介入東亞整合的正式管道。康納的預測失敗，無疑是過於相信全球化力量、忽視地緣政治因素，又沒有深入分析中國地緣戰略的結果。

(二)、區域主義地緣政治結構理論

地緣政治結構概念在科恩的理論中有迄今最完整的發展，其從 1963 年就開始發展地緣政治結構理論，將結構與單元分開，認為結構主要由兩種地理條件組成：「地緣政治模式」(Geopolitical Patterns)與「地緣政治特徵」(Geopolitical Features)，前者指地緣政治單元的形狀、大小、自然與人文地理特徵，以及結合這些地理條件，使每個地緣政治單元有別於其他單元的網絡；後者則指政治地理的節點(nodes)、面積與邊界等可幫助地緣政治單元增強其獨特性，並影響其內聚性(cohesiveness)的條件，包括：歷史發展核心(Historic Cores)、首都或政治中心(Capital or Political Centers)、人口及經濟發展精華區(Ecumenes)、可供經濟持續發展與人口穩定增長的實際國家或區域領域(Effective National Territory or Effective Regional Territory)、可提供防衛縱深或天然資源的荒蕪地區(Empty Areas)、邊界(Boundaries)，以及不服從核心的不一致區域(Nonconforming Sectors)。²²換言之，結構是由具有不同地緣政治模式與特徵的個別單元共同組成的整體概念，而單元依照其對結構的重要性，分成三個階級式(hierarchy)層次：

最上層為對結構的運作有支配性影響力的「地緣戰略領域」(Geostrategic Realm)，其定義為「世界中某個足夠大的區域，它擁有全球影響力的功能與特色以服務組成它的主要強權、國家和區域。其架構是由連結內人員、貨物、理念的循環地緣政治模式所形塑，並經由控制具有戰略重要性的海陸戰略通道，將這些模式而成」。²³地緣戰略領域概念深受海陸二元性質的影響，因為其最主要的依據是這些地區受海洋與陸地等自然條件的影響程度，²⁴由此可看到科恩繼承古典地緣政治學以來的基礎概念，也因此在其模型中，當代地緣政治結構包含三個領域(圖 3.2)：以俄羅斯為主、受陸地影響遠超過海洋的「歐亞大陸領域」(Eurasian Continental Realm)；以中國為主，同時受到海洋與陸地影響的與「東亞領域」(East Asia Realm)；世界其餘部分則劃歸主要依靠海權力量所形成的「貿易—依賴海洋領域」(Trade-Dependent Maritime Realm)。

中層則是「地緣政治區域」(Geopolitical Region)，是由「地理連續性、政治、文化、軍事之間的互動，可能還加上擁有類似歷史與民族的歷史性移民與混居所形塑」。大多數地緣政治區域受地緣戰略領域的支配，但也可以是完全獨立且具備在未來發展成為另一個地緣戰略領域的潛力，例如南亞地緣政治區域。²⁵最下

244-246.

²¹ "US, Russia to join EAS group," *The Strait Times*, July 20, 2010, http://www.straitstimes.com/BreakingNews/SEAsia/Story/STIStory_555712.html.

²² Saul B. Cohen, *Geopolitics: The Ge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9), pp. 35-36.

²³ *Ibid.*, p. 37.

²⁴ *Ibid.*, p. 34 and 37.

²⁵ *Ibid.*, pp. 40-42.

層則是民族國家、半國家、自治領等單位。此外，還有不屬於任何層級，但具有重要戰略價值，卻因嚴重的內部分裂而捲入支配地緣戰略領域的超強之間戰略競爭的「破碎帶」(Shatterbelts)、具備連結不同地緣戰略領域之間橋樑功能的「通路國」(Gateways)、以及比破碎帶有更嚴重的內部分歧，和受到鄰近區域與國家更多外部干預，使其內部動亂比破碎帶更為嚴重的「聚合區」(Convergence Zones)。²⁶

圖 3.2 科恩的當代地緣政治結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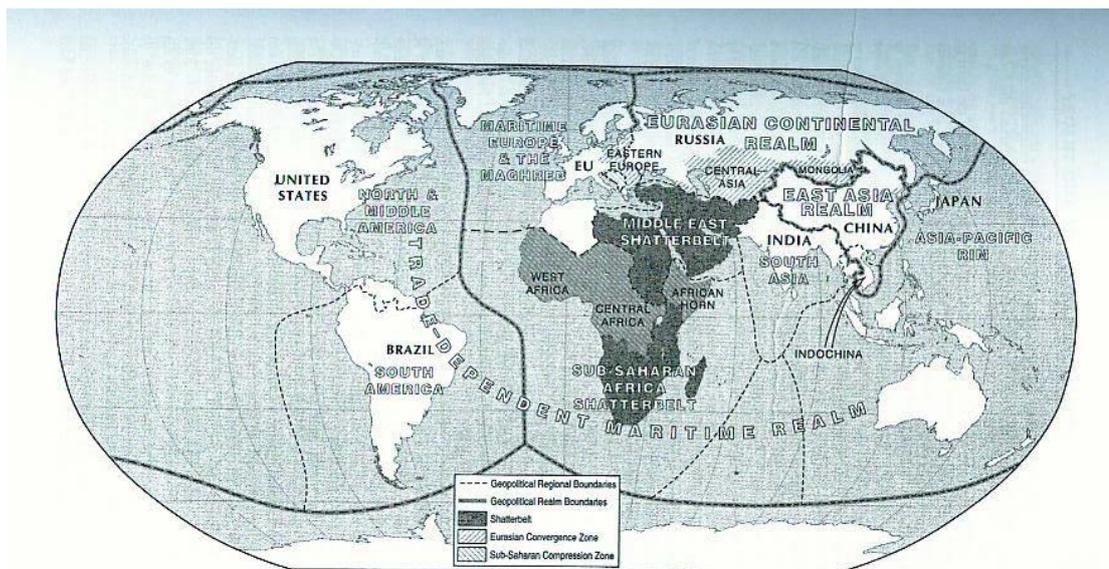


Figure 3.1. The Geopolitical World: Beginning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資料來源：Cohen, *Geopolitics: The Ge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p. cit., p. 41.

地緣戰略領域、地緣政治區域、破碎帶、聚合區的概念來自地質學的地球板塊構造理論(Plate tectonics)，科恩認為領域與區域都是覆蓋地表的板塊，只是領域是主要板塊，區域則是中型板塊；聚合區則是板塊的交接帶，它可以因為板塊活動的變化(相互碰撞或合為新板塊)而出現或消失；至於介於領域(主要板塊)之間的破碎帶可能會因為許多獨立板塊的運動而變得更加破碎，成為新的聚合區，但也可能完全被領域所吸納。²⁷

儘管科恩提出遠比布里辛斯基與康納兩人更嚴謹的地緣政治結構模型，且其模型由於擁有相當精密與層次分明的政治地理分析，對於地緣戰略研究有相當高

²⁶ *Ibid.*, p. 33. 不過馬漢、英國地理學者費爾格理夫等人亦曾針對破碎帶提出解釋。馬漢在 1900 年認為破碎帶指的亞洲地區介於北緯 30 度至 40 度之間的區域，這是英國與俄國的強烈競爭的區域，請見 Mahan, *The Problem of Asia and Its Effect upon International Policy*, op. cit., pp. 21-26。另外，費爾格理夫在 1915 年使用的名詞是「衝突區」(Crush Zone)而非破碎帶，不過意思接近，他認為這種區域指的是介於海權與歐亞大陸心臟地帶之間的小型緩衝區，其範圍大致從北歐與東歐往南和往東延伸，經過巴爾幹半島(Balkan)、土耳其、伊朗，直到暹羅與朝鮮半島。

²⁷ *Ibid.*, p. 36.

度的創新與適用性，²⁸但其地緣政治結構模型仍有三個不足之處與缺陷。

第一，科恩沒有說明地緣戰略領域到底是如何形成的，是什麼原因讓其特別不同於地緣政治區域，以及這個結構中最高層次的單元在結構中的戰略重要性。

「足夠大的區域」與「具備全球重要性」這兩個概念非常模糊，從科恩認為冷戰後的國際關係本質已經不再是敵對與競爭，和平依賴主要國家之間的合作等觀念可知，²⁹他對領域的劃分雖然仍保有麥金德與馬漢以來的海陸二元性基本地緣政治本質，但已經跳脫古典地緣政治學的對抗性，在這種情形下，假使中國與深受其政治影響的北韓、越南、寮國與柬埔寨具備成為東亞地緣戰略領域的資格，何以科恩劃分的以歐盟為核心，包含西北非的「海洋歐洲與馬格理布地緣政治區域」(Maritime Europe & The Maghreb)不能成為領域？這個地緣政治區域的面積並不比東亞小，且同樣具備全球戰略重要性。事實上，根據科恩自己對地緣戰略領域的概念與定義，他曾提到一個能夠作為領域與區域之間的邏輯區分，亦即領域的架構必須藉由控制具戰略重要性的海陸交通要道而組成，但地緣政治區域則並不具備這樣的組成要求。然而科恩並未進一步運用這個邏輯，來解釋哪個國家因為控制了哪些重要的海陸戰略要道，故能形成地緣戰略領域。³⁰

第二，科恩對國家力量等級與結構形式的劃分，因為他未妥善處理權力與地理之間的關係，而展現出比結構現實主義更大的混亂。屬於最高分析層次單元的地緣戰略領域看起來似乎就是他的結構模型中的「極」，而結構的形式依據地緣戰略領域的數目而定，故科恩在分析東亞領域時即表示當前全球均衡已經不再是海陸兩極權力平衡，而是三極基礎。³¹但是科恩在對結構中的國家實施層級劃分時，他將國家力量等級分為五級，第一級的「主要大國」(Major Power)卻包括美國、俄羅斯、歐盟、中國日本與印度，其中除了印度之外的五國被他稱為三大地緣戰略領域的核心國家，而印度能躋身主要大國的原因是它身為獨立的南亞地緣政治區域(正步向「南亞領域」(South Asian Realm)的發展道路)的核心國家。³²

於是，科恩的結構模型似乎就將地理與權力分開處理，各種單元就是單純的政治地理單元而非具備權力政治意涵的地緣政治單元。如上所述，科恩完全沒有解釋主要大國與領域之間的關連性和對結構的戰略價值差異性何在，領域很容易讓人理解為組織此一單元的強國的勢力範圍，但是他的結構模型對每個領域的處理又沒有展現出符合此一理解的一致的標準—不可能認為整個貿易—海洋領域都屬於美國的勢力範圍，可是對於東亞領域，他的劃分標準似乎又是中國在政治上能夠發揮強大影響力的國家與地區，因此包括北韓、越南、寮國與柬埔寨等國，但卻沒有包括他成書時還與中國關係相當密切的緬甸。³³如此一來，很容易令人混淆他的結構究竟與權力政治結構之間的差異。

²⁸ Mackubin Thomas Owens, "In Defense of Classical Geopolitics,"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 52, No. 4(Autumn 1999), pp. 70-72.

²⁹ Cohen, *Geopolitics, op. cit.*, p. 47, p. 57, and pp. 85-87.

³⁰ *Ibid.*, pp. 37-40.

³¹ *Ibid.*, p. 293.

³² *Ibid.*, p. 47.

³³ *Ibid.*, p. 39.

相較之下，布贊與威佛兩人所提出的「區域安全複合體理論」便展現出真正嚴謹的劃分邏輯：以國家是否具備能在全球體系中發揮強大影響力的能力，搭配傳統的政治、軍事、經濟權力要素，作為決定國家為超強(Superpower)、強權(Great Power)與區域大國(Regional Power)三級的標準，於是冷戰時期的美國與蘇聯為兩大超強，但到了冷戰後只剩下美國為超強，至於中國、俄羅斯、日本、歐盟都同為強權，但強權還可區分為有無潛力升級為超強者；³⁴另以區域本身的無政府狀態結構(anarchic structure)與衍生而出的權力平衡關係，以及區域國家間的地理距離(geographic proximity)作為劃分區域安全複合體的兩大變數。³⁵布贊與威佛依此劃定全球整體體系結構為「一個超強+四個強權」(1+4 System)與區域安全複合體的數目，以及複合體內的權力結構。³⁶科恩在這方面顯然遠不如布贊與威佛。

第三，科恩重視地緣政治區域勝過對國家的重視，因此他從冷戰期間(1973)就認為基於區域整合所出現的新國際權力中心(例如歐盟)，能夠打破兩極結構中嚴重軍事對峙，使國際體系逐漸呈獻出一種均衡的多極結構。而冷戰後，國際軍事與意識型態對峙不復存在，區域整合更為廣泛與發達，大國之間為了爭奪權力而發生戰爭的可能性已經不存在，但整個體系的均衡之所以不穩定係肇因於大國勢力範圍重疊、貿易的擴張等諸多非傳統安全威脅，而體系自身的平衡機制卻未必總是相應發生來調整體系的均衡狀態，因此全球體系的穩定有賴於主導體系的主要國家在聯合國等大型全球或區域國際組織中的協調，來共同應付非傳統安全的新威脅。³⁷然而無論是對地緣政治結構或地緣政治體系，科恩都沒有設定結構或體系如何影響國家行為的變數，當然也無法得知結構或體系對國家行為的影響力何在，因此研究者很難像運用結構現實主義那樣，從科恩的地緣政治結構模型中得知哪些變數會在不同層級影響國家行為，或哪些結構變數會影響結構或體系的穩定。而且他雖然指出均衡的動態概念不同於世界體系理論的靜態「世界秩序」概念，可是因為他將權力政治與地緣政治結構分開處理，故忽略了說明均衡與另一個常被用來描述國際體系穩定的結構手段—「權力平衡」之間的差異，後者也是地緣政治中一種極為動態且重要的概念。

(三)、交通線控制與地緣戰略

在「強權與地緣政治變遷」(*Great Powers and Geographical Change*)一書中，格利吉爾與科恩相反，他不追求提出一般性的地緣政治理論或發展適用於任何一個時代的地緣政治結構模型，但他的分析層次完全以地緣政治學的動態特性為基礎：按照變動速度的快慢，設定了地理、地緣政治與地緣戰略三個分析層次。格利吉爾基於兩個理由而對地理並沒有太多著墨，首先是因為這一層次的變動速度最為緩慢，其次則是每個地區的地理特徵都是獨特的，既然他不追求建立一般性的模型或理論，則只需要在進行個案研究時展開政治地理分析即可。比較重要的

³⁴ Barry Buzan and Ole Wæver, *Regions and Powers: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34-37.

³⁵ *Ibid.*, p. 45.

³⁶ *Ibid.*, pp. 37-39, Map 2 at p. xxvi, and Table 1 at p. 62.

³⁷ Cohen, *Geopolitics, op. cit.*, pp. 57-59.

是地緣政治與地緣戰略。格利吉爾對地緣政治的概念如第一章的定義中所示，是世界上資源分佈中心與連接這些中心的交通線(lines of communication or routes)之間的分佈結果，他選擇這兩個變數作為地緣政治的主要組成，因為資源中心(可分為經濟性與天然資源兩大類)乃是國家權力的最重要來源之一，而交通線則同時是各種國際活動發生，以及國家投射權力和獲得資源的媒介。³⁸易言之，交通線的控制與麥金德國家政治行為絕大多數受經濟與地理兩外在驅動力影響的主張相符，是一個同時能呈現兩種不同行為目的的戰略目標。地緣政治的變化也就是這兩個變數發生變化的時候，儘管速度相當緩慢，但無時不在發生，不過不會在一夕之間，經由某個災難性的事件就發生變化。³⁹

因此國家的地緣戰略必須隨當代的地緣政治局勢而制訂，否則將使國家蒙受慘重損失，⁴⁰格利吉爾利用對威尼斯、鄂圖曼土耳其與明朝等三個古代大帝國的地緣戰略發展來驗證此一假設，並認為美國應體認到從冷戰結束開始，世界地緣政治局勢就開始發生一項至今仍在持續的改變－中國崛起與心臟地帶的衰弱，美國真正的戰略對手已經變為中國，真正的戰略重心也轉移到亞太地區，因此美國的地緣戰略應該隨著地緣政治局勢的變化而調整，全力維持美國在當地的海空優勢。⁴¹格利吉爾認為基於下述三個理由，全球化並未降低這兩個變數對國家地緣戰略的影響：全球化之下的經濟互賴反而加深了國家與遙遠地區的連接關係；全球化並不代表貿易可以發生在虛擬世界，各種物品的交易實際上都還必須依靠交通線的運輸才能達成；今日基於海洋自由所達成的經濟全球化，實際上是美國身為海洋霸主的緣故，是美國控制全球重要海上交通線的結果，沒有美國的海上霸權，類似世界貿易組織之類的國際建制並不能保證世界貨物的順利流通。⁴²因此地緣政治仍然是當代國際政治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

格利吉爾的三層次動態分析對於地緣戰略研究具有相當的啟發性，尤其其他一再強調僅靠地理與地緣政治並不足以完全決定國家的地緣戰略本質與走向，後者還受到許多與地緣政治無關的國內政治因素的影響，例如意識型態、利益團體甚至決策者的個人偏好。由這一點來看，格利吉爾的地緣政治概念是較為偏向古典地緣政治學的類型，沒有意識到國內因素也是地緣政治因素的種類，意識型態、利益團體對外交政策的影響都帶有它們本身對國家的地緣政治密碼的不同解讀，因此他才會表示地緣戰略是對國家外交政策動力的描述，並不涉及決策動機與過程。⁴³此外，交通線控制的概念也使研究者能進一步思考地緣政治學與現實主義典範之間的融合問題，空間的控制是政治體系存在的必要條件，其喪失必然危及政治體系的生存與發展，因此對特定空間的控制即為國家維持其生存的主要途徑。現實主義所謂國家追求權力的目的在於國家安全，其地緣政治意涵也就在

³⁸ Jakub J. Grygiel, *Great Powers and Geographical Change* (Baltimore, Maryland: The John Hopkins Press, 2006), pp. 26-27 and 30-32.

³⁹ *Ibid.*, p. 25.

⁴⁰ *Ibid.*, p. 23, Table I.

⁴¹ *Ibid.*, pp. 167-176.

⁴² *Ibid.*, pp. 165-166.

⁴³ *Ibid.*, p. 22.

此，權力必須轉換為能控制空間的能力才有意義。如此一來，僅在理論上而言國土安全對國家安全的威脅就不是影響國家戰略行為的最主要因素，國家還會關注遠離邊界的資源與國際交通線控制議題，因為工業發展所需的資源變得與領土一樣重要，是國家權力要素的重要來源。

據此邏輯，格利吉爾抨擊威脅平衡論只關注對國家本身威脅的觀點，國家勢必還會對攸關其生存的交通線與資源生產地的威脅做出反應。此外，現實主義典範對權力要素的增長概念其實相當類似封閉體系中的有機體－幾乎完全依賴自身的機制增強權力，很少考慮或忽略國家如何在自身資源不足的情況中從外部環境增加權力，以及資源與國家權力之間的相對關係，從理論觀點來說這導致攻勢現實主義與攻守理論等現實主義修正理論所主張的自給自足島國國際結構穩定論出現與現實的嚴重誤差－根本不可能有這樣的國家或國際結構存在，即使主要強國均為島國，也會因為封閉體系導致無法補充消耗的能源而衰退，在這種情況下強國若欲維持原有的地位而被迫向外尋求新的資源來源，結果又導致水體的阻隔與穩定能力被打破，致使這樣的理論出現解釋缺口，⁴⁴而且從現實而言也很難解釋許多無關領土安全的國際戰爭或國家戰略行為，因為依現實主義的結構邏輯，大國在遠離本土的地區所發起或參與的衝突，不僅對國家安全來源的權力大小並無實質影響，而且也無助於維持國際權力平衡。⁴⁵

格利吉爾真正的問題在於，由於他為了避免落入地理決定論的陷阱而一直迴避建立較完整的一般性理論或結構模型，這使得他雖然提出重要但常被忽略的地緣政治與戰略概念，但沒有完整的結構概念使其分析無法指出這些分析對象為何選擇某一類型的地緣戰略，而且使其精密的分析陷入一種邏輯錯誤，特別是當他分析明朝的地緣戰略時，沒有注意到這三個古代帝國都是處於「區域」國際體系與結構中，「世界」體系與結構在當時根本沒有發展成形，或許有交通線連接這些區域地緣政治體系，但一如布贊所指出的，這些交通線之上的「互動」密度還沒有高到能將這些區域融合成新的結構與體系。⁴⁶因此，特別在明朝的個案中，假使沒有注意到這個細微但宏觀的差別，就會難以解釋為何其地緣戰略並未隨著地緣政治局勢的變化而改變。

三、世界體系理論與單極地緣政治結構

以單極作為主要理論研究對象的地緣政治結構理論是華勒斯坦(Immanuel M. Wallerstein)的世界體系(World System)理論與摩德爾斯基(George Modelski)的歷史長週期(Long Cycle)理論。二者都不是完全的地緣政治學理論，但都被引用為地緣政治學結構理論，而且主要的理論重點在於都提出國際政治與經濟史上霸權

⁴⁴ *Ibid.*, p. 19.

⁴⁵ John J. Mearsheimer, "Hans Morgenthau and the Iraq War: Realism Versus Neo-conservatism," *OpenDemocracy*, May 18, 2005, http://www.opendemocracy.net/democracy-americanpower/morgenthau_2522.jsp.

⁴⁶ Barry Buzan, "Beyond Neorealism: Interaction Capacity," in Barry Buzan, Charles Jones, and Richard Little eds., *The Logic of Anarchy: Neorealism to Structural Re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74.

崛起與衰退對世界體系秩序影響的長循環週期。

(一)、世界體系

華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認為「體系就是世界」，因此其理論內涵是研究資本主義經濟世界中的國家戰略行為，以及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擴張。華勒斯坦強調資本主義是維持世界體系的主要工具，而世界秩序則由核心國家—半邊陲國家—邊陲國家(Core States-Semi-periphery States-Periphery States)的三級經濟分工來維持，核心國家由於在生產力、貿易與金融等三大經濟要素與制度面上佔據支配地位，因此具備能制訂整個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中的遊戲規則，故屬於體系中的霸權，荷蘭、英國、法國、美國都曾是或現在是核心國家；而半邊陲國家既是被核心國家經濟剝削的對象，同時也是剝削邊陲國家的中間層級，由於他們的存在才串連起資本主義在核心與邊陲國家的運作，俄國、中國即屬於半邊陲國家；最後，邊陲國家是那些只能向核心國家和半邊陲國家提供原料與廉價生產力的國家，經濟上的不平等使他們完全無力反抗來自核心與半邊陲國家的剝削。華勒斯坦認為這三個階層不是固定不動的，不過由於核心國家不只一個，因此彼此之間隨著生產力與對世界體系中貿易和金融的支配力量的此消彼長，會為了爭奪世界的資源、對邊陲國家的經濟支配和世界體系的霸權而爆發衝突，爾後隨著戰爭的結果，不同的核心國家取得霸權地位，重新支配包括其他核心國家在內的所有世界體系成員，而產生新的世界秩序，此即霸權循環週期。⁴⁷

艾格紐與諾克斯(Paul Knox)在《世界經濟的地理學》(*The Geography of the World Economy*)一書中為了以地緣政治學詮釋世界體系理論時引入了地緣政治學強調的地理控制概念，提出六點當代世界經濟體的基本特徵：第一是世界經濟體由一個單一世界市場組成，生產的目的在於交換而非使用，生產者為了獲得最好個價格而交換商品，價格的不固定導致激烈的競爭，更有效率的生產遂能打敗其他生產者而達到全球性的壟斷控制；第二，支配整個世界體系的「世界帝國」(world-empire)不可能產生，因為國家是以領土劃分而存在，核心國家很難對整個體系的所有國家實施直接政治控制；第三，華勒斯坦世界體系理論中的核心國家—半邊陲國家—邊陲國家三層次地理結構與其層次之間的運作過程確實存在；第四，世界經濟體遵循在一段時間內成長和衰退的經濟循環；第五，世界對於世界體系不是簡單的接受或屈服，而是抵制或適應，不同區域對世界體系的擴張有不同的反應，其關鍵取決於當地的政治文化組織系統對外部影響的抵制能力或適應能力；第六，世界上每一個地區與世界經濟體的演進之間，都各自擁有不同且獨特的關連性。⁴⁸

⁴⁷ 華勒斯坦的世界體系運作與核心國家特徵並沒有這麼簡單明確出現在其巨著中，更詳細的世界體系觀點，可參考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system: I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4);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system: II Mercantilism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1600-1750*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0);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system: III The Second Era of Great Expansion of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 1730-1840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9).

⁴⁸ Paul Knox and John Agnew, *The Geography of the World Economy* (London; New York: Edward Arnold, 1989), pp. 84-85.

從以上的六大特徵可看出，艾格紐與諾克斯認為世界經濟體由於強調經濟力對國際秩序的主導，雖然其基本單元還是以民族國家為主，且民族國家在整個國際體系或國際社會中仍擁有樞紐地位，但隨著世界經濟越來越國際化，它們也不得不開始尋求合作，並在各種層面形成跨國整合，使得許多功能不同的區域性或全球性國際組織如雨後春筍般出現，而且重要性越來越高。⁴⁹這替全球地緣政治結構帶來最大的影響，就是科恩所指出的，由於新興工業國家興起，導致區域強權在世界經濟與政治上的戰略重要性大增，所導致的區域化與跨國整合。整合的結果對核心國家來說顯然更有助於強化整個世界經濟體的發展，因為半邊陲國家的產業逐漸外移至邊陲國家，使得核心國家可以利用更精密的國際分工來從整合之後的世界獲得更高的利益，而半邊陲與邊陲國家為了維持與獲得經濟成長，只能屈服於核心國家的經濟支配。艾格紐與諾克斯承認整合之後的世界經濟體與科恩對世界地緣政治體系的描述相符，是一個高度階級化的地緣政治體系。⁵⁰

(二)、歷史長週期

與華勒斯坦不同，摩德爾斯基首先認為所謂的世界體系，從概念上而言就是一種用來觀察將世界的整體社會活動，以及用來研究區域、國家與局部三個層次的社會活動與世界範圍的互動之間關係的研究方法；其有形層面則可從世界的總人口數與不同地區之間的互動形式與密度來度量世界體系是否存在，以及其類型。⁵¹基於上述的條件，現代世界體系在西元 1500 年左右形成。世界體系一如所有的社會體系，總是包含政治次體系，在政治領域中，最重要的事情是領導地位的歸屬，對世界體系而言，領導國家的出現極為重要，它可提供五大體系不可或缺的功能：設定對體系穩定而言極重要的議程；動員體系內的國家或形成強大的聯盟以提供世界秩序必要的基礎；對體系的政治方向做出關鍵的決策；管理體系中的金融秩序、穩定國際匯率與提供可預測的商業政策等；最後，領導國家在科技上的研發與創新可使整個體系在科技上的進步，克服原來人類無法克服的障礙，使體系得到進一步的發展與繁榮。⁵²

摩德爾斯基在定義現代世界體系的形成年代之後，基於對此後歐洲與現代世界歷史的研究，提出國家爭奪體系內領導權的霸權循環的百年歷史長週期概念。此一長週期循環與華勒斯坦的霸權循環類似，但最大的差異在於領導霸權的權力基礎，華勒斯坦認為是經濟力量，摩德爾斯基則結合馬漢的歷史研究與 16 世紀以來的歐洲歷史研究，認為由現代世界體系是由全球的海洋所連接才形成的，⁵³因此世界體系的領導地位歸於擁有最強海權(在空權出現後，摩德爾斯基對海權的概念合併了空權)的國家，因為唯有擁有強大的海權才能擁有控制其他國家使用海洋的能力，才能擁有全球投射的能力，也才能在一場全球規模的戰爭中獲

⁴⁹ *Ibid.*, p. 339.

⁵⁰ *Ibid.*, pp. 341-342.

⁵¹ George Modelski, *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7), pp. 20-23.

⁵² *Ibid.*, pp. 14-15.

⁵³ George Modelski and William R. Thompson, *Seapower in Global Politics, 1494-1993* (Hampshire and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88), p. 4.

勝。故摩德爾斯基所定義的五個百年霸權皆為當代的海權強國，分別是 16 世紀的葡萄牙、17 世紀的荷蘭、18 與 19 世紀的英國，以及 20 世紀的美國，而挑戰霸權國領導地位的國家則分別是 16 世紀的西班牙、17 與 18 世紀的法國、19 世紀的德國，以及 20 世紀的蘇聯，全為擁有強大海軍艦隊的陸權國家。⁵⁴

歷史長週期理論雖然研究的時間幅度與華勒斯坦相當，但是摩德爾斯基強調海權對歷史長週期的重要性卻有一個明顯的破綻，即是在 19 世紀之前，所謂的「世界體系」實際上只是資本流動終於擴展到全球範圍，但政治上卻還未融為一個整體，統治中東與北非的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印度的蒙兀兒帝國、中國的明朝與清朝、日本、大部分的非洲地區實際上都沒有與歐洲國家建立密切的政治互動，而被視為霸權的葡萄牙、荷蘭與 18 世紀的英國，實際上只能算是當時歐洲西發利亞體系中而非全球體系中的霸權，甚至也未必是真正的霸權。不過摩德爾斯基的理論也再度證實，無論是在全球或區域地緣政治體系中，要成為體系內真正的強權不只要擁有強大的軍事與經濟實力，和相應的政治制度，最重要的還是能將政治、經濟、軍事等權力要素轉換為對體系內重要戰略交通線的控制。

本論文的地緣政治結構概念為了研究中國的地緣戰略及對亞太地緣政治均衡的影響，所提出的地緣政治結構概念必須符合下列四點需求：第一，具有明確且嚴謹的國家層級劃分邏輯，以確定中國在體系與結構中之地位，以及和其他主要強國的相對關係。第二，必須能作為地緣戰略產出的獨立變數，並與本論文另外兩個理念性變數—地緣政治密碼與戰略文化—結合，方便研究地緣戰略。第三，由於地緣戰略的研究基礎是海陸相對性質差異與精密的政治地理分析，必須能適用這些基本分析。

上述既有的地緣政治結構概念皆無法完全滿足上述三點需求：馬漢、麥金德等人的古典地緣政治結構模型雖然包含了地緣政治學如今仍持續運用的某些戰略概念，卻因時代的差異而不能完全適用；至於布里辛斯基則只是繼承了麥金德與馬漢的概念，以及美國的傳統地緣戰略觀，其結構概念沒有獨特的創新之處或嚴謹的概念與變數設定；科恩的地緣政治結構模型最為完整，特別是能滿足於第二點與第三點，不過其最大的缺點就是缺乏嚴謹的國家層級劃分邏輯。而格利吉爾的模型則與科恩相反，他只提出嚴謹的交通線劃分邏輯，但缺乏明確的模型建構。至於華勒斯坦、艾格紐與諾克斯的地緣政治結構模型，係根據經濟活動所發展的世界體系概念所建構，雖然是麥金德所重視的兩大國家對外行動動機之一，而且彌補了一般古典與新古典地緣政治學較忽略的經濟變數面向，但卻過於偏重經濟觀點而不近於一般的地緣政治學理論，對於上述三點要求皆無法滿足。故本章在第二節的模型建構過程中，將捨棄華勒斯坦、艾格紐與諾克斯的地緣政治結構模型，僅針對科恩與格利吉爾的模型進行整合研究結合，以提出適合建構本論文研究的地緣政治模型的變數與概念。

⁵⁴ Modelski, *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 op. cit., p. 40, Table 2.1.

第二節、本論文的地緣政治結構概念

本論文的模型首先以較為完整，且能運用於詳細政治地理分析的科恩的模型為基礎，保留科恩的地緣政治模式與地緣政治特徵兩種概念，以及地緣戰略領域、地緣政治區域、民族國家、破碎帶、聚合區與通道國等不同層次的地緣政治單元概念，這些單元概念有助於理解不同層次的單元對結構以及各主要行為者的不同戰略價值，並可與結構中各單元的海陸分佈、相對位置，與彼此間的距離等一起作為結構影響國家地緣戰略制訂的**單元層級變數**，以協助解釋結構此一物質基礎如何影響國家的地緣戰略基本形式以及戰略重心。而為了修正科恩模型中結構與國家權力界線不清、國家等級劃分不清，以及將權力政治與地緣政治分開處理，導致容易與現實主義權力政治結構發生混淆的缺點，本論文將加入格利吉爾的交通線控制概念，以國家對國際交通線的控制能力作為劃分國家等級的依據以及**結構層級變數**，主張唯有能控制結構中戰略交通線的國家才是真正的超強，結構形式視超強數目而定，戰略交通線地理性質則決定超強與領域的地緣政治屬性。此外，本論文還將修改地緣戰略領域的概念，主張地緣戰略領域係由結構中的超強藉由控制戰略交通線所組織，一個領域只包含一個超強，以避免科恩模型中的劃分邏輯混亂。

採用對結構中海陸戰略交通線的控制能力作為劃分國家等級的主要依據，首先是如布贊曾經指出，所謂的「全球體系」(Global System)在 15 世紀之後才逐漸形成，在此之前世界上有多個區域體系並存。⁵⁵此固然因為過去體系所允許的互動能力太低，導致區域體系間無法建立高密度的互動而融合為一個範圍更大的新體系所致，不過更精確而言，是在之前並未出現能控制全球戰略交通線的超強的緣故，只有當科技能克服阻隔不同區域體系之間密切交流的龐大自然地理障礙時，共享組織與規範才能隨之漸漸消除人為障礙，並產生全球結構與體系，⁵⁶在此之前，每個區域體系的超強都無法使其他區域體系接納自身建立的國際規範與政治秩序，當代全球體系乃是基於歐美列強獲得這樣的控制能力並以此擊敗其他反對這些國家所推行的政治經濟制度與國際規範後才得以出現。互動不僅僅是政治上的，也與華勒斯坦等人的世界體系概念有密切的關連性，在國家追求成為超強並建構屬於其本身的勢力範圍的過程中，提供強烈的經濟動機。而本論文根據這種基本歷史發展事實，進一步提出基於國際互動、控制能力與國力的關連性、交通線分佈與結構特徵的關係、控制能力與國家的地緣政治屬性密切相關，以及控制情況對國家的地緣戰略有重大影響等五個相互關連的原因，來強化此一劃分標準的適用性：

第一，國際交通線是國際互動的媒介，而與全球化的觀點相反，⁵⁷國際交通

⁵⁵ Barry Buzan, "Beyond Neorealism: Interaction Capacity," in Barry Buzan, Charles Jones, and Richard Little eds., *The Logic of Anarchy: Neorealism to Structural Re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74.

⁵⁶ Buzan, "Beyond Neorealism: Interaction Capacity," *op. cit.*, p. 74.

⁵⁷ Barry Buzan and Ole Wæver, *Regions and Powers: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7.

線的控制仍是國際安全的重要基礎，不僅因為這是國家能否順利向外投射權力至戰略重心地區的基本條件，也在於強國所偏好的標準地緣政治程序仍然壓過中小型國家安全所依賴的替代程序，⁵⁸而且任何國家欲建立一套國際秩序，都必須滿足控制國際交通線的先決條件才能達成。

第二，國際交通線涵蓋範圍相當廣泛，不是每個國家都能對交通線進行控制，必須具備異常強大的國力才能遂行控制，而且控制的程度也會因為能力高低而有所區別，因此可依國家對國際交通線的控制能力區分國家在結構中的等級。

第三，國際交通線的分佈和路線途徑精確反應出特定時代地緣政治結構中的精華區、政治中心、資源分佈區、戰略要地等制訂地緣戰略時必須詳加注意的各種重要戰略目標的相對位置，必須經由三種地緣政治力量同時經年累月的運作才會發生緩慢的變化；國際社會的政治與經濟運作制度的長期變化導致地緣政治結構核心區的改變；重要戰略能源與資源分佈區的變化改變精華區與交通線的分佈；氣候或科技的變遷致使新的戰略交通線出現，⁵⁹然而一旦發生變動，亦代表科恩所謂的地緣政治結構模式已發生變化，結構形式亦將隨之產生改變。

第四，控制處於不同地理介質的交通線需要不同且很難互換的控制能力，因此由結構中戰略交通線的控制情況即可得知是否存在地緣戰略領域、其數目與地緣政治屬性，有助於劃分結構形式並瞭解各國的戰略目標所在。

第五，為了控制國際交通線而向外投射的力量，其效果隨著距離的增加而呈現效用遞減現象，⁶⁰再加上交通線控制經常是透過控制交通線流通狀況的間接控制而非真的控制交通線本身，尤以海上交通線的控制更是如此，因此交通線的控制經常處於相對狀態，非常容易受到其他國家因為力量或立場的變化所形成的威脅，使得對國際交通線的控制經常受到侵蝕，影響各國的地緣戰略。

然而何謂交通線控制？何以交通線控制對地緣政治結構的發展有莫大的影響，並與體系的均衡密切相關？又為何本論文認為交通線控制能力可決定國家在結構中的等級？下文首先將針對交通線的類型作區別，繼之分析控制的方式、類型與程度，以為進一步回答這些問題的基礎。

一、交通線的類型

除了將交通線分為國內與國際兩種基本類型之外，還可依交通線所處的地理環境，可將其分為空中、海洋與陸地等三種，未來也許還會有太空交通線。一般

⁵⁸ Parker, *Geopolitics*, *op. cit.*, p. 166.

⁵⁹ 由於人類有清楚紀錄的歷史相對於地理時間而言極為短暫，因此氣候變遷導致交通線分佈出現變化的個案甚少，但當代正在經歷一次可能因為氣候變遷而導致交通線分佈出現重大變化的個案，亦即因為北極海夏季永凍冰層變薄，使船隻在未來可能直接經由北極海，循距離最短的「大圓航線」往來歐洲、北美與亞洲之間。不過這一改變的速度極為緩慢，而且其長期趨勢是否會導致這樣的預測成真仍不清楚，不過有關國家，包括中國在內，都已經開始投入北極海航線的相關工作中，可參考 Linda Jakobson, "China Prepares for an Ice-Free Arctic," *SIPRI Insight on Peace and Security*, No. 2010/2, March 2010, <http://books.sipri.org/files/insight/SIPRIInsight1002.pdf>.

⁶⁰ 關於距離對國家權力的影響，請參考 Patrick O'Sullivan, *Geopolitic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6), pp. 53-68 and Figure 5.1-5.13.

說來，陸上交通線以鐵路、公路、河流航道等三種類型為主，不過格利吉爾亦將輸油管歸為交通線，⁶¹因為油管能迅速且大量地輸送石油，且有明顯的起點和終點。因此陸上交通線有明確與具體的路線，依賴陸上交通線移動的人員、貨物與軍隊很難隨時離開固定的交通線路徑而仍能維持相同的移動速度與運輸量。但空中交通線則不然，飛機可在天空隨意移動，因此不存在具體的路線形式，只有抽象的航道座標與大致上的方向。海上交通線的性質則介於空中與陸地之間—船隻在沒有天然障礙的廣闊海洋上雖然有無數的航行選擇，但船隻無法直接越過陸地，因此會因為海洋與陸地的相對分佈而必須通過海峽或運河才能由一個海域前往另一個海域，且在淺海地區還必須避開容易擱淺或觸礁的地區，因此海上交通線雖然無具體的路線形式，但還是具有一定程度的路線概念。

國際交通線的戰略價值視其所連接的目標與能擔負的運量大小及功能而定。能同時滿足連接結構的核心區，以及連接核心區與主要的戰略資源與能源的生產地區，又能擔負大量運輸功能以作為軍事力量投射時主要路線等條件的交通線，即為本論文所謂的「結構層級戰略交通線」（後續簡稱戰略交通線）。依此標準，只有陸地與海洋交通線具備成為戰略交通線與決定地緣戰略領域的地緣政治屬性的資格，空中交通線雖然為極重要的交通工具，空權也是國家不可或缺的武力，但因為運輸能力遠不如前兩者而不具備成為戰略交通線的資格，本論文往後所討論之戰略交通線控制皆限於海上與陸上交通線。

全球地緣政治結構的戰略交通線皆為洲際性，因此最主要的是擔負全球 90% 以上貿易運輸量的海上交通線，⁶²根據下圖 3.3，目前全球運輸量最大的海上交通線共有四條：第一是連接北美與西歐的跨大西洋海上交通線；第二則是連接北美與東北亞的跨太平洋海上交通線，其在東太平洋可分成北美西岸至東北亞與北美東岸經巴拿馬運河(Panama Canal)至東北亞等兩部分)；第三條海上戰略交通線則是橫跨印度洋北部，並由紅海經蘇伊士運河(Suez Canal)進入地中海至歐洲的海上交通線，其最重要的地位在由中東分別通往東亞與歐洲的遠洋海上石油運輸。第四條則是由東北亞的華北、日本與南韓，經黃海、東海與南海至東南亞甚至澳洲的東亞海上交通線，這條海上交通線的重要性並不僅限於由印度洋而來的海上石油運輸，亦負擔東北亞與東南亞之間各種商品在生產地與市場之間的運輸任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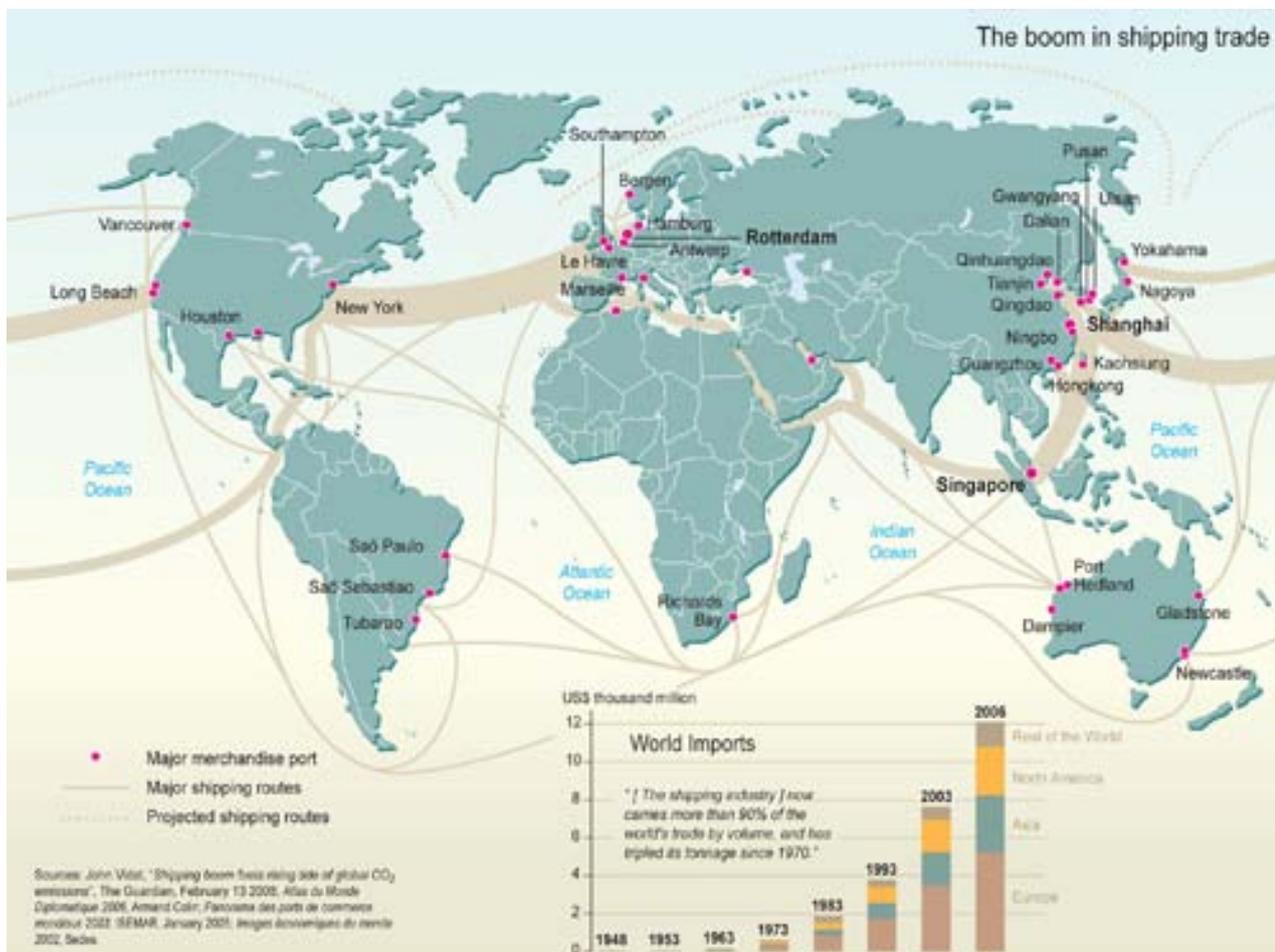
上述四條海上交通線是體系中運量最大的海上交通線的原因不僅在於其連接最主要的國家與地緣政治區域，更在於其連接全球地緣政治結構中最主要的經濟精華區(市場)、原料生產地、工業生產地，因此經過許多最具戰略重要性的扼

⁶¹ Grygiel, *Great Powers and Geographical Change*, op. cit., p. 30.

⁶² "International Shipping and World Trade: Facts and Figures,"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October 2009, http://www.imo.org/KnowledgeCentre/ShippingFactsAndNews/TheRoleandImportanceofInternationalShipping/Documents/International%20Shipping%20and%20World%20Trade%20-%20facts%20and%20figures%20oct%202009%20rev1___tmp65768b41.pdf, p. 7.

制點，如麻六甲海峽、荷姆茲海峽(Strait of Hormuz)、亞丁灣(Gulf of Aden)、蘇伊士運河、直布羅陀海峽(Strait of Gibraltar)、巴拿馬運河、臺灣海峽與巴士海峽(Bashi Channel)，使得其路線不僅大量為民用船隻使用，也是主要的軍用路線，故可被視為目前全球地緣政治體系中的海上戰略交通線。

圖 3.3 根據運量所描繪的全球主要海上交通線分佈



資料來源：“The Boom in Shipping Trade,” UNEP/GRID-Arendal, <http://maps.grida.no/go/graphic/the-boom-in-shipping-trade1>.

陸上戰略交通線的形式為洲際鐵路，輸油管只能運輸能源故非戰略交通線。陸上戰略交通線集中於世界最主要的人口居住地，以及重要能源生產地的心臟地帶所在的歐亞大陸。⁶³第一條也是首先出現的是冷戰時代連接心臟地帶與歐洲的

⁶³ 根據英國石油公司(British Petroleum Co., BP)在 2010 年的世界能源統計年鑑(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09)，俄羅斯在 2009 年底已探明的石油儲存量為 10.2 百萬噸，在中東以外的世界地區排名第二，僅次於委內瑞拉(24.8 百萬噸)，在歐亞大陸則排第一(歐亞大陸包括歐洲最大的北海油田在內全部儲存量 1.6 百萬噸；俄羅斯以外心臟地帶最大國家的哈薩克擁有僅次於俄羅斯的 5.3 百萬噸，而北海油田的三大生產國英國、挪威、丹麥合計只有 1.4 百萬噸)，但若論生產量則俄羅斯從 2002 年迄 2008 年都是僅次於沙烏地阿拉伯的世界第二大生產國，在 2009 年則躍升世界第一。而若論天然氣儲存量則俄羅斯為世界第一(1567.1 兆立方公尺)，比第二名的伊朗(1045.7 兆立方公尺)還多出快一半，整個前蘇聯境內的天然氣總儲量(1735.9 兆立方公尺)也佔了

鐵路網：中亞鐵路(Trans-Caspian Railway)－土西鐵路(Turkestan-Siberia Railway)－西伯利亞鐵路(Trans-Siberian Railway)，這條鐵路線又可從莫斯科向西經由斯摩稜斯克(Smolensk)、明斯克(Minsk)、華沙(Warsaw)、波茨南(Poznań)、奧德河畔法蘭克福(Frankfurt an der Oder)而至柏林(Berlin)，在冷戰後由於歐盟東擴以及與俄羅斯的貿易發展而更形重要。⁶⁴

第二條與第三條戰略交通線皆因中國崛起而出現，分別是西伯利亞鐵路經蒙古與中國東北連接北京的路線，以及西伯利亞鐵－土西鐵路－中國北疆鐵路－蘭新鐵路連接中國內陸的路線，即所謂的「新歐亞大陸橋」。⁶⁵三者目前皆靠西伯利亞鐵路連接歐亞兩洲，但西伯利亞鐵路只是其中的一部份，不可視為單一戰略交通線。重要國際河流如歐洲的多瑙河與萊茵河，或東南亞的湄公河在當代則無法成為戰略交通線，因為河流的通航里程都不足以達到洲際範圍，而且通常僅限於航行河道所經過的國家，最重要的是，河流在鐵路出現後對於武力投射能力的幫助已遠不如古代。⁶⁶

全世界(6621.2 兆立方公尺)的 26%以上，僅落後給中東(2690.4 兆立方公尺)，佔了歐亞大陸總儲量(2228.1 兆立方公尺)的 78%。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June 2010,” BP, http://www.bp.com/liveassets/bp_internet/globalbp/globalbp_uk_english/reports_and_publications/statistical_energy_review_2008/STAGING/local_assets/2010_downloads/statistical_review_of_world_energy_full_report_2010.pdf, p. 6, p. 8, and p. 22.

⁶⁴ 俄羅斯、德國、波蘭、白俄羅斯四國與歐盟經濟委員會(EU Economic Commission)在 1995 年簽署一項諒解備忘錄(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為了因應德俄間貿易量大幅增加而準備改善四國境內的國際鐵路網，建立從柏林向東經由華沙、明斯克、莫斯科至西伯利亞鐵路上的下諾夫葛羅德(Nizhny Novgorod)之間總長約 1830 公里的國際鐵路走廊。四國後來在 2007 年 6 月又聯合成立專門負責這條鐵路走廊營運的「歐亞鐵路物流」(Eurasia Rail Logistics)國際公司，整個走廊在 2010 年完全營運。另外在 2011 年 4 月 21 日的第四屆「波俄政府間經濟合作委員會」會議期間，俄國亦邀請波蘭參與由柏林經華沙、明斯克至莫斯科的高鐵路線開發案。請參考 Michael Emerson and Evgeny Vinokurov, “Optimisation of Central Asia and Eurasian Inter-Continental Land Transport Corridors,” *Munich Personal RePEc Archive*, December 2009, http://mpira.ub.uni-muenchen.de/20916/1/MPRA_paper_20916.pdf, p.9; “Pan-European international Transport Corridor No. 2,” *Russian Railways*, accessed on May 23, 2011, http://eng.rzd.ru/isvp/public/rzdeng?STRUCTURE_ID=84; “Russia, Germany, Poland, and Belarus create joint railway enterprise,” *Russia-InfoCentre*, June 20, 2007, <http://www.russia-ic.com/news/show/4183/>; “Polish-Russian Intergovernmental Commission on Economic Cooperation ended its session in Cracow,” *Ministry of Infrastructure, Poland*, April 22, 2011, <http://www.en.mi.gov.pl/2-482be1a920074-1793972.htm>.

⁶⁵ 李寶仁，「鐵路在地緣政治和周邊外交中地位和作用的思考」，*鐵道經濟研究*(北京市)，第 3 期(2008 年)，頁 11。

⁶⁶ 林伯格(Michael Lindberg)與陶德(Daniel Todd)曾詳細分析美國內戰(1861-1865)以來迄越戰為止的海軍河川作戰，雖然他們認為即使在當代，河川作戰對海軍來說仍有其重要性，但從其個案分析可知，工業革命之後的河川作戰不僅兵力規模完全無法與海戰相比，交戰各方除非缺乏可用的鐵路網，否則也很少利用河川運送大部隊以達到戰略目的，這與中國古代南方政權與北方國家利用長江、淮河以及各種運河系統來進行戰略部署，並在這些河川流域所進行的大規模水戰相較，無疑是小巫見大巫。而箇中原因自然是河運的速度已趕不上科技賦予鐵路甚至公路的速度與便利性，以及對這兩種運輸方式的運量改善，而更重要的是，利用河川運輸部隊或遂行其他重要戰鬥越來越受限於河川本身相對於科技發展的限制，而且也更容易遭受來自河岸甚至空中的攻擊。請參考高一中譯，Michael Lindberg and Daniel Todd 著，*近岸、近海及遠洋艦隊—自 1861 年迄今地理環境對海軍作戰之影響*(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5 年)，第七章。

二、戰略交通線控制的類型、方式與程度

由於交通線的主要功能在提供人貨運輸，因此所謂對交通線的「控制」並非控制交通線本身，控制的真正意涵為「國家運用本身的能力，依照自身的政治意願，決定給予哪些結構中其他行為者使用交通線的權力」。然而由於陸地與海洋的地理性質差異，以及人類居住於陸地而非海洋的基本事實，使得對海、陸戰略交通線的控制本質有所差異。

(一)、對陸地戰略交通線的控制

陸地交通線的控制權為准許特定國家使用特定的鐵路、公路或河川航道來運輸人員、貨物，甚至軍隊調動的權力，或為了政治因素而忍受鉅額損失，拒絕提供能源給管線的接受國，直到對方屈服於己方的政治意志為止的權力。達到此種目的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將交通線通過的全部地區，特別是交通線所連接的精華區、核心區、資源生產區，以及數條交通線交會的戰略要地，⁶⁷納為領土或屬地，實施直接的政治與軍事控制，國內陸地交通線即隨時受到這種程度最高的直接控制。但陸地戰略交通線在一般的情況下屬於國際交通線，而且擁有許多通往其他國家的戰略要地，欲全部納為領土或屬地並非易事，因此次佳的方式是將攸關控制的任何上述地區納為勢力範圍(sphere of influence)，並在戰略要地或資源生產區駐軍以對該地區實施直接控制。此種控制在程度上略遜於第一種方式，因為勢力範圍的主權屬於其他國家，不僅無法直接對位於其內部的國際交通線實施等同本國領土的控制，也比較容易因為國際局勢的變化而無法駐軍或失去這個國家為勢力範圍，其程度乃介於直接控制與較低的間接控制之間。這兩種方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都是常見的控制方式，但在冷戰時期則改以第二種為主。

除此之外的控制方式都是屬於程度更低的間接控制。第三種建立控制的方式是藉由建立軍事同盟來獲得對盟國境內的重要交通線之控制，或藉由同盟的力量一起控制戰略交通線。這種「共享的控制」對交通線的控制程度比勢力範圍更低，因為同盟國之間並不存在類似勢力範圍內的階級化政治關係，一般的同盟也未必能在對方國境內駐軍，因而很難強迫對方完全接納己方的政治意志，除非同盟存在於強國與其勢力範圍內的國家之間，或基於相當特殊的戰略關係才可能在盟國之間產生階級化政治關係與在盟國內駐軍，例如冷戰時期的華沙公約(Warsaw Pact)，以及冷戰後的美日同盟、美韓同盟與北約。至於以同盟的力量控制戰略交通線亦為共享的間接控制，這種同盟的盟約中通常會載明聯合作戰的內容與出兵的比例等，在兩次世界大戰前很常見，例如英日同盟(Anglo-Japanese Alliance, 1902-1923)、三國協約(Triple Entente)等都是，但冷戰開始後則因為新興國家越來

⁶⁷ 克勞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與孫子都曾指出這種稱為「衢地」或「國家鎖鑰」的戰略要地之重要性：克氏認為「鎖鑰」是國家中幾條道路交集的地方，或容易儲積物資的地方，或便於朝幾個方向運動，其位置可以使佔有該地的軍隊本身的交通線受敵軍威脅之前，即已能有效威脅敵人之交通線；孫子則認為「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天下之眾者，為衢地」。請參考鈕先鍾中譯，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et 英譯，Carl von Clausewitz 著，**戰爭論**(台北：軍事譯粹社，1980年)，頁 724、727；徐瑜編撰，**孫子兵法：不朽的戰爭藝術**(台北市：時報文化，1994年)，頁 265。

越多，他們並不願意與母國之間維持這種被認為嚴重危及主權，以及被捲入兩大陣營政治鬥爭的同盟，而使這種同盟越來越難形成。不過所有依靠同盟所建立的控制都有一個基本問題：其持續時間視同盟的存續而有很大的變化。

第四種方式與同盟類似，是區域整合出現的區域性國際組織對通過成員國境內的陸地國際交通線之控制。這是一種抽象的概念轉換－國家加入組織成為會員國，組織透過國家的力量而在某種意義上控制了區域內的陸地交通線。但區域性國際組織除非擁有能獨立運作用於控制交通線的能力，否則不能被視為真正對交通線擁有控制權。目前具備此種能力的區域性國際組織只有歐盟，其手段同時包括政治性與軍事性，前者主要為 1985 年 6 月簽署的「申根協定」(Schengen Agreement)，歐盟藉由此約第一章與第二章的規定，取消簽約的成員國之間的邊境檢查，但整合簽約國的對外邊境檢查一致；⁶⁸後者則根據 1999 年底提出的「歐洲安全暨防衛政策」(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se Policy, ESDP)之指導，在 2003 年正式設立一支規模約六萬人的「歐洲快速反應部隊」(European Rapid Reaction Force, ERRF)，供其運用於北約未參與，或基於歐盟「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Commo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CFSP)所發動的解決國際危機作戰任務。⁶⁹此種控制方式雖然尚在發展階段，但由於歐洲整合的進程藉由申根協定之類的條約與歐洲安全暨防衛政策之類的正式戰略走向，使會員國逐漸讓渡部分主權而邁向超國家組織，因此得以對「申根區」(Schengen Area)內的交通線實施類似領土控制的直接控制，並組成屬於歐盟的武力。不過以目前而言，歐盟成員國並未放棄大部分主權，因此條約賦予歐盟的控制力仍源自成員國對交通線的直接控制，歐盟的控制並非真正的直接控制。

最後一種控制方式則是某個強國藉由建設或開發新戰略交通線－最主要是洲際鐵路－的機會，利用本國的經濟力量，以及新戰略交通線建設完成後，沿線東道國與強國之間龐大的貿易、金融往來等種種有利各國經濟發展的強大經濟誘因，吸引那些國家成為該強國的友好國，甚至可利用經濟力量與修建鐵路所需的金融力量改變東道國的政策，降低甚至排斥其他強權甚至超強原先對那些東道國既有的龐大政治、經濟影響力，藉此完成本身的標準地緣政治程序，甚至可能改變體系原有的權力平衡狀態。職是之故，鐵路建設在過去一直被歐洲視為「非正式」的帝國建立的手段。⁷⁰不過這種方式並非真正有效的控制方式與影響體系權力平衡乃至均衡的手段，首先，除非新戰略交通線完全位於強國所控制的領土或殖民地上，否則開發新戰略交通線的強國無法獨佔鐵路的所有權並真正控制這條戰略交通線。

⁶⁸ “Schengen Agreement,” *The Official website of the European Union*, [http://eur-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CELEX:42000A0922\(02\):EN:HTML](http://eur-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CELEX:42000A0922(02):EN:HTML).

⁶⁹ “HELSINKI EUROPEAN COUNCIL 10 AND 11 DECEMBER 1999, PRESIDENCY CONCLUSIONS: Annex 1 to annex IV on — strengthening the common European policy on security and defence,” European Parliament, http://www.europarl.europa.eu/summits/hel2_en.htm#IVa.

⁷⁰ Ronald E. Robinson, “Introduction: Railway Imperialism,” in Clarence B. Davis and Kenneth E. Wilburn, Jr., with Ronald E. Robinson eds., *Railway Imperialism*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91), p. 2.

此外，雖然鐵路對強國來說具有獨特的領土整合乃至合併功能，⁷¹但新路線是否具有完成標準地緣政治程序的帝國主義功能，取決於其整體路線是否符合強國的政治與經濟利益，但路線建設既大多是由私人企業負責，又在外國土地上興建，還是會受到企業追求利潤還有東道國繁榮本國經濟等未必與強國達成標準地緣政治程序需要一致的兩種考量的影響，多重互相交錯的利益使得欲興建新戰略交通線的強國未必能完全遂行其意志。⁷²最後，由於新戰略交通線的開發曠日廢時，又需要極為龐大的金融後盾，使得其他強權與超強很容易提出反制計畫，甚至直接介入新戰略交通線的開發。

在 19 世紀後期的鐵路興建熱潮中，西方列強在亞洲與非洲的殖民地以及尚未淪落為列強殖民地的國家內部大肆興建鐵路，所謂的「鐵路政治」(Railpolitik)是列強推展帝國主義政策的重要工具，並與列強的軍事戰略和帝國防衛有直接的關連，⁷³不過只有由德意志第二帝國出資興建，由柏林經伊斯坦堡(Istanbul)通往巴格達的「巴格達鐵路」(Bagdad Railway)具有上述新戰略交通線控制的意涵，而其興建過程便遇到上述困難的干擾。⁷⁴不過正如本論文即將在第六章分析的，中國在 2000 年之後興起的國內與跨國鐵路建設熱潮，亦為一種此種控制方式與試圖藉此達成本身標準地緣政治程序的呈現。

(二)、對海上戰略交通線的控制

海上交通線之控制即為所謂的「制海權」(command of the sea)、「制海」(sea control)，⁷⁵或「海上優勢」(mastery of the sea)。⁷⁶但這些對海上交通線的「控制」與陸地交通線的控制概念截然不同，最重要的是真正的海上交通線之控制只存在於戰時，平時的海上交通線並不受任何國家之控制，⁷⁷甚至在大多數情況中，戰爭初期的交通線控制權歸屬並不明朗。⁷⁸這是因為海洋本身雖然作為運輸的媒介，但絕大部分的海洋不受任何國家的主權所覆蓋，即使在國際法允許的領海中，海軍也無法駐紮在其上來實施類似陸軍對領土的嚴密控制，因此國家不可能

⁷¹ *Ibid.*, p. 3.

⁷² *Ibid.*, pp. 7-8.

⁷³ T. G. Otte and Keith Neilson eds., *Railway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ath of Empire, 1848-1945*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⁷⁴ Edward Mead Earle, *Turkey, The Great Powers, and The Bagdad Railway*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4).

⁷⁵ 所謂制海是相對制海權而言，在當代海軍戰略理論中，制海權被認為是範圍最廣泛、程度最高的控制，而制海則是範圍較狹窄與程度較低的控制。請參考 Vego, *Naval Strategy and Operations in Narrow Seas*, pp. 116-117; 鈕先鍾譯，Mitchell Simpson III 著，「原編者導言」，Mitchell Simpson III 編，*海軍思想的發展*(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7 年)，頁 20-21。

⁷⁶ 海上優勢是歐陸國家與蘇聯/俄羅斯海軍的慣用語，其意與制海相當，可參考 Raoul Castex, *Strategic Theories*, trans. by Eugenia C. Kiesling(Annapolis, Marylan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4), pp. 53-58; Edward Wegener, *The Soviet Naval Offensive*, trans. by Henning Wegener(Annapolis, Maryland: United States Naval Institute, 1975), pp. 1-4; Sergei G. Gorshkov, *The Sea Power of the State*(Oxford, England;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1979), pp. 229-234.

⁷⁷ Barry R. Posen, "Command of the Commons: The Military Foundation of U.S. Hegemon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8, No. 1(Summer 2003), p. 8; 蔣士良，「初論制交通權」，*中國軍事科學*(北京)，2001 年第 06 期，頁 54。

⁷⁸ Sir Julian Corbett, *Some Principles of Maritime Strategy* (Annapolis, Marylan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88), p. 91.

「不准」其他國家「使用」海洋，國際法也反映出這樣的地理性質差異而訂出對領海的「無害通行權」(Innocent Passage)與對國際海峽的「過境通行權」(Transit Passage)。

因此所謂的海上交通線之控制，主要是對航行與海上的船舶與飛機之控制—禁止特定國家的船舶進入某片海域，而不是對海洋本身的控制，如羅辛斯基(Herbert Rosinski)所言：「我們所想要『控制』(command) 或『掌握』(control) 的對象並非『海』(the sea)，而是我們的對方，或中立國；正因為我們不能把海『化』為『領土』(reduce the sea “into possession”)，所以在海軍戰爭中也就遭遇到中立國及涉及其權益的微妙與困難問題。一種常見的錯誤就是說當『獲得制海權』(gaining command) 時，我們也就享有使用海洋的權力，事實上，那是我們早已享有的，真正的意義是我們獲得排斥對方使用海洋的權力，於是我們也就能夠阻止他們攻擊我們或干涉我們的行動，僅只是一個「制」字並不表示所「制」的對象不可以分割，「排斥」(exclusive) 一詞則絕無誤解的可能。換言之，僅當一方排斥了對方，然後才能獲得『控制』。」⁷⁹這也是某些學者認為真正具體的海上交通線實為船隻的原因。⁸⁰既然海上交通線之控制為對船隻之控制，則海上戰略要地—「扼制點」(choke point)的歸屬遠比陸上戰略要地來得更關鍵。扼制點是連接兩個較寬闊海域的狹窄通道，通常的形式為海峽或運河。原先分散在海洋各處、擁有近乎無數航線選擇的船隻必須集中通過扼制點才能進出不同的海域，但扼制點的狹窄特徵使船隻在通過時很容易同時遭到來自海陸兩方面的攻擊，而這在海洋中絕不會發生，因此控制了扼制點對攻勢作戰來說可以自由發動對敵人的海上攻勢，而對防禦來說則佔有一個非常有利的防禦位置，既可獲得以逸待勞之便，又可簡化對本身海上交通線保護的任務。職是之故，海上戰略交通線通過的扼制點，其戰略重要性便凌駕其他扼制點。

在海上永遠不可能達到類似陸上的直接控制，所有的控制都是間接控制，控制程度永遠都是相對而沒有絕對。⁸¹但是海洋與海上交通的兩種特性使得對海上交通線控制的鬥爭因此遠比陸上交通線的鬥爭更激烈，第一種是柯白所謂的「共有交通線」(Common Communication)理論，即是說交戰國各方在海上所使用的交通線大部分相同，但在陸戰中，各國軍隊因為各位於其本國或佔領區內，故所使用之交通線必不相同。⁸²第二種則是所謂的「海只有一個」(the Sea is all one)，全世界的海洋連成一片，若不控制所有與對手有關的海域，聽任其在某處保存甚至培養實力，隨時有遭到敵人反擊的可能，故必須盡可能殲滅或封鎖敵人在任何

⁷⁹ 鈕先鍾譯，Herbert Rossinski 著，「論制海權」， Mitchell Simpson III 編，*海軍思想的發展*(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7年)，頁5。

⁸⁰ 王蜀寧，*海戰與戰略*(桃園：國防大學，民國93年)，頁103-105。

⁸¹ Corbett, *Some Principles of Maritime Strategy*, op. cit., pp. 103-105; Castex, *Strategic Theories*, op. cit., p. 53; Milan N. Vego, *Naval Strategy and Operations in Narrow Seas* (London: Frank Cass Publishers, 1999), p. 117; Geoffrey Till, *Maritime Strategy and the Nuclear Age*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1982), p. 189.

⁸² Corbett, *Some Principles of Maritime Strategy*, op. cit., p. 100.

地方的海軍力量，或完全摧毀敵方的港口，⁸³並拿捕敵對國家的民船，將敵對勢力完全排斥出整個地區的天空與海洋(包含海面上空、海面與水下)，同時還必須防止對方內部的長程陸基反艦與防空飛彈破壞己方對交通線的控制，以及禁止中立國家的軍民船隻進入欲建立控制的海域，才能建立對海上交通線的完整控制，否則只能認為海上交通線的控制權處於「爭奪」(dispute)狀態。換句話說，陸上並不需完全殲滅對方的力量，只要能確保佔領即可，但海上沒有「權力平衡」，將陸上的勢力範圍劃分運用於海上反而會導致本身的不安全。⁸⁴

故海洋國家要發展為「海權」—在本論文中其意義指的是結構中的海上超強—遠為困難，必須不斷與其他海洋貿易國家鬥爭，而且每次鬥爭都必須掌握對海上戰略交通線的控制，直到可以利用控制達到建立符合本身經濟利益的海上國際貿易體系，以及消滅任何擁有強大海軍，能在戰爭中立即威脅其制海權的國家。而由於海上交通線的延伸範圍遠非陸上所能比擬，海權不僅要擁有結構中最強大的艦隊，還必須在戰略交通線上各個重要的扼制點設立堅強的基地並派駐強大的分遣艦隊，⁸⁵並確保沒有其他強權能爭奪這些扼制點的控制權與使用權。利用派駐在扼制點上的艦隊隨時往來巡弋以消除順暢使用海上交通線的各種潛在的國家與非國家威脅，確保一旦戰爭發生，扼制點與母國之間依然能保持順暢，可順利調動艦隊作戰。馬漢主張海軍戰略不分平時或戰時就是這種情況的最佳說明，⁸⁶蓋海上戰略交通線的控制比起陸上戰略交通線更容易受到侵蝕的威脅。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直接佔領扼制點是最常見的作法，而且也是最有力的控制手段。而在戰後由於無法直接佔領扼制點或成立殖民地，於是改為得到扼制點所在國與海上戰略交通線通過國的同意，在其境內設置海外基地並派駐艦隊，雖然此種方式所達成的效果與戰前類似，但由於是在其他國家領土內設置基地，因此基地的存廢相當程度上仰賴母國與東道國之間的政治關係，特別是雙方不存

⁸³ *Ibid.*, pp. 167-208; Castex, *Strategic Theories*, *op. cit.*, pp. 43-46; V. Shavtsov, "O. gospodstvo na more,"(On Command of the Sea), quoted from Robert W. Herrick, *Soviet Naval Theory and Policy* (Annapolis, Marylan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89), p. 238.

⁸⁴ 把海洋視為可和陸地一樣可以在上面建立權力平衡，是歐洲陸權國家的普遍觀點，尤以 17-18 世紀為甚，不過當英國在 18 世紀後期越來越接近海上超強的地位，並在 19 世紀初期完成達到此一地位後，由於歐陸國家已經無法建立一支足以與英國匹敵的艦隊，故對海上權力平衡的概念已經不再是勢力範圍的劃分，而是次級海軍國家(second naval power)如何形成抗衡英國的聯盟以確保本國的海外(商業)利益，以及戰時的中立國權益。英國雖然不認為海上可以劃分勢力範圍，卻也很早就意識到本身作為海權超強，若單以本國利益為考量，忽略不顧或甚至侵犯其他歐陸國家的海上利益，將很容易激起歐陸國家形成對英國的抗衡聯盟而不利於英國的根本利益—國家獨立與商業。不過整體來說，海洋只能容納一個超強的觀點並無錯誤。請參考鈕先鍾譯，Herbert Rosinski 著，「海權在未來戰爭中的任務」，Mitchell Simpson III 編，*海軍思想的發展*(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7 年)，頁 163-164；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New York: Random House, Inc., 1987), p. 139; Rolf Hobson, *Imperialism at Sea : Naval Strategic Thought, the Ideology of Sea Power, and the Tirpitz Plan, 1875-1914* (Boston and Leide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Inc., 2002), pp. 57-76.

⁸⁵ 艦隊一詞在本論文中如未特別註明為水面艦隊或水下艦隊，通常即指包含水面艦隊、水下艦隊、海軍航空兵三者之內，能構成艦隊全部武力組成的各種兵種之內。

⁸⁶ 楊鎮甲譯，Alfred T. Mahan 著，*海軍戰略論*(臺北：中華文化事業出版委員會：1956 年)，頁 109-110。

在強力的軍事同盟時更是如此。第三種方式則是傳統的結盟與盟國共享控制，這是由於己方的控制能力無法延伸至每一個需要控制的海域，因此與該海域的海軍強國在相同的戰略利益之下結盟，共享彼此對各自海域內的海上交通線，此種控制與陸上交通線同盟控制一樣，程度遠不如前兩種控制。但冷戰後出現一種新的戰略合作概念，國家之間並不形成真正的同盟建立有獨立控制能力的國際組織來實施對交通線的控制，反而更強調參與戰略合作的各國對交通線的共享控制，在這些新戰略合作中，傳統的國家戰略利益與應對安全威脅的「硬權力」(hard power)雖然仍是合作的基礎與控制交通線的主要能力，但主導合作的國家也開始注意到奈伊(Joseph S. Nye, Jr.)所強調的軟權力在合作上提供的誘因。⁸⁷這樣的戰略合作可分別以美國的「千艦海軍」(Thousand-Ships Navy)概念為代表，以國際打擊海盜與應付海上非傳統威脅的戰略合作為基礎，美國與和它進行戰略合作的國家之間並沒有形成真正的同盟，故美國未必在東南亞、波斯灣(Gulf of Persia)沿岸設立海外基地或常駐部隊，卻能利用平時的打擊行動之需要，利用當地國的港口作為美軍的重要整補基地，以進一步將美軍的有效作戰與控制範圍延伸至亞洲大陸沿岸。⁸⁸

三、交通線控制能力、國家地緣政治屬性與國家分級

根據上述的控制邏輯與方法可知，對海上戰略交通線的控制必須擁有最強大的艦隊，並盡可能控制所有的扼制點與擁有更多海外基地，以提供遠洋作戰必要的各種支援，方能盡快在戰時建立控制；對陸上戰略交通線的控制最好的方式是使本身的領土或勢力範圍盡量涵蓋戰略交通線延伸的範圍。然而這兩種控制所需的能力相當不同且難以互相通用：海軍無法用來控制陸上交通線，陸軍也幾乎無法幫助控制海上交通線，故國家很難同時發展對海上與陸地交通線的控制能力，只能選擇發展一種主要的控制能力，這也就是國家為何被稱為海權或陸權，以及海權或陸權為何難以發展控制另一種控制能力的原因。

然而所謂的「海權」與「陸權」，與權力平衡一樣包含相當複雜的概念，既可用來代表海上或陸上的超強，亦可用來代表國家在海洋與陸地上的權力與能力。無論是海權或陸權，第二種概念包含的層面尤其複雜，皆同時包含軍事權力與能力，以及國家本身用來支援這些軍事能力，和透過海洋或陸地所進行的各種活動投射，以影響其他國家的組織、科技、產業能力與所形成的複雜網絡。⁸⁹但如此一來，除了內陸國家僅能集中全力發展陸地控制能力而能明顯判斷其地緣政

⁸⁷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Jr.,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3rd. edition (New York: Longman, 2001), p. 11; Joseph S. Nye Jr.,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⁸⁸ Ronald E. Ratcliff, "Building Partners' Capacity: The Thousand-Ship Navy,"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 60, No. 4(Autumn 2007), pp. 44-58; 林文隆，「21世紀的美國海權佈局—『千艦海軍』」，*國防雜誌*，第23卷第2期(2008年6月)，頁41-54。

⁸⁹ William T. Johnsen, "Redefining Land Power for the 21st Century,"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http://www.strategicstudiesinstitute.army.mil/pdffiles/pub312.pdf>, pp. 6-8; Geoffrey Till, *Seapower: A Guid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second edi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 22.

治屬性之外，大多數國家都是同時具備某種程度陸地與海洋能力的濱海國家，⁹⁰使得「海權」與「陸權」等兩個地緣政治名詞無法簡單使用，如不加以說明很容易發生兩種概念的混淆。

此外，判斷一個濱海國家的地緣政治屬性究竟是「陸地」或「海洋」亦沒有簡單的標準或規律，有些時候僅是憑國家予人的印象，以及其地理位置或特徵而定。馬漢的海權六大要素中，地理因素的順序置於非地理因素之前，亦增加屬性判別的困擾。不過更大的困擾在於隨著體系互動密度之提高、經濟全球化之擴張與深入，以往被馬漢列為海權三大支柱的殖民地、商業生產與航運，早在 20 世紀就開始與地理變數、從事海上事業的人口比例等馬漢的舊變數一樣，失去判斷國家是否為「海上超強」的「海權」的衡量功能，許多國家的殖民地對其海上發展幾無助益，某些國家僅擁有海軍而無龐大商船隊，或顛倒的情況。⁹¹而全球化更使造船、航運分散至許多中小型國家，不再由體系中的強國壟斷，後者可能反而比不上這些中小型國家，當然不可能藉此判斷那些擁有龐大造船工業與商船隊的中小型國家即是體系中的「海權」。⁹²

事實上，國家的基本地理性質為大陸或島嶼並非影響其地緣政治屬性的真正決定性因素，擁有龐大的海軍或商船隊亦非重點。真正的重點在於國家的經濟結構究竟是偏向大陸性或海洋性、社會文化是否崇尚海上事業之發展，以及主導大戰略的決策菁英之思考模式究竟是大陸性或海洋性。⁹³因此日本帝國實際上應視為陸權而非真正的海權國家，雖然其曾經擁有僅次於英、美兩國的世界第三大海軍，但其整體的經濟與社會文化仍為大陸性，陸軍與持大陸性思考的戰略菁英支配其大戰略決策，海洋貿易與海軍始終不是日本帝國主要的國家生計與決定性軍種；⁹⁴蘇聯雖然在冷戰時期曾經發展出強大的海軍、商船隊、漁船隊與海洋科學發展，符合傳統上對海權的定義，但也因此不能被視為真正的海權國家，反而始終被視為代表性的陸權國家。⁹⁵

無論是在陸地或海洋，欲完成本身的標準地緣政治程序都需要極為強大的國

⁹⁰ Till, *Seapower*, *op. cit.*, p. 22.

⁹¹ Paul M.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British Naval Mastery*, with a New Introduction by the Author (New York: Humanity Books, 2004), pp. 5-8.

⁹² Till, *Seapower*, *op. cit.*, pp. 102-104.

⁹³ Eric Grove, *The Future of Sea Power* (London: Routledge, 1990), p. 231; *Ibid.*, p. 84. 值得注意的是格羅夫(Eric Grove)與提爾(Geoffrey Till)兩人對現代海權組成因素的分類並不完全一致，前者將政府視為獨立變數，影響力與地理環境、海洋經濟等因素一樣是次要的，而後者則將政府與社會政治文化等歸為一類。

⁹⁴ 日本帝國海軍雖然在明治憲法與實際上都擁有與日本帝國陸軍平等的地位，但海軍自己承認，日本既非純粹的島國又非純粹的大陸國，但是在明治維新時的兵制選擇上卻分別以純粹陸軍國的德意志帝國與純粹海軍國的英國為師，結果日本帝國海軍軍人受英國海軍之影響，並不喜歡涉入政治，而陸軍軍人則受德意志帝國之影響，喜好參與政治事務；再加上明治初期的皇室受傳統陸戰觀念之影響，與日本之發展方向集中於東北亞大陸，益發使得日本帝國的國防重心、地緣戰略發展與「帝國國防方針」等重要決策，屢屢出現陸軍頻頻壓迫海軍而出現明顯的「陸主海從」現象，海軍雖然屢次試圖改變，但效果始終相當有限。見；吳玉貴譯，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撰，**戰前之大本營海軍部**(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0 年)，頁 7-9、18-19、51-55、143-163、225-238、282-287、446-467。

⁹⁵ Till, *Seapower*, *op. cit.*, p. 22.

力與達成戰略目標的政治意志，因此並非所有的強國都具備控制戰略交通線的能力，根據國家對不同層級的交通線之控制能力，可將國家分為超強(Super Power)、強權(Great Power)、區域大國(Regional Power)等三種等級。但是為了進一步完善地緣政治結構中的國家分級，還可再依照地緣政治屬性而分為海洋性或陸地性的超強與強權。然而由於 20 世紀以來，大陸強國也擁有許多傳統上認為屬於海權專有的特徵，因此為了避免混淆起見，本章將「陸權」(Land Power)與「海權」(Sea Power)中用來指稱那些在體系中代表性強國的概念，專門用來分別代指控制陸地或海洋戰略交通線的超強，而強權則依其屬性分別稱為大陸強權或海洋強權。而一般意義的「海權」(sea power)與「陸權」(land power)，則分別以「海洋權力」和「陸地權力」代指其包含的各種權力、能力與影響力層面。

(一)、超強

擁有高於其他國家的科技水準與軍事力量，以及能夠確保這兩種能力的長期發展始終優於其他國家的政治與經濟實力，有能力控制整條戰略交通線的國家為地緣政治結構中的超強，是結構中真正的「極」。依照區域安全複合體理論，超強同時也是體系中最活躍的國家，是唯一擁有全球地緣政治密碼的行為者，幾乎在各個地緣政治區都有其政治、軍事、經濟等層面的利益存在，這使得超強比其他國家更需要順暢地使用戰略交通線。超強藉由兩種方式控制戰略交通線：同時擁有最廣大的領土與最強大的地面部隊，或者擁有最強大海軍艦隊(同時包含水面、水下艦隊與海軍航空兵)⁹⁶來控制陸地或海洋戰略交通線，進而組織地緣戰略領域，並在領域中建立符合其政治意志與經濟制度的國際秩序，⁹⁷因此是結構中的極，19 世紀與 20 世紀初的英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迄今的美國，以及冷戰時期的蘇聯，都是超強的代表。超強不僅是影響體系均衡的主要角色，同時也是權力平衡的主要操作者，因為超強雖然國力超群，卻仍然受制於距離對權力投射所造成的遞減法則，必須與遠離本土的其他國家合作才能強化對戰略交通線的控制，並防止其他超強或強權對控制權的侵蝕。

⁹⁶ 陸軍的數量優勢對於超強來說並非完全必要，必須同時考量裝備的科技程度與能提供的火力，否則就會出現評估上的失真。但陸權的部隊數目的確也必須相當龐大，才能壓倒其他競爭對手並防守廣大的領土。數量優勢對海權來說則絕對必要，尤其是在對控制海上交通線具最大功效的水面艦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是主力艦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則是航艦戰鬥群(CVBG)，潛艦部隊由於對交通線的控制能力不如水面艦隊，因此海權未必需要擁有數量第一的潛艦部隊，只要其潛艦部隊的火力能與最大競爭對手抗衡即可。同理亦可知，即使擁有最強大的潛艦部隊，但水面艦隊實力遠不如其他競爭對手的國家，根本無法成為海權。

⁹⁷ 例如東亞陸地戰略交通線在 19 世紀中葉之前常被中國古代王朝控制，從而建立起所謂的朝貢體系(Tribute System)；英國與美國分別在 19 世紀中葉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依靠其對全球海上戰略交通線之控制，擴展其所倡導的資本主義意識型態、自由貿易經濟制度與民主政治理念；而蘇聯則因控制歐亞大陸心臟地帶與陸上戰略交通線，與東歐國家組織「經濟互助理事會」(COMECON)，進行以共產主義為指導的歐洲整合。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超強所建立的不同政治意識型態與經濟制度範圍會因為彼此之間的互動而產生一定程度的融合，在當代全球地緣政治結構中，由於海上交通線對運輸的重要性遠超過陸上交通線，陸權常受到海權的影響而在政治與經濟制度或意識型態上發生改變，例如朝貢體系在 19 世紀後半的崩潰，以及蘇聯在 1970 年代之後因為經濟衰退而不得不增加與西方的貿易量，從而融入西方的世界體系內。Peter J. Taylor, *Political Geography: World-economy, nation-state and locality* (Essex, England: Longman, Third Edition, 1993), pp. 82-85.

(二)、強權

支配某個位於結構核心區或精華區的地緣政治區，具備獨自控制周邊或進入其境內的海洋或陸地戰略交通線，但無法像超強那樣控制全部戰略交通線的國家或超國家組織，是地緣政治結構中的強權。強權可能在某些領域的實力與超強在伯仲之間，但其整體國力與超強有明顯差距，導致其無法發展出與超強同樣的戰略交通線控制能力，因此不是結構中的「極」。雖然強權具有不可忽視的控制能力，但無法與超強爭奪超過周邊地區的陸地或海洋戰略交通線的控制權，這導致強權雖然也很活躍於體系中，但其關切的戰略目標很少涵蓋整個地緣戰略領域，多半限於本身所處的地緣政治區域與相鄰的地緣政治區域；其地緣政治密碼也因此雖然兼有全球層級，但由於能力的限制而多以區域為主。強權基於兩個主要的原因，不僅是影響國際體系均衡的主要行為者之一，也是權力平衡運作中重要的角色：第一，為了順暢地使用戰略交通線以達成戰略目標，必須與超強聯合或反對某個超強對其他海陸戰略交通線的控制；第二，強權與超強的地位如同世界體系理論中的核心與半邊陲國家一樣是會互相流動的，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與蘇聯取代英國成為超強，因此強權隨時在培養更進一步的控制能力，以尋求擴張、或擺脫超強的支配、或成為新超強的機會。

(三)、區域大國

在強權之下的任何國家都無力對戰略交通線的任何部分實施有意義的控制，但是在每一個地緣政治區域中，都存在一些交通線控制能力較區域中其他國家為高的特殊國家，它們的政治態度雖然不致立即對均衡產生真正的影響，卻能在一定程度內增強或減弱超強與強權對離其本土較遙遠的戰略交通線之控制。本論文將這樣的國家歸類為區域大國，由於其控制能力超過對本國內部交通線的控制所需，能向外對重要性較低的區域性國際交通線實施一定程度的控制，因此其地緣政治密碼同時包含周邊與區域層級。由於每個地緣政治區域的發展程度甚為不同，區域大國彼此之間的能力與權力差距可能甚為巨大，而雖然大部分的區域大國與強權之間存在更大的權力與能力差距，但二者的地位同樣存在流動性，特以某些具備巨大發展潛力並同時位於戰略交通線直接通過地區之旁的區域大國更有這種可能，因此區域大國是地緣政治結構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國家類型之一。

超強與強權向來是結構中影響體系均衡最主要的行為者，但自冷戰以來區域大國的角色逐漸加重，而冷戰結束後，原來加諸於海陸兩極結構中的地緣政治對抗性與意識型態因素幾乎消失，陸權與海權的對抗性亦不如以往，⁹⁸使他們能專從本國利益的角度出發而非被迫順從超強與強國的戰略利益或意識型態，在國際上扮演較重要的角色。這些國家可能是戰略領域主導國在冷戰時期密切的盟邦或友好國，也可能始終保持著不結盟的傾向，但無論他們在冷戰時期與地緣政治領

⁹⁸ 也有學者認為經濟互賴、全球化等發展並未使地緣政治的對抗性消失，反而因為強國權力更形集中，使結構中的權力分配更為不均，地緣政治的對抗性因而被強化。見鞠海龍，「論地緣政治的“對抗性”思維」，*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江蘇省南京市)，2009年第5期，頁58-60。

域主導國的關係如何，他們在目前的地緣政治結構中固然並不願意與超強和強權保持完全的政治對抗，但也不願意如過去一樣馬首是瞻。⁹⁹由於區域大國乃是各地緣政治區域中的重要國家，且可能與超強或強權發生政治、經濟、領土、軍事上難以解決的爭端，部分區域大國甚至在戰略交通線沿線佔據重要的位置，因此是超強與強權極力爭取為運用權力平衡影響均衡發展的重要對象。

結構中還存在無法歸入上述三種大國類型的其他國家，這些國家在結構中為數最多，但對結構與體系的重要性卻不如上述三類國家，不過它們對結構的戰略價值還可依照是否位於戰略交通線之上而區分為兩大類，第一類是位於戰略交通線所經地區，甚至數條戰略交通線在其周邊或境內交會的國家，這類國家即是科恩所謂的「通道國」(Gateway State)，其特徵除了位於數條戰略交通線交會點之上外，還包括因為缺乏自給自足內需經濟體而必須建立以特殊化天然或人力資源為主要出口品的貿易經濟體，這使得通道國不僅因為位居戰略交通線匯聚處而成為超強與強權在權力平衡競爭中極力爭取的對象，也使其經濟體系有助於連接不同的地區以使人員、貨物與理念能順利進行交換。¹⁰⁰通道國的地緣政治密碼雖然主要以局部層次為主，但某些在區域中相對強大的通道國有時可能發展出區域層次的地緣政治密碼。第二類則是沒有戰略交通線經過的國家，由於它們的政治選擇對戰略交通線的控制沒有重要影響，因此通常是國際政治運作中最被忽略的國家，這類國家的地緣政治密碼完全僅限於局部層次。

四、戰略交通線控制與結構形式劃分

控制的邏輯顯示真正的控制只存在於戰爭爆發後或如冷戰初期高度緊張的不均衡時期，尤其是海上戰略交通線在平時根本不存在類似陸上交通線於主權原則下的控制。既然平時不存在海上交通線控制，至多只存在某種程度的陸上交通線控制，那麼如何依此邏輯劃分結構形式？

對戰略交通線的控制是任何一個強權達成地緣政治標準程序、成為超強的必要條件，在戰時取得的控制權於程序達成後會以駐軍於國外戰略要地的形式持續表現在新的均衡中，接受駐軍的沿線國家不僅是被納入超強組織的地緣戰略領域而已，還必須遵循控制國建立的互動規範與領土、政治、經濟、軍事安排，越靠近超強力量中心的國家則越容易成為超強的勢力範圍，只有在領域邊緣的國家才有較高的行動自由，允許其實施某種替代程序。反之，超強則大為增強在戰略交通線沿線的戰略優勢，降低或消除其他潛在競爭對手在其標準程序範圍內的政治影響力或軍事控制力，俾能夠在下次均衡被顛覆而爆發戰爭時迅速在初期建立對戰略交通線的控制權。

⁹⁹ 王逸舟，*當代國際政治析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頁 208。

¹⁰⁰ Cohen, *Geopolitics, op. cit.*, pp. 50-52. 科恩對通道國的認定遠比本論文更加寬廣，他不僅使用“Gateway States and Regions”來擴大通道的概念，使之包含部分非國家但具有高度獨立經濟地位的地區如香港、杜拜(Dubai)、加納利群島(Canary Islands)、亞速群島(Azores)與開曼群島(Cayman Islands)等，他對通道國的認定也不僅是位於戰略交通線匯聚處的國家，還包括不位於戰略交通線匯聚處，但連接兩個不同地緣政治區的國家。

因此儘管平時在陸地與海上皆不存在真正的控制，但超強的標準地緣政治程序實際上卻使其在戰略交通線沿線的「面」享有極高的戰略優勢，不僅是交通線周邊條狀地帶的「線」，與扼制點的「點」周邊的戰略優勢而已。而這些戰略優勢在國際上形成各海陸戰略交通線受某些國家「控制」的認知。區域大國不敢挑戰超強的控制，強權則不願隨意挑戰控制，因為這可能會引發與超強之間的嚴重衝突而導致較弱小的本國受害，除非本國已決定為了達成更高的戰略利益，願意承受高昂的代價來改變結構形式。¹⁰¹因此吾人可藉由分析結構中的超強數目，以及超強的地緣政治屬性，來決定結構的形式：大致上可分為完全沒有領域存在的「無極」(non-polarity)，只有一個海洋或陸地領域的海權或陸權單極，兩個以上地緣戰略領域的兩極、三極、多極，以及所有戰略交通線均為一個國家所控制的霸權(hegemony)等六種形式。但憑著超強數目與地緣政治屬性判定的結構形式只是最粗淺的結構外貌，欲探討結構形式對體系穩定甚至均衡的影響還必須進一步研究結構中是否有其他強權存在，以及超強、強權的相對位置與地緣政治屬性的互動關係。

第三節、地緣政治均衡

地緣政治學從未對均衡提出真正嚴謹的定義，最常見的作法是將均衡等同於權力平衡，例如史派克曼稱「均衡就是平衡的權力(balanced power)...國家只關注對他們有利的權力(不)平衡而非均衡」。¹⁰²琳姆的書雖然題為「東亞地緣政治：尋找均衡」(*The Geopolitics of East Asia: The Search for Equilibrium*)但是她完全沒有提到均衡的真正概念，其書裡的均衡從文意中可知是繼承史派克曼的觀點。

科恩提出「地緣政治均衡」的概念時雖然接受了均衡即權力平衡的概念，但他同時又指出這是地緣政治體系中的穩定狀態，¹⁰³是開放體系中大致相等的各種衝突力量之間的動態平衡的質(quality)，平衡會因為新的勢力或刺激(stimuli)出現而被打破，體系雖可經由自我修正而恢復均衡，但有時機制會失靈，必須經由更大的人為干預才能取得新均衡；無論是自我修正維持既有均衡或產生新的均衡，其過程都伴隨原有力量平衡的改變。¹⁰⁴

更有甚者，馬漢完全沒有提到均衡與權力平衡之間的關係，他認為國際體系的均衡類似生態系統的均衡，每個國家在體系中必然有屬於自己的適當位置，一

¹⁰¹ 此種國家即是施維勒「利益平衡」(Balance of Interest)模型中所謂的「狼型」(Wolf)國家，其特徵是願意付出高風險的代價來改變現狀，使本國獲得較現狀中高出許多的利益。Randall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Summer 1994), pp. 103-104.

¹⁰² Nicholas J. Spykman, *American Strategie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42), p. 21.

¹⁰³ Parker, *Geopolitics*, *op. cit.*, p. 174; Ronald John Johnston, Derek Gregory, Geraldine Pratt and Michael Watts eds., *The Dictionary of Human Geography*, 4th edition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0), p. 310.

¹⁰⁴ Cohen, *Geopolitics*, *op. cit.*, p. 58; Saul B. Cohen, "Global Geopolitical Change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 81, No. 4(1991), p. 551.

如生物在生態系中有自己的「生態位」(Ecological niche)。馬漢雖然認為達成均衡的方法類似自然界的「天擇」(natural selection)，但他認為 20 世紀的強權太過強大，因此天擇的過程必須依照理性計算與判斷來避免衝突，使用人為的協調與協議來達成均衡與各種調整。¹⁰⁵

顯然，地緣政治均衡的概念仍有待更進一步的發展，不過由於均衡在國際關係理論中也是一個常見但同樣容易與權力平衡混淆的概念，因此在探究何謂「地緣政治均衡」之前，必須先釐清均衡的概念。

一、均衡概念回顧

傳統上，均衡在國際關係理論中的象徵(metaphor)與權力平衡密切相關，但權力平衡理論對均衡的概念則異常混淆。最常見的觀點是將均衡與權力平衡劃上等號，並用來描述體系中完全平均的權力分配狀態。¹⁰⁶此種觀點不接受權力不平衡狀態下仍有均衡，更反對完全推翻權力平衡作用的霸權或帝國體系可能出現均衡的想法。¹⁰⁷第二派觀點認為權力平衡體系的主體是體系本身而非國家，是一種權力分配狀態能夠阻止戰爭爆發、維持和平的體系，克勞德(Inis L. Claude Jr.)即持此種觀點，但他從未對均衡下過任何嚴謹或清楚的定義。¹⁰⁸雷諾斯(P. A. Reynolds)則在均衡主體是體系本身而非國家間或國家集團間的權力平衡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均衡概念。他提出三種均衡概念：穩定均衡、不穩定均衡、完美均衡(perfect equilibrium)。穩定均衡的概念指的是能用來防止對既有權力平衡的挑戰並恢復原狀(原有的權力分配結構)的均衡，不穩定均衡則是雖然體系成功防止霸權崛起，但最後卻創造出新權力平衡(與之前不同的權力分配結構)的均衡，至於完美均衡則是一種任何國家看似能順利達成目的，實際上卻不可能隨心所欲的體系，而均衡和體系穩定與否並不需要實際上不存在的完美均衡。¹⁰⁹

席漢(Michael Sheehan)也接受均衡的主體為體系的觀點，他主張權力平衡體系中的均衡並非組成體系的所有國家都一致強大，而是任何國家或聯盟都無力推翻體系建立霸權或帝國的情勢，¹¹⁰所謂的不均衡(disequilibrium)是均衡的一種狀態，雖然充滿了國際危機甚至戰爭，但只要這些危機並不過份削弱體系中其他國家抵抗潛在霸權擴張的能力，則整體而言體系仍維持均衡；至於均衡達成的穩定不是一個沒有戰爭的和平狀態，亦非特定國家之間的關係，而是體系是否能維持

¹⁰⁵ Mahan, *The Problem of Asia*, op. cit., p. 78.

¹⁰⁶ Dina A. Zinnes, "An Analytical Study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Theorie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 No. 3(1967), pp. 271-272; Richard Little,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etaphors, Myths, and Mode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72-73; Michael J. Sheehan, *The Balance of Power: History and Theory*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pp. 16, 18; Inis L. Claude, Jr.,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2), p. 13; Paul W. Schroeder,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ystem: Balance of Power or Political Equilibrium?"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5, No. 2(April 1989), p. 138.

¹⁰⁷ Sheehan, *The Balance of Power*, op. cit., p. 35; Little,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72.

¹⁰⁸ Claude,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p. cit., pp. 41-66.

¹⁰⁹ P. A. Reynolds,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econd edition (London; New York: Longman, 1980), pp. 201, 204-205, 212.

¹¹⁰ Sheehan, *The Balance of Power: History and Theory*, op. cit., p. 79.

整體，只要改變在容忍的範圍內，就無損於均衡。¹¹¹從這點看來，權力平衡體系所注重的均衡概念著重於體系的結構形式是否受到改變，假使體系的結構形式、內部的權力分配都沒有基本的變化，則這樣的體系就可被視為存在均衡，對權力平衡理論來說，最明顯或最完美的例子就是 18 世紀的歐洲國際體系，因為當時的戰爭都是有限戰爭(limited war)，使得體系中的權力分配沒有顯著的變化，至於不穩定的代表則是 1890 年之後的歐洲國際體系，蓋當時的體系由以往的多極逐漸轉變為兩極，而兩個敵對同盟集團之間並沒有任何政治緩衝存在。¹¹²

上述的權力平衡理論的均衡概念都沒有提到類似馬漢的合作性均衡概念，不過另有其他權力平衡理論認為均衡是體系中主要國家基於對現狀的滿足而合力建構一種符合主要國家安全利益的穩定體系。¹¹³賓克利(Robert C. Binkley)與湯姆遜(David Thomson)根據對 19 世紀外交史的研究，發現權力平衡概念自 19 世紀初以來曾發生大幅變化，但這樣的變化卻被國際關係學者忽視了。賓克利引用約翰羅素爵士(Lord John Russell)在 1852 對權力平衡的定義，指出在 1852 年之前的歐洲，權力平衡的意義不是如在 1914 年時所指的那樣是敵對國家之間的平衡結盟，而是沒有國家可以未經其他國家同意而逕自擴張，因此權力平衡指的是領土情勢，而 1860 年代之前的歐洲領土變遷皆透過歐洲協調的共識，後者不僅是政治工具，也是一個立法機構與會議過程，當歐洲協調在克里米亞戰爭(Crimean War, 1854-1856)之後完全崩潰，國際領土變遷不再需要經過大國共識，同盟對戰爭的影響變得比以往更為重要，權力平衡的意義才逐漸轉變為今日所熟知的樣貌。湯姆遜對權力平衡的概念變化亦有類似的觀點。¹¹⁴賓克利遂將以歐洲協調共識為外交政策和擴張之基礎的年代稱為均衡而非權力平衡。¹¹⁵

此種觀點與季辛吉有相似之處，後者認為均衡是國際力量平衡的秩序，由被所有主要強國接受的合法性原則所建構，在實務上有兩種類型，第一種稱為「一般均衡」(general equilibrium)，是類似 18 世紀歐洲國際體系，以嚇阻國家尋求霸權為目的的均衡，第二種則是以歐洲協調為代表，以平穩合作的形式界定特定強權之間的歷史關係來建立合法的國際秩序，他稱此為「特殊均衡」(special equilibrium)。¹¹⁶而所謂的「合法性」(legitimacy)，按照季辛吉的解釋，與所謂的「正義」(justice)不同，是指由所有主要強國都接受的國際秩序架構，或者至少沒有像凡爾塞和約之後的德國那樣利用革命性外交政策來表達其對秩序的高度不滿的國家存在的秩序架構。¹¹⁷值得注意的是季辛吉與席漢一樣認為在這種合法

¹¹¹ *Ibid.*, pp. 101-102, 186.

¹¹² *Ibid.*, pp. , 134-136; Reynolds,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p. cit.*, p. 213.

¹¹³ Little,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p. cit.*, p. 73.

¹¹⁴ David Thomson, *Europe since Napoleon*,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2), pp. 221-222.

¹¹⁵ Robert C. Binkley, *Realism and Nationalism: 1852-1871*(New York and London: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35), p. 162, p. 178.

¹¹⁶ Henry Kissinger, "The Congress of Vienna: A Reappraisal," *World Politics*, Vol. 8, No. 2(January 1956), pp. 265, 266.

¹¹⁷ Henry Kissinger, *A World Restored: Metternich, Castlereagh and the Problem of Peac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73), p. 1.

體系中仍然存在衝突，只是其範圍被限制住；戰爭仍然存在，但其爆發是以既存結構的名義，而戰爭之後的和平更證實唯有普遍一致的合法性才是正當的。¹¹⁸

權力平衡理論之外的相關國際關係均衡概念雖然也沒有統一的定義，但比起權力平衡理論的混淆卻有兩種比較突出的一致性，首先是與雷諾斯一樣認為均衡可依穩定程度而有所區分，其次則強調均衡是大國多邊合作的產物。例如施洛德(Paul W. Schroeder)就指出 19 世紀的歐洲權力平衡概念基於政治均衡(political equilibrium)而非權力分配，歐洲國際政治體系能維持穩定，發揮作用的是政治均衡而非權力平衡。施洛德不只描述概念上的變化，他由政治學角度提出自己的均衡概念，認為維持 19 世紀歐洲國際政治體系的均衡包含兩個部分：第一是國家或群體之間在國際上對權利、影響力與重要利益之間的聲索對抗，第二則是國家追求的目標之間存在一種平衡或和諧。歐洲的政治均衡仰賴各國的榮譽與尊嚴被承認、國家權利的滿足、條約的維持、強權聯合與所有的強權在歐洲協調(Concert of Europe)中有平等的地位；至於均衡的破壞則不在權力轉移本身或是某個國家侵略性地使用其權力，而是拒絕使用已經建立起來用於維持國際秩序的方法來對改變實施合法的制裁。¹¹⁹均衡體系的目的是藉由強迫每個強權承認其他國家的獨立權利一如其本身的獨立權利來保護國家的獨立。¹²⁰但與賓克利等人不同的是，施洛德並不認為均衡在 1850 年代之後已不存在，而是持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

吉爾平的均衡概念同時結合了經濟學與權力平衡的完整論述，但強調國際政治經濟學(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ics, IPE)的主導作用。均衡原來是「新古典經濟學」(Neo-Classical Economics)的核心概念之一，其來源是供需法則，認為在完全競爭市場(Perfect Competitive Market)中，達成供需平衡的價格點就是均衡點，此時供給與需求方在既有生產要素水準中都沒有繼續獲利的空間，除非生產要素水準發生改變，否則供給方與需求方單方面調升或降低價格都會導致對方減少消費或降低生產，反而傷害本身的利益，使得雙方都缺乏改變既有價格的動機，因此均衡簡單來說就是尋求改變的力量被平衡的狀態。¹²¹

吉爾平主張均衡就是體系中所有主要國家皆滿意於領土、政治與經濟安排，相信任何改變體系現狀的企圖的獲利都低於所須花費的成本，結果缺乏改變現狀的動機而使國際體系得以處於穩定狀態。雖然這是成本考量的結果但實際上與價格均衡點的概念是一致的。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吉爾平引述季辛吉的合法性觀點，認為均衡必須具備合法性，合法性越高越能有效降低國家改變現狀的動機，反之則否。¹²²而合法性的來源在吉爾平看來就是體系中的主要行為者能否合作達成大家都能接受的安排。吉爾平同時主張均衡仍然容許在領土、政治、經濟等層面的

¹¹⁸ *Ibid.*, pp. 1-2.

¹¹⁹ Schroeder,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ystem: Balance of Power or Political Equilibrium?" *op. cit.*, pp. 143-144.

¹²⁰ *Ibid.*, p. 138.

¹²¹ Johnston, Gregory, Pratt and Watts eds., *The Dictionary of Human Geography*, *op. cit.*, p. 229.

¹²²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12-13.

小規模調整，調整的起因則在於任何體系中都不斷會因政治、經濟與科技變化，而產生有利於某個行為者能從中獲益或威脅其他行為者利益的現象，體系的相對穩定程度則取決於其利用調整安排以適應變化的能力。

若調整的需求很小，體系就呈現自我平衡(homeostatic)狀態，¹²³不過一旦調整導致某個或多個國家改變現狀的潛在收益上升或降低改變的成本時，大規模的變化使自我平衡無法維持而進入不均衡狀態，吉爾平對不均衡的概念與席漢有所差異，他認為不均衡可能是由於軍事、科技或其他方面的變化使征服領土的收益提高或以其他方式提高改變體系的收益，也可能因為國家之間出現不平衡的權力成長。¹²⁴這兩種原因都會造成體系中權力的重新分配，導致不均衡現象產生，而不均衡雖然可能以和平方式解決，但歷史上真正常見的方式是霸權戰爭(hegemonic war)，在戰爭後以和平解決重新安排體系中的政治與領土基礎，以達到新的權力分配、均衡與現況。由於調整與不均衡持續在體系內發生，吉爾平遂認為均衡只是國際政治不斷變化過程中的暫時現象。¹²⁵

帕森斯(Talcott Parsons)與席爾斯(Edward A. Shils)則認為均衡是在一個足夠長久的體系中維持秩序的趨勢，包括自我維持能力極強而相當穩定的靜態均衡，與遵循一種既定模式(determinate pattern)的變動「過程」(process)而非隨機模式的動態均衡(moving equilibrium)；過程被定義為「任何體系或體系的一部份由某種狀態轉變為另一種狀態的模式」，兩種均衡中都存在過程，體系的穩定存在於過程內的相互關係。¹²⁶體系本身在任何時候都存在與均衡達成時的不一致(incompatibility)情況，可能是兩個主要行為者之間的關係發生大變化，此時體系依賴兩種過程適應新的變化：第一種是藉由消除不一致來使均衡回復到先前的狀態，第二種則是一旦無法消除不一致，而新關係被確立下來之後，使體系其他部分的關係同樣發生變化以達到整體新均衡的過程。¹²⁷這似乎顯示二人認為假使體系整體處於均衡，則每個組成體系的部分也都處於均衡狀態。¹²⁸二人並沒有提及均衡是否需要藉由國際安排來達成，不過提出均衡的兩種維持方法，分別是維持體系內部組成的分佈與均衡狀態時一致的「分配」(allocation)過程，以及使體系的內部屬性與邊界能融為一體以面對外在變化的「整合」(integration)過程。¹²⁹

二、均衡的特徵及其與權力平衡的差異

¹²³ 雖然上述的定義不涉及權力平衡，但吉爾平又引用拉德德(Trout Rader)的觀念，將平均權力分佈、征服收益降低與體系穩定三者結合在一起，見 *Ibid.*, pp. 11-12, 13.

¹²⁴ *Ibid.*, pp. 13-14.

¹²⁵ *Ibid.*, p. 155.

¹²⁶ Talcott Parsons, "An Outline of the Social System," in Talcott Parsons, Edward A. Shils, Kaspar Naegele, and Jesse R. Pitts eds., *Theories of Society* (New York: Free Press, 1961), p. 201; Talcott Parsons and Edward A. Shils, "Categories of the Orientation and Organization of Action," in Talcott Parsons and Edward A. Shils eds., *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Actio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p. 107.

¹²⁷ *Ibid.*, p. 108.

¹²⁸ James E. Dougherty and Robert L. Pfaltzgraff, Jr. eds., *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omprehensive Survey* (New York: Longman, 2001), p. 115.

¹²⁹ Parsons and Shils, "Categories of the Orientation and Organization of Action," *op. cit.*, p. 108.

由以上的回顧可發現，均衡的概念相當龐雜，不過整體而言，這些不同的概念都認同均衡的主體為體系，是體系中追求結構形式、領土現況、國際政治與經濟的秩序和運作方式**迅速**發生有利於本身的改變的力量，被不希望發生這種改變的力量所平衡，而形成的長期體系穩定狀態。此種平衡來自兩種情況，第一種是體系中原來相互激烈競爭的所有主要國家體認到，現有的地緣政治結構不可能讓他們能取得真正壓倒對方的相對或絕對利得，而一旦再度爆發大規模戰爭，反而可能讓他們失去在體系中既有的政治、領土與經濟利益，故願意形成多邊合作來確保本身的利益。第二種情況則是體系在經歷大規模戰爭後，主要國家為求不再發生類似威脅所有主要國家利益的大戰，而達成多邊安排並成立國際建制，藉由在建制中的合作調和各大國之間的利益衝突並維繫體系的穩定。但學界對於均衡的達成是否需要權力完全平衡的結構並無共識，至少分成兩大類觀點：多數權力平衡理論的觀點認為必須依靠平均的權力分配結構，或至少需要不致出現某個國家或國家集團能建立霸權或帝國的權力分配結構；但少數權力平衡理論觀點，以及大多數權力平衡之外的相關國際關係理論均衡概念並不強調權力平衡結構的重要性，反而主張大國合作甚至多邊國際建制對均衡達成的重要性。

這種情況實與本節開頭所提到的兩種地緣政治學均衡概念沒有太大的差異，似乎又回到原點，但實際上，均衡達成的關鍵是大國多邊合作對體系的穩定作用，權力平衡則是這些合作中安排各方政治、經濟、領土利益的重要原則，目的在於協助大國確立在建制中的合作關係，防止合作因為某些大國獲得完全超過其他大國的能力而推翻合作，或將合作轉為受其支配的同盟，用於創造霸權或甚至帝國。二者的概念雖然不同，卻並不互斥，但看起來也很接近，因此容易產生混淆。不過最主要的差異是均衡的行為主體為體系，或體系某個組成部分(次體系，Sub-system)，而權力平衡的主體則是國家。國際體系不同於結構，其一般特徵與定義大致上包括國家與結構等在內的許多組成單元，與單純物質組成的結構最大的差異在於體系是國家、結構等多種組成單元的集合體，單元之間擁有規律的政治、經濟、社會等互動關係，並且經由互動互相影響彼此的行為與發展，互動同時也產生互賴(interdependence)，互動越高，互賴就越深，成為限制國家使用權力解決國際問題行動自由的新變數。¹³⁰此外，體系還包含國家與其他行為者互動時所依循的成文與不成文規範、原則、道德標準等秩序原則。¹³¹溫特的三種無政府狀態文化(cultures of anarchy)－霍布斯、洛克、康德¹³²是秩序原則的基礎，但不同無政府狀態文化中還包含其他下文將提到的更具體的特徵，不可單純認為無政府狀態文化即是體系秩序原則。而由於每個時代的秩序原則並不相同，

¹³⁰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Inc., 1979), p. 79;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op. cit., p. 26; Reynolds,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p. cit., pp. 185-186; Headley Bull and A. Watson eds., *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1; Morton A. Kaplan, *System and Proces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olchester, UK: ECPR Press., 2005), p. 33.

¹³¹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p. cit., pp. 88-89.

¹³²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U.K.;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chapter 6.

也導致每個時代建構均衡的合法性大不相同。

由於主體不同，權力平衡與均衡在概念上最大的差異就是前者的概念極度複雜。莫根索(Hans J. Morgenthau)認為權力平衡有四種含意：¹³³特定情況下的政策；作為一種確實的政策狀態；大致平均的權力分配狀態；任何權力分配狀態。克勞德也另外提出四種意義：¹³⁴對國際權力分配的單純描述，在這種情況中可能代表完全平均或不平衡的權力分配狀態；國家的外交政策或政策原則；作為國際政治體系；學者對國際關係中權力問題的關切象徵(symbol)。懷特(Martin Wight)更整理出九種不同的權力平衡意涵：¹³⁵平均的權力分佈；權力應該平均分佈的原則；現存的權力分配狀態；藉由犧牲弱者來使強者的權力獲得均等增強的原則；我方必須獲得較對方具優勢的力量，以避免權力分佈成為不平均狀態的原則；維持權力平均分配的機制；在現存權力分佈狀態中擁有特殊優勢；卓越的優勢(predominance)；國際政治創造權力平均分配的內在趨勢。至於所謂的「權力平衡體系」(Balance of Power System)，是學者從權力平衡理論切入分析體系中的國家行為，指的是從體系運作依照權力平衡法則，但所謂的權力平衡「法則」(rule)並非真正的體系秩序原則(因為在任何體系、任何時代中，國家都存在權力平衡思考)，只是學者提出的歸納原則，而不同學者的歸納原則並不一致。¹³⁶反之，均衡就相當單純，只是用來描述體系或次體系內部的長期穩定狀態而非國家之間的權力關係，¹³⁷既不牽涉體系中的權力分配結構，也不涉及國家的政策。

既然均衡是體系中追求迅速改變的力量與希望維持既有秩序的力量之間平衡所形成的長期穩定狀態，則此一尋求改變的力量不僅強大且影響範圍遍及整個體系，幾乎對所有的主要大國都是潛在或確實的威脅。改變力量的來源雖然多數是國家的領土擴張，但亦有可能來自不同的政治、經濟意識型態或宗教信仰，為了尋求將本身在國際間並非主流的意識型態成為主流而發生的擴張行為，即阿宏(Raymond Aron)所謂的，各國都分享共同意識型態的「同質體系」(homogeneous system)，以及分享不同意識型態的「異質體系」(heterogeneous system)兩者之間的衝突。¹³⁸要平衡此種遍及整個體系的改變力量，必須所有主要行為者一起合作，創造出符合體系秩序原則、具有合法性的安排，將國家的個別要求轉為所有大國的一般利益才能達成，¹³⁹而此種情況只有依賴大國多邊合作才能達成。

權力平衡理論雖然承認均衡的出現乃是人為外交謀畫(diplomatic contrivance)的結果，¹⁴⁰聯盟亦屬一種國際合作，但此種對抗性平衡只是以權力和能力嚇阻對

¹³³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5th editi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8), p. 167, Note 1.

¹³⁴ Claude,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p. cit., pp. 13-25, 37-39.

¹³⁵ Martin Wight,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Herbert Butterfield and Martin Wight eds., *Diplomatic Investigations: Essay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66), p. 151.

¹³⁶ 例如卡普蘭與席漢的「法則」即甚為不同，請參考 Sheehan, *The Balance of Power: History and Theory*, op. cit., pp. 87-88; Kaplan, *System and Proces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p. cit., pp. 35-36.

¹³⁷ Sheehan, *The Balance of Power*, p. 79.

¹³⁸ Raymond Aron, *Peace and War: A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heory*, trans. by Richard Howard and Annette Baker Fox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3), pp. 99-100.

¹³⁹ Kissinger, "The Congress of Vienna: A Reappraisal," op. cit., p. 265.

¹⁴⁰ Claude,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p. cit., pp. 48-49.

現狀不滿國家的擴張行為，未必能創造出為每個大國所接受的合法性，故達成的是單純的體系穩定而非均衡，敵對行為者彼此的基本利益並未經由轉變為共同的安全要求而得到滿足，難以使所有大國都認為當前的體系持續下去對其有利而願意維持體系現狀，反而可能創造出某個或某些大國認為既有結構與體系秩序壓迫其國家利益，使秩序成為所謂的「革命性」(revolutionary)，¹⁴¹不斷尋求與增強改變的願望與力量，隨時伺機改變結構與體系來符合自身的利益，因此體系仍然充滿高度的緊張，一旦權力分配出現大幅度的變化或出現不平衡的科技發展，導致某一方擁有明顯的技術優勢時就會變得極不穩定，容易因此爆發大規模戰爭(不一定為總體戰爭)。權力平衡創造的持續一段時間的和平狀態並非均衡的結果，而是國家在這段期間考量到發動戰爭的擴張所得比不上所需付出的成本的緣故。這也使得均衡具有**主動**達成穩定而權力平衡是**被動**達成穩定的差異，而且使得均衡的出現比權力平衡更為困難：假使用權力平衡就能達成穩定，則國家不會考慮合作性的均衡，除非體系中出現對全體主要行為者都是最嚴重的國家安全威脅，因為即使穩定中存在緊張，但國家不必藉由妥協(均衡的最大特徵)就可維持穩定並獲得相當可觀的利益。

因此，根據上述的概念整理與分析，本論文認為均衡具有如下六種特徵：

(一)、體系或次體系的整體穩定狀態

均衡的主體既然為體系或次體系，其必然是體系或此體系整體的穩定狀態，而非體系或次體系某個部分的穩定狀態。所謂的次體系，在國際關係研究中經常被等同於「區域次體系」(regional subsystem)，但它既可以是體系的某個組成實體，也可以是以體系研究途徑分析研究者想觀察的簡化後的體系現象，¹⁴²凱澤(Karl Kaiser)對次體系下的定義便符合這樣的觀點：「世界政治中的基本單元之間具有一定程度的規律性與緊密度的關係，以及意識到參與單元之間具有互賴關係的關係行為模式」。¹⁴³因此其研究對象不限於世界上的自然地理區域，可以是體系中任何一個由意識型態、政治、軍事、經濟、金融、組織關係等界定的群體，¹⁴⁴即使範圍限定於區域次體系，凱澤也認為除了地理區域之外還可包含如北約、東南亞公約組織(SEATO)之類成員不限於同一個地理區域的有組織的空間群體。¹⁴⁵均衡必須存在於體系或次體系全體(視研究主體為體系或次體系而定)，次體系的某個部分達成長期的穩定，或組成體系某個部分的次體系本身達成均衡，並不表示體系本身同時也達成均衡。

而基於上述的基本特徵，均衡可分為兩種，第一種是在缺乏霸權的體系中產

¹⁴¹ Kissinger, "The Congress of Vienna: A Reappraisal," *op. cit.*, p. 265.

¹⁴² 王軍，「雷蒙·阿隆的歷史社會學方法析論」，*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第1期(2007年)，頁32；Michael Haas, "International Subsystem: Stability and Polarity,"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4, No. 1(March 1970), p. 100.

¹⁴³ Karl Kaiser, "The Inter- action of Regional Subsystems," *World Politics*, Vol. 21, No. 1(October 1968), p. 86.

¹⁴⁴ Peter Berton, "International Subsystem-A Submacro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13, No. 4(December 1969), pp. 332-333.

¹⁴⁵ Kaiser, "The Inter- action of Regional Subsystems," *op. cit.*, p. 86.

生的一般均衡，第二種則是由霸權由提供穩定國際秩序公共財的「霸權穩定式均衡」。兩種均衡的共同特徵都是體系或次體系的長期穩定狀態，但內涵與形式則稍有差異，下文將進一步說明。

(二)、大國合作的產物

判斷國際體系是否存在均衡的首要變數，就是體系內的主要大國(超強與強權)之間是否願意藉由國際合作創造出滿足各方在領土、政治、經濟等方面利益的合法國際安排，來達成與維護本身在體系中的主要國家利益，並消除主要大國改變體系現狀的動機。

第二個變數則是多邊國際建制的存在。合作的結果經常創造出多邊國際建制來運作均衡，建制依照克拉斯納(Stephen D. Krasner)、基歐罕(Robert O. Keohane)、奈伊、哈斯(Ernst Haas)、蒲恆力(Hedley Bull)等人的定義，可視為國際社會中互相協調以規範國家行為與控制其效應的一套明示或暗示的原則(principle)、規範(norm)、規則(rule)與決策過程(decision-making procedure)的網絡，制度(institution)對原則、規範、規則與程序的設立、傳播、執行、強化、解釋、合法化與採行的重要性雖然為布爾所強調，但在討論建制對均衡的重要性時必須注意到的一點是並非任何時代中正式的國際制度都是國際體系中的重要行為者，而原則、規範、規則與程序在沒有制度的情況下也能發揮相當的作用，儘管其效用可能不如有正式國際建制作為執行載體的情況，但仍不可忽視。¹⁴⁶

均衡所仰賴的國際建制包括聯合國之類的正式政府間國際組織(IGO)或其他包含所有強國在內的多邊國際建制，如維也納會議所建立的歐洲協調「公會體系」(Congress System)等。條約雖然是建制的一部份，但單純的條約安排並非均衡，因為簽署條約的大國可能處心積慮修改甚至撕毀條約，這是歷史上常見的現象。雖然均衡的達成有賴建制，但建制的存在並不一定代表達成均衡，國家可能已經根本不存在合作的願望，使得建制無法發揮其功效，均衡便不存在。沒有建制的大國合作亦非均衡狀態，一方面在於這只是大國之間的不成文默契，二方面是可能只是少數幾個大國之間的合作，未必得到其他大國的同意與認可，三則缺乏建制制訂遊戲規則來約束的合作隨時會因為局勢的發展導致戰略利益發生變化而消失。因此對均衡而言，大國合作與國際建制二者缺一不可。

(三)、包含衝突的穩定狀態

幾乎每一種均衡概念都提到均衡絕非毫無衝突，因為改變的力量始終存在，當維持體系現有運作模式、組成結構、領土現狀力量能有效平衡希望改變的力量時—可能因為所有主要行為者皆參與國際合作並對現狀皆感到滿意，或感到不滿意的大國力量明顯不足以突破維持力量，或肇因於其他政策上的本益比考量，無法全力追求突破的對外戰略—衝突可因建制能迅速將其解決而維持自我平衡，但

¹⁴⁶ Stephen D. Krasner, "Structural Causes and Regime Consequences: Regimes as Intervening Variabl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6, No. 2(Spring 1982), p. 186; Ernst Haas, "Structural Causes and Regime Consequences: Regimes as Intervening Variabl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4, No. 4(Autumn 1980), p. 553;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1977), p. 19; 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54.

當改變的力量越來越大—可能體系範圍發生變化，必須適應新行為者加入對既有安排的影響；或不滿的國家越來越多；或體系範圍不變的情況下，原有權力分配狀態改變；或既有的安排無法適應政治、經濟、科技持續發展帶來的新局勢；或體系的秩序原則逐漸發生改變—衝突規模越來越大也越來越難解決，自我平衡機制不復能發揮功用，不均衡於焉出現，此時主要行為者將面臨選擇以外交手段解決不均衡並恢復既有的均衡，或以霸權戰爭來直接達成新均衡。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恢復既有安排，但均衡內涵絕不會與最初達成時相同，這是因為長期下來的互動使得體系環境—並非單指結構，還包含體系秩序原則與各國的重要國家利益對象—已發生重大改變的緣故。套用梅特涅(Prince Klemens von Metternich)的話，均衡狀態中的穩定並非停止不動，¹⁴⁷而是使體系能夠在某種秩序原則的支配下順利發展，或者如帕森斯所言，有秩序地從一種狀態到另一種狀態。

(四)、合作仍包含權力平衡考量

雖然均衡與權力平衡不同，但權力平衡是達成均衡體系必不可少的重要工具。¹⁴⁸均衡所使用的權力平衡有兩種，亦即李特爾(Richard Little)所提出的「競爭性權力平衡」(adversary Balance of Power)與「協作性權力平衡」(associational Balance of Power)。所謂的「競爭性權力平衡」也就是上文所提到的一般概念中的權力平衡，其概念是強國會監控國際體系中所有國家擁有的物質權力並試圖操縱權力的分配朝向對其有利結果以增加生存機會；「協作性權力平衡」則與英國學派和古典現實主義(Classical Realism)的國際社會概念相關，同時考量權力中的理念與物質因素，其中一個關鍵的理念因素是強國承認它們有維持國際社會秩序，並且將秩序作為建立與維持權力平衡必要條件的集體責任。¹⁴⁹換言之，兩種權力平衡的最大差異在於競爭性權力平衡是單純的物質性，協作性權力平衡則有很強的理念性特徵。而既然均衡是大國多邊合作的產物，必然需要協作性權力平衡的成功運作，故協作性權力平衡的存在是均衡能否達成的必要條件，而均衡則是協作性權力平衡在整個體系中包含所有主要大國並運作成功的結果。

在李特爾的研究中，他發現兩種權力平衡都曾被歐洲學者認為可以達成均衡，不過這是對均衡概念混淆的緣故，因此認為競爭性權力平衡可以藉由創造出權力平均分配的結構來達成均衡，而協作性權力平衡則可以由大國的政治合作來建立政治均衡。¹⁵⁰兩種權力平衡似乎是站在對立面並對體系的穩定有截然不同的功能，但實際上，兩種權力平衡都包含在均衡的作用與運作中，但具有不同的運作次序，競爭性權力平衡比較接近林碧炤所謂的國家相處的方法之一，而協作性權力平衡的作用則接近於林碧炤所稱的，一旦平衡成為國家對外政策的目的，就會不斷想化異求同，以相同的規範或制度來維持均勢。¹⁵¹當然，他所指的利用規範或制度來維持均勢，視一般均衡中的情況。

¹⁴⁷ Andrew Milne, *Metternich*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Press, 1975), p. 170.

¹⁴⁸ A. F. Pollar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Edgar Algernon Robert Cecil eds., *Essays on Liberalism* (London: W. Collins Sons & Co. Ltd, 1922), pp. 25-26.

¹⁴⁹ Little,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p. cit.*, pp. 11-12.

¹⁵⁰ *Ibid.*, pp. 72-73

¹⁵¹ 林碧炤，*國際政治與外交政策*(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第二版，1997年)，頁311。

上述的邏輯可以沃佛斯(Arnold Wolfers)的觀點進一步說明。沃佛斯曾指出所謂的「修正主義國家」(Revisionist states)只有在知道他們改變體系現狀的意圖與作為會受到其他反對改變現狀的國家以絕對優勢的力量抵抗的時候，才會徹底接受現狀之下的權力平衡。¹⁵²故必須利用「競爭性權力平衡」的競爭性作用，創造出每個大國皆無法再有進一步提高相對利得機會的結構與安排，避免某些國家或國家集團佔有相對於其他國家與國家集團的相對乃至絕對優勢，造成其他大國的利益受到嚴重威脅，結果使這些被威脅的國家視體系秩序為革命性，而使合作的合法性消失，導致合作破裂。不過如果僅是利用競爭性權力平衡來避免上述情況之發生，最後很容易變成單純的權力平衡競爭而步入所謂的「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反而成為尖銳的對峙而無法合作。故第二種作用是在成功運用競爭性權力平衡達成安排後，進一步利用「協作性權力平衡」來使體系中各大國皆視體系秩序的穩定為其最高利益並促進其產生共同維繫體系穩定的責任感，以共同合作維持體系秩序之穩定和打擊對各大國都是首要安全威脅的來源，藉此促使所有大國樂意參與合作機制，產生維持既有體系的政策偏好，從而提高均衡的穩定性。而基於均衡仍依賴競爭性權力平衡的作用來產生難以突破的結構現狀與安排，故成功的一般性均衡個案皆是由體系中力量較弱的強權或次等國家所提出，例如下文將提到的維也納會議時的奧地利帝國與中國春秋時代的宋國。由超強提出的均衡構想，例如蘇聯在冷戰時提出的「亞洲集體安全倡議」(Asian Collective Security Proposal)的倡議，¹⁵³與美國在 2002 年國家安全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中欲建構新的協作性權力平衡，¹⁵⁴很容易被其他大國視為超強欲進一步成為霸權的工具而遭到抵制而失敗。

霸權穩定式的特殊均衡雖然由足以抵擋體系中其他強國單一或聯合反擊的霸權所建構，但這並不代表霸權在建構與運作此一均衡時不須要考量權力平衡關係。由於均衡的質仰賴體系中其他國家對均衡的合法性承認，而體系中其他強國均仍然對霸權抱持競爭性權力平衡的觀點，並非完全擁護霸權建構的均衡之下的規範與運作制度，故霸權在增加本身管理均衡的成本時，亦必須盡可能降低其他強國改變既有均衡的動機，以免危及對霸權有利的均衡運作。兩種權力平衡概念仍然需要交互使用－競爭性權力平衡用來實施「分而治之」的政策，「分化」其他強國可能的反霸權聯合；協作性權力平衡則用來強化其他強國對霸權穩定式特

¹⁵² Arnold Wolfers,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Arnolds Wolfers eds., *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126.

¹⁵³ 這是蘇聯在 1969 年 6 月，由當時蘇共中央總書記布里茲涅夫(Leonid Ilyich Brezhnev)所提出，爾後延續至戈巴契夫時代的蘇聯亞洲政策，其目的是藉由在亞洲建立以蘇聯為主導的安全體系來產生反華同盟體系與填補西方國家撤離東南亞之後的權力真空，但是遭到中國的強烈抵抗而始終沒有成功。Alexander O. Ghehardt, "The Soviet System of Collective Security in Asia," *Asian Survey*, Vol. 13, No. 12 (December 1973), pp. 1075-1091; Arnold L. Horelick, "The Soviet Union's Asian Collective Security Proposal: A Club in Search of Members," *Pacific Affairs*, Vol. 47, No. 3(Autumn 1974), pp. 269-285; Elizabeth Wishnick, "Soviet Asian Collective Security Policy from Brezhnev to Gorbachev," *East Asia*, Vol. 7, No. 3(September 1988), pp. 3-28.

¹⁵⁴ Little,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p. cit., pp. 82-84

殊均衡合法性的承認，並與霸權一起維護均衡的運作。如司馬法·仁本篇所言：「王、霸之所以治諸侯者六：以土地形諸侯；以政令平諸侯；以禮信親諸侯；以材力說諸侯；以謀人維諸侯；以兵革服諸侯。同患同利以合諸侯，比小事大以和諸侯」，¹⁵⁵其中土地、兵革都是明顯的競爭性權力平衡運作方式，政令、禮信、材力、謀人、同患同利、比小事大則同時具有兩種權力平衡概念。

(五)、非專門用於阻止霸權國家出現的政策工具

競爭性權力平衡具有非常明顯的阻止霸權或帝國出現的政策意涵，因此以這種權力平衡觀為基礎的當代權力平衡理論認為均衡的目的就是阻止霸權甚至帝國出現的最穩定體系狀態。協作性權力平衡雖然也有阻止霸權或帝國出現的政策意涵，¹⁵⁶但根據李特爾的研究，並非任何協作性權力平衡的實踐皆有此種目的，美國在 2002 年提出的國家安全戰略即是如此。而雖然均衡運用協作性權力平衡來達成，而且看起來也有類似權力平衡般阻止霸權與帝國出現的用意，例如 19 世紀前半期的歐洲協調，但均衡本身並沒有這種明確的政策意涵或特定目的，只是體系因改變與穩定的力量達成平衡而呈現的長期穩定「狀態」，其本質不具備權力平衡那樣的政策意涵，¹⁵⁷尤其是均衡還包含霸權穩定式的特殊均衡，更不可能將其視為專門阻止霸權產生的政策工具。嚴格說來，一般均衡較具有此種意涵，但這是因為其乃是無霸權的結構中產生，參與均衡的國家不希望結構轉為霸權的影響，不是均衡本質的緣故。

(六)、極為脆弱的穩定狀態

由於均衡仰賴體系內所有大國在多邊國際建制中基於共享價值、利益與對現有體系秩序原則的滿意所形成的密切合作來維持，但國家利益時時改變，一方面在於不同的決策者對國家利益的優先順序定位與外交理念不同，二方面在於隨著體系內高度的互動與各種政治、經濟、科技、社會、文化等因素不斷地發展，秩序原則時刻在變動而導致各國的利益常發生衝突。因此均衡雖然是體系或次體系中的長期穩定狀態，但是一種相當脆弱的穩定狀態，雖然不如克拉克(Ian Clark)認為非常容易因為小事件之發生而立即崩潰，¹⁵⁸但正如上文提到的吉爾平之觀點，真正的均衡實際上只存在於安排達成之瞬間，在此之後即因各種發展與維持原有安排的成本上升速度遠高於各國維持的技術成長之速度，使均衡迅速趨向不均衡而必須時時調整，

經由上文對均衡特徵與均衡和權力平衡差異的整理之後可對二者之間的關係歸納如下：真正的均衡體系是體系中的主要大國，藉由多邊合作創立國際建

¹⁵⁵ 王雲璐注譯，*新譯司馬法*(臺北：三民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96年)，頁15。

¹⁵⁶ Little,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p. cit., p. 67.

¹⁵⁷ 這是本論文均衡觀點的自然結果，但權力平衡理論中將均衡視為阻止霸權或帝國出現的國際體系穩定狀態的觀點則認為均衡可以作為國家的外交政策方針，阿宏即採取這樣的觀點而對均衡作為國家在不同權力結構中的政策有深刻的分析。請參考 Aron, *Peace and War*, op. cit., pp. 125-128.

¹⁵⁸ Ian Clark, *The Hierarchy of States: Reform and Resistance in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55.

制，並運用權力平衡原則來分配體系中的領土、政治、經濟利益，達成各國都願意接受的多邊國際安排，使參與建制的的所有主要大國都接受經由建制所創立的國際秩序為合法，並認同此一秩序最能保障本身在體系中的國家利益，藉此降低對體系秩序不滿的革命性思想，以消除改變體系秩序的動機，出現體系的長期穩定狀態。但在此種穩定狀態中，各國仍可依照建制所創立的體系秩序運作規範，較有秩序地調整因局勢變遷而產生的利益變化。單純只依靠權力平衡原則，而沒有出現所有大國皆參與的多邊國際建制的體系不是均衡體系，充其量只能視為穩定體系，因為各主要大國的利益並沒有協調地分配來降低緊張、消弭改變體系秩序的動機，絕大多數主要行為者都視體系秩序為非法，意欲將其改變為最符合本國利益的型態，只是因為權力平衡的運作使其體認到立即發動戰爭以求改變的作法在當前不符合國家利益，然而一旦局勢發生變化，以尋求改變為目的的大規模戰事將很快發生。

三、地緣政治均衡

學者使用體系途徑分析國際關係時通常從其最感興趣的研究領域切入，並以此界定和定義體系中的行為者及其在體系內的互動關係。¹⁵⁹所謂的地緣政治均衡，就是地緣政治體系中的均衡狀態。而地緣政治體系按照科恩的說法，是將地緣政治世界視為一般的體系，提供一個分析框架供研究政治結構與其地理環境之間的互動關係。¹⁶⁰但是此種說法未免太過模糊，事實上地緣政治均衡固然其基本概念與均衡相同，但其主要分析點是研究以陸地、海洋為主要來源的地緣政治力量如何影響體系中的單元互動、形塑結構發展、達成與顛覆均衡的體系。國家是地緣政治體系中最主要與最基本的單元，而最高層次的單元則是地緣政治結構，此外隨著時代的差異，體系中的其他單元可能還包括組成結構的其他單元如地緣戰略領域、地緣政治區域與破碎帶，以及具有地緣政治意義與活動能力的區域性、跨區域性、全球性國際組織，具體代表如聯合國、歐盟、北約、東協、上海合作組織等。

並非每一種單元對均衡都有一致的影響，最主要的行為者是國家，國際組織的影響力則視其整合程度帶來的能力高低與政策方向而定，這樣的組織迄今只有北約與歐盟。地緣戰略領域、地緣政治區域與破碎帶等單元本身不具備對外的政治意志，在體系中並非類似國家或國際組織的主動性(active)單元，只能被動地影響均衡的達成與顛覆。由於均衡的範圍遍及整個體系，是體系中所有主要行為者都參與下的長期穩定狀態，故最能影響均衡的達成與顛覆的單元為體系或次體系中的超強與強權等兩種主要行為者。區域大國與能力更低落的其他國家對均衡的影響力較低，其角色是當超強與強權形成合作之後，承認均衡並加入合作中，亦即帕森斯與席爾斯，當體系中的某種關係確立下來後，其他部分適應此種新關係的過程。

¹⁵⁹ Reynolds,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p. cit., pp. 192-193.

¹⁶⁰ Cohen, *Geopolitics*, op. cit., p. 55.

(一)、地緣政治體系中的秩序原則

根據人類歷史與國際體系的演進史，以及本節前文學者們所提出的觀點與理論，再加上陸權與海權的地緣政治屬性差異所產生的二者相互關係，與對國際安全的不同要求形式，本章將地緣政治體系的秩序原則歸納出五種主要類型：

1. 體系允許國家的擴張方式

包括是否將國家的領土擴張視為常態、是否允許國家以戰爭作為合法的擴張方式、以及是否允許國家直接吞併其他國家等三種擴張方式。不同的時代允許的擴張方式不盡相同。

2. 體系內的政治秩序形式

主要可分為兩種，第一種是傾向以某個霸權甚至帝國所主導，各國在體系中的政治權利地位並不平等，國際爭端仰賴主導國家的國內法或政治裁決，呈現類似國內政治秩序的從屬性，古代東亞區域地緣政治體系就是此種秩序原則的代表。第二種則是體系中各國互動的法則並非依照某個國家的政治意志設立，雖然國際體系中還是存在霸權或帝國，但所有國家至少還能享有平等的國際政治權利，國際秩序為階級式而非從屬性，近代歐洲區域地緣政治體系就是這樣的代表。理論上來說還存在第三種秩序形式，即體系中毫無帝國或霸權存在，各國地位完全平等、不存在階級式秩序，不過這樣的體系秩序在歷史上還未真正出現過。

3. 國家共享的政治經濟意識型態

主要國家分享同一種政治或經濟意識型態者為阿宏所稱的同質體系，不同者則為異質體系。阿宏認為同質體系因為分享相同的意識型態，具有較為穩定、容易產生國際妥協、限制大規模暴力、易於預測等特性，而異質體系則因對抗而具有相反的特徵。¹⁶¹此觀點很明顯是從 18 世紀以來的歐洲區域地緣政治體系觀察與歸納的結果，但若從東方歷史而言，意識型態對體系的影響未必如此，例如中國的戰國時代是同質性極高的體系，卻具有與阿宏觀點相反的不穩定性、無限制使用暴力、不易預測國家行為等特徵。

4. 時代的地理觀點(geographical perspective)

這是國家對體系範圍內地理環境的集體認知，包括體系的範圍以及體系內的主要地緣政治力量是陸權還是海權。就前者而言，廿世紀的地理觀點是全球性的，但在此之前則是有許多如今被視為區域體系的各地緣政治體系各自獨立存在，每個體系都自命為世界，具有各自不同的運作模式與規範，彼此之間可能相隔巨大的獨立空間，因此缺乏真正能融為一體的政治互動，每個體系內部的反應對其他體系的影響很小，也很少關切其他體系內部的發展與變化，但在全球體系中則不然，所有的主要國家都會受到遠離本身的其他地區的變動所影響，某個地區的變動必然在其他地區引發回應。¹⁶²

5. 大陸國家與海洋國家的相互關係

地緣政治學最明顯的傳統及與一般國際關係理論最大的區別就在於其海陸

¹⁶¹ Aron, *Peace and War*, *op. cit.*, pp. 100-101.

¹⁶² Halford J. Mackinder, *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Defense Classic Edition, 1996), pp. 21-23.

二元論。地緣政治體系中，海權陸權何者居於主導力量，則影響每個主要國家的地緣政治與戰略重心，和隨之而來的體系秩序形式－陸權的控制遠比海權嚴密與絕對，¹⁶³因此在缺乏海權的陸權的世界體系中，以陸權為中心的霸權和帝國的從屬性秩序是常見現象。但在海權的世界體系中，因為海權的基礎是海上貿易，而且海權無法控制大陸上的國家，故其體系秩序雖然為階級性，卻不是以海權為絕對中心的從屬性。格雷認為海權與陸權的關係可以是戰略夥伴或戰略競爭對手，不過可能作為戰略夥伴要多於競爭對手，¹⁶⁴但他沒有解釋為何如此。事實上，所謂海權與陸權是戰略夥伴的結論只有在一種情況下才會成立－陸權無意發展屬於其本身的強大海上控制能力，甚至挑戰海權的地位，也就是陸權無意介入海洋事務，同時海權也無意朝陸上發展，介入大陸事務與陸權的勢力範圍。在這種情況下，海陸權之間的基本地緣政治利益都不受到對方的威脅，自然能發展夥伴關係甚至達成均衡，但假使陸權試圖發展強大的海洋控制能力並介入海洋事務，或海權試圖朝陸上發展與介入大陸事務，則海權與陸權之間將產生嚴重的競爭甚至敵對關係。

(二)、地緣政治利益與協作性權力平衡之安排

地緣政治體系中改變的力量無論其來源為何，必須以國家或國際組織為主要載體，這使得其以標準地緣政治程序和替代地緣政治程序呈現，不過並非前者總是改變的力量而後者是維持既有運作模式的力量，也有可能是某個或某些大國意圖達成本身的標準地緣政治程序以反抗其他大國甚至既有體系主導大國的標準地緣政治程序，或者替代地緣政治程序才是試圖改變體系運作模式的力量而標準地緣政治程序反而是維持既有運作模式的力量。

安排的達成必須盡可能滿足體系或次體系中參與合作的主要大國在政治、領土、經濟、軍事等四方面的主要地緣政治利益。主要地緣政治利益必與國家的地緣政治屬性一致，國家的擴張方向亦與其地緣政治屬性相符。因此地緣政治均衡實際上就是各大國相互在勢力範圍劃分上妥協，但這個勢力範圍劃分不是帝國主義時代單純在地圖上實現的勢力範圍劃分，而是互相不威脅彼此的基本地緣政治利益，例如大陸國家不追求建立強大的海軍，或與其他大陸國家甚至海洋國家聯合起來威脅海權對海上戰略交通線的控制，而海洋國家與海權也不追求在大陸上建立反對特定國家的同盟。而判斷地緣政治屬性不可僅以國家為島國或大陸國家而定，須視主導國家戰略決策的菁英所持的地緣戰略發展方向為何。¹⁶⁵為了達成均衡而擬定的安排要為大多數主要行為者所接受，必須考量地緣政治屬性，才能

¹⁶³ Parker, *Geopolitics*, op. cit., p. 162.

¹⁶⁴ Colin S. Gray, *The Navy in the Post-Cold War World*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The Pennsylvan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95.

¹⁶⁵ 例如日本帝國(1868-1945)其實是一個陸權而非海權，因為真正決定日本戰略方向的是陸軍而非海軍，而且日本主要的擴張方向大多尋求在亞洲大陸上的領土擴張，並沒有像英國與美國那樣的海權貿易擴張。同樣的，1890年之前的美國亦為陸權而非海權，因其擴張皆發生於北美大陸上的領土擴張，美國經濟發展並不像英國那樣依賴國際貿易，而且只擁有一支規模很小的海軍。如果吾人忽略此種差異，所發展的理論將過於偏向地理決定論，出現像米爾斯海默那樣的理論缺口而無法提供真正有益的解釋。

使安排符合這四方面的基本地緣政治利益：

1. 政治

大致上即為體系中主要大國在體系內作為一個大國的政治地位是否得到其他主要大國的承認、權利與要求是否被其他大國接納為合法。主要大國在體系與建制中是否保有平等的地位則需視時代而定，施洛德研究 19 世紀的歐洲國際體系故強調保有平等地位是基本政治利益，但未必每個時代的主要行為者在體系中都能保持完全平等的地位，尤其是在東亞古代歷史上更是如此，因此本論文將此修改為主要大國在國際建制中保有合於本身實力的階級化政治地位，以及主要行為者在所處的地緣政治區域中的勢力範圍或優越政治地位得到承認。

2. 領土

傳統上，主要領土地緣政治利益指主要大國本國、殖民地、勢力範圍的海陸邊界是否與另一主要大國的本國、殖民地、勢力範圍，或另一主要大國的重要盟國存在難以解決的爭議，或某一主要大國在邊界上佔有利於進攻相鄰主要大國的戰略地理，假使存在這種情形則均衡相當難以達成，因為處於不利戰略地裡的一方必然試圖盡全力改變戰略劣勢，而處於優越地位者卻不會輕易放棄這種優勢。不過在地緣政治結構中，另一個可能的領土地緣政治利益衝突來自強權與超強對地緣政治區域、地緣戰略領域交接處的海陸地區的政治主導權、主權權利等的爭執，當代最為明顯者為海洋專屬經濟區的歸屬與海上航運問題。

3. 經濟

有三種主要的經濟地緣政治利益，¹⁶⁶第一種是為了本國經濟發展而必須獲得的各種原物料、能源和天然資源(重商主義(Mercantilism)時代則以貴重金屬為主)。第二種則是在冷戰時期逐漸出現，在當代相當受到重視的區域經濟整合主導權。第三種經濟地緣政治利益常被人忽略，但對於國家的戰略行為相當重要的是國家所採取的經濟與貿易發展形式，如重商主義、自由放任主義(*laissez-faire*)、國家資本主義(State Capitalism)、社會主義(Socialism)、共產主義(Communism)、自給自足(Autarky)、貿易保護等在體系中的不同發展需求。其中資源的取得迄今都是國家最重視的經濟地緣政治利益，而經濟制度差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常為包括兩次世界大戰在內的許多重要國際戰爭的起因。¹⁶⁷

¹⁶⁶ 人口由於同時代表納稅、勞動力與軍事人力來源，在人口稀少的古代無論是哪個地區，亦皆為相當重要的地緣經濟利益，但由於中國在步入帝國時代以後即逐漸停止利用戰爭與擴張來掠奪人口，歐洲也在 17 世紀以後逐漸放棄類似的行為與蓄奴貿易，即使後來的新帝國主義殖民地競爭，其重點也不在人口的掠奪，殖民帝國更很少將殖民地原有的土著人口視為重要的軍事資產，因此本章不將人口列為地緣經濟利益之一。

¹⁶⁷ 例如富勒 (J. F. C. Fuller) 曾說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主要原因實為德國嚴重威脅到英國的貿易，使英國感到必須消滅德國這個最主要的商業競爭對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因同樣是納粹德國與其他國家的以貨易貨貿易(barter)交易重擊了英國與美國的國際貿易、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極為重視的金融信貸，以致於雖然易貨制度改善了德國在 1930 年代前後的世界經濟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中的惡劣貿易情況，但其不以國際金融借貸為主要交易方式的設計卻引起德國與美國之間的強烈敵對意識，對於激起英國和美國的反德意識，和美國加入對抗德國有一定程度的推波助瀾作用。鈕先鍾譯，J. F. C. Fuller 著，*西洋世界軍事史*(臺北：軍事譯粹社，1996 年)，卷三，頁 151-152、156、319-321。

4. 軍事

軍事地緣政治利益非單指軍隊力量的大小，而在於主要行為者是否擁有一支能夠控制海陸戰略交通線的武力，以及這支武力與其他主要行為者同樣控制力量之間的力量差距，更精確來說是指能用於交通線控制的主要兵種與輔助兵種之間的力量差異與部署地區。由於軍事地緣政治利益攸關交通線與領土的控制，並總是被作為權力平衡的主要考量因素，因此經常與政治和領土地緣政治利益掛勾，而且其實際重要性經常必須與後兩種地緣政治利益一起考量才能有效且正確地凸顯。

在四種地緣政治利益中，領土與政治利益在 19 世紀之前，因為國家的成長和擴張與國家內部決策集團的有形金錢利益與無形威望利益有直接相關，¹⁶⁸使其與經濟地緣政治利益相結合，而成為影響均衡最重要的兩種地緣政治利益。今天雖然國家內部的決策圈已不再靠對外領土擴張來獲得直接的有形物質利益，但領土與政治地緣政治利益還是與國家的威望、國際地位與國防有直接關連，甚至還涉及越來越受到重視的海洋資源開發，使其仍與經濟地緣政治利益有一定程度的結合，同時符合麥金德提出的國家行為動機的兩種根源，而仍為影響均衡的最重要兩種地緣政治利益，任何安排若無法在這兩種利益上滿足各主要大國，即使經濟與軍事方面能達成各方都接受的安排，均衡的達成依然是不可想像的，充其量只是穩定狀態而已，而且已達成的經濟與軍事安排仍隨時可能因為政治與領土衝突而遭到破壞，例如美、英、日、法、義雖然在兩次世界大戰間藉由華盛頓海軍條約(Washington Naval Treaty, 1922)與第一次倫敦海軍條約(London Naval Treaty, 1930)建立了規範五國之間的海軍力量比例，¹⁶⁹納粹德國也在 1935 與英國簽訂類似前述兩個條約安排的「英德海軍協定」，達成了雙方的軍事地緣政治利益安排，¹⁷⁰但日本在 1931 年之後對中國的侵略無法重新藉由國際協定來安排列強、日本與中國之間都能接受的新安排，遂導致日本於 1936 年廢棄華盛頓海軍條約—第一次倫敦海軍條約為期五年，而日本因為不滿美國等西方國家對中日關係的處置，並未加入第二次倫敦海軍條約—¹⁷¹德國則於 1939 年 3 月違反慕尼黑協定(Munich Agreement)併吞捷克之後，英德雙方因為對於歐洲的政治與領土地緣政治利益安排再無法達成妥協而進一步敵對，英德海軍協定也就在 1939 年 4 月為德國所廢棄，連帶影響了 1938 年 12 月英國與瑞典、挪威、丹麥、芬蘭等北歐國

¹⁶⁸ 例如在封建時代，君王或貴族可藉由擴張來增加自己的領地，由此使財富增加，因此在這個時期，決策圈除非有其他能壓制擴張的內部鬥爭理由或外部不利擴張的因素，否則皆熱中於擴張。國家更可由於成為體系的霸權或主導國，不僅有政治上的威望利益，還可在貿易非自由化的時代，藉此地位剝削體系中其他臣服於霸權或主導國的中小型國家，來藉此獲得政治與經濟上的利益。

¹⁶⁹ 吳玉貴譯，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編，**戰前之大本營海軍部**，前引書，頁 266-275、317-332。

¹⁷⁰ 關於英德海軍協定之談判背景、過程與結果，請參考 Joseph A. Maiolo, "The Admiralty and the Anglo-German Naval Agreement of 18 June 1935," in Andrew Lambert eds., *Naval History 1850-present* (Hampshire and Burlington: Ashgate, 2007), Volume II, pp. 87-126.

¹⁷¹ 吳玉貴譯，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編，**戰前之大本營海軍部**，前引書，頁 407-416。

家簽訂的「盎格魯－斯堪地納維亞海軍協定」(Anglo-Scandinavian Naval Agreement)的批准。¹⁷²

軍事地緣政治利益在 20 世紀之前是對均衡影響最小的地緣政治利益，因為體系的秩序原則視戰爭為合法的政策工具與國家的擴張手段，另外各國所擁有的能用於交通線控制與擴張的軍兵種大致相同，而且主要都是仰賴人力與獸力，故很少會產生影響深遠的軍備競賽，戰爭之後的條約除了極少數的例外—如羅馬共和國(Roman Republic)在與迦太基(Carthage)的第二次布匿戰爭(Second Punic War, 218 BC-201 BC)獲勝後，在和約中禁止迦太基擁有戰象與海軍，另外也在羅馬—敘利亞戰爭(Roman-Syrian War, 192 BC-188 BC)獲勝後，禁止塞琉古帝國(Seleucid Empire)擁有戰象，海軍艦隊規模限 10 艘戰艦¹⁷³亦不曾對戰敗國的軍事力量實施限制，在平時更幾乎沒有限武與裁軍會議。只是步入 20 世紀之後，才由於科技的發展而使得各國所擁有的軍事力量因為科技水準的高低而開始拉大其差距，尤其是在海空軍方面更是如此。人力與獸力對戰爭的影響開始被火力與機械力所稀釋甚至取代，雖然數量仍是軍事地緣政治利益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但這只建立在雙方在相同科技水準下，各軍兵種擁有類似的武器裝備的基礎之下。不過軍事地緣政治利益對均衡的影響力增加方式，卻是以裁軍與限武談判、會議等成為國際建制的一部份作為表現，從另一方面來說，也由於戰爭作為國家政策工具的合法性在 20 世紀之後逐漸被限制，無法繼續作為國家擴張的合法手段，使得軍事地緣政治利益對均衡的重要性因體系秩序原則的改變而未能與政治、領土兩種利益的重要性相提並論。

至於經濟地緣政治利益雖然經常與國內政治團體的利益相關，也是麥金德所稱國家對外行動的根源之一，在過去常是戰爭爆發的原因之一，但在經濟自由主義逐漸主導國際貿易，各種資源可以自由在國際市場上取得之後，經濟地緣政治利益對均衡的影響就逐漸降低。不過由於保護主義依然存在，且國家仍然對本國所生產的資源的外銷方向具有控制能力，特別是區域主義的盛行，使得經濟地緣政治利益對均衡的影響力並未完全消失。但是雖然目前因為區域主義之影響而導致地緣經濟與區域經濟整合大為盛行，然而與軍事地緣政治安排一樣，經濟層面的地緣政治安排的重要性仍無法壓過政治與領土地緣政治利益，缺乏政治與領土地緣政治安排支撐的經濟整合與地緣政治安排，還是充滿了參與國之間的競爭性權力平衡思維，例如吾人在當代東亞經濟整合中看到的中國、日本與東協之間的主導權競爭，單靠這種安排不可能達成均衡或長期穩定。反過來說，冷戰時期的歐洲整合之所以能夠成功由經濟層面擴大至政治與安全層面，也是因為西德在西歐的政治地位得到西方國家重新承認並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與西歐聯盟(Western European Union)，艾德諾(Konrad Adenauer)政府接納德國分裂之現實，

¹⁷² Joseph Maiolo, "Naval Diplomacy in Northern Waters: The Origins of the Anglo-Scandinavian Naval Agreement of 21 December 1938," in Rolf Hobson and Tom Kristiansen eds., *Navies in Northern Waters, 1721-2000* (London and Portland, OR.: Frank Cass, 2004), Volume 2, p. 204.

¹⁷³ 鈕先鍾譯，J. F. C. Fuller 著，*西洋世界軍事史*(臺北：軍事譯粹社，1996 年)，卷一，頁 217、227。

承諾不以武力統一德國、改變西德疆界現狀，與將武力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避免刺激當時敏感的領土地緣政治利益，以及能夠解決與法國戴高樂政府之間的經濟、政治與安全爭執的緣故。¹⁷⁴

因此地緣政治均衡的達成必須體系內的主要大國皆願意在地緣政治發展方向上妥協，互相協調本身的四種地緣政治利益，並藉由多邊地緣政治安排劃分互相可接受的地緣政治勢力範圍，和成立符合的多邊安排與國際建制以協調爾後的體系穩定與發展。地緣政治均衡之內的協作性權力平衡運作不是一般權力平衡理論只重視的軍事、政治或經濟權力的平衡概念，而是如英國學派(English School)的蒲恆力(Headley Bull)的權力平衡概念，被視為國際秩序運作的一部份，包括外交(Diplomacy)、國際法(International Law)、戰爭(War)及強權管理(Power Management)等四個物質與非物質變數互動之平台，並與之一起影響國際秩序運作。¹⁷⁵故可對地緣政治均衡作如下的定義：

地緣政治均衡是地緣政治體系或次體系中的主要大國為了維護本身在體系或次體系中的政治、經濟、領土軍事地緣政治利益，願意在這些利益中相互而不互相威脅妥協，並達成體系中的政治、經濟、領土與軍事安排來劃分互相接受的地緣政治勢力範圍，創立所有大國均參與的多邊國際建制，依靠建制的運作和大國合作來調和主要大國在這四方面的基本地緣政治利益之需求與發展，並消弭改變體系以滿足這四方面基本地緣政治利益的動機，使體系或次體系因改變既有體系運作模式的力量受到平衡而呈現長期穩定的狀態，並在建制的主導下，以符合體系秩序的方式發展。大國多邊國際合作與建制被越多主要國家視為具有合法性，均衡的品質越高，反之則否。

四、地緣政治均衡的不均衡與顛覆

與其他國際體系的均衡一樣，地緣政治均衡由於安排很難完全滿足主要行為者之間互相抵觸的各種地緣政治利益，使得主要大國永遠有破壞均衡的動機，使得因此均衡狀態中仍有許多試圖修正均衡基礎的擴張行為，這些擴張經常是國際危機與中小型國際衝突的根源。當出現危機與小型衝突時，均衡即轉變為不均衡，甚至進一步朝被顛覆發展。這個過程的速度快慢與均衡的「質」有密切的關係，「質」即為主要行為者對安排的滿意程度。安排越能滿足大多數主要行為者在這四方面的地緣政治利益，其合法性越高，越使這些主要行為者感到打破既有的均衡、建立另一個對自己更有利的均衡的成本過於高昂，也就越能降低他們顛覆均衡的動機。

反過來說，均衡有可能達成在無法滿足某些主要大國的基本地緣政治利益之下，這些大國可能在力量不足的無可奈何情況下接受均衡的達成，但如此一來其對均衡的基礎極為不滿，甚至認為均衡是「非法」的，導致國際秩序成為革命幸

¹⁷⁴ John Spanier,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 II*, 10th edition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85), pp. 46-50, 89-91.

¹⁷⁵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op. cit.*, pp. 106-107.

而使得均衡的「質」相當低落，非常容易遭到破壞，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經由凡爾塞條約(Versailles Treaty)、華盛頓海軍會議(Washington Naval Conference, 1921-1922)等戰後國際條約體系所達成的均衡，雖然安排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各主要國家之間的政治、經濟、領土與軍事地緣政治利益，但它只滿足了英國、美國與法國的主要地緣政治利益，其他主要戰勝國如日本、義大利的利益並未得到妥適的安排，遑論戰敗的德國、俄國、奧地利等，導致其所達成的均衡品質極為低落，在 1930 年代初期就開始遭到這些不滿的主要行為者的挑戰。

導致均衡朝向不均衡與顛覆發展的原因，除了國家對均衡的滿意程度之外，還主要來自體系中不斷發生的各種國際與國內變化，使得國家改變對利益的界定，進一步影響其對加入均衡的賽局思考結果。

(一)、國內變化

此即國家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的改變，導致國家的地緣政治利益產生變化。不過這四種層面的變化速度並不一致，速度最快、影響也最大的是政治環境，主要是受到秉持不同地緣政治密碼、戰略次文化的決策菁英，以及決策菁英與不同國內外利益團體之間關係的影響，使得決策團體每次的更替都必定牽連政策的變化，正如吉爾平所言，當國家的成長及擴張與決策者的利益相連時，國家就會產生擴張與試圖改變體系的強烈動機，反之，如果國家的成長與擴張會使決策者付出沈重的代價，甚或威脅其利益，那國家就會強烈希望維持現狀。¹⁷⁶變動速度其次的是經濟層面，這主要受到國家的經濟制度意識型態、經濟發展形式，甚至國家經濟精華區位置變化對經濟政策的影響，除了經濟精華區位置變化之外，經濟制度意識型態與經濟發展形式同樣受到決策圈更替以及國際主流經濟意識型態的影響，不過相對來說沒有政治方面的影響那麼明顯與快速。至於社會與文化的變動是速度最慢的變化，通常必須等待政治、經濟層面發生劇烈變化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後才會發生變化，但社會與文化的變化又回頭對決策者的地緣政治密碼與戰略次文化發生連帶影響。簡言之，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等四方面的變化，對政策的影響都是雙向而非單向。

(二)、國際變化

吉爾平將此一層次的變化區分為三層，最高層的國際變化是以構成體系的主要行為者的本質的差異性(如帝國、民族國家或多國公司(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等)為主要邏輯的「體系本身的變化」(Systems Change)，第二層則是以結構形式變化為主的體系的變化(Systemic Change)。至於最低層的變化指的是行為者之間的政治、經濟互動對體系造成的變化的「互動變化」(Interaction Change)等三種。¹⁷⁷

在地緣政治均衡中，前兩層變化另有更多含意：就體系本身而言，行為者的特質雖然是變化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是各時代四種地緣政治體系秩序原

¹⁷⁶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op. cit., p. 97.

¹⁷⁷ *Ibid.*, pp. 41-44.

則的變化，例如施洛德認為 1815 年前後的歐洲政治特徵並不相同，使得 1815 年之前的歐洲適用權力平衡維持體系穩定，在 1815 年之後就必須改用政治均衡，¹⁷⁸而這種政治特徵的變化即為地緣政治體系秩序原則的改變。就第二層而言，吉爾平所關注的結構變化是現實主義典範中的結構概念，但在本論文的地緣政治均衡中所關注的則是地緣政治結構的概念，亦即國家對結構中戰略交通線控制能力相對成長速度以及戰略交通線分佈等兩方面的變化，這兩種變化發生的速度雖然不如相對權力分配變化來得快速，其影響卻更為深遠與持久。

雖然吉爾平視國際互動為最低層的國際變化，但前兩層變化事實上也與互動密切相關，因為體系的成長仰賴布贊(Barry Buzan)所謂的「互動能力」(interaction capacity)，其來源包括科技、共享的組織與規範，¹⁷⁹科技能克服大型天然障礙，共享組織與規範可降低人為的交流阻礙，二者均可促進互動的密度與降低擴張成本。因此互動能力的高低在結構層面決定了戰略交通線的分佈狀況，也影響國家除了本身地理環境之外發展何種類型的控制能力。而高度的互動能力配合高密度的國際互動，也會將不同的地緣政治精神傳輸至結構中的各處，藉由人員與思想的交流慢慢改變每個時代的地緣政治精神甚至主流國家組成型態，完成體系本身的變化。總之，國際互動正如地理學與地質學中的侵蝕作用(erosion)，每天發生的各種國際政治、經濟、社會、軍事、文化互動不斷侵蝕(undermine)原有的均衡基礎，一如各種自然力量對地貌不斷地改造地貌。互動密度越高侵蝕作用也越快，在短時間就可使形成均衡安排達成時的環境大相逕庭，迫使國家必須針對新環境不斷在政策上做出修正，從而改變均衡的內涵。但侵蝕作用的作用方向與影響程度受到地球物理學的支配，而國際互動對均衡產生的侵蝕作用雖然不如自然界般機械化，但大體上也受到均衡確立的變動模式的影響，因為達成均衡的安排是針對各主要行為者最重視的地緣政治利益，對均衡不滿意的修正也必然由此著手，而不會將成本浪擲於收效不大的無關之處。

侵蝕造成的不均衡使得維持均衡的成本上漲速度遠超過主要行為者的財政能力成長速度，吉爾平認為這是由於軍事、科技或其他使征服變得更容易的改變出現，或不同國家間的權力出現不同的成長速度，或國內的政治環境出現變化，導致改變體系的成本下降時，擴張出現潛在淨利，此時國家會試圖透過在領土、政治、經濟方面的擴張來改變體系，儘管和平手段可能存在，但歷史上大多數解決不均衡的方法通常是經由霸權戰爭(hegemonic war)來重新分配利益，¹⁸⁰本論文採納席漢的觀點，認為當不均衡出現時，各方都會試圖以非暴力性的外交手段解決危機以維持均衡，即使是小型武裝衝突，甚至少數主要行為者之間或主要行為者與相鄰小國之間的較大規模武裝衝突，若不能根本改變既有均衡之下的利益分

¹⁷⁸ Paul W. Schroed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Politics: 1763-1848*(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4), p. 578.

¹⁷⁹ Barry Buzan, "Rethinking System and Structure," in Barry Buzan, Charles Jones and Richard Little ed., *The Logic of Anarchy: Neorealism to Structural Re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69.

¹⁸⁰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op. cit.*, pp. 13-14.

配狀況，也還是屬於不均衡狀態，只是體系的穩定程度有所差異。不過在這兩種情況下雖然均衡到頭來還是能夠維持，其外觀與內涵都與最初有所差異。

吉爾平的觀點忽略了一個事實，也就是說假使國家確實以本益比作為是否擴張與維持均衡的主要考量，那麼他認定在不均衡之後馬上接著的霸權戰爭是最不為每個試圖擴張與力圖維持均衡的國家所採用的方法，因為霸權戰爭的成本無論如何必定高於在不更動既有均衡基礎的情況下，以外交手段、威嚇戰略或規模較小的武裝衝突來試圖修正均衡的部分內涵並獲得目標利益。真正捲入所有主要行為者、以既有推翻均衡並達成新均衡為目的的霸權戰爭或大型國際戰爭不僅少見，而且許多時候常是「意外事件」(incident)的結果。均衡的顛覆與地質學在此呈現奇妙的相似性，地質學事件的發生經常是由於某個環節突然釋放部分壓力，引發連鎖反應才導致均衡被破壞，但很難有一個真正精確的間隔發生時間；同樣的，地緣政治體系的均衡可能因為充滿許多危機而呈現不均衡狀態，並不斷朝被顛覆發展，但是否真的會被顛覆、何時會被顛覆，必須等到出現一個引燃導火線的意外事件，才會真正導致不均衡急速升級並引發許多連鎖反應而導致均衡被顛覆。然而預料意外事件何時出現則絕非體系或均衡理論的主要功能。

第四節、地緣政治結構與地緣政治均衡

雖然地緣政治均衡是體系中主要大國的合作行為所促成的長期體系穩定狀態，而且受到體系秩序原則這一理念性變數的影響，似乎與純物質的結構形式沒有關連，也無法從結構判斷均衡是否能夠達成，只能夠判斷結構對體系的穩定程度影響力，再加上地緣政治結構理論不願意預設且主張結構形式對國家戰略行為有絕對的影響力，甚至認為單憑結構形式判斷國家行為有極大的誤判危險，¹⁸¹似乎使得地緣政治結構與地緣政治均衡之間沒有聯繫。然而，地緣政治結構既然是體系的組成單元之一，對均衡的達成與顛覆自然有其影響力。不過由於結構本身並沒有獨立的地緣政治意識與決策、行為能力，因此只能被動地影響均衡的達成，但身為體系組成單元之一的地位又使其變化能主動影響均衡的顛覆。

地緣政治結構的影響力最主要在於結構的形式是否使得國家長期無法有效打破僵持的現狀，難以在其中繼續得到明顯壓倒其他競爭對手的絕對或相對利得，從而願意與其他主要大國達成均衡以保有既得的利益，所謂的地緣政治結構形式不同於國際關係理論中僅計算「極」數的結構形式，還包括判斷結構中超強與強權的地緣政治屬性與相對位置，以及是否存在能威脅超強或霸權對戰略交通線控制，而後者卻很難迫其屈服的強權等對地緣戰略有較為直接影響的變數。或者在已經達成均衡的體系中，結構是否逐漸改變而影響均衡的維繫。而結構形式的變化受到其內部兩種相反作用力的影響：結構施加於單元的向心力與單元欲擺脫結構束縛的離心力之間互動的結果，當向心力強於離心力時，由於難以打破現狀，相互競爭的國家可能會較易傾向達成均衡，已達成的均衡也較容易維持，反

¹⁸¹ Oliver Dollfus, "The World System," *Geopolitics*, Vol. 5, No. 2(Autumn 2000), pp. 59-60.

之則否。

帕克與科恩認為離心力是特定領土中的人們抗拒被其視為外來者，會強加與其相異的政治制度、語言、文化與宗教在其身上的其他國家產生更大的統一國家的政治意識；向心力則是正好相反，其作用是提升不同領土之間的政治統一性。¹⁸²不過這是國家內部的政治離心力與向心力，科恩沒有提出結構層級的離心力與向心力，但根據帕克的兩種地緣政治程序可知，結構層級的離心力實際上就是中小型國家反抗地緣政治標準程序的替代程序，以及體系中居主導地位的類型被另一種類型取代的過程。¹⁸³後者實際上也是一種替代程序反抗標準程序成功的類型。而向心力則是結構中壓迫國家，使其無法或不敢付出巨大代價，將結構形式由既存形式轉移為另一種的作用力，具體表現為結構中超強壓制其他行為者也成為超強的政治軍事力量，包括適應特定結構形式而發展出來的政治經濟運作程序，與相應的國際法、國際組織與其他規範性的國際建制；國際互動產生的全球化或區域經濟整合或其他國際貿易關係產生給予參與其中的行為者的龐大經濟利益；以及結構的地緣政治特徵所產生限制國家向外發展的地理力等。當然所有這些力量並非都能同時出現於任何時代，也不代表這些力量對國家行為的影響力對均衡達成的重要性是一致的，端視所研究的時代與地區而定。至於離心力則主要為非物質的理念作用力，包括政治與經濟意識型態、文化認同、宗教信仰等的綜合作用，使國家產生對抗性的地緣政治密碼並指導地緣戰略的發展。

離心力基礎的非物質力量需要堅實的物質基礎才能發揮作用，否則必然使行為者受到嚴重的傷害。離心力的物質基礎即為國家能發揮出來的全部交通線控制能力，但除此之外，屬於物質層面的地緣政治結構亦分別在結構與單元層面影響這兩種作用力的強弱，前者包括國家在結構中的地位變化，以及戰略交通線的分佈與國家對戰略要地的控制情況，以及如吉爾平所稱的，國際相對能力分配的變化速度是否不一致，若對均衡內涵與現狀不滿的強權甚至超強的能力發展速度較其他滿足於現狀的國家要更快，均衡勢必容易朝不均衡發展而難以維持；後者則包括國家的地緣政治屬性、相對位置是否能對彼此的政治核心構成最大的威脅、是否位於能遠離標準程序壓力與擁有抗拒其滲透的地理位置和地緣政治特徵，以及政治、經濟與軍事制度上能否產生足以支持不斷鬥爭的政治、經濟與軍事力量，和發展出能夠在主要地緣政治利益方向鬥爭的最重要軍事力量，例如中國古代與游牧民族在草原地區的鬥爭中，最重要的軍事力量是騎兵，無強大的騎兵即無法發動遠征；而在現代戰略環境中，性能優異的長程戰機是海陸鬥爭所共同的必須品，但在陸地上則必須擁有強大的現代化機械化部隊，而欲在海上爭雄則必須擁有攻擊性(核子動力)航艦戰鬥群與核子動力攻擊潛艦。

離心力強弱是決策菁英秉持的戰略次文化與對國家地緣政治密碼解構的等非物質變數與物質基礎的控制能力之間的總和結果。當決策者產生新的地緣政治密碼，認為應提高國家的國際地位或傾向以更具強制性的手段獲得利益，並願意

¹⁸² Parker, *Geopolitics, op. cit.*, p. 34.

¹⁸³ *Ibid.*

承受因此所產生的高度人力與物力損失，則離心力將大於向心力，均衡就會由於國家的擴張而轉向不均衡，假使尋求擴張的國家又擁有明顯強於他國的能力，其大戰略將更具侵略性，體系很容易爆發導致新均衡的國際大戰；反之，假使戰略次文化與地緣政治密碼並未改變，代表向心力仍強於離心力，國家即使具有較強的能力也未必會出現明顯的擴張，可較容易以外交手段解決不均衡。值得注意的是破壞均衡的國家並不一定要具備技術或權力優勢，特別是在科技水準與整體實力差距都不大的古代國際體系，小國敢於主動破壞體系現狀向大國發動進攻的個案屢見不鮮。然而離心力也有可能源自國家內部的政治離心力，導致超強發生解體現象而使結構發生變化，蘇聯解體是最佳個案，但並非歷史上的唯一個案，在中國歷史上亦可找到許多例證：北魏分裂成東魏與西魏；五代十國亦可視為唐朝藩鎮割據的遺緒。

每一種結構形式中的離心力與向心力對抗結果皆不相同，以下本節將分析地緣政治結構如何利用這兩種力量影響均衡的達成與顛覆。

一、無極

無極是沒有任何超強存在的結構形式，還可進一步細分為是否存在強權以及戰略交通線是否僅有為陸地或海洋其中之一或二者皆有等不同的類型，但共同的特徵是最重要的戰略要地均位於中小型國家內，強權若欲達成標準程序就須控制這些國家。因此無極結構沒有向心力可言，反而因為每個強權都亟欲完成本身的標準地緣政治程序而導致離心力至為強大，尤以只有海洋戰略交通線的體系為甚：由於海上交通線的控制特徵使得體系在達成均衡之前的爭鬥相當激烈，因為每個國家都不能獲得安全，促使他們為了獲得安全而必須互相採取攻勢，直到有一方達成標準程序控制整個海上戰略交通線為止。

無極結構因此有強大的離心力效應並經常爆發控制與反控制的戰爭，例如中國古代在春秋中期城濮之戰(公元前 632 年)後形成的晉、楚兩大強權陸上無極結構，雙方各自位於連接南北的戰略交通線起迄點，而戰略交通線的交會處卻位於夾在晉、楚、齊三國之間的周、宋、鄭、陳等四國，¹⁸⁴在第二次弭兵之會之前不斷在晉楚之間爆發為了爭奪宋、鄭、陳三國以完成標準程序的大戰，¹⁸⁵以及吳、秦、齊等區域大國反抗晉、楚兩國擴張標準程序的戰爭，三國位居結構的邊緣處，不僅是標準程序影響最低之處，也擁有能支撐長期鬥爭的力量，以及不易被攻入的地形，因此春秋後期至戰國時代，幾乎全為這五個國家或其後繼者之間對標準程序的擴張與反擴張的戰爭，戰國時代不僅延續春秋的無極結構，再加上各國由

¹⁸⁴ 春秋戰國時期戰略交通線的分佈，本論文主要參考陳彥良，「戰國迄漢初區域交通和市場網絡」，*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34 期(民國 94 年 12 月)，頁 5-7；史念海著，*河山集·七集*(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 年)，頁 120-131、134-154。

¹⁸⁵ 公元前 597 年的郟之戰，以及左傳襄公二十六年(公元前 547 年)楚國大夫聲子敘述往事時所提到，在郟之戰以後的三次戰役：繞角之役(前 585 年)、鄢陵之役(前 575 年)、彭城之役(前 573 年)，以及聲子沒有敘述到的湛阪之役(襄公年 16，前 557 年)。

於高度中央集權，使得能用於擴張的能力遠比春秋時代更強大，¹⁸⁶控制與反控制戰爭爆發的頻率更勝於春秋時代。

無極體系最常見的是利用權力平衡與地理力維持體系的穩定，但幾乎不可能達成均衡。穩定在同時擁有海陸戰略交通線的無極結構中較易達成，雖然必須在兩方面同時達成各國均能接受的領土、政治、軍事與經濟安排，但由於海洋與陸地所需的安排在性質上並不相同－前者重視貿易關係和扼制點的歸屬，後者則重視領土控制與政治秩序－故反而容易因為各國重視的基本地緣政治利益未必相同，而比較容易達成，16至18世紀的歐洲/大西洋區域地緣政治結構即為一明顯的例子：沒有一個國家能完全控制歐洲內部、周邊與跨大西洋的海洋或陸地戰略交通線來主導歐洲的政治經濟發展，導致各國不斷尋求擴張本國的政治、領土、經濟利益的機會。結果在1648-1789年不到一百五十年的時間，一共出現了結束三十年戰爭的西發利亞和平(Peace of Westphalia)、結束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的烏特勒支條約(Treaty of Utrecht, 1714)、結束七年戰爭的巴黎條約(Treaty of Paris, 1763)與胡貝爾圖斯堡條約(Treaty of Hubertusburg, 1762)等三大條約體系。

二、霸權

霸權結構是所有戰略交通線均為一個超強所控制的結構，這個超強可能是完全的陸權，也可能同時控制所有海陸戰略交通線。霸權與帝國是兩種不同的概念，翟維斯指出在帝國結構中除了帝國本身之外不存在任何獨立行為者，帝國之外所有的「國家」都是帝國的一部份，同樣必須服從帝國的中央政治、經濟與軍事權威，與帝國的貿易關係是朝貢而非平等貿易，¹⁸⁷只是在政治地位上稍微不同於帝國的直接領土，在這種情況中不可能出現任何「國際」合作，帝國體系中展現的長期和平只是純粹的內部穩定而非均衡，是按照帝國設立的和諧秩序原則運作而非真正的均衡。但霸權結構中除了霸權之外的其他行為者大致上都能保有獨立的政治地位，霸權與體系中其他行為者之間的政治關係是平等而非帝國式的政治從屬關係，其他國家也能反對霸權的政治意志。

霸權地緣政治體系一般能維持長期穩定，其原因如「霸權穩定理論」(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所揭示的，在於霸權能提供結構中包括霸權在內的所有行為者在國際社會中必要的安全與經濟公共財(public goods)，使其他行為者皆能從中得利而維持體系的長期穩定運作，¹⁸⁸但霸權所設定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如要能良好運作也必須奠基於尊重其他行為者的政治、經濟、軍事、領土等四大基

¹⁸⁶ 戰國時代各國擴張能力的增強包含各國中央集權的加強，以及西周以來封建制度的完全崩潰，和各種生產技術與商業的進一步發展，使各國的政治與經濟制度允許國家能動員更多人力與物力運用於擴張。楊寬，*戰國史*(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二章至第六章。

¹⁸⁷ Robert Jervis, "Unipolarity: A Structural Perspective," *World Politics*, Vol. 61, No. 1(January 2009), p. 191.

¹⁸⁸ Charles P. Kindleberg,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p. 28; Stephen D. Krasner, "State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World Politics*, Vol. 28, No. 3(April 1976), pp. 322-323.

本地緣政治利益，否則將危及霸權結構中的體系穩定。¹⁸⁹不過與由近代歐洲國際關係為基礎發展而來的均衡概念不同，霸權地緣政治體系也可能存在均衡，因為霸權並非帝國，仍然尊重結構中其他行為者的主權，而且當結構中存在對霸權的交通線控制存在潛在威脅，而霸權卻無法以政治、經濟、軍事力量迫使其完全服從於霸權制訂的國際政治、經濟、軍事秩序的強權時，霸權也仍必須嚴肅對待這些強權構成的威脅以及如何與之共處而不傷害霸權在體系中地位的維持這一最主要的國家利益。而雖然其他國家是加入或服從於霸權設立的國際秩序，但反過來說他們也是認同這一秩序能在既存體系中最有效地維持其利益才會加入，因此實際上也是一種與霸權的合作，對抗追求結構變化而導致體系不穩，危及其利益的離心力作用，而得以達成一種特殊的均衡。

理論上，霸權體系的均衡能維持相當程度的穩定，因為霸權已經滿足所有的地緣政治利益，而霸權結構也是標準程序的最終結果，故霸權本身對結構沒有其他離心力作用；其他國家由於力量差距太大，很難或根本不可能發展出真正的離心力，因此向心力在結構中應該恆大於離心力而使體系維持穩定。然而霸權結構可因結構中是否存在其他強權而再細分為兩種不同的形式。在完全不存在其他強權的形式中，體系的向心力恆大於離心力。但若結構中存在與霸權擁有共同邊界，並鄰近霸權政治核心與戰略交通線，但卻有強大的地理力輔助而難以迫使其完全屈服於標準程序之下的強權。離心力來自霸權與強權都對結構中的政治與領土安排感到不滿，特別是當強權的位置又靠近戰略交通線時，甚至鄰近霸權的政治核心時，由於陸軍比海軍更能輕易跨越戰場上的天然障礙發動進攻，強權很容易產生希望建立本身標準程序的願望；霸權也會強烈感受到潛在威脅，導致離心力強於向心力而使穩定狀態被破壞。

西元七世紀中葉的東亞區域地緣政治體系即為上述霸權結構卻存在強大離心力的例子，當時唐朝不僅是體系中最強大的國家，且控有東亞通往中亞的絲路系統，是真正的霸權。但唐朝所處的結構中同時存在許多與其擁有共同邊界、又位於當時東亞區域地緣政治結構邊緣，擁有強大地理力輔助的強權。唐朝為了實現「華夷一家」的理想與以其為中心的朝貢體系，不斷與周邊各強權爆發長期戰爭，不僅從未與其他國家達成均衡，也未有過真正的穩定，唐朝最嚴重的問題就是位於青康藏高原的吐蕃帝國與其爭奪大絲路的控制權，吐蕃不僅從甘肅起沿整個青康藏高原與唐朝接壤，還控制許多能由青康藏高原透入大絲路的小型戰略要地，¹⁹⁰但最關鍵的莫過於青海東北部的絲路「青海道」，以及唐朝割給吐蕃，位於甘肅南部黃河上游的「河西九曲」，該地位於青海、甘肅、四川交界處，戰略地位相當重要；吐蕃的這些領土靠近唐朝的政治核心關中，但唐朝卻無法威脅吐蕃位於西藏的政治中心，結果導致吐蕃從 670 年之後就不斷與唐朝爆發控制絲路的長期戰爭。

¹⁸⁹ Robert Gilp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87.

¹⁹⁰ 吐蕃從青康藏高原周圍隘口進入絲路的通道，可參考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關係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頁 20-42、119-131、165-168。

三、單極

單極結構亦可分為海權單極與陸權單極，前者指所有海上戰略交通線為一個超強所控制，但該超強無法控制陸上戰略交通線；後者則指結構中存在一個控制至少一條陸上戰略交通線的超強，但該超強無法控制海上戰略交通線或其他陸上戰略交通線。兩種結構對均衡的影響並不相同，以下分析兩種不同的結構對維持均衡的影響。

(一)、海權單極

由於海權的基礎是貿易、航運、海軍，¹⁹¹是一種與民主制度、商業霸權三位一體的地緣政治權力型態。¹⁹²海權單極的形成遠較陸權困難，其標準程序的達成必須在結構中建立其所支配的國際貿易體系，控制海上戰略交通線的目的在於肅清對貿易順利發展的國家或非國家威脅，確保對其有利的貿易體系之維持，領土只是貿易的基礎而非貿易成功與否的充要條件；佔領資源生產區對重商主義(Mercantilism)式的貿易或有所幫助，但海權關注資源生產區控制權歸屬的真正意義在於能不斷由該地區獲得重要的工業生產原料，保持本國的經濟發展與海軍戰力，但並不一定需要佔領所有資源生產區，只要不被與海權敵對的強權所控制，避免該強權利用中斷貿易來威脅海權的經濟與海軍戰力持續發展即可。

海權單極結構有一種弔詭的現象，即是說海權的單極地位雖然穩固，卻不易形成均衡。就前一種情況來說，海權雖握有制海權，卻無法控制陸地戰略交通線，米爾斯海默已證明但制海權並非能成功發動越洋進攻大陸的兩棲登陸戰的保證，海洋迄今始終是對境外武力投射的最大障礙，¹⁹³這使海權對發動幾乎無利可圖的陸上戰略交通線控制戰興趣缺缺，很難單靠本身的力量壓制來自陸地強權的聯合挑戰。但海上戰略交通線的控制程度不如陸上嚴密且容易受到侵蝕，任何海洋國家若不可能僅靠一次決定性戰爭便成為海權，必須與其他海洋強國反覆進行許多次鬥爭之後才能真正完成標準程序，在這些鬥爭中必須時時確保對海洋戰略交通線的控制。因此當一個海洋國家成為海權後，標準程序所建立的貿易體系非常強大，很難為其他國家所推翻。例如荷蘭的海上地位為英國奪取，至少經歷過四次英荷戰爭(Anglo-Dutch Wars, 1652-1654, 1665-1667, 1672-1674, 1781-1784)；英國真正成為海權單極是在1815年完全擊敗法國之後，¹⁹⁴此後直

¹⁹¹ Till, *Seapower, op. cit.*, p. 34.

¹⁹² 王曾惠、張競，「另眼看海權」，*中華戰略學刊*(2001年冬季號)，頁181-186。兩位作者解釋他們所謂的民主制度並非嚴格政治學意義的民主制度，或拘泥於特定形式的政治制度，而是指國家利益與主要的人民生計合而為一，不會因為執政者的特定偏好或戰略思想而決定國家是否朝海洋發展，人民的生計亦不須仰賴「聖君」的政治制度。

¹⁹³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op. cit.*, p. 86 and pp. 114-125.

¹⁹⁴ 由於海權具有明顯的經濟性，此種說法乃是參照經濟史的發展而下的結論。本論文對英國擺脫荷蘭的貿易控制而自己達成標準程序的經濟史觀點主要參考施康強、顧良譯，Fernand Braudel 原著，*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台北：貓頭鷹出版社有限公司，1999年），卷三，頁226-229。同書頁338與340指出英國早在1786年就已經獲得世界經濟霸權，但本論文並不認為在這時英國已經獲得海權單極的地位，因為英國在接下來的法國大革命與拿破崙戰爭中就面對來自法國的強力海上挑戰，必須等到法國在拿破崙戰爭中完全戰敗，英國才真正消除結

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其海權的地位才被美國所奪取。

雖然海權單極的地位相當穩固，而且海權對體系中其他國家的威脅程度，和這些國家本身關切的地緣政治利益都不一致，再加上這些國家即使聯合起來也未必能在力量上超越海權，因而難以形成對抗海權的聯盟，¹⁹⁵使得這樣的聯合行動在本質上極為鬆散，很難對單極構成真正的威脅，但結構中仍有強大的離心力，使得結構的向心力大於離心力作用。結構中的其他大陸強權朝海洋發展與建立龐大海軍，威脅甚至侵蝕海權對海上戰略交通線的基礎，雖然大陸強權可能無意取代海權的單極地位與海上霸權。抱有這種希望的大陸強權越多，離心力就越強，結果海權與大陸國家之間互相以競爭性權力平衡的運作相互鬥爭而使體系極不容易達成均衡，甚至可能走向牽動整個體系的大戰。英國在 20 世紀的單極地位變化可為說明：英國在 1904 年之前曾視新興的美國在貿易、海軍與西半球的擴張為海上威脅，¹⁹⁶也曾在 1920 年代就兩國是否應維持一致的海軍兵力而產生嚴重爭執；¹⁹⁷在 1907 年之前則與俄國有嚴重的地緣政治對峙，而德國在 1897 年開始大規模擴張其「公海艦隊」(*Hochseeflotte* or *High See Fleet*)以及英國對德國造艦計畫的軍事回應，更是公認造成英德關係在 19 世紀末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緊張與敵對的主要因素之一。¹⁹⁸英國工黨(Labor Party)政府在 1930 年代雖採取力求與美國保持友好關係的地緣政治密碼，¹⁹⁹但此時結構中有太多強權欲擴張本身的

構中所有對其海上地位的潛在挑戰者。

¹⁹⁵ Jack S. Levy and William R. Thompson, "Balancing on Land and at Sea: Do States Ally against Leading Global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5, No.1(Summer 2010), pp. 7-43.

¹⁹⁶ Alan P. Dobson,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Of Friendship, Conflict and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Superpower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p. 18-31.

¹⁹⁷ 吳玉貴譯，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撰，*戰前之大本營海軍部*，前引書，頁 320；Stephen Howarth, *To Shining Sea: 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avy, 1775-1998*(Norman, Oklahoma: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9), p. 339, 347; Phillips Payson O'Brien, *British and American Naval Power: Politics and Policy, 1900-1936*(Westport, Connecticut and London: Praeger, 1998), chapter 8.

¹⁹⁸ Paul Kennedy, *The Rise of the Anglo-German Antagonism 1860-1914*(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80), pp. 416-424, 448-449.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納粹德國(Nazi Germany)雖然在 1939 年 1 月 27 日開始稱為「Z 計畫」(*Der Z Plan*)的大規模造艦計畫：4 艘航艦（二萬噸級）、10 艘戰艦、15 艘裝甲艦 (*Panzerschiffe*，又稱「袖珍戰艦」*Pocket Battleship*，分為二萬噸級 12 艘，一萬噸級 3 艘)、43 艘各型巡洋艦、68 艘驅逐艦、90 艘魚雷艇、以及 249 艘潛艦 (U-boat, 又稱 U 艇)，但 Z 計畫卻不是造成英德關係緊張的元兇，其原因首先在於納粹德國的海上擴軍並非為了與英國爭奪海上霸權，雖然 Z 計畫隱含有未來與英國一戰的戰略準備意義，但德國當時的戰略方向並不在海上，而是在歐陸。再加上英德之間在 1935 年簽署了英德海軍協定，允許德國海軍水面艦隊實力可達英國海軍實力的 35%，潛艦部隊的實力限制在 45%。由於德國同意在海軍規模上自行設限，不再試圖威脅英國的海上地位，因此德國的擴軍並未引起英德關係的緊張。關於 Z 計畫的艦隻數量可參考 "Der Z Plan(Stand Anfang 1939)," *Bundeswehr, Marine*, http://www.marine.de/portal/a/marine/!ut/p/c4/TUzBCsIwFPuW_UBfh6DiTZGBO8yjbrefuXQPt3a8tu7ix9seBBNICAmBATKdepNVkxbxTMzyh13QaN7EoFglH5OSCsBj0RHqKKBizh-TMiwltYDNyKP4DPMqrQaG9w1g0oouU1bKKnsXqOc6lScy5EWSgl_X1Ilg_yh_qzb9q2G6Tc3brmXg5nC71BWJfluJ2r6gt9uSr9/. Z 計畫的戰略意義可參考 Kenneth P. Hansen, *Raeder Versus Wegener: Conflict in German Naval Strategy,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 58, No. 4(Autumn 2005), p. 103; Holger H. Herwig, "Wolfgang Wegener and German Naval Strategy From Tirpitz to Raeder," in Wolfgang Wegener, *The Naval Strategy of the World War*(Annapolis, Marylan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89), p. xliv.

¹⁹⁹ 吳玉貴譯，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撰，*戰前之大本營海軍部*，前引書，頁 414-415、417；Greg Kennedy, *Anglo-American Strategic Relations and the Far East, 1933-1939*(London and

標準程序，導致離心力遠超過向心力，雖然英國的政策緩和了與美國的競爭，最終仍無法卻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

職是之故，海權單極相當不容易形成均衡，除非是在海權形成之初，而大陸強權的主要目標在極力維持大陸局勢之穩定，願意承認海權的海上地位，例如下文將討論的維也納會議公會體系。

(二)、陸權單極

陸權單極依靠領土控制與在他國駐軍所產生的嚴密控制力，離心力主要來自陸權本身希望成為霸權甚至帝國的願望，這使得均衡相當難以達成。但是反過來說，陸地邊界雖然使得戰爭容易爆發，可是地理力也有助於單極以外的國家防禦來自單極的戰略壓力，因此在陸權單極結構中，大多數情況都是依賴權力平衡與地理力維持體系的穩定，除非陸權經過長期霸權戰爭卻始終無法進一步成為霸權，不得不接納體系的現狀，而其他主要強國又能團結一致，均衡才有達成的希望。另一種離心力來源是結構存在位於結構或領域邊緣，卻佔據某些對超強國家安全可能構成嚴重威脅的戰略地帶的強權時，其為了達成自己的標準程序或甚至取代超強的主導地位而產生強大的離心力，假使雙方又擁有共同邊界，且強權又鄰近超強的政治核心，則成為最不穩定的地緣政治結構，例如中國古代帝國與其北方游牧帝國之間的對峙情況便經常如此。

陸權單極雖與處於邊緣的海洋國家的地緣政治利益不同，而且海洋阻止了陸權的權力投射，替代地緣政治程序較易壓倒標準地緣政程序的擴張，理論上較易維持穩定。此種結構中離心力作用主要來自單極朝海上擴張，與海洋國家的替代程序發生衝突。海洋國家經常不願服從陸權設立的貿易規則，但陸權因為無法控制海上交通線，對於海洋國家經常無計可施，貿易制裁通常又引發嚴重的走私問題，而且也根本無法迫使海洋國家屈服；唯一的方法只有建造強大的艦隊以控制海上交通線，但這對陸權來說並非容易的事情，海上戰爭與陸權的傳統戰爭哲學、戰略經驗與作戰模式、偏好的手段方式等大相逕庭，陸權首先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建立龐大的艦隊，又需要長時間的訓練與經驗累積才能使其成為能用於控制海上交通線的強大海上力量，並建立艦隊交通線控制作戰與長期控制所必須的基地與補給系統，但在其傾力建設艦隊與支援艦隊控制權作戰必要的各種設施的同時，又必須留心結構中是否出現潛在的陸上威脅。因此結構中的海陸分配狀況限制了陸權朝海上發展。不過假使單極真能成功建立越洋征服的強大海上力量，離心力將遠超過於向心力而難以達成均衡，可能引發陸權破壞體系穩定朝向霸權發展，例如羅馬共和國在獲得強大艦隊之後對迦太基的征服。

四、兩極

兩極結構可分為海陸分立的兩極或兩大陸權分立的兩極等兩種結構形式。兩種結構都難以達成均衡，因為任一方都極為關注對方的發展，一方所得必為另一方所失，僅當某一方願意先提出合作的意願，經過一番試探之後才有可能朝均衡

發展，如冷戰後期所見的短暫美蘇合作，除此之外大多只有長期的穩定。

在兩大陸權分立的兩極結構中，由於無法改變結構，利用權力平衡、自然地理障礙或中立小國作為勢力範圍邊界的作法是常見的達成穩定的方式，例如南宋與金朝在西元 1141 年達成的「紹興和議」就是以秦嶺(大散關所在山脈)與淮河為界。但也有不以這兩種方式而以人工界線為界的，例如西漢初年與匈奴以長城為界，北宋與遼之間亦缺乏明確的天然邊界。穩定的維持無法單靠是否具有緩衝國、天然邊界或雙方的國力對比，而與超強之間的地緣政治密碼有密切關係，例如西漢初年與匈奴之間雖不易維持穩定，北宋與遼卻能維持長期穩定；南宋與金雖然維持長期穩定，但以類似邊界為界的南宋與蒙古卻完全沒有穩定可言。另外假使兩極結構中出現力量強大的新興強權，將產生新的離心力來源而改變原有的穩定關係。例如北宋與遼的兩極結構之崩潰肇因於金的出現，南宋與金之間則是蒙古的出現。

雖然在海陸分立的兩極結構中，雙方的基本地緣政治利益相當不同—海權的生命基礎是貿易，領土僅是建立成功貿易體系的必要因素之一，因此海權最重視能控制海上交通線、確保貿易順利進行的海軍；反之，陸權的基礎是領土擴張，密集與廣泛的國際商業貿易雖然是陸權經濟體系避免成為封閉式純粹消耗本身資源的必要條件，但並非其絕對仰仗的權力基礎，故能保衛領土的陸軍遠比海軍重要。²⁰⁰但此種結構的緊張關係並不遜於兩大陸權分立的兩極，甚至可能更為強烈，因為海上交通線的控制更容易受到侵蝕作用的影響，因此海權對陸權的任何海上擴張都相當敏感，必然尋求類似甚至更為激烈的海上擴張行為反制。美國在雷根政府時期針對蘇聯海軍的擴張所提出的「600 艘海軍」(600-Ship Navy)擴軍計畫即為一例。²⁰¹

五、三極與多極

在古典地緣政治學與冷戰中期的地緣政治概念中，三極結構是海陸兩極對峙的替代概念，藉由第三極的出現來緩和兩極的緊張對峙，多極概念則相應於冷戰時殖民地國的解體與區域主義的發展。²⁰²本章所探討的三極與多極結構是基於本論文的地緣政治結構模型所進行的理論探討，並非探討過去的地緣政治學結構概念。

三極是多極的基礎，在這兩種結構中，由於極數的增加使得自然地理對向心力的作用性不如在單極與兩極中明顯，特別是在多極結構中更是如此，因為各國

²⁰⁰ Parker, *Geopolitics, op. cit.*, p. 103;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op. cit.*, p. 574.

²⁰¹ 此計畫的目標在將美國海軍艦隊擴張為以 15 支航艦戰鬥群和 100 艘核子潛艦為主要骨幹的規模，在海軍提交給國會的報告中即明確指出這麼做的目的在於蘇聯自 1960 年代開始的海軍建設已經在 1980 年代顯現出成果，對美國海軍構成前所未有的威脅。“Building a 600-Ship Navy: Costs, Timing, and Alternative Approaches,”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March 1982, <http://www.cbo.gov/ftpdocs/53xx/doc5336/doc13b-Entire.pdf>, p. xiii and pp. 3-4, retrieved on June 3, 2011.

²⁰² Parker, *Geopolitics, op. cit.*, chapter 8.

在結構中的行動自由受到的越來越多超強的出現而受到更多限制，而難以進行擴張的結構使得傳統的權力平衡成為主要的均衡手段與向心力來源之一，均衡可能因為力量平衡關係甚為強大，導致擴張成本過於高昂而出現，但這在三極與多極結構中的情況並不相同，以下分別敘述。

(一)、三極

三極結構經常與「戰略三角」(Strategic Triangle)概念混淆，二者最主要的差異在於後者可運用於任何三個國家之間的關係，而前者則是三個力量中心相互作用形成的相對穩定結構關係，是一種特殊的三角關係，包含三角關係的互動。²⁰³三極結構中影響體系穩定的最主要關鍵在於三極之間的距離以及是否擁有共同邊界。但除了距離與共同邊界—所謂的「邊界」並非指超強之間的國界，而是領域之間的界線，因為領域乃是由超強所組織，而他國力量可以滲透，故「邊界」有時並非明顯的界線，而是一個超強之間影響力重疊的緩衝區域—之外，影響均衡更重要的變數在於三極的地緣政治本質、結構中的陸海分佈與超強彼此的相對位置。

三極可分為三個陸權超強的形式，以及一個海權超強與兩個陸權超強並立的兩種不同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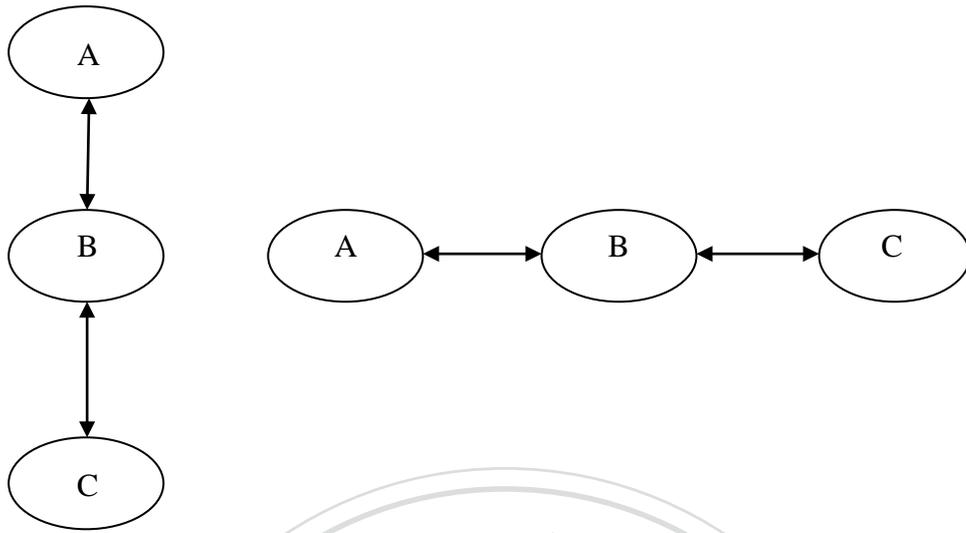
1. 三個陸權並立的三極結構：

在此種結構中，超強之間各自擁有彼此的勢力範圍，相對位置與力量對比遂成為影響結構穩定的主要變數，假使三極之間的相對位置為並列式，且位於中央的極與另兩極皆相鄰接，²⁰⁴如下圖 3.4 所示：

²⁰³ 陸俊元，**地緣政治的本質與規律**(北京：時事出版社，2005年)，頁 275-279。

²⁰⁴ 科恩在其地緣政治結構模型中，對於地緣戰略領域的邊界，乃是以屬於這個領域內最邊緣的國家的國界線為領域的邊界，只有在敘述冷戰後的歐亞大陸地緣戰略領域時才表示，由於俄羅斯力量的衰退，此領域與其他領域之間的界線已經模糊化為一片作為領域間緩衝區的過度地帶。不過本論文認為，地緣戰略領域不像地緣政治區域那樣，是一個有明確邊界的政治地理單元，而是具備確實政治意涵的地緣政治單元，故除非組織領域的核心國家與領域內的國家締結政治與軍事同盟，並且和其他領域或地緣政治區域具有明確的敵對關係，否則以國界線作為領域界線並不合邏輯，因為越靠近領域邊緣地區的國家，和周邊其他領域或地緣政治區域的互動與受到這些相鄰地區的影響甚至「滲透」，一定大於靠近領域核心的國家。因此本論文認為領域之間並不存在以國家邊界為形式的線狀「邊界」，而是在某個作為緩衝區的地區互相鄰接，而這個地區內的國家則並不明確屬於哪一個領域。

圖 3.4. 並列式三極陸權地緣政治結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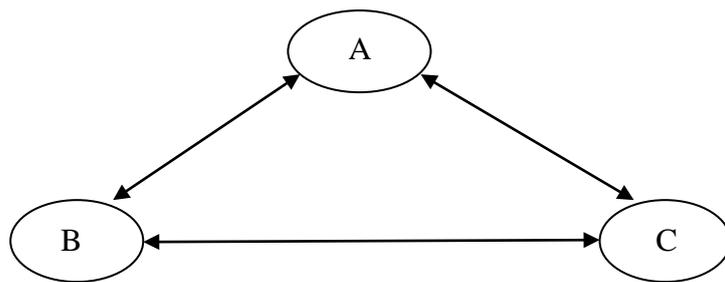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在此種結構中，向心力的來源是三者互相平衡，但實際上B將因介於A與C之間，同時成為A與C的主要地緣政治目標而承受最大的地緣政治壓力。無論均衡能否達成，結構的向心力來源依賴B是否擁有足夠強大的力量調整來自兩方面的地緣政治壓力，A與C會因同受B的威脅而尋求戰略合作以抵禦來自強者的地緣政治壓力，中國南北朝時期的柔然—北魏—劉宋/南齊即為此種三極結構，由於北魏強於柔然與劉宋/南齊，後兩者多次遣使聯絡，意欲締結同盟共伐北魏，不過因為兩者的互動並不高而同盟行動至為困難所致。²⁰⁵不過假使B明顯弱於A或C，無力調和來自A與C的地緣政治壓力，且結構中沒有其他強權分散A、C的注意力，則A與C有可能傾向聯合發動攻擊將B滅亡，將結構轉為兩極，無論是均衡或穩定都因此不易維持，個案可見於南宋聯蒙古滅金。雖然這種邏輯看起來與權力平衡邏輯或米爾斯海默的「推卸責任」(Buck-Passing)邏輯嚴重不符，但其實是理性決策的結果—C與A將認為與其坐等B遭另一方滅亡而使對方獲得大多數B原來的勢力範圍或領土而變得極端強大，不如聯合對方一起進攻，替自己取得在B滅亡後的兩極結構中更有利的地緣政治條件與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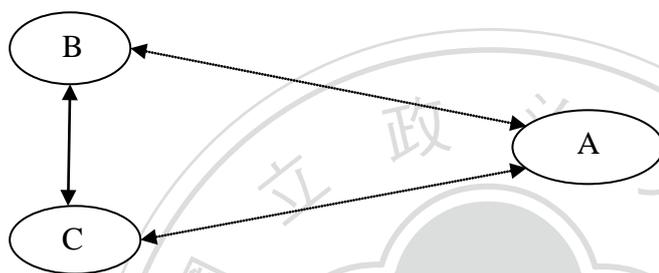
圖 3.5. 三極均擁有共同邊界的結構

²⁰⁵ 根據《南齊書》卷 59，「芮芮虜」條(芮芮即柔然)的記載，南齊太祖在篡位劉宋之前曾「遣驍騎將軍王洪軌使芮芮，剋期共伐魏虜」，而柔然的確也曾發動大軍進攻，但南齊卻沒有出兵響應，北魏因此逃過一劫。其後柔然亦「頻遣使貢獻貂皮雜物，與上書欲伐魏虜」，但一方面南齊專注於內部政治改革，而柔然因高車反叛而未實現戰略聯盟。(梁)蕭子顯撰，《南齊書》(台北：鼎文書局，1975 年)，頁 1023-1024。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圖 3.6. 只有兩強擁有共同邊界的三極結構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在三極同時擁有共同邊界的結構中(圖 3.5)情況則大為不同，假使A的力量最強，B與C會發展出戰略合作關係而非選擇與A聯合消滅另一方，因為B與C同時受到A的威脅。但由於三極皆擁有共同邊界，當B與C聯合之後，情況會出現如雷諾斯(P. A. Reynolds)主張的發展，即是A雖然強於B、C，但B、C聯合則強於A，故A為了避免自己落如最不利的情況，會降低自己在B、C的威脅認知中的程度，並試圖同時與B、C進一步發展關係以破壞這兩者的結合，並使B、C重新思考在這種情況下的相對利得(relative gain)，情勢遂可能出現三種排列組合關係：A+B vs C、A+C vs B、B+C vs A。²⁰⁶由於相互關係的多樣化，在此種三極結構形式中離心力將小於向心力。

在只有兩極擁有共同邊界的結構中(圖 3.6)，A 因不具有共同邊界而使其同時為 B、C 所重視，B 與 C 雖仍有合作空間，但其關係因為共同邊界的緣故而使其不如與 A 的合作關係強固。至於 A 的戰略選擇將因權力平衡的考量而選擇與 B、C 之中較弱的 C 聯合，因為與較強的 B 聯合之後假使奪去弱者的超強地位，其遺留下來的權力真空大部分必為 B 所填補，A 會因為地理阻隔而無法獲得較多相對利得；反過來說與 C 聯合雖然會使 B 警覺，可能激起軍備競賽等緊張關係，但由於 A 與 C 的聯合必能壓倒 B，因此 B 也不敢輕率破壞現狀，在實行內平衡(internal balance)的同時也會試圖與 A、C 改善關係。故 A 與 C 聯合的結構向心力將大於 A 與 B 的聯合。

²⁰⁶ Reynolds,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p. cit., pp. 206-208.

2. 一個海權與兩個陸權並立的三極結構：

此種結構可視為圖 3.4 情況的進一步變化，只是阻隔A與B、C的地理介質改為海洋。由於A難以越過海洋，地緣政治利益彼此衝突的兩個陸權B與C都希望獲得海權A的協助以牽制對方的潛在擴張威脅，而A雖然能與其中一個B或C發展出戰略合作，卻不會協助對方消滅另一個陸權超強，因為這反而使結構轉為海陸兩極對峙，海權必須面對一個更為強大卻難以牽制的陸權，與圖 3.4 的情況極為類似。反過來說，兩個陸權也因彼此衝突的基本地緣政治利益而很難合起來對抗海權。這樣的結構形式因此被麥金德、史派克曼與其後的古典地緣政治學者認為真正能維持均衡的地緣政治結構，²⁰⁷因為三極之間的權力平衡使每一極都同時是另外兩極的潛在威脅與盟友，因此既能避免兩極的高度對峙，也能避免單極可能造成的霸權發展。

(二)、多極

多極結構是擁有四個以上的超強的結構。雖然多極是地緣政治結構理論中的一種結構形式，但實際上由於戰略交通線分佈、戰略要地、結構的地緣政治特徵等基本原因的影響，若根據本論文的地緣政治結構概念，人類歷史上從未出現過多極地緣政治結構，故本小節的分析，實際上只是理論性為主，而非真正的實證檢驗。

多極非常容易與無極混淆，特別是因為此種結構中同樣也由於每個超強都擁有複雜的雙邊與多邊關係，導致尋求擴張的願望始終存在，而經常存在不均衡與因此而起的小規模衝突。但與無極不同的是，多極中的主要行為者是控有戰略交通線而組織本身的地緣戰略領域、完成標準程序的擴張，對多極結構中的超強而非強權，在各自所處的地緣戰略領域中已經完成其標準程序的擴張，滿足基本的領土、政治、經濟與軍事地緣政治利益，但無極中的強權並沒有達成這樣的目標，故彼此為了爭奪戰略交通線控制權而不斷衝突。因此多極結構在理論上較容易達成均衡，儘管因為必須滿足四個以上的行為者而導致其難度也相當高，但並非不可能。但多極由於超強數目達四個以上，即使能夠達成均衡，安排也無法完全協調所有超強在各面向的相對地緣政治利益，使得多極結構非常容易因為超強對均衡的不滿而興起持續擴張的願望，導致不均衡不斷產生，但多極結構中各超強的離心力很少能強過向心力，因為多極之間形成互相牽制的關係，各個超強都擁有兩對以上的雙邊關係，使得戰略複雜度比其他結構更高，超強的戰略自由也越低。此外，其他超強甚至也會與對方領域邊緣的中小型國家結盟，策動其以替代程序對抗領域中超強的標準程序，使得潛在對手必須將主要注意力置於邊緣地區，更難隨心所欲發動擴張，從而降低不均衡發展為顛覆均衡的機率。特別是當多極結構中存在海權超強時，由於在海上沒有其他競爭對手，海權較其他陸權擁有更多行動自由，可以策動的替代程序與結盟對象也更多，使得體系均衡容易因此而被長期維持。

²⁰⁷ Parker, *Geopolitics, op. cit.*, pp. 123-127; Mackinder, "The Round World and the Winning of Peace," *op. cit.*, pp. 603-605.

第五節、地緣政治均衡的實踐

由於地緣政治均衡的形成是基於所有主要大國為了對抗遍及整個體系的改變力量對每個主要國家的基本地緣政治利益所形成的威脅，這樣的威脅在近代交通技術改變、體系內所有國家都發展出較高密度的互動之前不容易產生，因此在古代很難出現均衡體系或均衡思考，大多數國家思考的重點在於本國與主要威脅之間的權力關係，很少考慮到整個體系的秩序應該如何共同建構。不過在歷史上還是曾經出現過均衡或接近均衡的實踐，分別有兩次，第一次是中國古代在春秋時代的第二次弭兵之盟，第二次則是拿破崙戰爭之後由維也納會議所建構的公會體系。爾後當公會體系於 1850 年代逐漸崩潰之後，無論是在歐洲或全球體系中都再也沒有出現成功的均衡實踐。

一、弭兵之盟與維也納公會體系

中國在春秋時代曾出現兩次弭兵之盟。所謂的「弭兵」，意思即是「停止戰爭」。第一次弭兵之盟是晉楚兩國在公元前 692 年所成立的，但只有兩國參加，而且只持續三年。第二次弭兵之盟則是在公元前 546 年，彼時晉國雖然是黃河地區的主宰國，卻不能夠真正擊敗長江流域的主宰國楚國，並且晉國剛在公元前 550 年經歷執政貴族之間嚴重的內戰，凸顯出晉國內部統治階級之間有日益尖銳的矛盾，又與齊國之間爆發戰事，使其不能全力應付楚國，故其新執政有與楚國謀和之意。²⁰⁸而楚國因為在公元前 575 年的鄢陵之役為晉國所大敗之後，雖然還是長江流域的主宰國，卻不能真正再與晉國爭鋒，又苦於東方新興的吳國越來越激烈之攻擊。故雖然彼時的地緣政治結構形式為無極，但由於晉、楚之間沒有直接相鄰，所爭奪的是體系領導權而非攻佔彼此的領土與重要戰略要地，故能創造晉楚兩國能講和的結構先決條件。

第二次弭兵之盟與第一次一樣是由中型國家的宋國提案，避開了大國提案可能引發其他大國疑慮的可能，但是大國之間雖然同意宋國的提案，彼此之間仍有很深的疑慮，同意舉行弭兵仍然是競爭性權力平衡思維——左傳沒有記載秦楚兩國允許弭兵的原因，但記載了齊晉兩國的原因，晉國允許弭兵的原因是：「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約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齊國同意的原因則是：「齊人難之，陳文子約：『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²⁰⁹

而在第二次弭兵之盟中，政治地緣政治利益的解決乃是由於晉國在政治權利上的退讓，接受楚國作為諸侯盟主——「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

²⁰⁸ 左傳·襄公 25 年記載：「(晉)趙文子為政...謂(魯)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若敬行其禮，道之以詞，以靖諸侯，兵可以弭。』」李宗侗註譯，*春秋左傳今註今譯*，校訂版(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3 年)，頁 941。

²⁰⁹ 同上註，頁 970。

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尸其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為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楚國亦承認晉國的能力遠高於楚國，楚國無法與之競爭—「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霸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另外同時承認秦、齊兩國與晉、楚兩國的政治平等地位。承認齊、秦兩國政治地位與晉、楚兩國平等相當重要，蓋當時的「盟主」除了政治上的地位與利益之外，很重要的還是還擁有屬國進貢的重要經濟利益，因此第二次弭兵之盟規定晉、楚兩國的盟國必須同時向兩國進貢，而秦、齊兩國由於被承認與晉、楚兩國在政治上有平等的地位，故不須負擔進貢的義務，左傳記載其內容是「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楚)王曰：『釋秦、齊，他國請相見』」。²¹⁰春秋時代中期以後便藉此達成接近本論文提出的現代意義的均衡。

第二次弭兵之盟只是「接近」而非真正意義的均衡，蓋從技術層面而言，第二次弭兵之盟並沒有解決領土爭端，魯國在西元前 541 年便為了傳統的領土爭端而入侵長期與其相爭的莒國，雖然這次事件晉、楚最後合力解決，但並沒有因此擴大解決其他疆界問題。²¹¹第二次弭兵之盟也沒有包含當時的異族行為者，以及新興的吳、越兩個長江流域下游大國。這使得第二次弭兵之盟的合作維持國際和平只限於參與會盟的國家而非整個體系，晉國便在會盟後將擴張目標轉移至周邊長期臣服於晉國的異族，而此種征服並不被視作違反盟約規定的行為；弭兵之盟更未合力解決楚國與沒有參加盟會的吳國之間的長期衝突，致使雙方即使在弭兵之盟後依然不斷爆發戰事。不過雖有上述之缺憾，對於未曾發展出權力平衡與均衡概念的中國古代而言，第二次弭兵之盟仍可視為最接近現代地緣政治均衡意義的唯一實踐。

維也納會議的公會體系所面對的威脅主要是拿破崙領導下的法國意欲在歐洲完成其標準地緣政治程序，因而危及其他國家的領土地緣政治利益甚至國家生存。維也納公會體系主要著重於歐洲的政治與領土地緣政治利益安排，較不注重於經濟地緣政治利益，並與上述的弭兵之盟一樣完全未觸及軍事地緣政治利益。但與春秋時代不同的是，維也納公會體系所處的地緣政治結構是海洋單極的初期而非單極，結構中既有海權，也有強大的大陸強權。不過與 19 世紀中期以後不同的是，能夠挑戰英國海權的傳統大陸強權—法國、西班牙與荷蘭，其海軍與海外殖民地皆在拿破崙戰爭中遭受重創，不復能威脅英國的海上地位，而作為擊敗

²¹⁰ 上述文字內容見同上註，頁 970-972。

²¹¹ 據左傳·昭公元年之記載，這起事件的起因是魯國執政者季孫宿攻打莒國，莒國便到盟會上控告魯國，而晉國執政趙武對楚國表示：「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辨焉？吳濮有鬻，楚之執事，豈其顧盟？莒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莒魯爭鄆為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可知弭兵之盟並未解決領土地緣政治利益，只安排了政治與經濟地緣政治利益，而且其後也沒有要解決領土地緣政治利益的念頭。同上註，頁 1039。

法國的大陸主力—奧地利、普魯士與俄羅斯則尚未有朝海洋發展的意願。此外對英國與大陸強權而言，真正的威脅在於拿破崙是否會復辟以及法國是否會再度因革命而成為歐陸的主要威脅，故此時期的海權單極結構具有希望維持現狀的強大向心力，同樣成為維也納公會體系創造地緣政治均衡的先決條件。

在公會體系創立之前，維也納會議先以 1814 年結束拿破崙戰爭的兩次巴黎條約(Treaty of Paris)解決歐洲地緣政治次體系內的領土安排與勢力範圍劃分，包括法國的國界、俄普奧三國對波蘭與日耳曼地區領土的爭執，²¹²和奧普兩國在日耳曼地區內部的政治地位，²¹³避免俄普兩國與英奧之間為了中歐地區的政治與領土安排發生另一次戰爭。另外還包括確立英國的海權單極地位與原先屬於法、荷兩國的海外殖民地歸屬於英國。²¹⁴而在完成地緣政治安排之後，另以英、奧、普、俄四國在 1815 年 11 月祕密建立所謂的「四國同盟」來遏制法國可能再起的威脅。²¹⁵雖然四國允許法國在 1818 年 9 月之後也加入了四國同盟，使之擴大為包含歐洲地緣政治次體系中五大國的「五國道德同盟」(Moral Pentarchy)，但是原先的四國又另外祕密簽署一項協定，確認他們在 1815 年針對法國的安排，以防法國重新因為革命的威脅而再度對歐洲產生致命的威脅法國。²¹⁶

不過維也納公會體系的均衡從一開始就存在一個導致不均衡的弱點，亦即成員國對法國大革命帶來的民族主義與民主主義對各國傳統王室存續的威脅有不同的態度，最主要是英國不能同意公會制度用於壓制其本身也存在的民主主義，認為這是對他國內政的干涉，因此維也納公會體系雖然依靠五國道德同盟為主要的國際合作建制，卻因為英國與俄、奧、普三國主導的神聖同盟(Holy Alliance)之間就是否可以將公會體系用作壓制歐陸民族主義與民主主義工具的爭論，而產生不均衡，四國祕密防止法國的同盟安排也在 1821 年拿破崙逝世、英國失去最主要的安全威脅關切之後消失，²¹⁷最後終於因為 1848 年的「二月革命」導致公會體系的支柱—梅特涅(Klemens von Metternich)下台，而後在 1850 年代因為克里米亞戰爭(Crimean War, 1854-1856)的爆發，推翻了 1815 年以來需要公會體系來維持和平與承認領土變更的制度而導致完全瓦解。

二、冷戰與冷戰後的全球地緣政治均衡

無論在冷戰前或冷戰後，全球地緣政治體系都不存在任何真正的均衡，最多只有其底下的次體系曾經在 1970 年代之後達成均衡。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美國曾有建構全球地緣政治均衡的願望，而其所依賴的安排主要是戰時的國際會議而非戰後的條約體系。雅爾達會議(Yalta Conference, February 4-11, 1945)與波

²¹² Edward V. Gulick, *Europe's Classical Balance of Power*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5), pp. 184-279.

²¹³ J. A. R. Marriott, *A History of Europe: From 1815-1939*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60), pp. 33-37.

²¹⁴ *Ibid.*, pp. 37-38.

²¹⁵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op. cit.*, p. 41.

²¹⁶ Marriott, *A History of Europe: From 1815-1939*, *op. cit.*, pp. 43-44.

²¹⁷ Brison D. Gooch, *Europ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 History* (New York: MacMillan, 1970), p. 79.

茨坦會議(Potsdam Conference)對戰後的領土劃分與確立聯合國體制的成立，是冷戰時期全球地緣政治均衡在政治與領土地緣政治利益等兩方面最主要的基礎，其中聯合國安全理事會(Security Council)常任理事國與非常任理事國之組織設定及賦予常任理事國的否決權(veto)，基本上就是政治地緣政治利益的解決與安排。但是領土地緣政治利益由於極為敏感，故在戰爭結束前，其之安排則沒有如政治地緣政治利益般完整。至於經濟地緣政治利益，雖然當時尚無區域經濟整合之概念，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亦曾在經濟層面達成其他安排，即 1944 年 7 月建立的「布萊頓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確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以美元為主要國際儲備貨幣與貨幣匯率等國際貿易與金融體系。完全沒有達成任何安排的是軍事地緣政治利益，雖然原子武器已經出現，但在戰時由於極為機密，故戰前的國際會議均未處理此一議題。最後，以聯合國為主導的體系秩序原則延續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所奠定的基礎，不再允許國家利用武力擴張領土，也不再視戰爭為合法的政治手段，更不允許國家以武力併吞其他國家。²¹⁸

(一)、冷戰時的全球地緣政治體系與均衡

戰前的會議雖然對戰後的政治與領土地緣政治利益做了最基本的安排，看似又回復到維也納體系的會議外交模式，但上述的安排與體系秩序原則卻不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使全球地緣政治體系達成均衡。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權力平衡概念原來已經由維也納體系時的領土變化是否得到歐洲協調的同意，轉變為計算敵對國家與聯盟之間的硬權力—特別是軍事力量—對比。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以蘇聯和其後的中國為代表的共產主義，與以美國等西方國家為代表的資本主義，不僅是截然不同的經濟意識型態，而且對體系秩序安排希望也大不相同。再加上中國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由原來殖民地獨立的新國家，一方面與締造西發利亞體系導致整個冷戰時期的歐美國家具有完全相異的歷史與文化經驗，使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全球地緣政治體系乃是超越人類歷史上任何區域地緣政治體系的鮮明異質體系而非同質體系；二方面這些國家也具有強烈的民族主義，不願意輕易為了「體系的穩定」而犧牲自己的領土主張。這使得全球地緣政治體系內分屬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陣營的主要國家對於危及體系整體穩定的「威脅」來源認知有相當大的差異，甚至互相視彼此為最大的國家安全威脅來源，並產生世界大戰還是很有可能再度爆發的認知；而遠離兩極對抗核心地區的中小型國家則特別關注與其競爭對手的領土爭端。在這種情況下，強國的任何戰略考量都是以競爭性權力平衡思考為基礎，而不是以維持體系整體穩定的協作性權力平衡為基礎，故不可能達成任何有助於建立均衡的安排與協作性權力平衡。這使得戰後三件涉及結構、領土與政治變化的發展，因主要強國之間根本缺乏以協作性權力平衡維持體系穩定的思考，而使得戰前的安排迅速崩潰：

第一，雅爾達會議乃是美、蘇、英三強共同分配戰後的國際政治與領土地緣政治利益，但英國在 1947 年 2 月 21 日要求美國負擔其本來在歐洲與近東的國際

²¹⁸ 聯合國憲章第二條第三款與第四款之規定。“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Chapter 1: Purpose and Principles,” *United Nations*, <http://www.un.org/en/documents/charter/chapter1.shtml>.

政治義務，其退出戰後初期的大國權力政治舞台，等於正式宣告結構轉為美國與蘇聯對峙的兩極而非雅爾達會議時所設想的三極結構，²¹⁹原本由英國控制或有安全承諾的政治與領土地緣政治利益，在英國不復為超強、殖民地逐漸獨立之後出現許多有待填補的權力真空，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歐洲、中東與東南亞，但美、蘇在冷戰時從未再度舉行類似戰時會議之類的會議外交來重新安排彼此與其他主要強國在全球地緣政治體系中的政治與領土地緣政治利益以因應英國的衰退與兩極體系的發展。

第二，蘇聯在 1945 年 8 月對日宣戰之後迅速佔領中國東北與朝鮮半島北部，無法落實雅爾達會議與波茨坦宣言(Potsdam Declaration)的規劃，導致朝鮮半島分裂並加遽中國內戰，直接導致 1949 年之後迄今的兩岸與兩韓分立狀態，成為體系中最主要的衝突點之一。而其中最主要的影響是中國在中共的統治下採取與美國敵對的外交政策並介入韓戰，完全推翻美國原先希望中國作為其在東亞地區的強大盟友的考量，²²⁰美中雙方開始產生持續至今對彼此的深刻猜忌，雖然 1972 年以後雙方因為共同對抗蘇聯的戰略利益而接近並建立邦交，但並沒有改變此種猜忌態度，特別是中國方面對美國的態度更是如此，在冷戰後期雖然與美國保持戰略上的合作，但始終沒有加入美國的同盟體系。

第三，雅爾達會議對德、波、蘇三國邊界的重新劃定因為冷戰出現導致德國分裂，而使戰後歐洲在政治與領土地緣政治利益出現嚴重的對立。東德雖然為了立國的需要而在 1950 年與波蘭簽署條約，承認雅爾達與波茨坦會議劃定的奧德-奈塞國界(Oder-Neiße-Grenze or Oder-Neisse line)，²²¹但西德卻堅拒此國界線的合法性，不承認戰前德國東部領土(*Ostgebiete des Deutschen Reiches* or *die deutschen Ostgebiete*) 在戰後被波蘭併吞，甚至在 1952 年拒絕蘇聯用承認新邊界換取德國統一和國際中立地位的提議(即所謂的「史達林照會」(Stalin-Note))。²²²兩德的政治地位與德、波邊界問題遂成為冷戰時期歐洲最主要的領土與政治地緣政治利益衝突，而且由於冷戰的緣故，雖然兩極與兩大陣營為了兩德問題曾經試圖以會議外交解決，但至少在 1970 年代之前對此還是無法達成任何具體的共識，²²³更不

²¹⁹ Spanier,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 II*, op. cit., p. 29.

²²⁰ *Ibid.*, pp. 52-68.

²²¹ Debra J. Allen, *The Oder-Neisse Line: The United States, Poland, and Germany in the Cold War* (Westport: Praeger Publishers, 2003), p. 119.

²²² 西德拒絕蘇聯建議並非純粹的邊界考量，主要還是顧慮到當時剛建國的西德必須在與美國、西歐國家聯合以順利重建、恢復國際地位的主要政策目標，和統一德國，卻必須保持前途不確定的中立地位，以及單獨面對共產主義與蘇聯勢力西進的可能前景這兩個政策目標之間的辯論與決策結果，邊界問題之所以浮上檯面，乃是史達林的照會為了阻止西德進一步與西方整合和結盟，而將西德不願接受的德東邊界問題與德國統一掛勾的結果。辛達謨譯，Martin Vogt 編，*德國史*(臺北：國立編譯館，2000 年)，頁 1417-1421；洪丁福，*德國的分裂與統一：從俾斯麥到柯爾*(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4 年)，頁 249-254。

²²³ 美國與英國在雅爾達會議與波茨坦會議中雖然最後接受戰後歐洲邊界的變動，但在兩個會議中其實都曾反對邊界變動，即使美國後來的接受也是有條件的妥協而非最終蘇聯與波蘭實施的大規模邊界變動與民族遷移。因此一俟冷戰開始，不承認德波邊界變動的西德加入西方陣營，美國與英國在 1950 年代亦支持西德不承認東德建國與德波邊界現狀的立場。Department of the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The Conferences at Malta and Yalta*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5), pp. 716-717; Department of the

可能合作產生重要與各方都能接受的妥協安排。

換言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全球體系在 1945 年之後因為蘇聯試圖控制其在東歐、近東與遠東的弱小周邊國家，而加遽了西方國家對蘇聯動機的恐懼，當蘇聯的行動在 1950 年促成韓戰的爆發之後，蘇聯與美國、西方國家之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建立起來的信任與合作亦隨之崩潰，導致冷戰的產生。²²⁴冷戰時期雖發展出包括聯合國及其所屬組織與相關國際條約在內的多邊國際政治、經濟、安全建制存在，但全球地緣政治體系卻因美、蘇之間，以及兩超強與其他強權之間不存在全面的合作而無均衡可言。雖然美國是海權而蘇聯是陸權，似乎沒有地緣政治性質上的衝突，但實際上彼此卻都深入對方的地緣政治利益範圍內——美國組織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與蘇聯在歐洲大陸對峙，而土耳其與希臘作為北約成員國更使美國能夠進入黑海威脅蘇聯內部。反過來說，蘇聯在東歐與中歐的地位雖然是大陸屬性，但其在 1960 年代中期以後的海軍擴張則明顯深入美國的海洋地緣政治利益範圍。兩超強彼此深入對方的地緣政治利益範圍，使得所謂「海權的盟友是陸權」的假設在冷戰時期不復成立，美蘇雙方亦因此難以發展合作並達成體系均衡。直到蘇聯在 1987 年 5 月提出所謂「合理充足」(reasonable sufficiency)準則，並將整體戰略態勢改為戰略守勢後，²²⁵蘇聯深入美國地緣政治利益範圍的情況才有所緩和，雙方才能夠在 1990 年共同合作應付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產生的危機。

冷戰時期只有 1970 年代中期之後的歐洲區域次體系曾因建立了兩大陣營之間的信心建立措施(C 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 CBMs)而近達成均衡，其均衡的達成是從解決棘手的東德與德、波邊界問題開始。美國、法國等西方國家在 1950 年代後期開始正式承認東德的國際地位，以及接受或支持奧德-奈塞國界的合法性，²²⁶最重要盟國的立場變化，加上西德內部一方面急切希望降低與波蘭和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The Conferences of Berlin(the Potsdam Conference), 1945*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0), pp. 480, 519, 1150; Richard C. Lukas, *Bitter Legacy: Polish-American Relations in the wake of World War II*(Lexington, Kentucky: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82), pp. 16-18; Allen, *The Oder-Neisse Line, op. cit.*, pp. 17-29.

²²⁴ 關於蘇聯在東歐、近東與遠東的擴張導致體系強國之間互信與合作的消失的歷史分析，請參考 Andrew H. Kydd, *Trust and Mistru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chapter 4.

²²⁵ Milan N. Vego, *Soviet Naval Tactics, op. cit.*, p. 6.

²²⁶ 法國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政府在 1959 年公開宣佈支持以奧德-奈塞河線為德國的東部國界，美國則從艾森豪(Dwight Eisenhower)政府起就不斷針對是否支持奧德-奈塞河線、柏林問題、美國-波蘭關係與美蘇對峙等相關大小議題之間的互動關係進行政策辯論，其原因既有冷戰的國際結構因素，也有美國國內的波蘭裔美國人(Polish American)對美國政治的影響。在內外雙重壓力下，美國逐漸接受奧德-奈塞河線為德國的永久東部國界，但不像法國那樣公開宣示，直到德國在 1990 年統一，西德在統一前修改其基本法(*Grundgesetz für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or Basic Law)規定，明確承認奧德-奈塞河線為國界，並與波蘭、美國、蘇聯、英國、法國一起簽署「最終解決德國問題條約」(The Treaty on the Final Settlement With Respect to Germany, 又稱「二加四條約」)之後，才正式承認奧德-奈塞河線為德國的東部國界。Allen, *The Oder-Neisse Line, op. cit.*, pp. 1-2, chapter 5-8; William Glenn Gray, "West Germany and the Lost German East: Two Narratives," in Charles W. Ingrao and Franz A.J. Szabo eds., *The German and the East* (West Lafayette, Indiana: Purdu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406-407.

共產陣營之間的緊張關係，另一方面又逐漸出現對過去侵略歷史的「罪惡態度」(guilt narrative)，²²⁷導致其外交政策從 1960 年代起逐漸改變，最後終於在 1970 年代初因為「東進政策」(*Ostpolitik*)而對東德的國際地位與波蘭邊界問題出現鬆動現象，先後與東德、蘇聯、波蘭簽署一系列條約，承認東德的國際地位與實際上承認奧德-奈塞國界(但未修改基本法，仍聲稱必須等待德國統一之後再做決定)。²²⁸此一問題得到基本安排解決後，加上美國與蘇聯之間開始有所謂的「低盪」(*Détente*)出現，全體歐洲國家均參加、並用於合作處理歐洲安全問題的歐洲安全會議(Conference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CSCE)才得以出現，²²⁹使歐洲區域次體系在 1970 年代之後因為信心建立措施的產生而逐漸朝均衡達成發展。

(二)、冷戰後的全球地緣政治體系與均衡

蘇聯在 1980 年代中至 1990 年代初期崩潰之前與美國在國際安全領域的合作，如削減核武協議與條約，以及在聯合國中共同應付第一次波斯灣戰爭(*Gulf War*, 1990)，原本使得冷戰時期的全球地緣政治體系展現出達成均衡安排的可能，不過 1991 年蘇聯的突然解體使體系的結構劇烈地由海陸對峙的兩極轉變為美國海權單極，使得兩極體系達成均衡的可能消失，但冷戰後新的美國海權單極體系亦未能達成均衡。

首先是體系中仍缺乏足以使所有大國產生協作性權力平衡的共同威脅來源。維也納會議的均衡源自其他歐洲國家對拿破崙重新統治法國的威脅的共同恐懼，但冷戰結束後的體系並沒有此種在傳統安全方面的共同潛在威脅來源恐懼，雖然俄羅斯仍然存有恢復舊蘇聯的願望，俄羅斯也仍是美國之外最大的核武國，但美國、歐盟(1995 以後)、日本與中國並未與新的俄羅斯聯邦共和國一起完成單極體系中的政治與領土地緣政治利益安排，並填補蘇聯解體後在東歐、中亞與東亞出現的亟待填補的權力真空，只是被動承認俄羅斯繼承前蘇聯的國際法人格地位，以及獨立國協各國的獨立和歐洲、中亞國界的變動，並將原來美蘇之間於 1991 年簽署的戰略核武裁減協定(*START I*)擴大包括接收蘇聯遺留下來核武的獨立國協各國—俄羅斯、烏克蘭、哈薩克與白俄羅斯(1995)，²³⁰以修正並維持原來

²²⁷ Gray, "West Germany and the Lost German East: Two Narratives," *op. cit.*, pp. 407-411.

²²⁸ 即統稱為「東方條約」(*Ostverträge*)，包括分別規定德國、波蘭、蘇聯尊重歐洲戰後疆界現況，三國在當時與未來均不會提出領土要求，也不以武力解決爭端，形成對奧德-奈塞河線暫時性共識與妥協(*Modus vivendi*)的德蘇莫斯科條約(*Treaty of Moscow*, August 1970)與德波華沙條約(*Treaty of Warsaw*, December 1970)，以及規定兩德在國際法架構下關係的兩德基礎關係條約(*Grundlagevertrag* or *Basic Treaty*, 1972)。辛達謨譯，Martin Vogt 編，*德國史*，前引書，頁 1484-1493；洪丁福，*德國的分裂與統一*，前引書，頁 279-293。不過「東方條約」不只包括這三個條約，還包括其他五個從 1970 年到 1972 年，西德與蘇聯、美國、英國、法國、東德簽署的其他關於柏林地位的其他一籬筐相關協定，以及 1973 年與捷克斯洛伐克簽署的，確認 1938 年慕尼黑協議(*Munich Agreement*)為無效與非法，西德承認德捷邊界與放棄對捷克斯洛伐克的任何領土要求的德、捷「布拉格條約」(*Treaty of Prague*, 1973)等六個條約在內。

²²⁹ 吳萬寶，*歐洲安全暨合作組織：導論與基本文件*(臺北：韋伯文化，2003 年)，頁 7-12；David J. Galbreath, *The 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p. 13-15, 25-27.

²³⁰ "Chronology of U.S.-Soviet-CIS Nuclear Relations," *Arms Control Association*, 140

的戰略核武裁減協定之有效性。換言之，僅在軍事地緣政治利益達成部分擴大安排，而沒有進一步的政治、領土與軍事安排。其次，雖然維也納會議的均衡同樣有來自對民族主義與民主主義對歐陸各國王室的潛在威脅來源的恐懼，但冷戰後的全球地緣政治體系亦缺乏此種來源。恐怖主義目前尚無足夠強大的國際行為主體承載，使其對當前國際體系秩序的威脅遠不如拿破崙戰爭後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對歐陸主要國家的政治體制與國際安全的威脅，也因此使得各大國還沒有真正利用聯合國或產生其他新的全球性多邊反恐組織來作為整合各區域反恐與美國全球反恐作為的主導機制，也沒有產生其他專門為了反恐的需要而達成的多邊大國聯合反恐建制，無法將大國多邊反恐合作作為全球體系達成均衡的證明。

在這種情況下，冷戰後的體系是各大國之間雖然為了經濟發展與國際安全，而在冷戰後的體系中增加不少多邊合作建制，國際雙邊乃至多邊會議外交的次數大為增加，但彼此之間還是維持競爭性權力平衡的觀點思考與其他國家的競爭關係，美國從未與俄羅斯、中國、歐盟等強權就各方在體系內的地緣政治利益合作達成妥協安排，甚至對冷戰留下來的既有安排－戰略武器管制協議，雖然其持續加強與俄羅斯之間的戰略武器管制，但退出與俄羅斯的反彈道飛彈條約²³¹則嚴重侵蝕冷戰後期與冷戰結束後所建立的軍事地緣政治利益安排體系的基礎，蓋中國與俄羅斯對反飛彈系統的疑慮甚深並將其視為嚴重的安全威脅，美國退出條約可能會促使這兩國為了維持可信的嚇阻而增加核武數量或拒絕與美國進行戰略武器管制。²³²事實上冷戰時與冷戰後的戰略武器管制協議亦非真正全面的安排，它只包含美國與蘇聯/俄羅斯，忽略了體系中其他核武國。

不過其他強權也未必願意與美國或其他強權達成安排。冷戰後的全球地緣政治體系儘管比起冷戰時更加排斥戰爭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但既有的外交制度、國際法、科技發展與強權之間的關係管理在冷戰後的發展，仍然與冷戰時期一樣被用來增強競爭性權力平衡的手段，並沒有使權力平衡思維轉向協作性，而且因為美國與北約藉由反恐戰爭朝向歐亞大陸心臟地帶伸張勢力、歐盟東擴、中國海上擴張等行動皆互相將本身的勢力伸入另一方的地緣政治利益範圍－美國與北約在歐亞大陸心臟地帶的反恐戰爭威脅俄羅斯在歐亞大陸之地位、歐盟與北約的東擴以及不接納俄羅斯為成員國的態度威脅俄羅斯在東歐的地位與安全、中國在東亞的海上擴張則威脅到日本與美國的海上地位。這些發展持續增強強國對於權力平衡的競爭性思考而非協作性思維。

簡單來說，國家之間仍然存在視其他主要大國為最主要競爭對手與國家安全主要威脅的思考，這使得冷戰後還是沒有針對冷戰以來懸而未決的政治與領土地緣政治利益進行妥善的安排，這些政治與領土地緣政治利益反而因為超強之間的全球海陸對峙地緣政治緊張消失，安全問題區域化而在冷戰後的全球體系中變得

<http://www.armscontrol.org/print/217>.

²³¹ “ABM Treaty Fact Sheet,” *The White House*, December 13, 2001, <http://georgewbush-whitehouse.archives.gov/news/releases/2001/12/20011213-2.html>.

²³² Andrew Futter, “Getting the Balance Right: U.S. 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and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 30, No. 3(July/August 2011), p. 260.

比冷戰時更加敏感與具有危機升級的刺激性。因此冷戰後的全球地緣政治體系仍不存在均衡，均衡與冷戰時期一樣仍只存在個別區域地緣政治體系，例如歐洲區域次體系之中。

第六節、地緣政治結構與戰略文化

既然本論文一再強調地理是戰略文化的基礎，則地緣政治結構必然也會影響一個國家的戰略文化塑造與內涵。史奈德(Jack Snyder)雖然提出戰略文化有物質基礎，但他沒有以此基礎進一步研究戰略文化從何而來，王元綱亦批評江憶恩未曾解釋為什麼中國會出現他所認為的「霸道」戰略文化。²³³一般說來，戰略文化與國家本身的地理環境和各種內部的政治、經濟、社會等因素有最密切的關係，因為國家本身的自然地理相當程度上支配了經濟地理(economic geography)，經濟地理則決定社會地理的發展方向，最後社會地理對政治形式的演進發揮主要的影響力，²³⁴地緣政治環境塑造國家應付外來威脅的戰略選擇，長期下來產生固定的戰略模式並成為主流戰略文化，故地緣政治學在第一代戰略文化研究中，可補充「戰略文化從何而來」的基本議題。蓋國家的地緣政治環境決定國家偏好的戰爭形式，並進一步決定國家會演化出何種有效的外來威脅應付經驗，從而形成戰略文化。國家在結構中的地位，以及結構形式發生巨大轉變，新的長期均衡產生時，國家的戰略環境亦必發生變化，決策與戰略菁英對國家在結構中的地位、國家的國際戰略環境與敵我的地緣政治條件之變化而產生新的認知，偏好的戰爭方式、戰略文化亦必隨之發生改變。²³⁵

一、地理變數與戰略文化的根源和變遷

目前支配戰略文化研究的建構主義途徑研究一般說來較為忽略物質因素的影響力，但部分學者也承認自然地理對戰略文化形成的影響，趙景芳的「戰略文化的再思考」一文是主流戰略文化研究中少數有系統地分析國際環境與國內地緣政治環境等物質與非物質變數如何塑造戰略文化的研究，其認為戰略文化有內生與外部兩種形成機制，前者包括國家的地理環境、生產生活方式、傳統文化、歷史經驗、社會因素(包括組織制度、政治文化、科學技術等)等五大類，其作用是文化培養或教化(enculture)。趙氏認為在這五大因素中，國家的組織制度是戰略文化的直接塑造者、制度承載者和體現者，但仍須有其他四項物質基礎才能發揮作用，因此他承認戰略文化的基礎是物質的科學技術。後者則是以國家所處的國際體系環境，包括物質層面的結構性體系因素，以及理念層面的建構性體系因素，國家會因與外部世界的互動而將主動將體系文化內化(internalize)，也有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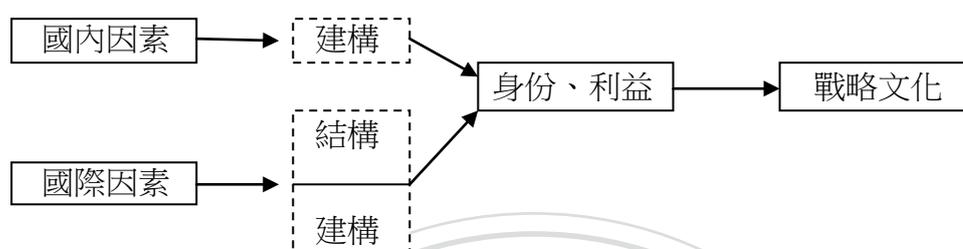
²³³ Yuan-kang Wang, *Harmony and War: Confucian Culture and Chinese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27.

²³⁴ Colin S. Gray, *The Geopolitics of Super Power* (Lexington, Kentucky: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88), p. 44.

²³⁵ 趙景芳，「戰略文化的再思考」，*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2008年第1期(2008年)，頁21。

是被動地遭同化(acculturate)。趙氏認為一個國家的戰略文化是國家在內部五大形成要素上進行自我建構，同時又受到與國際體系建構與結構層面互動的影響，遂形成對自我國際身份地位的認同，由此再界定其國家利益所在，最後形成其本身的戰略文化(圖 3.7)。²³⁶

圖 3.7 國家戰略文化生成過程圖解



資料來源：趙景芳，「戰略文化的再思考」，前引文，頁 20，圖 2。

趙氏的研究還是較為純粹的建構主義途徑，沒有在國際結構層面引入地緣政治分析，他仍將地理歸類在戰略文化的國家內生因素中。可是他又無法忽略地緣政治對國際關係的強大影響力，結果使他在解釋國際互動對戰略文化形成的影響時出現矛盾：為了強調國際環境的結構與建構因素對戰略文化的不同影響，他先表示國際的無政府狀態是一種客觀存在，國家在這種狀態下必需依靠聯盟政策與均勢手段平衡外部威脅，所以美國在獨立戰爭期間與法國的結盟與對兩次世界大戰的干預都是這種結構因素的產物，但接下來他又說，美國孤立主義戰略文化的形成是因為美國在剛獨立後與英國的連串互動受挫後，其開國元勳體認到捲入歐洲權力政治的危險才形成的，但他卻又很表示孤立主義是美國與英國的互動關係和獨特的地理位置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戰略文化傳統。²³⁷然而，如果權力平衡是趙景芳所謂的結構性戰略文化之一，那麼弱小的美國為何能以孤立主義取代權力平衡來應付英國的外在威脅？假使與英國的互動關係能決定美國孤立主義戰略文化的形成，那也是因為英國在 19 世紀身為地緣政治結構中唯一的全球海上戰略交通線控制者，使得美國與歐陸國家之間既無法相互威脅，也不能產生聯盟對抗英國。這種情況乃是海權成為國際體系中主導力量的結果，是一種地緣政治結構的影響而不是完全的權力結構影響。但是趙景芳並沒有指出這一點，他只注意到美國獨特的地理位置，而且錯誤地表示美國在一戰後成為世界首強之後就轉而積極主導國際體系主流文化的發展，忽略了美國在一戰後甚至二戰結束後初期強大的孤立主義聲浪對其外交政策的影響。顯然在結構因素方面，光是權力與自然地理兩個變數並不足以完全解釋一個國家的戰略文化，必需綜合起來從地緣政治結構的角度分析，才能得到比較正確的結果。

²³⁶ 同上註，頁 18-20。

²³⁷ 同上註，頁 19。

相較於趙景芳的建構主義途徑，歷史學派對地緣政治和戰略文化的結合研究就較為透徹，特別是在理論建構這方面，不過這也只是相對而言，因為長期以來，歷史學派也只有兩篇並不十分深入的文章提供了這方面的理論建構，首先是屬於格雷，其次則是美國夏威夷大學教授李氏。

格雷本身與戰略文化研究創始人史奈德一樣同屬江憶恩歸類的「第一代」戰略文化研究者，²³⁸傾向於將文化視為解釋戰略行為的背景因素而非與戰略行為之間具有因果關係，可以理論檢驗的統一研究變數，因為每個國家的歷史與戰略環境都不同，無法找出國家間共同遵循的行為模式，因此戰略文化始終只是戰略研究的一部份。²³⁹故他將戰略文化定義為「在社會中傳播的戰略社群對國家安全研究方法，包括看法(attitudes)、習慣(habits)與技術(skills)」。²⁴⁰戰略文化顯然是地緣政治因素的產物，因為「決定文化地理(cultural geography)的經濟地理深受自然地理(physical geography)的支配，而文化地理則對政治型態的演進有很大的影響力」，因此地緣政治同時包含了人文與文化等因素，以及領土、地形、經濟資產與政治實體間距離等統計，形成國家與民族的認同基礎，簡言之，國家的政治行為反映出歷史，而歷史則大致上為地理條件的產物。²⁴¹但格雷的研究範圍很明顯的僅限於單元層級而未提升到結構層級，可是根據他自己對戰略文化的定義，國際環境對戰略文化的形塑顯然具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力，因為只要政治體系本身不是封閉的，戰略菁英對處理威脅的看法、態度與技術都會受到外在環境變化的影響，而這些外在變化的影響力首推地緣政治結構，因為國家在應付外來威脅時不止需要考慮如何發揮本國地緣政治環境的特點來應付威脅，還需考慮外來威脅的性質，對不同性質的威脅做出不同的反應，而威脅性質的改變經常與結構的變化相關，特別是當結構範圍擴大並包含新的行為者，或結構形勢變化導致國家在結構中的地位改變，或出現更多潛在競爭者的時候。

夏威夷大學教授李氏進一步強調國家本身的地緣政治因素與國際物質結構對戰略文化的影響力。李氏認為戰略文化基本上是國家對其本身的地緣政治潛力的認知以及對國際環境長期趨勢的評估，二者交互影響下的結果(圖 3.8)。²⁴²換言之，地緣因素在戰略文化的物質基礎中佔了絕大部分，因為人類無法完全擺脫地理的限制，只能依靠科技來降低限制。然而，並非所有人對本國的地緣政治可能性的認知和限制，以及對國際環境的長期認知都相同。此種認知上的差異，再加上政治與軍事菁英各有不同的戰略思維，遂形成不同的戰略次文化(Strategic Subculture)。

²³⁸ 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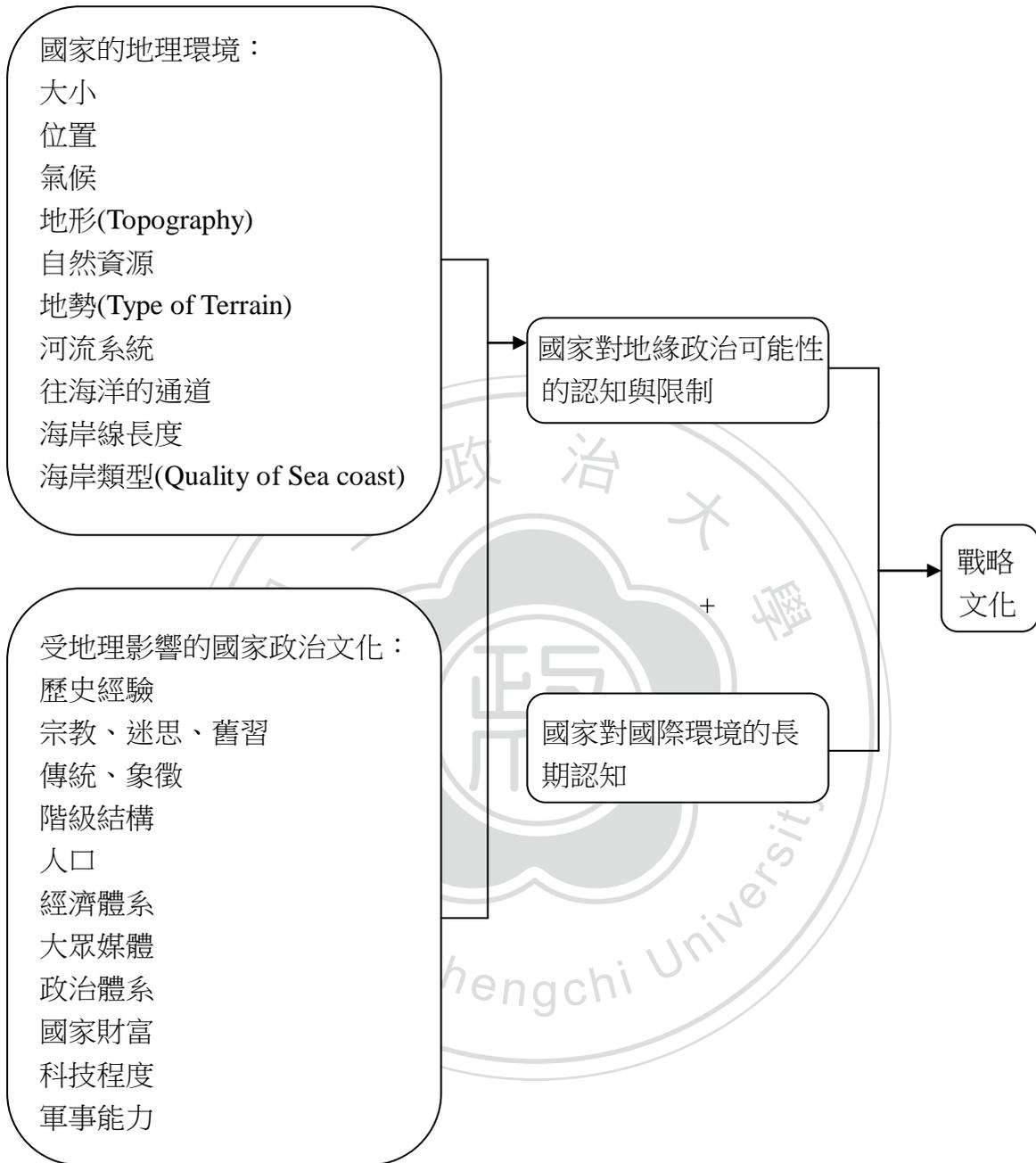
²³⁹ Gray, *The Geopolitics of Super Power*, *op. cit.*, pp. 42-43; and Colin S. Gray, "Strategic culture as context: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theory strikes back,"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5, Issue. 1(1999), pp. 46-69.

²⁴⁰ Gray, *Geopolitics of Super Power*, *op. cit.*, p. 51.

²⁴¹ *Ibid.*, pp. 43-44.

²⁴² Oliver M. Lee, "The Geopolitics of American Strategic Culture,"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 27, No. 3(May/June 2008), p. 268.

圖 3.8. 國家戰略文化的根源



資料來源：Lee, “The Geopolitics of American Strategic Culture,” *op. cit.*, p. 269.

從圖 2.2 可發現，李氏雖然一方面簡化了布斯的戰略文化根源變數，但他卻因為列舉了各種小型戰略文化根源而使他的研究變數較布斯看起來更為複雜。其實，李氏所謂的「國家地理環境」，可視為科恩的地緣政治特徵，至於其所謂「受地理影響的國家政治文化」，則與地緣政治模式的概念有極為類似之處，但是他在這部分的列舉太過龐雜，大眾媒體、科技程度與軍事能力很難直接或間接視為受地理影響的國家政治文化，亦即上文提到的，格雷對於戰略文化從自然地理到

文化、社會地理的演進過程中，故應將其捨去以免變數過於龐雜而難以研究。甚至於僅以傳統與象徵這兩個名詞來說明這是受地理影響的國家政治文化，因此屬於戰略文化的根源之一，這樣的說法也太過簡略。既然戰略文化是國家長期以來與主要威脅互動的經驗累積，在這兩方面能作為戰略文化根源者，只有那些長期以來他國互動的主要方式，以及如江憶恩所謂的，不斷出現於重要戰略思想典籍中的「符號」，²⁴³才能作為戰略文化根源中的傳統與象徵，而非所有的傳統跟象徵，都對戰略文化的形成，具有相同的根源效力。

不過典籍中的「符號」所代表的意義會因為思想家的派別、使用這些符號的人的身份地位，與時代的差異，而產生對戰略文化的效力是否一致的問題，例如在中國戰略文化中，雖然儒家、兵家都有提到所謂的「仁」的概念，但兩個學派對「仁」的概念是否一致，卻很值得商榷。同樣的，政府官員雖然可能受到儒家或兵家思想的深刻薰陶，但他們對「仁」的認知，是否與不具官方身份的純粹學者在思想典籍中的認知一致，又是另一個問題，更不用說時代變遷所產生的差異，春秋時代的「仁」的意義，是否即與秦漢以後的「仁」一致，或者戰國時代修建的長城，其戰略意義是否與秦、漢、北魏、北齊、隋、明朝等帝國的長城一致。江憶恩並沒有提到這些問題，可是這些問題對於他所謂的戰略文化定義的可操作、證偽性，以及大戰略偏好的排序，²⁴⁴卻有重要的影響。而由於這些差異過於偏向理念與思想層次，與本論文的研究變數設定與戰略文化途徑相關性不大，故雖然是戰略文化研究中極為重要的議題，但本論文的戰略文化研究途徑捨棄了對這方面的研究。

最後，李氏提到了「國家對地緣政治可能性的認知與限制」與「國家對國際環境的長期認知」等兩個戰略文化形成過程中的變數，這其實這其實已經屬於本論文所採用的批判性地緣政治學地緣政治密碼研究途徑，顯示他的研究其實綜合了許多新古典地緣政治學與批判性地緣政治學的觀點，與奧圖塞爾的四大批判性地緣政治學類型有若干符合之處，而且其後他在該文中對美國戰略文化中的地緣政治機遇(Geopolitical Opportunities)的分析也包含了許多對外交政策實務者的地緣政治思想研究，²⁴⁵儘管他並沒有提到這種批判性地緣政治學的概念。因此，經由上述對李氏概念的整理與分析可知，李氏對於戰略文化形成的概念，可簡化為國家在其地緣政治特徵與模式的影響下，經由其地緣政治密碼的指導，與周邊地緣政治結構特徵與模式所產生的其他行為者之間的長期戰略互動所產生的戰略經驗累積。

二、地緣政治結構形式對戰略文化性質的影響

綜合上述的回顧與分析可發現，地緣政治結構透過兩種方式完成此種影響，第一種是藉由結構中的地緣政治特徵與模式等基本物質環境來影響國家偏好的戰爭方式，以及國家大戰略的攻守勢性質，和對武力在國際事務中效用的信任程

²⁴³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op. cit.*, pp. 36-37.

²⁴⁴ *Ibid.*, pp. 35-36, pp. 37-39.

²⁴⁵ Lee, "The Geopolitics of American Strategic Culture," *op. cit.*, p. 278.

度。第二種則是利用物質地緣政治環境來影響戰略菁英的世界觀與地緣政治密碼，例如新古典現實主義學者杜耶克(Colin Dueck)對美國歷次戰略調整時權力與文化各自扮演的角色所進行的研究，認為美國大戰略的選擇除了必須能應付國際環境的變動之外，還必須符合美國自由主義與擔負有限國際責任的戰略文化，任何不能同時滿足這兩者的選擇都無法成為美國在特定時期的大戰略。²⁴⁶楊仕樂則分析農業與工業時代不同的社會物質基礎對戰爭行為的影響，來論證「不戰而屈人之兵」與「文化道德主義」(Cultural Moralism)²⁴⁷並非中國獨特的戰略文化，西方也曾有過，而之所以會產生此種偏好非暴力的戰略文化都是物質條件的差異使然，在物質條件允許時，暴力型的戰略文化亦為中國戰略文化的主要典型，²⁴⁸是否會出現文化道德主義則取決於中國是否身為體系的單極或霸權。²⁴⁹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有二，首先是體系的秩序原則類型，在霍布斯無政府狀態文化與康德無政府狀態文化這兩種極端中，前者不可能存在柔性戰略文化，後者則皆為柔性戰略文化，至於洛克無政府狀態文化則必須視其他地緣政治體系具體秩序原則而定，例如當體系秩序原則允許國家以戰爭為合法的擴張與解決爭端的手段時，甚至視併吞他國為常態時，柔性戰略文化並不容易存在。第二種原因則是結構性的，亦即結構的形式、國家在結構中的地位，以及結構中是否存在國家即使耗費長期力量也無法徹底解決的威脅，若存在此種威脅則國家的戰略文化不可能是純粹的柔性或和平傾向，至少必須以強現實政治戰略文化面對此威脅；反之，假使威脅可以在短時間內徹底解決，則戰略文化會因威脅消失而慢慢轉向，但須耗費多少時間才能完成轉變亦無精確的時間長度。

這樣的歸納意識用於霸權結構。歷史上許多霸權並未出現所謂的「柔性」戰略文化，反而持續擴張相當長一段時間的原因便在於霸權在結構中仍存在強大的潛在威脅，使之繼續朝結構的邊緣地區特別是霸權認為潛在威脅最大的地區擴張，直到佔有結構中絕大部分的精華區，並取得明顯的防禦地勢，幾乎沒有其他適合再向外擴張的領土與安全動機時為止，此時維持國內統取代向外擴張成為最重要的政治考量，而龐大的武力對於此並非最佳手段，反而可能危及霸權的政治統一與穩定，至於邊境的騷擾性威脅則只需小型機動部隊即可應付。如此的戰略環境使得霸權必須改以政治、經濟、文化等柔性手段維繫本身與整個地緣政治體

²⁴⁶ Colin Dueck, *Reluctant Crusaders: Power, Culture, and Change in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Princeton and Lond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21-42.

²⁴⁷ Cultural Moralism 一詞係張鐵軍在 2002 年時首次提出，而楊仕樂在 2007 年將之譯為「文化道德主義」。張鐵軍原來認為該詞指的是中國戰略文化在規劃中國的安全戰略時以儒家思想的德、仁、義等為基礎信條，楊仕樂則進一步指出文化道德主義的重點在於強調道德的感化與制度的吸引力，不單單只是偏好和平手段而已，因為有些和平手段具備強制性質，不能使被制裁者心悅誠服。請參考 Tiejun Zhang, "Chinese Strategic Culture: Traditional and Present Features,"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 21, No. 2(April/June 2002), p. 73; 楊仕樂，「中國獨特的戰略文化？尋找理念的物質基礎」，*東亞研究*，第 37 卷第 1 期(2006 年 1 月)，頁 203，註釋第 9。

²⁴⁸ 楊仕樂，「中國獨特的戰略文化？尋找理念的物質基礎」，*東亞研究*，第 37 卷第 1 期(2006 年 1 月)，頁 198-230。

²⁴⁹ 同上註，頁 221-223。楊仕樂在同一篇文章中(頁 200-201)還指出戰略文化也會隨著國內的物質基礎變化而發生轉變。

系的穩定，大戰略類型改為安撫型或防禦型，文化道德主義因此才有取代強現實主義，成為主導性戰略文化的空間。以羅馬為例，儘管其在西元前二世紀中葉就取得當時地中海區域地緣政治體系的霸權地位，但還是繼續朝多瑙河(Danube or die Donau)流域、高盧(Gaul) 與萊茵河(Rhine)流域、大不列顛(Great Britain)等地區擴張，直到進入帝國時代初期之後才確立帝國在歐洲與中東的堅固且明確的防線，並大幅裁軍，輔以靈活的同盟國體系來維持帝國安全。²⁵⁰

霸權之外的地緣政治結構形式由於超強的增加以及超強與強權之間力量差距的對比不如霸權結構中巨大，似乎使得國家更不容易發展柔性戰略文化，或者傾向於在強現實戰略文化中輔以部分柔性戰略手段，以求降低達到戰略目標所需的花費。整體而言，在相對簡單的單極結構中，陸權單極的戰略文化比海權單極更容易傾向完全的強現實政治：單極與強權之間因彼此互為國家安全與戰略交通線控制的潛在威脅而均以強現實政治戰略文化主導其戰略，以免遭受對方的奇襲而嚴重傷害國家安全。此外也導因於國家在陸地上的行動遠比海洋容易，陸權單極由於想要將結構更進一步轉為霸權而維持強現實政治戰略文化，但在這種情況中，會加入部分柔性戰略手段以試圖更迅速達到目的。海權單極雖然因為海洋的阻隔，在國家安全上的擔憂比陸權輕微而較容易發展出秉持理想主義特色的柔性戰略文化，但仍然無法完全擺脫強現實主義戰略文化，畢竟其對海上戰略交通線的控制非常容易受到侵蝕的威脅，若不盡全力維持對海洋交通線的控制能力，並阻止陸地強國之間的戰略合作，極有可能會在短時間內出現足以與之匹敵的潛在競爭對手，將體系導向兩極甚至多極發展。因此在海權單極體系下，單極本身與其他強權的戰略文化仍以強現實主義為主，而且單極與體系內其他強國之間的國力差距越接近時，強現實主義面向越容易表現出來。

強現實政治戰略文化在無極、兩極與多極結構中更是普遍的現象，因為沒有一個超強或強權能在結構中取得絕對優勢地位，而每個超強或強權又都想在這些方面獲得比其他極更多的控制權，或阻止其他對手獲得更多控制權。此外，在兩極以上的體系結構中，極之間經常擁有共同邊界，或勢力範圍重疊，因此國家的重心和所控制的交通線經常相隔不遠，距離的因素使彼此都擔心對方對本國領土與交通線的威脅，也都想盡量消除這些因距離而產生的威脅，而最直接的手段就是盡量使敵人與本國的領土及交通線距離越遠越好，武力縱使不是唯一用來實行擴張或阻止潛在敵人擴張的手段，其他非武力手段也常帶有濃厚的現實主義考量，²⁵¹強調競爭與擴張的戰略環境遂難以使柔性戰略文化得到發展的機會，例如歐洲在羅馬帝國分裂之後，再也沒有哪一個國家出現類似羅馬帝國的柔性戰略文化與防禦性質為主的大戰略，馬基維利(Niccolò Machiavelli)的現實主義思想更是

²⁵⁰ 關於羅馬帝國的大戰略可參考 Edward Luttwak, *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an Empire from the First Century A.D. to the Third*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6).

²⁵¹ 米爾斯海默將國際競爭中獲取權力與阻止對手獲得更多權力的非武力戰略歸納為訛詐(Blackmail)、誘捕(Bait and Bleed)、坐觀血腥廝殺(Bloodletting)、權力平衡(Balanc of Power)、推卸責任(Buck-Passing)、綏靖(Appeasement)與扈從(Bandwagoning)等七種，每一種皆是現實主義考量下的產物。請參考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Norton, 2001), pp. 147-164.

發源於 15 世紀義大利半島長期多國混戰的時代。

第七節、小結

本章的討論顯示均衡乃是國際安全合作的最高等級，但也因此是最難達成的合作。均衡既與地緣政治結構有密切的關係，也與國家的戰略相連，只要有對現狀不滿的國家不願意加入即不可能達成。而國家是否加入安排並協助均衡的達成則與其地緣戰略有密切的關係，而地緣戰略的制訂、性質與操作，則牽涉到國家的地緣政治密碼與戰略文化的影響。

此外，本章第六節第二小節以西方歷史發展對地緣政治結構和戰略文化之間的推論，是否適用於本論文主旨的中國個案？本論文在第四章進一步利用上述的結構對戰略文化與大戰略性質的影響概念，配合本章的地緣政治結構模型，對中國自古以來戰略與決策菁英的地緣政治密碼變遷與戰略文化的發展作進一步的分析，進一步分析中國古代的地緣政治密碼與戰略文化的性質，及其對中國古代帝國的地緣戰略之影響，以藉此找出中國戰略文化的真貌與古代中國遺留給當代中國什麼樣的戰略遺產。



第四章 中國古代地緣戰略遺產

本章的目的在分析中國古代遺留的地緣戰略遺產，認為中國古代戰略菁英所秉持的天下「世界觀」(Weltanschauung or Worldview)受到東亞地緣政治結構與中國本身的特徵與模式之影響，產生地緣戰略重心置於「中原」，首要戰略方向是東亞北方或西北方的徹底陸權式地緣戰略思考，完全缺乏海權戰略思想。天下觀指導了中國古代戰略菁英的地緣政治密碼，發展出九州一統的周邊密碼與華夷一家或嚴夷夏之防的體系層級密碼，是中國古代帝國的標準地緣政治程序實施根據。天下觀既視中國為東亞地緣政治體系的中心，不存在體系均衡的概念，也很少競爭性權力平衡的概念，造成中國古代戰略菁英對東亞地緣政治體系的秩序目標是以其為中心的霸權穩定甚至帝國式均衡；而強烈的天朝意識與不瞭解、鄙夷周邊國家的心態，使其在無法達成此一目標時多依賴內平衡來對抗主要威脅，外平衡很少受到重視。

天下觀與地緣政治結構的特徵和模式，以及中國古代甚早完成極為發達的中央集權政治體制，並以此全面控制社會制度，與重視農業經濟、抑制商業發展的經濟制度，產生了持續兩千多年的內政導向戰略文化。此戰略文化相當信任武力在國際事務中之效用，但其大戰略偏好為攻勢或守勢則視戰略目標於九州之內或之外，並與決策圈秉持華夷一家的高理想性密碼或低理想性的嚴夷夏之防等兩種不同體系地緣政治密碼有密切關係。地緣政治結構阻礙了中國古代帝國持續向外擴張，同時也對帝國內部長期穩定統一始終構成潛在威脅，內部與外部的結構特徵與壓力，造成帝國難以採用速戰速決的攻勢或攻勢防禦戰略解決體系中的安全威脅，遂使內政導向戰略文化在天下觀的影響下重視內部穩定高於對外行動，而且發展出另一種以武力為核心，輔以其他政治、經濟、心理手段應對威脅的「間接戰略」(Indirect Strategy)特徵。

本章共分六節。第一節利用地緣政治結構理論，首先分析中國古代所處的東亞地緣政治結構與體系的地緣政治特徵與模式，提出「**農耕—封建**」與「**草原—部落**」等兩大地緣戰略領域。第二節則分析東亞地緣政治結構與天下觀發展的互動，以及天下觀對中國古代戰略菁英地緣政治密碼的影響。第三節則根據前兩節的研究，討論內政導向戰略文化的起源與特徵。第四節則根據內政導向戰略文化與東亞地緣政治結構、古代帝國決策菁英地緣政治密碼的差異，研究中國古代一統帝國的大戰略偏好。接下來在第五節則提出古代地緣戰略經驗留下來的純陸權式思考、偏好內平衡與缺乏均衡甚至權力平衡概念等三種遺產。第六節則是本章的小結，總結本章的研究並連結與第六章對當代中國地緣政治密碼與戰略文化的研究。為了配合地緣戰略研究的需要以及凸顯地緣政治結構對戰略文化變遷的影響，本章的分析研究方法以歷史趨勢分析為主，至於江憶恩等第三代戰略文化學者與批判性地緣政治學重視的決策與戰略菁英思想和重要戰略文獻分析則作

為輔證主要研究途徑之用。

第一節、古代東亞區域地緣政治結構的特徵與模式

鴉片戰爭之前的中國古代地緣戰略在結構上受到其身為東亞地緣政治體系中的超強甚至霸權，以及佔據東亞地緣政治結構中最適合農業發展的地區作為帝國的核心區與精華區的影響，產生了以天下觀為基礎的地緣政治密碼，以及同樣受自然地理與經濟地理深刻影響的戰略文化類型。故本節將首先對古代東亞地緣政治結構進行簡要分析。

東亞是東北亞與東南亞的總稱，在古代這個地區尤其是東北亞的大陸部分具有明顯的地理封閉性，既缺乏能從海上深入內陸的海灣，又受到崇山峻嶺和山脈所造成的高原與沙漠氣候包圍，不易與其他地緣政治體系發展密切的互動。東亞內部也有嚴重的自然地理切割，大陸與外部的「島鏈」隔著相當寬闊的海域，使得兩者之間的互動密度並不高，發展也甚為緩慢；東亞南方既有廣闊的熱帶雨林，也有險峻的縱谷地形，北方與西方更有世界著名的廣大高山、高原、草原與沙漠，氣候與地形皆不利內部各區域發展密切的互動，大部分中南半島地區遲至 13 世紀以後才逐漸被納入以中國為主導的東亞地緣政治結構內。而島鏈區的菲律賓、大部分印尼與馬來西亞地區皆很少與身為東亞核心國家的中國或其他東北亞國家發生密切的互動，只有日本因為和大陸的距離較近而勢力外，因此古代東亞區域地緣政治結構的範圍僅包含互動密切的東北亞與中南半島。

古代東亞地緣政治結構可分為 13 個不同的地緣政治區域：日本列島、蒙古、¹西域(塔里木盆地與天山)、滿州(Manchuria)與朝鮮半島、²華北平原、黃土高原、四川盆地、長江中下游、雲貴高原、華南、青康藏高原、印度支那(Indo-China)、泰國與緬甸。這些地緣政治區域並非同時形成，對整個結構的戰略重要性亦有所區別。華北平原與黃土高原是最早發展的地區，其次則是長江中下游與四川盆地，再來則為緊鄰華北的內外蒙古與朝鮮半島。青康藏高原與熱帶地區的雲貴、印度支那與泰緬地區至八世紀後才先後成為地緣政治區域；日本列島則由於寬闊海洋的阻隔而始終保有獨立地緣政治區域的地位。³但東亞並非一

¹ 包括內外蒙古與新疆東北的準噶爾盆地，後者自匈奴時代起即為蒙古地區游牧民族牧區的一部份，直到清朝時還將該地稱為「衛拉特蒙古」或「漠西蒙古」。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擇*(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 年)，頁 125；姚大中，*古代北西中國*(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81 年)，頁 211-212。

² 廣義上的滿州包含舊東北九省全境與熱河，但熱河與東三省西部歷史上為匈奴、蒙古等草原游牧民族的畜牧區；東部的溫帶季風氣候區擁有較多森林與降水，游牧雖然也是當地的烏桓、鮮卑、女真等民族的生產方式，但粗放農業、漁獵等所佔的比重遠比西部的游牧民族為高，而且越往東部越依賴漁獵而放棄游牧。因此本文的「滿州」並不包含如今屬於內蒙古自治區的舊東三省地區。可參考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擇*，前引書，頁 125、210-217；Owen Lattimore, *The Mongols of Manchuria: their tribal divisions,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historical relations with Manchus and Chinese, and present political problems* (New York: H. Fertig, 1969), pp. 42-46.

³ 東亞大陸與日本之間最狹窄的對馬海峽寬約 130 公里，相較之下英吉利海峽(English Channel)僅有 34 公里寬，導致英格蘭長期被大陸國家直接或間接控制，只有更遠的愛爾蘭與蘇格蘭免於

開始就形成包含這 13 個地緣政治區域的結構，而是逐漸擴大與發展：在西元前 1,000 年左右的中國西周時代，東亞區域地緣政治結構僅包含黃土高原與華北平原兩個地緣政治區域，直到西元前 771 年以後的春秋戰國時代才逐漸擴大至長江流域與內蒙古，又等到秦朝在西元前 215 年前後征服華南與越南中北部，⁴以及匈奴在秦漢之際興起並統一整個草原地區，結構才大致完全發展成形，此時僅剩青康藏高原、日本列島與泰緬地區尚未真正被納入結構，但也紛紛在西元 7 世紀與 13 世紀時被納入結構之中。

今日中國的華北與華中地區的關中盆地、華北平原與長江中下游地區為整個古代東亞地緣政治結構的歷史核心區，是最重要的政治中心與經濟精華區所在，雖然朝鮮半島、越南、日本等三國等亦為東亞歷史悠久的古國，但無論是朝鮮半島、中南半島或完全獨立的日本列島，其發展程度皆比不上中國迅速，甚至經常必須仰賴與中國的交流才能獲得更先進的生產技術以進一步發展。而當東亞地緣政治結構發展至包含大多數地緣政治區域後，整個結構可依其氣候受海洋的影響程度，以及主要的生產方式和因此發展出來的文明類型，大致分為「**農耕—封建**」與「**草原—部落**」等兩大地緣戰略領域，前者包括今日中國在長城以南與青康藏高原以東的華北、華中與華南，至於更南方的印度支那與泰緬地區，其熱帶季風氣候的自然環境不適合中原農業的發展，且因為地形破碎並遠離領域的核心區和精華區，使其在歷史上經常為獨立地緣政治區域，即使從屬於領域之中也常成為不一致區域。草原領域則包括蒙古、新疆與滿州。

兩大領域交界處在遼東、內蒙古與河西走廊等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 或譯賴德懋)稱為「**邊緣地域**」(marginal territories)的半農半牧區，⁵這些地區的歸屬隨兩個領域的相對力量強弱而時有變動；青康藏高原的歸屬直到元朝為止皆屬於草原領域，明朝之後才受農耕領域支配；朝鮮半島因其中北部在中國的秦漢時期屬於這兩個帝國的領土，在唐朝中期與明朝則因臣屬於這兩個朝代而屬於農耕領域，但在南北朝、隋朝、唐朝初期與兩宋則為獨立地緣政治區域。此外，長江流域在東晉、南北朝與南宋期間獨立為新領域。但有時結構亦不存在任何領域。然而兩個領域都是徹底的大陸屬性，東亞始終沒有出現過海洋領域。以下分別敘述兩個領域的地緣政治特徵與模式。

一、農耕—封建地緣戰略領域的地緣政治特徵與模式

此領域的範圍大致上即為今日長城以南與青康藏高原以東的地區。領域東部

此種命運，可參考 George M. Trevelyan, *History of England* (London;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and Co. LTD., 1926), chapter II, pp. 80-85, 101-169.

⁴ 秦朝究竟是否已將越南中北部納為領土目前仍頗有爭議，以往認為秦朝已領有越南中、北部地區，但有學者主張秦朝領土只及於今廣東與廣西地區，並未真正進入越南。請參考張榮芳、黃焱章，**南越國史**，第 2 版(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8 年)，頁 83-84。

⁵ 邊緣地域是學者拉鐵摩爾提出的政治地理概念，在地理條件與生產性質上都具有明顯的過度性。拉鐵摩爾主張這個地區構成獨特的邊緣社會，從未被草原或農業民族真正征服，反而兩大勢力都必須依賴邊緣社會的支持才能有效壓倒對方。Owen 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New York: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1951), pp. 411-412.

以平原和丘陵為主要地形，西部與南部則多為高山與高原，北方與西北方則以長城線作為與草原領域的分界線。氣候大多為季風氣候，且擁有許多大河，故以農業主要生產方式，並發展出高度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華北平原與關中盆地是本領域的歷史核心，長江中下游、四川從春秋時期起成為有效領域，在南北朝後逐漸成為精華區，其中四川盆地雖甚具成為不一致區域的潛力，但其位置使支配本領域的華夏勢力易於在此扎根並實施政治與經濟控制，因此四川作為有效領域的時間遠多於不一致區域。而華南、雲貴和印度支那地區，由於氣候溼熱與地形破碎，非常不利於華夏勢力的擴張，因此長期為荒蕪地區與不一致區域。長城線周邊與隴西高原因氣候逐漸向草原過渡，生產方式為農牧並行。⁶此外本領域雖擁有許多作為農業文明發展基礎的東西向大河，但這些大河卻形成地理學上所謂的「平行河川體系」，對領域內的南北往來與政治統一構成重大障礙，⁷雲貴地區更由於地形崎嶇，在歷史上長期擁有半獨立甚至完全獨立的政治地位。

本領域的戰略交通線形式為道路與河川，但由於運輸量與效率差異甚大，戰略交通線通常以長江、黃河、淮河等三大河為主，而這些河川的戰略價值又略遜於連接不同平行河川體系的運河系統。道路的分佈經常隨政治中心的變化而改變，陸地戰略交通線通常只出現於水運尚不發達，或水路戰略交通線無法順利抵達之地，例如關中與河北之間的豫西山地與山西省的河東，由於水運難以順利連接，因此以道路連接關中與華北水陸交通路中心的洛陽。當政治中心移至洛陽、開封或北京等水路戰略交通線能迅速抵達的地區，道路的戰略價值就大為降低，比較重要者為水路無法抵達的重要邊防地區的道路，例如關中盆地西北通往寧夏與甘肅的「蕭關道」，與關中朝北通往鄂爾多斯的「靈州道」，二者不僅為「大絲路」的一部份，而且是游牧民族由寧夏與鄂爾多斯兩方面進入關中的主要交通線，⁸控制道路的蕭關與靈州即成為最重要的戰略要地，顧祖禹曾稱蕭關「自秦漢以來，為華戎之大限」。⁹另一陸地國防交通線為華北通往塞外的路線，主要有二，其一為由洛陽正北行，經今山西中北部的太原、朔州至內蒙古河套地區的路線，其二則為洛陽東北行，經邯鄲、北京而至遼西的路線。¹⁰二者為西周以來歷代北伐的主要路線，¹¹所謂的「燕雲十六州」即位居此兩路線末端，故成為農耕

⁶ 史記·貨殖列傳，記載隴西與長城沿線的天水、隴西、北地、上郡等地區，「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狄之畜，畜牧為天下饒」。馬持盈，**史記今註**，第3版（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年），頁3317；史念海，**唐代歷史地理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頁260-263。

⁷ 蔣君章，**政治地理學原理**（台北：中外出版社，1976年），頁177-178、180-182。

⁸ 李峰，**西周的滅亡：中國早期國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頁45-48；薛正昌，「蕭關道與固原歷代政權建置及其發展」，**西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甘肅省蘭州市），第1期（1994年），頁64-71。蕭關道與靈州道的詳細路線和其通往關中、戎狄的道路路線，可參考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卷一，頁175-220。

⁹（清）顧祖禹撰，賀次君、施和金點校，**讀史方輿紀要**（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頁2790。

¹⁰ 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卷一，前引書頁129。

¹¹ 宋朝**太平寰宇記**卷四十九引**冀州圖經**記載：「自周、秦、漢、魏以來，前後出師北伐，唯有三道：中道正北發太原，經雁門、馬邑、雲中，出五原塞，直向龍城，即匈奴單于十月大會祭天之所。一道東北發向中山，經北平、漁陽，向白檀、遼西，歷平岡，出盧龍塞，直向匈奴左地，即左賢王所理之處。一道西北發自隴西，經武威、張掖、酒泉、敦煌，歷伊吾塞，向匈奴右地，即

領域北方最重要的戰略要地。¹²

在魏晉南北朝之前，本領域的政治核心與精華區完全位於華北，特別是關中地區。魏晉南北朝時由於北方人口的大量南遷，與東吳、東晉、南朝等朝代的興起，使得長江流域逐漸崛起為領域的新精華區，包括四川盆地、長江中游的荊襄地區與下游的「三吳」地區，¹³長江亦因此在東晉之後才成為戰略交通線。但領域的政治核心主要仍位於華北，不過由於中國北方氣候逐漸乾冷化，¹⁴以及戰亂等自然與人文地理環境的變遷，導致原先就極度仰賴黃河流域灌溉系統以維繫本身繁榮的關中地區逐漸失去精華區的地位，使得農耕領域的政治核心在魏晉南北朝時代重新出現關中與黃淮平原交替的現象。唐朝中期之後的安史之亂(755-763年)、藩鎮割據、黃巢之亂(875-885年)以及五代的長期戰亂，以及氣候逐漸進入歷史上著名的「小冰期」(Little Ice Age)，¹⁵使得華北在五代之後完全喪失精華區的地位，本領域的精華區僅剩長江中下游，以及明朝之後的珠江流域。同時，政治核心也由原來的黃土高原與洛陽逐漸東移至更容易藉由運河連接長江流域的開封、南京與北京等地。不過華南始終是領域內相當落後的地區，直到明朝時華南的廣東地區才有明顯的發展，成為結構的新精華區，但雲貴地區與廣西因為土著民族的力量強大，例如唐、宋時期的對這兩帝國構成嚴重威脅的南詔，以及繼承南詔，但並未服從中國的大理國，實際統治該地的元、明、清三朝也必須以「土司」制度籠絡當地民族，因此一直是領域中實際或潛在的不一致區域。

二、草原一部落地緣戰略領域的地緣政治特徵與模式

本領域深處歐亞大陸內部，氣候以草原與沙漠為主，只有受黃海與日本海影響的滿州，以及受到北極海影響的漠北，擁有茂密的森林與大河流。本領域的生產方式並不限於游牧，西元前 2000-1000 年開始的世界大規模氣候寒冷化造成青海東北部的河湟地區、內蒙古的鄂爾多斯地區、西遼河流域等逐漸轉為草原，直到春秋時代才稍微回暖，再度使部分上述地區適合農業發展，¹⁶因此本領域在氣

右賢王所理之處」。史子正，**太平寰宇記**(臺北：文海出版社，1963年)，頁 401。

¹² 前述北伐路線中的雲中即燕雲十六州的雲州，雁門關亦位於燕雲西部，馬邑則位於燕雲十六州中的朔州。另北平屬幽州，漁陽則屬檀州與薊州，盧龍塞即今喜峰口，位於燕雲東部。

¹³ 方高峰，**六朝政權與長江中游農業經濟發展**(天津市：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王玲，**漢魏六朝荊州地區的經濟與社會變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許輝，蔣福亞主編，**六朝經濟史**(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

¹⁴ 中國西北部地區的沙漠化約起自北魏(西元 386-534 年)初期，北宋時夏州(轄區約在今陝西北部榆林市與內蒙古鄂爾多斯市的杭錦旗與烏審旗一代)已處於沙漠中，北宋在 994 年奪得此地時不得不放棄此城。何彤慧、王乃昂、李育、馮文勇，「歷史時期中國西部開發的生態環境背景及後果——以毛屋素沙地為例」，**寧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第 28 卷第 2 期(2006 年)，頁 28。

¹⁵ 劉昭民，**中國歷史上之氣候變遷**(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92 年)，頁 116-174。

¹⁶ 林濤，「中國北方長城地帶游牧文化帶的形成過程」，**燕京學報**(北京)，新 14 期(2003 年 5 月)，頁 95-146；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擇**，前引書，頁 90-91；許倬雲，**西周史**(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4 年)，頁 68-69；劉昭民，**中國歷史上之氣候變遷**，前引書，頁 31-73。**史記·匈奴列傳**也記載，周人祖先公劉因為「失其稷官」，只好「變為西戎」，很明顯是因為氣候變遷才會導致原來以農業為主要生產方式的民族改為游牧業，見馬持盈，**史記今註**，前引書，頁 2898。

候適合之處亦能發展農業，特別是滿州冬季森林中狩獵與夏秋兩季的農業收穫是該區游牧民族的重要輔助生產方式。¹⁷塔里木盆地則因塔里木河而產生可供精細農業發展的綠洲，¹⁸除此之外大多數地區皆以游牧為主。游牧無法發展出嚴格中央集權甚至封建式政治制度，只有部落、部落聯盟，所謂的游牧帝國也只是以分配牧場與其他牧民無法自產的必要生活資源為主要功能的「超部落國家」。¹⁹僅當游牧民族控制了農耕地區並將政治核心置於該區後才會向中央集權帝國政治制度轉變，例如北魏、遼、西夏、金、元、清。

王明珂曾指出理想的牧區包含三個條件：一、足以在不同季節皆可提供牧畜所需的水草資源的廣大草原；二、有森林的山區，提供牧民獵場與製作車具、穹廬、弓矢的木材，且能在夏、冬季節得到豐富的水源、草料及避風寒的場所；三、鄰近定居村鎮、半游牧聚落或重要貿易路線的地理位置，以取得自己無法生產製造的日常用品或穀類，或由保護定居城邦及商旅中獲利。²⁰符合上述三個條件的地區為本領域的精華區與有效領域，包括內蒙古南部的鄂爾多斯地區，涵蓋河套、陰山、鄂爾多斯高原(漢代文獻稱此地為「河南」)與寧夏的銀川、固原地區，與華北的半農半牧區緊鄰；蒙古高原西北部鄂爾渾河流域(漠北)與阿爾泰山南方的準噶爾盆地，與大絲路的天山北路諸國相鄰；內蒙古西部的額濟納旗與阿拉善右旗，以及新疆東部的蒲類海，居河西走廊的農業區與大絲路之旁；青海高原東北部的河湟地區，特別是日月山以東的湟水流域，屬黃土高原的西部延伸以及黃河上游，鄰近甘肅西部的半農半牧區；最後是西遼河流域，擁有大興安嶺森林，可供游牧、狩獵與簡單農作，並靠近遼東半島、遼西走廊與燕雲十六州等地。²¹此外，塔里木盆地是草原領域中農業、礦產與手工業最豐富的地區，長期與蒙古高原東部的克魯倫河流域—呼倫貝爾草原地區一起作為有效領域。²²

鄂爾多斯與漠北為本領域的歷史核心，而西域則是最重要的有效領域，連接此三個區域的絲路為本領域的戰略交通線，共分為兩部分：「草原絲路」—唐朝時的「中受降城入回鶻道」或「參天可汗道」，以及元朝時的「木怜站道」，由陰山穿越戈壁向北連接漠北與鄂爾多斯，從匈奴時期起即為各游牧帝國主要的貿易幹道，以及與農耕帝國交戰時雙方的行軍交通線；²³草原絲路在漠北分南北兩道

¹⁷ 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擇*，前引書，頁 213-217

¹⁸ 姚大中，*古代北西中國*，前引書，頁 215-216。

¹⁹ 關於興起於蒙古高原的游牧帝國的政治制度研究與評析甚多，本文主要參考吳景山，「後突厥汗國的政治制度辨析」，*西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甘肅省蘭州市)，第 4 期(1995 年)，頁 38-41、56；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擇*，頁 155-166、246-250；林幹，*中國古代北方民族通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年)，頁 109-115、119-130；劉學鈞，*北亞游牧民族雙軌政制*(臺北：南天書局，1999 年)，第三章。

²⁰ 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擇*，前引書，頁 124。

²¹ 整理自同上註，頁 124-125、168-169、209、213-217；Arthur Waldron,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From History to My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61.

²² 例如匈奴在強盛時便曾設置「僮僕都尉」以控制塔里木盆地地區的政治與經濟物產。而呼倫貝爾地區則屬匈奴左賢王管理，在蒙古帝國時代則屬於成吉思汗兄弟等「東道諸王」的領地。姚大中，*古代北西中國*，前引書，頁 218-222、223-224、227。

²³ 鍾美珠譯，長澤和俊著，*絲綢之路史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 年)，頁 267；而*太平寰宇記*記載的農業帝國北伐三道，中道的五原塞即位於河套地區，戰國至秦漢的雲中郡亦位於河

—南道向西南行三千里至準噶爾南部的庭州，²⁴北段則由漠北越過蒙古高原至阿爾泰山北麓的草原，再經中亞至裡海、伏爾加河甚至(東)羅馬帝國東部等地區，是匈奴以來的傳統交通線與最早出現的絲路，南道則因突厥藉由參天可汗道連結中亞與中國才真正成為戰略交通線。南北朝與中唐之後則先後因佔據青海的吐谷渾與吐蕃的開發，而以西域南道經青海、甘肅南部至關中與四川的「青海路」(即南北朝的河南道)為主要絲路幹線。²⁵另外連接甘州(今張掖市)與漠北的草原交通線從漢代起亦作為漠北通往河西走廊的重要交通線。²⁶大絲路在 11 世紀之後同樣受到小冰期的影響而逐漸消失，草原絲路在大絲路消失後成為草原領域唯一的戰略交通線，乾冷化則使游牧民族更容易在西域取得優勢，加上蒙古帝國分封察合臺汗國於中亞、準噶爾及西域，導致草原地區的歷史不再為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主導，準噶爾開始成為另一個草原政治中心，先後產生察合臺汗國、瓦剌與準噶爾汗國(瓦剌後裔衛拉特蒙古)等強大的游牧帝國。

最後，任何游牧帝國欲成為結構中的超強，必須藉由佔有鄂爾多斯、漠北、西域三處中的任兩處以控制草原絲路來達成，²⁷特別是本領域的兩個戰略要地：最重要的是同時包含河套農業區與草原沙漠區的鄂爾多斯，是農耕帝國與游牧帝國的前線基地與兩大領域間的聚合區，始終是二者的必爭之地。²⁸其次則為準噶爾盆地進出塔里木盆地的門戶、天山南北路匯聚點的吐魯番盆地，此地不僅為控制絲路的最重要地區，亦可分別經由河西走廊與草原絲路進入關中與漠北。這使得只有崛起於蒙古高原的游牧帝國才能真正成功組織草原領域，而崛起於滿州的草原帝國如遼、金，以及元朝之後興起於西域的諸游牧帝國，皆無法或很難成功控制整個草原地區成為結構中的超強：遼雖然從立國之初即意欲佔領漠北支配草原絲路，但始終未能真正征服該地的韃靼部落「阻卜」，直到 1004 年之後在漠北設立三個「鎮州」，才算是較成功地控制漠北，但該地仍不時有叛亂發生，遼也因此未能在西域建立真正的政治統制地位；²⁹金則完全沒有真正控制過漠北，遼論西域；清朝在入關前雖自稱蒙古大汗，實際上只征服漠南蒙古，漠北喀爾喀蒙古與漠西蒙古合碩特部與衛拉特部甚至捐棄前嫌，共組「喀爾喀—衛拉特聯盟」對抗清朝的威脅，³⁰清朝即使在征服明朝，得到農耕領域的人力與物力支持後，

套；李明偉，**隋唐絲綢之路—中世紀的中國西北社會與文明**(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4 年)，頁 90-91。另外，元朝時在木憐站道之外尚有一條連接大都、上都(即忽必烈自立為汗的開平)與漠北，同樣跨越戈壁的「帖里干站道」存在。兩路線的詳細路徑請見席隆飛、楊 燾、唐錫仁主編，**中國科學技術史**，前引書，頁 633-634。

²⁴ (唐)李吉甫撰，**元和郡縣圖誌**(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 年)，頁 1170-1172。

²⁵ 李明偉，**隋唐絲綢之路**，前引書，頁 81、82-83、90、102-104；姚大中，**古代北西中國**，前引書，頁 75。

²⁶ 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卷二，頁 618-628。

²⁷ Waldron,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op. cit.*, p. 62.

²⁸ *Ibid.*, chapter 4.

²⁹ 鍾美珠譯，長澤和俊著，**絲綢之路史研究**，前引書，頁 336-339。

³⁰ 清朝在 1646 年北征喀爾喀大勝使此聯盟消亡，但清朝仍未能消除合碩特與準噶爾的聯合威脅，對漠北蒙古甚至還是只能採取安撫手段，和利用喇嘛教牽制蒙古部落的敵對意識，以免分散清朝投注於併吞農耕領域戰略方向的主力。直到 1690 年第一次準清戰爭爆發，清朝擊敗準噶爾大汗噶爾丹之後才對向來聯合準噶爾的合碩特部與西藏正式建立羈縻控制，又直到 1725 年在第

仍很費力地經過三次準清戰爭才終於在 1725 年第二次準清戰爭獲勝後，以及在 1759 年第三次準清戰爭結束並以種族滅絕消滅準噶爾後才完成對整個新疆與青康藏高原的統治。至於核心位於西域的游牧帝國，除了準噶爾汗國在噶爾丹統治下曾短暫(1688-1690 年)征服漠北，但迅速在第一次準清戰爭(1690-1697 年)中被擊敗退出之外，其勢力從未真正達到蒙古高原中心，遑論支配整個領域。

第二節、天下觀與中國古代地緣政治密碼

影響地緣戰略的干擾變數中最容易被觀察到，但也常被忽略的，是決策菁英的「世界觀」(*Weltanschauung* or *Worldview*)。地緣政治密碼與世界觀不同，瑪麗塔克(Mary Evelyn Tucker)認為世界觀的定義指的是「協助形成社會與個人的基本觀點的一套廣泛理念與價值觀」，³¹因此簡單來說，世界觀是決策菁英的地緣政治密碼與對體系秩序原則的理解所綜合構成的，而地緣政治密碼則是決策菁英以其世界觀為基礎，加上對體系秩序原則與結構現狀的理解，對國家利益界定後，為了維護國家利益所制訂的一連串政策指導。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同一個國家內，每個決策菁英或決策菁英團體所秉持的世界觀也不盡相同，當然對體系秩序原則和結構現狀的理解更會有所差異，導致地緣政治密碼的變化常隨決策菁英的更迭而產生變化，影響地緣戰略的延續性。

中國古代一統帝國的地緣政治密碼係受到戰略菁英的世界觀—天下觀的影響，形成同時涵蓋了周邊、區域與體系的華夷一家或嚴夷夏之防的兩種地緣政治密碼，在周邊層次強調九州一統與排除異族(主要是北方草原地區的游牧民族)對邊境的威脅；在區域層次上則利用聯盟戰略應付難以順利解決、且須長時間面對的異族國防安全，目的是擊敗這些敵對異族國家，最終目標是徹底消除其威脅，或至少在短期而言取回被這些國家佔據、但被視為九州一部份的領土；體系層次的密碼則是依照決策菁英秉持的天下觀，在體系中建立以中國為主導、其他行為者都承認中國領導地位合法性的體系秩序原則，但其類型可分為強調華夷一家，或認為須嚴夷夏之防等兩種。

一、天下觀的地緣政治意涵

二次準清戰爭獲勝後才真正控制了青海與西藏。烏云畢力格，「清太宗與喀爾喀右翼札薩克圖汗素班第的文書往來——兼談喀爾喀—衛拉特聯盟的形成」，*西域研究*(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烏魯木齊市)，第 2 期(2008 年)，頁 1-8、130；齊木德道爾吉，「1640 年以後的清朝喀爾喀關係」，*內蒙古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第 4 期(1998 年)，頁 12-20；佟佳江，「清朝統治蒙古的體制——八旗蒙古、外藩蒙古、內屬蒙古」，*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第 6 期(1998 年)，頁 36-41；王景澤，「清朝的黃教政策與蒙古社會」，*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吉林省長春市)，總第 195 期(2002 年)，頁 34-40；湯代佳，「青海厄魯特蒙古與清朝之早期關係述略」，*青海民族研究*(青海省西寧市)，第 12 卷第 3 期(2001 年 7 月)，頁 59-60；牛海楨、李曉英，「簡論清朝初年對青海蒙古的政策」，*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甘肅省蘭州市)，第 35 卷第 2 期(2007 年 3 月)，頁 114。

³¹ Mary Evelyn Tucker, "Religious Dimensions of Confucianism: Cosmology and Cultivation,"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Vol. 48, No. 1(January 1998), p. 8.

天下觀的起源可追溯至夏朝與商朝。³²從夏商開始，華北地區的原始國際體系已經形成諸小國共同接受一主導國家領導的型態，發展成為一種「城邦聯盟」，行為者之間的力量差距則由夏朝與商朝初期的伯仲之間，在商朝中期之後發展為主導國家明顯超越其餘各國，賦予商朝君主「天子」的形象，逐漸朝向「封建國家」發展，後為西周所繼承並完成整個程序。³³但西周的天下觀與商朝並不完全一致，其初期發展受到西周所處的地理環境的深刻影響，有相當濃厚的地緣政治意涵。據許倬雲的推測，關中既無崇山峻嶺，亦無茂密的森林阻斷視野，舉目所及經常是一片晴朗、籠罩四野直至地平線的穹蒼，無所不在的蒼天與廣闊的大地遂在以關中為發源地的周人心中具備最高神特性；³⁴其後當周以蕞爾小國卻能一戰擊敗商朝，周人又認為其獲有商朝的族群守護神—上帝之助，上帝之所以棄殷從周是因為殷人耽於逸樂不如周人勤勞等原因，³⁵天神與上帝的觀念結合，周既承受上帝新的天命，天籠罩四野，故「普天」之下，盡可為周王之土，「天下」觀念由是而產生，並經由西周所創立的封建體系而被往後由華夏諸國所組成的國際社會轉化為代表「中國」的政治地理名詞。³⁶凡是欲主宰整個體系者，必須在「天下」的範圍內；只有能夠統治「天下」者，才是體系內合法的統治者，這只有在當時已知體系的中央—「中國」才能承接。³⁷

固然天下觀最初的發展與地理之間的聯繫主要為推測，但隨著天下觀的發展，其政治地理與地緣政治意涵越發明顯。與天下觀相對應的是可能在西周時實行過並延續至春秋初期，後為戰國時的戰略菁英具體描述於重要戰略文獻與史籍如**國語**、**尚書**、**周禮**、**爾雅**上，總稱為「畿服制度」的「五服」、「六服」、「九服」等理想國際政治秩序，以及稱為「九州」的狹義天下概念。³⁸簡單而言，畿服制度融合了殷商的內外服防衛制度與周人的天下觀，³⁹周王身為天子，是畿服制度的核心，而畿服制度中的各「服」則代表與周王之間存在不同征服關係的國際行為者，⁴⁰是一種類似同心圓的關係，越往外層的「服」是周王的「外服(臣)」，與

³² 邢義田，「從古代天下觀看秦漢長城的象徵意義」，**燕京學報**(北京)，新 13 期(2002 年 11 月)，頁 15-29。

³³ 杜正勝，**古代社會與國家**(臺北市：允晨文化出版社，1992 年)，頁 269。

³⁴ 許倬雲，**西周史**，前引書，頁 101。

³⁵ 同前註，頁 97、105。

³⁶ 張其賢，「『中國』與『天下』概念探源」，**東吳政治學報**，第 27 卷第 3 期(2009 年 9 月)，頁 190-199。

³⁷ 「中國」一詞在古代沒有現今的民族國家意涵，而只是地理與文化上的名詞。而從西周至戰國，「天下」沒有明確的邊界與範圍，隨著華夏文化圈與政治勢力範圍的擴大而跟著擴大，不過必須注意的是，「天下」指的是包含「中國」與「四夷」的世界範圍，而「中國」才是華夏民族眼中真正的體系與文明核心。同上註，頁 190-218；丁力，**地緣大戰略：中國的地緣政治環境及其戰略選擇**(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 年)，頁 208-209。

³⁸ **國語**·周語上記載祭公謀父勸諫周穆王勿出兵征討西周傳統盟友犬戎，當中即描述犬戎在畿服制度中的地位：「戎狄荒服」。另外**左傳**·桓公 2 年亦記載晉國大夫師服稱：「今晉，甸侯也」，**左傳**稱師服說此話的時間在魯惠公 24 年，約西元前 745 年，此時已為春秋初期。見易中天注譯，**新譯國語讀本**(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5 年)，頁 4；李宗侗註譯，**春秋左傳今註今譯**，校訂版(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3 年)，頁 67。

³⁹ 邢義田，「從古代天下觀看秦漢長城的象徵意義」，前引文，頁 19。

⁴⁰ 由於**周禮**·夏官·「職方氏」、**尚書**·禹貢對畿服制度的描繪都是以距離為基礎，許多學者往

周王的征服關係越淺，對周王負擔的政治、經濟、防衛義務也越低，實際上就是西周結構中的蠻夷戎狄等外族；而越接近同心圓中心的「服」，是最受周王嚴密控制的行為者與「內服(臣)」，亦即各種同姓、異姓封建諸侯國，他們對周王的政治、經濟、防衛義務隨著越接近核心而越高。

畿服制度不僅是西周繼承商朝而來的國際互動規範，而且是基於天下觀而產生的捍衛封建制度與西周王室的防衛制度：「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⁴¹四夷是畿服制度中最外圈的「要服」與「荒服」，諸侯則是要服以內的諸「服」，諸侯與天子一起構成所謂的「九州」，是狹義的天下，而九州加上四夷—或者爾雅中所稱的「四海」(東南西北等四方之海)，「海」在先秦經典中除了自然地理的含意之外，亦常用來指稱華夏之外的異族—⁴²以及四夷之外所謂的「化外之地」，則是廣義的天下。⁴³「服」制所包含的內外觀念配合「中央」、「四方」的方位概念形成以後天下觀最基本的骨架，⁴⁴到戰國中期與禮記·王制篇寫作成的漢文帝時代，正式發展成現代人熟悉的九州為中央核心、東夷、南蠻、西戎、北狄方位概念。⁴⁵

秦朝創造統一九州的大帝國雖然確立了九州等於中國的概念，不過秦漢之後的九州與「中國」仍只是政治地理名詞而非近代意義的國家，即使出現了全新、更強而有力的中央集權一統帝國，畿服制度也順應新的政治地理概念與地緣政治

往也視距離為畿服制度的最主要依據，認為因為蠻夷戎狄等異族距離周朝王畿最遙遠，因此才被歸類為要服與荒服，而且就是因為他們距離核心太過遙遠，所以對周王的朝貢只是一世或六年以上的時間。但邢義田與杜正勝都認為此種說法極不可靠，距離只是禹貢和周禮作者的理想化結果，因為周朝王畿位於關中，但許多列為最核心的侯服、甸服的重要封國位於華北平原或山西的黃土高原，離關中頗有距離，但列於荒服的犬戎卻位於關中西北的甘肅黃土高原，離西周王畿的距離反而比華北平原的諸侯國要更近，距離說顯然極不合理。此外根據國語·周語上的記載，五服對周王的政治經濟義務，與周王對五服未盡其職責的對應措施如下：「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增修於德而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杜正勝認為這是五服制度以征服關係為基礎的明顯證據，因為唯有對於被征服者或者完全臣服於周王統治秩序的諸侯國，周王才能對其違反畿服制度進貢義務的行為以刑罰、討伐、征討等作為處罰，但對於身為周王盟友的荒服與要服，其征服關係最淺，幾乎與周王立於平等地位，因此周王對這兩服只能以低聲下氣的文書佈告，要求其不要違反畿服制度，除此之外是無可奈何。見杜正勝，**古代社會與國家**，前引書，頁468、502-503；易中天注譯，**新譯國語讀本**，前引書，頁4。

⁴¹ 語出左傳·昭公23年。李宗侗注譯，**春秋左傳今註今譯**，前引書，頁1248。

⁴² 張其賢，「『中國』與『天下』概念探源」，頁206-208；邢義田，「從古代天下觀看秦漢長城的象徵意義」，前引文，頁28。

⁴³ 化外之地是否屬於天下的一部份在先秦戰略菁英中並無共識，尚書、周禮中描繪畿服制度藍圖的作者並不認為化外屬天下，但爾雅、莊子、山海經與戰國中期齊國的鄒衍則持相反意見。

⁴⁴ 邢義田，「從古代天下觀看秦漢長城的象徵意義」，前引文，頁19。

⁴⁵ 左傳雖然在文公3年與襄公26年的記載中雖各有「遂霸西戎」與「捍禦北狄」等語，但在戰國之前並沒有正式將方位概念與異族稱號合為東夷、南蠻、西戎、北狄，左傳的這些描述均非正式的稱號，因為左傳同時在桓公6年提到「北戎」，其餘提及異族時多以異族的姓氏、居處、特徵或圖騰加上族名為稱號，例如長狄、姜戎、驪戎、陸渾之戎、荊蠻等，即使是總稱也未必加上方位稱號，例如文公16年稱群蠻、百濮。

環境中而在西漢時轉為「冊封制度」，唐朝之後又逐漸演變為所謂的「朝貢制度」，但其內涵並沒有什麼真正的變化，天下觀仍是世界觀而非國家觀，帝國有邊疆而無邊界，在天下觀之中仍可無限制擴張，是中國古代王朝實現標準地緣政治程序的思想依據。⁴⁶邢義田因此認為秦朝之後的一統帝國對天下觀之下的國際秩序安排沒有基本上的影響，絕大多數古代中國王朝對外行為模式無非就是天下觀與「華夷一家」或「尊王攘夷」爭論下的結果。然而之所以由畿服、冊封與朝貢制度最高理想的華夷一家，演變出尊王攘夷這種截然不同的天下觀內涵，則是東亞自然環境差異對中國農業文明擴張所產生的嚴重限制，以及由於操持不同生產方式而產生不同類型的文明的結果。

爭論源自西周中期逐漸開始基於經濟生產方式、物質生活、社會制度與風俗、文化等方面的差異，而鄙視身為周人祖先重要盟友，身為荒服的戎族。⁴⁷此種鄙視在周穆王遠征犬戎勝利後發展為往後延續數千年的華夷衝突，並進一步因為戎狄始終維持自己的風俗與生產方式，不願變為「諸夏」，且滅亡西周與在春秋初期進犯中原諸侯國，使得春秋戰略菁英興起「尊王攘夷」的政治思想，排斥「冥頑」與危險的異族在華夏世界。一統帝國的出現雖然強化了決策者與戰略菁英認為中國居於體系中最核心地位的自信與信念，但隨著地緣政治結構與體系越來越向外擴張，帝國開始必須面對許多位於與九州極為不同的地理環境中，在政治制度、經濟生產方式、社會文化等各方面都與華夏文明極為不同的新行為者，地理障礙嚴重限制華夏農業文明與帝國進一步的擴張，以及利用各種強制或柔性手段將「教化」與理想國際秩序推行至整個體系。因為地理因素而無法征服或不願臣服的異族行為者從現實面來說是對帝國的嚴重安全威脅，但也不啻是對無法實現華夷一家最高理想的羞辱與無力感，也提高了嚴夷夏之防的呼聲。⁴⁸

二、天下觀對中國古代地緣政治密碼的影響

有疆無界的天下觀概念、華夷一家與嚴夷夏之防的辯論，加上東亞地緣政治結構特殊的封閉性產生了華夏文明難以跨越的地理障礙，形成一種將戰略重心完

⁴⁶ 張文曾針對中國古代在天下觀的薰陶下只有邊疆而無明確的邊界概念，提出一個解釋，主張由於歷代或多或少都會遇到無法征服的異族政權，此時王朝與異族之間的實際軍事控制線就具有類似現代邊界的意義。但是他自己又承認，軍事控制線作為邊界的意義在歷代均不相同，只有在中原的王朝其力量不足以完全壓制異族時，邊界的意義才會明顯，否則都不具備實質意涵，而這種情況的極致就是 19 世紀中葉之後西方國家將西發利亞體系強加於中國身上，迫使其完全放棄天下觀。如此一來又回到原點，反證中國古代天下觀實為標準地緣政治程序的一種實踐，當然在這種情況下不可能存在邊界，只有華夏文明無法跨越的自然地理障礙，才會產生「限胡漢」的類邊境效用。張文，「論古代中國的國家觀與天下觀——邊境與邊界形成的歷史座標」，**中國邊疆史地研究**(北京)，第 17 卷第 3 期(2007 年 9 月)，頁 16-23。

⁴⁷ 雖然戎族的形象歷來都是游牧民族，但商、周時期中國北方民族並不完全依靠游牧為生，真正屬於游牧的民族為長期屬於嚴重邊患的鬼方、獯狁，而西周時在中國北方與周人雜居的戎、狄等族則非完全的游牧民族，因為中國北方的氣候環境比鬼方、獯狁等居住的內蒙古草原要好上許多，使他們除了游牧之外還能夠從事農作與漁獵，不過基本上他們在生產方式、政治制度與民族文化上還是與華夏文化中純粹的農業性格截然不同。杜正勝，**古代社會與國家**，前引書，頁 499-500；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擇**，前引書，頁 93-98。

⁴⁸ 邢義田，「從古代天下觀看秦漢長城的象徵意義」，前引文，頁 17-23。

全置於東亞大陸，徹底忽略海洋戰略地位與對帝國發展重要性的地緣政治密碼，其戰略目的是建立以中國為體系主導國，並以天下觀之中的華夏為君、異族(夷)為臣的階級式政治秩序與秩序原則的地緣政治體系，但是依照決策菁英秉持的是華夷一家或嚴夷夏之防兩種不同的體系層級密碼，在實際操作上會有所差異。

(一)、周邊層次

對於秦漢之後已經將天下觀內化的中國古代戰略菁英而言，創建一統九州的帝國是最重要的地緣戰略目標。因此中國古代一統帝國最基本，也是屬於最低層的周邊地緣政治密碼，就是一統九州、剷除九州之內的所有敵對勢力。然而九州在核心區之外的範圍常在變動：在九州概念最初形成的戰國初期，並不包含四川、鄂爾多斯、遼東半島與朝鮮半島中北部、華南、河西走廊、越南中北部、雲貴等地區，秦、趙、燕等三國為了各自的利益朝外擴張領土，使九州的範圍在戰國中期之後擴大包含四川、鄂爾多斯、遼東半島與朝鮮半島中北部；秦、漢兩朝的擴張，又進一步將華南、越南中北部(唐朝之前與華南合屬交州)、河西走廊(涼州)正式納入九州範圍內。⁴⁹

在天下觀的指導下，一統九州的地緣政治密碼連邊緣地域都不可出現任何威脅統一的政治勢力，此基於邊緣地域的特殊地緣政治地位使其擁有雄厚的政治、經濟、國防潛力，⁵⁰足以獨立成為體系中的重要國家，因此對一統九州的帝國統治者而言，一旦有熟悉華夏政權治術的中原豪傑人士在邊緣地帶組織起不臣服於中國的國家，其威脅就不只是騷擾邊境而已，這些同樣接受華夏天下觀的君王可能在中國內亂時乘機取代原本的王朝。⁵¹其次，兩大領域交接處的邊緣地域本身就是草原領域的核心區或精華區，取得這些地區對核心區大多位於九州北方的中國古代帝國而言既可削弱游牧國家的國力，又可提供本身重要的前線基地與優良

⁴⁹ 邢義田將秦朝統一後所併吞的南方領土也歸入邊緣地帶的範圍，但拉鐵摩爾並未這麼做，後者的根據是自然、政治、人文、經濟地理特質，邢義田則反過來由社會性質屬性作為優先判斷邏輯，認為拉鐵摩爾的概念可擴大適用於秦漢時代農耕領域的南方，如華南、印度支那與雲貴地區，因為這些地區長期被當作流放人犯的處所，帝國以為「天子守邊」的名義放逐人犯於此，實際上是要隔離這些人與社會的接觸，而這些人在一統帝國的末代亂世中也經常能據地為王，成為不可忽視的政治割據勢力，因此應該也可視為邊緣社會的一種。同上註，頁 39。

⁵⁰ **讀史方輿紀要**對所有邊緣地域作為體系中重要獨立國家的政治、經濟、國防潛力曾有極精闢的描述：遼東—「控馭戎貉，限隔海島…其地憑恃險遠，鹽鐵之饒，原隰之廣，足以自封；而招來旁郡，驅率奚、羯，乘間抵隙，不能無倒植之勢矣」；鄂爾多斯—(大同府)「府東連上谷，南達并、桓，西界黃河，北控沙漠，居邊隅之要害」、(榆林鎮)「鎮截河套之冲，固延綏之守…沃野千里，水草豐美，土宜產牧」、(寧夏鎮)「衛為關中之屏蔽，河隴之嚆喉…地方千里，表裏山河，為夷戎必爭之地」；河西走廊—(陝西行都指揮使司/甘肅鎮)「鎮河山襟帶，扼束羌戎…水草宜蓄牧。故涼州之畜，為天下饒…河西殷富，帶河為固，張掖屬國，精兵萬騎，一旦緩急，杜絕河津，足以自守」；雲南「其地曠遠，可耕可牧，魚鹽之饒，甲於南服」；華南—「廣東，在南服最為完固。地皆沃衍，耕耨以時，魚鹽之饒，市舶之利，資用易足也。誠於無事時修完險阻，積穀訓兵，有事則越橫浦以徇豫章，出湟溪以問南郡。東略七閩，通揚越之舟車；西極兩江，用狗、僮、獠之弓矢。且也放乎南海風帆，頃刻擊楫江津，揚舡淮渚，無不可為也。」(清)顧祖禹撰，賀次君、施和金點校，**讀史方輿紀要**，前引書，頁 1699、1992-1993、2903-2904、2941-2942、2971-2971、4575。

⁵¹ 邢義田，「從古代天下觀看秦漢長城的象徵意義」，前引文，頁 42。

戰馬產地，是採取更進一步攻勢作戰的地理基礎，⁵²三方面則截斷蒙古高原、青康藏高原、滿州南部與朝鮮半島之間各游牧民族的聯繫，使其無法同時從三個方向產生威脅。⁵³

(二)、區域層次

古代中國絕大多數時候在東亞地緣政治結構中都面臨相當強大的競爭對手，而這些競爭對手與中國之間的外交關係常有變動，其本身也試圖在本身所處的區域或領域中達成標準地緣政治程序，一如中國在九州之內所為。這些互動都導致中國與其周邊的眾多競爭對手的關係變得相當複雜，區域層次密碼即在於如何安排與這些競爭對手的穩定關係。

一般說來最常發生對抗的方向在中國北方，南方相對稀少。這是因為中國的核心區－黃土高原的關中盆地與華北平原－與草原領域直接相鄰，而農耕領域南方的華南、雲貴與中南半島上的地緣政治區域，不僅離中國的核心區較遠，又有許多高山、大河與氣候形成的多重大型地理障礙相隔，華夏民族固然不易向南擴張，同時也限制了南方民族的北上。再加上南方的面積較北方狹隘，地形又更為破碎，不像草原領域範圍廣袤，同時又鄰近比較容易征服的邊緣地域，能發展出擁有強大騎兵，且得到許多邊緣地帶華夏人民支持的游牧帝國。因此華南、雲貴、中南半島等南方地區在歷史上只有西漢初年的南越國與唐朝中期以後的南詔曾經構成嚴重邊患，往後的交阯/安南/越南、緬甸等國雖然是中南半島上的區域大國，卻無法成為類似南越國與南詔的嚴重邊患。而草原領域卻在每個時代都產生相當強大的游牧帝國民族。中國與這些國家的關係非僅限於邊疆領土糾紛，還包括如何維持穩定的國際關係，特別集中在政治秩序與雙邊貿易的安排上，以及對勢力範圍的爭奪。

(三)體系層次

依據天下觀建立以中國為主導，且為體系中其他國家所接受的合法秩序是體系層次的地緣政治密碼，但分為華夷一家與嚴夷夏之防兩種截然不同的類型。前者是開放性的世界觀，華夏文明不僅必須成為體系的最高主宰，還必須積極同化異族或將異族以冊封或朝貢的方式納入中國的政治體系之下，與華夏民族一樣成為皇帝的「內臣」，實現「王者無外」的天下觀最高理想。因此秉持華夷一家地緣政治密碼的時代，外交政策甚為積極，完全不排斥戰爭作為有效的政策手段，而且盡可能地將所有華夏文明能拓展的地區都納入九州(已經在秦朝之後等於「中國」)之內，例如遼東與朝鮮半島中北部自戰國後期就被視為廣義的「遼東」

⁵² 史記·卷 112·平津侯主父列傳記載鄂爾多斯的地理條件是「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至於西漢奪得河西走廊之後，該地與鄂爾多斯北方的長城成為兩漢向北方進攻漠北、西北方進攻西域及中亞的前進基地。馬持盈，*史記今註*，前引書，頁 2977。

⁵³ 西漢劉歆曾經議論漢武帝東伐朝鮮與西取河西走廊的戰略意義，以為「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併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隔若羌，裂匈奴之右肩。單于孤特，遠遁漠北，四垂無事」。玄菟、樂浪是西漢在朝鮮半島中北部所設立的四郡其中之二，羌族則是居於青康藏高原的游牧民族。劉歆的「毀廟議」一文為宋朝**太平御覽**所收錄。見(宋)李昉等奉敕編，**太平御覽**，臺二版(臺北：商務印書館，1974年)，頁 549。

之一部分，⁵⁴屬於九州之中的幽州，⁵⁵是九州的一部份，而今天的越南中北部在漢朝至北宋期間同樣是屬於九州的交州。假使有邊緣地帶脫離中國而獨立，哪怕已經長達數百年，秉持華夷一家密碼的華夏戰略菁英還是有想要將其重新收回為領土的強烈願望，例如遼東與朝鮮半島雖然在魏晉南北朝時被高句麗所侵吞而脫離華夏帝國與中原王朝的統治，⁵⁶但隋、唐兩朝仍認為其屬於九州之內，並為此發動戰爭。⁵⁷另一個個案則出現在安南，北宋無論是在宋太宗即位初期國力較強大的時期與處於單極超強的地位，或宋神宗期間的兩極結構且長期受到來自西夏的沈重國防壓力所困擾的時期，秉持華夷一家與一統九州兩密碼的兩位君主與許多臣屬皆有強烈征服該事實上獨立且稱帝的表面藩屬國，將其重新納為中原王朝領土一部份的願望。⁵⁸

嚴夷夏之防地緣政治密碼則認為禽獸般的異族與華夏之間存在鮮明的文

⁵⁴ 楊軍，「朝鮮半島與“遼東”內涵的關係」，*遼寧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遼寧省大連市)，第27卷第2期(2004年3月)，頁111-112。

⁵⁵ 顧頡剛稱幽州即為戰國時燕國新拓地之五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其中遼東郡所轄範圍即為今遼寧省大凌河以東至朝鮮半島大同江之地。顧頡剛，「讀周官·職方」，*禹貢*(北平)，第7卷第6-7合期，頁331。

⁵⁶ 王明珂主張將魏晉南北朝之前的帝國稱為「華夏帝國」，而魏晉之後的帝國稱為「中原王朝」，認為因為魏晉時期與其後隋、唐、五代、北宋、遼、金、元、明、清等朝，北亞「胡人」與原來中國地區的「諸夏」進行了相當長時間的民族融合與游牧、農耕兩文明的同時統治，導致魏晉之後的「漢族」王朝，其民族內涵與對外族的思考等其實已與魏晉之前不同。見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擇*，前引書，頁230-233。

⁵⁷ *隋書*·卷67，裴矩條記載，隋煬帝重臣裴矩建議煬帝征討高句麗的首要原因，乃是：「高麗之地，本孤竹國也。周代以之封於箕子，漢世分為三郡，晉氏亦統遼東。今乃不臣，別為外域，故先帝疾焉，欲征之久矣…當陛下之時，安得不事，使此冠帶之境，仍為蠻貊之鄉乎」。而宋朝**冊府元龜**·帝王部·親征二，記載唐太宗發動征討高句麗的首要原因，也與隋煬帝類似：「遼東舊中國之有，自魏涉周，置之度外。隋氏出師者，四喪律而還，殺中國良善不可勝數。今彼弑其主恃險驕盈，朕長夜思之而輟寢，將為中國復子弟之讎，為高麗討弑君之賊。今九瀛大定，唯此一隅」。此語亦見於**資治通鑑**·卷197·唐紀13，惟內容稍有差異：「遼東本中國之地，隋氏四出師而不能得；朕今東征，欲為中國報子弟之仇，高麗雪君父之恥耳。且方隅大定，惟此未平，故及朕之未老，用士大夫餘力以取之」。(唐)魏徵等撰，*隋書*(臺北：鼎文書局，1975年)，頁1581；(宋)王欽若、楊億等奉敕撰，*冊府元龜*(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7年)，頁1400；楊家駱主編，*新校資治通鑑注*，第4版(臺北：世界書局，1972年)，頁6217-6218。

⁵⁸ 依照本論文的地緣政治結構理論，北宋初期儘管處於宋遼對峙的局面，結構卻是以宋為超強、遼為強權的單極，因為遼直到1004年才於漠北建立三個「鎮州」，真正完成對草原絲路的控制才成為超強，使結構進入兩極。在此之前，遼只能算是強權，其對西域因為無法控制草原絲路或大絲路而沒有真正的支配，西域諸國並不受其控制，西夏的前身黨項政權一開始則臣服於北宋，雖然在982年叛宋並結援遼朝，但並不是遼的屬國。遼取得草原絲路控制權的過程，請見鍾美珠譯，長澤和俊著，*絲綢之路史研究*，前引書，頁324-332、333、334-336。在遼未成為超強之前，北宋並不畏懼與遼為了併吞北漢、奪回燕雲十六州等理由開戰。神宗時期與越南的戰爭，無論是**宋史**、**續資治通鑑長編**，或司馬光自己撰寫的**涑水記聞**，都記載乃是意圖仿效北宋在西北對西夏開疆闢土的官員所挑起的，但是宋神宗與當時的宰相王安石在戰爭期間也都認為應當將交趾攻破並收為宋朝版圖，並利用攻破交趾的聲威來壓服西夏。(宋)李燾撰，*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頁245、6639、6689、6734-6735、6740-6741；湯佩津，「北宋的南邊政策：以交趾為中心」，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4年)，頁57；王繼東，「北宋對越南從“郡縣其地”到宗藩關係確立的轉變」，*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河南省鄭州市)，第41卷第2期(2008年3月)，頁151-155；(元)脫脫等撰，*宋史*(臺北：洪氏出版社，1975年)，頁10728-10729；(宋)司馬光撰，鄧廣明、張希清點校，*涑水記聞*(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頁248。宋太宗削藩導致黨項叛變，見李華瑞，*宋夏關係史*(石家庄市：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頁18-21。

化、種族分野，是華夏的嚴重安全威脅，但華夏都不需要致力同化異族，也不一定需要徹底征服以完全解除威脅，這兩種行動都會導致華夏的力量衰退，危及自身在體系中的核心地位，只要確保異族無法威脅華夏在體系中的地位與領土安全即可。⁵⁹此種地緣政治密碼主導的外交政策就相當消極，而且有將天下觀等同國家觀發展的現象，儘管並不十分完全。首要影響是天下與九州的範圍有時甚至只等於漢族的傳統疆域範圍而不包括邊緣地帶，造成後者被視為可以放棄的地區，例如天下觀朝國家觀明顯過度的明朝，⁶⁰從明太祖時期起一開始就放棄西域，甚至打算連河西走廊一起放棄的打算，⁶¹新疆則始終被明朝視為戰略弱點，最後在明世宗初年被完全放棄。⁶²明成祖雖然秉持較為明顯的華夷一家密碼，但是其在位期間為了政治與經濟等理由放棄了北京以北明太祖征服而來的草原前進防衛據點，⁶³及至他死後明朝重新秉持嚴夷夏之防的密碼，又因此地緣政治密碼的改變與防衛形勢困難而放棄已經被蒙古人長期佔有的鄂爾多斯，⁶⁴而且從未將政治控

⁵⁹ 典型的例子見於左傳·襄公 4 年，晉國大臣魏絳建議晉悼公「和戎」的記載。魏絳秉持嚴夷夏之防的觀點，以及考量到晉國雖然身為中原諸侯的盟主，卻仍與楚國有激烈的對抗，因此在反駁晉悼公「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的戰略思考時稱「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在舉出征討北方山戎(左傳記載為「無終」國)的不利之處後，又從國際政治與貿易、晉國內部經濟與社會等面向，舉出「和戎」的五大好處：「戎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咸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動，甲兵不頓，四也。鑒於後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李宗侗註譯，*春秋左傳今註今譯*，前引書，頁 777-778。

⁶⁰ 根據萬明的統計，明太祖頒佈的詔令文書中，對「天下」一詞的使用，承襲古代天下觀的比例高達 54%，以天下代指超出九州之外的整個體系範圍者有 6 次，比例只有 5.9%，而以天下指稱中國本土者，則有 42 次，約佔 41%，但是這些詔令真正屬於外交文書者只有 2 封，其餘大多是在處理國內事務時所頒發。此外，明太祖認為「自古天下有中國，有外國」，似乎承襲北宋以來的新內外觀念。萬明與王偉據此又指出，明太祖與明初的戰略菁英雖然繼承了以往華夏戰略菁英以地理分別華夷的思想，而且更進一步欲以此明確劃分中國與其他外國之間的邊界。陳文源則指出，明初的這些天下觀思想對中期以後的戰略菁英影響甚大，不過其原因除了承襲祖制之外，尚包括現實的政策與國際政治層面因素，使明朝戰略菁英雖然仍存有根深蒂固的華夷一家最高理想，卻無法真正採納於外交政策上，導致明朝對外政策不斷具有明顯的消極傾向。請參考萬明，「明代外交觀念的演進——明太祖詔令文書所見之天下國家觀」，*古代文明*(吉林省長春市)，第 4 卷第 2 期(2010 年 4 月)，頁 71-79；王偉，「明代士大夫的天下觀：以 1368-1428 年中越關係為中心」，*求索*(湖南省長沙市)，頁 231-232；陳文源，「明朝士大夫的安南觀」，*全球化下明史研究之新視野論文集*(台北：東吳大學歷史系，2007 年)，第三冊，頁 39-42。

⁶¹ 趙現海，「洪武初年甘肅地緣政治與明朝西北疆界政策——由馮勝“棄地”事件引發的思考」，*古代文明*(吉林省長春市)，第 5 卷第 1 期(2011 年 1 月)，頁 89-90。

⁶² 王玉祥，「淺說明朝的關外衛」，*甘肅社會科學*(甘肅省蘭州市)，2000 年 04 期，頁 72-74。

⁶³ 明成祖為何放棄北京之外的大寧三衛給予作為明朝外藩與防衛體系之一的所謂蒙古「兀良哈三衛」，學者們眾說紛紜，其原因可能有政治上的一明成祖為了獎勵兀良哈三衛對其在靖難之變中的忠順；經濟與氣候上的一草原衛所周邊的經濟環境難以支撐其繼續存在；以及氣候上的一兀良哈三衛等蒙古部落因氣候寒冷化而逐漸南遷，不過亦有某些意見以為明朝初年兀良哈三衛並沒有明顯受到氣候變遷的壓迫而向南遷徙的跡象。Waldron,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pp. 80-83; 程龍，「兀良哈三衛南遷氣候寒冷說質疑」，*中國史研究*(北京)，第 1 期(2001 年)，頁 123-132。

⁶⁴ 明朝長城大約沿今日山西省與陝西省北界修建，雖然包括了寧夏河套地區，卻放棄了鄂爾多斯。*明史*·卷 198·翁萬達條對明朝長城放棄鄂爾多斯時有如下的評論：「河套本中國故壤。成祖三犁王庭，殘其部落，舍黃河，衛東勝。後又撤東勝以就延綏，套地遂淪失。然正統、弘治間，我未守，彼亦未取。乃因循畫地守，捐天險，失沃野之利。弘治前，我猶歲搜套，後乃任彼出入，

制延伸進入漢、唐時期的西域。長城是此類地緣政治密碼中的防衛線甚至國境線，長城與其說是古代中國防禦性戰略文化的象徵，不如說是嚴夷夏之防的主要象徵更為貼切，因為華夏文明無法越出長城扎根，長城的存在乃是分別夷夏的人為界線，與自然地理一樣警示華夷之別不可逾越，⁶⁵不僅是雙方的國界線也是文明分界線，明確表示西漢等朝代對於以各種手段軟硬兼施，卻始終無法推行華夷一家理想，只好轉為嚴夷夏之防的無奈。⁶⁶

雖然持嚴夷夏之防密碼的朝代仍受天下觀的影響，經常重建冊封或朝貢體系來顯示其已達到王者無外的理想，但這些朝代對於其所建立的冊封與朝貢體系一開始就不是相當熱心，東漢甚至連西域諸國不斷的要求都不肯有所行動，直到北匈奴重新佔有西域並由此威脅東漢的河西走廊，才使其重新介入西域事務。不過無論是這麼消極的心態，或一開始較為積極的明朝，即使建立了本身的冊封或朝貢體系，在大多數時候亦非常不願意以武力或其他強制性手段維繫這一體系的完整存續，東漢對西域的消極態度使其出現後漢書所謂的「三絕三通」之現象；⁶⁷北宋對於已經來朝貢的國家無意給予傳統冊封/朝貢體系中的保護，除了宋太宗初年之外也沒有意願擴大朝貢體系；⁶⁸明朝雖然在理學的影響下重建朝貢體系，而且依將朝貢的等級秩序按照理學的觀念，仿照古代對各外國制訂了不同的等級

盤據其中，畜牧生養」。可見秉持嚴夷夏之防地緣政治密碼的明朝其對外政策的消極到何種不可思議的程度。(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5249。

⁶⁵ 班固在**漢書·匈奴傳**的結語稱「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絕外內地」，東漢末年的蔡邕則稱「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分別內外，亦殊俗也」。內、外及西周以來的政治秩序內、外觀，在天下觀之中「外」用來指華夏之外的異族，「內」則為華夏本身。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漢書并附編二種**，第5版(臺北：鼎文書局，1983年)，頁3834。

⁶⁶ 邢義田，「從古代天下觀看秦漢長城的象徵意義」，頁31-32。

⁶⁷ 「三絕三通」是後漢書·西域傳的記載，原稱「自建武至於延光，西域三絕三通」。建武為漢光武帝年號，延光則為漢安帝之年號，二者相隔約一百年。東漢光武帝即位之初西域諸國「皆遣使求內屬，願請都護。光武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竟不許之」，其後當西域諸國請求東漢援助他們對抗莎車國統一全西域的野心時，漢光武帝卻說「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在東漢中期之後則認為維持對西域的控制對其本身並無實質利益，但是又因為北匈奴對西域的進攻，並利用西域攻擊東漢的河西走廊，導致原先就不願意經營西域的東漢不斷擺盪在放棄與收復西域的政策之間，產生「三絕三通」的現象。世界書局編輯部主編，**新校後漢書注**，第3版(臺北：世界書局，1972年)，頁2909、2912、2924。另亦可見姚大中對東漢政府為了反擊北匈奴才進入西域，以及爾後對駐軍西域、應付羌亂、供養降服的南匈奴所耗花費與一般的政策態度之分析，姚大中，**古代北西中國**，前引書，頁249-258。

⁶⁸ 根據**宋史·外國四·交趾條**之記載，交趾獨立之後雖然接受北宋的冊封，但對北宋幾乎沒有什麼尊崇之心理，而且在宋神宗熙寧元年就與遼、西夏一樣稱帝，但北宋對這個舉動幾乎沒有什麼反應，再根據**宋史·外國五·占城條**之記載，宋仁宗嘉祐七年，廣西安撫經略司就曾上奏：「占臘素不習兵，與交趾鄰，常苦侵軼；而占城復近修武備，以抗交趾，將蘇廣東路入貢京師，望撫以恩信」，哲宗元祐七年，占城對宋朝表示：「如天朝討交趾，願率兵掩襲」，但宋朝卻回以「交趾數入貢，不絕臣節，難以興師」。宋神宗雖然出兵討伐交趾，並下詔派遣使節至占城與占臘兩國，「說諭」兩國一起出兵，但並不是為了維護宋朝在朝貢體系中的天朝地位，或打擊交趾圖謀在中南半島建立小天朝的舉動，而是因為交趾已經與宋朝爆發大戰的緣故，且由詔書中「說諭」之用法亦可見該兩國並非北宋完全的屬國。對於在北宋初年曾經來朝的高麗後來受遼的壓迫而中斷對北宋的朝貢，改成為遼的屬國。雲貴地區的南詔/大理與兩宋的互動更少，不僅沒有將被納入朝貢體系的意思，連一般的貿易都極為稀少。(元)脫脫等撰，**宋史**，前引書，頁14069、14085；陶晉生，**宋遼關係史研究**(臺北：聯經，1984年)，頁170-171；(宋)李燾撰，**續資治通鑑長編**，前引書，頁6651、6657-6658。

順序，以示實施天下觀中的內外國際秩序，但其本身卻既不欲且無法以實力支持這個成員大多是其所不關注的戰略邊緣區的朝貢體系之遂行，導致朝貢體系徒具虛名，只是披著朝貢外表的貿易關係，既非真實的體系秩序，更非天下觀理想的實踐，因此明朝中期以後，臣屬關係大多淪為形式，此外，明朝從未真正將勢力伸入西域，對西域的發展出現比東漢更為消極退縮的「三立三絕」現象，⁶⁹明朝甚至與北宋一樣默許安南在中南半島上建構威脅天下觀基礎的「小天朝」。⁷⁰

第三節、內政導向戰略文化

比起地緣政治密碼，第二個地緣戰略制訂過程中的干擾變數－戰略文化的影響則更為複雜與不確定。在中國戰略研究中經常被討論的是儒家的柔性戰略文化是否為中國戰略文化的典型，目前戰略文化研究學者們對此並未有所共識，本論文並不贅述其詳細情況，亦不願陷入涉入爭論的情況。但學者們的爭論多根據強理念戰略文化研究途徑，是否中國自古以來的戰略文化的確會隨著地緣政治結構的變化而發生變遷，抑或維持一貫的獨特風格，則始終沒有學者進行深入的研究。事實上，天下觀不僅塑造了中國古代帝國的地緣政治密碼，也與東亞地緣政治結構的模式與特徵一起塑造了作為古代帝國主流戰略文化的內政導向戰略文化。此種戰略文化並非全然的柔性或強現實政治，根據本章前兩節的歷史與地緣政治分析，以及本節下文即將驗證的，中國古代的內政導向戰略文化共有六種主要特徵：

第一，非常強調內政與外交的連結，認為對外活動的成功的先決條件是必須有強大的國力(富國強兵)與人民的支持作為後盾，如此才能完全發揮帝國的強大物質資源後盾的優勢，俾能在長期戰略鬥爭中獲得最後勝利。而在強大的過程中，中央政府由上而下控制經濟與社會發展先於軍事領域的大規模改革與發展，必定等到富國取得一定程度的效果之後才會強兵，這也是「富國強兵」一詞順序的邏輯。不過所謂取得人民的支持並不一定指中共軍事理論中所謂的「人民戰爭」，這種「箪食壺漿以迎王師」的思想只有在所欲奪取的戰略目標同屬華夏文明時才會產生，在應對非華夏文明的情況中，所謂取得人民的支持通常指的是取得多數有政、軍領導實權的戰略菁英的支持，最低限度則是不致使人民對國家的

⁶⁹ 「三立三絕」出自**明史·西域傳·哈密衛條**。明朝雖然意欲重建中國的天下觀威信與朝貢體系，但對西域極為消極，僅利用位於新疆哈密的「哈密衛」作為明朝在西域的代表，而哈密衛一則位於新疆東部靠近甘肅之地，二則又非正式明朝官員，只是依附於明朝之下的西域哈密國。哈密衛在明朝中期頻遭蒙古東察合台汗國之攻擊，但明朝對支援哈密國並不甚熱心，在當時的戰略菁英眼中，哈密衛的地位至為低落，例如鄭曉從戰略地理的觀點切入，在**皇明四夷考**中不僅將哈密的地位次於安南、蒙古、女真等與明朝有所交往的異族之後，認為雖然哈密對河西走廊有所威脅，但「土番入哈密而嘉裕不驚」，是即使淪喪也不需要太過在意的羈縻之地；王世貞則在**弇州四部稿**中，將哈密排在蒙古、倭寇、安南之後而且稱「夫哈密末矣，閉玉關而絕西貢之路可也」一方面表現了對西域的消極，另一方面則展現了天下觀逐漸朝國家觀過度時，注重國家邊界安全勝於建立國際秩序與中國威信的戰略思考。(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前引書，頁 8525-8526；王世貞，**弇州四部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頁 339。

⁷⁰ 陳文源，「明朝士大夫的安南觀」，前引文，頁 41。

對外行動發生強烈的反對與實質抗拒，並因而引發社會甚至政治動亂。

第二，為了取得「人民」的支持，具有「正當」開戰理由的「義戰」就成為相當重要的戰爭方式，所謂「師直為壯，曲為老」，⁷¹至於義戰所需的「正當」理由大致上可歸納為有四種原因：其一，帝國無端受外族侵略或欺凌；其二，帝國給予外族政治、經濟、安全上的「好處」，但外族非但不「知恩圖報」，反而採取與帝國敵對的「恩將仇報」行為，與第一種行為一樣，兩者都產生實質上的損害，而且破壞戰略菁英秉持的天下觀秩序原則；其三，外族發生內部動亂，執政者「不愛民」，必須「弔民伐罪」，此種行為實際上是一種明顯的國際干預，而且許多兼併即是由此產生；其四，得到其他弱小外族的「邀請」，前來共同抗擊另一強大的行為者以維護該地區秩序。

第三，與第一種特徵相反，雖然認為中國的物質優勢遠超過其所面對的敵人，但又瞭解到敵人不僅擁有強大的實力，也同時擁有強大的地理力，能抵銷中國的物質優勢，使其在長期戰事中無法完全發揮，反而會因為困難的後勤與慘重的傷亡而消失，進而導致帝國國力嚴重衰退，故為了保障政權對帝國的長久穩定控制而強調政權的穩定與國內社會秩序的安定重於對外行動的利益，認為大規模對外行動必須以能速戰速決為前提，若對外行動會產生導致帝國發生衰退或可能危及政權穩定的嚴重政治動亂甚至分裂的危機則不可實施，不應以追求擴張對外的利益犧牲了最重要的政權穩定，這使得中國古代帝國除了在帝國強盛並配合華夷一家的密碼的情況之下，不太願意利用武力支持朝貢體系之完整運作，而上述的情況在中國歷史上實不多見，這使得內政導向戰略文化對於帝國的對外行動與依照天下觀建立的體系秩序—如朝貢體系—其實秉持一種「有限責任」(Limited Liability)的態度。⁷²

第四，在抵擋外敵時分成兩種主要的戰略，第一種是以禦敵為國境之外的前沿防禦為主，在這樣的戰略指導中通常是以身兼防衛線的長城作為主要的國境線，但在沒有長城的地方也以某些重要的戰略要地，如山脈中的重要關隘與大河流等，作為前沿防禦的基礎。第二種則是在缺乏這些基礎的地區實施允許敵人進入邊境地區的彈性防禦，但彈性防禦戰略並不要求在邊境地區實施焦土戰略，因為這些邊境地區國土是邊防駐軍的重要根據地，焦土戰略會使外敵退去以後帝國無法在當地駐軍。

第五，對外戰略具有濃厚的權力政治思維，認為成功的對外政策必須具有充分的彈性，考量決策時的地緣政治結構形式與特徵，並充分評估敵我力量的對比，隨時勢的發展而改變，這使得對外戰略沒有一定的類型，雖然戰略菁英秉持

⁷¹ 語出左傳·僖公 28 年。李宗侗註譯，*春秋左傳今註今譯*，前引書，頁 371。

⁷² 「有限責任」是杜耶克描述美國戰略文化的一個特徵，其內涵是希望在大戰略中避免損失與做出承諾，導致美國大戰略在某些情況下與其所宣稱的或已經建立的國際目標不相符。本章認為嚴夷夏之防密碼主導下的中國大戰略行為亦有此種現象，而由於嚴夷夏之防密碼在帝國時代居於主導的時候比華夷之家更多，因此可視為內政導向戰略文化的確在對外行動與國際秩序的維持上具有「有限責任」的特徵。關於杜耶克對有限責任的描述，請見 Colin Dueck, *Reluctant Crusaders: Power, Culture, and Change in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Princeton and Lond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26-30.

天下觀的秩序原則，但當體認到本身力量不足或內部政局不穩定，無法積極對外時，可能在衝突中向對手做出相當程度的妥協以求穩定最受重視的帝國內部形勢，或者能暫時與某些較次要敵人聯合對抗對帝國安全威脅最大的敵人。

第六，由於古代東亞地緣政治結構很少形成對中國古代帝國完全沒有嚴重外部威脅的霸權形式，使得內政導向戰略文化信任武力在國際事務中的效用，但由於地理力的影響，帝國又很難完全依靠武力一勞永逸解決外部威脅，故內政導向戰略文化發展出類似薄富爾(André Beaufre)所謂的間接戰略，這是一種在沒有太多行動自由與不想將局勢引發為全面性大戰的情況下，依靠軍事勝利以外的方式來達成戰略目的。⁷³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在大戰略層面上實際上便是一種以武力為核心的間接戰略概念。⁷⁴不過在絕大多數情況中，不戰而屈人之兵只是一種理想與戰略思想，天下觀鄙視異族的心態更使戰略菁英不願意去詳細認識與瞭解周邊國家，一相情願認為對方必然會仰慕中國之「德」與創建的體系秩序原則，使得間接戰略的運用只限於政治與經濟手段，缺乏薄富爾最重視的，針對自身與對方群眾心理，以及能夠促成其他東亞地緣政治結構內行為者支持中國古代帝國對外行動心理的「外部動作」(external manoeuvre)的手段，⁷⁵也使得政治與經濟手段基於錯誤的認知而時常無法發揮作用。此外，間接戰略就大戰略層面來說是一種持久戰，與強調速戰速決的內政導向戰略文化特徵相悖，因此只有在明顯無法以武力達成速戰速決的情況之下才有發揮的空間。

至於內政導向戰略文化究竟偏向攻勢或守勢，則與戰略菁英所秉持的天下觀與地緣政治密碼形式有密切的影響：強調九州一統的周邊密碼使內政導向戰略文化在面對同屬華夏文明的行為者，或想從異族手中奪取原為九州華夏文明控制的地區，以及想要奪取對政治核心的國防安全有極大戰略價值，同時地理上又能達成擴展華夏文明與截斷對手戰略壓力的地區時具有強烈的攻勢偏好，除非面對攻勢武力運用始終面臨強大抵抗且長期無法達成戰略目標的情況，否則柔性戰略次文化多只是輔助性質的運用。可是在面對九州以外的行為者或潛在威脅時，由於這些地區是華夏文明所無法擴張之處，地理力與國家實力的綜合使中國古代帝國難以使用武力真正取勝，因此只有當決策者秉持華夷一家地緣政治密碼時，才會展現出明顯的攻勢偏好，若決策者的地緣政治密碼為嚴夷夏之防，則性質多數偏

⁷³ 鈕先鍾譯，André Beaufre 著，**戰略緒論**(臺北：麥田出版社，1996年)，頁141。

⁷⁴ 楊仕樂認為「不戰而屈人之兵」是東西農業文明因為包括指揮在內的各種戰爭必須技術低落而產生的重要戰略文化特徵之一，大規模會戰因工業革命改善這些技術缺陷之後而出現。但本論文認為並非如此，因為同樣屬於農業文明的中國戰國時代，頻頻爆發死傷數萬乃至數十萬人的大型會戰，而西漢也曾與匈奴在蒙古高原進行數次大規模會戰；至於楊氏本人所提及的拿破崙戰爭，當時歐洲是否已全面進入工業化時代，仍大有疑問。顯然工業化與否並非戰爭大規模化與會戰次數增加的真正關鍵，而是國家是否能藉由數字化管理對人民發展出足夠的控制力，以從中獲得能投入戰爭的資源，能獲得的資源越多，戰爭規模也就越龐大。楊仕樂，「中國獨特的戰略文化？尋找理念的物質基礎」，前引文，頁210-218。

⁷⁵ 根據薄富爾的觀點，所謂的「外部動作」不僅在於手段運用的主要地理範圍在鬥爭區域之外，還包括這個範圍之外、屬於本國、競爭對手或敵國內部的輿論、群眾意識型態或心理，鈕先鍾譯，André Beaufre 著，**戰略緒論**，前引書，頁143-146、151-153。

向防禦型。

中國學者在這方面經常出現概念上的混淆與變化，他們指出中國古代秉持的大戰略屬於積極防禦，目的是根除中國周邊的威脅以重建和強化中央政權在其心臟地區與周邊地區的權威，而且這些行動並未逾越當時已知的周邊範圍。⁷⁶但這些研究經常是以當代的全球體系對國家戰略行為的攻勢與守勢來看待古代孤立的東亞地緣政治體系中的國家行為，他們以漢、唐、明三朝為積極防禦之代表，但在漢、唐時代，已知的周邊地區實際上就是彼時東亞地緣政治結構的邊界，而根除已知邊界中對中國的威脅，實際上就是戰略文化具有明顯攻勢偏好而非「積極防禦」的代表，否則漢、唐不會成為元朝之前疆土最大的兩個朝代。

一、內政導向大戰略思想的起源

內政變數對國家的大戰略與軍事戰略指導有重要的影響並非新觀念，羅斯克蘭斯(Richard Rosecrance)在 1970 年代初期為了建立外交政策研究理論就曾提出這樣的概念，認為現實主義典範單憑外部變數解釋國家戰略行為的解釋力不足，應重視國內因素的影響力。羅斯克蘭斯與史坦因(Arthur Stein)等人在 1993 年即運用對國內因素的研究來解釋歷史上許多大國的大戰略起源與制訂，不過他們未提到戰略文化與內政之間的關連性，其研究大多以個案為基礎，並沒有說明如此具有影響力的內政變數是否能夠在決定大戰略的同形塑國家的戰略文化。⁷⁷基爾(Elizabeth Kier)藉由對兩次世界大戰的英國與法國軍事準則之研究，雖然確信包含各種組織文化與個人因素在內的內政變數所形成的次文化，對國家的軍事戰略指導—採取攻勢或守勢態勢以及準則以攻勢或守勢為主—具有超越結構變數的影響力，特別是當一個國家擁有多種不同的政治—軍事次文化(political-military subculture)時將更為複雜，但她並沒有進一步延伸到大戰略層面並討論內政變數與戰略文化之間的關係。⁷⁸

曾瑞龍是首位從內政導向觀點提出中國古代存在「內政導向大戰略」的學者，其研究根據乃是北宋戰略菁英的主流大戰略偏好。曾氏認為北宋內政導向大戰略的基礎是儒家的「民本論」，特點在於認為雖然歷史經驗顯示出窮兵黷武必然為國家帶來極大的負面影響，但使用武力並非有弊無利，相反的，戰略資源可以互相轉化，可將人民的支持與經濟發展轉化為軍事動力，因此國家必須以內政為優先，只有在內部穩定、後勤順利的情況下，國家才有能力東征西討，同時在與資源較為欠缺的游牧帝國長遠的國力競賽中佔得上風甚至最終的勝利，是一種不反對使用暴力但反對濫用暴力的戰略思想。⁷⁹不過雖然曾氏不贊同羅斯克蘭斯

⁷⁶ Tiejun Zhan, "Chinese Strategic Culture: Traditional and Present Features,"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 21, No. 2(Apr-Jun 2002), p. 79.

⁷⁷ Richard Rosecrance and Arthur A. Stein eds., *The Domestic Bases of Grand Strategy*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⁷⁸ Elizabeth Kier, "Culture and Military Doctrine: France between the War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4(Spring 1995), pp. 65-93.

⁷⁹ 曾瑞龍，*經略幽燕(979-987)——宋遼戰爭災難的軍事分析*(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 105-110。

認為可能對大戰略產生的積極性產生消極制約的內政變數必然導致消極軍事戰略的主張，⁸⁰而且引用北宋初年名臣趙普之言，認為內政導向大戰略的起源可追溯自漢、唐。⁸¹不過他沒有直接將內政導向大戰略視為中國主流戰略文化的表現，而是將其視為文人戰略菁英的組織文化，其源頭是混和了道家思想的儒家思想，⁸²與武將比較傾向野戰戰略的組織文化相對，都是中國戰略文化中的次文化。然而，假使吾人認為戰略文化是國家對外大戰略的經驗傳承之表現，而大戰略則是國家運用其所能動用的政治、經濟、軍事、心理等手段來達成政策目標的藝術，那麼從這個角度而言，內政導向戰略次文化實際上才是傳統中國戰略文化的主流類型。

內政導向大戰略思想在先秦時期就已出現，它以先秦時代的東亞國際體系中的戰略經驗為基礎，發展出三種對武力使用態度各有不同的次級戰略思想：

第一種是根據長久以來戰爭以及武力擴張始終是國際關係中基本現象，以及周人利用傳統的東進戰略和具有武裝殖民性質的封建制度，⁸³取代商朝成為體系主導國家並征服原來不屬於周人勢力範圍的華北平原的戰略經驗，承認戰爭在國際關係中有其重要的地位與武力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國家必須時時刻刻備戰以免遭受亡國厄運，例如詩經中的詩人稱「濟濟多士，文王以寧」，⁸⁴即是表示連文王這樣被儒家尊崇為注重道德的聖王，尚且必須依靠眾多武人的力量才能使國家安寧；司馬法也稱「天下雖安，忘戰必危」。⁸⁵更積極的是試圖將戰爭作為結束混亂體系秩序的「義戰」(just war)思想，例如為西周以及春秋戰國時代戰略菁英所繼承的商朝戰略菁英仲虺所提出「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取亂侮亡，兼弱也」武力擴張方式。⁸⁶此種帶有義戰性質的武力使用方式給予國家干涉他國內政甚至併吞他國的絕妙藉口。而最激烈者則是「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⁸⁷這種積極以戰爭、武力來成為霸權、帝國，完成標準地緣政治程序並穩定體系秩序的想法。

第二種戰略思想同樣源自西周擊敗殷商的戰略經驗，但與第一種的積極態度

⁸⁰ 曾瑞龍，**拓邊西北—北宋中後期對夏戰爭研究**(香港，中華書局，2006年)，頁45-46。

⁸¹ 曾瑞龍，**經略幽燕(979-987)——宋遼戰爭災難的軍事分析**，前引書，頁106。

⁸² 同上註，頁110。

⁸³ 杜正勝指出，周人封建殖民的傳統由來已久，可能來自遷居關中「豳」地的祖先公劉，並延續至西周末期。而考證西周的封國之地理位置與時間，可發現周武王最初滅商時，由於人口結構之限制，並沒有真政大行分封，即使有所分封也沒有真正向東深入華北平原，但等到周公與成王東征成功壓制東方反對西周的殷商舊勢力與不肯臣服的異族之後，原有的封國與新封建的國家位置都向東深入華北平原，幾乎都在遠離關中的東方(黃淮平原)、東北方(山西境內黃土高原與河北)與東南方(雒邑南方的漢水流域)地區，關中周邊幾乎沒有什麼封國存在，顯然封建的目的在於同時利用西周關中的基地，與東方封國以齊、魯、衛三國構成的兩道防線的力量，協助西周控制華北平原。杜正勝，**古代社會與國家**，前引書，頁333-351。

⁸⁴ 語出詩經·大雅·文王之什。屈萬里，**詩經釋義**(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2年)，頁203。

⁸⁵ 語出司馬法·仁本。王雲璐注譯，**新譯司馬法**(臺北：三民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96年)，頁6。

⁸⁶ 見左傳·宣公12年。李宗侗註譯，**春秋左傳今註今譯**，前引書，頁571-572。

⁸⁷ 語出司馬法·仁本。王雲璐注譯，**新譯司馬法**，前引書，頁3-4。

不同，由於體認到周是以蕞爾小國這種懸殊物質力量差距，卻能擊敗體系主導國，遂產生所謂「土廣不足以為安，人眾不足以為強」、「河山之險，信不足保也；是伯王之業，不從此也」、⁸⁸「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⁸⁹「國雖大，好戰必亡」、⁹⁰「天下戰國，五勝者禍，四勝者弊，三勝者霸，二勝者王，一勝者帝。是以數勝得天下者稀，以亡者眾」⁹¹等慎戰思想，其目的在於保全農業文明甚為重視的人力與物質力量，避免因戰爭大量損耗能用於耕種、徵稅的人力資源，以及重要的可耕之地和其他經濟、軍事資源生產區，反而導致國家國力衰退而滅亡，和權力要素累積越多與戰略地理形勢強固皆不代表國家越安全等基本戰略觀。以保全國力為主要考量的慎戰思想同時衍生出另外兩種具有相反特徵的內政導向戰略文化特徵戰略：第一種是速戰速決之戰略思想，強調盡可能以少數決定性會戰解除威脅或達致最後的政治解決。第二種則是以間接戰略為代表的持久戰，試圖以其他政治、經濟、心理等手段形成對敵人的其他壓力，慢慢藉由「蠶食」的行動來擴大本身在政治或領土上的重要戰略進展，協助作為戰略手段核心的武力達成戰略目標，盡可能降低武力的使用次數，或一旦使用武力時能降低傷亡，甚至達成「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理想。

第三種思想則是第二種思想的另一型態之變化。西周以蕞爾小國並採取聯合其他西方民族與商朝敵對的周邊民族的聯盟戰略作為擊敗商朝的手段，但一場決定性會戰的勝利並不能使西周跨越其傳統勢力範圍在陝西黃土高原與超越，本身的實力與人口結構之限制，征服商朝在東方的地盤與壓制東方的商朝殘餘勢力和親商勢力，迫使西周不得不對東方勢力採取懷柔手段，試圖藉由政治聯合與民族融合來穩固西周在東方的封國的政治基礎並增強其力量，一方面達成控制東方、「以蕃屏周」的戰略目標與標準地緣政治程序，另一方面則維護西周作為新「天子」的合法性，⁹²以遂行西周天下觀的目的與理想。此種相當柔性的戰略經驗，再加上周人自認為夏朝之後，不斷重複夏禹如何征伐不服從他的「無道」大國，以及為天下共主的強大夏朝如何遭同樣遭原先亦為蕞爾小國的殷商始祖成湯消滅的戰略經驗和遠古傳說，被先秦戰略菁英由傳說演變為反抗戰國時代頻繁戰爭與兼并的反戰與聖王以道德壓倒武力的哲學思想，⁹³構成了日後中國戰略思想中相當重要的對道德在國際關係中效用的信仰。

前兩種戰略思想都承認武力在國際事務中的效用，後來轉化為內政導向戰略文化中具備江憶恩所謂的備戰邏輯的強現實政治戰略次文化，第三種則成為強調道德效用，否定武力效用的柔性戰略次文化。三種戰略思想的大致概念在春秋時期逐漸成形，對春秋史記載最詳盡的**左傳**到處可見此種觀念，至戰國時期則成為

⁸⁸ 二者皆出自**戰國策**，前者為秦策四之語，後者則為魏策一之語。溫洪隆注譯，**新譯戰國策**（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頁291、954。

⁸⁹ 語出**左傳**·宣公12年。李宗侗註譯，**春秋左傳今註今譯**，前引書，頁573。

⁹⁰ 語出**司馬法**·仁本。王雲璐注譯，**新譯司馬法**，前引書，頁6。

⁹¹ **吳子兵法**·圖國第一。傅紹傑註譯，**吳子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頁59。

⁹² 杜正勝，**古代社會與國家**，前引書，頁352-354、363-394、486-495。

⁹³ 同上註，頁892-897。

華夏文明的主流大戰略思想，**武經七書**中成書於先秦時期的兵書(孫子兵法、吳子、司馬法、六韜、尉繚子)亦皆提到必須獲得人民的支持方能有利戰爭之進行，先秦法家思想代表的**管子**、**商君書**更具有明顯的內政導向大戰略思想，⁹⁴而戰國時魏國李悝變法、楚國吳起變法、秦國商鞅變法，也都先求改革內政再延伸至對外政策，是內政導向大戰略思想的實踐。不過先秦時期的內政導向主流戰略思想並沒有塑造出趙普所謂的漢朝以後的內政導向戰略文化：主要國家的大戰略並未因慎戰思想而趨於防衛性，也沒有產生強調道德、否定武力的柔性戰略次文化，更未產生重視政權穩定與社會秩序安定勝過對外發展利益的優先性思考。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先秦對攻勢/擴張的偏好並不妨礙其在大戰略中使用屬於間接戰略手段來降低軍事成本與提高成功機率，「攻其國愛其民」的思想即為一例，不過在先秦時期對於這種手段的運用並不常見，**左傳·成公二年**雖然有「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的記載，⁹⁵但從**左傳**對春秋中期以後的記載中很難看出這種思想的運用。會有這樣的差異，最主要的原因在於地緣政治結構特徵與模式的完全不同所致。

二、古代東亞區域地緣政治結構與內政導向戰略文化的變化

整體而言，真正決定國家的大戰略與主流戰略文化之攻守勢偏好的是決策菁英的世界觀與地緣政治密碼。基爾認為結構因素不能決定國家大戰略的攻守偏好，若其「結構因素」指的是狹隘的結構的形式則是正確的，此種因素最多只能決定國家的戰略文化對於武力在國際事務中效力的信任度高低，但不能決定國家是以偏好攻勢或偏好守勢的戰略次文化為主導。但地緣政治結構理論對結構的概念是廣義的，其關切的不僅是結構的形式對國家大戰略行為與戰略文化的影響，還包括關切結構的特徵與模式對國家的大戰略行為與戰略文化的影響。而正是後兩者的變化，與技術能力一起塑造了戰略文化的下層物質基礎，形成每個時代不同的地緣政治密碼。故造成中國古代戰略文化在先秦與漢朝以後兩種截然不同形式的最主要原因就在於東亞地緣政治結構的特徵與模式在秦漢之際，特別是西漢時期的變化與轉化。

(一)、「中國地區」地緣政治特徵之影響

就特徵而言，先秦時期的結構僅限於華夏農業文明能順利發展的地緣政治區域，因此周人能順利推展其具備征服本質與武裝殖民精神的封建制度作為鞏固西周在體系中地位的主要手段，周公東征與周成王、康王的封建都是代表。先秦的地緣政治結構具備三種形式上的特徵使戰略文化的典型偏向強烈的攻勢擴張而非帝國時代以後的內政導向型。

第一種是對戰略交通線的控制極度不穩，西周初期的體系戰略交通線僅有關中的「宗周」沿渭水與黃河南岸向東至華北平原道路交通線中心，也是西周東都

⁹⁴ (唐)尹知章注，(清)戴望校正，**管子校正**，**商君書解詁**(臺北：世界書局，1962年)。

⁹⁵ 楚國子重引楚莊王之語，李宗侗註譯，**春秋左傳今註今譯**，前引書，頁636。

的雒邑(洛陽)，⁹⁶雖然西周藉由營建東都來支援華北平原的封建諸侯，同時藉由經營雒邑來達到控制戰略交通線成為霸權、達到「以屏蕃周」與殖民、控制華北平原的戰略目標。⁹⁷但由於當時體系低落的互動能力，從關中到雒邑需時甚久，導致關中的核心區與東部平原區實際上處於一種隔絕狀態，⁹⁸使得西周對戰略交通線的控制經常受到東方不服從者的威脅而極不穩固，必須長期與不臣服且能嚴重威脅戰略交通線控制權的徐夷、荊蠻等作戰。戰爭的目的初期在確保對戰略交通線與東方新戰略殖民基地的控制權，但到了周昭王、穆王以後，西周在華北平原的地位已經穩固，其繼續向外擴張行動雖然還是帶有消除南方異族對雒邑威脅的動機，但更主要的部分是純粹的領土與臣民侵略性擴張，以及確保南方所產的金屬原料與西方所產的玉這兩大貿易與冶煉技術等之來源，以供農業經濟發展等理由。⁹⁹

第二種特徵則自西周經歷春秋延續至戰國才消失，亦即結構中存在大量不屬於華夏的異民族與華夏諸國沒有控制的「野」或「隙地」。西周雖然取代殷商成為天下共主，但是其勢力除了關中以外，在初期並未延伸至黃淮平原，故必須藉助封建式的武裝殖民、營建雒邑控制戰略交通線，以及承認和安撫願意與周人合作的東方既有勢力與殷商遺民的地位，與之聯合壓制不服從周王的其他東方勢力。而西周與春秋時代的國家，其對領土的控制不是今日吾人理解的形式，國家的整個「封疆」由首都(國)、首都之外的城邑、首都與城邑等城市城牆之外的郊、不屬於郊的「野」所組成，只有首都可稱為「國」，而除了城邑之外，其他封疆之內並不算真正的「國土」，國家與國家之間甚至還有未築城邑的「隙地」。¹⁰⁰住在城內的「國人」與住在「野」的「野人」之間有嚴格的身份差別，「野」不屬於封建制度的經濟制度—井田制度，國與野之間必須要有通行證才能移徙。¹⁰¹但從反面來說，「野」所代表的荒地也是井田制度崩潰後，各國人民可新開拓的地區，西周後期井田制度逐漸崩潰後，至少在春秋中期以前對於「野」已經有大規模的開墾，這使得春秋各國政府與貴族都開始認可對新田的開墾，甚至主導新田

⁹⁶ 雒邑東出虎牢、滎陽即到達豫東平原邊緣；北渡孟津，則進入黃土高原另一經濟區河東，還能沿太行山麓、黃河北岸抵達原商朝首都朝歌所在的河內，南下伊闕，穿過南陽盆地，則進入南方主要民族荊楚盤據的漢水流域；雒邑也位於經函谷至姚林，穿越險要嶺函山區道路的東口。宋杰，**中國古代戰爭的地理樞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頁27。另外李峰也指出，從洛陽至朝歌的交通線是殷周時期途經中國東部人口最稠密地區的一條最重要交通線，見李峰，**西周的滅亡**，前引書，頁73-74；史念海，「春秋以前的道路」，史念海著，**河山集·七集**(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114-115、116-119。

⁹⁷ 雒邑駐守的西周主力軍是所謂的「成八師」，宗周的直屬軍隊則稱為「西六師」。二者與殷商舊都朝歌所在地，即西周封建的衛國所駐紮的「殷八師」，皆為西周的主力。西周為了控制並保衛這條體系中唯一的戰略交通線以保持天下共主地位與殖民華北平原的成果，分別封建一齊、魯在山東壓制殷商舊勢力，宋國在淮河中游對抗徐夷，申國在南陽控制方城和通往宗周的主要道路丹水谷地以阻止荊蠻北上。

⁹⁸ 李峰，**西周的滅亡**，前引書，頁72。

⁹⁹ 許倬雲，**西周史**，前引書，頁180；唐蘭，「用青銅器銘文來研究西周史」，**文物**(北京)，第6期(1976年)，頁32。

¹⁰⁰ 關於春秋以前的國家形式，見杜正勝，**古代社會與國家**，前引書，頁451-452、458-461。

¹⁰¹ 同上註，頁669。

開墾，以求增加本身的力量。¹⁰²結果是各國貴族在春秋時代大量開墾新田，國與野的界線逐漸消除，國家本身的概念與對領土的觀念逐漸接近今日的中央集權型態，開始重視對封疆邊關的防守而非如春秋以前那樣不設防。這些地緣政治結構在模式上的變化，導致各國在春秋中期以後為了爭奪土地進一步引發華夏諸國之間，以及併吞異民族的大規模國際戰爭與兼併。

第三種特徵則與前兩種密切相關，特別是第二種。先秦的內政導向思想產生的最基本原因，不是崇高的道德化理想，而是極為基本的地緣政治現實考量——各國明顯的人口不足，除了春秋後期與戰國初期的衛國、魏國等少數例外，皆面臨地廣人稀的窘境，特以處於體系邊緣的晉、秦、楚、燕、趙、齊等國為甚。¹⁰³陳槃認為就是因為這種從西周持續至戰國的普遍地廣人稀現象，所以當時的國家都把人口看得很寶貴，好像人口就是財產。¹⁰⁴因此先秦各國對外擴張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劫掠人口與攻取已經被大量人口充分開發的「熟地」以充實國力，並用新增加的人口來開墾尚未開墾的荒地；即使不以武力作為增加人口的方式，儒家如孔子、法家如管仲、李悝、吳起、商鞅等人的所謂「民本」思想與其他內政導向思想與改革政策，某種程度來說其實也就是阻止本國人口外流與設法從國內國外雙管齊下增加本國人口的人口政策主張。這當然需要一定程度的道德宣傳與作為，但不可認為先秦時代，特別是春秋時代的民本思想與內政導向思想因此具有崇高的道德意涵或屬於柔性戰略文化。

上述三種地緣政治特徵，再加上春秋戰國時代的無極結構中，「征伐自諸侯出」，接受數百年天下觀薰陶的諸侯國逐漸也產生成為「伯」甚至「王」的念頭，又導致強國之間為了完成本身的標準地緣政治程序而互相攻伐與兼併。不過春秋戰國時期征服對象還包括位於中原與中原周邊的異族，此種經驗源自周穆王時期，華夏文明的生產力進步而逐漸產生與其他民族的文明差異，導致結構模式開始出現變化，不再是西周初期生產方式與文化皆無太大差異的情況。以文化作為區分自我與他者的準繩，導致華夏民族開始鄙視甚至敵視文化較低落的異族，¹⁰⁵

¹⁰² 一個明顯的實例就是晉國在西元前 646 年為秦國戰敗俘虜後，晉國為了預防秦國乘晉國大敗又失去國君的惡劣情況持續進攻，承認了原來不被承認的私有開墾田地，即所謂的做「爰田」與「州兵」，藉此增強晉國的國力。另外，魯國在西元前 594 年也改為實施「稅初畝」的財政制度，即將過去井田制度稅人的制度，因應井田制度崩潰與開墾田地增多的情況，改為依土地徵稅，不論耕作者為神的制度。同上註，頁 669-670；楊寬，**戰國史**（臺北：商務印書館，1997 年），頁 158-161。

¹⁰³ 值得注意的是春秋時的地廣人稀原因與戰國時並不完全相同，春秋時代大致上是因為殷商與西周以來的生產技術尚未十分發達，因此人口未能大量增加，導致體系內還未開墾的土地極多而產生地廣人稀的現象。但春秋中期以後與戰國時代的地廣人稀除了體系邊緣各國持續向外擴張，新增加許多荒地之外，最主要的原因在於長期爆發許多大規模戰爭，殺戮人數極為可觀所導致的地廣人稀現象。

¹⁰⁴ 陳槃，「春秋列國的兼併遷徙與民族混同和落後地區的開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與中國上古史編輯委員會編，**中國上古史待定稿**（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與中國上古史編輯委員會，1985 年），第三本，頁 316。

¹⁰⁵ 根據**國語**·周語上的記載，祭公謀父勸諫周穆王不要征討犬戎時不僅沒有鄙視犬戎的文辭，甚至還稱讚犬戎「樹惇，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可是到了西周後期，**國語**·鄭語記載史伯為鄭桓公分析一旦周室動亂，他可以到哪邊避禍時，已經稱「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則皆蠻、荆、

而周昭王南征失敗導致損耗大量兵力，導致使西周產生西北異族可能趁西周忙於東方戰事時乘機而入的恐懼心理，使得周穆王主動打破西周與戎族傳統的同盟關係，意欲對蕭關道實施絕對控制而非同盟式間接控制。異族的人口與土地自春秋起更被新崛起的諸侯國視為重要的人力與物力資源來源，是擴張的首要目標之一，¹⁰⁶主要國家無不大肆對其發動侵略，導致戰國初期以後中原與各國境內的異族幾乎全部消失，秦、趙、燕、楚等國還不斷進攻位於邊緣地域的異族以強化「爭天下」的國力。¹⁰⁷換句話說，先秦時期華夏文明的擴張其實都侷限於九州內部，是在自身熟悉的地理條件中，因此擴張所能獲得的征服利益相當龐大，甚至具有掩蓋內部政治鬥爭、將威脅政權穩定的潛在力量導引至外部的效用。

但秦漢兩大領域形成之後，結構特徵的變化使一統帝國的異族威脅不再來自九州內部而只存在於外部，而且後者也逐漸興起足以身為強權甚至同為超強的強大帝國，其力量遠非以往華夏國家遇到的鬆散部落可比擬。農耕帝國雖然相對於異族國家具有絕對的綜合國力優勢，卻因為地理限制而很難再依靠實施武力擴張，加上北方與西方寒冷的草原、沙漠、高山、高原是華夏農業文明無法生存之地，徹底阻礙華夏農耕文明利用擴張的方式解決威脅，而華南與中南半島的熱帶氣候雖可發展農業，但不適中原人民生活的氣候條件和崎嶇的地形同樣困擾中國歷代王朝的軍事行動與政治擴張。¹⁰⁸再加上力量對比的變化，即使強如西漢，漢武帝傾全國之力對匈奴進行長達三十年的攻勢戰爭，西漢縱使擺脫了初期那種生

戎、狄之人也。非親則頑，不可入也」。進入春秋之後，各種文獻更直接記載華夏民族直視周邊異族為禽獸。易中天注譯，**新譯國語讀本**，前引書，頁 4、705。

¹⁰⁶ Nicola Di Cosmo, *Ancient China and Its Empires: The Rise of Nomadic Power in East Asian Hist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122-124. 在**左傳與戰國策**中亦可找到明確的論述支撐，例如**左傳·莊公 28 年**記載「狄之廣莫，於晉為都。晉之啟土，不亦宜乎」；**戰國策·秦策一·張儀與司馬錯爭論於秦惠王前**，則記載「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夫蜀，西辟之國也，而戎狄之長，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眾，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西海，諸侯不以為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而又有禁暴正亂之名」。李宗侗註譯，**春秋左傳今註今譯**，前引書，頁 193；溫洪隆注譯，**新譯戰國策**，前引書，頁 124-125。

¹⁰⁷ 戰國中期之前整個核心區都是華夏與異族雜居的情況，西周關中王畿周邊即為西戎與犬戎所居之地，某些國家如晉國，由於周邊大多是戎狄部落，周王訓令其禮儀使用「戎索」（**左傳·定公四年**），結果使晉國對周朝的「禮」不十分清楚（**左傳·宣公十六年**）。西周為犬戎所滅之後，異族更大舉進入華北，成為春秋初期諸國嚴重的威脅。秦、楚兩國也因為處於西陲與南方而分別被中原國家視為西戎與荊蠻，因此春秋初期楚國北上黃河流域的舉動，被華夏戰略菁英視為與同一時間的狄國消滅西周封國之一的邢、衛等國並侵擾其他華夏國家的行為相呼應，**公羊傳·僖公四年**稱當時的局勢為「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線」。異族進入核心區部分原因在於晉、秦兩國出於各自的戰略考量而遷移不同的戎族進入中原。核心區的異族經過春秋時期各大諸侯國的兼併之後才逐漸消滅，**後漢書·西羌傳**稱「周貞王八年，秦厲公滅大荔，取其地。趙亦滅代戎，即北戎也。韓、魏復共稍併伊、洛、陰戎，滅之。其遺脫者皆逃走，西踰汧、隴。自是中國無戎寇，唯餘義渠種焉」。但整個九州內部完全成為華夏之地必須等到戰國中期以後，趙武靈王於西元前 296 年滅白狄所建的中山國（河北省中西部）之後。雪克注譯，**新譯公羊傳**（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8 年），頁 211；世界書局編輯部主編，**新校後漢書注**，前引書，頁 2874；李宗侗註譯，**春秋左傳今註今譯**，前引書，頁 609、1332。

¹⁰⁸ 倪樂雄，**尋找敵人：戰爭文化與國際軍事問題透視**（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03 年），頁 303-304；丁力，**地緣大戰略**，前引書，頁 222-229。

存備受匈奴威脅的戰略形勢，也在領土與對外關係上有很大的收穫，卻仍未能迫使匈奴降服，而且本身國力消耗極大，不得不在漢武帝後期實施長期的休養戰略，對外息兵，這樣的戰略經驗進一步確認在新的結構中，擴張所得到之收益無法與先秦時期相較，過去那種以擴張為解決威脅的戰略經驗，在新結構中已經幾乎無法適用。¹⁰⁹

(二)、「中國地區」地緣政治模式之影響

地緣政治模式的變化大體上隨著特徵的變化而連帶產生，是另一種重要的影響因素。即使僅計算先秦時期狹義天下的九州，範圍也相當龐大，內部更有許多平行河川體系與其他自然地理障礙，和超過一千年以上諸邦林立的國際體系之歷史，都對帝國的統一造成分裂的離心作用力。中國自西周以來直到清朝為止，始終是重視農業超過工商業的文明，也是世界史上唯一一個兩千多年來始終直接向各基層農戶抽稅的國家，¹¹⁰農民既同時負擔稅賦與徭役，同時又是農業文明經濟發展的主力，這雖然使華夏文明在戰國初期就得以實施全民皆兵的軍制，取得發動具有戰略重要性的大規模會戰的必要物質基礎，爾後更發展成為統一九州的最重要物質工具。但這也使得農民成為政治家、思想家與戰略家最重視的人力資源，國家既必須嚴密掌控農民以強化國力、發展經濟，又不能使此等珍貴而難以恢復的資源因為戰爭而受到嚴重的損害，更不能使其因為地主的兼併而脫離中央政府的掌控，或避免農民因為各種原因結果無法生存，進一步發展成威脅中央政府的叛亂勢力。這些社會與物質基礎是內政導向戰略文化中民本意識型態的最主要根源。

從先秦至清朝將近三千年的歷史中，雖然秦漢以後幾乎都是偏向中央集權大帝國的形式，但每一個時期政府的制度對人民的控制力卻不同，如果再考量到先秦時的國家大小與今日的歐洲國家相埒，不超過現代中國的一兩個省之範疇，中央集權在掌握農民以成就富國強兵的任務上可以發揮高度的效力。可是秦朝以後的大帝國必須治理遠超過以往戰國時代範圍的天下，而這一天下因為自然環境的差異而有相當複雜的自然與人文風貌，單單想要凝聚這樣一塊地理結構與人口成具有相當多樣性的「大陸」成為一個政治長期穩定的帝國，就需要極為高超的技巧與努力。因此不單單是體系層級密碼左右著帝國的大戰略傾向與內政導向戰略文化的本質，地緣政治模式也有極為強大的影響：戰國、秦、漢、唐等時代的國家與帝國有精密的管理制度，其數字管理能夠深入至最基層的家庭單位，¹¹¹中央政府的政令可直達地方，不須依賴地方勢力來治理國家，遂能提供帝國充裕的資

¹⁰⁹ 秦始皇的丞相李斯反對秦朝遠征匈奴的主張是：「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相同的意見不僅為漢朝賈誼等人所繼承，一千五百年後明太祖頒佈的《皇明祖訓》中都還有相同的觀點：「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李斯的主張出自《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見馬持盈，《史記今註》，前引書，頁 2968；《皇明祖訓》的原文請見吳相湘主編，《明朝開國文獻》（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6 年），頁 1588。

¹¹⁰ 黃仁宇，《中國大歷史》（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3 年），頁 56。

¹¹¹ 關於秦漢及先秦時期的詳細數字管理制度，見杜正勝，《編戶齊民：傳統政治社會結構之構成》（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 年）。

源，此種地緣政治模式在初唐時配合結構的轉變，大絲路有效滲透隔離東亞與其他歐亞大陸區域地緣政治體系的自然隔閡，再加上唐朝經歷魏晉南北朝長期胡漢融合演化出的華夷一家地緣政治密碼，造就了初唐與盛唐相當明顯的攻勢/擴張偏好，形成華夏文明疆域最廣大的帝國，內政導向戰略文化的主導次文化無庸置疑地是強現實政治之類型。

然而，華夏文明始終強調農業重於工商業的經濟意識型態。另外，宋以後的政治制度雖然更趨向高度的中央集權以調集更多物力於國防、財政之用，但唐以前發展出來的數字管理制度與社會控制體制卻逐漸崩壞，使得對地方的控制比盛唐以前削弱許多，越來越依靠地方豪族與人士協助官吏管理與執行政令甚至維護治安。¹¹²這兩者嚴重阻礙了宋代以後的中國成為能在政治、經濟、金融與軍事等各方面都仰賴嚴格數字化科學管理技術治理的國家—唐以前能有如此的成就在於當時尚未發展出宋以後複雜的經濟與金融制度—尤以明、清兩朝最為明顯。¹¹³而廣闊的地理此時展現出不可忽視的影響，與落後管理制度遂嚴重削弱帝國對外政策的後勤能力，再加上威脅多來自自然與人文地理條件與九州差異極大的地區，更加使中國的對外行動若非有當地國家或民族的支持，否則難以得到充分的後勤支援而容易失敗，使得中國雖然在對抗外來威脅時具有能在物質力量上壓倒對方的自信，卻始終因為後勤管理不足以支撐較長時間的大規模對外行動，而害怕戰事長期化將嚴重消耗物質資源與損害以農民和農業為骨幹的人力資源和經濟發展，反過來危及帝國內部的社會穩定，並因此進一步威脅政治穩定。在這樣的中國，單憑武力統治不可能維持有效的長期統治，因為一支政治上可靠的軍隊其規模不足以壓制全中國，而一支能夠壓制全中國的軍隊，在政治上卻不可靠。¹¹⁴再加上有赫赫武功的秦朝與隋朝，最後卻因嚴重的內部動亂結果短命而亡的歷史經驗，更加深了內政導向戰略文化強調帝國真正的戰略重心在於如何確保自己對九州的長期統治，必須首先將戰略注意力集中於內部，其次才是謹慎地在地理環境極端不利之處作戰，否則必然因力量消耗過大而反過來導致內部動亂，帝國失去九州內唯一合法統治者的法統地位，甚至完全崩潰的戰略認知。

簡言之，九州的天下是帝國的根本，結構在範圍、特徵與模式等層面的變化導致中國古代帝國難以實行大規模軍事行動於擴張的情勢，迫使中國古代帝國無論對內或對外的戰略利益界定、手段取向都必須隨之變化以適應新結構與新體系秩序，甚至重新思考是否必須持續向無法發展華夏農業的地區擴張，以完成華夷一家、王者無外的天下觀最高理想。為了在新結構與新體系中重新建立合於天下

¹¹² 關於秦漢自清朝，歷代帝國中央政府對地方控制之差異，以及這種情況對帝國內政與對外政策之影響，請見黃仁宇，**中國大歷史**，前引書；黃寬重主編，**中國史新論·基層社會分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與聯經出版，2009年）。

¹¹³ 黃仁宇，**中國大歷史**，前引書；阿風等譯，黃仁宇著，**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1年）；黃仁宇，**放寬歷史的視界**，增訂一版（臺北：允晨文化，1999年），頁170-189。

¹¹⁴ 這是學者林蔚對現代中國政軍關係的描述，但對於交通、管理、政治控制力等都遠不及現代的古代中國而言，這種描述可能更加合適。Mark Burtles and Abram Shulsky, *Patterns in China's Use of Force: Evidence from History and Doctrinal Writings* (Santa Monica: RAND, 2000), p. 81.

觀的國際秩序與界定國家利益，並維持國家安全，內政導向大戰略思想中的慎戰觀念得到加強，柔性戰略手段的運用也開始得到重視，中國古代帝國的大戰略正式擺脫西周與先秦時期主流與單一的攻勢/擴張類型，內政導向戰略文化於焉形成，並在唐代衍生出「治安中國，遠人自服」的思想，以及後來北宋著名的「先本後末」戰略主張，¹¹⁵ 朝向林蔚(Arthur Waldron)與佛拉吉(Paul Forage)等學者認為中國古代帝國的大戰略通常同時包含外交安撫，以長城為基礎、配合偶爾出現的懲罰性遠征的靜態防禦，和攻勢征服等三種大戰略的混合。¹¹⁶ 同時包含具有備戰邏輯、重視武力效用的強現實政治戰略次文化，與否定武力效用、強調道德無敵的柔性戰略次文化的內政導向戰略文化在西漢以後才正式成形並作為往後中國歷代帝國的主流戰略文化。值得注意的是，強調道德重要性的戰略次文化之出現，是內政導向戰略文化在帝國時代才成為主流戰略文化的另一個有力證據：呂靜引用小倉芳彥與楊向奎對出土的西周青銅器銘文與比對左傳、國語，等成書於戰國初期的史書對道德作為政治思想之研究，發現西周青銅器銘文中的「德」完全不涉及道德倫理的概念，只是周王在道路上視察之意，德、刑、禮、義等左傳、國語及後代柔性戰略次文化中常見的觀念，實際上皆是春秋中期至戰國初期才因戰略菁英體系中的大規模戰爭與兼併行為，和對古代歷史的反思而慢慢形成。¹¹⁷

狹隘的結構概念－結構形式對戰略文化的影響僅在於決定其性質對武力使用的信任程度這一大方向。東亞地緣政治結構使內政導向戰略文化的本質不可能成為所謂「愛好和平的儒家戰略文化」。結構中經常存在嚴重的國家安全威脅，導致中國戰略菁英的決策思考充滿濃厚的現實主義權力政治考量，成為華夏文明決定對外政策類型的首要準則，道德與信義等皆位於權力政治之後，尤以九州處於分裂時代的戰略菁英為然，這造成即使屬於儒家學派的戰略菁英，本身也對使用武力的效用分成截然不同的兩派主張。因此內政導向戰略文化的本質便較為偏向強現實政治思考，¹¹⁸ 在其影響下，帝國外交政策的制訂首先必須從權力政治出發，對結構形勢、敵我力量對比有明確的瞭解後，才決定是以代表強現實政治的

¹¹⁵ 先本後末中的「本」指的是帝國人民，「末」指的是九州核心區以外的邊緣地帶疆土，即所謂的「聖人先本後末，安內以養外，人民本也，疆土末也」，見(宋)李燾撰，*續資治通鑑長編*，前引書，頁485。

¹¹⁶ Waldron,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op. cit., pp. 40-41, 212-218; 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17.

¹¹⁷ 呂靜，*春秋時期盟誓研究：神靈崇拜下的社會秩序再構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頁34-35。

¹¹⁸ 唯一的例外或可認為是北宋。在宋太祖為了消滅唐朝後期藩鎮割據的影響，而推行的重文輕武與懷疑武臣的傳統強烈影響下，以及北宋一直無法如以往的朝代那樣以武力作為維持國家安全的主要手段，但在澶淵之盟後卻因為付出相對整體經濟來說，屬於少量的歲幣而能維持與遼之間的長期和平，陶晉生認為這導致北宋戰略菁英產生批判過往朝代以武力作為國家安全主要手段的大戰略作為。不過北宋也未能完全以偏向柔性道德思考的戰略次文化為主導，反而因為西夏與遼始終是其揮之不去的嚴重國家安全與國防威脅，以及無法真正擺脫天下觀中的華夷之別概念，和汲汲營營於收復為遼、夏所佔領的九州「失土」，而使其大戰略不斷陷入柔性手段與武力路線之間的爭論。陶晉生，*宋遼關係史研究*，前引書，頁40-42、102-130。

「力」，或柔性思考的「德」與「義」作為主要戰略手段。唐朝的陸贄與北宋的王安石都曾根據這樣的標準，總結在秦漢以來的內政導向戰略文化傳統中，真正居主導地位的是對結構形式、敵我力量對比形勢有充分瞭解，基於權力政治思考的強現實政治戰略次文化，何時運用武力與何時運用德治兩種不同手段深受結構力量的支配，¹¹⁹導致對外政策沒有一定的類型。¹²⁰

陳寅恪更指出，¹²¹唐朝經常以對外族盛衰的連環性之深入瞭解為基礎，利用其矛盾而設計聯盟戰略或「以夷制夷」甚至「以夷攻夷」政策，¹²²作為武力以外輔助解決外部威脅的重要手段。但實際上不僅唐朝如此，其餘朝代亦然，導致資治通鑑柔性戰略手段亦具有強烈的功利主義取向和權力政治思考與權謀計算，¹²³

¹¹⁹ 王安石的說法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221 的記載：「武王稱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力同然後度德，德同然後度義。苟力不足雖有德如文王尚不免事昆夷。但有德者，終能強大勝夷狄，文王是也。先王於夷狄，力不足則事之，力同則交之，力有餘則制之。同力同德我交之，而彼拒我，則我義而彼不義，則我勝矣。」(宋)李燾撰，《續資治通鑑長編》，前引書，頁 5378。

¹²⁰ 陸贄在《陸宣公奏議》，卷 3·「論緣邊守備事宜狀」中稱：「蓋以中夏之盛衰異勢，夷狄之強弱異時，事機之利害異情，措置之安危異變…形變不同，胡可專一。夫以中國強盛，夷狄衰微，而能屈膝稱臣，歸心受制，拒之則阻其向化，滅之則類於殺降，安得不存而撫之，即而敘之也。又如中國強盛，夷狄衰微，而尚棄信忤盟，蔑恩肆毒，諭之不變，責之不懲，安得不取亂推亡，息人固境也。其有遇中國喪亂之弊，當夷狄強盛之時，圖之則彼釁未萌，禦之則我力不足，安得不卑詞降禮，約好通和。啖之以利，以引其僇心，結之以親，以紓其交禍。縱不必信，且無大侵，雖非御戎之善經，蓋時事有不得已也。倘或夷狄之勢，強弱適同，撫之不寧，威之不靖，力足以自保，勢不足以出攻，安得不設險以固軍，訓師以待寇，來則薄伐以遏其深入，去則攘斥而戒於追遠。雖非安邊之令圖，蓋勢力亦有不得已也。故曰…是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其中關於與外敵的應對之道，與前註王安石之意見類似。見(唐)陸贄撰，《陸宣公奏議》，台二版(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2 年)，頁 62。

¹²¹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臺二版(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4 年)，頁 141。

¹²² 漢武帝派遣張騫通西域的原始戰略思考即是聯絡遭匈奴亡國的大月氏一同攻擊匈奴，後來西漢又將聯盟對象轉移至西域諸國以及中亞大國烏孫。漢宣帝與東漢能徹底擊敗匈奴，很重要的原因是利用匈奴分裂，聯合南匈奴擊破與漢朝為敵的北匈奴。唐朝的聯盟戰略主要是在中期以後聯南詔、回鶻以抗吐蕃，在前期強盛時與隋朝一樣並無聯盟戰略之存在。兩宋最為有名的是北宋連金滅遼與南宋聯蒙古滅金，不過北宋初期也曾出現「聯麗制遼」、聯阻卜(蒙古高原游牧部落)與西域牽制遼，以及聯青唐吐蕃滅西夏，南宋初期也有過聯西夏抗金的嘗試，不過這些聯盟戰略除了北宋與青唐的聯合之外，若非無疾而終，就是根本未曾成為認真的政策選項。至於明初的聯盟戰略主要體現在明太祖為了消滅最主要的敵人北元，而採取的聯高麗滅北元戰略。關於北宋的聯麗制遼、聯阻卜與西域制遼兩聯盟戰略，請參考梁利，「從“聯麗制遼”到“聯金滅遼”——論 10-12 世紀東北亞的戰略格局及宋朝的戰略對策」，《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河南省開封市)，第 2 期(2005 年)，頁 101-105；陶晉生，《宋遼關係史研究》，前引書，頁 173-179；張睿麗，「王延德出使高昌使命補證」，《西域研究》(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烏魯木齊市)，第 3 期(2003 年)，頁 39-44。北宋與青唐的聯盟戰略可參考曾瑞龍，《拓邊西北——北宋中後期對夏戰爭研究》，前引書，頁 134-138；李華瑞，《宋夏關係史》，前引書，頁 394-412；鍾美珠譯，長澤和俊著，《絲綢之路史研究》，前引書，頁 364-369。明初的聯高麗滅北元聯盟戰略，則可見於趙現海，「洪武初年明、北元、高麗的地緣政治格局」，《古代文明》(吉林)，第 4 卷第 1 期(2010 年 1 月)，頁 90-97。

¹²³ 劉敬主張和親的兩大理由是：「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彼知漢適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為子婿；死，則外孫為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儒家學者董仲舒也認為：「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獨可說以厚利，結之於天耳。故與之厚利以沒其意，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殺愛子何！夫賦斂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這些都是功利主義取向考量，不是「以德服人」的主張。北宋在 1038 年與西夏開戰之後，為了應付遼從中藉機牟利的壓力，在無法以武力做回應的情況下，採取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明朝在 1570 年與蒙古韃靼部俺答汗達成的「俺答封貢」，雖然解決了

甚至帶有強制的成分，例如「攻其國愛其民」，本來就是同時運用武力與道德的擴張手段，道德既然與武力互相配合，則已不可能具有單純的人道考量，至於所謂的「羈縻」，實際上就是一方面用軍事手段和政治力量加以控制的「羈」，配合以經濟和物質利益給予撫慰的「縻」並用；¹²⁴而是否開放與異族貿易的決策、關閉貿易場的貿易制裁，以及冊封等政治安撫手段，更常被中國戰略菁英視為重要的「馭戎」，甚至「以夷制夷」、「以夷攻夷」手段。¹²⁵換言之，間接戰略開始被大規模運用，尤以武功不如漢、唐的北宋，放棄了速決戰以後，在中期結合前沿防禦的經驗，採用「招撫」西夏周邊民族，以及進築堡寨等強度、風險均較低，但具有很高持續性的手段，¹²⁶慢慢擴大北宋西北邊境與對西夏的戰略地理優勢，試圖以此制服西夏，並利用遼、夏之間矛盾來牽制這兩者無法緊密聯合包圍宋朝的大戰略作為最明顯。

這些手段在帝國時代能得到比先秦更大的成效亦在於結構之變化—秦漢以後的間接戰略運用對象多為對中國有巨大經濟需求但沒有什麼政治要求，或要求中國在政治與安全上給予援助的異族行為者；反之，先秦時期的運用對象多為同屬華夏文明的國家，在不存在政治、經濟意識型態差異的情況下，光憑道德宣傳起不了太大的作用，因此間接戰略難以得到發揮並促成內政導向戰略文化。

第四節、內政導向戰略文化與中國古代帝國的大戰略 偏好

江憶恩將國家的大戰略類型概分為在鄰近區域外以攻勢性、預防性或先制性(preemptive)武力使用，目的在藉由兼併某些領土來達成獲取完全軍事勝利或在政治上毀滅對手的「攻勢/擴張型」(Offensive/Expansionist)；以外交、政治貿易、經濟誘因、扈從等為主要戰略手段的「安撫型」(Accommodationist)大戰略；以及介於上述光譜兩端之間，武力使用以強調對邊界實施靜態防禦而非兼併或毀滅敵人的國家或政治組織的「防衛型」(Defensive)大戰略等三種。¹²⁷曾瑞龍認為

困擾明朝許久的西北方外患問題，看起來似乎是成功地以貿易這種柔性手段解決了外部威脅，但依照**明史·列傳第 215·外國八對支持俺答封貢的戰略菁英的戰略意圖**描述，即可知明朝的封貢同樣具有明顯的功利取向與權力政治思考：「朝廷若允俺答封貢，諸邊有數年之安，可乘時修備。設敵背盟，吾以數年蓄養之財力，從事戰守，愈於終歲奔命，自救不暇者矣」。馬持盈，**史記今註**，前引書，頁 2728；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漢書并附編二種**，前引書，頁 3831；陶晉生，**宋遼關係史研究**，前引書，頁 70-91、94-95；(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前引書，頁 8486。

¹²⁴ 葛劍雄，**統一與分裂——中國歷史的啟示**(北京：三聯書店，1994 年)，頁 89。

¹²⁵ 以冊封作為以夷制夷的重要手段，則見於西漢以後至唐朝，包括北魏在內的中國對北方民族處於明顯優勢的時代，至於將貿易制裁與決策作為權力政治考量下的政策工具的行為則是中國較無法以武力取勝，或在競爭中居上風的時代，因此在宋朝與遼、西夏和西北各民族的互動中為最明顯，明朝的「俺答封貢」同樣是此種思維下的產物。請見札奇斯欽，**北亞游牧民族與中原農業民族間的和平與戰爭**(臺北：正中書局，1972 年)，頁 529-577；陶晉生，**宋遼關係史研究**，前引書，頁 53-56；李華瑞，**宋夏關係史**，前引書，頁 312-342。

¹²⁶ 曾瑞龍，**經略幽燕**，前引書，頁 294。

¹²⁷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op. cit.*, pp. 112-113.

內政導向變數是否會導致消極的大戰略尚須進一步的研究，本論文認為這必須考量每個時代的結構形式、特徵與模式是否使國家不易利用積極大戰略達成目標，以及決策菁英所秉持的地緣政治密碼與受何種戰略次文化較深的影響而定。因此內政導向變數未必全然對大戰略具有消極的制約，至少從春秋中期以後與戰國時代，以及西漢、初唐與盛唐等秉持華夷一家密碼的朝代中並未看到明顯的影響。

西漢以後的中國大戰略常同時混用複數以上的類型，但每個時代在混用之中仍因朝代的對外性格與主流戰略次文化的差異，而使某一種大戰略類型較居主導性。何種戰略次文化與大戰略居於主導地位，既受到地緣政治結構的影響，同時也與決策者本身的背景(受何種戰略次文化的影響與抱持什麼樣的地緣政治密碼)、政治制度的設計，和決策過程中的政治鬥爭有極為密切的關係。戰略文化本身與大戰略的積極性無必然的因果關係，正如格雷所說，戰略文化的功用是作為解釋國家何以會做出某種戰略行為的背景因素而非與戰略行為之間具有因果關係。¹²⁸決策者的大戰略規劃有時會超越戰略文化的制約，尤其是當決策者具有對國際體系的秩序原則具有相當高度的理想性，或感到情勢對國家至為不利，必須盡力改變國家的戰略形勢以免國家安全甚至生存遭受嚴重威脅。反之，也有可能完全無力改變長期情勢，使之與理想相符時，倒退回非常消極、甚至對國家利益有害的決策。不過決策者的個人影響力卻又常未能完全超越戰略文化的影響，尤其當結構與國力的限制使其無法達到戰略目的時，文化會迫使戰略進行修正。總之，特定時代的大戰略類型視時代的不同、敵我力量之的客觀對比與戰略菁英之認識程度、戰略菁英對前代的戰略經驗反思等之影響，與「人」的關係較為密切，可能因為領導核心在短時間內的更替就迅速改變大戰略的類型。

以中國古代情況而言，第一種「人」的影響就在於天下觀產生的地緣政治密碼差異。很明顯的，當決策者與戰略菁英多秉持華夷一家的最高理想時，必然會採取積極的外交戰略以求達成目標；反之，嚴夷夏之防的地緣政治密碼則不鼓勵與周邊國家的交往，甚至會有鄙夷外國的民族主義心理，在這種情況下，大戰略性質必然較為消極。不過積極的對外戰略不代表一定以武力為主，華夷一家的地緣戰略指導也同樣願意運用包含強烈攻勢意味的柔性戰略手段來達到戰略目的以降低成本，尤以同時擁有多處戰線而帝國難以在每個戰線都維持同樣強度的力量時為然。至於第二種「人」的影響則在於政治哲學的意識型態。柔性戰略次文化之所以能不斷流傳下來，固然與中國在歷史上數度成為東亞的單極甚至霸權，必須提供霸權穩定論所主張的體系穩定公共財，以及地緣政治結構形式難以擴張等戰略經驗有關，但更大的因素恐怕在於中國戰略菁英長期受到各種儒家思想天下觀理念之薰陶，以及儒家特有的道德秩序觀之影響，不僅完全認同中國皇帝是東亞地緣政治體系中的最高秩序來源，還因之產生異族對中國的各種柔順行為都是皇帝或帝國之「德」遠播的影響，完全不顧及這些外交事件經常是異族在其本身的戰略利益考量之下所做出的決策—通常是希望得到中國在國防或外交上的

¹²⁸ Colin S. Gray, "Strategic culture as context: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theory strikes back,"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5, No. 1(January 1999), pp. 49-69.

支持，或著眼與中國通商貿易的龐大利益—與中國皇帝的「德」沒什麼關連，歐陽修即曾精確地指出：「自古夷狄之於中國，有道未必服，無道未必不來，蓋自因其衰盛」，¹²⁹明太祖亦稱明初各國願意不遠千里頻繁至中國朝貢的真實目的在於：「雖云修貢，實則慕利」，¹³⁰可是中國戰略菁英為了符合本身的政治哲學意識型態，有時甚至為了政治鬥爭的緣故，¹³¹便盡量朝這方面解釋，有時甚至到了完全不切實際的情況，不過無論其影響對中國歷代帝國的戰略決策是好或壞，最明顯的現象是使柔性戰略次文化能夠不受結構變動之影響，持續不斷流傳。

至於地緣政治結構的影響，一方面指的是結構與中國本身的地緣政治模式所產生的內外向性格，二方面指的是結構中是否存在與中國敵對，而中國始終無法有效解除其威脅的強大行為者。從這個角度切入，在秦漢之後的結構中始終存在中國難以解決其威脅的敵對大國，雙方不僅對北方邊緣地域因為經濟、國防安全上的理由而競爭激烈，還存在因文明形式的不同而產生貿易、文化上的嚴重摩擦，再加上視外族為禽獸的觀念、華夷之間摩擦的歷史記憶，使得武力的效用始終被中國古代戰略菁英所重視，強現實政治戰略次文化在大多數時代一直是內政導向戰略文化中的主導類型，縱使內政導向戰略文化使中國古代帝國的主流大戰略類型由攻勢/擴張型朝防衛型修正，甚至正式加入了柔性戰略手段，而且自西漢以來，特別在北宋中期以後的確不斷有戰略菁英主張以柔性戰略次文化作為主導型戰略次文化，並提出徹底的非暴力柔性戰略手段，強調以道德感化外部威脅對帝國安全的重要性與可行性，¹³²但受制於結構的影響，這些發展始終沒有使中國古代戰略文化真正朝向完全和平本質的柔性戰略次文化改變，班固即在**漢書**中猛烈批評和親、貿易與歲幣等柔性戰略手段根本無法有效維持漢匈之間的穩定關係與西漢的國家安全。¹³³

¹²⁹ (宋)歐陽修撰，**新五代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885。

¹³⁰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勘，**明太祖實錄**，第二版(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8年)，第三冊，頁2125。

¹³¹ 這樣的情況在北宋有最明顯的表現，例如**宋史**·卷282·王旦條記載澶淵之盟以後北宋大戰略完全傾向安撫型而非宋太宗中期以後的防禦型，實在於宋真宗本人厭惡用兵，以及原來主張防禦型甚至一定程度上偏向攻勢型大戰略的執政大臣在政治鬥爭上失敗的結果，此外，陶晉生也詳細分析了王安石的外交政策與反對他的某些大臣如韓琦等人在宋仁宗時代的主張是相符的，只是因為政治立場不同而互相反對。見(元)脫脫等撰，**宋史**，前引書，頁9544-9545；陶晉生，**宋遼關係史**，前引書，頁163，註釋第63。

¹³² 例如西漢賢良文學在「鹽鐵會議」中提出應對匈奴的戰略主張，以及北宋真宗以後不斷強調遼與西夏與北宋維持和平關係乃是北宋的道德政策發揮效用的緣故。盧烈紅注譯，**新譯鹽鐵論**(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頁222、503、515、555、561-562、564-565、568-569、574、578、590、595、601、604-605、607-608、613-614、617、625、633、637、642、648、652、661、666。

¹³³ **漢書**·匈奴傳文末稱「昔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冀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後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為衰止，而單于反以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增其約…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乃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關於後世也。當孝武時…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尚如斯，安肯以愛子而為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

因此處於內政導向戰略文化光譜兩個極端：強現實政治本質的攻勢/擴張大戰略，與極端柔性的非暴力道德外交手段，只有在決策者本人的地緣政治密碼、結構的形式與特徵、結構與帝國內部的地緣政治模式等諸多因素同時配合之下，才有展現的可能。柔性戰略次文化提倡的大戰略大多只存在紙上談兵的理想階段，能真正由戰略思想轉化為大戰略手段者極為稀少，柔性戰略次文化想要成為主導型戰略次文化，不僅要決策者本人的地緣政治密碼屬於嚴夷夏之防，以及信仰道德的功用超過武力之效用，還只能在兩種極為特殊的結構型式之下才有可能實現：

第一種是結構中完全不存在對中國領土、戰略交通線控制權與天下觀秩序原則構成潛在威脅的完全霸權式地緣政治結構，此種時代可見於周成王後期與周康王初期、漢宣帝之後的西漢、漢和帝之後的東漢、統一九州之後的西晉與 1760 年代至鴉片戰爭為止的清朝。這種結構雖然在歷史上並不常見，但由於結構的向心力極為強大，柔性戰略次文化能維持至結構再度轉變為止。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這樣的時代出現之前，必然經歷過明顯的攻勢/擴張大戰略時期：西周有周公、成王、康王的東征與封建制度壓制東方反周勢力；西漢有漢武帝時的長期戰爭嚴重削弱匈奴的實力，漢宣帝才能積極利用匈奴內亂招降分立的各單于；東漢先藉由支援南匈奴的戰爭徹底擊敗北匈奴並迫使其西遷離開東亞，而清朝則以種族清洗的方式完全消滅了體系中唯一的競爭對手—盤據新疆的準噶爾汗國；¹³⁴西晉則得力於其前身曹魏對匈奴、烏桓、鮮卑等游牧民族，以及東吳、蜀漢對南方異族的征服。

第二種結構更為特殊，僅見於北宋中期以前，一方面基於北宋決策與戰略菁英體認到宋的軍事力量太弱，無法改變宋遼並立與党項/西夏獨立於宋之外的現實，必須另尋他法解決眼前的立即威脅並建立穩定的國際關係；二方面基於歲幣與宋遼貿易的經濟利益對遼朝極為有利可圖，¹³⁵而遼雖欲在草原領域建立以其為中心的區域國際次體系，其努力卻不甚成功—對漠北、河西走廊的控制並非固若金湯，西域更不在其支配之下，西夏雖然在名義上為遼之屬國，在沒有抗宋的共同戰略目標之下卻時常與遼發生齟齬，遼夏之間兵戎相見的程度並不亞於宋初的情況，¹³⁶這些結構因素迫使遼的注意力經常四處分散，無法專心於北宋，使遼願意信守澶淵之盟；三方面則是北宋與南詔/大理的互動極少，交趾之地緣戰略重心又指向印度支那，南方的威脅不如唐朝繁重。柔性戰略次文化因此才得以在北

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夫邊城不選守境武略之臣，修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斂於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讎。信甘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漢書并附編二種**，前引書，頁 3830-3832。

¹³⁴ 相關記載可參考(清)傅恆等奉敕撰，**平定準噶爾方略**(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叢書第 358 冊，頁 358-632；烏云畢力格、成德崇撰，**伊克昭盟蒙古民族通史編委會編，蒙古民族通史**(內蒙古：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1 年)，頁 184-185；(清)魏源撰，**聖武記**(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頁 156。

¹³⁵ 陶晉生，**宋遼關係史研究**，前引書，頁 53-55。

¹³⁶ 草原領域與西夏分散遼的戰略注意力之研究，請參考鍾美珠譯，長澤和俊著，**絲綢之路史研究**，前引書，頁 324-407。

宋真宗、仁宗、英宗三朝取得長期主導地位，但與第一種結構相較，此種結構的離心力—遼、夏與北宋的關係違反傳統天下觀的秩序原則，嚴重刺激許多北宋戰略菁英之心理；北宋欲取回失於遼、夏的漢、唐舊疆域以解除遼、夏的威脅，而遼、夏在後期反而希望進一步從北宋獲得更多地緣政治利益—甚為強大，一旦遼、夏、交趾其中之一不願持續維持與宋的舊關係，柔性戰略次文化登時失去主導地位而被強現實政治戰略次文化所取代。¹³⁷

同樣的，強現實政治戰略次文化主導的攻勢/擴張大戰略不僅需要中央能嚴密控制各地方的集權政治體制，也要決策者秉持華夷一家地緣政治密碼，和能與之配合的地緣政治結構。例如漢武帝及其之後的西漢皇室，其所處的地緣政治結構不僅匈奴是與漢朝分庭抗禮的草原領域超強，也因為西漢的首都位於關中，極易受到草原地區的威脅而使其為了解除沈重的國防壓力、實現華夷一家的理想與完成標準地緣政治程序，而不斷朝西北方擴張。至於皇室胡化深刻的唐朝更為明顯之例，唐朝的核心位於關中，不僅與西漢一樣必須嚴防來自鄂爾多斯與河西走廊的威脅，故必須發動與兩突厥和高昌國的戰爭以解決國家基本安全，但更重要的是唐朝正值絲路鼎盛的時代，對外貿易、體系中的強權與區域大國數目都超過漢朝，使得唐朝不可能閉關自守，使其比西漢更要面對位於青康藏高原的吐蕃這一更強大的威脅，因此必須始終與吐蕃爭奪河西走廊和西域以控制大絲路。這使得初唐與盛唐大戰略的攻勢/擴張傾向至為明顯，甚至遠超過西漢。

不過必須注意到的是，初唐的攻勢/擴張大戰略時之所以能成功，一方面在於善用外族盛衰的連環性—兩突厥、高句麗等主要敵人都有天災或內亂，因此得以運用攻勢/擴張戰略思想中的「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擴張方式，而唐太宗所謂「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¹³⁸不僅是「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的實踐，更顯示出在內政導向戰略文化的作用下，即使是攻勢/擴張大戰略也包含有攻勢意味極濃厚的柔性手段作為間接戰略，以降低擴張成本與提高成功機率，這是初唐得以成功的重要原因。反之，當上述的諸多成功因素有其中之一缺乏時，攻勢/擴張大戰略就難以實行而必須朝安撫型修正，例如安史之亂後，唐朝因為藩鎮割據威脅到其政治與經濟安全，不得不將戰略重心轉移至國內並放棄對外大規模行動，而唐朝對付始終沒有什麼內亂與天災的吐蕃與南詔，也因此經常遭遇失敗。同樣的情況亦見於兩漢—漢武帝的攻勢並不能屈服沒有分裂與未受天災襲擊的匈奴，可是一俟匈奴在漢宣帝以後連番遭

¹³⁷ 北宋對西夏的柔性大戰略只在趙德明採取「依遼和宋」的對外政策時發揮較大的效用，換言之，同樣是與遼一樣的結構因素才使柔性大戰略有較持久的表現。依遼和宋政策被趙元昊以後的西夏諸帝拋棄後，北宋再也不能依此維持穩定的宋夏關係，必須極力操縱遼夏之間的矛盾來轉移二者對宋的威脅，但這也不能解除西夏對北宋嚴重的國防負擔與宋夏長年的邊境糾紛，最後演成宋神宗時期的開疆拓土戰略根源。雖然宋哲宗初年北宋在反對新法的太后與保守大臣主政下，一意以柔性大戰略為主導，意圖恢復與西夏的和平，主動願意歸還宋神宗時期奪自西夏的土地，但西夏並未因此與北宋恢復關係，徹底的柔性戰略手段根本無法發揮效用，不久即被放棄，宋夏在此時間內因為歸還土地談判而引起的新爭端反而成為宋哲宗中期以後更激烈的開疆拓土戰略的根源之一。李華瑞，**宋夏關係史**，前引書，頁 85-96。

¹³⁸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資治通鑑注**，前引書，頁 6247-。

受天災與產生嚴重的政治分裂，西漢才能逐漸以武力配合具有濃厚權謀思考的柔性手段間接戰略降服匈奴；東漢初期雖然匈奴同樣南北分裂，但臣服於漢朝的南匈奴勢力完全不能與北匈奴相比，只有在北匈奴同樣連續遭受嚴重天災襲擊、人民不斷逃往南匈奴，導致南北勢力消長發生根本變化之後，才有南匈奴與東漢聯手滅北匈奴的戰爭。¹³⁹

清朝作為異族的征服王朝是第二個持華夷一家地緣政治密碼並明顯交互運用攻勢/擴張與安撫型大戰略的朝代，特別展現於滿蒙關係上。¹⁴⁰由於清朝是人口少數的女真族所建立，必須取得蒙古諸部¹⁴¹的合作，才能消除側翼威脅並專心於穩定對中國的統治，因此清朝從未入主中國之前就以「臨之以兵，懷之以德」的手段，雙管齊下拉攏漠南蒙古，¹⁴²對較遙遠的漠北蒙古與漠西蒙古則以政治分化手段為主，軍事遠征為輔，即使有1646年遠征漠北蒙古的大勝，嗣後為了控制中國的最終戰略目的，後還是採取安撫型戰略而非直接控制，¹⁴³對於緊鄰河西走廊與甘肅、四川的和碩特部則採取冊封的方式維持友好關係，並拉攏西藏，以宗教牽制信仰喇嘛教的漠北與漠西蒙古，¹⁴⁴翦除其與準噶爾的聯繫。女真族的傳統核心區在滿州中北部，其能穩固控制的勢力範圍一向難越過蒙古高原，因此清朝的攻勢/擴張型大戰略能取得過去華夏、契丹、女真族帝國所不能達到的成功，同時控制包含青康藏高原在內的兩大領域，很顯然在於蒙古並沒有形成統一的帝國，而且唯一的強大對手準噶爾，在第一次與第三準噶爾戰爭中也有嚴重的內部分裂，清朝才能順利將其擊敗與滅亡。不過清朝並沒有對蒙古之外的次要競爭對手採取攻勢/擴張型戰略，而是交替運用防禦型與安撫型戰略於外來威脅和帝國內部的潛在威脅，特別是在帝國擴張的極限之處，如雲南與緬甸交界處、滿州北方與俄羅斯交界處以及新疆。

明朝尤其是在成祖時期的例子較為特殊，明成祖比起明太祖更明顯地抱持華

¹³⁹ 基於此戰爭原則是支援南匈奴的匈奴統一戰爭，而且無論東漢或南匈奴，在徹底擊敗北匈奴迫使其朝中亞逃竄之後都沒有佔領蒙古高原，是否符合攻勢/擴張大戰略的內涵實有爭論之餘地。不過東漢的決策明顯是基於華夷一家地緣政治密碼的指導，因為東漢大臣耿秉主張同意南匈奴請求的原因即在於「北虜分爭，以夷伐夷，國家之利，宜可聽許」。世界書局編輯部主編，**新校後漢書注**，前引書，頁2952-2953。

¹⁴⁰ 陳安麗，「論康熙對蒙古政策產生的歷史背景和作用」，**內蒙古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第31卷第3期(1999年5月)，頁17-26。

¹⁴¹ 清朝時的蒙古延續明朝以來的分化，共分成漠南蒙古(韃靼後裔)、漠北蒙古與漠西蒙古。漠西蒙古又或稱厄魯特蒙古，散佈範圍最廣，分為準噶爾的瓦剌後裔準噶爾部、青康藏高原的和碩特部，以及位於伏爾加河(Volga River)流域的土爾扈特部等。黑龍，「噶爾丹統治時期的準噶爾與清朝關係研究」，**內蒙古大學歷史系博士論文**(2005年)，頁10-11。

¹⁴² 穆峯臣，「試論清朝治理東蒙古的政策和措施」，**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第26卷第3期(2005年5月)，頁50。

¹⁴³ 齊木德道爾吉，「1640年以後的清朝喀爾喀關係」，**內蒙古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第4期(1998年)，頁12-20。

¹⁴⁴ 佟佳江，「清朝統治蒙古的體制——八旗蒙古、外藩蒙古、內屬蒙古」，**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第6期(1998年)，頁36-41；王景澤，「清朝的黃教政策與蒙古社會」，**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吉林省長春市)，總第195期(2002年)，頁34-40；湯代佳，「青海厄魯特蒙古與清朝之早期關係述略」，**青海民族研究**(青海省西寧市)，第12卷第3期(2001年7月)，頁59-60。

夷一家地緣政治密碼，許多人經常以鄭和下西洋的過程中沒有建立海外殖民地與利用強大的軍備滅亡他國，對比後來西方國家在地理大發現時代之後四處建立殖民地與滅亡當地國家的舉動，來證明中國古代戰略文化與儒家文化的一致性、具有愛好和平的本質，異於西方國家的侵略性。這些均為不察明朝所處的地緣政治結構與真實歷史發展的錯誤說法。但鄭和下西洋並不能證明明朝的大戰略與戰略文化具有愛好和平的本質，**明史**很清楚地指出明成祖派遣鄭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是「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宣天子詔，因給賜其君長，不服則以武備之」，鄭和的艦隊亦在麻六甲海峽建立重要的海外基地以維持其遠航的補給，雖然沒有建立殖民地，卻將當地不服從的華商集團全部殲滅；**明史**又記載鄭和出航之後「交阯已破滅，郡縣其地，諸邦益震讐，來者日多」，這樣的行為再加上海外基地的建設，仍稱得上一定程度的海外擴張，而「耀兵異域」更與儒家傳統的「耀德不觀兵」完全背道而馳，鄭和的最後一次遠航，則是明宣宗認為「以踐阡歲久，而諸番國遠者猶未朝貢」。¹⁴⁵因此鄭和下西洋即使與西方國家的擴張方式不同，也有非常濃厚的強制外交(coercive diplomacy)意涵，根本不是「酷愛和平」的儒家戰略文化之表現。而明朝能在成祖初期六次北伐蒙古與併吞越南，除了國力強盛與對國內有堅強的控制之外，也肇因於越南內亂與蒙古嚴重分裂，可是明成祖的攻勢/擴張大戰略卻未能成功以武力搭配政治與經濟柔性手段，導致其擴張與對蒙古的用兵其實都是失敗收場，而且對國力損耗極大，¹⁴⁶在他死後明朝不得不立刻全面的戰略緊縮。

除了這兩種極端之外，大多數的結構都不能使這兩種趨於極端的大戰略居於主導，而且實際上大多數時候的中國決策與戰略菁英是秉持嚴夷夏之防地緣政治密碼。這樣的帝國雖然不追求建立完全的霸權體系與領土大規模擴張政策，但仍因抱持使用武力統一九州的组织戰略文化，敵視外族的民族情感，以及意欲取得有利的防禦地勢而重視武力的效用，強現實政治戰略次文化依然居於主導地位，其大戰略主流類型則以積極的攻勢防衛型與安撫型兩者為主，比較消極的大戰略類型是如班固所謂的「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靡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¹⁴⁷至於比較積極的防禦類型則是盡量將防線往外推的攻勢防禦。值得注意的是，嚴夷夏之防的密碼要產生較為消極的地緣戰略，必須配合地緣政治結構與模式。例如東漢、北宋的首都分別位於黃河中游的洛陽與開封，遠離草原地區的威脅，但卻是華夏文明的中心與當時的重要戰略樞紐，處於所謂的「四戰之地」，自然使戰略菁英較忽略對草原地區的經營而重視對中原的控制，北宋尚且喪失河西走廊與鄂爾多斯，並面

¹⁴⁵ Louise Levathes, *When China Ruled the Sea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4), pp. 88-98; (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前引書，頁 7766-7768；陳鴻瑜，「明朝與馬六甲王朝之關係：戰略前沿的建立和喪失」，**漢學研究**，第 28 卷第 4 期(2010 年 12 月)，頁 139-169；王冬青，「論鄭和下西洋與明成祖的威懾外交戰略」，**江蘇社會科學**(江蘇省南京市)，第 1 期(2005 年)，頁 205-211。

¹⁴⁶ 札奇斯欽，**北亞游牧民族與中原農業民族間的和平與戰爭**，前引書，頁 99-100

¹⁴⁷ 語出**漢書·匈奴傳**文末，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漢書并附編二種**，前引書，頁 3834。

臨嚴重的沙漠化，更使其難以採取積極的地緣戰略。¹⁴⁸唐朝中期以後的首都雖然仍位於關中，但由於安史之亂的影響，「防胡」的嚴夷夏之防密碼取代了初唐與盛唐的華夷一家密碼，加上中唐以後面臨內部嚴重的藩鎮割據與國力衰退，遂使其地緣戰略方向轉回九州之內而非草原地區，首都同樣位於關中的西漢初期，也是因為國力衰弱與頻頻面對諸侯王的叛亂而無法採取較積極的地緣戰略。北京雖然同樣靠近草原地區，但明朝遷都於此後，因為國力不斷下降、失去北京的塞外前進據點等因素，使其地緣戰略在嚴夷夏之防密碼的雙重影響下，幾乎是最消極的一統帝國。

反過來說，在帝國成立初期等武力較為強大，或帝國國力較充沛的時期，即使體系層級密碼是嚴夷夏之防，防衛型大戰略也經常因為決策菁英秉持一統九州的周邊密碼，而具有較積極的攻勢傾向。例如北宋初年在單極結構中的北伐行為，¹⁴⁹以及宋神宗試圖藉由變法增強國力以後的開疆拓土戰略。明朝則是一個特例，其立國時的戰略觀乃基於元朝打破一千多年華夏文明凌駕異族的傳統，反過來統治中國的屈辱民族記憶，以及曾受過皇帝(明英宗)曾為敵人擄掠而去的慘痛戰略教訓的帝國，與外族的和議始終是非到武力完全無法解決威脅的無奈狀況下，或除非對方主動求合的情況下才採納的政策選項，除此之外明朝對外戰略的一貫現象是視國力的變化與敵我力量的消長而在攻勢防禦與消極防禦之間調整，並不因為其不鼓勵對外發展的戰略傳統而使主導行戰略次文化轉為柔性。例如明太祖在**皇明祖訓**中列出 15 個「不征之國」，實為考察當時的地緣政治環境與元朝的歷史經驗所得的教訓而來，因為「不征」的原因是「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而他放棄征討不願入貢的日本原因則是明朝沒有征討日本的原因乃是明太祖「終鑑蒙古之轍，不加兵也」。¹⁵⁰可是明太祖並未放棄其他現實主義外交政策與對武力的信任，這一方面表現在他為了蘇門達臘島上的三佛齊庇護胡惟庸餘黨並阻礙麻六甲海峽以西國家朝貢明朝，而藉暹羅唆使三佛齊的宗主國爪哇派兵將其消滅的行為上，¹⁵¹二方面則是明朝再度修築長城、模仿北魏在長城周邊配置稱為「九邊」的軍鎮等建立穩固防線的措施，¹⁵²而這些邊鎮如大寧、東勝等的位置甚至進入草原地區。

¹⁴⁸ **續資治通鑑長編**記載宋臣曾布稱：「朝廷出師常為西人所困者，以出界便入沙漠之地，七八程乃至靈州。既無水草，又無人煙，未及見敵，我師已困矣」。(宋)李燾撰，**續資治通鑑長編**，前引書，頁 1298-1299。

¹⁴⁹ 宋太宗除了與遼的戰爭之外，在 980 年試圖以武力將已經被宋太祖承認為藩屬國的交趾再度收為版圖，又在 982 年對西北邊藩採取削藩政策，導致党項羌藩屬叛變。

¹⁵⁰ (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前引書，頁 8343-8344。

¹⁵¹ 陳鴻瑜，「明代鄭和下西洋的先行者：尹慶」，**歷史月刊**，第 22 期(2006 年 6 月)，頁 98-100。

¹⁵² 明朝早在 1372 年就因在「嶺北之役」中為北元所大敗而轉變為攻防並重，開始建立後來有名的邊防體系「九邊」。Waldron,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pp. 76-79；韋占彬，「明代“九邊”設置時間辨析」，**石家莊師範專科學校學報**(河北省石家莊市)，第 4 卷第 3 期(2002 年 9 月)，頁 44-47；鄧沛，「明代“九邊”考述」，**綿陽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四川省綿陽市)，第 18 卷第 4 期(1999 年 8 月)，頁 57-59；田澍、毛雨辰，「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明代西北邊鎮研究述評」，**西域研究**(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烏魯木齊市)，第 2 期(2005 年)，頁 105-108；(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前引書，頁 2235-2236。

表 4.1 一統帝國時期中國對外用兵記錄

朝代	攻擊性對外戰爭	防衛性對外戰爭	攻防混和對外戰爭
秦(西元前 221-前 207 年)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西元前 221 年征服閩越。 2. 約西元前 218 -前 214 年間南征華南與越南北部, 將其納為領土。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西元前 214 年北伐匈奴。
西漢(西元前 202 年-9 年)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西元前 133-前 90 年, 漢武帝時期對匈奴的戰爭, 第二度征服鄂爾多斯, 並將帝國領土與九州概念拓展至河西走廊, 同時開使用兵西域與中亞。 2. 西元前 112-前 111 年, 消滅南越國, 併吞兩廣與越南中北部。 3. 西元前 110 年滅閩越。 4. 西元前 109-前 108 年滅衛氏朝鮮, 佔領大同江以北的朝鮮半島。 5. 西元前 71-前 60 年, 攻擊漠北並完全控制西域。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西元前 200 年漢、匈白登之役。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西元前 63-前 60 年, 與青海地區羌族之戰。
東漢(西元 25-225 年)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西元 58 年進攻西羌。 2. 西元 73 年-76 年進攻北匈奴與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西元 107-118 年第一次羌亂。 2. 西元 119 年-144 年第二次羌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西元 124 年、126 年、137 年與 151 和北匈奴於西域交戰。

	<p>西域。</p> <p>3. 西元 89-91 年擊破北匈奴。</p> <p>4. 西元 94 年聯合烏桓與鮮卑攻擊北匈奴。</p>	<p>亂，發生於關中。</p> <p>3. 西元 159 年第三次羌亂。</p>	
<p>隋(西元 581-619 年，取樣範圍自西元 589 年隋朝統一中國起)</p>	<p>1. 西元 598 年第一次征討高句麗。</p> <p>2. 西元 608 年-609 年攻擊青海與河西走廊的吐谷渾。</p> <p>3. 西元 612-614 年三次征討高句麗。</p>	<p>1. 西元 599 年防禦突厥。</p> <p>2. 西元 600 年防禦突厥。</p> <p>3. 西元 605 年防禦契丹。</p>	
<p>唐(西元 618-907 年，紀錄上包含武周，但不包括半獨立的河朔三鎮與契丹等北方民族的戰爭)</p>	<p>1. 西元 629-630 年滅東突厥。</p> <p>2. 西元 640-648 年，征服高昌、焉耆、龜茲等西域諸國。</p> <p>3. 西元 641-646 年滅薛延陀。</p> <p>4. 西元 644-645 年、647-648 年，唐太宗進攻高句麗。</p> <p>5. 西元 655-662 年，唐高宗進攻高句麗。</p> <p>6. 西元 660-663 年，與新羅聯合滅百濟。</p> <p>7. 西元 666-668 年，唐高宗滅高句麗。</p> <p>8. 西元 720 年進攻後突厥汗國。</p>	<p>1. 620-626 年抵禦東突厥。</p> <p>2. 西元 638 年松州之戰抵禦吐蕃。</p> <p>3. 西元 642 年在新疆哈密抵禦西突厥的進攻。</p> <p>4. 西元 682-716 年，與後突厥汗國的戰爭中採取守勢，並於河套建築以三座受降城為核心的防禦體系。</p> <p>5. 西元 696 年，在河北抵抗契丹的入侵。</p> <p>6. 756-779 年，抵抗吐蕃、南詔</p>	<p>1. 西元 670-676 年，唐朝與新羅在朝鮮半島的戰爭。</p> <p>2. 西元 670-702 年，與吐蕃爭奪西域的安西四鎮與青海高原北部。</p> <p>3. 西元 714-729 年，與吐蕃在西域、青海高原等地發生戰爭。</p> <p>4. 西元 737-748 年與吐蕃在青海高原發生戰爭。</p> <p>5. 西元 786-808 年，與吐蕃爭奪但最後失去對西域的控制。</p>

	<p>9. 西元 751 年發動與阿拉伯帝國的怛羅斯之役。</p> <p>10. 西元 844-866 年，乘吐蕃崩潰之機，重新收復被吐蕃佔領的西部領土。</p>	<p>兩國聯合對長安城、長安以西領土、四川與雲南的侵攻。</p> <p>7. 西元 829-830 年，抵抗南詔對四川的攻擊。</p> <p>8. 西元 859-870 年，南詔攻擊唐朝在廣西與越南的領土。</p>	<p>6. 西元 793-802 年，與南詔聯合進攻吐蕃。</p>
<p>北宋(西元 960-1128 年，取樣自西元 979 年滅北漢統一中國起)</p>	<p>1. 西元 979、986 年兩度北伐遼朝，企圖攻奪燕雲十六州。</p> <p>2. 西元 980 年征安南。</p> <p>3. 西元 1072-1085 年，熙河開邊與攻擊西夏。</p> <p>4. 西元 1075-1077 年攻擊安南。</p> <p>5. 西元 1094-1099 年進攻西夏與青唐吐蕃。</p> <p>6. 西元 1103-1106 年進攻西夏與青唐吐蕃。</p> <p>7. 西元 1114-1119 年進攻西夏。</p> <p>8. 西元 1120-1123 年與金朝聯合滅遼。</p>	<p>1. 西元 986-1004 年防衛遼之入侵。</p> <p>2. 西元 984-1006 年與党項爭奪鄂爾多斯。</p> <p>3. 西元 1038-1044 年防禦西夏的進攻。</p> <p>4. 西元 1064 年防禦西夏的進攻。</p> <p>5. 1087-1089 年防禦西夏與青唐吐蕃的進攻。</p>	<p>1. 西元 651-657 年，唐朝先防禦西突厥的進攻，後消滅西突厥。</p>
<p>元(滅南宋後至北京為明軍攻)</p>	<p>西元 1281 年，第二次進攻日本。</p>	<p>西元 1299-1300 年，應藩屬國</p>	<p>西元 1277-1285 年，招降緬甸</p>

<p>陷，西元 1279-1368 年)</p>	<p>西元 1282-1283 年，進攻占城。 西元 1284-1285 年、1287-1288 年，蒙古第二次與第三次對安南發動進攻。 西元 1292 年，進攻爪哇。 西元 1300-1301 年，以「未奉原正朔」為名義，進攻位於今日泰國北部的「八百媳婦國」。</p>	<p>緬甸之請，派兵攻擊緬甸境內的叛亂與反元組織。</p>	<p>失敗而引發與緬甸的戰爭，緬甸第一年先入侵元朝，爾後元朝整軍攻入緬甸境內，迫使緬甸請和。 西元 1287 年，利用緬甸內亂與殺死元朝雲南王任命的官吏之機會，攻入緬甸，將緬甸正式納為藩屬。</p>
<p>明(西元 1368-1644 年)</p>	<p>西元 1372 年，明軍佔領甘肅與河西走廊。 西元 1381-1382 年攻陷元朝統治下的雲南。 西元 1404 年開始在遼東以北設立軍事性質的衛所，但以當地部族為主，1434 年廢棄。 西元 1405-1433 年，鄭和下西洋。 西元 1406 年在新疆設立哈密衛。 西元 1407 年併吞越南，1427 年放棄。</p>	<p>西元 1449 年，土木堡之變，並在北京抵禦瓦剌的進攻。 西元 16 世紀，抵禦蒙古韃靼汗國及其後各部落的南侵。 西元 1523 年起，在沿海地區清剿倭寇。 西元 1592-1598 年，救援被日本入侵的朝鮮。 西元 1599-1600 年，播州之役鎮壓苗族。 西元 1616-1644 年，抵抗後金/清的進攻。</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西元 1370-1372 年進攻北元但僅佔領漠南之地，且於 1372 年大敗之後在北方重新構築長城防禦北元。 西元 1387-1388 年，連續兩次攻擊北元，並奪得遼東地區。 西元 1406-1422 年，鎮壓原先臣服於明朝的蒙古兀良哈三衛。 西元 1409-1424 年，明成祖五次遠征蒙古的韃靼與瓦剌。
<p>清(入關後至鴉</p>	<p>1. 西元 1646 年征服</p>	<p>1. 1685-1686 年，</p>	<p>1. 西元 1690-1697</p>

片戰爭前，西元 1644-1840 年)	漠北喀爾喀聯盟。 2. 西元 1755-1759 年滅準噶爾。	清朝與俄羅斯的邊境戰事。	年，康熙帝與準噶爾汗國之間的戰爭。 2. 西元 1716-1720 年，雍正帝與準噶爾汗國間的戰爭。 3. 西元 1762-1769 年清緬戰爭。
----------------------	------------------------------------	--------------	---

註：攻擊性對外戰爭係指中國為了奪取領土、要求對方完全臣服等擴張性政治目的而主動發起的對外戰爭；防禦性對外戰爭則指中國遭遇外敵之攻擊，主要在本國領土進行防禦戰的戰爭；攻防混和對外戰爭則指三種狀況：第一種是中國發動以消除邊境威脅為目的，卻沒有佔領對方土地或徹底擊敗對方的戰爭；第二種是中國先遭受對方攻擊，但在反擊階段奪取對方土地、甚至完全擊敗對方，實際上成為擴張行動的戰爭；第三種則是與競爭對手爭奪原先屬於中國勢力範圍的戰爭。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相關記錄繪製。

不過在決定採用防衛型與安撫型並用的大戰略之前，通常必然經歷過在決定性會戰中遭遇慘敗，如西漢初的平城之戰、宋太宗在十年內(979 與 986 年)連續兩次慘敗於遼，以及明朝初年(1372)在「嶺北之役」遭北元擊潰等重大戰役，均產生無法攻勢性使用武力戰勝異族、達成戰略目標之鮮明戰略經驗與認知，必須轉向以防禦態勢或和談應對外敵之威脅，是一種無奈之舉；¹⁵³或長期戰爭仍不能消滅對手的情況，例如西漢在武帝時期與匈奴在長期戰爭後國力大為衰退，匈奴卻仍然有一定的實力且不肯屈服；¹⁵⁴或本身出現政治危機、無法全力對外等帝國國力嚴重衰退的情況，導致無法採用攻勢/擴張大戰略的戰略經驗，例如中唐因為安史之亂已經削弱了國力，吐蕃又趁機奪取唐朝北方重要的半農半牧產馬地與關中周邊的戰略要地，還為了防備「河朔三鎮」及其他對中央採取敵對態度的節度使而不得不將兵力集中於國內。¹⁵⁵至於明朝則面對明太祖設立的草原前進據點

¹⁵³ 史記·匈奴列傳記載呂后與大臣討論是否要對匈奴改為武力應對時，諸將皆曰「以高帝賢武，然尚困於平城」，遂仍與匈奴和親。北宋則於岐溝關會戰與其後續的陳家谷、君子館兩場會戰中繼續慘敗後，弭兵論由爭論應否採取內政導向大戰略收復燕雲十六州，轉為主和與主守的論調，大戰略態勢也由攻勢與防禦態勢的爭論，轉為純粹討論如何防禦。馬持盈，*史記今註*，前引書，頁 2910-2911；曾瑞龍，*經略幽燕*，前引書，頁 268。嶺北之役慘敗對明朝地緣戰略性質之影響見趙現海，「洪武初年甘肅地緣政治與明朝西北疆界政策——由馮勝“棄地”事件引發的思考」，頁 79-80。

¹⁵⁴ 據漢書·匈奴傳之記載，西漢在漢武帝期間每每經歷一段較長時間不出擊匈奴，與漢武帝最後不出擊匈奴的原因，乃是「漢士物故者亦萬數，漢馬死者十餘萬匹。匈奴雖病，遠去，而漢馬亦少，無以復往」、「自貳師沒後，漢新失大將軍士卒數萬人，不復出兵」。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漢書并附編二種*，前引書，頁 3774、3781。

¹⁵⁵ 所謂「河朔三鎮」，語出兩唐書，指盧龍、成德、魏博等華北平原三大藩鎮，安祿山即以盧龍

為明成祖所放棄，又遭逢土木堡之役的大敗的結果。無論情況如何，威脅迫使帝國運用安撫型與防衛型混合的大戰略。前者主要是和親、¹⁵⁶貿易與歲幣等三種。和親的用意在於以家族觀念牽制外族的侵略性政策，貿易與歲幣之用意則在滿足外族經濟上所需，二者的目的皆在降低侵犯的動機。但安撫型戰略手段最後的目的是否帶有希望異族能漸漸臣服於華夏，則每個帝國並不一致，西漢具有這種想法，¹⁵⁷但北宋則無，而且強烈反對和親，只藉由輸送歲幣、開放貿易，並承認遼、夏兩國對以往屬於九州範圍和中原王朝北方戰略要地的燕雲十六州、鄂爾多斯與河西走廊的合法統治和其他政治安排措施。¹⁵⁸

至於那些無法對中國的國家安全與天下觀政治秩序原則構成重大利害關係的小國，或天下以外的行為者—即處於「化外」之地的行為者，通常是必須通過海洋才能抵達中國，例如東南亞與印度、中東、西歐國家；或者在中國已知世界範圍之外，與中國沒有真正互動的行為者，例如羅馬帝國—中國決策與戰略菁英通常抱持漠不關心的態度，亦缺乏瞭解的興趣，¹⁵⁹而以安撫型戰略手段相待，將

節度使身份發動叛變。唐朝在平定安史之亂的過程中未直接攻入只有收撫，因此三鎮在安史之亂後賦稅不入唐朝，節度使也由地方自行擁立，更有自己的一套官制，完全不受唐朝中央節制，唐文宗時的宰相牛僧孺稱「范陽自安、史以來，非國所有」，杜牧也說「國家自天寶盜起，河北百餘城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無敢窺者」。河朔三鎮根據地的河北對唐朝的重要性在於「國家無河北，則精甲、銳卒、利刀、良弓、健馬無有也。卒然夷狄驚四邊，摩封疆，出表裏，吾何以禦之？是天下一支，兵去矣。河東、盟津、滑台、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以塞虜衝，是六郡之師，嚴飭護疆，不可他使，是天下二支，兵去矣。六郡之師，厥數三億，低首仰給，橫拱不為，則沿淮已北，循河之南，東盡海，西叩洛，經數千裏，赤地盡取，才能應費，是天下三支，財去矣。鹹陽西北，戎夷大屯，嚇呼臆臊，徹於帝居，周秦單師，不能排辟，於是盡鐘吳、越、荊楚之饒，以啖戎兵，是天下四支，財去矣…焉有人解四支，其自以能久為安乎」。長江中下游精華區則因靠近開封周邊運河的淮西、淄青兩大藩鎮的敵對態度，使唐朝必須時常注意其潛在威脅，不得不依賴中原藩鎮，實行「以方鎮御方鎮」的戰略，雖然消滅了淄青與淮西，並使河朔三鎮不敢發動叛亂，但中原藩鎮也成為尾大不掉的遺患，據張國剛的統計，唐朝中原藩鎮的動亂共計 52 起，僅次於河朔藩鎮。見(清)仁宗敕撰，**欽定全唐文**(臺北：匯文出版社，1961 年)，頁 9885；張國剛，**唐代藩鎮研究**，增訂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 年)，頁 50-53。

¹⁵⁶ 和親雖然從西漢起就開始作為主要的柔性戰略手段，但並非只用於對外戰爭無法取勝時才勉強作為講和手段的屈辱象徵，唐朝在強盛時期的和親記錄相當多見，證明這也是一種可用於攻勢戰略中的手段，不過這可能也跟唐朝皇室的胡化有明顯的關係。但是在北宋時，從一般戰略菁英至皇帝等級的決策者，在嚴守華夷之辨的同時均認為和親是華夏文明對外至為屈辱的象徵，寧願多給歲幣也不願和親。李華瑞，**宋夏關係史**，前引書，頁 356。

¹⁵⁷ 根據**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之記載，劉敬認為這樣的安撫手段的最終目的在於「兵可無戰以漸臣也」。馬持盈，**史記今註**，前引書，頁 2728。

¹⁵⁸ 澶淵之盟中，政治安排是宋朝確立稱遼朝為「北朝」，並自稱為「南朝」的對等地位，國書上則稱「大宋皇帝謹致誓書於大契丹皇帝闕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58**)，往後宋遼之間的國書皆以大宋皇帝與大契丹皇帝互稱，這是繼西漢初年承認匈奴單于與中國皇帝的對等地位之後的第二次實踐。不過雖然許多史學家一致表示澶淵之盟確立了宋朝皇帝為「兄」，遼朝皇帝為「弟」，以及宋朝皇帝稱呼遼聖宗母親為「叔母」的皇室關係安排，但誓書上並未出現，史書對宋遼皇帝以兄弟相稱的記載首見於**續資治通鑑長編**引用慶曆年間遼興宗勒索宋朝土地所致的國書。(宋)李燾撰，**續資治通鑑長編**，前引書，頁 1299、3229-3230。

¹⁵⁹ 古代史書對於周邊異族的記載都相當簡略，甚至有許多國家合為一傳者，帝國主要敵人的紀錄亦大多僅分上下兩傳，日本學者重野安繹就曾尖銳批評這種鄙夷他國的自大心態：「吾每閱漢士史乘，治所謂外國傳、異域志，未嘗不嗤其自小。彼以中土自居，而儼然臨萬國」，姚瑩亦稱：「自來言地理者，皆詳中國而略外夷…凡諸正史，外夷列傳，多置不觀」。鎖國情況嚴重的明、清時代對外國更不屬於理解，儘管耶穌會傳教士引入大航海時代之後日趨精進的世界地圖與地理

其與中國的和平交往作為展示帝國與皇帝德威遠播天下的象徵，因此也不會有併吞這些國家的念頭。但也正因為這些國家在鴉片戰爭之前，除了日本在 1590-1597 年很短暫的時間之外，與中國沒有真正的利害關係，因此不可將中國對待這些國家的方式視為中國戰略文化的本質與偏好的大戰略類型。

第五節、地緣戰略遺產

中國古代數千年戰略經驗遺留給當代中國戰略菁英的首要遺產，就是天下觀造成中國古代戰略菁英自視中國為主宰東亞國際體系核心的天朝上國的超強乃至霸權身份認同，以及強烈的九州一統觀念等兩大心理。其次則是具備彈性外交與重視武力在國際事務中效用的內政導向戰略文化。

上述兩大遺產具體來說，可再概分為三種地緣戰略遺產。第一種完全的歐亞大陸地緣戰略方向與徹底的陸權帝國地緣戰略思想，幾乎沒有任何值得一提的海洋戰略思想與海權觀念，幾乎所有海上戰略活動都是附屬於陸戰的需求之下，或是為了將帝國的威望伸展至整個體系的目的，從來沒有一種海上戰略活動的目的與近代西方海權思想一樣，是結合國家地緣戰略目標、社會結構變化與經濟發展的產物。而這主要當然是受到東亞地緣政治結構，以及上述受結構影響的天下觀、地緣政治密碼的指導，以及中國古代帝國過早發展出能夠直接向最底層農民徵稅的強大官僚體系國家機器，使得農民成為稅收主力與兵源最主要的來源，農業文明安土重遷的性格與重農抑商思想又進一步阻止中國戰略菁英重視國際貿易對帝國的重要性，結果使得地緣戰略方向主要都是與國家政治核心的安危密切相關，幾乎沒有受到經濟動機的影響，這導致歷代的周邊地緣政治密碼類型雖無不同，地緣戰略方向卻因中國內部政治地理變化與主要威脅來源方向的互動而有所差異。第二種遺產則是由於天下觀之影響，使得中國戰略菁英完全缺乏體系均衡之概念，在先秦之後甚至也失去了以聯盟維繫競爭性權力平衡的戰略思想。至於第三種遺產則是中國在純大陸觀點的戰略文化與地緣政治密碼影響下，完全沒有發展出本身的海洋戰略傳統。而最後一種遺產則是中國可以在力量較為衰弱時暫時放棄天下觀的核心意識型態，與主要競爭對手乃至潛在敵人維持極為友好與對等的雙邊關係，以待在力量對比發生改變時迅速拋棄這種友好關係，重新恢復追求建立天下觀理想國際體系的「計算」戰略思考與作為。

一、徹底的陸權式地緣戰略與歐亞大陸重心

知識，但除了少數例外，大部分中國戰略菁英的普遍態度是如明史·卷 326·外國七所顯示的：「其說荒渺莫考，然其國人充斥中土，則其地固有之，不可誣也」，或如四庫全書總目對職方外紀和坤輿圖說的評述：「所紀皆絕域風土，為自古輿圖所不載…所述多奇異不可究詰，似不免多所誇示」、「疑其東來以後，得見中國古書，因依訪而變換其說，不必皆有實跡」。(清)張廷玉等撰，明史，頁 8459；(清)紀昀編纂，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館，1979 年)，頁 1495、1498；重野安繹與姚瑩之語引自章清，「晚清『天下萬國』與『普遍歷史』理念的浮現及其意義」，二十一世紀雙月刊(香港)，總第 94 期(2006 年 4 月)，頁 57。

中國古代帝國的地緣戰略方向首先都是指向九州內部而非外部，這是因為如同王緝思所言，與其說作為一個國家，中國即使在現代都更像是一塊「大陸」(continent)而非一個國家。¹⁶⁰假使在現代互動能力與政府控制力如此先進與深入的條件下都仍然如此，古代中國自然更符合王緝思的說法，因此任何一個帝國的地緣戰略方向首先都必須指向「九州」內部而非外部，只有如此才能使本身因為一統九州、消除所有邊緣地域的競爭者，而在政治上獲得「天朝」的正統地位，並因取得全部的歷史核心區與精華區而使帝國經濟能進一步更加繁榮。以及更有利的對外防衛態勢。

西周、秦、西漢、隋、唐等五個朝代皆都於黃土高原的關中盆地，而該地區西北自西周以來就是戎族的根據地，游牧民族容易透過蕭關道和靈州道，自鄂爾多斯與河西走廊發動攻擊，因此這些朝代特別重視鄂爾多斯與河西走廊，對於離關中較為遙遠的滿州、朝鮮半島等地區就沒有那麼重視，除非西北邊患已經平息，否則東北不會是地緣戰略之主要方向。¹⁶¹而東漢、北宋這兩個分別定都於洛陽和開封這兩個黃河中游都市的朝代，由於發生核心區東移，使其對西北邊患的重視遠不如上述五個朝代，特別是北宋由於草原領域同樣發生核心區轉移，由位於滿州的遼與金取代位於蒙古高原的游牧帝國，比起沒有面對草原區核心東移的東漢來說更加重視東北方之邊患，¹⁶²西北方的西夏對北宋而言是次要的戰略方向，北宋甚至可以放棄漢、唐甚為重視的鄂爾多斯。至於先都南京、後都北京的明朝，不僅中國的核心已經完全轉移至東方，明初最大威脅的北元亦位於滿州，其後一統蒙古諸部的「韃靼」亦位於蒙古東部，加上遷都北京與放棄蒙古東部和鄂爾多斯的前進據點後產生北京極端不利防禦邊患的戰略地理特性，¹⁶³導致明朝的戰略重心全面轉移至東北，¹⁶⁴西北邊疆與北宋一樣不斷從鄂爾多斯後退。

¹⁶⁰ Wang Jisi, "China's Search for a Grand Strategy: A Rising Great Power Finds Its Way," *Foreign Affairs*, Vol. 90, No. 2(March/April 2011), p. 79.

¹⁶¹ 陳寅恪稱此為「關中本位主義」與「東北消極戰略」。見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前引書，頁 147。

¹⁶² 北宋對遼、夏二者的威脅認知是不同的，一般咸認為遼是北宋最嚴重的亡國威脅，懷有根本的恐懼，不過因為澶淵之盟的緣故，北宋長期以來對遼實際上沒有什麼龐大的國防負擔；至於西夏完全不構成北宋的亡國威脅，北宋在戰略上始終蔑視西夏，可是由於沒有一個類似澶淵之盟的有效外交手段安排宋夏間的領土與經濟地緣政治利益，造成西夏不斷以經濟、政治等理由侵擾北宋邊界，加以北宋始終有意圖收復西夏佔領的河西走廊「漢、唐中國舊疆」，導致西夏在國防上對北宋造成的負擔遠遠超過遼。李華瑞，**宋夏關係史**，前引書，頁 334、338-342、352-354；陶晉生，**宋遼關係史研究**，前引書，頁 119。

¹⁶³ **明史**·卷 91·兵三稱北京的戰略地理形勢為「三面近塞」。根據**史記**·匈奴列傳之記載，難於防守的地理劣勢早在西漢時就迫使漢武帝放棄北京以北的造陽：「棄上谷之什辟縣造陽地以予胡」。顧祖禹認為若要定都北京而無後患，就必須保有內蒙古、鄂爾多斯與遼東的前進據點，使之發揮如同鄂爾多斯與河西走廊拱衛關中的防衛態勢，但明成祖先後將明太祖時社立的大寧、開平、東勝等「衛所」放棄或內撤，「視遼左如秦越」，導致北京的戰略地理態勢更加惡劣，明朝既然疲於防衛北京，自不可能再將地緣戰略重心置於西北或其他方向。馬持盈，**史記今註**，前引書，頁 2921；(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前引書，頁 2235。

¹⁶⁴ 定都關中與定都北京所造成的核心區轉移對地緣戰略方向之影響，見於明朝地理學者王士性的論述，其稱：「前代都關中，則邊備在蕭關、玉門急，而漁陽、遼左為緩。本朝都燕，則邊備在薊門、宣府急，而甘、固、莊、涼為緩」。(明)王士性撰，**廣志譯**(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 12。

離核心區最遠的中南半島和雲貴地區除了西漢初的南越國、8世紀中葉崛起的南詔，以及清朝中期的緬甸王國之外，從未興起對中國構成實質威脅的國家，因此在中國古代幾乎從來不是地緣戰略重心所在。這主要基於三個原因：

第一，由於雲貴與中南半島的兩個地緣政治區離中國的核心區、政治中心與經濟精華區的太過遙遠，雖然氣候條件嚴重限制了中國歷代在該地的軍事行動，但氣候條件(由熱帶地區朝溫帶進攻的氣候障礙)與這些地區和「九州」之間的多重巨大自然地理障礙同樣限制南方國家對中國的威脅－南越國最多只威脅到西漢的長沙國南境，即今湖南省與廣東省交界大庾嶺山脈，南詔對唐朝的邊境威脅則僅限於唐朝在四川、雲貴的領土，至於緬甸王國僅與清朝在雲南地區交戰，三個地區皆離關中、華北與長江中下游非常遙遠，不若游牧民族從北方可立即直逼關中與華北。更不用說與中國隔著南海相對的菲律賓與巽他群島。

第二，南方相對偏狹的幅員與破碎的地形，加上與九州之間有龐大的地理障礙，文化與技術交流不若草原與華北容易，發展相對北方較為緩慢，使其不易形成強大的國家，且南越國、南詔、緬甸王國三者的時代彼此皆相距超過八百年，不像北方游牧民族始終是中國的強大威脅。

第三，南方國家與中國之間不存在像北方游牧民族與中國之間為了爭奪鄂爾多斯、河西走廊等對中國來說是戰略要地，對游牧民族而言是生存與發展必須的精華區與核心區的地緣戰略衝突，南方國家的地緣戰略方向反而是彼此在中南半島上的競爭，只有南詔與南越國曾經攻擊漢、唐的領土，但其目的不是為了朝北方擴張並威脅那些帝國的政治核心以從中獲得戰略利益，南越國的目的在獲取西漢對其獨立地位的尊重與承認，南詔雖然以唐朝包括四川在內的西南領土作為擴張目標，但其方向在晚唐時也一度轉向唐朝的交州(越南中北部)，¹⁶⁵而交阯/安南、緬甸的主要對象大多同為中南半島國家的占城、暹羅等國，中國的華南領土非其主要擴張方向，其與北宋、清朝等兩個帝國雖有領土糾紛，但這種糾紛的擴張性質遠比不上游牧帝國與中國之間的戰略要地爭奪。

二、缺乏均衡之概念與以聯盟維繫競爭性權力平衡的思想

上述三個因素使得中國古代的地緣戰略出現一種明顯的南北差異－北方由於是核心區與政治中心所在，離威脅來源非常接近，又存在難以解決的地緣戰略衝突，因此北方是地緣戰略重心所在，武力的使用相當明顯，柔性手段的運用也經常帶有濃厚的強制外交意圖或利益考量，絕非單純的「德化遠人」政治宣傳。反之，南方由於遠離核心區與經濟精華區，在力量對比上又遠不如中國，加上幾乎不存在類似北方那種難以解決的兩種文明之間的地緣戰略衝突，使得南方國家雖然同樣被視為禽獸般的蠻夷，卻因威脅性遠小於北方國家而在大多數時代中不受中國的重視，中國古代的區域地緣政治密碼的聯盟對象，也幾乎全是北方游牧民族或朝鮮半島的政權，以對抗主宰草原領域游牧帝國的威脅，只有唐朝為了對

¹⁶⁵ 王吉林，*唐代南詔與李唐關係之研究*(臺北縣：黎明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2年)，頁335-353。

抗吐蕃才將南詔作為聯盟戰略的一部份。¹⁶⁶

類似現象亦可見於塔里木與哈密兩盆地的西域國家。由於新疆的氣候環境遠不適於華夏文明發展，但準格爾盆地的溫帶草原氣候與塔里木盆地的溫帶沙漠氣候卻與蒙古高原一致，因此蒙古高原的游牧帝國透過準噶爾盆地對該地實施政治控制比起中國有更大的戰略優勢。¹⁶⁷這導致當蒙古或中亞存在強大的游牧帝國並將政治與軍事威脅滲入塔里木盆地時，該地的綠洲農業國家或唐朝後期因氣候寒冷化而新出現的游牧－貿易國家經常會選擇在政治上向中國稱臣，一方面是換取中國的保護與援助以抵抗蒙古高原或中亞的游牧帝國由準格爾盆地發動的威脅，二方面則基於經濟理由的考量－從中國之處得到草原領域無法生產的經濟與民生必須產品，以及大絲路的貿易利潤。

這使得天下觀所強調的理想和諧國際秩序以及內政導向戰略文化中的安撫型大戰略與柔性戰略手段因此只有在上述兩個方向才能得到較完整的實踐，而且似乎呈現一種基歐罕所謂的「和諧」國際關係－行為者在追求本身利益時，其政策剛好能幫助其他行為者達成政策目標的現象－¹⁶⁸西域以及特別是農耕領域南方的國家大多數時候願意在追求本身的政策目標與國家利益時在表面上對中國臣服以換取來自中國的政治、軍事、經濟援助或減輕來自中國的戰略壓力，而此種表面臣服也正好能滿足中國對華夷一家理想的滿足。¹⁶⁹不過這樣的思想所產生的是帝國式穩定而非體系均衡之概念，甚至也算不上霸權穩定式均衡。蓋此一國際秩序強調華夏政權(天子)在整個東亞國際體系中的絕對領導地位，秩序原則是華夏政權為「君」，異族行為者為「外臣」的君臣與內外關係，不允許其他民族分享「君」在體系中的領導政治地位，畿服、冊封、朝貢制度皆是此種思想的具體展現。¹⁷⁰所謂的和諧大多只針對中國而言，其他國家未必真正感受到是一種和諧的秩序，因為雖然他們的「朝貢」滿足了中國的心理感受，但中國卻未必願意達成這些國家之所以「朝貢」的真正目的，更何況所謂的「朝貢」在大多數時候

¹⁶⁶ 資治通鑑·卷 233·唐紀 49 記載唐德宗宰相李泌向德宗建議消弭唐朝最大外患吐蕃的聯盟戰略：「回紇和，則吐蕃已不敢輕犯塞矣。次招雲南，則是斷吐蕃之右臂也。雲南自漢以來臣屬中國，楊國忠無故擾之使叛，臣于吐蕃，苦於吐蕃賦役重，未嘗一日不思復為唐臣也。大食在西域為最強，蔥嶺盡西海，地幾半天下，與天竺皆慕中國，代與吐蕃為仇，臣故知其可招也」。楊家駱主編，*新校資治通鑑注*，前引書，頁 7505。

¹⁶⁷ 姚大中，*古代北西中國*，前引書，頁 223-225。

¹⁶⁸ 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51.

¹⁶⁹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西域是中國作為對抗蒙古高原或準噶爾盆地游牧帝國的重要前進基地，因此這些國家的臣服中國雖然形成和諧秩序，在中國屬於政治中心位於關中的時代很容易遭到中國的直接併吞或遭遇嚴格的政治控制，但農耕領域南方的國家除了離核心區最近、而且作為抵抗吐蕃重要盟友之一的南詔之外，並沒有這樣的現象。

¹⁷⁰ 雖然從這一點來看，中國古代以天下觀為基礎的聯盟戰略思想比較接近基歐罕與奈伊所主張的，基於國際體系中存在的階級化秩序，利用聯盟來建構國際規範與秩序，進而維護聯盟內部的穩定。但是從畿服制度防衛原則：「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很明顯地在天下觀與畿服制度的基礎下，儘管存在「聯盟」，但這個聯盟中的每個行為者政治地位連在法律上也完全不平等，至少美國絕對不會認為被基歐罕與奈伊等人認為已經規範化的北約，其功能為美國「守土」。由此即可知天下觀的理想和諧國際秩序僅是對華夏文明而言，對其他民族與行為者是否同樣具有「和諧」的意味，仍頗有商榷之餘地。

只是中國內部的翻譯，外國可能根本沒有朝貢的意思。¹⁷¹

中國在先秦之後的中央集權大帝國模式與自視為體系核心的天朝上國，對地緣戰略的另一個遺產是不重視聯盟戰略的運用以及聯盟對體系穩定的重要性。由於權力平衡在中國歷史上始終沒有深入戰略菁英的思想並發展成類似歐洲地緣政治次體系在文藝復興時代以後那樣的國家政策，甚至進一步發展為維護體系穩定功能的「制度」，導致戰國後期的思想著作如**韓非子**等便批判認為同盟足以維持國家安全，甚至實現本身地緣政治標準程序的觀念，認為國家安全的首要應在內平衡之努力。¹⁷²中國古代戰略思想對於聯盟戰略固然還是有其重視之處，「天子守在四夷」就是一種理想中的聯盟戰略，而畿服、冊封與朝貢體系則是對理想的實踐。然而在帝國時代，中國既是體系的核心，依照天下觀的秩序原則，邏輯上不存在「君」與他國(臣)締結同盟共同對抗另一行為者(臣或不服)的可能，只有「君」直接「懲罰」「臣」或「不服」，或「命令」「臣」征討「叛臣」或「不服」，或協助「臣」平息其外部安全威脅。換言之，帝國時代在天下觀秩序原則的影響下，與外族之間不存在先秦時代普遍的正式平等國際軍事同盟，而是塑造成君臣關係，是否能被視為聯盟大有疑問。雖然中國戰略菁英還是能熟練運用異族盛衰的連環性來制訂對外戰略，但此一看似權力平衡運用的行動實際上只是謀略運用，再加上華夷一家的密碼在盛唐朝之後幾乎消失，更使以後長達一千多年的時間，傳統上鄙視異族的中國古代戰略菁英對利用同盟維持體系穩定的外平衡方式持相當保守的態度，先秦之後各帝國與他國所謂的「盟誓」，幾乎都是以雙邊和談為目的而非著眼於權力平衡之運用，這使得吾人熟悉的聯盟性質與維繫權力平衡和體系穩定之功能幾乎不存在於帝國時代的中國戰略菁英思想中。

帝國時代只有在國力不足以達成戰略目標時才會考慮同盟的必要性，但此時的同盟與穩定體系沒有關係，也不具備維持保持競爭性平衡的功能，因為其目的是要推翻體系既有的現狀。然而，此種同盟雖然因為帝國力量不足而較具備平等的性質，且中國能提供其「盟友」亟需的正常雙邊國際貿易，但政治與經濟方面的誘因並不足以長久維持聯盟，尤其是當原先的共同威脅消失—如唐與南詔、北宋與金、南宋與蒙古的聯盟—或中國本身對聯盟並沒有積極意圖—如北宋與高麗的抗遼同盟—或中國在對共同目標的戰爭中傷害到既有盟友的利益—如北宋與青唐的同盟—時，同盟不是無疾而終—北宋與高麗—就是使中國本身轉而成為原來盟友的新攻擊對象，有時則因中國戰略菁英視異族盟友為臣屬的心態，也經常助長邊境文武官員在互動過程中以各種方式虐待對方人民與官員，致使同盟關係惡化甚至完全消失。此外，華夏文明對於國際間所謂的「盟」，無論是春秋時期的神靈崇拜性質，¹⁷³或戰國以後的人文主義，其概念相當混雜，既有作為信心建立措施的一部份，有時又將其視為國家之間的同盟，不過一致的部分則是普遍認為

¹⁷¹ 葛劍雄，**統一與分裂**，前引書，頁 88-89。

¹⁷² 見**韓非子·五蠹**第四十九。韓非，**韓非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頁 156-157。

¹⁷³ 關於中國古代對「盟」的神靈崇拜特徵與「盟」字在人際關係中所代表的約定關係演進，見呂靜，**春秋時期盟誓研究**，前引書，頁 55-67。

既然「盟」，就代表國家必須「守信」，¹⁷⁴如此一來就在國際關係中注入了極高的個人與一般道德成分，雖然華夏文明的戰略菁英從對春秋歷史的瞭解中，自己也知道「背盟而克者多矣」，¹⁷⁵但由遠古神靈崇拜轉換而來的道德守信概念，還是使其下意識地認為盟約必須具有堅定的永久性。這樣的概念在帝國進一步依天下觀轉換為君臣關係，或其他具有上下之分的家庭成員關係，如父子、兄弟、翁婿等，更助長了同盟應該是長久的觀念。這種違反聯盟性質的觀念，不僅危害了維持聯盟應有的經營努力，使中國因聯盟破滅而受害時，加深了中國戰略菁英對聯盟的不信任。

中國古代對均衡的概念則更為缺乏。誠然，均衡是一相當近代的概念，但中國在先秦的列國體系而非一統帝國時期亦不乏相關實踐。春秋時期的兩次弭兵之盟已經接近今日的均衡概念，流傳下來的第一次弭兵之盟的約文稱：「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就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驚往來道路無壅塞，謀其不協而討不庭」；¹⁷⁶列國亦將盟、會作為重要的國際協定與爭端協調機制，尤以黃河流域諸國先後以齊、晉兩霸主國為主導的盟會為成熟，皆為均衡的類似實踐。¹⁷⁷第三章亦提及**司馬法**，仁本篇也有類似霸權穩定式均衡體系運作原則的描述：「王、霸之所以治諸侯者六：以土地形諸侯；以政令平諸侯；以禮信親諸侯；以材力說諸侯；以謀人維諸侯；以兵革服諸侯。同患同利以合諸侯，比小事大以和諸侯」，可以發現這是利用滿足各國地緣政治利益以達成各國均能接受的安排的明顯作法，同時利用協作性權力平衡來維繫安排。而諸侯之間的集會則是多邊國際建制，利用集會來解決體系內的安全問題：「會之以發禁者九：憑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禽獸行，則滅之」。¹⁷⁸而第一次弭兵之盟的約文型式對爾後中國的國際盟誓影響甚大，漢元帝時西漢與匈奴呼韓邪單于的盟約即與此有相類之處：「自今以來，漢與匈奴合為一家，世世毋得相詐相攻。有竊盜者，相報，行其誅，償其物；有寇，發兵相助」，¹⁷⁹而西元 229 年吳國與蜀漢的盟誓文與第一次弭兵之盟更加類似：「自今日漢、吳既盟之後，戮力一心，同討魏賊，救危恤患，分災共慶，好惡齊之，無或攜貳。若有害漢，則吳伐之；若有害吳，則漢伐之」。¹⁸⁰

這些記載證明中國戰略菁英至少在先秦時代也曾發展出類似的概念與實踐。但這樣的均衡概念在大帝國形成之後一方面受制於為了核心區安全的需要而朝邊緣地帶擴張，侵奪了游牧民族重要的精華區而引發嚴重的領土與政治地緣政

¹⁷⁴ **左傳**·成公 11 年記載晉國大夫范文子對盟在國家安全中的功能性解釋：「齊盟所以質信也，會所信之始也。始之不從，其何質乎」。李宗侗註譯，**春秋左傳今註今譯**，前引書，頁 691。

¹⁷⁵ 語出**左傳**·昭公 22 年。同上註，頁 1237。

¹⁷⁶ 同上註，頁 692。

¹⁷⁷ 呂靜，**春秋時期盟誓研究**，前引書，頁 114-139；劉伯驥，**春秋會盟政治**（臺北：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62 年），頁 242-243、245-246。

¹⁷⁸ 王雲璐註譯，**新譯司馬法**，前引書，頁 15、17。

¹⁷⁹ 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漢書并附編二種**，前引書，頁 3801。

¹⁸⁰ 楊家駱主編，**新校三國志附索引**，第 4 版（臺北：鼎文書局，1980 年），頁 1135。

治利益爭端，另一方面最重要的則是因為「天朝」的自我認知確立而被拋棄，既然帝國與其他異族行為者之間的關係為君臣，而「君」的地位又由華夏所獨佔，即不可能與其他國家合作處理東亞體系的安全問題，即使是在外交行為上公開承認體系中有平等對立的其他強大行為者的西漢與兩宋等時代也不存在這樣的概念，因為戰略菁英心中還是排斥此種與異族的平等關係，假使在國際安全議題上站在平等立場合作無非自毀天下觀之原則，對明朝這樣的帝國而言更隱含喚起元朝以異族統治整個華夏的民族恥辱。故超強間的合作僅有劃分勢力範圍或規定並立的兩強之間如何降低衝突、增加互信已穩定雙邊關係的互動方式，¹⁸¹在這樣情況下能達成的是雙方決策者之間經由互信與道德層次建立的暫時性穩定，既非由於權力平衡運作生效，更非均衡，很容易由於決策者變更或同一決策者在想法上的變化而破壞穩定。

三、缺乏海洋與海軍戰略思想

最後，古代中國的地緣戰略對於海洋可說絕對的忽略，甚至也很少承認其軍事價值。這一方面肇因於地緣政治結構的三種客觀條件：

第一，東亞的大陸部分相當完整，除了渤海灣之外幾乎沒有什麼深入陸塊的海灣存在，不像歐洲擁有許多大型海灣，可以相當迅速地從海上前往歐陸的大部分地區。第二，中國歷代一統或分裂時代主要的政治中心，如關中、太原、洛陽/開封、北京、成都等，皆深入內陸遠離海洋，只有作為東吳、東晉、南朝與明朝初年首都的南京較為靠近海洋，以及南宋首都臨安(杭州)直接位於海岸線上。第三，第一島鏈上的國家與中國之間存在巨大的文明發展程度差異，島鏈區的國家除了爪哇與日本之外從未成為古代東亞地緣政治體系中的主要國家，但由於東海與南海都相當寬闊，島鏈區距離中國古代帝國的核心區太過遙遠。於是，海洋既然在絕大多數時代遠離中國的政治中心，而海洋之外並無強大國家存在，海洋便從來不是中國古代國家安全的主要威脅來源，只有南宋因為臨安的地理位置使其必須時刻警備來自海上的攻擊，而曾建立一支常備海軍並重視其發展。

第二，天下觀對西周以來歷代一統帝國與分裂狀態下的各國的首要地緣戰略意義，就是華夏戰略菁英與決策者都繼承了同樣基本概念的天下觀，認為最主要的戰略重心位於中原，必須首先控制中原、其次一統九州，才能宣稱自己的合法天子地位與隨之而來的政治權利與權力。反過來說，天下觀主流思想將海洋視為天下的盡頭，海外的世界除了能從陸上抵達者，而且是中國古代實際有所接觸的

¹⁸¹ 西漢初期與匈奴之間的約定是「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以長城為界的規定一直流傳至西漢後期，匈奴雖然在漢宣帝之後逐漸淪為事實上的漢朝屬國，但在名義上仍與漢朝對等，為了解決漢匈之間相互逃亡的臣屬問題，雙方立下的條約規定是：「中國人亡入匈奴者，烏孫亡降匈奴者，西域諸國配中國印綬降匈奴者，烏桓降匈奴者，皆不得受」。北宋與遼在澶淵之盟的盟約除了歲幣之外的規定是：「沿邊州軍，各守疆界，兩地人戶，不得交侵。或有盜賊逋逃，彼此無令停匿。至於隴畝稼穡，南北勿縱驚騷。所有兩朝城池，並可依舊存守，洵壕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創築城隍，開拔河道」。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漢書并附編二種*，前引書，頁 3762、3818；(宋)李燾撰，*續資治通鑑長編*，前引書，頁 1299。

天下之外的行為者如唐朝的阿拉伯帝國(大食)與佛教發源地印度(天竺)之外，都是不值得前往的化外之地。¹⁸²這樣的思想不僅導致限制古代中國的戰略重心始終位於東亞大陸的農耕領域，也使得帝國中負責規劃與制訂大戰略的決策與戰略菁英對開拓遠隔海洋與沙漠、雨林、高原等巨大地理障礙的東亞之外的世界毫無興趣，對於中國的海洋運用造成比地理環境更為嚴重的傷害。

第三，最重要的是西方海權思想甚為重視的海上貿易與國家經濟結合之必要條件幾乎從未在中國古代出現。儘管從先秦時期起，中國沿海地區就與日本、朝鮮等地有所交通，其後自漢朝起至明、清時代，南方的廣州、泉州、福州、寧波、杭州等沿海地區就一直有興盛的海外貿易，唐宋時期之後的中國更是重要的歐亞海上貿易幹線之起點，¹⁸³但中國在此海上貿易中的地位其實是經濟資源產地而非極端需要產品消費的市場，再加上亦可選擇由華北出發的貿易線，對海上交通線的重視程度自然不如歐洲國家。加上海上貿易從來就不是華夏國家與帝國富國強兵的主要手段，也不是國家經濟與皇室財富的首要支柱，佔有東亞大陸的精華區與重視小農經濟才是。既然經濟需求不需海上貿易即可滿足，海上貿易當然無從與國家經濟發展相結合，更不可能如西方海權國家那樣成為經濟主幹。¹⁸⁴

雖然唐朝以後中國的精華區完全轉移至長江中下游與華南，後者在兩宋與明朝以全國十分之一的土地卻聚集了一半左右的人口，但其本身多山地少耕地的自然環境卻不可能僅靠農業來供養如此繁多的人口，必須依靠貿易與商業的幫助，¹⁸⁵導致北宋時中國的海外貿易開始快速發展，到南宋時更因失去華北以及與金朝的戰爭打斷原有的經濟運作，農業與手工業產出銳減導致財政收入嚴重收縮，而更加致力於貿易與商業方面的彌補，成為中國歷史上最發達的時代，海外貿易的收入佔全國財政總收入也兩度來到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5%。¹⁸⁶南宋的強大常備海軍某種程度上來說是古代中國由於海上貿易、經濟與科技發展的結果，但這樣的比重與後來的西方海洋國家相較仍然太低，而且南宋的社會結構、政治制度與哲學思想並未隨之改變，無法真正產生保羅甘迺迪所謂經濟與科技發展所產生的改變動力對國家的社會結構、政治制度、軍事權力，與形勢的影響，¹⁸⁷自然仍無法產生海權地緣政治思想與以控制海上交通線為基礎的制海權戰略思

¹⁸² **鹽鐵論**記載賢良文學稱直斥戰國時期鄒衍主張整個中國僅是龐大天下中其中一州，而天下與中國範圍相仿的各州皆由海洋分隔的「大九州說」為荒謬，稱「近者不答，焉能之瀛海？故無補於用者，君子不為；無益於治者，君子不由」。盧烈紅注譯，**新譯鹽鐵論**，前引書，頁672。

¹⁸³ 古代東亞地緣政治結構中的海上交通線，可參考席隆飛、楊熺、唐錫仁主編，**中國科學技術史**，前引書，頁318-346。

¹⁸⁴ 此種觀點在學術界中很早就出現，華勒斯坦在建構其世界體系理論時也曾有這種主張，見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I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4), pp. 52-63.

¹⁸⁵ Jung-Pang Lo, "The Emergence of China as a Sea Power During the Late Sung and Early Yuan Periods," *Far Eastern Quarterly*, Vol. 14, No. 4, Special Number on Chinese History and Society (August 1955), p. 498.

¹⁸⁶ Jung-Pang Lo, "Maritime Commerce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Sung Navy,"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Vol. 12, No. 1(1969), pp. 62-69.

¹⁸⁷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p. 439.

想。

雖然古代中國很早就體認到海洋的軍事價值，但這也是海洋對元朝以前古代中國唯一的戰略價值，而且由於經濟形式與戰略地理形勢之影響，海洋的戰略價值只停留在軍事戰略層次，而且在南宋之前多停留在輔助陸地進攻的層次，¹⁸⁸南宋雖然甚為倚重海軍之力量於國防與貿易保護，可是其海軍在國防體系中的地位仍附屬於陸軍之下，沒有長期且獨立的發展。¹⁸⁹元朝以後出現第二種海洋對古代中國的戰略價值—以王朝威望為主要目的，典型的表現如元朝屢次發動跨海兩棲登陸作戰進攻日本與爪哇以迫使這些國家加入其朝貢體系之內的行動，以及鄭和下西洋之類的遠洋冒險。

海權的發展除了地理環境之外，最重要的是其為以經濟為核心之社會運動，並延伸至政治制度層面之發展，沒有這樣的發展背景支持，單靠政府由上而下的力量很難發展出真正且成功的海權。¹⁹⁰何況中國古代帝國中央政府對海洋的認識僅在於輔助陸上軍事行動的價值，根本不足以發展出流傳後世的成熟海軍甚至海權戰略思想。明朝雖然一度為了鄭和下西洋的目的而將海洋的重要性提升到大戰略層次，但此種僅靠政府力量的發展，最大的弱點就在於非常容易隨決策集團的更迭而失去支持，元、明時代的戰略菁英並沒有真正瞭解海洋對國家大戰略的價值，因此儘管傾全國之力進行海上擴張行動，但這只是帝國中央政府單方面的戰略作為，其出發點僅具備高度的政治性，並不像後來西方的海洋國家是政治與經濟目的兼具，並與民間的海上商業行動相結合，並有相應的其他政治、社會制度改革的支持，導致海上威望行動嚴重違反天下觀與內政導向戰略文化，在還沒有發展出值得一提的海洋與海軍戰略思想之前就無疾而終。

雖然中國長江以南各地區的民間的遠洋航海與造船技術在宋、元、明三朝時相當先進，與後來地理大發現初期的西方海權國家相較毫不遜色甚至領先，¹⁹¹但這樣先進的技術、明朝初年與中葉倭寇對中國沿海安全的嚴重威脅，與明清時期福建、廣東人民不斷移民東南亞的海上活動，都沒有協助培養帝國的海洋意識並改造戰略菁英的天下觀。中國的地緣政治模式還是以傳統的農業經濟為主，海上貿易對經濟與中央政府稅收的比重和貢獻遠不及宋朝，更因為明太祖以其農民之出身與防止蒙元再度回到中國實施統治的民族恐懼，將明朝以後的帝國地緣政治模式以農業部門的需要為基礎，改造為缺乏彈性的極端政治中央集權與社會儒學

¹⁸⁸ 漢武帝征討衛氏朝鮮係採海陸同時從遼東半島與從山東越渤海直入朝鮮半島中部，滅東越時亦曾以海洋作為輔助進攻路線。**舊唐書·東夷傳·高麗條**記載唐太宗由陸路征討高句麗失敗後，亦謀由海上迂迴輔助陸地之進攻，於貞觀 22 年「命江南造大船，遣陝州刺史孫伏伽召募勇敢之士，萊州刺史李道裕運糧及器械，貯于烏胡島，將欲大舉以伐高麗」。最後，海軍在宋太宗與宋神宗時期都曾作為征討交趾的軍種之一，不過都沒有什麼值得一提的輝煌戰績。馬持盈，**史記今註**，前引書，頁 3000；楊家駱主編，**新校本舊唐書附索引**（臺北：鼎文書局，1976 年），頁 5326。

¹⁸⁹ 王青松，「南宋海防初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北京），第 14 卷第 3 期（2004 年 9 月），頁 98-107；王青松，「海軍在南宋國防中的地位與作用」，**南都學壇（人文社會科學學報）**（河南省南陽市），第 24 卷第 3 期（2004 年 5 月），頁 35-36。

¹⁹⁰ 張競，「另眼看海權：兼論三保抱憾碧波之由」，**中華戰略學刊**（2001 年冬季號），頁 173-186。

¹⁹¹ 關於宋、元、明三朝的航海與造船技術，請見席隆飛、楊燿、唐錫仁主編，**中國科學技術史**，前引書，頁 114-136、143-165、170-210。

道德化，¹⁹²進一步限制了民間海洋貿易可能的影響，此後帝國的海上事業都是以中央政府為主導，一旦明朝財政因為明成祖遠征蒙古、併吞安南與遷都北京而嚴重惡化，迫使以後的皇帝不得不實施緊縮政策，由政府推動的海上事業亦隨之無疾而終。遷都北京更使帝國的政治核心持續處於易受草原地區威脅的華北，使得帝國的地緣戰略仍維持大陸性，降低了對海洋的重視。

倭寇的威脅雖然協助明朝培養出強大的海軍，而且在打擊倭寇之上有過輝煌的戰績，甚至遠達菲律賓的馬尼拉，¹⁹³但一來倭寇並非有特定戰略目標的國家海上武力，也威脅不到內陸的政治核心區，使得明朝中央政府只要倭寇一平息就不再注重海上安全，¹⁹⁴甚至調用和挪用原來用於剿倭的人力與物力資源對真正威脅政治核心的傳統草原地區，導致海軍的發展與維護因此停滯與衰敗。二來則由於明朝戰略菁英始終沒有海洋意識，主要是以陸上陣地戰結合沿海海上島嶼攻奪來消滅倭寇，¹⁹⁵導致海軍空有遠洋作戰能力卻難以發揮，等到倭亂一平息，遠洋作戰能力也隨著海軍的衰敗而消失。三則雖然明朝、清朝已經與初步東來的西方海權國家葡萄牙、西班牙、荷蘭有所接觸與互動，但西、荷兩國的根據地—菲律賓、印尼與臺灣—皆屬於天下觀概念中的化外之地，西方人也在天下觀概念中被視為化外之民，本來就缺乏海洋意識的中國戰略菁英沒有瞭解這些海洋民族的興趣，在地緣政治結構沒有發生劇烈變動的情況下，僅有的少數官方與貿易互動根本達不到改變天下觀與中國地緣政治模式的作用，中國也就無法發展出海洋意識與海洋、海軍戰略思想，遑論流傳後世。

即使是後來的葡萄牙、西班牙與荷蘭海軍，雖然夾帶近代西方海權勢力東來，但其真正的戰略方向在美洲、印度與東南亞島鏈地區而非東亞大陸，故對中國東南沿海的侵擾也和倭寇一樣威脅不了北京，故倭寇雖然是明朝中期的國防重擔，但明朝地緣戰略方向不可能指向周邊海域，因此明朝海軍的任務最多只是近海防衛作戰，其戰略與作戰思想整體而言並非制海權理論中的海上交通線作戰。清朝雖然利用海軍消滅盤據臺灣的明鄭東寧政權，但在其利用明鄭降將施琅建立與領導本身的海軍之前，一開始還依靠荷蘭海軍來與鄭成功周旋，甚至想藉用荷

¹⁹² 黃仁宇，**中國大歷史**，前引書，頁 209-215、223-227。

¹⁹³ 根據 1575 年曾隨為了打擊海盜林鳳，而從馬尼拉前往福建謁見泉州總督與福建巡撫的使團的西班牙人門多薩(Juan Gonzalez de Mendoza)所著之**中華大帝國史**(*Historia del Gran Reino de la China*)之記載，使團最初是因為在馬尼拉外海遇見明軍艦隊一艘離開主艦隊搜尋海盜的戰艦，其後與艦隊指揮官聯繫之後，為了向明朝請求聯兵打擊林鳳以及希望建立西班牙與明朝友好關係而出動，當時泉州總督知道林鳳在馬尼拉被圍困時，曾提他可派遣五百艘甚至更多戰艦與所配屬的海陸士兵前往馬尼拉協助，但西班牙人表示以林鳳的情況與馬尼拉周邊的開發狀況，這麼多人毫無用處。而雖然最後明朝沒有派出任何以追剿林鳳為目的的艦隊，倒還是派遣了十艘戰艦護送西班牙人返回馬尼拉，而這支小艦隊的指揮官在馬尼拉甚至一度欲與林鳳交戰並將之擒拿。見孫家坤譯，Juan Gonzalez de Mendoza 編撰，**中華大帝國史**(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 年)，頁 145、166-172。

¹⁹⁴ **明史·兵三**記載「永樂六年…緣海捕倭，防備益嚴…十七年，倭寇遼東，總兵官劉江殲之於望海埭。自是倭大懼，百餘年間，海上無大侵犯。朝廷閱數歲一令大臣巡警而已」。(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前引書，頁 2244。

¹⁹⁵ 同上註，頁 2243-2249。

蘭之力協助其征服臺灣，¹⁹⁶而當臺灣被征服導致軍事需求不存在之後，本來就沒有意願發展海洋戰略與海軍的清朝也放棄了這方面的持續發展。這樣的情況都不可能發展出以制海權為基礎的海軍戰略思想，遑論有任何值得一提的海洋戰略古典基礎。

鴉片戰爭之前海洋真正留給中國的戰略經驗是所謂的「海防」與在大型內陸河流的作戰。但前者之經驗不是近代西方海軍戰略理論中依靠海軍作戰來達成防禦海岸線與海外商業之目的，而是「以陸制海」：或以禁止沿海地區居民在海上活動或甚至將沿海居民往內陸撤離的方式杜絕海上威脅對鄰近海岸線地區的攻击，或以陸戰為主、水軍為輔的方式來被動防禦海上威脅，以達成海上防禦之目的。如此的「海防」經驗自然不可能有利於對海洋的運用與培養海洋文化，進一步發展成海權思想。至於後者雖然是中國傳統水上作戰的主要場地，自春秋時代延續至清朝，而且有豐富的利用內河水軍發動攻勢作戰的戰史，但中國古代的內河「水軍」畢竟不是海軍，內河作戰環境亦與海洋相差甚遠，¹⁹⁷也不可能由此衍生出值得一提的海軍與海洋戰略思想。

第六節、小結

從地緣政治角度而言，中國古代是位於半封閉海域周邊的純粹陸權帝國，因此其地緣戰略是完全的大陸式思考與歐亞大陸方向，缺乏海洋戰略思維與海洋氣息。而以東亞地緣政治結構特徵為基礎塑造而成的天下觀，以及華夏文明的大陸農業本質混合而成的內政導向戰略文化進一步加強了中國古代帝國的陸權性格，直到鴉片戰爭之後才由於東亞地緣政治結構被納入全球地緣政治結構之中，導致中國本身的地緣政治模式與戰略菁英的世界觀發生改變，使得海洋戰略思想得以滲入中國戰略菁英的地緣戰略思考中，然而儘管結構與模式發生劇烈的變化，而且中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屢次蒙受缺乏海洋戰略思維導致在以海權為基礎的全球地緣政治結構中與對外戰爭中不斷失敗的慘痛教訓，可是由於中國本身的地理位置與數千年來異於其他地區的地緣政治模式發展，海洋思維對中國地緣戰略的影響還是相當緩慢。

藉由對內政導向戰略文化從先秦時期發源的發展分析，本章發現中國的戰略

¹⁹⁶ 清朝首次與荷蘭聯合(1663年)實際上是荷蘭先提出雙方結成同盟共抗明鄭，荷蘭本身的意圖則在與清朝貿易和收復被鄭氏父子佔領的臺灣，不過清朝在1663年時除了忙於解決內部問題之外，並沒有攻擊臺灣的意願，這使得清荷聯盟在迫使明鄭勢力完全退出大陸沿海、撤往臺灣後之後，清朝又重新實施嚴格的海禁並管制貿易，終結了與荷蘭的同盟。不過1679年清朝完全平定三藩之亂、穩固對中國的統治後，想乘勝以武力解決東寧政權，反而率先派遣使者請求荷蘭與其同盟，俾利用荷蘭海軍運送清軍越過臺灣海峽，但荷蘭因前車之鑑而拒絕，康熙皇帝也由於冗長的談判與等待而逐漸不耐煩，最後決定以清朝本身的力量進攻臺灣。Lo-Shu Fu, *A Documentary Chronicle of Sino-Western Relations (1644-1820)* (Tucson: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66), pp. 32-35, 52-55.

¹⁹⁷ 關於兩者的環境差異對作戰之影響，請參考高一中譯，Michael Lindberg and Daniel Todd 著，*近岸、近海及遠洋艦隊：自1861年迄今地理環境對海軍作戰之影響*(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5年)，頁121-124、306。

文化本質雖然信任武力在國際事務中的效用，但由於處於特殊的地緣政治結構之中，以及中國古代帝國始終沒有發展出管理一個龐大國家所需的近代數字化管理技術與系統，導致中國古代帝國無法在對外戰爭中徹底發揮強大物質優勢，而改為運用以武力為核心的間接戰略來應對大多數威脅，雖然這顯示中國戰略文化遺產並非完全的偏好武力擴張性，但也絕非徹底的非暴力本質或以文化道德性為主宰，畢竟間接戰略仍充滿高度的權力政治思考與政治擴張性，只是手段性質有所差異，而且尤其當所爭奪的目標同為華夏文明屬性或認為攸關九州一統的周邊地緣政治密碼時，以及決策者的地緣政治密碼屬於高度理想性的華夷一家時，強現實政治性質相當明顯，除非受到極為堅強之阻擋才會改變大戰略偏好。若不具備這種認識則無法解釋中國為何從黃河流域的文明圈擴大為包含許多相異文明與文化的龐大帝國。這顯示戰略文化如同格雷所說，是會隨著時間的演進，由於新經驗被吸收、內化與文化性地轉變而發生改變，儘管過程相當緩慢。¹⁹⁸格雷的觀察僅在於國家層次，從體系層次而言，則是地緣政治結構之變化，導致戰略菁英秉持的世界觀和地緣政治密碼之差異而發生改變。

如本章一再指出的，天下觀造成中國古代戰略菁英自視中國為主宰東亞國際體系核心的天朝上國。這種超強乃至霸權的身份認同，再加上強烈的九州一統觀念，導致中國古代帝國擁有非常可觀的對外用兵紀錄(表 4.1)。中國歷代一統帝國有極為豐富的對外用兵紀錄，無論是攻勢性、防禦性或攻防混和皆然，顯示內政導向戰略文化對武力在國際事務中效用的信任。不過從表 4.1 亦可發現，中國歷代一統帝國的對外攻勢作為除了秦朝與元朝之外，多在帝國本身建立一段時間後才出現。帝國成立最初數年乃至數十年的用兵記錄多偏重抵禦外敵的防禦性。很顯然地，元朝以外的中國古代一統帝國，其對外用兵現象符合內政導向戰略文化的特徵：只有當帝國國力符合內政導向戰略文化的期待，而且帝國對內統治已經穩定之後，對外用兵收復失土或建立符合天下觀理想的東亞國際體系，才會得到絕大多數人的支持而較易遂行。同時這也顯示，儘管中國古代帝國最後可能建立起朝貢體系，但是在這之前必然經歷過相當程度的對外攻勢用兵，特別是當體系中存在許多不願接納朝貢體系必須臣服於中國的階級化國際秩序，又能與中國長期對抗的其他強國時最為常見。可是在中國瞭解其無力建立符合其理想的朝貢體系時，儘管戰略菁英內心不願意，但中國是可以暫時放棄天下觀的理想，與其所歧視的異族建立起平等外交關係與密切的政經互動。但這種互動不代表中國願意真正站在對等立場與其他體系成員一起維持體系穩定，而只是史旺與泰利斯所謂的「安全計算」戰略的一種表現，一旦中國發現權力結構發生朝向有利於自己的改變，它可以輕易放棄既有的穩定關係，轉向以戰略攻勢建立以其為核心的國際體系。

在下一章，本論文將繼續使用第三章的地緣政治結構理論與本章的分析架構，進一步分析冷戰以及冷戰後的「單極加四強」全球地緣政治結構對中國戰略菁英的世界觀變遷和地緣政治密碼指導的影響，以及結構、中國地緣政治模式在

¹⁹⁸ Gray, "Strategic culture as context," *op. cit.*, p. 52.

當代的變化是否對古代內政導向戰略文化遺產的繼承與改變有所影響，以作為第六章正式分析當代中國地緣戰略的基礎。



第五章、當代中國地緣政治密碼與戰略文化

本章之目的為進一步分析作為地緣戰略產出過程中的干擾變數之當代中國的地緣政治密碼與戰略文化。不過既然地緣政治密碼與戰略文化皆受到地緣政治結構的影響，本章亦將分析當代地緣政治結構之特徵與模式，以作為進一步分析的基礎。

古代東亞地緣政治結構與在 19 世紀迅速被全球地緣政治結構所整合，華夏文明在東亞兩千年來努力建構的天朝體系秩序原則亦被西歐國家所建構的西發利亞體系全面取代。在不到兩個世紀的短暫期間，全球地緣政治結構形式的變化相當迅速：因拿破崙戰爭、殖民擴張與 19 世紀中葉和中國的幾次戰爭而形成的英國海權單極，逐漸因 19 世紀末美國、德國、日本等新興海軍國家的崛起與各自實施本身的標準地緣政治程序，而使結構的離心力大為加強，雖然英國海權單極持續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但英國迅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退出超強之列，結構在 1947 年之後正式成為美蘇對峙的海陸兩極，爾後又因為蘇聯在 1991 年 8 月的解體而轉變為目前的美國海權單極。

結構的特徵與模式也迅速發生變化。一方面，國際貿易、工業與支撐工業發展的科技力量取代農牧業成為大國最主要的力量基礎與財富來源，但工業化的經濟又極端仰賴原物料與市場來供應產品之生產與銷售，以及不可或缺的能源，此時佔全球表面積超過 70% 的海洋即在全球地緣政治結構中成為最主要的運輸路線，其戰略地位迅速取代以往各個分立的區域地緣政治體系中的傳統陸上戰略交通線。工商業之發展逐漸先後形成包括心臟地帶區域的歐亞大陸西半部、北美洲的美國與加拿大，和 1990 年代迅速崛起的東亞等三大核心區。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東亞所交會的三條海陸戰略交通線在 19 世紀並不存在：跨太平洋海上交通線是在 20 世紀先後由於日本崛起，與美國擴張其海軍並將勢力範圍經由奪得夏威夷、關島與菲律賓而進入東亞島鏈地區，以及美國在當時身為全球石油最大生產國，美日之間的戰略互動日趨緊密而最早成為戰略交通線，

¹並經由冷戰時的結構變化而進一步確立其地位。西伯利亞鐵路則在冷戰時期由於蘇聯成為超強並控制了易北河以東的歐洲，才在傳統的軍事運輸價值之外進一步成為連接心臟地帶、西伯利亞兩個資源生產區與中東歐市場區的戰略交通線。

¹ 根據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所編著的日軍對華作戰叢書所提供的資料，在 1941 年日本被美、英、荷三國禁運之前，荷屬印尼雖然是日本第二大石油進口地，卻遠遠比不上排名第一的美國，後者在 1934 年(昭和十年度)的比例為 67%，1936 年(昭和十二年度)升高至 74%，1938 年(昭和十四年度)更因日中戰爭全面爆發而陡然升至 90%。吳玉貴譯，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著，**戰前之大本營海軍部**(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0 年)，頁 562。

由印度洋經南海至東亞的海上交通線雖然從唐朝起就初步成形，並在 19 世紀成為歐洲國家從海路前往向東亞的必經之路，但由於東亞在冷戰之前並非全球地緣政治結構中的核心區，以及日本的主要市場發展方向與資源來源皆非東南亞而指向中國與美國，因此當時並不存在跨印度洋與東亞海上戰略交通線，必須等到冷戰後期因為亞洲四小龍的崛起與蘇聯勢力伸入印度洋，並在越南金蘭灣設立基地後才逐漸形成，尤其是中國、印度與東南亞的經濟發展迅速，成為重要的經濟資源區，以及中國在 1993 年以後逐漸成為能源淨進口國，²必須大量從國外進口能源，而中東與非洲又是中國最主要的海外能源進口地區等原因。³

另一方面，國家型態與體系秩序原則也發生改變。首先在國家層次，隨著古代帝國逐漸被民族國家取代，民族主義取代了對皇室的效忠成為凝聚國家最主要的向心力，國家則成為在整個社會中無孔不入之機制，現代社會的每個人都受到國家在各層面的嚴密控制。就體系層次而言，由西歐國家建立，以近代國際法為運作基礎的西發利亞體系配合與其一起發展之世界經濟體系，在 19 世紀完全取代了其他古代獨立運作的區域體系秩序原則，一方面使得全球地緣政治體系因世界體系對國家的經濟地位之劃分而改變了國家對體系秩序原則之概念，另一方面則西發利亞體系本身的秩序原則亦因兩次世界大戰之發生而逐漸限制戰爭在人類數千年歷史中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最後法則的功能與地位。

本章共分為四節，由於地緣政治密碼、戰略文化皆以地緣政治結構為下層物質基礎，故本章在第一節先依據第三章提出的地緣政治結構概念與變數，分析冷戰後的全球地緣政治結構與亞太區域地緣政治結構的地緣政治模式與特徵。第二節則分析結構變動對當代中國戰略菁英的世界觀以及受世界觀指導的地緣政治密碼之影響。第三節則分析當代中國的大戰略行為對古典內政導向戰略文化的繼承情況。第四節則為小結，總結本章研究結果，並作為與下一章正式探討當代中國地緣戰略與亞太地緣政治均衡的連結。

第一節、當代全球地緣政治結構與亞太區域地緣政治結構

根據第三章提出的地緣政治結構概念與劃分變數，冷戰以後的全球地緣政治結構係為美國為唯一的海權超強的單極結構，另外再加上歐盟、俄羅斯、中國、日本四個強權的「單極+四強」結構，而印度在結構中只能居於區域強國的地位。而當範圍縮小至亞太次體系時，則呈現「單極+三強」，即美國海權超強加上中

² 中國在 1993 年成為石油淨進口國，在 2006 年成為天然氣淨進口國，在 2007 年成為煤炭淨進口國。

³ 根據國際能源總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在 2011 年 2 月發佈的研究報告，中國在 2009 年的進口石油中有 47%來自中東、30%來自非洲，而 2010 年則分別為 44%來自中東與 32%來自非洲。見 Julie Jiang and Jonathan Sinton, "Overseas Investments by Chinese National Oil Company: Assessing the Drivers and Impacts,"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http://www.iea.org/papers/2011/overseas_china.pdf, p. 12.

國、俄羅斯、日本等三個強權，印度仍只位居區域大國的地位。

一、美國海權單極

蘇聯解體與歐盟成立使原先作為歐亞大陸主要精華區的蘇聯歐洲部分和東歐不復處於同一個政治勢力控制下－東歐完全脫離蘇聯/俄羅斯的控制，被歐盟與北約組織(NATO)納入歐洲整合，原來是心臟地帶一部份的領土如烏克蘭、白俄羅斯、高加索三國與中亞五國等地區已經獨立，烏克蘭甚至領導組織了「GUAM」這個區域性國際聯盟對抗俄羅斯對獨立國家國協(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CIS)的整合；⁴即使是在中亞，俄羅斯也必須面對中亞國家聯合並引入中國組織上海合作組織以平衡俄羅斯試圖藉由歐亞主義重新控制中亞的企圖。結果，蘇聯原來在冷戰時期藉由控制唯一的陸上戰略交通線：中亞鐵路－土西鐵路－西伯利亞鐵路與莫斯科－東歐鐵路網而成為超強，但其解體之後，俄羅斯無法藉由直接的領土控制或間接的國際組織支配力量來間接控制位於其領土之外的土西鐵路與中亞鐵路，更遑論控制已被歐盟所控制的波蘭與德國東部的鐵路網，只能控制境內的西伯利亞鐵路。這使得科恩所謂的歐亞大陸領域因為俄羅斯並未控制完整的戰略交通線而不存在。

中國雖然在冷戰後逐漸成為結構中的精華區，再加上在冷戰末期逐漸形成的日本、韓國、中華民國等「太平洋邊緣地帶」(Asia-Pacific Rimland)精華區，以及新興的東南亞國家協會(Association of South East Asian Nations, ASEAN)，使東亞成為全球地緣政治結構的新核心區。科恩將中國、北韓與中南半島的印度支那(Indo-China, 包括越南、寮國與柬埔寨等三國)合組為同時受到海洋與陸地綜合影響的東亞領域，有別於純陸權性質的歐亞大陸領域與純海權性質的貿易－依賴海洋領域。然而，中國在陸地上對於新出現的中亞鐵路－土西鐵路－北疆鐵路－蘭新鐵路戰略交通線也像俄羅斯一樣，只能控制本國內部的鐵路網，無法對中亞鐵路－土西鐵路實施任何具戰略意義的直接或間接控制。在海洋方面，中國也根本未能控制由東北亞至麻六甲海峽的海上戰略交通線－中國海軍迄今仍缺乏能在南海、東海與黃海建立制海權的航艦戰鬥群，在南海也缺乏夠堅強的前進基地以供艦隊前進作戰之用，使得中國龐大的軍事力量在交通線控制中即使不是無用武之地，也仍然無法真正發揮作用。反之，美國不僅在東北亞有日本、沖繩與南韓的基地可供使用，在東南亞也與新加坡、泰國有密切的戰略合作，可使用這兩個國家的海軍基地，特別是新加坡的樟宜海軍基地(Changi Naval Base, CNB)乃是東南亞唯一可供航艦泊靠的海軍基地，⁵更使中國迄今根本無力與美國爭奪東亞地

⁴ 「GUAM」是格魯吉亞、烏克蘭、亞塞拜然、摩爾多瓦四國在 1997 年成立的區域性聯盟，旨在對抗俄羅斯對獨立國家國協的主導整合，該聯盟以烏克蘭為領導國，保持親西方的立場。對中亞懷有野心的烏茲別克在 1999 年曾加入該聯盟，使其成為「GUUAM」，但 2005 年烏茲別克因為國內發生美國支持的反政府示威，而退出了該聯盟，使其又回到原始的「GUAM」。

⁵ Emma Chanlett-Avery, "Singapore: Background and U.S. Relations,"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s, February 25, 2011, <http://www.fas.org/sgp/crs/row/RS20490.pdf>, p. 5. 東南亞其他能泊靠美軍航艦的港口就只有馬來西亞位於麻六甲海峽中的「巴生港」(Port Klang), Michael Richardson, "Singapore welcomes US

區的海上戰略交通線控制權，因此不存在受中國支配的東亞領域。

唯一的地緣戰略領域只剩下貿易—依賴海洋領域，美國無庸置疑地擁有在各方面均遙遙領先他國的國力，提供其維持體系中最強大的交通線控制能力。整體而言美國的超強地緣政治屬性是海權，這使得當今的全球地緣政治結構形式乃是海權單極。美國的海權單極地位首先來自其擁有世界最強大的海軍，其次則加上北約、美日同盟、美韓同盟、美澳紐公約等同盟體系，盟國不僅協助強化美國對遠離其本土的海上交通線之控制力，也提供美國重要的前線基地以控制位於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海上戰略交通線。而儘管美國對印度洋海上戰略交通線的控制能力因為缺乏航艦母港與相對來說較少前進基地而不若對太平洋與大西洋的控制來得強，但由於得到巴林作為美國海軍第五艦隊總部所在地與基地，以及英國提供其位於印度洋中央的狄亞哥嘉西亞(Diego Garcia)基地，而本區也缺乏真正足以威脅美國控制權的強大海軍國家，⁶使得南亞次大陸以及印度洋周邊地區，迄今還是屬於貿易領域，不過也正由於美國對印度洋海上戰略交通線的控制能力不若其對太平洋、大西洋的海上戰略交通線那樣嚴密，而印度與中國同樣是一個對海洋具有極大野心的崛起中強國，而且印度並不像中國與歐洲那樣直接與美國正面相對，使得南亞以及其周邊的印度洋地區，在印度進一步強大之後具有發展成新地緣戰略領域的潛力。

至於對歐亞大陸戰略交通線的控制方面，雖然美國因為主導北約的緣故而得以插足由大西洋到黑海的歐洲大陸，不過這僅為歐亞大陸戰略交通線的其中一段而非全部，除非美國也有能力控制俄羅斯境內的歐亞大陸戰略交通線，否則無法視其已經控制歐亞大陸上的陸地戰略交通線。故雖然美國在各方面的影響力高居全球第一，但在地緣政治結構中仍不具備成為霸權的資格，使得目前的全球地緣政治結構是一個以美國海權為唯一超強的海權單極結構。

二、全球地緣政治結構中的四強

歐亞大陸乃是世界上面積、人口、國家數、資源蘊藏量均居第一的大陸，也是麥金德心臟地帶與史派克曼邊緣地帶的主要所在地，亦擁有歐洲、東亞兩大高度發展地區，使得陸地戰略交通線集中於此。儘管歐亞大陸上的陸地戰略交通線

aircraft carrier,”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March 22, 2001, <http://www.singapore-window.org/sw01/010322ih.htm>. 但馬來西亞雖然允許美軍航艦停泊巴生港，卻不沒有與美國簽署任何協定允許美國利用巴生港作為航艦戰鬥群或其他海軍艦隊在東南亞的作戰基地；反之，新加坡與美國在 1990 年即簽署了允許美軍使用該國設施的備忘錄，美國依此在 1992 年於新加坡設立了「西太平洋後勤指揮部」(Commander, Logistics Group, Western Pacific, COMLOG WESTPAC)。1990 年的備忘錄在 1998 年做了一次修正，新加坡宣布將為美國擴建樟宜海軍基地以容納航艦補給，並允許美國利用樟宜海軍基地作為其在東南亞的主要軍事存在基地，成為美國在 1992 年撤出菲律賓蘇比克灣(Subic Bay)後，在東南亞最重要的軍事基地與唯一的航艦基地，不僅可作為日本、關島與中東間的中途站，亦提供美軍監控東南亞局勢的最重要基地。請參考“Singapore Changi naval base,” *GolbalSecurity.org*, retrieved on May 26, 2011,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facility/singapore.htm>.

⁶ Andrew S. Erickson, Ladwig C. Walter III, and Justin D. Mikolay, “Diego Garc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Emerging Indian Ocean Strategy,” *Asian Security*, Vol. 6, No. 3(September 2010), pp. 214-237.

並未被美國，但歐亞大陸在蘇聯解體後迄未出現其他足以控制任一戰略交通線的超強，但卻擁有四個被陸地或海洋戰略交通線所連接，具有強大的國力但迄未發展出足以控制整條戰略交通線的強權，分別是俄羅斯、中國、歐盟與日本。

(一)、俄羅斯

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繼承大部分的前蘇聯領土，以及大部分屬於麥金德心臟地帶概念的區域。⁷心臟地帶的重要性在冷戰時期受到許多學者的懷疑，部分學者甚至認為麥金德在 1943 年提出三極結構的構想時，實際上已經承認心臟地帶並不足以成為統治世界的單極帝國的基礎，背棄了他長期以來的理論。⁸麥金德可能認為心臟地帶不足以成為霸權的基礎，但心臟地帶的潛力畢竟還是足以使蘇聯成為三極之一，亦為世界體系理論列入半邊陲國家，⁹心臟地帶的歐洲部分因此屬於結構的精華區與核心區。雖然在冷戰後心臟地帶上的政治勢力四分五裂，但其地緣政治價值依然相當巨大，而且因歐盟整合和中國崛起而有日益升高之勢。首先是獨立國協各國人口總和仍將近三億，並擁有巨大的能源蘊藏。俄國不僅仍是世界上領土最廣大的國家，也仍控制大半個心臟地帶，其軍事力量更不可小覷：擁有除了美國之外最大的核武力量，¹⁰以及世界第四位的軍隊人數，提供俄羅斯戰略交通線控制能力的基礎；俄羅斯位居歐亞大陸中央，境內的西伯利亞鐵路如第一節所述，是連接東亞與西歐的陸上戰略交通線中樞。但最重要的是俄國憑其大量能源出口，仍和 19、20 世紀之交一樣是重要的能源出口國，¹¹特別

⁷ 麥金德的心臟地帶範圍受整體國際戰略環境變化的影響，有多次變動。1919 年的概念是範圍最大的一個：西從易北河往東直達今日中國境內的內蒙古自治區全境，北從挪威向南直達喜馬拉雅山南部山麓。而 1943 年最後一次提出時，剔除了中歐以及葉尼塞河(Yenisei River)以東的西伯利亞地區(麥金德稱此地為 Lenaland)，其理由是這個地區太過地廣人稀(300 萬平方哩的土地卻只有 600 萬人口)，不足以列入心臟地帶。而始終屬於心臟地帶的區域包括今天的波羅的海三國、烏克蘭、白俄羅斯、葉尼塞河以東的俄羅斯與高加索三國。請參考 Halford J. Mackinder,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23, No. 4 (April 1904), pp. 429-430; Halford J. Mackinder, *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1996), pp. 69-74 and Figure 23 at p. 75, Figure 24 at p. 76; Halford J. Mackinder, "The Round World and the Winning of the Peace," *Foreign Affairs*, Vol. 21, No. 4(July 1943), pp. 598-599.

⁸ 冷戰時期，部分學者認為麥金德在 1943 年縮小心臟地帶範圍的舉動是他拋棄這個理論的開始，因為他發現心臟地帶根本不夠資格成為對國際權力平衡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戰略要地，Geoffrey Parker, *Western Geo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Sydney: Croom Helm Ltd, 1985), chapter 8

⁹ Peter J. Taylor, *Political Geography: World-economy, nation-state and locality* (Essex, England: Longman, Third Edition, 1993), pp. 82-85.

¹⁰ 根據「美國科學家聯盟」(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截至 2008 年的估計，俄羅斯分別擁有 14,000 件庫存核武與 5,192 件現役核武，這兩個數字都超過美國(5,400/4,075)。即使根據 2010 年 4 月簽署的美俄戰略武器限制條約(START)規定，兩國在未來七年內將消滅部署於洲際彈道飛彈與潛射洲際彈道飛彈上的核彈頭至 1550 枚的程度。這個削減過的數量在目前已超過其餘核武國：中國、法國、英國、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的各式飛彈核武彈頭總和的一倍以上，若加上非洲洲際彈道飛彈的彈頭，差距會更大。"Obama, Russian president sign arms treaty,"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Data as March 2008, 2011, <http://www.fas.org/nuke/guide/summary.htm>, accessed on June 5; CNN Wire Staff, "Obama, Russian president sign arms treaty," *CNN*, April 8, 2010, <http://edition.cnn.com/2010/POLITICS/04/08/obama.russia.treaty/index.html>.

¹¹ 俄國在 19 世紀末時曾因高加索石油的開發而成為當時僅次於美國的石油生產國。關於 19-20 世紀初俄國石油的生產與銷售情況，請參考薛鈞譯，Daniel Yergin 著，*石油世紀*(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1)，頁 36-40 及頁 98-101。

是歐盟和中國、日本的最主要能源供應來源之一，容許俄國在普欽(Vladimir Putin)總統時期利用俄國龐大的能源儲存推行「新重商主義」(Neomercantilism)以恢復俄國的經濟及提升俄國的國際地位。¹²

然而儘管俄國仍具備堅強的控制能力與巨大的潛力，在本文的地緣政治結構中還是不能賦予其極的地位，其原因正如上文所述，在於俄國無法控制完整的歐亞大陸戰略交通線，從莫斯科通往中歐的鐵路從波蘭起已經在歐盟控制之下，中國境內的鐵路固然不必說，即使是完全位於獨立國協境內的傳統戰略交通線中亞鐵路－土西鐵路－西伯利亞鐵路，全部的中亞鐵路與大部分土西鐵路如今位於哈薩克、烏茲別克、土庫曼等三國境內，俄羅斯無法實施直接控制。其次是關於聯盟形式的間接控制，俄羅斯雖然在 2002 年將其在 1992 年與部分獨立國協成員國簽訂的「集體安全條約」(Collective Security Treaty)改組為「集體安全條約組織」(Collective Security Treaty Organization, CSTO)，¹³甚至在 2009 年設立組織本身的快速反應部隊，¹⁴但無論是集體安全條約組織或獨立國協的政治與軍事整合均非第二個華沙公約，¹⁵不存在以完成標準程序和戰略交通線控制的一致戰略目標，¹⁶中亞鐵路所在的土庫曼更未加入集體安全組織，俄羅斯不僅無法完全一手掌握這些組織，更遑論將其轉變為如歐盟般具有部分超國家屬性的國際組織，允許俄羅斯對戰略交通線實施間接控制。

因此俄羅斯在目前只能在結構中屈居強權地位，不過俄羅斯在梅德維潔夫(Dmitry Medvedev)總統上台後更致力於將主導獨立國協的整合方向轉移至與安全相關的政治與軍事面，包括 2010 年 12 月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土庫曼、亞美尼亞、亞塞拜然等九國國防部長同意進行更進一步的軍事整合，¹⁷使得 2010 年被認為是獨立國協成立以來整合最具意義與最具里程碑意義的一年，¹⁸未來俄羅斯是否能藉由聯盟戰略再度恢復對任一歐亞大陸戰略交通線的控制，重新取得超強地位，值得更進一步的觀察。

¹² Charles E. Ziegler, "Neomercantilism and Energy Interdependence: Russian Strategies in East Asia," *Asian Security*, Vol. 6, No. 1 (January 2010), pp. 74-93.

¹³ 成員國包括俄羅斯、白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烏茲別克(一度退出，2006 年重新加入)、塔吉克、亞美尼亞等七國。

¹⁴ "CSTO's rapid-reaction force to equal NATO's - Medvedev," *RIA Novosti*, February 4, 2009, <http://en.rian.ru/russia/20090204/119984654.html>; "Russia and CIS Allies Create Military Bloc, Establish Joint Stabilisation Fund," *IHS*, February 5, 2009, <http://www.ihs.com/products/global-insight/industry-economic-report.aspx?id=106595885>.

¹⁵ "Collective Security Treaty Organization (CSTO)," *GlobalSecurity.org*,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world/int/csto.htm>, accessed on June 10, 2011.

¹⁶ 例如當俄羅斯在 2009 年 8 月準備在吉爾吉斯南部設立一個集體安全組織快速反應部隊的基地時，烏茲別克基於畏懼俄羅斯可能利用此一機會恢復在中亞的軍事地位的心理因素，便嚴詞抨擊俄羅斯的舉動。"Uzbekistan: Tashkent Throws Temper Tantrum over New Russian Base in Kyrgyzstan," *EurasiaNet.org*, August 3, 2009, <http://www.eurasianet.org/departments/insightb/articles/eav080409a.shtml>.

¹⁷ "CIS chiefs of staff want military integration," *RIA Novosti*, December 3, 2010, <http://en.rian.ru/exsoviet/20101203/161615698.html>.

¹⁸ "2010 a milestone for CIS," *RIA Novosti*, December 29, 2010, <http://en.rian.ru/analysis/20101229/161977847.html>; "End of 2010 Sees Increased Integration in CIS and CSTO," *Central Asia-Caucasus Institute*, December 22, 2010, <http://www.cacianalyst.org/?q=node/5472>.

(二)、中國

第二個強權是中國。中國在當代國際政治中的地位由於其強勁的經濟成長與軍事力量間的大幅落差而一直苦惱國際關係學者，本論文與區域安全複合體理論一樣將中國置於強權的地位，其原因首先在於東亞在冷戰後的發展已使其成為結構的精華區，並逐步朝核心區邁進，而中國的經濟發展與軍事現代化已經使其具備必要的力量基礎，再加上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政治地位，使其國際地位與地緣政治密碼都已脫離區域層級，朝向全球發展。但不可否認的，中國目前還不具備控制任何海陸戰略交通線的能力。就陸上戰略交通線而言，西伯利亞鐵路固不必說，中國西北部雖適於進入心臟地帶，¹⁹但中國並不能藉此控制土西鐵路與中亞鐵路，上海合作組織固然阻止俄羅斯重新將中亞整合為其勢力範圍，但俄羅斯同時也利用該組織限制中國在中亞的可能擴張行為。²⁰而擬議中的「新亞歐大陸橋」完工之日仍在未定之天；²¹即使完工之後中國可以擺脫目前對西伯利亞鐵路的依賴，但這條新歐亞大陸戰略交通線經過的國家更多，更容易受到其他超強、強權與區域大國的影響，中國更無法控制。

中國對海上交通線的控制同樣困難重重。雖然中國向海洋發展的自然環境遠優於心臟地帶或歐亞大陸北部，後者因深處內陸而使海岸線與海洋長期冰封，不適合向海洋發展，²²而中國周圍卻有兩條海上戰略交通線，首先是東亞海上戰略交通線，中國、日本、韓國、中華民國皆利用此海上交通線與東南亞、印度洋地區和歐洲相連進行貿易，美國也利用這一海上交通線調動其位於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間的海軍兵力。其次則是前往美洲的跨太平洋海上戰略交通線，對美國、日本、南韓、中華民國等國家特別重要，除了由此連接亞太與北美洲市場與中南美洲石油生產地之外，更重要的是美國藉此連結亞洲盟邦，是美國介入東亞事務的最直接路線。

¹⁹ 費爾格理夫在 1915 年曾分析過中國西北部的新疆、甘肅等省區與心臟地帶中亞部分的地理共通性，以及古代此區域的游牧民族如何利用此一地區的特性在這個地區建立起數個大帝國，反過來說，這也表示從心臟地帶容易進入東亞，因此在冷戰時期，東亞的大陸部分幾乎都受到心臟地帶的政治控制，難以取得獨立發展的地位與機會。目前東亞日趨重要則是心臟地帶政治力量衰退的結果。James Fairgrieve, *Geography and World Power*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Press, 1915), pp. 329-346.

²⁰ Maria Raquel Freire, "Russian Policy in Central Asia: Supporting, Balancing, Coercing, or Imposing?" *Asian Perspective*, Vol. 33, No. 2 (Summer 2009), pp. 125-149.

²¹ 所謂新亞歐大陸橋的走向實際上沒有明確的概念或官方定義，不過一般認為大致上分為南道與北道，南道大致上即中國與哈薩克、吉爾吉斯、烏茲別克等國家擬議中的亞歐國際鐵路線，以「中吉烏鐵路」為主，橫越歐亞大陸南部至裡海(Caspian Sea)後再經由伊朗與中東抵達歐洲。請參考李寶仁，「鐵路在地緣政治和周邊外交中地位和作用的思考」，*鐵道經濟研究*(北京)，2008 年第 3 期 (2008 年)，頁 11。

²² 近年來由於全球暖化的影響，以往全年冰封、不適合船隻航行，同時也被麥金德視為心臟地帶北方天然屏障的北冰洋(Arctic Ocean)，在未來逐漸能夠通行船隻。此種改變使得北太平洋和北極周邊各國無不對此敏感起來，因為從地理上而言，經由北極的大圓航線是最短的路線。加上北冰洋底下似乎也有豐富的能源蘊藏，使得各沿岸國與中國都開始正視這一地緣政治現實的新發展。請參考 Arvind Gupta, "Geo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Arctic meltdown," *Strategic Analysis*, Vol. 33, No. 2(March 2009), pp. 174-177; Linda Jakobson, "China Prepares for an Ice-Free Arctic," *SIPRI Insights on Peace and Security*, No. 2010/2, <<http://books.sipri.org/files/insight/SIPRIInsight1002.pdf>> (March 2010).

中國目前仍沒有足夠力量控制任何一條海上戰略交通線，最關鍵的原因在於缺乏足夠強大的艦隊，馬漢曾指出艦隊在海軍戰略中的地位比位置還更加重要，而中國不僅沒有前進基地，也最缺乏此一要素，結果使其雖然能利用其海上多層次戰略部署來試圖控制東海的海上戰略交通線，但此一戰略部署的有效涵蓋範圍僅約 350 公里，²³而從海南島至麻六甲海峽的南北長度卻超過兩千公里，但中國在南海中卻也沒有足夠強大的前進基地支援艦隊獲致制海權的作戰。至於跨太平洋海上戰略交通線則更不必說，中國根本無力與美國爭奪西太平洋的控制權，而且由於受到完全不屬於中國領土的「島鏈」區的阻隔，中國最多只能利用南海與東海的其他通道突破對美國發動突擊，²⁴但此種作戰正如本論文將在第五章分析的，並非獲致交通線控制權的作戰，只是對這些地區實施阻止敵人控制海上交通線、自己卻沒有意願也無力控制海上交通線的海上拒止(sea denial)，阻止美國海權單極持續干預中國在東亞的行動自由，因為中國根本沒有足夠的遠洋海軍，更完全沒有太平洋前進基地，不可能藉由控制太平洋戰略交通線來阻止美國。

(三)、日本

同樣位於東亞的日本作為強權的條件首先在於其巨大的經濟力量—2010 年之前均為世界第二位，2010 年之後才為中國所取代而成為世界第三，但中國超越日本的最主要利基在於其人口為日本的 11 倍左右—與雄厚的科技實力，提供日本作為發展交通線控制力的基礎。由於日本為一自然資源蘊藏相當缺乏的島國，迫使其極度依賴國際貿易以維持經濟發展，而且所有貿易都必須經由海上交通線才能發生，加上日本同時為跨太平洋與南海—印度洋兩海上戰略交通線的終點之一，使得海上交通線對日本國家安全具有絕對重要性。日本首要交通線控制力量即為其海上自衛隊。得利於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即身為世界第三大海軍國，擁有深厚的造艦能力與相關科技，加上冷戰期間從美國獲得更先進的潛艦與武器科技，²⁵使得日本海上自衛隊的實力遠超過其他亞洲國家：可運用於交通線控制戰的第一線各型主力軍艦達 47 艘，特別是其中 6 艘在性能上與美國阿雷柏克級(Arleigh Burke Class)神盾驅逐艦相當的金剛級與愛宕級神盾驅逐艦，以及兩艘東亞噸位最大的戰艦：日向級直昇機驅逐艦，²⁶再加上世界上最強大的柴電潛

²³ 廖文中，「中共廿一世紀海軍戰略對亞太區域安全之影響」，廖文中主編，**中共軍事研究論文集**(臺北：中共研究雜誌社，2001 年)，頁 113-114。

²⁴ James R. Holmes and Toshi Yoshihara, "History Rhymes: The German Precedent for Chinese Seapower," *Orbis*, Vol. 54, No. 1(Winter 2010), pp. 20-23.

²⁵ 這主要是指日本海上自衛隊開始建造冷戰期間流行的淚滴型船殼(Tear Drop Hull)潛艦，包括神盾系統在內、從海上自衛隊建軍初始的多種艦上作戰系統，固定翼反潛機與反潛直昇機，以及多種反艦飛彈與反潛火箭等美式武裝。請參考趙翊達，**日本海上自衛隊：國家戰略下之角色**(臺北：秀威資訊科技，2008 年)，頁 69、70、80-82、88、90。

²⁶ 日向級標準排水量為 13,500 噸，滿載排水量則高達 17,000 噸，不僅完全超越當前東亞唯一的航艦—泰國的「查克里納呂貝克號」輕型航艦(HTMS Chakri Naruebet R-911，滿載排水量 11,486 噸)，即使在歐洲也直追英、西、義三國的輕型航艦，而其所擁有的航艦全通式飛行甲板在尺寸上甚至略大於英國的「無敵級」(Invincible Class)輕型航艦。這些事實使得許多人認為日向級可以操作垂直起降(Vertical Take Off and Landing, VTOL)戰機，被歸類為「直昇機驅逐艦」只是日本用來規避其不能擁有航艦與避免敏感的國際局勢的作法，但此為日本所否認，稱日向級的結構並不適合操作固定翼艦載戰機。“DDH-161 Hyuga/16DDH "13,500 ton" ton Class,” *GolbalSecurity.org*,

艦艦隊。²⁷相較之下，其在亞洲最大競爭對手的中國海軍雖然目前擁有 49 艘第一線主力軍艦，但其中包含 13 艘性能較落後的 051 型驅逐艦(北約代號「旅大級」)，且中國海軍在整體造艦能力、火力、科技水準等方面仍落後於日本，因此日本海上自衛隊較中國海軍更有能力進行遠洋海上交通線控制戰。

然而日本受限於兩個因素，導致其在當代地緣政治結構中空有強大的控制能力，卻始終無法進一步取得超強的地位。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日本的和平憲法規定其不能以武力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使得日本就法理上而言主動無法發動交通線控制作戰並因此完成本身的標準程序，儘管美國強化美日安保條約的舉動以及日本國內政治環境的變化，使日本國防政策越來越從自衛隊建立以來的被動「專守防衛」原則轉為主動防禦形式，²⁸但在憲法並未修改，以及中國、南韓對日本強化武力仍存在疑慮的情況下，日本不論是從國內主觀環境或國際客觀環境而言，皆無法獲得對海上戰略交通線作戰至關重要的攻擊航艦與核子動力攻擊潛艦以組建類似美國的航艦戰鬥群，²⁹因此缺乏真正的戰略交通線控制能力以完成標準程序，至多只能控制其周邊的海上戰略交通線，亦即第二次中曾根內閣時確立的所謂「中曾根航路帶」概念範圍：東京向東南與關島間、大阪向西南至臺灣海峽間約 1000 海里左右的範圍。³⁰第二個因素則與中國一樣是缺乏重要的前進基地，日本雖然在西太平洋上擁有伊豆—小笠原群島以及更南方的沖之鳥礁和南鳥島等屬地，比起中國而言似乎較佔優勢，但絕大多數這些島嶼的自然環境太差，特別是面積太小，如沖之鳥礁之類的島嶼甚至引發能否依聯合國國際海洋法的規定被視為島嶼的爭議。日本政府在 2011 年 5 月為了符合聯合國海洋法的規定，即欲將沖之鳥礁強化作為爭取專屬經濟區的重要地位，³¹但無論是沖之鳥礁、南鳥島或絕大多數小笠原群島的島嶼，先天環境都太差，很難被建設為對海上戰略交通線控制作戰真正有力的前進基地。

retrieved on June 11, 2011,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world/japan/ddh-x.htm>; Ypji Koda, "A New Carrier Race? Strategy, Force Planning, and JS Hyuga,"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 64, No. 3(Summer 2011), pp. 55-56.

²⁷ Toshi Yoshihara & James R. Holmes, "The Next Arms Race," January 2010, *The Diplomat*, <http://apac2020.the-diplomat.com/feature/the-next-arms-race/>, p. 2.

²⁸ 蔡增家，「從新保守主義論述變遷中的日本防衛政策」，*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8 卷第 3 期(2007 年 7 月)，頁 91-125。

²⁹ 日本海上自衛隊從成立之初便有獲得航艦以實行反潛戰的想法，在整個冷戰期間從未間斷。只是在這段期間其主要尋求的目標限於能操作反潛直昇機的輕型航艦，而非能組成航艦戰鬥群的大型攻擊航艦。Koda, "A New Carrier Race?" *op. cit.*, pp. 38-46.

³⁰ 「日本戰略研究フォーラム第 19 回シンポジウム詳報」，日本戰略研究フォーラム会誌，Vol. 37 夏号(平成 20 年)，http://www.jfss.gr.jp/kihou_20_Sumer.pdf，頁 46。然而此一航路帶概念早在 1970 年代即出現亦為時任防衛廳長官的中曾根康弘的主要構想之一，範圍雖相去不遠，但並沒有明確的指明，不過後來中曾根航路帶使用的距離單位是「海里」(nautical mile)，而舊有的概念則是「英里」(mile)，因此中曾根航路帶的範圍較以往稍微擴大。吳明上，「美日建立海上聯合防衛的決定：以日本的政治決定過程為中心」，*東吳政治學報*，第 20 期(2005 年)，頁 157-160。

³¹ 沖之鳥礁最大的爭議在於其究竟只是海中一塊高於海面的岩石，抑或符合聯合國海洋法規定的真正島嶼。日本政府為了盡可能平息爭議，在 2011 年 5 月宣布將沖之鳥礁列為「特定離島」，並開始在其周邊建設船隻泊地與臨港道路。「沖ノ鳥島に港湾施設を整備へ 政府の『総合海洋政策本部』」，*産経新聞*，2011 年 5 月 27 日，<http://sankei.jp.msn.com/politics/news/110527/plc11052712360017-n1.htm>。

(四)、歐盟

歐盟作為強權的地位比日本更難判定，因為歐盟是否能作為一個與國家享有相同地位與能力的強權始終在國際關係學界存在激烈的爭辯。³²但儘管吾人承認歐盟具備一定程度的國家行為者角色，僅從交通線控制能力而言歐盟也絕非超強，在可預見的為來僅能在全球地緣政治結構中取得強權的地位。

歐盟的強權基礎與控制力來源有三：首先是旗下會員國的龐大能力。一般在考量歐盟的經濟權力時經常將其會員國的經濟實力加總，現實主義亦將此種辦法套用至估計歐盟的軍事能力估計。³³以此觀之，歐盟可謂是全球傳統武力與海軍力量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軍事強權，更是美國之外唯一擁有核子動力攻擊航艦戰鬥群和最多現役航艦的強權。其次，申根公約亦協調簽約國的對外邊境檢查，雖然並非所有歐盟會員國均簽署申根公約，但至少所有的歐陸會員國都已簽署，³⁴提供歐盟對橫貫歐陸、前往心臟地帶的東西國際鐵路線(柏林—華沙—明斯克—莫斯科—下諾夫葛羅德國際鐵路走廊)在歐盟境內的有限間接控制。最後，歐盟亦擁有真正屬於其所控制的獨立武力：歐洲快速反應部隊(European Rapid Reaction Force, ERRF)，特別是屬於快速反應部隊的一部份，在 2007 年正式建軍的 13 個歐盟戰鬥群(The EU Battlegroup)，每年保持兩個戰鬥群於待命狀態使歐盟能隨時有可動用的兵力。

然而歐盟基於以下兩個條件，使其至少在當前與可預見的將來仍僅為強權而不可能成為結構中的超強。首先是將各會員國的能力總和為歐盟的能力極不適當，因為會員國所屬的武力並不完全歸歐盟統一指揮，他們不僅仍受本國的指揮與控制，而且許多歐盟成員國同時也是北約成員國，必須提供武力供北約使用；英國甚至還同時擁有與其他大英國協(Commonwealth of Nations)成員國的區域防衛協定。這樣看起來似乎會員國本身才應該作為強權看待，特別是英國與法國這兩大核武國。但大英國協的共同防衛協定在目的上並非使英國重獲對各區域的海上交通線之控制，英國亦未在其他國家之中駐紮軍隊俾便進行交通線控制戰；而從歐盟的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歐洲安全暨防衛政策等的出現可發現，英、法、德等歐盟主導大國近幾年來不斷追求一致的歐盟對外戰略，不再像冷戰以前的各行其是，希望以「歐洲」的身份取得更高的國際地位與追求全球利益，因此本論文認為仍應以歐盟作為分析對象而不宜以個別成員國。

³² Buzan and Wæver, *Regions and Powers: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36; Pernille Rieker, "The EU—A Capable Security Actor? Developing Administrative Capabilities," *European Integration*, Vol. 31, No. 6(November 2009), p. 703.

³³ For example, see Michael Friederich Kluth and Jess Pilegaard, "Balancing beyond the horizon? Explaining aggregate EU naval military capability changes in a neo-realist perspective," *European Security*, Vol. 20, No. 1(March 2011), pp. 45-64.

³⁴ 歐盟在 2011 年 6 月初決定延後在 2007 年簽署公約，但原本預定於 2011 年實施的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正式進入申根區，但這並不妨礙歐盟控制進入歐亞大陸戰略交通線在歐陸的部分。"Schengen zone: Delay for Bulgaria and Romania to join," *BBC*, June 9, 2011, <http://www.bbc.co.uk/news/world-europe-13709768>.

其次，雖然歐洲快速反應部隊擁有可觀的員額與帳面上強大的作戰能力，³⁵但無論是快速反應部隊或戰鬥群都無法使歐盟取得強如美國的陸地或海上戰略交通線控制能力，原因包括各國提供的裝備性能與軍事協調作戰能力差距太大，特別是東歐前共黨國家與其他歐盟成員國之間的差異更是巨大，嚴重限制了快速反應部隊的戰力；後者雖然為了改善快速反應部隊的缺失而建立，³⁶具備高度的作戰能力，但規模卻僅以營級為核心，每個戰鬥群人數只在 1500 人左右；³⁷此外也有成員國國防禦算過低、投入軍事科技研發比例更低等財務問題，³⁸不過最嚴重的是歐盟與北約之間存在激烈的安全競爭關係，由於歐盟無論在軍力素質與指揮管制等方面完全不如北約，導致歐盟必須依賴 1999 年與北約簽署的所謂「柏林延伸協定」(Berlin Plus Agreement)向北約調借大型軍事資產，³⁹而這又必須在北約完全沒有參與的情況下，導致歐洲安全還是以北約為主導，⁴⁰歐盟即使具備本身的武力，實際上能扮演的角色還是非常有限，此種困境導致一向主導歐洲安全暨防衛政策最力的法國為了改善北約的牽制而在 2009 年 4 月正式重返北約指揮體系，試圖消除北約對歐洲安全暨防衛政策的疑慮與掣肘。⁴¹

(五)、印度的地位

在單極加四強的結構中，另一個需要解決的結構形式問題是印度在結構中的地位。科恩在其模型中針對印度提出所謂的「獨立地緣政治區域」，認為印度試圖自冷戰起便試圖成為美、蘇之外的獨立力量，拒絕來自兩極的地緣政治壓力、

³⁵ 除了六萬名以上的戰鬥部隊與包含後勤在內的總數十八萬名員額之外，還包括超過 400 架各式先進戰機，海軍所擁有的 100 艘以上的戰艦中更包含由法國所提供的戴高樂號航艦戰鬥群，該艦是美國以外世界上唯一的核子動力航艦，另外法國亦提供兩艘核子動力攻擊潛艦。各國承諾提供的相關兵力資料可參考 Alistair J. K. Shepherd, "The European Union's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 A policy without Substance?" *European Security*, Vol. 12, No.1(Spring 2003), Table 1, on p. 44; "The European Union's 'Headline Goal'-Current Status," *Center for Defense Information*, <http://www.cdi.org/document/search/displaydoc.cfm?DocumentID=966&StartRow=1&ListRows=10>, accessed on June 8, 2011.

³⁶ Natalia Touzovskaia, "EU-NATO Relations? How Close to 'Strategic Partnership'?" *European Security*, Vol. 15, No. 3(September 2006), pp. 245-246.

³⁷ "The EU Battlegroups," *European Parliament*, September 12, 2006, http://www.europarl.europa.eu/meetdocs/2009_2014/documents/sede/dv/sede030909notebattlegroups_/sede030909notebattlegroups_en.pdf, pp. 4-7.

³⁸ 關於歐洲快速反應部隊的能力與相關問題，請參考 Jocelyn Mawdsley and Gerrard Quille, "Equipping the Rapid Reaction Force: Options for and Constraints on a European Defence Equipment Strategy," *Bon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Conversion*, 2003, <http://www.bicc.de/uploads/pdf/publications/papers/paper33/paper33.pdf>, pp. 48-78; Daniel L. Garvey, "The European Rapid Reaction Force: Just How Serious are They?" April 9, 2002, *DTIC Online-Information for the Defense Community*, <http://www.dtic.mil/cgi-bin/GetTRDoc?Location=U2&doc=GetTRDoc.pdf&AD=ADA404288>, pp. 12-15; 甘逸驊，「歐洲安全防衛政策的軍事層面：歐盟的全球戰略地位」，*問題與研究*，第 45 卷第 5 期 (2006 年 9、10 月)，頁 124-126；鄭大誠，「歐盟快速反應部隊：發展與展望」，*全球防衛雜誌*，第 276 期(2007 年 8 月)，頁 65-67。

³⁹ Raymond A. Millen, "Reconfiguring NATO for Future Security Challenges,"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 23, No. 2(April-June 2004), p. 128.

⁴⁰ Touzovskaia, "EU-NATO Relations?" *op. cit.*, p. 253.

⁴¹ Soren Kern, "Why France Wants to Rejoin NATO?" *The Brussels Journal*, April 28, 2008, <http://www.brusselsjournal.com/node/3208>.

採行獨立的外交政策並作為世界地緣政治結構中的第三股力量。⁴²然而這似乎是一個特別為印度量身訂做的定義而非通用於地緣政治結構理論中任何「獨立地緣政治區域」的定義，因為冷戰時期追求類似戰略的中國，在他看來卻從屬於歐亞地緣戰略領域之下。⁴³此外，單以印度的外交政策決定南亞為獨立地緣政治區域看起來似乎也有點勉強，因為南亞有另一個區域大國巴基斯坦與印度敵對，並非完全受印度的支配。是以如果認為結構中可能出現獨立地緣政治區域，則應將此種區域定義如下：結構中某個地緣政治區域受到位於其中的某一強權在政治、經濟上完全的完全控制，區域內國家的外交政策追隨此一強權，不依附結構中的任何超強或捲入超強之間的標準地緣政治程序鬥爭，追求作為獨立力量影響超強在此一區域中的政策，以替區域維持和平與穩定。在這樣的定義下，當代全球地緣政治結構中並不存在真正的獨立地緣政區域。

本論文將印度置於區域大國的角色，首先是因為印度不符強權的定義：南亞並非結構中的核心區或精華區，而印度也未支配南亞，至少在這個地緣政治區中還有巴基斯坦是其明顯且不可忽視的競爭者與最主要的國家安全威脅之一。此外印度也不具備控制通過南亞的戰略交通線的能力，通過南亞的戰略交通線僅有由東亞經印度洋前往中東與歐洲的海上戰略交通線，而印度儘管位居印度洋中央，擁有極佳的交通線控制戰略位置，且是印度洋地區除了美國之外唯一擁有現役航艦戰鬥群的國家，但目前只有一支老式的航艦戰鬥群，其核心的維拉特號航艦(INS Viraat R-22)不僅接近除役且無法搭載新式的艦載機，⁴⁴作戰範圍亦只有印度將於 2015 年部署的，由俄羅斯負責改裝的「維克拉馬地亞號」(INS Vikramaditya，即前蘇聯海軍「基輔級」(Kiev Class)航艦的最後一艘，冷戰後更名為「高西柯夫號」(Admiral Gorshkov)的「巴庫號」(Baku)航艦，續航距離約達 14,000 浬)航艦的三分之一，印度海軍雖擁有 57 艘各式水面艦艇，但除了 3 艘德里級(Delhi Class)驅逐艦、1 艘施瓦立克級(Shivalik Class)與 3 艘塔瓦級(Talwar Class)巡防艦之外，其餘大多數軍艦不僅接近除役年限，亦無法滿足印度海軍的當代作戰需求，⁴⁵能用於航艦戰鬥群遂行遠洋交通線控制戰的先進護航軍艦數量太少。這樣的海軍實力與國家整體力量根本無法提供印度海軍控制印度洋戰略交通線的能力，印度的經濟與產業技術能力，以及政府能力又使其無法順利發展海上戰略交通線控制能力，能力上的不足嚴重限制了印度的戰略範圍與地緣政治密碼設定，無法如其他

⁴² Saul B. Cohen, *Geopolitics: The Ge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9), p. 43.

⁴³ *Ibid.*, p. 254.

⁴⁴ 維拉特號建造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雖然在戰後經歷過數次改良而能適應後來的新航艦作戰型態與各種新技術，當印度 1986 年從英國購入時該艦已在英國海軍中除役。而該艦在戰後的時代中亦因尺寸過小而無法搭載任何需要彈射器或較長滑跳甲板起降的傳統起降戰機，只能搭載不需這些設備亦能作戰的垂直起降戰機，但這種戰機在性能上很難與前者相比，除非此種輕型航艦戰鬥群面對的是裝備並不優良的海空軍，例如 1982 年福克蘭群島戰爭(Falklands War)中的阿根廷，否則很難作為獲致制海權作戰的主力。

⁴⁵ Walter C. Ladwig III, "Delhi's Pacific Ambition: Naval Power, 'Look East,' and India's Emerging Influence in the Asia-Pacific," *Asian Security*, Vol. 5, No. 2(May 2009), p. 91, pp. 92-93.

四個強權般真正跨出本身所處的地緣政治區域。⁴⁶

三、「單極+三強」的亞太區域地緣政治結構

所謂的亞太地區是一個概念相當模糊的地理範圍，並不像其他慣用的自然地理區域有較為明確的界線，而且相關的國際組織、國家戰略文件以及學者的研究在提到這個地區時，其範圍亦大為不同。

(一)、範圍與定義

科恩的地緣政治模型將一般意義的亞太稱為「亞太邊緣區」(Asia-Pacific Rim)，範圍從南韓、日本與臺灣經菲律賓、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印尼、汶萊、東帝汶、與巴布亞紐幾內亞延伸至澳洲與紐西蘭，當然還包括太平洋上的帛琉、密克羅尼西亞聯邦、所羅門群島、萬那杜、馬歇爾群島，以及像關島與北馬里亞納群島在內的美國屬地。⁴⁷

朱陽明與陳舟把亞太的範圍限定為「東北亞、東南亞、中亞、南亞、大洋洲和南北美洲西部」，但他們另外亦整理出五種亞太的定義：⁴⁸

1. 包括亞洲和太平洋的所有國家和地區以及北美、中美、南美的太平洋沿岸國家。
2. 亞洲東部和大洋洲諸國，一般不包括美洲各國和西亞各國，聯合國亞太經濟社會委員會(U.N.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ESCAP)的成員採用此種劃分。
3. 東經 100°到 180°之間的區域，包括西伯利亞、中國、蒙古、日本、朝鮮半島、東南亞各國、南太平洋的一些託管島嶼、澳洲與紐西蘭等，美國因為有部分島嶼屬地位於這個區域中，因此可被視為亞太國家。
4. 亞太經濟合作理事會(APEC)的成員國涵蓋範圍。
5. 限於亞洲和太平洋的結合地帶，指亞洲太平洋沿岸的邊緣和半邊緣地帶，包括亞洲大陸東部與西太平洋瀕臨大陸的區域，甚至包括南亞諸國。

由於中國的鄰國數量眾多且遍佈北亞、東北亞、東南亞、中亞與南亞，其海洋與海軍戰略雖與美國、日本等兩大太平洋海洋國家密切相關，亦與相當關注的南海情勢的澳洲有關，加上澳洲又同時身為中國的重要經貿伙伴與美國在太平洋的重要盟邦，為探討中國地緣戰略對亞太地緣政治均衡之影響，顯然對「亞太」的概念不能太過狹隘，既要符合一般的地理範圍，又必須能清楚地涵蓋中國地緣

⁴⁶ 事實上根據印度自己的估計，其海軍真正具備能實現其「2004 年海洋準則」(2004 Maritime Doctrine)中所設定的，在由波斯灣(Persian Gulf)至麻六甲海峽的廣大印度洋範圍中作戰的願景，也必須等到 2020 年以後，在此之前印度實際上並不能在南亞之外的亞太地區擁有真正堅實的地位與角色。Ibid., pp. 91-92, pp. 103-104; Erickson, Walter III, and Mikolay, "Diego Garc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Emerging Indian Ocean Strategy," p. 230; James R. Holmes, Andrew C. Winner and Toshi Yoshihara, *Indian Naval Strateg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London and New York: 2009), pp. 82-94.

⁴⁷ Cohen, *Geopolitics, op. cit.*, p. 295.

⁴⁸ 朱陽明、陳舟，「中國的亞太安全戰略與地緣戰略思考」，*中國軍事科學*(北京)，第 13 卷第 4 期(2000 年月)，頁 18、19。

戰略的主要方向。有鑑於此，本論文所研究的亞太地區的地理概念，範圍包括涵蓋俄羅斯西伯利亞地區的地理上的東北亞，地理上的東南亞、中亞五國、大洋洲與南亞，以及北美洲的美國與加拿大兩國，略去與東亞的互動較不如美、加密切的拉丁美洲地區。依此定義的亞太地區對地緣政治結構最大的戰略重要性在於其同時包含北美核心區與東亞精華區，是全球人口最多與經濟總產值最高的地區，遠超過地球上其他地區的總和。

(二)、結構組成

在這樣範圍定義下的亞太次體系同時擁有海洋與陸地戰略交通線：陸上戰略交通線即由中國經西伯利亞與中亞前往俄羅斯與歐洲的洲際鐵路線，而跨太平洋以及由印度洋經南海前往東北亞的兩條戰略交通線在巴士海峽與琉球群島會合。次體系內的國家目前只有美國有能力且確實控制兩條海上戰略交通線並組織貿易—依賴海洋領域，居於超強的地位。而雖然全球地緣政治結構中的俄羅斯與中國兩個強權，以及強權資格候選人的印度等三個大陸國家皆位於亞太之內，但俄羅斯並未瀕臨海洋，中國與印度雖是濱海國家，前者的海軍在冷戰以後發展迅速，後者則擁有航艦戰鬥群，但二者的能力皆仍無法控制海上戰略交通線。而陸上戰略交通線雖然位於上海合作組織全境之內，但由於該組織並沒有一個明顯的主導國家，亦非具有明顯戰略目標的聯盟，更非類似歐盟的國際組織，故無法認為該戰略交通線受到任何國家或聯盟的控制，使得亞太次體系不存在任何陸地地緣戰略領域，是明顯的單極結構。

亞太區域地緣政治結構中的強權則包含俄羅斯、中國與日本。印度在亞太地緣政治結構中依然因為南亞非區域結構的精華區，以及能力不足的緣故而無法取得強權的地位，只能位居第一級區域大國，其餘屬於第一級力量大國還包括澳洲與加拿大。巴基斯坦雖然與印度同屬體系中最新被接納的正式核武國，但由於其經濟力量過低，政府能力也相當低落，使其即使加上軍事力量，也只能與中華民國、南韓、泰國、越南、印尼等國同列次級區域大國。

亞太區域地緣政治結構雖然在地理上可分為地理上的東北亞；地理上的東南亞；南亞；地理上的中亞；俄羅斯西伯利亞地區的北亞；澳洲、紐西蘭、南太平洋諸島國的南太平洋地區；以及巴拿馬運河以北瀕臨太平洋各國的北美洲大陸部分；巴拿馬運河以南瀕臨太平洋的南美洲地區。但以上八個地理區在區域地緣政治結構中由於國家之間的國際安全與經濟連結差異，並非原封不動轉為地緣政治區域，最主要的差異有二：

第一，南韓、日本、臺灣、菲律賓、新加坡、馬來西亞與印尼等島國或半島國家，安全與經濟受亞洲大陸的影響較低，受海洋與海權國家的影響較高，而脫離原來的地理區域，組成獨立的島鏈地緣政治區，南韓與臺灣分別是面向以蒙古、中國、俄羅斯遠東地區與北韓的「東北亞地緣政治區」的通道國。

第二，在科恩的模型裡，中南半島被一分為二：越南、寮國、柬埔寨等三國組成的印度支那地緣政治區，泰國與緬甸則屬於南亞地緣政治區的一部份，但冷戰後由於「大湄公河次區域開發計畫」(The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al Program,

GMS)的發展，而湄公河流經整個中南半島，使得緬甸、泰國、寮國、柬埔寨、越南等中南半島五國有逐漸整合為一個新的中南半島地緣政治區的趨勢，而在這個新地緣政治區域中，泰國、越南與緬甸分別作為面向島鏈地緣政治區、東北亞地緣政治區與南亞地緣政治區的通道國，其中緬甸與越南是同時面臨兩個地緣政治區的通道國。

此外，東南亞在冷戰時原本是全球地緣政治結構中的「破碎帶」之一，但在冷戰後由於越南撤出寮國，以及東協接納越、寮、柬三國，東南亞已擺脫破碎帶的地位。目前的亞太區域地緣政治結構並沒有破碎帶存在。

(三)、東亞在全球/亞太區域地緣政治結構中的戰略地位

隨著中國的崛起與東南亞地區的經濟發展，加上日本、南韓與中華民國等原本等三個在 1990 年代就已較為發達的國家，東亞在全球地緣政治結構中逐漸取得北美洲與歐洲之外的第三個核心區地位。不過目前來說這樣的地位還不算真正確立，因為除了日本之外，其餘工業化經濟體的發展仍是以代工業為主的出口導向經濟，而非美國、加拿大、日本、歐洲等掌握核心技術的生產鏈上游國家的內需型經濟，而且除了日本、新加坡、中華民國與南韓之外，其餘東亞國家仍存有相當大量的落後農業人口與難以在短期內改善的貧窮問題。這使得東亞在世界產業鏈中仍處於下游地位，或者世界體系理論中的半邊陲與邊陲地位。

然而，東亞與南亞為史派克曼所謂的邊緣地帶與麥金德所謂的「內新月形地帶」(Inner Crescent)之一部分，原來即是英美海權與心臟地帶陸權在爭奪體系霸權中必須極力爭取的地區，也是最有可能發展出能與陸權與海權相互平衡的新超強的地區。目前無論是在全球或亞太區域地緣政治結構，唯一的陸地戰略交通線部分位於東亞內部與鄰近的中亞，而兩條海上戰略交通線又在東亞周邊交會，此種優越的海陸交會地理位置是 20 世紀初以來歐美地緣政治學者認為東亞符合與心臟地帶陸權、美國海權一樣成為獨立地緣戰略領域的主要原因。⁴⁹此外，東亞大陸部分雖不如心臟地帶深入歐亞大陸內陸，但其他自然與人文地理條件卻優於心臟地帶，也不像歐洲那樣擁有深入腹地的海灣，使得其內陸同樣不易受到海權的攻擊，但同樣擁有靠近心臟地帶、能朝該地發展的條件。東亞既有堅強的陸權基礎，又具備發展為超強的自然、人文與經濟地理條件，能控制東海與南海的東亞國家還能夠威脅美國作為單極海權的戰略基礎：全球海上交通線暢通，阻止美國在全球順利調動部隊應付區域威脅。迅速崛起的中國正位於東亞的中心地帶，同時身為亞太海陸戰略交通線的起迄點，但又為單極與俄、日兩強權所包圍，使得其崛起備受關注。

第二節、當代中國的地緣政治密碼

結構的劇烈變化與西發利亞體系的秩序與國際法原則取代朝貢體系的天下

⁴⁹ Mackinder,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op. cit.*, p. 433 and p. 437; Alfred Thayer Mahan, *The Problem of Asia and Its Effect upon International Policy* (Boston: Little, Brown, 1900), p. 98, p. 106.

觀秩序原則和道德基礎，對中國戰略菁英往後的世界觀產生巨大的影響，再加上中國共產黨引入馬列主義思想作為唯一政治意識型態，結果形成一種與天下觀相較，既對現存體系秩序原則與中國在體系中的地位不滿，卻又沒有明確目標，更對中國在體系中角色模糊的矛盾世界觀。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由於中共的政治制度奉行集體領導與所謂的「民主集中制」，導致 1949 年以後中國的地緣政治密碼對大戰略與地緣戰略的指導變遷速度完全不若帝國時代迅速，並不因為決策圈少數核心的更換就在政策上出現極大的變化，而且由於華人對權威的服從性與不敢隨意更動權威留下來的密碼，除非地緣政治環境發生極劇烈的變化，否則後續的領導人所秉持的密碼也經常包含前者的密碼，只是因應戰略環境的變化而稍做修正，但絕不會如帝國時代的決策圈那樣完全拋棄前人的密碼。

一、矛盾的新世界觀

鄧勇(Yong Deng)曾指出，當代中國在體系層級的重大利益乃同時受到偏好目前體系的趨勢與對世界秩序抱持修正主義心態兩個目標的驅動。⁵⁰這兩個具有明顯差異的目標不僅驅動中國對國家利益的設定，也驅動中國戰略菁英對冷戰後新世界觀的塑造，使其出現極為明顯的矛盾。

中國戰略菁英已經接受中國非世界的中心，但是其建立的新世界觀因為對中國的自我認知，以及對現存體系秩序原則的不滿，以及對海權發生前所未有的迷戀而充滿了矛盾：既對現存的國際秩序不滿，又希望能融入這個秩序中，並與美國保持良好的關係；既希望中國重新恢復帝國時期的光榮與國際地位，成為體系中不可忽視與重要的新超強並「改革」國際秩序，又認為自己不是修正主義國家，希望以不引起體系中既有超強敵視的和平方式，擺脫歷史上權力轉移經常造成霸權戰爭的循環現象來達成；⁵¹既希望中國發展成世界海權大國，又不希望重蹈德國與前蘇聯在 20 世紀海軍戰略破產的覆轍。這些矛盾產生一種奇妙的狀態：中國戰略菁英對於西方的物質與精神文明有強烈的自卑心態，特別是在強調有形物質力量的層面，可是基於中國快速發展的事實，許多中國戰略菁英又產生希望盡快恢復中國大國地位、洗刷近代恥辱歷史的急於求成心態，非常不能抵抗西方國家各界對中國有意無意的吹捧，於是雖然表面上還是認為中國不是一個真正的大國，可是卻不斷利用「外媒」有利於中國發展的言語來支撐自己內心的強烈大國意識，⁵²並在西方世界似乎在 2008 年之後處於衰退期的時期，儼然扮演起「指導」其他既有強國行為的角色，甚至本身的對外行為較以往更為獨斷，結果徒增外國對中國的反感與擴大中國威脅論的市場，並加深其影響。⁵³

⁵⁰ Yong Deng, "Remodling Great Power Politics: China's Strategic Partnerships with Russia, the European Union, and India", *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30, No. 4-5(August-October 2007) p. 882.

⁵¹ 李春福譯，文正仁著，**中國崛起的大戰略——與中國知識菁英的深層對話**(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11 年)，頁 184。

⁵² 唐世平，「再論中國的大戰略」，**戰略與管理**(北京)，第 4 期(2001 年)，頁 30-31。

⁵³ 我國學者陳至潔在 2011 年 6 月至義大利參加「歐洲夏日中國政治經濟研究課程」時即觀察到除法國以外的不少歐洲學者與外交官對中國在 2010 年前後較以往明顯許多的獨斷行為存有憂

這樣的矛盾心態並非冷戰以後的獨特現象。冷戰時期，中國的世界觀大體而言是依照馬列主義(Marx-Leninism)唯物史觀與國家實力兩種概念所建構的，因此產生了諸如「三個世界」的國家分類概念，將中國列入第三世界國家之林。爾後又因鄧小平對國際經濟發展的見解，將國家分為「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兩大類，而中國屬於發展中國家，這些概念與中國試圖領導第三世界或發展中國家，已經因為中國決策與戰略菁英對本身在國際上地位的定位與認知的改變，而成為新的「中國中心」主義(Sino-centricism)。⁵⁴但是冷戰後新中國中心主義的不同之處在於如趙汀陽所言，⁵⁵隨著冷戰的結束與中國國力的提高，中國戰略菁英在 1990 年代中期以後再度重新思考中國的國際地位與國際定位議題，並成為最重要的思想運動，希望塑造中國未來的新世界觀與在國際關係上的價值觀，以及思考中國未來在國際上的地位、命運、理念、責任與貢獻。

根據江西元的歸納，中國戰略菁英在這波思想運動中出現了主張對五四以來中國「西化」思想路線進行徹底清算與批判的「新左派」；強調向傳統中華文化的精神實質復歸，重新認識和肯定中國自己固有傳統文化的新天下主義；倡導中西融合，在「中西會通」中實現中華文化自我創新的「新儒家」；恪守「民族本位」的「新民族主義」以及要求同國際社會「全面接軌」的「新自由主義」等多種在立場與觀點上相互對立、相互排斥，但是又相互影響、滲透、印證與促進的對外關係思想。⁵⁶不過雖然江西元稱這些思想的立場與觀點相互對立與排斥，但上述思想流派中除了他所謂的「新自由主義」之外，其他大多強調重新回歸中國傳統文化，並在對外關係中堅持中國本身的立場。結果，這些新對外思維與世界觀的塑造，配合追求體系穩定以實施民族復興的國家戰略目標，不僅希望中國能夠發展為既保有與其他列強具有不同政治、經濟意識型態，又是體系中不可或缺、有崇高地位且負責任的強國，以孫中山與鄧小平的「開放主義」與「世界主義」思維建立一種類似先秦時代萬國並存，但超越先秦天下觀概念，強調萬國平等的新天下主義，⁵⁷更逐漸形成以「中國特色」和強調中國「傳統文化」為對內號召，⁵⁸反霸權主義為對外號召，試圖建立中國是東亞儒家文明中心，儒家文明

慮，尤以德國和東歐國家為甚。此外，美國較為傳統的智庫，以及印度政府都曾抱怨過中國近年來的獨斷行為，美、日、印三國更在 2011 年 12 月 11 日於華府討論此一議題。見陳至潔，「歐盟的中國焦慮症」，**戰略安全研析**，第 75 期，2011 年 7 月，頁 60-67。

⁵⁴ 葉自成，**中國大戰略：中國成為世界大國的主要問題及戰略選擇**(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年)，頁 148。

⁵⁵ 趙汀陽，**天下體系：世界制度哲學導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年)，頁 7-8。趙汀陽稱這種運動為「重思中國」，並認為與過去的「檢討中國」有很大的差異，因為「檢討」的對象是「過去」，而「重思」的對象則是「未來」。

⁵⁶ 江西元，「試析和和譜世界與中國戰略文化重塑」，**教學與研究**(北京)，第 2 期(2009 年)，頁 62。

⁵⁷ 楚樹龍、金威主編，**中國外交戰略和政策**(北京：時事出版社，2008 年)，頁 73-74；葉自成，**中國大戰略**，前引書，頁 148-149；葉青，「從戰爭與革命到和諧世界——略論中國共產黨的時代觀發展與中國外交」，**國際展望**(上海)，第 4 期(2011 年)，頁 1-18。

⁵⁸ 2011 年 10 月初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 17 屆六中全會即是自 1996 年第 14 屆六中全會以來，中共決策圈再度討論文化建設和道德的六中全會，顯示中國決策高層確實開始將文化視為重要的對內政治凝聚力之一。「中共召開六中全會討論文化議題」，**BBC 中文網**，2011 年 10 月 15 日，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chinese_news/2011/10/111015_china_ccp_beijing.shtml。

對國際體系秩序原則與人權、政治體制等認知與價值觀不同於西方國家的新大國自我認知與中國中心主義世界觀。

這種新天下主義承認體系存在極為多元的文化與文明，完全不是先秦時期較為一致的華夏文明類型，而中國在這個多元文化與文明並存的體系中希望成為其中的一個超強，但絕非被其他文明所同化，而是力求保護中國既有的各種文化，尤其是政治與經濟意識型態和文化，並對抗西方文明在這兩方面對中國的「入侵」。⁵⁹換句話說，當代中國的「和諧世界」世界觀與冷戰時期的革命世界觀一樣是因應中國擁有特殊近代歷史的產物，其內涵會因為中國國際地位的後續變化而發生改變，無法像天下觀那樣維持長期的一致性，以及明確指出其對體系秩序原則的真正理想目的是什麼。不過可以確定的是，隨著中國在結構中的地位不斷提升，其世界觀內的中國中心主義基礎只會不斷加強，而不會弱化或改變為擁抱西方文明與完全接受當前體系秩序原則的「世界主義」，王緝思便指出，中國戰略菁英並沒有把中國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在 2008 年以後陸續舉辦奧運、世界博覽會等世界盛會，以及中國在太空項目和先進武器技術等的發展成就歸功於美國或美國領導的世界秩序，而且認為美國經濟的持續衰弱、其內部的政治混亂，以及中國的政治經濟制度和發展模式，使其沒有像那些採用西式民主的發展中國家一樣，出現混亂與分裂，促使絕大多數中國戰略菁英相信，是美國而非中國，「站在歷史錯誤的一邊」。⁶⁰這樣的思維也是某些比較主張融入現存國際秩序的中國戰略菁英認為是中國崛起的危險之處。⁶¹

(一)、對中國國際地位與國力的矛盾自我認知

中國戰略菁英一方面基於中國古代的輝煌歷史與廣土眾民、聯合國安理會五常任理事國之一和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等突出的政治與國際法地位，而有強烈的大國意識，但另一方面又因為鴉片戰爭之後在對外戰爭中屢戰屢敗導致國

⁵⁹ 胡錦濤在中共官方刊物—求是雜誌的 2012 年 1 月的一篇專文中表示，西方國家正試圖透過在中國散佈其意識型態與文化來分化、支配中國，他認為中共必須警惕這種威脅，並要求中國加強文化產業來對抗這種攻擊。這篇文章雖然是在胡錦濤在第 17 屆六中全會上的一篇演講為基礎，但其所展現的不僅是胡錦濤卸任前對其政治路線的延續，亦為當代中國新世界觀裡的中國中心主義進一步加強的充分展現。胡錦濤，「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求是(北京)，第 1 期(2012 年)，頁 3-7。

⁶⁰ Kenneth Lieberthal and Wang Jisi, "Addressing U.S.-China Strategic Distrust," *Brookings Institution*, March 30, 2012, http://www.brookings.edu/~media/Files/rc/papers/2012/0330_china_lieberthal/0330_china_lieberthal.pdf, pp. 9-10.

⁶¹ 王慶新認為，中國春秋時代的歷史顯示，與華夏文明相異、居於體系非主流地位的楚國長江流域文化與文明在當時的體系中與北方的體系主流華夏文明發生相當多次的大規模戰爭，這段歷史與冷戰時的美蘇對峙、2001 年之後的反恐戰爭一樣，都顯示體系中非主流文化要得到主流文化與價值觀的認同，必須經歷相當長一段時間的衝突與磨合，只有當非主流文化融入主流社會，國際衝突與矛盾才會降低和停歇。他據此認為由於中國的文化與價值觀異於西方—包含美國、西歐、日本、南韓與東歐—的現代主流體系文化與價值觀，即使未來中國經濟規模能超越美國，由於其在文化層面居於孤立與少數派的地位，還是無法改變國際社會的主流文化價值觀與力量均衡，而中國在文化價值上的迷失不僅是其與西方交流與溝通的主要障礙，在未來還很有可能是衝突的主要來源之一。王慶新，「春秋華夏天下秩序的啟示」，國際政治科學(北京)，總第 25 期(2011 年)，頁 83-84。

際地位極為低落—不僅在 19 世紀的全球地緣政治結構中不是超強，還在中日甲午戰爭之後進一步失去強權的地位，更由於 1912 年辛亥革命之後政局的極度不穩所導致的嚴重分裂，使得中國本身是否作為一個在國際政治上獨立發揮國際影響力與重要性的現代國家的能力遭到高度懷疑，被視為最次等的國家—⁶²而產生中國因為物質力量與政府能力低落的弱國自我認知，與大國意識結合成為一種「衰弱的大國」矛盾心態與自我認知。⁶³換言之，大國意識始終存在中國戰略菁英心裡，真正使其發生矛盾的是中國在物質能力的衰弱，這是中國亟欲藉由所謂的「民族復興」或「崛起」來改變的，目的是使中國的國際地位與國家物質力量能趕超列強，並恢復中國在漢唐或康乾盛世時的世界實力地位。⁶⁴

雖然中國戰略菁英希望恢復強國的地位，改革開放政策與四個現代化也確實提升了中國的國力，進一步強化中國的大國意識，甚至開始朝向「強國」認知過度，⁶⁵可是中國戰略菁英在 1990 年代還是反對中國是一個「強國」(power)的觀點，⁶⁶直到 1990 年代後期才開始有意識地自視為體系中的強國。這種現象除了中國的物質力量與能力確實仍遠不如列強之外，很明顯地是由於畏懼從冷戰 1950 年代就已經存在的「中國威脅論」⁶⁷會因為中國力量的成長而形成強大的反中同盟，使中國又陷入前蘇聯與美國軍備競賽而導致解體的歷史覆轍之中。⁶⁸導致中國即使在 2010 年正式取代日本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國，軍事力量也因現代化而有顯著的提升，但中國領導人還是在重要國際場合不斷公開強調中國的物質力量水準仍與其他強國差距甚遠，依然是個發展中國家，不是真正的「強國」，⁶⁹金燦榮也指出，雖然中國的經濟力量發展迅速，但許多中國人還

⁶² 麥道戈爾(Walter A. McDougall)引述法國總理白理安(Aristide Briand)在 1919 年巴黎和會(Paris Peace Conference)上對當時中國的輕蔑態度是：「中國是什麼？」(What is China?)，以及當時外交事務的一篇文章稱：「全世界都知道中國在政治上只比無政府狀態好一點(all world knows China is politically in a state better than anarchy)」。見 Walter A. McDougall, *Let the Sea Make a Noise: A History of the North Pacific from Magellan to MacArthu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3), p. 561.

⁶³ 例如毛澤東在 1954 年 12 月與緬甸總理吳努見面時表示：「我國是一個大國，原因就是人口多，地方大，但是並不強」，類似的觀點又見於 1956 年與印尼總統蘇卡諾、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代表團見面時的談話，和 1957 年在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的發言。同樣的，鄧小平在 1984 年也指出中國基於地大人多的權力要素，在政治上是大國，是冷戰結束後多極化國際體系中的一極，可是經濟並不發達，國力也很弱小，所以實際上是一個小國或發展中國家。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著，*毛澤東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 年)，頁 193、257、269、296；鄧小平，*鄧小平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三卷，頁 94；葉自成，*新中國外交思想：從毛澤東到鄧小平——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外交思想比較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 年)，頁 69-70。

⁶⁴ 閻學通，「中國人看中國崛起」，閻學通、孫學峰等著，*中國崛起及其戰略*(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頁 62-63；閻學通，「中國崛起的實力地位」，閻學通、孫學峰等著，*中國崛起及其戰略*(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頁 81。

⁶⁵ 此即鄧小平所謂的「中國不要看輕自己，再怎麼樣也算是一極」的說法。見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前引書，頁 353。

⁶⁶ Susan Shirk, *China: Fragile Superpower*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106.

⁶⁷ 葉自成，*新中國外交思想*，前引書，頁 291-304。

⁶⁸ 閻學通，「中國崛起的實力地位」，前引文，頁 74-75。

⁶⁹ 例如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 2011 年 4 月 15 日於博鰲亞洲論壇上便表示，中國雖然取得舉世矚目的發展，但仍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面臨許多嚴峻的經濟、社會發展問題，要實現現

沒有對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做好心理準備，既發展出強國的身份認同，卻也同時繼續保有發展中國家的身份認同。⁷⁰這樣的現象反應出中國戰略菁英實際上並不清楚到什麼樣的階段，中國的物質力量才能使其符合其心目中真正的「強國」地位——是中共定義的「小康社會」，或中國軍事實力提升到擁有諸如航艦戰鬥群與其他先進軍事裝備，抑或與其他超強在各方面都並駕齊驅的綜合國力。

不過在 2008 年之後，由於中國的物質能力發展以及西方國家與美國在全球金融海嘯中的受創，越來越多中國官員相信中國已經躋身世界一流大國，應該得到與之相稱的待遇，⁷¹尤其是習近平在 2012 年 2 月訪問美國時對後者提出的要求在言詞上的使用已經自視為與美國平等的大國，似乎是中國已經準備擺脫過去「謙虛」的態度與「韜光養晦」的戰略，準備採取大國政治的外交戰略。⁷²

(二)、對中國地緣政治屬性的矛盾

同樣的矛盾也展現在中國對本身的地緣政治屬性認知上。由於西發利亞體系乃是以貿易與海權為基礎的國際體系，使得近代中國在海洋與陸地同時面臨嚴重的外部威脅，而列強威脅的性質與歷史上的威脅有極大的差異——列強的國家性質完全不同於以往的游牧帝國，列強的是擁有高科技的工業化國家，能獨立生產經濟發展所需之民生用品與戰爭所需之軍備，在作戰時間選擇上更不像游牧帝國與歷史上的農業帝國那樣受天候與作物生長季節的限制；列強施加給中國的海上威脅亦完全不是古代可以使用政治、經濟、社會等手段來「招撫」的海盜團體所能比擬，是有組織、以國家力量為支持的強大艦隊，這表示欲降低海上之威脅，實際上即等於必須在一場國際戰爭中獲勝才有辦法，而且也必須建立強大的艦隊才能與之對抗。

近代以來中國在海陸兩方面都面臨嚴重的國家安全威脅的前所未有的情況，加上中國在冷戰以後逐漸成為能源淨進口國，相當仰賴海洋從國外大量進口能源，使中國戰略菁英越來越重視海洋、海權與海軍對中國「民族復興」的重要性，以及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賦予濱海國家的海洋權益與當代中國戰略菁英最重視的國家主權連結，⁷³並從改善中國陸地資源短缺的角度，將中國的「海洋國土」視為未來中國可持續發展不可或缺的「生存空間」，⁷⁴遂產生一種帝國時代完全

代化和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另外解放軍總參謀長陳炳德在 2011 年 5 月訪問美國時則表示，美國人民的生活水準高於中國 12 倍，他經過這次訪問瞭解到解放軍的裝備太過落後，與美國差距太大，尤其海軍竟落後美國有 20 年的差距。徐子涵，「胡錦濤：中國實現共同富裕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人民網，2011 年 4 月 15 日，<http://finance.people.com.cn/GB/8215/210272/218687/14400426.html>；「陳炳德感嘆中國軍事設備落後：永不挑戰美國」，中國評論新聞網，2011 年 5 月 20 日，<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16/9/9/7/101699729.html?coluid=37&kindid=711&docid=101699729>。

⁷⁰ 李春福譯，文正仁著，**中國崛起的大戰略**，前引書，頁 230、240。

⁷¹ Lieberthal and Wang, "Addressing U.S.-China Strategic Distrust," *op. cit.*, p. 8.

⁷² Yang Hengjun, "Reading between the lines of Xi Jinping's U.S. visit," *China Media Project*, February 22, 2012, <http://cmp.hku.hk/2012/02/22/19518/>.

⁷³ 劉中民，**世界海洋政治與中國海洋發展戰略**(北京：時事出版社 2009 年)，頁 6-7。

⁷⁴ 中國戰略菁英從資源角度分析海洋對中國未來可持續發展具有絕對重要性，甚至是新「生存空間」的言論與著作不可勝數，茲舉兩篇較為突出的資料：王生榮主編，**金黃與蔚藍的支點：中**

不存在的，對海洋的迷戀，一方面希望中國與其他超強一樣成為海權強國，一方面又不能忽視中國本身的歐亞大陸陸權屬性，在兩個基本上互斥的地緣政治方向上擺盪，即使某些戰略菁英提出折衷的「海陸兼備、海洋為主」的發展方向，但卻始終沒有關於如何實現的明顯主張。

(三)、對現存體系與區域秩序不滿卻又必須盡力維持的矛盾

在半封閉的東亞地緣政治結構塑造出來的古老天下觀之中，中國自認為一實際上大多數時候也是一體系的中心，它可以在表面上制訂體系中各成員在階級化的政治秩序中的地位，以及成員與中國的互動原則；當中國古代帝國對既有秩序原則不滿時，它經常性的作法是在盡力推翻其所不滿的秩序與互動原則，或自我封閉視而不見者兩者中擇一。可是在全球地緣政治結構中，中國不僅只是其中的一員，而且根本不是體系的中心，雖然中國戰略菁英對中國在體系中的地位與經常受到西方國家的「羞辱」感到極為不滿，但一方面不可能做到如古代那樣的自我封閉，二方面衰弱的中國也不可能選擇推翻西發利亞體系中對其不利的政治秩序原則。而這種無可奈何的情況產生一種真正的矛盾：為了想要實施民族復興恢復強國地位，必須在和平的國際環境才辦得到，遂迫使中國必須接受體系與區域的既有秩序原則與安排，免得危及中國本身的發展，⁷⁵結果又延續了這些中國不滿的體系秩序與互動原則。

二、各層次地緣政治密碼

一般認為中國對外關係長期來說分為大國關係、周邊關係與第三世界等三個部分，⁷⁶但其實第三世界的比重在 1987 年以後的中國對外政策中比重即有明顯的下降，⁷⁷大國外交和周邊外交在 1990 年代以後的中國外交工作中逐漸加重成為新趨勢後，⁷⁸更可明顯地區分出周邊、區域與全球/亞太三個層次的地緣政治密碼。事實上，儘管中國戰略菁英的世界觀充滿矛盾，而且中國在冷戰時只是一個衰弱的區域大國，但中國自冷戰以來一直存在體系層級地緣政治密碼，亦即先後產生的「反霸權主義」、「反修正主義」、「多極化」與「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這些密碼的目的皆在謀求以各種手段恢復中國在體系中的超強地位與改變中國所不滿的既有體系秩序原則，因此並非後者取代前者，前者完全被摒棄不用，而

國地緣戰略論(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2001 年)，頁 299；張世平，「中國海洋開發意識差，海洋係中國未來生存空間」，求是理論網，2011 年 9 月 19 日，http://big5.qstheory.cn/gj/zgwj/201109/t20110919_110916.htm。

⁷⁵ 例如中國固然對美日同盟在冷戰後繼續維繫且不斷擴大適用範圍感到極為不滿，但又體認到美日同盟其實阻止了日本重新成為獨立的軍事強權，而不得不繼續接受美日同盟的存在。此外，中國也對既有的美中關係感到不滿，但同樣體認到美國的衰退對中國經濟的發展極為不利。Lieberthal and Wang, "Addressing U.S.-China Strategic Distrust," *op. cit.*, p. 9; Wu Xinbo, "The End of Silver Lining: A Chinese View of the U.S.-Japanese Alliance,"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9, No. 1(Winter 2006), pp. 119-130.

⁷⁶ 章百家，「90 年代的中國內政與外交」，郭德宏、王海光、韓鋼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專題史稿**，第 2 版(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 年)，卷五，頁 87。

⁷⁷ 葉自成，**新中國外交思想**，前引書，頁 65。

⁷⁸ 章百家，「90 年代的中國內政與外交」，前引文，頁 87-88。

是後者的操作概念包括前者，儘管前者的稱呼可能不再被使用：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與追求國際體系多極化包含反霸權主義，江澤民時期的新安全觀也繼承這三種密碼，胡錦濤時期的和平發展/崛起與和諧世界等概念則同樣涵蓋從反霸權主義到新安全觀的各種密碼，以及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獨立自主和不結盟等傳統外交政策指導。⁷⁹然而冷戰的結束、美國海權單極體系的出現、全球化與區域經濟整合等新現象之發展，又使新安全觀與和平發展/崛起對不結盟外交政策方針做出一定程度的修正：由於單極體系無法發展對抗美國的同盟，⁸⁰因此中國改以各種不同程度的「戰略夥伴關係」(Strategic Partnership)，以使中國在全球/亞太次體系與區域的戰略行動有更大的行動自由，試圖以此種異於同盟但又具有某種同盟意涵的政策來達成權力平衡之穩定作用。

儘管目前的和平發展/崛起密碼承接了毛澤東提出反霸權主義以後的各種密碼全球/亞太次體系層級密碼，但由於地緣政治結構的變化，各層次密碼的操作與冷戰時期並不完全一致，而且相較於冷戰時期甚至帝國時代的中國地緣政治密碼，周邊與區域地緣政治密碼更加重視海洋與國際貿易對地緣戰略的影響，逐漸跳脫以往大多限於政治意識型態層面與海防角度的大戰略思維。在 1993 年第十四屆三中全會之前，中國「計畫委員會經濟研究中心」(現在的「宏觀經濟研究中心」)曾提出大中小三個層次的「三角關係」戰略構想—大三角(中、日、美)，中三角(中國、亞洲四小龍、東協)，小三角(大陸、臺灣、香港)，並主張中國的最佳戰略選擇是「依靠小三角、爭取中三角、周旋於大三角」，以創造穩定的外部環境、繁榮中國經濟和促進中國的統一，⁸¹明顯表現出周邊、區域與亞太三個層級。雖然沒有直接證據顯示第十四屆三中全會接納了這一戰略構想，但從爾後中國的行動來看，三個三角關係某種程度上來說可視為冷戰後初期的中國地緣政治密碼，並從中看出中國的地緣政治密碼並非純粹的國內經濟發展與政權穩定等內政考量，亦開始回應體系加諸於其上的外部壓力與限制。⁸²

然而，「三個三角關係」戰略構想並非如李文志認為的那樣，具有統合 1990 年代中國的軍經發展戰略的意義，和透過大、中、小三角間的「遠交近攻」，達成在亞太地區建立「多層次統一戰線」布局，以平衡美國在亞太地區獨大的霸權地位的終極目標企圖，⁸³因為「三個三角關係」主要是從經濟層面出發，雖然也包含一定程度的政治考量，但畢竟不是完整的地緣政治密碼分析，而且隨著結構的發展與變化，更未必符合 2000 年代以後的情況。比較起來，王生榮與葉自成對中國的地緣戰略思維分析所提出的層次戰略比「三個三角關係」更符合地緣政

⁷⁹ 余精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國際新秩序觀的演進」，*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北京)，第 1 期(2009 年)，頁 91-95。

⁸⁰ Yuan-kang Wang, "China's Response to the Unipolar World: The Strategic Logic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Vol. 45, No. 5(October 2010), p. 556.

⁸¹ 黃范章，「東亞地區經濟的形勢及格局」，*世界經濟*(北京)，第 8 期(1993 年)，頁 10、12；黃范章、李大偉，「東亞經濟一體化進程、發展趨勢及中國的戰略思考——兼論日本地震對東亞經濟的影響」，*金融發展評論*(北京)，第 11 期(2011 年)，頁 73-74。

⁸² Wang, "China's Response to the Unipolar World," *op. cit.*, p. 555.

⁸³ 李文志，「中共的亞太戰略：海洋戰略的開展與挑戰」，蕭全政等著，*劇變中的亞太與兩岸關係*(臺北：業強出版社，1996 年)，頁 129。

治密碼的整體概念，儘管其本身的研究並不是專為了這個目的。故以下將以 1993 年的「三個三角」構想和王生榮與葉自成的戰略概念為基礎，分析冷戰以後中國各層次地緣政治密碼。

(一)、周邊層次

此一層次密碼的內容包括中國的核心利益，以及與中國同位於東北亞地緣政治區域內的次區域發展與相關安全形勢。1993 年的三角關係理論中代表周邊層次密碼的是所謂的「小三角」，而王生榮則認為是「確立以“環中國海”為一體化的國家戰略」，其主要目標是可持續開發、維護海洋權益和近海防禦等三個方面，而最重要的戰略樞紐是臺灣海峽。⁸⁴葉自成的觀點與此類似，認為近期的地緣戰略是「以臺灣海峽為中心的環中國海海洋戰略」，臺灣海峽是這一近期地緣戰略體系中的重點，南海則是另一個重要戰略取向。⁸⁵不過此一層次之密碼內涵相當複雜，不僅僅包括 1993 年構想提出的當時所指的臺灣與港澳三個地區，而且隨著中國在結構中地位的上升與港澳先後回歸中國統治，其他領土爭端與領土議題之重要性就更加被凸顯出來。

1. 核心利益範圍

周邊密碼同時受到民族復興世界觀與古代九州一統的觀念之影響，其具體表現就是中國在冷戰後，尤其是 2000 年代以後越來越常出現的「核心利益」(core interest)之表述內容。目前對中國的核心利益最常見與最權威的表述，⁸⁶來自胡溫政權中主管對外事務的國務委員戴秉國在 2009 年 7 月首輪美中「戰略與經濟對話」(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 S&ED)結束後發表的：第一是維護基本制度和國家安全，第二則是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第三則是經濟社會的持續穩定發展。⁸⁷戴秉國的三項範疇後來在中國國務院於 2011 年 9 月 6 日發佈的「**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之中，明確定義為六項具體目標：國家主權、國家安全、領土完整、國家統一、中國憲法確立的國家政治制度和社會大局穩定、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本保障。⁸⁸

根據戴秉國對核心利益的範疇界定與**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中國的周邊層次地緣政治密碼最主要的目標就是完成其所認定的中國統一目標—合併臺灣，這一部分與冷戰時期相較，並沒有明顯的改變。但是與冷戰時期比較明顯不同的地方在於，除了臺灣之外，被列為核心利益中的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目標，尚包括徹底消除西藏、新疆的分離主義對中國領土完整的威脅，亦對中國對臺灣、新疆與西藏的主權聲索之保衛，是最主要的核心利益與周邊地緣政治密碼。⁸⁹不過冷

⁸⁴ 王生榮主編，**金黃與蔚藍的支點**，前引書，頁 298-301。

⁸⁵ 葉自成，**中國大戰略**，前引書，頁 334-335。

⁸⁶ Michael D. Swaine, "China's Assertive Behavior, Part One: On 'Core Interests,'"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No. 34(Winter 2011), p. 5.

⁸⁷ 「首輪中美經濟對話：除上月球外主要問題均已談及」，**中國新聞網**，2009 年 7 月 29 日，<http://www.chinanews.com/gn/news/2009/07-29/1794984.shtml>。

⁸⁸ 「《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全文)：三、中國和平發展的對外政策方針」，**新華網**，2011 年 9 月 6 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9/06/c_121982103_4.htm。

⁸⁹ Swaine, "China's Assertive Behavior, Part One: On 'Core Interests,'" *op. cit.*, pp. 7-8.

戰後最明顯的變化之一，就是集中在東海與南海的海洋領土爭端取代冷戰時期以陸地劃界為主的領土爭端。由於海洋對中國的經濟發展越來越重要，以及因此產生的對海權的迷戀，臺灣對中國的周邊地緣政治密碼來說除了九州一統的傳統觀念之外，還加上了攸關中國海權是否能發展成功的地緣戰略重要性，被提倡中國地緣戰略應走向海洋的戰略菁英視為中國海權發展的最重要關鍵。⁹⁰

雖然史旺指出南海議題雖然是中國極為重視的領土爭端，但從來沒有被列入任何中國官方文件的核心利益之中。⁹¹然而，南海與東海兩個地區被列入中國周邊地緣政治密碼的重要目標是無庸置疑的，最主要的原因在於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給予濱海國家在領海、專屬經濟區、大陸礁層等地區的主權與主權權利，使其除了對南海諸島的主權聲索之外，亦產生對東海與南海的專屬經濟區與大陸礁層「領土化」的密碼。中國政府在 1990 年代且將「維護國家海洋權益」寫入中共的十四大、十五大報告以及政府工作報告中，把「國家海洋權益」與維護國家主權同樣置於戰略高度。⁹²中國在這些作為核心利益或周邊地緣政治密碼的領土與主權聲索上毫無餘地的態度，明顯是民族復興觀與九州一統概念的影響。

2. 穩定中國西部內陸與周邊國際環境

史旺認為中國基本制度與國家安全連結，以及中國社會與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等兩種核心利益是較少提及的層面，⁹³但由於同樣被納入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顯示其同樣是極為重要的周邊地緣政治密碼內涵。此兩種核心利益是冷戰後基於民族復興與富國強兵的願望，而產生的周邊層次密碼的第二種內涵，亦即建構穩定的週邊環境之意義。對中國來說，這樣的地緣政治密碼目標一方面在於降低外部國際環境對中國主權與政治制度存續的威脅，另一方面則著眼於將中國的經濟發展與周邊鄰國的結合，後者主要是指中國為了發展內陸省分，俾拉近相當嚴重的區域經濟發展不一致的情況，而設立的「西部大開發」與其他多個「次經濟合作區」的區域經濟發展戰略，希望藉助區域經濟整合的力量，⁹⁴與中南半島國家、俄羅斯、朝鮮半島、日本、中亞，甚至南亞等周邊國家形成緊密的區域或

⁹⁰ 張文木，*論中國海權*，第二版(北京：海洋出版社，2010年)，頁102；鞠海龍，*中國海權戰略*(北京：時事出版社，2009)，頁226-227、233、239；劉新華，「試論中國發展海權的戰略」，*復旦學報*(上海)，第6期(2001年)，頁71-72。

⁹¹ Swaine, "China's Assertive Behavior, Part One," *op. cit.*, pp. 8-10.

⁹² 孟凡明、許晨光，「海權思想的沿承與中國發展海權的辯證思考」，*新華網*，2010年5月10日，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theory/2010-05/10/c_1284016.htm。

⁹³ Swaine, "China's Assertive Behavior, Part One: On 'Core Interests'," *op. cit.*, p. 5. 此外，2012年2月16日，時任中國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在訪問美國時所做的一場正式演講中，要求美國必須尊重的中國「核心利益」亦無南海，只有美國直接涉入的臺灣與西藏，Edward Wong, "Chinese Vice President Urges U.S. to Respect 'Core Interests',"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6, 2012, <http://www.nytimes.com/2012/02/16/world/asia/vice-president-xi-jinping-of-china-urges-united-states-to-respect-core-interests.html>.

⁹⁴ 中國開發西部內陸並不始於西部大開發戰略與1990年代的三個三角戰略構想，中共自建立政權起即有意平衡東部沿海與西部內陸之間的發展差距，故從「一五」計畫起，「內地傾斜、均衡佈局」就始終是中國內部區域發展的政策基調，爾後更大規模的「三線建設」，其實也就是在此種基調的延續，只是將國防建設的重要性置於首位而已。而此種以國家力量強調均衡內部區域經濟發展的基調，直至1978年鄧小平實施改革開放政策時才為了優先發展東部地區經濟而遭廢棄。見李京文，*走向21世紀的中國區域經濟*(桂林：廣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207、272。

次區域經濟整合。⁹⁵由於中國的陸地鄰國大多在中國的西部地區與其接壤，西部地區亦為中國少數民族的主要分佈區，西部大開發本身即含有穩定中國西部邊境社會局勢，以免區域發展不均使少數民族衍生分離主義，產生中國國家分裂威脅的戰略目的。⁹⁶當然除了經濟整合之外，中國亦希望利用政治手段與周邊國家一起合作穩定其西部內陸，避免遭到民族分裂勢力、宗教極端勢力與國際恐怖勢力等「三股勢力」的破壞，⁹⁷而危及其國家統一與建設，上海合作組織便是最明顯的作為。

3. 朝鮮半島

中國的朝鮮半島政策是另一個冷戰結束後，為了實現建構穩定周邊國際環境的地緣政治密碼，而出現明顯變動之處的政策。雖然中國在朝鮮半島的主要利益之一是不允許出現一個與中國敵對或不友好的統一國家，或者由美國或其他與中國敵對的大國主導統一之後的朝鮮半島，利用半島作為封鎖和遏制中國的工具，⁹⁸似乎應歸入區域地緣政治密碼而非週邊地緣政治密碼，但由於朝鮮半島與中國同時位於東北亞地緣政治區內，且與中國相鄰，其局勢發展直接影響中國在東北亞陸地邊界的穩定、東北與華北和朝鮮半島海陸相鄰省區的發展與安全，故仍應歸入週邊地緣政治密碼內。

傳統上，朝鮮半島對中國的地緣政治價值主要在西元十世紀之後出現核心位於滿州的帝國，以及中國本身的政治重心逐漸東移至北京的結構形式，朝鮮半島上的國家因能牽制位於滿州的帝國，又與中國本身有密切的文化聯繫，而被中國視為最重要的安全合作夥伴與朝貢體系行為者。時至今日，中國雖然不再因首都之位置而決定其地緣戰略方向，朝鮮半島也不再因此而展現出對中國的最大地緣戰略價值，但其緊靠中國的政治核心仍是不爭的基本地理事實，這使得北韓始終被中國視為與美國、日本之間的戰略緩衝國，也始終不敢輕忽北韓「崩潰」後產生的大量難民問題對中國內部穩定、區域國際政治與整體國際形象的影響。此外，朝鮮半島在冷戰前緊鄰中國最重要的東北重工業區基地，在冷戰後則臨接中國極為重視的「環渤海經濟區」，後者包括北京市、天津市、遼寧省、河北省與山東省，在中共十四大中被列為與「長三角」、「珠三角」同等地位與重要性的經濟區，被認為是繼長江三角洲與珠江三角洲之後的中國經濟增長「第三極」、「拉動中國北方地區經濟發展的發動機」。⁹⁹換言之，朝鮮半島在地緣政治結構中對中國的地緣政治價值，可能隨著中國在經濟與海洋方面的持續發展所導致的結構變化而越來越重要。

⁹⁵ 黃范章，「東亞地區經濟的形勢及格局」，頁 12；胡鞍鋼主編，**地區與發展：西部開發新戰略**（北京：中國計畫出版社，2001 年），頁 199-204。

⁹⁶ 董鎖成、李周、魏曉東著，**中國西部大開發戰略研究**（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9 年），頁 31-33。

⁹⁷ 趙常慶等著，**中亞五國與中國西部大開發**（北京：昆侖出版社，2004 年），頁 344。

⁹⁸ 葉自成主編，**地緣政治與中國外交**（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 年），頁 443-447；楚樹龍、金威主編，**中國外交戰略和政策**，前引書，頁 175。

⁹⁹ 吳浙，「環渤海地區經濟——競爭中的發展」，陳德昇主編，**中國大陸區域經濟發展：變遷與挑戰**（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3 年），頁 262。

整體來說，中國在朝鮮半島的地緣政治利益除了上述的不允許出現敵對中國的統一朝鮮半島這一未來局勢發展之外，還視朝鮮半島的統一為東北亞能否成功經濟合作與區域整合的重要關鍵，特別是對中國東北省區來說甚為重要的次區域整合計畫—圖門江流域國際開發合作、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以及中、日、韓、俄四國在中國東北與俄國遠東地區的能源合作。現階段在短程來說最主要的是維持朝鮮半島的穩定與無核化，以免危及東北亞地區乃至世界的和平，如此一來將立刻危及中國最重視的內部發展，而首當其衝的就是中國東北地區；其次，中國在朝鮮半島的中期利益是要求朝鮮半島的統一進程應由兩韓自行決定，外國勢力尤其是美國不應主導，以免美軍在半島統一後仍留駐半島，中國視此為最嚴重的安全威脅之一，故中國與北韓的立場一致，即是在統一的過渡階段不應有美軍的存在，最低限度則是美軍不應在半島統一後繼續留駐。¹⁰⁰

雖然中國仍維持冷戰以來支援北韓對抗美國威脅的傳統，而且視北韓為阻擋美國在冷戰後強化針對中國的東亞同盟體系、飛彈防禦系統與軍事前進部署等措施的緩衝。¹⁰¹但北京與平壤之間實際上存在著高度的不信任，這不僅有歷史與意識型態的因素—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共視金日成為依附蘇聯的「走資派」—亦有冷戰後南韓在東北亞崛起的結構變化之影響，中國與南韓在 1992 年的建交對北韓是極為強烈的刺激，而由於蘇聯解體與俄羅斯的衰弱，導致北韓決定走向發展核武以尋求自保，並敵視中國。¹⁰²反之，中國與南韓的關係卻因為中國成為南韓首要貿易夥伴、南韓作為環渤海區的主要投資國，以及中韓雙方在 2008 年建立戰略合作夥伴關係而不斷加深。這使得中國陷入兩難之局面：在傳統思維的影響下必須盡力維持北韓的存在與朝鮮半島局勢的穩定以提供與美國在東北亞的戰略緩衝，並確保中國能有穩定的國際發展環境，但一個敵視中國的北韓又使中國對北韓的影響力甚為低落，使中國很難有把握維持朝鮮半島的穩定。加上美國在 2010 年 11 月延坪島砲擊事件後派遣航艦戰鬥群進入黃海與南韓海軍舉行聯合軍演，嚴重刺激許多中國戰略菁英—特別是解放軍—的心理。¹⁰³

上述這些發展使得部分中國戰略菁英為了追求中國本身的利益而開始鬆動

¹⁰⁰ 葉自成主編，*地緣政治與中國外交*，前引書，頁 392-393；楚樹龍、金威主編，*中國外交戰略和政策*，前引書，頁 171-176。

¹⁰¹ Avery Goldstein, "Across the Yalu: China's Interests and the Korean Peninsula in a Changing World," 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 Ross ed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37.

¹⁰² 作者在 2011 年 11 月 25 日在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參與中國延邊大學姜龍範教授發表的演講時，根據姜龍範的描述，北韓認為美國還比中國更可信賴，其核武的主要目標針對中國的意味遠比針對美國濃厚。而同一場演說中，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美歐研究所研究員鄭端耀則宣稱，他在 2006 年在南韓參與一場學術研討會時，曾在會場上聽聞與會的南韓前外長韓昇洲轉述，後者在北韓首次試爆其核武時曾於北韓訪問，親眼見到北韓人民興高采烈地表示，該國終於有了「對付中國」的武器。

¹⁰³ 羅援，「武力炫耀的背後是霸道——評美國航母擬赴黃海參加軍演」，轉引自中國國防部網站，2010 年 8 月 12 日，http://news.mod.gov.cn/headlines/2010-08/12/content_4183275.htm；楊毅，「武力炫耀的背後是霸道——評美國航母擬赴黃海參加軍演」，轉引自中國國防部網站，2010 年 8 月 13 日，http://www.mod.gov.cn/big5/gflt/2010-08/13/content_4183770.htm。

對北韓的態度。¹⁰⁴不過整體來說，在追求週邊環境穩定的周邊密碼指導下，中國還是希望盡力維持朝鮮半島的穩定，同時加強與南韓的經濟合作。

(二)、區域層次

此一層次密碼涵蓋的地理範圍主要是中國所在以及與中國相鄰的亞洲各地緣政治區，包括東北亞、東南亞、南亞與中亞，不過其範圍隨著時代而有所差異，在冷戰時期，中國的區域地緣政治密碼集中於抗拒兩大超強在東南亞、東北亞與南亞建立勢力範圍並以此阻擋甚至作為夾擊中國的地區，因此其競爭對手主要是越南。但蘇聯解體與冷戰結束導致兩大超強逐步撤出東南亞，東協亦納入原來與其敵對的越南和受越南支配的寮國與柬埔寨，成為涵蓋東南亞全境的區域國際組織。這些結構上的變化加上中國本身的地緣政治模式的改變－經濟快速發展與高度的能源需求－使得區域密碼必須有所轉變與擴大範圍以適應新結構。

三個三角關係中的「中三角」對應於區域地緣政治密碼，但由於其考量以經濟為主，故其目標只限於當時的東協與亞洲四小龍等經濟上較為發展的經濟體，沒有對整個亞洲地區的全面考量，甚至認為可以「抓兩頭，帶中間」－著重處理好與大三小與小三角的關係，特別是中美關係與兩岸關係，即可確保中國與東協、亞洲四小龍的經貿合作關係得到順利發展。¹⁰⁵王生榮等人則認為區域地緣戰略是「堅持以“睦鄰友好”為中心的周邊戰略」，其目標著重於和周邊國家發展友好關係，而對象國則是那些與中國有重大邊界爭議的國家如俄羅斯、越南與印度，以及與中國維持長期友好關係的區域大國或其他國家，如北韓與巴基斯坦。¹⁰⁶但是他在區域層級中卻沒有提到日本，而從他對第三層體系地緣政治密碼的分析，可以看出他對日本的地位如非不重視，亦相當混淆不清。而葉自成的中程地緣戰略，則是「以穩定周邊為中心的東亞大陸地緣戰略」，不過他認為內涵是中國與鄰國之間是否存在邊界領土糾紛與跨邊界的民族宗教問題。¹⁰⁷

無論是「中三角」或王生榮、葉自成等人的概念，都並非中國區域地緣政治密碼的全貌。根據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中國的區域目標是「奉行睦鄰友好的地區合作觀」，而其主要區域目標則是中國所在的亞洲地區。¹⁰⁸由此看來，中國的區域地緣政治密碼目標絕不限於東北亞或東南亞，而應該視為同時包括東北

¹⁰⁴ 此種發展並不十分明顯，且主要是以中國外交部與部分學者為主，還不是主流觀點。楚樹龍是其中最主要的人物，其在 2011 年 10 月 18 日於首爾一場關於中韓安保對話的國際會議中表示，中國與北韓在許多領域的態度既不友好也不合作，如果北韓遭到南韓或美國攻擊，中國將會呼籲以外交途徑尋求解決，而且中國領導階層已經逐漸接受由南韓主導朝鮮半島統一，甚至即使未來美國持續在朝鮮半島駐軍，中國也不認為統一的韓國將會與中國敵對。姜遠珍，「陸學者：北韓遭襲，中國不軍援」，中央社，2011 年 10 月 18 日，<http://www2.cna.com.tw/ShowNews/Detail.aspx?pNewsID=201110180171&pType1=PF&pType0=aOPL&pTypeSel=&pPNo=3>。另外金一南也曾提到，北韓的核武危機使江澤民政府感到非常氣憤，中國外交部的不少專家皆曾提出放棄金正日的建議，中共中央黨校的張連魂也曾提出與美國合力拔除北韓核武能力的建議，見艾文革，「中國戰略及轉向－中國將在寮、緬、泰武裝護航」，*全球防衛雜誌*，第 328 期(2011 年 12 月)，頁 12-13。

¹⁰⁵ 黃范章、李大偉，「東亞經濟一體化進程、發展趨勢及中國的戰略思考」，前引文，頁 74。

¹⁰⁶ 王生榮主編，*金黃與蔚藍的支點*，前引書，頁 301-303。

¹⁰⁷ 葉自成，*中國大戰略*，前引文，頁 335-336。

¹⁰⁸ 「《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全文)：三、中國和平發展的對外政策方針」，前引文。

亞、東南亞，乃至南亞與中亞等與中國相鄰的亞洲地區。從這個觀點來看，「中三角」的純經濟層面觀點最為過時與不適切，而王生榮等人的概念雖然較進一步，但是他並沒有釐清與中國相鄰的國家是否都可歸入區域地緣政治密碼範疇，事實上僅有能夠主導這些與中國相鄰的地緣政治區的區域內行為者才算是中國真正區域地緣政治密碼的對象，而那些僅與中國相鄰的中小型國家與中國的邊界議題則僅能納入周邊地緣政治密碼內。因此黃范章與王生榮等人的觀點都並非中國區域地緣政治密碼的全貌，反而樓耀亮的觀點較接近白皮書的要旨。

此一層次的密碼主要受到世界觀的影響，以及全球/亞太次體系層級密碼的指導，企圖在盡力維持包括東北亞、東南亞兩個中國核心區直接接壤地區的和平與穩定，與王生榮、葉自成等人的概念相同，亦即所謂爭取和平國際環境以實現中華民族之復興。但隨著中國國力不斷提升，區域地緣政治密碼尚包括完成中國的標準地緣政治程序—壓倒中國在東亞的其他地緣政治競爭對手的影響力，組織東亞地緣戰略領域並成為支配此領域的超強的積極內涵。在這個中程戰略目標中，東南亞、東北亞和南亞連為一體構成影響中國安全的三大戰略區域，¹⁰⁹不能讓任何大國控制這三大地區，以免中國的安全遭到威脅，在三個地區都存在大國的情況下更會遭到包圍。¹¹⁰其中最重要的是東南亞，該區在冷戰後不僅呈現權力真空，更是中國海上運輸、西部大開發與其他次區域經濟圈，以及敏感的臺灣與南海等核心利益與領土爭端所在，是中國四種地緣政治利益重合之處，以及中國、美國、日本、印度等超強與強權在東亞的主要競爭之處。東南亞與南亞是中國較能展現較積極攻勢手段的地區，但其在強權政治中的重要性則遠超過南亞，反之，東北亞由於直接面對美、日兩國，中國主要以戰略守勢為主。

冷戰結束之初，由於中國的力量仍十分微弱，在結構中的地位亦僅限於區域大國，故其操作區域地緣政治密碼時只能「爭取」區域國家的支持並設法阻止任何強權或乃至超強主導上述三大地區。然而隨著中國力量的大幅提昇並在結構中上升至強權的地位，甚至可能進一步成為超強，對區域地緣政治密碼的操作擺脫 1990 年代的較消極態度，在經濟上表現出「團結中三角」，¹¹¹而在安全上則認為中國既身為大國，¹¹²就必須營造中國自己的安全範圍與組織屬於中國的緩衝區才能維護中國國家安全，這些都屬於積極的觀點。因此中國與幾乎全部的東亞國家建立了不同程度的「夥伴關係」，並改變 1990 年代對多邊主義外交與信心建立措施(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 CBMs)的疑慮，不僅大力介入東亞區域與次區域經濟整合，而且在 2000 年代逐漸加強融入區域多邊主義外交架構之中。¹¹³儘管

¹⁰⁹ 朱聽昌主編，*中國周邊安全環境與安全戰略*(北京：時事出版社，2002年)，頁31。

¹¹⁰ Andrew Nathan and Robert S. Ross, *The Great Wall and the Empty Fortress: 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1998), pp. 100-101.

¹¹¹ 黃范章、李大偉，「東亞經濟一體化進程、發展趨勢及中國的戰略思考」，前引文，頁75。

¹¹² 艾文革，「中國戰略及轉向—中國將在寮、緬、泰武裝護航」，前引文，頁12。

¹¹³ 關於中國在 1990 年代以後對多邊外交與信心建立措施態度的轉變，請參考 Thomas J. Christensen, "China, the U.S.-Japan Alliance,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4(Spring 1999), pp. 49-80; Thomas J. Christensen, "Fostering Stability or Creating a Monster? The Rise of China and U.S. Policy toward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1, No. 1(Summer 2006), pp. 81-126.

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宣稱其區域目標絕不謀求地區霸權與勢力範圍。¹¹⁴這些行動的主要目的之一固然如下文討論當代中國戰略文化時將分析的，是為了中國本身的發展，但同時也存在中國戰略菁英絕不願意承認，但實際上卻是鄰國最憂慮的議題－排斥美國與東亞以外大國對東亞的影響力以組織受中國領導的東亞地緣戰略領域，換句話說，也就是完成中國本身的標準地緣政治程序。

美國與中國的競爭為全球/亞太次體系層次，不僅限於東亞內部，故非中國取得東亞的領導權並組織東亞地緣戰略領域的首要區域競爭對手；俄羅斯雖亦是亞太的強權之一，且仍與中國在中亞地區存在地緣政治利益衝突與競爭關係，但中國視俄羅斯為牽制美國的重要棋子並相當依賴此種關係，¹¹⁵使得中俄關係實際上亦屬於亞太次體系層級而非東亞區域層級。故中國在東亞面臨的區域競爭對手，主要是日本、印度，和在東亞區域整合中居於關鍵主導地位的東協。洛茲曼 (Gilbert Rozman) 指出，中國正進行一場複雜的外交戰略操作以圖達成此一目標：利用與俄羅斯的關係來牽制美國在東亞的行動，另外誘使日本成為中國的區域夥伴以離間美日聯盟關係並弱化日本在東南亞與朝鮮半島的角色；而雖然中國願意與印度加強合作關係，但又利用巴基斯坦來迫使印度的注意力集中於南亞；此外，中國還利用與北韓、緬甸等東亞邊緣化國家的雙邊關係，作為影響區域發展的籌碼。¹¹⁶這樣的歸納其中除了巴基斯坦與緬甸在 2011 年開始逐步改善與印度以及外界的關係之外，大體上是正確的分析。

1. 日本

中國在東亞區域的首要區域競爭對手無疑是同為強權的日本，後者是唯一沒有與中國建立戰略夥伴關係的東亞大國，雙方只有達成「戰略互惠關係」。這乃是結構改變使中國與日本皆成為強權，以及日中在冷戰後出現許多區域政治、經濟競爭，以及雙方海洋戰略控制能力均有所突破，¹¹⁷導致雙方在互不信任的情況下自然產生的結果，並非單純的歷史因素使然，畢竟中日兩國的歷史宿怨由來已久，日本也比中國更早在冷戰後期就尋求主導亞洲區域整合，可是在冷戰時期由於蘇聯的存在，雙方並沒有凸顯出明顯的敵意與互相視為競爭對手，而是在冷戰後因原來的共同威脅蘇聯消失後才逐漸顯現。

對中國來說，日本與中國的競爭除了東海經濟海域與油氣田等屬於周邊範疇的領土爭端之外，遍佈東亞與橫跨政治、經濟等多方面：¹¹⁸日本為東亞最關注臺灣問題的國家，認為中國在 1995/96 年臺海飛彈危機中的行為顯示中國有意在區域挑戰美國的地位並展現其權力；中國可能使用其遠洋海軍能力切斷日本的海上交通線；中國崛起使其與日本競爭東亞整合的領導地位，並危及日本與東協的「特

¹¹⁴ 「《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全文)：三、中國和平發展的對外政策方針」，前引文。

¹¹⁵ Gilbert Rozman, *China's Strategic Thought toward Asi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 144.

¹¹⁶ *Ibid.*, p. 5.

¹¹⁷ 日本在冷戰後的海洋戰略能力發展，請參考 Toshi Yoshihara and James R. Holmes, "Japan's Emerging Maritime Strategy: Out of Sync or Out of Reach?"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 27, No. 1 (Jan/Feb 2008), pp. 27-43.

¹¹⁸ Christopher W. Hughes, "Japan's responses to China's rise: regional engagement, global containment, dangers of collisi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5, No. 4 (July 2009), pp. 840-841.

殊關係」；中國崛起在 2000 年代造成南韓與中國的接近；日本憂慮東亞國際秩序可能轉變為一種新的「中國世界秩序」。最後，中國認為日本藉由美日安保條約修訂所帶來的 1997 年與 1999 年防衛指針改訂，取得協助美國干涉甚至入侵亞太各國以及介入臺灣軍事衝突的依據。¹¹⁹因

此三個三角關係理論主張建立多個次經濟合作區的目的，不僅在於取得同為發展中國家的東協諸國之支持，也在於減少國家對日本與美國的經濟依賴並削弱後兩者當時既有的經濟領導地位，甚至要將當時日本推行的「雁行模式」割裂為數段，¹²⁰以阻止日本領導東亞經濟發展，並弱化日本對東南亞和朝鮮半島的影響力，改由中國本身替代。進入 2000 年代之後，雖然中國已經瞭解美日安保體系制止了日本向外發動軍事擴張，但也無法阻止日本在東亞取得政治大國的趨勢，¹²¹不過中國仍極力阻止日本取得東亞政治、經濟整合主導權的行動不僅表現在互相爭奪東亞區域經濟整合與安全議題的主導權上，以及阻止日本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以進一步獲得更高的國際地位來支持其爭奪東亞整合的主導權，由中國曾表示只要印度放棄與日本一起爭取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次，中國可以支持印度「入常」的條件交換說，¹²²即可看出中國最大的區域競爭對手實為日本。

2. 印度

第二個中國區域密碼的對象是印度。¹²³冷戰結束之前，印度並非位於中國的區域密碼之中，兩國的爭議在邊界議題與西藏獨立問題，¹²⁴屬於周邊層次而非區域層次。在冷戰之後才因為彼此的崛起而使印度逐漸成為中國區域地緣政治密碼的主要對象。

印度在中國的區域地緣政治密碼中佔有重要且複雜的地位，一方面，印度是中國僅次於俄羅斯的第二大陸地鄰國而且位於西藏之旁，中國需要維持與印度的友好關係才能保持穩定的週邊環境，並遏制印度境內以流亡藏人為主的藏獨勢力對西藏的影響。但另一方面，隨著中印的崛起，印度與中國之間的衝突面向也從領土爭端逐漸擴大到其他區域甚至全球層面，議題也由安全擴大至經濟等其他領域，霍斯拉格(Jonathan Holslag)指出印度與中國之間的衝突包括四個面向，分別

¹¹⁹ 樓耀亮，**地緣政治與中國國防戰略**(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頁 176-177、182。

¹²⁰ 黃范章，「東亞地區經濟的形勢及格局」，前引文，頁 12-13。

¹²¹ 周建明，「亞太格局與中國的東亞戰略」，胡鞍鋼主編，**中國大戰略**(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 294-295、299。

¹²² 此據報導為中國國務委員戴秉國在印度毛派共黨領導人耶楚里(Sitaram Yechury)在 2011 年 7 月中訪問中國時的意見陳述。Ananth Krishnan, "China ready to support India bid for UNSC," *The Hindu*, July 16, 2011, <http://www.thehindu.com/news/international/article2233806.ece>.

¹²³ 儘管中國在 2006 年 11 月與印度的**聯合宣言**中提到雙方是多極化國際秩序中的兩個主要國家，中印關係具有全球戰略意義，對未來國際體系也產生影響，似乎顯示印度應為中國的體系層級而非區域層級密碼的對象，但該聯合聲明中對中印關係的發展與合作區域，絕大多數仍侷限於雙邊關係與亞洲地區，故本章仍將印度置於中國的區域地緣政治密碼中。「中國和印度發表《聯合聲明》(全文)」，**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06 年 11 月 21 日，<http://www.fmprc.gov.cn/chn/pds/ziliao/1179/t281112.htm>。

¹²⁴ 葉自成主編，**地緣政治與中國外交**，前引書，頁 443-447。

是與西藏、臺灣相連的中印領土爭端，中國在這方面若採取較為妥協的立場將會危及其在西藏與臺灣議題的立場，而印度政府則會危及本身的政權存續；巴基斯坦議題；區域影響力；海外市場的競爭與進入。¹²⁵

不同於日本，中國雖與印度有嚴重的邊界衝突，而且中國戰略菁英從冷戰時期起就認為印度的大戰略繼承了英國在南亞的霸權主義傳統，但中國在冷戰時的衝突中明顯佔上風，在冷戰後的發展又大幅超越印度，因此對印度沒有像日本那樣的民族主義仇恨存在。雖然中國戰略菁英也承認雙方都沒有對彼此的深入瞭解，但是由於中國在面對印度時佔了上風，使得中國戰略菁英指責印度存在明顯的中國威脅論是印度對中國的理解低於中國對印度的理解，而且普遍存在對印度的輕視心態，認為印度與中國相異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制度不僅阻礙了印度的發展速度，而且導致印度的能力低落，無法支援印度的大戰略，¹²⁶不是中國真正的威脅與競爭對手。中國戰略菁英還喜歡引用鄧小平在 1982 年對中印關係「既不存在中國對印度的威脅，也不存在印度對中國的威脅」，以及鄧小平在 1987 年表示認為中印都發展起來才是真正的「亞洲世紀」或「亞太世紀」到來的說法，¹²⁷來證明中印之間不存在根本的利益衝突與威脅。

但是鄧小平的發言是在 1980 年代，而 1987 年的發言則顯示至少對鄧而言，他認識到印度對中國的戰略重要性已經超越周邊層次，唯有一個能在區域上與中國合作的印度，才能進一步使中國達成多極化的最終目標。這可視為中國將印度納為區域地緣政治密碼對象之始，但是其重要性並沒有受到重視，因為當時的印度與中國皆只是體系中力量微弱的區域大國而非扮演主要角色的超強與強權。但是當中國在本世紀發展為結構中的強權，印度的力量亦提升為主要的區域大國甚至可能朝向強權發展時，印度在中國區域地緣政治密碼中的角色就漸趨明顯與複雜，而且正式成為中國區域地緣政治密碼的競爭對手。雖然大部分的中國戰略菁英對印度大戰略的最終目標仍無共識，¹²⁸但是他們卻一致認為印度面對的挑戰太多，未來難以達成類似中國這樣的崛起，而且沒有改變輕視印度的心理，認為印度的實力與戰略方向都還不「夠格」作為中國的戰略敵人或對手，中國可以輕易反制印度。

不過從現實上來說，取得核武國地位的印度以控制印度洋為戰略目標而建立強大的海軍，加上其能輕易威脅中國利用跨印度洋海上戰略交通線的地理位置，

¹²⁵ Jonathan Holslag, "The Persistent Military Security: Dilemma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32, No. 6(December 2009), pp. 812-814.

¹²⁶ 高一中譯，Stephen Philip Cole 著，*印度：成型中的強權*（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3 年），頁 433-437。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戰略菁英與 1990 年代開始運用綜合國力評估體系中各大國的國力以作為大戰略制訂的依據時，印度的真實力量與其對中國的威脅程度就由於評估方式的差異而在中國戰略菁英中引發激烈的辯論。Michael Pillsbury, *China Debates the Future Security Environment* (Honolulu, Hawaii: University Press of the Pacific, 2005), pp. 138-140.

¹²⁷ 以上鄧小平的說法見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前引書，頁 19、282。

¹²⁸ Taylor M. Fravel, "China Views India's Rise: Deeping Cooperation, Managing Differences," in Ashley J. Tellis, Travis Tanner, and Jessica Keough ed, *Strategic Asia 2011-12: Asia Responds to Its Rising Powers, China and India* (Seattle and Washington, D.C.: 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2011), pp. 74-75.

以及 2007 年以來與阿曼、馬達加斯加、莫三比克、茅里西斯與塞席爾等印度洋周邊國家簽署海洋安全協議乃至設立海軍設施等作為，¹²⁹更加上印度制訂「東望政策」(Look East Policy)插手東南亞乃至南海事務，以及美印關係之改善、日印戰略合作關係的推動，這些改變都使中國越來越無法忽視印度對中國的挑戰，所謂的「中俄印」戰略合作，基本上就是中國明確將印度列為其區域地緣政治密碼主要對手的一種反應，部分中國菁英亦開始提防印度強大之後與中國產生激烈的競爭或干擾中國的崛起，¹³⁰某些倡導中國發展海權的戰略菁英甚至認為印度是美國衰退之後對中國「可持續發展與生存」最大的對手，¹³¹溫家寶在 2005 年 3 月稱中印應永遠和平的發言，¹³²也是承認印度在中國地緣政治密碼中的地位已經躍升至區域層次，是中國重要區域競爭對手與合作夥伴的證明。

3. 東南亞地緣政治區域

雖然東協的力量比起日本與印度都要弱小許多，卻因為其成員國在結構中最多不過是區域大國，組織的物質力量與能力皆不像歐盟那樣強而有力，而得以在中、日兩強權妥協下取得東亞政治、經濟區域整合的實質主導權。此外，東南亞已成為中國重要的經濟發展資源來源、人員與文化交流的重要夥伴，以及中國企業走向世界的跳板，這使得中國學者們認為，在中國尚未能真正成為超強之前，必須也只能先立足於近鄰，只有得到遠比中國在各方面都弱小的東協國家的認同，中國的和平崛起才能駁倒中國威脅論，確保中國的強國地位並更有效地擴展其戰略利益和增加在全球的影響，東協也才能作為中國擴展外交與地域上的空間，協助中國遏制日本與美國。¹³³

然而中國與東協的關係並不非如此平順，即使在經濟領域亦然，東協因而成為日本與印度之外，第三個中國區域地緣政治密碼的競爭對手。中國與東協的在貿易與產業型態的相似性使其彼此的競爭性更勝於互補，¹³⁴加上東協的重要成員國越南、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皆捲入與中國程度不一的南海領土爭端之中，這使東協一方面利用「東協加N」自由貿易區進行東亞區域整合的來抵銷中國的競爭，另一方面在安全政策上又同時拉攏美國、日本、印度與澳洲來平衡中國的海權發展。這些舉動不僅阻礙了中國實施標準地緣政治程序，使其感到在南海議題上受到區域外國家的干涉，越南、菲律賓等與中國有嚴重領土爭端的東協成員國希望以東協為整體來與中國在南海議題中對抗，更使中國感到難以對付。這些

¹²⁹ David Brewster, "The Australian-India Security Declaration: The Quadrilateral Redux?" *Security Challenges*, Vol. 6, No. 1(Autumn 2010), pp. 7-8.

¹³⁰ 丁力，**地緣大戰略：中國的地緣政治環境及其戰略選擇**(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 年)，頁 406；「社評：中印沒有成為“戰略敵人”的理由」，**環球網**，2011 年 11 月 29 日，<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1-11/2215857.html>；龍興春，「印度仍是可團結的力量」，**環球網**，2011 年 11 月 30 日，<http://opinion.huanqiu.com/roll/2011-11/2221898.html>。

¹³¹ 章世平，**中國海權**(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1998 年)，頁 419。

¹³² 「直播實錄：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答記者問」，**人民網**，2005 年 3 月 14 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4/3241551.html>。

¹³³ 楚樹龍、金威主編，**中國外交戰略和政策**，前引書，頁 186-188。

¹³⁴ John Wong and Sarah Chan, "China-ASEAN Free Trade Agreement: Shaping Future Economic Relations," *Asian Survey*, Vol. 43, No. 3(May/June 2003), p. 517.

舉動都使中國學者很早(1997)就警惕東協可能與美、日一起在東亞確立以中國威脅論為基礎的安全框架，¹³⁵故雖然在目前承認東協對區域整合的主導地位，但視東協的更進一步強化為中國在區域議題上必須面對的重要挑戰。¹³⁶

(三)、全球/亞太次體系層次

中國的全球體系層級地緣政治密碼在冷戰前後有極大的差異。冷戰時，特別是在毛澤東時期，由於毛澤東乃深受意識型態理想影響的領導人，導致中國的全球地緣政治密碼操作受到意識型態的支配超過戰略菁英基於世界觀對國家利益的評估：1950年代的反霸權主義密碼認為社會主義將擊敗資本主義並擴展至全球，因此完全依附蘇聯的「一邊倒」外交政策來對抗美國，但同時又將自己定位於第三世界國家，與印度、蘇聯、南斯拉夫爭奪第三世界國家以及「不結盟」(non-alignment)集團的領導地位；¹³⁷1960年代毛澤東蓄意挑起與蘇聯的意識型態之爭，「反蘇修」成為反霸權主義密碼最主要的內涵，欲將體系「三分」為帝國主義、修正主義與馬列主義，讓毛澤東成為世界革命領袖，¹³⁸領導馬列主義國家與美國帝國主義和蘇聯修正主義相抗衡；蘇聯在1969年珍寶島事件後真正全面與中國敵對，中國感受到來自蘇聯的巨大軍事入侵威脅與在亞洲策動的圍堵壓力，陷入同時與兩大超強敵對的孤立地位，迫使毛澤東改採與美國接近的外交政策，分別提出「一條線」、「一大片」、「三個世界」等新外交政策指導，避免中國以區域大國的地位陷入同時與兩超強在意識型態與軍事方面的對抗。¹³⁹意識型態的支配力量直到1980年代之後才被國家利益所取代，但「蘇修」仍是全球地緣政治密碼的主要目標，並連帶影響中國產生對抗越南在中南半島的勢力範圍擴張的區域地緣政治密碼。

冷戰後期的1980年代中期與1990年代初期，中國的全球體系層級密碼逐漸轉想推動體系的多極化與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鄧小平在1990年3月就曾指出「世界格局」正朝向多極化發展的趨勢，他在1988年與1989年也都曾指出世界應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尤其在1990年年更認為中國在國際舞台上要「積極推動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¹⁴⁰冷戰結束後，這兩種密碼皆出現在江澤民與胡錦濤時期的十四大(1992年)、十五大(1997年)、十六大(2002年)與十七

¹³⁵ 出自黃平在1997年的博士論文「東盟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轉引自樓耀亮，**地緣政治與中國國防戰略**，前引書，頁179。

¹³⁶ 朱聽昌主編，**中國周邊安全環境與安全戰略**，前引書，頁308-312。

¹³⁷ 周萬，「與中蘇爭奪第三世界：1958-1959年鐵托的亞非之行」，沈志華、李濱主編，**脆弱的聯盟：冷戰與中蘇關係**(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頁266-299；杰·弗里德曼，「1960年代蘇聯對發展中世界的政策與中國的挑戰」，沈志華、李濱主編，**脆弱的聯盟：冷戰與中蘇關係**(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頁300-324；安·耶杰姆斯基，「蘇聯參加第二次亞非會議的計畫及對華策略」，沈志華、李濱主編，**脆弱的聯盟：冷戰與中蘇關係**(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頁325-345。

¹³⁸ 沈志華主編，**中蘇關係史綱—1917-1991年中蘇關係若干問題再探討**，增訂版(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頁367。

¹³⁹ 同上註，頁433-447；呂德良，「不期而遇的局面：1969年中蘇美三角關係論析」，沈志華、李濱主編，**脆弱的聯盟：冷戰與中蘇關係**(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頁434-456。

¹⁴⁰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前引書，頁282-283、328、363。

大(2007年)等四次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的領導人工作報告中：

十四大：「兩極格局已經終結，各種力量重新分化組合，世界正朝向多極化方向發展。新格局形成將是長期的、複雜的過程。…我們主張在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等原則的基礎上，建立和平、穩定、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這一新秩序包括建立平等互利的國際經濟新秩序。」¹⁴¹

十五大：「多極化趨勢在全球或地區範圍內，在政治、經濟等領域都有新的發展…要致力於推動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這種國際新秩序是以和平共處五原則為基礎的」。¹⁴²

十六大：「我們願與國際社會共同努力，積極促進世界多極化，推動多種力量和諧並存…我們主張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¹⁴³

十七大：「世界多極化不可逆轉…我們將…推動國際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¹⁴⁴

冷戰以後的多極化與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地緣政治密碼，基本上仍是鄧小平以來對外路線的延續與在此框架中因應結構改變而提出的新發展。胡錦濤提出的和諧世界路線，從他在 2005 年 9 月的聯大演說、2006 年 8 月在中共中央外事工作會議，與 2007 年 10 月在中共十七大上的工作報告對和諧世界概念的描述(見第一章第一節第三小節)，可看出所謂的「和諧世界」概念實際上仍不脫過去的多極化與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密碼內涵，以及鄧小平、江澤民以來的和平共處五原則、國際關係民主化、尊重全球文化多樣性、持續推進經濟全球化與協作的新安全觀等主張，¹⁴⁵實際上可視為對中國追求體系多極化與建立真正符合中國新世界觀與國家利益的國際政治與經濟新秩序的重新包裝。換言之，和諧世界最多只能算是針對多極化和建立國際政治與經濟新秩序，在操作路線上提出更不具明顯對抗性與進一步合作性主張的政策路線指導，而非在概念上提出新的體系層級地緣政治密碼。

至於冷戰後中國全球/亞太次體系層級密碼的對應地區與國家，在三個三角關係中對應於亞太次體系的是大三角，國家對象則是美國與日本。日本被列入大三角的原因是其與美國一樣居於生產鍊末端的地位，以及日本在冷戰結束之初可

¹⁴¹ 江澤民，「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奪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更大勝利」，中共中央文獻室編，**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頁 34、36。

¹⁴² 江澤民，「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中共中央文獻室編，**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41-42、43。

¹⁴³ 江澤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共中央文獻室編，**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一冊，頁 36。

¹⁴⁴ 胡錦濤，「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奪取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鬥」，中共中央文獻室編，**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頁 35、37。

¹⁴⁵ 胡錦濤，「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奪取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鬥」，前引文，頁 36-37。值得注意的是，胡錦濤在 2005 年的聯合國演說中尚且提到新安全觀，可是在十七大工作報告中已經不再提，但這並不代表新安全觀的理念不存在於和諧世界中。

能脫離美國的軍事保護與經濟互賴，在亞太特別是東亞地區實施經濟擴張。¹⁴⁶在這一點上，三個三角關係比王生榮的地緣戰略思維要具備明確的次體系層級地緣政治密碼意涵，後者僅指出歐亞大陸是冷戰後最為重要的地區，但沒有進一步分析中國的次體系密碼，而是將其附屬於全球體系之下。葉自成與王生榮等人接近，提出遠程地緣戰略的目標是「以推動多極化為中心的歐亞大陸地緣戰略」，目的在於「打破美國試圖獨霸世界的圖謀...反對美國控制歐亞大陸的地緣戰略」。¹⁴⁷不過中國的亞太次體系密碼顯然不可能單純從經濟生產層面進行考量，再加上日本經濟活力的衰退使其無力再與美國、中國競爭亞太次體系的經濟整合方向與主導權，何況亞太次體系密碼還受到中國的全球體系密碼的深刻影響，經濟無法單獨發揮決定性影響力，僅身為強權而非超強的日本因而並非中國在亞太次體系中的體系層級密碼主要目標。

對大多數中國戰略菁英而言，在蘇聯解體後，多極化的目的便在於提高歐亞大陸主要國家在世界事務中的力量，反對美國獨霸世界。¹⁴⁸不過因為中國戰略菁英體認到在冷戰後的地緣政治結構中，亞太地區乃是最多大國匯聚之處，是全球地緣政治結構的重心之一，¹⁴⁹而如同第六章將進一步分析的，中國本身的實力與影響力尚無法真正跨出亞太地區，使得中國的體系層級密碼的操作重心集中於亞太次體系，蓋中國本身就位於亞太地區，而且又與美國同處於此。事實上，美國作為中國最主要敵人的觀點在中國戰略菁英中從未消失，王緝思在與美國學者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合著，並由美國布魯金斯研究院(Brookings Institution)在2012年3月公佈的美中戰略「互疑」(distrust)研究報告(*Addressing U.S.-China Strategic Distrust*)中便指出，中國戰略菁英始終對美國存有極為嚴重的不信任甚至懷疑，因此其對國際政治與美國在國際政治中角色的典型理解是認為美國政治人物遵循所謂的「叢林法則」(the law of the jungle)，只是將促進人權與推廣民主這兩種概念作為達成權力政治目標的手段，美國的終極目的是為了維持霸權地位與主導權，為此美國會試圖遏制其他強國－特別是中國－的崛起與阻止這些崛起中的強國達成其戰略目標與強化其國際地位，這使美國情報界發現，中國的主要官員在內部交流時對於美中關係之間無論是直接或間接相關議題，都採取零和角度分析，而由於這些交流是不對外公開並限於少數機構中，更使美國情報界認為中國官員的這種零和角度才是他們對於美中關係的真正意圖。¹⁵⁰

雖然美國在冷戰後身為唯一的超強，中國卻不認為美國有能力維持單極體系，早在1990年代中期，中國戰略菁英便根據所謂的「綜合國力評估」，認為美國國力在冷戰後已然衰退，全球地緣政治體系多極化趨勢不可避免，此種觀點在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由於美國經濟衰退、內政出現混亂，中國經濟卻仍能保

¹⁴⁶ 黃范章，「東亞地區經濟的形勢及格局」，前引文，頁11-12；黃范章、李大偉，「東亞經濟一體化進程、發展趨勢及中國的戰略思考」，前引文，頁74。

¹⁴⁷ 葉自成，**中國大戰略**，前引書，頁336。

¹⁴⁸ 王生榮主編，**金黃與蔚藍的支點**，前引書，頁304。

¹⁴⁹ 劉強主編，**國際安全·2010**(北京：時事出版社，2011年)，頁22-23。

¹⁵⁰ Lieberthal and Wang, "Addressing U.S.-China Strategic Distrust," *op. cit.*, p. 36.

持明顯的成長並大幅拉近在本世紀初與美國的總體國力差距—由 2003 的八倍差距到如今的不到三倍—而得到大多數中國戰略菁英的進一步確認。¹⁵¹因此中國戰略菁英一方面反對美國強化其冷戰時已存在的同盟體系，批評其為冷戰思維、敵對中國與引發區域不穩定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卻也逐漸改變以往毛、鄧時代認為唯有超強與霸權主義才能引發戰爭的觀點，承認中國崛起極有可能導致其與衰退的美國之間爆發嚴重衝突。¹⁵²不過美國作為全球海權單極，在亞太次體系中仍有極為堅強的同盟體系與影響力，加上亞太大多數國家還是對中國抱持極大的疑慮，更不用說與中國存有嚴重領土爭端的鄰國與次體系中的其他強權對此一目標的抵抗，使得中國不得不在政策上非常小心，並且反對任何美中「G2」（兩國集團）共治亞太的說法，¹⁵³但是由戴秉國在 2012 年 5 月在第四回美中戰略與經濟對話中提出替代概念—「兩國協調」（「C2」）。¹⁵⁴上述的思維可能暗示，雖然中國希望全球體系發展為多極，卻不希望亞太次體系成為多極，而是美中並立，俄羅斯、日本、印度等國在亞太次體系中環繞於美中兩國身旁的兩極加多強體系，可是在本身國力尚未完全發展已達成這個目標之前，必須小心謹慎避免與美國發生直接衝突。

為了達成多極化全球體系與兩極化的亞太次體系之目標，同時又避免與美國發生衝突，中國體系層級密碼的目標便如同王生榮等人所指出的，包含同為強權的歐盟與俄羅斯，¹⁵⁵拉攏歐洲國家以分化美歐關係是中國自冷戰以來的傳統—歐洲國家(特別是戴高樂主義(Gaullism)支配下的法國)從冷戰起在中國的世界觀中就一直必須爭取的「中間地帶」(intermediate zone)，被中國視為抗衡美國與蘇聯力量的反霸權主義最重要的盟友之一。¹⁵⁶此種情況在冷戰後並未改變，而且因為第三世界或發展中國家對中國的戰略價值降低、中國經濟發展需要與歐盟更進一步的合作並取得歐盟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以及中國本身逐漸改採大國外交而更受重視。但中國與歐盟畢竟存在政治與經濟意識型態，以及與美國關係上的相當差距，這使得中國僅能與歐洲大國在所謂的「軟平衡」(soft balancing)上針對美國的單邊主義合作，¹⁵⁷但是當 2006 年以後歐洲大國對美國實行軟平衡

¹⁵¹ *Ibid.*, p. 9.

¹⁵² Pillsbury, *China Debates the Future Security Environment*, *op. cit.*, pp. 52-53.

¹⁵³ 「溫家寶批駁“中美 G2 共治全球”：毫無根據」，*中國評論新聞*，2009 年 5 月 21 日，http://mag.chinareviewnews.com/doc/1009/7/5/3/100975339_2.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0975339&mdate=0521111922。

¹⁵⁴ 「戴秉國：促進中美在亞太地區良性互動」，*新華網*，2012 年 5 月 3 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05/03/c_123074577.htm。

¹⁵⁵ 王生榮主編，*金黃與蔚藍的支點*，前引書，頁 304。

¹⁵⁶ 葉自成，*新中國外交思想*，前引書，頁 247-251。

¹⁵⁷ 「軟平衡」通常指美國以外的大國利用外交手段聯合制止美國的單邊主義行為，但並不尋求彼此之間形成正式的聯盟或大幅強化國內的軍力，有別於現實主義對「平衡」的傳統定義。但因此使部分學者認為，這種鬆散的行為根本不是「平衡」，只不過是美國和這些國家之間的外交摩擦(diplomacy friction)而已。軟平衡的概念見 Robert A. Pape, “soft Balancing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Summer 2005), pp. 7-45; T. V. Paul, “Soft Balancing in the Age of U.S. Prim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Summer 2005), pp. 46-71；而反對意見則可參考 Stephen G. Brooks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Hard Times for Soft Balanc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Summer 2005), pp. 72-108; Keir A. Lieber and Gerard

的動機消失，反而推動與美國相近的人權外交與支援 2011 年發生於中東國家的「茉莉花革命」時，中國就無法與歐盟站在同一陣線，甚至還會暗中反對歐盟的政策。¹⁵⁸

歐盟因不屬於亞太次體系，故僅存在於中國的體系地緣政治密碼中。相較之下，俄羅斯由於同時身為全球體系與亞太次體系中的強權，故存在於中國的全球體系與亞太次體系兩地緣政治密碼中，是中國在亞太次體系中除了美國之外的真正戰略目標。俄羅斯與美國仍存在相當地緣政治競爭，而且仍保有與美國匹敵的核武庫，加上又在歐洲面對北約與歐盟東擴造成的地緣政治壓力，與美國、歐盟仍有相當的地緣政治利益衝突，故成為中國推動全球體系多極化與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最重要盟友，¹⁵⁹而且是中國用來牽制美國在亞太次體系中最主要的棋子。雙方因共有美國這個主要的地緣政治競爭對手，而較能拋開潛在的區域地緣政治衝突，在共同抵抗美國的體系壓力與打擊分離主義、宗教激進主義對領土完整的潛在威脅的利益之下維持密切的戰略合作。然而，此種密切關係能維持多久對雙方來說都是一大問題，因為兩國基於本身的鄰近和強國意識，不僅對彼此的崛起仍保持高度的警惕，也存在多重地緣政治與經濟上的利益衝突，¹⁶⁰因而仍互相視彼此為潛在的地緣政治主要競爭對手。中國雖然不必如冷戰時那樣將國防

Alexander, "Waiting for Balancing: Why the World Is Not Pushing Back,"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Summer 2005), pp. 109-139. 不過也有學者將東協對中國的戰略選擇視為軟平衡的一種，見 Yuen Foong Kong, "Coping with strategic uncertainty: the role of institutions and soft balancing in Southeast Asia's post-Cold War strategy," in J.J. Suh, P. Katzenstein and A. Carlson (eds), *Rethinking Security in East Asia: Identity, Power, and Efficienc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72-208.

¹⁵⁸ 這主要是指當北約在 2011 年 3 月依據聯合國安理會第 1973 號決議對利比亞內戰實施武裝干涉，並使利比亞叛軍明顯取得優勢之後，中國試圖提供價值達 2 億美元的武器給予利比亞政府，而先後遭加拿大環球郵報(*The Globe and Mail*)與美國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披露一事。Anne Barnard, "China Sought to Sell Arms to Qaddafi, Documents Suggest,"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5, 2011, <http://www.nytimes.com/2011/09/05/world/africa/05libya.html?pagewanted=all>.

¹⁵⁹ 中國自 1998 年以來，在與歐盟的歷次聯合聲明中從未提到多極化與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之類的中國地緣政治密碼最終目標，僅在 2004 年與 2006 的兩次中法聯合聲明中提到必須尊重與促進世界的多邊主義。然而中國在 2005 年 7 月的「中俄關於 21 世紀國際秩序的聯合聲明」即指出該聲明的目的在於兩國將促進世界多極化與國際新秩序的建立，在 2008 年 5 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俄羅斯聯邦關於重大國際問題的聯合聲明」與 2009 年 10 月的中俄第十四次領導人定期會晤聯合公報中，亦重申世界多極化的不可擋。「中法聯合新聞公報」，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04 年 10 月 11 日，<http://www.fmprc.gov.cn/chn/pds/ziliao/1179/t217596.htm>；「中俄關於 21 世紀國際秩序的聯合聲明(全文)」，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05 年 7 月 1 日，<http://www.fmprc.gov.cn/chn/pds/ziliao/1179/t201988.htm>；「中法聯合聲明 共同建設更加安全、繁榮和諧與團結的世界」，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06 年 10 月 26 日，<http://www.fmprc.gov.cn/chn/pds/ziliao/1179/t277621.htm>；「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俄羅斯聯邦關於重大國際問題的聯合聲明(全文)」，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08 年 5 月 23 日，<http://www.fmprc.gov.cn/chn/pds/ziliao/1179/t457954.htm>；「中俄總理第十四次定期會晤聯合公報(全文)」，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09 年 10 月 13 日，<http://www.fmprc.gov.cn/chn/pds/ziliao/1179/t620336.htm>。

¹⁶⁰ 劉蕭翔，「俄屬遠東『黃禍論』之論析：迷思或事實」，*問題與研究*，第 48 卷第 2 期(2009 年 6 月)，頁 122-135；Gilbert Rozman, "The Sino-Russian Strategic Partnership: How Close? Where To?" in James Bellacqua eds., *The Future of China-Russia Relations* (Lexington, Kentucky: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10), pp. 13-32; Iliyas Sarsembaev, "Russia: No Strategic Partnership With China in View," *China Perspectives*, No. 65(May/June 2006), <http://chinaperspectives.revues.org/631>.

重心完全置於中俄邊界，而且宣稱沒有感受到從俄國來的威脅，但卻認為不能放棄軍事力量的發展以防俄羅斯可能出現的大國沙文主義或霸權主義危及中國的領土和主權完整，¹⁶¹故仍在鄰近中俄邊界的蘭州、瀋陽與衛戍首都的北京軍區部署了極為可觀的陸軍兵力、傳統和戰略飛彈以維持對俄羅斯的嚇阻。¹⁶²

第三節、內政導向戰略文化的當代延續與變化

結構形式、中國的地緣政治模式與中國在結構中地位的變化，使得帝國時代的內政導向戰略文化在當代中國有相當程度的變化。20 世紀初期的中國戰略菁英體認到中國既被列強的領土與勢力範圍所環繞，而衰弱的物質力量與能力又完全無法與列強競爭，因此忙於將中國的地緣政治模式從帝國時代的「文明」轉化為現代「民族國家」，但此時的中國深陷內戰的泥淖，缺乏統一的中央政府來展現一致的對外行為以供觀察內政導向戰略文化的延續情況。內政導向戰略文化亦因為各種外來政治、戰略思想的引入，與中國地緣政治模式的變化等刺激而處於調整時期。不過整體來說，1949 年之前的中國戰略菁英還是保有部分內政導向戰略文化的特徵，最明顯的就是蔣中正在 1930 年代的「攘外必先安內」對外政策方針，是強調內政與外交連結，以及對內行動優於對外行動兩種思維的表現。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後，內政導向戰略文化一方面因出現長期穩定的中央政府而有明顯的延續，但同時也因為地緣政治模式的變化與新政治、戰略思想的引入而有所變化，最明顯的差異在於中國終於發展出自身的數字化管理體系，而且藉由馬列主義和中共本身的社會控制機制，強化了中央政府的政令直接對社會底層發揮作用的能力。但其他地緣政治模式的改變並不明確，特別是中國人口仍有極大比例是農民，使得內政導向戰略文化在當代的延續與變化的分野並不明確。帝國時代內政導向戰略文化的六種特徵中，內政與外交連結在當代受到為了追求中華民族的復興而隨之產生的富國強兵思維而得到完全的延續；重視義戰、強調威脅主要來自內部，重視國內政治、社會局勢穩定勝過對外行動等兩種特徵亦保留下來，且在 21 世紀的現在仍有相當明顯的呈現。

然而其他特徵的延續則沒有那麼完全。古代利用異族盛衰的連環性來達成政治目的的濃厚的權力政治思維同樣延續下來，但弔詭的是其邏輯並非帝國時代利用強大的政治、軍事、經濟力量，反而是利用中國在全球地緣政治結構中為其他超強不可忽視的地理力以及龐大的市場潛力為籌碼。而由於馬列主義意識型態的影響，外交政策至少在 1970 年代以前是相當僵化，直到 1970 年代以後意識型態對外交政策的影響力降低，中國戰略菁英在外交政策的操作上也仍保有相當強烈的權力政治思維，同樣利用權力平衡來謀求中國在東亞各區域的地緣政治利益與

¹⁶¹ 楚樹龍、金威主編，*中國外交戰略和政策*，前引書，頁 239。

¹⁶²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1,” *Department of Defense*, http://www.defense.gov/pubs/pdfs/2010_CMPR_Final.pdf, p. 38;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1,” *Department of Defense*, http://www.defense.gov/pubs/pdfs/2011_cmpr_final.pdf, pp. 38-39.

維持中國周邊區域穩定以利改革開放政策與國內建設實施的地緣政治密碼指導，但由於受到不結盟傳統的影響，其方式並不一定是權力平衡理論中的聯盟，而是其他同樣隱含權力平衡思考的政策操作，不拘泥於一定的類型，俾使中國能有更大的外交空間。同樣的，慎戰思考與間接戰略偏好雖然延續下來，但並非帝國時代因地理遏制力發揮降低行動自由作用的緣故，而是一方面基於中國的實力與能力均難以與列強競爭，中國沒有太多行動空間，二方面則是中共多年劣勢游擊戰累積的「以劣勝優」成功經驗所致。

此外，雖然當代中國的內政導向戰略文化與帝國時代一樣重視武力在國際事務中的效用，而且如同許多學者所指出的，主要依靠本身的力量或「內平衡」(internal balancing)來平衡美國對當代全球與亞太單極體系的主導，¹⁶³但其原因不僅是結構中有許多與中國並駕齊驅，甚至力量遠超過中國的超強與強權存在，對中國的傳統國家安全構成潛在威脅，也在於中國的地緣政治密碼使其持續與美國、日本、俄羅斯、印度、東協等存在激烈的地緣政治利益衝突，「天下依然不太平」。¹⁶⁴特別是中國戰略菁英認為國家的領土完整—西藏與臺灣—與國家利益—海洋領土爭端—受到嚴重的威脅，激起其將國家分裂與清朝後期與民國初年衰弱、易受外國欺凌的歷史記憶結合，在害怕領土再度遭分割的心理認知下，產生「分裂就是衰弱、統一就是強大」的新國力認知，¹⁶⁵而且從戰略菁英每每將中國描述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可知「統一」代表的主權與領土完整意涵不僅已經在中國戰略菁英內心中根植，而且獲得了著魔一般的地位，這使得追求統一的強大民族主義導致中國戰略菁英如今還是信任武力在國際事務中的效用，特別是在國家統一議題中將武力視為最後的政策手段，使得當代中國戰略文化還是具有濃厚的強現實政治特徵與備戰本質。因此儘管邁入核子時代之後，體系的秩序原則使戰爭已經不再具備為體系用來保持權力平衡，或作為國際法與政策的最後裁決工具的功能，¹⁶⁶但正如蒲恆力所言，個別國家未必會因此改變對戰爭功能的看法，當代中國戰略文化即展現出此種現象。

而中國國力降低與中共在內戰中的成功經驗則使得其他古代內政導向戰略文化特徵發生改變。帝國時代速戰速決、強調以武力與戰爭作為完全解決政治議題的戰略思考，和內政導向戰略文化偏好的前沿防禦與機動防禦兩種戰略形式在冷戰期間幾乎不存在。主動使用武力的目的除了極少數情況之外，不再尋求完全

¹⁶³ Wang, "China's Response to the Unipolar World," *op. cit.*, p. 557.

¹⁶⁴ 亓成章、何中順，**時代特徵與中國對外政策**(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8年)，頁63。這句話亦出現於1998年之後歷次公佈的中國國防白皮書—**中國的國防**對國際局勢的分析之中。

¹⁶⁵ 雖然一個國家在內部發生嚴重的分裂與政治動亂時本來就很難抵禦外侮，但對中國古代的戰略菁英而言，雖然他們擁有根深蒂固的九州一統心理與地緣政治密碼，但並沒有因此相應產生不存在完全統一九州的帝國中央政府就必然導致帝國衰弱、無法抵禦外來威脅的認知，因為統一的帝國未必真的能強大抵禦外來威脅，長期分裂的時代如春秋戰國與魏晉南北朝，前者大肆向異族擴張，後者即使擴張情況不如先秦，卻也對異族居於相當的戰略優勢。一統帝國領土面積最小的北宋，其戰略菁英也沒有因為失去燕雲十六州、河套、河西走廊與交州等地，而產生北宋是分裂而導致衰弱的自我認知。

¹⁶⁶ 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186-189.

解決政治問題而僅將其作為塑造中國安全政策趨勢的一種手段，亦即柯慶生(Thomas Christensen)根據「脆弱之窗」(window of vulnerability)與「機會之窗」(window of opportunity)的趨勢分析(trend analysis)所得到的武力使用是尋求暫時的療效而非永久治癒的目的。¹⁶⁷結果，速戰速決的思考在很長一段時間中被拋棄，取而代之的是利用對日抗戰與游擊戰的勝利經驗所得到的誘敵深入戰略思維，一直到1980年代之後才又因為改革開放政策的成果而逐漸不能忍受誘敵深入戰略對中國經濟的破壞後果而發生改變，並在冷戰結束之後因為戰略思維轉變為「打贏高科技條件下的局部戰爭」，轉為力求在有限戰爭中速戰速決。

不過雖然內政導向戰略文化在當代有相當程度的延續，但並非始終有絕影響力，正如前一章所說，決策者有時會跳脫戰略文化的制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情況特以毛澤東時期的外交政策為然。下文將進一步分析中共建國迄今，當代中國內政導向戰略文化在毛澤東、鄧小平與冷戰之後等三個時期的特徵及演進。

一、毛澤東時代的內政導向戰略文化與中國大戰略行為

如上文所述，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基於意識型態的影響，產生類似帝國時代華夷一家的理想型體系層級密碼，並遵循這些密碼的指導，制訂許多激進政策以極力追求領導第三世界與社會主義陣營以與美國、蘇聯分庭抗禮。而中國在結構中地位的變遷以及毛本人和中共在內戰中的游擊戰成功戰略經驗也影響了中共建國以後的對外行為，這些行動有些跳脫了內政導向戰略文化的制約，有些則因為結構的影響而無法完全跳脫。

(一)、對速戰速決與軍事戰略型式的改變

毛澤東跳脫或者改變內政導向戰略文化限制最明顯的地方就在於他對中國應對外敵的軍事戰略模式之改變。如第四章所述，內政導向戰略文化影響下的傳統中國對外軍事行動以及防禦戰強調速戰速決，盡可能使用建築長城或依賴重要戰略地理的「關隘」實施前沿防禦，或在無險之處也不願築長城的情況下實施邊境彈性防禦等兩種野戰戰略，禦敵於國境之外或邊境地區。雖然持久戰與「誘敵深入」是中國古代戰略思想的重要組成以及將領在戰爭中的重要作戰方式，¹⁶⁸但大多限於作戰層次，並沒有明顯提升到大戰略層次的現象，因此持久戰與誘敵深入兩種戰略思想在帝國時代最多是軍事文化而非內政導向戰略文化，因為這兩種作戰方式根本就違反內政導向大戰略思想的邏輯。

但是毛澤東為了應付他認為即將爆發的世界大戰與蘇聯可能的入侵，而寄望以中國在對日抗戰的經驗，利用中國廣闊的地理空間使入侵的敵軍陷入空間征服的泥淖之中而難以抽身，並配合長期的人民戰爭來損耗敵軍的優勢物質力量與精神戰力，藉此獲致勝利。簡言之，毛澤東的人民戰爭思想是一種在物質弱勢的基礎上，利用國土縱深防禦、長期且大規模游擊戰的消耗方式壓倒強敵以獲致勝利

¹⁶⁷ Thomas Christensen, "Windows of War: Trend Analysis and Beijing's Use of Force," 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 Ross ed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51.

¹⁶⁸ (唐)杜佑撰，王文錦等點校，*通典二百卷*(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頁3954-3955。

的「以劣勝優」戰爭指導，將以往僅限於軍事文化的誘敵深入與持久戰兩種作戰方式提升至大戰略層次；反之，農業時代雖然科技不是戰爭的決定性因素，但中國古代帝國相較於其周邊任何一個行為者，除了騎兵素質叫不如游牧民族之外，幾乎在其他各方面都擁有質與量方面的優勢，特別是在水(海)軍方面，因此帝國時代內政導向戰略文化強調利用中國古代帝國的絕對物資優勢，以正規戰爭方式在前沿防禦或邊境地區縱深防禦的速戰速決取勝，是一種「以優勝劣」的戰爭指導，與毛澤東的戰爭指導方式完全不同。毛澤東的人民戰爭理論可說完全不符帝國時代內政導向戰略文化的行動特徵，是一種因應中國本身地緣政治模式與在結構中地位的變化而產生的戰爭指導，明顯是一種戰略文化受地緣政治結構影響而發生改變的現象。¹⁶⁹

這種現象的發生乃因結構與中國在地緣政治模式上的變化所致。以往的結構中，主要行為者皆以農牧業等第一級產業為主要生產方式，其次是不涉及生產的國際中轉商業，而民族主義思想在當時尚未出現或僅處於幼稚的萌芽階段，菁英與人民係為某一確實的君主個人效忠而非針對當時相當抽象的國家，故君主本人與其所在的政治核心是最重要的軍事目標與國家存續象徵。可是在 20 世紀的工業化地緣政治結構與西發利亞全球地緣政治體系中，第一級產業的重要性遠低於第二級的製造業與第三級的服務業，除了極少數城市國家的例外，國際商業也不再只是不涉及生產的中轉貿易，商業發達的強國家同時也有極為發達的製造業以供輸出貿易。而相對於第一級產業，工業很難禁得起戰爭的大規模與嚴重破壞，可是毛澤東時期的中國實際上是一個不具備全國性堅實工業基礎的落後農業國家，比起其他國家，中國相對上較不須要擔心深入國境的戰爭對工業的嚴重破壞會如何嚴重危及國家經濟，而中國又有世界最多的人口與堅強的民族主義思想來協助游擊戰之進行。不過這樣的戰爭究竟還是會對國家的戰爭能力造成傷害，在這樣的考量之下毛澤東選擇實施所謂的「三線建設」，試圖利用中國廣大的腹地與崎嶇地形來保存中國必要的戰爭能力，將中國西部建設為「戰略大後方」，¹⁷⁰以支撐毛澤東的誘敵深入戰略。¹⁷¹

(二)、慎戰與不戰而屈人之兵思想的消失

毛澤東對於武力使用的態度並不符合內政導向戰略文化的慎戰特徵。首先是他在 1950 年力排中共黨內強大的反對聲浪加入韓戰，¹⁷²又在 1958 年僅為測試蘇

¹⁶⁹ 1945 年之前的國民政府雖然沒有依靠游擊戰經驗培養出來的人民戰爭思想，但是他們在面對列強時除了軍隊人數之外，與中共同樣居於絕對的劣勢，雖然國民政府在 1937-1945 年的對日戰爭中採取的是正規戰鬥，但物質上的劣勢也使其很難採取帝國時代殲敵於國境之外的前沿防禦，或在邊境地區殲敵的彈性防禦，也無法主動尋找敵人並發動決定性會戰，必須設法利用中國廣闊地理範圍，設法在持久戰中獲勝。雖然國民政府的作戰方式與中共截然不同，但也是因應中國在全球地緣政治結構中模式與地位變化所產生的戰略文化改變。

¹⁷⁰ 孫健，*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1949-1990 年代初)*(北京：中國人民大學，1992 年)，頁 369；陳國權、王誠宏、張忠江、鄒洪學等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建設簡史(1949-1994)*(北京：中國物資出版社，1995 年)，頁 180。

¹⁷¹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北京：中共中央黨校，1991 年)，下卷，頁 1234。

¹⁷² Andrew Scobell, *China's Use of Military Force: Beyond the Great Wall and the Long Mar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81-91.

聯在中蘇同盟中對中國的支持程度而發動八二三砲戰，¹⁷³雖然根據中國學者的研究，中共高層內部對 1969 年中蘇珍寶島武裝衝突的地點、時間與規模，在事前有作過一番研究，¹⁷⁴但毛澤東發動此一武裝攻擊的目的卻只是想讓蘇聯得到「沈痛教訓」，¹⁷⁵而且事後更沒有料到蘇聯的後續反應力道之大，完全超乎中共高層事前的估算，在在顯示毛澤東時期的中國對武力使用的態度並不符合內政導向戰略文化的慎戰特徵，更沒有所謂的「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特徵。不過這方面係領導人個人的跳脫，與地緣政治結構本身沒有直接的相關。

(三)、義戰思想之延續與其內在邏輯之變化

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屢遭列強侵略與欺凌的歷史記憶，塑造了中國戰略菁英與人民極為強烈的民族主義。民族主義也是毛時代的中共發展出理想型體系地緣政治密碼的重要因素，而且因為民族主義進一步連接到所謂的「面子文化」，導致中國在毛澤東時代有許多激烈的對外行動，例如被視為中蘇共分裂重要原因之一的「長波電台」與「聯合艦隊」爭執，某種程度上來說也是因為蘇聯在這兩件議題以及其他當時雙邊戰略合作的處理上帶有不平等的作法，使得中國戰略菁英同時在民族主義思維與「面子」文化上受到強烈的刺激；¹⁷⁶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下台之後，中蘇雙方未能修補歧見，反而進一步因邊界糾紛走向全面對峙，民族主義與面子文化的連結也是重要的因素。¹⁷⁷

不過摒除面子文化的影響不論，具有強烈感情成分的民族主義在毛澤東時代發展成相當重要的義戰邏輯。毛澤東偏好的「後發制人」行動本身就是一種義戰思想的表現，其目的在取得「師直為壯」的根據與實施攻勢防衛行動的正當性，人民戰爭既然以「反帝國主義」為主要目的，又基於「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後發制人邏輯，必然是「正義」的戰爭。¹⁷⁸除了人民戰爭具有義戰之邏輯外，毛澤東也經常利用民族主義情感來獲得對外行動的正當性，並尋求團結和穩固中國內部比較紛亂的政治局勢與對自己領導地位的內部政治威脅。毛澤東時期的中國在歷次對外行動中先在國內製造目標國對中國發動侵略、侵犯中國領土主權、是霸權主義國家等侵略者與被侵略的形象，試圖鼓動公眾輿論以取得人民對國家的「反擊」行動之支持。由於中共本身的強烈民族主義與反帝國主義是根源於中國戰略菁英認為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屢次遭受帝國主義侵略的歷史記憶，反抗帝國主義在中國戰略菁英乃至一般民眾心中具有無須多言的絕對「正當性」，很容易因為這方面的原因而支持政府的舉動。

¹⁷³ 沈志華，「砲擊金門幕後解密：毛澤東玩弄中蘇同盟種下分裂惡果」，*文史參考*(北京)，第 9 期(2010 年)，頁 54-58。

¹⁷⁴ 沈志華主編，*中蘇關係史綱—1917-1991 年中蘇關係若干問題再探討*，前引書，頁 430-432。

¹⁷⁵ Yang Kuisong, "Sino-Soviet Border Clash: From Zhenbao Island to Sino-American Rapprochement," *Cold War History*, Vol. 1, No. 1(August 2000), pp. 27-31.

¹⁷⁶ 沈志華，「赫魯曉夫、毛澤東與中蘇未實現的軍事合作——關於遠東防空協定、長波電台及聯合艦隊問題的再討論」，*中共黨史研究*(北京)，第 5 期(2002 年)，頁 32-43。

¹⁷⁷ 李丹慧，「失去的機遇？——赫魯曉夫下台後中蘇實現和解的新嘗試」，沈志華、李濱主編，*脆弱的聯盟：冷戰與中蘇關係*(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頁 391-421。

¹⁷⁸ 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編輯，*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 年)，第四卷，頁 1142；郭偉濤，*人民戰爭論*(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2 年)，頁 148-153。

毛澤東時代的義戰邏輯不單單只是根據情感之成分，還發展出一套理性的義戰邏輯。帝國時代的理性義戰邏輯在西周之前是一套模糊的「民本」思想與根據此發展而出的國際干預與擴張經驗，後來西周取得體系中的霸權地位後，將其發展為一套比較清楚的華夏文明體系規範與秩序原則，亦即所謂的「禮」，當中包含了侵略與被侵略的判斷標準，以後在戰國時代與秦漢又逐漸發展為天下觀秩序原則。無論是先秦的「禮」或帝國時代的天下觀，這兩種義戰邏輯在支撐中國使用武力的正當性時也同時認可了利用武力對他國事務進行干預甚至擴張的「合法性」。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充其量只是在國際法「文件」上真正擁有大國地位，不可能推翻西發利亞體系使體系的規範與秩序原則回復到中國熟悉的「禮」與天下觀。要使自己的對外行動也取得國際上的支持就不能單靠民族主義訴求，必須發展出一套符合西發利亞體系秩序與規範的理性邏輯主張，這就是周恩來在 1953 年與印度談判西藏問題時所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¹⁷⁹揉合了西發利亞體系的國家主權獨立原則、不干涉、限制武力在國際爭端中使用、反對侵略與民族自決等國際法原則與西方政治理論，配合中國戰略菁英的強烈民族主義心理，來替中國的對外行為辯解，違反和平共處五原則的行為即是對中國的侵略行為，作為提供中國政府對外行動的義戰理論基礎。

因此雖然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沒有完全跳脫義戰的內政導向戰略文化特徵，其內在邏輯與先秦和帝國時代的義戰內涵有非常明顯的差異－後者主要邏輯是體系中強者對弱者的義戰並可以被用來作為實施標準地緣政治程序的手段，前者則具有一種兩面性：一方面，它既被強者(中國)用來取得弱者(第三世界國家)支持，希望能使更強的超強脫離中國的周邊，又被弱者(中國)用來作為對抗超強的精神武器，兩種途徑的目的都是消除超強對中國的威脅。但另一方面，和平共處五原則的宣傳也削弱了中國實施本身地緣政治標準程序的立場。

(四)、間接戰略之運用

傳統內政導向戰略文化所以強調間接戰略之運用，在於地理因素經常阻止了中國古代帝國使用武力的行動空間，但這是以強者的身份地位運用間接戰略，而且如上一章所說，因為強者的身份地位所產生的優越感和一相情願之思考邏輯，導致不願意對周邊國家進行深入瞭解而使得間接戰略手段只限於政治與經濟，且經常因對施用對象的不瞭解而無法發揮預期之效用。

工業革命帶來的科技發展雖然使得過去許多地理障礙不再有那麼強大的阻礙能力，但中國反而由於國力勉強只能算做結構中的區域大國，而且在陸地、海洋、周邊接面臨超強與其他強大的國家，而與帝國時代同樣難以依靠武力達成戰略目標，再加上冷戰時期的武力使用又受到國際法的發展而使運用武力以達戰略目標的行動自由有更大的限制，無法如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那樣將戰爭作為政策的一部份。

中國國力衰弱無法與列強相較的基本客觀事實，使得間接戰略成為毛澤東時代戰略菁英偏好的戰略方式，這又受到中共在內戰中的勝利很大一部份是靠游擊

¹⁷⁹ 周恩來，*周恩來選集*(北京：新華，1981年)，下冊，頁 118。

戰式的間接戰略之運用這一成功且鮮明的戰略經驗之加強。¹⁸⁰不過在這個時候，中國已經變為以弱者的身份地位使用間接戰略，其角度與方式都與帝國時代有所不同——以往可憑藉經濟與政治誘因而來實施，而毛澤東時代貧窮的中國經濟與政治地位，以及改變了的國際體系，不可能以提供官位、冊封與賞賜等過去慣用的政治經濟手段遂行，對外援助也只能選擇有限的對象和少數的物資，不可能像美國、蘇聯、日本、西德等超強與經濟力量龐大的強權，可以同時對許多國家提供長期且大量的援助。這使得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比帝國時代更加強調間接戰略的運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其實就是一種間接戰略，它使中國在強力宣傳自己愛好和平與決不稱霸擴張，以消弭「中國威脅論」的情況下，仍能使用武力來影響某些可能對中國不利的議題發展，以及進一步爭取自己更有利的國際地位，也沒有減緩爾後為了成為世界革命領袖而持續對外輸出革命的行動。毛澤東 1957 年雖然在莫斯科發表「東風壓倒西風」的演講時，很清楚地表示中國追求國際和平的原因在於需要時間建設，¹⁸¹但又認為世界大戰即將爆發，深信武力不可或缺，在蘇聯協助下建立空軍、海軍，以及獲得核武技術，¹⁸²更是一種相當明顯地以武力為核心，但不斷運用強化中國內部輿論與意識型態，並攻擊歐美日與其他國家的群眾心理、意識型態與輿論，藉以獲得國際輿論支持的外部動作的間接戰略運用。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提出雖然著眼於消除中國周邊鄰國對中國的疑慮，但這其實是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戰略菁英還是與帝國時代一樣缺乏對周邊國家、結構中主要行為者以及中國最主要敵人的深入瞭解，這一方面在於中國本身仍保持帝國時代的光榮回憶與強烈的大國意識之遺緒，另一方面則是意識型態之影響。周恩來在萬隆會議(Bandung Conference, 1955)之後承認，中國周邊鄰國害怕的是中國而非美國的威脅；¹⁸³毛澤東也在 1968 年對「帝國主義」既不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可是過去世界各國革命「遍地開花」的情況又減少許多，而感到不解與苦惱。¹⁸⁴顯示中國戰略菁英雖然利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替中國謀求一個較穩定的國際環境，這種柔性手段的背後邏輯卻仍與帝國時代一樣，基於不願深入瞭解鄰國的心理，而非真正的愛好和平，並與帝國時代一樣嚴重降低中國間接戰略的效用。

(五)、彈性外交政策之回復

毛澤東的意識型態地緣政治密碼導致中國在 1969 年同時進入與美、蘇兩超強軍事發生對峙的重大國家安全危機，不僅導致 1970 年代以後地緣政治密碼的

¹⁸⁰ 鈕先鍾譯，André Beaufre 著，**戰略緒論**(臺北：麥田出版社，1996 年)，頁 149。

¹⁸¹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著，**毛澤東外交文選**，前引書，頁 296-297。

¹⁸² 關於蘇聯援助中國發展核武的研究，本論文主要參考沈志華的研究。沈氏認為蘇聯出乎美國意料之外地幫助中國發展核武，乃是因為 1950 年代的中國是蘇聯在社會主義陣營中最重要的支柱與盟友，沒有史達林(Joseph Stalin)那種權勢與權威的赫魯雪夫為了確立在社會主義國家陣營領導地位，必須在政治上取得中國的支持和幫助，因在 1950 年代之後逐漸把對中國的核能技術協助從民用擴大到軍用。沈志華，「援助和限制：蘇聯對中國研製核武器的方針(1949-1960)」，沈志華、李濱主編，**脆弱的聯盟：冷戰與中蘇關係**(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頁 206-244。

¹⁸³ Shirk, *China: Fragile Superpower*, op. cit., p. 77.

¹⁸⁴ 中共中央文獻室，**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北京：中共中央文獻室，1987 年)，第 13 冊，頁 32。

改變，也促使毛澤東不得不將意識型態對中國行為的支配改為國家利益，與美國的接近導致中國不可能再主導「反帝反修」的世界革命，遂產生「一條線」與「一大片」兩種新地緣政治密碼，開始揭露毛澤東外交政策開始放棄以往意識型態主導，改採以國家利益為主的靈活態度的現象，雖然毛澤東仍因為對美國的意識型態，而很快放棄了「一條線」與「一大片」，改以「三個世界」作為最終的新體系層級地緣政治密碼，但矛盾的是「三個世界」的出現反而促使毛與彼時中國外交政策必須為了聯合第三世界國家，而被迫放棄以往對某些第三世界國家中毛派共黨的支援，改與該國政府接處，反而因此更進一步使內政導向戰略文化中的彈性外交政策特徵重新慢慢滲入 1970 年代以後的中國外交政策，並在鄧小平掌政以後隨著仍具有一定程度意識型態意義的「三個世界」密碼之消失，而完全主導爾後中國的大戰略行為。¹⁸⁵

(六)、內政、國力與對外戰略之連結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最為明顯的內政導向戰略文化特徵之繼承為藉由內政提升國力，並隨國力設定對外戰略之連結。毛澤東在 1950 年代認同必須先有強大的國力才能支持較積極的對外政策，而且認為中國本身的基本權力要素相當優越，若能有良好的組織與發展，有朝一日必能成為體系中的強國。¹⁸⁶因此毛澤東在「一五」計畫順利完成，使中國國力有所提升以前只能謹守「一邊倒」的對外路線，直到一五計畫結束以後才覺得中國有能力在國際體系中發揮更大的力量，並與蘇聯爭奪國際共產運動領導權；¹⁸⁷大躍進雖是極為失敗的經濟試驗與中國在 1950 年代末期至 1960 年代初期巨大的經濟災難，但其背後的指導思想，實為毛澤東在內政導向戰略文化影響下追求先富國強兵，再由此累積對外行動能力，與蘇聯爭奪社會主義陣營領導權的一種內政導向戰略作為；¹⁸⁸文化大革命則有鞏固中國人民在意識型態上反對蘇聯修正主義的政策目的。¹⁸⁹而中共在 1960 年代中期更實施「三線建設」，以調和當時中國東西部發展嚴重不均的情況，藉此同時達成備戰與長期建設的需要。¹⁹⁰而除了強化國力之後再對外行動的傳統行為特徵之外，毛澤東進一步在人民戰爭理論中將內政與外交的連結需要人民的支持這一特徵發展到極致。

總之，這些現象在在顯示儘管毛澤東時期的中國有許多超越傳統內政導向戰略文化的行為，結構的變化也使得部分內政導向戰略文化的特徵雖然表面存在，內在邏輯卻有很大的不同。不過由於兩極結構與中國的力量低落與在結構中的地位並不高，內政導向戰略文化在毛澤東時期的變異並沒有造成中國大戰略改為攻勢/擴張型，而是明顯屬於防衛型與安撫型的混合，柔性戰略次文化的運用一如

¹⁸⁵ 楊奎松，「中美和解過程中的中方變奏：毛澤東“三個世界”理論提出的背景探析」，沈志華、李濱主編，**脆弱的聯盟：冷戰與中蘇關係**（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頁 462-481。

¹⁸⁶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著，**毛澤東外交文選**，頁 114-115。

¹⁸⁷ 沈志華，「中蘇同盟破裂的原因和結果」，**中共黨史研究**（北京），第 2 期（2007 年），頁 37。

¹⁸⁸ 沈志華主編，**中蘇關係史綱—1917-1991 年中蘇關係若干問題再探討**，前引書，頁 207-210。

¹⁸⁹ 樂景河主編，**中俄關係的歷史與現實**（河南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 557-574。

¹⁹⁰ 耿曙，「『三線』建設始末：大陸西部大開發的先驅」，**中國大陸研究**，第 44 卷第 12 期（2001 年 12 月），頁 13-14。

帝國時代，帶有濃厚的權力政治考量與間接戰略之性質。

二、鄧小平、江澤民與胡錦濤：重回內政導向戰略文化的限制

毛澤東過於意識型態理想化的體系地緣政治密碼，造成中國國力嚴重衰退，又同時面臨與美國、蘇聯對抗的危險，尤以蘇聯的威脅最嚴重。這使得毛澤東以後的中國領導人必須如明朝中期那樣由對外政治擴張改為採取緊縮政策，以免使中國國家安全陷於更危險的處境。因此自鄧小平開始的領導人，其地緣政治密碼都不如毛澤東那麼具有理想性，¹⁹¹雖然仍具有建立國際政治和經濟新秩序的體系層級密碼，但更加注重中國的國家利益勝過虛幻的國際領導地位，體系層級密碼的理想性遠不如毛澤東濃厚。換言之，中國戰略菁英在中共的馬列主義與毛澤東思想指導下對於傳統與反傳統對中國在 1949 年之後的世界觀與戰略選擇的聯繫與辯證關係，在 1979 年之後因為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而事實上被承認為錯誤而結束，¹⁹²內政導向戰略文化對當代中國的戰略行為有更多影響。不過中國的實力與地緣政治模式，以及地緣政治結構在冷戰之後都有急遽的變化，這使得內政導向戰略文化在當代的內涵與毛澤東時期相較又發生了變化，而且環境的改變也不可能使 1979 年以後的中國戰略菁英全面回到在地緣政治結構、地緣政治體系秩序原則、物質文明基礎都完全不同情況下發展出來的傳統內政導向戰略文化。

(一)、內政、國力與對外戰略之連結

章百家指出，從 1980 年代開始出現、在 1990 年代變得更加明顯的一個與以往不同的中國內政與外交之間的相互作用特徵，是外交政策同國內目標的聯繫更為緊密，中國領導人相當自覺地從國內經濟、政治需要出發來考慮外交問題。¹⁹³此一趨勢乃從鄧小平開始，他始終認為必須堅持取得和平的國際環境以發展中國的國力，才能建立和加強國防工業與軍隊建設，取得應付世界大戰或對抗霸權主義的力量，其提出的「社會主義須先發展生產力」，以及「四個現代化就是經濟建設」等主張，即為內政導向戰略文化中強調內政與外交連結的明顯表現。其後的領導人正如章百家所言，明顯繼承此一回歸內政導向戰略文化制約的趨勢：江澤民在 2002 年十六大期間提出 21 世紀前二十年是中國建設所謂的「重要戰略機遇期」，¹⁹⁴戰略機遇期的概念為胡錦濤所繼承，¹⁹⁵表現出鄧小平以後內政與外交

¹⁹¹ 實際上，周恩來的對外政策比起毛澤東來說實際許多，但是周恩來雖然主持中國的外交，卻並非中共的首要領導人，這使其對外政策的現實考量經常被毛澤東的意識型態化主張所取代而不能得到貫徹。對於此種差異，尼克森曾指出是因為周恩來總是將「中國」而非「共產黨」放在政策的首要位置，但其他中共戰略菁英卻反過來，而且周恩來的成長背景比毛澤東受到更多傳統文化的影響。Richard Nixon, *Leaders* (New York, N.Y.: Warner Books, 1982), pp. 226-227.

¹⁹² 黃河，「進退之間：中國外交理論更化與重建」，上海社會科學院社會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編，*多邊合作與中國外交*（北京：時事出版社，2010 年），頁 154-155。

¹⁹³ 章百家，「90 年代的中國內政與外交」，前引文，頁 82-83。

¹⁹⁴ 中共中央文獻室編，*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年），頁 2414-2415。

¹⁹⁵ 「胡錦濤：中國繼續處在戰略機遇期和矛盾凸顯期」，*香港商報*，2010 年 1 月 2 日，http://www.hkcd.com.hk/content/2010-01/02/content_2455563.htm；「胡錦濤：全軍要堅決維護中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中新網*，2011 年 3 月 12 日，<http://big5.chinanews.com:89/gn/2011/03-12/2901955.shtml>。

連結、先內政後外交的內政導向戰略文化特徵。無論是江澤民的「三個代表」與「新安全觀」，或胡錦濤的「和平崛起」、「和平發展」與「科學發展觀」等指導思想，皆延續鄧小平以來改革開放、維持國內政局穩定與追求和平國際環境的政策路線，而且繼承了中國自鄧小平以來將中國內部建設、改革開放與追求和平國際環境，和反對國際霸權主義、達成國際體系多極化、建立國際新政治與經濟秩序等對外政策目標相連結的一貫政策傳統。

另外在人民戰爭的部分，既然這一戰略理論原本就是結合中國在全球地緣政治結構中的地位與中共本身的內戰戰略經驗，為了抵抗中國在冷戰中可能遇到的超強入侵所發展的，而鄧小平時代的中國所面對的結構與其在結構中的地位並沒有發生任何實質變化，因此仍被繼承與遵循，只是注意到 1970 年代以後科技的急速發展，但他們對戰爭中作戰的觀念還是不脫以往得到的經驗與毛澤東人民戰爭思想，頂多只是認為需要因應敵人在科技上的進步將裝備現代化，¹⁹⁶即所謂的「現代化人民戰爭」。¹⁹⁷然而鄧小平時期的人民戰爭理論在實際運作上不如毛澤東時期，以懲越戰爭為例，除了鄰近戰場的少數邊境地區外，並沒有像韓戰那樣發展為全民運動，即使邊境省分也未必完全支持懲越戰爭，爾後更幾乎被中國官方與教育所遺忘。¹⁹⁸

不過 1990 年代以後，隨著冷戰的結束與中國之崛起，結構形式與中國在其中地位等的結構變化使人民戰爭戰略思想的延續遇到極大的困境。雖然中國仍然因為科技大幅落後西方國家與俄羅斯，使其可能持續面臨「以劣擊強」的態勢，但中國已經不再需要畏懼遭到列強入侵的大規模、總體性反擊戰。這使中國戰略菁英開始尋求如何在既有的人民戰爭思想與積極防禦戰略思想下，尋求在冷戰後以短時間、高科技、高強度等特徵構成的有限戰爭中獲勝，尤其當中國為了領土爭端而捲入這樣的戰爭中，大多不是在國境周邊的地區而是近海地區，很難再以傳統人民戰爭的陸戰方式打贏以海空戰為主要性質的高科技有限戰爭，再加上第一次波斯灣戰爭與美國爾後在全球各地充分發揮其高科技戰力的刺激，使得江、胡兩個時代的人民戰爭理論更加強調科技建軍與作戰對於嚇阻戰爭爆發與在有限戰爭中獲勝的重要性，人民對戰爭的支援從毛、鄧時代的人海戰術與後勤、情報支援，改為運用經濟、科技、文化、道義等方式和手段支援戰爭，解放軍也依賴這種人民支援的方式來尋求獲勝。¹⁹⁹中國在 1990 年代因應市場經濟發展與全球化而進行的裝備體系改革，試圖藉由「軍轉民」與「軍民結合」等措施，引進民間的新管理、研發、生產制度和技術於軍工企業中，從而提高軍事工業的生產

¹⁹⁶ 鄧小平與葉劍英的觀念大致即如是，只有粟裕曾提到必須在作戰上也因應科技的發展做出相應的改變。見中央軍委辦公廳，**鄧小平關於新時期軍隊建設論述選編**（北京：八一出版社，1993 年），頁 45；范碩，「葉劍英對現代軍事理論的傑出貢獻」，潘石英主編，**當代中國軍事思想精要**（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2 年），頁 401-403；王希先，「淺談粟裕的軍事思想」，潘石英主編，**當代中國軍事思想精要**（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2 年），頁 457-463。

¹⁹⁷ 姚延進、劉繼賢主編，**鄧小平新時期軍事理論研究**（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4 年），頁 94。

¹⁹⁸ Scobell, *China's Use of Military Force, op. cit.*, p. 141.

¹⁹⁹ 彭光謙、姚有志主編，**戰略學**（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 2001 年），頁 480。

效率與研發水準，²⁰⁰可謂是一種表現。不過除此之外，另一個表現是進一步將這種軍民結合的方式利用國防動員體制、民兵與預備役部隊的方式制度化，這是中共從十六大到十七大的領導人工作報告中揭櫫的重要建軍工作。²⁰¹

(二)、義戰思想的延續

鄧小既然繼承了人民戰爭作為解放軍的戰略指導，人民戰爭中的後發制人與義戰邏輯也被其繼承下來。²⁰²鄧小平時期一個非常明顯的後發制人與義戰行動是他在 1979 年發動對越南的戰爭之前，與毛澤東時期一樣先利用國內媒體製造越南意圖在中南半島建立霸權，以及越南為蘇聯代理人，二者的目標為中國，越南已經對中國發動了多次政治與軍事攻擊，導致中國邊境地區人民在這些行動中受害，中國若不予以反擊將有遭到蘇聯南北夾擊的嚴重國家安全危險。²⁰³

但是基於中國實力與實質國際地位的提升，雖然鄧小平與其後的領導人還是將民族主義作為一個行動合法性的來源，但是越來越認識到理性行為準則的重要性。除了仍強調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對外交政策的指導原則之外，另一個冷戰後的重要發展是將國際法的實際規定引用為義戰合法性之根源，而非僅是抽象的國際法原則，亦即將原本之「輿論戰」增加了「法律戰」的運用，最明顯的情況有二：第一個案例就是依照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之規定，劃定本身的領海、專屬經濟區與大陸礁層等合計超過三百萬平方公里的「海洋國土」，並賦予其有如陸地領土一般的象徵意義，依此責成解放軍保衛海洋領土與中國海洋權益。第二個案例則是藉由制訂反分裂國家法這樣的國內法，取代過去僅提出何種情況下中國將對臺灣動武的原則性宣示，來為自己出兵臺灣的行動取得的「合法性」。

(三)、慎戰、對外行動與國家政權穩定優於對外行動

為了強調建設的優先，此一邏輯必須首先要確保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所以鄧小平甚至認為維護世界和平要高於反霸權主義傳統，²⁰⁴而與之相呼應的則是中國國內需要有穩定的政治環境，「壓倒一切的是穩定」、²⁰⁵「中國不允許亂」。²⁰⁶因此除了 1979 年與越南的戰爭之外並沒有其他主動對外用兵的行動。鄧小平發動對越南的戰爭雖然與毛澤東在韓戰之前一樣是力排眾議之後的結果，²⁰⁷不過考

²⁰⁰ 丁樹範，「市場因素與一九九〇年代以後中國裝備體系的改革」，*中國大陸研究*，第 48 卷第 1 期，2005 年 3 月，頁 29-49；丁樹範，「全球化下的中國國防工業」，*中國大陸研究*，第 49 卷第 3 期，2006 年 9 月，頁 1-22。

²⁰¹ 江澤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前引文，頁 33。

²⁰² 鄧小平在 1977 年 12 月於中央軍委全體會議中演講時表示，「我們進行的是正義戰爭，是人民戰爭」。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鄧小平文選（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年），頁 75。另外，根據姚延進、劉繼賢等中國軍事學者的觀點，鄧小平也肯定了毛澤東後發制人的觀念，見姚延進、劉繼賢主編，*鄧小平新時期軍事理論研究*，第一版（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4 年），頁 131。

²⁰³ 彭慕仁，「中共『懲越戰爭』的決策」，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論文（1986 年），頁 88-89、93、95-99、115、135。

²⁰⁴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前引書，頁 116；葉自成，*新中國外交思想*，前引書，頁 57。

²⁰⁵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前引書，頁 284。

²⁰⁶ 同上註，頁 286。

²⁰⁷ David Bonavia, "Sowing the Seeds of a Bigger War,"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March 9, 1979, p. 12; Robert G. Sutter, "China's Strategy Toward Vietnam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量到中國國家利益與實施改革開放的需要，儘管這場戰爭的重要目的是希望提高中國的威望、穩定中國周邊戰略局勢以利實施改革開放，和鞏固鄧小平對中共黨內與解放軍的領導權和建軍方向，其對戰爭的態度比起毛澤東對韓戰的態度要謹慎許多，使得戰爭成為一場甚為有限的長期戰爭，當中國發現戰爭無論是在 1979 年或 1984 年，均未能達到迫使越南從柬埔寨撤軍以及停止與中國敵對的戰略目的，反而陷入僵持局面時，雖然威脅要給予越南「第二次教訓」，但實際上除了 1984 年的「老山戰鬥」算是 1979 年作戰結束之後為了解決局面的新發展而產生的大規模戰鬥之外，鄧小平的中國為了專注於國內建設與顧慮來自蘇聯的更嚴重威脅而從未實施「第二次教訓」，取而代之的外交活動與支援中南半島的反越游擊戰。²⁰⁸而即使鄧小平對國際社會因為天安門事件而對中國施加經濟制裁感到極為不滿，²⁰⁹卻沒有因此發動類似毛澤東式的激進對抗行動。

為了加強建設而不允許中國動亂的思想在江澤民與胡錦濤時期因為中國的發展不均衡與隨著經濟發展而出現的各種內政危機而同樣受到關注。1989 年天安門事件、東歐民主化浪潮與 1991 年的蘇聯解體等事件，共產主義意識型態不再能作為中國共產黨的長期執政合法性，中國共產黨政權懼怕自己同樣遭受西方國家的「和平演變」而喪失政權，其戰略菁英則將中共失去政權與中國的立即分裂與動亂連結。因此雖然中共不是古代帝國的家天下統治，在冷戰以後卻與古代帝國一樣害怕自己喪失執政的合法性而被推翻，但是他們又不願將政治體制改為西方的民主式政體來增加自己的合法性，遂只能將政權的合法性與人民的支持程度結合，而在冷戰後最重要的兩點，²¹⁰一是維持中國的高速經濟成長來轉移人民在社會與政治層面的不滿，願意為了維持經濟成長帶來的「富國強兵」現象而支持中共政權的合法性，而中共則代表了此種發展的保證，江澤民在十六大的三個代表即是此種觀點的完整展現；二是與主權相關的議題，特別是兩岸統一。

然而單憑經濟發展並不能完全維持穩定，中國社會內部的不滿情況隨著經濟發展與日俱增，使得中國戰略菁英普遍認為中國內部無論是在經濟或社會層面皆存在可能於短期內引發重大長期危機的危險因素，²¹¹迫使中國領導人不得不更加關注內部局勢並投注更多資源於維持內部的穩定(即所謂的「維穩」)。²¹²此外，雖然中國的國力大幅提高，而且由於結構在冷戰後轉為單極，蘇聯解體與俄羅斯

States,” in David Elliot eds., *The Third Indochina Conflict*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1), pp. 184-185; Scobell, *China's Use of Military Force, op. cit.*, pp. 124-134.

²⁰⁸ Edward C. O'Dowd, *Chinese Military Strategy in the Third Indochina War: The Last Maoist Wa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p. 89-105

²⁰⁹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前引書，頁 347-349。

²¹⁰ Jeffrey W. Legro, “What China Will Want: The Future Intentions of a Rising Power,” *Perspective on Politics*, Vol. 5, No. 3(September 2007), p. 525.

²¹¹ 丁元竹，「2010 年：中國的三種可能前景——對 98 名政府和非政府專家的調查與諮詢」，*戰略與管理*(北京)，第 4 期(2004 年)，頁 1-15。

²¹² 根據陳至潔(Titus Chen)的研究，中國政府花在武警、公安與其他維安警力的預算，從 2003 年開始與軍事預算一樣每年呈現兩位數成長，尤其在 2007 年會計年度，為了維安的預算較 2006 年成長 36%、公安與警察預算成長達 60.34%，武警預算也成長 50.81%，都遠超過以往雙位數但不到 20% 的成長率。Titus Chen, “China's Reaction to the Color Revolutions: Adaptive Authoritarianism in Full Swing,” *Asian Perspective*, Vol. 34, No. 2(April 2010), pp. 38-39.

在 1990 年代的力量大幅衰退使得中國能消除 1969 年以來北方長期的嚴重國家安全威脅，但一方面體認到無論是在南海或臺灣海峽使用武力，必然導致與美國發生武裝衝突而危及中國的發展與政局穩定，²¹³ 二方面則是認為其所要打贏的「高技術局部戰爭」的破壞力與影響力遠超過傳統戰爭，因此對於是否投入戰爭必須相當謹慎。²¹⁴ 這些因素都相當程度上降低了發動大規模對外行動的意願。維穩與政權合法性的考量在降低中國發動大規模對外行動可能的同時，也證明古代內政導向戰略文化強調慎戰與國家政權穩定的風險高於對外行動的可能收益等兩種特徵，在冷戰後也繼續被當代中國所繼承。

帝國時代的內政導向戰略文化強調對內優先於對外衍生出對其期望中的體系秩序採取有限責任的態度，除非威脅到帝國本身的領土，否則不願意有大規模且長期的對外行動。這樣的有限責任特徵也被當代中國繼承下來。毛澤東雖然對外輸出革命，可是當時的中國從來沒有直接參與毛派革命，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更是有限責任的直接表現。雖然中國的體系層級密碼是多極化，可是中國從來也沒有認真以本身的力量追求多極化之實現，即使到今天，中國與國際社會有密切的互動，但中國還是受到有限責任這一戰略文化特徵的影響，很少願意積極參與國際維和行動，而國際社會不斷呼籲中國作為「負責任的大國」，就是中國仍然繼承這一戰略文化特徵的代表。

(四)、對武力的信任與間接戰略

鄧小平雖然注重國內經濟建設超過對外行動，但他從未忽視武力在國際事務中的效用，發動與越南戰爭的重要目的即是穩定中國的周邊戰略環境以便順利實施經濟建設，同時提高中國在體系中的威望，並藉機訓練解放軍的作戰能力與作為改革的契機。²¹⁵ 鄧小平甚至將 1979 年的戰爭視為改善解放軍作戰能力的試驗，當第一次作戰無法達到主要戰略目的—迫使越南從柬埔寨撤軍—時，而且曝露許多解放軍在裝備、作戰與戰術上的弱點時，鄧小平在戰後立即根據這一實戰經驗予以改進。²¹⁶ 因此雖然鄧小平曾實施大規模裁軍與縮減軍備，卻將「現代化」加入人民戰爭與積極防禦戰略理論之中，並致力於提升解放軍裝備水準，同時強迫反對軍事改革的將領離開軍隊。²¹⁷

²¹³ 關於中國戰略菁英在冷戰後的慎戰思想整理，見 David M. Finkelstein, "Chinese Perceptions of the Cost of a Conflict," in Andrew Scobell eds., *The Costs of Conflict: The Impact on China of a Future War* (Honolulu, Hawaii: University Press of the Pacific, 2005), pp. 9-25.

²¹⁴ 沈明室，「中共積極防禦戰略：根源、演變與傳統」，政治作戰學校政治研究所博士論文(2005 年)，頁 214。

²¹⁵ Nayan Chanda, "Mustering for a Battle on the Border,"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February 16, 1979, p. 11; Harlan W. Jencks, "China's 'Punitive' War on Vietnam: A military Assessment," *Asian Survey*, Vol. 19, No. 8(August 1979), p. 803. 鄧小平在 1975 年 1 月就提出整頓軍隊的想法，以後在 1977 年 12 月與 1978 年 5 月都各有提過，見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鄧小平文選(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前引書，頁 7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與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鄧小平軍事文集*(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與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 年)，第三卷，頁 6-8、104-105。

²¹⁶ See Edward C. O'Dowd and John F. Corbett Jr., "The 1979 Chinese Campaign in Vietnam: Lessons Learned," in Laurie Burkitt, Andrew Scobell, Larry M. Wortzel eds. *The Lessons of History: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t 75* (Carlisle, Pa.: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U.S. Army War College, 2003), pp. 353-378.

²¹⁷ Scobell, *China's Use of Military Force*, op. cit., pp. 139-140.

冷戰以後的中國戰略菁英雖然深信體系中追求和平與發展的力量超越發動戰爭的力量，世界大戰不可能發生，而且胡錦濤「和諧世界」的主張似乎與過去側重軍事硬權力的「三個世界」不同，重視軟權力與國際制度、觀念等層面，²¹⁸但由於區域衝突頻仍，以及認為美國所主導的全球同盟體系與單邊主義(Unilateralism)對中國的安全與追求多極化、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的地緣政治密碼仍構成潛在威脅，使得中國戰略菁英並不認為武力在國際事務中的效用已然消失，而是秉持「平衡來源於力量，和平來源於威懾」²¹⁹的觀念，強調物質與軍事力量的重要性。因此儘管中國戰略菁英不願與美國發生衝突，但是畏懼與美國的武裝衝突危機並不表示中國屈服於此種危機，相反的，中國在冷戰以後認為軍事戰略必須與政治外交緊密配合，才能強化反霸權主義的優勢，並且確立必須在所進行的有限戰爭中，只要出兵便能獲勝的戰略指導。²²⁰此外，江澤民與胡錦濤都強調維護中國的海洋權益對解放軍的意義與維持國家統一同樣重要，²²¹再加上中國軍事力量發展並不透明，使得與中國有嚴重爭端的鄰國不能盡信中國強調以和平手段解決海洋領土爭端的政治宣示。²²²因此雖然中國為了經濟發展的目的而追求穩定的國際體系，造成目前的和平發展/崛起大戰略更看似柔性戰略次文化主導了內政導向戰略文化，但實際上並非如此，仍然因為結構之影響而具有濃厚的權力政治考量與間接戰略取向，並信任武力在國際事務中之效用。

對間接戰略的偏好是另一個內政導向戰略文化特徵的繼承。其最主要的表現是在中國的對臺政策上，²²³這是一個無論在亞太次體系或全球體系來說都極為有限的目標，中國利用「一個中國」的原則與政策、堅決不放棄以武力解決臺灣問題的政策宣示、行動與武力建設和展示，以及所有有關各方對維持臺海和平的渴望與臺灣本身追求經濟持續繁榮的願望，已經讓全世界包括臺灣自身在內，都接受臺灣議題是中國最核心的利益與政策底線與不得衝撞的紅線。但如何詮釋臺灣議題中各種發展是否「衝撞」中國的利益，大多數情況下掌握在中國自己手中。此種極為強硬的態度屬於間接戰略中的外部動作，不僅中國在臺海議題中取得更有利的地位，另一方面則持續加深、加快與臺灣的經濟、文化、社會等層面交流

²¹⁸ 宋效峰，「中國與世界的關係變遷：從“三個世界”劃分到和諧世界構建」，*嶺南學刊*(廣東省廣州市)，第4期(2011年)，頁24。

²¹⁹ 門洪華，「中國國家安全觀念的創新」，門洪華主編，*中國：大國崛起*(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172。

²²⁰ 同上註，頁206、213。

²²¹ 江澤民在1996年12月接見解放軍海軍第八次黨代表大會代表時指示解放軍海軍的任務為「保衛中國的領土完整，維護祖國的統一和海洋權益，維護周邊環境的穩定」，另外，胡錦濤在2006年12月會見解放軍海軍第十次黨代表大會的代表時也有類似指示，而在該次會議中，胡錦濤更首次公開表示中國是個海洋大國。見張蜀誠，「剖析信息條件下共軍近海防禦戰略」，*空軍學術雙月刊*，第622期(2011年6月)，頁49；「胡錦濤：鍛造適應歷史使命要求強大人民海軍」，*新華網*，2006年12月27日，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mil/2006-12/27/content_5539162.htm。

²²² Dona Z. Pazzibugan, "Defense Chief Accuses China of Double Talk," *Inquire News*, July 23, 2011, <http://newsinfo.inquirer.net/27935/defense-chief-accuses-china-of-double-talk>.

²²³ Jacques deLisle, "Soft Power in a Hard Place: China, Taiwan, Cross-Strait Relations and U.S. Policy," *Orbis*, Vo. 54, No. 4(Fall 2010), pp. 493-524.

與互動，即所謂「軟的更軟，硬的更硬」之對臺戰略指導，以及宣揚中國的強大與臺灣經濟的日益萎縮與政治紛亂，試圖對臺灣與世界—主要是美國—的精神領域產生一種時間與整體趨勢都站在中國那一邊，按照中國意願的統一勢不可擋的內部動作腐蝕效果。這不僅使中國獲得對臺灣的最大行動自由，希望達成不動武而能統一臺灣的戰略目的更是古典戰略思想中「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當代呈現。

雖然「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戰略思想似乎隨著中國戰略菁英向古代歷史汲取經驗而重新受到重視，²²⁴並在臺灣議題中有相當的運用，不過當前中國對間接戰略最大規模的運用，就是所謂的「和平發展/崛起」戰略與宣傳。此種戰略的目的簡單來說，就是因應因為中國是一個在科技與經濟發展上相對落後，但卻擁有巨大潛力與亞太中心位置，又對現有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安排不滿的國家，為了使中國能夠順利達成經濟建設來提升政治、經濟、軍事力量以成為體系中的超強，並建立理想中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但又不希望在這一過程中遭到體系中既有大國的威脅而導致失敗的構想。由於中國的硬權力相較其他既有超強與強權來說落後甚多，無可避免一定要運用間接戰略才能避免其他大國的圍堵，並取得戰略上的勝利。

因此中國政府與戰略菁英在談及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係時，除了針對美國、日本等比較明顯的競爭對手之外，千篇一律喜歡著重描述雙邊關係發展前景與當前發展狀況未來的可預期性，強調經貿、文化、合作安全是雙邊關係發展的主流與「互惠雙贏、共存共榮」的優點，並強調—無論這是否符合史實—中國傳統文化的愛好、反侵略和平特徵，避談或少談雙邊關係中的隱藏危機，以及最重要的，當外國與中國增加經貿互動之後，是否會受到中國的支配，久而久之甚至在最敏感的政治與安全議題也對中國讓步，成為中國勢力範圍內的國家，則絕口不提或以中國愛好和平、不稱霸、中國遵守和平共處五原則等話語帶過。但另一方面，他們也強調中國擴張軍力乃是為了自衛而非對外擴張的合法之舉。

這種處理方式與對臺灣議題一樣，顯示中國希望利用間接戰略的外部動作與腐蝕手段，來消弭其他國家的戒心並達成本身的政治目標。²²⁵但這是否能重新成為當代內政導向戰略文化的特徵還有待觀察，畢竟中國目前的間接戰略成功運用個案僅限於臺灣，其地理範圍與目標的地緣政治屬性、政治與文化特殊性等都有特別的限制。雖然領土爭端也是有限的目標，但與臺灣問題不一樣的是這些議題本質無法得到「不干涉內政」原則的支援，也沒有國際社會自 1971 年以來對「一

²²⁴ Pillsbury, *China Debates the Future Security Environment*, op. cit., pp. 208-209.

²²⁵ 近年來，由於南海地區的領土爭端越演越烈，而中國的力量也逐漸加強，某些中國戰略菁英的思維開始展現出較露骨的武力使用與強調大國力量展現手段。例如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員陳向陽指出，中國的周邊戰略應強調「剛柔並濟」，強調並清楚說明「和平發展」絕不排除為捍衛自身正當利益的自衛反擊。而為了破解周邊鄰國「經濟上靠中國、安全上靠美國」的作為，中國應將經濟與政治連結在一起，以擴大共同經濟利益的手段來化解安全利益衝突，並對侵犯中國權益的國家實施能夠準確打擊對方「痛處」的經濟制裁。雖然陳向陽的觀點與政策建議是否即為目前中國戰略菁英主流觀點，與決策菁英的主流政策路線，尚待進一步的後續觀察，但這樣的觀點無疑是內政導向戰略文化對武力的信任，以及使用其他間接戰略手段協助武力達成戰略目標特徵的明確展現。陳向陽，「冷靜研判周邊戰略新態勢」，*瞭望新聞週刊*(北京)，2011年6月27日，頁75。

個中國」原則的默示或明示的類似支持，而周邊國家與臺灣不一樣，和中國之間存在巨大的文明差異，卻有同樣強大的民族主義與主權敏感性，而中國在領土爭端中運用國際法原則作為主要的外部動作，但這些原則卻又都能立即為爭端國反過來利用。

因此，即使中國對臺灣能夠成功運用間接戰略，能否將其適用於更大的空間範圍，以及文明屬性與中國差異甚大的其他國家，是一個很大的挑戰與疑問。例如即將於中共十八大中取代胡錦濤成為新一代領導人的習近平，在 2012 年 2 月訪問美國時提出美國需尊重中國核心利益以建立與中國的互信，雙方才能於更廣泛的安全議題中合作。²²⁶這種說法明顯屬於一種以「合作」交換美國承認中國對其「核心利益」有主導權的間接戰略作為。中國敢於對美國提出這樣的「交換」要求，當然是基於其已經發展為一定程度軍事大國的自信，但是從習近平訪問之後的發展來看，卻沒有美國願意接受這種「建議」的跡象。

中國在鄧小平時代開始擺脫毛澤東的孤立與革命外交政策，逐漸因為改革開放而與世界其他國家有更多的互動，並且在冷戰後因為全球化與區域主義的擴展，中國在結構中力量與地位的提升而有更多自信，和新安全觀強調的合作性安全觀念，以及為了促使週邊環境在穩定的同時進一步成為中國未來發展的助力，和尋求改變既有國際建制以獲取更多利益於發展等多種考量以及全球地緣政治結構和中國本身的在地緣政治模式與結構形式上的變化，而在進入本世紀之後積極參與亞太尤其是東亞的多邊外交活動，²²⁷但鄧小平、江澤民與胡錦濤時代的戰略菁英在運用間接戰略時仍然沒有完全改變對周邊國家、主要對手缺乏瞭解甚至輕視的心理：長期擔任周恩來在外交事務助手的鄧小平在 1976 年甚至還因為不瞭解東南亞國家對中、越兩國鬥爭的真正關注焦點，而在訪問馬來西亞時受到冷落；鄧小平並未因此有體悟，結果在 1979 年準備發動對越南的戰爭之前，聽到李光耀表示東南亞國家視中國而非蘇聯為主要威脅時還是大感驚訝。²²⁸

中國戰略菁英雖然在 1990 年代之後引入國力綜合評估作為研究中國與其他主要國家在結構中地位的主要依據之一，但一方面這種計算方式很容易因為對研究指標的定義與採納標準不同而就結果發生爭論，另一方面則是數字並無法協助全面瞭解一個國家的真實情況，這就導致雖然中國不斷宣示其和平發展與不稱霸的政策原則，並成功地推行「東協+1」自由貿易區與深入參與湄公河流域的次區域整合，但這些多邊主義指導下的經濟與政治間接戰略手段並沒有完全發揮中國戰略菁英的預期效果，「中國威脅論」在今天仍有廣大的市場，中國在這方面還是遠不如前蘇聯，後者根據薄富爾的分析，在冷戰中期以前就已經多次成功地

²²⁶ Wong, "Chinese Vice President Urges U.S. to Respect 'Core Interests'," *op. cit.*.

²²⁷ Shirk, *China: Fragile Superpower*, *op. cit.*, pp. 110-111; Wang Jisi, "China's Changing Role in Asia," in Kokubun Ryosei and Wang Jisi eds., *The Rise of China and a Changing East Asian Order* (Tokyo: Jap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 2004), pp. 5-6; 張蘊嶺, 「構建中國與周邊國家之間的新關係」, 張蘊嶺主編, *中國與周邊國家：構建新型夥伴關係*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8), 頁 11-12。

²²⁸ 中山, 「李光耀回憶鄧小平決策對越自衛反擊戰」, *領導文萃* (福建省福州市), 第 8 期 (2007 年), 頁 57。

運用間接戰略來達成戰略目標，²²⁹但中國在其所欲達到的各種戰略目標之中，除了臺灣這個特例之外，並沒有任何可與前蘇聯相媲美的成果，²³⁰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國對既存國際秩序有很高的不滿，使其戰略行動容易展現只顧慮自己安全而不願意負擔應有責任的言行不一的現象並洩漏其權力政治考量，²³¹而且其為了建構和諧社會以作為「崛起」的根本策略和幫助中國改善國際形象爭取更多盟友的行為，²³²反而使國內法律對人權的處理亦與目前西發利亞體系中的主流價值有太高的抵觸，傷害了其軟權力政策欲傳遞的正面形象。²³³某些中國學者因此承認中國必須反思並改變用錢就可以買到「人心」的政策思維。²³⁴這樣的反思就是中國迄今還是與帝國時代一樣缺乏對周邊國家瞭解，以致間接戰略手段無法真正發揮功效的證明。

(五)、權力政治思維的彈性外交政策

由於逐步拋棄過於理想化的體系層級地緣政治密碼，鄧小平及其以後的領導人在對外政策上展現出更多傳統內政導向戰略文化的權力政治思維與彈性外交政策特徵。所謂的「韜光養晦，有所作為」大戰略指導即是鄧小平受內政導向戰略文化影響下，最明顯的權力政治思維彈性外交政策的表現，葉自成認為「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另一種說法是鄧小平在 1987 年提出的，在中國實現現代化之前，還要夾著尾巴做人，要很謹慎。²³⁵這與陸贄、王安石指出中國在傳統上能力不足以「制夷」的時候，總是必須放下天朝自尊，與夷狄交好，等力量足夠時才能壓倒夷狄的說法，實不謀而合。此外，雖然近代中國的經濟力量遠低於帝國時期，但鄧小平同樣將經濟發展與市場作為解決外交問題的重要手段，²³⁶更是內政導向戰略文化中具有強烈功利主義與權力政治思考特徵的表現，這在強調意識

²²⁹ 鈕先鍾譯，André Beaufre 著，**戰略緒論**，前引書，頁 145-146。

²³⁰ 根據 BBC 對世界 27 個國家在 2011 年的民意調查顯示，中國崛起有相當兩極化的評價，與首次調查的 2005 年相比，2011 年的結果顯示對中國的經濟崛起，七國集團(G-7)民眾認為是壞事的比例明顯都有攀升並超過 50%，不過開發中國家則普遍還是對中國經濟影響力增加抱持較為正面的態度，尤其是非洲國家與亞洲的巴基斯坦，中國最親密的盟友之一。不過在軍事力量方面就不是如此，大多數亞洲國家尤其是日本、南韓、菲律賓與澳洲對中國軍事力量崛起抱持極為負面的態度，僅有巴基斯坦維持正面而印尼態度較為中立，印度民眾雖然對中國軍事崛起抱持正面態度的還是較多，但比例已經從 2005 年的 56% 下降到 2011 年的 44%。此外，美國的正形象還是遠多於中國，而在美、法、德、日、西班牙等國甚至認為中國成為世界經濟領導者是壞事，他們更傾向接受現存由美國領導的體制。“Global poll reveals rising concern about China's increasing power,” *BBC*, March 28, 2011, http://www.bbc.co.uk/pressoffice/pressreleases/stories/2011/03_march/28/poll.pdf; Jaime A. FlorCruz, “China works hard to project soft power,” *CNN*, March 30, 2012, <http://edition.cnn.com/2012/03/30/world/asia/florcruz-china-soft-power/index.html>.

²³¹ 見中央社對印度學者瑪德胡的專訪報導，何宏儒，「印中矛盾考驗彼此合作」，**中央社**，2012 年 3 月 28 日，<http://www.cna.com.tw/News/aALL/201203280309.aspx>。

²³² 閻學通，「序言」，閻學通、孫學峰等，**中國崛起及其戰略**（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頁 7。

²³³ FlorCruz, “China works hard to project soft power,” *op. cit.*

²³⁴ Yan Xuetong, “How China Can Defeat America,”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0, 2011, <http://www.nytimes.com/2011/11/21/opinion/how-china-can-defeat-america.html?pagewanted=all>.

²³⁵ 葉自成，**新中國外交思想**，前引書，頁 427。

²³⁶ 同上註，頁 428-429。

型態支配性的毛澤東時期是幾乎不存在。

此外，鄧小平以後的中國戰略菁英也因為毛澤東時代實施過的結盟戰略，認為這些結盟—無論是對蘇聯的一邊倒正式結盟或對美國的另一種「準一邊倒結盟」—對中國的國家利益來說在最後都造成了傷害並削弱中國在體系中的影響力與降低其地位，²³⁷因為 20 世紀的中國與以往帝國時代相反，是本身極有可能成為他國的附庸而非過去居於能夠指使附庸國的主宰地位。因此中國在 1980 年代初期逐漸放棄利用結盟來維護國家安全的外平衡手段，趨向帝國時代對結盟採取極為保守的態度，時至今日，中國戰略菁英仍因為清朝後期以來與毛澤東時期的同盟最後皆失敗的歷史經驗而不願再度尋求以同盟維繫中國的國家安全與周邊國際環境的穩定，轉而強調自身物質力量基礎在國際權力關係中的重要性。²³⁸不過鄧小平雖然稱其獨立自主外交政策是「真正的不結盟」，²³⁹但其實是一種強調內平衡重於外平衡，可是並不單純依靠內平衡來達成戰略目標或忽略外平衡重要性的外交政策，²⁴⁰仍相當重視國際政治中的權力關係。

鄧小平以權力政治思維指導的彈性外交政策具體來說有如下的表現。雖然毛澤東與周恩來替中國為美中關係改善開啟序幕，但如上文所述，毛澤東仍因意識型態的影響而對此政策路線抱持懷疑，不願更進一步發展美中關係抗衡蘇聯，但在鄧小平時期則完成了建交這一真正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政策。基於抗衡蘇聯與越南的考量，鄧小平在擱置釣魚台領土問題的這一與中國敏感的民族主義攸關的主權問題的妥協之下，於 1978 年 8 月完成了 1972 年以來談判僵持多時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²⁴¹並同意日本的要求，取消 1950 年生效、有效期 30 年、以對抗日本為主要目的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²⁴²儘管該同盟條約在中蘇共分裂之後已形同具文，但中國與蘇聯還是認為其具有穩定中蘇關係不致兵戎相見，以及作為改善雙邊關係的出發點之效果。²⁴³1980 年代初期之後，鄧小平發現與美國的「準同盟」關係並不能從美國那邊取得中國真正想要的抗衡蘇聯威脅的外交與國防支持與解決臺海議題，而且蘇聯也試圖對中國拋出改善雙邊關係的善意—即蘇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Leonid Brezhnev)在 1982 年 3 月在塔什干(Tashkent)發表蘇聯的亞洲政策演說—時，他利用中蘇關係的改善牟取對中美關係中的更多籌碼，又同時以美中的友好關係為基礎，尋求進一步改善中蘇關係，²⁴⁴以及利用蘇聯對改善中蘇關係的願望，與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的「新思維」(New Thinking)政策方針，對越南的中南半島政策施加壓力，以建立允許中國實施改革

²³⁷ 同上註，頁 160-162。

²³⁸ 黃河，「進退之間：中國外交理論更化與重建」，前引文，頁 160。

²³⁹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前引書，頁 57。

²⁴⁰ 同上註，頁 127-128；葉自成，新中國外交思想，前引書，頁 165。

²⁴¹ Daniel Tretiak, "The Sino-Japanese Treaty of 1978: The Senkaku Incident Prelude," *Asian Survey*, Vol. 18, No. 12(December 1978), pp. 1235-1249.

²⁴² Daniel Tretiak, "China's Vietnam War and Its Consequences," *The China Quarterly*, No. 80(December 1979), p. 746.

²⁴³ 沈志華主編，中蘇關係史綱—1917-1991 年中蘇關係若干問題再探討，前引書，頁 459-461。

²⁴⁴ 同上註，頁 466-510。

開放政策的穩定周邊環境。²⁴⁵

冷戰結束後，具備濃厚權力政治思維的彈性外交政策除了繼續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之外，另一種明顯的表現是江澤民提出的「新安全觀」，這是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著眼於結合冷戰後體系產生的全球化、非傳統安全與國際間擴大交往的互動方式，產生一種同時包含傳統安全、政治社會穩定、經濟安全、能源與環保等概念的「綜合安全觀」，試圖以所謂的「合作安全」來達成穩定中國週邊環境以利經濟建設，防止發生戰爭危及中國經濟建設的成果，²⁴⁶並利用反對霸權主義的力量平衡美國單極對中國追求多極化與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地緣政治密碼的阻礙，同時反擊「中國威脅論」和西方國家利用人權等議題對中國的干涉，維護中國本身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和價值觀。²⁴⁷

新安全觀對外交政策的指導在江澤民之後為胡錦濤的和諧世界所繼承。在新安全觀的指導下，中國與許多鄰國、體系間各層級大國所建立的各種「夥伴關係」，試圖達到成功維持中國周邊國際環境穩定的戰略目標，並在不引起大規模聯盟對峙的情況下牽制其他強國合縱連橫對中國戰略空間的壓縮。²⁴⁸而此種以雙方平等對待、提升雙邊利益、尋求建立共識與包容雙方的歧見，友好合作與不對抗，也不形成聯盟或對抗第三國的利益為特徵的夥伴關係，²⁴⁹具彈性之處就在於它雖然基於創造穩定週邊環境的共同利益因而設立一定程度的建制，卻不是基於共同威脅，因此沒有共同的針對目標，交往層級與範圍不僅能包括較不敏感的經濟與社會層面，也可以包括敏感的軍事與政治面向，這使得許多和中國有激烈地緣政治利益衝突的國家，如越南、印度、美國等國也能與中國建立此種關係。

(六)、從誘敵深入向禦敵於國境之外轉變

由於鄧小平實施改革開放的緣故，中國的地緣政治模式自 1980 年代起逐步轉向較大規模的工業化與市場化，被拉入世界體系之中；地緣政治特徵雖然仍維持宋朝以來東南各省分之經濟發展程度優於西部各省分的情況，但中國經濟越發依賴東南沿海各省分的對外貿易與工業發展的結果，以及將周邊海域視為領土一部份，使得中國戰略菁英開始因為不能忍受戰爭破壞經濟精華區造成的嚴重傷害，並重視海洋作為中國在國防上的價值。人民戰爭思想雖然仍未被放棄，但已不再強調誘敵深入，鄧小平時期的戰爭指導是以人民戰爭為戰略面，抵禦敵人於國境之外的積極防禦為作戰層面，雖然人民戰爭、積極防禦與以劣勝優等概念名詞沒有什麼變化，但發生了層級上的轉換。²⁵⁰不過鄧小平時期的轉換還不是很完

²⁴⁵ 同上註，頁 510-524；Robert C. Horn, "Vietnam and Sino-Soviet Relations: What Price Rapprochement?" *Asian Survey*, Vol. 27, No. 12(July 1987), pp. 729-747.

²⁴⁶ 楚樹龍，「冷戰後中國的對外安全戰略」，*現代國際關係*(北京)，第 8 期(1998 年)，頁 24-25；楚樹龍，「冷戰後中國安全戰略思想的發展」，*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第 9 期(1999 年)，頁 11-12、15。

²⁴⁷ 高桓，「多極化世界需要豎立新安全觀」，*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第 11 期(2000 年)，頁 22-27。

²⁴⁸ Charlyle A. Thayer, "China's 'New Security Concept' and Southeast Asia," in David W. Lovell eds., *Asia-Pacific Security: Policy Challenges* (Canberra: Asia Pacific Press, 2003), pp. 89-107.

²⁴⁹ 馬世琨、鄭圓圓，「多極化進程加快，中國外交成果豐碩—錢其琛副總理兼外長接受本報年終專訪」，*人民日報*，1997 年 12 月 18 日，第 7 版。

²⁵⁰ 丁樹範，*中共軍事思想的發展*(臺北：唐山，1996 年)，頁 117-118。

全，由於結構仍是美蘇對峙的海陸兩極，而蘇聯又是中國最嚴重的生存威脅，使得鄧小平還是認為人民戰爭與積極防禦的基本邏輯是持久戰，是中國能產生以劣勝優的最重要關鍵。²⁵¹

冷戰以後的結構變化，蘇聯既然不再是中國最主要的生存威脅，中國也認為世界大戰的發生率幾乎不存在，而其國力更進一步的發展帶來的國際地位提高、新的「海洋國土」概念的出現，再加上第一次波斯灣戰爭的刺激，這些發展都使中國應對外敵的軍事戰略不可能走向毛澤東時代的誘敵深入人民戰爭理論，鄧小平時期仍秉持的持久積極防禦論也被放棄，轉向真正的速戰速決。換言之，中國逐漸回到古代身為體系強國的地位，結構的影響使得冷戰以後的軍事戰略指導受到以往內政導向戰略文化更大的制約，不過明顯的改變在於即使受到傳統戰略文化的制約，但以固定防線為核心的前沿防禦不可能再度出現於當代中國的對外戰略之中，因此中國人民解放軍未來必然是設法努力將彈性防禦結合防衛「海洋國土」與攻擊臺灣的需要，不斷鍛鍊現代高科技與資訊化作戰環境下的攻勢防禦。

新的積極防禦與高科技條件下的人民戰爭戰略觀內涵進一步要求解放軍在「高科技局部戰爭」中利用積極防禦將敵人抵擋於國境之外，而且必須速戰速決，不再使用傷害經濟發展甚鉅的焦土戰略與長期抗戰。因此鄧小平首先對毛澤東的誘敵深入戰略進行改變，為了使經濟建設成果不受到戰爭的重大破壞，解放軍放棄誘敵深入的戰爭指導，改為在邊境利於防禦的地區實施陣地戰、運動戰與游擊戰相結合的前緣防禦，²⁵²以阻擋敵人於國外，同時更認為積極防禦軍事戰略的目的不僅在打贏戰爭，還要利用能打贏戰爭的實力，結合其他政治、外交與軍事手段來遏阻戰爭的爆發。²⁵³

總而言之，雖然中國在邁入 21 世紀後不斷融入多邊外交並加深對各種國際建制的參與，並提出和諧世界與和平發展等外交口號與密碼，但這並不表示中國的內政導向戰略文化本質已經真正轉變為柔性或文化道德主義，並使其地緣戰略手段以純粹和平手段為主。相反的，當代中國的內政導向戰略文化始終充滿濃厚的權力政治思維，而且仍然信任武力在國際事務中之效用並以武力為大戰略之核心，這不僅可由其持續不斷提升各種遠離本土、具備明顯戰略攻勢性質的兩棲軍事作戰與戰略交通線控制能力，以及 2010 年以來在周邊激烈的領土爭端所在的地區不斷展現出來，並為鄰國所抱怨、警戒的獨斷(assertive)態度與行為出端倪，²⁵⁴亦可由中國戰略菁英無論軍文，始終清一色在各種著作、公開表示中強調

²⁵¹ 中央軍委辦公廳，鄧小平關於新時期軍隊建設論述選編，前引書，頁 43-49。

²⁵² 沈明室，「中共積極防禦戰略：根源、演變與傳統」，前引書，頁 162-176。

²⁵³ 彭光謙，軍事戰略簡論(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9 年)，頁 75。

²⁵⁴ 主要以美、日、印三個亞太內的大國表現較為明顯，如胡立宗，「美智庫籲政府修改對中策略」，中央社，2010 年 8 月 30 日，<http://www.cna.com.tw/ShowNews/Detail.aspx?pNewsID=201008300004&pType1=PF&pType0=aOPL&pTypeSel=&pPNo=1>；“Worried about China machismo, PM told US,” *The Indian Times*, September 4, 2011, http://article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2011-09-04/india/30112112_1_peaceful-rise-afghanistan-china；“With China on mind, India, US and Japan to hold trilateral meet in Washington,” *The Indian Times*,

國防建設對大戰略與國家安全之重要性，以及軍事力量為和平崛起的核心等的主張看出。²⁵⁵顯然，當代中國內政導向戰略文化的本質仍然偏向強現實政治，偏向柔性與道德的戰略次文化雖然逐漸受到重視，但並未像宋朝的情況那樣，成為決策菁英與大多數中國戰略社群中的菁英秉持的主流戰略次文化而居於主導地位。

第四節、小結

本章概要地分析了鴉片戰爭以後直迄目前的地緣政治結構在形式與模式上的變化對當代中國地緣政治密碼與戰略文化發展的影響。本章的研究顯示，當代中國戰略菁英由於尚未建構一套能完成取代天下觀的中國中心世界觀，雖然其從冷戰時期起就發展出體系層級密碼並努力付諸實踐，但缺乏明確世界觀指導的體系層級密碼使其對未來的戰略規劃顯得相當模糊，也增加了體系中其他強國與周邊國家對中國戰略意圖的疑慮。

另外，地緣政治結構在形式與地緣政治模式上的變化，配合中國在結構中地位的提高與地緣政治模式變化，對傳統的內政導向戰略文化之延續發生很大的影響，不過總體而言繼承的部分仍多於改變的部分。當代中國與帝國時代一樣強調對外行動必須要有強大的國力為基礎，並延伸出對內優先於對外的邏輯，但這樣的思維有一個重大的缺陷，即無論是外國或中國內部，都不知道發展到什麼樣的階段，才算是達成「治安中國」的首要內政戰略基礎目標，這是一個極為相對與主觀的認知，即使定下一個客觀的標準，例如所謂的「小康社會」也沒有太大的幫助，因為中國的人口基數太過龐大，光是判斷是否達成小康社會就已經足夠引起廣大的爭論，可是在還沒達到小康社會之前，中國的總體經濟就已經位居世界第二或第三位，並因此得到龐大的軍事預算可供使用。此種模糊雖然制約了中國的對外行動，但亦增加中國內部對未來政策路線的辯論與中國對外政策在辯論之際的不確定性，尤其是內政導向戰略文化經常在看到主要敵人力量衰退時就改以強硬政策甚至發動戰爭，希望獲得亟欲奪取的戰略目標，這樣的文化特徵配合國際關係理論中的「權力轉移」理論，更增加外國對中國未來戰略發展，以及美、中、日、歐等既有主要超強與強權在 2008 年全球金融海嘯之後似乎出現的權力關係變化可能導致中國在亞太地區行為更加獨斷，並因此引發衝突的疑慮。²⁵⁶中

December 6, 2011,
http://article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2011-12-06/india/30481091_1_trilateral-dialogue-trilateral-meeting-asia-pacific.

²⁵⁵ 當然，也有從安全因素之外，認為增加國防開支能夠避免中國走向通貨緊縮並促進中國經濟成長，以及藉由優化軍隊的非軍事開支來降低社會負擔等對中國的經濟、社會有很大好處的觀點。見胡鞍鋼，「我為什麼主張繼續提高國防開支佔 GDP 比重」，胡鞍鋼主編，**中國大戰略**（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 年），頁 317-320、322-325。

²⁵⁶ 王緝思在 2004 年的文章中稱由於北京的主要戰略方向在內部、冷戰以後中國本身的實用主義和對中國威脅論的憂慮等因素之影響，中國未來在亞太地區不可能出現獨斷之行為，但這種說法由於本文所言，已經因為 2008 年全球金融海嘯之後產生的權力關係變化，中國在 2010 年間於南海不斷展現與以往相比更為強硬的作風而遭打破，顯示內政導向戰略文化在這方面的模糊性的確極有可能反而引發區域的衝突。Wang, "China's Changing Role in Asia," *op. cit.*, p. 19.

國固然強調其戰爭觀為義戰，但周邊國家同樣視與中國的領土爭端為義戰之理由，視中國的軍事現代化與殲敵於國境之外的積極防禦為嚴重之威脅，如此更增加彼此的疑慮。換言之，當代中國的內政導向戰略文化雖然因為強調內政之優先性與穩定對政權的首要性，而仍具有制約其對外行動的力量，但其他面向卻可能引發其他國家的疑慮，反過來增加中國對外強硬行動的正當性與呼聲。

其中最難以解決的是中國戰略菁英對這些領土爭端的態度。傅泰林(Taylor M. Fravel)對冷戰以來的中國邊界爭端進行研究的結果，認為當代中國在冷戰前後多次面臨領土爭端時傾向妥協，存在嚴重的內部政治鬥爭、需耗費大量精力處理的地方叛亂(1958年的西藏動亂)，與爆發危及政權穩定的嚴重社會與政治動亂的可能(文化大革命與1989年天安門事變)等內部原因的影響遠大於外部潛在國家安全威脅的影響。²⁵⁷內部爆發大規模動亂的可能使中國無法對外展現強硬之作為而必須在中國戰略菁英極為敏感的主權議題上妥協，看起來既是內政導向戰略文化注重對內勝於對外特徵在當代的延續，又是為了維持穩定的周邊環境以利內部發展的地緣政治密碼指導下的政策，藉由在領土上的讓步換取周邊國家的政治信任。然而中國戰略菁英對領土爭端的讓步有截然不同的態度—迄今所達成的邊界協定幾乎全都是陸地邊界，重要的海洋領土爭端與臺灣議題幾乎完全沒有在主權議題上妥協的跡象，顯然妥協與讓步有極為明顯的地緣政治意涵。

領土問題退讓並非當代中國特有的行為。帝國時代對於傳統上屬於「九州」一部份且對帝國之國防具有極大的重要性的邊緣地帶地區具有明顯的攻勢/擴張偏好，即使是較為內斂的嚴夷夏之防密碼亦然，能夠主動放棄的大多是認為對帝國安全無甚幫助，或為了政治理由而放棄對帝國安全具高度重要性的地區，共同的特點是華夏農業文明難以長久扎根的邊緣地帶；不可放棄的都是當代戰略菁英認為屬於九州傳統範圍的地區，這種地區即使長久喪失也仍會被視為「失土」而非外國領土，一有機會就要使用包括武力在內的各種方式將其收回，例如所謂的「燕雲十六州」。古代帝國主動放棄領土並非飽受內部政治威脅而無力強硬對外，反而是在較為強大且沒有明顯內部動亂威脅的情況下自動放棄或作為「賞賜」—漢武帝放棄北京以北的「造陽」之地；初唐將青海東北部黃河流域的「河曲」之地作為出嫁至吐蕃的金城公主的湯沐邑；明成祖將大寧之地給予兀良哈三衛。這些地區在給予的同時並不存在所謂的「領土爭端」，給予的目的也不一定是為了創造穩定的安全環境。真正的領土爭端如遼與北宋間的燕雲十六州爭執，北宋只是在澶淵之盟中承認兩國的實際控制線為暫訂國界，從未正式明言放棄對燕雲十六州的領土主權聲索，是一種信心建立措施而非領土問題的永久解決。

因此與古代相較，當代中國在領土問題上的妥協與古代在思維與作為上沒有根本的差異，對於被劃作中國正式領土的邊緣地區—臺灣、西藏與南海各群島—同樣不能輕易做出妥協，還因為民族主義之宣傳而變得更加強硬；反之，能做出妥協的地區不僅在戰略地理上對中國的國家安全沒有直接的危險，而且地緣政治

²⁵⁷ Taylor M. Fravel, *Strong Border, Secure Nation: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in China's Territorial Disput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模式也不再與中國相類。換言之，當代中國在領土妥協上的地緣戰略意識比帝國時代要強烈許多，再加上中國的地緣政治模式在迅速轉換，雖然當前的中國戰略菁英不是秉持華夏一家的密碼，卻也不是明、清兩代那種封閉的嚴夷夏之防密碼，不可能忽視這些邊緣地帶對中國的地緣戰略重要性。然而臺灣與中國周邊海域特別是南海，與以往帝國時代的北方邊緣地域一樣，是與其他地緣戰略領域交接之處，雙方在這個地區都有重要的地緣戰略利益，因此任何中國在臺灣與南海的擴張行動都必然引發另一方的強烈反應。

另一個更受關切的問題是中國是否會越過其周邊地區實施擴張。傳統上，華夷一家密碼固不待言，即使嚴夷夏之防密碼主導的時代亦有擴張之行為，雖然後者的本質並不傾向擴張，大多數越過疆界向外活動的情況是外部潛在威脅對帝國的傳統國家安全構成威脅，少數情況則是傷害了帝國在體系中的威望。但即使是這兩種因素主導下的向外行動，也經常會受到危及內政、帝國政權穩定等抨擊。今日中國的體系層級地緣政治密碼由於受到中國本身力量之限制、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概念、全球地緣政治結構中前所未有的高國際互動密度，與對外貿易的經濟利益對國家的重要性遠超過任何古代帝國等各項因素之影響，可說是介於古代的嚴夷夏之防與華夷一家之間。換句話說，雖然中國不至於立即挑戰體系的領導權，但仍然極有可能因為國家安全—特別是領土完整—與海外重要經濟利益受嚴重威脅的情況而實施有限度的對外擴張與劃定本身的勢力範圍，然而由於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與內政導向戰略文化的影響，其對外擴張舉動必然需要有其他國家的邀請才會進行。雖然這看似為「非侵略」的「柔性」之舉，然而一旦「邀請」的國家增加，且提出「邀請」的國家是體系或亞太次體系中不可忽視的國家，且具有本身特殊的戰略考量，中國的對外擴張行動即使有限，也必然會引發其他國家的疑慮，進而對亞太次體系能否達成均衡產生重要的影響。

因此，本論文在下一章將分析在當前全球與亞太區域地緣政治結構，以及中國本身的地緣政治模式影響下，中國的地緣戰略之形式與其方向，以及當代中國變遷中的內政導向戰略文化對其地緣戰略性質之影響，最後並探討中國地緣戰略與亞太地緣政治均衡之間的互動。

第六章、當代中國的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

本章將利用前一章對中國各層次地緣政治密碼與戰略文化分析，指出當代中國的地緣戰略實為一種以政治與武力為核心、但以經濟為主要表現手段，並利用多邊主義外交為消除「中國威脅論」的間接戰略手段，形成目標為周邊海域領土化以及控制自東北亞至麻六甲的海上戰略交通線，並將印度洋、西太平洋島鏈地區與中亞地區作為戰略防禦地帶，重心位於東南亞的「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並分析此種地緣戰略無助於目前不存在地緣政治均衡的亞太次體系形成均衡，不僅在於中國完成標準地緣政治程序與日漸趨向攻勢的大戰略行動是強大的離心力來源，無論是次體系或全球體系，皆不存在對超強、強權與區域大國的國家安全構成嚴重威脅，能使這些大國在彼此的地緣政治利益互相妥協、達成各方均可接受的安排的威脅來源；加上中國的海洋發展亦不斷侵蝕美國海權單極的基礎，使得大陸與海洋國家發生戰略合作與互信的前提並不存在。這些因素皆使得中國的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不僅無法促成均衡之形成，最多只能形成「冷和平」，而且極有可能會惡化體系的現況安排，發生嚴重的國際衝突。

本章共分為五節，第一節首先分析何謂「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將以法蘭西第二帝國、德意志帝國、納粹德國與蘇聯為個案，分析「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的定義、目的、性質與特徵。第二節則為對當代中國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之研究，本節將利用中國在冷戰後，特別是 2000 年代的戰略作為，證明中國的地緣戰略屬於大陸本質的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儘管其重心已經由過去帝國時代的歐亞大陸取向與純陸戰性質，轉為目前的海洋取向，但其地緣戰略的本質卻還是以陸權思考，只是因為當前的全球地緣政治體系發展深受海洋的影響，故引入西方海權思考作為戰略上的補充，為了證明這一點，本節將使用海軍戰略研究途徑，從中國海軍對制海權與海上戰爭的觀點與部署等角度切入，證明中國海軍戰略與歷史上的德國海軍與冷戰時的前蘇聯海軍一樣，係從陸權與陸戰之角度，和國家的威望需求來思考海軍戰略之制訂，並未真的以制海權的爭奪為基礎，而中國海軍戰略甚至不如德國與前蘇聯海軍戰略，沒有本身的海軍戰略理論，使其很難真正有所發展，而且始終採取以陸制海的手段而非以海制海之手段，顯示其大多數戰略菁英之內心仍為大陸心態，海權在其地緣戰略中是威望性大於實際需要。

接下來在第三節則利用第五章對當代中國地緣政治密碼與戰略文化的研究結果，探討中國的大陸地緣政治屬性、內政導向戰略文化以及周邊地緣政治密碼等，對其「安西、靠北、爭東南」的地緣戰略操作的影響。至於第四節則研究此種地緣戰略對亞太地緣政治次體系均衡的影響，為了證明中國地緣戰略無法促進

亞太次體系地緣政治均衡之達成，蓋中國的地緣政治密碼不允許其在既有周邊海洋領土爭端中妥協，這將使其追求獲致第一島鏈內制海權，與組織受其支配的東亞地緣戰略領域為目標的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威脅美國與中國周邊主要國家的地緣政治利益，刺激其他國家的競爭性權力平衡思維，採取對中國控制作為的反制措施，無法達成作為均衡基礎的安排。不過中國目前的威脅尚不如蘇聯與納粹德國那樣明顯，而且次體系的秩序原則並不允許以擴張戰爭達成戰略目標，再加上中國日益強大的國力與不斷融入世界體系的經濟發展，使得對中國採取冷戰那樣的圍堵方式或與中國開戰，都不可能成為次體系中各國的合理戰略選擇，故反控制作為還不會造成次體系的高度緊張，只是使得次體系維持一種「冷和平」的表面穩定，但內部緊張的狀態，雖然次體系大體上維持和平，但各種地緣政治利益衝突卻始終不斷。最後一節則是小結，總結本章的研究結果。

第一節、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

所謂的「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是全球地緣政治體系的結構在 19 世紀步入出現海權的結構形式之後，

¹法蘭西第二帝國(Second French Empire)在 1850-1860 年代、德意志帝國(*Deutsches Kaiserreich*)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納粹德國(*Deutsches Reich*)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以及蘇聯在 1960 年代以後曾實施過的地緣戰略類型。結構是否存在海權單極這一點相當重要，許多中國學者雖然對所謂「陸海複合國家」的地緣戰略進行分析，但是他們幾乎清一色只從分析單元本身的地理環境進行分析，忽略了地緣戰略的制訂與國家所處的環境有密切的關係，而是否存在海權單極這一變數造成 19 世紀前後大陸國家海軍戰略與思想的轉變，尤以 19 世紀中葉以後為明顯。

採行此種地緣戰略的國家，其海軍戰略形式與陸柏彬所謂的「海軍民族主義」(Naval Nationalism)或「次佳海洋戰略」(Suboptimal Maritime Strategy)不盡然相同，雖然上述陸柏彬將德意志帝國與蘇聯歸為海軍民族主義的個案—另外還包括

¹ 基於這個理由，拿破崙統治下的法國雖然亦有部分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特徵，例如越過地中海進攻埃及以試圖威脅英國在地中海的地位，但不能被列入本文的個案之中。蓋在七年戰爭(Seven Years War, 1756-1763)中，英國雖然在 1761 年幾乎獲致完全的制海權，但法國海軍在戰後的復甦亦重新建立了一支可與英國匹敵，某些方面甚至超越皇家海軍(Royal Navy)的艦隊，而英國在美國獨立戰爭(American Independent War, 1776-1783)中除了需與和美國同盟的法國海軍對抗之外，亦在歐洲遭遇到以俄羅斯、瑞典、普魯士等國為首的北歐「武裝中立同盟」的壓迫，要求英國尊重中立國的海上利益，迫使其有史以來第一次不得不在海洋領域中對其他國家妥協。而法國在拿破崙戰爭中直到特拉法加海戰(Battle of Trafalgar)之前，不僅尚能與英國在海上進行決戰，且特拉法加海戰中，法國與西班牙的聯合艦隊實力且在英國之上。但拿破崙戰爭結束後，英國的海軍優勢不僅無可匹敵，再加上控制絕大多數的扼制點，完全確立海權之地位，可以完全依照英國的意志解釋其海上利益之範圍而否決其他國家的相異見解。Rolf Hobson, *Imperialism at Sea: Naval Strategic Thought, the Ideology of Sea Power, and the Tirpitz Plan, 1875-1914* (Boston and Leide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Inc., 2002), pp. 67-68; C. J. Bartlett, *Great Britain and Sea Power, 1815-1853* (Aldershot, Hampshire, England: Gregg Revivals, 1993), p. 59.

俄羅斯帝國與日本帝國²而且其海軍擴張似乎都符合海軍民族主義所具有的強烈威望性與民族主義等特徵，但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有嚴格的地緣政治結構成因與特殊的海洋與海軍戰略內涵，而海軍民族主義卻可以存在於任何時代、任何意欲朝海洋發展的國家之中，例如義大利、奧匈帝國與美國都曾在 19 世紀後期發展出明顯的「海軍主義」(Navalism)與大規模海軍擴張，但陸柏彬完全沒有提到這些國家的海軍發展以及是否採取「次佳海洋戰略」。他的研究實際上是指出了民族主義對 18 與 19 兩個世紀的陸地強國對發展大海軍的渴望，但是這些強國的地緣戰略與軍事戰略內涵是否一致，他卻沒有深入分析。

下文將分析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的目的、重心、性質與特徵，以指出何以只有法蘭西第二帝國、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德意志帝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納粹德國，與 1960 年代以後的蘇聯才是符合陸權式地緣戰略的個案，而其他實施過海軍擴張的國家並不符合的原因。

一、目的、重心與性質

邵永靈與時殷弘認為，「陸海複合國家的真正強國之路在於，避免陷入兩難困境，積極創造條件，把戰略方向定於海上，並不排除在條件允許的時候在陸上有所作為」。³程廣中與楊勇則認為由於陸海複合國家無法同時兼顧陸地與海洋，因此其戰略重點經常擺動於陸地和海洋之間，應該視每個時期威脅來源的變化，而改變戰略重心側重於陸地或海洋，但是無論重心在陸地或海洋，都必須注意不可同時陷入兩面受敵，故防止海陸強國結盟反對自己是重要的地緣戰略任務。⁴但是如果觀察歷史上採用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國家的個案，即可發現這種地緣戰略的真正目的、重心與性質都還是大陸性的，雖然這些濱海國家的確會隨形勢之改變而變換其地緣戰略之重心，不過當他們不再投入大量資源於海軍與海洋事業，反而投注於傳統的骨幹軍種—陸軍，以及大陸事業時，也就顯示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不再是主流地緣戰略形式。

以海權為最主要體系層級地緣政治密碼競爭對手的大陸強權，如法蘭西第二帝國、德意志帝國與納粹德國，或為了在海權單極結構中完成本身的標準地緣政治程序以成為陸權，或為了防止海權攻擊本身的海上利益與威脅本身的發展等目的，或者如冷戰時的蘇聯陸權，為了在海陸對峙兩極結構中抵抗海權的戰略壓力與侵蝕海權的地緣戰略基礎，而與海權在地緣政治體系中產生對抗，並互相視彼此為最主要甚至唯一的海上競爭對手，希望藉由發展強大的海軍作為抗衡海權施加的戰略壓力的工具而發展的地緣戰略形式。由於海洋國家與大陸國家的戰略重心與戰略思考方式相異，對海洋的運用觀點亦有極大的不同，使陸權式海洋地緣

² Robert S. Ross, "China's Naval Nationalism: Sources, Prospects, and the U.S. Respons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4, No. 2(Autumn 2009), pp. 50-52.

³ 邵永靈、時殷弘，「近代歐洲陸海複合國家的命運與當代中國的選擇」，*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市)，第 10 期(2000 年)，頁 49。

⁴ 程廣中，「地緣戰略規律試論」，*軍事歷史研究*(上海市)，第 1 期(2001 年)，頁 168-169；楊勇，「發揮陸海兼備優勢是大型海陸複合國家的必然選擇」，*黑龍江社會科學*(黑龍江)，總第 84 期(2004 年 6 月)，頁 27。

戰略與海權的地緣戰略在方向與性質上具有根本的差異。

雖然馬漢曾表示海戰與陸戰原則並無太大的差異，⁵柯白(Sir Julian Corbett)也不認為在高層戰略中有海陸兩種不同的戰略，⁶而且指出海權的真正戰略目的在影響陸地事件的結果，⁷但對海權來說，由於其經濟倚賴貿易、安全倚賴海軍對制海權的掌握，故其地緣戰略的重心在海洋，運用海洋權力的首要目的乃影響陸地上的事件發展方向，使其結果不會對海權的海洋利用在經濟與安全上同時造成威脅。故其海軍戰略的核心都是獲致制海權，對海上交通線的控制建立後即可同時達成防衛本土的基本目標與向本土之外地區成功投射武力的必要條件，蓋其競爭對手或敵國既無法獲致制海權，也就無法對海權的本土構成真正或有效的威脅；而海上交通線既由海權所控制，便可按照其意志向外投射武力而不須擔心在海上遭到阻礙而導致投射行動失敗。無論如何，由於海權與其所有競爭對手或潛在敵人之間皆隔著海洋，故其地緣戰略基本方向至為專一，皆是由海上向大陸。是故，海權的主力軍種必為海軍，海軍戰略的目的與地緣戰略的目的是相同的一建立對全球海上戰略交通線的控制。而這必然使得海權由海軍主導整體軍事戰略之遂行，陸軍只居於次要的輔助地位。

採用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的陸權與大陸國家亦有龐大的海上利益，例如法國向來擁有許多海外殖民地與可觀的商船隊，而且在 1850 年代中期以後更步入全球殖民地擴張；⁸德意志帝國在 1890 年代後期的海外擴張亦使其擁有不少海外殖民地，儘管這些殖民地不若英國與法國的殖民地那樣能對母國的經濟發展提供重要的資源與收益，但仍是德意志帝國的重要海上利益，特別是在「世界政策」的威望性上，⁹此外德意志帝國的經濟發展在 1880 年代之後隨著工業化的發展而越來越仰賴國際貿易；納粹德國雖然在初期沒有海外殖民地，但是亟欲恢復因為凡爾塞和約的限制而極為弱小的海軍以保護其本身的安全，與殖民地以外的海上商業、漁業利益，¹⁰爾後則因為要求恢復德國的海外殖民地而更有保護可能的殖民地之需要；蘇聯雖然與納粹德國一樣沒有海外殖民地，但亦有可觀的海洋資源利用、海洋法、貿易、漁業、造船與科學研究等海上利益。¹¹這些利益既是大陸國

⁵ 楊鎮甲譯，Alfred T. Mahan 著，*海軍戰略論*(臺北：軍事譯粹社，1979 年)，頁 12。

⁶ Julian Corbett, *Some Principles of Naval Strategy*(Annapolis, Marylan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88), pp. 10-11.

⁷ *Ibid.*, p. 67.

⁸ C. I. Hamilton, *Anglo-French Naval Rivalry, 1840-187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39.

⁹ Holger H. Herwig, *"Luxury" Fleet: The Imperial German Navy 1888-1918* (Amherst, New York: Humanity Books, 1987), pp. 98-108.

¹⁰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德意志帝國海軍的規模為世界第二，但凡爾塞和約禁止德國擁有任何潛艦、飛機與一萬噸以上的戰艦，亦只能擁有 6 艘一萬噸級的戰艦(armoured ship)、6 艘六千噸級的輕巡洋艦(light cruiser)、12 艘八百噸級的驅逐艦，以及 12 艘魚雷艇。Joseph A. Maiolo, *The Royal Navy and Nazi Germany, 1933-1939: A Study in Appeasement and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1998), p. 20; 鈕先鍾，*第一次世界大戰史*(台北：燕京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7 年)，頁 659。

¹¹ Michael MccGwire and John McDonnell eds., *Soviet Naval Influence: Domestic and Foreign Dimensions*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77), pp. 139-141, 291-320; Sergei G. Gorshkov, *The Sea Power of the State*(Oxford, England;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1979), pp. 39-42, 44-46.

家的海洋權力一部份，也是防衛本國領土之外發展強大海軍的主要動機之一。¹²

儘管海洋對這些大陸國家甚為重要，但從大戰略的角度分析，大陸國家在陸地與海洋同時存在重要利益與潛在威脅，這使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的方向與重心不可能完全指向海洋。雖然從大陸國家的地理位置來看，越是位於邊緣地帶的大陸國家，由於越來越遠離歐亞大陸心臟地帶的資源中心與越接近海洋，海洋在其地緣戰略位置的份量明顯超過越靠近心臟地帶的大陸國家。但無論位置是否靠近歐亞大陸心臟地帶，由於大陸國家位於大陸之上，真正的安全威脅來自周邊的陸地鄰國，制海權的獲致與否不是生死攸關的重點，故其地緣戰略目的並非成為新的海權超強，而是「嚇阻」海權對大陸國家在體系中行動的干預以獲得更大的陸上行動自由，這使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出現一種奇妙的現象：海權是其最大的競爭對手，位居體系層級地緣政治密碼中，而大陸上的鄰國通常居於區域層級地緣政治密碼，很少躍升為體系層級，結果導致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最重要的對象國雖是海權，但真正的方向卻是大陸而非海洋，海軍不可能是大陸國家在國防上的主要軍種與政策工具，最多只能同時產生像德意志帝國那樣的海洋性「世界政策」(Weltpolitik)與大陸性的「大陸政策」兩個不同的方向；而一般說來，大陸國家只有在陸地局勢並不構成嚴重的安全威脅時才會投注較多資源於海軍之發展，但當其發現在大陸的地位明顯不利之後又會迅速轉回以陸地，¹³不過一旦大陸國家不再投入大量資源於海軍建設，而將注意力重新集中於陸軍時也顯示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逐漸走向終結。

簡單來說，大陸國家的海軍在地緣戰略中，作為外交政策一部份的工具性遠大於戰略本身的目的性，而海權卻是目的性指導工具性，亦即海軍外交雖然也是海權的重要外交政策工具，擁有許多功能，¹⁴但從地緣戰略的角度來看，其原始

¹² 只有納粹德國因為缺乏殖民地，又遭逢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蕭條，以及希特勒實施與鄰國的以物易物貿易制度，而使其最缺乏海上利益。雖然有研究指出希特勒的最後目標是實施與德意志帝國一樣的世界政策，而且希特勒在 1937 年 10 月之後曾要求恢復德國在戰前的殖民地，但以納粹德國當時的力量來說，無論是世界政策或恢復殖民地，都不是其主要政策方向，也不是以此為動力擴張海軍，如下文所述，其海軍在 1937 年以後的擴張，最主要的目的還是排除英國一可能還加上美國一的威脅。Andreas Hillgruber, "England's Place in Hitler's Plans for World Domin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9, No. 1(January, 1974), pp. 5-22.

¹³ 例如法國在 1850 年代曾經因為在歐陸沒有主要的威脅—俄羅斯在克里米亞戰爭(Crimean War, 1854-1856)被擊敗後暫時忙於國內的改革，而奧地利與普魯士仍在德意志邦聯(*Deutscher Bund*)中敵對而無暇顧及法國，因此使得法國可以在陸上沒有明顯威脅的情況下與英國展開海軍軍備競賽，將資源大量投注於海軍，可是當法國在義大利與萊茵區(Rhine)的政治與領土擴張行動威脅到普奧兩國時，這種有利於英法海軍競賽的外部條件遂告消失，大陸局勢的發展是 1860 年代英法海軍競賽緩和的關鍵乃至基本原因。此外，德意志帝國海軍在 1899 年之後曾經一度壓倒陸軍取得國防發展優先權，但在 1911 年阿加迪爾危機(Agadir Crisis)中，德意志帝國發現其在歐洲幾乎完全遭到包圍，遂不得不將發展重點又轉回陸軍。嚴格來說，蘇聯是唯一的例外，蓋其處於海陸兩極對峙結構之下，必須盡力在各方面維持與美國接近的軍事力量才能產生有效的嚇阻，因此儘管蘇聯在 1983 年之後對國際局勢的重新評估，但卻在 1987 年之後明顯地改變為戰略防禦態勢。Hamilton, *Anglo-French Naval Rivalry, 1840-1870*, op. cit., pp. 297-299; Nicolai I. Lambi, *The Navy and German Power Politics, 1862-1914*(Winchester, Mass.: Allen & Unwin, Inc., 1984), pp. 160-164, 380-382; Milan N. Vego, *Soviet Naval Tactics* (Annapolis, Marylan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2), p. 6.

¹⁴ Geoffrey Till, *Maritime Strategy and the Nuclear Age*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1982), pp.

目的卻是為了藉由各種可運用的手段來穩固海權的前進據點經營以確保對海上戰略交通線之控制。這使得大陸國家的海軍戰略與海權有明顯的不同——不是以戰略攻勢擊敗海權獲致海上戰略交通線的控制為核心，而是希望盡可能構成對海權的嚴重海上威脅，或改變體系中其他國家的結盟意向，以嚇阻海權對大陸國家本土與海上利益的攻擊，其次才是與海權國家一樣，由海上發起對陸地事件的影響，或保衛本身的海上利益。即使有「制海」(sea control)的需要，目標也只限於大陸國家周邊的狹窄海域或有限的開闊海域沿海地帶而非整個大洋。例如拿破崙三世(Napoleon III)擴建海軍的目的在於嚇阻英國，使法國可以在體系中獲得較大的行動自由，而法國海軍將領則希望藉此嚇阻獲得「海上自由」(freedom of sea)以保衛法國的海上利益；¹⁵德意志第二帝國同樣想以類似的「風險理論」(Risk Theory)嚇阻英國對德國的可能攻擊，藉此確保德國的海上發展不會受到英國的干擾；¹⁶至於納粹德國無論是在 1935 與英國簽訂英德海軍協定，或在 1939 年片面撕毀該協定、進一步擴張艦隊的目的，亦非欲取代英國的海上地位而是希特勒希望藉此從英國手中獲得或者其後改為嚇阻英國對德國向東歐實行大陸擴張政策干預的行動自由；¹⁷蘇聯的地緣戰略重心始終位於歐亞大陸，其海軍在地緣戰略中的角色亦僅為協助增加蘇聯的嚇阻能力，保衛蘇聯領土、周邊海域與海上國家利益，以及展現蘇聯的「國際責任」(International Duty)以增加蘇聯的威望與影響力等類似的大陸國家觀點，而非以海軍控制全球海上戰略交通線、成為海權的純粹海洋式地緣戰略觀點。¹⁸

故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真正的重心與方向仍在大陸而非海洋，而且儘管其在海洋的首要競爭對手是海權，但基於重心的不同，可能未必希望與海權爭奪海洋霸權的地位。海洋既在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中只居於次要地位而非核心地位，使得此種地緣戰略的本質仍然是大陸性的「以陸制海」，而非海洋性的「以海制海」或「以海制陸」。根據以上的分析，在 1815 年之前，儘管法國曾與英國有過激烈的海上與陸地競爭，俄羅斯亦曾在 18 世紀初大規模擴張海軍，但皆非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蓋彼時的歐洲區域乃至全球地緣政治結構都不存在任何海權；而義大利與奧匈帝國雖然在 19 世紀末也擁有一些海上利益並曾出現海軍民族主義，但其地緣戰略不屬於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蓋其地緣戰略方向雖在歐洲大陸，目

255-280; Edward Luttwak, *The Political Uses of Sea Power*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 3-7; Ken Booth, *Navies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Holmes & Meier Publishers, 1979), pp. 18-20.

¹⁵ Hobson, *Imperialism at Sea*, *op. cit.*, pp. 61-62.

¹⁶ 事實上，德意志帝國早在俾斯麥執政的時代，他本人在 1872 年就一直認為德意志帝國必須擁有一支可觀的、甚至是超越其他第二位海軍國家的海軍艦隊，以增加德意志帝國在海上權力平衡的份量。*Ibid.*, pp. 115-116, 256-260; Lawrence Sondhaus, *Preparing for Weltpolitik: German Sea Power before the Tirpitz Era* (Annapolis, Marylan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7), p. 109.

¹⁷ Joseph A. Maiolo, "The Admiralty and the Anglo-German Naval Agreement of 18 June 1935," in Andrew Lambert eds., *Naval History 1850-present* (Hampshire and Burlington: Ashgate, 2007), Volume II, pp. 101-102; Keith W. Bird, *Erich Raeder: Admiral of the Third Reich*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6), p. 114, 132.

¹⁸ Robert W. Herrick, *Soviet Naval Doctrine and Policy, 1956-1986* (New York: The Edwin Mellen Press, 2003), pp. 224-227, 547-557, 1069-1073; MccGwire and McDonnell eds., *Soviet Naval Influence*, *op. cit.*, pp. 623-629.

的卻不是為了與海權相抗以完成本身的標準地緣政治程序，甚至海軍軍備競賽的對手是彼此而非針對英國海權。¹⁹而美國在 19 世紀末以後從陸權本質開始的海軍民族主義與海軍擴張，乃是遵從馬漢等海軍戰略學者之理論指導，以成為海權為目標而非阻止英國對美國的大陸事務之干預，且逐漸走向與英國聯盟而非對抗，反而是西班牙與日本帝國先後成為美國的主要競爭對手，故並非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²⁰至於日本帝國海軍之個案較為特殊，留待下文進一步分析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之特徵後再行驗證。

二、特徵

「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是一種歷史歸納的地緣戰略形式，雖然大陸國家使用來協助其完成標準地緣政治程序，以及阻止結構中的海權超強對陸上事件施加壓力，本質上仍是大陸屬性，且可歸納出下述三種特徵。不過既然「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是歷史歸納的結果，並不代表上述三國的大陸式海洋地緣戰略都具備完全相同的特徵，每個國家都會受到其本身的地緣政治模式與特徵、海陸軍物質條件與主要假想敵之差異、海陸兩軍的基本戰略思想以及對國防政策的主導性、戰略文化的地緣屬性，甚至時代等因素之影響，而導致三種特徵在其地緣戰略中的顯現程度出現明顯的差異。

(一)、以對抗海權為目標的大規模海軍擴張，強調海軍在戰略防禦的作戰攻勢中的重要性

這是外表最明顯的特徵。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的目的雖然不在挑戰海權的海上地位，但基於四種理由使這種地緣戰略必然帶有明顯的海軍擴張：

第一，由於與海權之間有龐大的海軍與海上力量物質差距，僅靠外交壓力難以奏效，除非大陸國家的目標極為有限，而且在這個目標上與海權沒有直接的衝突，同時海權身陷其他更重要的安全威脅而無法抽身；²¹

第二，如上所述，大陸國家也擁有可觀的海上利益，而可能對其利益構成威脅的並不限於海權，還包括其他國家的潛在威脅，故需要強大的海軍來對這些海上利益實施保護；

¹⁹ Lawrence Sondhaus, *The Naval Policy of Austria-Hungary, 1867-1918: Navalism,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the politics of Dualism* (West Lafayette, Ind.: Purdue University Press, 1994); Milan N. Vego, *Austro-Hungarian Naval Policy, 1904-1914* (London; New York: Frank Cass, 1996).

²⁰ Paul M. Kennedy, "The Relevance of the Pre-war British and American maritime Strategies to the First World War and its Aftermath, 1898-1920," in John B. Hattendorf and Robert S. Jordan eds. foreword by Robert O'Neill, *Maritime Strategy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Britain and Americ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89), pp. 165-188; Jan S. Breemer, "Taking Our Share in the Turmoil of the World: America Builds a New Navy, 1890-1900," in Kenneth J. Hagan eds., *In Peace and War: Interpretations of American Naval Policy, 30th Anniversary* (West Port, Conn.: Praege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2008), pp. 134-153; Richard W. Turk, "Defending the New Empire, 1901-1914," in Kenneth J. Hagan eds., *In Peace and War: Interpretations of American Naval Policy, 30th Anniversary* (West Port, Conn.: Praege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2008), pp. 154-168.

²¹ 這是羅普(Theodore Ropp)分析俾斯麥對英國的潛在海上威脅僅施以外交手段應付而非增強海軍力量的政策的分析結果。見 Theodore Ropp, "Continental Doctrines of Sea Power," in Edward Mead Earle eds.,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Military Thought from Machiavelli to Hitl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451.

第三，大陸國家本身的海上戰略交通線控制能力與海權超強相較處於明顯的劣勢，必須擁有強大的海軍才能在與海權的對峙中，作為抗衡海權來自海上的壓力以及迫使海權在政治上妥協的工具；

第四，與前兩種軍事需要不同，是出於對所謂「海軍民族主義」的心理需求，在法國的情況是基於與英國的傳統敵對情緒、英法在 1840 年代後期的外交與海軍爭論、文化差異，和政府與海軍的刻意挑起，所發展的民族主義反射，²²而德意志帝國則由於缺乏海洋國家的大規模全民族性海上事業歷史經驗，²³使其在 19 世紀後期的人文地理學(Anthropo-geographical school)與馬漢的海權理論興起時，在政策與學術上同時建構出海洋權力等於財富亦等於國家在體系中主導地位的觀念，²⁴並與國內部分工商利益團體結合成所謂的「海軍聯盟」(Flottenverein, Navy League)，²⁵再加上與英國之間的外交與海軍爭執的結果。

大陸國家在陸權式地緣戰略中追求海軍擴張時，幾乎都是追求建造一支如果不能超越，至少能與海權匹敵的艦隊，或者雖居於劣勢，但與海權之間擁有不易為海權擊敗的一定兵力對比的艦隊。²⁶對海軍的重視遂成為相當明顯的特徵，而且會強調海軍擴張的目的在保衛其本身的國家安全與海上利益，並非為了取代海權的地位，但海軍擴張是否真的符合這些大陸國家的大戰略與地緣戰略目標，其國家安全與海上利益是否真的需要一支如此強大的海軍才能保衛，甚至這支海軍是否真能達到原始建造目的、大陸國家整體國防戰略與海軍戰略目標等單純的軍事戰略需要，卻是次要考量。

(二)、深受陸戰觀念之影響，試圖利用海上戰略防禦遏阻海權的干涉，達成陸地戰略目標

這是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常被忽略的內在明顯特徵。米爾斯海默雖然指出海洋本身就是阻止國家向外投射權力的最大障礙，因此具有相當的防禦價值，²⁷但海權與大陸國家之間對海洋的防禦價值採取截然不同的運用方式。傳統上，海權運用獲致制海權的手段來同時達成防衛本土、確保海上貿易持續進行與干預大陸事務等基本戰略任務。欲獲致制海權必須採取戰略攻勢，採用戰略守勢無法獲致制海權，而其兩大主要手段—艦隊之間的決定性海戰以及封鎖，都需要龐大的數

²² Robert S. Ross, "The Geography of Peace: East Asi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4(Spring 1999), p. 51; C. I. Hamilton, *Anglo-French Naval Rivalry, 1840-1870*, pp. 282-286.

²³ 鈕先鍾譯，Herbert Rosinski 著，「德國海軍思想中的戰略與宣傳」，Mitchell Simpson III 編，*海軍思想的發展*(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7 年)，頁 93。

²⁴ Hobson, *Imperialism at Sea*, op. cit., pp. 290-293.

²⁵ 支持海軍擴建的並不僅海軍聯盟，還包括其他政治利益團體，英國在同時亦曾因為海軍擴張而形成類似的海軍聯盟。*Ibid.*, p. 241 and 246; Paul M. Kennedy, *The Rise of the Anglo-German Antagonism 1860-1914* (London: Allen & Unwin, 1980), pp. 369-375.

²⁶ C. J. Bartlett, *Great Britain and Sea Power, 1815-1853* (Aldershot, Hampshire, England: Gregg Revivals, 1993), pp. 180-181; Sergei Chernyavskii, "The Era of Gorshkov: Triumph and Contradictions," *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28, No. 2(April 2005), p. 306; Hobson, *Imperialism at Sea*, op. cit., pp. 254-255; Lambi, *The Navy and German Power Politics*, op. cit., chapter 14.

²⁷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2001), p. 86 and pp. 114-118.

量優勢才能有效達成，²⁸尤其是封鎖。不過傳統海軍戰略理論亦對劣勢海軍如何面對優勢海軍的作戰提出其理論，此即柯白歸納英國海軍戰史所提出的，運用海軍艦隊的機動能力，盡量騷擾敵人卻又不與敵接戰，藉此保存己方兵力嚴重威脅優勢敵人的行動自由，阻止敵人獲致制海權，使敵人因為無法獲致制海權而不敢採取進一步大規模攻勢或干預行動的「存在艦隊」(fleet in being)守勢海軍戰略。²⁹在柯白與英國海軍戰略中，存在艦隊只屬於作戰性的攻勢防禦，是海權在次要戰場上的暫時作為，但是主要戰場與整體戰略都還是攻勢，俟海權在主要戰場上獲勝後，存在艦隊即因重心轉移至次要戰場且具備物質優勢而恢復為獲致制海權的攻勢戰略與作戰，柯白早已指出若為單純的存在艦隊戰略，其守勢態度將因避免決戰而不能獲致積極成果－制海權之獲得。³⁰

大陸國家海軍的物質條件先天弱於海權超強，想改善這種條件可依賴內平衡－海軍擴張，與外平衡－尋求其他次級海軍強國的協助，俾使聯盟的海軍力量能與海權抗衡等兩種方式。法國與德意志帝國都曾同時採取外平衡與內平衡，³¹但兩種方式都難以改變海上的力量對比。就外平衡而言，海權的優勢極為龐大，僅有一兩個盟友可能還不足以改變既有的平衡，不過真正的困難在於海權同樣可以拉攏其他次級海軍強國為盟友，而且次級海軍強國未必願意與採行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的國家結合，尤其是海權並未對這些次級海軍強國構成實質政治與經濟威脅，反而次級海軍強國與其追求海軍擴張的大陸鄰國之間存在不易化解的地緣政治衝突時更難以達成。至於內平衡更難以達成目標，蓋此種地緣戰略的方向與本質都是大陸性的，而海軍並非大陸國家的主要軍種，因此大陸國家不可能像海權那樣投入全部的資源於海軍建設，故很難創造出真正能與海權在大洋上競爭海上戰略交通線控制權的遠洋艦隊。

這使得大陸國家的海軍始終必須在明顯的物質劣勢下與海權對抗，而且只能採取戰略守勢，因此其在海洋方向始終是戰略防禦，不過並非上述柯白根據英國歷史而提出的典型存在艦隊戰略，而是一種不排斥與海權的艦隊在大陸國家近海作戰以掌握近海制海權，但不願與海權的艦隊主力在近海以外的開闊海域交戰，意圖使公海的制海權保持在爭奪狀態的戰略防禦態度。這種觀點受到兩種思考的影響，第一種是學者波森(Barry R. Posen)所指出的，越接近敵方領土的區域，敵方的抵抗就會因政治、地理與科技等因素的綜合而越強，並形成一種劣勢軍隊能對優勢軍隊在使用傳統武器的戰鬥中造成實質損害的「爭奪區」(contested

²⁸ 要以艦隊決戰獲致制海權固然需要優勢，但柯白曾指出這種思考有一明顯的陷阱，即是說由於海軍重視數量優勢遠超過陸軍，因此當某一方集中明顯的優勢兵力時並欲遂行決戰時，另一方可能因為劣勢而不敢與不願接受挑戰，結果導致優勢一方如果不能運用兵力優勢實施封鎖，結果將因沒有對敵方艦隊建立控制而無法獲致制海權。柯白認為所謂海戰需要優勢的真正意義，是指艦隊的部署必須有極大的彈性，在戰前使用分散艦隊力量的方式誘敵，但是當敵人受到引誘時又能迅速集中在一起進行決戰。Corbett, *Some Principles of Naval Strategy*, op. cit., p. 138.

²⁹ *Ibid.*, pp. 209-227.

³⁰ *Ibid.*, p. 209.

³¹ Hobson, *Imperialism at Sea*, op. cit., pp. 59-62, 267-270.

zone)；³²第二種則是因制海權概念深受陸戰觀點影響而產生的差異，尤以德意志帝國海軍為明顯，其將制海權視其為一種軍事狀態，與陸軍在陸地上獲致的軍事優勢類似，而且受到克勞塞維茨觀念的影響，認為決定性海戰是獲致制海權的唯一方式，故假定一旦與英國爆發衝突，後者必定會憑其龐大的優勢前來德國近海挑戰並試圖以決定性海戰殲滅德意志帝國海軍艦隊，而居於劣勢的德意志帝國海軍本身不能前往英國主動挑戰，這種作法會使其本身遭到英國的毀滅，因此德意志帝國海軍最有希望獲致勝利的作法是在近海部署許多能削減英國艦隊優勢的陣地與作戰措施，以期能與英國艦隊在一場較為「公平」的兵力對比態勢下作戰，並在這樣的一場「防禦性」決定會戰中擊敗英國海軍，獲致制海權。³³

蘇聯海軍也將獲致制海權視為首要任務，但是其將制海權視為一種敵對國家無法阻止蘇聯海軍遂行所擔負的作戰任務的「有利情況」，而非海上交通線之控制，而為了創造此種「有利情況」必須在海上、空中與沿海地區運用不同的部隊和資源從事堅強而長期的戰鬥。³⁴故蘇聯現代科技的幫助下採取更為積極的海上攻勢防禦，除了希望在擊毀敵軍海上兵力以防其對蘇聯在大陸上、以核武摧毀敵方攻擊能力等攻勢防禦作戰，始終是蘇聯海軍的最優先任務。³⁵即使是最不重視制海權功用的法國，也意圖在體系內以通商破壞戰(*commerce raiding or guerre de course*)與各種積極防禦作戰來與英國周旋。換言之，即試圖消耗海權的實力以產生積極的結果—迫使海權超強考慮干預的高代價，承認大陸國家行動的既成事實或打消繼續干預的政策；或者利用與大陸國家在海上爆發戰爭或產生極高的代價為嚇阻，海權即使將其艦隊消滅，亦會嚴重削弱其海上力量而不復為海上超強，藉此嚇阻海權給予大陸國家「海上自由」，以保護其重要的海上利益與國家安全。

為了達成阻止海權干預的戰略目的，降低雙方兵力差距是必要的作戰。傳統上，海權降低雙方海上力量差距的傳統作法是柯白所謂的「小型攻擊」(*minor-attack*)，或德意志帝國海軍所稱的「兵力平等化」(*Krafteausgleich or force-equalization*)，即利用海軍艦隊的奇襲，設法殲滅敵人某部分分散艦隊以改變雙方兵力對比的作法，³⁶但在力量差距甚大的情況下，以及偵察、防禦科技不斷進步的 20 世紀，此種作法已不甚可行，僅有的較成功運用是英國海軍地中海艦隊在 1940 年 11 月藉由對停泊在義大利南部大蘭多港(Taranto)的義大利艦隊之夜襲，以及本海軍在 1941 年 12 月對珍珠港(Pearl Harbor)的奇襲。但正如柯白與蘇聯海軍元帥(Admiral of the Fleet of the Soviet Union)高西科夫(Sergei G.

³² 波森的原文是專指弱勢國家對美國的威脅，但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早在冷戰之前即已存在，故本文將其受詞由「美軍」(U.S. forces)改為「優勢軍隊」。Barry R. Posen, "Command of Commons: The Military Foundation of U.S. Hegemon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8, No. 1(Summer 2003), p. 22.

³³ 鈕先鍾譯，Herbert Rosinski 著，「德國的海戰理論」，Mitchell Simpson III 編，*海軍思想的發展* (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7 年)，頁 74；鈕先鍾譯，Herbert Rosinski 著，「德國海軍思想中的戰略與宣傳」，前引文，頁 107。

³⁴ Herrick, *Soviet Naval Theory and Policy*, *op. cit.*, p. 237; Gorshkov, *The Sea Power of the State*, *op. cit.*, pp. 231-232.

³⁵ Herrick, *Soviet Naval Doctrine and Policy*, *op. cit.*, pp.559-564, 1073-1077.

³⁶ Corbett, *Some Principles of Naval Strategy*, *op. cit.*, p. 227.

Gorshkov)所指出，這種作戰層次的奇襲實際上只能一時降低兵力差距而不能真正改變整體力量對比，故其效果短暫且有限，甚至可能限於某些區域，不能對制海權問題造成嚴重影響。³⁷因此大陸國家轉而依靠利用潛艦與飛彈(特別是攜帶核彈頭的飛彈)的攻擊來達成此一目的，亦即蘇聯海軍所謂的「艦隊對陸上作戰」的一部份。³⁸不過真正展現出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中深受陸戰觀念影響特徵的，是這些大陸國家的海軍為求在明顯甚至極端劣勢之下降低雙方的兵力差距與達成本身的戰略任務，而表現出來的戰略思想與作戰部署，具有明顯的陸軍陣地戰概念，而非海軍傳統的存在艦隊。

以往採用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的大陸國家，其海軍作戰受陸戰觀念影響的起源各有不同，例如法國在 1850 年代是因為在數量劣勢，而當時海軍作戰正準備由木製帆船過渡至近代後燃機裝甲戰艦，再加上法國海軍在克里米亞戰爭中的經驗與教訓，以及法國傳統的海岸防禦經驗，不重視科技的法國海軍遂急就章引入了陸軍的戰術概念以發展新戰略與戰術，使得陸戰觀念逐漸滲透至法國海軍之中。³⁹德國海軍則先天上就受到普魯士的陸戰戰略文化之影響，⁴⁰加上其海軍戰爭學院(*Marine-Akademie*)成立之初，單靠克勞塞維茨的陸戰理論而非針對海戰史的精密分析來研究海軍戰略，並依照陸戰原則擬定德意志帝國海軍的作戰原則。⁴¹蘇聯海軍則受到陸軍掌握國防部，同時在意識型態上反對單獨的海軍戰略之影響，而出現受陸軍影響而重視奇襲、強調「平衡艦隊」(Balanced Fleet)重要性、各兵種聯合作戰對抗敵人，以及創造出有利的作戰環境(*favorable operational regime*)俾協助獲勝等戰略與作戰概念。⁴²

儘管起源不同，但目的皆是為了削弱海權的絕對優勢。法國在採取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的時代中，受陸軍影響的戰略行動與作戰部署還比較限於海岸防

³⁷ *Ibid.*; Gorshkov, *The Sea Power of the State*, *op. cit.*, p. 216.

³⁸ 「艦隊對陸上作戰」是高西科夫對蘇聯海軍作戰任務類型的一個分項說明，包括運用潛艦和戰艦上的飛彈攻擊敵方港口、機場與停泊在港中的艦隊。不過這種概念並不源自高西科夫本身，至少蘇聯海軍戰略學者貝里(V. A. Beli)在 1938 年、潘特利耶夫中將(Vice-Admiral Yuriy Panteleyev)在 1947 年就曾提出過類似的概念，爾後在 1950 年代繼續發展而為高西科夫所繼承。見 Herrick, *Soviet Naval Theory and Policy*, *op. cit.*, pp. 119-120; Herrick, *Soviet Naval Doctrine and Policy*, *op. cit.*, pp.21-22; Vego, *Soviet Naval Tactics*, *op. cit.*, pp. 275-276; Gorshkov, *The Sea Power of the State*, *op. cit.*, pp. 220-222.

³⁹ Hamilton, *Anglo-French Naval Rivalry*, *op. cit.*, pp. 111-112, 126.

⁴⁰ Wolfgang Wegener, *The Naval Strategy of the World War* (Annapolis, Marylan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89), p. xxxvii.”

⁴¹ Hobson, *Imperialism at Sea*, *op. cit.*, pp. 136-143.

⁴² 平衡艦隊乃是由陸軍的「平衡兵力」與對「最後兵器」的駁斥等概念的延伸，而聯合兵種作戰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就一直存在蘇聯陸軍內部的主要作戰概念，奇襲的情況也類似，不過在蘇聯陸軍主導的軍事概念中，奇襲是軍事成功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可靠的基礎，無論其多麼成功，對整個戰爭的最後勝利亦不具有決定性。這些概念對海軍的影響可由高西科夫對蘇聯海軍的兵學問題、海上優勢的解釋，以及蘇聯海軍艦隊兵力均衡等議題的分析看出，以及蘇聯海軍對海上優勢、有利的作戰環境、集中火力、戰術機動、奇襲等概念的解釋中看出陸軍概念的影響。Raymond L. Garthoff, *Soviet Military Doctrine* (Illinois: Free Press, 1953), pp. 121-129; Raymond L. Garthoff, *Soviet Strategy in the Nuclear Age*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74), pp. 72-86; Vego, *Soviet Naval Tactics*, *op. cit.*, pp. 14-16, 41-48; 275-276; Gorshkov, *The Sea Power of the State*, *op. cit.*, p. 226, pp. 231-234, 253-255, 271-277.

禦，⁴³真正的海軍陣地戰特徵乃是德意志帝國海軍與蘇聯海軍承接 1870 年代以後配合新科技與技術，企圖以此打破英國對制海權掌握的法國「少壯派」(*Jeune École*)海軍思想所發展出來的海上縱深陣地戰作戰，⁴⁴利用驅逐艦、潛艦、飛機，以及魚雷艇等能夠「消耗」的小型艦艇來騷擾與消耗海權的攻擊，並加大這些武器的航程，以期同時達成降低兵力差距對比與打破海權的遠距離戰略封鎖，⁴⁵特別是蘇聯海軍的「防禦區域」(*Zones of Defense*)概念，是最完整的海上縱深陣地戰理論，追求以對海洋的區域控制(*Area Control*)來防禦其海岸，並盡可能阻止海權自靠近其海岸線的海域發動攻擊。⁴⁶

(三)、尋求「以陸制海」

最後，由於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的重心本來就位在大陸，且大陸國家很難像海權那樣將所有資源全力投入海上控制力量的建設，這使得這些國家經常試圖採用「以海制陸」的手段來與海權競爭並達成戰略目的。

這主要包含兩種手段，第一種是與體系中其他擁有相當力量海軍的大陸國家聯合，試圖以外平衡手段壓倒海權的海上優勢，建立確保大陸國家在海上行動自由的海洋平衡(*maritime balance*)。拿破崙三世曾試圖與普魯士聯合以再造小型「武裝中立同盟」來限制英國海權，⁴⁷而德意志帝國在提爾畢茨(*Alfred von Tirpitz*)的影響下，曾經希望聯合歐陸國家，甚至說服與其敵對的法俄同盟，以及美國和日本，加入對抗英國的行列。⁴⁸納粹德國則是尋求義大利，以及特別是第二次世界

⁴³ Hamilton, *Anglo-French Naval Rivalry*, *op. cit.*, p. 127.

⁴⁴ 值得注意的是，法國少壯派的戰略與作戰並非海軍陣地戰，他們很精確地分析科技發展對海權的影響，並提出如何破壞英國封鎖系統的方法，同時包括公海上的商業破壞戰與近海小型艦艇作戰，不可將其與海上縱深陣地戰混淆。Ropp, "Continental Doctrines of Sea Power," *op. cit.*, p. 449.

⁴⁵ 德意志帝國海軍雖然曾經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部署過近海海上縱深防禦消耗戰陣地，但其目的只有消耗英國兵力而無打破遠距離封鎖，此種部署出現打破遠距離封鎖的目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德國與蘇聯海軍戰略學者目睹德意志帝國海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飽受英國的遠距離封鎖卻毫無作為的戰略破產，而在 1920 年代發展出來的概念。見 Herrick, *Soviet Naval Theory and Policy*, *op. cit.*, pp. 7-8; 錢懷源、黃志潔譯，Sergei Gorshkov 著，*蘇俄海軍的崛起*(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5 年)，頁 75-76。

⁴⁶ 值得注意的是，羅普也曾指出，19、20 世紀之交的義大利、美國與日本，都曾提出區域控制的海軍戰略概念，並表示這些新興海軍強國的區域控制，削弱了英國原先的全球海上優勢地位。見 Ropp, "Continental Doctrines of Sea Power," *op. cit.*, p. 448. 不過本論文認為，義大利等國的海上區域控制與後來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的海上區域控制有很大的不同，因為前者的海戰戰略仍根據馬漢與柯白等人所提出的傳統海軍戰略原則，希望以大海軍來執行正規海戰與封鎖取得制海權，在這些國家所在的地區內具有明顯的戰略攻勢。但後來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中的區域控制，卻融合了少壯派思想與戰術，而且不再強調正規海戰與封鎖對於取得制海權的根本重要性，其整體海軍戰略乃是處於戰略守勢。

⁴⁷ Hamilton, *Anglo-French Naval Rivalry*, *op. cit.*, p. 127.

⁴⁸ 鈕先鍾譯，Herbert Rosinski 著，「德國海軍思想中的戰略與宣傳」，前引文，頁 97。另外俾斯麥在 1885 年也曾對法國表示，德意志帝國與法國有必要形成海軍同盟對抗英國以在海上形成「權力平衡」態勢，德法兩國也在 1885 年 2 月的「剛果會議」(*Congo Conference*)中站在同一陣線對抗英國。但是保羅甘迺迪認為這不是戰略上的轉換，俾斯麥在這段時間的「反英」態度與加入殖民地競爭只是為了應付德國內部的政治壓力，以及他不喜歡英德兩國內部日漸龐大的自由主義勢力的緣故。Sondhaus, *Preparing for Weltpolitik*, *op. cit.*, p. 169; Paul M. Kennedy, "German Colonial Expansion. Has the 'Manipulated Social Imperialism' Been Ante-Dated?" *Past and Present*, No. 54(February 1972), pp. 136-137.

大戰前身為第三大海軍國的日本帝國作為抗衡英國海權的重要盟友。⁴⁹蘇聯沒有這種特徵是因為冷戰時體系中的其他海軍強國皆已與美國結盟，不可能再尋求聯合次級大陸海軍國家對抗美國。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手段並非實行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的大陸國家獨有，由於英國在七年戰爭之後逐漸取得無可匹敵的海軍力量，其他歐洲大陸國家如俄國、普魯士、丹麥、瑞典等國，在 18 世紀後期即曾先後組織過兩次所謂的「武裝中立聯盟」(League of Armed Neutrality)，試圖壓迫英國給予參與聯盟的中立國應得的戰時中立權利，俾斯麥更是德意志帝國建立後，普魯士利用海上平衡對抗英國潛在威脅政策傳統的首要繼承人。⁵⁰

第二種則是利用其在大陸上的內線位置繞過為海權所控制的扼制點，將勢力伸入地緣戰略方向所指的地緣政治區域，由陸地獲取國家發展所需的資源、能源與市場，甚至將與其友好的國家轉變為領土或保護國，或組織堅強的大陸同盟體系，以對海權施加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的壓力，並利用陸軍力量威脅海權對扼制點的控制，以此打破海權對海上戰略交通線的控制。最主要的方式包括第三章所提到的兼併、聯盟、利用國際鐵路建設這種「非正式帝國建立措施」等行動來達成目的。德意志帝國建設巴格達鐵路的方式即為最明顯的展現，試圖尋求取得鄂圖曼土耳其的政治妥協，以繞過受英國掌控的地中海與蘇伊士運河，到達近東、中東與其非洲殖民地來建立其囊括中歐、巴爾幹半島、近東與中東的中歐國家經濟體系。⁵¹

與其他國家合作而得以在海外設立軍事基地與派駐海軍艦隊並非以陸制海的手段，以制海權的觀點來看，這種行為與海權的遠洋「珍珠串」(string of perils)式部署具有相同的原理，即利用設立於體系中各主要扼制點的海外基地系統來控制海上戰略交通線，需要的是強大的海軍艦隊與對扼制點的控制，而非大陸國家的內線相對位置優勢。海權的珍珠串式部署能控制海上戰略交通線不僅在於設立許多位於重要戰略地理位置的堅強海外基地而已，更在於海權超強有能力將這些基地與國內的威力來源結合起來，成為一套海上攻防體系以控制海上戰略交通線。因此除非有辦法打通由本國經扼制點到達海外基地的交通線，否則還是會因為無法與國內「威力來源」相連，很容易遭到優勢海軍的孤立而無用武之地。⁵²

另一種具備更明顯軍事意涵的以陸制海手段，是利用陸軍執行所謂的「地理攻勢」(geographical offensive)，即是利用陸軍或其他政治手段，奪取對海軍進入遠洋作戰至關重要的前進基地，以繞過海權控制之下的扼制點並威脅海權在大洋上的戰略交通線控制。德國海軍戰略家魏格勒(Wolfgang Wegener)在 1915 年與 1929 年提出的地理攻勢思想即使最明顯的例子，其主張藉由向北歐發動地理攻

⁴⁹ 吳玉貴譯，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編，*戰前之大本營海軍部*(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0年)，頁 602-604。

⁵⁰ Rolf Hobson, "Prussia, Germany and Maritime Law from Armed Neutrality to Unlimited Submarine Warfare," in Rolf Hobson and Tom Kristiansen eds., *Navies in Northern Waters, 1721-2000* (London and Portland, OR.: Frank Cass, 2004), pp. 99-100, 107-108.

⁵¹ Edward Mead Earle, *Turkey, The Great Powers, and The Bagdad Railway*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4), pp.45-52, 56-57.

⁵² Edward Wegener, *The Soviet Naval Offensive*, trans. by German by Henning Wegener (Annapolis, Maryland: United States Naval Institute, 1975), pp. 2-3.

勢取得北歐港口，為德國海軍取得繞開英國的遠程戰略封鎖、進入大西洋，以及與英國海軍進行艦隊決戰以獲致制海權、為德國建立海上交通線控制的絕佳機會。⁵³羅辛斯基(Herbert Rosinski)批評此種觀點有兩個矛盾，忽略了德國海軍在數量上對英國居於絕對劣勢，無論在北海或大西洋中都不可能擊敗英國艦隊，德國海軍取得此種前進位置並進入大西洋的唯一結果，是迫使英國海軍全力在大西洋上剿滅可能對其交通線產生威脅的德國艦隊，而不是德國艦隊獲得能與孤立的個別英國艦隊交戰的機會，也就是說對德國的基本海上戰略劣勢並沒有真正的改善。⁵⁴更糟的是，德國艦隊被英國消滅的結果又使英國海軍能威脅原來因德國艦隊存在而不敢接近的德國海岸，迫使德國必須抽掉其他兵力防守海岸線，削弱了整體力量。

最後一種陸權更常運用來「以陸制海」的方式，也是大陸國家海軍對海權在海上真正的實質威脅，是以擁有劣勢海軍的大陸國家在 1870 年代後結合新軍事科技與大陸國家的近代海戰經驗，為了對抗英國海權而發展出來的所謂「少壯派」(*Jeune École*)為始祖的海軍思想，少壯派提出包括以魚雷艇的威脅來迫使傳統在港口外的近接封鎖(close blockade)無法實施、利用巡洋艦戰爭(cruiser war)來切斷英國海權經濟至為依賴的海上交通線，以及轟炸英國海岸線上的城市與港口。⁵⁵雖然少壯派是在法蘭西第二帝國崩潰之後才發展出來，而在德意志帝國、納粹德國與 1960 年代以後的蘇聯海軍中也經常受到排斥而始終不是真正的主流，但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中的海軍戰略依然採取了部分少壯派的觀念，進一步利用科技發展所培養的陸基長程火力，與陸權的海軍艦隊一起組成海上陣地戰，發揮對海權超強艦隊的「拒止」(denial)能力，其最初的起源是德國海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發展出來的「前進地帶」(*Vorfeldzonen*)概念，將沿岸地區「劃給」飛機與岸防單位，只把遠洋「保留」給戰艦。⁵⁶目前為止運用最成功者即為前蘇聯海軍以區域防禦與「海軍陣地」為基礎的「藍帶」(Blue Belt)縱深防禦，⁵⁷下文將分析，目前中國海軍的縱深防禦即是模仿前蘇聯海軍的縱深防禦戰略，並沒有特殊之處。此種海上陣地戰雖然完全不是「正統」的海軍戰略，但其威力所產生的嚇阻確實可以使大陸國家在靠近其本土與陸基長程火力涵蓋範圍內，藉由奪取有限

⁵³ Wegener, *The Naval Strategy of the World War*, op. cit., pp. 26-34 and pp. 179-184.

⁵⁴ 鈕先鍾譯，Herbert Rosinski 著，「德國的海戰理論」，前引文，頁 80-81。

⁵⁵ Arne Røksund, "The *Jeune École*: The Strategy of the Weak," in Rolf Hobson and Tom Kristiansen eds., *Navies in Northern Waters, 1721-2000* (London and Portland, OR.: Frank Cass, 2004), pp. 117-130.

⁵⁶ 鈕先鍾譯，Herbert Rosinski 著，「第二次世界大戰海權的擴張」，Mitchell Simpson III 編，**海軍思想的發展**(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7 年)，頁 63。

⁵⁷ 「藍帶」實際上是蘇聯國防部長馬林諾夫斯基元帥(Rodion Malinovsky)在 1966 年宣布的海軍戰略守勢作戰部署，是陸軍支配下的蘇聯國防部希望限制海軍遠洋發展的決策，蘇聯海軍雖然早已有防禦區域的作戰概念與部署，但本身從未劃地自限於「藍帶」所提出的 1800-2500 公里範圍內，而且對國防部的設計相當不滿並與之展開激烈的辯論。但最後海軍還是勉強採取「藍帶」防禦系統，可是其概念在 1970 年春季的「海洋」(Okean) 全球演習之後就被悄悄廢棄了，但是區域防禦作戰使得部署上仍顯現出「藍帶」的樣式，結果蘇聯海軍本身自己在 1980 年代初掀起「藍帶」防禦系統是否仍存在海軍內部的辯論。Herrick, *Soviet Naval Doctrine and Policy*, op. cit., pp. 336-339, 465-466, 887-892.

範圍內的制海權，實施有限度的攻勢戰爭，而海權超強除非願意升級戰爭規模，在派遣大規模海空軍武力應戰的同時，另以長程火力同時攻擊陸權位於沿海與深入內陸的作戰與後勤基地，⁵⁸否則並不容易突破大陸國家的海上陣地戰。

總而言之，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乃是一種大陸國家為了在體系或次體系中與其體系層級密碼的對手相抗，以實現本身地緣政治標準程序的地緣戰略類型。而受到本身在結構中的地位、地緣政治屬性，以及戰略文化地緣屬性的影響，基本上仍是一種大陸性思考的地緣戰略，非真正欲取代體系中海權既有地位的純海洋性地緣戰略。這種差異也使得日本帝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地緣戰略很難被歸類為大陸式海洋地緣戰略，儘管日本帝國具有與上述三國極為類似的大陸國家特徵：決策圈始終為陸軍以及具備大陸思考的決策菁英所把持，導致海軍經常為陸軍所壓制；其發展方向始終位於東亞大陸；1943年9月更在陸軍主導下畫出所謂的「絕對國防圈」，作為培養對抗盟軍的戰力與作戰行動上，與維持日本國內人民生活最低限度不可少的「防禦圈」，希望建立一個穩固的外圍防線與陣地，以便日本能在防線內一面急速擴充戰力，另一方面又同時在防線上與英美兩國作戰。⁵⁹然而島國本質使日本帝國不可能成為完全的大陸國家，亦不可能將地緣戰略重心完全置於東亞大陸—當美國在20世紀初崛起為足以挑戰英國海權地位的海軍強國之後，日本帝國即慢慢確立以太平洋作為在大陸上發展的「屏障」的地緣戰略概觀，⁶⁰然而太平洋雖為「屏障」，但首要的國防威脅卻逐漸由傳統的俄羅斯轉移至被認為是最有可能與日本帝國發生衝突的美國。⁶¹

此外，島國本質亦使日本帝國擴建海軍有其絕對必要性，完全不是陸柏彬所謂的海軍民族主義使然，因此日本帝國海軍雖然也期盼與英、美兩國海軍保持一定的兵力對比以完善其防禦，⁶²但與上述三國不同的是，日本帝國並不是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才開始擴張海軍，早在美國成為日本主要威脅之前，日本已經是主要的海軍強國。而儘管太平洋是「屏障」且屬於戰略防禦，但其對抗英、美等優勢

⁵⁸ 此即美軍在21世紀初所發展的「空海戰」(Air-Sea Battle)概念。Jose Carreno, Thomas Culora, and Thomas Hone, "What's New About the AirSea Battle Concept?," *Proceedings Magazine*, Vol. 136, No. 8(August 2010), <http://www.usni.org/magazines/proceedings/2010-08/whats-new-about-airsea-battle-concept>.

⁵⁹ 謝鴻崑譯，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編撰，**海軍戰略重建與第三階段前期海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0年)，頁708、736-737、779-780。值得注意的是，該書在第742-743頁指出，日本官方的正式文書從未出現「絕對國防圈」，這個名詞的創造者不詳，而該詞可能是源自當時作戰規劃中提到的「絕對應確保的要域」一詞。

⁶⁰ 吳玉貴譯，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編，**戰前之大本營海軍部**，前引書，頁463。

⁶¹ 在1936年後，又成為同時包括美國與蘇聯。同上註，頁285-287、462-467。

⁶² 即所謂「對美七成比率」。這是自19世紀末以來，許多海軍兵學計算上的數字，也就是攻方必須至少對守方保有三成以上的優勢方可執行有效的攻勢作戰，若攻守比低於這個比率，守方可以遂行有效的防禦戰略。但日本帝國海軍與法國和德意志帝國的海軍擴張比率有兩點不同，首先是其對象不僅為美國，在提出當時尚包含德意志帝國，1920年代時則為英、美兩國。第二，與法、德僅注重主力艦不同的是，美、英、日三國海軍重視整體海軍的兵力對比，這也使得華盛頓海軍條約體系的兵力限制從一開始的主力艦與航空母艦，不斷延伸至巡洋艦、驅逐艦與潛艦等「補助艦艇」上。同上註，頁225-229、264-275、317-331。

海軍的作戰並非如法國的通商破壞戰，或德、蘇的防禦性海戰或積極防禦，而是以奪取制海權為目標，極為傳統的海軍攻勢戰略，⁶³更非陸柏彬所謂的「次佳海洋戰略」。因此雖然日本帝國的地緣政治屬性接近大陸國家，地緣戰略重心位於亞洲大陸，亦展現出許多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的特徵，但仍無法被完全歸入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的個案之中，亦不能將其視為「海軍民族主義」與「次佳海洋戰略」的代表之一，只能將其視為極特殊的個案。

第二節、當代中國的地緣戰略：形式與特徵

第五章的分析指出中國一直以來的體系層級地緣政治密碼是促成體系的多極化與追求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這個密碼自然是中國地緣戰略的最高目標，而區域與周邊層級密碼的目標—阻止中國以外的任何強國掌握東北亞、東南亞與南亞，以及追求國家統一、保障中國在周邊海域的海洋權益等核心利益—則是地緣戰略中較低層次的目標。

閻學通很清楚地指出東亞對中國整體大戰略的重要性及為何中國的地緣戰略重心必須位於東亞：「若中國以東亞為中心，加大東亞區域化戰略的力度，就能促使國際格局向有利於中國崛起的方向轉化。東亞區域化如能取得實質進展，目前非常不願意接受中國崛起前景的日本也將不得不改變其對華強硬的政策，會仿效英國一定程度地參與地區一體化的進程，採取與中國合作的態度」。⁶⁴如果和諧世界確實是中國未來的大戰略主軸，和平發展則是其主要戰略手段，那麼即使中國在參與東亞區域化的方式，也就是其地緣戰略的形式與手段，將追求以多邊外交、大國妥協、區域整合等合作性安全的方式來實現其主導東亞，並以此為基礎，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戰略目標。反之，如果這只是對外政治宣傳，則中國的地緣戰略將展現出傳統追求控制戰略要地與戰略交通線的特徵與強制性手段，以組織以中國為核心的東亞地緣戰略領域，使中國完成其標準地緣政治程序並晉身為結構中的超強。

依照本論文第三章對地緣政治結構中「極」的判斷標準，是能對結構中陸地或海洋戰略交通線建立控制的大國，而地緣戰略領域則至少應包含一條以上的戰略交通線。然而，正如第三章第二節第一小節所述，目前在東亞大陸內部與周邊，僅存在連接東北亞與東南亞的海上戰略交通線，陸上戰略交通線則只有位於中國北方、連接中國、俄羅斯、蒙古與中亞諸國的跨國鐵路網，但這些鐵路網中，無論是新歐亞大陸橋，或者是由北京經蒙古與西伯利亞至俄羅斯的鐵路線，皆與西伯利亞鐵路連接，中國不可能希望控制大部分路線在俄羅斯境內的歐亞大陸陸地戰略交通線。故依本論文的標準，若要建立所謂的「東亞地緣戰略領域」，考量到東亞的海陸自然地理分佈，以及市場、能源與原料產地的人文地理分佈特徵，

⁶³ 同上註，頁 190-193、251-253、308-313、505-507、547-549、552-553。

⁶⁴ 閻學通，「中國崛起的實力地位」，閻學通、孫學峰等著，**中國崛起及其戰略**（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 104。

中國可以有三種戰略選擇：

第一，建立強大的海上力量以控制既由麻六甲海峽至中國北方的第一島鏈內的海上戰略交通線，同時把第一島鏈與第二島鏈間的菲律賓海(Philippine Sea)作為保護第一島鏈內緣海的戰略緩衝，並區隔與美國在亞太的海上勢力範圍，但是在陸地上沒有建設新的戰略交通線並加以控制，可是並不忽略對相鄰的亞洲地緣政治區域的影響。如此一來，中國將成為全球體系史上第一個控制邊緣地帶的大陸性—非全球性—海權。而此種地緣戰略相當接近中國戰略菁英所謂的「陸海並重，以海為主」的類型。

第二，選擇建設以中國國內鐵路網為核心、連接中國與中亞、東南亞之間的新東亞陸地戰略交通線，並將東南亞作為其勢力範圍，以控制這條陸地戰略交通線，徹底發揮中國在邊緣地帶的陸權基礎與相對優勢，但是在海上並不試圖控制位於沿海內的戰略交通線，僅以沿海區域控制為滿足，如此一來，中國將成為純粹的陸權。葉自成的陸權主張大抵與此類似。

第三，上述兩種選擇同時進行，若能成功，亦將成為全球體系形成以來，第一個同時控制陸海戰略交通線的超強，接近麥金德在 20 世紀初認為日本或許可以支配中國，並進而成為同時擁有強大陸權力量的海權的想像。

無論是哪一種選擇，依戰略交通線控制邏輯所組織的東亞地緣戰略領域是以東北亞的日本、南韓、中華民國與中國東部沿海為核心市場，中國東部沿海以外的中國西部內陸、中亞、東南亞則為能源、原料產地與次要市場。如果「東亞地緣戰略領域」係依陸地戰略交通線的建設而組織，其範圍在大陸上可包括中國、北韓、中南半島，並以中亞、蒙古甚至俄羅斯遠東地區作為俄羅斯仍有極大主導力量的心臟地帶地緣政治區域之間的緩衝過度地帶，甚至可能進一步將中亞與中國鄰接的諸國透過鐵路線整合進入東亞地緣戰略領域的西部地區。至於南韓、中華民國、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等東亞海上戰略交通線所途經的國家，將成為東亞地緣戰略領域與美國控制下的貿易—海洋領域之間的通道國，甚至可能是勢力、影響力重疊的緩衝區。至於緬甸則可能成為與東亞地緣戰略領域與印度之間的通道國。不過如果中國所選擇的領域組織手段包含對東亞海上戰略交通線的控制，雖然可將能源與原料產地進一步延伸至澳洲，但其很有可能將因此與原先掌控此一戰略交通線的美國發生嚴重的地緣政治衝突，而這種衝突甚至將捲入南韓、中華民國、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等位於海上戰略交通線之旁，原先可能成為兩大領域之間通道國與緩衝區的國家。

在進一步驗證中國目前所採行的地緣戰略究竟屬於何種形式，以及其攻守態勢為何，和操作方向之前，本節將先針對中國目前的地緣戰略性質與特徵進行分析，以判定中國地緣戰略的地緣政治屬性與類型，為下一節進一步分析中國地緣戰略的性質、重心與操作方向做基礎分析。

一、地緣政治屬性

整體來說，雖然中國在冷戰結束後於海洋議題上有許多明顯的作為，例如提升保衛海洋權益的戰略重要性與國家統一一致，自 1990 年代中期以來不斷加深對海洋議題的關注，先後提出相關政策白皮書、政策綱領、海洋相關國際法與國內法的批准或修訂，以及組織機構改革等行動，⁶⁵中共也在十六大報告中提出實施海洋開發戰略的方向，⁶⁶在十七大報告中又提出發展海洋產業的戰略要求，⁶⁷似乎展現出前所未有的朝向海洋發展的雄心，但中國本質上還是一個大陸國家，其地緣戰略依然具有濃厚的陸權性格。但這些政策作為其實證明中國因為本質上還是一個在國家戰略層面屬於純粹大陸性質的國家，才必須以國家之力量整合、發展海洋事務。

這種大陸性質的明顯影響，不僅可由中國迄今還未出現整合完全的國家海洋戰略看出，也可由海洋開發無論在十六大、十七大報告中，都僅一筆帶過看出。反之，中國在東亞大陸上的陸地發展卻相當迅速，其中一個明顯的特徵就是中國提出許多區域與次區域經濟整合，其對象國幾乎都以陸地鄰國為主，與海洋鄰國之間不存在真正的海上區域經濟整合。⁶⁸而隨著中國國力在本世紀的進一步提高，中國開始大力投入這些區域或次區域經濟整合中的基礎建設，其中相當重要的一項作為，就是利用新建跨國鐵路來促進與周邊國家的經濟整合。誠然，中國內部的鐵路建設—無論是新建路線獲既有路線的改善—其著眼點主要在於促進國內的經濟發展，並不具備明顯的對外戰略行為意涵，但依然是中國這樣的大陸國家利用完善的國內鐵路網進一步整合內部經濟發展與國家統一的大陸屬性地緣戰略特徵，⁶⁹以西部大開發為核心的陸地發展與經濟整合戰略也與中國追求創

⁶⁵ 周繼祥，**中共處理海洋事務策略與組織架構之研究**(臺北：行政院海岸巡防署，2005 年)，<http://pal.csie.ntu.edu.tw/~xflash96/policy/sites/default/files/page/PRCOcean.pdf>，頁 49-65、68-96、111-120、122-147。

⁶⁶ 江澤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共中央文獻室編，**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 年)，第一冊，頁 17。

⁶⁷ 中共中央文獻室編，**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北京：中央文獻，2009 年)，頁 18。

⁶⁸ 例如中國與東協之間固然有「東協加一」，但中國與東協的陸地鄰國之間尚存更緊密的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與陸上新交通線建設帶來的整合關係，但中國與菲律賓、印尼等東協海上成員國之間卻沒有類似的整合。而中國與東北亞國家之間的次區域經濟整合如圖門江、環日本海等經濟圈構想，仍然是以陸地開發來吸引海洋國家加入的模式為主。真正的中日韓自由貿易區至目前為止還沒有簽署真正的協議展開。

⁶⁹ 中國在 2004 年通過的「中長期鐵路網規劃」目標，是希望到 2020 年時，中國境內鐵路營運里程達到 10 萬公里，為此需要興建高速鐵路式的客運專線 1.2 萬公里以上、西部開發與其他地區的新路線 1.6 萬公里，同時將既有路線中的 1.3 萬公里雙線化，1.6 萬公里電氣化，其中新線建設的重點即是配合西部大開發，以該區域為重點。而 2008 年通過的「中長期鐵路網規劃調整」中，其目的是中國政府在 2008 年為了因應全球金融海嘯而投入的「救市」行動，鐵公路等基礎建設是救市行動的重點，鐵路建設則更是基礎建設中的重點，而其中的新線建設目標暴增至 4.1 萬公里，雙線化工程增加至 1.9 萬公里，電氣化則增加至 2.5 萬公里。見「國家《中長期鐵路網規劃》簡介」，**中國政府網**，2005 年 9 月 16 日，http://www.gov.cn/ztl/2005-09/16/content_64413.htm；「中長期鐵路網規劃(2008 年調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基礎產業司**，2008 年 10 月 8 日，<http://jtyss.ndrc.gov.cn/fzgh/W020090605632915547512.pdf>；「泛亞鐵路建設或暫擱淺，設計時速遭質疑」，**鉅亨網**，2011 年 5 月 26 日，

造穩定的內部與週邊環境等周邊與區域地緣政治密碼密切相符，尤其維持內部社會穩定更是中國自古至今，內政導向戰略文化一貫的主要特徵。不過新鐵路網中與周邊國家連接的路線就比國內路線的建設具備較清晰的對外戰略意涵，雖然其主要目的之一仍然是促進西部地區的開發，但延伸進入周邊國家的跨國鐵路線(網)，不僅具備促進中國與東協、中亞國家之間的區域經濟整合的功能，也必然使中國在路網完成後能藉由經濟力量的加快滲透而獲得對這些國家的更高政治影響力。因此，根據上述的推論，中國內部與跨國鐵路網的建設，適足以證明中國的地緣戰略重心仍然位於東亞大陸，屬性亦為大陸性而非海洋性。

不過除了上述內部地緣政治模式、地緣政治密碼與戰略文化的影響之外，中國在工業科技，特別是海軍造艦方面的客觀能力不足，亦使其地緣戰略的屬性難以走向海洋性。雖然中國海軍現代化與海上勢力擴張一直是冷戰以來重要的國際安全議題，但事實上中國並沒有表現出以往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的大規模海軍擴張特徵。其原因在於中國與以往的陸權不同，其經濟、科技與工業水準都沒有完全的發展，而且與結構中的其他超強與強權有明顯的差距。這使得中國一方面必須把本身的經濟力量基礎發展視為首要，而且極力避免與其他超強、強權發生直接衝突，以免危及自身的經濟發展。二方面是由於科技與重工業、材料工業等產業水準的限制，中國沒有能力與其他超強與強權一樣，獨力研發與製造國防所需的各種重要裝備，除了第二砲兵之外的各軍種幾乎都需要與其他國家進行技術合作與轉移，或直接自其他國家進口核心裝備甚至主戰裝備，尤其是戰車、戰機、大型軍艦與潛艦最重要的推進系統，以及各種相關的作戰次系統，嚴重限制其海軍的現代化速度，⁷⁰迫使中國海軍必須採取所謂「小步快跑」的造艦模式—小批量但連續建造多種試驗與過度性質的戰艦，藉此累積與改善本身的造艦能力與技術。雖然這樣的發展確實讓中國在海軍造艦能力上有所進展，但迄今中國在關鍵技術與推進系統等方面還是無法取得成功的突破，仍必須依賴外國—尤其是俄羅斯—技術與專家的大量協助。

因此即使中國改革開放已經超過 30 年，而且自 1991 年第一次波灣戰爭之後就以打贏高科技條件下的局部戰爭為目的，進行軍事現代化超過 20 年，但是迄今仍面臨許多武器無法自製的嚴重技術問題。⁷¹再加上海軍在人民解放軍內的地位還是為陸軍所支配，軍種地位與技術能力綜合之下，即使在 2020 年之前能換裝較新式的戰艦而改善技術上的老舊劣勢，但受限於國防預算總額與海軍能分配到的比例，以及中國造艦能力的限制，目前似乎沒有大規模造艦計畫來顯著提升

<http://news.cnyes.com/Content/20110526/KDWVOX16AVB4A.shtml>。

⁷⁰ 蘭德(RAND)公司在 2005 年的報告即指出，雖然中國在海軍造艦技術的研發與製造能量上已有很大的改善，但動力系統與成熟的艦上操作次系統，仍是中國造船工業無法支持中國海軍大規模、迅速現代化的主要原因，而且可能在下個十年還未能有所改善。Evan S. Medeiros, Roger Cliff, Keith Crane, and James C. Mulvenon, *A New Direction for China's Defense Industry* (Santa Monica, California: RAND, 2005), pp. 153-154.

⁷¹ “China defense industry faces homemade engine troubles,” *The China Post*, July 20, 2011, <http://www.chinapost.com.tw/commentary/the-china-post/special-to-the-china-post/2011/07/20/310435/China-defense.htm>.

水面艦隊的數量。⁷²換言之，中國目前根本無力大規模擴張遠洋海軍、與海權單極進行海上軍備競賽。這也使得中國儘管存在希望大規模發展海軍的呼聲與對海軍存在威望性的功能思考，但並沒有真正發展出類似法蘭西第二帝國與德意志帝國那樣的海軍民族主義，倪樂雄曾指出中國內部某些戰略菁英採取中國在當前的全球化體系中不須要擁大海軍的世界主義觀點，⁷³另外某些學者則從中國的國防戰略角度，提出暫緩發展強大海軍的呼聲，⁷⁴不過鑑於中國開始接近擁有本身的航艦，未來是否會轉變仍有待觀察。

上述分析顯示，中國的地緣戰略性質仍然是大陸性而非海洋性，那麼是否中國的地緣戰略形式即是屬於本章第一節所謂的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具有其這種地緣戰略的明顯特徵？以下本文將根據第一節的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特徵，與目前中國的地緣戰略特徵進行比較，以進一步分析此問題。

二、海軍戰略思想與部署：陸戰觀念指導下的海上攻勢縱深防禦

一般來說，中國文武戰略菁英對於其海軍戰略的地緣政治屬性並沒有特別的描述，他們著重的是凸顯中國海軍戰略在積極防禦原則下的戰略防禦態勢與馬漢以來的西方「帝國主義」海軍戰略或蘇聯「霸權主義」海軍戰略的戰略攻勢思想與態勢之間的差異，以強調中國海軍戰略的防禦性與非侵略性，甚至中國整體戰略的愛好和平性格。⁷⁵

儘管中國還未追求大規模海軍擴張，但其地緣戰略中的海軍戰略指導，卻明顯具備深受陸戰思維影響的海軍戰略思想與部署，蓋依照朱紹鵬的描述，中國海軍的「近海防禦」戰略部署原則係為「建立以陸岸(包括沿海大陸和島嶼)為依托，由陸向海逐步延伸的近海防禦體系…近海防禦的範圍具有一定的伸縮性…應充分利用陸岸增大海上防禦的戰略縱深，形成多層次的防禦布勢…在此基礎上，還應根據保衛國家安全和海洋權益的需要，視情將海上防禦範圍適當前伸」。⁷⁶此種部署與戰略思維很顯然受到陸戰觀念的影響，由英國所發展出來的，以海洋戰略思維為基礎的海軍戰略思想與部署指導，並不會將陸地視為海上防禦的縱深，而且雖然島嶼和海岸上的港口對海軍作戰極為重要，但絕不會是海軍作戰的「依托」，更不會出現「多層次防禦布勢」，海軍如要擴大「縱深」，就應設法掌握並運用制海權，將海戰的戰場延伸至敵方海岸。

⁷² 估計至 2020 年，中國海軍能執行遠洋作戰的驅逐艦與護衛艦數量大致上小幅提升至 82 艘。Kamlesh Kumar Agnihotri, "Strategic Direction of the PLA Navy: Capability and Intent Assessment," *Maritime Affairs*, Vol. 6, No. 1(Summer 2010), p. 87.

⁷³ 戰略菁英具有不同的戰略思維和認知是很自然的事情，即使在中國這樣言論與思想較受管制的國家亦然。此外，美國戰略文化中具有明顯的自由主義政治傳統，但外交政策卻受到現實主義邏輯的支配。Ni Lexiong, "Sea Power and China's Development," *Liberation Daily*, 17 April 2005, 4,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Website, http://www.uscc.gov/researchpapers/translated_articles/2005/05_07_18_Sea_Power_and_Chinas_Development.pdf;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Norton, 2001), pp. 23-25.

⁷⁴ 唐世平，「再論中國的大戰略」，*戰略與管理*(北京)，第 4 期(2001 年)，頁 32-33。

⁷⁵ 如朱紹鵬，「海洋軍事鬥爭」，王文榮主編，*戰略學*(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99 年)，頁 316-317；鞠海龍，*中國海權戰略*(北京：時事出版社，2010 年)，頁 221。

⁷⁶ 朱紹鵬，「海洋軍事鬥爭」，前引文，頁 317-318。

不過上述中國海軍的積極防禦部署思維還更具備一項很少為人所注意到的特徵，即中國海軍的積極防禦與蘇聯海軍的區域防禦之間極高的相似性。

西方戰略學者中注意到中國海軍戰略的陸戰思維與深受蘇聯海軍影響者為柯爾。他認為中國海軍戰略思想與部署受到極深的陸戰觀念與大陸思想之影響，這展現在兩方面：第一，劉華清本人早期的陸軍背景，⁷⁷提出的島鏈戰略與中國海軍內部各艦隊的「戰區」劃分，顯示劉華清本人與中國海軍仍深受陸戰觀念的束縛，因為海軍在缺乏地形的海上作戰，不可能有障地觀念和有形的地理界線存在。⁷⁸第二，由於歷史上缺乏海外發展之經驗來在戰略思想中植入海軍與海權思想，使其在近代歷史上的海軍戰略思想幾乎完全仰賴自其他國家輸入，1949 年之後便藉由依靠蘇聯在建立海空軍的幫助，直接從蘇聯引入各種相關的概念，其中包括中國海軍認為在港內(inport)的訓練重要性大於西方國家認為比較重要的海上戰鬥訓練，⁷⁹以及海上縱深障地戰概念。⁸⁰

蘇聯海軍對中國海軍的影響確實如柯爾所言，非常深遠。雖然中國在 1980 年代提出「海軍戰略」，但直到目前為止，中國海軍戰略思想的核心概念仍然與蘇聯海軍類似，並未發展出自身的海軍戰略理論，這一點與上述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個案國家極為不同。柯爾雖然認識到中國海軍在海上障地戰概念與訓練上的影響，但其實並不止於此，中國海軍連本身的制海權概念、積極防禦的部署內涵等，也與蘇聯海軍戰略理論中的制海權概念和區域防禦極為類似，而此種相似性，或可起源於中國在 1950 年代大量派遣包括劉華清在內的中高階海軍軍官前往蘇聯伏羅希洛夫海軍學院(Order of Lenin K.E. Voroshilov Naval Academy)留學時，受到蘇聯海軍當時在戰略思想與制海權理論發展的影響。⁸¹

中國海軍的**海軍大辭典**將制海權定義為：「交戰雙方依靠海上優勢，在一定時間內對一定海洋區域所取得的控制權」，⁸²其目的則是：「為了消除在預定海域內可能對己方造成的威脅，使己方獲得海上行動自由，並且能有效地利用海洋進行政治、軍事與經濟活動，保障己方海上交通運輸和沿海安全，在必要時剝奪敵方的制海權，破壞敵方的海上交通運輸和沿海安全，以阻止其利用海洋，使敵方

⁷⁷ 事實上不只劉華清，除了在內戰中「投共」的國軍海空軍官之外，中國海空軍最初的創始人都是來自陸軍，這使得解放軍內部實際上不存在海空軍與陸軍的路線之爭，陸軍的支配力量與思想長期以來牢不可破。蔡偉，「禮儀之師的航母夢」，*三聯生活週刊*，2009 年 4 月 21 日，<http://www.lifeweek.com.cn/2009/0421/24690.shtml>。

⁷⁸ Bernard D. Cole, "China's Maritime Strategy," in Susan M. Puska eds.,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fter Next* (Carlisle, Pennsylvania: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U.S. Army War College, 2000), p. 294.

⁷⁹ *Ibid.*, p. 319.

⁸⁰ Bernard D. Cole, *The Great Wall at Sea: China's Nav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nnapolis, Maryland: Naval Institute Press, second edition, 2010), p. 177.

⁸¹ 作者曾在 2012 年 7 月與柯爾就下文將提到的，中國海軍受蘇聯海軍影響的內容，透過電子郵件(e-mail)的形式討論，柯爾對本章下文討論的觀點，表示同意。

⁸² 張序三主編，*海軍大辭典*(上海：上海辭典出版社，1993 年)，頁 8。

海上行動受到限制」。⁸³與此相較，劉華清與其他在 1950 年代中期赴蘇聯留學的中國海軍中高階軍官可能接觸到的蘇聯制海權，正好是 1955 年蘇聯海軍對制海權的大辯論結束時，對於制海權的概念與獲致制海權的目的所下的定義：「交戰雙方的海軍兵力能夠在軍事行動的海軍戰場中，為了於一定時間內成功完成所擔負任務而創造的有利形勢，擁有這種優勢形式的海軍，其敵方無法阻止其達成任務，僅能在有限的地區實施局部騷擾。」⁸⁴

從以上的敘述，似乎難以直接推論中國海軍的制海權分級概念係受到蘇聯之影響，因為「控制權」是否即代表「有利形勢」？「在特定地區順利達成任務」的概念，是否又與「為了消除在預定海域內可能對己方造成的威脅，使己方獲得海上行動自由，並且能有效地利用海洋進行政治、軍事與經濟活動，保障己方海上交通運輸和沿海安全」一致，似乎很難直接論斷。不過若進一步比較中國與蘇聯海軍關於「制海權」的分級概念，當可發現其中有更深刻的相似性。

表 6.1 前蘇聯與中國海軍制海權概念比較

前蘇聯海軍 ⁸⁵		中國海軍 ⁸⁶	
戰略性制海權 (Strategic Command of the Sea)	己方在整個海軍戰場或戰場的一個戰略區域中完成一個或一連串戰略任務時，一種能夠確保任務成功執行，且持續時間長達整個任務執行時間的有利(favorable)情勢。	戰略制海權	指對一個或數個海洋區域，在整個戰爭期間或某個戰略階段，為了便於實施戰爭或戰略性戰役而占有的控制權。
作戰性制海權 (Operational Command of the Sea)	在 1940 年代的蘇維埃學派(Soviet School)海軍戰略思想中又稱為「有限制海權」。 ⁸⁷ 指一	戰役制海權	指對海洋戰區的一定區域，在較長時間內，為順利實施某次戰役而取得的控制權。

⁸³ 中國軍事百科全書編審委員會編，**中國軍事百科全書(軍事學術 II)**(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7 年)，頁 810-811。

⁸⁴ V. Vozenko, I. Korotkov, and M. Skovorodkin, "Voyennaya strategiya v trudakh Sovetskikh avtorov, 1917-1967 gody," *Voennaya mysl'(Military Thought)*, No. 4(April 1967), p. 93, quoted from Herrick, *Soviet Naval Theory and Policy*, *op. cit.*, p. 190.

⁸⁵ V. Shavtsov, "O gosподstov na more,"(On Command of the Sea), *Voennaya mysl'(Military Thought)*, No. 6(June 1955), pp. 11-12, quoted from *ibid.*, p. 237.

⁸⁶ 中國軍事百科全書編審委員會編，**中國軍事百科全書(軍事學術 II)**(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7 年)，頁 810-811。

⁸⁷ Herrick, *Soviet Naval Theory and Policy*, *op. cit.*, p. 249. 海瑞克(Robert Herrick)教授乃是美國海軍戰院(Naval War College)中專門研究蘇聯海軍戰略思想與戰略部署的專家。

	種在作戰區內的有利 (advantageous) 形勢，允許享有這種制海權的一方能成功地實施一次以完成所擔負的作戰任務為目標的海軍作戰，而另一方無法有效地反擊。		
戰術性制海權 (Tactical Command of the Sea)	藉由具有「現場行動 (scene-of-action) 海軍兵力優勢的攻勢作戰，或以多重防禦手段(如雷區與岸砲)建立的有利情勢。	戰術制海權	指對有限海洋區域，在較短時間內，為順利進行戰鬥而奪得的控制權。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相關資料自行整理

表 6.1 所列的蘇聯海軍三級制海權分類，乃是 1955 年海軍內部針對制海權概念的辯論結束時所採用的分類，這個時間點正好是劉華清留學蘇聯期間 (1954-1958)，他與其他同期或之後赴蘇聯研究的海軍中高階軍官，很可能都接納了這種制海權理論。因此在上表 6.1 可發現，中國海軍的制海權分類與蘇聯海軍相當類似。誠然，光憑如此還是無法直接將兩國海軍的戰略思想作聯繫，因為這種戰略、作戰(戰役)、戰術的分類，雖然最早是德意志帝國的普德學派 (*Preußischen-deutschen Militärischen Gedanken, Prussia-German School*)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初期戰略思想內涵之一，爾後在兩次世界大戰與冷戰期間分別為德國陸軍與蘇聯紅軍分別持續發揚光大，⁸⁸但是中國軍方出版的彭光謙與姚有志主編的**戰略學**卻指出，人民解放軍的戰略、戰役(作戰)與戰術分層結構，是由毛澤東在 1936 年所獨創，⁸⁹而本論文作者依據**毛澤東選集**的第一卷來檢驗當時毛澤東「提出」這個三極結構的內容，並未發現毛澤東提到任何德國或蘇聯的起源。因此雖然毛澤東提出此一分級概念是在 1936 年，已經落後德國與蘇聯許多，但仍難以憑此斷定毛的概念係受到蘇聯的影響，儘管兩者間有明顯的相似性。不過

⁸⁸ 滕昕雲，**閃擊戰－迷思與真相：普魯士德意志軍事思想的詮釋**(臺北：老戰友工作室，2003 年)，頁 5-11。

⁸⁹ 彭光謙、姚有志主編，**戰略學**(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 2001 年)，頁 11。

就海軍戰略思想而言，由於中國海軍在 20 世紀以前一直缺乏制海權理論與海軍戰略思想，雖然在 20 世紀初年開始接觸西方制海權理論並有所研究，⁹⁰但似乎並沒有在人民解放軍海軍中流傳下來。而劉華清等大批中國海軍軍官留學蘇聯的 1950 年代中期與後期，正逢三級制海權概念在蘇聯海軍提出與被接納，⁹¹故合理推斷，劉華清等人應當也受到蘇聯的三極制海權概念之影響，並將其引入中國海軍戰略思想中。

無論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戰略、戰役(作戰)與戰術分層結構是否為毛澤東所獨創，承接此一三級結構的制海權概念乃是一種陸戰思維而非海戰思維則殆無疑義。與美國海軍的制海權概念相較即可對此有清楚的瞭解：雖然美國陸軍也從蘇聯接納了戰略－作戰－戰術的三級概念，但美國海軍對制海權的分級還是始終維持絕對制海(Absolute Control)、有效或有限制海(Working or Limited Control)、爭奪制海(Dispute or Contested Control)等受柯白影響的傳統概念，⁹²並沒有像陸軍那樣接納戰略、作戰、戰術的分層概念。

另一個中國海軍受蘇聯海軍影響之處在於海軍艦隊的作戰、部署與運用思想。柯爾雖然指出中國海軍的近海防禦與蘇聯海軍極為類似，但是他沒有詳細說明相似之處，他首先只是指出劉華清對中國海軍的在每個發展階段所欲控制的目標，源自蘇聯海軍的海洋控制區概念－由海岸線向外分別為海洋控制區、海上拒止區，以及最外層的長程偵察與潛艦阻擊區，而島鏈戰略的最外緣範圍亦與蘇聯海軍的海上控制、拒止區延伸範圍相符，大約為 1,350-1,500 哩，⁹³雖然他又接著引述接任劉華清為中國海軍司令員的張連忠在 1988 年提出的縱深防禦部署，⁹⁴但單從此一綱領性的描述中，很難清楚瞭解中國海軍的區域防禦與蘇聯海軍的相似處何在。

⁹⁰ 史滇生，「中國近代海軍戰略戰術思想的演進」，*軍事歷史研究*(上海)，第 1 期(2000 年)，頁 122-129。

⁹¹ Herrick, *Soviet Naval Theory and Policy*, *op. cit.*, p. 245.

⁹² 維戈(Milan N. Vego)指出，隨著科技的進步，能阻礙海上交通線控制的手段從以往的水面延伸至水下、天空乃至太空，使得艦隊能控制的範圍與時間都不斷縮小與縮短，不可能再如帆船時代一樣出現接近絕對的控制，現代真正的「制海權」必須同時控制水面、水下與天空，而只要其中之一無法控制，就不存在「制海權」，此種嚴苛與不斷變動的動態控制使得在現代戰場客觀環境之下，使用「制海」(sea control)一詞，實較「制海權」更能真實反應現代海軍作戰中難以持續控制海洋的情況。在這種概念下，所謂的「絕對制海」，也就是古典意義的制海權，而有效制海則是擁有高度但非絕對的行動自由，行動時還是有一定的風險，只是已經降至最低，而敵方則很難在海上活動。至於爭奪制海則發生於戰爭初期，還未決定哪一方在海上握有優勢而存在為了爭奪優勢而作戰的階段。不過使用制海權仍有其意義，代表整個海軍戰略理論的核心概念。Milan Vego, *Soviet Naval Tactics* (Annapolis, Marylan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2), p. 111, p. 117; 另外類似的制海權分級概念亦可見，鈕先鍾譯，Mitchell Simpson III 著，「原編者導言」，Mitchell Simpson III 編，*海軍思想的發展*(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7 年)，頁 20-21。兩者稍有不同，但基本概念一致。

⁹³ Cole, *The Great Wall at Sea: China's Nav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op. cit.*, p. 177

⁹⁴ *Ibid.*

表 6.2 前蘇聯與中國海軍防禦區域部署內容

前蘇聯海軍 ⁹⁵		中國海軍 ⁹⁶	
開放洋面區 (Open-Ocean Zone)	<p>範圍－阿拉夫佐夫的概念為：大型水面艦與潛艦可被部署在遠離其基地但又不減弱其作戰能力的區域。1950 年代中期：整個海洋戰區，甚至延伸至潛在敵人的海岸。</p> <p>艦隊部署與兵力運用形式(1950 年代中期)－受限於敵方的海上優勢，只有長程潛艦可部署於此，任務為截斷貿易線與攻擊敵方戰艦，但無意在這個區域建立制海。</p>	外層作戰區	<p>範圍－北起朝鮮海峽、東至琉球群島、南達南沙群島的南中國海外圍海域。⁹⁷</p> <p>艦隊部署與兵力運用形式－中國將使用各型潛艇及轟炸機及「飛豹」殲轟機和新購之 SU-27 戰機等，遂行以海上、空中以及水下作戰。藉三層次整體作戰，奪取海上主動權。⁹⁸</p>
遠海區(Far Zone)	<p>範圍－阿拉夫佐夫的概念為：陸基中程轟炸機、魚雷機、輕型戰艦等可發揮效用的區域。1950 年代中</p>	中層近海機動區	<p>範圍－離岸一百五十海浬至三百海浬(270-550 公里)以內的海域。⁹⁹</p> <p>艦隊部署與兵力運用形式－將以</p>

⁹⁵ 此表關於蘇聯海軍的防禦區域概念與部署內容，主要是 1950 年代劉華清留學時的形式，以顯示劉華清受蘇聯影響之後的類型，而非 1966 年以後的藍帶防禦部署，儘管後者是防禦區域的擴張運用。Herrick, *Soviet Naval Theory and Policy*, op. cit., pp. 181-182; Herrick, *Soviet Naval Theory and Policy*, op. cit., pp. 63-64.

⁹⁶ 此表關於中國海軍的區域防禦部署內容轉引自廖文中，「中共廿一世紀海軍戰略對亞太區域安全之影響」，廖文中主編，**中共軍事研究論文集**(臺北：中共研究雜誌社，2001 年)，頁 99。與柯爾引用的張連忠文章由於有時代上的差異，故在內容上有些許差異，將在內文中引註說明。

⁹⁷ 張連忠原文僅指第一島鏈周邊的海域範圍。

⁹⁸ 在張連忠的原文裡，由於當時中國尚未取得飛豹(殲轟七)與 Su-27 等 1992 年以後才陸續引進的較先進戰機，故其主要依靠傳統核子動力潛艦和海軍航空兵實施縱深防禦，並在敵軍交通線上佈雷。

⁹⁹ 在張連忠文章內，範圍指的卻是海岸線外 150 浬內，而且在大多數情況中並不延伸至第一島鏈周邊。不過對於兵力部署方式與主戰兵種的描述相同。

	<p>期：離岸約 300-400 哩（約 500-650 公里）。</p> <p>艦隊部署與兵力運用形式(1950 年代中期)—擁有強大防空系統的水面戰艦、潛艦、偵察機與長程轟炸機。不過因缺乏航艦，只能使制海權處於爭奪狀態。</p>		<p>多用途護衛艦和導彈護衛艦等大型作戰艦艇為主，集中兵力，擊滅敵艦艇部隊。</p>
<p>近海區(Near Zone)</p>	<p>範圍—能夠使用陸基戰鬥機與輕型魚雷機密集支援海戰的近距離區域。1950 年代中期：海軍陸基戰機能提供空中保護的最遠距離，約 100 哩(約 160 公里)。</p> <p>艦隊部署與兵力運用形式(1950 年代中期)—海軍岸防火砲與飛彈連、防禦性佈雷、小型與大型水面艦艇，及所有戰術性潛艦，是蘇聯海軍必須確保制海權的區域。</p>	<p>內層防禦區</p>	<p>範圍—海岸線起至一百五十海哩(270 公里)以內的海域。¹⁰⁰</p> <p>艦隊部署與兵力運用形式—使用各型快艇、砲艇及導彈艇為主，結合海岸反艦導彈兵力實施海上防禦作戰。</p>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相關資料自行繪製。

從表 6.2 的比較可發現，中國海軍的區域縱深防禦與蘇聯海軍在概念上頗為類似，差異處則在於範圍的確實距離，以及國家形勢、時代和科技差異在遠海區

¹⁰⁰ 張連忠的文章對內層防禦區的範圍是海岸線外 60 哩。由於他發表文章時中國海軍尚未得到冷戰結束後獲得的先進戰機，故他宣稱內層防禦區是海軍防空兵主力負責的區域。

/中層近海機動區與開放洋面區/外層機動區等兩個區域所造成的兵力任務型態。誠然，張連忠與劉華清等人不同，他沒有到過蘇聯留學，因此很難說他的縱深防禦戰略直接受到蘇聯海軍的影響。不過，蘇聯海軍的作戰部署乃是阿拉夫佐夫將軍(Admiral V. A. Alafuzov)在 1946 首先提出防禦區域(Zones of Defense)概念，雖然提出後在蘇聯海軍內部引發激烈的辯論，但由於此一概念相當符合蘇聯海軍自 1930 年代後期以來根據柯白的存在艦隊理論所發展的，以劣勢海軍依靠積極防禦奪取近海的有限制海權(limited command of the sea)的「積極存在艦隊」(“active” fleet-in-being)戰略思想，到 1953 年已經成為蘇聯海軍的主要作戰部署，¹⁰¹因此劉華清與其他 1953 年以後在蘇聯留學的中國海軍軍官，很可能都學習了蘇聯海軍的防禦區域概念，並在日後引入中國海軍。由於中國海軍同樣屬於劣勢海軍在近海乃至沿海作戰，而且接受積極防禦戰略指導，故可能非常容易接納此種概念，並根據當時中國海軍物質能力加以修正運用。

另外，張召忠、杜朝平等中國海軍戰略學者都認為中國海軍的重要戰略任務之一是為拱衛陸上國土創造安全縱深，¹⁰²在這種基本任務的要求下，「近海區域防禦」就被中國海軍視為國家海上安全的基本保證，認為根據國家利益需求和海軍作戰能力的發展，海軍戰略防禦範圍應逐步擴大。¹⁰³這種思維基本上也與阿拉夫佐夫所說的「海上戰爭的本質就是一方盡可能擴大其所能長期控制的區域，最終包含整個戰區」¹⁰⁴的概念符合。而與此相關的是蘇聯海軍的「海軍障地」概念對中國海軍的影響。這是附屬於阿拉夫佐夫提出的劣勢海軍的海上障地戰與防禦區域概念下的一個作戰概念，藉由平時對所需防禦的戰場環境的完善經營，以求在戰時能迅速完成戰略目標的作戰概念而非真正的防禦據點，本質上只是陸地防禦向海洋的延伸，高西科夫便曾指定北大西洋東北部與挪威海中，由格陵蘭(Greenland)經冰島至英國的所謂GIUK缺口(GIUK gap)，及鄂霍次克海(Sea of Okhotsk)、日本海(Sea of Japan)為大型「海軍障地」。¹⁰⁵

中國海軍的海軍障地經營，包括廖文中指出的以「近海防禦」戰略及任務指導海軍建設，兵力建設朝向「合理結構均衡提高戰力」；戰場建設著重中國沿岸戰略性城市防禦、重要港口經營與熟悉太平洋第一島鏈海域特性；裝備建設根據海洋戰區特點、海軍作戰特性規劃各型機艦建設，增強協同作戰能力。¹⁰⁶另外，中國海軍曾在 1997 年十五大期間提出在 21 世紀因應現代作戰體制和戰略防禦體系的兵力調整與改革計畫，欲將原有的北海、東海、南海三個艦隊整併為「中國東海艦隊」與「中國南海艦隊」，分別負責西北太平洋與南海至麻六甲海峽的戰略防禦任務，以在東部和南部各形成一個相對獨立、完善配套和相呼應的海戰場

¹⁰¹ Herrick, *Soviet Naval Doctrine and Policy*, op. cit., pp. 62-63.

¹⁰² 蔡偉，「禮儀之師的航母夢」，前引文；杜朝平，「島鏈對中國海軍的影響有多大」，*艦載武器*(河南省鄭州市)，第 5 期(2004 年)，頁 40。

¹⁰³ 徐起，「21 世紀初海上地緣戰略與中國海軍的發展」，*中國軍事科學*(北京市)，第 17 卷第 4 期(2004 年 8 月)，頁 80。

¹⁰⁴ Herrick, *Soviet Naval Theory and Policy*, op. cit., p. 182.

¹⁰⁵ *Ibid.*, pp. 186-187.

¹⁰⁶ 廖文中，「中共躍向遠洋海軍戰略」，*中共研究*，第 28 卷第 12 期(1994 年 12 月)，頁 52。

體系，其中東部以舟山為中心，青島和三都為兩翼，南部則以榆林為中心，湛江和西沙為前後縱深，並以南沙諸島為前沿基地。¹⁰⁷雖然此一調整計畫迄未實施，¹⁰⁸但從中國海軍擴建山東姜哥庄基地與海南三亞港，並頻頻派出海測船測繪海洋地圖的等行動來看，中國海軍可能有意將山東半島以南的黃海結合東海地區，以及南海北部各作為「海軍陣地」。¹⁰⁹

目前的中國海軍已經與蘇聯海軍一樣，認為最重要的目標是獲致戰略制海權，否則將會失去戰略主動權，導致既無法確保中國的海上安全與利益，也難以維護中國的大國地位，¹¹⁰將戰略性制海權的爭奪由海軍本身的戰略議題提升至攸關國家威望的大戰略層面。故中國海軍已經出現極具攻勢特徵、且範圍延伸至「遠海」的戰略主張，例如發展海軍的「外線作戰」攻擊能力，以使其有能力在 1000 哩的距離上攔截和打擊敵方，並擁有在戰時控制朝鮮海峽、琉球群島諸海峽、巴士海峽、馬六甲海峽、龍目海峽、巽他海峽和菲律賓群島間諸海峽的能力，享有進出大洋的自由權。¹¹¹這樣的攻勢主張依然只是與蘇聯海軍一樣最多控制周邊海域的戰略制海權、在遠洋維持爭奪制海的有限制海權的戰略守勢、作戰攻勢的態勢，仍不脫積極防禦、防禦區域與海軍陣地等舊有的戰略本質，¹¹²並與中國整體國防戰略的積極防禦主張相符，目的是防止海權對其在大陸上的行動與安全，和威脅其海上利益，¹¹³實為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標準特徵。此種以支援陸軍作戰為核心目標而非對海上交通線建立控制的制海權概念，不可避免地會限制海軍朝遠洋發展並發展出控制海上戰略交通線的海洋戰略的決心與意志，且反而會因為為了達成支援陸軍作戰的目的而發展出來的區域防禦手段，進一步成為雖然擁有大艦隊，卻只能在陸基空中武力支援下活動、最多於近海建立控制的真正「近海」海軍。

此種「領域劃分」雖然在紙上很有吸引力，但對於海權不僅有損，而且根本行不通，假使一個海權只能在公海上盤旋，而不能接近任何陸基空中武力航程內的敵岸，則根本不能視為海權，¹¹⁴但中國海軍的海上陣地戰覆蓋範圍以東海和黃海來說，卻又正好是其海洋國土之範圍與海上交通線所經之處，而要求擁有在戰時控制朝鮮海峽、琉球群島諸海峽、巴士海峽、馬六甲海峽、龍目海峽、巽他海峽和菲律賓群島間諸海峽的能力，則完全符合控制連接東北亞與東南亞的海上戰略交通線，並將菲律賓海(Philippine Sea)作為保護第一島鏈內緣海的戰略延伸的組織東亞地緣戰略領域的必要條件。

¹⁰⁷ 廖文中，「中共廿一世紀海軍戰略對亞太區域安全之影響」，前引文，頁 103-107。

¹⁰⁸ 迄今為止中國海軍還是維持三大艦隊的編制，不過根據 2011 年 12 月 5 日的國際先驅導報的報導，似乎有「不具名」的軍事專家再度倡議中國應組建自己的「太平洋艦隊」，才能成為真正的海洋國家。見海韜，「中國海軍應打造“太平洋艦隊”」，新華網轉引國際先驅導報，2011 年 12 月 5 日，http://news.xinhuanet.com/herald/2011-12/05/c_131284309.htm。

¹⁰⁹ 王俊評，「制海權與中國海軍戰略」，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11 卷第 1 期(2010 年 1 月)，頁 152-153。

¹¹⁰ 劉一建，「中國未來的海軍建設與海軍戰略」，戰略與管理(北京市)，第 5 期(1999 年)，頁 97。

¹¹¹ 同上註，頁 97-98。

¹¹² 王俊評，「制海權與中國海軍戰略」，前引文，頁 156。

¹¹³ 杜朝平，「島鏈對中國海軍的影響有多大」，前引文，頁 40。

¹¹⁴ 鈕先鍾譯，Herbert Rosinski 著，「第二次世界大戰海權的擴張」，前引文，頁 63。

三、以陸制海的海洋戰略

第二種與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相符的特徵是以陸制海的海洋戰略。海上縱深防禦本身就是一種以海制陸的表現，蓋其相當倚賴陸基武力與陸基海岸防禦的力量來實施近海的海上阻絕與近岸的有限制海。不過中國的地緣戰略也展現出三種深具地理攻勢意涵、與第一節的分析相符合以陸制海特徵，第一是利用與中亞國家、中南半島國家之間的次區域經濟整合與陸上交通線建設，包括國際鐵公路、油氣管與國際河流運輸等方式，在達成「西部大開發」、創造穩定的週邊環境與降低對印度洋—麻六甲—南海海上交通線依賴的同時，影響這些參與整合與受益於新陸上交通網的陸上鄰國的政治態度，甚至可能進一步將中南半島納入其勢力範圍，以組織東亞地緣政治領域，完成其地緣政治標準程序。¹¹⁵第二個特徵則比較不具有上述的複雜國際政治經濟意涵，但遠比第一個具明顯的軍事意涵—利用取得臺灣來破解海權的海上圍堵與防衛中國的東南沿海精華區。至於第三種特徵則是藉由與周邊陸地鄰國的各種戰略與經濟合作，形成以中國為中心的大陸集團，牽制以美國為核心的海洋集團對中國在東亞周邊海域擴張的對抗行動。

(一)、臺灣與中國海洋戰略中的地理攻勢

許多中國戰略菁英都認為取得臺灣對於中國能否成為真正的海洋強國相當重要，因為中國周邊三個緣海皆是被第一島鏈包圍的半封閉海域，而中國地緣政治特徵中的所有精華區與政治核心皆面向這三個緣海。對中國來說，臺灣的戰略價值在於由於其位置正當第一島鏈中央，取得臺灣首先就能在臺灣與海南島之間形成一道拱衛中國東南沿海的海洋地區，將其作為保護中國東南沿海經濟「軟腹」的屏障，並有助中國解決南海問題。¹¹⁶其次，取得臺灣能使中國打破美國利用第一島鏈對中國的「圍堵」與海洋安全威脅，使中國海軍具備真正進入太平洋的前進基地和保衛中國在東南沿海的海上交通線暢通，避免為美國所截斷，並以臺灣的樞紐地位協助中國解決海洋領土防衛、專屬經濟區保護、確保進入太平洋的戰略通道，以及不間斷地控制麻六甲海峽附近南海海域的鄰近國家海域等四個方面的安全問題。¹¹⁷此種概念可謂是魏格勒「地理攻勢」思想的呈現。

嚴格說來中國的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只有對臺灣的構想屬於地理攻勢，包括在泰國南部「克拉地峽」(Kra Isthmus)開鑿可繞過麻六甲海峽的「克拉運河」(Kra Canal)在內的所謂「珍珠串」(String of Pearls)戰略概念—共有位於肯亞的「拉穆」(Lamu)、馬爾地夫的「馬勞」(Marao)、巴基斯坦的「瓜達爾」(Gwadar)、斯里蘭

¹¹⁵ Alex Liebman, "Trickle-down Hegemony? China's 'Peaceful Rise' and Dam Building on the Mekong,"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27, No. 2(August 2005), pp. 281-304; 李文志、蕭文軒，「大湄公河流域爭霸戰：大湄公河經濟合作的推展及其戰略意涵」，*臺灣東南亞學刊*，第2卷第1期(2005年4月)，頁101。

¹¹⁶ 張文木，*論中國海權*，前引書，頁102；張文木，「中國海洋安全防務重心在東海」，前引文。

¹¹⁷ 劉新華，「試論中國發展海權的戰略」，頁71-72；江雨，「島鏈與中國海軍向遠洋的發展」，*艦載武器*(河南省鄭州市)，第12期(2008年)，頁31；杜朝平，「島鏈對中國海軍的影響有多大」，前引文，頁40；Chris Rahman, "Defending Taiwan, and why it matters,"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 54, No. 4(Autumn 2001), p. 77.

卡的「漢班托塔」(Hambantota)、孟加拉的「吉大港」(Chittagong)、緬甸的「實兌」(Sittwe)、經由寮國連接雲南的鐵路線以及克拉運河¹¹⁸並非地理攻勢的展現。首先，開鑿克拉運河雖然可能使中國得到繞過麻六甲海峽的新海上交通線，但也只是創造出一個未必接受中國控制的新扼制點，而非如臺灣那樣屬於能夠使中國海軍完全不經任何阻礙便可通往大洋的真正地理位置。其次，珍珠串戰略概念表達的其實是英國與美國海權對全球海上戰略交通線控制的基地體系，屬於純粹的傳統海軍戰略理論概念而非大陸國家衍生的地理攻勢概念。

(二)、與其他大陸國家的以陸制海戰略合作

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中依靠外平衡舒緩海權的壓力，以及利用大陸內線位置試圖繞開海權控制下的扼制點並威脅海權在扼制點以外的後方海上戰略交通線控制的兩種方法，在當代中國的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中也可發現，但性質略有差異。首先也是最具有強權政治(power politics)意涵的，是中國與俄羅斯之間的戰略合作關係，但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究竟不是真正的軍事同盟，雖然主要目標是國際體系的多極化與反對美國的單邊主義，卻沒有針對共同對抗美國的軍事戰略合作條款存在，上海合作組織同樣不具有這樣的功能，事實上北京本身也不支持增強上海合作組織與成員國幾乎一致的「集體安全條約組織」(Collective Security Treaty Organization, CSTO)¹¹⁹之間的軍事關係，¹²⁰使得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與上海合作組織雖然給予雙方在應付來自美國的戰略壓力時重要的緩衝，卻不是古典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中標準的以陸制海手段，但符合冷戰後，以同盟、戰略合作作為防範其他競爭對手在區域與體系中取得相對於自身的戰略優勢的新權力平衡概念的當代以陸制海手段。

不過從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又可看出另一種當代中國地緣戰略中繼承自古代的戰略遺產，以及明顯的大陸性格，前者即中國古代自畿服制度以來，對外國進行嚴格親疏關係劃分的行動。儘管這種劃分不能完全精確表現出中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的關係全貌，因而甚少為學者所碰觸，即使是鑽研中俄、中印、印俄等三大亞洲戰略夥伴關係的納德卡尼(Vidya Nadkarni)也只提出戰略夥伴關係的性質與特徵，並沒有分析中國夥伴關係中的等級劃分。但從中國對外交關係親疏的劃分亦可看出中國的地緣戰略競爭對手、合作夥伴與地緣戰略屬性。

鄭宇碩(Joseph Y. S. Cheng)和張萬坤(Zhang Wankun)列出了中國在冷戰後建

¹¹⁸ 佩爾森(Christopher J. Pehrson)在 2006 年的報告中只有永興島、瓜達爾、吉大港與實兌，其他「珍珠」見出現在《華盛頓時報》(Washington Times)在 2005 年引述美國國防部報告內容的報導，該報導是美國國防部首次提出「珍珠串」的概念。“China Builds up Strategic Sea Lanes,” *The Washington Times*, January 17, 2005, <http://www.washingtontimes.com/news/2005/jan/17/20050117-115550-1929r/>; Christopher J. Pehrson, “String of Pearls: Meeting the Challenge of China’s Rising Power Across the Asian Littoral,”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http://www.strategicstudiesinstitute.army.mil/pdffiles/pub721.pdf>, p. 3.

¹¹⁹ 這是 2002 年 10 月，俄羅斯、白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與亞美尼亞等六國，在獨立國家國協原有的「集體安全條約」(Collective Security Treaty)的基礎上成立的軍事同盟組織，烏茲別克在 2006 年加入，因此目前共有七個會員國。而七個會員國中除了白俄羅斯與亞美尼亞之外的其餘五國都是上海合作組織的正式成員。

¹²⁰ Vidya Nadkarni, *Strategic Partnership in Asia: Balancing without alliances* (London: Routledge, 2010), p. 75.

立的各種「夥伴關係」的等級，在他們的分析中，中國似乎是綜合一個國家與中國的雙邊關係、有無存在重大利益衝突或安全威脅、能否成為中國推展多極化的幫助，以及該國在全球體系中的全球或區域地位，來決定與該國建立何種夥伴關係。¹²¹但是鄭氏與張氏並沒有解釋為什麼要賦予不同的夥伴關係名稱。**韓國聯合通訊社**在 2008 年 5 月在南韓總統李明博訪問中國後刊登一篇從中國外交用語解析中國親疏外交的文章，該文指出中國自 1996 年起開始將與中國建交的國家關係分為單純建交、睦鄰友好、夥伴、傳統友好合作以及血盟等五種親疏關係，其中夥伴關係又可細分為合作夥伴、建設性夥伴關係、全面合作夥伴、戰略夥伴、戰略合作夥伴、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等。這六大項關係的親疏差異在於名稱中是否存有「戰略」一詞，因為夥伴關係中的戰略概念意味著共同討論世界經濟問題並在軍事合作以及國際舞台上展開合作，很明顯地遠高於單純的經濟合作關係而進入更為全面的雙邊關係。此外，無論是在有「戰略」或無「戰略」的兩大夥伴關係類型中，進一步決定更細微差異的是「合作」與「全面」，因此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是最高等級的夥伴關係，其次是戰略合作夥伴與戰略夥伴。在無戰略關係的夥伴關係中，全面合作夥伴關係是最高級的，其次是建設性夥伴關係，最後才是單純的合作夥伴關係。¹²²

然而這篇文章並沒有提到中國與俄羅斯在 1996 年建立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這一「協作」夥伴關係由於同時包含了「協調」與「合作」的目的而超越了上述六種只單純存在「合作」的夥伴關係，成為最高等級的夥伴關係；同時，它也沒有提到中國與巴基斯坦在 2005 年建立的「全天候戰略合作夥伴關係」，這種戰略夥伴關係雖然低於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但由於其性質為不分任何情況的「全天候」，顯然又高於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雖然俄羅斯身為中國的體系/次體系層級地緣政治密碼對象而建立最高等級的夥伴關係，但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卻不是同為體系層級密碼的歐盟或任何歐洲國家，而是中國周邊的越南(2008)、寮國(2009)、柬埔寨(2010)、緬甸(2011)，以及甫於 2012 年 4 月才將夥伴關係由原先的「戰略性合作」提升至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的泰國，全部皆為中南半島國家，而且除了泰國之外，其餘全都是與中國擁有第二級「傳統友好合作關係」的國家。歐盟、法國則與哈薩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此外，中國還與印度(2006)、哈薩克(2011)建立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又與蒙古建立戰略夥伴關係(2011)，中國的陸地鄰國與亞太的亞洲大陸國家中，沒有與中國建立戰略夥伴關係以上的夥伴關係者，僅有保持第二級傳統友好合作關係的北韓、烏茲別克、吉爾吉斯、塔吉克、尼泊爾與不丹。

反過來說，中國與亞太的海洋國家則沒有這麼強的戰略夥伴關係。雖然中國與印尼、加拿大在 2005 年建立戰略夥伴關係，又在 2008 年將與南韓的夥伴關係提升至戰略合作關係，但這已經是中國與亞太海洋國家之間最高程度的戰略夥伴

¹²¹ Joseph Y. S. Cheng and Zhang Wankun, "Patterns and Dynamics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Behavio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1, No. 31(May 2002), pp. 244-250.

¹²² 「韓聯社：透過外交用語解讀中國的親疏外交」，轉引自**中國網**，2008 年 5 月 29 日，http://www.china.com.cn/international/txt/2008-05/29/content_15527347.htm。

關係。馬來西亞雖然與中國有相當友好的關係，卻沒有建立任何夥伴關係，同樣的情況亦發生在中國與澳洲的關係；菲律賓則僅在 2005 年與中國建立「戰略性合作關係」；中國雖然在 2008 年將與日本的關係由 1990 年代的「友好合作夥伴關係」提升至「戰略互惠關係」，但仍不是戰略夥伴關係。中國與最大地緣政治密碼競爭對手的美國之間的夥伴關係則經歷了相當大的變化：由 1997 年確立要致力於「建立面向 21 世紀的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到 2005 年 11 月的「21 世紀中美建設性合作關係」，連夥伴都不是，雖然 2009 年 11 月美國總統歐巴馬 (Barack Obama) 訪華時提出「應對共同挑戰的夥伴關係」(partnership to address common challenges)，¹²³雙方並在 2011 年 1 月 19 日確認「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合作夥伴關係」(cooperative partnership based on mutual respect and mutual benefit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common interests of both countries)，¹²⁴但迄今仍無恢復建立戰略夥伴關係的跡象。最後，中國與東協也沒有建立戰略夥伴關係。

戰略夥伴關係的建立情況與層級，顯示中國的外交親疏關係有兩大特徵，第一是較高等的夥伴關係與外交關係集中於冷戰以來的擁有長期傳統友誼，或者對中國的多極化最終目標具有明顯幫助的國家，顯示「友誼」仍對中國有很高的情感價值；第二則是對中國的地緣戰略目標具有高度重要性者，例如哈薩克，但五個中南半島國家如下所分析，亦是中國建設陸上新國際交通線的主要目標。此外，中國的戰略夥伴關係集中相當大的精力於拉攏俄羅斯實施以陸制海，特別是制衡美國與日本，而且具有極為濃厚的大陸重心特徵，對於海洋的經營發展仍不如對大陸的經營與發展。

(三)、周邊區域經濟整合與陸上新國際交通線建設

對中國來說，組織東亞地緣戰略領域中可能更為重要的，但較不具備強權政治意涵的，也較不會引發與周邊強國發生嚴重衝突的作為，是與周邊中亞、東南亞陸地鄰國之間的區域經濟整合，以及連接中國與這些鄰國間的新跨國大陸交通線建設。但這些行動不僅具備地緣經濟意涵而已，另一個相當重要的因素則是中國經濟發展上的能源與資源安全，蓋中國的海上戰略交通線控制能力既然遠遠不及海權，迫使其必須尋求額外的安全能源運輸路線，以降低對極可能在臺海危機與美中衝突中遭到嚴重切斷威脅的印度洋—南海海上能源運輸的依賴，東亞與歐亞大陸心臟地帶遂成為相當重要的替代途徑。而這又與中國的西部大開發計畫以及中國與東協的區域和次區域經濟整合等經濟因素密切相關，蓋歐亞大陸心臟地帶、中國西部地區與中南半島中北部雖有豐富的能源與其他天然資源蘊藏，以及潛力龐大的市場，但皆缺乏良好的基礎建設網連接資源生產地與市場，無法真正發揮陸地權力相對於海洋權力的內線優勢。中亞地區雖有蘇聯留下之鐵路網與基礎建設，但需要通過俄羅斯才能連結中國與歐洲市場，1990 年貫通的「新歐亞大陸橋」雖為中國與中亞、西亞經貿合作的重要新通道，但是該條路線基於多方

¹²³ “U.S.-China Joint Statement,” *The White House*, November 17, 2009,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us-china-joint-statement>.

¹²⁴ “U.S.-China Joint Statement,” *The White House*, January 19, 2011,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1/01/19/us-china-joint-statement>.

面的問題所導致的運輸能力低落，又其主要路線必須透過俄羅斯連接中國與歐洲，¹²⁵而俄羅斯的國家主義又限制了中國對這條路線的依賴，迫使中國思考興建新陸上交通線的必要性。¹²⁶

因此交通建設成為中國西部大開發的「重中之重」，不僅強調改善國內「大通道」的建設，中國更希望立足國內通道，開闢國際通道，西部地區國際大通道建設成為中國進一步發展與東南亞、南亞和中亞區域經濟合作的前提。¹²⁷相對於海上控制能力的不足，中國對陸上交通線建設的能力則強上許多。換句話說，新的大陸交通線建設不僅與中國西部大開發的成敗密切相關，而且是中國與陸地鄰國合作的重要內涵。當然對俄羅斯這種次體系強權以外的其他中國陸地鄰國來說，加入中國的跨國新大陸交通線建設未必含有協助中國「以陸制海」，或本身也希望利用中國來對美國、日本「以陸制海」的目的，最大目標多只是單純希望發展本國經濟，可是對中國來說則具有這樣的明顯戰略意涵。相關的陸上交通線建設與控制共分三部分：第一部份是傳統的「非正式」帝國建立手段－跨國鐵路與公路建設之外，第二部分則是 20 世紀中葉以來越來越普遍與常見的新陸上交通線－國際油氣管線的建設，至於第三部分則針對連接中國境內與中南半島的瀾滄江－湄公河國際河道。

1. 跨國鐵路建設

這是中國陸上交通線建設中最主要的重點，而其中的重點又在於西北與西南地區的跨國鐵路建設，二者皆屬所謂的「泛亞鐵路」之一部分(圖 6.3)：西南地區由昆明出發、連接中南半島五國並通達新加坡的跨國鐵路網被另稱為「東南亞走廊」，而西北由連接新疆與中亞、俄羅斯的鐵路網則屬於「新歐亞大陸橋」的一部份。

無論是「泛亞鐵路」的概念與計畫本身或東南亞走廊的概念，都不是中國首先提出，前者最早是聯合國亞洲及太平洋經濟社會理事會(U.N.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UNESCAP)在 1960 年代所提出，是全長超過 14,000 公里、連接新加坡與土耳其伊斯坦堡，並延伸至歐洲與非洲的龐大洲際鐵路網，¹²⁸後者則是前馬來西亞首相馬哈蒂(Mahathir Mohamad)在 1995 年 12 月第五屆東協高峰會上所提出，其原始目的是藉由興建由昆明至新加坡，連接中國、緬甸、泰國、寮國、越南、柬埔寨、馬來西亞與新加坡，總長約 5,500

¹²⁵ 新亞歐大陸橋在哈薩克境內的北部路線需要與西伯利亞鐵路相連才能以最短路線進入歐洲。不須利用西伯利亞大鐵路的南部路線是 1996 年以後開通，需繞經伊朗與土耳其才能進入歐洲，同時某些伊朗與高加索地區還必須使用渡輪越過大型內陸湖泊與黑海。Shigeru Otsuka, "Central Asia's Rail Network and the Eurasian Land Bridge," *Japan Railway & Transport Review*, No. 28(September 2001), pp. 43-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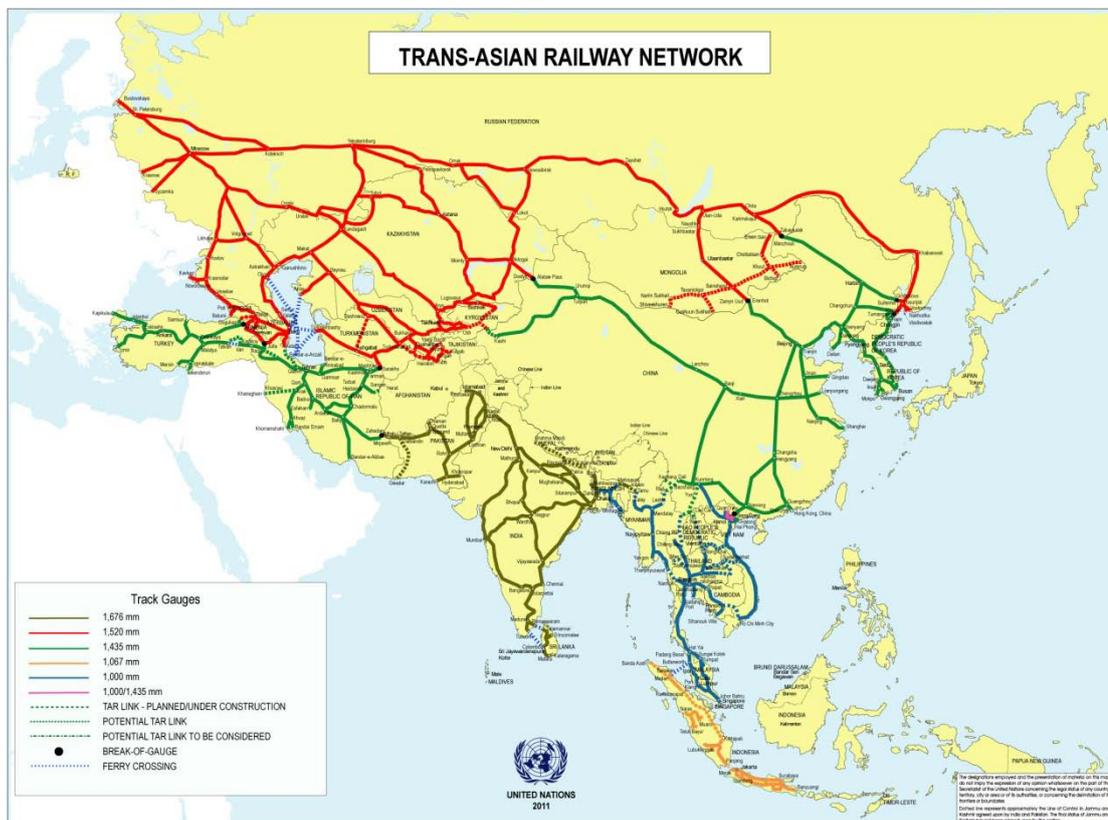
¹²⁶ 胡鞍鋼主編，**地區與發展：西部開發新戰略**(北京：中國計畫出版社，2001 年)，頁 203；曹宏威，「新【歐亞大陸橋】」，**科學網**，2011 年 12 月 12 日，<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6708&do=blog&id=517607>。

¹²⁷ 胡鞍鋼主編，**地區與發展：西部開發新戰略**，頁 203。

¹²⁸ "About the Trans-Asian Railway," *UNESCAP*, <http://www.unescap.org/ttdw/index.asp?MenuName=TheTrans-AsianRailway>.

公里的國際鐵路網，一方面發展馬來西亞南部的港口以與新加坡競爭，¹²⁹另一方面則希望拉進日本、南韓與中國的力量，協助東協排除美國對東協想抗拒美國介入開發被東協視為「後院」的湄公河盆地(Mekong River Basin)的強烈反對。¹³⁰

圖 6.1 泛亞鐵路網



資料來源：“Trans-Asian Railway: The three-stage development,” UNESCAP, http://www.unescap.org/ttdw/common/TIS/TAR/images/tarmap_latest.jpg.

這些國際提案需要龐大的建設資金並克服多重國際軌道建設技術障礙，在 1990 年代中期以後更由於遭逢東南亞金融危機而限於停頓。中國因其迅速的發展與位居歐亞大陸和中南半島之間的中間位置，而逐漸成為這些歐亞大陸新陸上戰略交通線的建設中心。其中最主要的有兩部分，第一部份是中國為求降低對俄羅斯控制下的西伯利亞鐵路之依賴而與中亞的烏茲別克、吉爾吉斯合作進行的「中吉烏鐵路」，但目前尚未正式動工興建，其路線由新疆經烏茲別克、土庫曼與伊朗進入歐洲，而另一條類似路線則是哈薩克在 2005 年向中國提出的，連接中國新疆「精伊霍鐵路」(精河—伊犁—霍爾果斯)與伊朗、軌距與中國的標準軌同樣的境內鐵路建設計畫，「精伊霍鐵路」內的客貨運輸可不必因軌距差異更換

¹²⁹ Tony Allsion, “A new era in Asian shipping,” *Asian Times online*, September 2, 2000, <http://www.atimes.com/se-asia/BI02Ae06.html>.

¹³⁰ Donald E. Weatherbee,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in the Mekong River Basin,”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Vol. 20, No. 2(April/June 1997), p. 181.

列車，由哈薩克境內直通裡海，並進入土庫曼與伊朗，並通往歐洲，這兩條路線完成後可使中國與歐洲間的運輸不必再經由軌距完全不同的西伯利亞鐵路，¹³¹既能使中國進入歐亞大陸心臟地帶能源區，又可使中國與歐亞大陸的貿易擺脫俄羅斯境內路線的控制。

第二部分則是西部大開發中進一步與東亞次區域與區域經濟整合密切相關的「泛亞鐵路」東南亞走廊建設。由於東協乃是中國重要的市場與經濟發展資源來源之一，而中南半島又是中國降低對麻六甲海峽海上運輸依賴的最主要地區，使得此中國對泛亞鐵路東南亞走廊的關注甚至可能超越對歐亞大陸心臟地帶交通線建設關注。目前擬議的泛亞鐵路東南亞走廊路線，共包括東、西、中三條路線(圖 6.4)：東線—新加坡、吉隆坡、曼谷、金邊、胡志明市、河內、昆明；西線—新加坡、吉隆坡、曼谷、仰光、瑞麗、昆明；中線—新加坡、吉隆坡、曼谷、萬象、尚勇、祥雲(或玉溪)、昆明。¹³²三條路線皆將興建以完善整個中南半島鐵路網，其優缺點各為：¹³³中線營運里程最短(4,200 公里)，沿途經過的國家最多(新、馬、泰、寮)，又因為通往目前尚無鐵路的雲南南部，對該省農、礦、旅遊等資源的開發幫助較大，但寮國境內同樣沒有鐵路，故所需新建的鐵路最長(1,300 公里)；東線營運里程最長(5,500 公里)，又包含許多運輸能力低且成本高的窄軌鐵路，但可利用的既有鐵路網比例最高，需要新建的鐵路段最短(430 公里)；¹³⁴西線營運里程與所需新建的鐵路線皆介於前兩線之間(4,900 公里與 970 公里)，沿線可開發的礦產資源種類較多，貿易量也較大，但經過的地形最複雜，工程難度最高。最易實施的東線已於 2005 年 9 月正式動工，¹³⁵是最早動工的路線；難度最高的西線亦於 2007 年 3 月動工；¹³⁶以高速鐵路標準施工的中線亦已於 2011 年動工。¹³⁷

¹³¹ 李寶仁，「鐵路在地緣政治和周邊外交中地位和作用的思考」，*鐵道經濟研究*(北京)，第 3 期(2008 年)，頁 11；王為，「“十一五”規劃中的中國鐵路國際通道建設」，*大陸橋視野*(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烏魯木齊市)，第 2 期(2009 年)，頁 35。

¹³² 「中國力推泛亞鐵路，以求突破“馬六甲瓶頸”」，*新華網轉引國際先驅導報*，2005 年 8 月 22 日，http://news.xinhuanet.com/herald/2005-08/22/content_3388630.htm。

¹³³ 徐文洲，「中國繪製昆明至新加坡的泛亞鐵路三大路線藍圖」，*新華網*，2004 年 8 月 30 日，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4-08/30/content_1926487.htm。

¹³⁴ 另一種說法是根據東協的評估，東線只要新建東埔寨首都金邊至越南胡志明市不到 300 公里的鐵路，以及泰國東南部亞蘭(Aranyaprathet)至東埔寨西北部主要城市詩梳楓(Sisōphōn)約 48 公里的鐵路，即可全線貫通。「30 小時穿越東盟」，*東盟財經*，2010 年 6 月 9 日，<http://www.asean-info.com.sg/user/1338/125/2010699293883478.html>。

¹³⁵ 王晉，「泛亞鐵路東線明動工」，*文匯報*，2005 年 8 月 31 日，<http://paper.wenweipo.com/2005/08/31/CH0508310024.htm>。

¹³⁶ 李懷岩，浦超，「雲南加快泛亞鐵路大通道建設」，*新華網*，2007 年 3 月 25 日，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7-03/25/content_5892336.htm。

¹³⁷ 「中國·穿梭 8 國·中線動工·泛亞高鐵路 2020 年通車」，*星洲日報*，2011 年 4 月 25 日，<http://www.sinchew.com.my/node/202151?tid=2>。

圖 6.2 泛亞鐵路東南亞走廊與中國雲南省境內相接鐵道網



資料來源：藍科銘，「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研究」，臺灣區機器工業同業公會，2011年11月20日，http://www.tami.org.tw/sp1/market/market_1001220-5.pdf，頁34。

中國希望藉由泛亞鐵路東南亞走廊搭配已經通航的瀾滄江－湄公河國際航道，以及現已完成的昆明－曼谷國際高速公路和未來即將完工的昆明－仰光高速公路網，形成中國西南部與中南半島的水陸交通網絡，擴大中國西南部與大湄公河地區的交往與連結，並將泛亞鐵路的作用配合其終點站新加坡，進一步向南與向東延伸至印尼、澳洲與菲律賓，最終達成中國與東協三分之一貿易額經由泛亞鐵路與國際公路系統完成的目標。¹³⁸然而，泛亞鐵路網迄今所有開工建設的路段皆位於中國境內，東協境內路段只有寮國境內有開工跡象—中國與寮國曾進行先

¹³⁸ 「30小時穿越東盟」，前引文。

期工程，¹³⁹該國亦宣布將在 2012 年開工，但是否真能順利進行仍在未定之天。¹⁴⁰換言之，東協境內段的高難度挑戰使得上述的泛亞鐵路夢想對中國來說似乎仍遙不可及。¹⁴¹但某些中國學者卻提出一個比泛亞鐵路更富雄心的新陸地戰略交通線建設構想，亦即透過上述的泛亞鐵路東南亞走廊，進一步由緬甸延伸進入南亞、西亞並進入歐洲，形成連結中國以深圳為中心的廣東沿海港口，和荷蘭鹿特丹港的「第三亞歐大陸橋」，作為通過印度洋地區的新通道之一。¹⁴²雖然印度已於 2012 年 4 月加入泛亞鐵路政府間協定，並決定興建連接緬甸與印度的 350 公里鐵路，¹⁴³不過既然連泛亞鐵路都尚未真正建成，「第三亞歐大陸橋」更只是一個幻影，即使能如預期在 2025 年克服所有困難完工，由於這條「陸橋」穿越印度，中國實際上無法加以控制。

不過另外有兩個較具可行性且已經具備連接中國西部與南亞初步規模的新大陸交通網。第一個是於 2006 年 7 月全線通車的青藏鐵路，中國在 2008 年 4 月承諾尼泊爾政府，將在五年內完成由拉薩經日喀則連接尼泊爾邊境城鎮、位於首都加德滿都(Kathmandu)北方約 20 公里的加次的延伸線，不過尼泊爾政府在 2009 年 10 月對中國政府提出新要求，希望能將該延伸線進一步延伸至加德滿都。¹⁴⁴目前日喀則延伸線已於 2010 年 9 月正式動工。¹⁴⁵第二個中國與南亞的新大陸交通網是從中國新疆的喀什噶爾起，穿越巴基斯坦控制的喀什米爾之後，由北向南縱貫巴基斯坦並抵達中國在巴基斯坦印度洋海岸上建設的瓜達爾港深水港的跨國鐵路線。巴基斯坦極力向中國遊說興建這條路線的重要性，¹⁴⁶然而這條鐵路因為地質因素的影響而導致技術困難度極高，又有引發戰爭的危險，而且運費高昂，沿途經過的地區經濟規模也遠不如中國東南沿海與西南地區，本益比並不高，因此不如泛亞鐵路網東南亞走廊那樣受到中國的重視，一開始並沒有列入

¹³⁹ 「泛亞鐵路建設或暫擱淺，設計時速遭質疑」，前引文。

¹⁴⁰ 「穿越泛亞鐵路網，中國高鐵布局對接周邊」，*中國出色經濟網*，2012 年 2 月 29 日，<http://www.cswe.org.cn/jiaotong/1444.html>。

¹⁴¹ 梁嘉桓，「大陸建構泛亞鐵路網，東協成最大挑戰」，*電子時報(DIGITIMES)*，2011 年 11 月 1 日，http://www.digitimes.com.tw/tw/dt/n/shwnws.asp?CnIID=&id=0000247412_OP531X3W2G681O1Q0DPQX&ct=1&OneNewsPage=2&Page=1&query=。

¹⁴² 周雷，「第三亞歐大陸橋構想浮出」，*新華社瞭望週刊社*，第 47 期(2007 年)，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1w.xinhuanet.com/htm/content_1762.htm。

¹⁴³ Kumod Verma, "India agrees to be part of Trans-Asian Railway Network," *The Times of India*, April 1, 2012, <http://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city/patna/India-agrees-to-be-part-of-Trans-Asian-Railway-Network/articleshow/12488320.cms>.

¹⁴⁴ "96% of netizens support Qinghai-Tibet Railway extension to Nepal," *People's Daily Online*, October 15, 2009, <http://english.people.com.cn/90001/90776/90883/6784371.html>.

¹⁴⁵ 顏圓圓、張亞東，「青藏鐵路首條延伸線拉日鐵路開工建設」，*新華網*，2010 年 9 月 26 日，http://news.xinhuanet.com/society/2010-09/26/c_13530616.htm。

¹⁴⁶ Debasish Chaudhuri, "China-Pakistan Railway Project," Vivekananda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http://www.vifindia.org/China-Pakistan-Railway-Project>; "Pak-China discuss rail line to connect Pok with Xinjiang," *The Times of India*, September 4, 2011, http://article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2011-09-04/china/30112339_1_xinjiang-east-turkistan-islamic-movement-etim.

中國的國家《中長期鐵路網規劃》。¹⁴⁷再加上這條鐵路必須穿越巴基斯坦控制的喀什米爾，可能引發印度的敏感反應，因此目前仍未真正動工興建。¹⁴⁸

2. 油氣管線

雖然中國極力建設連結周邊陸上鄰國的陸上鐵公路與國際河流交通線，但其在地緣政治中受到的關注反不如交通線性質較低的國際油氣管線，後者因與中國的能源戰略相連而受到最多國際關注，但其敏感性也遠高於上述的鐵公路建設而容易引發大國之間的地緣政治競爭，截至目前為止，中國極力從俄羅斯、中亞與緬甸建設油氣管以運輸能源，試圖降低對對印度洋與南海海上交通線的依賴。不過雖然中俄雙方目前維持良好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但仍對彼此有很高的疑慮與猜忌，故若僅以俄羅斯為中國陸上境外能源的唯一來源，將使中國非常容易受到俄羅斯的控制，而且俄羅斯通往中國的石油管線建設路線方向並不完全依照中國的意願，還受到其他亞太大國如日本的影響，¹⁴⁹而且中國在油氣管線中是接受端，很容易受到生產端的影響而未能真正對油氣管線實施控制，故這一方面的石油管線建設不是中國真正的以陸制海作為。

¹⁴⁷ 李富永，「三大戰略鐵路有急有緩，中巴中緬鐵路尚未立項」，*中華工商報*，2004年7月6日，<http://finance.sina.com.cn/g/20040706/0700852000.shtml>。

¹⁴⁸ 潘特(Harsh V. Pant)認為中國正在興建這條鐵路，不過截至目前為止，並未有這條鐵路已經正式動工興建的消息傳出。Harsh V. Pant, "The Pakistan Thorn in China-India-U.S. relations,"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35, No. 1(Winter 2012), p. 86.

¹⁴⁹ 這主要是指日本與中國在 2000 年代競逐俄羅斯西伯利亞與遠東石油管線的建設方向，二者都試圖使油管主要方向朝有利自己的方向。Spyridoula-Amalia Metallinou, "Energy Security: The Russian Trans-Siberian Pipeline and the Sino-Japanese Courtship,"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eptember 2006, http://www.idis.gr/GR/Ekpaideutika/hydra_papers/metallinou_amalia-spyridoula.pdf.

圖 6.3 中國能源主要進口路線與油氣管線建設計畫



資料來源：“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1,” *Department of Defense*, http://www.defense.gov/pubs/pdfs/2010_CMPR_Final.pdf, p. 38;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1,” *Department of Defense*, http://www.defense.gov/pubs/pdfs/2011_cmpr_final.pdf, p. 21.

中國在這方面最主要的管線建設主要有兩部分，第一是與其國內「西氣東輸」戰略結合的「西氣東輸二線」工程，建設由中亞的土庫曼、烏茲別克與哈薩克連接新疆，並由新疆通往廣州的天然氣管線(圖 6.6)，是中國第一條引入國外天然氣的管線，已在 2011 年全線正式供應。¹⁵⁰第二則是所謂的「中緬油氣管」(圖 6.7)。

¹⁵⁰ 西氣東輸二線西段工程—又稱「中亞—中國天然氣管線」(Central Asia-China Gas Pipeline)，由土庫曼與烏茲別克邊境起，穿越烏茲別克與哈薩克南部，抵達新疆霍爾果斯—較早完工，在 2009 年 12 月 31 日正式完工並運作供氣，東段由霍爾果斯穿越中國西北並折向南方的廣東與香港，則在 2011 年 6 月 30 日完工運作。“Central Asia-China Gas Pipeline,” *China National Petroleum Corporation (CNPC)*, http://www.cnpc.com.cn/en/aboutcnpc/ourbusinesses/naturalgaspipelines/Central_Asia%EF%BC%8DChina_Gas_Pipeline_2.htm; 「中亞天然氣直送珠三角」，*大公網*，2011 年 11 月 25 日，<http://www.takungpao.com/news/china/2011-07-01/861817.html>。

以重慶為首的中國西南部省市和中石化在 2005 即以「破解麻六甲困局」的理由，向中國國務院爭取建造連接重慶與緬甸的油氣管，¹⁵¹爾後中國在 2007 年與 2008 年先後獲得緬甸境內天然氣採購權並與緬甸政府簽署供銷協議後，¹⁵²便進一步於 2009 年 3 月與緬甸簽署油氣管的建設協議，¹⁵³並於 2009 年 9 月正式動工建造¹⁵⁴由緬甸皎漂(Kyaukpyu)港進入中國西南部雲南省、貴州、廣西、重慶各省市的油氣管。¹⁵⁵

圖 6.4 西氣東輸二線工程



資料來源：「中亞天然氣管道全線開建」，文匯報，2008 年 7 月 3 日，<http://paper.wenweipo.com/2008/07/03/CH0807030006.htm>。

¹⁵¹ 李隽瓊，「中國破解馬六甲假運輸困局，重慶向國務院爭取中緬油氣管」，新華網，2005 年 3 月 24 日，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5-03/24/content_2736070.htm。

¹⁵² 「中國公司贏得緬甸天然氣田採購權」，中國評論新聞網，2007 年 12 月 7 日，<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05/0/9/9/100509914.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0509914>；陳竹，「中緬天然氣供銷協議達成」，財經，2008 年 12 月 26 日，<http://www.caijing.com.cn/2008-12-26/110042870.html>。

¹⁵³ 翟磊，「中國緬甸簽署建設原油和天然氣管道協議」，南方網，2009 年 3 月 27 日，<http://china.huanqiu.com/hot/2009-03/415963.html>。

¹⁵⁴ 徐雅平，「中國第四大能源進口通道中緬油氣管道 9 月全面開工」，中國網，2009 年 6 月 16 日，http://www.china.com.cn/economic/txt/2009-06/16/content_17954466.htm。

¹⁵⁵ 緬甸境內的油氣管同時存在原油管與天然氣管，其中天然氣管起點在皎漂，原油管的起點則在皎漂北方的馬德島。「中緬油氣管後年貫通」，大公網，2011 年 12 月 28 日，<http://www.takungpao.com.hk/news/11/12/28/ZM-1437208.htm>。

圖 6.5 中緬油氣管線



資料來源：「中緬油氣管道小資料」，文匯報，2011年2月18日，<http://paper.wenweipo.com/2011/02/18/CN1102180004.htm>。

最後一個中國極為有興趣介入的管線建設案是所謂的「伊朗—巴基斯坦—印度管線」(Iran-Pakistan-India Pipeline, IPI Pipeline)，中國希望興建一條從瓜達爾到新疆，並與IPI管線相連的天然氣管道以輸送伊朗出口的天然氣，更進一步完善其能源進口來源分散的目標並降低對印度洋航線依賴，因此在2008年表示將慎重考慮巴基斯坦邀請中國加入的提議，¹⁵⁶爾後在2011年，據報中國工商銀行(ICBC)提供資金給予這條原本中斷的管線建設，中國國務委員戴秉國也在2012年12月呼籲主要強國支持這條管線的建設，¹⁵⁷但由於伊朗因堅持發展核武而遭到美國與西方國家的禁運，禁運的威脅也指向提供資金給予這條管線建設的中國工商銀行，導致後者不得不在2012年3月中宣布撤出對這條管線提供的資金與顧問。¹⁵⁸

¹⁵⁶ Vijay Sakhuja, "The Karakoram Corridor: China's Transportation Network in Pakistan," *China Brief*, Vol. X No. 20(October 8 2010), p. 6. 另外關於中國對加入此一天然氣管道建設的考量分析，見 Stephen Blank, "Will China Join the Iran-Pakistan-India Pipeline?" *China Brief*, Vol. X No. 5(March 5 2010), pp. 8-10.

¹⁵⁷ Saibal Dasgupta, "China offers goodies to Pakistan, urges world powers not to abandon it," *The Times of India*, December 24, 2011, http://article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2011-12-24/china/30554350_1_turkmenistan-nation-gadwar-yousuf-raza-gilani.

¹⁵⁸ Paul Richter and Alex Rodriguez, "Chinese bank pulls out of Pakistan-Iran pipeline project," *Los Angeles Times*, March 14, 2012, <http://www.latimes.com/news/nationworld/world/la-fg-pakistan-china-pipeline-20120315,0,2392636.story>.

不過使用油氣管線作為以陸制海的手段，其效用如何似乎頗有疑問。其中之一是非常客觀地技術事實：即使中國能完成擬議與建設中的所有油氣管線並達到最大使用設計，還是只能稍微降低中國對印度洋與南海海上戰略交通線的依賴，絕大部分進口量還是要依靠海運，¹⁵⁹這既受限於中亞和俄羅斯本來就不是超越中東的世界最大能源生產區與中國最主要的能源進口地區，也受限於油氣管線的運輸量設計上限還是比不過海運—中緬(設計輸送能力一年兩千兩百萬噸)、中俄(設計輸送能力一年三千萬噸)、中哈(設計輸送能力一年兩千萬噸)三大主要中國陸路油管的總設計輸送能力雖達為一年七千萬噸以上，¹⁶⁰但 2010 年中國原油進口量達 23,626.9 萬噸，¹⁶¹2011 年更成長為 25,378 萬噸，¹⁶²陸路石油管線的最大設計輸送能力總和還佔不到三分之一，而中緬油管最大輸送量僅為每年兩千兩百萬噸，對於原油進口超過 80% 都是經過麻六甲海峽的中國來說，這只佔十分之一的杯水車薪，完全無法取代或有效降低中國對海運能源的依賴。

另一個原因在於油氣管是否真的完全屬於中國政府主導的地緣戰略行為的一部份，因為中國的石油公司雖然皆為國營，卻未必是中國政府的外交政策工具。¹⁶³即使油氣管線的建設是由北京的中央政府而非地方政府或石油公司主導，是否就具有明顯的地緣戰略目的？對此，查道炯指出，中國進口天然氣不是為了外交的需要，其真正目的是中國國內許多特別依賴煤炭作為主要能源的地區，或者生態特別脆弱的地區，需要改造成以天然氣為主要使用能源。¹⁶⁴誠然，這些油氣管線都具備一定程度的地緣政治意義，但查道炯指出，中國與周邊國家興建中的油氣管線，只有從中亞—特別是哈薩克的「中哈油管」—進入中國的油氣管線因為涉及兩國的利益而具有重要的地緣政治意義，但從中亞輸入中國東部與南部地區的油氣在經濟效益上仍遠不如從澳洲與印尼進口的液化天然氣，而且大多數中亞輸氣管的建設目的，是為了改善，儘管查道炯認為中亞油氣能改善中國西北省分的能源使用組成與環境質量，可能在未來成為整個中國乃至東北亞地區重要的公共產品，而且他也承認如果未來通達中國的歐亞石油管道網路的設想能夠實現，中國將處於決定是否允許歐亞石油管道的油氣通過中國流向日本和韓國市場的戰略地位，¹⁶⁵不過這些都只是未來的長期構想，能否完全實現尚在未定之天。

¹⁵⁹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1,” *Department of Defense*, http://www.defense.gov/pubs/pdfs/2010_CMPR_Final.pdf, p. 38;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1,” *Department of Defense*, http://www.defense.gov/pubs/pdfs/2011_cmpr_final.pdf, p. 21.

¹⁶⁰ 李新民，「中國油氣進口的四大戰略通道形成」，人民網，2010 年 9 月 10 日，<http://energy.people.com.cn/BIG5/12694616.html>。

¹⁶¹ 「2010 年我國石油市場特點分析」，中國產業信息網，2011 年 4 月 26 日，<http://info.chyxx.com/shyhg/201104/994128G5IZ.html>。

¹⁶² 「2011 年原油進口同比增 6%，對外依存度達 56.5%」，中國網，2012 年 1 月 13 日，http://ny.china.com.cn/2012-01/13/content_4758771.htm。

¹⁶³ 李春福譯，文正仁著，*中國崛起的大戰略——與中國知識菁英的深層對話*(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11 年)，頁 144。

¹⁶⁴ 「世界看中國：土庫曼—中國輸氣管」，BBC 中文網，2009 年 12 月 16 日，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09/12/091215_chinainworl_pipeline.shtml。

¹⁶⁵ 查道炯，「從國際關係角度看中國的能源安全」，*國際經濟評論*(北京)，第 6 期(2005 年)，頁

故整體來說，使用建設油氣管線作為以陸制海手段的作用，似乎遠不如鐵路網。

3. 湄公河國際航道

連接雲南省與中南半島緬甸、泰國、寮國與越南等四個國家的湄公河是中國用來作為一旦臺海地區發生緊急事件時，由南海進入南中國的另一條緊急能源替代交通線。¹⁶⁶湄公河作為中南半島極為重要的國際河流與世界主要大河，除了運輸之外仍有極重要的水力發電、漁業及觀光等經濟價值，對中國的西部大開具有極大重要性，而湄公河同時連接中國與中南半島五國，參加所謂的「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Economic Cooperation in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GMS)不僅有利於本身的西部大開發與海上交通線替代計畫，亦可進一步整合中國在「東協加一」裡與中南半島國家的整合，遂使得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成為中國地緣戰略中的重點，被中國運用作為以次區域合作促成區域合作、以次區域合作作為區域合作的基礎，而交通建設則是其中的優先部分。¹⁶⁷

雖然瀾滄江－湄公河國際航道的運輸能力與對中國的戰略交通線替代重要性皆不如泛亞鐵路與油氣管線，但由於中國以外的中南半島國家無力獨立或聯合維持湄公河的航運安全，使得這一條國際航道反而成為中國對境外跨國陸地交通線控制中進展最大者。2011年10月爆發中國船隻在泰緬邊境地區的湄公河捲入槍戰導致13名中國船員遇害的事件發生，¹⁶⁸成為中國介入中南半島境內湄公河航運安全管理與航道控制的重要契機，同年11月由其主辦的四國一中、緬、泰、寮一部長級會議中得到其他三國的同意，不僅允許中國派遣警力進入三國境內與三國的警方一起執行湄公河聯合巡邏任務，還允許中國派遣將近一千名武警進駐

32。

¹⁶⁶ 中國在1990年代參與開通瀾滄江－湄公河航道時，並沒有真正考慮到利用其作為能源運輸的另一個管道，然而即使目前，許多分析家都認為瀾滄江－湄公河航道不可能降低中國對麻六甲海峽的依賴，充其量只是一條區域出現危機時，南海石油運輸進入南中國的緊急替代路線，因為湄公河口位於麻六甲海峽東北，必須先通過麻六甲才能抵達湄公河口，而中國在2011年的原油進口量高達2.54億噸，其中來自必須通過麻六甲海峽的中東與非洲原油所佔比例達64.5%，根本不是瀾滄江－湄公河航道所能負擔。因此瀾滄江－湄公河航道最多只能擔負所謂的「成品油」運輸而非原油，而且還必須考量到運油對湄公河沿岸生態、環保與其他水資源利用產生的潛在威脅與影響，不可能完全發揮所有的運輸功能在能源運輸上。劉大清，「加快瀾滄江－湄公河國際航運開發、利用的思考」，*綜合運輸*(北京市)，第10期(1996年)，頁13；Chua Chin Hon, "China to ship oil through Mekong next month," *Strait Times*, April 8, 2006, http://groups.google.com/group/lancang-mekong/browse_thread/thread/e086ce12ba8e0096/a1d5822b4505604b; 「解能源運輸困局，中國成品油運輸擬走道湄公河」，*環球時事*，2006年3月21日，http://www.stnn.cc:82/global/china/t20060321_170198.html；章卓，「中國用湄公河運油受關注」，*世界新聞報*，2007年1月12日，<http://big5.cri.cn/gate/big5/gb.cri.cn/12764/2007/01/12/1865@1396868.htm>；「中國的石油安全格局面臨挑戰」，*中國評論新聞網*，2012年3月17日，<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20/4/3/3/102043366.html?coluid=0&kindid=0&docid=102043366&mdate=0317080252>。

¹⁶⁷ 吳玲君，「中國與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區域合作與能源安全」，金榮勇主編，*東亞區域意識下的亞太戰略發展*(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民國96年)，頁38-44。

¹⁶⁸ Keith Bradsher, "China Suspends Boat Traffic in Mekong,"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1, 2011, http://www.nytimes.com/2011/10/11/world/asia/china-suspends-boat-traffic-on-mekong.html?_r=1&ref=asia.

三國境內。¹⁶⁹而聯合巡邏在 2011 年 12 月 10 日正式展開後，儘管對於中國將如何與其他三國進行分工，與聯合巡航將擴展到何種程度都仍不清楚，¹⁷⁰但這顯示中國充分利用此一契機對湄公河展開第一步的控制，對其日後能否成功將中南半島納入其東亞地緣戰略領域中，有相當程度的影響。

四、陸地權力平衡的海上運用、海洋區域控制與領土化

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的明顯特徵之一是大陸強國將陸地權力平衡轉運用於海上的思維。美國與印度媒體在 2007 年與 2009 年曾分別根據美國方面的消息報導，中國欲與美國劃分太平洋勢力範圍，與美國在太平洋分庭抗禮的傳言。¹⁷¹部分中國戰略菁英似乎也有這種想法，例如楊勇在 2004 年認為美中之間真正「公平」的「劃分」是以國際換日線，把太平洋劃為「亞洲太平洋」與「美洲太平洋」，「現實」而「比較合理」的劃分是美國的前沿勢力在馬里亞納群島(Mariana Islands)和加羅林群島(Caroline Islands)的經度線，而且認為這種劃分不能說是對美國的挑戰，而應該說是中國向美國「討公道」，而且也是美國對東亞國家應有的「尊重」，並且認為西太平洋是中國的「利益範圍」。¹⁷²

反過來說，葉自成認為中國海權不應以馬漢的思想為基礎，他批評中國內部的馬漢海權論主張，認為他們根本混淆了「海權」與「制海權」的概念，以為只要有強大的海軍，能夠獲致制海權就等於使中國獲得強大的海權，並保障中國的經濟發展，但馬漢的海權論主張有很強烈的「爭霸」思想，與中國「不稱霸」的基本國策相悖，遵循馬漢的思想反而會使中國海權發展走入死胡同，重蹈北洋海軍的覆轍，況且歷史上中國的繁榮與強大從來都不是依靠制海權，對中國海軍發展真正重要的是馬漢思想中的海上貿易、政府組織與民族性格等非軍事力量層面。¹⁷³不過他並沒有忽視海洋對當代中國的重要性，也認為中國確實需要建立強大的海軍，但應以國際海洋法為基礎，強調中國的合法權利，武力的使用也應以維護中國的海洋法權益為主，與中國的和平發展政策路線相符合，而不以制海權

¹⁶⁹ Sharon LaFraniere, "China to Join Effort to Patrol Mekong River,"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0, 2011,

http://www.nytimes.com/2011/11/10/world/asia/china-will-patrol-mekong-with-southeast-asian-neighbors.html?_r=1&ref=asia.

¹⁷⁰ "Mekong River four-nation patrols begin after attacks," *BBC*, December 10, 2011, <http://www.bbc.co.uk/news/world-asia-16119515>.

¹⁷¹ 一般而言是以夏威夷群島為界，但是印度方面的報導則不只如此，某些媒體如**印度快報**(*Indian Express*)的報導是中國的要求除了西太平洋之外還加上印度洋。Bill Gertz, "Inside the Ring," *The Washington Times*, August 27, 2007, <http://www.washingtontimes.com/news/2007/aug/17/inside-the-ring-11086842/>; Richard Halloran, "US' Keating argues for exchanges with China," *Taipei Times*, February 22, 2009, <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editorials/archives/2009/02/22/2003436750>; Manu Pubby, "China Proposed Division of Pacific, Indian Ocean Regions, We Declined: US Admiral," *Indian Express*, May 15, 2009, <http://www.indianexpress.com/news/china-proposed-division-of-pacific-indian-o/459851/>.

¹⁷² 楊勇，「發揮陸海兼備優勢是大型海陸複合國家的必然選擇」，**黑龍江社會科學**(黑龍江省哈爾濱市)，總第 84 期(2004 年 6 月)，頁 29。

¹⁷³ 葉自成，**陸權發展與大國興衰：地緣政治環境與中國和平發展的地緣戰略選擇**(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 年)，頁 258-260。

的控制目的和使用武力爭奪海洋資源及排他性控制海上通道為目的，以避免與周邊國家發生衝突，危及中國的穩定與發展。¹⁷⁴他對海軍的運用觀點反映出極為典型的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中的海軍功能性使用。而發展一支能維護中國海洋權益，卻不以掌握制海權為目的的海軍的觀點，同樣是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中將陸上戰爭概念應用於海上的觀點。張文本實施戰略收縮的主張與唐世平與美國劃分勢力範圍的主張，雖然是站在與葉自成不一樣的觀點，但也都是此種陸上權力平衡在海上運用的展現。

劃分海上勢力範圍的觀點一般屬於非官方的學者與媒體所提出的主張，中國官方一直以來並沒有對於這種主張公開表達明確的態度或提出正式的說明。不過近年來，中國官方似乎開始間接對外提出這種勢力範圍劃分的要求。最新但是較為模糊的官方主張來自習近平在 2012 年 2 月在美國訪問時所提出的「太平洋有足夠的空間可同時容納中美兩國」(The vast Pacific Ocean has ample space for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的主張，¹⁷⁵雖然習氏沒有明確指出中國欲與美國瓜分太平洋並將西太平洋納為勢力範圍，但是至少他的目的是想要限制美國對中國鄰近地區的介入，¹⁷⁶也很明確地對美國指出中國進入太平洋勢不可擋，無論這會不會威脅到美國的利益，未來太平洋必然是美中兩極架構。¹⁷⁷此一以東亞大陸為主、周邊海域為輔的勢力範圍要求，不僅可視為中國組織東亞地緣戰略領域的外圍區域延伸，亦展現出中國完全將陸上的權力平衡概念與勢力範圍劃分運用於海上，是中國向美國要求劃分太平洋的主要思想依據。而 2010 年美軍「喬治華盛頓號」航艦(USS George Washington, CVN-73)進入黃海與南韓舉行聯合軍事演習引發中國媒體的緊張與強烈反應，也顯示中國實際上將黃海視為不允許其他強權染指的自身勢力範圍。

與此相較，海洋領土化的概念就是中國在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出現並允許濱海國家能劃分專屬經濟區之後，所出現不同於以往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的新構想。由於海洋議題領域(issue area)始終未曾形成類似陸地國際社會的秩序體系，¹⁷⁸使得歷史上一直有在海上建立秩序的強烈願望，構成國際海洋法的主要演進歷史。¹⁷⁹不過在英國崛起後，直到 1856 年巴黎宣言(Declaration of Paris)之前，雖然海洋一直是西方國家平時自由運用的運輸媒介，但由於重商主義的盛行、中立制度尚未建立、海上私掠(privateering)制度之存在，以及各強國的海軍競爭和歐陸權力平衡的運作等原因，英國以外的濱海國家一直想從英國之處取得戰時的中

¹⁷⁴ 同上註，頁 261-263。

¹⁷⁵ “Full text of Xi’s interview with Washington Post,” *China Daily*, February 13, 2012, 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12xivisit/2012-02/13/content_14596561.htm.

¹⁷⁶ 陳嘉生，「習近平訪美的幾項戰略意涵」，*戰略安全研析*，第 82 期(2012 年 2 月)，頁 8-9。

¹⁷⁷ Andrew Billo and Yan Shufen, “Tiger, Tiger: Can the US and China ‘Live Harmoniously’?” *Asia Society*, February 22, 2012, <http://asiasociety.org/blog/asia/tiger-tiger-can-us-and-china-live-harmoniously>.

¹⁷⁸ Robert O. Keohane, Joseph S.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3rd. edition (New York: Longman, 2001), p. 89, 91.

¹⁷⁹ Ken Booth, *Law, Force and Diplomacy at Sea*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85), p. 35.

立國海上「航行自由」(Freedom of Navigation)權利。¹⁸⁰但在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通過、領海、鄰接區與專屬經濟區等性質異於公海的海洋區域範圍為國際法正式劃定之後，許多重要國際海上交通線必經的近海地區「公海」範圍縮小許多，反而變成美國海權必須與其他濱海國家爭奪海上「航行自由」。¹⁸¹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雖使近海地區的「海洋領土化」成為濱海國的海洋「權利」，但中國在這方面真正展現與以往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個案不同的海洋領土化概念，在於其戰略菁英對專屬經濟區的「法律心態」，以及因此衍生而出，在專屬經濟區上能否允許外國軍艦從事軍事活動的態度。¹⁸²就前者而言，中國雖然在法律上承認專屬經濟區的國際法地位並不同於屬於領域的領海，¹⁸³而且中國官方並未真正正式公開把這些地區賦予所謂「海洋國土」的政治意涵，但是將綜理中國海洋事業的「國家海洋局」納入「國土資源部」之下其實已是不公開賦予專屬經濟區與大陸架「國土」意涵的展現，蓋國家海洋局的重要職責之一即是在中國管轄的海域內進行「海洋執法」。¹⁸⁴雖然中國官方從未公開視專屬經濟區與大陸架為「海洋國土」，也未公開說明其「海洋國土」的範圍與大小，不過透過中國學者與媒體的說法，可以大概得知其輪廓，最常出現的就是所謂的「三百萬平方公里海洋國土」之主張，稍微謹慎一點與符合海洋法公約的用法，則是「三百萬平方公里的海上管轄範圍」。但無論如何，皆是將專屬經濟區賦予類似領土主權意涵的想像，從而進一步混淆了國際法、國防安全與國際局勢三者的分析關係，導致中國戰略菁英時常單從中國國家利益角度出發。¹⁸⁵此種心態的出現，除了大陸思維的展現之外，也是追求民族復興與希望擺脫過去民族恥辱的強烈民族主義心態，與冷戰時期遺留下來的權力對抗思維的展現。

¹⁸⁰ Hobson, *Imperialism at Sea*, *op. cit.*, pp. 65-76.

¹⁸¹ 「航行自由」是美國立國以來的重要外交與戰略原則。在當代，美國對海上航行自由的訴求主要是軍艦在他國的領海、毗鄰區與專屬經濟區的自由航行，以及在專屬經濟區的軍事作業。但在美國成為海權之前，其主要訴求卻是海上完全的航行自由與對私人財產的禁止捕獲，以利美國與其他交戰國的商業往來。美國為此與英國在 1812 年爆發戰爭，其後也不願正式加入仍承認海上捕獲的巴黎宣言，甚至在 1918 年將這種訴求加入「十四點和平原則」(Fourteen Points)中。
“Freedom of Navigation, FY 2000-2003 Operational Assertions,” *Office of the Under Secretary of Defense for Policy*, http://policy.defense.gov/gsa/cwmd/docs/fon_fy00-03.html; Castex, *Strategic Theories*, *op. cit.*, pp. 37-38; John W. Coogan, *The End of Neutrality: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and Maritime Rights, 1899-1915*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17-22; 宋燕輝，「美國對南海周邊國家歷史性水域主張之反應(上)」，*問題與研究*，第 37 卷第 10 期(1998 年 10 月)，頁 4-8。

¹⁸² 雖然外國軍艦能否事先不須得到領海國的批准而在領海內進行無害通行(*innocent passage*)，也是中國與美國之間的爭議焦點，但這點並非中國的首創，蘇聯與美國在 1988 年即曾發生過在黑海地區的 12 哩領海內能否允許外國軍艦無害通過的爭議。宋燕輝，「美國對南海周邊國家歷史性水域主張之反應(下)」，*問題與研究*，第 37 卷第 11 期(1998 年 11 月)，頁 65。

¹⁸³ 「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法」第一條的規定即稱，中國對專屬經濟區對大陸架行使主權權利和管轄權。「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法」，*中國政府網*，2005 年 9 月 12 日，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ziliao/flfg/2005-09/12/content_31086.htm。

¹⁸⁴ 「國家海洋局主要職責」，*中國國家海洋局*，2010 年 4 月 9 日，<http://www.soa.gov.cn/soa/governmentaffairs/overview/zhuyaozhineng/webinfo/2010/04/1270102487344747.htm>。

¹⁸⁵ 李元俊，「在他國專屬經濟區進行軍事測量的法律分析」，*東方法學*(上海市)，第 6 期(2010 年)，頁 157。

民族主義與大陸領土思維的影響與深入擴大開發專屬經濟區內的資源，使中國戰略菁英認為不可放棄專屬經濟區內的海上利益，該區域應納入海上戰略防禦的內涵之中。¹⁸⁶這種考量更因為海洋法公約並未明確規定外國船隻、飛機在他國專屬經濟區內的航行自由範圍與軍事作業行為許可範圍，以及美國尚未批准海洋法公約，導致美國海權與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濱海國家對公約中關於領海、鄰接區與專屬經濟區的航行自由與是否能在其上進行軍事活動等解釋存在重大差異，¹⁸⁷而使中國非常容易與海權之間爆發因解釋不同而產生的嚴重國際衝突，並激發中國內部的民族主義情緒，例如 2001 年美國 EP-3 電戰機在南海北部中國專屬經濟區內與中國海軍航空兵的殲-8 戰機相撞引發的雙邊關係急速緊張；2009 年 3 月，美國海軍「無瑕號」(USNS Impeccable, T-AGOS-23)海測船又在南海北部中國專屬經濟區內遭中國船隻包圍與騷擾，導致美國海軍加派一艘驅逐艦為其在南海作業時護航，¹⁸⁸皆屬證明。

五、制海權與海權概念的混淆：海軍的威望性需要

很少研究者注意到中國戰略菁英對這兩種概念的混淆。如第三章早已分析過的海權是一個相當廣泛、同時包括軍事與非軍事海洋力量與運用的概念，制海權僅是海權之下的其中一種軍事戰略概念，而且僅存在於戰時。但是對大多數關心中國地緣戰略的戰略菁英來說，制海權與海權即使不是同義詞，似乎也沒有真正嚴格意義的區別。只有極少數菁英瞭解二者的差異，¹⁸⁹而對海軍的威望性思考即是因為混淆了二者概念的緣故。

第二章的文獻回顧雖然提到張文本分離了中國的「海洋權利」與「海洋權力」兩種概念，但是他並沒有進一步分析海權與制海權在概念上的差別，僅指出制海權是一種有利的形勢，但是不能與海權混用。¹⁹⁰他雖然又引用中國**海軍大辭典**對制海權的解釋，指出制海權是「交戰雙方依靠海上優勢，在一定時間內對一定海洋區域所取得的控制權」，¹⁹¹但是在此之後他就把最重要的「戰時」、「一定時間」、「一定海洋區域」等制海權與海權兩者最重要的區別放在一旁，而專注於「制海權」與「大國興衰」之間的關係：「制海權」帶來的「有利形勢」，對於強國在體系中能得到什麼樣的好處，而缺乏「制海權」又會有什麼樣的悲慘後果。這麼做顯然是混淆了海權與制海權兩者的關係，而且他反覆出現制海權與海權概念上的

¹⁸⁶ 楊金森、梁喜新、黃明魯，**中國海洋開發戰略**(武漢，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1990年)，頁 43-49。

¹⁸⁷ Li Jianwei, Ramses Amer, "China and US Views on Military Vessel Rights in the EEZ is More Than a Legal Matter?" *China US Focus*, August, 10, 2011, <http://www.chinausfocus.com/peace-security/china-and-us-views-on-military-vessel-rights-in-the-eez-is-more-than-a-legal-matter/>; 鄭雷，「論中國對專屬經濟區內他國軍事活動的法律立場——以“無瑕號”事件為視角」，**法學家**(北京市)，第 1 期(2011 年)，頁 137-146。

¹⁸⁸ Ann Scott Tyson, "Navy Sends Destroyer to Protect Surveillance Ship After Incident in South China Sea," *Washington Post*, March 13, 2009,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9/03/12/AR2009031203264.html>.

¹⁸⁹ 劉新華，「試論中國發展海權的戰略」，**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上海市)，第 6 期(2001 年)，頁 69。

¹⁹⁰ 張文本，**論中國海權**，第二版(北京：海洋出版社，2010 年)，頁 5。

¹⁹¹ 同上註，頁 19。

混淆現象，例如他就德意志帝國、日本帝國與美國的歷史研究，提出「制海權擴展的限度」，¹⁹²但其實他的政治經濟與歷史分析卻應該屬於「海權」的擴展限度而非制海權，蓋制海權的「限度」是由交戰國海軍力量之間的對比以及交戰國欲在何處建立控制而決定，政治、經濟發展影響的乃是海權而非制海權。

另一個明顯混淆海權與制海權兩種概念的是倪樂雄。他嚴厲批判葉自成同時包含軍事與非軍事領域的「陸權」與「海權」概念，認為這是一種「創新」，更改了學術界約定俗成的用法。¹⁹³倪樂雄自己認為「海權一般指國家運用軍事力量對海洋的控制，陸權則是國家運用軍事力量對陸地的控制」，¹⁹⁴但本論文先前的分析已經指出當代的海洋權力與陸地權力概念實際上都同時包含軍事與非軍事層面，倪樂雄的觀點顯然不是當代的地緣政治理論觀點。但他明顯混淆海權與制海權兩者的地方，在於他對於上述「海權」概念的註釋，他引用中文版的**不列顛百科全書**的解釋：「海上力量的主要目的始終是保護己方海運不受敵方襲擊，並摧毀或阻止敵方的商業、軍事海運。當交戰國一方在一部份海域能絕對控制海運時，這個國家就被認為有了制海權」。¹⁹⁵爾後倪樂雄與張文本一樣，在混淆「海權」與「制海權」觀念的情況下，分析「海權」與大國興衰的關係及對當代中國大戰略與發展的重要性。

在混淆兩者概念的情況下，又加上中國戰略菁英喜歡把近代中國衰弱的歷史與中國缺乏強大海軍以及大陸傳統做連結，導致海軍與大國地位完全連結在一起，使得中國戰略菁英在論及中國的「海權」時，普遍一致的特徵是集中在海軍的重要性與需要建立與中國「國際地位」相稱的強大海軍，以保衛中國的海洋權益與重要性無庸置疑的遠洋海上交通線，而此種邏輯很自然地導出需要航空母艦方能遂行這兩種任務的呼聲。航空母艦對於保衛遠洋海上交通線確實有其幫助，但對於海洋法公約賦予的濱海國家海岸線外 200 浬海上權益則並不一定，蓋此一範圍仍在陸基武力支援範圍內。但是由於海軍建設與民族復興、中國的威望等政治議題連結，使得中國海軍擴張與航空母艦獲取等問題早已跳脫單純的軍事戰略需求，成為中國對外威望的最明顯象徵。¹⁹⁶

大多數中國戰略菁英對於建立強大海軍以保衛海上交通線思考的盲點在於，由於混淆了海權與制海權，沒有考慮到制海權僅存於戰時，只有少數戰略菁英瞭解到假使一個像中國這樣的強權的海上交通線受到其他國家的威脅，則雙方

¹⁹² 同上註，頁 40-44。

¹⁹³ 倪樂雄，「從陸權到海權的歷史必然－兼與葉自成教授商榷」，**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市)，第 11 期(2007 年)，頁 30。

¹⁹⁴ 同上註，頁 29-30。

¹⁹⁵ 同上註，頁 30。

¹⁹⁶ 例如劉華清在回憶錄中宣稱，航艦是國家綜合國力的象徵，又認為有了航艦之後，不僅可以提高海軍的作戰能力，還能提高軍威與國威。中國國防部長梁光烈在 2009 年 3 月會見日本防衛大臣濱田靖一時亦表示，大國中沒有航母的只有中國，中國不能永遠沒有航母。劉華清，**劉華清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4 年)，頁 479、481；「國防部長梁光烈：中國不能永遠沒有航母」，中國評論新聞，2009 年 3 月 23 日，<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09/2/1/2/100921237.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0921237>。

實際上已經接近交戰，而且由於擁有這種能力的只能是海權，故除非受威脅的大國也擁有與海權旗鼓相當的海上力量，否則解決不了問題。¹⁹⁷如此一來，倘使真的依照許多中國戰略菁英所呼籲的，建立一支能夠保衛中國海上利益、又能掌握「制海權」的強大海軍，即使中國在併吞臺灣後願意如張文木與唐世平主張的那樣實施戰略退縮或與美國劃分勢力範圍，¹⁹⁸但由於中國海軍的能力嚴重威脅美國的海權單極地位，實際上很難不與美國海權單極爆發嚴重衝突，而這卻又是中國大戰略最極力避免之處。

綜合上述五項對目前中國海軍戰略思想、戰略菁英對海權與制海權的概念，以及中國對海洋領土化與海上權力平衡思維等的分析，可以發現目前中國的地緣戰略不僅具備以陸制海、陸戰思維指導的海上陣地戰與縱深防禦等兩項明顯的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特徵，另外關於基於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所顯現的海洋領土化概念的新發展，也展現出中國海洋戰略運用中的深刻大陸國家思維。而雖然中國目前還沒有大規模海軍擴張之舉，但許多中國文武戰略菁英對海洋的戰略角色與認識，在明顯地混淆了制海權與一般的海洋權力兩種概念之餘，強調制海權在海洋戰略中的唯一重要性與其對中國的國家安全、國際地位之間的連結，成為另一種海軍民族主義的鮮明表現，同樣體現了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中的陸戰思考特徵與海軍民族主義的威望需求。

既然中國的地緣戰略具備明顯的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特徵，而中國地緣戰略中的海洋戰略指導與以陸制海手段，又特別強調海洋領土化與對中南半島國家之整合，希望能降低中國對完全依靠海洋運輸其商品—特別是能源—的依賴。那麼中國的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是否也與以往的個案一樣，因為重心在大陸上而強調在陸地戰略攻勢與海洋戰略守勢，以抵擋海權對其在大陸上行動自由的干預，追求達成其標準地緣政治程序，建立其勢力範圍乃至組織以其為核心的地緣戰略領域，並因此和海權與其他相鄰的大陸與海洋強國爆發激烈的安全競爭關係？更具體來說，就是「驅逐」美國、印度等國家在東南亞之勢力以建立接受其領導的東亞地緣戰略領域？本章接下來將在第三節對中國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的攻守性質、重心、操方向與手段形式進行分析，以驗證上述的假設。

第三節、當代中國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攻守性質、

重心與操作

中國戰略菁英認為中國在冷戰後於東亞這個戰略重心面臨的地緣戰略局勢是所謂的「東急西重」，¹⁹⁹更具體來說是「北部形勢穩定，東南憂患增多，東北、

¹⁹⁷ 徐棄郁，「海權的誤區與反思」，*戰略與管理*(北京)，第3期(2003年)，頁17。

¹⁹⁸ 唐世平，「再論中國的大戰略」，前引文，頁34-35；張文木，*論中國海權*，前引書，頁234-236。

¹⁹⁹ 「東急西重」一詞是張文木在1999年提出，在2004年又再度提及。不過類似的概念早在1997年就被葉自成等人用來描述中國的周邊地緣政治形勢：包括俄羅斯哈薩克、塔吉克、吉爾吉斯與

西南暗藏危機，南部變數加大」。²⁰⁰「東急西重」與「陸海兼備，以海為主」的地緣戰略主張均顯示當代中國的地緣戰略方向已經不再指向西北方的歐亞大陸內部，而是東部沿海地區。當代中國已經不像古代帝國那樣將地緣戰略方向置於對首都構成最嚴重安全威脅的方向，中國決策與戰略菁英皆同意，中國的地緣戰略重心已經由歐亞大陸轉移至東部與東南沿海，葉自成所謂「安西、靠北、爭東南」的主張(見第二章)，基本可視為中國戰略菁英為了處理「東急西重」以及「北部形勢穩定，東南憂患增多，東北、西南暗藏危機，南部變數加大」的 21 世紀初期中國周邊地緣政治局勢的共識。此種方向與操作進一步證明中國地緣戰略仍具有極為深刻大陸的本質，不是真正想要成為像美國那樣的純粹海權。

多重因素促使中國地緣戰略朝此方向改變，並將戰略重心留置於東亞大陸與周邊的緣海地區。既包括中國國內的地緣政治結構與模式變化，如經歷改革開放後，經濟發展不僅改變了中國的核心區與精華區分佈，整體地緣政治模式已經轉為依賴海上貿易為主的外貿導向經濟，而且越來越重視周邊海洋資源對其國家發展的重要性。也包括全球與亞太地緣政治結構變遷的外在環境改變，以及中國本身的海陸戰略交通線控制能力發展。這些因素對中國的周邊與區域地緣政治密碼之指導產生的綜合影響，使中國地緣戰略的方向雖然已不再指向歐亞大陸，但在現階段亦非指向太平洋與印度洋等真正的「大洋」，而是東亞的大陸部分與亞太島鏈地區；重心則因為了完成內部建設與參加東亞區域整合，仍位於東亞大陸與大陸周邊的緣海，其中首要的地緣戰略重心是東部沿海各省與其外圍的三個緣海，後者的開發由於與中國的海洋領土化，以及擴大陸上防禦縱深相連，故屬於陸地發展的一部份而非與海權、遠洋相關的海上發展。第二個重心在於與中國西南各省相連的中南半島，是中國西部大開發與次區域經濟整合的重要區域，也是中國利用國際鐵路建設實施「以陸制海」、分裂東協國家對中國態度的主要地區。

一、中國與亞太區域地緣政治結構特徵的影響

蘇聯解體、中印與中越關係緩和，使中國不再直接面對來自東亞大陸與歐亞大陸的軍事威脅，但中國仍是全球擁有最多陸地鄰國的國家，這些國家不但包括

蒙古的「北—西北地緣」局勢，是「變地緣大患為和平地緣」；以南亞為主的「西線地緣」是「穩定和平」；至於包括朝鮮半島、日本與東南亞的「東—南線地緣」，則是中國的「熱線地緣」。見葉自成主編，**地緣政治與中國外交**(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年)，頁339-450；張文木，「科索沃戰爭與中國新世紀安全戰略」，**戰略與管理**(北京)，第3期(1999年)，頁4-6；張文木，**世界地緣政治中的中國國家安全利益分析**(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333-335。

²⁰⁰ 門洪華，「變變動應對為主動謀劃，維護和拓展國家利益」，胡鞍綱主編，**中國大戰略**(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95-96。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於2011年3月11日連續遭受強震與海嘯的天災，以及因海嘯而引起的福島核電廠災變事故之後，某些中國學者認為日本在未來一段長時間內將因忙於內部重建而無暇對外，因此中國周邊地緣政治形勢應修正為「北穩、西安、東緩、南亂」。但實際上，日本雖然忙於內部重建，但在天災之後並未呈現出「無暇對外」的作為，如第七章所述，日本仍持續與美國、東南亞國家進行安全合作，更與中國在東海釣魚台的主權爭端上持續針鋒相對。因此本論文認為，「北部形勢穩定，東南憂患增多，東北、西南暗藏危機，南部變數加大」的分析，仍較「北穩、西安、東緩、南亂」要更為精確。見陳向陽，「冷靜研判周邊戰略新態勢」，**瞭望新聞週刊**(北京)，2011年6月27日，頁75。

俄羅斯、印度、巴基斯坦、越南等強權與區域大國，也包括北韓、緬甸等政治局勢不穩定、可能替中國邊境地區帶來安全威脅的中小型國家。²⁰¹此外，與中國同為強權且擁有海洋領土爭端的日本亦位於東北亞，中國與身為海權單極的美國在臺海與朝鮮半島兩個區域衝突點直接面對，2010 年後又逐漸增加在南海議題上的對抗。這些鄰近地區的安全威脅使得中國必須把地緣戰略的方向與重心置於東北亞與東南亞地區，而主要的安全威脅尤其來自這兩個地區海域中的領土爭端，但這些海域係屬於面積較為狹小的半封閉(semi-closed)海域，其情勢之發展主要受到周邊大陸的支配，不是真正的遠洋性質，事實上雖然中國逐漸產生許多因其外貿導向經濟的急速發展、對海外能源與資源的需求與投資大量增加而浮現的遠洋利益，但在全球化與國際自由貿易體系之中，這些遠洋海上與海外利益無法真正受到中國本身力量保護的嚴重性與所受到的潛在傳統安全威脅，²⁰²仍然比不上中國在周邊半封閉海域中與其他國家對海洋權益的爭奪。

雖然同樣與中國相鄰的南亞與中亞地區並非毫無安全威脅，而且同樣包含大國之間的地緣政治競爭，但由於東部沿海地區與西南方向的安全威脅緊鄰當代中國的政治核心與精華區，且包含更複雜的大國安全競合關係，²⁰³相較之下面向南亞、北亞與中亞的方向就只是當代中國地緣戰略中的次要區域。中亞作為中國重要的陸地能源輸入地區與歐亞大陸內部國際貿易通道，是中國在面對東南海洋競爭時急需穩定的內陸區域。中國在該地區並未面臨來自其他國家的真正傳統安全威脅，新疆也不涉及與結構中其他強國的複雜領土爭端，俄羅斯又是中國的次體系地緣政治密碼夥伴而非主要競爭對手，中國需要利用俄羅斯在次體系中牽制美國海權單極的戰略壓力，因而使得中亞與中俄邊界成為中國地緣戰略中最主要的次要地區。另外，雖然中國在南亞則與身為中國主要區域地緣政治密碼競爭對手之一的印度有難以解決的大規模、嚴重領土爭端，印度洋又擔負中國至為重要的

²⁰¹ 北韓對中國的安全威脅主要在於其核武政策造成朝鮮半島局勢緊張與高度不穩定，以及北韓逃至中國境內的難民(脫北者)對中國東北各省內部社會治安以及中國國際形象的影響，當然也在於北韓向被中國視為與美國同盟體系之間的重要緩衝國家。緬甸雖然在 2010 年 11 月的大選之後結束軍政府獨裁統治，內部政治局勢日趨穩定，但緬甸政府與境內少數民族之間的關係仍未完全和解，導致緬甸政府軍與少數民族叛軍之間的武裝衝突危及中國在緬甸境內的商業利益，而動亂產生的大批緬甸難民逃入雲南省境內，亦使中國政府難以應付。

²⁰² 一般說來，海上交通線安全與海外利益面臨的主要傳統安全，在於戰爭時被敵國攻取與切斷。然而中國目前的認知是世界大戰不會爆發，可能爆發的乃是區域(局部)戰爭，但這影響到的地區極為有限，因此遠洋海上與海外利益所面臨的傳統威脅幾乎可以忽視。而雖然美中關係並非真正和睦，存在許多潛在激烈競爭，並互相視對方為主要軍事競爭對手，但即使在局勢更為緊張的冷戰，蘇聯的平時海上活動亦幾乎不曾受到美國的截斷，故中國更不須擔心其遠洋海上運輸與海外利益在平時會遭破壞與截斷。

²⁰³ 中國人民解放軍少將羅援在 2011 年曾針對為什麼中國軍方激烈反對美軍航艦在黃海與南韓舉行聯合軍事演習提出說明，其中關於地緣政治結構的方面共有三點，而且最受中國軍方關注，包括：歷史上多次外敵入侵中國就是以黃海為跳板抵達中國內陸，中國在黃海有「歷史傷痕」；黃海是中國京畿門戶與軍機要地，距北京僅 500 公里，中國的三大軍區、兩大艦隊也都位於黃海周邊，而美軍航艦的作戰範圍廣達 600-700 公里；黃海是中國海軍通往大洋的咽喉要道，若將其蜂腰部攔腰卡斷，中國海軍在內海的艦艇難以走向大洋。楊鐵虎，「羅援少將：黃海對中國具有戰略意義，不能任人為所欲為」，人民網，2011 年 9 月 30 日，<http://military.people.com.cn/BIG5/1078/15795919.html>。

海上能源運輸，而可能在未來成為其地緣戰略的主要發展方向，但在目前由於中國仍缺乏海上戰略交通線控制能力，加上其周邊環境對其來說並非高度穩定，使得南亞與印度洋在目前為止仍非中國地緣戰略的主要戰略目標。除此之外，越過亞太島鏈地區的太平洋周邊地區，除了美國的潛在軍事威脅之外，並不存在中國重要的政治、經濟與領土地緣政治利益，亦使得此一地區不可能成為中國地緣戰略的真正重心所在，中國只要求擁有在西北太平洋進行防衛作戰的能力而非控制此一地區，換言之，僅將西北太平洋作為積極防禦的最外圍延伸而非真正的攻勢目標。²⁰⁴

另一個使中國的地緣戰略方向與重心在目前仍位於東亞大陸與周邊緣海的結構因素來自中國本身的地緣政治結構特徵。雖然中國自 1978 年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速度極為迅速，在 2011 年正式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其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地位乃是來自其龐大的人口基數，中國的經濟發展程度如以個人水準來看仍相當落後，這也是中國戰略菁英的世界觀在論及中國是否身為一個真正的大國時所產生的矛盾。而在這樣的經濟發展情況下，中國更出現相當嚴重的區域發展不均衡現象，不僅東北、西北與西南各省分皆嚴重落後於東部沿海省分，包括山西、河南、安徽、江西、湖北與湖南各省在內的「中部地區」也與東部沿海有明顯落差，²⁰⁵即使是在東部沿海，華北的「環渤海區」由於對「高端市場」的「可接近性」不如華中的「長三角」與華南的「珠三角」，使其發展情況明顯不如後兩者。²⁰⁶這種內部區域經濟發展不均衡的狀況迫使中國必須努力改善以防內部因嚴重的貧富不均而發生大規模社會動亂，如此一來限制了中國地緣戰略真正朝向海洋的發展。而中國為了促進這些地區發展而推動的西部大開發、各種東亞次區域經濟整合，以及中國本身為了進一步成為超強而參與的東亞區域整合，更使其重心必須留在東亞大陸與周邊緣海的亞太島鏈地區。

二、地緣政治密碼之指導與內政導向戰略文化之影響

第五章分析當代中國的地緣政治密碼時指出，其周邊密碼的內涵是創造穩定的國際環境以利中國本身的建設，並保衛中國的核心利益。而從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將「國家統一」、「中國憲法確立的國家政治制度和社會大局穩定」與「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本保障」等三項一起列為核心利益，可知當代中國實繼承了古代中國九州一統與重視內部穩定超越對外行動的古典地緣政治密碼，必然會使其地緣戰略的方向、重心與範圍受到限制。

核心利益的地理目標包括臺灣、西藏與新疆，南海是否屬於核心利益則似乎未有定論。此種內涵即宣示中國主要的地緣戰略目標實際上仍在東亞大陸與周邊

²⁰⁴ 劉中民、王曉娟，「澄清中國海權發展戰略的三大思想分歧」，*學習月刊*(湖北省武漢市)，第 9 期(2005 年)，頁 33；劉一建，「中國未來的海軍建設與海軍戰略」，頁 97。

²⁰⁵ 聶華林、馬紅翰編著，*中國區域經濟格局與發展戰略*(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年)，頁 100-104。

²⁰⁶ 吳浙，「環渤海地區經濟——競爭中的發展」，陳德昇主編，*中國大陸區域經濟發展：變遷與挑戰*(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3 年)，頁 271。

緣海，並沒有跨越島鏈進入太平洋或印度洋，創造穩定的周邊國際環境以利建設這一內涵亦限制了當代中國的地緣戰略於東亞大陸與亞太島鏈地區，蓋所有不利中國經濟建設的衝突與不穩定的來源—臺灣海峽、北韓核武危機、南海領土爭端、中日東海領土與海洋資源爭端，再加上中國在地緣政治結構中幾乎與所有的超強、強權在海洋或陸地上直接鄰接，其區域地緣政治密碼不允許任何一個強國控制東北亞、東南亞與南亞，而體系與次體系密碼均不欲挑戰美國的海權地位，使得中國已經首先限制其地緣戰略的方向與重心不在太平洋或印度洋本身，劉華清在其回憶錄中即明確指出：「我們搞航空母艦，目的不是為了和美國、蘇聯比賽，主要是用於解決對臺鬥爭需要、解決南沙群島爭端和維護海洋權益等方面的任務」；²⁰⁷張召忠也表示：「中國不是一個向全球擴張的國家，中國海軍不需要去大西洋、印度洋和中太平洋以東作戰」。²⁰⁸

內政導向戰略文化亦對當代中國的地緣戰略態勢、方向與重心施加限制。如上所述，中國尚面臨嚴重的內部問題，包括區域經濟發展不均衡之問題，並未真正達到已開發國家生活水準；中共政權面臨嚴重的執政合法性危機，必須投注越來越多資源於維持國內社會與政治穩定。這兩種問題的嚴重性使得內政導向戰略文化強調內政與外交連結的重要性與重視國內政權穩定優於大規模對外行動的主要特徵，能充分發揮對中國地緣戰略在態勢、方向與重心的限制：中國在未充分解決這些內部嚴重潛在威脅之前，雖然在激烈的主權爭端中不會輕易讓步，但也不會輕易在主權爭端之外的議題擺出明顯的戰略攻勢態勢，其地緣戰略在尚未獲得足夠的力量支援之前，不會貿然越過亞太島鏈地區向大洋發展，或超越目前中國能力所及的範圍，將勢力朝不相鄰的地緣政治區域伸展，而會持續關注其內部屬於東亞大陸以及與歐亞大陸連結的經濟落後省分之發展，並藉此消弭可能的內部動亂危機。此外，強調積極防禦的戰略次文化亦使當代中國的地緣戰略方向不可能真正轉為海洋性，蓋海洋性地緣戰略強調以海軍在海洋上的戰略攻勢來獲致制海權，但積極防禦強調的是作戰的「積極性」，其戰略本質仍是防禦性，地理性質也是陸戰思考而非海洋思考，以此作為整體國防戰略指導亦證明其地緣戰略的真正方向與重心仍在大陸而非海洋。

最後，中國雖然身為結構中的強權，但尚未壓倒日本、印度、東協等區域整合競爭對手取得東亞區域整合的領導權，按照自己的利益與意志組織在政治、經濟、安全各層面受其領導的東亞地緣戰略領域。這顯示使其地緣戰略在現階段很難越過重重阻礙向外延伸，必須等到其周邊不存在對其核心利益真正的威脅之後，才可能超越東亞大陸與亞太島鏈地區向外發展。而深入歐亞大陸內部的廣袤西部領土雖然使其具有接近中亞能源蘊藏區、利用歐亞大陸的陸上運輸以降低對海上交通線之依賴、提高中國在歐亞大陸與經濟全球化中的競爭力，以及將西部領土作為在強權競爭中的重要資源後備基地與擴大戰略縱深的優勢，²⁰⁹但此種

²⁰⁷ 劉華清，**劉華清回憶錄**，前引書，頁 479。

²⁰⁸ 蔡偉，「禮儀之師的航母夢」，前引文。

²⁰⁹ 董鎖成、李周、魏曉東著，**中國西部大開發戰略研究**（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9 年），頁 9-22；王信賢，「中國大陸區域經濟發展」，魏艾主編，**中國大陸經濟發展與市場轉型**（臺北：揚

「陸海兼備」的形勢對於中國如何決定地緣戰略主軸與軍事投資卻具有嚴重的資源分散效果—如第五章所述，中國仍然視俄羅斯為未來的長期嚴重威脅，又與印度有懸而未決的嚴重領土爭端，以及面臨種族問題引發的西藏與新疆分離主義危機，再加上朝鮮半島局勢對中國東北部發展與周邊國際環境穩定的地緣政治密碼目標也具有相當程度的威脅，迫使中國必須將大量精銳的陸軍、空軍與戰略彈道飛彈部署於西部與北部地區，從而分散了進一步向遠洋發展的資源。

三、中國海上戰略交通線控制能力不足

雖然上述的結構、地緣政治密碼與戰略文化等變數都對當代中國的地緣戰略仍屬大陸性有所影響，但更根本的原因在於中國與其他採用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的個案一樣，迄今仍缺乏使其地緣戰略轉往海洋性發展所需的海上戰略交通線控制能力，而且中國的能力比之前的四個個案都更為低落。截至目前為止，中國仍缺乏編制完全，可供遠洋交通線控制作戰的大型遠洋水面艦隊，無論是最重要的航空母艦、艦載戰機機隊，與航艦戰鬥群所需的各種大型護衛水面艦隊，例如目前中國所擁有最接近成軍服役的「施琅號」航空母艦，原為前蘇聯海軍「庫茲涅佐夫級」(Admiral Kuznetsov Class)航艦的第二艘「瓦良格」號(Varyag)，可搭載包括 18 架Su-33 戰鬥機或MiG-29K戰機、15 架Ka-27 反潛直昇機與 2 架Ka-31 預警直昇機在內，最多約 50 架各型作戰機種的艦載機隊，但由於俄國拒絕出售 Su-33 戰機予中國，²¹⁰後者遂沒有真正的艦載戰機可供運用，只有仿造Su-33 但尚未服役的殲 15(J-15)戰機，²¹¹且缺乏與航艦搭配作戰之訓練與經驗，²¹²使得該艦即使能夠成功服役，要構成戰力仍有相當一段路要走。

此外，想要控制海上戰略交通線，僅有一個戰鬥群是不夠的，最低限度必須要保有至少三個以上的戰鬥群，才能至少有兩艘航艦執行作戰任務，換言之，擁有越多航艦戰鬥群，越能實施海上交通線控制作戰與掌握制海權。中國海軍雖然可能持續建造國產航艦，但這些航艦在數量上仍無法與美國相較，而「施琅號」受限於航艦大小(滿載約 65,000 噸)與其「滑跳式」(ski jump)飛行甲板的限制，使其只能搭載預警直昇機與反潛直昇機，也無法安全起降輕型運輸，機艦載戰機的數量、裝備與油料亦受到限制，不僅無法全方位執行任務，甚至還縮短了可執行

智出版社，2003)，頁 164。

²¹⁰ 中國從 2006 年起就與俄國談判關於購買 Su-33 戰機的軍售案，但由於中國先前違反當初俄羅斯出售 Su-27 戰機予中國時的智慧財產權協定，製造了本身仿造的 Su-27SK 戰機，使俄國極為不滿。而在 Su-33 戰機的軍售談判中，雖然中國提出 50 架的採購數量，但因為要求先提供 2 架戰機給中國「試用」，而觸怒俄羅斯導致談判破裂。“Russian-Chinese Su-33 fighter deal collapses-paper,” RIA Novosti, March 10, 2009, <http://en.rian.ru/russia/20090310/120493194.html>.

²¹¹ Gabe Collins and Andrew Erickson, “‘Flying Shark’ Gaining Altitude: How might new J-15 strike flight improve China’s maritime air warfare ability?” *China SignPost*, June 8, 2011, <http://www.chinasignpost.com/2011/06/flying-shark%E2%80%9D-gaining-altitude-how-might-new-j-15-strike-fighter-improve-china%E2%80%99s-maritime-air-warfare-ability/>; David Axe, “Chinese Carrier Lacks Fighters,” *The Diplomat*, May 5, 2011, <http://the-diplomat.com/flashpoints-blog/2011/05/05/chinese-carrier-lacks-key-aircraft/>.

²¹² Kamlesh Kumar Agnihotri, “China’s Naval Aviation and its Prospective Role in Blue Water Capabilities of the PLA Navy,” *Maritime Affairs*, Vol. 6, No. 2(Winter 2010), p. 37.

任務的範圍。反過來說，較大型的美軍航艦飛行甲板採用彈射器(catapult)起飛，不僅可搭載包括 40-50 架戰鬥機，亦可搭載需依靠彈射起飛的定翼(fixed wing)預警機、反潛機與輕型貨機，這些戰機在彈射器的幫助下，均能攜帶更多裝備執行任務，使得中國航艦戰鬥群的作戰範圍較美國狹隘許多，²¹³無法真正在開闊的大洋中作戰。²¹⁴

而除了航艦本身的限制之外，中國海軍能提供於航艦戰鬥群與遠洋作戰的大型水面艦隊亦感不足。以美國海軍的航艦戰鬥群(Carrier Strike Group, CSG)為例，其編制除了航艦本身與其配屬的艦載機之外，大約還包括一艘配備巡弋飛彈、能執行防空與多用途任務的巡洋艦(cruiser)、兩艘主要擔負防空任務的飛彈驅逐艦(destroyer)、一艘攻擊潛艦，以及一艘能在遠洋為航艦戰鬥群提供補給的遠洋補給艦。²¹⁵況且除了航艦戰鬥群之外，還必須擁有足夠數量的其他水面艦隊與潛艦部隊來實施其他沿岸防衛、護航與海上阻絕、交通線控制任務。由下表 6.1 可見，至 2011 年為止，中國海軍分別擁有 13 艘驅逐艦與 65 艘相當於巡防艦的護衛艦，二者合計雖然是僅次於美國，但假使中國想控制海上戰略交通線，這樣的數量遠遠不夠，蓋美國擁有多達 103 艘的巡洋艦、驅逐艦與護衛艦，而日本則擁有 50 艘，美日同盟合計(153 艘)已將近中國海軍的兩倍，此種數量劣勢在短期內無法迅速改變。更嚴重的問題是中國海軍的驅逐艦與護衛艦中，裝備技術與建造水準能擔負現代化遠洋作戰與航艦戰鬥群作戰任務的驅逐艦只有 1990 年之後建造與購買的 13 艘驅逐艦與 22 艘護衛艦，在數量與技術上完全不能單獨與美國或日本相較，²¹⁶遑論美日同盟的聯合力量。

雖然中國海軍擁有多達 71 艘潛艦，但潛艦一方面不是真正用於建立制海權

²¹³ 美軍航艦上部署的 E-2C「鷹眼」(Hawkeye)式空中預警機的偵測能力使其可配合航艦上的戰機打擊群，在航艦戰鬥群外圍畫出超過 300 公里的防禦範圍，但施琅號上原來搭配的 Ka-31 預警直昇機滯空時間只有大約兩個半小時，而且僅能偵測到 100 公里外的空中目標與 150 公里外的水面目標。此外，據稱中國正以其輕型運輸機一運-7 為基礎，發展與鷹眼式功能類似的定翼式早期預警機，並可能部署於施琅號上，但專家認為比較可能的情況是部署於中國未來自製且具備彈射起飛能力的航艦上。*Ibid.*; Gabe Collins and Andrew Erickson, “‘Flying Shark’ Gaining Altitude: How might new J-15 strike flight improve China’s maritime air warfare ability?”; “Russian media said China’s new transport aircraft will be equipped with improved early-warning 7,” *Military of China, force comment*, August 30, 2011, <http://www.9abc.net/index.php/archives/8909>.

²¹⁴ 張召忠認為中國需要的航艦不是美國那種大型核子動力攻擊航艦，而是與法國戴高樂號(*Charles de Gaulle*)航艦(滿載 42,000 噸)相仿或稍大、且能起降定翼戰機的中型航艦。不過這裡有個弔詭處，由於目前彈射起飛技術由美國所壟斷，戴高樂號以中型航艦的規模卻能起降鷹眼式預警機，關鍵即在於美國願意提供法國所需的蒸汽彈射器。假使中國無法從美國購得彈射器或成功研發，勢必只能維持滑跳式甲板，如此一來很可能成為真正的「近海」海軍。蔡偉，「禮儀之師的航母夢」，前引文。

²¹⁵ “The Carrier Strike Group,” *Official Website of the United States Navy*, <http://www.navy.mil/navydata/ships/carriers/powerhouse/cvbg.asp>.

²¹⁶ 中國大型水面艦中火力最強者為購自俄羅斯的現代級驅逐艦，數量為四艘。而雖然中國海軍亦嘗試自製配備與美國「神盾戰鬥系統」(Aegis Combat System)類似的「中華神盾」的蘭州級驅逐艦，不過該艦能導引的防空飛彈只有 48 枚，僅有美國、日本神盾級巡洋艦與驅逐艦的一半，且蘭州級目前只有兩艘，即使加上建造中的數量亦不過六艘，但日本則擁有兩級六艘神盾驅逐艦，美國則擁有 61 艘現役阿雷伯克級(Arleigh Burke class)神盾驅逐艦與 22 艘提康德洛加級(Ticonderoga)神盾巡洋艦，另有 13 艘建造中的阿雷伯克級。

的主要軍艦，二方面中國的潛艦與水面艦一樣，技術上較先進、能擔負現代化作戰任務的，也大約只有合計約 34 艘的核子動力與柴電動力潛艦，其中更只有兩艘新式的「商級」(Type 093)核子動力潛艦能擔負航艦戰鬥群的護航與支援任務。不僅在數量上完全無法與美國的 71 艘核子動力潛艦相較，即使在東亞的三個緣海內，中國潛艦無論在數量與技術上，面對日本的 18 艘與南韓的 12 艘柴電潛艦，亦無法取得明顯的數量與火力優勢，²¹⁷若再加上東南亞國家購進的潛艦則中國海軍潛艦部隊更無法取得數量與火力優勢，²¹⁸而且因為舊式艦艇仍然佔相當數量的比例，亦缺乏航艦戰鬥群在遠洋作戰必要的其他支援武力如巡洋艦。簡單來說，中國海軍本身既有的艦隊組成、科技，及其新航艦在遠洋海上交通線控制能力上的不足，²¹⁹嚴重限制了其地緣戰略的方向與目標。

表 6.3 2011 年亞太主要國家海軍船艦與人員編制數量之比較

國家\編制	航空母艦	潛艦總數	巡洋艦	驅逐艦	護衛艦	近岸艦艇	人員編制
澳洲	—	6	—	—	12	14	14,250
中國	—	71 (3)	—	13	65	211+	255,000
印度	1	16	—	10	12	49	58,350
印尼	—	2	—	—	11	66	45,000
日本	1	18	2	30	16	6	45,518
馬來西亞	—	2	—	—	8	37	14,000
菲律賓	—	—	—	—	1	65	24,000
南韓	—	12	1	6	12	111	68,000
新加坡	—	5	—	—	6	35	9,000
臺灣	—	4	4	—	22	73	45,000
泰國	1	—	—	—	10	82	44,011
越南	—	2	—	—	—	56	40,000
美國	11	71 (14)	22	59	22	28	330,065

*：括號內的數字為戰略彈道飛彈潛艦數量。

**：日本的航空母艦係滿載排水量達 19,000 噸的日向級直昇機護衛艦，雖然設計了與航空母艦相同的全通式甲板，卻因沒有裝置滑跳式甲板與操作定翼機的裝

²¹⁷ 日本海上自衛隊潛艦部隊的主力為親潮級潛艦，為世界上體型最大與最先進的柴電潛艦。南韓則為德製 209 級(Type 209)與 209 級的授權生產衍生型張保皋級(Chang Bogo class)。此三種潛艦的技術皆與中國的俄製基洛級(Kilo class)潛艦不相上下。

²¹⁸ 越南、印尼、馬來西亞與新加坡購入的潛艦，如非與中國一樣是俄製基洛級(越南、印尼)，就是德製 209 級潛艦或法製天蠍級(*Scorpène* class)潛艦(馬來西亞)，性能皆十分接近。而新加坡海軍的二手瑞典製潛艦雖然較為老舊，但性能亦不容小覷。

²¹⁹ 對中國航艦本身能力與中國海軍能提供的航艦戰鬥群能力分析，見 Yang, Shih-yueh & William C. Vocke Jr., “Chinese Aircraft Carrier Development: A Technical and Geostrategic Analysis,” pp. 2-6.

備而只能搭載直昇機。而不稱航空母艦、改稱「護衛艦」，乃是由於日本憲法禁止日本生產航空母艦的緣故。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 *The Military Balance* 2011 年之數據繪製。

最後，中國幾乎沒有任何供其遠洋交通線控制作戰所需的海外基地，而其海軍航空兵又甚為依賴陸上基地的支援，這使中國海軍在高度強調空中優勢對海上作戰重要性的現代，幾乎難以進入無法得到陸基空中武力支援的地區作戰。「珍珠串」戰略—如果真的有的話—上的港口既非中國在印度洋上的海軍基地網絡系統，亦非中國朝印度洋擴張並欲控制印度洋海上戰略交通線的明顯證據。這些港口不僅缺乏適合軍艦泊靠與補給的設備，而且以馬漢對前進據點與位置的要求標準—位置、強度與資源—來看，²²⁰非常容易遭到敵對海軍的攻擊而遭毀滅，根本無法提供中國海軍在印度洋上的交通線控制作戰所需的各種支援。²²¹最後，遠洋作戰能力仍極為有限的中國海軍根本不可能派出足夠的艦隊駐紮於任何一個「珍珠」之上，而艦隊又正是據點防禦與交通線控制最重要的工具，使得這些「珍珠」無法與國內的威力全員相連，即使發生緊急事件或需要在印度洋上遂行交通線控制作戰，也沒有真正的幫助。國家科技能力的不足、缺乏足夠的海洋設施，以及國際關係上的影響，使得中國海軍大致上還是只能在東海與南海投射武力，²²²無法真正進入太平洋或印度洋，這兩大洋在現階段來說並非中國地緣戰略的真正方向與重心。

綜合上述由亞太次體系的地緣政治結構、中國的地緣政治密碼與戰略文化的影響，以及中國的海上控制能力等三層面的分析，可發現中國的地緣戰略重心與實際上仍位於東亞大陸，雖然中國加大朝海洋發展的力度，但其範圍大多限於周邊海域，離不開大陸沿岸，更尚未跨出亞太島鏈地區朝太平洋或印度洋發展，這兩個大洋本身目前無論是哪一個，都絕非中國地緣戰略的主要方向與重心所在，最多只是以實行戰略防禦與海上阻絕為主的次要戰場。由於中國的海洋發展仍相當程度上依賴其陸地力量的幫助，不可能成為真正的海權，使其最多只能與蘇聯一樣成為在近海地區擁有有限制海權、能在遠洋地區實施海上阻絕的海權。

四、中國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的攻守性質

雖然中國能力的提升、在外交態度與軍事戰略的轉換並不表示其目的必然將挑戰美國在全球地緣政治體系中的主導地位，或取代美國目前在亞太次體系中的單極角色，且中國的地緣政治密碼同樣要求必須維持穩定的國際環境以完成對中國的建設，此一密碼的優先性甚至高於對臺灣與周邊主權爭端的領土要求。再加

²²⁰ 楊鎮甲譯，馬漢撰，*海軍戰略論*（臺北：中華文化會，1955年），頁119-120。

²²¹ Daniel Kostecka, "Hambantota, Chittagong, and the Maldives – Unlikely Pearls for the Chinese Navy," *China Brief*, Vol. 10, No. 23, November 19, 2010, http://www.jamestown.org/programs/chinabrief/single/?cHash=a82d537697&tx_ttnews%5Btt_news%5D=37196.

²²² Agnihotri, "China's Naval Aviation and its Prospective Role in Blue Water Capabilities of the PLA Navy," *op. cit.*, p. 44.

上中國實際上還未擁有真正可用於海上戰略交通線控制能力，而且周遭環繞著亞太次體系中最主要的單極、強權與區域大國，使其必須採取整體上而言屬於戰略防禦的態勢，並運用靈活、彈性的外交政策來降低結構施加於其上的戰略壓力，避免周遭強國對其形成圍堵(containment)的態勢。結果，雖然當前中國的大戰略仍與大多數帝國時代一樣維持攻勢、防禦與安撫型並用，但與古代不同的是，其以防禦型大戰略手段為主要大戰略態勢，另外搭配比重越來越高的安撫型大戰略手段作為間接戰略的原因，是因為當代中國仍然無法像古代中國那樣憑本身力量成為結構中的超強並完成標準地緣政治程序，必須如柯慶生(Thomas J. Christensen)的研究所指出的，以此降低結構施加於其上的戰略壓力，包括美中直接對峙的危險、美國在東亞的同盟體系以及中國周邊鄰國的「中國威脅論」共同形成對中國的發展極為不利的戰略包圍形勢，²²³而非因為無力克服結構的地理障礙，並基於嚴夷夏之防的思考。

但這並不表示當代中國的大戰略類型即與金竣遠的「新俾斯麥式」(Neo-Bismarckian)大戰略主張相符。確實當代中國與德意志帝國一樣，從結構的表面因素來看，皆因處於強國包圍之中而必須盡力維持周邊國際環境的穩定，才能確保其安全與發展，而且當代中國在目前並沒有金竣遠在其書中所羅列的，如同納粹德國與前蘇聯那樣的大規模領土野心，或與舊日本帝國一樣受困於明顯的資源缺乏與恢復昔日帝國的光榮。²²⁴但從地緣政治模式進行分析則非如此。俾斯麥主政下的國家，1871年之前的普魯士王國已經長期身為歐洲地緣政治次體系中的強權，和西發利亞體系與基督文明發展過程中的基本成員，其國際地位早已為體系所承認；爾後於1871年之後誕生的德意志帝國，在歐洲與全球地緣政治體系中的強權地位與角色，亦為其他成員所承認。而中國卻不具備這些條件，不僅各層次地緣政治密碼之目標皆是其被納入西發利亞體系後所失去或從未擁有者，甚至仍然為了維護本身的政治制度、價值觀與意識型態而對西發利亞體系秩序原則的普世化發展，持續採取敵視與抗拒的態度。

更重要但常被忽略的，是哈夫納(Sebastian Haffner)所指出的，²²⁵俾斯麥主政下的德意志帝國之外交政策，其實是其前身普魯士王國與新的德意志帝國之間在身份認同轉換時的展現。俾斯麥是完全的普魯士人，他所秉持的地緣政治密碼因而是普魯士的地緣政治密碼，即使在1871年新的德意志帝國成立之後，俾斯麥之後所奉行的外交政策其實也還是他原有的普魯士本位主義的地緣政治密碼所展現的外交政策，結合了梅特涅曾經給予他的忠告：「保持普魯士為一個滿足的國家」，²²⁶以及普魯士在1871年之後確實因為成為主宰奧地利以外整個德意志地區的霸權，需要時間來消化這一成果的基本事實。可是對俾斯麥所建立起來的新德意志帝國來說，這是一個新的、包含普魯士在內的國際法個體，普魯士實際上

²²³ Thomas J. Christensen, "Fostering Stability or Creating a Monster? The Rise of China and U.S. Policy toward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1, No. 1(Summer 2006), pp. 117-122.

²²⁴ Avery Goldstein, *Rising to Challenge: China's Grand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210.

²²⁵ 周全譯，Sebastian Haffner 著，*不合傳說的普魯士*(新北市：左岸文化，2012年)，頁244-245。

²²⁶ Alan Warwick Palmer, *Metternich*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2), pp. 325-326.

已經失去其國際法主體地位，融入德意志帝國之中，因此德意志帝國在俾斯麥或普魯士以外的「德國」戰略菁英，是從統一之後位於中歐地區，國家戰略利益擴散至整個歐洲，乃至歐洲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區的德意志帝國的角度來塑造其世界觀與地緣政治密碼，而非從原先侷限於歐洲東北，國家戰略利益範圍不超過德意志地區的普魯士的角度來建構其地緣政治密碼。由於普魯士「王國」在德意志帝國內逐漸消失，俾斯麥即使在執政的後期也必須與其他「德國」戰略菁英的新地緣政治密碼妥協，制訂一些不符合 19 世紀以來普魯士本位主義－追求國際環境穩定、重視與俄國的友誼－的外交政策，如殖民地擴張。²²⁷而在俾斯麥去職之後，從威廉二世以降的德國決策與戰略菁英皆不再秉持普魯士本位的地緣政治密碼，政策的改變實乃必然之事。

但是對當代中國來說，不存在這種普魯士－德意志之間的融合關係，中國的世界觀與地緣政治密碼一直都是國家戰略利益至少涵蓋整個東北亞的華夏本位主義思考，而這個東北亞的範圍已經幾乎與整個歐洲相仿，故當然不具備俾斯麥在 1871 年之後於德意志帝國外交政策上的踩煞車行為。況且俾斯麥的德意志帝國因為擴張而必須保持滿足來消化其成果，而當代中國從 1949 年建國伊始，無論在東海、南海與臺灣問題上，都不是這些爭端領土在實際與國際法兩個層面上的真正擁有者，尤其在臺海議題上更是如此，這使得中國必須致力於發展本身的遠洋大規模兩棲攻勢能力與海上戰略交通線控制能力並在這些領土爭端上採取攻勢才能達成其戰略目標，並符合其周邊密碼與國內強烈民族主義之需要。但俾斯麥主政下的德國沒有這種為了實現領土目標而採取攻勢的需要，反而因為併吞原為法國領土的亞爾薩斯與洛林(Alsace and Lorraine)兩省，而必須傾力採取守勢避免法國為了奪回亞洛兩省而與德國重啟戰端。因此從單元層級來說，中國在領土爭端上不若俾斯麥時期的德國是居於防禦地位，反而必須居於積極的攻勢地位，使其大戰略性質並非所謂的「新俾斯麥式」，而且與主流戰略次文化將逐漸趨向積極性甚至攻勢。

尤有甚者，隨著中國經濟進一步融入世界體系之中，加上中國的能力提升帶來其在全球地緣政治體系中的地位不斷上升，和中國國家利益因其發展而不斷對外延伸，並與國際事務發生以往不曾發生的密切連結等新變數之出現，當代中國戰略菁英的世界觀與地緣政治密碼與 1871 年之後其他德國戰略菁英一樣，已經發展為符合全球地緣政治體系的程度，不再侷限於過去的東亞範圍。這使得部分中國戰略菁英開始進一步要求中國應制訂能夠保護其在國外的重要國家利益的戰略與新海外軍事部署，²²⁸其實也更類似 1880 年代以後的德意志帝國而非之前的德意志帝國。這些行動的目的在目前雖可視為防禦性，但卻使中國獲得能將控制力與影響力向外投射的據點，未來便可在有需要時，進一步轉換為攻勢性戰略的基礎。若再考慮到海洋是中國未來的重要發展方向之一，而海上交通線之控制

²²⁷ 周全譯，Sebastian Haffner 著，*不含傳說的普魯士*，前引書，頁 246-248；Sondhaus, *Preparing for Weltpolitik*, *op. cit.*, pp. 153-158.

²²⁸ 例如海韜，「中國可建印度洋“三線基地群”」，*新華網*，2011 年 12 月 23 日，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herald/2011-12/23/c_131321310.htm。

(制海權)只能以攻勢手段獲致，則攻勢戰略手段在中國未來大戰略中的角色益形重要顯然是必然的趨勢。故中國儘管宣稱其整體戰略態勢為防禦，但為了達成併吞臺灣與實現其在東海與南海的海洋領土化，再加上控制周邊海上戰略交通線的等戰略目標，必然將使其中國培養強大的攻勢能力以及明顯的進攻態勢，尤其是在其視為最高優先的臺灣問題與南海領土爭端上。

中國追求成為體系中的一極並使體系走向多極化的地緣政治密碼更是在目前國力與地位提昇的情況下，對其大戰略性質與主流戰略文化偏好的最大影響。即使不以本論文對「極」的判定標準－對結構中陸地或海洋戰略交通線建立控制－這個目標本身就已經是一個極為積極的戰略目標；而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則顯示中國無論如何不是一個維持現狀的國家。這兩個體系/次體系地緣政治密碼必然使得中國隨著其能力的發展與地位之提升，產生攻勢型大戰略與戰略次文化具有主導當代中國大戰略與戰略文化之可能性，蓋所謂戰略上的「攻勢」，按照柯白之說法，係為以積極手段達成最終戰略目標者，無論最終目標的性質是積極或消極皆然。²²⁹積極性質的目標必須以積極之手段才能達成，消極手段不能達成積極之目的為戰略上之明顯原理。以往中國的「韜光養晦，有所作為」，前者屬於消極手段，後者則有積極之內涵，在中國僅為區域大國且能力弱小之時，以消極手段為主、帶有積極意涵的防禦手段為輔，不失為正確的作法。但隨著中國能力與國際地位的提升、國家戰略利益範圍逐漸延伸至整個亞太乃至全球，而不像以往那樣限縮於東北亞或東南亞，而中國卻仍是一個對現狀不滿的國家，則攻勢大戰略與戰略次文化必然將逐漸取得主導之地位，一如德意志帝國在 1890 年代之後的轉變，而目前吾人所見中國戰略菁英對是否要繼續維持「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辯論，即是這種轉變的過程。換言之，如果中國確有所謂的「新俾斯麥式」大戰略，那也是限於 1980-1990 年代之間，步入本世紀之後則展現了德意志帝國在 1890 年代的戰略轉換。

誠然，當代中國採取攻勢型大戰略手段的原因，不是像古代著眼於實現華夷一家的體系地緣政治密碼，或以積極的攻勢手段消除帝國的嚴重外部威脅，但攻勢大戰略手段也逐漸成為中國完成其標準地緣政治程序的重要政策工具。不過在目前，中國本身的直接控制能力發展仍不足，但相對來說，以經濟力量為基礎的柔性攻勢手段則較為強大，因此整體來說，目前的中國的直接控制能力只能使其攻勢大戰略手段運用於其最關切的臺灣與南海議題上，程度與範圍都仍屬狹隘，但由於其內政導向戰略文化之性質仍偏向強現實政治並存在濃厚的權力政治思維，故中國一方面從未放棄對攻勢大戰略手段的發展與運用機會，另一方面則加強運用以經濟為核心的柔性攻勢手段，和運用與前蘇聯類似的意識型態與心理作戰等間接戰略手段，²³⁰試圖以間接戰略彌補直接戰略之不足。總而言之，隨著中

²²⁹ Corbett, *Some Principles of Maritime Strategy*, op. cit., pp. 32-34.

²³⁰ 這樣的間接戰略行動被公開者甚至包括解放軍對美國軍方的政治工作。根據美國國會「美中經濟暨安全檢討委員會」發佈的 2011 年度對國會報告，即提到人民解放軍利用其外圍組織「中國國際友好聯絡會」(CAIFC)，在 2008 年與美國海軍退役將領歐文斯(Bill Owens)合作成立所謂的「三亞倡議」(Sanya Initiative)，利用與美國退役將領的交流會，不斷傳遞中國的意識型態與官

國國力的提升與能力的增加，其對大戰略的重要性更加明顯，無論是在直接或間接戰略的運用上皆然。

五、方向與操作

中國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的方向如葉自成所言，乃是「安西、靠北、爭東南」。此一地緣戰略方向是 1990 年代初期之後，地緣政治結構變化以及俄羅斯在獨立後所採取的新西方政策遭到挫敗，不得不逐步與中國靠攏，使中國得以將戰略重心至東南線地緣的產物。

(一)、靠北

雖然中國的陸權式海洋戰略的重心與方向是在東部海洋地區，但與俄羅斯、蒙古、中亞等國接壤的北線地緣實為中國能實施這種轉移的真正關鍵，沒有與中國友好且願意與中國合作的俄羅斯與中亞，就不可能出現「安西、靠北、爭東南」的地緣戰略方向，即使俄羅斯的態度可讓中國不須如冷戰時期那樣將地緣與軍事戰略重心置於北線地緣，至少也會使中國同時在歐亞大陸與亞太海洋地區等兩個主要地緣方向同時面臨潛在威脅的困難情況，甚至因為中亞局勢的不安定，使新疆處於所謂「三股勢力」的影響下，嚴重威脅中國在新疆地區的社會穩定與領土完整，迫使中國必須分散相當一部份的精力於歐亞大陸，無法全力專注於海洋發展。因此為了能夠維持本身的穩定並將戰略重心轉移至東南線地緣，中國無論如何必須全力維持北線地緣的穩定。吾人可發現，冷戰結束後中國儘管同時擁有海洋與陸地領土爭端，但已經解決的幾乎全部是北方的陸地領土爭端，西線與東南線地緣除了中越北部灣這一相對爭議較小的海洋領土爭端外，沒有其他重要的海洋領土爭端獲得類似的最終國際法解決。

穩定中國的北線地緣除了能解除腹背受敵的可能之外，還能將北線地緣作為以陸制海的最主要依據，畢竟中亞與俄羅斯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氣產地與僅次於中東的石油產地，²³¹而俄羅斯又是僅次於美國的軍事大國，與美國仍存有激烈的地緣政治競爭，可以引為中國在「爭東南」時牽制美國、日本等海洋勢力的重要盟友。除此之外，中國還需穩定中亞與新疆之局勢，在利用該地區作為重要能源進口區與基地，和通往歐洲的陸上交通線與潛在市場的同時，藉由打擊「三股勢力」來消除其對新疆作為中國領土一部份的威脅，使中國得以全力集中力量於東南線地緣。因此北線地緣「靠北」有兩大重點，第一是中俄關係，第二則是中亞的穩定。

方宣傳給予這些美國退役將領，試圖藉由這些退役將領來影響美國的對華政策，其具體行動包括遊說與阻止美國國防部發佈年度中國軍力報告、要求國會檢討臺灣關係法，以及宣傳軍售臺灣非美國主要利益的主張。“2011 Report to Congress of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November 16, 2011, http://www.uscc.gov/annual_report/2011/annual_report_full_11.pdf, pp. 365-366.

²³¹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June 2011,” *BP Global*, http://www.bp.com/assets/bp_internet/globalbp/globalbp_uk_english/reports_and_publications/statistical_energy_review_2011/STAGING/local_assets/pdf/statistical_review_of_world_energy_full_report_2011.pdf, p. 8, 10, 22, 24.

1. 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

中國在「靠北」方面的努力，首先是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為了建立這樣的夥伴關係，中國採取了多重政策以達成與俄羅斯之間的各種地緣政治安排，並深化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這些政策包括：²³²第一，努力解決與俄羅斯、中亞國家之間的領土爭端解決，不惜在爭端上採取退讓的態度，²³³結果，相較於在西線與東南線地緣僅與越南劃定北部灣及陸地邊界，其餘領土爭端離解決還遙遙無期，北線地緣的領土爭端目前幾乎已全部解決。第二，在 1996 年的聯合聲明中調整彼此在冷戰時期的軍事部署方向，俄羅斯調整重點至歐洲方面，中國則轉移至東南方。第三，自俄羅斯採購大量武器，並將俄羅斯作為中東以外的重要能源進口國。

如此的安排則雖然能建立穩定的中俄關係，卻不是真正的「靠北」操作，後者含有更為積極的權力與地緣政治操作意涵。中國必須拉攏俄羅斯使其支持中國的國際政治立場與在東南線地緣的擴張才能算是真正的「靠北」，特別是中國認為美日等國際力量在臺灣問題上的涉入越來越深，使用武力解決臺灣問題的可能性一直存在，而俄羅斯在這方面的支持便顯得特別重要。²³⁴因此中國在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中，以支持俄羅斯對車臣(Chechnya)的政策立場交換俄羅斯支持中國對臺灣的政策立場，遏制俄羅斯決策圈的親西方的傾向，²³⁵並加上共同反對美國的單邊主義與反彈道飛彈系統政策，來使俄羅斯作為中國向東南線地緣發展時的重要盟友。儘管所謂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並非真正的同盟，但在主要權力平衡手段由 19 世紀後半以來利用互相對抗的正式軍事同盟來調整體系內權力相對分配狀態與遏止潛在威脅的觀念與手段，逐漸轉變為冷戰結束後，以非正式安全安排來牽制共同潛在威脅與防範後者行動的冷戰後美國海權單極地緣政治體系中，²³⁶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隱然確實成為擁有防止美國單極體系對其施加進一步壓力的中俄兩國，用來對美國實施「軟平衡」的最主要工具。²³⁷

2. 上海合作組織與新陸地交通線建設

²³² Nadkarni, *Strategic Partnership in Asia*, op. cit., pp. 55-73.

²³³ *Ibid.*, pp. 65-66; Taylor M. Fravel, *Strong Border, Secure Nation: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in China's Territorial Disput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160-166.

²³⁴ 劉清才，*東北亞地緣政治與中國地緣戰略*(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頁 343。

²³⁵ Nadkarni, *Strategic Partnership in Asia*, op. cit., pp. 58-59.

²³⁶ 泰斯曼(Brock F. Tessman)認為這乃是源自冷戰後的體系是為權力分散的單極體系的結果，次等強國既然沒有希望真正形成傳統同盟來成功制衡單極，唯有利用戰略防範(strategic hedging)來避免與單極在短期內的直接對抗，並增加自身在可能與單極的長期軍事緊張對峙中生存的機率，或成功對抗因為單極取消原本在體系內提供的有利公共財或安全補貼，對本身所造成的安全威脅。但是本論文認為防範的使用不僅限於次等強國，例如目前的美國也在利用增加與非盟邦的亞太國家的戰略合作，這顯然也屬於戰略防範的作為。此外，這也涉及國家對權力平衡概念的轉換，以及冷戰後體系在秩序原則上的差異，否則在 19 世紀同樣屬於權力分散式的英國海權單極體系中，攻守同盟仍然是主要的權力平衡工具，而非戰略防範。見 Brock F. Tessman, "System Structure and State Strategy: Adding Hedging to the Menu," *Security Studies*, Vol. 21, No. 2(April-June), pp. 192-231.

²³⁷ Chaka Ferguson, "The Strategic Use of Soft Balancing: The Normative Dimensions of the Chinese-Russian 'Strategic Partnership'," *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35, No. 2(April 2012), pp. 197-222.

上海合作組織是中國「靠北」的另一項重要政策，作為次體系內國家合作打擊所謂的「三股勢力」對次體系內各國國家安全的威脅的主要建制。結果是形成以俄羅斯和中國為主導的歐亞大陸兩極結構，中國和俄羅斯各自劃分其勢力範圍——大體上東亞地區(包括東北亞及東南亞地區)應以中國的意見為主，中東及歐洲事務則由俄羅斯主導。²³⁸此種劃分能夠成立，基本上乃是因為兩者的地緣戰略重心不同的緣故——中國轉移至東方的海洋地區，俄羅斯則必須應付歐盟與北約的東擴，以及美國在中歐部署國家飛彈防禦系統(NMD)帶來的地緣政治與戰略壓力。

由於中國努力維持北線地緣的穩定，故盡量以協作性權力平衡思維處理涉及此一方面的地緣政治事務，但中國與此一方面的俄羅斯、中亞國家實際上並沒有放棄互相競爭，中亞國家更不希望中國或俄國獨自支配中亞。在這樣的情況下，上海合作組織不僅是成員國協作性權力平衡的產物，也帶有明顯的競爭性權力平衡思維，而正是這種競爭性權力平衡思維的運作及與協作性權力平衡的結合，使上海合作組織得以成立並運作至今——中亞國家利用希望獲得油氣資源與不希望俄國重新支配中亞的中國來牽制俄國在中亞的影響力並確保自己的獨立，與中國一起利用上海合作組織加以平衡俄國，但俄羅斯也利用上海合作組織限制中國在中亞可能的勢力範圍擴張。²³⁹此外，俄國不希望上海合作組織與中國有進一步的經濟整合，²⁴⁰而中國也不支持上海合作組織與集體安全條約組織之間進一步軍事合作關係的態度。然而隨著新疆維吾爾族的動亂在 2009 年以後的增加與大規模化，上海合作組織在中國原來利用穩定中亞以協助中國打擊新疆分離主義與宗教激進主義對中國領土完整的威脅顯得更加重要。²⁴¹

「靠北」不僅意味著維持北線地緣的穩定，另一方面還在於利用這一方面實施以陸制海。而欲在北線地緣以陸制海，除了藉助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與上海合作組織作為增強與美國海洋單極、日本等海洋國家的安全競爭籌碼之外，另一個相當重要的面向在於進一步強化中國的能源安全，以及利用貿易導向經濟協助西部大開發，穩定中國的後方戰略基地。對中國來說，這方面的重要性可能還超過與俄羅斯的戰略合作關係。因此北線地緣便匯聚了上文提到的中國在中亞地區的陸地交通線建設，包括境外天然氣管線、石油管線，以及連接心臟地帶的新國際鐵路路線，顯示中國的北線地緣戰略操作乃是意欲同時以能源貿易和安全合作來穩定中國在北方的地緣政治形勢，是明顯的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操作。不過整體來說，北線地緣即使攸關中國的能源安全與新疆的穩定，而且包含俄羅斯這個中國的次體系地緣政治密碼合作對象，但由於該區遠離中國的東南線地緣，除了能源之外亦非重要的市場所在，而能源進口亦不能完全取代中國對印度洋海上戰略交通線的依賴，故居於中國在大陸方向地緣的次要地位。

²³⁸ 連弘宜，「俄羅斯當前東北亞政策初探」，*戰略安全研析*，第 81 期(2012 年 1 月)，頁 22。

²³⁹ Maria Raquel Freire, "Russian Policy in Central Asia: Supporting, Balancing, Coercing, or Imposing?" *Asian Perspective*, Vol. 33, No. 2 (Summer 2009), pp. 125-149.

²⁴⁰ Nadkarni, *Strategic Partnership in Asia*, op. cit., p. 75.

²⁴¹ 白樺，「新疆騷亂使上合組織對中國更加重要」，*美國之音中文網*，2009 年 10 月 15 日，<http://www.voanews.com/chinese/news/Putin-shang-hai-20091015-64352762.html>。

(二)、安西

另一個中國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的大陸本質展現與操作是力求安定以印度和巴基斯坦為主要目標的西線地緣。由於印中關係的地緣政治衝突遠多於俄中關係：就領土而言，雙方沿著西藏與印度的邊界有廣大且難以解決的領土爭端；就政治而言，印度雖然承認西藏為中國領土，但印度卻是包括達賴喇嘛在內的西藏流亡人士最主要的庇護國，此外印度在 1962 年中印邊界戰爭中慘敗給中國，也一直為印度耿耿於懷；最後就地緣戰略目標而言，印度擁有可隨時威脅中國對印度洋海上戰略交通線運用的戰略地理位置，而且始終認為印度是南亞與印度洋地區的支配國，不容許其他強國染指印度洋地區的傳統戰略共識，²⁴²對於中國能否順暢使用印度洋海上戰略交通線構成極大的潛在威脅，如張貴洪所指出的：「崛起的印度對中國來說意味著一個強大的競爭者，雙方的利益和影響從南亞、西亞、東南亞、中亞到印度洋和太平洋已經或即將相撞」(圖 6.8)。²⁴³這些因素與潛在衝突顯示，中國不能像倚靠俄羅斯那樣，「倚靠」印度與南亞作為在亞太海洋地區擴張的後方，必須設法「安定」西線地緣以免印度成為海洋同盟圍堵中國的陸地盟友，否則將使中國無法全力投注於「爭東南」。

圖 6.8 中印勢力範圍



²⁴² James R. Holmes, Andrew C. Winner and Toshi Yoshihara, *Indian Naval Strateg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 41; 高一中譯, Stephen Philip Cohen 著, *印度：成型中的強權*(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2003 年), 頁 96。

²⁴³ 張貴洪, 「美印戰略伙伴關係與中國：影響和對策」, *當代亞太*(北京市), 第 5 期(2005 年), 頁 33。

資料來源：John W. Garver, *Protracted Contest: Sino-Indian Rival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1), p. 15.

中國的「安西」作為既包括對印度的圍堵，也包括與印度的交往，消極來說是不希望印度成為中國的主要威脅，甚至成為上述美國、日本對中國「圍堵」的重要部份。積極來說則希望印度能成為中國推動大戰略的助力。²⁴⁴但以純粹競爭性權力平衡思維處理與印度的關係將會激起原本就對中國猜忌甚深的印度的反擊，並不符合中國希望安定西線地緣與周邊國際環境的地緣政治密碼。故中國追求西線地緣的穩定與具有明顯協作性權力平衡作為的北線地緣不同，係採取與印度交往但又限制印度的影響力進入東亞與中亞，並在領土爭端議題上具有明顯軍事嚇阻意味的防範戰略操作。

整體來說，中國的「安西」對印度的主要安撫手段包括建立與印度之間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2004年)、高層間的多次友好互訪、聯合軍事演習、以軍事交流為基礎的信心建立措施、擴大雙邊貿易規模和追求戰略共識，以及藉由金磚國家(BRICS)與中俄印三邊戰略合作進行對話並擴大在世界經濟與環境議題的合作。²⁴⁵此外，胡錦濤在2006年11月訪問印度時公開表態支持印度與巴基斯坦改善關係以穩定南亞，此後中國在2009年11月的「中美聯合聲明」中與之後，亦持續表態支持巴基斯坦與印度直接對話以改善和發展關係。²⁴⁶北京似乎也改變早先對印度東望政策(Look East Policy)的競爭性觀點，利用官方媒體半公開地承認印度的外交政策與中國一樣是追求獨立自主，而非追隨美國對中國的圍堵。²⁴⁷此外，印度與中國也在2007年建立了年度國防對話機制。這些作為使得中印之間的嚴重誤解在最近幾年稍有改善。²⁴⁸

²⁴⁴ Taylor M. Fravel, "China Views India's Rise: Deeping Cooperation, Managing Differences," in Ashley J. Tellis, Travis Tanner, and Jessica Keough ed, *Strategic Asia 2011-12: Asia Responds to Its Rising Powers, China and India* (Seattle and Washington, D.C.: 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2011), p. 66.

²⁴⁵ Nadkarni, *Strategic Partnership in Asia, op. cit.*, pp. 136-143; "India, China reject rivalry, seek strategic consensus," *The Times of India*, December 16, 2010, <http://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india/India-China-reject-rivalry-sseek-strategic-consensus/articleshow/7112213.cms>; 崔繼新，「中俄印三邊合作的穩定發展及其制約因素」，*俄羅斯中亞東歐研究*（北京），第4期(2009年)，頁66-68。

²⁴⁶ 「國家主席胡錦濤在印度科學宮發表重要演講(全文)」，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06年11月22日，<http://www.fmprc.gov.cn/chn/gxh/zlb/ldzyjh/t281240.htm>；「中美聯合聲明(全文)」，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09年11月17日，<http://www.fmprc.gov.cn/chn/pds/ziliao/1179/t627468.htm>；「印媒：辛格訪美將強調反對中國在南亞發揮作用」，*中國評論新聞*，2009年11月23日，<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11/4/4/6/101144665.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1144665>；「2011年3月29日外交部發言人姜瑜舉行例行記者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11年3月29日，<http://www.fmprc.gov.cn/chn/pds/wjdt/fyrbt/t810580.htm>；"China praises Zardari's India visit," *The Times of India*, April 8, 2012, <http://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india/China-praises-Zardaris-India-visit/articleshow/12580957.cms>.

²⁴⁷ "India pursuing independent foreign policy: Chinese daily," *The Times of India*, April 6, 2012, http://article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2012-04-06/india/31299766_1_bricks-summit-trilateral-dialogue-independent-foreign-policy.

²⁴⁸ 某些印度學者指出，胡錦濤十年的執政與印度前後兩任總理在很多不同場合會晤過，雙方對彼此的認識或許較先前任何時期的兩國領導人更為透徹。何宏儒，「印中矛盾考驗彼此合作」，中

但是與上述符合中國追求周邊國際環境穩定地緣政治密碼的態度與作為相較，中國在「安西」方面更明顯的是從外交與軍事兩層面對印度雙管齊下的包圍與嚇阻，有時甚至與上述的安撫行為互相矛盾。最明顯的就是，儘管中國與印度之間有明顯的天然邊界，似乎擁有比中俄在中亞更容易出現協作性權力平衡運作的先決地緣政治結構條件，但實際上，中印關係卻遠不如中俄關係密切，而且直到目前為止根本沒有出現類似上海合作組織那樣，以中印兩國為核心、包含南亞甚至部分中亞國家等雙方潛在勢力範圍內其他區域大國乃至中小型國家的區域政府間國際組織來協調並安排雙方在南亞的地緣政治利益衝突，甚至相互排斥對方進入己方在潛在勢力範圍的地緣政治區域中組織的區域組織。並且從南亞次大陸到印度洋都有各種程度不一的地緣政治衝突與競爭性權力平衡運作。

首先從政治上來說，中國與印度雖然建立了戰略合作伙伴關係，但中國與印度在南亞的最大競爭對手，同時也是中國自 1970 年代以來的盟友巴基斯坦，卻建立了更密切的「全天候戰略合作伙伴關係」，而且相較於俄羅斯同時支持印度與巴基斯坦由現有的觀察員地位提升至上海合作組織正式會員申請案的態度，²⁴⁹ 中國的態度是支持巴基斯坦，但從未公開表態是否支持印度的申請案。同時，中國利用美國和巴基斯坦關係在 2011 年美國在巴基斯坦境內擊斃蓋達(al-Qaida)組織首腦賓拉登(Osama bin Laden)而急轉直下，導致後者陷入孤立無緣的處境，重申與巴基斯坦的長期盟友關係。如果說重申中巴友好關係的主要目標是美國而非印度，那麼中國在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連任的支持對象就展現出對印度的防範與壓力，不顧印度為了希望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而對中國、巴基斯坦採取較退讓的「寧靜外交」(quiet diplomacy)，²⁵⁰ 在 2011 年 10 月宣布基於兩國長期盟友關係，中國決定支持巴基斯坦繼續擔任聯合國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使得同樣尋求連任的印度大感懊惱。²⁵¹

事實上，印度尋求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一案最能看出中國對印度的猜忌與防範。這不僅涉及到印度成為常任理事國將大為提升其國際地位，可能進一步成為中國在亞太，乃至非洲與印度洋地區更有力的競爭對手，還在於印度在安理會改革一案上與日本維持極為密切的合作，二者都是所謂尋求成為安理會新常任理事國成員的「G4」(日本、印度、巴西、德國)的成員國，再加上印度與日本已經

央社，2012 年 3 月 28 日，<http://www.cna.com.tw/News/aALL/201203280309.aspx>。

²⁴⁹ 俄羅斯在 2010 年與 2011 年曾兩度表達過支持印度成為上海合作組織正式會員的態度，另外在 2011 年 5 月表達支持巴基斯坦的態度。“Russia backs India's case for SCO membership,” *The Times of India*, June 12, 2010, http://article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2010-06-12/india/28313547_1_sco-russia-backs-india-and-pakistan; “Russia pledges support to India for SCO membership,” *IBN Live News*, November 17, 2011, <http://ibnlive.in.com/generalnewsfeed/news/russia-pledges-support-to-india-for-sco-membership/904924.html>; Fyodor Lukyanov, “Russia to include Pakistan in the SCO puzzle,” *RT*, May 13, 2011, <http://rt.com/politics/columns/unpredictable-world-foreign-lukyanov/russia-pakistan-sco-us/>.

²⁵⁰ Kim Chan-Wahn, “India’s Quiet Diplomacy: Seeking A Permanent UN Security Council Seat,” *POSRI Chindia Quarterly*, (Winter 2012), pp. 82-84.

²⁵¹ Ali Raza, “India upsets as China endorses Pakistan for Non-Permanent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seat,” *New Pakistan*, October 20, 2011, <http://www.newspakistan.pk/2011/10/20/india-upsets-as-china-endorses-pakistan-for-non-permanent-united-nations-security-council-seat/>.

發展出相當密切的戰略安全合作關係，其背後目標直指中國。因此中國設法利用安理會改革一案壓抑印度，並試圖拆散印度與日本的戰略安全合作。中國一直以來都以「支持安理會進行必要改革...主張優先增加發展中國家在安理會的代表性...中方支持印度在國際事務中的地位，理解並支持印度希望在聯合國發揮更大作用的願望，願與包括印度在內的其他聯合國會員國就聯合國安理會改革問題保持接觸與協商」等極為模糊的言語帶過，²⁵²中國總理溫家寶在 2011 年元月訪問印度與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 2012 年三月在新德里出席金磚五國(BRICS)會議時皆未提及此事，²⁵³而中國同時又希望以此為誘餌，拆散印度與日本之間的合作關係，²⁵⁴同時私下運作在實質上反對印度與日本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蓋中國一方面雖然支持安理會改革，但卻要求安理會改革的各項問題必須達成「一攬子」共識，這將使得印度與日本因為改革問題上的爭議而實際上幾乎無法成為常任理事國，另一方面中國則私下運作，要求東南亞國家必須注意到安理會的擴大須有耐心與「廣泛的共識」。²⁵⁵

不過除了這些外交上的壓抑之外，中國對印度還有更進一步的嚇阻與圍堵作為，所謂的「珍珠串」，雖然不是立即的軍事戰略作為，但卻是對印度的防範作為之一：中國藉由對緬甸、孟加拉、斯里蘭卡、馬爾地夫等印度周邊或鄰近印度的印度洋地區中小型國家的投資與合作，設法降低印度對這些國家的影響力，以牽制印度在印度洋的海上發展。²⁵⁶不過珍珠串的滲透力主要以經濟力量為主，中國的軍事力量尚未真正進入印度洋地區，因此還不是真正的威脅。中國的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對印度真正的嚇阻與圍堵作為來自陸地而非海洋，主要是由中國在西藏、中印邊界、印度周邊鄰國等地區的軍事相關建設與部署所組成。印度戰略菁英在 1998 年曾指出，中國對印度北方緊鄰西藏的非「印地語」(Hindi)國家—尼泊爾與不丹—的關係並非如中國與其他東亞國家一樣是以經濟為主，長期以來中國與該兩國的關係乃是國防與情報關係、軍事裝備轉移與政治支持等關係為主；²⁵⁷而在 2006 年青藏鐵路通車以後，由於中國獲得能迅速向西藏投射大量武力的重要交通線，遂轉變為以青藏鐵路為主軸，在西藏境內約 58,000 公里左右

²⁵² 此為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在 2010 年 11 月 9 日的記者會中的發言。「2010 年 11 月 9 日外交部發言人洪磊舉行例行記者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10 年 11 月 9 日，<http://www.fmprc.gov.cn/chn/pds/wjdt/fyrbt/t767721.htm>。

²⁵³ Jim Yardley, "BRICS Leaders Fail to Create Rival to World Bank,"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29, 2012, http://www.nytimes.com/2012/03/30/world/asia/brics-leaders-fail-to-create-rival-to-world-bank.html?_r=1&ref=asia#.

²⁵⁴ 據印度媒體的報導，中國在 2011 年 7 月間曾對印度表示，如果印度能放棄與日本一起申請常任理事國席次，中國將準備支持印度。Ananth Krishnan, "China ready to support Indian bid for UNSC," *The Hindu*, July 16, 2011, <http://www.thehindu.com/news/international/article2233806.ece>.

²⁵⁵ "Opposition gathers against India's UNSC push," *The Time of India*, April 28, 2011, http://article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2011-04-28/india/29482018_1_india-s-uns-uns-uns-uns-reform-process-countries.

²⁵⁶ Vikas Bajaj, "China's 'string of pearls' meant to encircle India?" *Deccan Herald*, February 2012, <http://www.deccanherald.com/content/53291/chinas-string-pearls-meant-encircle.html>.

²⁵⁷ John W. Garver, *Protracted Contest: Sino-Indian Rival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1), p. 30.

的鐵公路網和五座作戰功能完善機場的基礎設施，²⁵⁸以及青藏鐵路向尼泊爾的延伸線。青藏鐵路的通車以及西藏境內基礎設施的完善，其目的固然是為了中國西部大開發與經濟發展，但亦使得中國能在一個月內部署 30 個師至中印邊境，可在該作戰區對印度形成至少三比一的數量優勢。²⁵⁹而青藏鐵路尼泊爾延伸線不僅使尼泊爾脫離印度、改接受中國的經濟影響，且使得尼泊爾成為中印邊界之外第三個中國對印度施加軍事壓力的地點，²⁶⁰尼泊爾本身更為了使中國能將青藏鐵路延伸進入該國以降低印度對該國的影響力和該國對印度的依賴，與中國的交換條件便是禁止國內有任何反中活動，²⁶¹儼然已經自視為中國在南亞的衛星國。

對印度威脅更大的是連接喀什米爾與瓜達爾的「中巴鐵路」，雖然目前在鐵路預定經過的巴基斯坦控制喀什米爾地區已經存在一條於 1978 年完工的「中巴友誼公路」(Sin0-Pakistan Friendship Highway)，是中國在「加德滿都—拉薩」(Kathmandu-Lhasa)公路之後第二條完工穿越喜馬拉雅山的跨國公路，而且早已在當時引發印度高度的疑慮，認為中巴友誼公路能使中國更便利地派遣部隊進入巴基斯坦控制下的喀什米爾。²⁶²而鐵路的運輸量遠大於公路，對印度來說其潛在威脅比中巴友誼公路更大。中國雖然尚未正式動工興建這條鐵路，但已經開始在巴基斯坦控制的喀什米爾興建鐵公路等基礎設施，印度已經就此向中國提出抗議，視此為對印度國家安全的嚴重威脅。²⁶³

更為敏感的是中國在印度周邊的軍事行動。雖然中國以擔憂引發與美國和印度的敵對為由，拒絕了巴基斯坦在其境內設立海軍基地的要求，²⁶⁴但中國卻更有興趣於以打擊以追求新疆獨立為宗旨，並與蓋達組織(al-Qaeda)有聯繫的「東土耳其斯坦伊斯蘭運動」(East Turkestan Islamic Movement, ETIM)恐怖組織為名，在巴基斯坦境內尋求設立軍事基地與駐軍，²⁶⁵以及利用修復連接新疆與巴基斯坦的「中巴國際公路」(Karakoram Highway)為名，派遣多達 11,000 名以上的解放

²⁵⁸ "India tells China to stop infrastructure work in Pok," *The Times of India*, September 6, 2011, http://article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2011-09-06/india/30118628_1_strategic-roads-india-china-border-zakama.

²⁵⁹ 這是美國國防部在 2011 年 8 月的評估，印度國防部本身在 2006 年的評估則是中國利用青藏鐵路可在一個月內部署 12 個師至中印前線。Abanti Bhattacharya, "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the Qinghai-Tibet Railway," *Institute for Defence Studies & Analyses*, July 7, 2006, http://www.idsa.in/idsastrategiccomments/StrategicImplicationsoftheQinghaiTibetRailway_ABhattacharya_070706; Rajat Pandit, "Pentagon warns India of Chinese build-up," *The Times of India*, August 26, 2011, http://article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2011-08-26/india/29931170_1_ballistic-missile-css-5-df-31a.

²⁶⁰ B. Raman, "China: India Strategic Strangulation," *South Asia Analysis Group*, Paper no. 4069, September 20, 2010, <http://www.southasiaanalysis.org/%5Cpapers41%5Cpaper4069.html>.

²⁶¹ Shirish B Pradhan, "Extend Tibet railway line to Kathmandu, Nepal tells China," *The Indian Express*, October 12, 2009, <http://www.indianexpress.com/news/extend-tibet-railway-line-to-kathmandu-nepa/527936/>.

²⁶² Garver, *Protracted Contest*, *op. cit.*, pp. 206-207.

²⁶³ "India tells China to stop infrastructure work in Pok," *op. cit.*.

²⁶⁴ "China deploys 11,000 troops in Gilgit area in Occupied Kashmir," *The Indian Express*, August 28, 2010, <http://www.indianexpress.com/news/china-deploys-11-000-troops-in-gilgit-area-i/673770/>; Harsh V. Pant, "The Pakistan Thorn in China-India-U.S. relations," p. 84.

²⁶⁵ Amir Mir, "China seeks military bases in Pakistan," *Asia Times Online*, October 26, 2011, http://www.atimes.com/atimes/South_Asia/MJ26Df03.html.

軍進入巴基斯坦控制的喀什米爾「吉爾吉特－巴爾帝斯坦」(Gilgit-Baltistan)地區，²⁶⁶更有巴基斯坦當地報紙報導巴基斯坦為了挽救與美國關係急速降溫後的孤立態勢，打算將這塊地區租予中國 50 年的傳言。²⁶⁷此外，藉由 2011 年 12 月 2 日塞席爾群島外長的邀約，中國似乎正嚴肅評估於該國設立一個印度洋海上軍事補給站的可行性，²⁶⁸即使這尚未成為事實，但已經引發印度的嚴重疑慮。²⁶⁹

不過與這些大多仍在傳聞階段的境外軍事部署相較，印度更為關注中國經常利用邊境軍事行動對印度施加壓力。中印實際控制線的中國守軍多次發生越界進入印度控制區的行為，但最大規模的軍事嚇阻行動應該是解放軍在 2012 年 3 月 23 日於西藏舉行的大規模軍事演習，這是解放軍首次在西藏高原出動殲-10 戰機進行實彈演習，而且一反過去殲-10 戰機只在夏季部署於西藏的作法，解放軍這次讓殲-10 戰機在冬季也部署於西藏，而演習規模也讓印度媒體認為，中國藉此向印度傳達訊息，表達其即使處於政權交替階段也有能力以武力處理對外事務。²⁷⁰

(三)、爭東南

這是中國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當前真正的重點與方向所在。雖然安西與靠北是中國地緣戰略的確定方向與戰略菁英的共識，但在「爭東南」這個方向，究竟應以南海與中南半島為核心的東南亞為主，還是以東海、黃海與朝鮮半島為核心的東北亞為主，中國戰略菁英對此尚無定論，中國的戰略行為也未能明確顯示出其重心以東北亞或東南亞為主。

1. 方向與重心

張文木與劉清才等人主張，由於東北亞同時匯集俄羅斯、中國、日本、臺灣海峽與朝鮮半島等對中國安全最為重要的國家與議題，是大國利益交匯的地方，故東北亞應該是中國展開大國外交的首要陣地與睦鄰外交戰略的優先選擇；²⁷¹另外由於臺灣問題是東海海洋安全戰略的瓶頸，如果先解決臺灣問題，南海問題的

²⁶⁶ Pant, "The Pakistan Thorn in China-India-U.S. relations," *op. cit.*, p. 92.

²⁶⁷ Tufail Ahmad, "Chinese Military Taking Over Gilgit Baltistan, Pakistan Considering Proposed to Lease the Disputed Region to China for 50 Years," *Institute for Gilgit Baltistan Studies*, February 10, 2012, <http://www.gilgitbaltistan.us/Analyses/chinese-military-taking-over-gilgit-baltistan-pakistan-considering-proposal-to-lease-the-disputed-region-to-china-for-50-years-by-tufail-ahmad-memri.html>.

²⁶⁸ "Seychelles Invites China to Set Up Anti-Piracy Base," *Defense News*, December 2, 2011, <http://mobile.defensenews.com/story.php?i=8450805&c=ASI&s=SEA>.

²⁶⁹ Mandip Singh, "The Proposed PLA Naval Base in Seychelles and India's Options," *Institute for Defence Studies & Analyses*, December 15, 2011, http://www.idsa.in/idsacomments/TheProposedPLANavalBaseinSeychellesandIndiasOptions_msingh_151211; Maseeh Rahman, "Chinese plans in Seychelles revive Indian fears of encirclement," *The Guardian*, March 22, 2012, <http://www.guardian.co.uk/world/2012/mar/22/china-seychelles-indian-fears-encirclement>.

²⁷⁰ Rajat Pandit & Saibal Dasgupta, "China 'warns' India with border drill," *The Times of India*, March 23, 2012, http://article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2012-03-23/india/31229503_1_chabua-airbases-actual-control.

²⁷¹ 劉清才，*東北亞地緣政治與中國地緣戰略*，前引書，頁 331-335。

解決就相對容易得多，故中國海洋安全戰略與地緣政治應以東北亞為重心。²⁷²但由於中國對海上貿易最重視的能源運輸中，大部分皆來自印度洋周邊地區而非太平洋彼岸，使得由中國沿海各港口往南穿越麻六甲海峽進入印度洋，再由印度洋至中東與大西洋的海上交通線成為中國最重要的海上交通線，²⁷³即使未來中國擬議與建設中的陸上油氣管線全部完工，總運輸量也還是遠遠無法與海運量相比，完全不會降低這條海上交通線的重要性。

再加上其西部大開發戰略中相當一部份是與西南地區的次區域經濟整合，中國本身也積極加入東亞區域經濟整合，導致鞠海龍、楚樹龍與金威等人主張應以南海－東南亞為主要方向與重心，因為該區不僅是海上戰略交通線所經過，資源豐富並且是中國重要的市場與文化交流地區，對中國有極高的經濟價值，不僅能讓中國發揮全面外交戰略，又能作為中國遏制日本與美國的優勢，是中國的地緣政治中心，而東北亞既非中國地緣政治的中心又缺乏資源，²⁷⁴一旦中國對南海的控制力增加後，便能藉此對經濟發展嚴重依賴南海航線的臺灣與日本對中國的南海「海權」產生極大的安全賴，使中國得以增強對臺灣問題的控制能力與對同屬海權競爭對手的日本的戰略威懾力，使南海成為「啟動」中國東北亞地區海權戰略，並在解決臺灣問題後啟動遠洋安全戰略的關鍵。²⁷⁵

由中國目前的戰略行動觀察以及上文對中國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特徵的分析，可發現兩種主張都可在當前的中國地緣戰略行動中看出。首先，由於中國本身的地緣政治結構中，首都、長江三角洲與「環渤海區」都面靠東北亞，美國、日本等兩大區域與次體系競爭對手，以及最重視的核心利益臺灣海峽亦皆位於東北亞，而東海油氣田相較於南海，也是已經證實其蘊藏並可加以開採的油氣田，故中國海軍較強大的戰艦，皆部署於北海與東海兩大艦隊，自俄羅斯進口、火力為中國海軍最強的四艘現代級驅逐艦亦全部配備於東海艦隊。而擔負南海地區作戰任務的南海艦隊雖然面對南海主權爭端與保護位於南海的海上戰略交通線，但南海一方面形勢極為複雜，二方面其面積極為廣大(350 萬平方公里)，陸基空中武力較難以覆蓋支援，使得南海艦隊配屬的新戰艦目前主要以配備較先進防空系統的旅洋級驅逐艦為主。

雖然 2008 年 2 月與 8 月分別有報導指出，²⁷⁶中國最新式核子動力攻擊潛艦－商級(Type 093, Shang class)與一艘新一代的核子動力彈道飛彈潛艦－晉級(Type-094, Jin class)，已經部署於海南島專門為核子潛艦擴建的三亞基地，²⁷⁷

²⁷² 張文木，「中國海洋安全防務重心在東海」，知遠戰略與防務研究所，2008 年 11 月 29 日，<http://www.defence.org.cn/article-13-93052.html>。

²⁷³ 楊金森、梁喜新、黃明魯，中國海洋開發戰略，前引書，頁 6。

²⁷⁴ 楚樹龍、金威主編，中國外交戰略和政策(北京：時事出版社，2008 年)，頁 73-74；同上註，頁 187。

²⁷⁵ 鞠海龍，中國海權戰略(北京：時事出版社，2010 年)，頁 276。

²⁷⁶ Hans M. Kristensen, "China's Noisy Nuclear Submarines,"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November 21, 2009, <http://www.fas.org/blog/ssp/2009/11/subnoise.php>.

²⁷⁷ 該基地的建設在 2008 年 5 月初首度遭西方媒體披露，並已與青島的姜哥庄基地一起被視為中國最重要的潛艦基地，不過姜哥庄基地是在冷戰時即以存在的中國第一個核子潛艦基地。Ben Blanchard and Benjamin Kang Lim, "China Shrugs off Report of Tropical Nuclear Sub Base," *Reuters*,

般也視中國在南海部署核子潛艦具有威嚇東南亞諸國的政治用意，²⁷⁸但在三亞基地部署核子潛艦的目的卻在利用南海的大水深與複雜海底水文躲避美、日衛星與水底監聽系統的監測，並同時利用巴士海峽進入太平洋支援中國海軍在太平洋的長期與遠程作戰，至於印度洋的作戰則並非主要目標。²⁷⁹職是之故，東北亞的兩個緣海可謂是中國海軍防務的重心與主要戰場所在，是必須奪取戰略制海權的地區第一島鏈東方的西太平洋則是這個主要戰場的次要戰場與實施海上拒止的主要地區。而東南亞則可視為整個中國海軍防務的次要地區，其中南海本身是這個地區需要奪取戰略制海權的主要戰場，而印度洋則是次要戰場與海上拒止區。另外根據美國國防部在 2007 年對中國海軍水面兵力配置的評估，64%的驅逐艦屬於東海艦隊，85%的護衛艦則屬於南海艦隊，²⁸⁰這不僅顯示當中國海軍在冷戰後不須面對來自蘇聯的威脅之後，原先以護衛首都的北海艦隊為重心的兵力配置已經逐漸改變，也顯示中國海軍為了奪取緣海內的戰略制海權，在區域內的戰略採取明顯的攻勢態勢—東海艦隊擔負對臺灣作戰的主力，南海艦隊則是應付南海爭端的主力。

李南雖非中國內部的戰略菁英，但他提出在純粹軍事與地緣政治因素之外，關於中國在冷戰後轉向以海洋為主的地緣戰略方向的新觀點，認為中國強化海軍發展與改變戰略優先性，與江澤民與胡錦濤兩代領導人的個人因素有密切的關係。兩人均未曾在解放軍中服役，缺乏如毛澤東和鄧小平般對軍隊的高度個人威信式控制力，因此必須嘗試以發展制度化控制解放軍的方式，將其侷限在執行功能性與技術性任務上，以使軍隊專注處理外部威脅，海軍則是解放軍中因為冷戰後兩代領導人推行制式化控制與外向化轉變的最大受益者，因為海軍是高技術軍種，不受政治力干預的制度化發展可使其有更大的發展空間。不過最重要的還是在於外部戰略環境改變，嚇阻臺灣獨立以及解決南海領土問題和保衛印度洋海上交通線等議題都必須仰賴海軍、空軍與二砲部隊，前兩者的作戰環境大多為非實體及一維或二維空間，而且能擔負的作戰任務也較少，但海軍的作戰範圍大都在實體空間與多維度空間，而且比空軍和二砲能承擔更多樣化的作戰任務。李南還指出江澤民與胡錦濤雖然都致力強化海軍，但由於戰略目標不同，建軍重點也大相逕庭：江氏首要戰略目標在嚇阻臺灣正式宣佈獨立與美軍介入台海戰爭，因此格外重視東海艦隊，而且由於臺灣離大陸較近，可依靠陸基戰機奪取空優，故他也拒絕劉華清的航艦計畫；胡錦濤則較重視中國的能源問題，因此他的戰略重心在南海與印度洋海上航道問題，故他特別青睞南海艦隊。²⁸¹

May 6, 2008,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idUSPEK14567120080506>.

²⁷⁸ Christopher McConaughy, "China's Undersea Nuclear Deterrent: Will the U.S. Navy Be Ready?" in Andrew S. Erickson, Lyle J. Goldstein, William S. Murray, and Andrew R. Wilson eds., *China's Future Nuclear Submarine Force*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7), p. 98.

²⁷⁹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Navy: A Modern Nav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November 20, 2009, <http://www.fas.org/irp/agency/oni/pla-navy.pdf>, p. 21.

²⁸⁰ Claire Taylor and Tim Youngs, "China's Military Posture,"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Defence Section, House of Commons Library Research Paper 08/15, February 21, 2008, available at *UK Parliament Website*, www.parliament.uk/briefing-papers/RP08-15.pdf, p. 30.

²⁸¹ 袁平譯，Nan Li 著，「中共擴張海權之企圖」(Scanning the Horizon for "New Historical

從政治與經濟角度整體而言，中國在東北亞主要關切的是朝鮮半島與俄羅斯能源合作兩大議題，中國經濟戰略與東亞區域經濟整合的主要方向並不位於東北亞，而是位於市場潛力極為龐大的東南亞，即使中國本身的區域經濟建設計畫，西部大開發的規模也比振興東北老工業區大上十倍，²⁸²更不用說中國的泛亞鐵路建設計畫重點絕大多數都與東南亞相關，而且泛亞鐵路東南亞走廊擔負的重要政治目的，就是提升中國在東南亞國家的影響力，在 2010 年後更有盡力削弱美國重返亞洲帶給中國的亞洲外交壓力，並利用經濟力量降低東南亞諸國對中國威脅的敏感程度，使其轉為更強調與中國的合作而非處處防範。²⁸³相較之下東北亞的市場潛力不僅不如東南亞，又牽涉北韓在內而使得該地區的次區域經濟整合計畫迄今仍難以全面發展。因此可以認為，目前中國的地緣戰略，軍事層面的主戰場與政治經濟等兩層面的主戰場並不一致且呈現分離狀態，後兩者的主戰場在東南亞，東北亞屬於以防衛態勢為主的次要戰場。

觀察何者為中國未來的重心，可由目前駐紮地仍眾說紛紜的未來中國海軍施琅號航艦的配屬情況略窺一二，是觀察中國地緣戰略方向的政、軍、分離狀況的指標之一。若施琅號加入南海艦隊，則代表中國海軍的戰略重點移至南海，地緣戰略中的政治、經濟、軍事面向將合一；反之，若施琅號配屬於北海或東海艦隊，則此種分離狀態可能還將持續下去。不過根據多維新聞在 2012 年 6 月 6 日的一篇報導，²⁸⁴中國軍方似乎認為施琅號配備於南海艦隊過於敏感，且無法發揮應有的戰略價值，²⁸⁵而東海艦隊是針對臺灣的主力作戰艦隊，中國中央軍委又要求北海艦隊在臺海戰事時策應東海艦隊，並擔負平日加強對日本佐世保與沖繩海空軍基地的觀察與偵察美日海軍在西太平洋北緯 20-30 度間的所有軍事演習，為中央軍委提供未來臺海戰事的重要情報等目的，加上北海艦隊可供施琅號駐紮的青島基地又擁有中國最大的核子潛艦艦隊，並有包含兩個戰鬥機師與一個轟炸機師在內的三個海軍航空兵師、一個訓練團與一個艦載直昇機大隊，較有利於施琅號快速形成戰力等戰略、戰備與後勤因素，施琅號未來似乎可能派駐青島並配屬於北海艦隊，如此一來，中國海軍的戰略重點顯然還是集中於東海及北海，陸權式的影響更為明顯。

2. 操作

葉自成指出中國在東南線地緣的「爭」不能只有對利益的鬥爭，還必須要包

Missions”），國防譯粹，第 37 卷第 12 期(2010 年 12 月)，頁 86-88。

²⁸² 張弘遠，「中國大陸『振興東北』總體戰略的內涵與分析」，陳德昇、許光泰主編，**振興東北：政策、機遇與挑戰**（臺北：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2004 年），頁 57。

²⁸³ 彭念，「外報：“高鐵戰略”成中國與周邊政經交往“黏合劑”」，**中新網**，2011 年 4 月 28 日，<http://www.chinanews.com/hb/2011/04-28/3004159.shtml>。

²⁸⁴ 季北群、安非，「多維獨家：中國首艘航母將進駐北海艦隊」，**多維新聞網**，2012 年 6 月 6 日，<http://military.dwnews.com/news/2012-06-06/58753235.html>。

²⁸⁵ 楊仕樂與李沃奇(William C. Vocke, Jr.)在 2011 年 10 月便根據技術分析，認為中國施琅號即使部署在南海，也難以發揮應有的戰力與價值，見 Yang, Shih-yueh & William C. Vocke Jr., “Chinese Aircraft Carrier Development: A Technical and Geostrategic Analysis,” presented for 2011 Annual Conference on China Studies (Taipei: Graduat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October 1, 2011).

含「爭取」中國在此線地緣的最大利益、更多盟友與共同發展。²⁸⁶簡言之，中國在東南線地緣乃是以武力與外交為核心的強權政治鬥爭，搭配對周邊國家以經濟手段為主的「爭取」措施的間接戰略運用。不過其手段交互運用情況則視地域與議題而不同。中國在東南線地緣的鬥爭目標主要有四：臺灣議題、南海議題、東海議題與朝鮮半島問題。這四個議題皆與美國、日本等兩大海洋強國有關，尤其是美國；其次才涉及中國周邊的中小型國家，甚至東亞之外的印度以及澳洲。美國在冷戰後的東亞盟國主要是日本與南韓，軍事部署主力位於東北亞，雖然美國近年來利用南海航行自由、中國崛起與區域穩定、反恐戰爭、緬甸民主化改革等議題作為切入點，積極介入東南亞，但美國在東南亞沒有像在東北亞那樣的堅強軍事同盟，遑論像在東北亞那樣的永久大規模軍事部署。而臺灣則介於東北亞與東南亞二者的情況之間，雖然沒有與美國的正式外交與盟邦關係，但卻是中美兩國最有可能爆發直接衝突的最主要地區。

上述的亞太次體系一般情勢決定了中國在東南線地緣的「鬥爭」與「爭取」手段交互運用與攻守態勢的差異。

(1). 臺灣

整體來說，由於臺灣是中國最關切的核心利益與主權議題中最具戰略價值的目標，而且許多中國戰略菁英皆認為包括美國在內的其他國家沒有干預中國對臺灣統一行動的合法立場，例如張文木即認為中國對臺灣的統一乃是雅爾達會議所承認與允許的行動，包括美國在內的其他國家沒有反對的理由與立場，²⁸⁷故中國對臺灣的戰略態勢乃是以戰略攻勢為主。不過大部分中國決策與戰略菁英也理解，臺灣不能被中國以武力手段同樣是美國在亞太次體系中的主要利益之一，²⁸⁸這導致臺灣議題又成為中國最有可能與美國爆發直接衝突之處，故中國在臺灣議題上是鬥爭與爭取並用，攻勢重於守勢，其軍事戰略直接針對臺灣故不待言，又不斷試圖阻斷臺灣的武器購買管道，以使臺灣的防衛力量在面對中國軍事力量成長的同時，質量差距日益擴大；當然中國也不斷強化其海上陣地戰與太空軍事技術的發展，²⁸⁹俾使臺灣議題萬一發生武裝衝突，能迅速在國際社會與美國反應之前奪取臺灣。同時，中國亦全力壓縮獨立於中國之外生存的政治力量並阻止臺灣議題的國際化，試圖盡可能將臺灣孤立於東亞、亞太的政府間區域安全、經濟整合與組織之外。但在鬥爭的同時，中國也不斷透過政治、經濟、文化交流等方式，

²⁸⁶ 葉自成，*地緣政治與中國外交*，前引書，頁 28。

²⁸⁷ 張文木，*論中國海權*（北京：海洋出版社，第二版，2010 年），頁 234-235。

²⁸⁸ 梅然，「海軍擴展與戰略穩定：從英德競爭到中美關係」，*國際政治研究*（北京），第 4 期（2007 年），頁 86。

²⁸⁹ 根據美國「2049 計畫研究所」(Project 2049 Institute)在 2012 年 4 月發表的研究報告指出，中國的太空發展並沒有明確的軍民分野，因此經常可在民用計畫的掩護下發展軍事用途，或將民用計畫發展出來的技術轉用於軍事之上。而為了對抗美國在太空的優勢，中國將在未來 10-15 年加速其太空發展，這將大有助於中國利用軍事手段解決臺灣以及其他中國涉入的區域爭端。Mark A. Stokes with Dean Cheng, "China's Evolving Space Capabilities: Implications for U.S. Interests," *Project 2049 Institute*, April 26, 2012, http://project2049.net/documents/uscc_china-space-program-report_april-2012.pdf.

希望盡可能爭取到臺灣多數的民意，改變臺灣的民意為統一壓過獨立，同時使美國失去干預臺灣議題的藉口。

(2). 朝鮮半島

其次在朝鮮半島議題上，該半島與包含濟州島在內的南韓領土由於完全位於黃海、東海之內，又與中國東北相連，並隔著黃海面對包括北京、天津在內的環渤海區，而中國在半島上直接面對來自美國、日本、南韓等超強、強權與區域大國的地緣政治壓力。包括近兩萬名地面部隊在內，總數近三萬名的美軍駐紮於南韓之內，又有美韓同盟為支持，而北韓的國力除了發展核武自保之外皆遠不如南韓，遑論美國。雖然這樣懸殊的力量對比差距與朝鮮半島和中國核心區的鄰近，似乎使得中國應該對朝鮮半島採取更積極的攻勢態度，可是中國並沒有這麼做，朝鮮半島並非中國的核心利益，這使得中國雖然希望盡可能排除美國在朝鮮半島的影響力，其整體作為卻是守勢重於攻勢。

由於北韓屢屢採取戰爭邊緣政策，而且其發展核武的作為又已正式為聯合國安理會譴責，²⁹⁰因此中國在此議題上採取「維持朝鮮半島的穩定」的守勢作為，仍將北韓視為最重要的盟友之一，也不願如其他國家那樣明顯譴責北韓的行為，並希望「爭取」其他六方會談有關國家採納中國的現狀穩定政策，避免局勢失控引發戰爭，其結果輕則危及中國週邊國際環境的安定與大量增加的北韓難民對中國東北、環渤海區等重要經濟區的社會穩定造成嚴重威脅，重則造成朝鮮半島在美國與南韓主導下完成統一，在東北亞大陸地區形成對中國的陸上威脅，造成中國在東北亞的陸上地緣政治壓力遽增。但是中國對朝鮮半島並不只有消極維護半島現狀與穩定，另一個方向是「支持朝鮮半島自主和平統一」，²⁹¹卻具有鬥爭意涵，不過首要鬥爭對象是美國而非南韓，態勢也是守勢大於攻勢，目的是盡可能降低美國乃至日本對朝鮮半島的影響力，以使朝鮮半島在不受到美國影響的情況下完成統一，最終使整個朝鮮半島而非只有北韓成為中國在東北亞與美國海權的緩衝區，甚至將整個半島納入中國支配下的東亞地緣戰略領域。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同時也為了與南韓進一步的經濟互動促進中國特別是環渤海區的經濟發展，中國在 2000 年代利用南韓希望掌握朝鮮半島議題主導權的態度，對南韓逐漸展現出積極攻勢爭取多於鬥爭的政策，在發展本身經濟的同時離間南韓與美國乃至日本的關係，這不僅限於屬於「自由派」的金大中與親中態度鮮明的盧武炫政府，也同樣運用於保守派且親美、親日色彩鮮明的李明博政府。²⁹²例如中國外交部曾分別在 2008 年 5 月及 2010 年 7 月，針對李明博政府加

²⁹⁰ 安理會在 2006 年 10 月與 2009 年 6 月分別通過第 1718 號決議與第 1874 號決議，譴責北韓的核武試爆。“Non-proliferation/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UN Security Council*, October 14, 2006, <http://daccess-dds-ny.un.org/doc/UNDOC/GEN/N06/572/07/PDF/N0657207.pdf?OpenElement>; “Non-proliferation/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UN Security Council*, June 12, 2009, <http://daccess-dds-ny.un.org/doc/UNDOC/GEN/N09/368/49/PDF/N0936849.pdf?OpenElement>.

²⁹¹ 楚樹龍、金威主編，**中國外交戰略和政策**，前引書，頁 179。

²⁹² 劉德海，「變遷中的南韓中國政策」，**臺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5 卷第 2 期(2009 年夏季號)，頁 1-35。

強美韓軍事關係與美韓軍演指出，將東北亞、亞太地區分割成不同的軍事同盟乃是典型的冷戰思維，但時代的變化需要以不同思維處理安全議題。此外如前所述，南韓與中國的夥伴關係乃是亞太海洋諸國中最高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這卻是在 2008 年 5 月李明博訪華時所提升的，雙方亦在同年 12 月舉行首屆高層戰略對話，又在 2011 年 7 月舉行首屆國防戰略對話。而中國與南韓雖然在東海的「蘇岩礁」有主權爭端，也圍繞著北韓的「脫北者」和中韓兩國對朝鮮半島歷史的解釋有所爭論，近來更在黃海的南韓經濟海域發生中國漁民殺死登船臨檢的韓國海上警察事件，²⁹³但這些問題一方面皆未涉及兩國最主要的核心利益，雙方也極力克制不使這些衝突進一步發展為影響兩國實質關係的重大危機。這些作為在在顯示中國極力希望爭取南韓、排除美國對南韓與朝鮮半島事務影響力的攻勢爭取態度，但中國對南韓的爭取，時而受到其與北韓關係的影響，由於中國不能拋棄北韓，在 2010 年的南韓天安艦遇襲沈沒與北韓對南韓延坪島砲擊等事件中並未譴責北韓，使得李明博政府持續與美國、日本深化安全合作，使得中國對南韓的爭取，至少在李明博政府時代並沒有收到很明顯的成效。

(3). 中日東海爭端

最後，中國在與日本相關的東海議題上則是鬥爭多於爭取、攻勢重於守勢。日本雖然屬於遠離中國的海島國家，又身為體系中的強權，並有美日同盟的存在，使得中國的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在東北亞不太可能將日本納入受其支配的東亞地緣戰略領域之中，但日本與中國隔著東海相對，後者乃是中國「環中國海一體化」海洋戰略的重要一部份，而日本又涉及與中國在東海經濟海域劃分與釣魚台列嶼等主權爭端，加上中國認為日本刻意希望阻撓中國併吞臺灣，這兩者都涉及中國的核心利益。如前所述，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甚至還不是「夥伴關係」。而雖然日中兩國在 2008 年 6 月達成東海問題的共識，同意在實現劃界前的過渡期間，在不損害雙方法律立場的情況下進行合作並繼續進行磋商，但中國外交部仍表示這個共識不會改變中國對東海春曉油氣田位於中國主權權利範圍內，無關共同開發，以及中國不承認日本提出的東海「中間線」之主張的立場，²⁹⁴結果迄今中日雙方根本在東海議題上沒有達成任何「合作」。

2008 年以後，儘管臺灣海峽局勢穩定許多，但隨著中國海軍現代化逐漸完成、新主力艦隊的服役與中國海監、漁政等單位的巡邏船隻增加，中國對日本的鬥爭卻更加激烈而不稍懈，主要行動包括中國海軍近年來的擴張、遠洋海軍演訓，和 2010 年以來釣魚台問題引發的中日緊張。中國海軍北海與東海兩艦隊近年來頻頻經由琉球群島進入太平洋演訓，已多次引起日本的高度憂慮，但更嚴重的則是中國在釣魚台議題上的侵略性行為引發的區域緊張。2010 年 9 月發生的日本海上保安廳在釣魚台海域逮捕衝撞海上保安廳巡邏船隻的中國漁船船長並帶回

²⁹³ 「外交部召見中國大使，抗議我海警被中國漁民刺死」，韓聯社，2011 年 12 月 12 日，<http://big5.yonhapnews.co.kr:83/gate/big5/chinese.yonhapnews.co.kr/domestic/2011/12/12/0401000000ACK20111212002100881.HTML>。

²⁹⁴ 「中日就東海問題達成原則共識」，新華網，2008 年 6 月 19 日，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08-06/19/content_8398183.htm。

日本拘留，引發中國的強烈反彈，不僅中斷與日本之間的東海油氣田議題談判與暫停軍事交流，甚至在 2010 年 9 月下旬中斷對日本輸出極為重要的戰略物資「稀土」作為制裁，²⁹⁵直到同年 11 月才恢復，²⁹⁶以及在 9 月 29 日聯合來訪的俄國總統梅德維潔夫抨擊日本的行徑。²⁹⁷這引發美國國務卿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在 2010 年 10 月 27 日對日本外相前原誠司承諾，釣魚台適用美日安保條約第五條美國針對日本領土遭到攻擊的協防規定。²⁹⁸而日本防衛省的統計則指出，中國的Su-27、Su-30 戰機與漁船在釣魚台衝突之後，接近日本領空與領海的次數激增至以往的三倍以上。²⁹⁹最後，隨著日本在 2012 年 3 月準備為釣魚台列嶼各島「命名」的舉動，中國國家海洋局下屬的中國海監總隊更在 3 月 16 日宣布，將派遣由「海監 50」與「海監 66」兩艘海監巡邏船組成的「定期維權巡航編隊」，在釣魚台周邊進行定期巡航，目的是為了打破日本對釣魚台的時效控制。³⁰⁰除此之外，故整體而言中國對日本乃是鬥爭多於爭取，攻勢大於守勢，而且在 2010 年以來隨著中國海上控制能力的增強，有越演越烈之勢。

(4). 東南亞

與此相較，中國在東南亞的「爭」與東北亞則有所不同。由於東南亞國家皆為中小型國家，因此中國的強調「爭取」多過「鬥爭」，但態勢則是攻勢重於守勢。不過東南亞地區的操作可分為中南半島與南海兩個次區域觀察。在南海地區，由於這是中國接近核心利益的利益範圍與周邊地緣政治密碼主要目標，而且因為包括中國在內的周邊國家之間存在激烈的領土爭端，成為東南亞以外的強國最容易介入的議題。以往中國由於海軍實力與國力尚未達到一定程度的自信，雖然一貫堅持南海主權爭端應以雙邊架構而非多邊機制解決並反對南海問題國際化，但並沒有更明顯的鬥爭與攻勢情況出現。不過與在東北亞對日本的鬥爭相同，2008 年之後，隨著海南三亞基地的建設與中國海上控制能力的增強，中國在南海的攻勢鬥爭行動開始明顯增加，無論在 2010 年傳出中國將南海納入核心利益的傳聞是否為真，這都顯示中國必欲實現自己對南海的完全主權聲索。中國對南海區域的鬥爭態度以 2010 年 7 月，中美雙方在河內的東協峰會上為了南海

²⁹⁵ Keith Bradsher, "Amid Tension, China Blocks Crucial Exports to Japan,"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3, 2010, <http://www.nytimes.com/2010/09/24/business/global/24rare.html?pagewanted=all>.

²⁹⁶ "China resumes rare earth exports to Japan," *BBC*, November 24, 2010, <http://www.bbc.co.uk/news/business-11826870>.

²⁹⁷ Seima Oki and Kyoko Yamaguchi, "China, Russia team up on territorial claims," *Daily Yomiuri Online*, September 29, <http://www.yomiuri.co.jp/dy/national/T100928004811.htm>.

²⁹⁸ 日本媒體曾報導前原在 9 月 23 日表示希拉蕊已做出釣魚台適用美日安保條約第五條的承諾，但這條報導並未真正向前原本人查證其說法的真確性，而美國國務院的表態則是釣魚台的問題極為複雜，美國並不對其主權預設立場，只是呼籲有關各方冷靜。但在 10 月 27 日，希拉蕊就在夏威夷對前原正式做出這項承諾。"Joint Press Availability with Japanese Foreign Minister Seiji Maehara," *U.S. Department of State*, October 27, 2010,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0/10/150110.htm>.

²⁹⁹ 「中国軍機、中間線越え 海自の情報収集妨害か」，*産経新聞*，2011 年 9 月 7 日，<http://sankei.jp.msn.com/world/news/110907/chn11090707040002-n1.htm>。

³⁰⁰ 余建斌，「海監披露巡航釣魚島細節：遭日船和飛機干擾阻攔」，*人民網*，2012 年 3 月 21 日，<http://military.people.com.cn/BIG5/17444856.html>。

議題針鋒相對達到一波高潮。不過中國在這個地區的鬥爭對象較為有限，主要目標是針對越南、菲律賓兩個區域國家，特別是菲律賓，在 2012 年 4 月因菲律賓取締在主權爭議地區作業的中國漁船，演進成菲國海軍、海岸防衛隊與中國海監互相對峙的嚴重海上對峙事件。³⁰¹

但是中國對於美國海權利用南海議題加強與南海周邊，乃至其他東南亞國家的戰略合作，卻沒有明顯的攻勢鬥爭行動。不過事實上，中國乃是企圖以爭取的行動來建立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並降低美國的影響力。除了既有的友好關係與泛亞鐵路東南亞走廊的建設之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國與中南半島之間的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之建立，皆是在 2008 年之後所建立，顯示中國的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操作乃是在 2008 年之後，隨著中國認為已經拉近與西方國家之間的差距而活躍起來。此外在「爭取」東南線地緣不可忽視的另一個重要操作是中國的對外援助。雖然根據中國國務院在 2011 年 4 月發佈的「中國的對外援助白皮書」，對亞洲國家的援助只佔了 32.8%，遠不及對非洲國家的 45.7%，³⁰²但不可忽視的是中南半島國家在中國對外援助中所佔的地位。以資源開發、減免債務和不須附帶條件的貸款為主要形式的中國援助，在 2006 年以後逐漸取代日本、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與其他西方國家在東南亞的援助國地位，並且集中在中南半島，特別是大湄公河次區域中的國家越南、緬甸、泰國、寮國、柬埔寨等五國。雖然許多中國學者聲稱這些貸款使中國與東南亞國家之間互利雙贏，但中國貸款的用途主要是為了能順利建設其規劃中的泛亞鐵路走廊、中緬油氣管，以及由新加坡經越南至廣西南寧的經濟走廊，³⁰³真正用於鄰國人民生活的援助相形之下仍相當稀少，³⁰⁴顯示這些「援助」實際上帶有極為明顯的政治「爭取」意涵。

中國爭取東南線地緣國家的方式，著重經濟發展的方式與過往德意志帝國利用鐵路建設與貸款，將勢力延伸進入巴爾幹半島與土耳其帝國頗有類似之處。不過在目前來說主要是分化東協內部在與中國相關安全議題上的歧見，迫使採用一致決的東協無法形成一致共識來對抗中國的主張。特別是在南海議題上，中國不希望東協形成一致的共識並將該議題國際化，俾能使該議題仍能在中國偏好的雙

³⁰¹ 林行健，「捕魚爭議，菲陸船艦南海對峙」，中央社，2012 年 4 月 11 日，<http://www.cna.com.tw/News/aOPL/201204110074.aspx>。

³⁰² 「授權發佈：《中國的對外援助白皮書》」，新華網，2011 年 4 月 21 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11-04/21/c_121332527_8.htm。

³⁰³ 根據中國與東協在 2009 年的投資協議，中國進出口銀行將提供高達 100 億美元的基礎建設援助，主要目標是大湄公河次區域中能連接越南與中國的港口與鐵路。而中國在 2010 年宣布給予寮國用於建設泛亞鐵路走廊中線高速鐵路的 70 億美元援助即屬於其中的一部份，另外中國在協議中也宣布要提供東協 150 億美元信用貸款。Jane Perlez, "China competes with West in aid to its neighbors,"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8, 2006, http://www.nytimes.com/2006/09/18/world/asia/18iht-web.0918aid.2845121.html?_r=1&pagewanted=all; Jonathan Weston, Caitlin Campbell, and Katherine Koleski, "China's Foreign Assistance in Review: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United States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September 1, 2011, http://www.uscc.gov/researchpapers/2011/9_1_%202011_ChinasForeignAssistanceinReview.pdf, p. 13; 盧光盛、熊鑫，「中國對大湄公河次區域國家的援助」，中國網，2011 年 12 月 29 日，http://www.china.com.cn/international/txt/2011-12/29/content_24282974.htm，頁 1。

³⁰⁴ 同上註。

邊架構下處理。站在這個觀點，目前中國的爭取以得到初步成效，例如馬來西亞便聲稱中國在區域中應被視為一股「良善的力量」(benign force)，引發東協內部其他與中國有嚴重南海主權爭端的成員包括越南與菲律賓的嚴厲批評；³⁰⁵此外，中國也試圖利用援助與交換條件，要求與中國關係極為密切的柬埔寨在 2012 年擔任東協輪值主席的機會，阻止南海議題的在 2012 年 4 月的東協高峰會中成為主要議題，並獲得柬埔寨總理洪森(Hun Sen)的同意，³⁰⁶雖然東協峰會最後還是應菲律賓之請而稍微討論了南海議題，沒有完全達到中國的目的，但這也顯示中國對中南半島國家的爭取已經取得了初步成效。

不過中國力量增強後對中南半島國家亦非全然的爭取，即使對那些長期以來與中國友好的國家亦然。這主要是指緬甸在 2011 年 9 月 30 日，在國內政治的壓力下與希望贏得西方國家的好感等雙重考量下，單方面停止由中國出資興建、利用伊洛瓦底江水力的「密松水壩」，導致中國對緬甸提出強烈抗議，事後緬甸向中國保證不會以中緬關係作為緬甸改善與西方關係的犧牲品，³⁰⁷不過緬甸迄今還是未重啟水壩建設，顯示中國的鬥爭行為似乎沒有取得預期成果。但這些作為顯示，隨著中國整體國力與交通線控制力量的增強，其對東南線地緣的「鬥爭」行動越來越明顯與激烈，而「爭取」作為被後的權力政治考量也越來越明顯，目的就是希望能在東亞完成其標準地緣政治程序，最終建立一個以中國與第一島鏈內三個緣海為中心、東南亞尤其是中南半島為附屬地緣政治領域，排除美國與日本等其他亞太次體系主要強國的影響力，接受中國支配的東亞地緣戰略領域。

第五節、小結

從第五章對當代中國戰略菁英的世界觀與地緣政治密碼的分析，以及王緝思在中美戰略互疑報告中所承認的，可發現中國戰略菁英其實相當渴望追求恢復中國以往在帝國時代的政治地位，這不僅限於取得名義上的「列強」或世界第一大或第二大經濟體地位而已，還包括相應的軍事力量，以及在重要國際政府間政治、經濟組織中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取得對東亞的領導權並主導東亞區域整合。中國願意與其他大國妥協並採取防禦性的大戰略態勢，但其前提是各大國承認中國在東亞的優越領導地位，以及中國對周邊領土爭端的聲索合法性。換言之，也就是承認東亞是中國的勢力範圍。

而本章的分析顯示，目前中國所採行的地緣戰略似乎正作為上述的目標的工具。其形式可歸類為 19 世紀中葉以來出現的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不過由於中

³⁰⁵ Trefor Moss, "ASEAN members divided on China maritime dispute," *Jane's Defence Weekly*, Vol. 48, No. 24, June 15, 2011, p. 24.

³⁰⁶ Prak Chan Thul, "Hu wants Cambodia help on China Sea dispute, pledges aid," *Reuters*, March 31, 2012,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2/03/31/us-cambodia-china-idUSBRE82U04Y20120331>.

³⁰⁷ "China raps Myanmar over halting of \$4.7b dam project," *The Strait Times*, October 2, 2011, http://www.straitstimes.com/BreakingNews/SEAsia/Story/STIStory_719077.html; "Myanmar reassures China on relations and cooperation," *The Strait Times*, October 30, 2011, http://www.straitstimes.com/BreakingNews/SEAsia/Story/STIStory_728757.html.

國的科技、工業等能力仍相當不足，遂使中國的戰略手段不得不仰賴經濟與其他柔性手段為主。這使得中國雖然在冷戰後開始逐步走向海洋，並開始小規模著手建立遠洋海軍，但這些作為並非中國已經決定朝美國海權的目標發展，中國還是一個本質上為大陸性的強權，不是真正的海洋國家。但中國的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並非在 1990 年代即發展成熟，而是直到進入本世紀之後，由於中國大力投入周邊東南亞、中亞地區的國際鐵公路、油氣管建設，以及海軍較大規模的現代化裝備換裝，並真正進入太平洋實施遠洋演訓和建設海南的三亞基地等戰略擴張作為，才逐漸發展出完整的特徵。

由中國海軍擴張的速度與中國對海洋的戰略目標來看，海洋雖然對當代中國的地緣戰略重要性超越中國歷史上任何時代，但其地緣戰略目標與本質並非欲成為新的海權，而是展現出「陸海兼備，以海為主」的地緣戰略思考。但即使想要「以海為主」，由於戰略菁英嚴重混淆海洋與海軍戰略思想，加上中國仍不具備全面的海上戰略交通線控制能力，以及中國的周邊與區域兩層級地緣政治密碼重視與陸地鄰國的整合超過與海洋鄰國的整合，反而與海洋鄰國之間存在明顯的領土爭端，使其地緣戰略無論在手段與戰略思維上仍然是「以陸制海」遠超過「以海制海」，乃至「以海制陸」。換言之，其地緣戰略無論就本質、重心、方向、目標或手段來說均仍是大陸性的，只是加入了關於海洋的思考並重視海軍對國防與大戰略的重要性，注定使其地緣戰略實際上是一種關注歐亞大陸與東亞大陸對中國發展之重要性超過海洋，並以陸戰與海洋領土化為基本思想的「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與上述法蘭西第二帝國、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德意志帝國，以及 1960 年代以後的蘇聯所曾實施過的地緣戰略相當類似，皆為海上交通線控制能力不足以與海權競爭的情況下，試圖運用大陸國家的相對優勢來與海權在體系中競爭並維護國家安全與利益的地緣戰略形式。

可是中國與其他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在周邊與區域地緣政治密碼的指導下，仍嚴重威脅次體系中的日本、印度，乃至其他周邊中小型國家產生直接的戰略衝突，也嚴重威脅美國海權單極的基礎——對海上戰略交通線的控制。再加上中國位於古典地緣政治學所謂的邊緣地帶，其領土爭端除了與俄羅斯、中亞國家之間因為接近心臟地帶，對海洋領土爭端無實質的重要影響之外，任何中國與濱海鄰國之間的海洋領土爭端都會牽涉到美國與其他次體系中主要大國的地緣政治利益，這使得中國幾乎不可能在忽視美國利益的情況下，單獨與周邊國家解決海上領土爭端與勢力範圍劃分，納德卡尼即曾指出長遠來說要達成一個穩定的中印關係，達成美國與其他主要強國也能接受的勢力範圍劃分是重要的先決條件。³⁰⁸事實上不僅中印關係如此，其他亞太次體系中的大國關係與南海領土爭端的解決亦復如是。若缺乏美國與其他主要大國的承認，雖有「解決」也很容易引發其他大國的懷疑，並進而引發更嚴重的互疑與相對的戰略反應。

結果，當代中國的地緣戰略最終目的似乎還是一如其帝國時代：在力量強大時追求重建中國的超強地位與構建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地緣戰略領域，只是以往

³⁰⁸ Nadkarni, *Strategic Partnership in Asia*, op. cit., pp. 147-148.

帝國時代是純粹的陸權，海洋幾乎完全沒有戰略價值，如今則對中國有極高的政治、經濟與軍事戰略價值，但中國的本質還是一個大陸國家，因此其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只是將過去僅限於東亞大陸的地緣戰略領域建構，擴大至東亞周邊的緣海以及西太平洋。而中國若朝東南方的西太平洋與太平洋緣海發展將介入美國以及美國亞太盟邦的地緣政治利益範圍，向陸地發展則進入俄羅斯與印度兩大強國的地緣政治利益範圍。

因此，本論文在第七章將進一步探討中國的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發展對亞太次體系中的地緣政治均衡的影響，以驗證中國是否確實追求以「和平發展」的手段來達成「和諧世界」，還是中國的地緣戰略將因追求對戰略要地、戰略交通線的控制，與區域整合的主導權，而激起亞太次體系中明顯的競爭性權力平衡反應，顯示「和平發展」與「和諧世界」，只是中國的對外宣傳口號。



第七章、中國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對亞太地緣政治均衡之影響

如第三章的分析，要想達到體系或次體系的均衡，首先必須存在一個結構，試圖改變現狀的國家在這個結構中無法使用武力或武力以外的手段來達成其戰略目標，亦即離心力小於向心力。然後主要大國之間才能夠達成各方均能接受的地緣政治安排，並根據協作性權力平衡的思維，創立所有大國均參加的多邊國際建制，以合作維持體系秩序的長期穩定。而安排的達成，政治與領土地緣政治利益的解決是首要關鍵，若不能先解決則縱然能達成其他經濟與軍事層面的安排或信心建立措施，但不能真正降低大國之間的猜忌心態與增進合作意願，大國之間仍然有很強的競爭性權力平衡思維，最終還是無法達成均衡，最多只能維持表面穩定、內部緊張的局勢，主要大國之間爆發大規模武裝衝突的憂慮將一直存在體系或次體系內部。

從均衡的角度來看，雖然中國的崛起已經使其逐漸從一個在國際政治天平上起砝碼作用的國家向起天平托盤作用的國家轉換，其實力地位使中國的任何戰略立場轉變都會嚴重影響國際政治的穩定，

¹而且中國近年來不斷深化與區域多邊國際建制的交往，但其本身的次體系/體系層級地緣政治密碼就是結構離心力的主要來源之一，因此中國的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本身就是一種欲打破既有體系結構與秩序安排現狀的產物。在「安西、靠北、爭東南」的操作中，除了北線地緣是已經達成政治與領土地緣政治安排而得以產生長期穩定之外，西線與東南線地緣都處於緊張狀態。這是因為中國的周邊地緣政治密碼不容許在西線與東南線地緣中的領土爭端中讓步，區域地緣政治密碼又致力於壓倒這兩線地緣中的競爭對手，獨佔東亞的政治、經濟領導權，並在體系/次體系地緣政治密碼中反對美國領導的單極體系，追求多極化與建立以中國為中心的新國際政治新秩序，遂使得中國的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雖然強調「安定」西線地緣與「爭取」東南線地緣的國家，但實際上卻在各個地緣政治區域與次體系內中不斷刺激其他主要大國與中國的互疑(distrust)與競爭性權力平衡思維，結果完全無法促成多邊地緣政治安排的達成，無助於目前不存在均衡的亞太地緣政治次體系達成均衡，甚至還因為大規模涉入其他次體系內主要國家的地緣政治利益而引發這些國家的反制。

但另一方面，從戰略角度而言，中國目前在交通線控制能力與整體軍事戰略向外投射能力的限制還不足以完全掌控東亞，遑論對亞太次體系與全球體系構成

¹ 閻學通，「中國崛起的實力地位」，閻學通、孫學峰等著，**中國崛起及其戰略**(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104。

類似蘇聯那樣的威脅。再加上中國已經相當程度融入世界體系之中，貿易利益也相當程度降低次體系內主要國家對中國實施冷戰時那種圍堵政策的意願，降低大規模衝突與冷戰爆發的可能。不過貿易並不能完全發揮所謂的「外溢」(spill over)效果並自動消弭中國與主要大國之間的猜忌和複雜的領土爭端，這使得亞太次體系中在中國西線與東南線的主要大國，為了同時從中國獲得龐大的經濟利益並阻止其侵犯本身的地緣政治利益，不願意真正對中國形成真正的圍堵同盟，而互相採取扞從行動來推卸責任並形成一種以「防範」為主要目的、不包含中國在內的雙邊與多邊戰略合作，作為推進本身地緣政治利益，並形成對中國的多邊地緣政治壓力以維持現狀的主要手段，以及一旦中國採取更激烈戰略時的聯盟基礎。結果，亞太地緣政治次體系在這種操作之下形成一種國際經濟互動熱絡，但政治與安全互動存在許多緊張關係的「冷和平」局勢。

第一節、不存在的亞太次體系地緣政治均衡

亞太地緣政治次體系自冷戰迄今從未達成均衡，這主要在於該次體系是一個相當複雜的異質體系，與接近達成均衡的北大西洋－歐洲地緣政治次體系相較，亞太地緣政治體系無論是在地緣政治結構層面或結構的單元(國家)層面，均與前者有顯著的不同。

一、冷戰時的亞太地緣政治次體系與地緣政治均衡

從結構上來說，雖然冷戰時的全球地緣政治結構形式為海陸對峙的兩極結構，但亞太地緣政治次體系的結構與北大西洋－歐洲地緣政治次體系的兩極結構並不類似。由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盟軍的兩大陣營分別佔領了歐洲大陸的主要地區，使得北大西洋－歐洲地緣政治次體系的兩極結構相當緊密，很少國家能脫離結構獨自發展，只有傳統或接受國際條約保護的中立國如瑞士、奧地利與瑞典，或位於結構邊緣、遠離蘇聯陸權力量影響的國家如南斯拉夫與阿爾巴尼亞，能較不受兩極結構的支配。

反之，東亞地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與冷戰期間並非全球地緣政治結構的核心區或精華區，故被視為次要的戰場，除了朝鮮半島之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並沒有像歐洲那樣分別為美國與蘇聯分割佔領，使得海陸兩超強的勢力無法在一開始就伸入東亞內部，隔絕了兩大陣營在東亞大陸的直接全面對峙－蘇聯因沒有大量駐軍於中國，故其陸權的力量無法如在北大西洋－歐洲地緣政治次體系那樣深入整個東亞大陸；同樣的，印度、中國與東南亞破碎帶的存在亦使得美國海權的力量無法完全支配整個亞太島鏈地區，並如在歐洲那樣穩定地延伸進入東亞大陸。結果雖然美國在冷戰初期於東北亞和東南亞分別組織了受其支配的同盟體系進行圍堵，但其勢力範圍大致限於自日本、南韓往南至菲律賓有美國駐軍的亞太島鏈地區，²與大陸上的蘇聯－中國共產集團形成鮮明的海陸對峙態勢，既沒

² 東南亞公約組織的總部雖位於曼谷，但組織本身並無軍隊存在，美國在冷戰時期駐軍於泰國的

有像歐洲那樣的海陸全面對峙結構，即使在東亞大陸邊緣有美軍駐守並介入戰事的朝鮮半島與越南，陸上對峙亦非像歐洲那樣的超強直接對峙，而比較接近於「代理性」的對峙。

1945 年之後南亞、東南亞諸國陸續獨立與英、法、荷等原殖民地國家撤出亞太，以及中共建立政權等事件的陸續發生，進一步破壞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雅爾達會議所預定的三極結構基礎並改變了冷戰期間亞太區域地緣政治結構的形式。大多數新獨立或建立的東亞國家與政權皆是由前殖民地獨立的中小型國家，或者如中國、印度這種擁有悠久歷史與文化，並曾經在古代歷史上於自身所處的區域地緣政治體系中身為主要強權乃至超強的區域大國。不過無論是東北亞的中國、日本與朝鮮半島，南亞與東南亞諸國，彼此之間不僅存在巨大的權力要素差距，連歷史經驗、文化、政治、經濟制度與意識型態，以及整體發展程度也有極高的差異，遑論與美國、蘇聯兩大超強之間的差異。這使得亞太地緣政治次體系成為一個高度異質的體系，不若北大西洋—歐洲地緣政治次體系呈現較為「均質」的情況；亞太次體系內各層級國家對於體系秩序也不像北大西洋—歐洲次體系那樣一致：超強只關注亞太內是否仍維持兩極結構與中小型國家的政治意識型態與外交態度是否反共或親共；東亞內的強權與區域大國如日本、中國與印度除了關注與兩極之間的政治地位比較之外，還在意能否在全球體系中取得真正的大國地位，以及在東亞與南亞建立本國的政治或經濟領導地位，和與他國的領土爭端能否得到滿意的解決；而中小型國家固然關注次體系內的意識型態鬥爭與大國之間鬥爭的結果，但作為新獨立與經濟發展落後的國家，短期來說它們更在意本身的政治地位是否獨立與穩定、經濟是否能得到順利的發展，以及領土爭端是否能得到滿意的解決。

超強的勢力沒有交互伸入東亞大陸與周邊海洋地區並形成包括所有亞太國家在內的壁壘分明的兩大敵對同盟體系，造成兩種體系秩序原則的異質性，第一種是南亞與東亞諸國除了日本與中國之外，實際上均遠離蘇聯而與中國領土、美國勢力範圍更為接近，導致印度與許多東南亞國家並不認為蘇聯是真正的國家安全威脅，反而視中國與東亞內部的共產勢力擴張為更大的威脅（見第五章）。這樣的威脅來源認知分歧，以及次體系內各主要國家的政治與領土地緣政治利益始終沒有得到各方均能接受的多邊安排解決，一方面使得亞太次體系極難出現所有主要國家的共同安全利益，二方面則使得次體系中的國家對於權力平衡的思維在大多數情況中仍停留於競爭性，沒有發展出完整的協作性權力平衡思維，美蘇中三國的相互對峙與牽制、印度與蘇聯聯合牽制中國、越南與蘇聯的聯盟以及柬埔寨與中國聯合對抗越南，以及東協成立宗旨中的反共產主義，³都是競爭性權力平

時間只限於自 1961-1975 年，泰國感受到來自寮國與越南共產勢力在中南半島擴張壓力的這段時間。

³ 東協在 1967 年成立時，其宗旨之一即為反共，對抗中蘇鬥爭、越南擴張與成員國內的共黨叛亂帶來的共產主義威脅。由於當時越戰仍在進行中，東協的成立遂被蘇聯、中國與北越視為美國帝國主義支持的戰線之一，而在北越併吞南越之後，東協各成員國相當恐懼共產主義的進一步威脅，又加強了對反共的態度。Rudd Van Dijk eds., *Encyclopedia of the Cold War* (New York: Taylor &

衡的明顯表現。雖然東南亞國家加入「不結盟運動」(Non-Aligned Movement)與形成東南亞內自身的安全安排的目的是希望擺脫兩極對峙與增加本身自主性和發展的獨立性，避免一定要在兩極中選邊站，⁴但中國、印度、印尼等區域大國加入不結盟運動則隱含有領導第三世界國家，以提升本身國際地位和增加超強及體系中其他大國對抗時籌碼的意圖，結果仍是強化了競爭性權力平衡思維，無助於協作性權力平衡的產生。

第二種則是歷史與文化經驗的異質性影響。雖然 19 世紀以後形成的全球地緣政治體系是西發利亞體系擴張後的結果，但亞太次體系中的亞洲地區卻與西發利亞體系有截然不同的歷史經驗，再加上二戰後新獨立與成立的東亞與南亞國家有嚴重的國家分裂、領土爭端、意識型態鬥爭、宗教衝突與反帝國主義等諸多問題，使得雖然聯合國憲章與 1955 年萬隆會議的和平共處五原則均強調不得侵略與和平解決爭端，但實際上這些次體系秩序原則卻一再遭到違反，亞太次體系自萬隆會議之後，連續出現第二次與第三次印度支那戰爭(Indo-China War, 1955-1975, 1979-1989)、金門危機(1958，即我國所謂的八二三砲戰)、中印邊界衝突(1962)、珍寶島事件(1969)、第二次與第三次印度－巴基斯坦的戰爭(1965、1971)、中國與南越的西沙海戰(1974)、越南與柬埔寨戰爭(1975-1989)等諸多大規模長期戰爭。至於亞太次體系中存在的許多領土爭端，如日本與蘇聯的北方四島領土爭端、臺灣海峽議題、釣魚台與南海領土爭端、越南在中南半島的勢力擴張及東協與越南的敵對、中越與中印邊界衝突、朝鮮半島分裂，以及菲律賓、馬來西亞與印尼之間的領土爭端等。⁵這些敏感的領土爭端除了菲律賓與馬來西亞之間的沙巴主權爭端之外，⁶其他爭端在冷戰時甚至連西德在歐安會議時對奧德－奈塞河國界線的默認這種程度都沒有達成，更不用說兩韓、南北越、臺海兩岸在冷戰時皆以武力征服對方完成國家統一為主要大戰略方向訴求，與兩德的情況有天壤之別。

結果，整個冷戰期間，異質性極高的亞太次體系從未出現所有主要國家皆同意的合法地緣政治安排並達成均衡。美國與蘇聯儘管在歐洲能分別組織北大西洋

Francis Group, 2008), pp. 42-43; Donald E. Weatherbe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Southeast Asia: the Struggle for Autonomy* (Lanham,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9), p. 70.

⁴ Weatherbe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Southeast Asia*, op. cit., p. 61.

⁵ 比較嚴重的是菲律賓與馬來西亞之間對婆羅洲(Borneo)北部的沙巴地區(Sabah)的領土爭端。馬來西亞在獨立之初並未包括該地，是 1963 年才將該地納入，並與當時一起加入的新加坡和沙勞越(Sarawak)一起組成馬來西亞聯邦(Federation of Malaysia)，此舉幾乎引發菲律賓、馬來西亞與印尼之間的戰爭，也造成泰、馬、菲原來在 1961 年組成的「東南亞協會」(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 ASA)這一區域反共組織的崩潰。Rudd Van Dijk eds., *Encyclopedia of the Cold War*, p. 42.

⁶ 菲律賓與馬來西亞之間針對沙巴的爭端在 1966 年之後因為菲律賓總統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承認馬來西亞聯邦的成立，並與馬來西亞之間形成對於沙巴領土爭端的默契－該爭端為了區域團結的利益而暫被擱置，可是必須在東協架構內解決。但自冷戰以來迄今，此一爭端固然被擱置，卻從未成為東協的主要議題，而菲律賓官方則由於政治人物的利益、菲律賓本身發展不順利，以及菲南叛軍組織「莫洛伊斯蘭解放陣線」(Moro Islamic Liberation)不斷從鄰近的沙巴(相距不到 20 公里)得到支援與藏身處等諸多原因而從未真正放棄對沙巴主權的聲索，甚至將其法律化。Paridah Abd Samad and Darusalam Abu Bakar, "Malaysia-Philippines Relations: The Issue of Sabah," *Asian Survey*, Vol. 32, No. 6(June 1992), pp. 554-563.

公約組織與華沙公約組織(Warsaw Pact)兩大集體防衛組織，但在東亞完全無法複製此種成功經驗，只能與個別國家建立雙邊同盟或合作關係而無法建立多邊合作乃至聯盟。⁷僅有的多邊安全建制「東南亞公約組織」(SEATO) 甚至未包含東亞主要國家，⁸不僅為多數東南亞國家所敵視，會員國對組織也存在不同的利益與目標，成為東南亞公約組織的根本弱點。⁹亞太次體系在冷戰期間幾乎不存在類似歐安會議的多邊信心建立措施建制，少數雙邊信心建立措施幾乎都是區域內的雙邊措施，其規範不僅相當陽春，且因未真正行諸文字而不具有真正的拘束力。¹⁰

二、當代亞太地緣政治均衡

雖然與冷戰時相較，當前的亞太地緣政治次體系並不存在冷戰那種鮮明的意識型態對峙，政治制度亦大多轉變為民主制度並熱中於追求經濟發展，反對以武力解決國際爭端在大多數情況中已成為次體系中重要的秩序原則，儘管仍有少數例外如北韓在 1994 年以後屬於戰爭邊緣政策的核武發展計畫，以及中國始終不放棄武力解決臺海議題，但整體來說並無損於上述的認定。同時也出現更多區域安全建制與更緊密的經濟整合，次體系的異質性大為降低，但這些結構、單元與體系的變化並未導致當代亞太地緣政治次體系達成均衡，蓋在冷戰結束後，次體系中仍然沒有對尚存的政治、領土、經濟、軍事地緣政治利益做妥適的安排以解決因蘇聯解體、中印與東南亞崛起所產生的地緣政治競爭，既有的建制只是擴大參與國的範圍而沒有真正的解決。這些懸而未決的地緣政治利益在各方面都持續強化主要國家之間的競爭性權力平衡思考為主，協作性權力平衡代表的國際責任並未為每個主要國家所接受。

此外，在當前的亞太地緣政治次體系中，權力平衡的概念從 19 世紀中葉以前單純的領土變化意涵，聯盟的目的是為了以戰爭奪取領土或防止領土被奪取，逐漸在 19 世紀中葉以後改變為在平時維持正式聯盟來嚇阻潛在威脅對現狀改變的意圖，到目前成為以所謂的「戰略夥伴關係」與各國間的戰略對話與戰略合作

⁷ 關於美國為何以及如何在亞洲建立其以雙邊同盟為主的聯盟體系而非類似北約的多邊集體防衛建制，可參考 Victor D. Cha, "Powerplay: Origins of the U.S. Alliance System in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4, No. 3(Winter 2009/10), pp. 158-196.

⁸ 東南亞公約的成員國包括美國、英國、法國、澳洲、泰國、菲律賓、紐西蘭與巴基斯坦，其中只有泰國與菲律賓算是東亞國家。

⁹ John Spanier,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 II*, 10th edition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85), p. 205; Peter Lowe, *Contending with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m: British Policy Towards South-East Asia*(Basingstoke, England ;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p. 8, 91, 125, 140; Kai Dreisbach, "Between SEATO and ASE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egional Organization of Southeast Asia," in Marc Frey, Ronald W. Pruessen, and Tan Tai Yong eds.,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utheast Asia: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on Decolonization*(New York: M. E. Sharpe, 2003), pp. 246, 251.

¹⁰ 例如中國與蘇聯在 1969 年珍寶島事件幾乎爆發戰爭的危機之後，為了避免局勢進一步升高，中國向蘇聯提出以談判方式解決邊界衝突、保持邊界現狀與雙方不得推進邊界，以及軍隊互不開火射擊的建議，在 1969 年 9 月蘇聯外長柯錫金(Alexei Kosygin)訪問北京時得到後者的承諾，但雙方並未簽署任何書面文件確認。此外，上述菲律賓與馬來西亞之間的默契亦可視為未行諸文字的一種信心建立措施。Xia Liping,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Views toward CBMs," in Michael Krepon, eds., *Chinese Perspectives on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The Henry L. Stinson Center, May 1997), pp. 21-22.

等流動性與彈性極高的非正式同盟安排，來顯示各國之間的關係親疏與立場，來平衡其他國家的相反立場，正式軍事同盟除了冷戰時期遺留下來的之外，在冷戰後的亞太地緣政治次體系之後沒有新的軍事同盟產生，也沒有類似歐洲的北約東擴大樣的軍事同盟擴大。根據納德卡尼之研究，此種發展是因為冷戰後在全球層次、亞洲的區域層次與文化等多種因素促成。¹¹在全球層次主要是因為美國海權單極的產生，使反美同盟受制於美國優越的主宰能力而無法出現，經濟與貿易的全球化則是另一個因素。至於在區域層次，納德卡尼認為主要是亞洲地區的文化、語言、宗教、多元化的歷史等傳統對聯盟的反對，以及歐亞大陸廣大的地理空間使得任何國家很難在其上形成霸權等多重因素，使得歐亞大陸各國在冷戰後迄今儘管彼此競爭區域的影響力，卻沒有形成新的同盟。此外，核子武器擴散、非傳統安全威脅，以及經濟全球化，和反恐怖主義等較低層次安全議題的需要，使得他所說的「次級強國」儘管相互競爭，卻必須採取多邊合作來應付這些議題。

戰略夥伴關係由於不具有明確的針對對象，雖然舉行聯合軍事演習卻沒有聯盟的具約束力防衛承諾，同時強調建立強大的經濟關係、文化交流與應付非傳統安全威脅與議題等特徵，¹²使得權力平衡在當代亞太地緣政治次體系的運作因為缺乏真正明確的國家威脅目標而變得更為複雜，幾乎不再有冷戰之前涇渭分明的正式對抗聯盟出現，主要強國與中小型國家均為了擴張本身的利益而紛紛進行扈從與推卸責任的操作，所謂的「防範」，即是扈從、推卸責任與平衡的綜合。另外，冷戰後的亞太區域地緣政治結構形式亦轉變為美國海權單極結構，可是大國之間卻沒有形成多邊地緣政治安排來處理新結構中的各種地緣政治問題，反而因為中國、印度的崛起與東協對東南亞的進一步整合與發展而使得這一單極結構具有強大的離心力。中國與印度都分別展現出主導東亞與南亞發展的強烈企圖心，甚至互相將勢力伸入對方所在的地緣政治區域或主要發展方向。另一方面，日本雖然是美國自冷戰以來的堅定盟友，但其在冷戰後的外交政策逐漸明確地尋求成為一個「正常國家」，2009年民主黨執政後，更提出對美國與中國都要保持「等距」的外交政策。雖然日本的外交政策變化對結構的影響遠不如中國與印度的崛起，而且日本亦無法脫離美日安保體系獨立，但亦逐漸表現出本身的政治地緣政治利益。

結果，冷戰時期亞太次體系遺留下來的領土爭端在冷戰後有部分得到解決，如馬來西亞與印尼針對西巴丹(Sipidan)島與利吉丹(Ligitan)島的領土爭端確實經由國際法途徑，在2002年12月由國際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CJ)做出判決而順利解決。中國與越南的北部灣海域劃界問題與陸地邊界劃分，也分別在2004年與2009年解決。¹³第三個得到解決的領土爭端是中國與俄羅斯、中亞國

¹¹ Vidya Nadkarni, *Strategic Partnership in Asia: Balancing without alliances* (London: Routledge, 2010), pp. 45-46.

¹² *Ibid.*, pp. 48-49.

¹³ 「中國立法機關批准中國與越南北部灣劃界協定」，新華網，2004年6月25日，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4-06/25/content_1547607.htm；「中越兩國政府簽署陸地邊界勘界文件」，新華網，2009年11月18日，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09-11/18/content_12485837.htm。其中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8月

家之間的邊界爭議，也在 1996-2001 年之間大致上獲得解決。¹⁴不過大多數冷戰時期的領土爭端在冷戰後仍然沒有得到解決，而這些領土爭端大多數是海洋性的，反而因為冷戰後東亞各國致力朝海上發展的海洋領土化措施而進一步加劇。至於北韓核武問題、朝鮮半島統一與臺灣海峽議題等更複雜的區域政治與領土議題的政治解決則更是遙遙無期。至於東亞國家因應中國崛起的海上擴張而相應擴張本身的海軍力量，以及中國的海軍與海上擴張直接與美國海權、日本，以及周邊國家發生地緣政治利益範圍衝突，卻也沒有出現類似 1920-30 年代海軍條約體系的軍事地緣政治利益安排，結果是各國仍競相擴張本身之武力。

甚至在經濟地緣政治利益層面，雖然亞太地區本來已經存在包含大部分國家的「亞太經合會」(APEC)，但在本世紀初期卻在東亞地區逐漸出現以東協為核心，日益緊密的東亞區域經濟整合。雖然二者之間並未出現明顯的排斥或競爭，但東亞區域整合由於沒有政治與領土地緣政治安排的支持，遂使得東亞區域整合因為中國、日本與東協之間彼此爭奪東亞整合的主導權，並將東亞以外國家是否能夠加入東亞區域整合作為平衡彼此力量的籌碼。結果，雖然所謂的「東亞高峰會」(East Asian Summit)自 2005 年以來已經由原先的「東協加三」(東協、中國、日本、南韓)擴大為「東協加八」(東協、中國、日本、南韓、印度、澳洲、紐西蘭、美國、俄羅斯)。甚至還另外出現所謂的「泛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TPP)這個目前由美國大力推動以與中國競爭經濟整合的區域經濟協定。

這些發展顯示目前的亞太地緣政治次體系中無論是在政治、領土、經濟、軍事等地緣政治利益中都存在激烈的競爭與衝突，可是各國之間仍然沒有達成涵蓋所有議題的多邊地緣政治安排，特別是在敏感度最高的政治與領土層面，使得目前的亞太地緣政治次體系根本不存在地緣政治均衡。而目前的單極加三強亞太地緣政治結構雖然因為東亞、南亞本身的半封閉特性，而在表面上顯示出可以劃分為俄羅斯、中國、印度三個大陸強國彼此擁有各自的勢力範圍，而美國、日本與澳洲等三個海洋大國在美國海權單極主導下，掌握包含太平洋與印度洋的海洋領域，同時東南亞因冷戰的結束與東協的整合，早已擺脫冷戰時的破碎帶角色，從而似乎能形成一個有助均衡達成的結構，但實際上卻不是表面這麼簡單，目前的亞太單極加三強地緣政治結構一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歐洲區域地緣政治結構，雖然都是以海權單極為主的結構，卻因為大陸國家在陸地與海洋均出現激烈擴張競爭而導致強大的離心效應，難以達成均衡的結構。

首先，蘇聯解體使其在中亞、東北亞北部與部分東南亞留下有待填補的權力

時，中國外交部條約法律司海洋處處長蕭建國在接受中國媒體訪問時曾指出在北部灣劃界協議中只有海上邊界、專屬經濟區的劃界而不涉及兩國在北部灣內部島嶼的主權爭端，但有消息指出，中越北部灣劃界爭議中最受重視的島嶼—白龍尾島，實際上已在 1950 年代劃歸越南管理，而且中國漁船在 2004 年 6 月中越北部灣劃界協議相關的漁業協定生效之後遍布准進入白龍尾島 15 哩內的海域。吳蔚，「中越北部灣劃界面積相當 未涉島嶼主權」，[新浪網](http://news.sina.com.cn/c/2004-08-03/04203274593s.shtml)，2004 年 8 月 30 日，<http://news.sina.com.cn/c/2004-08-03/04203274593s.shtml>；陶短房，「北部灣劃界問題與中越關係現況」，[鳳凰博報](http://blog.ifeng.com/article/2682426.html)，2009 年 5 月 15 日，<http://blog.ifeng.com/article/2682426.html>。

¹⁴ Taylor M. Fravel, *Strong Border, Secure Nation: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in China's Territorial Disput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150-168.

真空，但目前的俄羅斯卻仍無力繼承前蘇聯的地位加以填補，而美國雖然在冷戰後初期與本世紀初期都意識到中國可能是其未來最大的競爭對手，卻將其戰略重心置於偏向歐洲的歐亞大陸與中東，導致中國與印度能利用這種形式發展其力量，在亞太區域地緣政治結構中迅速竄升，改變了與冷戰結束之初的形式。其次，東協本身不是歐盟那樣的區域組織，東協內部也沒有一個至少屬於第一級區域大國的主導國家，這使得其雖然成功地使東南亞地緣政治區域脫離破碎帶的角色，卻還無法使其成為不受次體系中各超強與強權介入的獨立地緣政治區域，尤其在與中國有嚴重領土爭端的南海地區更是如此。第三，雖然中國、印度、美國正如麥金德在 1943 年所言，¹⁵在地圖上看似各自佔有不同的地緣政治角色，沒有基本地緣政治利益衝突而可彼此互相制衡與合作，但實際上，印度與中國這兩個邊緣地帶大國都位於海上戰略交通線之旁，其位置原本就很容易威脅海權的控制；而印度視南亞次大陸與印度洋為一體，不可能放棄海洋去遷就陸地，或放棄陸地遷就海洋，西藏則是印度與中國之間的重要緩衝。但中國視西藏為其重要領土，對印度佔有部分西藏「領土」耿耿於懷，印度則對中國發展與喜馬拉雅山南麓的「邊緣地帶」國家的戰略關係，以及修建青藏鐵路這一重要的交通線進入西藏感到備受威脅。第四，與 19、20 世紀之交屬於英國海權單極的歐洲地緣政治次體系不同，當時德意志帝國雖然也在崛起並有奧匈帝國作為主要大陸盟友以與英國海權競爭，但彼時歐洲次體系中尚有法國與俄羅斯帝國兩個強權的聯盟可在歐陸上制衡德意志帝國的大陸力量，而如今的亞太區域地緣政治結構中卻沒有這樣的大陸同盟來應付中國的崛起與牽制其海上發展，印度在國力上完全弱於中國，俄羅斯雖然在政治與軍事力量尚可與中國相較，但是其在國際政治與經濟上的發展需要中國，故反而成為中國的主要大陸盟友，而其他中南半島國家更無法與中國相提並論，導致目前中國除了需在西線地緣提防較其本身弱小的印度，並在東北亞維持朝鮮半島現狀與穩定之外，並沒有在東亞大陸上並沒有什麼真正的威脅來牽制其海洋發展。

因此當中國與印度紛紛崛起時，結構就產生龐大的離心效應—印度希望將整個南亞與印度洋地區轉變為受其支配的地緣戰略領域，但這必然威脅到美國的海權基礎，同時也使中國對印度洋海上戰略交通線的使用能否暢通感到懷疑。而中國想組織東亞地緣戰略領域，則同樣嚴重威脅到美國的海權基礎，以及印度、日本、澳洲、南韓等次體系強權與一級區域大國在東北亞與東南亞的地緣政治利益，而且沒有其他大陸強國可以真正發揮對中國的牽制作用，使其能夠盡力朝海上發展，試圖驅逐美國對東亞的影響力。而對美國海權來說，想同時遏制中印兩國對其在太平洋與印度洋的威脅甚為困難，而俄羅斯的衰退，以及美、歐、俄長期以來的地緣政治心結與在歐洲、中東的競爭，又使美國難以運用俄羅斯來制衡中印兩國的崛起，不得不將目前能力發展落後於中國的印度作為主要戰略合作夥伴，並增加與東南亞國家的海上安全合作，來抵抗中國在東亞與西太平洋的地緣

¹⁵ Halford J. Mackinder, "The Round World and the Winning of Peace," *Foreign Affairs*, Vol. 21, No. 4(July 1943), p. 605.

政治壓力。¹⁶但如此又導致印度等於是在美國默許下發展其戰略能力，使得目前的亞太次體系產生離心力逐漸增加，可能在未來大於向心力的結構，對於均衡的達成增加很高的困難度，因為中國、印度都認識到當前的亞太區域地緣政治結構是可以在不引起大規模衝突的情況下，持續分別在東亞與印度洋地區擴張並獲得相對利得的結構形式，而非已經無法獲得相對利得，並陷入僵局的結構形式。故中國與印度都將持續擴張的地緣戰略，不會抱有真正願意以多邊國際合作達成均衡的心態。

第二節、中國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對亞太次體系的權力平衡效應

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在陸地與海洋都很容易同時引發強國之間的競爭性權力平衡思維，蓋其海軍擴張與海洋領土化作為威脅海權對海上戰略交通線的控制，也威脅海權、周邊其他海洋國家與鄰國的政治、軍事乃至領土地緣政治利益，試圖利用陸地交通線取代對海上戰略交通線依賴的作為同樣引發海權的疑慮。換句話說，這種地緣戰略形式因為強調海軍發展、有限制海與抑制海權的國際角色，對海權的海上戰略交通線控制有強大的腐蝕作用，而必然引發大陸強國與海權之間的對峙。而由於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的真正目標是大陸性，而且其利用陸地交通線繞過海上戰略交通線的作為經常會侵入另一個大陸強國的勢力範圍，容易引發大陸強國之間的猜忌甚至敵對。

中國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對亞太次體系其他主要國家的地緣政治利益威脅，從次體系層次來說，是試圖弱化美國在亞洲的角色並由中國取而代之；在區域層次則是阻止印度成為南亞與印度洋區域的超強，與日本、東協競爭東亞整合的領導權，並裂解東協使其無法成為類似歐盟的堅強國際組織；在周邊層次則是壓迫周邊國家接受中國的領土主張，並弱化美國在朝鮮半島事務的主導權。這些戰略目標隨著中國國力不斷的增長會因威望需求而更加迫切，並且不斷增強其攻勢願望，使得中國的「安西、靠北、爭東南」地緣戰略操作，雖然希望穩定西線地緣，並且爭取東南線地緣的國家來協助其發展經濟，卻因侵入周邊、區域與次體系主要國家的地緣政治利益，導致「爭取」與「安定」的效果反而被「鬥爭」所掩蓋，這對目前已經有很強離心效應的亞太地緣政治結構來說，中國的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將進一步引發嚴重的互疑並嚴重刺激彼此的競爭性權力平衡思維。

一、西線地緣

如第六章所述，中國極力希望維持西線地緣的穩定，以使其得以傾全力在其地緣戰略的最重要方向—東南線地緣進行「爭取」與「鬥爭」。但根據第六章對

¹⁶ Bronson Percival, "Growing Chinese and Indian naval power: U.S. recalibration and coalition building," in Sam Bateman and Joshua Ho ed., *Southeast Asia and the Rise of Chinese and Indian Naval Pow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pp. 36-47.

中國在西線地緣的戰略作為可知，中國雖然在該區的戰略態勢確實以守勢為主，但卻是帶有明顯「積極防禦」含意的戰略守勢，而這樣的態勢以及雙方皆不願在領土爭端中妥協的態度，對於達成地緣政治均衡所需的兩種權力平衡來說，激起競爭性權力平衡的效用將遠大於促成協作性權力平衡。

中印領土問題是雙方始終維持高度戰略互疑的一個重要關鍵，而且是刺激印度不斷進行內平衡的最主要因素。中國除了在錫金問題上小幅退讓，承認其屬於印度領土之外，¹⁷並不願意在其他中印領土爭端中對印度讓步。當然印度亦不願在這個問題上與中國妥協，但是當中國崛起導致其整體軍事力量不斷往上提升，逐漸拉大與印度之間的權力與能力差距，第六章指出的中國不斷增強西藏境內的基礎設施與軍事部署的行為，便很容易刺激印度對中國的疑慮甚至恐懼。印度迄今還是認為中國可能運用武力攻取由印度實際控制的領土爭議區：根據印度媒體在 2012 年 3 月的報導，一份由印度前高級外交與國防官員、學者在內的專家執筆的研究報告：「不結盟 2.0：21 世紀的外交與戰略政策」(Non-Alignment 2.0: A Foreign and Strategic Policy for the 21st century)指出，中國在可見的未來是印度外交政策與安全的重要挑戰，而且是直接衝撞印度地緣政治空間的唯一主要大國，其經濟與軍事能力的發展將拉大與印度的權力差距，印度不能完全排除中國使用武力攻取印度控制下的中印爭端領土的可能，而中國最可能的目標是印度的阿魯納恰爾邦(Arunachal)或查穆與克什米爾邦(Jammu and Kashmir)的拉達克(Ladakh)地區。¹⁸這些認知導致印度認為必須致力於發展能有效反擊中國的軍事戰略，¹⁹並不斷加強其北部與東北部靠近中印邊界地區的基礎建設與陸、空軍事部署。²⁰

除了領土爭端之外，另一個容易激起競爭性權力平衡的因素是中國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在印度洋與南亞地區對印度的外交圍堵所引發的地緣政治衝突。印度繼承了英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視南亞與印度洋為單一戰略區域的觀點，其範圍由北自阿富汗經西藏延伸至緬甸北部，自西由紅海向東延伸至麻六甲海峽，並且自 1960 年代後期確立了不允許或盡量縮小這個戰略區域以外主要大國在對區域內發揮影響力的原則。²¹但是如第六章所分析的，中國在西線地緣對印度實際上嚇阻重於交往的行動，同時在南亞大陸與印度洋侵入了印度一向視為屬於其勢力範圍的戰略地區的周邊，特別是中國與印度在南亞最大的競爭對手巴基斯坦，

¹⁷ 中國官方從未正式公開承認錫金是印度的領土，而是在 2003 年以後的多次聯合聲明、地圖與備忘錄中承認錫金為印度之領土。唐璐，「中印雙方在邊界問題上互作調整」，*國際先驅導報*，2005 年 4 月 18 日，http://news.xinhuanet.com/herald/2005-04/18/content_2844918.htm。

¹⁸ Sunil Khilnani et al, "Non-Alignment 2.0: A Foreign and Strategic Policy for the 21st century," *Centre for Policy Research*, February 29, 2012, http://cprindia.org/sites/default/files/NonAlignment%202.0_1.pdf, p. 40.

¹⁹ *Ibid.*, pp. 40-42.

²⁰ Prabin Kalita, "IAF moving Sukhoi base to northeast to thwart Chinese threat," *The Times of India*, June 10, 2009, http://article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2009-06-10/india/28190068_1_su-30mki-air-base-chabua; "Army has two new mountain divisions," *The Times of India*, February 8, 2011, <http://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india/Army-has-two-new-mountain-divisions/articleshow/7448646.cms>.

²¹ John W. Garver, *Protracted Contest: Sino-Indian Rival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1), p. 17.

以及印度北方緊鄰中國邊界，並不屬於北印度「印地語」的不丹與尼泊爾之間的密切關係，最讓印度感到憂慮。而中國對位於印度傳統戰略地區周邊地區國家的「滲透」，在 2000 年之前已經使得這個地區中的巴基斯坦、伊朗、孟加拉、緬甸與斯里蘭卡等國視中國為「良善」的國家，認為中國的權力有助於這些國家平衡他們更關切的印度、美國或俄羅斯等區域中主要強國的力量。²²

這些外交圍堵行為自然不為印度所容許，故印度除了加強本身的軍事建設與部署之外，亦亟謀與次體系內中國的其他競爭對手合作以施加對中國的壓力。自 2005 年起，先後與美、日、澳三國發展出密切的戰略合作關係，包括 2005 年與美國簽署「防衛關係新架構」；2006 年 3 月，美、印建立戰略伙伴關係；2006 年 5 月，日、印簽署「國防合作協定」；2006 年 12 月 15 日，日、印建立戰略伙伴關係；最後則是 2008 年 10 月 22 日，印度與日本簽署的「日印安保共同宣言」(Joint Declaration on Security Cooperation between Japan and India)。使得原先美國在亞太建構的美、日、澳三邊戰略安全合作機制，擴大成為美、日、印、澳四邊戰略安全合作機制，儼然對中國構築起一道自東北亞延伸至南亞的邊緣地帶圍堵線。雖然這一四邊戰略合作機制因為中國的嚴正抗議，以及四國後來各自改變政府、採取與中國深入交往的新政策而在 2007 年以後無疾而終。

不過印度亦非只關注與主要強國的聯合，其對象亦向東伸入東南亞地區。印度自 1940 年代以來即與越南保持密切的關係，甚至稱越南為「最信任的朋友與盟友」(most trusted friend and ally)，在冷戰以後則進一步發展為包括多重國防合作，以及越南作為印度海軍進入南海的基地，以反制中國海軍進入北印度洋。除了越南之外，印度也與新加坡在 1990 年代發展了密切的國防合作。²³雖然越南尚未改變態度，同意將金蘭灣提供為印度海軍在南海的基地，但根據與越南的新安全合作關係，印度不僅向越南出口許多軍事設備，並準備在越南宣稱為自己所有的南海專屬經濟區中探勘石油，²⁴導致中國曾被印度媒體報導，在南海騷擾印度海軍戰艦，²⁵並施壓印度必須放棄已經與越南簽署的在南海的石油探勘合約，²⁶更在 2012 年 3 月及 4 月連續兩次公開警告印度不能插手南海事務，²⁷如此一來，

²² *Ibid.*, p. 30.

²³ See David Brewster, "India's Strategic Partnership with Vietnam: The Search for a Diamond on the South China Sea?" *Asian Security*, Vol. 5, No. 1(January 2009), pp. 24-37.

²⁴ "India, Vietnam launch security dialogue," *The Times of India*, October 13, 2011, http://article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2011-10-13/india/30274619_1_extradition-treaty-similarly-welcome-vietnamese-investments-india-vietnam.

²⁵ "China harasses Indian naval ship in South China Sea," *The Times of India*, September 2, 2011, <http://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india/China-harasses-Indian-naval-ship-on-South-China-Sea/articleshow/9829900.cms>.

²⁶ 事實上，印度並未接受中國的警告而停止進入南海，藉由中菲黃岩島衝突的機會，其外交部在 2012 年 5 月 11 日發出一紙罕見的聲明，表示維持南海周邊的穩定是國際社群的共同重要利益，希望有關各方能相互克制，並秉持國際法原則循外交途徑解決問題，此舉不啻是公開承認介入南海議題。"India steps into Philippines-China spat over South China Sea," *The Times of India*, May 11, 2012, <http://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india/India-steps-into-Philippines-China-spat-over-South-China-Sea/articleshow/13089219.cms>.

²⁷ "Stay away from South China Sea: China warns India," *IBNLive*, March 25, 2012, <http://ibnlive.in.com/news/stay-away-from-south-china-sea-china-warns-india/242460-2.html>; "Keep

所刺激的仍是競爭性權力平衡而非協作性權力平衡，蓋即使印度可能因不願觸怒中國而停止插手南海議題，²⁸但這並不表示印度承認東南亞與南海為中國的勢力範圍，或認為能夠以此承認換取中國停止在南亞次大陸與印度洋地區的發展，因為雙方並沒有先解決彼此在陸地上直接衝突的地緣政治利益，並互相建立協作性權力平衡。

二、東南線地緣

比起西線地緣，中國極力爭取的東南線地緣因鬥爭而引發的互疑與競爭性權力平衡作用更加明顯。不過雖然中國海軍擴張與海軍戰略對美國海權單極地位的影響是東南線地緣最重要的安全形勢發展，但由於涉及海權與陸地強國之間的互動模式，本章留待下一節專門敘述，在此先分析中國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對東亞國家的權力平衡刺激。

(一)、微弱的協作性權力平衡實踐

基本上，中國在東南線地緣並不乏參加多邊國際組織、與美國、日本、南韓等大國之間的雙邊對話等看似屬於協作性權力平衡的作為。而中國拒絕美國的「兩國集團」概念之後，由戴秉國在 2012 年 5 月在第四回美中戰略與經濟對話中提出似乎與其追求「和諧世界」與「和平發展」相符的替代概念—「兩國協調」(「C2」)，加強雙邊溝通、協調與合作，並秉持相互尊重、增進互信；平等互利、和睦共贏，謀求共同發展；開放包容、循序漸進，共同推進區域合作制度發展；求同存異、共擔責任，以合作求共同安全，妥善處理地區熱點問題等四項兩國在亞太互動的原則。²⁹

然而這個概念能否促進東南線地緣的協作性權力平衡並協助亞太次體系達成地緣政治均衡仍頗有疑問。根據第三章的均衡達成條件，「兩國協調」只是中美兩國對亞太次體系的「共管」，從這個角度來看，其基本性質與「兩國集團」相比，似乎沒有太大的差別。既然「兩國協調」最多只是雙邊合作機制而非納入其他主要亞太強國的多邊合作機制，那麼其對於協作性權力平衡與均衡能有多少幫助實難以確定，因為這涉及美國與中國能否取得對其他國家的強大外交影響力，能夠各自領導親中與親美國家的外交行動，甚至主導東南線地緣內的領土爭端解決，但目前的亞太局勢能否達成這樣的形勢實頗有疑問。此外，無論美國與其他亞太國家是否接受這樣的概念，「兩國協調」並沒有嘗試解決美中之間在亞太次體系內的各種敏感地緣政治利益，即劃分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勢力範圍，並說明美國在東亞整合中的地位與角色，也沒有其他協調軍事力量部署、軍事與政

off South China Sea, India warned,” *The Times of India*, April 5, 2012, <http://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india/Keep-off-South-China-Sea-India-warned/articleshow/12540393.cms>.

²⁸ Saibal Dasgupta, “China warns India against exploring oil in South China Sea ahead of Krishna’s visit to Hanoi,” *The Times of India*, April 5, 2012, http://article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2011-09-15/india/30159956_1_south-china-sea-sea-disputes-jiang-yu.

²⁹ 「戴秉國：促進中美在亞太地區良性互動」，*新華網*，2012 年 5 月 3 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05/03/c_123074577.htm。

治信心建立措施等具體戰略行動的內容。顯示這個概念還只是在一個相當初步與粗淺的階段，也不是達成地緣政治安排的指導概念，想要藉此促進亞太協作性權力平衡與均衡，仍有相當長遠的路要走。

東亞主要國家之間都有複雜的海上領土爭端，如中日、日韓、日俄，以及南海周邊國家，相互交錯的雙邊威脅關係原先就不容易發展出針對海上傳統安全的信心建立措施乃至多邊安排，³⁰中國在區域內的海上擴張更是進一步刺激已有的矛盾，遑論與美國、日本、印度等次體系主要國家進行更進一步的政治、領土、軍事地緣政治利益安排。中國由於對美國、日本等主要的海洋超強與強權懷有甚強的戒心，尤其與美國有極為嚴重的「互疑」，導致其經常懷疑以美國為主導的海上多邊安全倡議與建制之真正目的乃是對中國主權的侵犯，甚至是對中國崛起的遏制。這造成中國對於涉及主權與傳統安全議題的協作性權力平衡，仍有相當高的不信任與排斥，而且限制了其對以美國為首的海上多邊安全倡議參與的層級，這方面最明顯的例證來自中國對亞太地區海上安全合作的參與。儘管中國越來越重視東南線地緣的海洋權益與經由海洋獲得的利益，但是由於中國的周邊地緣政治密碼目標是掌控周邊海域，這使得其對目前存在於亞太地區的海上安全倡議與合作機制抱持強烈的競爭性權力平衡思維，懷疑這些大多由美國所主導的海上安全倡議與安全合作機制的真實目的是否確實為促進海上安全，或只是美國意圖進一步強化對海洋控制的作為，導致中國在這些海上安全合作的參與度都很低，層級也不高。根據黃恩浩與王俊評的研究，中國在東南線地緣的海上安全合作中只是有限度地選擇支持一些以美國為主的低階海上安全合作機制，藉以宣傳其和平崛起的口號，多侷限於低度敏感的非傳統安全議題，或低階海軍合作如與各國海軍互動，包括船艦赴國外港口參訪、海軍雙邊及多邊演習，以及高階官員交流互訪，以及 2002 年由美國海關及邊境保護局(Bureau of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在 2002 年首度提出，目的在反制每年運往美國的大量貨櫃可能帶來的高度風險的貨櫃安全倡議(CSI)。除此之外，中國基於對美國的懷疑而不願參加包括防止武器擴散安全倡議與區域海事安全倡議(RMSI)等在內的海上安全倡議與合作。³¹

(二)、東南線地緣的競爭性權力平衡發展

相較之下，中國的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對東南線地緣的競爭性權力平衡刺激就相對多過協作性權力平衡。這包括中國在亞太次體系崛起之後，其海軍擴張與海軍戰略對美國海權單極地位的影響，以及中國在東北亞與東南亞的海上領土鬥爭以及新陸上交通線建設，分別影響中國周邊國家的領土地緣政治利益，以及日本、東協對東亞區域整合主導權的政治與經濟地緣政治利益。除此之外也包括中國雖然希望在朝鮮半島中爭取南韓，以削弱美國、日本對朝鮮半島的影響力，甚

³⁰ Hyun-Ki Kim, "The Possibility of Naval between Korea and Japan," in Choon Kun Lee, *Sea Power and Korea in the 21st Century* (Seoul: The Sejong Institute, 1994), p. 184.

³¹ 黃恩浩、王俊評，「中國海權擴張對亞太區域權力平衡之衝擊」，發表於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101 “亞太區域研究”」學術研討會(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2012年3月9-10日)，頁16-21。

至將朝鮮半島建為東亞地緣戰略領域在東北亞與美國、日本的緩衝區，但其不可能放棄支持北韓的基本政策與兩面下注心理，造成其在 2010 年以來的天安艦事件與延坪島砲擊等南韓受到北韓攻擊的事件中皆保持不願譴責北韓的態度，卻又刺激南韓對中國的疑慮，認為其不可能取代美國在朝鮮半島中的地位，反而加強美韓同盟以及南韓與美國、日本間的戰略合作。

此外，中國所推動的跨國陸地交通線建設特別是鐵路，具有很強的政治經濟整合功能，雖然對於東亞的經濟整合可能具有很大的幫助，但如果沒有其他強國的強力政治與經濟介入，或是這些鄰國僅能依賴與中國的陸地交通線來發展本國經濟，最後很可能導致這些陸地鄰國不得不因為經濟而在安全層面別無選擇地扈從於中國，從而形成中國的勢力範圍，乃至於成功組織東亞地緣戰略領域。而中國的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在東南亞的鬥爭與爭取作為，原本就是在裂解東協，使其無法成為一個能在地緣政治與經濟議題上與中國競爭的有力對手。在這種情況下，一旦泛亞鐵路東南亞走廊在中國主導下完成，東協勢必很難再擁有目前在東亞區域整合中的中心地位，勢必改以中國為主導。雖然真正能顯示鐵路建設是否為擴大勢力範圍考量的，是建設國是否能依其政治目的與意志來決定鐵路的路線，而第六章已經指出，攸關泛亞鐵路網成形與否的東協境內段重要關鍵，率先興建的卻是經過越南的東線，而非對中國最具戰略意義與重要性的中線與西線。儘管中國方面稱這是因為中國「尊重」東協的決定，³²但除了現實上的理由—越南境內已有鐵路網，需要新建的路線最短—之外，其實暴露中國在泛亞鐵路東南亞走廊的興建上除了必須與成本妥協之外，³³無法使自己的意志壓倒東協的意志。這樣的發展顯示，雖然中國與親華媒體認為泛亞鐵路網的完成將使東南亞國家因經濟利益的擴大而削弱對中國威脅的敏感，將更加強調與中國的合作而非處處防範，³⁴而且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交往與經濟整合，確實已經相當有效地消除東南亞國家對中國崛起可能帶來戰爭的最壞觀點，但大多數東南亞國家仍把崛起的中國視為政治、領土、軍事與經濟上的潛在威脅。³⁵

如上所述，原本中國崛起本身就已經是東南線地緣中許多國家感到憂心的現

³² 「30 小時穿越東盟」，*東盟財經*，2010 年 6 月 9 日，<http://www.asean-info.com.sg/user/1338/125/2010699293883478.html>。

³³ 雖然泛亞鐵路東線通過廣西與北越之間所謂的「環北部灣區」，後者在 2007 年的十二五中被稱為從與四川成渝區、瀋陽為核心的東北舊工業區、武漢為核心的中部地區的競爭中脫穎而出，被確認為繼珠三角、長三角、環渤海區以外的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第四極」。但是這種發展晚於東線的動工(2005 年 9 月)，儘管廣西曾在 2005 年 2 月底提出盡快興建東段的要求，但當時環北部灣區的完整構想尚未形成與付諸實施，不能把東線的優先建設認為與環北部灣區發展有密切的關係。「中國和東盟七國專家指出，修建中—東線泛亞鐵路和崇左至欽州高速公路具有重要戰略作用」，*人民網*，2005 年 3 月 1 日，<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49/14173/1262740.html>；「“中國經濟第四極”確定為環北部灣經濟圈」，*中評網*，2007 年 12 月 04 日，<http://mag.chinareviewnews.com/doc/1005/0/7/1/100507185.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0507185>。

³⁴ 彭念，「外報：“高鐵戰略”成中國與周邊政經交往“黏合劑”」，*中新網*，2011 年 4 月 28 日，<http://www.chinanews.com/hb/2011/04-28/3004159.shtml>。

³⁵ Evelyn Goh, “Southeast Asian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a Challenge,” *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30, No. 4-5(August-October 2007), pp. 810-823.

象，而中國周邊地緣政治密碼中對領土爭端的堅決不退讓態度，使其與東北亞與東南亞地緣區域與中國有嚴重領土爭端國家造成嚴重的領土地緣政治利益衝突，以及領土爭端之外的地緣戰略作為，例如上述的跨國鐵路網建設、中國政治經濟影響力在東南亞地區的擴張，以及中國海軍戰略的擴張與海上力量發展等在東南線地緣的操作，也都很容易引發其他東南線地緣國家的競爭性權力平衡作為。處於中國地緣戰略中東南線地緣的國家與印度一樣，同時外平衡－利用拉進其他次體系中的強國介入東南亞－以及內平衡－強化本身的軍事力量，特別是海軍－等傳統手段來降低中國地緣戰略所引發的潛在威脅。

1. 外平衡與競爭性權力平衡

東南線地緣的競爭性外平衡，既包括美國、印度、澳洲等國家與此一方面國家的戰略安全合作，也包括這一方面國家之間的彼此合作，甚至美國、印度、澳洲等國家彼此在東南線地緣外圍的合作。其中，美國與這一方面國家的戰略合作，由於涉及美國海權對中國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的回應，本章留待第三節分析，此處先分析位於中國東南線地緣的其他屬於競爭性權力平衡的外平衡作為。

(1). 次體系強國的戰略合作與競爭性權力平衡

東南線地緣以外的強國戰略合作，除了美印之間發展迅速的戰略合作關係之外，澳洲與印度的戰略關係發展也相當迅速，澳洲除了在 2011 年 11 月解除對印度的鈾輸出管制之外，³⁶也與印度一起針對中國在南海的獨斷態度，呼籲尊重公海航行自由。³⁷雖然這種外圍國家在東南線地緣周邊進行戰略合作的情況因為地理上的敏感性，通常都會宣稱不針對中國，但其仍會對中國在東南線地緣的行動自由造成牽制，而且這些國家並沒有邀請中國參加其合作，故應可視為對中國的一種競爭性權力平衡作為，儘管其意涵並沒有那麼強烈。

就東南線地緣內的國家而言，由於日本與東協是中國在東南線地緣中首當其衝的操作目標，故展現出較為積極的平衡作為，但這兩者的操作方式有極大的差異。日本由於與中國同為亞太次體系內的強權，其方式屬於較明顯偏向傳統競爭性權力平衡性質的聯盟操作。除了維持與強化既有的美日同盟之外，日本與印度、澳洲之間的雙邊戰略合作也有令人側目的發展：對中國的嚴重關切是日印關係在 2000 年之後迅速升溫的主要因素，³⁸雙方在 2006 年 5 月簽署「國防合作協定」，並於同年 2006 年 12 月建立戰略伙伴關係；日本與澳洲則在 2007 年 3 月簽署「日澳安保聯合宣言」(Japan-Australia Joint Declaration on Security Cooperation)，2008 年 10 月則是「日印安保共同宣言」。上述這些東南線地緣的亞太次級強國雙邊關係的發展，在 2007 年 8 月促成一個同時包含美、日、印、

³⁶ “Australia to revoke ban on uranium sale to India,” *The Times of India*, November 16, 2011, http://article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2011-11-16/india/30405412_1_uranium-sale-rory-medcalf-1-owy-institute.

³⁷ “India, Australia call for 'freedom of navigation' on high seas,” *The Times of India*, December 8, 2011, http://article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2011-12-08/india/30490201_1_defence-cooperation-trilateral-security-pact-ban-on-uranium-sales.

³⁸ Purnendra Jain, “Westward Ho! Japan Eyes India Strategically,” *Japanese Studies*, Vol. 28, No. 1(May 2008), pp. 15-30.

澳四個次體系中的超強、強權與一級區域大國的四邊戰略機制。雖然四邊戰略機制在 2007 年曇花一現，但美日同盟的強化、美日澳戰略對話、日印與日澳安保合作則都持續存在，且在歐巴馬政府宣示重返亞洲(return to Asia)之後，³⁹在 2011 年 12 月首次舉行聚焦於印度洋與南海等美日印三國皆有共同利益，並與中國相關的海洋議題的美日印三邊戰略對話，並達成協調各自在這些議題上的立場與角色的共識。⁴⁰除此之外，日本與印度更在 2012 年 6 月於東京附近的相模灣首度實施雙邊聯合海軍演習，相當於海軍司令的海上自衛隊幕僚長杉本正彥暗示，演習的目的與意義就是為了因應中國崛起對亞太安全所造成的不確定因素。⁴¹

亞太次體系內的強國之所以出現上述的複雜戰略合作發展，其中特別關鍵的因素在於南海對於次體系中所有強國的特別戰略價值。雖然南海在中國的利益定位還不完全屬於核心利益，在地緣政治密碼的層級也只屬於周邊密碼，但南海實為中國能否真正建立以其為核心的東亞地緣戰略領域的關鍵－倘使中國能如同美國控制墨西哥灣(Gulf of Mexico)與加勒比海(Caribbean Sea)那樣直接控制南海與其周邊地區，則必然能藉由此一優勢主導地位阻斷次體系中美、日、印、澳等超強、強權與一級區域大國對南海周邊地區的滲透與影響力，並高度弱化東協在東南亞與東亞區域整合中既有的領導角色，同時如閻學通所指出，可迫使日本相當程度必須與美國保持距離並融入以中國為核心的東亞地緣戰略領域和接受中國對東亞區域整合的主導。而在這種情況之下，美國、印度以及東南亞國家都將失去一個潛在有力的聯合對手，勢必削弱其在東南亞的地位，讓中國得以主宰整個東南亞。當然這樣的後果，美、日、印等超強、強權與一級區域大國並非不明瞭，故對南海地區有越來越明顯的直接介入，使得南海議題已經升級為中國與亞太次體系各強國的主要地緣政治競爭之處。

此種地緣政治競爭的升級導致中國在南海的強硬行為在 2008 年以後越來越常見，部分原因乃是臺灣海峽議題局勢緩和，使中國得以抽出許多原先用來應付臺海議題的精力與力量，並運用於南海和東海的緣故。中國海軍進一步的現代化，即使仍不能危及美國的海權地位，但任何能增強中國對南海與東海控制的海軍力量成長，以及中國在西太平洋與印度洋遠洋作戰能力的提升，都會促使美國、日本與澳洲的進一步戰略合作，若中國在領土爭端中拒絕對印度讓步，亦會刺激印度深化與美國、日本的戰略合作，使這些國家的推卸責任戰略變得不切實際，進一步形成真正針對中國的戰略聯盟，無論其安排是正式或非正式。而這些安排的性質很顯然屬於競爭性權力平衡。

(2). 東協國家的「間接平衡」：間接性的競爭性權力平衡

³⁹ “U.S. ‘is back’ is Asia, Secretary of State Hillary Clinton declares,” *New York Daily News*, July 21, 2009, http://articles.nydailynews.com/2009-07-21/news/17929594_1_north-korea-nuclear-weapons-program-nuclear-technology.

⁴⁰ “India, Japan, US meet today with China on minds,” *The Times of India*, December 19, 2011, http://article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2011-12-19/india/30533569_1_maritime-security-trilateral-dialogue-south-china-sea.

⁴¹ 峯匡孝，「日印共同訓練 中国の海洋覇権阻止の意志を示す」，*産経新聞*，2012 年 6 月 9 日，<http://sankei.jp.msn.com/politics/news/120609/plc12060920480012-n1.htm>。

相較於日本等強權與區域大國的競爭性外平衡行為，成員最多在結構中只屬於第二級區域大國，也不如歐盟那樣具有強有力組織與對外行動能力的東協，雖然是中國在東南線地緣的主要目標之一，部分成員國也仍然視中國為安全上的嚴重挑戰，但其外平衡之舉就比較不那麼直接，乃是採取軟平衡或某些學者所稱的「間接平衡」(indirect balance)來應付中國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的挑戰。⁴²根據戈赫(Evelyn Goh)的描述，所謂的間接平衡乃是一種不以權力為主要目標的平衡戰略，其包含兩種手段，第一種是由個別國家片面或雙邊進行，以嚇阻潛在威脅的間接軍事平衡，第二種則複雜許多，戈赫稱為「區域複合平衡」(regional complex balancing)，其手段包括引入更多對東南亞的安全有重要利益的區域外強國，使東南亞區域內的權力競爭呈現分散化(diversification)；在國際建制中，給予這些強國在戰略議題中角色，以改變它們在區域事務中的交往與權力的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最後是將戰略焦點由權力平衡轉向「影響力平衡」(balance of influence)，使平衡手段擴大至更多非軍事手段，讓區域內戰略競爭盡可能集中在外交與政治層面的規範化(normalization)。

在間接平衡的驅動下，身為東亞國家之一，並與東協對中國崛起並深入東南亞、可能掌握未來東亞整合主導權有共同的憂慮的日本，就成為東協在間接平衡戰略中最主要的東亞合作對象國。東協與日本近年來擴大在海洋安全與次區域整合上的合作，包括日本防衛省在 2011 年 7 月以東南亞地區為主，設立指導東南亞國家救災、掃雷、反海盜等安全技術的「能力構築支援室」，⁴³並在 2012 年 4 月，以聯合東南亞濱海國家應付中國為目的，利用其「政府開發援助」(ODA)為手段來建立在東南亞對中國的「包圍網」，其行動包括贈與馬來西亞、越南與菲律賓巡邏船隻；與泰、寮、柬、緬、越等中南半島湄公河流域國家自 2009 年起舉辦「湄公與日本高峰會」，並在 2012 年的第四屆會議上提出未來三年投入六千億日圓與大湄公河次區域的財政計畫，並獲得中南半島國家的支持；此外，日本也同意取消緬甸以往積欠日本的 37 億美元的債務，並給予緬甸新的貸款。⁴⁴而與中國在南海有直接且激烈領土爭端的越南與菲律賓，更自 2011 年以來進一步加強與日本的國防及海事安全合作，⁴⁵其中菲律賓不僅強化與日本的國防合作，

⁴² 下文關於間接平衡的描述，皆引用自 Evelyn Goh, "Great Powers and Hierarchical Order in Southeast Asia: Analyzing Regional Security Strategi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2, No. 3(Winter 2007/08), pp. 132-148.

⁴³ 楊明珠，「牽制中國，日授東南亞安全技術」，中央社，2011 年 7 月 23 日，<http://www2.cna.com.tw/ShowNews/Detail.aspx?pNewsID=201107230077&pType1=PF&pType0=aOPL&pTypeSel=&pPNo=1>。

⁴⁴ "Japan to write off \$3.7bn Burma debt," *BBC*, April 27, 2012, <http://www.bbc.co.uk/news/world-asia-17797910>; 「首相、3年でODA6000億円表明日メコン首脳会議」，*產經新聞*，2012 年 4 月 21 日，<http://sankei.jp.msn.com/politics/news/120421/plc12042112080007-n1.htm>；「フィリピンなどに船艇供与 戦略的ODAで“対中包圍網”」，*產經新聞*，2012 年 4 月 29 日，<http://sankei.jp.msn.com/politics/news/120429/plc12042901190000-n1.htm>。

⁴⁵ 越南與日本在 2011 年 10 月 24 日藉由國防部長對談，簽署了一項雙邊軍事合作與交換的備忘錄，決定將國防次長層級雙邊對話制度化與定期化，同時越南軍方與日本自衛隊各軍種將在人道救援與救災層面實施實務層級(working-level)的定期互訪，作為雙邊合作的基礎。在 2012 年 7 月

還因為黃岩島事件的刺激，而批准了原本在 2007 年就已經與澳洲簽署，且後者早已批准的「菲律賓－澳洲互訪軍隊地位協定」(Status of Visiting Forces Agreement, SOVFA)，來進一步強化與更多區域外強國的戰略合作。⁴⁶

美國對於東協的間接平衡來說更是最主要的對象，其與東協國家之間的戰略合作也是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雙管齊下。前者最主要是強化與東協成員國之間的安全合作，東南亞國家中位於南海周邊的國家與新加坡，不僅持續讓美國保持在東南亞地區的軍事存在，部分國家如菲律賓這種和中國在南海主權爭端上直接針鋒相對的國家，甚至擴大和美國的安全合作，其中最明顯與直接的，就是 2012 年 4 月中菲在南海黃岩島的對峙即促使菲律賓更進一步導向美國並尋求更多物質援助以抗衡中國的作為。⁴⁷

而非傳統安全合作中，最值得注意的便是美國傳統與非傳統安全合作對象進入被科恩劃為中國支配的印度支那地區，包括其在冷戰時的主要敵人越南，以及與中國在冷戰結束後密切的友好國家柬埔寨等兩國，美國不僅與越南發展出越來越密切的安全合作，也對越、柬兩國提出大量的軍事、經濟與人道援助，甚至在柬埔寨設立軍事訓練中心，並與柬國進行沒有中國參與的雙邊與多邊軍事演習。⁴⁸當然美國在中南半島上的合作對象不只越、柬兩國，美國「重回」亞洲之後大的象徵，就是其「重回」湄公河區域，美國在 2009 年與東南亞湄公河流域的泰國、寮國、柬埔寨與越南等四國在泰國舉行首屆「美國－下湄公河區域會議」(US-Lower Mekong Meeting)，並提出許多湄公河流域的開發與生態保護計畫，和

14 日，日本外相玄葉光一郎在訪問越南時也與越方決定，以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與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為基礎，加強雙方的海事安全合作。“Japan-Vietnam Defense Ministerial Meeting (signing of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inistry of Defense, Japan Defense Focus*, No. 24(December 2011), <http://www.mod.go.jp/e/jdf/no24/leaders.html>; “Vietnam, Japan agree on cooperation for maritime security,” *Thanh Nien News*, July 16, 2012, <http://www.thanhniennews.com/index/pages/20120716-vietnam-japan-to-enforce-cooperation-in-marine-security.aspx>.

⁴⁶ George Amurao, “Philippines arms itself with new pacts,” *Asia Times Online*, August 2, 2012, http://www.atimes.com/atimes/Southeast_Asia/NH02Ae01.html.

⁴⁷ 在黃岩島事件爆發後，菲律賓外長德羅薩里歐(Albert del Rosario)在 2012 年 4 月 26 日即向美國指出，根據 1951 年的「美菲共同防禦條約」(Mutual Defence Treaty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Philippines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美國應協助菲律賓建立有效的國防來應對外來威脅，而據此在 2012 年 5 月向美國要求提供更多有助於海洋監控的武器與系統，而美國則向菲律賓承諾，將在 2012 年倍增給予菲律賓的軍援至三千萬美元，並與菲律賓共同分享其海域的即時情資。“PH seeks US military help amid China row,” *ABS-CBN News*, April 26, 2012, <http://beta.abs-cbnnews.com/nation/04/26/12/ph-seeks-us-military-help-amid-china-row>; Manuel Mogato, “U.S. triples military aid to Philippines in 2012,” *Reuters*, May 3, 2012,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2/05/03/us-philippines-usa-idUSBRE8420IU20120503>.

⁴⁸ 見陳鴻瑜，「美國、中國和東協三方在南海之角力戰」，*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12 卷第 1 期(2011 年 1 月)，頁 53-56。美國在 2010 年與柬埔寨的演習尚為多邊性質，但在 2011 年以後，已經分別與柬埔寨舉行三次雙邊聯合軍事演習，見“Cambodia, U.S. naval forces to conduct joint drill this weekend,” *People’s Daily Online*, February, 23, 2011, <http://english.people.com.cn/90001/90777/90851/7297922.html>; “U.S. Marines, Cambodian Forces Continue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and Disaster Relief Cooperation,” *Embassy of the United States Phnom Penh, Cambodia*, December 12, 2011, http://cambodia.usembassy.gov/121211_pr.html; “United States, Cambodia Begin First Joint Military Exercise of the Year,” *Embassy of the United States Phnom Penh, Cambodia*, March 12, 2012, http://cambodia.usembassy.gov/031212_pr.html.

援助這些國家對抗傳染病、疾病的威脅，以及與美國的交流學生教育計畫等，2010年7月更將給予上述四國的金額擴大至1億8千7百萬美金，作為與軍事援助相配套的非傳統安全措施，試圖藉由這些合作在印度支那建立軍事聯繫紐帶關係，將印支半島和中國切割開來。⁴⁹

另一個東協極力拉攏進入間接平衡戰略的區域外強國是印度。泰國、緬甸倡議建設連接緬甸東南部土瓦(Dawei)深水港與印度南部清奈之間走廊(Chennai-Dawei Corridor)的國際開發構想，該走廊由於連接南印度的新興工業區與東南亞預計將比中國在印度洋周邊的珍珠串相形失色，蓋後者周邊的內陸腹地目前均尚未開發，而泰國也邀請日本加入這一建設計畫。⁵⁰當然更不能忽略的間接平衡手段，是東協不斷擴大能正式參與東亞高峰會的區域外國家成員：在2005年即允諾印度、澳洲與紐西蘭加入東亞高峰會，使之由「東協加三」進一步擴大為「東協加六」，更在2010年10月擴大為納入美國與俄羅斯的「東協加八」，讓美國與俄羅斯能正式加入東亞高峰會，⁵¹來進一步降低中國在東亞高峰會中的影響力，達成間接平衡中的分散化以及「影響力平衡」。

除此之外，由於中國近年來在南海的動作越來越具有獨斷性，導致部分東協成員國可能發展出超越以往の間接平衡或軟平衡的外平衡操作。根據2012年6月14日一項來自印尼軍方的消息指出，印尼將主導聯合越南、菲律賓與汶萊等其他三個與中國在南海有主權爭端的東協會員國，研究在南海南部中國宣稱擁有主權的海域實施聯合巡邏，監控中國漁船的「非法」捕魚行為，並利用無線電交換彼此的監控情報，同時協調一致行動，以進一步強化監控的效果，藉此對抗中國在南海的行動。⁵²雖然這項倡導是否將成真尚不得而知，不過這項行動的特別之處在於，東協的南海周邊成員國過去只在各自的專屬經濟區內單獨行動，如果印尼的倡導發揮作用，今後這些國家可能將聯合起來，使中國在南海主權爭端上面臨東南亞國家更加強硬的聯合行動。

(3). 東南線地緣競爭性權力平衡的發展對中國地緣戰略的反饋

整體來說，東協的平衡行為雖然號稱「間接」，卻仍是一種涉及權力與武力的競爭性權力平衡，因為東協的手段與目的是希望拉攏更多區域外國家介入東南

⁴⁹ 同上註，頁56-57；Chheanh Vannarith, "An Introduction to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al Cooperation," *Cambodian Institute for Cooperation and Peace*, CICP Working Paper, No. 34, March 2010,

http://www.cicp.org.kh/download/CICP%20Working%20series/CICP%20Working%20Paper%20No%2034_An%20Introduction%20to%20Greater%20Mekong%20Subregional%20Cooperation.pdf, pp. 10-11.

⁵⁰ 何宏儒，「盈拉倡印度清奈－緬甸土瓦走廊」，中央社，2012年，1月26日，<http://www.cna.com.tw/News/aOPL/201201260137.aspx>；林憬屏，「泰國支持日本參與湄公河發展」，中央社，2012年4月21日，<http://www.cna.com.tw/News/aOPL/201204210188.aspx>。

⁵¹ 方沛清，「東亞峰會擴大 美俄獲邀參與」，中央社，2010年10月30日，<http://www.cna.com.tw/ShowNews/Detail.aspx?pNewsID=201010300130&pType1=PF&pType0=aOPL&pTypeSel=&pPNo=1>。

⁵² "Shock: the four small countr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ogether Chinese fishing boats moving force in Chinese water," *Finance Online*, June 14, 2012, <http://www.finance-ol.com/2012/06/shock-the-four-small-countries-in-the-south-china-sea-together-chinese-fishing-boats-moving-force-in-chinese-waters/>.

亞，來平衡中國對東協的絕對權力優勢與日漸強大的政治影響力，特別是中國在南海議題中越來越獨斷的行為，以及東亞區域整合的主導力。但這些作為本身儘管強調非軍事性、規範性甚至制度性，可是仍與中國的地緣政治利益有所衝突——中國並不希望區域外國家進入東亞區域整合來稀釋中國的影響力，不僅在首屆東協高峰會之前就反對拉攏印度、澳洲、紐西蘭等「非」東亞國家進入東亞高峰會與東亞區域整合進程，⁵³更始終強烈反對區域外強國介入南海議題造成的國際化，以及東南亞國家聯合起來形成一致立場的區域化，一再堅持與其他爭端國直接進行雙邊談判才是有效解決爭端的辦法。⁵⁴因此，東協的間接平衡作為可謂直接與中國的周邊層次地緣政治密碼中的國家主權目標產生激烈的衝突。

由於東協所拉攏的主要強國——美國、日本、印度——不是亞太地緣政治次體系中的單極超強，就是強權或一級區域大國，而且全部都是中國在次體系與區域兩層次地緣政治密碼的主要目標，故間接平衡透過拉攏這些大國，也「間接」與中國的區域層次，乃至次體系層次地緣政治密碼的目標發生衝突——東協拉攏越多強國進入東南亞，就使得東南亞地區越來越成為次體系中各強國地緣政治競爭，以及美國、日本與中國競爭東亞發展區域經濟與安全整合主導權的主要區域。

因此間接平衡對中國而言真正的競爭性權力平衡作用，來自東協拉攏區域內外大國的戰略合作，不過不是來自東協本身或其成員國個別與這些強國的合作行為本身，而是在於這些強國——除了日本受限於其憲法的規定，而較難以直接進行類似的行為之外——利用與東協整體的多邊合作，或者與東協成員國之間個別雙邊戰略合作的機會，以非傳統安全領域——如反恐、打擊跨國犯罪、反海盜、海上航行自由與安全、衛生與糧食安全等層面——的合作，作為與東協本身及其個別成員國之間發展傳統安全合作的「掩護」，介入東亞事務或在東亞的安全議題中建立本身的長期實質存在，並利用這種地位的建立，或東協與中國之間的爭端，或東協畏懼中國主導東亞區域整合的心理，來遏制中國因為其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的發展，以及利用這種地緣戰略來解決周邊領土爭端的短期目標，和組織以其為核心的東亞地緣戰略領域的長期目標的努力，例如美國進一步發展與東南亞國家的戰略合作，不僅可能削弱中國對東協國家在經濟與非傳統安全議題的依賴，更如本章第三節將分析的，有利於美軍調整在亞太地的部署並增強其在東南亞的軍事存在，進一步強化東協國家對美國在政治與傳同安全議題上的靠攏，那麼美國等於是利用不屬於其亞太盟邦體系的東協的外平衡行為來增強其本身對中國的內平衡效用，將大為增強原本美國只依賴本身的內平衡與既有同盟體系對中國產生的競爭性權力平衡刺激效應。

如此一來，雖然越多區域外強國涉入東南亞事務，的確越能限制中國在東南亞的行動自由，但中國也越會增強本身的力量與發出強硬態度來應對此種發展，

⁵³ 陳鴻瑜，「2005年東亞峰會評析」，*展望與探索*，第4卷第1期(2006年1月)，頁6。

⁵⁴ 「楊潔篪外長談出訪東南亞三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12年8月13日，<http://www.fmprc.gov.cn/chn/pds/wjdt/wjbxw/t960015.htm>。

蓋若中國因區域外強國增加在東南亞的行動而自我設限其在東南亞的行動，無異是放棄其短程與長程戰略目標。如果中國所放棄的目標是對中南半島國家的政治與戰略主導地位，或許對其本身來說還不會有所傷害，但若中國因區域外強國介入而對其在南海這種主權與領土議題上的行動自我設限，則對其中國的發展與中共政權的存續可能引發相當可觀的傷害，蓋南海—臺灣、東海等其他海洋領土爭端亦然—領土爭端涉及的主權議題對當代中國來說已經不只是消去歷史上的「羞辱」記憶，還是重獲其歷史上偉大地位，以及亞洲領導強國地位的渴望的展現，恢復中國這些具有高度歷史、政治與戰略價值的領土的主權，與控制這些「丟失」的領土，不僅可使中國重拾歷史上的地位，還可作為測試中國軍事與經濟力量的標準，並使中國政府利用主權聲索來行使外交影響力，與展現對國際法的運用，當然也包括更實際的功能，例如保護中國對東亞海上戰略交通線的使用，特別是運輸能源。⁵⁵因此目前來說，中國為了因應區域外強國介入東南亞而做出的反應行動，大致上集中在南海議題上，而這些行動又可概括為對內與對外兩種形式：

第一、對內的行為：強化、重新組織與統合中國的海上力量。而這一部分又可分为下述三種官方的建議與發展：

1. 雖然目前中國並未大規模增強南海艦隊的實力，但卻決定加強在南海擔負海上警察任務的海監與漁政兩套海上保安體系的實力。⁵⁶同時強化對南海海域實施海上巡邏以強化其主權聲索，其最新的結果是造成 2012 年 4 月以來持續約兩個月的中菲黃岩島對峙事件。
2. 2012 年 3 月中國「兩會」期間，有部分政協委員認為目前屬於中國國務院國土資源部，層級僅為「副部級」的國家海洋局的執行強度不足，建議應仿效中國開發太空事業那樣加強海洋戰略，中共黨中央成立「國家海洋委員會」，另於政府部門中成立屬於「正部級」的「國家海洋部」，來進一步加強維護中國在海洋國土上的權益，以及公海上的探測開發和其他權益。⁵⁷
3. 設立「三沙」警備區。中國在 2012 年 6 月先在南海設立了管轄南沙、西沙、中沙三個群島的「三沙市」，爾後中國中央軍委在 7 月又批准設立了師級的「三沙警備區」，負責擔負三沙市的防衛與南海地區的防衛

⁵⁵ “2008 Report to Congress of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tte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ttee*, November 2008, http://www.uscc.gov/annual_report/2008/annual_report_full_08.pdf, p. 141 and p. 142.

⁵⁶ 2012 年 4 月的人民日報即指出中國海監船隊的力量與日本差距甚大，必須以日本為目標，盡量縮小兩國的差距，方能在東海執法與日本對抗。而 2012 年 5 月的英文中國日報則報導，為了進一步確保中國的海洋權益，將在 2013 年增加 36 艘 600-1,500 噸的各型巡邏船隻。余建斌，「中國海監裝備與日本相比差距明顯」，*人民網日本頻道*，2012 年 4 月 18 日，<http://japan.people.com.cn/35469/7790972.html>；Wang Qian, “More ships to bolster maritime monitoring,” *China Daily*, May 10, 2012, 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12-05/10/content_15252829.htm.

⁵⁷ 楊萬國，「政協常委稱國家海洋局執行強度不夠，建議成立海洋部」，*鳳凰網*，2012 年 3 月 5 日，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2012lianghui/tianyian/detail_2012_03/05/12958004_0.shtml。

動員、救災等工作，儘管警備區並沒有直接擔負作戰任務，但已被周邊國家與研究者認為是中國即將以軍事手段處理南海爭端的一個訊號。⁵⁸事實上，中國國防部先前曾在 6 月下旬也曾表示，考慮在三沙市中設立基地並定期巡邏三沙市轄下的南海地區。⁵⁹

第二、對外的行為：警告區域外強國對東南線地緣的滲透。對於印度涉入南海事務，中國不僅如上文所述，可能曾經在南海騷擾印度海軍的軍艦，也對印度進入南海的石油探勘發出強硬警告，並要求印度撤出南海；中國也多次曾表明，反對不屬於南海爭端聲索國的美國與日本介入南海議題；⁶⁰甚至連俄羅斯都被中國警告，不可在北京宣稱擁有主權的南海地區探勘石油。⁶¹

這些發展均顯示，在整個東南線地緣，中國的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激化的乃是明顯的競爭性權力平衡，離均衡還相當遙遠。因為根據第三章的分析，均衡中的競爭性權力平衡之作用乃是先以此建立各國都無法進一步用各種手段獲得更多相對利得的平衡，然後再以此為基礎，達成各國均能接受的地緣政治安排，並建立多邊國際建制，再於建制中合作維持體系的秩序。可是目前的東南線地緣並沒有利用競爭性權力平衡來達成無法進一步獲得相對利得的平衡狀態，中國仍然很反對將南海議題國際化、與所有爭端國一起進行多邊談判，或將此議題提交國際法庭裁決。雖然東南線地緣存在許多中國也深入參與的政治、經濟、安全的多邊國際建制，但這些建制先存在於地緣政治安排解決之前，其內部的各方也並沒有利用建制來合作解決次體系或東南線地緣內各種重要安全議題的共識。結果，中國的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本身機化了此線地緣中的競爭性權力平衡，而其他國家為了制衡中國而進行的競爭性權力平衡在外平衡方面的運作又對中國的地緣戰略造成反饋，再度刺激了中國本身的競爭性權力平衡思維與作為，使其態度與作為越發強硬。

2. 內平衡與競爭性權力平衡

內平衡是東南線地緣國家—特別是力量較微弱的東南亞國家—在應付中國的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運用時，相對於外平衡來說更為重要，但不若外平衡明顯

⁵⁸ Dennis J. Blask and M. Taylor Fravel, "Much Ado About The Sansha Garrison," *The Diplomat*, August 23, 2012, <http://thediplomat.com/2012/08/23/much-ado-about-the-sansha-garrison/>.

⁵⁹ 「中国、軍事施設設置を検討 南シナ海の3諸島」, *産経新聞*, 2012年6月28日, <http://sankei.jp.msn.com/world/news/120628/chn12062820140005-n1.htm>。

⁶⁰ Keith B. Richburg, William Wan, and William Branigin, "China warns U.S. in island dispute," *The Washington Post*, June 23, 2011,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china-warns-us-in-island-dispute/2011/06/22/AGTiVxfH_story.html; Amrutha Gayathri, "South China Sea: China Warns US Against 'Muddying The Water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imes*, June 3, 2012, <http://www.ibtimes.com/articles/348110/20120603/south-china-sea-warns-against-muddying-waters.htm>.

⁶¹ Saibal Dasgupta, "After warning India, China asks Russia to stay away from South China Sea," *The Times of India*, April 10, 2012, http://article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2012-04-10/china/31317893_1_facts-and-international-law-sea-dispute-south-china-sea.

的競爭性權力平衡操作。

一個很基本的現象是東亞濱海國家紛紛採取強化本身海上武力的內平衡作為來因應中國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在海洋領土爭端上越來越獨斷的政策態度與作為，以及中國海軍日益增強的制海權獲致能力，即使是運用間接平衡的東協，增建海上武力也是其中一個重要手段。這樣的結果是產生區域性的海上軍事力量擴張。⁶²東亞濱海國家大幅增加其海上武力更新與建置，與冷戰結束之初的 1992 年相較，出現大幅成長(表 7.1)，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海上武力投資中大多集中於潛艦，尤以東南亞國家為明顯，蓋潛艦乃是海上拒止的重要武器，可有效破壞敵對國家建立的控制。中國固然也加強潛艦艦隊的更新，但東亞國家新部署的潛艦亦皆為德、法、俄、瑞典等潛艦大國製造的產品，在性能上並不輸給中國。區域中小型國家的潛艦艦隊大幅增加中國對通過第一島鏈內三個緣海的海上戰略交通線建立控制的挑戰，遑論美國與日本這兩大海軍國的潛艦艦隊與水面艦隊對中國的控制能力構成的壓力。

表 7.1 亞太地區海軍船艦與人員編制數量之比較

國家\編制	戰略核子 動力彈道 潛艦	潛艦總數	驅逐艦	護衛艦	兩棲武力	人員編制
中國	3 (1)	62 (94)	28 (19)	50 (37)	244 (61)	255,000 (260,000)
印度	—	16 (17)	8 (5)	15 (21)	17 (9)	55,000 (55,000)
印尼	—	2 (2)	—	11 (17)	81 (14)	45,000 (42,000)
日本	—	16 (17)	44 (6)	8 (60)	25 (6)	44,100 (44,000)
馬來西亞	—	1 (0)	—	2 (4)	1 (2)	14,000 (10,500)
菲律賓	—	—	—	1 (1)	7 (7)	24,000 (23,000)

⁶² 雖然魯塞特(Bruce Russett)曾指出，在安全困境中為了獲得安全與降低威脅而產生的競爭性軍事互動是導致軍備競賽的要素，但是布贊與希林(Eric Herring)也另外指出，軍備競賽是國與國之間因為激烈的政治對抗而導致畏懼對方的軍事潛力所造成的異常緊張狀態。根據這兩種定義與標準，雖然表 7.1 顯示許多東亞濱海國家在冷戰結束後擴張其海上力量，但這些國家—除了 2008 年以前的臺灣—在領土爭端之外，是否與中國存在具有明顯的安全困境，或激烈的政治對抗，以致必須畏懼中國的軍事潛力，則似乎頗有商榷的餘地，因此似乎難以將東亞濱海國家的海上軍事力量擴張視為與中國間的軍備競賽。Barry Buzan & Eric Herring, *The Arms Dynamic in World Politics*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8), p. 78; Bruce Russett, *The Prisoners of Insecurity: Nuclear Deterrence, the Arms Race, and Arms Control* (New York: W. H. Freeman and Company, 1983), p. 70.

南韓	—	12 (4)	10 (9)	9 (26)	48 (14)	68,000 (60,000)
新加坡	—	4 (0)	—	9 (0)	38 (5)	9,000 (4,500)
臺灣	—	4 (4)	4 (24)	22 (9)	19 (26)	45,000 (30,000)
泰國	—	—	—	10 (6)	22 (8)	44,751 (50,000)
越南	—	2 (0)	—	5 (7)	29 (7)	13,000 (31,000)
美國	14 (34)	71 (121)	52 (49)	22 (97)	334 (65)	339,453 (584,800)

資料來源：黃恩浩、王俊評，「中國海權擴張對亞太區域權力平衡之衝擊」，前引文，頁 12-13。

表 7.1 的數據顯示，儘管中國一再宣稱其軍事戰略係屬於積極防禦，而且秉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指導原則，但顯然這並不為東南線地緣的國家所採信。除了這些濱海國家大多與中國有難以解決的海洋領土爭端，必須警戒中國的海上力量擴張對爭端解決造成的影響之外，更重要的還在於中國海軍擴張與海軍戰略展現出來的攻勢意圖。一方面，如第五與第六兩章所分析的，所謂的「積極防禦」與中國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的海軍戰略，本身就含有極為強烈的作戰攻勢意涵與奪取第一島鏈內海域制海權的意圖；另一方面，正如格羅夫所指出的，「海軍實力與作為不能脫離政治的背景，海軍防禦或進攻的程度比起海軍武器與作戰平臺更能更體現領導人的意圖。」⁶³當中國海軍不斷增加現代化的水面與水下作戰艦艇，甚至欲組建航艦戰鬥群時以保衛其海上利益時，這些武器、武器系統與載台在許多東南線地緣與中國存在海上領土爭端的濱海鄰國眼中，就成了中國可能在未來以武力作為解決領土爭端後盾的攻勢象徵，必須小心防範。

如此一來，雖然東南線地緣中的區域性海上軍事力量擴張雖然還未演成區域軍備競賽，但本區目前也沒有管制海上力量擴張的協作性權力平衡作為來輔導此種局勢的發展，更遑論類似華盛頓海軍會議的強制限制性體制。因此中國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中的海軍戰略與海上力量擴張，已經在東南線地緣造成相當程度上刺激了競爭性權力平衡在內平衡方面的發展，儘管尚未演變為軍備競賽，但仍可視為周邊國家對中國地緣戰略的清晰回應。

綜合上述兩項分析，整體來說雖然中國試圖以爭取的手段拉攏其東南線地緣

⁶³ Eric Grove, "Naval Technology and Stability," in Win A. Smit, John Grin & Lev Voronkov, eds, *Military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Stability in a Changing World* (Amsterdam: VU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212.

的國家，但由於其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在 2010 年以後越來越明顯的強硬作為而沒有達到應有的效果，反而相當程度上刺激了競爭性權力平衡的發展，無論是在內平衡或外平衡方面皆然。顯然，中國的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在東南線地緣的手段操作上，追求區域控制等傳統地緣戰略的競爭性操作還是多過追求均衡的協作性操作，離達成均衡的程度仍相當遙遠。

三、北線地緣的協作性權力平衡與與亞太次體系的海陸對峙

整體來說，中國的三線地緣方向中只有北線地緣因為已經不是中國的地緣戰略重心與主要方向，而且中國的體系/次體系地緣政治密碼需要聯合俄羅斯一起反對美國的單極體系，並依靠俄羅斯與中亞地區的陸路能源來降低中國對海路能源的依賴，和利用日俄之間的北方領土問題牽制日本在東海與中國的競爭，以及共同打擊所謂「三股勢力」對國家安全與穩定的威脅，而使得中國與俄羅斯、中亞國家之間能較有效地解決領土爭端與政治勢力範圍劃分，從而增強國家之間的互信，並因地緣政治安排之達成而利用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與上海合作組織發展出較為穩定的長期局勢，但這並不表示北線地緣的國際安全與地緣政治形勢不受中國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的影響。

(一)、中俄之間的摩擦

中國與俄羅斯之間的關係並非全無摩擦。俄羅斯是 19 世紀唯一從清朝奪取大片領土的列強，在文化與宗教上亦接近歐洲而非亞洲，因此儘管俄羅斯內部自 1990 年代起在對外交政策就有親西方(美國)、與中國結盟的反西方(美國)、保持彈性同盟以平衡歐洲與美國等數派主張，⁶⁴但親西方的戰略思維自蘇聯解體迄今從未消失且始終是主流之一，這使得俄國官方在 2000 年代雖然採取以不犧牲俄國利益的前提下，與體系中各強國皆保持良好關係的戰略，並在 2005 年之後出現較強硬的對外態度，卻也未真正採取完全的反美態度或暗中反對美國的全球地位，⁶⁵而且在 2009 年公佈的「2020 年俄羅斯國家安全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until 2020)對仍視為安全主要威脅的北約採取較 2000 年公佈的「2000 年國家安全概念」(2000 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軟化許多的態度，希望與其發展良好關係。⁶⁶

反過來說，雖然近年來圍繞著中國違反軍售協議擅自複製俄製武器，並以複製軍火銷售給其他國家等軍事合作議題而出現的許多嚴重摩擦，⁶⁷但這些軍售上

⁶⁴ Zbigniew Brzezinski, *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7), pp. 98-99; Andrei P. Tsygankov, "Russia in the Post-Western World: The End of the Normalization Paradigm?" *Post-Soviet Affairs*, Vol. 25, No. 4(October/December 2009), p. 357.

⁶⁵ Tsygankov, "Russia in the Post-Western World," *op. cit.*, p. 353.

⁶⁶ Javier Morales, "Russia's New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Towards a 'Medvedev Doctrine'?" *Real Instituto Elcano*, September 25, 2009, http://www.realinstitutoelcano.org/wps/portal/rielcano_eng/Content?WCM_GLOBAL_CONTEXT=/elcano/elcano_in/zonas_in/ari135-2009; Keir Giles, "Russia'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to 2020," *Conflict Studies Research Centre*, June 2009, <http://conflictstudies.co.uk/files/RusNatSecStrategyto2020.pdf>, p. 7.

⁶⁷ Wendell Minnick, Usman Ansari, and Nabi Abdullaev, "Russia Fears Competition From Chinese

的齟齬似乎主要集中在商業層面而未真正影響雙邊關係。不過俄羅斯對於中國崛起確實懷有極為強烈的戒心，某些戰略菁英認為中國的崛起使得俄羅斯越來越依賴中國的能源市場與對外的強硬態度來與西方周旋，但在中俄經濟與政治權力差距擴大、軍事權力縮小的情況下，俄羅斯與中國的緊密結盟可能不會使全球地緣政治體系成為多極，而是走向美中兩極體系，並反而使俄羅斯成為中國的「小弟」。⁶⁸此種態度因為俄羅斯遠東地區的領土問題而更形敏感，雖然遠東地區邊界已經劃定，但包括普欽(Vladimir Putin)與梅德維潔夫(Dmitry Medvedev)前後兩任俄羅斯總統都曾公開表示對遠東地區「亞洲化」與可能失去該地區的憂慮，⁶⁹其他俄羅斯戰略菁英更擔憂中國認為其人民在西伯利亞與遠東區的活動乃是合法重返其歷史領土的態度，以及俄羅斯對中國依賴的加深，會使俄羅斯失去西伯利亞與遠東地區。⁷⁰

然而，受到全球金融海嘯的影響，以及尋求南韓與日本的投資政策因北韓問題、日俄之間的北方四島領土爭端，以及俄羅斯的政治、經濟發展無法達到日韓兩國的要求等影響而失利，導致俄羅斯在 2008 年之後不得不改變其亞太政策對中國的懷疑態度，為了需要中國作為開發俄羅斯遠東地區經濟的首要外國角色而更加依賴中國，⁷¹使得後者在 2009 年後取得進入俄羅斯遠東地區與中亞投資的戰略主導權。⁷²俄羅斯對中國的需求導致其在「2020 年俄羅斯國家安全戰略」幾乎刻意遺漏中國的潛在威脅以免引起中方的不滿。⁷³但是俄羅斯仍然害怕中國能力急速成長對俄羅斯國家安全與西伯利亞領土帶來的威脅，導致其外交政策出現暫時與美國深化合作關係的現象，⁷⁴並持續希望拉攏其他東亞國家進入遠東地區開發，同時排斥中國進一步深入遠東地區開發的政策。⁷⁵這些發展都是中國操作以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為主要支柱的「靠北」地緣戰略運作時的隱憂，但針對

Fighter Jets,” *Defense News*, July 11, 2010, <http://www.defensenews.com/article/20100711/DEFBEAT04/7110303/Russia-Fears-Competition-From-Chinese-Fighter-Jets>; Stephen Blank, “New Strains Emerge in the Sino-Russian Military Relationship,” *China Brief*, Vol. X, No. 21, October 22, 2010, pp. 7-9.

⁶⁸ Tsygankov, “Russia in the Post-Western World,” *op. cit.*, p. 359; 劉蕭翔，「俄屬遠東『黃禍論』之論析：迷思或事實」，*問題與研究*，第 48 卷第 2 期(2009 年 6 月)，頁 124。

⁶⁹ 普欽在 2000 年表達對遠東地區「亞洲化」的憂慮，並未真正認為俄羅斯可能失去遠東地區。梅德維潔夫在 2008 年 9 月則是警告，俄國忽略遠東地區太久，若再不努力與加速開發遠東地區，將會「失去所有的東西」。劉蕭翔，「俄屬遠東『黃禍論』之論析：迷思或事實」，前引文，頁 109；Analytical department of RIA RosBusinessConsulting, “Medvedev: Far East ignored too long, Without action, Russia will lose it, he says,” *RosBusinessConsulting*, September 26, 2008, <http://www.rbcnews.com/komment/komment.shtml?2008/09/26/32133807>.

⁷⁰ 同上註，頁 124-125。

⁷¹ Stephen Blank, “Why is Russian Energy Policy Failing in Asia?,” *Pacific Focus*, Vol. 26, No. 3(December 2012), pp. 405-427.

⁷² Stephen Blank, “China’s Russian Far East,” *China Brief*, Vol. IX, No.16, August 5, 2009, pp. 8-10.

⁷³ Giles, “Russia’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to 2020,” *op. cit.*, p. 10.

⁷⁴ Alejandro Sueldo, “Kremlin’s Fear of China Drives Its Foreign Policy,” *The Moscow Times*, August 30, 2011, <http://www.themoscowtimes.com/opinion/article/kremlins-fear-of-china-drives-its-foreign-policy/442862.html>.

⁷⁵ Dmitry Shlapentokh, “China locked out of Russia’s far east,” *Asia Times Online*, Mar 2, 2012, http://www.atimes.com/atimes/Central_Asia/NC02Ag01.html.

這種發展，中國似乎仍沒有明顯的應對，蓋中國戰略菁英一直認為，雖然俄羅斯與美國接近會影響中俄關係，但不會以中俄關係為犧牲，因為對抗中國不符合俄國的利益，故中國不必對美俄關係的改善感到悲觀，不可能會出現以對抗中國為目標的美俄同盟關係。⁷⁶

(二)、合作大於摩擦的北線地緣政治與安全形勢

雖然瑞典「斯德哥爾摩和平研究所」(SIPRI)在 2011 年 10 月的一份研究報告提出三點使中國不須要像以往那樣依靠俄羅斯，可能在中俄關係中佔上風而改變此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發展：第一，由於俄羅斯害怕中國依靠仿製來竊取其不許輸出至中國的高階軍事技術，但中國在武器方面的自製率提高，降低對俄羅斯的依賴，導致雙方武器交易不如以往熱絡，甚至中國自製武器還逐漸出口，可能搶奪以往俄製武器的市場；第二，雙方在能源價格上的分歧很大且無法達成共識，削弱以往是中俄關係重要基石的能源合作；第三，中俄雙方彼此都視自己對美國的關係為最重要的對外雙邊關係，而且兩國各自都有部分戰略家視對方為最大的長期戰略威脅。⁷⁷不過鑑於俄羅斯與中國還是共同反對美國可能的單邊主義並追求體系多極化，同時俄羅斯因為北方四島問題與日本再度發生齟齬，再加上朝鮮半島問題的影響使鐵路、油氣管線等難以通過北韓進入南韓，順利將南韓與俄羅斯遠東地區的開發結合，導致目前只有中國能協助其開發遠東地區的緣故，⁷⁸不得不還是與中國保持密切的戰略合作以解決眼前的主要戰略與經濟發展議題。這使得北線地緣是中國的三線地緣戰略戰線中，可能是協作性權力平衡大於競爭性權力平衡的唯一戰線。

北線地緣的長期穩定肇因於中國在較不受到海洋勢力影響的北線地緣中，因為與該地緣政治區域國家擁有共同的安全威脅，而能產生協作性權力平衡並進一步達成類似均衡的長期區域穩定。但如上文所述，在受海洋影響甚深的西線與東南線地緣中卻不存在這樣的現象，中國的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為了達成周邊與區域地緣政治密碼目標和國防戰略假定，反而使中國成為這兩線地緣中許多主要國家的安全威脅目標，並且不斷刺激競爭性權力平衡思維，無法解決地緣政治利益衝突並達成各方均能接受的安排，從而產生類似北線地緣的穩定。結果，北線地緣的中俄聯合之勢，與西線、東南線地緣的激烈鬥爭態勢相較，造成亞太次體系陷入新的海陸對峙局勢。

第三節、中國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與美中地緣政

⁷⁶ 葉自成，，*中國大戰略：中國成為世界大國的主要問題及戰略選擇*(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年)，頁 263-264。

⁷⁷ “3 Oct 2011: Chinese-Russian security and energy relations are crumbling, says SIPRI,” *SIPRI*, October 3, 2011, <http://www.sipri.org/media/pressreleases/2011/3-oct-2011-chinese-russian-security-and-energy-relationships-are-crumbling-says-sipri>.

⁷⁸ 連弘宜，「俄羅斯當前東北亞政策初探」，*戰略安全研析*，第 81 期(2012 年 1 月)，頁 24-25。

治競爭

嚴格說來，大陸－海洋地緣政治競爭模式並非不絕對有害於均衡的達成，如果結構如同冷戰後期那樣，兩極都無法在各自的主要戰略目標上再有所突破，則還是有可能逐漸朝向均衡發展，如同吾人在 1980 年代後期所見的那樣。但中國的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對其海軍戰略的指導卻使達成這一目標的難度大為提高，其根本原因在於中國海軍戰略對美國海權基礎的威脅所造成的地緣政治衝突。

一、中國中心的東亞地緣戰略領域與亞太島鏈長城⁷⁹

布里辛斯基曾認為不應將中國在東亞的「勢力範圍」與冷戰時期蘇聯在東歐的「獨佔政治區」(zone of exclusive political domination)混為一談，他認為中國在東亞所創造出來的最多是一個有很深的社會經濟滲透，但在政治上卻不那麼獨佔的區域，範圍類似本論文在第六章指出來的中國勢力範圍區域。⁸⁰布里辛斯基這種判斷低估了中國戰略菁英將古代天下觀轉化為當代中國中心主義世界觀的影響力。中國採用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的目的既然是為了盡量將美國海軍驅離亞太島鏈區與西太平洋周邊，而美國又是一個海權超強，則其目的就不僅是防衛本身的海洋安全與權益而已，而是藉由驅離美國在東亞的軍事力量展現之後由中國自己取而代之，消滅美國在東亞的政治影響力，建立一個以中國為唯一政治中心的東亞地緣戰略領域，不可能允許其他超強或強權還能在這個範圍內還有可觀的政治影響力存在。而這樣的作法，可由亞太島鏈地區在中國陸權式海洋戰略中的中心地位所看出來。

中國傳統上是一個純粹大陸性，又缺乏海洋事業對國家大戰略影響歷史的國家。更精確來說，中國歷史傳統上是由華北與華中黃河、長江兩個流域為代表的純粹大陸農業社會與文明，支配長江以南海洋文明色彩較濃厚的浙江、福建、廣東的沿海貿易社會與文明。南宋之所以能在中國歷代帝國中發展出最為強大的海軍，就是因為它的位置完全位於長江流域，政治核心更位於浙江海邊的杭州，而長江以南的浙船是航行於東海貿易的船隻，福建的「福船」與廣東的「廣船」則往來航行於海上絲路，皆較長江以北適合活動於沿岸的「沙船」更適合遠洋航行，特別是福船與廣船。⁸¹江南沿海的遠洋造船、貿易與航海業使南宋得以發展出強大的海軍，以及元朝得以在 1281 年發動更大規模的日本遠征、爪哇，和明朝鄭和下西洋之基礎。但是除了南宋算是比較深入建立於中國南方的海權基礎，以及當時地緣政治結構特徵使其需要維持一支強大的海軍供國防之用以外，元、明、

⁷⁹ 作者在 2010 年即曾將亞太島鏈區與中國戰略菁英的長城心理連結在一起，本節的內容為當時概念的後續發展。見王俊評，「制海權與中國海軍戰略」，*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11 卷第 1 期(2010 年 1 月)，頁 164-166。

⁸⁰ Brzezinski, *The Grand Chessboard*, op. cit., p. 166 and map in p. 167.

⁸¹ 席隆飛、楊 熿、唐錫仁主編 *中國科學技術史* (北京:科學出版社, 2004 年), 交通卷, 頁 186-191、206-208。

清皆是以北方文明來運用中國南方的海權基礎於其大陸事業，⁸²而南宋又向來被華夏文明視為積弱不振與文明恥辱的主要代表之一，因此中國南方海權的基礎與其對國家發展和大戰略的功用，也就完全被後代的華夏文明與大多數戰略菁英所遺忘。

相對於海洋文化與海權基礎在中國戰略文化與大戰略傳統中的弱化乃至消逝，始終根深蒂固存在的是黃河流於農業文明與北方游牧民族之間的安全鬥爭所留下的大陸性長城戰略思維。傳統上，雖然中國在帝國時代經常希望達成「王者無外」的最高天下觀理想，但受限於地理環境的限制以及華夏文明對異族的鄙視，這種理想很少能達成。再加上中國古代帝國幾乎佔領了所有適於華夏農業文明發展的區域，導致異族所處的地理環境與中國有鮮明的差異，特別是在北方。因此長城就成為中國古代帝國無法達成「王者無外」與「華夷一家」的最高理想與體系地緣政治密碼時，用來劃分不肯臣服於中國的異族行為者與中國之間的人為政治、文化、經濟、軍事界線，具有劃分胡漢文化文明界線與帝國國界、防衛線的雙重功能。⁸³長城線的位置則具有彰顯帝國對北方威脅相對力量與安全程度的潛在意義：戰國時代、秦漢兩帝國與明初的長城線深入邊緣地帶，代表華夏帝國相對於游牧民族的威脅具有較堅強的抵抗能力，甚至一定程度的征服能力，故能奪取草原領域精華區之一的邊緣地帶作為戰略防禦的前沿防線，來擴大華夏帝國相對於游牧民族在安全上的相對利得(relative gain)；反之，南北朝時的北齊以及明朝放棄草原據點以後的長城線，其位置較戰國與秦漢以來的長城線向南收縮，⁸⁴代表的是中原的帝國已經無力征服邊緣地帶，只能以純粹的戰略防禦來維持本身的安全，無法擴大對游牧民族的相對利得。

因此當代中國在「復興」其海權的同時，很自然地承接具有將近兩千年的大陸帝國從大陸角度運用海權於大陸事業的傳統。中國在可預見的未來並無法取代美國成為第一海軍國家，不可能控制次體系中所有的海上戰略交通線，中國亦不可能希望「制服」美國與亞太次體系中其他強國，使其接受以中國為中心的亞太地緣政治次體系。因此中國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的主要功能是利用海上陣地戰來盡可能建立近海的有限制海權與沿海的完整戰略制海權，並在第一島鏈以外的海域實施海上拒止，同時擴張中國在中南半島、朝鮮半島等地的政治、經濟影響力，

⁸² 雖然魏晉南北朝時的東吳、東晉與南朝也都是純粹建立於長江流域及以南的華南地區的帝國，但是當時的長江流域與華南開發程度遠不如華北成熟，使得這些帝國必須先致力於開發本身的內部環境，而且彼時並不存在海上絲路，雖然有海上貿易，但不如後來海上絲路開通後的興盛。反過來說，南宋時期的江南與華南已有相當程度的開發，而且早已是整個農耕領域最主要的精華區，又有唐朝以來累積數百年的海上絲路貿易基礎。故在這兩種地緣政治特徵與模式的影響下，魏晉南北朝沒有像南宋那樣發展出強大的海軍。

⁸³ 只有北宋沒有建設長城之舉，但這並非北宋沒有類似的戰略思考，北宋也有部分戰略菁英曾提出在河北境內建設長城以供防禦遼軍騎兵的建議，而且北宋在山西境內的與遼的國界線亦大致依循北齊的長城線。曾瑞龍，*經略幽燕(979-987)——宋遼戰爭災難的軍事分析*(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169；Nicolas Tackett, "The Great Wall and Conceptualizations of the Border Under the Northern Song," *Journal of Song Yuan Studies*, Vol. 38 (2008), pp. 99-138.

⁸⁴ 姚大中，*古代北西中國*(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81年)，頁50-52、211-212；景愛，*中國長城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頁181-212。

並盡可能削弱美國對東亞國家的影響力，特別是位於東亞大陸上的國家。如此一來，中國就能重新成為支配東亞的超強並建立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地緣政治領域，與支配全球海洋的美國、目前支配大部分俄羅斯以外歐洲地區的歐盟，以及在心臟地帶恢復其影響力的俄羅斯等舊有列強一起作為全球體系中的超強，取得中國「應有」的實質大國地位。於是島鏈對中國來說就具有非常重要的大戰略與地緣戰略意義，不僅限於柯爾所觀察到的海軍戰略層次。中國既然無法控制如美國那樣控制亞太次體系中的大洋，又把海洋權益與其最重視的國家主權相連，而強調其在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下的專屬經濟區與大陸礁層等海洋權益與新「生存空間」對國家發展的戰略意義，超過對海權真正重視的遠洋發展與海上戰略交通線控制，顯然對中國來說，其近海的「海洋國土」甚至在「海洋國土」以外的近海海域已經成為必欲從鄰國與海權手中爭取來的「邊緣地帶」，類似古代介於農耕、草原兩大領域之間的邊緣地帶。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戰略菁英很自然地將太平洋兩島鏈，特別是位於中國「海洋國土」之外的兩條島鏈，視為一種保護中國「海上國土」、海洋權益，並延長陸地防衛縱深的「海上長城」。⁸⁵島鏈為中國佔有或受中國支配，形同在西太平洋與印度洋建立一道類似長城的有形防線，可阻止線外的美國海權與其盟邦對第一島鏈內的中國本土或海洋權益發動攻擊或掠奪，另外也掌握一定程度的主動權，可朝島鏈外的海權發動攻勢性防禦作戰；而若島鏈不受中國的掌握或支配，而是美國海權的前沿防線，則如同古代游牧帝國進入長城線之內，戰略主動權係掌握在彼之手，隨時可以對中國本土與其海洋權益夠重嚴重威脅。其中，距離中國比較近的第一島鏈，似乎可比擬為北齊、明朝中期所建築的，位於邊緣地帶南方的防衛性長城線，而距離中國較遠的第二島鏈，似乎可類比為越過鄂爾多斯與河套地區，涵蓋大部分邊緣地帶的戰國時代，以及秦、漢兩帝國所建築的北方長城線位置。如果中國的海軍戰略設下的縱深防禦無法延伸至第一島鏈，就如同無法在北方控制長城線的中國古代帝國，完全暴露在來自海上的潛在攻擊威脅之下；如果中國海軍的縱深防禦能延伸至第一島鏈，那麼就如同以往握有南方長城線的帝國，雖然可以取得較為有利的積極防禦態勢與攻勢防禦基地，但是由於海權仍握有第二島鏈，故中國還須面對自第二島鏈地區基地與兩島鏈之間的海上「邊緣地帶」發動的攻擊。然而如果中國海軍的縱深防禦可延伸至第二島鏈，甚至涵蓋整條第二島鏈，由於海權將被迫退往第二島鏈以東，中國此時的戰略地位將形同以往握有北方長城線並佔有大部分邊緣地帶的帝國，取得極為有利的戰略防禦態勢。

圖 7.1 西太平洋第一與第二島鏈

⁸⁵ 「海上長城」一詞原為前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視察中國海軍旅順基地時為基地題詞的其中一部份，原文是「扼守京津門戶，建設海上長城」。本論文引用「海上長城」一語則與江澤民的原意不同。



資料來源：“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1,” *Department of Defense*, http://www.defense.gov/pubs/pdfs/2010_CMPR_Final.pdf, p. 38;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1,” *Department of Defense*, http://www.defense.gov/pubs/pdfs/2011_cmpr_final.pdf, p. 23.

雖然中國尚未能在島鏈中佔有任何據點，但對想朝大洋發展，同時又不希望與美國發生地緣政治衝撞，希望能平等劃分與美國在海洋中的勢力範圍的中國戰略菁英而言，自劉華清以來將島鏈作為海軍戰略擴張目標的心理，證明在深受陸戰觀點與陸地權力平衡概念的中國戰略菁英心目中，島鏈的地位等於以往帝國時代的長城，中國欲建構的東亞地緣戰略領域與美國、美國的亞太盟邦之間以亞太島鏈區為界線來劃分彼此的海洋勢力範圍。最好的情況是能將島鏈列入中國勢力範圍之內，然後盡量使美國遠離西太平洋以擴大中國的戰略縱深，但如無法達成這個目標，至少也要將唯一有機會成為中國領土的臺灣與其周邊的釣魚台列嶼正式併入中國領土，以打破島鏈的地理封鎖並作為中國在島鏈上的主要據點，與在太平洋發動地理攻勢的基地。至於不受海洋影響的歐亞大陸與南亞次大陸，雖然也攸關中國的重要戰略利益，但是並非中國主要的地緣戰略方向，故中國對這兩

個地區，一如帝國時代對那些次要地緣戰略區域的操作，首先是力求穩定，並與這些區域建立友好的關係，其次則是確保建立起足夠的緩衝與區域平衡，遏制那些區域中潛在的威脅崛起成為中國真正的威脅。安西與靠北的兩種操作都是由此種邏輯而來。

在「島鏈長城」範圍之內的中國領土與其他東亞地區即是中國意欲建構的東亞地緣戰略領域，其範圍概念已見如第六章第二節。而以島鏈長城作為與在太平洋美國支配下的貿易－海洋領域之間的界線或緩衝區的東亞地緣戰略領域，如果其範圍係延伸至第二島鏈，則與日本帝國在 1943 年 9 月劃定的「絕對國防圈」有相當的類似之處，後者在太平洋與印度洋所涵蓋的範圍大致上包括：千島群島、小笠原群島、「內南洋(中西部)」(馬里亞納群島(Mariana Islands)與東經 148 度以西的加羅林群島(Caroline Islands)西部，以及屬於東加羅林群島的土魯克(Truk)島，後者即今日密克羅尼西亞聯邦(Federated States of Micronesia)的「楚克州」(Chuuk)、西新幾內亞、巽他群島(即今之印尼)、緬甸(包含目前屬於印度領土的「安達曼·尼古巴」群島(Andaman & Nicobar Islands))(圖 7.2)。⁸⁶

圖 7.2 1943 年 9 月劃定的「絕對國防圈」範圍



資料來源：吳玉貴譯，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撰，**全面潰退與與最**

⁸⁶ 謝鴻崑譯，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撰，**海軍戰略重建與第三階段前期海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0 年)，頁 736。

後防線(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9年)，頁247。

島鏈長城觀與絕對國防圈兩者相較之下，主要的差異在於太平洋、南海、印度洋三個方向的延伸範圍－島鏈長城觀指導下的中國海軍戰略範圍在太平洋最多只延伸到第二島鏈附近，並沒有像當時的日本因為有千島群島為領土，以及託管南太平洋島嶼之故，而能超越第二島鏈向前延伸至接近太平洋中央的位置；在南海地區，中國目前的戰略防禦也僅能延伸到南海中部，還無法進一步擴張至巽他群島；當然在印度洋地區，更無法延伸至當初日軍佔領之下的安達曼·尼古巴群島，該地目前屬於印度領土，同時也因為在南海地區無法延伸至巽他群島，故不能如絕對國防圈那樣超越麻六甲與龍目等海峽，真正進入印度洋。

雖然有如上的範圍差異，但島鏈長城與絕對國防圈還是有相當的地理範圍相似性，而這種相似性並非巧合。從組成地緣戰略領域的地緣政治結構理論觀點而言，無論是中國或日本，其所組織的東亞地緣戰略領域與蘇聯所組織的歐亞大陸地緣戰略領域不同，後者的核心乃是海權難以從海上發動攻擊的心臟地帶，而前者的核心卻位於海權容易從海上就能輕易攻擊的邊緣地帶。況且歐亞大陸地緣戰略領域可以在不大量依賴海上戰略交通線的情況下，僅憑陸地戰略交通線就能有足夠的資源－特別是能源－與市場－依靠其與歐洲(盟)的連接－發展，但東亞地緣戰略領域卻無法如此，其必須依賴海上戰略交通線才能自領域外輸送足夠的能源，也必須依賴海上戰略交通線來進一步連接主要市場所在的東北亞，與主要資源蘊藏地所在的東南亞。

如果按照上文對兩條島鏈與長城線位置的類比，中國在組織東亞地緣戰略領域時僅以建設並控制新的東亞大陸戰略交通線為滿足，其海軍的縱深防禦限縮於第一島鏈以西的海域，沒有包括第一島鏈，仍把東亞海上戰略交通線的控制交給美國，那麼即使中國能如科恩所設想的那樣將整個印度支那，甚至擴大包含整個中南半島都納入這個東亞地緣戰略領域的範圍內，還是必須面對美國海權控制跨太平洋與銜接太平洋、印度洋等兩條海上戰略交通線，所施加的來自太平洋與東亞周邊海域的戰略壓力。這對地緣戰略思想中具有濃厚陸戰思維，以及與美國之間存在高度戰略「互疑」⁸⁷的中國來說極為危險，其將認為這等於是讓中國東部的精華區完全暴露於來自美國的潛在海上攻擊威脅之下，必須要往前延伸至太平洋第二島鏈、巽他群島與安達曼·尼古巴群島，才能對第一島鏈以西、以北的東亞地緣戰略領域提供足夠的防衛縱深，同時抵禦來自印度洋與太平洋的海上戰略壓力。而能夠控制第一島鏈甚至第二島鏈的中國，將逐步增強對美國在西太平洋的戰略優勢，迫使美國在太平洋的勢力與軍事存在向東退縮，擴大中國在西太平洋的戰略防禦縱深。然而，中國能否成功實現將島鏈作為海上長城，並將海上縱

⁸⁷ 見第五章第二節對中國全球體系/亞太次體系層級地緣政治密碼的分析，或王緝思與李侃如合著的報告 Kenneth Lieberthal and Wang Jisi, "Addressing U.S.-China Strategic Distrust," *Brookings Institution*, March 30, 2012, http://www.brookings.edu/~media/Files/rc/papers/2012/0330_china_lieberthal/0330_china_lieberthal.pdf

深防禦延伸到至少第二島鏈周邊海域的戰略目標，與其海上戰略交通線控制能力息息相關，若不具備一定程度的海上戰略交通線控制能力，即不可能控制中國周邊的三個緣海並將島鏈作為海上長城，美國、日本、澳洲等亞太地緣政治次體系中的海洋國家與印度將憑藉其海上力量，持續大規模滲透東亞，特別是被視為重要市場與資源來源的東南亞地緣政治區域。

不過弔詭的是，從另一方面來說，如同長城對以往中國古代帝國向北方的擴張限制，這種將島鏈長城觀與海上陣地戰防禦，很可能也就是中國海軍與海上擴張的最遠範圍。這不僅因為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的目標本來就不是取代結構中既有海權的海上地位，更在於大陸國家或陸權的海上物質能力限制，以及視海軍在威望性任務與戰略嚇阻任務的重要性遠大於海上戰略交通線控制任務的觀點。如果說中國在帝國時代即使能握有邊緣地帶，但卻很難越過邊緣地帶真正取代游牧帝國對草原地區的控制，是因為華夏農業文明缺乏在草原地區長期立足並提供帝國在該處發展的重要據點，那麼當代中國在西太平洋的發展也面臨同樣的困境。大陸國家之所以採用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即是因為他們缺乏海上發展必要的物質能力，與遍佈一整個大洋各個扼制點、能夠使其控制整條海上戰略交通線的珍珠串基地系統，以及與他們戰略文化的陸戰思維完全不同的海權思維。物質限制與理念觀點使得他們創造出此種只能在近海建立制海權、在近海以外的開闊海域實施海上拒止的海軍戰略，儘管蘇聯海軍日後擁有許多遠程攻擊武器、武器系統與軍艦，但其海軍戰略的防禦區域與海上縱深陣地戰始終是一種結合少壯派作戰概念，採取戰略守勢、作戰攻勢，以獲致「近海區」的戰略性制海權，並保持遠海區和開放洋面區的制海權於爭奪狀態的「積極存在艦隊」戰略，⁸⁸還是一種劣勢海軍對抗優勢海軍的戰略指導，不是像以往的英國或當代的美國那樣控制跨洋海上戰略交通線的真正全球遠洋海軍。

對中國來說，其在海軍制海能力的物質限制比蘇聯更為明顯，不僅在於對美國居於劣勢，甚至僅面對亞太次體系中的主要強權日本也處於劣勢，若再加上其他與中國有嚴重地緣政治衝突的次體系內區域大國，物質劣勢就更為明顯。因此採用與蘇聯海軍極為類似的戰略指導的中國海軍，最終可能還是將與前者一樣，其對制海權的掌握僅限於第一島鏈以西的內層防禦區，最多延伸至第一島鏈較為靠近中國海岸的中層近海機動區，但是在這個區域靠近日本與美國的基地群，或接近越南、馬來西亞、印尼等區域大國海岸的中層近海機動區，乃至第二島鏈周邊的外層作戰區，就只能以使制海權保持在爭奪狀態為滿足(圖 7.3)。這使得中國海軍變成一支主要在第一島鏈周邊活動與作戰、「守衛」島鏈「長城」內的東亞地緣戰略領域的海軍，最多將海上作戰範圍延伸至第二島鏈，但很難真正到達太平洋與印度洋，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日本海軍那樣，具備與美國、印度(當時為英國)爭奪該整個西太平洋與東印度洋的制海權。

⁸⁸ Robert W. Herrick, *Soviet Naval Theory and Policy* (Annapolis, Marylan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89), pp. 274-275.

圖 7.3 中國海軍海上縱深防禦戰之活動範圍



資料來源：“2011 Report to Congress of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tte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ttee*, http://www.uscc.gov/annual_report/2011/annual_report_full_11.pdf, p. 196.

二、美國的回應

雖然中國周邊國家對中國崛起與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所造成的威脅與認知各不相同，但動作最大者卻是離中國最遠的美國海權單極。儘管中國的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目標不在取代美國的海權地位，但中國欲控制周邊三個緣海，以及將西太平洋作為防禦美國的勢力範圍前沿的戰略目標，是對美國海權基礎的重大破壞。蓋中國乃位於邊緣地帶而非心臟地帶，其位於連接東北亞與東南亞海上戰略交通線之旁的位置，很容易威脅美國對這條戰略交通線的使用與控制。一旦中國發展出能夠控制東亞大陸周邊的海上戰略交通線的能力，由於其素來反對美國持續對東亞安全議題發揮主導角色，以及加入東亞區域整合的態度，也使得美國對中國的戰略意圖感到懷疑，不儘可能更進一步刺激雙方原本就相當嚴重的戰略互疑，若中國配合其本身龐大的經濟力量與在東亞的政治地位，可能會使美國無法繼續作為主導東亞與西太平洋的超強，甚至喪失海權的地位。換言之，中國的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在希望確保大陸上發展結果的同時，侵犯了美國海權在太平洋的地緣政治利益，而美國的回應也同樣侵犯了中國在東亞大陸上的地緣政治利

益，遂使得原本就存在嚴重戰略互疑的雙方，競相依賴競爭性權力平衡手段來「捍衛」本身的地緣政治利益，難以合力促成亞太次體系的地緣政治均衡。

(一)、海權的傳統回應方式

大陸國家的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追求對近海的控制，雖然很少是真正想要挑戰海權在海上的地位，但是卻很容易激起與海權的地緣政治競爭。其原因在於威脅到海權對全球海上戰略交通線的控制，而這是海權之所以為海權，並能在全球體系中扮演主導角色的最重要戰略基礎。換言之，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嚴重腐蝕與威脅海權對海上戰略交通線的控制與其在體系中的地緣政治利益。如果海權果真允許這些大陸強國進一步發展強大的海軍來控制周邊海域，以避免與這些國家發生衝突，甚至換取這些國家在全球事務上的合作，其結果對於海權來說是一場地緣政治災難。雖然英國與美國是兩種不同的海權典型，後者比前者擁有更多單靠本身就能支撐海上力量發展的陸地力量戰略基礎，⁸⁹與潛在大陸威脅的距離也比前者更為遙遠，但兩者的結果仍然相當類似，這可分為兩方面分析，首先是採用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國家的戰略目標，其次是海軍力量的攻守勢運用對國際政治的影響。

誠然，採用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的大陸國家，其戰略重心與目標都在大陸之上，但他們在大陸上的主要戰略目標是歐亞大陸邊緣地帶，如西歐與中歐、從俄羅斯遠東地區直達東南亞的東亞等，以及與邊緣地帶相鄰的心臟地帶部分，例如烏克蘭、俄羅斯的歐洲部分等地，但是並不包括麥金德心臟地帶概念中真正居於歐亞大陸內陸，雖然天然資源與能源蘊藏豐富，而且難以遭到攻擊，但卻人口稀少、氣候寒冷，不適合於大規模開發的西伯利亞內陸與中亞地區。換言之，同時具備經濟與地理價值的大陸地區才是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的真正戰略目標。可是這些地區同樣也是海權重要的經濟市場與原料來源，而且位於大多數全球海上戰略交通線之旁，甚至直接位於英國海權身旁。這衍生出第二個問題，即是說如果海權允許那些大陸強國建立強大的海軍並控制周邊海域，那麼即使海權仍對這些國家的海軍擁有一定程度但並非絕對的海軍優勢，仍然會對海權的區域與全球國際政治地位，乃至本身的安全，構成嚴重的斲喪。

海權之所以能夠獲得主導體系的地位並不單純依靠其政治與經濟力量，其軍事力量才是此種地位的根本基礎。若海權允許實施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的大陸國家利用區域防禦或其他種形式的海軍戰略來控制其近海，這些國家的能力雖然未必能控制海上戰略交通線，但對於削弱甚至制止海權對體系中的海上戰略交通線的控制卻綽綽有餘，這基於兩點理由：第一，海上戰略交通線不可能始終存在於公海而不靠近大陸海岸線；第二，如第二節所述，海軍力量在運用上屬於攻勢或守勢，雖然依賴政治領導人的戰略意圖，但是海軍本身就是攻勢性極強的軍種與軍事力量，若海權無法確保與這些大陸海軍強國的友好關係，將在可能面對這些

⁸⁹ 葉自成，**陸權發展與大國興衰：地緣政治環境與中國和平發展的地緣戰略選擇**（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頁 58-63、81-93。不過在 19 世紀末，馬漢卻認為強大的陸權基礎是美國向海洋發展的重大阻力而非助力，見鈕先鍾，**西方戰略思想史**（臺北：麥田出版社，1995年），頁 400。

大陸海軍強國的海上軍事鬥爭中面臨嚴峻的挑戰。從體系層次而言，假使海權沒有能夠透過海上交通線迅速投射力量至體系各個角落，以及能夠持續控制海上戰略交通線的軍事力量，就無法有效干預大陸事務的發展，也無法尋求大陸上的有力盟友來牽制可能為其潛在威脅的大陸強國之發展，蓋其力量只能在公海上盤旋而無法突破採用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的大陸國家在近海部署的區域防禦，為其盟友在區域海域或沿海地區提供必要的援助。如此一來，其他國家將明瞭海權不是一個能夠依靠的盟友，會使得海權很難尋求有力的大陸盟友，也無法有效阻止會奪取其主導國際政治發展地位的多極化分權趨勢，導致其在國際政治上的領導地位逐漸削弱。而從海權本身的單元(國家)層次，可能會使其面臨本土遭受對方攻擊，也無法確保海上利益的直接危險。

故自英國海權單極出現以來至冷戰結束為止，海權從來都不願意看到其他大陸國家發展出足以控制其周邊海域、甚至該國所在的地緣政治區域的所有海域的強大海軍力量，更不願意在政治上允諾讓這些國家控制其周邊海域，以藉此試圖避免可能與他們之間的潛在衝突。海權應付大陸國家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在海上軍事鬥爭中的挑戰，雖然大致上仍不脫競爭性權力平衡中的內平衡與外平衡兩種措施，但是在這之前，根據英國處理與法蘭西第二帝國和德意志帝國的關係來看，⁹⁰海權多會試圖先透過外交手段與這些國家解決大陸強國的海軍擴張帶來的地緣政治衝突，特別是當體系中仍存有其他對海權來說更嚴重的威脅，而大陸強國的海軍擴張尚處於初期階段時更是如此，例如英國在 20 世紀初期為了共同應對法俄同盟而與德意志帝國進行的同盟談判。⁹¹

但若海權確信無法與這些國家保持同盟或友好關係，以及這些國家始終不放棄海軍力量擴張，且其程度已能對海權的國家安全與重要國家利益構成嚴重威脅後，海權會同時以內平衡和外平衡雙管齊下應付，而這些內平衡與外平衡手段包括下列三項：

1. 大規模擴張海軍艦隊，甚至與大陸海軍強國形成軍備競賽。例如英國與德意志帝國之間的海軍造艦競賽，以及美國在冷戰期間與蘇聯的軍備競賽，特別是雷根政府時期的大規模海軍擴張(見第三章第四節關於海陸兩極結構與均衡的分析)。
2. 調整海軍部署，使其集中於那些大陸強國所在的地緣政治區域，例如英國在 20 世紀初期前為了應付來自德意志帝國海軍擴張的壓力，利用英日同盟與英法協約來召回在遠東與地中海的艦隊，將其艦隊部署調整集中於北海。⁹²

⁹⁰ 此處不列入納粹德國與蘇聯的原因在於，當這兩個國家開始採用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與大規模擴建海軍時，都已經與海權處於可能爆發戰爭的緊繃敵對狀態。

⁹¹ Paul Kennedy, *The Rise of the Anglo-German Antagonism 1860-1914*(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80), chapter 13.

⁹² Holger H. Herwig, *Luxury Fleet: The Imperial German Navy* (Amherst, N.Y.: Humanity Books,

3. 建立新的攻守同盟或增強既有的同盟，或非正式的軍事安排，以強化對大陸海軍強國的壓力，或使海權在調整艦隊部署的同時，能夠應付其他地緣政治區域的壓力，並維持對其他地緣政治區域內的海上戰略交通線之控制。英日同盟、三國協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等皆屬例證。

上述三種手段未必同時實施，需視海權在決定回應時的國力整體狀況，以及大陸強國的海軍擴張程度。例如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乃是以大規模造艦配合調整海軍部署與三國協約的外平衡手段來應對德意志帝國自 1898 年就開始的海軍擴張，可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英國由於本身財政狀況不佳，無法再度大規模擴軍，而且當時納粹德國直到 1939 年才決定實施「Z 計畫」中的大規模艦隊擴張，故英國並沒有與德國進行海軍競賽。

(二)、美國對中國崛起的地緣政治競爭的回應

中國學者梅然在 2007 年的一篇文章中曾認為截至當時為止，中國海軍的擴張與德意志帝國海軍擴張引發英德競爭不同，前者的發展將不會危及中美關係的穩定，他認為這是基於中美之間的意識型態對利不足以引發雙方更進一步的敵對；美國理解中國海軍擴張是防禦性的，中國無意與美國競爭太平洋地區的海上霸權，也無意奉行以美國本土和中國境外的美國海外利益為目標的擴張性戰略；以潛艦為主的中國海軍力量結構明顯展現出中國的海軍戰略目標是海上拒止而非制海、強調反介入而非對海域實施控制；廣大的太平洋有助於，雙邊戰略關係穩定；包含中國在內，實際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有能力挑戰美國的海上地位；美國擁有遠優於中國的軍事科技與物質力量優勢；美國軍工企業並未助長中國海軍威脅論；美中之間有高度的經濟相互依賴；美國認為中國海軍擴張的程度還不到需要海上軍備控制的階段，等九點原因。⁹³

然而，事實上美國從 1990 年代中期開始就著手應付逐漸完整的中國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作為在東亞對美國海權的影響，而且在梅然文章發表之前，美國就已經越來越關切中國在西太平洋的戰略舉動，如果沒有這種背景，歐巴馬政府不會在 2009 年忽然公開提出「重返亞洲」的戰略路線與主張。不過對於海上軍備控制來說，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海軍戰略研究已經不再注重達成某種程度的兵力對比以建立嚇阻的觀念，同時戰前利用這種兵力對比來設法達成海軍權力平衡的會議與條約體系無法真正達成目的，美國在冷戰期間也沒有與蘇聯談判雙方的海軍力量對比，但這並不表示美國認為蘇聯海軍的擴張程度還不夠「嚴重」，這不僅在於冷戰期間雙方真正關注的重心是核武戰略，也在於過去的海軍力量談判手段，無法成功達成維護雙方關係穩定的預定目的的緣故。但是美國對於中國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的其他手段的運用和順序，則與上文所提到的海權「傳統」相當類似。

1987), p. 49 and p. 51.

⁹³ 梅然，「海軍擴展與戰略穩定：從英德競爭到中美關係」，*國際政治研究*(北京)，第 4 期(2007 年)，頁 85-88。

1. 柯林頓與小布希政府：外平衡為主、內平衡為輔

基本上，美國官方從未公開將中國視為真正的「敵國」，即使是對中國態度較為強硬的小布希政府，對美中關係的描述也僅是小布希在擔任總統前的選戰中認為兩者是「戰略競爭對手」(strategic competitors)，而非柯林頓政府認為的「戰略夥伴」(strategic partners)，⁹⁴以及在 2001 年 9 月公佈的「四年期國防總檢」(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QDR)在敘述東亞安全形勢時，暗指中國是美國的軍事競爭對象。⁹⁵

因此在歐巴馬政府之前，美國主要是利用外平衡手段來應對中國的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其中最主要的核心就是位於東北亞的美日同盟。原本美日同盟就在 1996、1997 年因應臺灣海峽飛彈危機而經歷兩次修訂，擴大了同盟對國際危機的地理涵蓋範圍並引發中國認為美日同盟可能會以此介入臺灣海峽與南海議題，和日本軍國主義復甦的疑慮。⁹⁶爾後美日兩國在 2005 年 2 月的外交、國防「2+2 會談」中，進一步正式公開將臺灣海峽議題的和平解決是美日同盟關切的區域重點，並將區域海上安全列入美日同盟的要務之一。⁹⁷不過由於當時美國重心在應付中東與中亞的反恐戰爭，故其在亞太的作為偏向不須大幅度調整美國軍事部署的「外平衡」作為，從外部環境對中國施加壓力。這主要是一連串以美國在亞太的既有同盟為基礎，但是另外增加與印度之間的戰略合作的雙邊與多邊機制：自 2005 年起，美國開始逐步改善與強化美印關係，包括當年 6 月兩國簽署美印「防衛關係新架構」，以及 2006 年 3 月美印建立「戰略伙伴關係」。此外，除了美日同盟之外，美國也進一步強化其在亞太的軍事同盟之間的橫向聯繫，即 2006 年 3 月成立的美日澳三邊外交與國防部長層級戰略對話機制。

這些作為雖然並未公開明言針對中國，但美國與次體系中的日本、印度、澳洲等其他主要強國越來越密切的戰略合作，卻沒有邀請中國與俄羅斯參加，而中俄之間的戰略合作，在大多數情況中亦未邀請這些國家的正式參與，這種地緣政治上的明顯陸海分野，似乎暗示美國的這些作為屬於對中國的競爭性權力外平衡作為。不過在這個階段，美國的作為還比較侷限於外平衡，屬於內平衡作為的軍事部署的調整則較為少見，主要包括下列四項海軍部署措施：將三艘太平洋艦隊轄下的洛杉磯級(Los Angeles Class)核子動力攻擊潛艦(SSN)轉移至關島；將美國海軍僅有的三艘海狼級(Sea Wolf Class)核子動力攻擊潛艦全數部署至關島；將兩艘改裝過、能同時搭載三叉戟(Trident)飛彈與執行特種作戰的核子動力巡弋飛彈

⁹⁴ 轉引自 Philip Yang, "From Strategic Competitor to Security Collaborator? New U.S.-China Tri-level Strategic Relations and Taiwan Security in a Post-9/11 World," *Issues & Studies*, Vol. 34, No. 4(December 2003), in note 8, pp. 187-188; Jing-dong Yuan, "Friend or Foe?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and U.S. China Policy in Transition," *East Asian Review*, Vol. 15, No. 3(Autumn 2003), in note 6, pp. 42-43.

⁹⁵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Department of Defense*, September 30, 2001, <http://www.defense.gov/pubs/qdr2001.pdf>, p. 4.

⁹⁶ Tomas J. Christensen, "China, the U.S.-Japan Alliance,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4(Spring 1999), pp. 61-69.

⁹⁷ "Joint Statement of the U.S.-Japan Security Consultative Committe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ebruary 19, 2005, <http://2001-2009.state.gov/r/pa/prs/ps/2005/42490.htm>.

潛艦(SSGN)至美國西部太平洋岸的班果(Bangor)海軍基地；將大多數神盾級戰艦轉移至太平洋艦隊轄下，某些戰艦並派往夏威夷與日本駐紮。⁹⁸

2. 歐巴馬政府(2010 以降)：內平衡與外平衡並重

梅然在 2007 年的文章中承認，由於美國在西太平洋鄰近中國的地區有圍繞著島嶼屬地、盟國安全及海上交通線安全的大量海外利益，故「未來」可能會對中國海軍注重發展以第二島鏈為地理外延的反介入能力產生「猜忌」，認為中國可能以此種能力為依托，主動挑戰美國在西太平洋中國領海以外地區的利益，或謀求該地區的海上霸權。⁹⁹這種「猜忌」在歐巴馬政府時代似乎越來越成為一種普遍的現象，導致除了上一小節分析的美國與日、印、澳等國的戰略合作，以及加強與部分東協國家的安全合作等外平衡手段之外，內平衡手段逐漸出現在美國應對中國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的手段中，形成內外平衡並重的現象。由於美國的外平衡手段已見於第二節，故在此僅分析美國的內平衡手段。

(1). 美國的認知

隨著歐巴馬政府在 2009 年 7 月宣布「重返亞洲」，美國似乎亦決定將其地緣戰略與軍事戰略的重心由傳統的歐洲、中東，以及反恐戰爭中的中亞，逐漸轉移至亞太地區。而這一戰略重心的改變，從後續公佈的一些涉及戰略路線改變與美中關係報告的美國官方文件中，似乎顯示出美國對中國崛起，以及其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在西太平洋對美國利益的影響的認知，產生與以往觀點不同的改變。

「美中經濟安全審議委員會」(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ttee, USCC)在 2011 年 11 月提交給美國國會的報告，首度改變以往對中國海軍戰略的觀點，認為中國的軍事戰略已經從以往的「反介入與區域拒止」(Anti-Access/Area-Denial)轉變為「區域控制」(Area Control)，其中的理由不僅在於認為中國的軍事戰略強調控制中國的周邊區域，特別是西太平洋地區，以保護其貿易與經濟利益、增強對海上主權爭端的聲索，以及盡可能排除對中國本土的威脅，而且認為以往使用「反介入與區域拒止」過於以美國觀點為主，忽略了中國現在的能力已經可以輕易實施對抗區域內國家的作戰，不僅使得美國在東亞的基地在中國的空軍與飛彈攻擊之下變得相當脆弱，而且同樣能嚴重威脅日本、菲律賓與越南的軍事基地。這份報告還認為，中國已經成功建立對第一島鏈內海域的控制，其下一個目標是在 2020 年之前建立對第一與第二兩條島鏈之間海域的控制權，第三階段則是在 2040 年之前，將航艦作為其軍事力量的核心，並結束美國對太平洋與印度洋的控制。¹⁰⁰

此外，根據美國國防部在 2012 年元月公佈的關於 21 世紀國防戰略的指導文件：「維持美國全球領導地位：21 世紀國防的優先選擇」(Sustaining U.S. Global

⁹⁸ Ronald O'Rourke, "China Naval Modernization: Implications for U.S. Navy Capabilities—Background and Issues for Congress,"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August 10, <http://www.fas.org/sgp/crs/row/RL33153.pdf>, p. 46.

⁹⁹ 梅然，「海軍擴展與戰略穩定：從英德競爭到中美關係」，前引文，頁 86。

¹⁰⁰ 上述內容見“2011 Report to Congress of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ttee,” *op. cit.*, pp. 7-8, 9-10, 182-189.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ies Defense), 美國承認中國崛起將在許多方面影響美國的經濟與安全利益,並認為中國軍事力量的成長必須要有更明確的戰略意圖以避免外界的誤判,同時指出克服像中國與伊朗這樣的國家設下的反進入與區域拒止並投射美國的權力,是美國軍事力量在嚇阻潛在威脅的重要任務與第三優先。¹⁰¹部分美國戰略菁英認為,該份指導文件暗示,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前進部署與對該地區國家的持續交往,必須明確展現美國對盟邦與夥伴的安全保證,以強化與這些國家的團結來對抗挑戰,同時藉由展現這樣的團結來勸阻中國的強制行為與北韓的侵略性,並將增加橫跨印度洋到太平洋沿岸地區的海洋主導意識與對潛在對手顯示美國確保第一與第二島鏈在衝突中一體化,作為更有效的軍事嚇阻手段。¹⁰²

上述美國官方公佈的文件顯示,美國已經認知到中國的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的操作已經對其海權地位構成嚴厲挑戰,特別是中國的島鏈長城海洋戰略觀與海上縱深防禦與陣地戰,顯示出中國亟欲控制至少第一島鏈內海域的作為。因此對中國的競爭性權力平衡作為不能再以過去外平衡為主、內平衡為輔的方式,必須逐漸提升內平衡作為的比例,才能有效應對中國的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對美國在亞太次體系中的挑戰。

(2). 空海戰概念與美國在西太平洋的內平衡手段

美國在內平衡作為方面最主要的舉動有二,第一是提出在 2010 年提所謂的「空海戰」(Air-Sea Battle)概念。第二則是進一步調整美軍的部署重心、單位型態與火力。

「空海戰」是美國在 2010 年四年期國防總檢中首度提出,¹⁰³其目的是利用海空軍在各種層面組織起網絡式(networked)與整合式(integrated)縱深打擊(attack-in-depth)來截斷(disrupt)、摧毀(destroy)與擊敗(defeat)等所謂「NIA-D3」手段來應對區域拒止與反介入對美軍的威脅。¹⁰⁴儘管美國從未正式明確指出這個概念的主要對付國家,但一般咸任其目標就是為了打破中國與伊朗的反介入戰略。¹⁰⁵

而為了達成這項戰略目標,海空軍的戰力在 2012 年公佈的戰略重心調整中便居於關鍵地位。¹⁰⁶儘管在這波戰略重心調整中,屬於內平衡行為的部分仍只包括重要軍事部署的調整,美國不僅沒有出現大規模擴軍的舉動,反而還預定藉由刪除國防預算、裁減陸軍與海軍陸戰隊規模、將戰艦或戰機中隊退休或編入預備

¹⁰¹ “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 *Department of Defense*, January 5, 2012, http://www.defense.gov/news/Defense_Strategic_Guidance.pdf, pp. 2, 4.

¹⁰² David J. Berteau, Michael J. Green et al., “U.S. Force Posture Strategy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An Independent Assessment,” *CSIS*, August 1, 2012, http://csis.org/files/publication/120814_FINAL_PACOM_optimized.pdf, p. 17.

¹⁰³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Department of Defense*, February 2010, <http://www.defense.gov/qdr/qdr%20as%20of%2029jan10%201600.PDF>, p. 32.

¹⁰⁴ O’Rourke, “China Naval Modernization,” *op. cit.*, p. 82.

¹⁰⁵ *Ibid.*, p. 45.

¹⁰⁶ “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 *op. cit.*, p. 2.

役等方式來縮減美軍的規模，使其能更迅速達成戰略的要求，¹⁰⁷但是其競爭性權力平衡的意涵卻並未縮減，因為美國仍維持 11 艘航艦與 10 個戰鬥群的編制，¹⁰⁸而且把太平洋地區的航艦數量由原來的 1 艘增加至 6 艘，太平洋美軍戰艦數量的比例也將從原來的 52% 上升至 60%，¹⁰⁹並且在新加坡的允許之下，讓四艘專為在近海地區作戰而設計的「近海戰鬥艦」(Littoral Combat Ship, LCS)自 2013 年春季起輪流派駐於新加坡，每次派駐期間為十個月。¹¹⁰此外，美國海軍也計畫與菲律賓當局談判，希望美軍的偵察機與海軍船艦能夠輪調於菲律賓的基地。¹¹¹預計其透過增強火力與部署至西太平洋。當然，美軍在亞太次體系中的部署調整也包括澳洲在 2011 年 11 月宣布允許美國在未來十年內於澳洲北部的達爾文(Darwin)派駐 3,000 名海軍陸戰隊，¹¹²以及 2012 年 4 月 27 日的駐日美軍重整計畫期中報告(United States-Government of Japan SCC Agreements)所宣布的，將九千名原來駐防於琉球的陸戰隊撤往太平洋其他地區如關島、夏威夷、澳洲北部與美國本土。¹¹³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官方於 2012 年 5 月又再度努力，¹¹⁴希望美國國會能批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2012 年 5 月 23 日，以美國國防部長潘內塔(Leon Panetta)為首，國務卿希拉蕊柯林頓與參謀首長聯席會(Joint Chiefs of Staff)主席鄧普西(Martin Dempsey)聯袂出席美國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的聽證會，三人在席上作證表示，他們希望國會能批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使美國成為正式締約國，提供美國在外交、法律和道德上的權力來堅持主張其他國家必須遵守該公約來強化美國的安全目標，而這種堅持在南海與中東的荷姆茲海峽的自由航行權特別重要，因為如果美國不是正式締約國，就無法與締約國在談判桌上協商海上爭端，而必須依靠海軍來解決，如此將升高軍事對峙風

¹⁰⁷ 美國預定在未來十年，總共削減 4,870 億美元的預算，與總數十萬名的地面部隊，相較之下海空軍的艦隊與戰機中隊的裁減則較低，因為這些是在西太平洋地區執行任務的重要骨幹兵力。David Alexander and Jim Wolf, "Pentagon cuts reshape military, trim costs," *Reuters*, January 26, 2012,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2/01/26/us-usa-defense-budget-idUSTRE80P1SP20120126>.

¹⁰⁸ "U.S. Won't Cut Carrier Fleet Below 11: SecDef," *Defense News*, January 22, 2012, <http://www.defensenews.com/article/20120122/DEFREG02/301220001/U-S-Won-8217-t-Cut-Carrier-Fleet-Below-11-SecDef>.

¹⁰⁹ Jim Wolf, "Pentagon says aims to keep Asia power balance," *Reuters*, March 8, 2012,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2/03/08/us-china-usa-pivot-idUSBRE82710N20120308>.

¹¹⁰ "Joint Statement from U.S., Singapore Defense Chiefs," *IIP Digital*, April 5, 2012, <http://iipdigital.usembassy.gov/st/english/texttrans/2012/04/201204053355.html#axzz1toHU1aJg>.

¹¹¹ Manuel Mogato, "Philippines studying U.S. offer to deploy spy planes," *Reuters*, January 27, 2012,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2/01/27/us-philippines-usa-idUSTRE80Q0L520120127>.

¹¹² "Obama visit: Australia agrees US Marine deployment plan," *BBC*, November 16, 2011, <http://www.bbc.co.uk/news/world-asia-15739995>.

¹¹³ 楊明珠，「駐日美軍重整報告出爐」，中央社，2012 年 4 月 27 日，<http://www.cna.com.tw/News/aOPL/201204270104.aspx>。

¹¹⁴ 美國自 1982 年以來就展開是否批准海洋法公約展開辯論，最近的努力是小布希政府在 2007 年也曾經希望國會通過海洋法公約，但並未獲得成功。Ernest Z. Bower and Grefory Poling, "Advanc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s of the United States: Ratification of the Law of the Sea," *Southeast Asia from the Corner of 18th & K Streets*, Volume III, Issue 10, May 25, 2012, http://csis.org/files/publication/120525_SoutheastAsia_Vol_3_Issue_10.pdf, p. 2.

險。¹¹⁵這顯示美國抗衡中國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的內平衡與外平衡手段已經擴及法律層面。不過雖然行政部門的這項努力獲得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亦即民主黨參議員凱利(John Kerry)的支持，¹¹⁶但迄本論文完成時，美國國會尚未就此事做出決定，因為除了軍事與外交戰略考量之外，批准海洋法公約還涉及美國其他涉及海洋事務的相關部門的利益，參議員凱利亦表示，他的支持乃是以不傷害民主黨在 2012 年總統大選年的政治利益為前提，故其後續發展是否會仍值得觀察。然而，國際法在此不是作為美國希望以國際法來促成協作性權力平衡的工具，反而很明顯地屬於競爭性權力平衡的工具，希望能夠更「合法」地介入南海爭端，不僅能支持南海周邊的東南亞國家與中國的主權聲索對抗，也能使美國利用南海的航行自由介入該區域事務，能有更強力的法律與外交立場。不過雖然競爭性權力平衡是達成地緣政治安排與均衡前用來限制各方競爭的重要工具，但以美國目前和中國極端缺乏戰略互信，甚至有高度的戰略互疑，又欲以此介入中國最敏感的周邊領土主權爭端議題，若美國國會果真批准海洋法公約，其所造成的效果很明顯的將是更強烈地刺激美中之間的競爭性權力平衡，難以藉此進一步達成雙邊協作性權力平衡。

上文所述的內平衡措施，再加上第二節提到的美國與日本、印度、澳洲，乃至東南亞國家的同盟強化、戰略或安全合作等外平衡措施，以及中國近年來在東海議題上日趨強硬的作為，又進一步促使美國宣布釣魚台也適用美日安保條約，等等這些內平衡與外平衡作為，很明顯都是美國針對中國的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所進行的競爭性權力平衡作為。顯示中國的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相當程度威脅到美國在亞太地緣政治次體系中的基本利益—海權地位，而美國不能允許中國進一步發展其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來控制東亞，並「驅逐」美國的勢力。此種地緣政治利益衝突所激起的乃是明顯的競爭性權力平衡思維與作為，雖然美中之間有多種對話，但這些對話顯然無法發揮協作性權力平衡的作用，真正有助於解決兩國之間的歧見與利益衝突，遑論達成重要的地緣政治安排，離次體系達成均衡仍甚為遙遠。

第四節、冷和平：對中國缺乏戰略交通線控制能力的次體系現狀

如果亞太次體系內的主要大國針對中國的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的反應，其作用是刺激競爭性權力平衡，難以形成協作性權力平衡來合作解決地緣政治衝突，

¹¹⁵ Kate Brannen, "Dempsey, Panetta to Congress: Pass sea treaty," *Naval Times*, May 23, 2012, <http://www.navytimes.com/news/2012/05/military-martin-dempsey-leon-panetta-to-congress-pass-sea-treaty-052312d/>.

¹¹⁶ Mia Bennett, "Senate to consider UNCLOS ratification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2007," *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 May 16, 2012, <http://foreignpolicyblogs.com/2012/05/16/senate-unclos-time-2007/>.

並因此達成各方都可接受的地緣政治安排，並進而形成次體系的地緣政治均衡，那麼亞太地緣政治次體系的安全，是否將走向大國之間的對抗？本論文認為，綜合目前中國的行動方式與主要戰略手段，亞太地區的發展模式，以及各方上述的主要反應，未來亞太地緣政治次體系的安全將呈現出一種「冷和平」的現象，雖然不是冷戰那樣因為強烈地意識型態與軍事對抗而產生的高度緊張，但也絕非存在多邊國際合作的均衡狀態，而是一種隨時可能因為主權爭端與大國地緣政治競爭，而引發大小區域外交危機，甚至小規模衝突的緊張穩定狀態。

所謂的冷和平，依照李瓊莉最初的解釋，是用來描述臺灣海峽兩岸在1999-2008年這段期間的局勢。李瓊莉認為在這段期間，臺灣海峽局勢處於「中度」(medium level)緊張的關係，雖然不存在戰爭，但和平形勢並不穩定，有時甚至發生公開的政治緊張，但這些公開政治緊張卻又不會立即造成戰爭的爆發。¹¹⁷雖然李瓊莉的定義中沒有提到國家在冷和平的狀態中，是否還會與另一方保持極為密切的社會、經濟互動，但從她的文章以及彼時臺灣海峽兩岸的互動中可知，冷和平雖然包含高度的政治緊張，但此種緊張並不妨礙處於冷和平狀態的國家之間存在其他社會、經濟、文化等各方面，極為熱絡的互動，甚至可認為冷和平之所以為「冷」和平，便肇因於存在政治之外在經濟、社會、文化等各方面的密切互動。

雖然亞太地緣政治次體系諸強國之間因應越來越完整的中國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的諸多反制作為在缺乏互信的情況下極易刺激次體系內的競爭性權力平衡思維與活動，不利於地緣政治安排的達成。但很弔詭地，當前的亞太地緣政治次體系儘管大國之間有嚴重的猜忌與強烈的競爭性權力平衡思維，卻也不至於引發如冷戰般的激烈對峙，其原因在於中國的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因控制能力不足，使得中國尚未真正成為對其他次體系中主要國家的嚴重威脅。不過所謂的「冷和平」，乃是中國與其西線地緣的印度，以及東南線地緣的美國、日本等次體系中區域地緣政治密碼層級以上的主要對手之間因為存在嚴重互疑，無法達成多邊地緣政治安排，卻又彼此需要合作以促進經濟發展、解決國際重要傳統與非傳統安全議題的局勢。在北線地緣，由於存在上海合作組織與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雖然中俄之間仍有猜忌，但由於彼此在傳統安全議題與地緣戰略相互需求的緣故，不會造成冷和平的態勢。

如第六章第二節的分析，中國海軍力量與以往實施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的大陸國家相較仍然太過弱小，又沒有積極的大規模海軍造艦擴張計畫來彌補這方面的嚴重缺陷，遂使得中國雖然確實已經具備在南海與臺灣海峽等鄰近中國沿海的一對一領土爭端中威脅中華民國、越南與菲律賓的領土地緣政治利益乃至生存的軍事力量，但其海空軍的遠洋作戰能力還是遠不如美國，即使與日本相較還是有段不小的差距，遑論進一步超越南海跨入印度洋，故中國在現階段是否因為操作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而真正成為亞太次體系中各主要國家的「威脅」，仍然頗有

¹¹⁷ Chyungly Lee, "Cross-Strait Participation in the Council for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A Case Study of a Multilateral Track Two Approach to Conflict Prevention," *Issues & Studies*, Vol. 45, No. 4(December 2009), p. 203.

討論的空間。而從海軍戰略的角度來說，中國在海洋領域的地理攻勢思維，雖然看似符合馬漢海權理論對前進基地的主張，但實際上與德國海軍戰略家魏格勒(Wolfgang Wegener)在1915年與1929年提出的「地理攻勢」(geographical offensive)思想更加接近，後者主張藉由向北歐發動地理攻勢取得北歐港口，為德國海軍取得繞開英國的遠程戰略封鎖、進入大西洋，以及與英國海軍進行艦隊決戰以獲致制海權、為德國建立海上交通線控制的絕佳機會。¹¹⁸羅辛斯基(Herbert Rosinski)批評魏格勒的觀點有兩個矛盾，忽略了德國海軍在數量上對英國居於絕對劣勢，無論在北海或大西洋中都不可能擊敗英國艦隊，德國海軍取得此種前進位置並進入大西洋的唯一結果，是迫使英國海軍全力在大西洋上剿滅可能對其交通線產生威脅的德國艦隊，而不是德國艦隊獲得能與孤立的個別英國艦隊交戰的機會，也就是說對德國的基本海上戰略劣勢並沒有真正的改善。¹¹⁹更糟的是，德國艦隊被英國消滅的結果又使英國海軍能威脅原來因德國艦隊存在而不敢接近的德國海岸，迫使德國必須抽掉其他兵力防守海岸線，削弱了整體力量。

德國的先例對中國來說也具有同樣的解釋效力。即使中國能取得臺灣作為自由進出西太平洋與解決南海問題的基地，但在遠洋艦隊數量不足的情況下能否真正將西太平洋作為確保其在東亞大陸發展與第一島鏈內緣海海洋利益的屏障，以及完全壓倒東北亞與東南亞其他國家的海軍力量，成功控制麻六甲至東北亞的海上戰略交通線，進而對美國在太平洋上的海上戰略交通線控制產生不可忽視的嚴重威脅，實際上還是大有疑問，畢竟在遠離陸基火力支援，僅憑海軍本身在陌生遠洋環境的海軍作戰不比能得到陸基火力支援、又在熟悉環境中運作的近海海軍作戰。而缺乏足夠海上戰略交通線控制能力對中國進入印度洋更是嚴厲的挑戰：一方面，中國在沒有解決周邊海域領土爭端的壓力，尤其是臺灣問題，並真正控制周邊三個海域之前，能派遣進入印度洋的海軍艦隊數量並不多。另一方面，即使中國能派遣相當力量的海軍艦隊進入印度洋，其攻勢作戰也將面對印度組織的「爭奪區」的威脅，將上演美國在中國沿海面對中國海軍爭奪區的困境，對印度的威脅實際上很有限，¹²⁰事實上，在上述由部分前印度決策菁英執筆的「不結盟2.0：21世紀的外交與戰略政策」報告中便認為，由於中國面臨上述兩種強大的海上限制，因此印度洋是印度在對抗中國的軍事戰略中唯一可以居於優勢主導地位的區域。¹²¹

除了軍事能力還不足以對其他次體系中的主要強國構成首要威脅之外，從世界體系的經濟角度來說，中國—加上印度—的崛起，由於充分融入已有的全球生產鏈中，從全球角度來說，其本身不僅成為最主要的生產國，國內市場的龐大需求也成為全球經濟成長的關鍵「發動機」；而從區域角度來說，中國迅速發展的

¹¹⁸ Wolfgang Wegener, *The Naval Strategy of the World War* (Annapolis, Marylan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89), pp. 26-34 and pp. 179-184.

¹¹⁹ 鈕先鍾譯，Herbert Rosinski 著，「德國的海戰理論」，Mitchell Simpson III 編，*海軍思想的發展*（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7年），頁80-81。

¹²⁰ James R. Holmes and Toshi Yoshihara, "China's Naval Ambitions in the Indian Oceans," *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31, No. 3 (June 2008), p. 388.

¹²¹ Sunil Khilnani et al, "Non-Alignment 2.0," *op. cit.*, pp. 41-42.

經濟亦使其周邊鄰國皆與中國展開超越領土爭端的深入經濟整合，提供中國發展所需的原料、資金、科技與出口市場，故對大多數亞太次體系中的主要國家乃至美國來說不僅不是威脅，還是一個很好的經濟發展機會。¹²²本論文在第一章即曾引用麥金德之語，指出地理與經濟同為影響國家行為的兩大主要變數，中國既然在身為全球體系與亞太次體系主要的經濟「發動機」之一，除非其本身的政策相當具有侵略性，否則其權力的成長很難促成其他國家的正式反制聯盟。再加上而中國的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正由於硬權力能力仍嫌不足，使其政策表現常以經濟或軟權力的方式呈現，導致其他對中國崛起感到不安的亞太次體系主要國家，也很難找到理由反對中國的政策，甚至本身也加入與中國的經濟整合之中。

因此中國目前既非亞太次體系中各主要國家明顯且唯一的傳統安全威脅，又是經濟發展重要的合作對象，遂使得次體系的主要國家實際上不願意對中國採取真正的對抗戰略。美國在 2009 年 7 月宣布「重返亞洲」，固然是一種將地緣戰略重心與方向由傳統的歐陸周邊轉向亞太地區的改變，而且強調外平衡與內平衡並重，並希望藉由軍事部署的調整來團結美國與盟邦和友好國家之間的戰略合作，以「說服」和「勸阻」中國勿採取強制行為危及亞太地緣政治次體系的秩序與安全。但是美國的調整並未使其對中國出現類似冷戰的圍堵政策，而且由於美國在內平衡的增強係以改變軍隊部署重心而非大規模擴建軍事力量，使得美國的調整行動實為格倫史奈德(Glenn H. Snyder)所謂的，綜合「推卸責任」(buck-passing)與平衡的「離岸平衡」(offshore balancing)戰略。¹²³攻勢現實主義者萊恩(Christopher Layne)指出此種戰略是一種責任轉移而非責任分享戰略，其基本假設是承認美國無力阻止其勢力範圍內的歐盟、德國與日本，和勢力範圍外的中國與復甦中的俄羅斯等國的崛起，而為了維護美國的地位，美國必須放棄對體系中混亂地區的安全維護承諾，並將維護區域權力平衡、阻止全球與區域霸權崛起，和穩定歐洲、東亞、中東地區的責任轉移給他國承擔。¹²⁴

一、冷和平中各強國的聯盟行為：離岸平衡、推卸責任與扞從

格倫史奈德與萊恩雖然注意到離岸平衡是推卸責任與平衡的綜合，但是他們與米爾斯海默一樣，都沒有詳細說明採取離岸平衡的海權的軍事戰略部署究竟如何。事實上柯白曾經提到一種「兵力的集中與分散」原則，說明海權為了盡可能涵蓋所有地區，其艦隊部署原則必須在平時就確定以一個戰略中心分散四處，但在分散的同時又保持一種利用艦隊活動的高機動性，能隨時集中於重點區域的彈性並保有相互照應之力量。¹²⁵從美國「重返」迄今的舉動與「維持美國全球領導

¹²² Ashley J. Tellis, "Overview: The United States and Asia's Rising Giants," in Ashley J. Tellis, Travis Tanner, and Jessica Keough ed., *Strategic Asia 2011-12: Asia Responds to Its Rising Powers, China and India* (Seattle and Washington, D.C.: 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2011), pp. 12-13.

¹²³ Glenn H. Snyder, "Mearsheimer's World—Offensive Realism and the Struggle for Security: A Review Essa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1(Summer 2002), p. 164.

¹²⁴ Christopher Layne, "Offshore Balancing Revisited,"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15, No. 2(Spring 2002), pp. 245-246.

¹²⁵ Julian Corbett, *Some Principles of Naval Strategy* (Annapolis, Marylan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88), pp. 131-134.

地位」的國防指導文件便可看出此種「分散－集中」原則的特徵。雖然美國加強與東亞國家的安全合作，但美國並沒有增加在東亞的駐軍，但是美國運用「分散－集中」原則，將九千名原來駐防於琉球的陸戰隊撤往太平洋其他地區如關島、夏威夷、澳洲北部與美國本土，而太平洋地區與東南亞地區增加的海軍戰艦數量雖是「未來」數年內的計畫而非現在立即執行之措施，但其分別派往新加坡、關島與中東而非集中於東北亞，顯示美國是將日本至麻六甲的亞太島鏈區視為戰略上最重要之點，爾後將艦隊與陸戰隊兵力分散於太平洋與印度洋，形成一個從美國本土、夏威夷到關島的軸心，日本、澳洲與印度洋為分散點，俾使兵力可在需要時集中於亞太島鏈區的分散－集中部署，從美日共同文書中提出的，在包括日本，以及日本以外的太平洋各處的「動態防衛合作」(dynamic defense cooperation) 概念，¹²⁶以及宣稱美軍的調整原則是「地理上分散、運用上有持久性、政治上可持續」，¹²⁷便可得證。此種「動態防衛合作」概念，加上美國還宣稱將與印度發展長期戰略夥伴關係，並支援其能力發展，俾使印度能在印度洋地區成為主要的安全支柱，¹²⁸都是明顯的離岸平衡推卸責任作為。

不過除了美國之外，當前亞太次體系中的其他主要國家，雖然對中國的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所展現出來的海陸擴張懷有極大戒心與不信任感，但他們同樣為了各自不同的原因在實施與美國類似的推卸責任戰略，以及為了獲取更大的利益政治與領土地緣政治利益，而採取施維勒的「利益平衡」(Balance of Interest)理論所主張的，利用扈從於美國的戰略之行為來從對中國的防範中獲得好處—根據施維勒的觀點，他主張所謂的「扈從」，應視為國家為了獲得夢寐以求的利益，或甚至追求利益的極大化，而與體系中較強的國家或聯盟結合以對抗較弱的國家。扈從並非完全只會造成體系的不穩定，若修正主義國家是較弱的一方，則扈從反而有助於維持體系的穩定。¹²⁹例如日本便展現出這樣的行為：長期以來，接受美國的核子保護傘一直是日本的戰略方向，這種傳統的扈從行為在中國崛起時，不僅可使日本藉由美國的力量來壓制中國的海軍與海上擴張對日本的威脅，並阻止中國成為亞太區域地緣政治結構中的新超強以維持現狀，還可進一步增加日本對中國在東海議題，乃至日本對俄羅斯在北方四島問題等海洋領土爭端的談判力量。換言之，儘管一般將日本的聯盟行為視為外平衡，但考慮到美日同盟並非兩次世界大戰以前的「攻守同盟」，而是美國對日本負有協防義務，但日本對美國卻沒有這種義務。因此日本在面對中國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於東南線地緣的鬥爭，而進一步向美國靠攏與強化美日安保的雙邊戰略合作，雖然可視為日本對中國崛起的外平衡，但可能更接近施維勒所稱的利益平衡中的扈從行為。

不過與日本相較之下，印度與澳洲這兩個對中國崛起的認知與態度和美國、日本較為不同，而且較不屬於中國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的直接鬥爭對象的亞太

¹²⁶ “‘Dynamic’ Japan-U.S. military cooperation sends message to China,” *The Asahi Shimbun*, April 28, 2012, http://ajw.asahi.com/article/behind_news/AJ201204280045.

¹²⁷ 楊明珠，「駐日美軍重整報告出爐」，前引文。

¹²⁸ “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ies Defense,” *op. cit.*, p. 2.

¹²⁹ Randall L.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Summer 1994), pp. 72-107.

次體系一級區域大國，為了利益平衡而採取的扈從行為就更加明顯：¹³⁰

(一)、印度

印度雖然被美國作為主要推卸責任對象之一，但其行動卻表現出明顯的扈從與推卸責任並用。雖然其在 2012 年 3 月公佈的「不結盟 2.0：21 世紀的外交與戰略政策」報告，當中指出中國在可見的未來是印度的重要挑戰，而且是直接衝撞印度地緣政治空間的唯一主要強權，印度不能完全排除中國在拉大與印度的權力差距後，可能使用武力攻取印度領土以實現其領土主權聲索的可能，因此對中國的戰略必須兼顧競爭與合作，但同時也指出，印度瞭解印度洋地區對中國來說，其重要性排在臺灣海峽以及周邊三個緣海之後，因此印度可以利用美國對亞太地區的強力海上部署、越來越向外投射的日本海軍武力，以及印尼、澳洲與越南的海軍建設來延緩甚至嚇阻中國海軍進入印度洋，為印度爭取時間建設本身的海軍，因此印度需要與這些國家維持良好的外交關係，並藉由安全合作協定與定期海軍聯合演習來支持他們的這種政策方向，¹³¹印度總理辛格(Manmohan Singh)更宣稱，印度認為中國是無法被圍堵的，因此印度的目標是同時維持與美中兩大國的友好關係。¹³²

(二)、澳洲

澳洲則是與印度較為不同的例子，也是所謂的美、日、印、澳四邊戰略合作無法真正成功的因素。對澳洲來說，其最重視的周邊地區包括印尼、巴布亞新幾內亞、東帝汶、紐西蘭與南太平洋國家，但是澳洲認為從東北亞延伸到東印度洋地區的廣大東亞地區也是其擁有戰略利益的地區，其中最重要的則是能夠對澳洲北部投射武力的東南亞地區，而澳洲的戰略利益，就是維持澳洲本身與周邊地區的安全、追求亞太地區的戰略穩定，以及一個穩定、以規範為基礎(rules-based)的全球安全秩序。¹³³

澳洲與美國傳統上有緊密的同盟關係，而上述的戰略利益使其必須與美國維持這種同盟關係。但澳洲在中國崛起的過程中也與中國有非常密切的貿易關係，¹³⁴而對中國來說，澳洲對中國而言是一個可以不須要通過麻六甲海峽而輸入天然氣與鐵礦等重要資源的產地，不過澳洲與中國之間的海上交通線還是必須經過龍目海峽。故假使澳洲加入對中國的「圍堵」，則一旦發生大規模武裝衝突，中國將連改由龍目海峽進出印度洋也很困難。而對澳洲來說，雖然中國軍事力量成長對澳洲本身並不構成實質威脅，但中國崛起可能導致對南海周邊地區，乃至

¹³⁰ Purnendra Jain, "Westward Ho! Japan Eyes India Strategically," *op. cit.*, pp. 23-25.

¹³¹ Sunil Khilnani et al, "Non-Alignment 2.0," *op. cit.*, pp. 13-15.

¹³² "We want friendly ties with both US and China: PM," *The Times of India*, March 25, 2012, http://article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2012-03-25/india/31236165_1_open-economy-today-sections-and-stake-holders-nuclear-security-summit.

¹³³ "Defending Australia: in the Asia Pacific Century: Force 2030," *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Defence*, 2009, http://www.defence.gov.au/capability/_home/cdaf/defence_white_paper_2009.pdf, pp. 41-44.

¹³⁴ 中國在 2007 年上半前超過日本，成為澳洲第一大貿易夥伴。David Uren, "China emerges as our biggest trade partner," *The Australian*, May 5, 2007, <http://www.theaustralian.com.au/news/nation/china-emerges-as-our-biggest-trade-partner/story-e6frg6nf-1111113474544>.

與次體系內其他主要強國在東亞或太平洋、印度洋地區可能的潛在衝突所產生的不穩定與安全，則使澳洲感到其安全受威脅，因為澳洲認為維持亞太地區的戰略穩定，乃是其重要的戰略利益。再加上部分澳洲戰略菁英希望進一步使澳洲成為「亞洲國家」，導致澳洲經常希望獨立於美國之外發展與亞洲國家的關係。

上述的亞太基本地緣政治環境，以及澳洲對中國的戰略與經貿利益矛盾關係，使得澳洲在亞太次體系中的政策處於兩難境地：一方面，澳洲希望能維持一個穩定的亞太環境以發展與東亞國家，特別是中國的經濟關係，這使其不願意在外交政策上過於觸怒中國，特別是不願意在雙邊與多邊安全合作上給予中國澳洲參與對中國圍堵的認知，故澳洲雖然在 2007 年參加美、日、印、澳四國戰略合作，卻反對這個多邊機制在國防與安全議題上有正式的四邊戰略對話，以免引發中國的疑慮，¹³⁵危及澳洲的重要經貿利益，澳洲在 2011 年 12 月也否認其政府提出美、印、澳三國安全公約的傳聞，目的同樣是避免中國的疑慮。¹³⁶但另一方面，澳洲又不希望中國的擴張引發區域的緊張態勢。這使得澳洲大量參與與美國、美國正式盟國之間的雙邊與三邊戰略合作，如美日澳三邊戰略合作與日澳戰略合作，並在 2011 年 11 月宣布允許美國在未來十年內於澳洲北部的達爾文(Darwin)派駐 3,000 名海軍陸戰隊。¹³⁷顯然，澳洲的戰略是藉由與美國、美國其他重要亞太盟邦如日本的在同盟關係下的雙邊與多邊戰略合作的力量，達成穩定亞太並試圖達成以規範為基礎的區域與全球戰略目標，進而使得澳洲能在這樣的國際環境之下發展與中國、東亞與南亞國家之間的關係。

結果，次體系中各主要國家之間雖然明顯加強不包含中國在內的雙邊乃至多邊安全合作，不過除了美韓同盟、美日安保與美澳紐公約是正式的軍事同盟之外，其餘的雙邊與三邊戰略合作如美印、日印、日澳、印越、印澳、美日印、美日澳等，均非正式同盟。但不管是哪一種戰略合作，都未明白表示針對中國，而 2007 年之前短暫存在的美、日、澳、印四國戰略合作雖然似乎有明顯的地理圍堵中國意涵，但澳洲既然已經懷抱不希望形成正式機制以免觸怒中國的立場，當中國在 2007 年對四國合作提出正式抗議，並要求印度說明其立場，後者國內有強大的反對與美國進行戰略合作的聲浪，且美、日等國亦分別在 2007-2008 年間更換為希望與中國更深入交往的政府，四國戰略合作於 2008 年無疾而終。¹³⁸2011 年 12 月首次舉行的美、日、印三邊戰略對話聚焦於印度洋與南海等三國皆有共同利益的海洋議題之上，並達成協調各自在這些議題上的立場與角色

¹³⁵ Emma Chanlett-Avery, Bruce Vaughn, "Emerging Trends in the Security Architecture in Asia: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Ties Among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ustralia, and India,"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January 7, 2008, <http://www.fas.org/sgp/crs/row/RL34312.pdf>, p. 16.

¹³⁶ "Australia denies suggesting India-US security pact," *BBC*, December 2, 2011, <http://www.bbc.co.uk/news/world-asia-india-15997836>.

¹³⁷ "Obama visit: Australia agrees US Marine deployment plan," *BBC*, November 16, 2011, <http://www.bbc.co.uk/news/world-asia-15739995>.

¹³⁸ David, Brewster, "The Australia-India Security Declaration: The Quadrilateral Redux?" *Security Challenges*, Vol. 6, No. 1(Autumn 2010), pp. 3-4.

的共識，顯示仍舊以中國為主要對象，¹³⁹但此一戰略對話能否進一步升級為正式三邊戰略合作機制而不重蹈以往次體系中多邊機制無疾而終的下場，仍有待觀察。

而上述的戰略安排形式、離岸平衡、推卸責任與扈從等聯盟行為顯示，亞太次體系中面對來自中國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的強大挑戰的各強國，雖然在中國地緣戰略的刺激下，各自以不同的競爭性權力平衡措施回應來自中國的戰略挑戰，但並沒有哪一個強國願意因為安全與地緣政治競爭越來越強烈的局面，而真正犧牲與中國的穩定關係所獲得的經濟利益，打破既有的緊張穩定態勢。這種局面似乎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英國與德意志帝國之間因為經濟利益的緊密交織，而對雙方爆發戰爭的可能性產生的抑制效應，有其表面上的類似之處。¹⁴⁰然而，雖然目前的冷和平似乎是亞太次體系地緣政治均衡之外，各強國均接受的一種緊張穩定狀態，並得到體系內密切互動產生的經濟利益、各種雙邊與多邊國際安全建制的維護，但鑒於中國的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對海洋發展的區域控制要求，遠強於德意志帝國當時的戰略形式與內涵中的海上控制要求，若中國進一步擴大其海空軍現代化下的區域控制能力，以追求盡可能將區域縱深防禦超越第一島鏈，甚至延伸至第二島鏈，來落實島鏈長城戰略觀的指導，那麼緊密的雙邊經濟利益，以及目前聯合國與亞太次體系中，包含中美兩國共同參與的各項政府間雙邊與多邊國際安全建制，是否還能在中國美國在西太平洋的基本地緣政治利益的直接衝撞的情況下，發揮目前的抑制力，而不致因某些預期之外的衝突而破壞體系內的冷和平，便有待往後的持續研究與觀察。

二、東南亞國家的「兩屬」行為

既然次體系中的超強、強權與一級區域大國對中國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的反應都如此模糊，一級區域大國以下的國家，特別是位於中國地緣戰略主要發展方向與重心的東南亞國家，對中國的態度就更加具有為了利益平衡，而產生的扈從/平衡兩面性。本章第二節第二小節所分析的東協與東協國家的「間接平衡」，即可視為這種兩面性的具體實踐。雖然根據本章第二節第二小節的分析，東協的間接平衡仍然是東協欲「平衡」中國影響力的一種競爭性權力平衡作為，但若站在東協希望主導東亞區域整合的立場，利用區域外大國的介入來降低中國影響力的同時，也無形中促成次體系中各主要大國承認東協對東亞整合的主導權，毋寧是一種利益平衡理論下的扈從行為。而東協國家中，尤以和中國有激烈爭端的越南所採取的行為，最具有兩面性特徵：蓋其一方面與美國改善關係並發展戰略合作，又與俄羅斯、印度發展防衛合作與戰略夥伴關係，但卻也同時與中國在領土爭端之外的議題保持友好關係，甚至是中國的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之一。至於

¹³⁹ “India, Japan, US meet today with China on minds,” *The Times of India*, December 19, 2011, http://article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2011-12-19/india/30533569_1_maritime-security-trilateral-dialogue-south-china-sea.

¹⁴⁰ See Paul A. Papayoanou, “Interdependence, Institutions,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Britain, Germany, and World War I,”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4(Spring 1996), pp. 42-76.

其他東協國家所採取的行為，本質上也與越南類似，只是在與中國及區域外強國的關係上，程度有所差異。然而，這引發另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即中國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在東南亞的鬥爭與爭取，以及東南亞國家的間接平衡與利益平衡行為，是否真能在東亞重建以中國為核心的「朝貢體系」，以作為東亞地緣戰略領域的經濟基礎？

假使中國真能建立以其為中心的東亞地緣戰略領域，這個領域內的國際秩序也不是中國古代在周邊建立起來的冊封與朝貢體系。第一個原因在於各國都早已接受西發利亞主權平等體系秩序原則，而東亞地緣戰略領域不過是西發利亞體系秩序原則的一個次體系的情況下，想重建古代中國與冊封國、朝貢國的法律地位完全不平等的冊封或朝貢體系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而冊封與朝貢體系是一種政治關係重於經貿關係的國際體系，中國並不特別重視在此一體系中的經貿獲利，反而更加注重中國的宗主權是否能維繫，但在全球化與中國和周邊東亞國家大都已深刻融入世界體系的今日，不可能再出現這樣不注重貿易關係的體系，各國也不可能為了經貿上的利益而承認中國的「宗主權」。假使中國真能建立以其為中心的東亞地緣政治領域，最多只是其在領域中具有優越的政治與經濟整合主導權，甚至可能與部分國家有密切的防衛合作關係，儘管在政治關係上可能有顯現出一定的階級化，但不可能恢復成類似古代那樣完全政治地位不對等、經濟關係對朝貢國單方面有利的「朝貢體系」。

更重要的原因則在於中國的能力是否真能將東亞轉變為類似冷戰時期的東歐與心臟地帶。蘇聯能夠建立此種體系的原因在於其以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的軍事征服為基礎，結合東歐的共黨勢力來組建由蘇聯支配的歐亞大陸地緣戰略領域，過程中由於蘇聯與東歐相鄰，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無論是英國海權或美國皆未在中東歐建立密切的政治聯盟關係，只有法國曾在 1920 年代與波蘭以及包含中東歐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與南斯拉夫三國在內的「小協約」(Little Entente)國家建立密切政治聯盟關係，作為防止德、俄兩國在歐陸崛起的手段。¹⁴¹但這一點關係也早已因為納粹德國在 1930 年代後期的擴張以及在 1941 年征服法國而消失殆盡。故蘇聯有很強大的「地利之便」優勢，除了土耳其以及巴爾幹半島南部的希臘因為屬於陸地與海洋的交接地帶而遇到英國、美國海權力量的對抗之外，並未在德國以外的中東歐其他地區遇到其他強權或超強的阻撓。

在目前的亞太次體系中，中國除了與中南半島相鄰之外，完全缺乏這樣的先決條件優勢，其他超強與強權早已同時在陸地與海洋上對東亞地區進行大規模滲透，假使中國不能真正控制其周邊三個海域，則其東亞地緣政治領域最多只限於東亞大陸之上；而除非其能在泛亞鐵路東南亞走廊建設完成之後弱化東協在東南亞之影響力，例如與中南半島國家建立一個更緊密的政治同盟關係，甚至擴大目前的湄公河聯合巡航，進一步投射更多軍事力量進入中南半島甚至南海周邊地區，否則東南亞不太可能成為受其支配的地緣政治區域。中國周邊的中小型國家

¹⁴¹ Colin S. Gray, *War, Pea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ic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second edition, 2012), p. 123.

即使願意與中國保持密切的政治、經濟乃至戰略關係，也必然將與美國、日本、印度乃至俄羅斯等其他次體系超強與強權維持一定程度的戰略關係，出現很明顯的「兩屬」情況，使得中國很難真正建立一個嚴密的東亞地緣戰略領域。

「兩屬」現象可能符合布里辛斯基的預測，但這不是因為中國願意允許這些國家「兩屬」的緣故。「兩屬」關係早在帝國時代的冊封與朝貢體系中就存在，它源自中國能力不足以真正在政治上掌控整個體系，而其他中小型國家為了本身的安全、政治與經濟利益，必須同時向冊封或朝貢體系內或體系外的強權同時朝貢以試圖極大化本身的利益，與確保國家生存與安全的現象。而古代東亞地緣政治體系冊封與朝貢體系中的「兩屬」現象能否消失，端看身為體系單極甚至霸權的中國，有無能力與意願完全掌握整個體系的發展主導權，並使體系外的強國無法介入體系，因為以往中國在帝國時代之所以無法確保兩屬情況的發生，除了缺乏能力之外，部分原因還在於缺乏對整個體系的瞭解，或不願意關注國際事務而對國際關係發展漠不關心，但這種現象消失與否，卻與體系地緣政治結構的改變沒有太大的關連性。

然而，在當前的亞太次體系中，中國周邊的東南亞國家出現「兩屬」的情況，固然是中國的能力不足以真正掌握整個東亞的結果，也是冷和平下的必然結果。但「兩屬」情況能否消失，卻涉及亞太地緣政治結構的變化：中國不是冷戰以來就主導東亞或東南亞區域國際秩序的唯一主導國，反而美國才是這樣的國家，其在東亞的強大軍事與軍事存在因此成為結構的「現狀」。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崛起如要消除東亞國家的「兩屬」情況，以此作為達成其標準地緣政治程序與組織東亞地緣戰略領域的基礎，唯一的可能便是取代美國成為東亞國際秩序與區域整合的唯一主導國。這不僅要求中國成為亞太次體系中的新超強，還要求中國必須將美國的勢力驅逐出東亞，二者都是對既有次體系結構的巨大革命性改變，以及次體系各主要強國的地緣政治利益直接且劇烈的衝突，其結果不只是「兩屬」現象的消失，也代表冷和平的消失。因此，未來中國是否果真會朝向這個方向發展，也有待後續的進一步觀察。

第五節、小結

正如萊恩指出，勢力範圍的劃分與相互承認，並尊重其他大國在勢力範圍內的利益、合法性與權益，強國之間才能達成互相接受的平等，並避免誤解與引發衝突。¹⁴²而要達成這樣的情況就必須強國之間達成在政治與領土地緣政治利益上的多邊地緣政治安排，亦即均衡的先決條件。

權力平衡概念再度由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藉由正式同盟來平衡敵對一方戰略意圖的內涵，轉變為不以正式同盟為形式的戰略合作，並成為本世紀的主要安全合作形式。由於這種「戰略合作」是連潛在競爭對手之前也可以進行，只要不涉及雙方最敏感的領域，這將使得權力平衡的運作變得更為複雜，均衡更難以達

¹⁴² Christopher Layne, "Offshore Balancing Revisited," *op. cit.*, p. 246.

成，蓋國家之間雖然存在戰略合作，但其內在雙邊關係可能因為彼此存在某些敏感而難以解決的地緣政治利益，特別是政治、領土與軍事方面的地緣政治利益，而不可能真正消弭彼此的戰略互疑，進而達成地緣政治安排與包含體系或次體系內所有大國在內的多邊國際合作建制。

然而，本章的分析顯示，上述的權力平衡的概念轉變並沒有使體系穩定的操作或均衡的達成更容易，反而因為缺乏足夠明確的平衡指標，而使得大國之間仍維持強烈的競爭性權力平衡思維。雖然目前的全球化使得大國之間必須合力解決非傳統安全議題，以及在經濟與其他低敏感國際問題上合作，但這些合作都未能降低彼此的猜忌。複雜的戰略合作與猜忌關係反而使得大國之間不容易判斷對方的真正意圖。所謂的「穩定」與「和平」，實際上暗潮洶湧。而大國之間的扞從與推卸責任行為也注定使得向中國這樣的修正主義國家不可能會認為體系會形成對其擴張行動真正的平衡，而在戰略意圖上有退縮之舉，反而會視局勢與本身的能力，和其他主要國家的能力的相對變化，伺機增強擴張的力道，結果是非常容易引發緊張的態勢。

目前的亞太次體系即表現出這樣的情況。在中國東南線地緣的大國戰略合作，參與國都未指明中國是其主要的針對目標，而且各參與國內部的菁英在其他政治、經濟利益，乃至非傳統安全層面的合作考量下，也不盡然完全支持這種明顯會引起中國側目的戰略合作，但中國對此抱有高度的疑慮是必然的。但是次體系截至目前為止，還未出現一個包含所有主要國家的多邊戰略合作，來化解彼此之間的戰略互疑並協助達成多邊地緣政治安排。因此儘管亞太次體系中，地緣經濟的發展相當蓬勃，但在地緣政治方面的停滯不前與仍然相當嚴重的戰略互疑，注定將使次體系無法達成平衡，只能維持緊繃的冷和平關係，隨時可能因為某些小事件或小衝突，而在主要大國之間引發相當激烈的緊張關係。故中國的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並無法數成當前亞太次體系的均衡，但在目前因其海陸控制能力不足之故，尚未真正成為其他主要國家的首要安全威脅，因此在目前為止使次體系保持一種在政治上互相猜疑、但又保有合作的冷和平穩定局面。然而正如吾人在 2010 年以後看到的，中國在海洋議題上的獨斷作為非常容易引發周邊國家的警覺，故假使中國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在未來因控制能力的進一步發展，以及縮小與美國之間的能力差距、同時擴大與周邊國家的控制能力差距，一旦在領土議題上轉為更加強硬的態度，進一步威脅其他次體系主要大國的政治、領土與軍事地緣政治利益，目前已有的雙邊與三邊戰略合作很容易在已有的基礎上發展為針對中國的更進一步正式戰略合作機制，如同歐洲在 20 世紀初期面對德意志第二帝國的崛起那樣。

結果，在當前的亞太地緣政治次體系中，除了東亞高峰會之外，中國參與的三邊以上大國安全戰略合作機制幾乎都沒有以美國為首的海洋國家之參與，上海合作組織本身就是一個純陸權性的國際組織，而在 2012 年初逐漸涉入亞太乃至全球安全議題的中、俄、印三邊戰略合作也完全不包括美國等海洋國家，三國不僅在伊朗核武與敘利亞內政議題上與美國持相反態度，也在北韓於 2012 年 4 月

發射衛星失敗、西方國家、南韓與日本一致譴責之際展現出較為「冷靜」的態度。¹⁴³反過來說，以美國為首的亞太海洋國家的多邊戰略合作，如美日澳三邊戰略對話、美日印三邊戰略對話，也沒有包含中國在內。中國只個別與美國、印度、南韓舉行雙邊戰略對話。換句話說，本已缺乏的戰略互信在「安西、靠北、爭東南」的地緣戰略操作之下，進一步使整個亞太地緣政治次體系陷入傳統的大陸－海洋地緣政治競爭模式，而且因為美中兩國互相涉入對方的地緣政治利益圈，使得競爭性權力平衡遠大於達成均衡必要的協作性權力平衡。

政治上緊張、經濟上發展熱絡的冷和平將取代冷戰成為新的國際形勢，類似維也納體系之類的大國協調(*concert of Powers*)雖然仍是部分國家追求的目標，特別是結構中以保護本身自己利益為主要目標的強權與一級區域大國，但此種等同於均衡的目標，既需要高度互信，又必須要以解決地緣政治利益衝突、達成各方均接受的地緣政治安排才能成立，將因為中國不肯在領土爭端中讓步，以及其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持續深入其他國家地緣政治利益範圍內所引發的地緣政治競爭而難以達成。



¹⁴³ Shoban Saxena, "India, Russia, China unite on North Korea," *The Times of India*, April 14, 2012, http://article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2012-04-14/india/31341817_1_trilateral-meeting-brics-russia-and-china.

第八章、結論

綜合以上從歷史與地緣政治途徑分析中國崛起的地緣戰略，本章將提出本論文的結論，包括本論文的研究發現、對本論文問題意識與研究假設的驗證，並檢討本論文的研究不足之處，和提出未來可能的繼續發展方向。

第一節、研究發現：中國對外戰略行為的本質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雖然在全球與亞太次體系地緣政治密碼上已經展現出相當的開放性，擺脫以往中國在帝國時代只將目光投注於東亞大陸的傳統，但毛澤東時代的地緣政治密碼，意識型態的重要性高於地緣政治因素，而且當時的中國國力相當弱小，並處於美蘇兩超強之間，不可能希望成為支配東亞的超強，故其爭取的是意識型態上的第三世界國家的領袖地位，而不是地緣政治上的東亞支配地位。鄧小平時代的地緣政治密碼雖然在表面上繼承了毛澤東的世界開放性，但是鄧小平深刻體認到中國力量的微弱，必須首先關注於中國本身的發展，然後才有機會與超強競爭並達成全球體系地緣政治密碼的目標。因此鄧小平時代的中國地緣政治密碼，外表上雖然開放，實際上卻是內斂，但基於結構與體系都早已邁入全球時代，中國再怎麼內斂也不可能走向以往的鎖國時代。此外，鄧小平時代的中國地緣政治密碼由於意識型態重要性降低，遂使地緣政治重要性上升，開始將注意力集中於亞太，而非毛澤東時代的世界性。而在冷戰結束後，中國戰略菁英認為全球戰略重心逐漸由歐洲向亞洲轉移，而中國在亞太則同時與美國、日本、俄羅斯、印度等大國相遇，其地緣政治密碼的亞太屬性也就越發明顯。

地緣政治密碼「亞太化」導致中國戰略菁英將注意力集中於東亞與其周邊。從第五章對中國戰略菁英的世界觀與地緣政治密碼的分析可看出，至少從毛澤東時代開始，中國就開始逐漸不能接受其他強國在東亞擁有比其優越的政治地位，到了冷戰之後更為明顯。這是因為中國在將近兩千年的東亞歷史中一直都是居於超強甚至霸權的地位，「中國應該身為體系秩序主導國」之一的心理深刻烙印在中國戰略菁英內心。這使得反帝國主義、反霸權主義、和平共處五原則，雖然抱持這些外交政策對中國來說也有相當的好處，至少在中國還很弱小的情況下有助於中國抵抗列強的支配，並找到志同道合的國家一起合作。但是當中國逐漸強大、不須要擔心可能來自外部的潛在亡國危機之後，這些原則就逐漸變為口號，不再真正被奉行，取而代之的是以中國國家利益為優先的政策原則，2010年以來逐漸於周邊海洋議題上採取強硬態度的行動就是這種轉變的初期具體呈現，雖然受到中國還沒有完全具備足夠能力，以及周邊國家特別是美國的力量還是遠超過中國的限制，使其強硬行動只能展現在與其領土爭端相關的有限議題上，但這

已經足夠困惑許多以往對中國的戰略採取較正面觀點的學者、分析家與政治人物。同時，以往在冷戰時協助中國提高國際地位的第三世界國家也不再那麼受重視，取而代之的是大國外交。

換言之，中國戰略菁英似乎一直追求以其為中心的霸權穩定秩序，至少在東亞必須以其為核心，在亞太與全球的範圍中其他列強必須容納中國為平等的體系秩序主導國。如此看來，中國以往的戰略行為似乎只是一種權宜之計，屬於一種「購買時間」邏輯的展現。然而事實是否真的如此？

一、購買時間或彈性反應

購買時間邏輯是一種國家應付威脅的特殊手段。李普斯曼(Norrin M. Ripsman)與李維指出，當國家在能力不足以應付即將到來的戰爭威脅時，為了避免在能力不足的情況下進入戰爭，可能會選擇向潛在威脅讓步，給予他們所想要得到的利益，但購買時間與所謂的「綏靖」(appeasement)最大的不同在於，這並不是為了達到持久和平所採取的方法，其目的是希望藉由暫時的讓步來在**短期**內避免戰爭以爭取時間，以便增建本身的軍事力量或爭取盟友，好在未來**長期**的時間內嚇阻戰爭，或在嚇阻失敗時能夠在戰爭中獲勝。換言之，這是一種不得不然的暫時作法。李普斯曼與李維認為，領導人在兩種情況下會採取這種行為來應對威脅，第一種也是最有利的情况，是他們預期時間對其有利，他們可以借著拖延時間來使權力平衡朝有利自己的方向發展，並在往後的軍事對抗中獲勝。第二種則是領導人預期或希望藉由讓步來購買時間，可以拖延到對手的政權改朝換代，或是對手出現其他的威脅，必須轉移焦點至新威脅。

1

值得注意的是，李普斯曼與李維指出，並非所有提到購買時間邏輯的國際關係學者對此一手段的概念都類似，例如施維勒就認為，購買時間就是國家利用交往或綏靖等手段來爭取時間來進行再武裝或爭取盟友，以應付新興強國無法被滿足導致戰爭無可避免的情況；布羅利(Mark Brawley)則認為，綏靖是一種最難以(least likely)發揮希望在未來累積財富與權力的效果的手段；至於米爾斯海默則主張，對危險的敵人讓予權力以期望能購買時間用來動員圍堵威脅所需要的資源，只有在國家面臨短期的衰弱，而且確實能在長期的未來動員更為優越的資源，才有其意義，因此這樣的個案極為稀少，就他所知只有 1938 年的慕尼黑協定，²而這個個案也正是李普斯曼與李維所研究的個案。根據這個整理，雖然可以確定購買時間的邏輯是為了暫時爭取時間動員更多資源或爭取盟友以在未來擊敗當前的威脅，但只有李普斯曼與李維，以及米爾斯海默等三人曾提到購買時間邏輯的行為必須是短期內的權力讓予或綏靖行為，而且必須確信本身能在未來動員更為優越的資源來嚇阻戰爭或在戰爭中擊敗敵人，才算是購買時間邏輯的展現。雖然

¹ Norrin M. Ripsman and Jack S. Levy, "Wishful Thinking or Buying Time? The Logic of British Appeasement in the 1930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3, No. 2(Fall 2008), p. 156.

² *Ibid.*, p. 157.

三人的解釋較為周延，但實際上很難清楚理解長短期的時間分野，特別是內平衡的效果通常需要一段時間才能展現，因此「短期」妥協是否為「購買時間邏輯」的必要條件，可能還需進一步分析。

不過整體說來，購買時間邏輯確實可以視為國家為了避免在力量微弱時與強大的潛在威脅爆發戰爭，被迫或主動讓予對方欲從己方處所獲得的地緣政治利益來滿足對方的要求以避免直接對抗導致預期的失敗結果，但是這種讓步的妥協行為只是一種無可奈何的暫時現象，讓步的國家只是為了爭取時間來動員更多資源或爭取其他盟友，以便在未來能嚇阻潛在威脅的更進一步要求，或因為不願繼續妥協而在與潛在威脅的戰爭中擊敗對方，達到完全解除威脅的目的。這裡必須指出，上述學者對於購買時間邏輯的描述中，僅認為戰爭之所以爆發乃是嚇阻失敗的緣故，並沒有提及戰爭的爆發原因是否會是採行購買時間邏輯的國家主動挑起。但從邏輯上來說，原先採取購買時間邏輯的國家的確有可能在動員充分的資源或爭取到足夠強大的盟友之後，因為預期在戰爭中獲勝的可能性增高，而主動挑起對潛在威脅的戰爭。這種情況特別存在於如果原先出於無奈而讓予的利益是國家相當重視的，例如本國領土的一部份或對國家安全極為重要的戰略要地。但反過來說，如果讓予的是不屬於本國領土的地緣政治利益，甚至是他國的地緣政治利益，則雖然這種讓予可能涉及國際權力平衡的改變，願意讓步的強國並不會為了這些不屬於本身核心地緣政治利益的利益物歸原主而主動挑起戰爭，反而是採取嚇阻來遏制新興強國的進一步擴張，具體的個案例如吾人在 1930 年代的歐洲歷史中所見。

根據第四章對內政導向文化的分析，這種戰略文化的主要特徵－內政與外交的連結，似乎是明顯的購買時間邏輯，其在帝國時期的假設是認為中國的資源遠優於潛在敵人，故時間站在中國這邊，可在與資源較為欠缺的游牧帝國長遠的國力競賽中佔得上風甚至最終的勝利。然而，上述國際關係理論中的購買時間概念在中國個案的適用性上有四種明顯的差異：

第一，國際關係理論中的購買時間概念，並沒有提到所妥協的是何種利益，但是本論文則提出國家至少會面對領土、政治、軍事與經濟四種地緣政治利益。若從部分學者舉慕尼黑會議的個案觀之，其所讓予的利益似乎指的是領土。不過在慕尼黑會議的個案中，所讓予的卻是他國的領土，而非參與會議的英、法、義三大歐洲主要強國的本國領土或勢力範圍。然而在中國歷史上，讓予本國領土作為購買時間的行為，可能只出現在戰國時代並為普遍現象，特別是魏、趙、韓——即當時所謂的「三晉」——等位於當時國際體系中央位置、可能同時遭受兩面以上夾攻的國家。³在戰國時代之前與之後，就幾乎再也沒有出現以本國領土購買時間的行為。在「九州一統」地緣政治密碼以及胡漢對立文化觀的支配下，再加上

³ 這並不是說三晉以外的其他國家就沒有這種行為，只是三晉的次數可能多於其他體系中的強國。不過這種說法有一個致命的漏洞，即是其所根據的乃是**戰國策**的記載，然而戰國策本身對事件的記載具有多少可信度，又經常為史家所懷疑，故戰國時代的華夏國際體系中的國家，是否經常展現出購買時間行為，還需要嚴格檢視相關文獻記載才能作進一步的確認。

中國的領土成為游牧帝國覬覦的直接目標，而不是如慕尼黑會議中，納粹德國的直接目標並非其他歐洲強國那樣，使得領土議題在戰略菁英中變得格外敏感，自然很難出現購買時間的行為。而對當代中國而言，領土問題受到其歷史記憶、民族主義與弱國認知的影響，似乎只會比古代更為敏感，故很難再出現以讓予領土來購買時間的行為。

第二，無論是帝國時期的中國或當代的中國，其展現出可能屬於購買時間現象的時期，通常其本身才是新興強國，甚至依照本論文的國家能力劃分等級，可能是一個「潛在的超強」，而非既有的強國。可是既有的假定並沒有提到新興強國是否會基於購買時間的考量而暫時妥協並讓予權力。

第三，雖然中國經常在與潛在威脅妥協，但除了唐太宗擊滅東突厥的個案之外，中國很少能在相當短的時間內動員足夠的資源來與潛在威脅抗衡：西漢從漢高祖敗於白登，至漢武帝即位後開始準備展開與匈奴的戰爭，其間歷時將近六十年(西元前 198 年-西元前 140 年)；北宋自宋太祖建國並實施先南後北戰略指導路線建立一統帝國的，至宋太宗第一次北伐，期間也經歷了將近 19 年的時間(西元 960 年至西元 979 年)，若是當代中國，毛澤東在 1957 年的「東風壓倒西風」演說中，對於爭取時間也認為至少還要再 15 年，而彼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立國 8 年；至於鄧小平以來的改革開放路線，迄今(2012)也已將近 35 年(西元 1978 年至西元 2012 年)。這些時間長度顯示，如果中國確實有意藉由購買時間來透過內政手段來動員與累積預期「足夠」的戰爭資源，皆須花費至少一代人，甚至數十年以上的時間。這樣的時間長度在國際關係研究上顯然不是慕尼黑會議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那種「短期」概念。

第四，根據第四章的分析，儘管中國在這些個案中對潛在威脅妥協，但除了給予異族經濟利益之外，中國很少—除了西漢與北宋分別承認匈奴與遼的平等國際地位等違反天下觀意識型態的行為—會藉由再讓予其他重要的地緣政治利益，特別是領土，來「購買」時間。

第五，雖然中國妥協，但其目的未必是為求爭取時間來動員更多資源或爭取盟友，以便在未來嚇阻戰爭，或在可能於短期內爆發的戰爭中擊敗潛在威脅。事實上根據第四章的分析，西漢與匈奴的和親與和平關係中，嚇阻戰爭雖然是目標之一，但妥協不是為了在日後奪回這些利益，這使得即使中國可能在後來主動發動攻勢戰爭，在此之前卻能與潛在威脅維持長期且互動頻繁，甚至友好的穩定關係，而這是國際關係學者在研究購買時間邏輯時未觸及的現象。

因此，中國對外戰略行為的本質與其說是購買時間邏輯的展現，不如說是一種彈性反應，回顧第四章引用的陸贄對唐朝以前中國歷代外交政策的總結即可發現這種現象：

「蓋以中夏之盛衰異勢，夷狄之強弱異時，事機之利害異情，措置之安危異變...形變不同，胡可專一。夫以中國強盛，夷狄衰微，而能屈膝稱臣，歸心受制，拒之則阻其向化，滅之則類於殺降，安得不存而撫之，即而敘之也。又如中國強

盛，夷狄衰微，而尚棄信忤盟，蔑恩肆毒，諭之不變，責之不懲，安得不取亂推亡，息人固境也。其有遇中國喪亂之弊，當夷狄強盛之時，圖之則彼釁未萌，禦之則我力不足，安得不卑詞降禮，約好通和。啖之以利，以引其懼心，結之以親，以紓其交禍。縱不必信，且無大侵，雖非御戎之善經，蓋時事有不得已也。倘或夷狄之勢，強弱適同，撫之不寧，威之不靖，力足以自保，勢不足以出攻，安得不設險以固軍，訓師以待寇，來則薄伐以遏其深入，去則攘斥而戒於追遠。雖非安邊之令圖，蓋勢力亦有不得已也。故曰...是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⁴

因此，若從戰略文化角度視之，中國近年來的對外態度與手段的轉變，和其歷史上的戰略文化特徵相符，並沒有令人感到意外或困惑之處。這種轉變的原因與古代一樣乃是基於物質能力差距而來。中國在冷戰結束之初，因為力量尚不足以在海洋地區實施攻勢作戰，特別是對美國更是如此，故只好「卑詞降禮、約好通和。啖之以利，以引其懼心」，儘管這些措施亦相當有利於中國經濟之發展。而如今，中國不僅完全拉開與東南亞國家的力量差距，也縮短與美國、日本的力量差距，但周邊國家目前還不願意接納中國對結構的改變，與中國有領土爭端的國家更不願接受中國的領土聲索，因此拉攏美國、日本等強國介入；而中國戰略菁英自認為其領土聲索完全符合國際法，周邊國家的聲索不僅不符國際法，也是對中國歷史上傳統利益範圍的侵犯，故中國改為較強硬的對外政策，也符合陸贄上文的總結經驗。

若再考量到中國歷史上更極端的個案，也就能理解到儘管目前的中國大幅融入世界體系與國際多邊建制之中，但卻不能因此肯定中國就變成一個維持現狀的國家，不會企求改變既有的國際秩序安排。西漢與匈奴的和親及貿易，在漢武帝初年曾經達到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的程度，⁵北宋與遼在澶淵之盟後的親善程度，也達到雙方皇室以兄弟相稱的情況，而且貿易往來極頻繁。⁶但儘管有這麼密切的經濟、政治互動，仍然無法阻止西漢與北宋亟欲收復失土，乃至建立符合其天下觀的東亞地緣政治體系秩序的地緣政治密碼目標。這種先追求周邊國際環境與體系秩序穩定，但在力量增強之後轉為為了本身的地緣政治密碼目標，而不惜主動破壞原先穩定的周邊國際環境甚至體系秩序的行為，不僅出現在古代中國，當代中國從文化大革命之後到目前中國於國際上展現出較以往更強硬的舉動，似乎也有這樣的現象，儘管在程度上離帝國時期那種掀起全面戰爭的個案還相當遙遠，不過似乎可將當代中國在對外行為上的這種轉變，視為中國古典與現代之間的戰略文化傳承之一。

當然，無論在哪個時代，總是會有戰略菁英在戰略轉換期間不願意拋棄過去行之有年的政策，這可能由於其意識型態或不同戰略次文化的差異，或甚至由於政治鬥爭的緣故。前者以古代來說，班固就批評不願放棄和親的董仲舒「和親無

⁴ 見第四章，註釋第 124。

⁵ 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漢書并附編二種*，第 5 版（臺北：鼎文書局，1983 年），頁 3765。

⁶ 陶進生，*宋遼關係史研究*（臺北：聯經，1984 年），頁 22-42。

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欲復守舊文，頗增其約」；⁷後者則例如北宋王安石變法時的黨爭，某些「舊黨」人物反對王安石的變法，不是因為新法不可行，而是部分舊黨人士如韓琦，為了政治立場不同而極力反對王安石變法的緣故。⁸但無論是哪種原因，任何改變都涉及原有關係的劇烈變動，自然需要謹慎以對。古代中國已如此，當代中國所面臨的局勢更加複雜，其謹慎程度自然超越以往，而且中國甚少公佈可信度極高的官方戰略文獻，更令人難以準確判斷是否改變只是國內政治引發的暫時現象，或是有計畫的轉變。但無論如何，改變已經發生，而這種改變是中國古典戰略遺產的現代傳承，則殆無疑義。因此吾人不可將中國融入東亞、亞太乃至全球地緣政治體系的規範，以及日益密切的大國互動，就斷然認為中國必然奉行和平發展的路線。歷史上更密切的互動，都不能阻止中國在強大之後改變行為，遑論目前的中國只是選擇性地參與低敏感、非傳統安全多邊國際建制，不願意真正參與或融入涉及高度敏感議題的傳統安全多邊國際建制，顯然對其周邊國家還是抱有極高度的戒心。

二、地緣政治結構對中國擴張的限制：是否能超越東亞

第二個研究發現是地緣政治結構對中國擴張的限制。除了元朝之外，中國歷史上其他發源於中國本土或滿州地區的帝國，大多數帝國的領土與勢力範圍很少超越目前中國的領土範圍或東北亞本身，遑論支配中國周邊其他地緣政治區域。當然第四章已經指出，這是古代地緣政治結構對華夏農業文明擴張的限制，迫使其只能留在適合其農業文明發展的土地上。但是對於目前不像以前那麼受到氣候限制的全球化工業經濟與貿易型態的體系結構，中國是否能夠超越以往的地理限制，進一步將勢力範圍的擴張超越東亞？

地緣政治結構對以往中國的擴張限制不僅限於地理環境，還包括結構中的行為者分佈情況、與中國的關係，以及其位置對中國國家安全的潛在影響，當然也包括中國本身的地緣政治密碼開放性、在結構中的地位，和中國本身的物質能力是否足以承擔向外擴張的地緣政治密碼任務——亦即中國與周邊國家之間的能力對比——等諸多不同要素的綜合影響。在北宋的個案中，由於遼的強大與西夏的存在，再加上北宋本身由與遼的互動中認識到遼為其主要的生存威脅，這種來自地緣政治結構的限制與北宋本身的戰略認知與地緣政治密碼，故儘管後遼與西夏並未以宋為主要目標，形成緊密的同盟，使得宋很難打破既有的僵局，不僅無法收回燕雲十六州，更遑論重建漢唐時代的東亞朝貢體系，而必須盡可能維持與遼之間的穩定關係。即使宋神宗時期的改革係以遼為最終目標，但鑒於遼的強大，使得北宋在戰略行動上必須相當謹慎，盡可能隱藏其真實目的，並以進攻西夏作為迂迴對付遼的地理間接路線手段，而且雖然是以遼為最終目標，其所希望從擊敗遼得到的利益，依然只有燕雲十六州，並不包括完全擊敗遼並取消北宋在澶淵之盟承認與遼之間的平等國際地位、回復天下觀理想的華夷體系秩序。

⁷ 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漢書并附編二種*，頁 3831。

⁸ 陶進生，*宋遼關係史研究*，頁 163，註釋第 63。

北宋受制於地緣政治結構而產生的戰略困難，在當代中國的個案中亦一覽無遺。建立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地緣戰略領域就是對現有亞太地緣政治結構的明顯改變，同時也涉及與美國、日本、俄羅斯、印度、東協之間的勢力範圍劃分，以及美國對太平洋海上戰略交通線控制的基本地緣政治利益，必然引發複雜的海陸地緣政治競爭，而中國處於東亞的中心，夾在美、日、俄、印、澳等次體系強國勢力範圍之間，其一舉一動都會引發這些大國的相應行動，故其行動必須相當謹慎，尤其在目前中國還沒有完成其內部建設，不具有完全與美國抗衡的物質力量時更需如此。職是之故，目前中國正在做困難的戰略抉擇：在東海、南海與中印邊界的領土爭端中讓步將會使政權的合法性備受質疑而受到威脅，但不讓步又會刺激周邊國家越來越針對中國進行明顯的戰略合作，無法真正保持穩定的週邊環境，以及促進大國合作，真正達成亞太地緣政治均衡。目前看來，中國似乎認為政權穩定的重要性大於在領土爭端中妥協，這種符合中國內政導向戰略文化的行為，將使得中國持續在領土爭端中採取強硬立場，這不僅將導致南海周邊國家與其他東亞濱海國家進一步提昇自己的內平衡作為，還會持續拉攏區域外強國的介入，而美國也將在南海議題中持續採取強硬立場。⁹

然而，雖然目前中國的政策越來越強硬，戰略上的攻勢態勢也越來越明顯，但這並非表示中國的戰略文化類型已經完全轉為類似西漢、唐朝、元朝與清朝那樣，在革命性地緣政治密碼指導下積極改變既有體系結構與秩序的戰略攻勢。目前中國的全球與亞太地緣政治密碼還只是追求體系的多極化，並沒有取代美國成為全球體系主導國的新密碼出現，而且為了避免衝突的爆發，中國目前將領土爭端與其他議題分開，並善用亞太次體系中各國為了發展經濟，與合作應付日益增加的傳統與非傳統安全議題的願望，建構與日本、印度、東南亞國家深化戰略關係，尤其是試圖拉攏印度、俄羅斯等歐亞大陸強國，¹⁰來形成與美國的海洋同盟體系抗衡的大陸體系。中國未來還是會持續利用經濟發展、間接戰略與軟權力來爭取東南線地緣特別是中南半島國家與其站在同一陣線之外，其另一個越來越重視的政策手段是擴大與深化對東亞多邊機制的參與，希望能藉此展現出中國「和平崛起」的形象並消除中國威脅論的影響。從中國的多邊主義中固然可以發現中國希望維持穩定的亞太次體系，畢竟這樣才可能繼續其目前最重視的內部建設，但這種「穩定」的概念雖然有希望提高亞太國家間的互信，並建議成立地區衝突解決機制與包含美、中、俄、日等亞太強國在內的多邊戰略對話，目的卻不是真正朝向均衡的發展，因為沒有提到任何攸關均衡最重要的地緣政治安排，或

⁹ Leszek Buszynski, "The South China Sea: Oil, Maritime Claims, and U.S.-China Strategic Rivalry,"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35, No. 2(Spring 2012), pp. 150-152.

¹⁰ 由於美國在 2012 年 6 月宣布要把太平洋調整為海軍部署重心，並派遣國防部長潘內塔(Leon Panetta)訪問印度，遂使得印度成為中美同時爭奪的重要亞洲大國，中國副總理李克權對訪華的印度外長克里希納(S M Krishna)表示，印中關係將是 21 世紀最重要的雙邊關係。Rajat Pandit and Sachin Parashar, "US, China woo India for control over Asia-Pacific," *The Times of India*, June 7, 2012, http://article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2012-06-07/india/32100282_1_asia-pacific-defence-cooperation-defence-secretary.

如何達成安排的方式建議。¹¹

雖然中國這麼做確實能暫時避免因陸上領土爭端而爆發嚴重的衝突，但始終存在的領土爭端卻使得這些雙邊合作無法真正消弭彼此的互信，而在這些爭端能解決之前，不僅亞太次體系不可能達成地緣政治均衡，中國亦很難超越其領土爭端所在的區域，真正將勢力範圍進一步擴張到東亞以外的地緣政治區域，一如北宋很難越過遼與西夏的影響，構築真正能反制這兩個國家戰略合作的同盟體系。但是在中國所處以及其周邊相鄰的地緣政治區域，仍然還是會因為中國崛起與難以解決的領土爭端，和大國圍繞著區域整合、海陸戰略交通線控制與建設等地緣政治競爭，而感受到東亞處於冷和平現象，以及在冷和平中，政治、安全局勢隨著各種地緣政治衝突而引發的大小危機的明顯起伏。

第二節、研究假設驗證

回顧第一章，本論文提出根據提出「若中國果真奉行和平發展/崛起的對外政策路線，並追求和諧世界作為最終戰略目標，其地緣戰略應該會表現出盡力以與體系中各大國進行多邊談判、對話乃至合作的方式，尋求解決中國與周邊國家乃至主要強國的地緣政治爭端，以達成作為均衡基礎的多邊安排，並與其他主要國家一起在既有或新創的國際建制中合力維持亞太地緣政治體系的均衡。反之，如果中國仍採取重建以其為核心的東亞區域國際體系的戰略目標，其地緣戰略將表現出與以往歷史上其他強國崛起後，追求控制戰略交通線與要地，以及建立受其支配的東亞地緣戰略領域的傳統地緣戰略形式，任何現階段的對話、倡議，與雙邊、多邊建制的參與，都只是本國利益極大化的安全計算戰略思維，甚至是購買時間邏輯的展現，不是真正欲追求體系的均衡，和諧世界、和平發展/崛起只是完全的政治宣傳口號」研究假設。

上述研究假設可分為三部分：

第一個假設(Hypothesis 1, H1)，是中國的地緣戰略是否追求以和平發展的手段，並將和諧世界列為最終戰略目標，從而盡力以協作性權力平衡來安排次體系中的地緣政治安排，並達成亞太地緣政治次體系的均衡。

第二個假設(Hypothesis 2, H2)，是中國的地緣戰略是否與傳統的地緣戰略類型較為接近，利用對戰略交通線與要地的控制來實現本身的標準地緣政治程序—組織以其本身為核心的東亞地緣戰略領域，具有強烈的競爭性權力平衡效應而非協作性權力平衡。

第三個假設(Hypothesis 3, H3)，是中國的戰略行為是否屬於只關注本身利益極大化的安全戰略，或購買時間邏輯，不是真心要促成亞太次體系的均衡，和諧

¹¹ 學者之間類似的倡議可見劉江永、閻學通，「中國崛起的安全合作戰略」，閻學通、孫學峰等著，*中國崛起及其戰略*(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166-182。

世界、和平發展/崛起只是宣傳口號。

針對前兩個假設(H1 與 H2)，根據第七章第一節的研究，目前的亞太地緣政治次體系自冷戰後起便不存在均衡。而本論文第四章與第五章的研究指出，中國的戰略文化還是具有強烈的強現實政治本質，並隨著新中國中心主義世界觀的形成、中國本身國力的提升，而加強其大戰略的攻勢性質。這些現象表現在第六章對中國地緣戰略的分析，中國的大戰略性質與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的態勢逐漸為了周邊密碼所追求的領土統一目標，而展現出明顯的攻勢，並且希望能夠控制東亞的海上戰略交通線與主導東亞區域整合，來形成以中國為核心的東亞地緣戰略領域，並驅逐美國在東亞的勢力與影響力，使亞太地緣政治次體系發展為兩極結構。而第七章的研究則顯示，中國的這些地緣戰略作為都進一步刺激亞太地緣政治次體系中的競爭性權力平衡思維與作為，其在歐亞大陸北線地緣中與俄羅斯和中亞國家的協作性權力平衡運作根本沒有真正轉移到其更重視的西線與東南線地緣，中國在這兩線地緣中有限的協作性權力平衡運作也不足以在更強烈的競爭性權力平衡運作中進一步朝向均衡發展。

因此，中國崛起的地緣戰略，其所展現的行為模式仍然較為接近追求戰略交通線與要地控制的傳統類型，雖然因為中國本身的不結盟態度、貿易全球化與區域經濟整合的發展、時代秩序原則以及權力平衡概念轉變等單元與體系層級因素變化的影響，使得中國的地緣戰略行為與以往單純追求對地緣政治目標的排他性控制權、聯盟政治與硬權力平衡的戰略行為有相當大的差異，但並沒有脫離這種對抗性的本質，而且其與美國、日本之間的地緣政治與戰略競爭，實際上可說是一種新的海陸二元對抗。不過從第五章第二節對中國的地緣政治密碼分析，以及第六章對中國的地緣政治行為探討，和本章上一節的研究發現，可知中國雖然在東南線地緣採取鬥爭大於爭取的操作方式，而且近年來在領土爭端中採取較以往更為強硬的手段與政策態度，但整體上仍極力追求穩定周邊地緣政治環境，不希望因此危及其內部經濟發展與國家建設，以及與這兩個目標緊密相連的，中共政權本身的存續。

故中國對於所謂的「和平發展」確實有其堅持，但吾人不能因這種堅持而產生中國將一直維持這種基本戰略路線，不會有所更動的認知。第四章已經指出，與國防安全密切相關的領土控制一直是帝國時代以來中國戰略菁英最關切的戰略目標，為此可以發動長期且大規模的作戰甚至戰略攻勢的戰爭，來確保這方面的地緣政治利益能為帝國的安全，甚至天下觀裡的華夷秩序理想服務。而從第五章第二節對中國的核心利益與周邊地緣政治密碼可發現，國家統一、領土主權的完整，以及與此相關的國家安全議題，既然已被中共領導人利用**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此一官方文獻，正式列入中國的核心利益之中，而且其在六項核心利益具體目標中的排序又位在前四位，那麼在新中國中心主義的世界觀與內政導向戰略文化的影響下，還是很有可能會為了這些核心利益目標而被捲入武裝衝突之中，無論是主動或被動。

雖然中國提出和諧世界的最終戰略目標，但從中國的地緣戰略操作來看，其真正的目標還是在藉由控制東亞周邊與內部的海陸戰略交通線與要地，來組織以其為核心的東亞地緣戰略領域，以完成其標準地緣政治程序，還是很難脫離傳統的地緣戰略形勢。儘管中國也持續擴大參與亞太次體系內的多邊國際建制，但中國的地緣戰略操作並沒有積極促進次體系中的各主要大國與領土爭端國達成各方均可接受的多邊地緣政治安排，並將這些多邊建制正式轉變為解決次體系內安全問題的主要機制。這使得中國的地緣戰略所激起的效用大部分都仍是傳統的競爭性權力平衡，而不是達成均衡必要的協作性權力平衡。如此一來，中國的地緣戰略操作不僅仍然達成均衡甚為遙遠，更與其提出的高度理想化「和諧世界」，有相當大的距離。而且雖然中國極力希望保持周邊國際環境的穩定，但是由於其仍追求利用傳統的軍事控制與強制性手段來追求對戰略交通線與要地的控制，同時為了組織東亞地緣戰略領域的戰略目標、追求領土主權完整的核心利益目標，與本身防衛的軍事需要，又使其地緣戰略操作與許多周邊國家，以及美國之間，互相產生激烈的地緣政治利益衝突，而中國在領土爭端中日益明顯的獨斷行為，配合其國力的顯著提升，確實也加深了中國與周邊國家爆發衝突的可能性。

而針對第三個假設(H3)，即中國的戰略行為是否屬於安全計算戰略，或甚至購買時間邏輯的假設，依照本章第一節第一小節的研究發現，似乎並沒有得到完全的驗證。中國的戰略行為基本上不屬於購買時間邏輯，首先，從戰略文化的面向而言，雖然內政導向戰略文化中強調內政與外交連結的特徵雖然含有部分購買時間邏輯的意涵，但並沒有以重要安全利益的妥協來購買時間，換取內部快速動員資源的經驗累積。其次，就此一邏輯在國際關係理論的既有概念而言，中國現有的國際地位反而是新興強國而非力量不足的既有強國，與理論中係既有強國力量不足以使用武力或其他強制手段遏制新興強國的擴張的假設不同。最後，國際關係理論中的概念認為這是短暫的退讓以購買時間，好動員更多資源在未來嚇阻其，然而中國無論是在帝國時代或當代，一方面很少願意就重大安全利益妥協以「購買」時間動員資源，另一方面是其動員資源所需的時間都長達十數年，甚至數十年以上的時間，很難認為中國妥協的目的是為了「購買」這麼長的時間來動員資源。

不過這個假設(H3)還有另一個問題有待檢驗，即中國的地緣戰略行為是否屬於史旺與泰利斯所謂的安全計算戰略？回顧第二章對兩人概念的介紹，這是一種歸納東亞地緣政治結構的歷史，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改革開放之後的行為的戰略模式，認為中國的民族主義仍希望控制周邊的戰略邊緣地區，但迫於實力的差距，中國逐漸形成一種混和強大國家對周邊戰略區域控制欲望，和弱國以領土防禦導向戰略與外交為主的「弱一強」國家安全戰略途徑，以及強調市場領導、外銷導向的經濟成長、與所有國家維持友好關係，克制使用武力但追求軍事現代化，和盡可能在國際上取得不對稱利得的「安全計算戰略」。文獻回顧中曾指出，史旺與泰利斯並沒有詳細分析這種基於地緣政治結構所歸納的戰略形式是否也

存在中國的帝國時期，並成為一種遺產，或者屬於當代中國的創新。

然而，根據第四章的分析，此種戰略形式似乎不能視為中國的戰略遺產。雖然內政導向戰略文化中的內政與外交連結、強調義戰與人民支持的重要性、重視對內勝於對外，以及彈性外交政策等四項特徵，確實帶有安全計算的內涵，但每個國家的對外戰略其實都會經過計算，而帝國時期的中國由於大多面對生產力不及中國的游牧帝國，中國其實是以具有高度發展的文明與生產力的帝國，面對文明與生產力程度較為低落的威脅來源，與當代中國的情況相當不同，故帝國時期的戰略形式即便具備安全計算的內涵，但也並非史旺與泰利斯所指的內涵類型，故無法據此認為帝國時期就具備安全計算戰略，或者安全計算戰略是中國的一種戰略遺產，而應將此視為當代中國在地緣政治物質結構，以及本身地緣政治密碼與自我認知等兩種物質與理念變數的綜合影響下，為了盡可能極大化本身的相對利益所產生的「創新」戰略形式。

史旺與泰利斯乃是綜合以往的地緣政治結構的物質變數，以及中國的自我認知的理念變數，二者影響下的戰略行為去歸納出此種戰略形式，其對這個概念的提出乃是在 2000 年，迄今(2012)已經過 12 年。在這 12 年內，中國的國力與經濟發展又與當初有所不同，在亞太地緣政治結構、中國的地緣政治模式、中國的世界觀與地緣政治密碼等都發生變化的情況下，安全計算戰略的內涵與形式也必然會有所改變。雖然中國在 2000 年以後的戰略行為，大體上仍不脫史旺與泰利斯歸納出來的類型。但根據本論文的分析，其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不僅逐漸朝近海以外地區的發展，而且在周邊領土爭端中的態度與行為也在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的影響下，展現出越來越明顯的獨斷性。由此觀之，似乎中國自鄧小平以來奉行的「安全計算戰略」路線正在緩慢發生改變，但在目前仍只是開端，是否會有進一步發展，或展現出什麼樣的新特徵，則有待 2012 年中共第十八屆全國代表大會(十八大)之後，新一屆領導人鞏固其政治領導地位後是否提出新的路線指導內涵與戰略方向而定。

因此根據上文對本論文在第一章提出的研究假設之檢驗，整體來說，本論文的問題意識大致上並沒有錯誤，中國的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確實是在其國力逐漸提升後，於 2000 年之後逐漸具備以往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個案中的各種特徵—除了大規模海軍擴張—而其性質、重心與其操作手段和方向，也使當代中國與其古代帝國一樣，在力量強大時逐漸展現出利用武力或其他強制手段來達成戰略目標的現象。至於中國大規模建設泛亞鐵路網，雖然有很深重的國家經濟建設考量，但若考慮到中國目前也逐步增強其海上縱深防禦施加對美軍在東亞的戰略存在與介入東亞武裝衝突的困難度，以及追求控制東亞海上戰略交通線的能力發展，便顯示出中國的戰略作為似乎是希望盡可能削弱美國在東亞的勢力與影響力的作為，並試圖建立以其為核心的東亞地緣戰略領域，而這也的確不斷升高中國與周邊國家，甚至與美國爆發衝突的機率，無助於促進亞太地緣政治次體系的均衡，遑論建構一個「和諧世界」，後者終究只是中國在胡錦濤政權時代提出的一

項對外政治宣傳口號，並非中國真正追求的戰略目標。

第三節、研究檢討與未來發展方向

在第一章第五節的研究限制中曾提出本論文兩個主要研究限制在於研究文獻類型的限制，以及研究理論範圍的限制，前者主要針對如何取得能夠完全中國領導與戰略菁英的地緣政治密碼的權威文獻的困難，後者則在於簡化地緣戰略研究的理論，無法運用批判性地緣政治學中的世界體系理論，以及目前的經濟全球化作為主要的研究理論與途徑。

一、對研究限制的檢討

對於第一章研究限制所提出的第一個研究限制，本論文在第五章盡力以中國官方的權威文獻資料作為領導菁英的地緣政治密碼解構依據，若有不足之處則輔以其他著名戰略菁英的研究內容。但無論是採用哪一種文獻，在解構過程中都脫離不了「臆測」的困境，這不僅在於運用這種解構方式的批判性地緣政治學本身就有因為使用書面文本與文件等二手資料，而遭逢「一個人如何知道其所知為何？」與「一個人如何認為其所知」的「地緣政治遙遠感應」困境，¹²也在於所謂的「地緣政治密碼」，原本就是亨利克森(Alan K. Henrikson)所謂的戰略菁英根據地理環境，對其本國外交政策目標的「想像計畫」(image plan)，¹³而根據文本對這種「想像計畫」進行「解構」，其結果仍然很難脫離想像與臆測的性質，蓋很難從文獻中理解作者真正的想法目標與目的。然而，本論文認為社會科學的質性研究，尤其是戰略研究、外交政策分析等，很難擺脫依賴文本分析所造成的「遙遠感應」困境，這不僅僅是批判性地緣政治學與地緣政治密碼研究途徑遇到的問題而已。吾人所能做的，僅能設法多採用權威性、正式文本，與第一手資料來作為可靠的分析基礎，以及嚴謹的文獻比對、分析與詮釋工作，來盡可能降低研究成果中「遙遠感應」的程度。

關於研究理論範圍的第二個限制，涉及理論與研究途徑選擇的問題。在第一章第五節，本論文僅提到排除世界體系理論與全球化對中國地緣戰略影響的理論運用。然而，本論文同時也提到麥金德指出，經濟是與地理同樣重要的國家對外行為影響變數，因此即使不採用世界體系理論，也應該增加經濟變數的重要性分析，特別是強化與在 2008 年全球金融海嘯之後，經濟成長仍相當亮眼的東亞地區的聯繫，便成為美國「重返亞洲」的一個重要動機，¹⁴再度印證麥金德的正確

¹² 莫大華，「批判性地緣政治戰略之研究」，*問題與研究*，第 47 卷，第 2 期(2008 年 6 月)，頁 71。

¹³ Peter J. Taylor, *Political Geography: World-economy, nation-state and locality* (Essex, England: Longman, Third Edition, 1993), p. 91. 關於亨利克森對「想像計畫」的解釋，請見 Alan K. Henrikson, "The Geographical 'Mental Map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Maker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 No. 4(1980), pp. 512-517.

¹⁴ 多位學者已從不同類型的文獻中指出經濟驅動力的影響，如 Ralf A. Cossa and Brad Glossman, "Return to Asia: It's Not (All) About China," *PactNet*, No. 7(January 30, 2012),

性。何況相對於較敏感的安全戰略研究，中國在經濟方面的文獻公開就較為開放。因此似可結合經濟因素與中國崛起和國際安全之間的關連性以對本論文的主題進行分析，例如將地緣經濟學或批判性地緣政治學中的世界體系理論等著重於探討經濟與地緣政治因素相互關係，分析經濟因素如何影響中國的地緣戰略。以及與亞太安全之間的關係。然而在權力、地理因素之間再加入經濟作為第三個研究變數，雖然能更進一步完善研究內容，但也必須構思一個更為龐大的研究架構來妥善處理三個原本都能作為獨立變數的變數之間的相互關係與在新架構中的變數地位，是一個比本論文既有的研究架構更為複雜與艱難的過程。

除了上述針對第一章第五節提出的先天研究限制的檢討之外，在本論文的整個研究過程中，雖然盡可能採取多重途徑來研究中國的地緣戰略與亞太安全的關係，並檢驗其是否全力利用和平發展手段追求達成所謂的和諧世界目標，但是對於如此龐大的議題，對於許多地方的分析便不得不有所省略，最主要的部分便是本論文的分析取向驗證中國地緣戰略與達成次體系地緣政治均衡之間的關係，來檢驗和諧世界是否為中國戰略目標的需要，只能集中於分析中國地緣戰略行為引發的國際反應究竟屬於競爭性或協作性權力平衡，而忽略了對個別國家更細微的安全政策層面向的討論，包括中國周邊國家對中國地緣戰略的政策反應、美國是否對中國形成新的圍堵、亞太地緣政治次體系中其他主要強國與中國在東亞的傳統與非傳統安全競爭政策的分析，以及對東南亞國家的軟平衡或間接平衡等諸多層面的政策分析。

雖然比起從理論層面分析政策的權力平衡效用，政策分析由於涉及對他國的在相同地緣政治結構中的地緣政治密碼與戰略行為的分析，能更深入詳細研究次體系中其他國家對中國地緣戰略操作的想法、為何做出這樣的反應的理由，與這些反應代表的戰略意涵。故如要理解中國是否真的欲組織以其為核心的東亞地緣戰略領域，除了研究中國的地緣戰略之外，分析中國周邊國家對此種戰略的態度以及政策反應，更能協助研究者進一步瞭解這些國家的政策走向是否支持或反對中國的地緣戰略目標，或者以其他方式來應對中國的地緣戰略。換言之，政策分析才能真正協助研究者瞭解次體系其他國家對中國的地緣戰略的反饋究竟為何。然而，由於本論文的主旨是為了檢驗中國的地緣戰略行為是否能顯示其果真追求和諧世界與堅持和平發展，亞太次體系的安全雖然是本論文的研究重點之一，但只是對中國的政策產出項(地緣戰略)與次體系的反饋進行分析，而且研究重心在於這些國家究竟是以競爭性或協作性權力平衡來應對中國的地緣戰略，以便於檢驗研究假設與問題意識。故本論文無法在論文中針對亞太次體系中其他國家針對中國的地緣戰略所提出的政策，詳加進行分析與討論，此一重要領域的研究與本論文的研究缺憾只能留待作者日後於其他研究計畫中進行進一步的相關研究。

不過對於研究內容的省略，也包括研究途徑選擇與發展的檢討，如戰略文化

研究途徑在分析對象的檢討，以及新古典地緣政治學關於地緣政治模型建構的檢討。最後，本節還將探討本論文的研究是否能與其他國際關係研究理論互相結合，以進一步提升本論文的理論研究價值。

二、戰略文化研究途徑：組織文化研究的重要性

本論文雖然提出了在整體國家戰略文化之下的戰略次文化與組織文化，但鑑於研究主旨而並沒有對此進行分析，況且何種戰略次文化與組織文化居於主導地位，有時涉及國家內部的政治發展與決策過程的鬥爭因素，在本論文的地緣戰略過程中被視為「黑盒子」而不予討論，本論文僅提到不同的戰略次文化與組織文化居於主導地位時，可能會改變國家的大戰略行為。然而，「黑盒子」有時才是判別國家戰略行為本質與其真正意圖的最重要關鍵。一方面，不同的政府組織有不同的利益與組織文化，有時某些看似屬於某種大戰略或地緣戰略行為的決策，可能不是刻意的決策，而純粹是特定組織文化為其利益而爭取到的決策。另一方面，這也牽涉到地緣政治密碼的判讀上，會產生「到底應判讀哪一類戰略菁英的地緣政治密碼與世界觀」的差異。而不同組織文化下的戰略菁英，其世界觀與地緣政治密碼可能差異甚大，對不同戰略菁英的地緣政治密碼解構上的差異，很可能對研究結果產生非常大的影響。

此種現象對當前的中國地緣戰略或大戰略研究而言，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變數。例如第六章第二節在分析中國的新跨國交通線建設，雖然將其視為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的特徵之一，但其實這些交通線建設未必就是有特殊地緣政治目的與意圖的戰略作為，第六章在敘述油氣管線建設時也引用查道炯的意見提到這個觀點本論文作者在 2011 年 11 月於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參與查道炯的演講時，他便提到目前中國與中亞、東南亞各國間的跨國油氣管建設，經常是中國的國營石油公司與油氣管線經過的西部各省市地方政府之間聯合起來「遊說」中央政府的結果，而不一定是中國中央政府刻意的地緣戰略行為。如果石油公司與地方政府能影響到油氣管線的建設政策，那麼解放軍是否也能對某些對外政策的決策擁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力？中國共產黨、中國政府涉外部門、解放軍、海洋局等，是否也為其各自的組織利益與文化，而競相對中國的地緣戰略與大戰略決策施加自己的影響？如果這些情況均屬事實，那麼辨別哪些決策單純只是中國內部組織為了本身的利益而爭取到的，還是哪些決策確實為中國中央政府最為關注，是刻意的地緣戰略或大戰略決策，對於判別中國的戰略意圖與預測中國的戰略行為，就具有相當高的重要性。但是本論文的戰略文化研究途徑並未觸及中國戰略菁英之間的組織文化，遂可能在判別中國的真實戰略意圖上出現誤差。

職是之故，從組織文化的角度，結合地緣政治密碼研究，以更進一步判別中國的地緣戰略的意圖、重心與發展方向，以及其對外戰略行為的真實性直，或可成為本論文研究主題，在未來最重要的進一步發展方向。

三、權力與地理變數結合的模型建構之改善

雖然本論文為了解決現實主義典範在加入地理變數後，如何處理地理與權力兩變數之間所產生的位階問題，以及科恩的地緣政治結構事實上分離了權力與地理，卻又希望藉由這種比較偏向政治地理學的結構模型來研究地緣政治的混淆情況，而藉由格利吉爾的交通線控制概念—事實上這也出現在科恩的地緣戰略領域概念中—作為結合權力與地理的連結，以及劃分地緣政治結構形式與國家等級的主要變數，但這樣的模型建構事實上有一個明顯的缺陷—從歷史的發展角度來看，雖然戰略交通線與要地的爭奪，通常的確是戰爭與地緣政治競爭的重要目標，但這是否為國家在戰略上的最終目標？還是僅為達成戰略目標的手段之一？如果答案偏向後者，那麼本論文將戰略交通線與要地的控制，作為地緣政治結構模型自變數，就會遭受變數設定是否適當的質疑。

然而，如果考量到地緣戰略的本質是利用對戰略要地的控制來達成國家的生存與繁榮等不同層次的戰略目標，而控制能力又與一個國家的整體國力—特別是現實主義最重視的軍事權力—密切相關，那麼本論文在地緣政治結構模型的變數設定上，雖然可能面臨是否符合歷史發展邏輯的質疑，但在進一步提出更適當的地理與權力相結合變數之前，確實還是只能沿用這個設定。

四、與國際關係聯盟理論的結合

外交政策研究學者艾利森(Graham T. Allison)與傑利科夫(Philip D. Zelikow)曾指出，對外交政策最佳的理解方式，就是運用相互競爭的多重研究途徑來進行分析。¹⁵由於本論文除了屬於戰略研究之外，也屬於國際關係研究的一部份，故對於運用其他研究途徑與方法來進一步研究本論文的問題意識，最重要的部分還在於能否與國際關係領域結合，特別是與安全、戰略研究直接相關，而且可能接納地理變數於其研究架構中的聯盟理論，如第一章在研究動機中提到的攻勢現實主義，以及沃爾特的威脅平衡理論等。蓋本論文第七章第四節對冷和平的分析，即引用了聯盟理論的研究。然而鑒於本論文的研究主旨，在第七章並沒有進一步探討聯盟理論與本論文主旨的相關性，遑論兩者的結合研究。

聯盟理論是國際關係理論的重要研究領域，其在這方面已有相當豐富的研究，本論文在第一章的研究動機中亦提到沃爾特的「威脅平衡論」，是首度重新引入地理變數於聯盟理論研究的中型理論。然而，沃爾特之後的聯盟理論對於地理變數的討論並不多見，儘管他們對於討論國家的平衡與扈從行為有更進一步的討論，例如施維勒將國家依其是否具有改變國際秩序線狀的能力與意願，分為四種不同的類型，進而研究這四種不同類型的國家如何操作體系中的權力平衡，甚至利用扈從強國的行為來牟取本身的利益。¹⁶第七章第四節的研究顯示，亞太次體系各強國與東南亞國家面對中國崛起與其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的挑戰，所採取的反應行動看起來似乎是攻勢現實主義的離岸平衡與推卸責任，沃爾特的威脅平

¹⁵ Graham T. Allison, Philip D. Zelikow, *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New York: Longman, 1999), p. 389.

¹⁶ Randall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Summer 1994), pp. 88-104.

衡，以及施維勒的利益平衡等三種聯盟理論的綜合。但進一步仔細研究之後又可發現，這些行動對於上述三種理論似乎只有部分符合，甚至與基本邏輯有所矛盾：

就**攻勢現實主義**而言，如第一章在研究動機中所言，如果巨大水體確實具有戰略上的阻隔效用，而共同邊界促進(競爭性)平衡行為，那麼美國與日本既然與中國隔著廣大的海洋，為何會感受到來自中國的地緣戰略壓力，而必須以競爭性權力平衡回應？中國又為何要盡可能擴張海上區域縱深防禦的範圍，來消除美國對其東部精華區的潛在軍事威脅？而與中國直接相鄰，且中俄邊界為世界上最長的陸地邊界的俄羅斯，又為何要與中國結成戰略夥伴關係中最高等級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同樣與中國為陸地鄰國的印度、越南等國，為何又要採取利益平衡與推卸責任，而非攻勢現實主義的制衡邏輯？

就**威脅平衡理論**而言，如格利吉爾所批評的，沃爾特沒有注意到距離本身的地理屬性，也就是說何謂距離的「遠近」？是否具有共同邊界即是「近」，而隔著海洋則是「遠」？還是說是測量首都之間的直線距離？因此印度與日本，究竟何者距離中國較近？如果是擁有共同邊界的印度，那麼雖然距離遠近似乎可以解釋為何印度比日本更強調內平衡來因應中國崛起，但印度卻又與中國建立戰略夥伴關係，而直接與廣西在陸上相鄰的越南，甚至與中國建立比印度更密切的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而日本與中國之間完全沒有戰略夥伴關係存在。此外，雖然距離可以解釋因為日本比澳洲距離更遠，故比澳洲更加憂慮中國的海上擴張，但為何距離中國更近的南韓與中華民國，沒有像日本那樣積極採取外平衡措施來因應？由其中華民國乃是次體系中，唯一在國家生存層面上直接面對中國軍事力量的國家。此外，沃爾特也忽略了有時國家對距離的考量，不僅限於威脅與本土之間，威脅與重要的資源來源之間的距離也是一個重要考量，¹⁷甚至威脅與勢力範圍的距離也具有相當的影響力。

最後，就**利益平衡**理論而言，施維勒對扈從與平衡行為的探討，對於地理變數的影響並沒有太多討論，因此無從得知其四種國家類型的設定中，較為弱小的國家對於扈從、平衡行為的選擇，例如東南亞國家的兩屬行為，是否會受到地理變數的影響？而地理變數是否也同樣會影響維持現狀的超強與欲改變現狀的新興強國之間爆發直接衝突的可能性，例如是否因為英國與德國、法國之間同處於相對狹小的中歐以西地區，故英國對該兩國無論在大陸或海上的擴張都甚為敏感，而習近平在 2012 年 2 月訪問美國時稱「太平洋有足夠的空間可同時容納中美兩國」，希拉蕊也在 2012 年 8 月 31 日參加「太平洋島國論壇」(Pacific Island Forum)時也提出類似的觀點，¹⁸是否表示地理空間的差異，對於這兩種國家的行為可能與單純行為主義學派的觀點，會產生其他影響？

¹⁷ 關於格利吉爾對沃爾特的兩個批評，見 Jakub J. Grygiel, *Great Powers and Geographical Change* (Baltimore, Maryland: The John Hopkins Press, 2006), pp. 17-18.

¹⁸ "Commemorating U.S. Peace and Security Partnerships in the Pacific," Department of State, August 31, 2012,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2/08/197262.htm>.

上述聯盟理論的缺憾，首先涉及聯盟的本質究竟為何的基本議題，其次則是地緣政治究竟對聯盟的本質與形成，能夠發揮什麼樣的影響力。過去的聯盟理論所關注的是第一個基本議題，對於第二個議題並沒有很好的解決。雖然本論文的地緣政治結構模型建構目的即是為了解決聯盟理論在這方面的不足，但鑒於本論文的研究主旨，並未進一步利用個案分析來嘗試解決這個第二部分議題。固然第七章第四節運用了聯盟理論進行初步探討，但仍只限於既有理論的運用，而非理論的創新發展與檢驗，後者需要將聯盟理論與本論文的地緣政治密碼與戰略文化研究途徑結合，來檢驗其地緣戰略與周邊國家的反應等行為，是否又符合上述三種現實主義聯盟理論的假設。而這一部分的途徑運用，特別對於第七章第四節的冷和平研究最具價值，可進一步對本論文既有的研究成果－強國間冷和平的運用，以及東南亞國家的「兩屬」行為，提供進一步的國際關係理論化解釋，不僅能為本論文的研究主旨提供另一種與國際關係理論接軌的新研究途徑，亦可與既有的國際關係理論解釋進行互補。

綜合言之，對於研究取向的改變，以及上述各種研究途徑的變化與新採用，是本論文作者日後進行與本論文研究主旨相關的其他研究時，為了深入擴展研究成果而努力的目標。

參考文獻

中文

專書

- (元)脫脫等撰，**宋史**(臺北：洪氏出版社，1975年)。
- (宋)王欽若、楊億等奉敕撰，**冊府元龜**(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7年)。
- (宋)司馬光撰，鄧廣明、張希清點校，**涑水記聞**(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
- (宋)李昉等奉敕編，**太平御覽**，臺二版(臺北：商務印書館，1974年)。
- (宋)李燾撰，**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 (宋)歐陽修撰，**新五代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
- (明)王士性撰，**廣志譯**(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 (唐)尹知章注，(清)戴望校正，**管子校正**，**商君書解詁**(臺北：世界書局，1962年)。
- (唐)李吉甫撰，**元和郡縣圖誌**(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
- (唐)杜佑撰，王文錦等點校，**通典二百卷**(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
- (唐)陸贄撰，**陸宣公奏議**，台二版(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2年)。
- (唐)魏徵等撰，**隋書**(臺北：鼎文書局，1975年)。
- (梁)蕭子顯撰，**南齊書**(臺北：鼎文書局，1975年)。
- (清)仁宗敕撰，**欽定全唐文**(臺北：匯文出版社，1961年)。
- (清)紀昀編纂，**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館，1979年)。
- (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
- (清)傅恆等奉敕撰，**平定準噶爾方略**(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 (清)魏源撰，**聖武記**(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
- (清)顧祖禹撰，賀次君、施和金點校，**讀史方輿紀要**(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
- 丁力，**地緣大戰略：中國的地緣政治環境及其戰略選擇**(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
- 丁樹範，**中共軍事思想的發展**(臺北：唐山，1996年)。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勘，**明太祖實錄**，第二版(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8年)，第三冊。
- 中央軍委辦公廳，**鄧小平關於新時期軍隊建設論述選編**(北京：八一出版社，1993年)。
- 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編輯，**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年)，第四卷。
- 中共中央文獻室，**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北京：中共中央文獻室，1987年)，第

13 冊。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與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鄧小平軍事文集**(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與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 年)，第三卷。
- 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鄧小平文選(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年)。
- 亓成章、何中順，**時代特徵與中國對外政策**(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8 年)。
- 中國軍事百科全書編審委員會編，**中國軍事百科全書(軍事學術 II)**(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7 年)。
-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著，**毛澤東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 年)。
- 中華歐亞基金會編著，**地緣政治與中共外交戰略**(台北：大屯出版社，2006 年)。
- 方高峰，**六朝政權與長江中游農業經濟發展**(天津市：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 年)。
- 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關係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 年)。
- 王世貞，**弇州四部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
- 王生榮主編，**金黃與蔚藍的支點：中國地緣戰略論**(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2001 年)。
- 王吉林，**唐代南詔與李唐關係之研究**(臺北縣：黎明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2 年)。
- 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擇：面對漢帝國的北亞游牧部族**(台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 年)。
- 王玲，**漢魏六朝荊州地區的經濟與社會變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 年)。
- 王逸舟，**當代國際政治析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年)。
- 王陽明，**陽明先生手批武經七書**(台北：國防大學戰爭學院，翻印，三版，1988 年)。
- 王雲璐注譯，**新譯司馬法**(臺北：三民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96 年)。
- 王蜀寧，**海戰與戰略**(桃園：國防大學，2004 年)。
- 世界書局編輯部主編，**新校後漢書注**，第 3 版(臺北：世界書局，1972 年)。
- 史子正，**太平寰宇記**(臺北：文海出版社，1963 年)。
- 史念海，**唐代歷史地理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年)。
- 史念海著，**河山集·七集**(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 年)。
- 札奇斯欽，**北亞游牧民族與中原農業民族間的和平與戰爭**(臺北：正中書局，1972 年)。
- 朱聽昌主編，**中國周邊安全環境與安全戰略**(北京：時事出版社，2002 年)。
- 吳相湘主編，**明朝開國文獻**(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6 年)。
- 吳萬寶，**歐洲安全暨合作組織：導論與基本文件**(臺北：韋伯文化，2003 年)。
- 呂靜，**春秋時期盟誓研究：神靈崇拜下的社會秩序再構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
- 宋杰，**中國古代戰爭的地理樞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年)。

李少軍主編，**國際戰略報告：理論體系、現實挑戰與中國的選擇**（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第一版，2005年）。

杜正勝，**古代社會與國家**（臺北市：允晨文化出版社，1992年）。

杜正勝，**編戶齊民：傳統政治社會結構之構成**（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年）。

李京文，**走向 21 世紀的中國區域經濟**（桂林：廣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

李宗侗註譯，**春秋左傳今註今譯**，校訂版（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3年）。

李明偉，**隋唐絲綢之路—中世紀的中國西北社會與文明**（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4年）。

李峰，**西周的滅亡：中國早期國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李華瑞，**宋夏關係史**（石家庄市：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

李義虎，**地緣政治學：二分論及其超越—兼論地緣整合中的中國選擇**（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

李際均，**軍事戰略思維**（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增訂版，1998）。

沈志華主編，**中蘇關係史綱—1917-1991年中蘇關係若干問題再探討**，增訂版（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

沈偉烈、陸俊元主編，**中國國家安全地理**（北京：時事出版社，2001年）。

沈默，**地緣政治**（台北：中央圖書供應社，1967年）。

辛達謨譯，Martin Vogt 編，**德國史**（臺北：國立編譯館，2000年）。

周恩來，**周恩來選集**（北京：新華，1981年），下冊。

屈萬里，**詩經釋義**（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2年）。

易中天注譯，**新譯國語讀本**（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

林幹，**中國古代北方民族通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

林碧炤，**國際政治與外交政策**（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第二版，1997年）。

武曉迪，**中國地緣政治的轉型**（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6年）。

俞可平編，**中國學者論全球化與自主**（重慶市：重慶出版社，2008年）。

姚大中，**古代北西中國**（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81年）。

姚延進、劉繼賢主編，**鄧小平新時期軍事理論研究**（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4年）。

姚延進、劉繼賢主編，**鄧小平新時期軍事理論研究**，第一版（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4年）。

姜華宣張蔚萍、尚珪主編，**中國共產黨重要會議紀事(1921-2011)**（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

洪丁福，**德國的分裂與統一：從俾斯麥到柯爾**（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4年）。

胡鞍鋼主編，**地區與發展：西部開發新戰略**（北京：中國計畫出版社，2001年）。

倪樂雄，**尋找敵人：戰爭文化與國際軍事問題透視**（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03年）。

倪樂雄，**尋找敵人：戰爭文化與國際軍事問題透視**(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03年)。

宮玉振，**中國戰略文化解析**(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2年)。

孫健，**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1949-1990年代初)**(北京：中國人民大學，1992年)。

席隆飛、楊熺、唐錫仁主編，**中國科學技術史**(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年)，交通卷。

席隆飛、楊熺、唐錫仁主編，**中國科學技術史**(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年)，交通卷。

徐瑜編撰，**孫子兵法：不朽的戰爭藝術**(台北市：時報文化，1994年)。

烏云畢力格、成德崇撰，伊克昭盟蒙古民族通史編委會編，**蒙古民族通史**(內蒙古：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1年)。

馬持盈，**史記今註**，第3版(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年)。

張文木，**世界地緣政治中的中國國家安全利益分析**(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發行，新華經銷，2004年)。

張文木，**論中國海權**，第二版(北京：海洋出版社，2010年)。

張世平，**中國海權**(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09年)。

張序三主編，**海軍大辭典**(上海：上海辭典出版社，1993年)。

張國剛，**唐代藩鎮研究**，增訂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

張榮芳、黃淼章，**南越國史**，第2版(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8年)。

章世平，**中國海權**(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1998年)。

許倬雲，**西周史**(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4年)。

許輝，蔣福亞主編，**六朝經濟史**(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

雪克注譯，**新譯公羊傳**(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

陸俊元，**地緣政治的本質與規律**(北京：時事出版社，2005年)。

陶晉生，**宋遼關係史研究**(臺北：聯經，1984年)。

郭偉濤，**人民戰爭論**(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

陳國權、王誠宏、張忠江、鄒洪學等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建設簡史(1949-1994)**(北京：中國物資出版社，1995年)。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臺二版(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4年)。

傅紹傑註譯，**吳子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

彭光謙，**軍事戰略簡論**(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

彭光謙、姚有志主編，**戰略學**(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1年)。

景愛，**中國長城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曾瑞龍，**拓邊西北—北宋中後期對夏戰爭研究**(香港，中華書局，2006年)。

曾瑞龍，**經略幽燕(979-987)—宋遼戰爭災難的軍事分析**(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年)。

曾瑞龍，**經略幽燕(979-987)—宋遼戰爭災難的軍事分析**(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年)。

程廣中，**地緣戰略論**(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99年)。

鈕先鍾，**大戰略漫談**(臺北：華欣文化事業中心，1977年)。

鈕先鍾，**西方戰略思想史**(臺北：麥田出版社，1995年)。

鈕先鍾，**孫子三論**(臺北：麥田出版社，二版，2007年)。

鈕先鍾，**現代戰略思潮**(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再版，1989年)。

鈕先鍾，**第一次世界大戰史**(臺北：燕京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7年)。

黃仁宇，**中國大歷史**(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3年)。

黃仁宇，**放寬歷史的視界**，增訂一版(臺北：允晨文化，1999年)。

黃寬重主編，**中國史新論·基層社會分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與聯經出版，2009年)。

楊金森、梁喜新、黃明魯，**中國海洋開發戰略**(武漢，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1990年)。

楊家駱主編，**新校三國志附索引**，第4版(臺北：鼎文書局，1980年)。

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漢書并附編二種**，第5版(臺北：鼎文書局，1983年)。

楊家駱主編，**新校本舊唐書附索引**(臺北：鼎文書局，1976年)。

楊家駱主編，**新校資治通鑑注**，第4版(臺北：世界書局，1972年)。

楊寬，**戰國史**(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年)。

楚樹龍、金威主編，**中國外交戰略和政策**(北京：時事出版社，2008年)。

溫洪隆注譯，**新譯戰國策**(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

葉自成，**中國大戰略：中國成為世界大國的主要問題及戰略選擇**(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

葉自成，**陸權發展與大國興衰：地緣政治環境與中國和平發展的地緣戰略選擇**(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

葉自成，**新中國外交思想：從毛澤東到鄧小平——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外交思想比較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

葉自成主編，**地緣政治與中國外交**(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年)。

葛劍雄，**統一與分裂——中國歷史的啟示**(北京：三聯書店，1994年)。

董鎖成、李周、魏曉東著，**中國西部大開發戰略研究**(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

蒲寧，**地緣戰略與中國安全環境的塑造**(北京：時事出版社 2009年)。

趙汀陽，**天下體系：世界制度哲學導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

趙常慶等著，**中亞五國與中國西部大開發**(北京：昆侖出版社，2004年)。

趙翊達，**日本海上自衛隊：國家戰略下之角色**(臺北：秀威資訊科技，2008年)。

劉中民，**世界海洋政治與中國海洋發展戰略**(北京：時事出版社 2009年)

劉伯驥，**春秋會盟政治**(臺北：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62年)。

劉昭民，**中國歷史上之氣候變遷**(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92年)。

劉強主編，**國際安全·2010**(北京：時事出版社，2011年)。

劉清才，**東北亞地緣政治與中國地緣戰略**(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

- 劉華清，**劉華清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4年)。
- 劉學鈞，**北亞游牧民族雙軌政制**(臺北：南天書局，1999年)。
- 滕昕雲，**閃擊戰－迷思與真相：普魯士德意志軍事思想的詮釋**(臺北：老戰友工作室，2003年)。
- 樓耀亮，**地緣政治與中國國防戰略**(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
- 蔣君章，**政治地理學原理**(台北：中外出版社，1976年)。
-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三卷。
- 盧烈紅注譯，**新譯鹽鐵論**(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
-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北京：中共中央黨校，1991年)，下卷。
- 韓非，**韓非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 鞠海龍，**中國海權戰略**(北京：時事出版社，2010年)。
- 聶華林、馬紅翰編著，**中國區域經濟格局與發展戰略**(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
- 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卷一。
- 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卷二。
- 樂景河主編，**中俄關係的歷史與現實**(：河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

專書譯著

- 吳玉貴譯，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撰，**全面潰退與最後防線**(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9年)。
- 吳玉貴譯，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戰前之大本營海軍部**(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0年)。
- 李春福譯，文正仁著，**中國崛起的大戰略——與中國知識菁英的深層對話**(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11年)。
- 周全譯，Sebastian Haffner 著，**不含傳說的普魯士**(新北市：左岸文化，2012年)。
- 阿風等譯，黃仁宇著，**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1年)。
- 施康強、顧良譯，Fernand Braudel 著，**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臺北：貓頭鷹出版社有限公司，1999年)。
- 孫家坤譯，Juan Gonzalez de Mendoza 編撰，**中華大帝國史**(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年)。
- 高一中譯，Michael Lindberg and Daniel Todd 著，**近岸、近海及遠洋艦隊—自1861年迄今地理環境對海軍作戰之影響**(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5年)。
- 高一中譯，Stephen Philip Cole 著，**印度：成型中的強權**(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3年)。
- 鈕先鍾中譯，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et 英譯，Carl von Clausewitz 著，**戰爭論**(臺北：軍事譯粹社，1980年)。
- 鈕先鍾譯，André Beaufre 著，**戰略緒論**(臺北：麥田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

年)。

鈕先鍾譯，Antonie Henri Jomini 著，**戰爭藝術**(台北：麥田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

鈕先鍾譯，J. F. C. Fuller 著，**西洋世界軍事史**(臺北：軍事譯粹社，1996年)，卷一。

鈕先鍾譯，J. F. C. Fuller 著，**西洋世界軍事史**(臺北：軍事譯粹社，1996年)，卷三。

楊鎮甲譯，Alfred T. Mahan 著，**海軍戰略論**(台北：中華文化事業出版委員會：1956年)。

劉從德譯，Geoffrey Parker 著，**地緣政治學：過去、現在和未來**(北京：新華出版社，2003年)。

錢懷源、黃志潔譯，Sergei Gorshkov 著，**蘇俄海軍的崛起**(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5年)。

薛絢譯，Daniel Yergin 著，**石油世紀**(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1年)。

謝鴻崑譯，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撰，**海軍戰略重建與第三階段前期海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0年)。

鍾美珠譯，長澤和俊著，**絲綢之路史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

專書篇章

王希先，「淺談粟裕的軍事思想」，潘石英主編，**當代中國軍事思想精要**(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頁457-463。

王信賢，「中國大陸區域經濟發展」，魏艾主編，**中國大陸經濟發展與市場轉型**(臺北：揚智出版社，2003)，頁164。

史念海，「春秋以前的道路」，史念海著，**河山集·七集**(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114-115、116-119。

安·耶杰姆斯基，「蘇聯參加第二次亞非會議的計畫及對華策略」，沈志華、李濱主編，**脆弱的聯盟：冷戰與中蘇關係**(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頁325-345。

江澤民，「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奪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更大勝利」，中共中央文獻室編，**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頁34、36。

江澤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新華月報**編，**十六大以來黨和國家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一冊，頁19、34、37。

江澤民，「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中共中央文獻室編，**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41-42、43。

- 吳玲君，「中國與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區域合作與能源安全」，金榮勇主編，**東亞區域意識下的亞太戰略發展**(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民國 96 年)，頁 31-51。
- 吳浙，「環渤海地區經濟——競爭中的發展」，陳德昇主編，**中國大陸區域經濟發展：變遷與挑戰**(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3 年)，頁 262、271。
- 呂德良，「不期而遇的局面：1969 年中蘇美三角關係論析」，沈志華、李濱主編，**脆弱的聯盟：冷戰與中蘇關係**(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頁 434-456。
- 李丹慧，「失去的機遇？——赫魯曉夫下台後中蘇實現和解的新嘗試」，沈志華、李濱主編，**脆弱的聯盟：冷戰與中蘇關係**(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頁 391-421。
- 李文志，「中共的亞太戰略：海洋戰略的開展與挑戰」，蕭全政等著，**劇變中的亞太與兩岸關係**(臺北：業強出版社，1996 年)，頁 129。
- 沈志華、李濱主編，**脆弱的聯盟：冷戰與中蘇關係**(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頁 206-244。
- 周建明，「亞太格局與中國的東亞戰略」，胡鞍鋼主編，**中國大戰略**(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 年)，頁 294-295、299。
- 周萬，「與中蘇爭奪第三世界：1958-1959 年鐵托的亞非之行」，沈志華、李濱主編，**脆弱的聯盟：冷戰與中蘇關係**(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頁 266-299。
- 杰·弗里德曼，「1960 年代蘇聯對發展中世界的政策與中國的挑戰」，沈志華、李濱主編，**脆弱的聯盟：冷戰與中蘇關係**(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頁 300-324。
- 門洪華，「中國國家安全觀念的創新」，門洪華主編，**中國：大國崛起**(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 年)，頁 172、206、213。
- 門洪華，「變被動應對為主動謀劃，維護和拓展國家利益」，胡鞍鋼主編，**中國大戰略**(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 年)，頁 95-96。
- 胡鞍鋼，「我為什麼主張繼續提高國防開支佔 GDP 比重」，胡鞍鋼主編，**中國大戰略**(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 年)，頁 317-320、322-325。
- 胡錦濤，「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奪取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鬥」，中共中央文獻室編，**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 年)，頁 18、33、35、36、36-37、37。
- 范碩，「葉劍英對現代軍事理論的傑出貢獻」，潘石英主編，**當代中國軍事思想精要**(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2 年)，頁 401-403。
- 馬保安，「戰略的含義、特點和分類」，王文榮主編，**戰略學**(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 1999 年)，頁 18-22。
- 張弘遠，「中國大陸『振興東北』總體戰略的內涵與分析」，陳德昇、許光泰主編，**振興東北：政策、機遇與挑戰**(臺北：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2004 年)，頁 57。
- 張蘊嶺，「構建中國與周邊國家之間的新關係」，張蘊嶺主編，**中國與周邊國家：**

- 构建新型夥伴關係(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頁 11-12。
- 章百家，「90 年代的中國內政與外交」，郭德宏、王海光、韓鋼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專題史稿**，第 2 版(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 年)，卷五，頁 87、88。
- 陳文源，「明朝士大夫的安南觀」，**全球化下明史研究之新視野論文集**(台北：東吳大學歷史系，2007 年)，第三冊，頁 39-42。
- 陳槃，「春秋列國的兼併遷徙與民族混同和落後地區的開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與中國上古史編輯委員會編，**中國上古史待定稿**(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與中國上古史編輯委員會，1985 年)，第三本，頁 316。
- 鈕先鍾譯，Herbert Rosinski 著，「海權在未來戰爭中的任務」，Mitchell Simpson III 編，鈕先鍾譯，**海軍思想的發展**(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7 年)，頁 161-183。
- 鈕先鍾譯，Herbert Rosinski 著，「第二次世界大戰海權的擴張」，收錄於 Mitchell Simpson III 編，**海軍思想的發展**(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7 年)，頁 55-70。
- 鈕先鍾譯，Herbert Rosinski 著，「德國的海戰理論」，Mitchell Simpson III 編，**海軍思想的發展**(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7 年)，頁 71-92。
- 鈕先鍾譯，Herbert Rosinski 著，「德國海軍思想中的戰略與宣傳」，Mitchell Simpson III 編，**海軍思想的發展**(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7 年)，頁 93-134。
- 鈕先鍾譯，Herbert Rosinski 著，「論制海權」，Mitchell Simpson III 編，鈕先鍾譯，**海軍思想的發展**(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7 年)，頁 1-25。
- 鈕先鍾譯，Mitchell Simpson III 著，「原編者導言」，Mitchell Simpson III 編，**海軍思想的發展**(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7 年)，頁 1-27。
- 黃河，「進退之間：中國外交理論更化與重建」，上海社會科學院社會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編，**多邊合作與中國外交**(北京：時事出版社，2010 年)，頁 154-155。
- 楊奎松，「中美和解過程中的中方變奏：毛澤東“三個世界”理論提出的背景探析」，沈志華、李濱主編，**脆弱的聯盟：冷戰與中蘇關係**(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頁 462-481。
- 廖文中，「中共廿一世紀海軍戰略對亞太區域安全之影響」，廖文中主編，**中共軍事研究論文集**(臺北：中共研究雜誌社，2001 年)，頁 99、103-107、113-114。
- 閻學通，「中國人看中國崛起」，閻學通、孫學峰等著，**中國崛起及其戰略**(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頁 62-63。
- 閻學通，「中國崛起的實力地位」，閻學通、孫學峰等著，**中國崛起及其戰略**(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頁 81、104。
- 閻學通，「序言」，閻學通、孫學峰等，**中國崛起及其戰略**(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頁 7。

期刊文章

- 丁樹範，「市場因素與一九九〇年代以後中國裝備體系的改革」，**中國大陸研究**，第 48 卷第 1 期，2005 年 3 月，頁 29-49。
- 丁樹範，「全球化下的中國國防工業」，**中國大陸研究**，第 49 卷第 3 期，2006 年 9 月，頁 1-22。
- 中山，「李光耀回憶鄧小平決策對越自衛反擊戰」，**領導文萃**(福建)，第 8 期(2007 年)，頁 57。
- 孔小惠，「中國作為陸海複合國家的地緣戰略選擇」，**國際關係學院學報**，2008 年第 2 期，頁 12-17。
- 王冬青，「論鄭和下西洋與明成祖的威懾外交戰略」，**江蘇社會科學**(江蘇)，第 1 期(2005 年)，頁 205-211。
- 王玉祥，「淺說明朝的關外衛」，**甘肅社會科學**(甘肅)，2000 年 04 期，頁 72-74。
- 王青松，「南宋海防初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北京)，第 14 卷第 3 期(2004 年 9 月)，頁 98-107。
- 王青松，「海軍在南宋國防中的地位與作用」，**南都學壇(人文社會科學學報)**(河南)，第 24 卷第 3 期(2004 年 5 月)，頁 35-36。
- 王俊評，「制海權與中國海軍戰略」，**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11 卷，第 1 期，(2010 年 3 月)，頁 131-178。
- 王為，「“十一五”規劃中的中國鐵路國際通道建設」，**大陸橋視野**(新疆)，第 2 期(2009 年)，頁 35。
- 王軍，「雷蒙·阿隆的歷史社會學方法析論」，**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第 1 期(2007 年)，頁 32。
- 牛海楨、李曉英，「簡論清朝初年對青海蒙古的政策」，**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甘肅)，第 35 卷第 2 期(2007 年 3 月)，頁 114。
- 王偉，「明代士大夫的天下觀：以 1368-1428 年中越關係為中心」，**求索**(湖南)，頁 231-232。
- 王逢云，「新疆阿拉山口口岸發展現狀及前景展望」，**沿海企業與科技**(廣西)，總第 114 期(2009 年 11 月)，頁 73-76。
- 王景澤，「清朝的黃教政策與蒙古社會」，**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吉林)，總第 195 期(2002 年)，頁 34-40。
- 王景澤，「清朝的黃教政策與蒙古社會」，**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吉林)，總第 195 期(2002 年)，頁 34-40。
- 王曾惠、張競，「另眼看海權」，**中華戰略學刊**(2001 年冬季號)，頁 181-186。
- 王慶新，「春秋華夏天下秩序的啟示」，**國際政治科學**(北京)，總第 25 期(2011 年)，頁 83-84。
- 王繼東，「北宋對越南從“郡縣其地”到宗藩關係確立的轉變」，**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河南)，第 41 卷第 2 期(2008 年 3 月)，頁 151-155。
- 史滇生，「中國近代海軍戰略戰術思想的演進」，**軍事歷史研究**(上海)，第 1 期(2000 年)，頁 122-129。

- 甘逸驊，「歐洲安全防衛政策的軍事層面：歐盟的全球戰略地位」，**問題與研究**，第 45 卷第 5 期 (2006 年 9、10 月)，頁 124-126。
- 田澍、毛雨辰，「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明代西北邊鎮研究述評」，**西域研究(新疆)**，第 2 期(2005 年)，頁 105-108。
- 朱陽明、陳舟，「中國的亞太安全戰略與地緣戰略思考」，**中國軍事科學(北京)**，第 13 卷第 4 期(2000 年月)，頁 18、19。
- 艾文革，「中國戰略及轉向—中國將在寮、緬、泰武裝護航」，**全球防衛雜誌**，第 328 期(2011 年 12 月)，頁 12-13。
- 江西元，「試析和和諧世界與中國戰略文化重塑」，**教學與研究(北京)**，第 2 期(2009 年)，頁 59-66。
- 江雨，「島鏈與中國海軍向遠洋的發展」，**艦載武器(河南)**，第 12 期(2008 年)，頁 31。
- 何彤慧、王乃昂、李育、馮文勇，「歷史時期中國西部開發的生態環境背景及後果—以毛屋素沙地為例」，**寧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寧夏)**，第 28 卷第 2 期(2006 年)，頁 28。
- 佟佳江，「清朝統治蒙古的體制—八旗蒙古、外藩蒙古、內屬蒙古」，**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內蒙古)**，第 6 期(1998 年)，頁 36-41。
- 余精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國際新秩序觀的演進」，**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北京)**，第 1 期(2009 年)，頁 91-95。
- 吳志中，「地緣政治理論與兩岸關係」，**國際關係學報**，第 18 期(2003 年 12 月)，頁 106。
- 吳明上，「美日建立海上聯合防衛的決定：以日本的政治決定過程為中心」，**東吳政治學報**，第 20 期(2005 年)，頁 157-160。
- 吳景山，「後突厥汗國的政治制度辨析」，**西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甘肅)**，第 4 期(1995 年)，頁 38-41、56。
- 宋效峰，「中國與世界的關係變遷：從“三個世界”劃分到和諧世界構建」，**嶺南學刊(廣東)**，第 4 期(2011 年)，頁 24。
- 宋偉，「關於地緣政治結構的理論：批判與建設」，**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2002 年第 2 期，頁 74-75。
- 宋增華，「海權的發展趨勢及中國海權發展戰略構想—兼論海上行政執法力量興起對中國海權發展的影響」，**中國軟科學(北京)**，2009 年第 7 期，頁 188。
- 宋燕輝，「美國對南海周邊國家歷史性水域主張之反應(上)」，**問題與研究**，第 37 卷第 10 期(1998 年 10 月)，頁 4-8。
- 宋燕輝，「美國對南海周邊國家歷史性水域主張之反應(下)」，**問題與研究**，第 37 卷第 11 期(1998 年 11 月)，頁 65。
- 李元俊，「在他國專屬經濟區進行軍事測量的法律分析」，**東方法學(上海市)**，第 6 期(2010 年)，頁 157。
- 李文志、蕭文軒，「大湄公河流域爭霸戰：大湄公河經濟合作的推展及其戰略意

- 涵」，**臺灣東南亞學刊**，第2卷，第1期(2005年4月)，頁83-126。
- 杜永吉，「論中國戰略文化的近代流變」，**軍事歷史研究**(上海)，第3期(2005年)，頁143-143。
- 杜朝平，「島鏈對中國海軍的影響有多大」，**艦載武器**(河南)，第5期(2004年)，頁40。
- 李義虎，「從海陸二分到海陸統籌——對中國海陸關係的再審視」，**現代國際關係**(北京)，2007年第8期，頁1-7。
- 李曉燕，「中國明代戰略文化與儒家文化一致性的研究——與江憶恩商榷」，**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第10期(2008年)，頁66-76。
- 李曉燕，「文化、戰略文化、國家行為」，**外交評論**(北京)，第4期(2009年)，頁83-93。
- 李曉燕，「戰略文化與國家行為——江憶恩戰略文化理論評述」，**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2006年第7期，頁38-39。
- 李寶仁，「鐵路在地緣政治和周邊外交中地位和作用的思考」，**鐵道經濟研究**(北京)，2008年第3期(2008年)，頁9-11。
- 沈志華，「中蘇同盟破裂的原因和結果」，**中共黨史研究**(北京)，第2期(2007年)，頁37。
- 沈志華，「砲擊金門幕後解密：毛澤東玩弄中蘇同盟種下分裂惡果」，**文史參考**(北京)，第9期(2010年)，頁54-58。
- 沈志華，「赫魯曉夫、毛澤東與中蘇未實現的軍事合作——關於遠東防空協定、長波電台及聯合艦隊問題的再討論」，**中共黨史研究**(北京)，第5期(2002年)，頁32-43。
- 邢義田，「從古代天下觀看秦漢長城的象徵意義」，**燕京學報**(北京)，新13期(2002年11月)，頁15-64。
- 林文隆，「21世紀的美國海權佈局——『千艦海軍』」，**國防雜誌**，第23卷第2期(2008年6月)，頁41-54。
- 林灃，「中國北方長城地帶游牧文化帶的形成過程」，**燕京學報**(北京)，新14期(2003年5月)，頁95-146。
- 邵永靈、時殷弘，「近代歐洲陸海複合國家的命運與當代中國的選擇」，**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第10期(2000年)，頁47-52。
- 門洪華，「中國戰略文化的重構：一項研究議程」，**教學與研究**(北京)，第1期(2006年)，頁59-60。
- 查道炯，「從國際關係角度看中國的能源安全」，**國際經濟評論**(北京)，第6期(2005年)，頁32。

研討會論文

- 胡錦濤，「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求是**(北京)，第1期(2012年)，頁3-7。

- 韋占彬，「明代“九邊”設置時間辨析」，**石家莊師範專科學校學報**(河北)，第4卷第3期(2002年9月)，頁44-47。
- 修斌、姜秉國，「中國“和平發展”戰略視野下的海洋權益維護」，**中國海洋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山東)，2007年第1期，頁2-4。
- 倪樂雄，「從陸權到海權的歷史必然—兼與葉自成教授商榷」，**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2007年第11期，2007年11月，頁22-32。
- 唐世平，「再論中國的大戰略」，**戰略與管理**(北京)，第4期(2001年)，頁29-37。
- 唐蘭，「用青銅器銘文來研究西周史」，**文物**(北京)，第6期(1976年)，頁32。
- 徐子軒，「軍事擴散理論的新思維：複合邏輯下的安全備戰模型」，**問題與研究**，第50卷第1期(2011年3月)，頁149-153。
- 徐起，「21世紀初海上地緣戰略與中國海軍的發展」，**中國軍事科學**(北京)，第17卷第4期，2004年8月，頁79、80。
- 徐棄郁，「海權的誤區與反思」，**戰略與管理**(北京)，2003年第5期，頁15-23。
- 徐斯儉，「全球化：中國大陸學者的觀點」，**中國大陸研究**，第43卷，第4期(2000年4月)，頁1-26。
- 烏云畢力格，「清太宗與喀爾喀右翼札薩克圖汗素班第的文書往來—兼談喀爾喀—衛拉特聯盟的形成」，**西域研究**(新疆)，第2期(2008年)，頁1-8、130。
- 秦亞青，「國家身份、戰略文化和安全利益—關於中國與國際社會關係的三個假設」，**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第1期(2003年)，頁10-15、77。
- 耿曙，「『三線』建設始末：大陸西部大開發的先驅」，**中國大陸研究**，第44卷第12期(2001年12月)，頁13-14。
- 袁平譯，Nan Li 著，「中共擴張海權之企圖」(Scanning the Horizon for “New Historical Missions”)，**國防譯粹**，第37卷第12期(2010年12月)，頁86-88。
- 高岩，「中美海軍戰略趨勢」，**廣角鏡**(香港)，第457期，2010年10月，頁28-32。
- 高桓，「多極化世界需要豎立新安全觀」，**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第11期(2000年)，頁22-27。
- 張文，「論古代中國的國家觀與天下觀—邊境與邊界形成的歷史座標」，**中國邊疆史地研究**(北京)，第17卷第3期(2007年9月)，頁16-23。
- 張文木，「科索沃戰爭與中國新世紀安全戰略」，**戰略與管理**(北京)，第3期(1999年)，頁4-6。
- 張其賢，「『中國』與『天下』概念探源」，**東吳政治學報**，第27卷第3期(2009年9月)，頁169-256。
- 張登及，「理論改良還是缺口？—新現實主義與冷戰後中美地緣競爭的分析」，**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2009年第3期，頁11-17。
- 張貴洪，「美印戰略伙伴關係與中國：影響和對策」，**當代亞太**(北京)，第5期(2005年)，頁33。
- 張蜀誠，「剖析信息條件下共軍近海防禦戰略」，**空軍學術雙月刊**，第622期(2011年6月)，頁49。

- 張睿麗，「王延德出使高昌使命補證」，**西域研究(新疆)**，第 3 期(2003 年)，頁 39-44。
- 張競，「另眼看海權：兼論三保抱憾碧波之由」，**中華戰略學刊**(2001 年冬季號)，頁 173-186。
- 崔繼新，「中俄印三邊合作的穩定發展及其制約因素」，**俄羅斯中亞東歐研究**(北京)，第 4 期(2009 年)，頁 66-68。
- 梁利，「從“聯麗制遼”到“聯金滅遼”——論 10-12 世紀東北亞的戰略格局及宋朝的戰略對策」，**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河南)，第 2 期(2005 年)，頁 101-105。
- 梅然，「海軍擴展與戰略穩定：從英德競爭到中美關係」，**國際政治研究**(北京)，第 4 期(2007 年)，頁 86、85-88。
- 章清，「晚清『天下萬國』與『普遍歷史』理念的浮現及其意義」，**二十一世紀雙月刊**(香港)，總第 94 期(2006 年 4 月)，頁 57。
- 莫大華，「批判性地緣政治戰略之研究」，**問題與研究**，第 47 卷，第 2 期(2008 年 6 月)，頁 61-62、71。
- 許耀桐，「民主集中制的“集中”之解」，**學習與實踐**(湖北)，第 7 期(2011 年)，頁 25-27。
- 連弘宜，「俄羅斯當前東北亞政策初探」，**戰略安全研析**，第 81 期(2012 年 1 月)，頁 22、24-25。
- 陳向陽，「冷靜研判周邊戰略新態勢」，**瞭望新聞週刊**(北京)，2011 年 6 月 27 日，頁 75。
- 陳安麗，「論康熙對蒙古政策產生的歷史背景和作用」，**內蒙古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內蒙古)，第 31 卷第 3 期(1999 年 5 月)，頁 17-26。
- 陳至潔，「歐盟的中國焦慮症」，**戰略安全研析**，第 75 期，2011 年 7 月，頁 60-67。
- 陳彥良，「戰國迄漢初區域交通和市場網絡」，**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34 期(2005 年 12 月)，頁 5-7。
- 陳偉華，「戰略研究的批判與反思：典範的困境」，**東吳政治學報**，第 24 卷第 4 期(2009 年 12 月)，頁 7-21。
- 陳嘉生，「習近平訪美的幾項戰略意涵」，**戰略安全研析**，第 82 期(2012 年 2 月)，頁 8-9。
- 陳鴻瑜，「2005 年東亞峰會評析」，**展望與探索**，第 4 卷第 1 期(2006 年 1 月)，頁 6。
- 陳鴻瑜，「明代鄭和下西洋的先行者：尹慶」，**歷史月刊**，第 22 期(2006 年 6 月)，頁 98-100。
- 陳鴻瑜，「明朝與馬六甲王朝之關係：戰略前沿的建立和喪失」，**漢學研究**，第 28 卷第 4 期(2010 年 12 月)，頁 139-169。
- 陳鴻瑜，「美國、中國和東協三方在南海之角力戰」，**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12 卷第 1 期(2011 年 1 月)，頁 53-56、56-57。

期刊譯作

- 湯代佳，「青海厄魯特蒙古與清朝之早期關係述略」，**青海民族研究**(青海)，第 12 卷第 3 期(2001 年 7 月)，頁 59-60。
- 程廣中，「地緣戰略規律試論」，**軍事歷史研究**(上海)，第 1 期(2001 年)，頁 168-169。
- 程龍，「兀良哈三衛南遷氣候寒冷說質疑」，**中國史研究**(北京)，第 1 期(2001 年)，頁 123-132。
- 黃范章，「東亞地區經濟的形勢及格局」，**世界經濟**(北京)，第 8 期(1993 年)，頁 10、12。
- 黃范章、李大偉，「東亞經濟一體化進程、發展趨勢及中國的戰略思考——兼論日本地震對東亞經濟的影響」，**金融發展評論**(北京)，第 11 期(2011 年)，頁 73-74。
- 黃恩浩、王俊評，「中國海權擴張對亞太區域權力平衡之衝擊」，發表於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101“亞太區域研究”」學術研討會(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2012 年 3 月 9-10 日)，頁 16-21。
- 楊仕樂，「中國獨特的戰略文化？尋找理念的物質基礎」，**東亞研究**，第 37 卷第 1 期(2006 年 1 月)，頁 198-230。
- 楊勇，「發揮陸海兼備優勢是大型海陸複合國家的必然選擇」，**黑龍江社會科學**(黑龍江)，總第 84 期(2004 年 6 月)，頁 26-29。
- 楊軍，「朝鮮半島與“遼東”內涵的關係」，**遼寧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遼寧)，第 27 卷第 2 期(2004 年 3 月)，頁 111-112。
- 楚樹龍，「冷戰後中國安全戰略思想的發展」，**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第 9 期(1999 年)，頁 11-12、15。
- 楚樹龍，「冷戰後中國的對外安全戰略」，**現代國際關係**(北京)，第 8 期(1998 年)，頁 24-25。
- 萬明，「明代外交觀念的演進——明太祖詔令文書所見之天下國家觀」，**古代文明**(吉林)，第 4 卷第 2 期(2010 年 4 月)，頁 71-79。
- 葉自成、慕新海，「對中國海權發展戰略的幾點思考」，**國際政治研究**(北京)，第 3 期(2005 年)，頁 5-17。
- 葉青，「從戰爭與革命到和諧世界——略論中國共產黨的時代觀發展與中國外交」，**國際展望**(上海)，第 4 期(2011 年)，頁 1-18。
- 廖文中，「中共躍向遠洋海軍戰略」，**中共研究**，第 28 卷第 12 期(1994 年 12 月)，頁 52。
- 趙現海，「洪武初年甘肅地緣政治與明朝西北疆界政策——由馮勝“棄地”事件引發的思考」，**古代文明**(吉林)，第 5 卷第 1 期(2011 年 1 月)，頁 77-90、113-114。
- 趙現海，「洪武初年明、北元、高麗的地緣政治格局」，**古代文明**(吉林)，第 4 卷第 1 期(2010 年 1 月)，頁 90-97。
- 趙景芳，「戰略文化的再思考」，**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第 1 期(2008 年)，頁 16、18-20。
- 齊木德道爾吉，「1640 年以後的清朝喀爾喀關係」，**內蒙古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

- 學版)(內蒙古)，第4期(1998年)，頁12-20。
- 劉一建，「中國未來的海軍建設與海軍戰略」，**戰略與管理**(北京)，第5期(1999年)，頁97。
- 劉一建、呂賢臣，「試論海權的歷史發展規律」，**中國海洋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山東)，第2期(2007年)，頁2-3。
- 劉大清，「加快瀾滄江—湄公河國際航運開發、利用的思考」，**綜合運輸**(北京)，第10期(1996年)，頁13。
- 劉中民、王曉娟，「澄清中國海權發展戰略的三大思想分歧」，**學習月刊**(湖北)，第9期(2005年)，頁32-33、50。
- 劉新華，「海權優先：當代中國的地緣戰略選擇」，**社會科學**(上海)，第7期(2008年)，頁58-61。
- 劉新華，「試論中國發展海權的戰略」，**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上海)，第6期(2001年)，頁68。
- 劉德海，「變遷中的南韓中國政策」，**臺灣國際研究季刊**，第5卷第2期(2009年夏季號)，頁1-35。
- 劉蕭翔，「俄屬遠東『黃禍論』之論析：迷思或事實」，**問題與研究**，第48卷第2期(2009年6月)，頁109、122-135。
- 蔣士良，「初論制交通權」，**中國軍事科學**(北京)，2001年第06期，頁54。
- 蔡增家，「從新保守主義論述變遷中的日本防衛政策」，**遠景基金會季刊**，第8卷第3期(2007年7月)，頁91-125。
- 鄭大誠，「歐盟快速反應部隊：發展與展望」，**全球防衛雜誌**，第276期(2007年8月)，頁65-67。
- 鄧沛，「明代“九邊”考述」，**綿陽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四川)，第18卷第4期(1999年8月)，頁57-59。
- 鄭雪飛，「近代大國崛起與海上安全環境辯證關係的歷史啟示」，**史學月刊**(河南)，2008年第12期，頁128-130。
- 鄭雷，「論中國對專屬經濟區內他國軍事活動的法律立場——以“無暇號”事件為視角」，**法學家**(北京市)，第1期(2011年)，頁137-146。
- 鄭端耀，「國際關係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問題與研究**，第44卷第1期(2005年1、2月)，頁125-126、127-128。
- 鄭端耀，「搶救權力平衡理論」，發表於國際關係理論學術研討會(台北：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與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會主辦，2010年5月21-22日)，頁8-9。
- 穆崑臣，「試論清朝治理東蒙古的政策和措施」，**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內蒙古)，第26卷第3期(2005年5月)，頁50。
- 薛正昌，「蕭關道與固原歷代政權建置及其發展」，**西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甘肅省蘭州市)，第1期(1994年)，頁64-71。
- 鞠海龍，「論地緣政治的“對抗性”思維」，**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江蘇省南京市)，

第 5 期(2009 年)，頁 58-60。

顧頡剛，「讀周官·職方」，禹貢(北平)，第 7 卷第 6-7 合期，頁 331。

未出版學位論文

沈明室，「中共積極防禦戰略：根源、演變與傳統」，政治作戰學校政治研究所博士論文(2005 年)。

彭慕仁，「中共『懲越戰爭』的決策」，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論文(1986 年)。

湯佩津，「北宋的南邊政策：以交趾為中心」，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4 年)。

黑龍，「噶爾丹統治時期的準噶爾與清朝關係研究」，內蒙古大學歷史系博士論文(2005 年)。

楊仕樂，「跳脫國際政治的攻勢及守勢現實主義：體系穩定的互動與結構解釋之嘗試」，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博士論文(2007 年)。

報紙

馬世琨、鄭圓圓，「多極化進程加快，中國外交成果豐碩—錢其琛副總理兼外長接受本報年終專訪」，人民日報，1997 年 12 月 18 日，第 7 版。

網路資料

「江澤民在黨的十六大上所作的報告(4)」，新華網，2002 年 11 月 17 日，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2-11/17/content_632260.htm。

「江澤民在黨的十六大上的報告」新華網，2002 年 11 月 27 日，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2-11/17/content_632290.htm。

「中國立法機關批准中國與越南北部灣劃界協定」，新華網，2004 年 6 月 25 日，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4-06/25/content_1547607.htm。

「中法聯合新聞公報」，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04 年 10 月 11 日，<http://www.fmprc.gov.cn/chn/pds/ziliao/1179/t217596.htm>。

「中國和東盟七國專家指出，修建中—東線泛亞鐵路和崇左至欽州高速公路具有重要戰略作用」，人民網，2005 年 3 月 1 日，<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49/14173/1262740.html>；「“中國經濟第四極”確定為環北部灣經濟圈」，中評網，2007 年 12 月 04 日，<http://mag.chinareviewnews.com/doc/1005/0/7/1/100507185.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0507185>。

「直播實錄：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答記者問」，人民網，2005 年 3 月 14 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4/3241551.html>。

「中俄關於 21 世紀國際秩序的聯合聲明(全文)」，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05 年 7 月 1 日，<http://www.fmprc.gov.cn/chn/pds/ziliao/1179/t201988.htm>。

「中國力推泛亞鐵路，以求突破“馬六甲瓶頸”」，新華網轉引國際先驅導報，2005

年 8 月 22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herald/2005-08/22/content_3388630.htm。

「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法」，**中國政府網**，2005 年 9 月 12 日，
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ziliao/flfg/2005-09/12/content_31086.htm。

「胡錦濤在聯合國成立 60 週年首腦會議上的講話(全文)」，**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2005 年 9 月 16 日，
<http://www.fmprc.gov.cn/chn/pds/ziliao/zyjh/t212365.htm>。

「國家《中長期鐵路網規劃》簡介」，**中國政府網**，2005 年 9 月 16 日，
http://www.gov.cn/ztl/2005-09/16/content_64413.htm。

「解能源運輸困局，中國成品油運輸擬走道湄公河」，**環球時事**，2006 年 3 月 21
日，http://www.stnn.cc:82/global/china/t20060321_170198.html。

「中央外事工作會議在京舉行，胡錦濤作重要講話」，**新華網**，2006 年 8 月 23
日，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6-08/23/content_4999294.htm。

「中法聯合聲明 共同建設更加安全、繁榮和諧與團結的世界」，**中華人民共和國
外交部**，2006 年 10 月 26 日，
<http://www.fmprc.gov.cn/chn/pds/ziliao/1179/t277621.htm>。

「中國和印度發表《聯合聲明》(全文)」，**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06 年 11 月
21 日，<http://www.fmprc.gov.cn/chn/pds/ziliao/1179/t281112.htm>。

「國家主席胡錦濤在印度科學宮發表重要演講(全文)」，**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2006 年 11 月 22 日，
<http://www.fmprc.gov.cn/chn/gxh/zlb/ldzyjh/t281240.htm>。

「胡錦濤：鍛造適應歷史使命要求強大人民海軍」，**新華網**，2006 年 12 月 27 日，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mil/2006-12/27/content_5539162.htm。

「中國公司贏得緬甸天然氣田採購權」，**中國評論新聞網**，2007 年 12 月 7 日，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05/0/9/9/100509914.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0509914>。

「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俄羅斯聯邦關於重大國際問題的聯合聲明(全文)」，**中華人
民 共 和 國 外 交 部**，2008 年 5 月 23 日，
<http://www.fmprc.gov.cn/chn/pds/ziliao/1179/t457954.htm>。

「韓聯社：透過外交用語解讀中國的親疏外交」，轉引自**中國網**，2008 年 5 月 29
日，
http://www.china.com.cn/international/txt/2008-05/29/content_15527347.htm。

「中日就東海問題達成原則共識」，**新華網**，2008 年 6 月 19 日，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08-06/19/cont>

ent_8398183.htm。

- 「中亞天然氣管道全線開建」，文匯報，2008年7月3日，
<http://paper.wenweipo.com/2008/07/03/CH0807030006.htm>。
- 「中長期鐵路網規劃(2008年調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基礎產業司，2008年10月8日，
<http://jtyss.ndrc.gov.cn/fzgh/W020090605632915547512.pdf>。
- 「國防部長梁光烈：中國不能永遠沒有航母」，中國評論新聞，2009年3月23日，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09/2/1/2/100921237.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0921237>。
- 「溫家寶批駁“中美 G2 共治全球”：毫無根據」，中國評論新聞，2009年5月21日，
http://mag.chinareviewnews.com/doc/1009/7/5/3/100975339_2.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0975339&mdate=0521111922。
- 「首輪中美經濟對話：除上月球外主要問題均已談及」，中國新聞網，2009年7月29日，
<http://www.chinanews.com/gn/news/2009/07-29/1794984.shtml>。
- 「中俄總理第十四次定期會晤聯合公報(全文)」，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09年10月13日，
<http://www.fmprc.gov.cn/chn/pds/ziliao/1179/t620336.htm>。
- 「中美聯合聲明(全文)」，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09年11月17日，
<http://www.fmprc.gov.cn/chn/pds/ziliao/1179/t627468.htm>。
- 「中越兩國政府簽署陸地邊界勘界文件」，新華網，2009年11月18日，
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09-11/18/content_12485837.htm。
- 「印媒：辛格訪美將強調反對中國在南亞發揮作用」，中國評論新聞，2009年11月23日，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11/4/4/6/101144665.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1144665>。
- 「世界看中國：土庫曼—中國輸氣管」，BBC 中文網，2009年12月16日，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09/12/091215_chinainworl_pipeline.shtml。
- 「胡錦濤：中國繼續處在戰略機遇期和矛盾凸顯期」，香港商報，2010年1月2日，
http://www.hkcd.com.hk/content/2010-01/02/content_2455563.htm。
- 「國家海洋局主要職責」，中國國家海洋局，2010年4月9日，
<http://www.soa.gov.cn/soa/governmentaffairs/overview/zhuyaozhineng/webinfo/2010/04/1270102487344747.htm>。
- 「30 小時穿越東盟」，東盟財經，2010年6月9日，
<http://www.asean-info.com.sg/user/1338/125/2010699293883478.html>。
- 「中國禁止向日本出口稀土？商務部否認」，中國評論新聞網，2010年9月23日，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14/5/4/5/101454539.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1454539>。

- ndid=0&docid=101454539&mdate=0923160407。
- 「日本尋求開發蒙古稀土免受中國禁運威脅」，**BBC 中文網**，2010 年 9 月 25 日，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business/2010/09/100925_japan_mongolia_rare_earth.shtml。
- 「中國打稀土牌 西方怕到」，**中央通訊社**，2010 年 9 月 27 日，
<http://www.cna.com.tw/ShowNews/Detail.aspx?pNewsID=201009270287&pType0=aCN&pTypeSel=0>。
- 「2010 年 11 月 9 日外交部發言人洪磊舉行例行記者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2010 年 11 月 9 日，
<http://www.fmprc.gov.cn/chn/pds/wjdt/fyrbt/t767721.htm>。
- 「中緬油氣管道小資料」，**文匯報**，2011 年 2 月 18 日，
<http://paper.wenweipo.com/2011/02/18/CN1102180004.htm>。
- 「胡錦濤：全軍要堅決維護中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中新網**，2011 年 3 月
12 日，<http://big5.chinanews.com:89/gn/2011/03-12/2901955.shtml>。
- 「2011 年 3 月 29 日外交部發言人姜瑜舉行例行記者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2011 年 3 月 29 日，<http://www.fmprc.gov.cn/chn/pds/wjdt/fyrbt/t810580.htm>。
- 「授權發佈：《中國的對外援助白皮書》」，**新華網**，2011 年 4 月 21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2011-04/21/c_121332527_8.htm。
- 「中國·穿梭 8 國·中線動工·泛亞高鐵料 2020 年通車」，**星洲日報**，2011 年 4
月 25 日，<http://www.sinchew.com.my/node/202151?tid=2>。
- 「2010 年我國石油市場特點分析」，**中國產業信息網**，2011 年 4 月 26 日，
<http://info.chyxx.com/shyhg/201104/994128G5IZ.html>。
- 「陳炳德感嘆中國軍事設備落後：永不挑戰美國」，**中國評論新聞網**，2011 年 5
月 20 日，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16/9/9/7/101699729.html?coluid=37&kindid=711&docid=101699729>。
- 「泛亞鐵路建設或暫擱淺，設計時速遭質疑」，**鉅亨網**，2011 年 5 月 26 日，
<http://news.cnyes.com/Content/20110526/KDWVOX16AVB4A.shtml>。
- 「《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全文)：三、中國和平發展的對外政策方針」，**新華網**，
2011 年 9 月 6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9/06/c_121982103_4.htm。
- 「中共召開六中全會討論文化議題」，**BBC 中文網**，2011 年 10 月 15 日，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chinese_news/2011/10/111015_china_ccp_beijing.shtml。
- 藍科銘，「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研究」，**臺灣區機器工業同業公會**，2011 年
11 月 20 日，http://www.tami.org.tw/sp1/market/market_1001220-5.pdf，頁 34。
- 「中亞天然氣直送珠三角」，**大公網**，2011 年 11 月 25 日，
<http://www.takungpao.com/news/china/2011-07-01/861817.html>。
- 「社評：中印沒有成為“戰略敵人”的理由」，**環球網**，2011 年 11 月 29 日，

- <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1-11/2215857.html>。
- 「外交部召見中國大使，抗議我海警被中國漁民刺死」，韓聯社，2011年12月12日，
<http://big5.yonhapnews.co.kr:83/gate/big5/chinese.yonhapnews.co.kr/domestic/2011/12/12/0401000000ACK20111212002100881.HTML>。
- 「中緬油氣管後年貫通」，大公網，2011年12月28日，
<http://www.takungpao.com.hk/news/11/12/28/ZM-1437208.htm>。
- 「2011年原油進口同比增6%，對外依存度達56.5%」，中國網，2012年1月13日，
http://ny.china.com.cn/2012-01/13/content_4758771.htm。
- 「穿越泛亞鐵路網，中國高鐵布局對接周邊」，中國出色經濟網，2012年2月29日，
<http://www.cswe.org.cn/jiaotong/1444.html>。
- 「中國的石油安全格局面臨挑戰」，中國評論新聞網，2012年3月17日，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20/4/3/3/102043366.html?coluid=0&kindid=0&docid=102043366&mdate=0317080252>。
- 「戴秉國：促進中美在亞太地區良性互動」，新華網，2012年5月3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05/03/c_123074577.htm。
- 「楊潔篪外長談出訪東南亞三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12年8月13日，
<http://www.fmprc.gov.cn/chn/pds/wjdt/wjbxw/t960015.htm>。
- 方沛清，「東亞峰會擴大 美俄獲邀參與」，中央社，2010年10月30日，
<http://www.cna.com.tw/ShowNews/Detail.aspx?pNewsID=201010300130&pTypepe1=PF&pType0=aOPL&pTypeSel=&pPNo=1>。
- 王晉，「泛亞鐵路東線明動工」，文匯報，2005年8月31日，
<http://paper.wenweipo.com/2005/08/31/CH0508310024.htm>。
- 白樺，「新疆騷亂使上合組織對中國更加重要」，美國之音中文網，2009年10月15日，
<http://www.voanews.com/chinese/news/Putin-shang-hai-20091015-64352762.html>。
- 何宏儒，「印中矛盾考驗彼此合作」，中央社，2012年3月28日，
<http://www.cna.com.tw/News/aALL/201203280309.aspx>。
- 何宏儒，「盈拉倡印度清奈－緬甸土瓦走廊」，中央社，2012年，1月26日，
<http://www.cna.com.tw/News/aOPL/201201260137.aspx>。
- 余建斌，「中國海監裝備與日本相比差距明顯」，人民網日本頻道，2012年4月18日，
<http://japan.people.com.cn/35469/7790972.html>。
- 吳蔚，「中越北部灣劃界面積相當 未涉島嶼主權」，新浪網，2004年8月30日，
<http://news.sina.com.cn/c/2004-08-03/04203274593s.shtml>。
- 李隽瓊，「中國破解馬六假運輸困局，重慶向國務院爭取中緬油管」，新華網，2005年3月24日，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5-03/24/content_2736070.htm。

李富永，「三大戰略鐵路有急有緩，中巴中緬鐵路尚未立項」，**中華工商報**，2004年7月6日，<http://finance.sina.com.cn/g/20040706/0700852000.shtml>。

李新民，「中國油氣進口的四大戰略通道形成」，**人民網**，2010年9月10日，<http://energy.people.com.cn/BIG5/12694616.html>。

李懷岩，浦超，「雲南加快泛亞鐵路大通道建設」，**新華網**，2007年3月25日，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7-03/25/content_5892336.htm。

周雷，「第三亞歐大陸橋構想浮出」，**新華社瞭望週刊社**，第47期(2007年)，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lw.xinhuanet.com/htm/content_1762.htm。

周繼祥，**中共處理海洋事務策略與組織架構之研究**(臺北：行政院海岸巡防署，2005年)，<http://pal.csie.ntu.edu.tw/~xflash96/policy/sites/default/files/page/PRCocean.pdf>，頁49-65、68-96、111-120、122-147。

孟凡明、許晨光，「海權思想的沿承與中國發展海權的辯證思考」，**新華網**，2010年5月10日，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theory/2010-05/10/c_1284016.htm。

季北群、安非，「多維獨家：中國首艘航母將進駐北海艦隊」，**多維新聞網**，2012年6月6日，<http://military.dwnews.com/news/2012-06-06/58753235.html>。

林行健，「捕魚爭議，菲陸船艦南海對峙」，**中央社**，2012年4月11日，<http://www.cna.com.tw/News/aOPL/201204110074.aspx>。

林憬屏，「泰國支持日本參與湄公河發展」，**中央社**，2012年4月21日，<http://www.cna.com.tw/News/aOPL/201204210188.aspx>。

姜遠珍，「陸學者：北韓遭襲，中國不軍援」，**中央社**，2011年10月18日，<http://www2.cna.com.tw/ShowNews/Detail.aspx?pNewsID=201110180171&pType1=PF&pType0=aOPL&pTypeSel=&pPNo=3>。

胡立宗，「美智庫籲政府修改對中策略」，**中央社**，2010年8月30日，<http://www.cna.com.tw/ShowNews/Detail.aspx?pNewsID=201008300004&pType1=PF&pType0=aOPL&pTypeSel=&pPNo=1>。

唐璐，「中印雙方在邊界問題上互作調整」，**國際先驅導報**，2005年4月18日，http://news.xinhuanet.com/herald/2005-04/18/content_2844918.htm。

徐子涵，「胡錦濤：中國實現共同富裕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人民網**，2011年4月15日，<http://finance.people.com.cn/GB/8215/210272/218687/14400426.html>。

徐文洲，「中國繪製昆明至新加坡的泛亞鐵路三大路線藍圖」，**新華網**，2004年8月30日，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4-08/30/content_1926487.htm。

徐雅平，「中國第四大能源進口通道中緬油氣管道9月全面開工」，**中國網**，2009年6月16日，

http://www.china.com.cn/economic/txt/2009-06/16/content_17954466.htm。

海韜，「中國可建印度洋“三線基地群”」，**新華網**，2011年12月23日，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herald/2011-12/23/c_131321310.htm。

海韜，「中國海軍應打造“太平洋艦隊”」，**新華網轉引國際先驅導報**，2011年12月5日，
http://news.xinhuanet.com/herald/2011-12/05/c_131284309.htm。

張文木，「中國海洋安全防務重心在東海」，**知遠戰略與防務研究所**，2008年11月29日，
<http://www.defence.org.cn/article-13-93052.html>。

張世平，「中國海洋開發意識差，海洋係中國未來生存空間」，**求是理論網**，2011年9月19日，
http://big5.qstheory.cn/gj/zgwj/201109/t20110919_110916.htm。

曹宏威，「新【歐亞大陸橋】」，**科學網**，2011年12月12日，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6708&do=blog&id=517607>。

梁嘉桓，「大陸建構泛亞鐵路網，東協段成最大挑戰」，**電子時報(DIGITIMES)**，2011年11月1日，
http://www.digitimes.com.tw/tw/dt/n/shwnws.asp?CnlID=&id=0000247412_OP531X3W2G681O1Q0DPQX&ct=1&OneNewsPage=2&Page=1&query=。

章卓，「中國用湄公河運油受關注」，**世界新聞報**，2007年1月12日，
<http://big5.cri.cn/gate/big5/gb.cri.cn/12764/2007/01/12/1865@1396868.htm>。

陳竹，「中緬天然氣供銷協議達成」，**財經**，2008年12月26日，
<http://www.caijing.com.cn/2008-12-26/110042870.html>。

陶短房，「北部灣劃界問題與中越關係現況」，**鳳凰博報**，2009年5月15日，
<http://blog.ifeng.com/article/2682426.html>。

陳鐵源，「鄭必堅可能放棄“和平崛起”而改用“和平發展”」，**天下博客**，2006年05月14日，
<http://sais2005.bokee.com/5050610.html>。

彭念，「外報：“高鐵戰略”成中國與周邊政經交往“黏合劑”」，**中新網**，2011年4月28日，
<http://www.chinanews.com/hb/2011/04-28/3004159.shtml>。

楊明珠，「牽制中國，日授東南亞安全技術」，**中央社**，2011年7月23日，
<http://www2.cna.com.tw/ShowNews/Detail.aspx?pNewsID=201107230077&pType1=PF&pType0=aOPL&pTypeSel=&pPNo=1>。

楊明珠，「駐日美軍重整報告出爐」，**中央社**，2012年4月27日，
<http://www.cna.com.tw/News/aOPL/201204270104.aspx>。

楊萬國，「政協常委稱國家海洋局執行強度不夠，建議成立海洋部」，**鳳凰網**，2012年3月5日，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2012lianghui/tianyian/detail_2012_03/05/12958004_0.shtml。

楊毅，「武力炫耀的背後是霸道——評美國航母擬赴黃海參加軍演」，轉引自**中國國防部網站**，2010年8月13日，
http://www.mod.gov.cn/big5/gflt/2010-08/13/content_4183770.htm。

- 楊鐵虎，「羅援少將：黃海對中國具有戰略意義，不能任人為所欲為」，人民網，2011年9月30日，<http://military.people.com.cn/BIG5/1078/15795919.html>。
- 翟磊，「中國緬甸簽署建設原油和天然氣管道協議」，南方網，2009年3月27日，<http://china.huanqiu.com/hot/2009-03/415963.html>。
- 蔡偉，「禮儀之師的航母夢」，三聯生活週刊，2009年4月21日，<http://www.lifeweek.com.cn/2009/0421/24690.shtml>。
- 盧光盛、熊鑫，「中國對大湄公河次區域國家的援助」，中國網，2011年12月29日，http://www.china.com.cn/international/txt/2011-12/29/content_24282974.htm，頁1。
- 龍興春，「印度仍是可團結的力量」，環球網，2011年11月30日，<http://opinion.huanqiu.com/roll/2011-11/2221898.html>。
- 顏圓圓、張亞東，「青藏鐵路首條延伸線拉日鐵路開工建設」，新華網，2010年9月26日，http://news.xinhuanet.com/society/2010-09/26/c_13530616.htm。
- 羅援，「武力炫耀的背後是霸道——評美國航母擬赴黃海參加軍演」，轉引自中國國防部網站，2010年8月12日，http://news.mod.gov.cn/headlines/2010-08/12/content_4183275.htm。

外文

專書

- Agnew, John, *Geopolitics: Re-Visioning World 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1998).
- Allen, Debra J., *The Oder-Neisse Line: The United States Poland, and Germany in the Cold War* (Westport: Praeger Publishers, 2003).
- Aron, Raymond, *Peace and War: A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heory*, trans. by Richard Howard and Annette Baker Fox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3).
- Bartlett, C. J., *Great Britain and Sea Power, 1815-1853* (Aldershot, Hampshire, England: Gregg Revivals, 1993).
- Binkley, Robert C., *Realism and Nationalism: 1852-1871* (New York: Harper & Row, 1935).
- Bird, Keith W., *Erich Raeder: Admiral of the Third Reich*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6).
- Blouet, Brian W., *Geopolitics and Globaliz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Reaktion Books, 2001).
- Booth, Ken, *Law, Force and Diplomacy at Sea*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85).
- Booth, Ken, *Navies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Holmes & Meier, 1979).

- Brzezinski, Zbigniew, *Game Plan: A Geostrategic Framework for the Conduct of the U.S.–Soviet Contest* (Boston: The Atlantic Monthly Press, 1986).
- Brzezinski, Zbigniew, *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7).
- Bull, Headley and Watson, A. eds., *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 Bull, Headley, *The Anarchy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7).
- Burles, Mark and Abram Shulsky, *Patterns in China's Use of Force: Evidence from History and Doctrinal Writings* (Santa Monica: RAND, 2000).
- Buzan, Barry & Eric Herring, *The Arms Dynamic in World Politics*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8).
- Buzan, Barry and Ole Wæver, *Regions and Powers: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Clark, Ian, *The Hierarchy of States: Reform and Resistance in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 Claude, Jr., Inis L.,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2).
- Cohen, Saul B., *Geopolitics: The Ge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Rowman & Littlefield, 2009).
- Cole, Bernard D., *The Great Wall at Sea: China's Nav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second edition (Annapolis, Marylan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10).
- Coogan, John W., *The End of Neutrality: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and Maritime Rights, 1899-1915*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 Corbett, Julian, *Some Principles of Maritime Strategy* (Annapolis, Marylan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88).
- Creeseey, George B., *The Basis of Soviet Strength* (London: George G Harrap, 1946).
- Dalby, Simon, *Geopolitics, Grand Strategy and the Bush Doctrine* (Singapore: Institute of Defence and Strategic Studies, 2005).
- Department of the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The Conferences at Malta and Yalta*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5).
- Department of the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The Conferences of Berlin(the Potsdam Conference), 1945*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0).
- Di Cosmo, Nicola, *Ancient China and Its Empires: The Rise of Nomadic Power in East Asian Hist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Dobson, Alan P.,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Of Friendship,*

- Conflict and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Superpower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 Dolman, Everett, *Astropolitik: Classical Geopolitics in Space Age* (London: Frank Cass, 2002).
- Dougherty, James E. and Robert L. Pfaltzgraff, Jr. eds., *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omprehensive Survey* (New York: Longman, 2001).
- Douhet, Giulio, *The Command of the Air*, trans. by Dino Ferrari, New Imprint (Washington D.C.: Air Force History and Museums Program, 1998).
- Dueck, Colin, *Reluctant Crusaders: Power, Culture, and Change in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 Earle, Edward Mead, *Turkey, The Great Powers, and The Bagdad Railway* (New York: Macmillan, 1924).
- Fairgrieve, James, *Geography and World Power*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Press, 1915).
- Fravel, Taylor M., *Strong Border, Secure Nation: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in China's Territorial Disputes*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 Fu, Lo-Shu, *A Documentary Chronicle of Sino-Western Relations (1644-1820)* (Tucson: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66).
- Galbreath, David J., *The 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 Garthoff, Raymond L., *Soviet Military Doctrine* (Illinois: Free Press, 1953).
- Garthoff, Raymond L., *Soviet Strategy in the Nuclear Age*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74).
- Garver, John W., *Protracted Contest: Sino-Indian Rival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1).
- Gilpin, Rober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 Gilpin, Robert,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 Glenn, John, Darryl Howlett, and Stuart Poore eds., *Neorealism versus Strategic Culture* (Burlington: Ashgate Press, 2004).
- Goldstein, Avery, *Rising to Challenge: China's Grand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Gorshkov, Sergei G., *The Sea Power of the State*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1979).
- Gray, Colin S., *The Geopolitics of Super Power* (Lexington, Kentucky: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88).
- Gray, Colin S., *The Geopolitics of the Nuclear Era* (New York: Crane, Russak, 1977).
- Gray, Colin S., *The Navy in the Post-Cold War World*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 The Pennsylvan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 Gray, Colin S., *War, Pea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ic history*, second edi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 Grove, Eric, *The Future of Sea Power* (London: Routledge, 1990).
- Grygiel, Jakub J., *Great Powers and Geographical Change* (Baltimore, Maryland: The John Hopkins Press, 2006).
- Gulick, Edward V., *Europe's Classical Balance of Power*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5).
- Hamilton, C. I., *Anglo-French Naval Rivalry, 1840-187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Herrick, Robert W., *Soviet Naval Doctrine and Policy, 1956-1986*(New York: The Edwin Mellen Press, 2003).
- Herrick, Robert W., *Soviet Naval Theory and Policy* (Annapolis, Marylan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89).
- Herwig, Holger H., *Luxury Fleet: The Imperial German Navy* (Amherst, New York: Humanity Books, 1987).
- Hobson, Rolf, *Imperialism at Sea: Naval Strategic Thought, the Ideology of Sea Power, and the Tirpitz Plan, 1875-1914* (Boston and Leiden: Brill, 2002).
- Holmes, James R. and Toshi Yoshihara , *Chinese Naval Strategy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Turn to Mahan* (London: Routledge, 2008).
- Holmes, James R., Andrew C. Winner and Toshi Yoshihara, *Indian Naval Strateg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 Howarth, Stephen, *To Shining Sea: 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avy, 1775-1998*(Norman, Oklahoma: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9).
- Johnston, Alastair Iai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 Johnston, Ronald John, Derek Gregory, Geraldine Pratt and Michael Watts eds., *The Dictionary of Human Geography*, 4th edition (Malden, MA.: Blackwell, 2000).
- Kang, David C., *China Rising: Peace, Power, and Order in East As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 Kang, David C., *East Asia Before the West: Five Centuries of Trade and Tribu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 Kaplan, Morton A., *System and Proces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57).
- Kearns, Gerry, *Geopolitics and Empire: The Legacy of Halford Mackind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 Kennedy, Greg, *Anglo-American Strategic Relations and the Far East, 1933-1939*(London: Frank Cass, 2002).

- Kennedy, Paul, *The Rise and Fall of British Naval Mastery*, with a New Introduction by the Author (New York: Humanity Books, 2004).
- Kennedy, Paul,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 Kennedy, Paul, *The Rise of the Anglo-German Antagonism 1860-1914*(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80).
- Keohane, Robert and Joseph S. Nye Jr.,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3rd. edition (New York: Longman, 2001).
- Keohane, Robert and Joseph S. Nye Jr.,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1977).
- Keohane, Robert O.,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 Khanna, Parag, *The Second World: Empires and Influence in the New Global Order*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8).
- Kindlebrg, Charles P.,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 Kissinger, Henry, *A World Restored: Metternich, Castlereagh and the Problem of Peac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73).
- Kissinger, Henry, *The White House Years* (Boston: Little Brown, 1979).
- Knox, Paul and John Agnew, *The Geography of the World Economy* (London: Edward Arnold, 1989).
- Kupchan, Charles A., *The Vulnerability of Empir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 Kydd, Andrew H., *Trust and Mistru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 Lambi, Nicolai I., *The Navy and German Power Politics, 1862-1914* (Winchester, Mass.: Allen & Unwin, 1984).
- Lattimore, Owen,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New York: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1951).
- Lattimore, Owen, *The Mongols of Manchuria: their tribal divisions,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historical relations with Manchus and Chinese, and present political problems* (New York: H. Fertig, 1969).
- Levathes, Louise, *When China Ruled the Sea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4).
- Little, Richar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etaphors, Myths, and Mode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 Lowe, Peter, *Contending with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m: British Policy Towards South-East Asia* (Basingstoke, England: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 Lukas, Richard C., *Bitter Legacy: Polish-American Relations in the wake of World*

- War II* (Lexington, Kentucky: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82).
- Luttwak, Edward, *Strategy: The Logic of War and Peace*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 Luttwak, Edward, *The Endangered American Dream: How to Stop the United States from Becoming a Third World Country and How to Win the Geo-Economic Struggle for Industrial Supremac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3).
- Luttwak, Edward, *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an Empire from the First Century A.D. to the Third*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6).
- Luttwak, Edward, *The Political Uses of Sea Power*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4).
- Mackinder, Halford J., *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Defense Classic Edition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Mahan, Alfred T., *The Problem of Asia: Its Effect up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Transaction, 2003).
- Maiolo, Joseph A., *The Royal Navy and Nazi Germany, 1933-1939: A Study in Appeasement and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1998).
- Marriott, J. A. R., *A History of Europe: From 1815-1939* (London: Methuen, 1960).
- McCwire, Michael and John McDonnell eds., *Soviet Naval Influence: Domestic and Foreign Dimensions* (New York: Praeger, 1977).
- McDougall, Walter A., *Let the Sea Make a Noise: A History of the North Pacific from Magellan to MacArthu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3).
- Mearsheimer, John J.,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2001).
- Medeiros, Evan S., Roger Cliff, Keith Crane, and James C. Mulvenon, *A New Direction for China's Defense Industry* (Santa Monica, California: RAND, 2005).
- Milne, Andrew, *Metternich*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Press, 1975).
- Modelski, George and William R. Thompson, *Seapower in Global Politics, 1494-1993* (London: Macmillan, 1988).
- Modelski, George, *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7).
- Morgenthau, Hans J.,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5th ed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8).
- Nadkarni, Vidya, *Strategic Partnership in Asia: Balancing Without Alliances* (London: Routledge, 2010).
- Nathan, Andrew and Robert S. Ross, *The Great Wall and the Empty Fortress: 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 (New York: W. W. Norton: 1998).

- Nixon, Richard, *Leaders* (New York: Warner Books, 1982).
- Nye Jr., Joseph S.,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 Ó Tuathail, Gearóid, Simon Dalby and Paul Routledge, *The Geopolitics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1998).
- O'Brien, Phillips Payson, *British and American Naval Power: Politics and Policy, 1900-1936* (Westport, Connecticut: Praeger, 1998).
- O'Dowd, Edward C., *Chinese Military Strategy in the Third Indochina War: The Last Maoist War* (London: Routledge, 2007).
- O'Loughlin, John eds., *Dictionary of Geopolitics*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94).
- O'Sullivan, Patrick, *Geopolitic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6).
- Otte, T. G. and Keith Neilson eds., *Railway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ath of Empire, 1848-1945* (London: Routledge, 2006).
- Palmer, Alan Warwick, *Metternich*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2).
- Parker, Geoffrey, *Geopolitic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London: Printer, 1998).
- Parker, Geoffrey, *Western Geo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Croom Helm, 1985).
- Pillsbury, Michael, *China Debates the Future Security Environment* (Honolulu, Hawaii: University Press of the Pacific, 2005).
- Reynolds, P. A.,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Longman, 1980).
- Rosecrance, Richard and Arthur A. Stein eds., *The Domestic Bases of Grand Strateg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 Rozman, Gilbert, *China's Strategic Thought toward Asi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 Russett, Bruce, *The Prisoners of Insecurity: Nuclear Deterrence, the Arms Race, and Arms Control* (New York: W. H. Freeman and Company, 1983).
- Schroeder, Paul W.,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Politics: 1763-1848*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4).
- Scobell, Andrew, *China's Use of Military Force: Beyond the Great Wall and the Long March*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Sheehan, Michael J., *The Balance of Power: History and Theory*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 Shirk, Susan, *China: Fragile Superpower*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Sondhaus, Lawrence, *Preparing for Weltpolitik: German Sea Power before the Tirpitz Era* (Annapolis, Marylan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7).

- Sondhaus, Lawrence, *The Naval Policy of Austria-Hungary, 1867-1918: Navalism,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the politics of Dualism* (West Lafayette, Ind.: Purdu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Spanier, Joh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 II*, 10th edition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85).
- Spykman, Nicholas J., *American Strategie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42).
- Swaine, Michael D. and Ashley J. Tellis, *Interpreting China's Grand Strateg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Santa Monica: Rand, 2000).
- Taylor, Peter J., *Political Geography: World-economy, nation-state and locality*, third edition (Essex, England: Longman, 1993).
- Terrill, Ross, *The New Chinese Empire and What It Mea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3).
- Thomson, David, *Europe since Napoleon*,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2).
- Till, Geoffrey, *Maritime Strategy and the Nuclear Age* (London: Macmillan, 1982).
- Till, Geoffrey, *Sea Power: A Guid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 Trevelyan, George M., *History of England* (London: Longmans, Green, 1926).
- Van Dijk, Rudd eds., *Encyclopedia of the Cold War* (New York: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8).
- Van Evera, Stephen, *Causes of War: Power and the Roots of Conflic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 Van Evera, Stephen, *Guide to Methods for Students of Political Scienc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 Vego, Milan N., *Austro-Hungarian Naval Policy, 1904-1914* (London; New York: Frank Cass, 1996).
- Vego, Milan N., *Naval Strategy and Operations in Narrow Seas* (London: Frank Cass, 1999).
- Vego, Milan N., *Soviet Naval Tactics* (Annapolis, Marylan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2).
- Wallerstein, Immanuel,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I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4).
- Wallerstein, Immanuel, *The Modern World-system: II Mercantilism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1600-1750*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0).
- Wallerstein, Immanuel, *The Modern World-system: III The Second Era of Great*

Expansion of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 1730-1840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9).

Walton, C. Dale, *Geopolitics and the Great Power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Multipolarity and the revolution in strategic perspectiv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Waltz, Kenneth 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1979).

Weatherbee, Donald 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Southeast Asia: the Struggle for Autonomy* (Lanham,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9).

Wegener, Wolfgang, *The Naval Strategy of the World War* (Annapolis, Marylan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89).

Wendt, Alexander E.,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專書譯著

Castex, Raoul, *Strategic Theories*, trans. by Eugenia C. Kiesling (Annapolis, Marylan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4).

Wegener, Edward, *The Soviet Naval Offensive*, trans. by Henning Wegener (Annapolis, Maryland: United States Naval Institute, 1975).

專書篇章

Bateman, Sam, "The Emergent Maritime Future of the Asia-Pacific Region," in Lawrence W. Prabhakar, Joshua H. Ho, and Sam Bateman eds., *The Evolving Maritime Balance of Power in the Asia-Pacific: Maritime Doctrines and Nuclear Weapons at Sea* (Singapore: Institute of Defence and Strategic Studies and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2006), pp. 244-246.

Booth, Ken, "The Concept of Strategic Culture Affirmed," in Carl G. Jacobsen eds., *Strategic Power: USA/USSR* (London: Macmillan, 1990), pp. 125-126.

Breemer, Jan S., "Taking Our Share in the Turmoil of the World: America Builds a New Navy, 1890-1900," in Kenneth J. Hagan eds., *In Peace and War: Interpretations of American Naval Policy, 30th Anniversary* (West Port, Conn.: Praege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2008), pp. 134-153.

Buzan, Barry, "Beyond Neorealism: Interaction Capacity," in Barry Buzan, Charles Jones, and Richard Little eds., *The Logic of Anarchy: Neorealism to Structural Re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74.

Buzan, Barry, "Rethinking System and Structure," in Barry Buzan, Charles Jones and Richard Little ed., *The Logic of Anarchy: Neorealism to Structural Re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69.

Buzan, Barry, "The Level of Analysis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Reconsidered,” in Ken Booth and Steve Smith 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oday* (University Park,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204.
- Christensen, Thomas J., “Windows of War: Trend Analysis and Beijing’s Use of Force,” 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 Ross ed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51.
- Cole, Bernard D., “China’s Maritime Strategy,” in Susan M. Puska eds.,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fter Next* (Carlisle, Pennsylvania: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U.S. Army War College, 2000), p. 294, p. 319.
- Dreisbach, Kai, “Between SEATO and ASE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egional Organization of Southeast Asia,” in Marc Frey, Ronald W. Pruessen, and Tan Tai Yong eds.,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utheast Asia: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on Decolonization* (New York: M. E. Sharpe, 2003), pp. 246, 251.
- Finkelstein, David M., “Chinese Perceptions of the Cost of a Conflict,” in Andrew Scobell eds., *The Costs of Conflict: The Impact on China of a Future War* (Honolulu, Hawaii: University Press of the Pacific, 2005), pp. 9-25.
- Fravel, Taylor M., “China Views India’s Rise: Deeping Cooperation, Managing Differences,” in Ashley J. Tellis, Travis Tanner, and Jessica Keough ed, *Strategic Asia 2011-12: Asia Responds to Its Rising Powers, China and India* (Washington, D.C.: 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2011), pp. 74-75.
- Goldstein, Avery, “Across the Yalu: China’s Interests and the Korean Peninsula in a Changing World,” 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 Ross ed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37.
- Gray, William Glenn, “West Germany and the Lost German East: Two Narratives,” in Charles W. Ingrao and Franz A.J. Szabo eds., *The German and the East* (West Lafayette, Indiana: Purdu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406-407.
- Grove, Eric, “Naval Technology and Stability,” in Win A. Smit, John Grin & Lev Voronkov, eds, *Military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Stability in a Changing World* (Amsterdam: VU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212.
- Herwig, Holger H., “Wolfgang Wegener and German Naval Strategy From Tirpitz to Raeder,” in Wolfgang Wegener, *The Naval Strategy of the World War* (Annapolis, Marylan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89), p. xliv..
- Hobson, Rolf, “Prussia, Germany and Maritime Law from Armed Neutrality to Unlimited Submarine Warfare, ” in Rolf Hobson and Tom Kristiansen eds., *Navies in Northern Waters, 1721-2000* (London: Frank Cass, 2004), pp. 99-100, 107-108.

- Johnston, Alastair Iain and Paul Evans, "China's Engagement with Multilateral Security Institutions," 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 Ross eds., *En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 (London: Routledge, 1999), pp. 235-272.
- Kennedy, Paul M., "The Relevance of the Pre-war British and American maritime Strategies to the First World War and its Aftermath, 1898-1920," in John B. Hattendorf and Robert S. Jordan eds. foreword by Robert O'Neill, *Maritime Strategy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Britain and Americ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MacMillan, 1989), pp. 165-188.
- Keohane, Robert and Joseph S. Nye Jr., "Introduction," in Joseph Nye and John D. Donahue eds., *Governance in a Globalizing World* (Cambridge, Mass.: Visions of Governance for the 21st Century, 2000), pp. 2-12.
- Kim, Hyun-Ki, "The Possibility of Naval between Korea and Japan," in Choon Kun Lee, *Sea Power and Korea in the 21st Century* (Seoul: The Sejong Institute, 1994), p. 184.
- Kim, Samuel S., "Chinese Foreign Policy Faces Globalization Challenges," in Alastair Ian Johnston and Robert S. Ross ed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284-288.
- Kong, Yuen Foong, "Coping with strategic uncertainty: the role of institutions and soft balancing in Southeast Asia's post-Cold War strategy," in J.J. Suh, P. Katzenstein and A. Carlson (eds), *Rethinking Security in East Asia: Identity, Power, and Efficiency*(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72-208.
- Macmillan, Alan and Ken Booth, "Appendix: Strategic Culture— Framework for Analysis," in Ken Booth and Russell Trood ed., *Strategic Culture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London: Macmillan, 1999), pp. 365-366.
- Maiolo, Joseph A., "Naval Diplomacy in Northern Waters: The Origins of the Anglo-Scandinavian Naval Agreement of 21 December 1938," in Rolf Hobson and Tom Kristiansen eds., *Navies in Northern Waters, 1721-2000* (London: Frank Cass, 2004), Volume 2, p. 204.
- Maiolo, Joseph A., "The Admiralty and the Anglo-German Naval Agreement of 18 June 1935," in Andrew Lambert eds., *Naval History 1850-present* (Hampshire: Ashgate, 2007), Volume II, pp. 101-102.
- Maiolo, Joseph A., "The Admiralty and the Anglo-German Naval Agreement of 18 June 1935," in Andrew Lambert eds., *Naval History 1850-present* (Hampshire: Ashgate, 2007), Volume II, pp. 87-126.
- McConaughy, Christopher, "China's Undersea Nuclear Deterrent: Will the U.S.

- Navy Be Ready?" in Andrew S. Erickson, Lyle J. Goldstein, William S. Murray, and Andrew R. Wilson eds., *China's Future Nuclear Submarine Force* (Annapolis, Marylan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7), p. 98.
- O'Dowd, Edward C. and John F. Corbett Jr., "The 1979 Chinese Campaign in Vietnam: Lessons Learned," in Laurie Burkitt, Andrew Scobell, Larry M. Wortzel eds. *The Lessons of History: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t 75* (Carlisle, Pa.: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U.S. Army War College, 2003), pp. 353-378.
- Parsons, Talcott and Edward A. Shils, "Categories of the Orientation and Organization of Action," in Talcott Parsons and Edward A. Shils eds., *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Action*(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p. 107, p. 108.
- Parsons, Talcott, "An Outline of the Social System," in Talcott Parsons, Edward A. Shils, Kaspar Naegele, and Jesse R. Pitts eds., *Theories of Society*(New York: Free Press, 1961), p. 201.
- Percival, Bronson, "Growing Chinese and Indian naval power: U.S. recalibration and coalition building," in Sam Bateman and Joshua Ho ed., *Southeast Asia and the Rise of Chinese and Indian Naval Pow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pp. 36-47.
- Pollard, A. F.,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Edgar Algernon Robert Cecil eds., *Essays on Liberalism* (London: W. Collins Sons, 1922).
- Robinson, Ronald E., "Introduction: Railway Imperialism," in Clarence B. Davis and Kenneth E. Wilburn, Jr., with Ronald E. Robinson eds., *Railway Imperialism*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91), p. 2, p. 3, pp. 7-8.
- Røksund, Arne, "The *Jeune École*: The Strategy of the Weak," in Rolf Hobson and Tom Kristiansen eds., *Navies in Northern Waters, 1721-2000* (London: Frank Cass, 2004), pp. 117-130.
- Ropp, Theodore, "Continental Doctrines of Sea Power," in Edward Mead Earle eds.,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Military Thought from Machiavelli to Hitler*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448, p. 449, p. 451.
- Rozman, Gilbert, "The Sino-Russian Strategic Partnership: How Close? Where To?" in James Bellacqua eds., *The Future of China-Russia Relations* (Lexington, Kentucky: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10), pp. 13-32.
- Shambaugh, David, "Return to the Middle Kingdom? China and Asia in the Early Twenty-First Century," in David Shambaugh eds., *Power Shift: China and Asia's New Dynamics*(Berk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pp. 23-47.
- Sloan, Geoffrey and Colin S. Gray, "Why Geopolitics?" in Colin S. Gray and

- Geoffrey Sloan eds., *Geopolitics, Geography and Strategy* (London: Frank Cass, 1999), pp. 1-2, p. 3.
- Sutter, Robert G., "China's Strategy Toward Vietnam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in David Elliot eds., *The Third Indochina Conflict*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1), pp. 184-185.
- Tellis, Ashley J., "Overview: The United States and Asia's Rising Giants," in Ashley J. Tellis, Travis Tanner, and Jessica Keough ed, *Strategic Asia 2011-12: Asia Responds to Its Rising Powers, China and India* (Washington, D.C.: 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2011), pp. 12-13.
- Thayer, Charlyle A., "China's 'New Security Concept' and Southeast Asia," in David W. Lovell eds., *Asia-Pacific Security: Policy Challenges* (Canberra: Asia Pacific Press, 2003), pp. 89-107.
- Turk, Richard W., "Defending the New Empire, 1901-1914," in Kenneth J. Hagan eds., *In Peace and War: Interpretations of American Naval Policy, 30th Anniversary* (West Port, Conn.: Praege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2008), pp. 154-168.
- Wang, Gungwu, "The Cultural Impactions of the Rise of China on the Region," in Kokubun Ryosei and Wang Jisi eds., *The Rise of China and a Changing East Asian Order* (Tokyo: Jap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 2004), pp. 77-87.
- Wang, Jisi, "China's Changing Role in Asia," in Kokubun Ryosei and Wang Jisi eds., *The Rise of China and a Changing East Asian Order* (Tokyo: Jap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 2004), pp. 5-6.
- Wight, Martin,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Herbert Butterfield and Martin Wight eds., *Diplomatic Investigations: Essay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66), p. 151.
- Wolfers, Arnol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Arnolds Wolfers eds., *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126.
- Xia, Liping,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Views toward CBMs," in Michael Krepon, eds., *Chinese Perspectives on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Washington D.C.: The Henry L. Stinson Center, 1997), pp. 21-22.

期刊文章

- Abd Samad, Paridah and Abu Darusalam Bakar, "Malaysia-Philippines Relations: The Issue of Sabah," *Asian Survey*, Vol. 32, No. 6(June 1992), pp. 554-563.
- Acharya, Amitav, "Will Asia's Past Be Its Futur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8, No. 3(Winter 2003/04), pp. 149-164.
- Agnihotri, Kamlesh Kumar, "China's Naval Aviation and its Prospective Role in Blue

- Water Capabilities of the PLA Navy,” *Maritime Affairs*, Vol. 6, No. 2(Winter 2010), p. 37, p. 44.
- Agnihotri, Kamlesh Kumar, “Strategic Direction of the PLA Navy: Capability and Intent Assessment,” *Maritime Affairs*, Vol. 6, No. 1(Summer 2010), p. 87.
- Andrei P. Tsygankov, “Russia in the Post-Western World: The End of the Normalization Paradigm?” *Post-Soviet Affairs*, Vol. 25, No. 4(October/December 2009), p. 353, p. 357, p. 359.
- Bassin, Mark, “The Two Faces of Contemporary Geopolitics,” in “Is There a Politics to Geopolitics?”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Vol. 28, No. 5(October 2004), pp. 620-626.
- Berton, Peter, “International Subsystem-A Submacro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13, No. 4(December 1969), pp. 332-333.
- Blank, Stephen, “China’s Russian Far East,” *China Brief*, Vol. IX, No.16, August 5, 2009, pp. 8-10.
- Blank, Stephen, “New Strains Emerge in the Sino- Russian Military Relationship,” *China Brief*, Vol. X, No. 21, October 22, 2010, pp. 7-9.
- Blank, Stephen, “Why is Russian Energy Policy Failing in Asia?,” *Pacific Focus*, Vol. 26, No. 3(December 2012), pp. 405-427.
- Blank, Stephen, “Will China Join the Iran-Pakistan-India Pipeline?” *China Brief*, Vol. X No. 5(March 5 2010), pp. 8-10.
- Bonavia, David, “Sowing the Seeds of a Bigger War,”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March 9, 1979, p. 12.
- Brewster, David, “India’s Strategic Partnership with Vietnam: The Search for a Diamond on the South China Sea?” *Asian Security*, Vol. 5, No. 1(January 2009), pp. 24-37.
- Brewster, David, “The Australian-India Security Declaration: The Quadrilateral Redux?” *Security Challenges*, Vol. 6, No. 1(Autumn 2010), pp. 1-9.
- Brooks, Stephen G. and Wohlforth, William C., “Hard Times for Soft Balanc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Summer 2005), pp. 72-108.
- Brzezinski, Zbigniew and John J. Mearsheimer, “Clash of the Titans,” *Foreign Policy*, No. 146(Jan/Feb 2005), pp. 47-48, p. 49, and p. 50.
- Buszynski, Leszek, “The South China Sea: Oil, Maritime Claims, and U.S.-China Strategic Rivalry,”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35, No. 2(Spring 2012), pp. 150-152.
- Carothers, Thomas, “The Backlash Against Democracy Promotion,” *Foreign Affairs*, Vol. 85, No. 2 (Mar/Apr 2006), pp. 55-68.
- Cha, Victor D., “Powerplay: Origins of the U.S. Alliance System in Asia,”

-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4, No. 3(Winter 2009/10), pp. 158-196.
- Chanda, Nayan, "Mustering for a Battle on the Border,"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February 16, 1979, p. 11.
- Chen, Titus, "China's Reaction to the Color Revolutions: Adaptive Authoritarianism in Full Swing," *Asian Perspective*, Vol. 34, No. 2(April 2010), pp. 38-39.
- Cheng, Joseph Y. S. and Wankun Zhang, "Patterns and Dynamics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Behavio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1, No. 31(May 2002), pp. 244-250.
- Chernyavskii, Sergei Chernyavskii, "The Era of Gorshkov: Triumph and Contradictions," *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28, No. 2(April 2005), p. 306.
- Christensen, Thomas J., "China, the U.S.-Japan Alliance,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4(Spring 1999), pp. 49-80.
- Christensen, Thomas J., "Fostering Stability or Creating a Monster? The Rise of China and U.S. Policy toward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1, No. 1(Summer 2006), pp. 81-126.
- Cohen, Saul B., "Global Geopolitical Change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 81, No. 4(December 1991), pp. 556-565.
- DeLisle, Jacques, "Soft Power in a Hard Place: China, Taiwan, Cross-Strait Relations and U.S. Policy," *Orbis*, Vol. 54, No. 4(Fall 2010), pp. 493-524.
- Deng, Yong, "Remodling Great Power Politics: China's Strategic Partnerships with Russia, the European Union, and India", *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30, No. 4-5(August-October 2007) p. 882.
- Dollfus, Oliver, "The World System," *Geopolitics*, Vol. 5, No. 2(Autumn 2000), pp. 59-60.
- Erickson, Andrew S., Walter III, Ladwig C., and Mikolay, Justin D., "Diego Garc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Emerging Indian Ocean Strategy," *Asian Security*, Vol. 6, No. 3(September 2010), pp. 214-237.
- Freire, Maria Raquel, "Russian Policy in Central Asia: Supporting, Balancing, Coercing, or Imposing?" *Asian Perspective*, Vol. 33, No. 2 (Summer 2009), pp. 125-149.
- Futter, Andrew, "Getting the Balance Right: U.S. 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and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 30, No. 3(July/August 2011), p. 260.
- Ghebbardt, Alexander O., "The Soviet System of Collective Security in Asia," *Asian Survey*, Vol. 13, No. 12 (December 1973), pp. 1075-1091.
- Gleason, Gregory, "The Uzbek Expulsion of U.S. Forces and Realignment in Central

- Asia,”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Vol. 53, No. 2 (March/April 2006), pp. 49-60.
- Goh, Evelyn, “Southeast Asian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a Challenge,” *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30, No. 4-5(August-October 2007), pp. 810-823.
- Goh, Evelyn, “Great Powers and Hierarchical Order in Southeast Asia: Analyzing Regional Security Strategi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2, No. 3(Winter 2007/08), pp. 132-148.
- Gray, Colin S., “Strategic culture as context: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theory strikes back,”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5, Issue. 1(1999), pp. 46-69.
- Gupta, Arvind, “Geo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Arctic meltdown,” *Strategic Analysis*, Vol. 33, No. 2(March 2009), pp. 174-177.
- Gyorgy, Andrew, “The Geopolitics of War: Total War and Geostrategy,”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5, No. 4(November 1943), pp. 347-349.
- Haas, Ernst, “Structural Causes and Regime Consequences: Regimes as Intervening Variabl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4, No. 4(Autumn 1980), p. 553.
- Haas, Michael, “International Subsystem: Stability and Polarity,”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4, No. 1(March 1970), p. 100.
- Hansen, Kenneth P., “Raeder Versus Wegener: Conflict in German Naval Strategy,”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 58, No. 4(Autumn 2005), p. 103.
- Henrikson, Alan K., “The Geographical ‘Mental Map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Maker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 No. 4(1980), pp. 512-517.
- Hillgruber, Andreas, “England's Place in Hitler's Plans for World Domin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9, No. 1(January, 1974), pp. 5-22.
- Holmes, James R. and Toshi Yoshihara, “China’s Naval Ambitions in the Indian Ocean,” *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31, No. 3, June 2008, pp. 367-394.
- Holmes, James R. and Toshi Yoshihara, “Historic Rhymes: The German Precedent for Chinese Sea Power,” *Orbis*, Vol. 54, No. 1(Winter 2010), pp. 14-34.
- Holmes, James R. and Toshi Yoshihara, “History Rhymes: The German Precedent for Chinese Sea Power,” *Orbis*, Vol. 54, No.1 (Winter 2010), pp. 14-34.
- Holslag, Jonathan, “The Persistent Military Security: Dilemma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32, No. 6(December 2009), pp. 812-814.
- Horelick, Arnold L., “The Soviet Union’s Asian Collective Security Proposal: A Club in Search of Members,” *Pacific Affairs*, Vol. 47, No. 3(Autumn 1974), pp. 269-285.
- Horn, Robert C., “Vietnam and Sino-Soviet Relations: What Price Rapprochement?” *Asian Survey*, Vol. 27, No. 12(July 1987), pp. 729-747.

- Hung, Ming-Te and Tony Tai-Ting Liu, "Sino-U.S. Strategic Competition in Southeast Asia: China's Rise and U.S. Foreign Policy Transformation since 9/11," *Political Perspectives*, 2011 Vol. 5, No. 3(2011), pp. 105-106.
- Hughes, Christopher W., "Japan's responses to China's rise: regional engagement, global containment, dangers of collisi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5, No. 4(July 2009), pp. 840-841.
- Jain, Purnendra, "Westward Ho! Japan Eyes India Strategically," *Japanese Studies*, Vol. 28, No. 1(May 2008), pp. 15-30.
- Jencks, Harlan W., "China's 'Punitive' War on Vietnam: A military Assessment," *Asian Survey*, Vol. 19, No. 8(August 1979), p. 803.
- Jervis, Robert,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 30, No. 2 (January 1978), pp. 167-214.
- Jervis, Robert, "Unipolarity: A Structural Perspective," *World Politics*, Vol. 61, No. 1(January 2009), pp. 190-191.
- Johnston, Alastair Iain, "Is China a Status Quo Stat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4(Spring 2003), pp. 5-56.
- Kaiser, Karl, "The Inter- action of Regional Subsystems," *World Politics*, Vol. 21, No. 1(October 1968), p. 86.
- Kang, David C., "Getting Asia Wrong: The Need for New Analytical Framework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4(Spring 2003), p. 58.
- Kennedy, Paul M., "German Colonial Expansion. Has the 'Manipulated Social Imperialism' Been Ante-Dated?" *Past and Present*, No. 54(February 1972), pp. 136-137.
- Kier, Elizabeth, "Culture and Military Doctrine: France between the War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4(Spring 1995), pp. 65-93.
- Kissinger, Henry, "The Congress of Vienna: A Reappraisal," *World Politics*, Vol. 8, No. 2(January 1956), pp. 265, 266.
- Kluth, Michael Friederich and Jess Pilegaard, "Balancing beyond the horizon? Explaining aggregate EU naval military capability changes in a neo-realist perspective," *European Security*, Vol. 20, No. 1(March 2011), pp. 45-64.
- Koda, Ypji, "A New Carrier Race? Strategy, Force Planning, and JS Hyuga,"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 64, No. 3(Summer 2011), pp. 55-56.
- Krasner, Stephen D., "State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World Politics*, Vol. 28, No. 3(April 1976), pp. 322-323.
- Krasner, Stephen D., "Structural Causes and Regime Consequences: Regimes as Intervening Variabl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6, No. 2(Spring 1982), p. 186.
- Ladwig III, Walter C., "Delhi's Pacific Ambition: Naval Power, 'Look East,' and

- India's Emerging Influence in the Asia-Pacific," *Asian Security*, Vol. 5, No. 2(May 2009), p. 91, pp. 87-113.
- Layne, Christopher, "Offshore Balancing Revisited,"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15, No. 2(Spring 2002), pp. 245-246.
- Layne, Christopher, "The 'Poster Child for offensive realism': America as a global hegemon," *Security Studies*, Vol. 12, No. 2(Winter 2002/3), pp. 126-127.
- Layne, Christopher, "The Waning of U.S. Hegemony: Myth or Real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4, No. 1(Summer 2009), pp. 147-172.
- Lee, Chyungly, "Cross-Strait Participation in the Council for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A Case Study of a Multilateral Track Two Approach to Conflict Prevention," *Issues & Studies*, Vol. 45, No. 4(December 2009), pp. 189-215.
- Lee, Oliver M., "The Geopolitics of American Strategic Culture,"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 27, No. 3(May/June 2008), pp. 268-272.
- Legro, Jeffrey W., "What China Will Want: The Future Intentions of a Rising Power," *Perspective on Politics*, Vol. 5, No. 3(September 2007), p. 525.
- Levy, Jack S. and William R. Thompson, "Balancing on Land and at Sea: Do States Ally against Leading Global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5, No.1 (Summer 2010), pp. 13-15, pp. 16-18, pp. 19-36, and p. 40.
- Lieber, Keir A. and Gerard Alexander, "Waiting for Balancing: Why the World Is Not Pushing Back,"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Summer 2005), pp. 109-139.
- Liebman, Alex, "Trickle-down Hegemony? China's 'Peaceful Rise' and Dam Building on the Mekong,"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27, No. 2(August 2005), pp. 281-304.
- Lo, Jung-Pang, "Maritime Commerce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Sung Navy,"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Vol. 12, No. 1(1969), pp. 62-69.
- Lo, Jung-Pang, "The Emergence of China as a Sea Power During the Late Sung and Early Yuan Periods," *Far Eastern Quarterly*, Vol. 14, No. 4, Special Number on Chinese History and Society (August 1955), p. 498.
- Luttwak, Edward, "From geopolitics to geo-economics, Logic of conflict, grammar of commerce,"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20(Summer 1990), pp. 17-24.
- Mackinder, Halford J.,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23, No. 4(April 1904), pp. 421-437.
- Mackinder, Halford J., "The Physical Basis of Political Geography," *Scottish Geographical Magazine*, Vol. 6, Issue 2(February 1890), p. 84.
- Mackinder, Halford J., "The Round World and the Winning of the Peace," *Foreign Affairs*, Vol. 21, No. 4(July 1943), pp. 595-605.
- Mamadouh, V. D., "Geopolitics in the nineties: one flag, many meanings,"

- GeoJournal*, Vol. 46, No. 4(December 1998), p. 238, pp. 238-239.
- Megoran, Nick, "Guest Editorial: Neoclassical Geopolitics," *Political Geography*, Vol. 29, No. 4(May 2010), pp. 187-189.
- Millen, Raymond A., "Reconfiguring NATO for Future Security Challenges,"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 23, No. 2(April-June 2004), p. 128.
- Moss, Trefor, "ASEAN members divided on China maritime dispute," *Jane's Defence Weekly*, Vol. 48, No. 24, June 15, 2011, p. 24.
- Nexon, Daniel H.,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the Balance," *World Politics*, Vol. 61, No. 2(April 2009), pp. 338-340.
- Otsuka, Shigeru, "Central Asia's Rail Network and the Eurasian Land Bridge," *Japan Railway & Transport Review*, No. 28(September 2001), pp. 43-44.
- Owens, Mackubin Thomas, "In Defense of Classical Geopolitics,"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 52, No. 4(Autumn 1999), pp. 70-72.
- Pant, Harsh V., "The Pakistan Thorn in China-India-U.S. relations,"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35, No. 1(Winter 2012), p. 84, p. 86, p. 92.
- Papayoanou, Paul A., "Interdependence, Institutions,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Britain, Germany, and World War I,"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4(Spring 1996), pp. 42-76.
- Pape, Robert A., "soft Balancing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Summer 2005), pp. 7-45.
- Paul, T. V., "Soft Balancing in the Age of U.S. Prima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Summer 2005), pp. 46-71.
- Posen, Barry R., "Command of the Commons: The Military Foundation of U.S. Hegemon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8, No. 1(Summer 2003), pp. 5-41.
- Rahman, Chris, "Defending Taiwan, and why it matters,"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 54, No. 4(Autumn 2001), p. 77.
- Ratcliff, Ronald E., "Building Partners' Capacity: The Thousand-Ship Navy,"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 60, No. 4(Autumn 2007), pp. 44-58
- Rieker, Pernille, "The EU—A Capable Security Actor? Developing Administrative Capabilities," *European Integration*, Vol. 31, No. 6(November 2009), p. 703.
- Ripsman, Norrin M. and Jack S. Levy, "Wishful Thinking or Buying Time? The Logic of British Appeasement in the 1930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3, No. 2(Fall 2008), p. 156, p. 157.
- Rose, Gideon,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Vol. 50, No. 1(October 1998), p. 146.
- Ross, Robert S., "China's Naval Nationalism: Sources, Prospects, and the U.S. Respons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4, No. 2(Fall 2009), pp. 46-81.
- Ross, Robert S., "The Geography of Peace: East Asi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2(Spring 1999), pp. 81-118.
- Sakhuja, Vijay, "The Karakoram Corridor: China's Transportation Network in Pakistan," *China Brief*, Vol. X No. 20(October 8 2010), p. 6.
- Schroeder, Paul W.,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ystem: Balance of Power or Political Equilibrium?"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5, No. 2(April 1989), p. 138, pp. 143-144.
- Schuman, Frederick L., "Let Us Learn Our Geopolitics," *Current History*, Vol. 2, No. 9(May 1942), pp. 161-165.
- Schweller, Randall,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Summer 1994), pp. 72-107.
- Shambaugh, David,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at 50: Reform at Last,"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59 (September 1999), p. 661.
- Shepherd, Alistair J. K., "The European Union's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 A policy without Substance?" *European Security*, Vol. 12, No.1(Spring 2003), Table 1, on p. 44.
- Snyder, Glenn H., "Mearsheimer's World—Offensive Realism and the Struggle for Security: A Review Essa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1(Summer 2002), p. 164.
- Sumida, Jon, "Alfred Thayer Mahan, Geopolitician," *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22, Issue 2 & 3 (1999), p. 43.
- Swaine, Michael D., "China's Assertive Behavior, Part One: On 'Core Interests',"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No. 34(Winter 2011), p. 5, pp. 7-8, pp. 8-10.
- Tackett, Nicolas, "The Great Wall and Conceptualizations of the Border Under the Northern Song," *Journal of Song Yuan Studies*, Vol. 38 (2008), pp. 99-138.
- Tessman, Brock F., "System Structure and State Strategy: Adding Hedging to the Menu," *Security Studies*, Vol. 21, No. 2(April-June), pp. 192-231.
- Touzovskaia, Natalia, "EU — NATO Relations? How Close to 'Strategic Partnership'?" *European Security*, Vol. 15, No. 3(September 2006), pp. 245-246, p. 253.
- Tretiak, Daniel, "China's Vietnam War and Its Consequences," *The China Quarterly*, No. 80(December 1979), p. 746.
- Tretiak, Daniel, "The Sino-Japanese Treaty of 1978: The Senkaku Incident Prelude," *Asian Survey*, Vol. 18, No. 12(December 1978), pp. 1235-1249.
- Tucker, Mary Evelyn, "Religious Dimensions of Confucianism: Cosmology and Cultivation,"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Vol. 48, No. 1(January 1998), p. 8.
- Van Evera, Stephen, "Offense, Defense, and the Causes of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2, No. 4(Spring 1999), p. 19.
- Wagner, R. Harrison, "What was Bipolar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7,

- No.1 (Winter 1993), pp. 77-106.
- Walt, Stephen M., "Alliance Formation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9, No. 4 (Spring 1985), pp. 9-12.
- Walt, Stephen M., "Alliance in a Unipolar World," *World Politics*, Vol. 61, No. 1(January 2009), pp. 91-92.
- Walt, Stephen M., "The Case for Finite Containment: Analyzing U.S. Grand Strateg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 14, No. 1(Summer 1989), p. 9.
- Wang, Jisi, "China's Search for a Grand Strategy: A Rising Great Power Finds Its Way," *Foreign Affairs*, Vol. 90, No. 2(March/April 2011), p. 79.
- Wang, Yuan-kang, "China's Response to the Unipolar World: The Strategic Logic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Vol. 45, No. 5(October 2010), p. 555, p. 556, p. 557.
- Weatherbee, Donald E.,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in the Mekong River Basin,"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Vol. 20, No. 2(April/June 1997), p. 181.
- Wholphorth, William C., "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1 (Summer 1999), p. 9.
- Wishnick, Elizabeth, "Soviet Asian Collective Security Policy from Brezhnev to Gorbachev," *East Asia*, Vol. 7, No. 3(September 1988), pp. 3-28.
- Wong, John and Sarah Chan, "China-ASEAN Free Trade Agreement: Shaping Future Economic Relations," *Asian Survey*, Vol. 43, No. 3(May/June 2003), p. 517.
- Wu, Xinbo, "The End of Silver Lining: A Chinese View of the U.S.-Japanese Alliance,"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9, No. 1(Winter 2006), pp. 119-130.
- Yang, Kuisong, "Sino-Soviet Border Clash: From Zhenbao Island to Sino-American Rapprochement," *Cold War History*, Vo. 1, No. 1(August 2000), pp. 27-31.
- Yang, Philip, "From Strategic Competitor to Security Collaborator? New U.S.-China Tri-level Strategic Relations and Taiwan Security in a Post-9/11 World," *Issues & Studies*, Vol. 34, No. 4(December 2003), in note 8, pp. 187-188.
- Yoshihara, Toshi and James R. Holmes, "Japan's Emerging Maritime Strategy: Out of Sync or Out of Reach?"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 27, No. 1(Jan/Feb 2008), pp. 27-43.
- Yuan, Jing-dong, "Friend or Foe?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and U.S. China Policy in Transition," *East Asian Review*, Vol. 15, No. 3(Autumn 2003), in note 6, pp. 42-43.
- Zhan, Tiejun, "Chinese Strategic Culture: Traditional and Present Features," *Comparative Strategy*, Vo. 21, No. 2(Apr-Jun 2002), pp. 74-75, pp. 75-79, and pp. 80-81.
- Ziegler, Charles E., "Neomercantilism and Energy Interdependence: Russian Strategies in East Asia," *Asian Security*, Vol. 6, No. 1(January 2010), pp. 74-93.

Zinnes, Dina A., "An Analytical Study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Theorie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 No. 3(1967), pp. 270-288.

研討會論文

Yang, Shih-yueh & William C. Vocke Jr., "Chinese Aircraft Carrier Development: A Technical and Geostrategic Analysis," presented for 2011 Annual Conference on China Studies (Taipei: Graduat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October 1, 2011).

政府出版品

Department of Defense,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United States Security Strategy for the East-Asia-Pacific Region* (Washington D.C.: Pentagon, February 1995).

網路資料

「日本戦略研究フォーラム第19回シンポジウム詳報」, 日本戦略研究フォーラム会誌, Vol. 37 夏号(平成20年), http://www.jfss.gr.jp/kihou_20_Sumer.pdf, 頁46。

「沖ノ鳥島に港湾施設を整備へ 政府の『総合海洋政策本部』」, 産経新聞, 2011年 5月 27日, <http://sankei.jp.msn.com/politics/news/110527/plc11052712360017-n1.htm>。

「中国軍機、中間線越え 海自の情報収集妨害か」, 産経新聞, 2011年9月7日, <http://sankei.jp.msn.com/world/news/110907/chn11090707040002-n1.htm>。

「首相、3年でODA6000億円表明 日メコン首脳会議」, 産経新聞, 2012年 4月 21日, <http://sankei.jp.msn.com/politics/news/120421/plc12042112080007-n1.htm>。

「フィリピンなどに船艇供与 戦略的ODAで“対中包囲網”」, 産経新聞, 2012年 4月 29日, <http://sankei.jp.msn.com/politics/news/120429/plc12042901190000-n1.htm>。

「中国、軍事施設設置を検討 南シナ海の3諸島」, 産経新聞, 2012年6月28日, <http://sankei.jp.msn.com/world/news/120628/chn12062820140005-n1.htm>。

峯匡孝, 「日印共同訓練 中国の海洋覇権阻止の意志を示す」, 産経新聞, 2012年 6月 9日, <http://sankei.jp.msn.com/politics/news/120609/plc12060920480012-n1.htm>。

“‘Dynamic’ Japan-U.S. military cooperation sends message to China,” *The Asahi Shimbun*, April 28, 2012, http://ajw.asahi.com/article/behind_news/AJ201204280045.

“2008 Report to Congress of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 Committe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ttee*, November 2008, http://www.uscc.gov/annual_report/2008/annual_report_full_08.pdf, p. 141 and p. 142.
- “2010 a milestone for CIS,” *RIA Novosti*, December 29, 2010, <http://en.rian.ru/analysis/20101229/161977847.html>.
- “2011 Report to Congress of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tte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ttee*, http://www.uscc.gov/annual_report/2011/annual_report_full_11.pdf, pp. 7-8, 9-10, 182-189, 196, 365-366.
- “3 Oct 2011: Chinese-Russian security and energy relations are crumbling, says SIPRI,” *SIPRI*, October 3, 2011, <http://www.sipri.org/media/pressreleases/2011/3-oct-2011-chinese-russian-security-and-energy-relations-are-crumbling-says-sipri>.
- “96% of netizens support Qinghai-Tibet Railway extension to Nepal,” *People’s Daily Online*, October 15, 2009, <http://english.people.com.cn/90001/90776/90883/6784371.html>.
- “ABM Treaty Fact Sheet,” *The White House*, December 13, 2001, <http://georgewbush-whitehouse.archives.gov/news/releases/2001/12/20011213-2.html>.
- “About the Trans-Asian Railway,” *UNESCAP*, <http://www.unescap.org/ttdw/index.asp?MenuName=TheTrans-AsianRailway>.
- “Army has two new mountain divisions,” *The Times of India*, February 8, 2011, <http://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india/Army-has-two-new-mountain-divisions/articleshow/7448646.cms>.
- “Australia denies suggesting India-US security pact,” *BBC*, December 2, 2011, <http://www.bbc.co.uk/news/world-asia-india-15997836>.
- “Australia to revoke ban on uranium sale to India,” *The Times of India*, November 16, 2011, http://article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2011-11-16/india/30405412_1_uranium-sale-rory-medcalf-lowy-institute.
-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June 2011,” *BP Global*, http://www.bp.com/assets/bp_internet/globalbp/globalbp_uk_english/reports_and_publications/statistical_energy_review_2011/STAGING/local_assets/pdf/statistical_review_of_world_energy_full_report_2011.pdf, p. 8, 10, 22, 24.
- “Building a 600-Ship Navy: Costs, Timing, and Alternative Approaches,”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March 1982, <http://www.cbo.gov/ftpdocs/53xx/doc5336/doc13b-Entire.pdf>, p. xiii and pp. 3-4, retrieved on June 3, 2011.
- “Central Asia-China Gas Pipeline,” *China National Petroleum Corporation (CNPC)*, http://www.cnpc.com.cn/en/aboutcnpc/ourbusinesses/naturalgaspipelines/Central_Asia%EF%BC%8DChina_Gas_Pipeline_2.htm.

-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Chapter 1: Purpose and Principles,” *United Nations*, <http://www.un.org/en/documents/charter/chapter1.shtml>.
- “China Builds up Strategic Sea Lanes,” *The Washington Times*, January 17, 2005, <http://www.washingtontimes.com/news/2005/jan/17/20050117-115550-1929r/>.
- “China defense industry faces homemade engine troubles,” *The China Post*, July 20, 2011, <http://www.chinapost.com.tw/commentary/the-china-post/special-to-the-china-post/2011/07/20/310435/China-defense.htm>.
- “China deploys 11,000 troops in Gilgit area in Occupied Kashmir,” *The Indian Express*, August 28, 2010, <http://www.indianexpress.com/news/china-deploys-11-000-troops-in-gilgit-area-in-673770/>.
- “China harasses Indian naval ship in South China Sea,” *The Times of India*, September 2, 2011, <http://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india/China-harasses-Indian-naval-ship-on-South-China-Sea/articleshow/9829900.cms>.
- “China praises Zardari’s India visit,” *The Times of India*, April 8, 2012, <http://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india/China-praises-Zardaris-India-visit/articleshow/12580957.cms>.
- “China raps Myanmar over halting of \$4.7b dam project,” *The Strait Times*, October 2, 2011, http://www.straitstimes.com/BreakingNews/SEAsia/Story/STIStory_719077.html.
- “China resumes rare earth exports to Japan,” *BBC*, November 24, 2010, <http://www.bbc.co.uk/news/business-11826870>.
- “Chronology of U.S.-Soviet-CIS Nuclear Relations,” *Arms Control Association*, <http://www.armscontrol.org/print/217>.
- “CIS chiefs of staff want military integration,” *RIA Novosti*, December 3, 2010, <http://en.rian.ru/exsoviet/20101203/161615698.html>.
- “Collective Security Treaty Organization (CSTO),” *GlobalSecurity.org*,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world/int/csto.htm>, accessed on June 10, 2011.
- “Commemorating U.S. Peace and Security Partnerships in the Pacific,” Department of State, August 31, 2012,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2/08/197262.htm>.
- “CSTO's rapid-reaction force to equal NATO's - Medvedev,” *RIA Novosti*, February 4, 2009, <http://en.rian.ru/russia/20090204/119984654.html>;
- “DDH-161 Hyuga/16DDH "13,500 ton" ton Class,” *GlobalSecurity.org*, retrieved on June 11, 2011,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world/japan/ddh-x.htm>.
- “Defending Australia: in the Asia Pacific Century: Force 2030,” *Australian*

-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Defence*, 2009, http://www.defence.gov.au/capability/_home/cdaf/defence_white_paper_2009.pdf, pp. 41-44, 42-43.
- “Der Z Plan(Stand Anfang 1939),” *Bundeswehr, Marine*, http://www.marine.de/portal/a/marine/!ut/p/c4/TUzBCsIwFPuW_UBfh6DiTZGBO8yjbreufXQPt3a8tu7ix9seBBNICAmBATKdepNVkxbxTMzyh13QaN7EoFglH5OSCSBj0RHqKKBizh-TMiwltYDNyKP4DPMqrQaG9w1g0oouU1bKKnsXqOc6lScy5EWSgl_X1Ig_yh_qzb9q2G6Tc3brmXg5nC71BWJfluJ2r6gt9uSr9/.
- “End of 2010 Sees Increased Integration in CIS and CSTO,” *Central Asia-Caucasus Institute*, December 22, 2010, <http://www.cacianalyst.org/?q=node/5472>.
- “Freedom of Navigation, FY 2000-2003 Operational Assertions,” *Office of the Under Secretary of Defense for Policy*, http://policy.defense.gov/gsa/cwmd/docs/fon_fy00-03.html.
- “Full text of Xi’s interview with Washington Post,” *China Daily*, February 13, 2012, 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12xivisituz/2012-02/13/content_14596561.htm.
- “Global poll reveals rising concern about China's increasing power,” *BBC*, March 28, 2011, http://www.bbc.co.uk/pressoffice/pressreleases/stories/2011/03_march/28/poll.pdf.
- “HELSINKI EUROPEAN COUNCIL 10 AND 11 DECEMBER 1999, PRESIDENCY CONCLUSIONS: Annex 1 to annex IV on — strengthening the common European policy on security and defence,” European Parliament, http://www.europarl.europa.eu/summits/hel2_en.htm#IVa.
- “India pursuing independent foreign policy: Chinese daily,” *The Times of India*, April 6, 2012, http://article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2012-04-06/india/31299766_1_brics-summit-trilateral-dialogue-independent-foreign-policy.
- “India steps into Philippines-China spat over South China Sea,” *The Times of India*, May 11, 2012, <http://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india/India-steps-into-Philippines-China-spat-over-South-China-Sea/articleshow/13089219.cms>.
- “India tells China to stop infrastructure work in Pok,” *The Times of India*, September 6, 2011, http://article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2011-09-06/india/30118628_1_strategic-roads-india-china-border-zakama.
- “India, Australia call for 'freedom of navigation' on high seas,” *The Times of India*, December 8, 2011, http://article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2011-12-08/india/30490201_1_defence-cooperation-trilateral-security-pact-ban-on-uranium-sales.

- “India, China reject rivalry, seek strategic consensus,” *The Times of India*, December 16, 2010, <http://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india/India-China-reject-rivalry-seek-strategic-consensus/articleshow/7112213.cms>.
- “India, Japan, US meet today with China on minds,” *The Times of India*, December 19, 2011, http://article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2011-12-19/india/30533569_1_maritime-security-trilateral-dialogue-south-china-sea.
- “India, Japan, US meet today with China on minds,” *The Times of India*, December 19, 2011, http://article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2011-12-19/india/30533569_1_maritime-security-trilateral-dialogue-south-china-sea.
- “India, Vietnam launch security dialogue,” *The Times of India*, October 13, 2011, http://article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2011-10-13/india/30274619_1_extradition-treaty-similarly-welcome-vietnamese-investments-india-vietnam.
- “International Shipping and World Trade: Facts and Figures,”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October 2009, http://www.imo.org/KnowledgeCentre/ShippingFactsAndNews/TheRoleandImportanceofInternationalShipping/Documents/International%20Shipping%20and%20World%20Trade%20-%20facts%20and%20figures%20oct%202009%20rev1___tmp65768b41.pdf, p. 7.
- “Japan to write off \$3.7bn Burma debt,” *BBC*, April 27, 2012, <http://www.bbc.co.uk/news/world-asia-17797910>.
- “Japan–Vietnam Defense Ministerial Meeting (signing of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inistry of Defense, Japan Defense Focus*, No. 24(December 2011), <http://www.mod.go.jp/e/jdf/no24/leaders.html>.
- “Joint Press Availability with Japanese Foreign Minister Seiji Maehara,” *U.S. Department of State*, October 27, 2010,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0/10/150110.htm>.
- “Joint Statement from U.S., Singapore Defense Chiefs,” *IIP Digital*, April 5, 2012, <http://iipdigital.usembassy.gov/st/english/texttrans/2012/04/201204053355.html#axzz1toHU1aJg>.
- “Joint Statement of the U.S.-Japan Security Consultative Committe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ebruary 19, 2005, <http://2001-2009.state.gov/r/pa/prs/ps/2005/42490.htm>.
- “Keep off South China Sea, India warned,” *The Times of India*, April 5, 2012, <http://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india/Keep-off-South-China-Sea-India-warned/articleshow/12540393.cms>.
- “lines of communication,” *The Oxford Essential Dictionary of the U.S. Military*, <http://www.oxfordreference.com.ezproxy2.lib.nccu.edu.tw/views/ENTRY.html?e>

- ntry=t63.e4622&srn=1&ssid=987225047#FIRSTHIT.
 “lines of communication,”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Lines_of_communication.
- “Mekong River four-nation patrols begin after attacks,” *BBC*, December 10, 2011,
<http://www.bbc.co.uk/news/world-asia-16119515>.
-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1,” *Department of Defense*,
http://www.defense.gov/pubs/pdfs/2010_CMPR_Final.pdf, p. 38.
-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1,” *Department of Defense*,
http://www.defense.gov/pubs/pdfs/2011_cmpr_final.pdf, pp. 38-39.
-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1,” *Department of Defense*,
http://www.defense.gov/pubs/pdfs/2010_CMPR_Final.pdf, p. 38.
-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1,” *Department of Defense*,
http://www.defense.gov/pubs/pdfs/2011_cmpr_final.pdf, p. 21.
- “Myanmar reassures China on relations and cooperation,” *The Strait Times*, October
 30, 2011,
http://www.straitstimes.com/BreakingNews/SEAsia/Story/STIStory_728757.html.
- “Non-proliferation/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UN Security Council*,
 October 14, 2006,
<http://daccess-dds-ny.un.org/doc/UNDOC/GEN/N06/572/07/PDF/N0657207.pdf?OpenElement>; “Non-proliferation/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UN Security Council*,
 June 12, 2009,
<http://daccess-dds-ny.un.org/doc/UNDOC/GEN/N09/368/49/PDF/N0936849.pdf?OpenElement>.
- “Obama visit: Australia agrees US Marine deployment plan,” *BBC*, November 16, 2011,
<http://www.bbc.co.uk/news/world-asia-15739995>.
- “Obama, Russian president sign arms treaty,”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Data
 as March 2008, <http://www.fas.org/nuke/guide/summary.htm>, accessed on June 5,
 2011.
- “Opposition gathers against India’s UNSC push,” *The Time of India*, April 28, 2011,
http://article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2011-04-28/india/29482018_1_india-s-unsc-unsc-reform-process-countries.
- “Pak-China discuss rail line to connect Pok with Xinjiang,” *The Times of India*,
 September 4, 2011,
http://article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2011-09-04/china/30112339_1_xinjiang-east-turkistan-islamic-movement-etim.

- “Pan-European international Transport Corridor No. 2,” *Russian Railways*, accessed on May 23, 2011, http://eng.rzd.ru/isvp/public/rzdeng?STRUCTURE_ID=84.
- “PH seeks US military help amid China row,” *ABS-CBN News*, April 26, 2012, <http://beta.abs-cbnnews.com/nation/04/26/12/ph-seeks-us-military-help-amid-china-row>.
- “Polish-Russian Intergovernmental Commission on Economic Cooperation ended its session in Cracow,” *Ministry of Infrastructure, Poland*, April 22, 2011, <http://www.en.mi.gov.pl/2-482be1a920074-1793972.htm>.
-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Department of Defense*, September 30, 2001, <http://www.defense.gov/pubs/qdr2001.pdf>, p. 4.
-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Department of Defense*, February 2010, <http://www.defense.gov/qdr/qdr%20as%20of%2029jan10%201600.PDF>, p. 32.
- “Russia and CIS Allies Create Military Bloc, Establish Joint Stabilisation Fund,” *IHS*, February 5, 2009, <http://www.ihs.com/products/global-insight/industry-economic-report.aspx?id=106595885>.
- “Russia backs India's case for SCO membership,” *The Times of India*, June 12, 2010, http://article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2010-06-12/india/28313547_1_sco-russia-backs-india-and-pakistan.
- “Russia pledges support to India for SCO membership,” *IBN Live News*, November 17, 2011, <http://ibnlive.in.com/generalnewsfeed/news/russia-pledges-support-to-india-for-sco-membership/904924.html>.
- “Russia, Germany, Poland, and Belarus create joint railway enterprise,” *Russia-InfoCentre*, June 20, 2007, <http://www.russia-ic.com/news/show/4183/>.
- “Russian media said China’s new transport aircraft will be equipped with improved early-warning 7,” *Military of China, force comment*, August 30, 2011, <http://www.9abc.net/index.php/archives/8909>.
- “Russian-Chinese Su-33 fighter deal collapses-paper,” *RIA Novosti*, March 10, 2009, <http://en.rian.ru/russia/20090310/120493194.html>.
- “Schengen Agreement,” *The Official website of the European Union*, [http://eur-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CELEX:42000A0922\(02\):EN:HTML](http://eur-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CELEX:42000A0922(02):EN:HTML).
- “Schengen zone: Delay for Bulgaria and Romania to join,” *BBC*, June 9, 2011, <http://www.bbc.co.uk/news/world-europe-13709768>.
- “Seychelles Invites China to Set Up Anti-Piracy Base,” *Defense News*, December 2, 2011, <http://mobile.defensenews.com/story.php?i=8450805&c=ASI&s=SEA>.
- “Shock: the four small countr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ogether Chinese fishing boats movng force in Chinese water,” *Finance Online*, June 14, 2012, <http://www.finance-ol.com/2012/06/shock-the-four-small-countries-in-the-south>

- china-sea-together-chinese-fishing-boats-moving-force-in-chinese-waters/.
- “Singapore Changi naval base,” *GlobalSecurity.org*, retrieved on May 26, 2011,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facility/singapore.htm>.
- “Stay away from South China Sea: China warns India,” *IBNLive*, March 25, 2012, <http://ibnlive.in.com/news/stay-away-from-south-china-sea-china-warns-india/242460-2.html>.
- “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ies Defens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January 6, 2012, <http://graphics8.nytimes.com/packages/pdf/us/20120106-PENTAGON.PDF>, pp. 2, 4.
- “The Boom in Shipping Trade,” *UNEP/GRID-Arendal*, <http://maps.grida.no/go/graphic/the-boom-in-shipping-trade1>.
- “The Carrier Strike Group,” *Official Website of the United States Navy*, <http://www.navy.mil/navydata/ships/carriers/powerhouse/cvbg.asp>.
- “The EU Battlegroups,” *European Parliament*, September 12, 2006, http://www.europarl.europa.eu/meetdocs/2009_2014/documents/sede/dv/sede030909notebattlegroups_/sede030909notebattlegroups_en.pdf, pp. 4-7.
- “The European Union’s ‘Headline Goal’-Current Status,” *Center for Defense Information*, <http://www.cdi.org/document/search/displaydoc.cfm?DocumentID=966&StartRow=1&ListRows=10>, accessed on June 8, 2011.
-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Navy: A Modern Nav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November 20, 2009, <http://www.fas.org/irp/agency/oni/pla-navy.pdf>, p. 21.
- “Trans-Asian Railway: The three-stage development,” *UNESCAP*, http://www.unescap.org/ttdw/common/TIS/TAR/images/tarmap_latest.jpg.
- “U.S. ‘is back’ in Asia, Secretary of State Hillary Clinton declares,” *New York Daily News*, July 21, 2009, http://articles.nydailynews.com/2009-07-21/news/17929594_1_north-korea-nuclear-weapons-program-nuclear-technology.
- “U.S. Won’t Cut Carrier Fleet Below 11: SecDef,” *Defense News*, January 22, 2012, <http://www.defensenews.com/article/20120122/DEFREG02/301220001/U-S-Won-8217-t-Cut-Carrier-Fleet-Below-11-SecDef>.
- “U.S.-China Joint Statement,” *The White House*, January 19, 2011,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1/01/19/us-china-joint-statement>.
- “U.S.-China Joint Statement,” *The White House*, November 17, 2009,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us-china-joint-statement>.
- “US, Russia to join EAS group,” *The Strait Times*, July 20, 2010, http://www.straitstimes.com/BreakingNews/SEAsia/Story/STIStory_555712.html.

- “Uzbekistan: Tashkent Throws Temper Tantrum over New Russian Base in Kyrgyzstan,” *EurasiaNet.org*, August 3, 2009, <http://www.eurasianet.org/departments/insightb/articles/eav080409a.shtml>.
- “Vietnam Buys Russian Kilo Class Subs, Su-30 Fighters, Nuke Plant,” *Defense Industry Daily*, March 31, 2010, <http://www.defenseindustrydaily.com/Vietnam-Reportedly-Set-to-Buy-Russian-Kilo-Class-Subs-05396/>.
- “Vietnam, Japan agree on cooperation for maritime security,” *Thanh Nien News*, July 16, 2012, <http://www.thanhniennews.com/index/pages/20120716-vietnam-japan-to-enforce-cooperation-in-marine-security.aspx>.
- “We want friendly ties with both US and China: PM,” *The Times of India*, March 25, 2012, http://article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2012-03-25/india/31236165_1_open-economy-today-sections-and-stake-holders-nuclear-security-summit.
- “With China on mind, India, US and Japan to hold trilateral meet in Washington,” *The Indian Times*, December 6, 2011, http://article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2011-12-06/india/30481091_1_trilateral-dialogue-trilateral-meeting-asia-pacific.
- “Worried about China machismo, PM told US,” *The Indian Times*, September 4, 2011, http://article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2011-09-04/india/30112112_1_peaceful-rise-afghanistan-china.
- Ahmad, Tufail, “Chinese Military Taking Over Gilgit Baltistan, Pakistan Considering Proposed to Lease the Disputed Region to China for 50 Years,” *Institute for Gilgit Baltistan Studies*, February 10, 2012, <http://www.gilgitbaltistan.us/Analyses/chinese-military-taking-over-gilgit-baltistan-pakistan-considering-proposal-to-lease-the-disputed-region-to-china-for-50-years-by-tufail-ahmad-memri.html>.
- Alexander, David and Jim Wolf, “Pentagon cuts reshape military, trim costs,” *Reuters*, January 26, 2012,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2/01/26/us-usa-defense-budget-idUSTRE80P1SP20120126>.
- Allsion, Tony, “A new era in Asian shipping,” *Asian Times online*, September 2, 2000, <http://www.atimes.com/se-asia/BI02Ae06.html>.
- Amurao, George, “Philippines arms itself with new pacts,” *Asia Times Online*, August 2, 2012, http://www.atimes.com/atimes/Southeast_Asia/NH02Ae01.html.
- Analytical department of RIA RosBusinessConsulting, “Medvedev: Far East ignored too long, Without action, Russia will lose it, he says,” *RosBusinessConsulting*,

- September 26, 2008,
<http://www.rbcnews.com/komment/komment.shtml?2008/09/26/32133807>.
- Axe, David, "Chinese Carrier Lacks Fighters," *The Diplomat*, May 5, 2011,
<http://the-diplomat.com/flashpoints-blog/2011/05/05/chinese-carrier-lacks-key-aircraft/>.
- Barnard, Anne, "China Sought to Sell Arms to Qaddafi, Documents Suggest,"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5, 2011,
<http://www.nytimes.com/2011/09/05/world/africa/05libya.html?pagewanted=all>.
- Bennett, Mia, "Senate to consider UNCLOS ratification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2007,"
 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 May 16, 2012,
<http://foreignpolicyblogs.com/2012/05/16/senate-unclos-time-2007/>.
- Berteau, David J., Michael J. Green et al., "U.S. Force Posture Strategy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An Independent Assessment," CSIS, August 1, 2012,
http://csis.org/files/publication/120814_FINAL_PACOM_optimized.pdf, p. 17.
- Bhattacharya, Abanti, "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the Qinghai-Tibet Railway," *Institute for Defence Studies & Analyses*, July 7, 2006,
http://www.idsa.in/idsastrategiccomments/StrategicImplicationsoftheQinghaiTibetRailway_ABhattacharya_070706.
- Billo, Andrew and Shufen Yan, "Tiger, Tiger: Can the US and China 'Live Harmoniously'?" *Asia Society*, February 22, 2012,
<http://asiasociety.org/blog/asia/tiger-tiger-can-us-and-china-live-harmoniously>.
- Blanchard, Ben and Benjamin Kang Lim, "China Shrugs off Report of Tropical Nuclear Sub Base," *Reuters*, May 6, 2008,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idUSPEK14567120080506>.
- Blask, Dennis J. and M. Taylor Fravel, "Much Ado About The Sansha Garrison," *The Diplomat*, August 23, 2012,
<http://thediplomat.com/2012/08/23/much-ado-about-the-sansha-garrison/>.
- Bower, Ernest Z. and Grefory Poling, "Advanc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s of the United States: Ratification of the Law of the Sea," Southeast Asia from the Corner of 18th & K Streets, Volume III, Issue 10, May 25, 2012,
http://csis.org/files/publication/120525_SoutheastAsia_Vol_3_Issue_10.pdf, p. 2.
-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June 2010,"
BP,
http://www.bp.com/liveassets/bp_internet/globalbp/globalbp_uk_english/reports_and_publications/statistical_energy_review_2008/STAGING/local_assets/2010_downloads/statistical_review_of_world_energy_full_report_2010.pdf, p. 6, p. 8, and p. 22.
- Bradsher, Keith and Hiroko Tabuchi, "China is Said to Halt Trade in Rare-Earth Minerals With Japan,"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4, 2010,

- <http://www.nytimes.com/2010/09/25/business/global/25minerals.html?ref=asia>.
- Bradsher, Keith, "Amid Tension, China Blocks Crucial Exports to Japan,"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3, 2010, <http://www.nytimes.com/2010/09/24/business/global/24rare.html?pagewanted=all>.
- Bradsher, Keith, "China Suspends Boat Traffic in Mekong,"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1, 2011, http://www.nytimes.com/2011/10/11/world/asia/china-suspends-boat-traffic-on-mekong.html?_r=1&ref=asia.
- Brannen, Kate, "Dempsey, Panetta to Congress: Pass sea treaty," *Naval Times*, May 23, 2012, <http://www.navytimes.com/news/2012/05/military-martin-dempsey-leon-panetta-to-congress-pass-sea-treaty-052312d/>.
- Carreno, Jose, Thomas Culora, and Thomas Hone, "What's New About the AirSea Battle Concept?," *Proceedings Magazine*, Vol. 136, No. 8(August 2010), <http://www.usni.org/magazines/proceedings/2010-08/whats-new-about-airsea-battle-concept>.
- Chanlett-Avery, Emma, "Singapore: Background and U.S. Relations,"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s, February 25, 2011, <http://www.fas.org/sgp/crs/row/RS20490.pdf>, p. 5.
- Chanlett-Avery, Emma, Bruce Vaughn, "Emerging Trends in the Security Architecture in Asia: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Ties Among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ustralia, and India,"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January 7, 2008, <http://www.fas.org/sgp/crs/row/RL34312.pdf>, p. 16.
- Chaudhuri, Debasish, "China-Pakistan Railway Project," Vivekananda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http://www.vifindia.org/China-Pakistan-Railway-Project>.
- CNN Wire Staff, "Obama, Russian president sign arms treaty," *CNN*, April 8, 2010, <http://edition.cnn.com/2010/POLITICS/04/08/obama.russia.treaty/index.html>.
- CNN Wire Staff, "Obama, Russian president sign arms treaty," *CNN*, April 8, 2010, <http://edition.cnn.com/2010/POLITICS/04/08/obama.russia.treaty/index.html>.
- Collins, Gabe and Andrew Erickson, "'Flying Shark' Gaining Altitude: How might new J-15 strike flight improve China's maritime air warfare ability?" *China SignPost*, June 8, 2011, <http://www.chinasignpost.com/2011/06/flying-shark%E2%80%9D-gaining-altitude-how-might-new-j-15-strike-fighter-improve-china%E2%80%99s-maritime-air-warfare-ability/>.
- Cossa, Ralf A. and Brad Glossman, "Return to Asia: It's Not (All) About China," *PactNet*, No. 7(January 30, 2012), <http://csis.org/files/publication/Pac1207.pdf>.

- Dasgupta, Saibal, "After warning India, China asks Russia to stay away from South China Sea," *The Times of India*, April 10, 2012, http://article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2012-04-10/china/31317893_1_facts-and-international-law-sea-dispute-south-china-sea.
- Dasgupta, Saibal, "China offers goodies to Pakistan, urges world powers not to abandon it," *The Times of India*, December 24, 2011, http://article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2011-12-24/china/30554350_1_turkmenistan-nation-gadwar-yousuf-raza-gilani.
- Dasgupta, Saibal, "China warns India against exploring oil in South China Sea ahead of Krishna's visit to Hanoi," *The Times of India*, April 5, 2012, http://article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2011-09-15/india/30159956_1_south-china-sea-sea-disputes-jiang-yu.
- Emerson, Michael, and Evgeny Vinokurov, "Optimisation of Central Asia and Eurasian Inter-Continental Land Transport Corridors," *Munich Personal RePEc Archive*, December 2009, http://mpra.ub.uni-muenchen.de/20916/1/MPRA_paper_20916.pdf, p.9.
- Engdahl, F. William, "Russia, Europe and USA: Fundamental Geopolitics," *Global Research*, September 4, 2008, <http://www.globalresearch.ca/index.php?context=va&aid=10062>.
- FlorCruz, Jaime A., "China works hard to project soft power," *CNN*, March 30, 2012, <http://edition.cnn.com/2012/03/30/world/asia/florcruz-china-soft-power/index.html>.
- Garvey, Daniel L., "The European Rapid Reaction Force: Just How Serious are They?" April 9, 2002, *DTIC Online-Information for the Defense Community*, <http://www.dtic.mil/cgi-bin/GetTRDoc?Location=U2&doc=GetTRDoc.pdf&AD=ADA404288>, pp. 12-15.
- Gayathri, Amrutha, "South China Sea: China Warns US Against 'Muddying The Water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imes*, June 3, 2012, <http://www.ibtimes.com/articles/348110/20120603/south-china-sea-warns-against-muddying-waters.htm>.
- Gertz, Bill, "Inside the Ring," *The Washington Times*, August 27, 2007, <http://www.washingtontimes.com/news/2007/aug/17/inside-the-ring-11086842/>.
- Giles, Keir, "Russia'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to 2020," *Conflict Studies Research Centre*, June 2009, <http://conflictstudies.co.uk/files/RusNatSecStrategyto2020.pdf>, p. 7.
- Halloran, Richard, "US' Keating argues for exchanges with China," *Taipei Times*, February 22, 2009, <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editorials/archives/2009/02/22/2003436750>.

- Yang, Hengjun, "Reading between the lines of Xi Jinping's U.S. visit," *China Media Project*, February 22, 2012, <http://cmp.hku.hk/2012/02/22/19518/>.
- Holmes, James R. and Toshi Yoshihara, "China Aims for Deterrence at Sea," *The Providence Journal*, October 1, 2009, http://www.projo.com/opinion/contributors/content/CT_holmes1_10-01-09_A2FSAUI_v8.3f8ca36.html.
- Hon, Chua Chin, "China to ship oil through Mekong next month," *Strait Times*, April 8, 2006, http://groups.google.com/group/lancang-mekong/browse_thread/thread/e086ce12ba8e0096/a1d5822b4505604b.
- Jakobson, Linda, "China Prepares for an Ice-Free Arctic," SIPRI Insight on Peace and Security, No. 2010/2, March 2010, <http://books.sipri.org/files/insight/SIPRIInsight1002.pdf>.
- Jiang, Julie and Jonathan Sinton, "Overseas Investments by Chinese National Oil Company: Assessing the Drivers and Impacts,"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http://www.iea.org/papers/2011/overseas_china.pdf, p. 12.
- Johnsen, William T., "Redefining Land Power for the 21st Century,"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http://www.strategicstudiesinstitute.army.mil/pdffiles/pub312.pdf>, pp. 6-8.
- Kalita, Prabin, "IAF moving Sukhoi base to northeast to thwart Chinese threat," *The Times of India*, June 10, 2009, http://article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2009-06-10/india/28190068_1_su-30mki-air-base-chabua.
- Kern, Soren, "Why France Wants to Rejoin NATO?" *The Brussels Journal*, April 28, 2008, <http://www.brusselsjournal.com/node/3208>.
- Khilnani, Sunil et al, "Non-Alignment 2.0: A Foreign and Strategic Policy for the 21st century," *Centre for Policy Research*, February 29, 2012, http://cprindia.org/sites/default/files/NonAlignment%202.0_1.pdf, pp. 14-15, p. 40, pp. 41-42.
- Kostecka, Daniel, "Hambantota, Chittagong, and the Maldives – Unlikely Pearls for the Chinese Navy," *China Brief*, Vol. 10, No. 23, November 19, 2010, http://www.jamestown.org/programs/chinabrief/single/?cHash=a82d537697&tx_ttnews%5Btt_news%5D=37196.
- Krishnan, Ananth, "China ready to support India bid for UNSC," *The Hindu*, July 16, 2011, <http://www.thehindu.com/news/international/article2233806.ece>.
- Kristensen, Hans M., "China's Noisy Nuclear Submarines,"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November 21, 2009, <http://www.fas.org/blog/ssp/2009/11/subnoise.php>.
- LaFraniere, Sharon, "China to Join Effort to Patrol Mekong River," *New York Times*,

- November 10, 2011,
http://www.nytimes.com/2011/11/10/world/asia/china-will-patrol-mekong-with-southeast-asian-neighbors.html?_r=1&ref=asia.
- Li, Jianwei, Ramses Amer, “China and US Views on Military Vessel Rights in the EEZ is More Than a Legal Matter?” *China US Focus*, August, 10, 2011,
<http://www.chinausfocus.com/peace-security/china-and-us-views-on-military-vessel-rights-in-the-eez-is-more-than-a-legal-matter/>.
- Lieberthal, Kenneth and Wang Jisi, “Addressing U.S.-China Strategic Distrust,” *Brookings Institution*, March 30, 2012,
http://www.brookings.edu/~media/Files/rc/papers/2012/0330_china_lieberthal/0330_china_lieberthal.pdf.
- Lukyanov, Fyodor, “Russia to include Pakistan in the SCO puzzle,” *RT*, May 13, 2011,
<http://rt.com/politics/columns/unpredictable-world-foreign-lukyanov/russia-pakistan-sco-us/>.
- Mawdsley, Jocelyn and Gerrard Quille, “Equipping the Rapid Reaction Force: Options for and Constraints on a European Defence Equipment Strategy,” *Bon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Conversion*, 2003,
<http://www.bicc.de/uploads/pdf/publications/papers/paper33/paper33.pdf>, pp. 48-78
- Mearsheimer, John J., “Hans Morgenthau and the Iraq War: Realism Versus Neo-conservatism,” *OpenDemocracy*, May 18, 2005,
http://www.opendemocracy.net/democracy-americanpower/morgenthau_2522.jsp.
- Mearsheimer, John J., “The Rise of China Will Not Be Peaceful at All,” *The Australian*, November 18, 2005,
<http://mearsheimer.uchicago.edu/pdfs/P0014.pdf>.
- Metallinou, Spyridoula-Amalia, “Energy Security: The Russian Trans-Siberian Pipeline and the Sino-Japanese Courtship,”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eptember 2006,
http://www.idis.gr/GR/Ekpaideutika/hydra_papers/metallinou_amalia-spyridoula.pdf.
- Minnick, Wendell, Ansari Usman and Nabi Abdullaev, “Russia Fears Competition From Chinese Fighter Jets,” *Defense News*, July 11, 2010,
<http://www.defensenews.com/article/20100711/DEFFEAT04/7110303/Russia-Fears-Competition-From-Chinese-Fighter-Jets>.
- Mir, Amir, “China seeks military bases in Pakistan,” *Asia Times Online*, October 26, 2011, http://www.atimes.com/atimes/South_Asia/MJ26Df03.html.
- Mogato, Manuel, “U.S. triples military aid to Philippines in 2012,” *Reuters*, May 3, 2012,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2/05/03/us-philippines-usa-idUSBRE8420IU2>

0120503.

- Mogato, Manuel, "Philippines studying U.S. offer to deploy spy planes," *Reuters*, January 27, 2012,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2/01/27/us-philippines-usa-idUSTRE80Q0L520120127>.
- Morales, Javier, "Russia's New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Towards a 'Medvedev Doctrine'?" *Real Instituto Elcano*, September 25, 2009, http://www.realinstitutoelcano.org/wps/portal/rielcano_eng/Content?WCM_GLOBAL_CONTEXT=/elcano/elcano_in/zonas_in/ari135-2009.
- Ni, Lexiong, "Sea Power and China's Development," *Liberation Daily*, 17 April 2005, 4,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Website, 5, http://www.uscc.gov/researchpapers/translated_articles/2005/05_07_18_Sea_Power_and_Chinas_Development.pdf4.
- O'Rourke, Ronald, "China Naval Modernization: Implications for U.S. Navy Capabilities—Background and Issues for Congress,"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August 10, <http://www.fas.org/sgp/crs/row/RL33153.pdf>, p. 45, 46, 82.
- Oki, Seima and Kyoko Yamaguchi, "China, Russia team up on territorial claims," *Daily Yomiuri Online*, September 29, <http://www.yomiuri.co.jp/dy/national/T100928004811.htm>.
- Pandit, Rajat & Saibal Dasgupta, "China 'warns' India with border drill," *The Times of India*, March 23, 2012, http://article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2012-03-23/india/31229503_1_chabu-a-airbases-actual-control.
- Pandit, Rajat, "Pentagon warns India of Chinese build-up," *The Times of India*, August 26, 2011, http://article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2011-08-26/india/29931170_1_ballistic-missile-css-5-df-31a.
- Pandit, Rajat, and Sachin Parashar, "US, China woo India for control over Asia-Pacific," *The Times of India*, June 7, 2012, http://article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2012-06-07/india/32100282_1_asia-pacific-defence-cooperation-defence-secretary.
- Pazzibugan, Dona Z., "Defense Chief Accuses China of Double Talk," *Inquire News*, July 23, 2011, <http://newsinfo.inquirer.net/27935/defense-chief-accuses-china-of-double-talk>.
- Pehrson, Christopher J., "String of Pearls: Meeting the Challenge of China's Rising Power Across the Asian Littoral,"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http://www.strategicstudiesinstitute.army.mil/pdf/files/pub721.pdf>, p. 3.

- Perlez, Jane, "China competes with West in aid to its neighbors,"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8, 2006, http://www.nytimes.com/2006/09/18/world/asia/18iht-web.0918aid.2845121.html?_r=1&pagewanted=all.
- Pradhan, Shirish B, "Extend Tibet railway line to Kathmandu, Nepal tells China," *The Indian Express*, October 12, 2009, <http://www.indianexpress.com/news/extend-tibet-railway-line-to-kathmandu-nepal/527936/>.
- Prak, Chan Thul, "Hu wants Cambodia help on China Sea dispute, pledges aid," *Reuters*, March 31, 2012,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2/03/31/us-cambodia-china-idUSBRE82U04Y20120331>.
- Pubby, Manu, "China Proposed Division of Pacific, Indian Ocean Regions, We Declined: US Admiral," *Indian Express*, May 15, 2009, <http://www.indianexpress.com/news/china-proposed-division-of-pacific-indian-ocean-regions-we-declined-us-admiral/459851/>.
- Rahman, Maseeh, "Chinese plans in Seychelles revive Indian fears of encirclement," *The Guardian*, March 22, 2012, <http://www.guardian.co.uk/world/2012/mar/22/china-seychelles-indian-fears-encirclement>.
- Raman, B., "China: India Strategic Strangulation," *South Asia Analysis Group*, Paper no. 4069, September 20, 2010, <http://www.southasiaanalysis.org/%5Cpapers41%5Cpaper4069.html>.
- Raza, Ali, "India upsets as China endorses Pakistan for Non-Permanent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seat," *New Pakistan*, October 20, 2011, <http://www.newspakistan.pk/2011/10/20/india-upsets-as-china-endorses-pakistan-for-non-permanent-united-nations-security-council-seat/>.
- Richardson, Michael, "Singapore welcomes US aircraft carrier,"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March 22, 2001, <http://www.singapore-window.org/sw01/010322ih.htm>.
- Richburg, Keith B., William Wan, and William Branigin, "China warns U.S. in island dispute," *The Washington Post*, June 23, 2011,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china-warns-us-in-island-dispute/2011/06/22/AGTiVxfH_story.html.
- Richter, Paul and Alex Rodriguez, "Chinese bank pulls out of Pakistan-Iran pipeline project," *Los Angeles Times*, March 14, 2012, <http://www.latimes.com/news/nationworld/world/la-fg-pakistan-china-pipeline-20120315,0,2392636.story>.

- Rogers, James, and Luis Simón, "Think Again: European Geostrategy," *European Geostrategy, Ideas on Europe*, March 14, 2010, <http://europeangeostrategy.ideason europe.eu/2010/03/14/think-again-european-geostrategy/>.
- Sarsembaev, Iliyas, "Russia: No Strategic Partnership With China in View," *China Perspectives*, No. 65(May/June 2006), <http://chinaperspectives.revues.org/631>.
- Saxena, Shoban, "India, Russia, China unite on North Korea," *The Times of India*, April 14, 2012, http://article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2012-04-14/india/31341817_1_trilateral-meeting-brics-russia-and-china.
- Shambaugh, David, "Beijing: A Global Leader With 'China First' Policy," *YaleGlobal Online Magazine*, June 29, 2010, <http://yaleglobal.yale.edu/content/beijing-global-leader-china-first-policy>.
- Shambaugh, David, "The year China showed its Claws," *Financial Times*, February 16, 2010, <http://www.ft.com/intl/cms/s/0/7503a600-1b30-11df-953f-00144feab49a.html#a xzz1xN4f6SPI>.
- Shlapentokh, Dmitry, "China locked out of Russia's far east," *Asia Times Online*, Mar 2, 2012, http://www.atimes.com/atimes/Central_Asia/NC02Ag01.html.
- Singh, Mandip, "The Proposed PLA Naval Base in Seychelles and India's Options," *Institute for Defence Studies & Analyses*, December 15, 2011, http://www.idsa.in/idsacomments/TheProposedPLANavalBaseinSeychellesandIndiasOptions_msingh_151211.
- Smith, Julianne, "The NATO-Russia Relationship: Defining Moment or Déjà Vu?"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November 2008, http://csis.org/files/media/csis/pubs/081110_smith_natorussia_web.pdf.
- Stokes, Mark A. with Cheng Dean, "China's Evolving Space Capabilities: Implications for U.S. Interests," *Project 2049 Institute*, April 26, 2012, http://project2049.net/documents/uscc_china-space-program-report_april-2012.pdf.
- Sueldo, Alejandro, "Kremlin's Fear of China Drives Its Foreign Policy," *The Moscow Times*, August 30, 2011, <http://www.themoscowtimes.com/opinion/article/kremlins-fear-of-china-drives-its-foreign-policy/442862.html>.
- Taylor, Claire and Tim Youngs, "China's Military Posture,"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Defence Section, House of Commons Library Research Paper 08/15, February 21, 2008, available at *UK Parliament Website*, www.parliament.uk/briefing-papers/RP08-15.pdf, p. 30.
- Tyson, Ann Scott, "Navy Sends Destroyer to Protect Surveillance Ship After Incident

- in South China Sea,” *Washington Post*, March 13, 2009,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9/03/12/AR2009031203264.html>.
- Uren, David, “China emerges as our biggest trade partner,” *The Australian*, May 5, 2007, <http://www.theaustralian.com.au/news/nation/china-emerges-as-our-biggest-trade-partner/story-e6frg6nf-1111113474544>.
- Vannarith, Chheanh, “An Introduction to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al Cooperation,” *Cambodian Institute for Cooperation and Peace*, CICP Working Paper, No. 34, March 2010, http://www.cicp.org.kh/download/CICP%20Working%20series/CICP%20Working%20Paper%20No%2034_An%20Introduction%20to%20Greater%20Mekong%20Subregional%20Cooperation.pdf, pp. 10-11.
- Verma, Kumod, “India agrees to be part of Trans-Asian Railway Network,” *The Times of India*, April 1, 2012, <http://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city/patna/India-agrees-to-be-part-of-Trans-Asian-Railway-Network/articleshow/12488320.cms>.
- Vikas Bajaj, “China’s ‘string of pearls’ meant to encircle India?” *Deccan Herald*, February 2012, <http://www.deccanherald.com/content/53291/chinas-string-pearls-meant-encircle.html>.
- Wang, Qian, “More ships to bolster maritime monitoring,” *China Daily*, May 10, 2012, 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12-05/10/content_15252829.htm.
- Weston, Jonathan, Caitlin Campbell, and Katherine Koleski, “China’s Foreign Assistance in Review: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United States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September 1, 2011, http://www.uscc.gov/researchpapers/2011/9_1_%202011_ChinasForeignAssistanceinReview.pdf, p. 13
- Wolf, Jim, “Pentagon says aims to keep Asia power balance,” *Reuters*, March 8, 2012,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2/03/08/us-china-usa-pivot-idUSBRE82710N20120308>.
- Wong, Edward, “Chinese Vice President Urges U.S. to Respect ‘Core Interests’,”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6, 2012, <http://www.nytimes.com/2012/02/16/world/asia/vice-president-xi-jinping-of-china-urges-united-states-to-respect-core-interests.html>.
- Yan, Xueting, “How China Can Defeat America,”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0, 2011, <http://www.nytimes.com/2011/11/21/opinion/how-china-can-defeat-america.html>

?pagewanted=all.

Yardley, Jim, "BRICS Leaders Fail to Create Rival to World Bank,"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29, 2012, http://www.nytimes.com/2012/03/30/world/asia/brics-leaders-fail-to-create-rival-to-world-bank.html?_r=1&ref=asia#.

Yoshihara, Toshi & James R. Holmes, "The Next Arms Race," January 8, 2010, *The Diplomat*, <http://apac2020.the-diplomat.com/feature/the-next-arms-race/>, p. 2.

"Cambodia, U.S. naval forces to conduct joint drill this weekend," *People's Daily Online*, February 23, 2011, <http://english.people.com.cn/90001/90777/90851/7297922.html>.

"U.S. Marines, Cambodian Forces Continue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and Disaster Relief Cooperation," *Embassy of the United States Phnom Penh, Cambodia*, December 12, 2011, http://cambodia.usembassy.gov/121211_pr.html.

"United States, Cambodia Begin First Joint Military Exercise of the Year," *Embassy of the United States Phnom Penh, Cambodia*, March 12, 2012, http://cambodia.usembassy.gov/031212_pr.html.

